《黑羊与灰鹰》

（套装共3册）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

作者:[英]丽贝卡·韦斯特

译者: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ISBN:978750868069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导读

导游手册的作者一般不具备艺术家那样的个性。他或她总是完完全全因地言事，最理想者莫过于隐匿身形，只将可靠的信息如公交车时刻表、何处落脚、博物馆开放时间传递出来。然而在光谱的另一端，摄影师迈克尔·阿克曼（Michael Ackerman）在其《创之作》（*Fiction*）一书中说：“一个地点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对它的感知。”

文学性的旅游札记则居于导游手册的刻板与阿克曼的唯我论的两极之间，并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最优秀的游记作者论及公交时刻表的可靠性或许有限，然而他们所书写的却是关于一个国度公交的永恒真理——或至少是这些作者与那些公共交通之间关系的永恒真理。比如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对于地点场景的敏锐反应既观照当下，又深邃辽远。编辑和出版商都深知他的这一天赋，劳伦斯本人也乐于将它转换为经济收益。

1921年，丽贝卡·韦斯特去佛罗伦萨拜访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时，道格拉斯开玩笑说，劳伦斯只需要在市镇逗留几小时，可能就已经构思好一篇文章，“将那里人们的脾气个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在韦斯特看来，这似乎“显然是在干一件傻事”。不过道格拉斯说得没错：他们去劳伦斯落脚的宾馆看他，发现他正奋笔疾书。韦斯特当时认为，劳伦斯并不真正了解佛罗伦萨，不足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直到劳伦斯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劳伦斯“那时所写的是他自己在那一刻的心灵情状”，这情状只能用象征性的语词才能表达。因此，“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城市，都是一种象征”。

韦斯特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1931年。那时，她还不曾踏上孕育《黑羊与灰鹰》这本书的第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但对于她的这部巨著来说，因劳伦斯而起的，对游记写作逻辑的认识却意义非凡。事实上，这部鸿篇巨制中，她在南斯拉夫的经历可谓微乎其微。正如知名的巴尔干专家伊迪丝·达勒姆（Edith Durham）当时的恶意评论所言：“小说家韦斯特小姐写下的这部鸿篇巨制所依托的不过是一次愉快的南斯拉夫之旅，而此前她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一无所知。”确切地说，韦斯特小姐曾三次前往南斯拉夫：第一次，1936年春，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前去做讲座；第二次，1937年春，与丈夫亨利·安德鲁斯同行；第三次是1938年初夏。最初，她希望快笔写出一本“速记”，可惜第二次旅程的四个月后，这一可能令其名利双收的冒险之作却变得“面目可憎、繁复缠结，激不起任何人的兴趣”。

在研究南斯拉夫“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中，韦斯特掌握并梳理了她本人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同时也了解到很多其他东西。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评价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卡什之毁灭》（*The Ruin of Kasch*）的话来说，《黑羊与灰鹰》有两个主题：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余一切。至该书出版（两卷本，共计五十万英文词汇）韦斯特才略带茫然地发现，自己“从1936年起投入了五年时光，花费巨资，殚精竭虑，以一种从任何寻常的艺术或商业眼光看都极不明智的方式，列清单似的将一个国家的林林总总记录下来，从头到脚直至最后一颗马甲纽扣也不放过”。因为“（她的）海量材料”内容不断增加，量变引起质变，以致这“清单”成了一幅巨型的、极其复杂的图画——不仅是她自己心灵的画像，更是处于“二战”边缘的欧洲画像。其结果是此书成为20世纪最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她曾担心“单是此书的篇幅，就几乎不会有人愿意看”。）

一如该书本身的不寻常，其声名更是不同寻常。韦斯特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位重要作家。假如有人觉得她算不得一流作家，那主要是因为确立她声望的多数作品所采取的文体被认为不像小说那样适于表现宏大的主题。而作为小说家，韦斯特的重要性显然不及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他在《尤利西斯》中天才般地“创造一种艺术形式，同时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或者福斯特。韦斯特最优秀的作品散落在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和游记之中——在传统看来，这些文体都属于左道旁门。《黑羊与灰鹰》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创造力，她顺其自然，将这种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该书很显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因为在英语里，文学（至少包括散文类别）与小说是同义语，因此这本书被默默地从本该归属的范畴里挪了出来并归于小说类。（当我向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提及自己正在写这篇导读时，她问我这本书是否是以南斯拉夫为背景的；她以为这是一本小说。）很明显，如果以评价小说的标准去看《黑羊与灰鹰》，即使它的品质上乘，其写作形式也并不符合小说的体例。所以可能一些次等的小说作品可以安然稳居榜单之中；而一部尴尬的大部头，因其本质上不属于这个序列，所以难以适应这种评价以确定其不凡的品质，它被安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为免于将其他卷册从顶级经典的书架上挤下来——或者说得更极端点，为免于将整个书架掀翻——《黑羊与灰鹰》从它应有的位置跌落下来，被默默地存放在一个较低的、不重要却安稳的位置。

一些评论家虽声称该书为杰作，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在《域外》（*Abroad*）中，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一篇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文学旅行”的调查得到了高度评价。然而，与伊夫林·沃（Waugh）、劳伦斯或者格林（Greene）不同，在这份调查中没有独立的一章对韦斯特做出评价，她的书也只是被顺口提及而已。维多利亚·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在其关于韦斯特的传记里充分肯定《黑羊与灰

鹰》是“韦斯特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一著作中，丽贝卡·韦斯特阐明了她对于宗教、道德、艺术、神话和性别的看法”。除此外，格伦迪宁对《黑羊与灰鹰》便再无话可说。对于所以努力表达它所激起的敬畏之情的尝试，难道这本书注定要拒斥吗？

为弥补这一缺憾，也为免于争议，我们姑且先这样说吧：这本书是关于南斯拉夫的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1993年，我在访问过塞尔维亚之后（凑巧跟韦斯特当年一样，也是因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缘故），为了解南斯拉夫，开始阅读这本书。这本书在那之前的几年间为回应一次局部冲突而重印发行，此次冲突恰恰被韦斯特以某种方式所预见。在《序章》里，韦斯特回忆说，自己“盯着”关于南斯拉夫国王的一部旧电影片段，“就像一个老妇细数她杯子里的茶叶残渣”（第15页）注。该书的预言特质不出十页便显露出来，当韦斯特说“人们的习惯是，当一个不善经营的老人一死，其事业随之分崩离析时，会说：‘啊，看这是怎样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稳稳当当的，可人家前脚刚一走，现在就成啥样子了！’”（第10页）我仍记得，1993年读这本书时我心中的迷惑，因为当时的局势极其复杂，让人不禁怀疑她笔下所写的并非弗朗茨·约瑟夫而是铁托。在这本书较后的科索沃部分中，韦斯特所雇的司机德拉古廷，拧着一个克罗地亚男孩的耳朵，语气里混杂着讽刺与威胁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们赶尽杀绝。”（第904页）甚至在我本人仅有的关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经历中，也曾多次亲见《黑羊与灰鹰》所描绘的场景。而作为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它更有着“极大的用途”，相当于一部形而上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而且永远不用更新版本。［如韦斯特本人所言，“有时，我们有必要知晓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永恒，在当下”（第825页）。］这部书的使用价值在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身上得以清楚地展示。他回忆道，自己在南斯拉夫，无论走到哪里，都与这本书寸步不离。“我宁可丢失护照、钱，也不想丢了被我翻旧的、写满注释的《黑羊与灰鹰》。”

如果你不在巴尔干半岛，或者对其毫无兴趣，那么书中大量谈及该地区历史的篇幅可能令你厌烦。不过，这却是只有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或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可能写出的史书。且看看1914年萨拉热窝那非比寻常的景象——那一年，就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前不久，他站在接待厅，发现里面挤满了自己狩猎生涯中所杀戮的大约五十万只野生动物（据他自己估计）：

> 你能想象，那么一个空间，从地上直至深红与金色的穹顶，各种毛皮与羽毛的幽灵充塞其间，仿佛是直达穹顶的钟乳石，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一头头雄鹿，它们鹿角的空隙里挤满山鹬、鹌鹑、野鸡、鹧鸪、

> 雷鸟，等等；一头头野猪，毛发竖立，胁腹贴着胁腹，宽阔的肚腹下面的空间里，层层叠叠挤压着各种兔子。这些动物的眼睛清澈且漆黑如水，它们将欢快地看着屠杀它们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一如当初它们自己那副模样。（第335—336页）

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时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正在那里执导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人们普遍觉得，舞台上的景象正是对剧场外面局势的某种荒诞主义的解说。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塔尔（该地以与萨拉热窝同样的方式，将国际社会扎了一下，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境况）某咖啡馆，一个类似的寓言也曾展现在韦斯特面前：

> 一束束白亮的灯光下，年轻军官在有节奏地来回穿梭。灯光倾泻在酸性绿的台球桌上，台球发出冷淡的碰撞声。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巴尔干情绪，怠惰苟且，顺从命运。似乎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个人进屋，挂起他的土耳其毡帽，然后解释说——措辞刚好足以让人理解，让人不致觉得是疯言乱语——所有桌前的人务必在原地等待，直到两位正在玩台球的军官打完一百万局比赛，并且众人永恒的命运将由球局的结果而定；而这样的要求却被人们接受了，人们一面看报，一面安静地坐着等待。（第289页）

韦斯特的目的是要“让过去与它所创造的现实并肩而行”（第1089页）。她的一部分成就就是试图揭示了，即便是明显不具历史性的知觉——比如被掐下的一朵花的香气——都饱含着过往的气息。地理与历史，其道理更是如此，常常难以分割。因此，特定的地域便会“给土地上的民众打上同样的烙印，不管历史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怎样的民众——即便是为了征服而将当地的人口灭绝，就像泼水一样把他们倒出去，再灌入种族、哲学截然不同的另一群人”（第747页）。不耐烦的读者，往往会跳过历史叙述的部分，但他们是在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过去——被叙述的历史——可能悄无声息地化入眼下的现实。最为引人注目的例证是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才被提出的（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论证确实有点太长），那是14世纪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杜尚统治期间，发生在普里什蒂纳的一件事。在大约二十页之后，我们得知了他的死亡：

> 在生命的第四十九年里，他死在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村庄小得今天已无迹可寻。他在痛苦中死去，似乎中了毒。由于他的死，一些不合意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我们坐在普里什蒂纳一家餐馆，手肘下的桌布仍带着污渍，盘子里的鸡瘦得像麻雀。一男一女朝我们走过来，

> 女的背上扛着一个犁头。（第894页）

啊！这岂非所曾见过的最大胆的跳切、最大胆的时间移位、最出乎人意料的推演？韦斯特并没就此打住。这对男女的出现，将她的思绪又拉回到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男人与女人之间让人欲说还休的关系：

> 在大男子主义不受限制的地方，女性被驱使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却没有权利实践自己的意愿。这种状况令人作呕，说它恶心，并不是因为工作对于女性的影响——她们总能从工作中学到东西——而是因为它让男人变成了废物。（第895页）

韦斯特仍未就此打住——又回想到史蒂芬·杜尚的死，然后才从餐桌旁起身，来到“一个土耳其式的厕所”：

> 地板上那黑乎乎的洞，以及厕所逼仄的空间里显得诡异的某种东西，让人觉得，似乎粪便——男人所排泄的——也树立起一种新的权力元素，充满敌意且具有魔力，能将其暗黑的浊流与恶臭的潮湿气息覆盖整个世界……我感觉那地方正用它的秽物将我玷污，而我永远无法再洗涤干净，因为那污秽的实质比温和的肥皂和水更加顽固。（第896页）

韦斯特仍然没就此打住……我们且绕回去片刻。为了检视所有涉及的问题的内在含义，这本书中无穷无尽的自我证明式的讨论，是韦斯特创作结构与写作风格的核心特色。她的所有结论都与过程（这本书的关键词）紧密相连。在此过程中，这些结论被一一梳理出来。任何能引起韦斯特注意的东西——比方说书的第507页[注]的一件小事，在一家餐馆里，收音机播放着一首莫扎特交响乐——都会被作者生动直观地传递出来。当韦斯特仔细描述和处理这一小插曲时，她会带着我们踏上一段偏离主题的旅程，直到推思默想至最幽深处，再准确无误地返回我们借以出发的地点或场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普林西普以此成为作者意图的积极代言人：“他将自己全身心地献给每一个大事件，以便彻底领悟这一事件如何揭示宇宙之本质。”（第378页）

以此看来，《黑羊与灰鹰》除了是一部浩大之作，还能是什么呢？即便是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的《文明大战》（*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的忠实读者，也可能觉得这令人一见难忘的大部头之所以厚

重的唯一原因是其丰富的积累以至于里面所包含的材料太过庞大。《黑羊与灰鹰》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其承载如此厚重。如威斯坦·休·奥登（W. H.Auden）在“给拜伦爵士的信”（“Letter to Lord Byron”，1936）中提到的，韦斯特需要“一种足够宏大的形式，以游弋其间”。作品思想的尺度，蕴含在它的词句和结构之中。经编辑节选的《丽贝卡·韦斯特精简本》（*The Essential Rebecca West*）看似方便，且颇具吸引力，却感觉像是一种对美的强暴。实际上，将这样一部作品精减到只剩要点是极不妥当的。我怀疑，其中的某些删减恰恰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却可能被删减者认为并非精华所在。这种删减制约了叙述的清楚度，也是韦斯特所一再公开反对的。我不想贬低《黑羊与灰鹰》作为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的重要意义，它基于“南斯拉夫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自然构造和色彩，与（韦斯特）想象力的内在构造与色彩，实现了近乎巧合的一致”（第1088页）。不过，虽然我所珍视的诸多部分源自南斯拉夫，它们却并非专属于世界的那一个部分。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举几个便已足够：一匹马“情欲炽盛而焦躁不安”，它“因为恐惧，也因为享受，眼珠儿直转，胃口好极地从食物中寻得安抚，马也明显知道可以从中获得安抚，并且追寻它所宣称的自己所恐惧之物”（第71页）；一个女人，“貌美若伯恩·琼斯的画，同时，她握紧的粗糙指关节，可以将她可爱的脸蛋揉擦出窟窿”（第58页）；那些穆斯林，“禁酒也不过是为了没了酒精照样能够陶醉兴奋罢了——这实在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第649页）

《黑羊与灰鹰》的文思河奔海聚，支流蜿蜒——你永远不会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但这并不是说它结构混乱。它可能枝叶蔓延——这是事实，但请记住，首先，一部表面上描述一次旅行经历的书，实际上却是三次不同的旅行天衣无缝的糅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熟悉了《荒凉山庄》或《尤利西斯》的复杂结构；在当代，我们赞赏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小说繁复缠结的情节、人物及主题。而《黑羊与灰鹰》却对读者的期望值提出了另一种要求。它是散文体的连续即兴创作，集统一性与流畅性于一体。就如同萨克斯手或号手的即兴演奏那样，韦斯特信笔漫游却不曾迷失路途的控制性因素是她的“基调”。“基调”在某些结构之承载上的大胆展现是这本书创新意义的关键所在。凭借总体上保持一致的基调，韦斯特能够轻松地在各个音区之间自由徜徉。她可以机智地说：“访问极为愉快，虽然一无所获——根本算不得访问。”（第750页）亦可戏谑：

> “那我们干吗不带上那本书呢？”我丈夫问道。“噢，那书简直比石头还重，”我说，“我在盥洗室的磅秤上称过。”“你称它干吗？”我丈夫问。“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除了自己这堆骨肉外，我已经不再知道任何别的东西的重量，”我说，“因此我拿起它来，以便让我的心思别有所寄。”（第140页）

韦斯特的文字可以诗情缱绻［“当我们驶近岸边，船身下的水体如淡绿的宝石，阳光洒落，可见到水底的沙子”（第222页）］，同时又那般奇异华美：

> 桥的前方，河面变得宽阔，水上长着一片黄色睡莲。两岸边缘像镶了一面带状的明镜，垂柳立岸，树的正下方，倒影映入水中。那惊人的绿，那千尾猫尾般下垂的柳枝，仿佛静态的礼花，让我们惊奇不已。（第1037页）

另一方面，当她鄙夷在波斯尼亚一家宾馆遇见的一个女人时，韦斯特也会出言不逊：“她就是残忍，她就是污秽。”（第438页）最让人惊奇的是，如此的一部长篇巨作中，韦斯特展现出叙事简洁的天赋：“（我们）再次置身于具有瑞士风情的乡间”（第296页），“一带裸露的山脉漆黑如夜，高耸的山脊上白雪点缀如星”（第734页），“一阵便士硬币大小的暴雨”（第510页）。

这篇导读的进程正被它的长篇累牍所妨碍，但终而言之，到底必须腾出一些空间，以便一瞥韦斯特的思想。《黑羊与灰鹰》出版几年后，韦斯特考虑过她的美国编辑本·休伯什的建议——写一本关于大英帝国的书。她本有心采纳这一建议，但“只能是在宗教与形而上学方面，我可以胡言乱语，提出只言片语的见解”，她于是断定，于如此一项研究，自己没什么新的东西可奉赠。当然，正是这点儿“胡言乱语”，才使得《黑羊与灰鹰》成为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巨著。在《尾声》中，韦斯特谈起她十多岁时，易卜生以他的方式“纠正了英国文学中的严重不足，即在认识思想动力方面的失败”。以其典型的热切语言，她后来认定，“易卜生对于思想观点的呼唤，就如人对于水的渴求，恰恰是因为缺这东西”。（第1086页）若说韦斯特只拥有一加仑水，那是低估了她。《黑羊与灰鹰》除了其他种种，更是一股思想观点的洪流。一如对于劳伦斯，你很难分清作者的知觉止于何处，思考又于何处发端。观察与玄思，思想与对于“生活的本真意义”（第235页）的即时反应，无时无刻不相互错杂而行。

这本书最大的思想恰恰是它的简洁，如此简单以至于别无他物：“愿合意之物胜于违逆”。

> 我们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这部分人喜好快乐，希望幸福的时日能更悠长；希望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这屋宇又将为后来者遮风挡雨。我们另有一半的人几近精神失常。他们偏好违逆的东西胜过合意如愿的东西，喜好痛苦，以及

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希望暴死横逆，致使生活回到原点，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除了被烟火熏黑的地基。（第1102页）

当韦斯特写下这些文字时，欧洲正一头栽向那样的灾难。1993年，我第一次读到《黑羊与灰鹰》时，电视画面上到处是熏黑的房屋地基，而且那里正是韦斯特曾描述过的地方。韦斯特内心受够了她本性厌恶之事的折磨，她意识到，要想得偿所愿，必须经过不懈的内心挣扎与政治斗争。她对于这一思想的坚持与信心，在奥登附于其十四行诗《战争时刻》（*In Time of War*，发表于1938年，当时韦斯特正埋头写作本书）的评论中得到回应：

理智胜于疯狂，为人所爱胜过为人所惧；

坐下来享受美餐，胜于胡乱填饱肚子；

两人同眠胜于孤枕独眠；快乐更合人心愿。

在两个案例中，谦逊的结尾都是智慧的明证——反之亦然。《黑羊与灰鹰》是一部浩瀚的、雄心勃勃的、繁复的巨著。它反复强调了普遍真理与朴素真理的亲缘关系。韦斯特坚信，“这只是敲出的一个低阶音符，换作贝多芬和莫扎特，弹奏出来的音节会高得多”。在黑山共和国，韦斯特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努力想弄明白降临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这次相遇使韦斯特相信，只要“在之后的千秋万代，每代中至少有一个人永不停歇地探寻命运的本质，甚至在命运抛弃他、打击他的时候仍不停歇，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解开宇宙之谜”（第1013页）。如果一个世纪里能有一本或两本，像《黑羊与灰鹰》这样的书，那么，那一天将指日可待。

杰夫·戴尔（Geoff Dyer）
2006年

---

1. 此处页码为英文版页码，下同。——编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皆为编者注。）

2. 此处为本书边码。

献给我南斯拉夫的朋友们，
他们如今全已死去或遭到奴役禁锢

……

许之以他们梦想的祖国，
让他们重又成为天国的子民。[注]

---

1. 本书初版于1941年。是年，纳粹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

弗鲁爱林：我想，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在马其顿。我告诉你，上尉，如果你看看世界地图，我保证你会发现，将马其顿与蒙默思郡做个比较，二者的地形，你瞧，很相似。马其顿有一条河，蒙默思郡也有一条河：蒙默思郡这条河名叫瓦伊河，另外那条河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可它们都一样，就像我一只手的手指与另一只手的手指那般，而且两条河里都有鲑鱼！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上册





序章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序章

我一只胳膊斜撑着身子，通过敞开的门，向另一节卧铺车厢高声喊道：

“亲爱的，我知道这会儿让你出来度假，给你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我也知道你半点也不想来南斯拉夫。但等你到了那地方，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此行如此重要了，而且为什么必须是现在，复活节的时候去。一旦我们到达南斯拉夫，一切就自然明了了。”

然而，没有应声。丈夫已经睡着了，或看上去如此。我本来不至于坚持自己的判断，认定这列车正带着我们前往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明了可解；在那里，生活的模式是如此真实，一切的繁杂都将就此终结。黑暗中，我重新躺下来，心里很是惊奇：自己竟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南斯拉夫竟如自己的祖国。因为当时是1937年，而直到1936年，我还从未到过那片土地。实际上，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说出“南斯拉夫”这一名字的时间——不过是两年半之前的1934年10月9日。

那是在伦敦的一家私人医院。我做了一个手术，那次经历新鲜而奇妙。一天早上，一名护士进来，给我打了一针，动作温柔至极，还开了些玩笑。玩笑并不那么好笑，却适得其宜，拂去了那难熬时刻我心中的恐惧。然后，我拿起书来，开始读乔基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那首十四行诗。诗的第一句是：“有过远游的人，一如尤利西斯，当是何等幸福。”我告诉自己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诗篇之一了”，然后在床上翻了个身，心里仍想着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诗篇之一，却发现刺眼的电灯亮起，站在我床尾的已经换作另一名护士。那一刻，十二个小时倏然而过。那期间，他们将我送往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遥遥俯瞰伦敦百千屋顶的房间，在我身上东切西割了三个半小时，又把我送下来。此时，我唯觉困倦不堪，全然没感到有任何病痛不适，仍半沉迷于那首诗美妙的意境里，仍在聆听穿越岁月的那款款吟唱，那般极尽简练，却又让人觉得那般极尽华彩，如一段优美的旋律：“要待什么季节，我才能再见自己那陋室前的小园？它对我来说比天堂都美好。”

我事先被告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但在手术前，人的下意识——真是一个易受惊吓的老傻瓜——往往会把手术想象为石器时代的样子。我当时非常害怕。我斥责自己不曾留意，世界已变得愈加仁慈，而且进步神速。不过，也不尽然。手术留下的伤口让我觉得，我身上似乎绑缚着重重的冰块。因此，为转移注意力，我让人送了一台收音机到房间。平生第一次，我意识到人生竟能如此无趣，人的胃口竟能如此乖张。听过一些访谈

和各式各样的节目之后，要是再听到有家庭找地方当局商议，家里垃圾桶不要倒掉，而是任其装得满满当当的这种事情，我不再会觉得奇怪。尽管如此，还是有或此或彼的某个电台，白天里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奉上。我还学会了像荡秋千演员般，在一个个电台栏目间搜寻荡悠。

但有一天晚上，我拧错了旋钮，听到一种并非自己想要搜寻的那种音乐。这乐曲非人间所有，而是居于雷雨云之间，滚滚而下，贯入人耳，有时震耳欲聋，却不失其旋律的优美。我听见播音员在讲述南斯拉夫国王那天上午在马赛街头被刺杀的情况。在这地球上，我们时时都在制造谜团，而那时，我们已然步入另一个阶段。我知道那可能会非常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关于自身的零零碎碎的知识告诉我，是什么敌对势力干的这事。我觉得必将有战事发生。而事实上，要不是南斯拉夫政权对其人民施行强制措施，在当时及其之后，禁止任何针对其敌人的挑衅行为，战争肯定早就爆发了。那般的克制忍让，战后的欧洲所展现出的这最为非凡的政治能耐，我实在无力想象。因此，我幻想自己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潜意识里的观念陈旧的又一实例——因为我知道，下一场战争中，我们女性几乎将无须害怕任何失亲之痛，既然不宣而战的空袭会将我们及我们所爱一同，如炒鸡蛋般完完整整送往另一个世界。当时，我并未想到这一层，因此按铃叫护士来。等她过来，我朝她叫道：“接通电话！我必须立即跟我丈夫说话。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啦。南斯拉夫国王被刺杀啦。”“噢，亲爱的！”她回答说，“你认识他吗？”“不认识。”我说。“那为什么，”她问道，“你会觉得这件事可怕呢？”

她的问题让我想起那个源自希腊语词根的意味深长的词：“白痴”。白痴态是女性的通病：专注于她们的私人生活，遵循命运的安排，沉迷于深渊的黑暗，她们的脑细胞有多畸形，所投射出来的黑暗就有多深。这种白痴态与男人的固有缺陷的可怕程度不相上下。男人的毛病是愚蠢：他们沉迷于公共事件，在月光下看世界，一切事物都只见个轮廓，却看不见展现事件本质的细节。我说：“哦，你知道，暗杀会导致其他的事情发生！”“是吗？”她问道。“可不是嘛！”我叹道，因为回顾往昔，我发现自己的生活被王族的屠杀打断，被报童的叫卖声打断——他们从大街小巷跑来告诉我，有人用致命的武器翻开了历史这部大书的新的一页。我记得自己五岁的时候，抬头望着我母亲和她堂姐并排站着，低头看一张报纸。报纸放在一张桌子上，笼罩在一圈煤油灯灯光下。她们那有口袋的白色衬衫上的褶皱和黑色的长裙，因为惊愕而纹丝不动，整个人犹似石雕。“还有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三十六年后，我对护士说。“她非常漂亮，是吧？”她问道。“世间曾有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之一。”我说。“可她不是疯了吗？”她问道。“也许吧，”我说，“也许吧，但只是一点儿，到最后的时候。她确实聪明过人，三十岁之前，就展现出她的伟大。”“怎么展现的？”她问。让她愈发沮丧的是，我告诉她说我深谙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直至发觉她感觉万

般无聊，才让她离去，留下我在黑暗里，看着黑暗中浮现出的伊丽莎白那可爱的三角形脸庞。

她是何等伟大！她早期的照片，从来都是一脸怒气冲冲的阴郁神情，如我们所见的少年拿破仑。她知道自己体内有一股生命力量，她担心世界不会让这种生命力肆意奔流，以结出累累硕果。她后期的照片，神情里再没了拿破仑脸上表情的影子。世界没有让那一泓泉水奔流出来，清泉变成了苦恨之水。不过她并非没有成就，不仅有，而且是最伟大的那种。事实上，那种成就，是拿破仑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她十六岁时，还是慕尼黑偏远地区维特斯巴赫家族的一员，嫁给了奥地利年轻的皇帝，从而成为统领维也纳宫廷的主人。自从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杜伊勒里宫和凡尔赛宫，它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宫廷。这一变化，本将会使得众多的女子无所作为。但五年后，她依身弗朗茨·约瑟夫身侧，游览了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从多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奇迹。首先，这是勇气的奇迹，因为他和他的臣僚使得这些省份因为他们的残酷与无能，而对他们痛恨有加。这年轻女孩高昂着头颅端坐剧院，尽管因为她的到来，剧院里寂然无声有如坟墓——人们穿着黑色的丧服以羞辱她；她坦然自若地走在大街上，尽管前方空无一人——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她。但当她与任何意大利人面对面相遇时，她总能找到恰当的字眼和姿态来表达自己的个性与请求：“瞧，我是皇后，但我并不邪恶。宽恕我和我丈夫以及奥地利，宽恕我们曾给你们带来的不幸，让我们彼此相爱，共同为和平而努力。”

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她的成功即刻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小官僚的抓捕行动和鞭打所抵销。这两个省份不可避免地要被并入新生的意大利王国。不过，伊丽莎白不仅生来甜美善良，她一直以自由派和皇后的方式思考。她知道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纽带，也知道这种关系因为政府管理不当而紧张。因此，第二年她进行了一次环匈牙利旅行。这次旅行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一地区几乎跟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一样，人民对政府严重心怀不满。之后，她学会了匈牙利语——尽管这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与许多重要的匈牙利人建立起友谊关系，也了解到匈牙利的诉求和让步的实质所在。后来因她离开弗朗茨·约瑟夫，四处游历了五年，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1866年，奥地利战败于普鲁士，于是她回来安慰丈夫。然后，她劝服丈夫创立二元君主制，赋予匈牙利自治权利。正是靠着这一体制，奥匈帝国才得以存续至20世纪。而这一举措背后的主意以及推动力，都当归功于伊丽莎白。这就是政治家的才华。拿破仑所缔造的一切都不曾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也没有这般高尚。

伊丽莎白本应继续前行，医治好危害帝国的其他创伤。她本当解决哈布斯堡王朝律令之下的斯拉夫族群问题。斯拉夫人属于这样一类人：爱争吵，勇敢，富有艺术天赋，善于思考，令所有别的民族都感到难于理解。他们

是在1世纪，从亚洲迁来巴尔干半岛的，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而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建立起暴力的、恢宏的、充满无限希望的众多王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但当土耳其人14世纪入侵欧洲时，这些帝国都已告覆灭，且全都被迫委身为奴——除了半岛西部边境的斯拉夫人。这些人生活于威尼斯、奥地利与匈牙利这些强国的羽翼之下，不过，既然他们被当作农奴，并在与土耳其人的对抗中被毫不吝惜地用作炮灰，其优越性亦是值得怀疑。如今，所有这些人都已归属奥匈帝国治下，包括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以及达尔马提亚人；而且他们全都身遭压迫虐待，主要原因是德国奥地利人从所有斯拉夫人，尤其是捷克人身上，嗅到一种出自本能的强烈憎恨。其中，捷克人出众的智慧与杰出的能力，使之在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危险的竞争者。此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世纪就摆脱了土耳其人的枷锁，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极端政党害怕，如果给予斯拉夫族群自由，他们会在沙俄庇护下，与塞尔维亚建立联盟。因此，他们使尽一切的经济与社会手腕，竭尽所能地迫害斯拉夫人，极力恶毒地破坏他们的语言，在斯拉夫人中间不断制造不和，以致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不和已使之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如果伊丽莎白像处理与匈牙利人的关系那样处理与斯拉夫人的关系，可能会挽救整个帝国，使其免于1914年的那场战争。然而，三十岁之后，她没再为帝国奔波努力。

她停止为帝国效力，是因为她为之努力的媒介——婚姻——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从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来看，这似乎很可能是因为伊丽莎白自身与某种矛盾处境难以调和的状况。这种情况在母性气质过剩的女性身上经常发生。她知道，人们对于女性总是有着某些特定的道德期待：美丽、温柔、优雅、顾家、能生育与抚养孩子。她相信自己拥有这里的一部分美德，丈夫也是因为这个才爱自己。实际上，他似乎也给出明确的证据，表明他非常爱伊丽莎白，因为他违背母亲索菲大公妃的意愿，坚决地娶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也认为，因为他爱自己，所以他必然是自己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她太单纯了。她的丈夫，与别的人一样，在爱情与亲情二者间左右为难。他因为爱情，而爱伊丽莎白。他因为亲情，而爱他令人讨厌的母亲，并且给予她高于伊丽莎白的威权——前者则滥用这样的权力而致令人恐惧。

大公妃索菲是一个有着普遍性意义的人物。她属于那样一类女人，男人付之以尊重仅仅是因为她致命的狠毒。这样的女人，男人组成的委员会会乐意任命她做医院看护。她不具有任何的女性美德，尤其缺乏的是温柔。不曾有任何记录表明她对儿子带回家的这位十六岁的女孩，说过半句温和的话。她那令人讨厌的威严，让人只能忍受。她还指使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大主教对新娘进行侮辱性的说教，告诫新娘别忘了自己卑微的寒门身份，告诫她既然被抬举到如此高贵的地位，就当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政治上，

她极为愚蠢，而且每一个蠢行都严重违背这位女孩本能的判断力。在政府会议上，她总是将自己愚蠢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肆意践踏充满智慧的辩论，犹似一头野兽将门前的花草踏入淤泥；坚持要反对和伤害一切可以反对和伤害的人，以损毁帝国的根基。对于一些极其丑恶的迫害事件，她负有个人责任——其中一位受害者就是农民哲学家康拉德·丢布勒（Konrad Deubler）。她还是一个大荡妇。她不曾有任何举措，以改革奥地利宫廷的中世纪落后习俗。伊丽莎白来到维也纳的时间是19世纪中期，但无论是在冬宫还是夏宫，无论是在霍夫堡还是美泉宫，她都被要求在这样的便桶上施展排泄功能：它就摆在一条通道里，前面摆放一道屏风遮挡，由一队卫兵在过道里负责巡逻。大公妃索菲下定决心，即使死后，自己的邪恶也要长存下去——她强行将伊丽莎白的孩子从其身边夺走，丝毫不让伊丽莎白介入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一个小女孩在她的看护下死掉，而在伊丽莎白看来，给孩子看病的那位医生医术落后且低弱；还有皇储鲁道夫，性格阴郁，焦躁任性，死板贪婪，也都是她在培育孩子们心灵成长方面无能的见证。

弗朗茨·约瑟夫因将伊丽莎白置于这样的较低一等的地位，并且认定爱不一定要温和，故而失去了她。之后，他对伊丽莎白表现出无限的温柔与溺爱，出钱供她四处游玩，用无限耐心为她建造城堡，每次她回家来，他都满心欢喜；似乎伊丽莎白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不满。她引荐一位女演员凯瑟琳娜·席拉特进入丈夫的生活。她这样做，无异于一位女子给一个房间布置些花朵，因为觉得房间过于阴郁清冷。但她定然因为他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员而恨他，因为他是这愚蠢、低能的体制的中心人物而恨他——1889年1月30日，鲁道夫被发现死在梅耶林的狩猎小屋，躺在一位十七岁的女孩玛丽·维特塞拉身旁。这一事件至今扑朔迷离。玛丽·维特塞拉作为鲁道夫的情人已有一年之久，一般的看法是他们俩约好双双自杀，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命令他俩必须分开。但这实在难以让人信服。玛丽·维特塞拉很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孩，全身散发着一股因为看了不适当的法国小说而萌生的粗鄙激情，并因此在埃及与一位英国军官有染；而风流浪荡的鲁道夫，似乎也不可能会觉得这个相处了一年之久的女子艳压群芳，毕竟在他去梅耶林之前的夜晚，还跟一位迷恋已久的女演员缠绵。更可能的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招致的诸多麻烦，他因此自绝，或死于谋杀（倘若他那份诀别信系伪造，便真有这可能性）。

关于鲁道夫的政治主张，我们所知甚多，因为他曾写过大量文章，匿名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并且有更为大量的书信，写给该报编辑莫里茨·谢普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犹太人。从这些文章和书信看得出来，他是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憎恨哈布斯堡王朝的制度。他也憎恨德国日益膨胀的黩武主义，并预言与德国的联盟将意味着奥地利从肉体到灵魂的彻底毁灭；他崇敬法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主传统；他为排犹主义拍案而起，

并写下了一篇措辞最为激烈的文章，训斥一帮贵族分子酗酒狂欢之后，跑去布拉格犹太居住区四处砸人家窗户，警方也对此蓄意纵容，不问不管。银行和法院的腐败，上层政府官员与政客的无良，尤其是奥匈帝国的种种行径，令他愤慨不已。“以一位单纯的旁观者的眼光观之，”他写道，“我真觉得好奇，衰老而暴虐如奥地利帝国这样的一个有机体，如何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曾在关节处撕裂，分崩离析为碎片。”他尤其热衷于处理如今已变得更加复杂的斯拉夫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赶走了土耳其人，然而他们所赢取的自由却被一纸《柏林条约》骗去。这一条约给了奥匈帝国占领他们土地和管辖他们的权力。这使得斯拉夫人怒不可遏，也使得塞尔维亚人满腹牢骚，因此那些极端保守分子更是觉得有必要维护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特权。鲁道夫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就曾表明自己的意见：当弗朗茨·约瑟夫任命他为上校时，他选择了当时驻扎在布拉格、军官多为中产阶级的捷克军团。

无论对梅耶林事件做何解释，伊丽莎白对于维也纳原本的不耐烦，都必然升级为诅咒。情势使得一切都变得徒劳，一切都毁了。她与儿子从未建立起一种愉快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识——因了他少年时期受到大公妃索菲的挑拨影响，哈布斯堡皇室又毁掉了他们不愿意让她留存的东西。鲁道夫迫于王朝压力而与一位乏味的比利时公主结了婚。那是个性格乖僻的女子，金黄头发，小眼睛，观点之保守，你还当她的话是从英国保守党总部一位老态龙钟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在她婚礼之际，还没显示出女性的性征。仅因为哈布斯堡皇室庞大而复杂的内部运行机制里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她和她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新郎，被打发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堡度蜜月，没有仆人，要啥没啥。这场没开好头的婚姻，后来愈来愈糟，丈夫和妻子折磨对方，同时自己也备受折磨。不过，鲁道夫的毁灭，却不只是因为哈布斯堡皇室的种种具体错误，更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局势。管家们虚张声势小题大做，间谍们匆匆忙忙抄抄画画，警察们威胁恐吓骂骂咧咧，每个人都清楚别的人一天里任何时候身在何处。弗朗茨·约瑟夫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处理公文十二或十四个小时，却不曾花一分钟时间思考如何清除损毁帝国根基的罪恶。而鲁道夫，一如这一家族任何有才智的成员必然之所为，想方设法医治这些痼疾。他要么是制订了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因被察觉而自杀或被杀，要么是因为沮丧而借白兰地消愁，自我麻痹，直至似乎时机成熟，而为一个十七岁的、胖乎乎的顽皮小姑娘殉情而死。如今，他既已死去，奥匈帝国也就没了直接的或令人满意的王位继承人。

伊丽莎白在她儿子死后，又活了九年。其生活之凄清寂寥，一如任何失业的人。然后，或许是对她放弃斯拉夫人问题——东欧问题的关键——的惩罚，一个西欧极端分子刺杀了她。煤气灯下，我母亲和她堂妹看的那份报纸所言并非事实，刺杀她的卢切尼并不是疯子。的确，他说之所以刺杀伊

丽莎白，是因为自己发誓要杀掉所遇到的第一个贵族。他先是去往伊维安，打算行刺奥尔良公爵，因为没遇上，于是回到日内瓦，转而刺杀了伊丽莎白。这一声明所说纯粹为疯子行径，因为这两人中任何一个死了，于谁都不会有任何好处。但无论怎样，卢切尼并非疯子。很多人都说不明白自己想说的话，只因为在那样的情境下，他们还找不到适当的词汇；他们看似没有意义的话，实则可能是因为足够的理性——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而触发的。

有这么一段历史，一个人如果想理解其同胞，就永远不可忘记。4世纪时在非洲，许多的基督徒加入一个主张分裂教会的组织。这些人被称为多纳图派信徒。他们破坏教会，坚持认为只有行为正派的教士主持的圣礼才有效，而当下大量的教士都被证明并非正派之人，因为他们在戴克里先(注)迫害教会的过程中表现怯懦。他们号叫道：根据教会的规定，基督才是圣礼的真正分配者，无法想象由上帝指定的关系能够经由人手进行切分。很多时候，这样的传言都是诽谤。但尽管这些人狂呼乱叫，他们却并不疯。他们不过是以此来制造噪音，以表达西罗马帝国经济崩溃所带给他们的不幸与痛苦。因为没有经济学文献，他们也找不到适宜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不幸，便拾起教会所给予他们的语词；他们就圣礼问题干号乱叫，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西罗马帝国即将灭亡，他们也是。

卢切尼亦是如此。他那毫无意义的行为，也是因为意识到这或许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为令人沮丧的处境。他是一位意大利裔，出生于巴黎，父母因为穷困而移民，被践踏而落入一个外国犯罪阶层，换言之，他属于这样一个城市群体：现有各级政府对他们毫无照应，他们常常四处游荡，没有工作，没有传统，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卢切尼通过刺杀伊丽莎白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最为合适不过的。因为，维也纳乃大型城市之典型，它滋养着这样的一群人，其奢华靠着剥削农民阶级而维持。农民阶级因为血液被榨干而如此苍白，他们随时愿意以任何条件，将他们的儿子送往工厂，将他们的女儿送往服务行业。关于维也纳街头的乞丐，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圣日耳曼条约》是其罪魁祸首，实则他们是一支军队的后裔。这支军队最初可追溯至19世纪。卢切尼手持短剑，对着权力的象征说，“喂，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他没有提出建议。不过也不能怪他，他这反社会的本质，决定了他不适宜提出建议，也无法提出自己的思想或对行动进行安排，只能采取最野蛮最暴力的手段。他在监狱里生活了不少年，差不多一直到他的同类为自己找到一套语言，寻得一个名字。他们以法西斯主义的闹剧震惊了世界。

因此，伊丽莎白就这样死去了，轻易得让人害怕。终其一生，她的紧身胸衣扭曲了她的身材，妨碍了她的美丽，却未能替她防护刺杀者的短剑。剑穿透了她的心脏。即便如此，她在皇室的身份也使得她在情感与智慧方面

的成就被阻绝，唯余无尽的悲伤。直至死后，她也得不着安宁。她曾在遗嘱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愿，希望葬在科孚岛，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不予理会，将她安葬在维也纳天主教嘉布遣会教堂的哈布斯堡皇室墓地里，位列第十五代皇后。哈布斯堡皇室阻止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激情，不仅仅针对生者。鲁道夫也曾提出不与自己的先人葬于一处，却仍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处置权；还有首相塔费伯爵本人前去拜访玛丽·维特塞拉的母亲，请求她不要在她女儿坟旁祈祷，却收到警方多次汇报，说她拒绝放弃祈祷，其实法院也觉得这样的行为没什么违法的，而且整个维也纳都明白女孩的死因。奥地利秘密警察很善于应对这样的事情。而对于保全皇室成员性命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却远没有如此在行。

那之后，奥地利在西方人眼中复归宁静。普鲁斯特曾指出，只要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时间足够长，任其如何乏味无聊，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得“精彩有趣”：一个八旬老太，如果每个周日都漫步在一条百码长的乡村街道，这事也会变得“精彩有趣”。长年累月，弗朗茨·约瑟夫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批阅公文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认为这是王国里最为“精彩有趣”的事情之一，几乎跟维多利亚女王一样“精彩有趣”，尽管长久以来，他顽固且呆板守旧，将维护其宫廷犹如一礼仪之停尸房视为己任，不顾其帝国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错误而勉力维持。毫无疑问，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将获得广泛的赞誉，因为人们的习惯是，当一个不善经营的老人一死，其事业随之分崩离析时，便说：“啊，看这是怎样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稳稳当当的，可人家前脚刚一走，现在就成啥样子了！”事实上，他的宫廷里已经在酝酿着一个将吞噬我们所有人的灾难，但这一点英国人并没看到，这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是在战前访问奥地利的，而且去访问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马匹，而奥地利的马匹的确很优良。

下一次暴力的红灯亮起时，情况似乎已不再重要，只不过是不相干的恐怖事件而已。1903年6月11日，在我十岁的时候，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德拉加，在贝尔格莱德的王宫里被谋杀。他们赤裸的躯体被从卧室扔到花园里。王后的两个兄弟以及两位大臣同时被杀害。实施谋杀行动的是一群军官，他们当时在塞尔维亚之外全是无名之辈，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没有谁是有趣的。亚历山大很年轻，一身松垮的赘肉，戴一副夹鼻眼镜，对于专制主义有一种特殊嗜好，喜欢笨拙地反复拿它来做实验。他的妻子——非常奇怪的是，她与玛丽·维特塞拉属于同一类型，尽管说在她年轻时，人要漂亮得多——被认为身处劣势，因为名声不好，家族野心太大，而且被怀疑耍弄伎俩，企图借来一个婴儿作为王位继承人。不用说，这些人在塞尔维亚人眼中显得很可怕，因为后者摆脱了土耳其人的控制不足一百年，深知他们的独立自由一直受着强权者的威胁。这桩罪恶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仅仅是因为它噩梦般的恐怖。阴谋叛乱

者用炸药炸开王宫的大门，结果把电灯也烧坏了，他们一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前行，先是骂骂咧咧，后来言辞愈发狠毒尖刻，令人不寒而栗。国王与王后躲进他们卧室的秘密橱柜中长达两个小时，听着外面的搜索者的音调时而冷，时而温，时而再冷，时而又温，最后变热，火一般的热。疲软无力的国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杀死：他们将他从阳台上扔出去，加上吃了那些子弹，受了那些剑伤，以为他死定了，但他右手抓住栏杆不放，他们只好将他的手指砍掉，他这才终于掉下去，掉下去后，左手手指又死死拽着地上的草不放。虽然是6月，清晨却下起雨来，洒落在躺在花丛中的他们赤裸的身躯上。整个欧洲都爆发了起义。爱德华七世召回他的内阁大臣，大多数大国也都效之而行。

那场谋杀案仅是一个半色调的方格——多年前见过的一张警方新闻海报，或一份小报的头版，在我脑海深处朦胧地映出来恐怖的形象。但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当亚历山大和德拉加从阳台上坠落，整个的现代世界也便随之坠落。过了一些时候，它才跌落至地面，摔断脖子，但其坠落却自那一刻便开始了。由于这并非一个纯粹的道义世界，所谓杀戮一个暴君于事无补，因为一个更坏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并非事实。对此说法的驳斥，没有比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的继任者来得更有力的了。在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势之下，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继承了王位。他年近六旬，十四岁随被流放的父亲离开塞尔维亚后，就再不曾见过这片土地；他在日内瓦长大，受到瑞士自由主义的影响，后来曾在法国军队做过军官；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没什么经验，性格谦逊隐忍，崇简尚朴，快乐地定居于日内瓦，照料着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接受教育；他还喜欢读书，略略有些书呆子气。显然，他虽然告诉密谋叛乱者，如果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交出王位，他随时愿意接手塞尔维亚，但他不曾料想那班人计划的举动远比逼迫退位更暴力；说到底，他最喜欢的作者毕竟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拉乔治维奇之所以回到贝尔格莱德，是因为他笃信王朝的神圣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要想在那里立稳脚跟，必须获得各方的支持。他身边尽是密谋叛乱者，对于他们的罪恶，他感到憎恶。可是，他又不能驱散这些人，因为冷静地想，一个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之中聚集着众多塞尔维亚最有才能也最爱国的人；身边这么多严厉的批评者，完全可能故伎重演，因此他只能顶着无数的内忧外患，维持着这个新兴的、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秩序。

不过，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却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慢慢地，亦是认真地，他证明了自己是欧洲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后来，通过几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人被驱逐出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他又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士。欧洲从不曾罹受如此的厄运。奥地利的版图本就大得难以善加治理，却还想进一步扩张，并制定好了“东方扩张政策”。如今，塞尔维亚这一令人畏惧的新兴军事政权亦是箭在弦上，甚至可能联手俄国，以抗击奥地利。与此同时，帝国的所有斯拉夫人也群情激愤，大为不满，因为自由的

塞尔维亚人干得如此漂亮。其结果是，德裔奥地利人对他们更加憎恨。自鲁道夫执政时，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帝国不再假装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为行政省份——这两个地区仅被帝国占领和统治，正式被帝国吞并，这伤害了斯拉夫人民的感情。这使得许多的斯拉夫人向塞尔维亚提出诉求，而对于一个年轻国家，很正常地，有时回应也难免在言辞上有矜夸之嫌。

鲁道夫之后的帝国王位继承人的性格，使得形势愈加复杂。此人即埃斯特大公弗朗茨·斐迪南。这个毫不可爱的忧郁症患者，因为他的提议，各地人民不得安生。这些起草的提议，从其措辞看不出丝毫的治国才能：将斯拉夫人归入为一个王国，从而使帝国变成三元帝国。极端保守派觉得，他这样做是对帝国及其保守主义充满敌意的一种表现；斯拉夫人亦不领情，宣布宁愿获得像塞尔维亚那样的自由。奥地利对于这一新的局势的反应，是一种过于夸张的害怕。奥地利总参谋部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个劲儿地告诉众多的国人和他那一阶层的大多数人，不断催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以防塞尔维亚的自卫能力进一步提升。若不是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被谋杀，继任者是一位更贤德的人，这位贤德之人将塞尔维亚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塞尔维亚变得日渐强大，赫岑多夫及其同类也不致生此担忧。

然后，1914年6月28日，奥匈政府允许弗朗茨·斐迪南以军队监察长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在塞尔维亚边境指挥演习。很奇怪的是，他竟然愿意这样做，而且他们竟会允许他这样做，因为那一天是圣维特斯节，是1389年科索沃战争纪念日。这次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并被奴役了五百年。这一败绩，因为巴尔干战争中科索沃被重新夺回而得以洗却。因此，提醒塞尔维亚人他们还有部分人民生活在外国列强铁蹄之下，是极不明智的。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愿得到满足，动身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那里的警察对于他的保护很不得力，尽管有警告说，有人想要取他性命。一位波斯尼亚籍塞尔维亚人，名叫普林西普，极其憎恨奥匈帝国暴政，当弗朗茨·斐迪南驾车行驶在大街上时，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杀害，并无意间同时杀掉了他妻子。有必要特别声明的是，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裔，而非塞尔维亚王国公民。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而塞尔维亚裔信仰正教，属于广泛分布于多瑙河以南、亚得里亚海与保加利亚之间，以及希腊山区以北的斯拉夫人的一支。塞尔维亚人是塞尔维亚王国的臣民，其臣民也可以是克罗地亚人，就如出生于旧时归属奥地利的克罗地亚省的居民也可能是塞尔维亚裔。但普林西普却是从贝尔格莱德弄来的手枪，虽然给他枪的是某位个人，而非政府。于是，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其他国家纷纷选边站队，于是大战爆发。

对于那次暗杀，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伊丽莎白之死的每一点细节，我都历

历在目，对贝尔格莱德大屠杀的细节，我也存有模糊记忆，但我回忆不起任何读过的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报道，或任何有关这事的传闻。那会儿，我忙于做一个白痴，忙于个人私事，我的双手满当当的。我的白痴态一如我被麻醉时的情形。在那段空白期，我任人宰割却无丝毫感觉，然而其后果却真实不虚。那之后我才感觉到疼痛。

因此，1934年的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心怀惧怕地看着我的收音机，虽然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相关信息了。后来，我像任何婚姻幸福的人在危机时刻的表现一样，我给丈夫打电话，问他一些明知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从他的话中寻求巨大的安慰。我真的被吓着了，因为早先时候那一次次的杀戮，要么使我的厄运更快地到来，要么预示了那样的厄运。要是鲁道夫不死，他可能会解决奥匈帝国的斯拉夫问题，会遏止帝国的野心，就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不被杀，塞尔维亚可能永远不会如此强大，以致激起帝国的嫉妒和恐惧，也就可能不会有战争。杀害弗朗茨·斐迪南本身就是开战。伊丽莎白之死，已让我看到战后世界的灾祸。卢切尼、法西斯主义，对于被剥夺阶级的统治——它们宣称自己的权利，却又无法提出一个确切构想——唯有漫无目标的暴力，以及杀戮、抢夺、镇压。

如今又有一桩谋杀，仍是发生在东南欧。这一地区，也是所有其他各种死亡的发源地。这样的事发生在1934年，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战争似乎已将斯拉夫问题令人满意地摆平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了一个满意的民主政府，而且运作良好，除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颇有抱怨，因为他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靠了他们的斯拉夫邻居买单，曾被给予太多的优待。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以及黑山人，如今联合起来组成南方斯拉夫王国，也即南斯拉夫；虽然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在精神信仰上，与塞尔维亚人不同，因为前者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且黑山人也为失去独立而耿耿于怀，但政府似乎找到了一种平衡。然而，这里又有一桩谋杀，又一个威胁，将使人们自陷痛苦之中。这桩谋杀带来的将是死亡，而非生命。

几天后，丈夫告诉我他看了一部新闻片，片中极其详细地展示了南斯拉夫国王真实的死亡过程。恰好我刚可以出院，便赶回去看那部新闻片。我不得不去一家私人放映室，因为到那会儿，普通的电影院已撤下了这部片子。我借此机会将影片反复看了好几遍，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就像一个老妇细数她杯子里的茶叶残渣。首先是那艘南斯拉夫战舰缓缓驶入马赛港——这个我很熟悉。战舰的后边，是一座巨型的吊桥。这吊桥总是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让我想到，在这机械化的时代，我几乎不能理解我周围的环境，就如一个原始时代的女人，以为瀑布里住着精灵。事实上，我甚至连原始女人也不及，因为她对于瀑布的看法，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却是合理

的。我心里很清楚，吊桥不会从那个巨大的钢铁支架上旋转掉落下来，但任何其他的解释都让我难以信服，并且我也全然不明白它到底有何用途。不过，从轮船舷梯下来、通过交通艇上到码头的那个人，我却能够理解，因为他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事物。通常，人们对于领袖人物都有特定的看法，有时这种看法是与生俱来的。

他的面颊因为疾病而深深凹陷，瘦得几乎皮包骨头，没一点儿气定神闲的风度，甚至也不帅。作为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他总给人一种枯燥无味、装腔作态、卖弄学问的感觉。不过，他看上去像一个大人物——不是说他便是一个贤德或者有智慧的人，而是说他身上有一种因为专注于某件重要事情而有的历史性气韵。从他那虔敬的眼神判断，他所思考的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这件事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他沉陷其中，并非因为另外的世界让他不感兴趣；相反，当他内心的交流暂时中断，他一头跌进现实，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但他并没显得心不在焉，对于法国与南斯拉夫两国会晤，他表现得足够尊重。事实上，对于这样的正式场合，他表现出一种天真的真诚。当法国外交大臣巴尔都先生走上前来向他致意时，他就如一个快活自在的牧师站在圣坛前，边上站着一位痛苦而神秘的俗众。有时，他也会扭一下头，紧敛的鼻孔张一下，以表示现场有什么让他感觉有趣。

他的各式反应中，有一种因为长期保持警觉而有的突然性动作。这也很正常。自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入伍当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一直受着死亡的威胁——内在的，是肺结核；外在的，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试图暗杀他，因为他们想要的是独立，而非与塞尔维亚人的结盟。不过，重压在他心上的却并非恐惧，理所当然地，是南斯拉夫问题。他脸上那神情，一如那些无论是国王还是总统的自谓君权神授者，他们的思想笼罩着他们的国家，包括人们头顶的天空。当你看到罗斯福总统，你敢肯定他心中在思虑着美国；有时候他的思绪可能显得轻柔舒缓，但仍然是随时随地想着那同一问题。看到列宁的人会说列宁时时在思考苏联国事，即使当他的思虑显得紧张而急促，仍是围绕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国王乔治五世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专注与虔诚。

此时，亚历山大国王正驱车驶过那些熟悉的街道，奇怪的是竟没带护卫，那辆车也是奇怪的古董车。从他的动作看得出来他试图让僵直的手变得柔和一些，从他谨慎的黑色眼眸那漫不经心的一闪，看得出来他领受人群的欢呼时那孩子般的认真。那神情真是让人动容，就像一个女孩在舞会上，对于别人的赞美真心地照单全收。接着，他的心头事情笼罩眉头，烤干了嘴唇。他又在想着南斯拉夫的事了，那怀想的愁绪，犹如一位作者正在撰写一部新书，不期被人打断。他可能在心里想：“有过远游的人，一如尤利西斯，当是何等幸福……”但这时，摄像镜头从他身上转开，向后拉退。声轨里除了人群里嘈杂的说话声，还杂着另一种声音：不断扩大的惊

叫声。我们看见一个人跳上汽车踏脚板，一个战士，一手挥舞着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一顶草帽躺在地上，一群人反复地跳上跳下，舞动着手臂，在用力打砸踩踹着平躺在地上的什么东西，直至我们看见人行道上一堆果肉般的东西，上面遮盖着衣服。一位少年，身穿一件毛线衫，在追捕者前面躲闪着，从他挑衅的脸上看不见害怕，虽然他爬行翻滚的身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恐惧。再看整个画面上，人们四散奔逃，好似一股有形的死亡之风将他们吹散。

镜头重新回到车上，我们看到了国王。他几乎瘫软地躺在座位上，就像我麻醉后的样子。他不知道出事了，仍沉浸在他思怀的快乐之中。他可能在问，“要待什么季节，我才能再见自己那陋室前的小园，那我的王国，那胜似的王国？”可以肯定，他快死了，因为他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心——若非生者面对死亡时被惊骇得失去了矜持，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无数只手在安慰着他。那些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从车后，从车侧，穿过车窗，都在安慰着垂死的国王。他们是如此友善。那些手远比一张张的脸要友善，因为那些脸都那么凝重，由于跟这位思想者关系太近，脸上都承载着许多的思虑。而那些手，却传达着生者之肌肤对于死去者肌肤——那引起怜悯的纯粹肉体的存在——的无思无虑的同情。这些都是男人的手，动作却又那般轻柔，犹似女人轻抚她们的婴儿，他们摩挲着他的面颊，犹如在用友善的爱怜洗濯那脸庞。突然，那怀想的神情离他而去。他那学究气溃散开来。他安宁下来，再无须人护卫他的生命。

接着，镜头里出现一名官员，头戴一顶高帽，身穿双排扣的上装，疯也似的沿街奔去，恰似中年男人那般滑稽模样，面皮松弛，满脸焦急，大腹便便，犹如怀孕，只是全然没个结果。如果是喜剧片，这倒是个绝佳的结尾。然后，我们又看见战舰和港口，共和国总统站在船上，一大帮人围在他四周。所有人都一脸认真得那般天真无邪，就像战舰首次进港时，那一个人的神情。只是此刻，没有了那快乐的牧师，他曾信心满满地认为他手中掌握着神圣的秘密：巴尔都此时也已死去。所有人都注视着这场景，一如国王在他抵达时的注视。似乎那些事情表象的后面，藏匿着某种真相，这一真相随时都可能自我呈现出来，就像圣餐，非为个人所享用，而当为各个国家享用。棺材里躺着这样一个人，通过他，这可怕的圣餐被分派至法国。棺材被抬上船，战舰载着它离这些人而去。他们站成一个巨大的圈，因为恐惧和敬畏，动作僵硬。他们感到极大的惊异，圣餐竟是如此的形状——而南斯拉夫国王却从来认为当是如此。

任我看过这影片多少次，我都无法理解这一事件。我自然知道谋杀发生的情况，以及发生的原因。在这世界上，“卢切尼”已是大为进步了。四十多年前，当卢切尼刺杀伊丽莎白时，他得自己动手，他必须得隐姓埋名在瑞士四处游走，以寻找下手的目标，他手里的作案工具无非一把双刃匕首，

他得为之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如今的“卢切尼”却是墨索里尼，他周遭环境的升格可以从他所犯罪恶的影响之广远程度体现出来。伊丽莎白事件，那位不安稳、无根基的城镇人氏击倒的是权力的象征。而他的现时代代表却靠了僭取权力本身，将权力击倒，贬损其本质。他的罪恶并非他真的罢黜了国王，因为国王或总统如果无法履行职责，相应地也就失去了在王国或共和国里的称号。他的罪恶在于，他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而不使自己受任何契约责任的约束。而这种契约责任，在历史上任何值得称道的阶段，均为文明人类强制加诸其领导者身上的要求，并给予权力以灵魂，使之不致堕落。政府管理删去了这一程式要求，使之成为一种漫无目标的暴力，并必然最终不惜任何代价僭越自身，因为它再无任何别的主张，因此也没有任何别的活动。身处贫困境地，长期的奴役会使人变得粗野，一旦不再施行暴力，除了迷蒙不解地瞥几眼物质的财富，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想不出宣泄能量的出口，唯有“创造”社会福利，并人为地、非自然地将这些财富分散给民众，每次一点点，以既使民众开心又让他们无法自立；而其第二根弦上，则演奏着单一暴力主题的各种幻想曲。在其国内，任何的反抗都招致各种各样形式的镇压，甚至凡是被怀疑与执政党持有不同意见者亦在镇压之列；而国外的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则全数被认为是敌人，都遭到憎恨和诋毁，在理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抢夺和谋杀。这种侵略性显然会使军事力量得到极大的扩充，并偷偷地不断试验伤害外部世界的新方法，而非采取传统战争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索里尼提出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些伤害外部世界的方法包括，在反对或仅仅是不满意与南斯拉夫合并的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地区建立营垒，将他们训练成恐怖分子，使其学会使用炸弹和小型武器，并资助他们用训练中获得的技术袭击南斯拉夫，且美其名曰为分离主义运动服务。对于那些大城市及其附庸所加诸我们文明的罪恶，再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因为在战前欧洲，任何国家都不曾建立这样的机构，以专门训练另一国家的国民去谋杀其统治者。这些营垒的存在，以及人类凡习得任何技艺便忍不住要拿来运用的特性，便给了亚历山大国王的遇刺一个解释，而又不致真实地透露其行径之肮脏。因为意大利指导其附庸国匈牙利仿效而行，在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延卡平原，建立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训练营。荣誉似乎是一种高度人为的约定，但在生活的任何层面，这东西一旦被抛弃，将会招致骇人的扭曲。当意大利人从他们自己的集训营派杀手去刺杀国王时，他们使尽手段制造假象，似乎杀手来自延卡平原，甚至引诱一位与匈牙利训练营有关联的马其顿杀手到马赛，然后将他杀掉，以便用其尸首作为证据，以示谋杀者之由来。对于一个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件大为快意的事情。在他们，犯罪之说是彻底废了，他们干这勾当仅仅是由于严重的估计错误。墨索里尼原以为国王一死，这个国家便会分崩离析，也就易于为外来侵略者所猎食。但即便克罗地亚人的不满情绪比实际情况严重一千倍，事实也仍然是，该国人

民宁愿由他们自己杀死其暴虐的统治者；实际上，南斯拉夫因了这谋杀的震撼，反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因此，战争并不曾发生，唯有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战争的因素进一步减弱。二者如今已难分彼此。

但该事件中的另一位当事人却依然神秘莫测。每看一遍影片，便能更清楚地发现，他对于自己被谋杀没有一点儿惊遽。他不仅知道有这种现实可能性，而且在想象中也充分意识到了其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影响力。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聪慧超过了其本有的智力。喜欢行动的人常常对他们自身的局限自恃得偏执，也因此做些无用之举；他虚弱却又战士般英勇的脸上，表明这两种形式的错误都集中在他身上。我所读到的关于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料，都证实了他脸上的这一表情，都表明他缺乏灵活性、反应迟缓。然而，他身上却有着一种伟大的智慧。这一智慧引领着他，直至生命终结那一刻，因了王者风范与爱国精神之类的宏大考量，亦无有断绝。一个人除开他自身的智力，还会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取智慧，这可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似乎能透过自己种族文化的毛孔获取智慧。或许，这一独具的智慧——在屏幕上，明晰如弗朗索瓦丝·罗赛[注]独具之理智，或如嘉宝[注]独具之自恋——是南斯拉夫国王从南斯拉夫王国、从南方斯拉夫人那里吸收来的。

对此问题，我提不出什么看法，因为我对南方斯拉夫人一无所知，也不曾遇到过与他们认识的人。我只知道他们是巴尔干民族的一部分，而这一民族在战前以及战后一些时候，曾在英国慈善史上扮演了奇特的角色。直至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于各个时期多次赢得独立，他们一直信仰基督教，受土耳其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为统治者的治理无能而受尽苦难与奴役。并且统治者还阴险地制造事端，使其各部相互争执不和，从而永远无法团结一致进行反抗。因此，每一个民族都与其四邻相互痛加控诉，永无宁日。比如，塞尔维亚人严厉指责土耳其人的同时，却又随时可能指控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指责他们在阳光下的一切罪恶。因此，具有人道主义与改革家秉性的英国人，一波又一波地前往巴尔干半岛，去看到底是谁在虐待谁。又因其信奉完美主义所致，听不得有任何谁虐待任何别的谁之可怕传言，每次回来，各自怜爱的心中都装着一部分巴尔干人民，认定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永远是受屠杀者，绝对不曾屠杀过别的人。这同样的人，致力于慈善，生活简朴，过去当是喜欢饲养猫咪和鹦鹉的，如今却往往在他们的壁炉上放着阿尔巴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希腊人的画像，尽显虔诚幻想曲之力量与轻柔。巴克斯顿兄弟所青睐的《保加利亚人》，达勒姆小姐所捍卫的《阿尔巴尼亚人》，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绘画《小塞缪尔》惊人地相似。

然而，情况经常让人觉得，是巴尔干人将虔诚强加在了某种非常怪异的材质上。听巴尔干青睐者谈论各自的《小塞缪尔》，让人想到与乔舒亚·雷诺

兹爵士全然不同的某位画家谈论希罗尼穆斯·波希。那些猫咪和鹦鹉一定经常感到惊诧。1912年曾有一场争辩，关于一个极不适宜那些参与者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在一个名叫普里兹伦的镇上，奥地利领事普罗查斯卡先生到底是不是被塞尔维亚人阉割了。普罗查斯卡先生是一位极其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他故意让人认为就是塞尔维亚人所为，以此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国家的反塞尔维亚政策。达勒姆小姐，出生于1863年，一位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的女儿，贝德福德学院的学生，受其内心人道豪情的指引，几乎将她全部生命都花费在了巴尔干人身上。她尤其反感塞尔维亚人，发布惊人声明说，在一处火车站，一群塞尔维亚军官告诉她，是他们给普罗查斯卡动的刀子。揣测一下皇家外科医学院那位院士或者贝德福德学院的教师们对她这样的声明会做何感想，会很有趣。这场论战越来越激烈，直至塞顿–沃森教授——并不受巴尔干各民族待见，却强烈反奥地利——声明说，他本人见过普罗查斯卡先生的一份秘密陈词，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根本就没被阉割。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没有人能想象如此一位出身名门的尊贵的人，如何会与人谈论如此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事业，受到自由主义者这般的追捧，却又被这事业自身的暴力给彻彻底底掀翻。印度和非洲问题从不曾在那些自由党人士——这些人因受格拉德斯通的鼓动，曾出访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的足迹里，催生出这乱七八糟的野蛮小册子。

事实上，我对于巴尔干人所知的除了暴力还是暴力：我对于南方斯拉夫人所知道的也是如此。这些印象来自早年自由主义所留下的记忆，来自旧货店灰尘密布的角落用线绳捆扎起来的、从那乱七八糟的小册子上散落下来的书页，后来又来自法国人的偏见，因为他们所用的“巴尔干”一词实则是一种侮辱，意为暴发的（rastaquouère）野蛮人。在巴黎一家宾馆里，因为私人空间不足以让人安宁，我被隔壁吵醒，听见响亮的啪啪啪三声，然后是一个女的抽抽搭搭的哭骂声：“巴尔干！巴尔干！”一次在尼斯港，我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外吃龙虾，听见几声枪响，一个水手从隔壁酒吧跌跌撞撞跑出来，女店主追出来，高声叫骂：“巴尔干！巴尔干！”原来他将手枪里的全部子弹都送进了酒吧后面的镜子里。此刻，我正面对影片里的国王那无比的威仪。国王自然是“巴尔干！巴尔干！”，他正以事与愿违的虚构的成就感来面对暴力，最后却陷入立意要毁灭的东西之中，成了它的陪衬。但这般轻信了关于巴尔干人的传闻，想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如果南斯拉夫人真是暴徒，就不会先是被崇尚帝国形式暴力的奥地利憎恨，后来又被崇尚极权主义形式暴力的法西斯分子憎恨。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巴尔干人温驯如绵羊，因为不可否认，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与德拉加，弗朗茨·斐迪南和他妻子，都非寿终正寝。我得承认，我肯定对欧洲东南角一无所知，而且那地方一直以来都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地，这些事件于我亦是危险之源，事实上，在四年里一直威胁着我的安全，永久剥夺了我很多的利益。换言之，我对于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那真是一场灾难。帕斯卡这样写道："人不过是芦苇，乃自然界最孱弱之物，但他又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整个宇宙，无须自我装备，即可将他压得粉碎。一缕蒸汽，一滴水，便足以将他杀死。但即便宇宙压碎他，他仍然比杀死他的东西要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死，也知道宇宙万物在哪些方面胜过了自己，而宇宙万物于此却一无所知。"这段话里，他为高贵的人类开出了唯一的药方。我们必须学着去了解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的优势的本质所在。这一点，于我的处境而言，似乎就藏匿于巴尔干半岛之中了。只剩两三天时间了，但我全然无心做此短途的旅行，即便它可能向我解释明白我将如何死去，以及为什么。正当我为自己的惰怠啧啧称奇之际，我接到邀请，去南斯拉夫几个城市的大学和英语俱乐部做演讲。于是1936年春，我便去了。

不幸的是，我在旅途之末到了希腊，被一只沙蝇叮了，患上了登革热。这种病又称断骨热，且名副其实。回来的途中，我不得不在维也纳城外的一家疗养所休息。在那里，人们以为我病得太重，于是我的丈夫赶来接我回家。他发现我在卧室哭泣，尽管这城市到处是花的海洋。因为是5月，沿街的紫色与白色的丁香花密密匝匝，犹似观看庆典游行队伍的人群，栗树在楼上房间的窗前高举着"蜡烛"。我已康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去户外活动了，但我坐在一张椅子里，膝盖上和脚上搭着一大堆粗布的亚麻衣裙。我一件件展示给丈夫看，一面自责地说："瞧瞧我都给他们添了怎样的麻烦！"这些衣裙，是我从马其顿的农民那里买来的。给我治病的奥地利医生让我叫人拿去做消毒处理，尽管它们还很干净。但拿走衣裙的护士却忘了要做什么，没有将它们放在灯下消毒，而是交给洗衣工，用浓浓的肥皂水进行浸泡。衣裙全给毁了。原本可保存二十年的染色被泡掉了，布料漂亮的纹理被弄脏了；原本简洁鲜明的绣花图案被弄得一团糟。即便我立马就回去买新的——尽管身子虚弱，我真就想去，我也得心里明白，是我没有保护好这些妇女的劳动成果，而这些东西本该留作一个见证，成为国王临死时所知道的事情的一部分。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犯傻，"我告诉丈夫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认为这些衣裙那么重要，你没在现场。""那地方就如此有趣吗？"他问道。"比我能告诉你的还要有趣。"我回答说。"可现在呢？"他说。我完全没法给他讲清。我说："噢，那地方什么都有。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东西外。但这些却似微不足道。""你是说英国拥有的东西微不足道呢，"他问道，"还是说整个西欧的东西微不足道？""整个西欧，"我说，"以及这地方。"他望着两侧栗树掩映的那些黄油色巴洛克式房屋，笑了。"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那么多的音乐。"他说。"可他们却谁也不开心。"我反驳说。"在南斯拉夫，"我丈夫笑眯眯地说，"每个人都很开心。""不是，不是，"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可……"然而，我想要告诉他的东西却又无从言说，因为事情太复杂，全然不同于平常可以用语言说得清楚的东西。我

结结巴巴继续道：“真的，我们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富有。或者说，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而巴尔干人拥有的东西却多得数不胜数。看看他们，你会觉得他们一无所有。缝制这些衣裙的人看似一无所有。但如果不是那些蠢货将这些织绣给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谁制作了这些东西，都会比我们拥有的多得多。”我见过蔚蓝的奥赫里德湖，见过萨拉热窝的清真寺，见过科楚拉的围城，但我似乎无法找到语言来对自己的所见进行描述，因为那是不真实的。我从来无法确定自己所见是否真实，如果只是见过一遍；我知道，只有当这些东西的客观存在深深地植入我的各种知觉和记忆时，我才能将其纳入自己的私人梦境。我急切地说：“我必须再回南斯拉夫，明年的这个时候，春天，复活节的时候。”

---

1. 戴克里先（Diocletianus, 约244—312），全名为盖尤斯·奥勒留·瓦莱利乌斯·戴克里先。罗马帝国皇帝，曾于303年进行了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
2. 弗朗索瓦丝·罗赛（Franç oise Rosay，1891—1974），法国女演员。
3.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0），美国著名影视演员。

旅途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旅途

当晚，我们在萨尔茨堡度过，第二天上午，我们得闲去参观莫扎特出生时的住所，观看他那架小钢琴。钢琴的键是棕色和白色的，而不是黑白的。那小男孩坐在钢琴前，看着漂亮的钢琴，听着弹奏出来的乐音，心中好不快乐。旁边是他怒气冲冲的父亲，看着自己这令人生厌、体弱多病、就知道闲荡的儿子，气不打一处来。这儿子只会滥用才华；往后也得不到他同时代人的认可——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再往后，我们如此爱戴他，只可惜相距久远，于他已没了任何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人类做得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前往火车站，等待好几个小时，等着去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火车。当火车终于到来，我发现自己置身在对于自己来说是无数谜团的谜团之中。因为火车是头一天晚上从柏林出发的，车上挤满了郁悒不乐的德国游客。他们都是冲着那协议来的：只要他们去往南斯拉夫，就可以从国内带出一笔可观的钱财。我真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行为。在我看来，整个中欧都在制造一种我所无法识解的幻象。

车上异常拥挤，我们只在一节头等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我坐下了，丈夫则拣了一个临时的空位坐下，因为那位年轻人刚好去餐车吃午饭去了。车厢里其余的人中，有一对年龄较长的商人夫妇看起来五十好几了，另外一位制造商和他妻子，社会地位较前两位更高，且年轻十五到二十岁。年长的商人夫妇，与车上几乎所有人一样令人生厌：女人有着母猪一般的体形，男的肌肉松垮，面色苍白。制造商看上去却顺眼得多，眼神率真，乐呵呵的，不过至少超重三十磅。他的妻子有几分姿色，因为某种奥地利血统而绷着脸，一脸傲慢。商人的妻子不一会儿又从座位站起身，在过道里跑来跑去，焦急之极，哀叹她跟丈夫没有奥地利先令，因此没法去餐车就餐。看她那般焦急模样，我们估计他们有很长时间不曾吃任何东西了，于是给了她一盒巧克力和一些饼干。她神思不定，吃得非常快，食物在嘴里塞得满满的。趁嘴巴空出的当儿，她解释说他们此行是去达尔马提亚岛，因为她丈夫病得很厉害，神经紊乱，影响了胃，使得他没法下决断。她手拿一条咬过的巧克力指着丈夫说：“真的，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决定！如果你问‘你是想走呢还是留下来’，他没主意。”悲痛与忠实的爱在她眼里闪烁。我的丈夫很是同情，说他自己也有某种神经性的困扰。他甚至声称——这让我吃惊——他也曾经历类似的一个时期，对自己想要什么没主意。阳光，他说，是他发现的唯一的治疗方法。

但她嘴上说着话，目光却越过我丈夫的肩头，接着叫道：“哈，我们现在进入美丽的山区啦！太漂亮啦！太棒啦！哇，肯定是白云石山脉！”“不，这里不是白云石山脉，”我丈夫说，“这是通向巴德加施泰因的一条河

谷。”他并告诉她16世纪时这一地区非常富庶，文化繁盛，因为是金矿中心。他指着远处的霍夫加施泰因小城，描述教堂那边矿主漂亮的哥特式坟墓，上面的雕刻代表了采矿进展的不同阶段。车厢里每一个人听到这些都陡然兴奋起来，惊叹中带着自豪；似乎他们都是些孩子，而我丈夫正从一本书里给他们读着他们祖辈光荣历史的传说。凝视着那些哥特式的建筑，他们似乎生发出一种尤其虔敬的快乐；同时，他们也为我丈夫那一口无可指摘的德语而着迷。

“可那真的是地道的德国德语啊！”他们说，那语气似乎是在赞美他既德语讲得好，又聪明。突然，那制造商问他道：“不过，你们真的有头等舱票吗？”我丈夫有些吃惊，说道：“是啊，我们当然有。瞧。”然后，那制造商说：“那么你们可以坐着现在的座位不让了，因为刚才坐你的位置的那年轻人只有一张二等车车票！”其他人也都急切地附和。“没错，是的，”他们说，“你可以坐着不动，他只有一张二等车车票！”商人的妻子从座位上跳起来，截住一位路过的检票员，将情况告诉了他，语气非常激动，一面朝着我们连连做手势，一副为我们辩护的姿态。检票员也激动起来，满脸同情。他许诺说，午餐这会儿刚结束，大家正从餐车回来，他会等着那年轻人，将他驱逐出去。正当此时，商人的妻子注意到火车从谷口出来，正驶上一片雪原，她兴奋地大叫，同样是“太漂亮啦，太棒啦”。整车厢的人也都变得激情满怀，心醉神迷，似乎白雪是哲学所认证的法定快乐之物，就如哥特式建筑。为此，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不仅是一种原初性的情感，如果充分发展，并修剪去它多愁善感的成分，那么还将演绎出贝多芬、勃拉姆斯与马勒类型的伟大，而且它与我顶讨厌的东西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照。如果在一节挤满英国人的车厢里，有谁对火车穿行其间的景致大加赞赏，他的同伴就会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不仅是要克制住自己，以免与他共享快乐，还要说服自己，那美景里有某种可鄙而令人憎恨的东西。你无法想象这般特质可以滋养出什么美德。

正当这集体大狂欢的高潮之际，那位持二等车车票的年轻人回来了。他进来有足足一到两分钟，都没人——包括那位检票员——注意到他的存在。他站在车厢中间，甚至不清楚他的座位已被人占了，因为我丈夫在窗前。这时，商人的妻子注意到他进来了。“哦嗬——嗬——嗬！”她夸张得有些吓人地叫道。接着，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愤慨地看着他。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吓蒙了。检票员只得抓住他的袖子，叫他拿了行李滚蛋。在场的四个德国人那怒不可遏的样子，让我们认定里面一定有其他原因，而不是纯粹出于关心我们的舒适与否。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那年轻人的种族和性格。因为他是拉丁人，而且唯唯诺诺的，缺乏男子气。他橄榄形的脸显得很温驯，似乎将讨好他们认作他的法定责任；他忸怩作态地穿着一套西装，像是卖弄风情的女子，外加衬衣、领带、袜子、手套和一顶帽子，从咖啡色到奶油色，色调各不相同。他手提箱上的各种标签表明，他要么是

戏剧演员，要么是跳舞的。事实上，他修长的身材，因为练习而扁平得不自然，像是穿了紧身胸衣。遭到这群起围攻，他静默地站着，低着头，全身放松——并非漠然相对，而是因为平时的训练教会了他，遇到打击时要放松肌肉，以便倒地时不会摔得那么重。他身上弥漫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气息，似乎他全然习惯了被公然仇视。那是一种消极的隐忍，而非一种高贵的刚毅。他确信自己能经得住这场面，能不受伤害地走出车厢。我们心里很难受，却也不能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为那些德国人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事实上，这年轻人与他们太不同，让人觉得，他们那反应就像是动物园里的一群河马在笼子里放进一只非洲猎豹时的状态。

待他离去时，火车正驶进巴德加施泰因。商人的妻子很是焦躁不安，因为在那地方她吃不了东西。我们进站时，那些装有巧克力、咖啡、柑橘和三明治的手推车正忙着招呼另一列火车。等他们要转战我们的火车时，时间已太晚，他们没能到达我们车厢。商人的妻子说自己倒没什么，主要是担心她丈夫，从慕尼黑吃过早饭出来之后，除了在帕绍用了些腊肠和咖啡，在萨尔茨堡吃了些火腿三明治，就没吃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给她的巧克力和饼干，他也吃了一些，我们觉得就身为一个胃病患者来说，他表现得不错。然后，她安静下来。我们穿过上陶恩山脉长长的隧道时，她坐下来，晃荡着两条短腿。这隧道并非真正的边境。他们仍在奥地利境内。他们是那天清早从德国出发的。可当我们到了对面，在场的四个德国人加快语速，自由自在地聊起来，似乎他们不再有什么好害怕的。制造商和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们这是去新海尔采格，南达尔马提亚海滨的一个村庄，去那里游泳。他们说，过去的几个月他的企业遇到一大堆的麻烦，把他给累坏了。此时，那商人低下头，一手抚额，嘴里一声哀叹。接着，他们都为各自的麻烦开怀大笑起来；他们彼此告诉对方，自己是如何地需要眼下的这次旅行，他们要花费多少食宿费用，什么时候必须回德国；他们讨论作为游客他们被允许去哪些地方，如果去其他国家，被允许带多少钱，以及必须采取什么方式带这些钱。束缚着他们的那些条条框框显然繁多，而且伤脑筋，因为他们不时为一些细节争执不下。事实上，对于遭受的种种束缚和烦扰，他们频频吐露的都是绝望的心情。

他们这样聊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时，有人过来告诉商人的妻子，她终于可以去餐车用餐了。她万分急切地跑了出去，余下的我们都默然无语。我看了会儿书，然后睡着了，醒来时火车正驶入菲拉赫。那是一个位于河滨的奥地利小镇，很是可爱。在菲拉赫，商人的妻子真是欢天喜地，因为她发现可以为自己和丈夫买到一些腊肠了。整个旅途中，她都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在过道里奔跑追逐食物，回来时嘴里哼哧哼哧地嚼着什么，嘴上和胸脯上都是面包碎屑。不过，她这吃相并不显得贪婪，她只不过是想从中获得一种感官的快意，不停地往自己体内塞食物，正如生病或疲惫的人饮酒。实际上，她性格极其可人：她非常贤淑善良，并且非常爱她的丈夫。

她无比开心地给丈夫弄来这样那样的吃的，途经任何漂亮的地方她都喜欢指给丈夫看。一旦她将丈夫的注意力引到那上面，她便不再看那些漂亮的东西了，而只是看着丈夫的脸庞。我们行驶在美轮美奂的沃尔特湖畔，地处山麓的湖泊，山色掩映，黄昏轻笼，美不胜收。她让丈夫看那美景，丈夫看风景时，她却看着丈夫，然后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想象不到他都遇到过怎样的麻烦！"我们都嗯嗯啊啊表示同情，商人于是嘟嘟囔囔，信口吐出心中的苦闷来。情况是，他在柏林拥有一栋公寓楼，这六个月来，因为一个全然不曾料想到，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额外的纳税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并非声称那笔税负不合理。他似乎认为那样的要求完全合法，只是关涉的法律过于复杂，纳粹法庭的解释又如此随心所欲，以致他无从知晓自己会被要求缴纳多少钱，亦无从计算到底将来还会被收取多少钱。同时，一些不良的佃户也给他带来无尽的烦恼。不良佃户的行为经常招致别的佃户的投诉，可那些不良佃户又是纳粹党党员。他语焉不详，说不清楚是否有过试图赶走那帮不良佃户的计划以及是否因此而招致纳粹分子的阻挠，或是被吓破了胆，吭也没敢吭一声。

听到这些，制造商和他妻子叹了一口气，说他们能够理解。商人说话一直遮遮掩掩，显然是不想透露他具体是干什么行当的，以免惹上麻烦。但他极其憎恨地说，纳粹党在他公司里安插了一个指导员，这人啥都不懂，仅仅是一个想要找事儿干的纳粹党员。不过，他又补充说，他真正在意的是无法预见的税负。他对自己这般荒谬的忧心忡忡哈哈一笑，因为他是个勇敢而快乐的人；但作为一个显然性格豪爽的人，他却不愿向我们透露他所忧心的具体细节，由此可见他心中是何等困扰。不久，他便陷入沉默，一只胳膊挽着他妻子。两人似乎被一种强烈的情感紧紧连在一起，被一种超乎寻常的肉体上的相融相契，以及一种对于压力与紧张的共同承担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是那么强烈，应该是在年纪大得多的人身上，才显得更为自然一些。为使丈夫开心起来，妻子给我们讲起希特勒当政后所发生的一些滑稽事。她讲到一个一直给她做卷发的理发师助理，一天上午眼泪汪汪地跟她打招呼，并告诉她说，她恐怕再也不能为她服务了，因为她担心自己的从业资格考试可能不及格。于是她对那女孩说："但我相信你会通过考试的，因为你的工作干得真的很漂亮。"可那女孩回答说："没错，我的技术很不错的！洗头我会，水烫波浪我会，一般烫发我会，焗油我会，染发我会，但我老是搞混戈林跟戈培尔的生日，这个我不会。"他们听完都开怀大笑，然后重新陷入沉默。

商人说："但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力挺希特勒。对于他们，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

其他人都说："是呀，的确如此！"商人的妻子开口道："是的，我们的儿子们……"然后没再说下去。

他们在政府施加于他们的情感与智性的双重压力下，彻底崩溃，就如被繁文缛节扼住的拉奥孔们。显然，纳粹正是靠着将民众置于如此境地，才得以维持统治，因为民众谁也不可能给任何反对党以有效的支持，让它夺得政权。事实上，他们那烂摊子，典型的一团糟，任何心智正常的政党这会儿都不会接管政府，因为前方除了失败，完全看不到任何出路。他们的苦难似乎已夺去了任何关于未来的可能性。我暗想，如果一列火车里挤满4世纪西罗马帝国人民，他们也会生起同样的哀叹。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改革，导致极度不正常的税负，催生特权官僚以及复杂的民政管理，结果是臣民的苛捐杂税没完没了，提供的安全保障却少之又少。西罗马帝国人民的苦难因为哥特人的入侵才宣告结束。然而，这些人却无法期盼那样的解放。就像一个故事里讲的：一个人患了无可救药的忧郁症，去看阿伯内西医生。医生建议他去观看著名的小丑格里马尔迪的表演。“我就是格里马尔迪。”他说。这些无法做出决断的男男女女，就是哥特人。

我们越过南斯拉夫边境时，天已黑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士兵，身穿橄榄绿军装，典型的扁平颧骨脸型，语气温柔地问我们问题，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脸上却没任何表情。当我们挤出车站，制造商哈哈大笑地说：“喔，直至再回到这里，我们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可吃啰。南斯拉夫的食物非常糟糕。”“哈，我们也听说过，”商人的妻子大叫道，“我拿我这可怜的男人咋办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是吗？”听到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南斯拉夫的食物是斯拉夫人一绝。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烹羊羔、制乳猪；淡水鱼也多，直接从河里捞起来就烤；选用的蔬菜鲜嫩，各种各样的汤香浓可人；他们也明白调料最好是辣中带着刺激，而非干辣。我说：“你完全无须担心，南斯拉夫的饭菜很不错。”制造商大笑，一面摇头：“不，战争期间我曾在那地方，真的不好。”“也许是那时候不好吧，”我说，“我去年去过那里，发觉相当不错呀。”他们都朝我直摇头，面带微笑，却又有些不自在。我的理解是，他们觉得英国食物比德国食物逊色多了，所以在此问题上，我的意见不值一提，而且我也忒单纯，竟没意识到这一点。“据我所知，”丈夫冒昧道，“那里的鳟鱼非常不错。”“哈，非也！”制造商大笑，舞动着他的一只巨手，“他们管那叫鳟鱼，但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他们的鱼不像我们德国的鳟鱼那么鲜美。”他们都坐下来，身子轻轻晃动，头一点一点的，沉醉在温暖舒适的德国生活之中，沉醉在热腾腾的可口的德国食物之中，沉醉在其他民族都蛮荒未化、唯有德国人最为优等的幻觉之中。

过了一小会儿，丈夫和我去餐车用餐，地道的南斯拉夫风味，味道好极了。当我们回来，商人正讲到战后，他坐在自己办公室桌前，如何看见屋顶上的三个斯巴达克同盟狙击兵被政府部队击落，从窗外掉下来；通货膨胀如何将他毁了，他甚至卖掉自己的狗，以换口饭吃；如何靠了一家新兴的企业重新融资，再次发家，只是再没有欣喜之意，因为他总是害怕布尔

什维克主义，担心自己找不到最可靠的途径保全这些财产；讲到他现在的担惊受怕。过去二十三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害怕过协约国，害怕过斯巴达克同盟分子，害怕过金融灾难，害怕过共产主义分子，如今，又害怕纳粹。

他深叹一口气，显然话里有话地说："生活在纳粹统治下最糟糕的是，公民个人没有任何自由，而官员同样没有任何权威。"很奇怪，如此尖锐的批评会从一个完全持逆来顺受态度的人嘴里说出来，因为当他先前说到那种种折磨他的势力时，语气里似乎它们都是不可违抗的，一如鸣雷闪电。说实在的，他似乎没什么政治见识。当他抱怨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灾难时，我丈夫试图安慰他说，他以及其他的人当时所遭受的不幸的确可谓深重，但这至少对于德国是有着极大好处的：赫弗里希这一计划被证实是一大壮举，因为它清除了德国内债，为商界人士开辟出道路，创造出一个新的繁荣的工业国家。然而，尽管商人本人就是业界一员，对此说法却没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似乎很不习惯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在一时的效果外还会对什么产生影响。

突然，我无意间看到我们所停留的站台的名字。于是，我让丈夫把他兜里的时刻表拿出来比照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晚点。结果我们真的晚点了，而且晚了将近两个小时。听我丈夫这么说，四个德国人都显得极其惊慌。他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到达萨格勒布的时间必然太晚，赶不上对接的车，那车本来再经十二个小时的行程，就可以送他们到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斯普利特——这样的话，他们只能在萨格勒布歇一晚上。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沮丧。两对夫妇都将在南斯拉夫逗留几个星期，耽误一天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上多大的损失，而且第二天早上他们愿意取多少南斯拉夫货币都没问题。商人的妻子给本已紧张的处境又增添了一份痛苦。因为仍有可能刚好赶得及，我们能够赶上去斯普利特的火车，可她又拿不定主意，在丈夫如此疲惫的情形下，要不要那样赶。她坐在那里，使劲地拧着那两只可怜的红通通的手。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他们应该打定主意歇一晚，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她的样子是那么难受，我们于是给了她一些饼干。她几下便塞进嘴里，恰似精疲力竭的人狂喝白兰地。另外两位决定在萨格勒布住一晚，不过那神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陡然间觉得自己好疲乏，禁不住也对此感到吃惊，嘟嘟囔囔抱怨个不停。

我又一次意识到我永远也无法理解德国人。这几个旅人的痛苦实在让人吃惊。他们竟会为火车晚点而感到意外，这实在让人费解。从柏林到萨格勒布大约需要三十个小时，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指望，在冬天，又是这种路线，尤其是其中大部分路段都是山区，一列小型火车会准点到达。我同样觉得奇怪的是，商人的妻子竟当这是始料未及的恐惧——她丈夫大病未愈，直挺挺乘坐火车一天一夜，竟然会感到疲惫。此外，既然她有如此的

好胃口，为什么她不带一罐饼干和一些火腿呢？而且，这两个男人，既然能成功管理好不算小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为何如此简单的一个行程都安排不好呢？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他们，又一个顾虑来惊骇他们了。“而且萨格勒布的宾馆会是什么样子呢！”制造商说，“猪圈！猪圈！”“哦，我可怜的丈夫啊！”商人的妻子哀鸣道，“想想他病得那么重，他多么难受呀！”我提出不同意见说，萨格勒布的宾馆非常不错，我自己就曾在一家旧式宾馆住过，舒适极了，还有一家新开的大型宾馆，其豪华程度绝不亚于美国的宾馆。但他们根本不信。“可既然你们认为南斯拉夫那么糟糕，干吗去那里呢？”我问道。“哈，”制造商说，“我们是去亚得里亚海海滨，那地方德国游客多，因此宾馆也很不错。”

接着，这种不解迎来高潮。一位南斯拉夫检票员第一次过来查票，这是一位红脸的克罗地亚人，长得很丑，却很和善。德国人都把票举到空中——天啦，瞧！他们全是二等车车票。丈夫和我大张着嘴，完全迷乱了。这让那场针对那位咖啡色加奶油色装束的年轻人的战斗彻底地无法理解了，也丝毫不让人感到快意。如果他们本就是些低俗之人，这倒正常，可他们一点儿也不低俗下贱，他们彼此相爱，热爱宁静，热爱雪景，热爱他们的民族历史。尽管如此，他们却对自己行为的暴露满不在乎，而这在我丈夫和我看来，却是极其严重的不道义。我意识到，如果我对他们说，“你们把那位年轻人撵出去了，因为他买的是二等车车票”，他们会点头说“是的”。如果我接着说，“可你们自己买的也是二等车车票啊”，他们会觉得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之间没什么关联——我想象不出来，不理解这二者之关联的人，他们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正当我们张口结舌之际，德国人的行为又一次令我们费解了。克罗地亚检票员告诉几个德国人，必须补足从边境过来的一等车与二等车之间的差价。钱也没有多少，每人几马克。德国人提出抗议，理由是从柏林出发的二等车厢太少。但克罗地亚人解释说，这个不是他的事，也不是南斯拉夫铁路公司的事。德国政府造的火车，造得不好是他们的错。南斯拉夫铁路公司只负责放行火车，在南斯拉夫境内道路上，乘客必须为相应的座位埋单。听到这，制造商朝他递了个眼色，伸过去一只手，手里握着贿赂的钱。那克罗地亚人实在太穷，他的手不能自已地往前伸了一下。但他解释说，自己不能这么做，因为可能有督查员过来巡查，他会因此丢掉工作的，因为在这问题上，公司处罚得非常严厉。制造商笑眯眯的，一定要给他。我差一点儿没从座位上噌地跳起来，因为检票员实在太穷，他咧嘴笑着，渴望得到那笔钱，眉毛却又因为恐惧而上扬。这样不公平，引诱他冒这样的险。我同时想，这些口口声声说南斯拉夫是一个野蛮未化的国家的人，却胆敢在刚越过边境不到几个小时的情形下，便将自己置身于违反法律的一边。

我心里正想着，检票员突然发火了。他红色的脸变成了紫色，开始大声吼叫。德国人却半点不以为意，只是开始凑钱。如果有人朝我这样大吼大叫，不管我怎样错了，我都会朝他吼回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远远比我强。但在他们凑钱补差价的时候，他们又一次让人完全无法理解了。他们可以交出马克，且相比于他们被允许带出德国，且他们也的确带上了的钱来说，要交的数额并不大。尽管如此，他们却为交钱费尽了周折，原因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们居然谁也不清楚自己的钱放哪里了。他们搜遍所有衣兜、手袋、钱夹，只好彼此凑零钱，一面回想，互相纠正，为这样的不便满腹牢骚，但这麻烦却是他们自找的。

我站起身，来到过道里。没理由跟这么一车厢气咻咻的无头苍蝇共度一晚。他们是那么善意，却又那么令人费解。很显然，他们注定将走向一种特有的灾难。这种灾难，任何不属于他们血统的人都无法想象该如何避免。除此，他们又有着一种令人害怕的素质——理论上，这些人似乎最讲求实际，最理性。我相信，他们的企业一定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但这只是说明，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制度已在社会上开辟出众多深沟大渠，顺着这些沟渠，绝大多数人都能顺畅地滚至某个确定的终点。当一个人管理一家工厂，实则是这家工厂在管理他。当他开办一家公司，这公司便在遍及整个世界的一个网络中定了位。他只要遵从一般的趋向行事，就不会遭遇任何明显的灾难。但出了专业领域，一走入日常生活领域，他们就失去了判断能力和独立办事的能力。这几位就属于这一类型。而且他们的那种无助感更为强烈，因为他们已然培养出来一种特殊才能——唯命是从。常规时期，他们的工商业肯定做得很成功。而这种成功换在所有其他时期，却必然演变成痛苦而不知所措的失败。就像如今，资本制度正进入一个颓丧阶段，他们过去滑行欢畅的很多沟渠被毁于无形，他们被击垮、被打败，他们选择日常生活之轮廓的能力，他们的政治决断能力，已不及往昔。像无头苍蝇的人们，他们的下一代也会变成无头苍蝇，必然会支持任何制度，只要能给予他们新的唯命是从的机会：能挣到钱。新的制度将在旧有的地方置下新的沟渠，对社会进行重塑。当这制度一步步导致一种普世的灾难，他们永远无法凭着竞争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对其有所察觉。我试图告诉自己，车厢里的这些人并不重要，亦不具有典型性，但我知道自己在撒谎。这些人与我曾认识的雅利安德意志人一模一样。而在中欧，这样的人有六百万之众。

“萨格勒布到啦！”那些德国人叫道，一面将行李架上的行李取下来。接着，他们又开始恼怒而沮丧地大喊大叫，因为那地方不是萨格勒布，而是萨格勒布萨瓦，是郊外，距离主城区还有三四英里路程。我身体斜倚着将头伸出窗外。雨下得很大，铁轨间泥水映照。一位老人，瘦削的身躯裹着一件贴身大小的单薄的大衣，沿着火车一路小跑，一面柔声叫着：“安娜！安娜！安娜！”他手拿一把撑开的伞，却没罩着自己的头顶，而是向

前伸出一手臂的距离。他带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所呼唤的那位心爱的女人。老人跑过长长的一列火车也没找到她，但他并没失望，而是转身又一路小跑回去，仍不停呼唤着，焦急中带着甜蜜：“安娜！安娜！安娜！”当火车冒着蒸汽驶出车站时，他正沿着列车跑第三趟，手里的伞仍远远地伸向身子的前方。一束路灯灯光洒落在他的白发上，洒落在他有好几处裂口的雨伞上，照亮了如箭的疾雨。我来到了我能够理解的人中间。

克罗地亚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萨格勒布I

我们的三个朋友顶着雨，在真正的萨格勒布火车站站台等候我们。他们分别是：康斯坦丁，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东正教斯拉夫成员，来自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瓦勒塔，萨格勒布大学数学教师，罗马天主教斯拉夫成员，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马可·格雷戈里维奇，评论家和新闻撰稿人，来自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从体态到思想，各不相同。

康斯坦丁身材矮胖，脑袋很像卢浮宫里著名的森林之神，眉毛又似藤蔓叶子。他喝酒不多，却永远像是在啜饮从嘴里流出来的东西，而非从外面进去的。他一直念念叨叨，从早上从卧室出来，嘴上挂着半句话，至夜间回卧室时，才好歹把这句话说完。他说话时本能地打着噤声的手势，以免有人意欲插嘴。他的话，基本上也都不错，有时影影绰绰，有时恣肆奔流，似海涅的《佛罗伦萨之夜》；有时清澈透明，如淙淙流淌的溪水讲述小故事，只将希望、爱恋、懊悔传递，似一首海涅的抒情歌谣。我见过的人当中，只有他最像海涅，海涅是所有作家中最具犹太人气质的——康斯坦丁既是犹太人，也是塞尔维亚人。他父亲是一位犹太医生，同情革命者，大约五十年前从俄治波兰逃出，然后定居在塞尔维亚一个富庶的外省小城，并成为那里医疗行业的领导者之一。那地方的医疗事业，也远比一般想象的发达得多。他母亲也是一位犹太裔波兰人，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是被收养的，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十足的塞尔维亚人。大战中，因为血气方刚，他非常英勇，在他心里，塞尔维亚的历史就是他的历史，他的生命就是塞尔维亚人民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是一名政府官员，不过这并不是他推崇南斯拉夫的原因。在他看来，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政权，由贝尔格莱德的一个中央政府来进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这些民族想要保全自身，同时抵抗来自西面的意大利与中欧的压力，以及来自保加利亚——或许其实也是来自东面的中欧的压力的话。

瓦勒塔来自达尔马提亚的一个城镇。早在公元前，那地方住着数百名希腊人。他身材高大，性格恬静，早晨睡醒起床后一坐就是半天，像一尊古代雕塑。他走到任何地方，无论是巴黎还是伦敦，或者柏林、维也纳，都非常惹人喜欢。不过，他是一位纯正的斯拉夫人，他的魅力纯粹，不夹杂其他民族的人魅力中常有的那些缺陷。他可能突然打住笑，修长的手攥紧成拳头，为某一想法表现出一种殉道精神。他反对南斯拉夫，拥护邦联制，推崇自治的克罗地亚。

格雷戈里维奇就像米老鼠电影里的那只布鲁托。他为在这混乱世界守护某些既定的崇高准则而费尽心力，却得不到一句好话。他的脸上写满悲伤。

他的身体就像布鲁托那般具有伸缩性。坐在扶手椅里，当他认为什么事本该还之以公道时，心中的憎恨会一寸寸将他拉伸至屋顶；而遇上什么无可避免的错误时，心中的绝望又会使他萎然折叠如六角手风琴。南斯拉夫便是这位“布鲁托”为之服务的米老鼠。他比时年四十六岁的康斯坦丁年长十岁，比瓦勒塔大三十岁。这就是说，战前的十六年里，他曾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为反对匈牙利人，争取克罗地亚人民自治和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而斗争。为使克罗地亚人能与他们自由的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人联合，他历经贫穷、牢狱与流放而不悔。南斯拉夫对于他就是人间的天堂。谁要对它稍有微词，就是往那十六年的悲伤里吐唾沫；谁要是举手反对它，就是亵渎斯拉夫之神圣。因此，在他看来，大战爆发时还是在巴黎读书的一个学生，一出生就是自由的塞尔维亚人的康斯坦丁，视南斯拉夫为理所当然实属贸然不敬。他们间的差异，就如公元初的前三个世纪为信仰而战的基督徒，与公元4世纪那些捍卫已取得胜利的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差异。

在格雷戈里维奇看来，瓦勒塔简直就是一个叛徒。他不仅仅是迷失方向的一个个体，更是背叛性行为的典型化身。年轻人应当高举正义的旗帜，反对不公的政权，应当虔心归顺上帝，反抗暴政。在格雷戈里维奇看来，瓦勒塔似乎正好背叛了这种正义，因为在他看来，南斯拉夫象征着违抗奥匈帝国极权统治的最高姿态。只有巫师才能让瓦勒塔觉得，在他六岁时奥匈帝国就不再专横，以及，除了南斯拉夫，他便不曾见过任何其他不公不义的政权。

他们站在雨里，他们是那么不同，却那么相似。他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在内心却无法向彼此问好，他们有点不高兴，因为是为了接我们，他们才跟敌人一同站在雨中的。我们是他们的朋友，但我们却是由不同物质做成的。康斯坦丁的激情满怀，瓦勒塔的紧张而优雅，还有选择性的快乐与悲伤，以及格雷戈里维奇的带着阴郁气息的大丹犬似的高贵，其基本材质都一样，虽然形状各异。他们坐在我们的宾馆房间里，一起喝着酒，他们表现出血统上的一致性。一扇门打开，他们都一震，同时扭过头去，动作一致。当敌人逼近，他们必须保持同样的步调。

我丈夫先前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看到他对他们奇怪的表现大为不解。他听着康斯坦丁一口漂亮的法语，满脸惊讶。康斯坦丁仍带着他少年时期那优雅而飘浮的腔调，那时他是柏格森[注]最喜欢的学生之一，跟着旺达·兰多芙斯卡学习音乐。他对康斯坦丁着了迷，身体努力前倾，注意倾听那完美的辞章。而这些完美的辞章是一定要涌出的，一旦康斯坦丁的眼睛捕捉到那光亮，他每一绺贴紧的黑发卷就会在头上打转，他的双唇就会向前伸出，他的双手就会在他面前的空中摸索，似乎在解开那令人窒息的真理的围巾。此时，康斯坦丁正谈到柏格森，说如果只把他当作哲学家看待，就会忽略掉他身上最根本的东西。其实他是一位魔法师，哲学只是

他的素材。他并不分析现象，他只念诵咒符，以激发人的领悟。“我们这些学生，”康斯坦丁说，“我们不是一位伟大的教授的学生，我们是一位巫师的门徒。我们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不在学术的常规路径中。星期天，我们常常在枫丹白露的树林里聊天，有时一聊就是一整天，汇聚我们的记忆，重建他讲课的内容。因为你知道，在他课堂上是没法做笔记的。如果我们只为记下一个要点而低头片刻，便会漏听一段前后有机关联的话语，课上余下的内容就可能听不懂。这一点足以表明他是一位魔法师。咒语的精髓何在？一旦你漏掉其中一个字，咒语便不再是咒语了。我当时立即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们镇上，也就是沙巴茨，有房子排成一排的三家，第一家住的是我父亲，也是我们那里最好的医生，隔壁一家住着一位牧师，是我们那里最了不起的圣人，再隔壁住着一位老太太，是我们那里最了不起的女魔法师。小的时候，虽然住第一家房屋，我却经常到另两家去玩，因为圣人和女魔法师都非常喜欢我。告诉你们吧，这两家房屋里都有魔力，因此我对此非常了解，而大多数人却不明白。”

一排光亮扫过我们内心的欧洲黑暗的地图。一端是在塞尔维亚的一个小镇——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小镇，就如古苏美尔的乌尔城，其中居住着一群童话故事般的人；另一端则是熟悉的柏格森的思想。看得出来，我丈夫对此欣喜若狂。他喜欢听闻自己不知晓的东西。可过了片刻，我发现他没那么开心了。瓦勒塔说他正筹划着怎样让我们在南斯拉夫玩得尽兴，说希望我们能去雪山里玩，尤其是如果我们喜欢冬季运动项目的话。我丈夫说他非常喜欢瑞士，当他感到疲惫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去那儿，将自己交给导游处置。“是的，那些导游对我们太有帮助了，他们是那么彬彬有礼，”康斯坦丁说，“跟他们在一起会让我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恢复。因为凡是我们失败的地方，恰是他们成功之所在。我们能为我们之所爱负起责任，比如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祖国、我们认为正义的事业，但对于我们所不爱的东西，我们却集中不起必要的注意力。导游的工作正好就是这个。而他们那无微不至的照拂，较之于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关注与理解，却毫无意义。”

“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去意大利做了一次最舒服的旅行。她是德国人，你知道，她崇拜歌德，因此这成了一次朝圣之旅。我们去看他在威尼斯和罗马居住过的地方。她是如此开心，你真是难以想象她心里有多开心，以致她凭直觉就能判断出很多事情。‘那是他居住过的房子！’她在威尼斯一艘平底船上来回兴奋地大叫。结果还真是。最后，我们来到那不勒斯，请了一名导游，去爬维苏威火山，因为歌德爬上过维苏威火山。你记得他写自己在一个小火山口边上的那一段吗？他说自己滑了一跤。我妻子对这一细节记得特别清楚。突然，直觉告诉她，我们看到的其中一个小火山口就是歌德滑倒的地方。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已朝那边奔过去。我当然明白，她随时都可能丧命，于是我跟着跑去。导游也奔

了过来，虽然她对歌德毫无兴趣。紧接着，一种导游生活中时时的警觉性所蕴藏的神秘领悟力得到了印证。这时，这座火山开始喷发，岩浆从四处喷涌出来。不过，导游总是知道岩浆会从哪里来，她领着我们或左或右地，朝着没岩浆的地方跑。有时，慢一秒我们就过不去了——后来我们发现鞋底被烧焦了，就是证据。有四十五分钟，我们就这样忽上忽下，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地奔跑，最后终于到达安全地带。整个过程我都兴奋不已，因为导游所做的，是我们无法做到的，而这太重要啦！”

听这故事的时候，我丈夫一直盯着我，脸上充满警觉的神情。从康斯坦丁说话的腔调看，显然他没觉得故事有什么好奇怪的，除了导游的尽职尽责让他难以理解。“她那些朋友脑子是否太不正常？”他只是这样问自己，“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但谈话突然转到实际事务上来，我们被提醒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当然，我们必须要与谁还有谁会面。从某些沉默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在了我们行程安排的问题上。因为看得出来，某某似乎不愿遇见某某。突然，因为对于某报纸编辑Y的不同意见，争执公开化，先前的沉默被打破。“噢，你们应该见见他，他会让你们感兴趣的！”瓦勒塔说。“没错，他是个非常有见解的人。”康斯坦丁承认说。“不！”格雷戈里维奇大声嚷道。他们用塞尔维亚语吵了一阵子。然后，格雷戈里维奇耸耸肩，轻描淡写的语气中带着沉重地对我们说：“Y不守信，我要说的就这个！”“他绝对守信。”瓦勒塔冷冷地说。“格雷戈里维奇，你是个不可能主义者。”康斯坦丁和善地说。“让我们的英国客人评判吧。”“布鲁托”阴沉着脸说。

情况似乎是，几年前的一天，“布鲁托”给Y打电话，提醒他下个星期是某位克罗地亚诗人百周年诞辰，问他是否愿意刊登一篇相关文章。Y说可以，于是“布鲁托”发给他一篇四栏篇幅的文章，其中包括两则论及自由的引文。但按规定必须提交审查官审查。碰巧，在当时当地，负责审查的就是“布鲁托”本人。他将文章削去了一栏半，其中包括那两段引文，然后发回给Y。然后，如果我们相信的话，Y给“布鲁托”打去电话，言辞极尽粗鲁，并从此再没接受过“布鲁托”任何一篇文章。“说实在的，”人高马大、一头灰白头发、满脸皱纹的“布鲁托”说，“他肯定也明白，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作为一位评论家，我必须对自己诚实，必须从评论家的角度考虑，写下该写的。而作为一位审查官，我也必须对自己诚实，该怎么删节就得怎么删节。在哪方面他希望我背叛自己的理想呢？”当他给我们讲起这件事，他的眼睛放着光芒，就像一个因正义而怒不可遏的壮士。

不过，我能够理解那故事。它不像一般可能认为的那样前后矛盾，反而是出自一种高度严格的秩序感。这里遗留着一种整个世界都曾持有的态度，而彼时人们的生活也许更为幸福快乐。如今，我们认为，如果有人担当某个职位，他常常会根据自己的身份，根据他自己的性情和行政标准，对该

职位进行修改和调整。而那个时候，一般人却理所当然地以为，一个人会根据其职位，调整和改变他的性情和道德标准，只要是真的必要。三、四世纪时，基督教教会一直坚持选举不愿出任其职的人做主教，其部分或许可靠的理由是，尽管他们甚至连基督徒都不是，但他们似乎具备了近似法官的主教职位所必需的能力。有时候，这些人实在不情愿，以至于教众们不得不绑架他们去强行加冕。不过，他们一旦就职主教职位，就往往干得非常出色。他们对于社会结构有自己的认识，他们清楚，因为那时的主教承担了大部分的民事管理职责——濒临崩溃的罗马帝国已无力管控社会——如果不想让社会分崩离析的话，他们必须恪尽职守。终其一生，格雷戈里维奇肯定很清楚爱国诗人的社会价值，以及过去郁郁寡欢的二十年里，审查官员的社会价值。因此，他觉得，他必须在两方面都做到最好，而不是轻易更换他的行为标准，以便保持他人格的一致性。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时间已经太晚，我感觉已无法向丈夫解释清楚。当我勉强撑开眼帘，我看见他正在慢慢脱着衣服，沉思的目光盯着窗帘，或许心中在想，明天将发现一个怎样奇怪的城市。

---

1.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代表作为《创造进化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萨格勒布II

不过，第二天早上展现在眼前的萨格勒布市一点也不怪异。它阳光充足，温暖而舒适。一千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生活安逸，虽然政治上不见得满意。此外，这里到处是巨大的吐司黄的建筑，兵营、法院和市政办公厅，这些建筑无一例外地是奥匈帝国留下的标记。这也意味着在舒适的环境里，人们吃得开心，却锻炼不足。栗树下的小桌子上满是咖啡、鲜奶油、甜饼，坐着欢乐的人群。但这城市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它没有大的河流，也没有一个至高点，旧城区所在的那座小山，在18世纪曾被称作“一片台地”。那里很少有非常精美的建筑，除了那座哥特教堂。而就是这座教堂，也被强迫穿上了一件丑陋的19世纪外套。不过，萨格勒布正因为它缺乏个性特征的俊美，而被赋予了一种犹如舒伯特的乐曲一般的怡人情调。那种令人愉悦的曲调开始时轻舒低吟，却似永远不会终了。第一天上午抵达时下着雨，我们以为会因此感到心烦，结果却是非常开心，仿佛徜徉在一座阳光中的美丽城市。此外，它还有着一种讨人喜欢的特别之处，就像许多法国城镇那样——尽管是一座不小的城市，却依然保留着一种小镇风情。萨格勒布居住着十五万人，然而听街头巷尾的闲谈，似乎谁都知道谁家什么时候要生孩子了。这对于城市化，真是一种可爱的精神胜利。

市里有一处开阔的市场。红白相间的伞下，站立着壮实的农民。他们的脸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那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丰富而细微，似乎他们都是些有着极好修养的城里人。那些女人的穿着是我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既不是裙子，也不是裤子，而是两大面围裙，一面罩着身体前面，一面罩着后面，两侧搭接，下面露出大胆的红色羊毛长袜。她们的形象，与我们通常概念里的“农民”一词恰恰相反。我们用这个词时往往带着贬义，认为那些妇女会因为反复怀孕生孩子而变得笨头笨脑的；又好像她们一辈子都在村子里，围着那些每个冬季都在门槛前的泥泞里打滚的幼稚儿打转。改造出这种服装的妇女，即使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也能迈着大步走动，只要她们乐意，也可以在泥泞中跳舞，无须理会其他蠢儿们的评论。

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优裕。他们都会说一些德语，因此我们可以询问他们东西的价格。我们只要花两个先令就可以买一大麻袋最好的水果蔬菜——同样的钱，在西欧城市里只买得到五分之一的东西。这意味着令人绝望和揪心的贫困，因为商店里的制成品标价跟西欧城市里的几乎一样。但他们非常沉着，没有人谈论贫穷，没有人乞讨。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中欧，因为在德国和奥地利城镇，尽管那里的人们比这里的富裕两倍，他们却会没完没了地抱怨。不过，有迹象表明，我们所处之地仍旧临近中欧。

一些货摊上堆满绣工精致的手帕和餐桌台布，都是一流的做工，因为斯拉夫妇女手指间有一个被俘获的精灵，只有她们会创造出如此的杰作来。但那些图案的设计却非常糟糕，不像我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见过的图案那样漂亮，甚至不及站在货摊边上的那些农家妇女衣裙上的花式好看，尽管那些衣裙质地较次。手帕和桌布上的图案过于自然风，试图再现水果和花卉的真实形象，遵照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柏林绒线刺绣的传统。换言之，其间显露出德国的影响。

我感到很不耐烦。身在这里，我心中没有如期望中的、来到南斯拉夫应有的愉快。我走到广场中央那尊雕塑的台阶上，稍加休息。看上面的题词，我明白这是克罗地亚爱国诗人叶拉契奇（Yellatchitch）的雕像。我由此想到，尽管克罗地亚人没能令我振奋，他们却有着其他的成就值得人们肯定。因为这尊塑像当属世界上最为奇怪的雕塑之一了。它展现了叶拉契奇骑在马背上，指引着他的部队前进的画面。他挥舞着手中的剑，直指布达佩斯方向。事实上，1848年，他的确领着战士们奔往这一方向，并战胜了匈牙利人。这尊雕塑并不是克罗地亚人从匈牙利解放出来之后，才新竖立起来的。作为打败匈牙利人的一份纪念，在匈牙利还是克罗地亚主人的时候，它就矗立在了这市场上。这并非由于匈牙利人的宽宏大量。要解开这一谜案，必须从克罗地亚的整个历史说起。

克罗地亚人原是一个斯拉夫部落，应希拉克略皇帝的邀请，前来赶走阿瓦尔人，解放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克罗地亚腹地。阿瓦尔人烧杀抢掠，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多瑙河为中心，四面侵扰，年复一年地向周边所有民族索要巨额贡赋，曾引发一次早期货币危机。这种状态持续到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公元7世纪。然后，克罗地亚人作为帝国臣仆滞留下来。当帝国政权瓦解，他们宣布独立，拥有了自己的国王，承认教皇的宗主权。有关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资料极少，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并非野蛮民族，而是传承了拜占庭大量复杂的典仪。他们最后一位国王的加冕，大约是在诺曼征服时期。他没留下什么后代。然后克罗地亚贵族间发生内乱。为了和平，他们承认提出占领权、选举权与继承权三项要求的匈牙利国王科洛曼为他们的国君。其中的最后一项权利值得怀疑，另两项则可算是公平。这是一件值得记上一笔的大事——在这些地区，在那古老的时代，便已有了法制思想。我们的偏见在于，我们以为边远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眼皮下，他们才开始开化，以为他们的昨天都非常野蛮。

科洛曼的加冕名号为“匈牙利-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国王”。两个世纪里，这两个王国各自独立，平等共存，又共侍一君。但两个民族不太可能融合。他们种族各异：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源自亚细亚，与芬兰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有着血缘关系；克罗地亚人属于斯拉夫人种，与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捷克人有着血缘关系。两个种族均非温顺之辈，

他们强烈地固守着各自的语言。匈牙利人凶悍好战，具有浪漫气质；克罗地亚人同样凶悍好战，却长于理性思考。没什么能让他们惺惺相惜，但考虑到他们在中欧的地位，基于双重君主制的紧密联合却很管用。不过，这并非铁铸般的坚固。14世纪时，科洛曼家族成员死尽，克罗地亚人不愿接受由匈牙利人选举出来的国王。他们在萨格勒布大教堂加冕自己选举的国王。直至六年之后，匈牙利人接受了克罗地亚国王，联盟关系才得以恢复。但到了国王的儿子路易大帝，因为他主要继承了匈牙利血统，而且在感情上也更倾向于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不得不屈居其次。

很多人都以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稳固，认为现代民主制在骨子里就具有反复无常性。我们忘了，稳固的君主制国家只是秩序的最完美的展现，或稳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最完美的展现在政权中之罕见程度，一如在文学或音乐中。缺了这些条件，君主制之反复无常，则几如癫狂。皇家血统不如平民家族那么枝繁叶茂，也许是因为，那些公主在不到青春期时，就会被抢去当新娘——以免被别的人抢了先手，从而建立起有益的姻亲关系。在任何阶层，不可能有纯种繁殖的昌盛，也不可能一代强代代强。如果国王死了，还不得不将王位传给一位白痴，或者后继无人，那些王公贵族就可能从很远的地方请一位以暴力著称的人来，以避免内部战乱。这人会因自己只是一个外来之人，施政冷漠无情。也有可能在他骨子里，就涌动着这样一股背信弃义的基因，使得在他死后，便扔下这些人群氓无首。任其如何，他必然会遭受所有国王都会面临的特有痛苦——贫穷。我们之不乐意缴纳的所得税，无非是一个时新的词汇，说的还是人类之短见，看不到提供团体开支的合理性。这一毛病，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请来的国君因为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名外族人，害怕在他乡异国地位不稳固，很少敢伸手向那些王公贵族要钱，只好狠命地向农民下手，且往往抢掠过度，毫无仁慈。也就是说，他要求王公贵族交纳一定量的税款，却没有相关法规制度来保护社会公正，阻止王公贵族为确保他们私囊毫发无损而盘剥压榨农民。此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因为国王是外族，他往往会跟外国签署一些不利于该国的合约。事实上，这一危险的确相当严峻。因为，虽然一般都认为谈判取代战争是现代人的一项发明创造，但事实上也仅此而已。中世纪时候，人们总是乐意放下刀剑，签订协议，宁愿支付赔款。而一位外来的国君，则往往尤其乐意割让土地和人民，以省下钱来支撑其政权。

身为这星球上的一位居民真不让人舒心。过去就不曾有谁舒心过，除了在一些短暂的时期。尤其不舒心的要数克罗地亚人。路易大帝是法国人，安茹家族的一员。他娶了伊丽莎白，一位斯拉夫人，波斯尼亚国王的女儿。路易死后留下两个女儿。几乎所有匈牙利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都推举大女儿玛丽为他们的女王，并由她母亲摄政。但某些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贵族反对她，要求将王位授予她父亲的堂弟，那不勒斯的查理国王。很显然，这

些克罗地亚贵族怪异又邪恶，对自己的人民几乎没什么体恤之情，而且跟人民简直不是一条心，让人觉得他们或许是异邦外族。这整个的一片河山，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亚洲的侵略者践踏蹂躏。有人认为，这许多的王公贵族都是各种各样的游牧强盗以及强权者的后裔。这些人在入侵者撤退后，从精疲力竭的人民手中夺去土地；他们有的是意大利、德国和哥特血统，有的本身就是亚细亚血统。查理国王被加冕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四年之后，被路易的遗孀伊丽莎白刺杀。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拉迪斯拉斯，一位满脑子幻想的冒险家。他面对着伊丽莎白和她女儿玛丽，以及玛丽的未婚夫——另一个外族人，卢森堡公国的西吉斯蒙德，德国查理皇帝的一个儿子。伊丽莎白和她女儿希望西吉斯蒙德做国王。从那之后的五十年里，这个国家深受这些外族人之苦。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些外族人带来的苦难又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痛苦地哀号。他们罹受折磨，或者被投进监狱，或者忍饥挨饿；他们的民族精神遭到亵渎。拉迪斯拉斯尽管从没加冕，却以十万达克特的价格，将达尔马提亚卖给了威尼斯共和国；虽然西吉斯蒙德最终加冕为王，却始终未能有力量维护其法定权利，也没能收复达尔马提亚。这也就是说，极其好战尚武、挥霍无度的高智商游牧民族，匍匐在了一群商人的脚下；因此，克罗地亚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因为与他们的达尔马提亚兄弟分裂，之后更加无力与匈牙利对抗。

西吉斯蒙德在心中记了克罗地亚人一笔，因为他们中的某些贵族曾帮助拉迪斯拉斯与自己作对。从那之后，克罗地亚都没有单独的加冕礼，只能满足于一纸单独的就职文告，一份写有国王誓言和意欲赋予臣民们何种权利的文件。不过，有人说，克罗地亚也应该知足了，尽管它被分割，但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讨价还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事情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从东南面，土耳其人日益逼近。1453年，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1468年又威胁到达尔马提亚海岸。之后，克罗地亚人与匈牙利人陷入了永无宁日的游击战争，以保卫他们的国土。1526年，匈牙利人发动摩哈赤战役，攻打土耳其人。出于自尊和贵族间政治上的分歧与争执，他们没有请克罗地亚人帮助。他们被打败，国王被杀。如今，克罗地亚人更加孤立无援了。它被打败并转而求助于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的统治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奥地利授予他王权是基于血统的理由。

德国人一直以来都恨斯拉夫人。不仅如此，他们一直以来时常对斯拉夫人做出一些充满仇恨的举动。如今，克罗地亚人开始吸取这一教训。克罗地亚在经济上被摧毁了，因为土耳其人从东北、东面和东南压将过来。因此，克罗地亚人从奥地利求得庇护。奥地利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克罗地亚变为军事边界，所有的男性，从十六岁到六十岁，全部被编入常备军，以守卫奥地利帝国。他们也被赋予某些权益——主要是从法律上虚拟假定的权益。但由于他们被与欧洲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便滞留于遵道守法的中世纪时代，安享着这些虚拟的权益。他们在悲苦的贫困之中苦苦挣扎。16世

纪末期发生过一次农民起义。起义遭到能被想象得出的最严酷的镇压。起义领袖被以模拟加冕的方式杀害——加在头上的皇冠是一个烧得通红的铁帽。从那之后，克罗地亚人俯首帖耳地在奥地利的铁拳与土耳其人的偷袭之间苟延残喘。直到1670年，许多的克罗地亚贵族密谋建立起一个组织，以对抗哈布斯堡皇室。这情势，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些外族人原先对其人民的利益毫不关心，到了这苦难的年代，却成了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被发现，被杀头，他们的土地被分给奥地利和意大利家族。而对于这些家族，农民不过是被用来剥削的粗鄙动物而已。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人当中生发出有史以来最让人不解的一种激情：对于哈布斯堡皇室热切而坚不可摧的效忠。因为他们与匈牙利传统上的联盟，他们派遣他们的班，也就是他们的统领者，出任匈牙利议会议员。该议会早先流落异乡，土耳其人被赶走后，重新回到布达佩斯。不过克罗地亚人仍拥有独立权，可以自己批准条约，没任何人会说个“不”字。他们利用这一权力，将哈布斯堡皇室稳稳地推上宝座。查理六世没有儿子，他于是颁发诏书，宣布哈布斯堡王位可以由女系继承，且由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继位。如果高度军事化的克罗地亚予以抵制，帝国的其他各部分也会跟风而行。但克罗地亚人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一诏书。他们后来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回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土耳其统治，匈牙利贵族道德堕落，目无法纪，悖逆乖张。特蕾莎为了讨好他们，撕毁宪法，将克罗地亚当作一个奴隶州，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不是王国的伙伴，而是匈牙利的附属领地。由于克罗地亚贵族已经被摧毁，如今再没有人领导人民起来反抗。外来的贵族对与他们同阶级的匈牙利人，比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要亲近得多。

因此，整个18世纪，克罗地亚人都在给匈牙利人做奴隶，然而他们对于奥地利的热爱，却牢固得几近痴傻。哈布斯堡王朝日渐无能，引发了1848年的危机。除了其他蠢行，弗朗西斯一世和梅特涅还想出个馊主意，将匈牙利议会关停了十四年之久。这一高压行为使匈牙利的民族情感沸腾到极点。让人不解的是，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内在精神是在任何环境下对任何民族的任何民族感情的鄙视和憎恨。这一点，从他们对待语言问题与众不同的态度中可得到证实。他们因为被强迫讲德语，不被准许使用自己的语言（马扎尔语）而暴跳如雷；但他们也极其厌恶他们的邻居——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提出关于自己语言的主张，或者说，任何在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的主张。著名的匈牙利爱国主义者拉约什·科苏特，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简直超出了理智，尤其是考虑到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一丝匈牙利血统，而纯粹是斯洛伐克血统。他在接任民族党领袖时宣布，他的施政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摧毁克罗地亚的民族身份。他宣称自己将用利剑镇压克罗地亚语言，并在提出的选举法案中略去了“克罗地亚”这一称谓，称其各部分为匈牙利县郡。

克罗地亚人再一次表现出他们对于奥地利的热爱与信任。他们委派代表团前去维也纳，向斐迪南皇帝请求与匈牙利“离婚”，以直接附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并建议任命一位名叫叶拉契奇的年轻军官，担任克罗地亚的班。斐迪南皇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火车上的那几位德国人一样，做事没个条理。他在欧洲历史上，正处于大难临头的境地。他被革命的维也纳人、心怀不满的捷克人，以及不忠的匈牙利人围困。眼前唯一忠诚的臣民，就只剩克罗地亚人了。但他踌躇再三，不欲准许代表团的要求。实际上，若不是宫廷的一些圈子里某些人青睐叶拉契奇，他可能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叶拉契奇受命上任后，用了六个月时间在全克罗地亚掀起了一股仇视匈牙利的情绪，然后于1848年9月，带领一支五万名克罗地亚士兵的队伍跨越边境，击败了一支正匆忙赶往奥地利，去协助维也纳革命者抗击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部队。没有人说匈牙利人不是骁勇善战的勇士，不过这一次他们遇上的克罗地亚人至少也不差，而且克罗地亚人的优势还在于所遇对手的头领精神不正常。他们甚至无须与匈牙利军队对垒，因为科苏特志比天高到近乎白痴，正式宣布废除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宣布自己为匈牙利统治者。直至那时，革命者的诉求都限于奥地利帝国内部的自治问题。这一走向，意味着俄国可能出手干涉。一些人很害怕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俄干涉别国内政——虽然这些干涉真可谓微不足道，也从没有成功过，他们忘记了，那一次，沙皇俄国携兵侵入他国国境，干涉力度之大，历史上未有与之比肩者，除了现代的法西斯国家的入侵之外。沙俄自认责无旁贷，有权清除任何地方对于王朝统治原则的威胁。科苏特刚一宣布，沙皇便立即派遣十万八千人的俄国军队，洪水一样地涌入匈牙利。到1849年之夏，科苏特已亡命土耳其。

叶拉契奇与克罗地亚人挽救了奥地利帝国，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从这效忠中一无所获，除了矗立于萨格勒布集市广场上的这尊塑像。哈布斯堡皇室家族仍在不断走向自我毁灭。他们致力于瓦解帝国，致力于强暴时间，以加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发生。他们非但没有给予克罗地亚人所要求的自治权，如今还彻彻底底使之附属于中央政府。他们将克罗地亚人从马扎尔人的手上解放出来，然后置于同等残暴的日耳曼人的铁蹄之下，并最终在克罗地亚人身上，施展出他们至高的背叛行径。为安抚匈牙利，奥匈帝国建立起来二元君主制，克罗地亚人被当作其奴隶，归属于匈牙利人。我从没见过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肮脏的行径了。[注]这样的卑鄙下作，唯见于一些极其粗鄙、极其无耻之辈的婚外性事之中：一个男人，抛弃他的妻子，去勾引一位女孩做他的情妇，然后又与他妻子和好，而且为讨好妻子，他还爆出这女孩，使之遭受公众的鄙视。然而，尽管如此，奥地利并未忘记1848年和拉约什·科苏特。它留下这尊塑像在广场上，以作为一个警示。由是，克罗地亚农奴站立在曾领导他们打败一支匈牙利军队的本族将军的身影下，向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触帽行礼。这是有关主权问题的一个最最奇怪的插曲，我在任何其他国土上都不曾见过。

不过，对于克罗地亚的人民，对于我眼前的这些人，对于正卖给我东西的这些人，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之所以来到南斯拉夫，是因为我知道过去造就了现在，我想弄明白这过程是怎样来的。现在就听我慢慢道来吧。很明显，这将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人类苦痛，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及其连续性，将使任何生活于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安乐窝的人震惊不已。要是我身上拥有魔法，走进市场，抓住一位农民的双肩，悄声问他："在你的人生中，你见识过和平吗？"等一等，不见他回答，摇晃他的肩膀，将他变形为他的父亲，又问他同样的问题，再将他变形为他父亲的父亲，我也永远得不着那两个字："见过"。如果我再就这一问题去问千年前的逝者，我也永远只会听到，"没见过，有的只是恐惧，有的只是境外敌人入侵，境内统治者的压迫，有的只是监狱，有的只是折磨，有的只是暴虐，有的只是死亡"。

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不曾得到过补偿，因为他们不曾造就过一种辉煌壮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传奇。就个体英雄主义而言，他们的纪录没任何国家能够超越，但这种英雄行为从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胜利形象，以供人缅怀，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失败。克罗地亚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战士，但他们最了不起的战绩都被湮没在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普遍的各次胜利之中。而哈布斯堡皇室更是费尽心机，不让克罗地亚人挣脱困境。他们的勇敢与忍耐精神最能展现于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其次数无法统计，其名称无以一一确记，不仅历史没有善加记载，甚至在当地传说中也没有留存任何明晰的记忆。唯一的一次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杰出的军事胜利，便是以叶拉契奇塑像作为纪念的击溃匈牙利人的这一次。而这也可能成了一桩败绩。再一次，我必须拿个人的婚外性事来做比较。随着我们越来越年长，我们既看明白了故事的结局，亦看明白了其开端，我们意识到，对于那些献身于故事中的人，幸福或者悲剧已不是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务必成为故事，故事结构要能够让人明白。那些男男女女，在命运下枯萎，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向死亡，却对其一生并无有迹可循的遗憾。他们并非因为过早丧偶或背信弃义而失去了伴侣，或者战场失利，或不堪众人鄙视的目光而被击倒，而是因为被爱人抛弃，或是因为情人无能，而无辜地成为受害者，不曾掌控，不曾得到无论成功或失败的机会。艺术并非消遣的玩物，而是一种必需。其内核，其形式，并非一种装饰性的摆弄，而是一只杯子，令人们可以将生活倾注其间，可以举杯唇前，进行品尝。如果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不具有形式，如果其所经历的事件不能在大脑中轻易地被唤起，不能够揭示出这些事件的意义，便会觉得，自己似乎在阅读一部非常糟糕的书。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判别其中的道理，因为几乎没有谁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些阶段，在这样的阶段里，我们人生的根本主旨为细节所模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物的个性是那么不鲜明。这样的可能，不仅见于个体的人，亦见于国家。比如英国，要不是瓦尔哈拉英烈殿里那无以计数的国王与英雄，要不是漫长的伊丽莎白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用这

些作为典范，表明英国曾经创造的奇迹、现在和永远所可能创造的奇迹，以及随时可以涌入记忆中的成千上万的大小事件，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美国，如果它记忆的宝库里没有战无不胜的坚强意志，没有独立战争的众多历史事迹，没有那些巨人般的政治家，没有西进运动，一言以蔽之，没有这些每一位美国人都铭刻在心、随时随地都可以一个猛子扎进去让自己重新恢复生命活力的这一切，这个国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难以记起自己历史的民族，也许注定了在任何情境下都将面临艰难阻碍，缺乏让自己重新振作的手段。“但也许，”丈夫说，“也没这么严重吧。”

---

1. 有必要声明，这篇写于1937年。——作者注

萨格勒布III

但就有这么严重。那天晚上，在我们上床就寝前，他便看见了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正当我们站在塑像的阶梯上，康斯坦丁朝我们走过来。广场所有没设摊位的人行道上，密密麻麻都是鸽子，他小心翼翼地在鸽群中择道而行。他眉头紧蹙，对其中两只鸽子很不高兴，因为尽管它们四周车流如织，它们却仍觉得很有必要亲热亲热。“瞧，克罗地亚人！”他嘴里念道，一面摇了摇头。见我们笑了起来，他继续说：“我能看得出来，你俩也在想着干点什么坏事。虽然没这么粗俗，但仍然是坏事。你们想要去看老城区，可那样就大错特错啦。那边都是些别墅和宫殿，千万不能在上午去看。傍晚的时候，在黄昏的意境里，透过那一道道大门，你会发现那些石柱廊、山形墙，看上去比罗马建筑还要邈远，因为这些建筑都是新古典主义的样式，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的维也纳建筑就是这种样式；你们还会看到我们斯拉夫人的一些小奉献，因为在那些房屋前面，用围墙围起来的花园里，我们仍可以看见那些闲置的铁椅铁桌；只需瞥一眼，你们就能辨认得出，坐在那地方的那个人，真就是从屠格涅夫的笔下径直走出来的。在大白天，你们看不到昨天之前的奥地利的模样，也看不到昨天的我们斯拉夫人的模样。就像这些鸽子。但是，去大教堂吧，它是那么美，你们无论是现在，还是任何其他时候去，都能欣赏到这种美。”

于是，我们沿着陡急的街道，来到大教堂广场，先参观了一会儿大主教的宅邸，看过那些低矮的圆塔，以及像灭烛器一样的塔顶，然后穿过大教堂的19世纪假牌面，进入哥特式建筑石头材质、各式植物构形的光线阴沉的内部。这里好似被某位村野裁缝肆意切割剪裁而成，又在考虑最基本采光的情况下保存了光线阴沉所带来的沉思默想的特有效果——其计算之精巧，竟似超越了数学。保持室内光线的阴沉，乃是原初设计的要旨所在。当时，人们因为强烈的信仰而修建起这座建筑，这座建筑也承载了强烈的信仰。这是复活节的前夜，巨大的十字架被从圣坛上取下来，斜撑着放在台阶前。受难的基督，面色青灰，在脚边烛光的映照下黯淡不清。旁边两位守护的士兵，穿着橄榄绿的南斯拉夫军装，斜倚在步枪上，好似守护着一位死去的国王，供人们凭吊。我看着他们，非常欣赏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某种一致精神，它从事战斗，并且认为自己有道德上的权利去战斗——可一旦它觉得这二者并不统一，它便会要么放弃战斗，要么放弃宗教。我看到两位士兵被一种深深的情感感动。他们紧咬牙关，嘴唇绷着，面色苍白，好似晕船。“他们累了吧？他们必须长时间地守护着十字架吗？”我小心地问道。“不长的，”康斯坦丁说，“不过一两个钟头。然后就会换人。”“那么是他们本来就那神情吗，”我追问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守护

死去的耶稣，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是肯定，”他回答说，“克罗地亚人对于天主教之虔诚，是你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都从未见过的。而且我想，你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不理解斯拉夫人。如果我们对于死去的基督不是因为有着如此崇高的敬意，我们也不会派我们的士兵去守护了——即便派他们，他们也不会去的，他们会转身走掉，去做别的事情去。要不是对于我们有着重大意义，这一习俗早已经消亡了。”好久好久，我们就这样注视着黯淡的基督和那两个低垂着脑袋的男孩。他们的身子非常轻微地前后来回地晃动着，就像是氧气几近耗尽的房间里的烛火。我并没有想错。在南斯拉夫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一种巨大的令人振奋的力量，还有着可敬的来源——现实主义的激情，完整一体的信仰。

那之后，我们又见识到了有关克罗地亚人的智识水平的一些事情。在大教堂旁边的一家餐馆里，有人在等着我们吃午餐：一位诗人、剧作家——写过许多宏大超过生命，甚至超过艺术的剧作。这些剧作使《奥赛罗》也显得缺乏情节且轻浮。他的模样就像匹克威克先生，他妻子貌美若伯恩·琼斯的画，同时，她紧握的粗糙指关节，可以将她可爱的脸蛋揉擦出窟窿。他们神思游离地抬头看着我们，说他们在一部英国诗歌选集里发现威尔士西留尔人沃恩（Vaughan the Silurist）的一些诗作，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并且在给我们点下以鹅肝和苹果沙司为主的饕餮大餐之际，谈论起文学，劈头盖脸地给我们撒下一面极其复杂的罗网。“我们认为，”剧作家说，“最近的时代里，最伟大的作家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马克西姆·高尔基与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我们有些吃惊，并持保留意见。我们觉得，如果这些人认为沃恩与杰克·伦敦同等伟大，他们事实上也许没什么品位。我们错了。剧作家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在他看来，除了诗歌，没任何其他艺术形式能成就艺术的最高经典。诸如萧伯纳、威尔斯、贝玑（Péguy）、纪德这样的作家，在他看来，根本算不得艺术家：他们将咖啡馆里的闲谈记录下来，当然，如果这些谈天足够精彩，倒也还不错，只是这样的东西不够严肃，因为所谈无非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汗液般随时便可以排泄一通。但是纯粹的叙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因为它所采集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具有诗才的人所吸收，并将这些经验转换成更高的形式；他之所以喜欢康拉德、杰克·伦敦与马克西姆·高尔基，是因为他们所采集的经验非常稀有，他们不仅亲身做过彻头彻尾的调查，并且用他们异乎常人的敏锐心灵检验过。不过，剧作家和他妻子在想，康拉德是否应独属一类，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一股真正悲剧性的情感。康拉德的作品从不曾辉煌到进入诗歌殿堂，但其所涉不恰恰是诗歌的题材吗？因此，不如说，他的作品就是诗歌大军的给养库。

“不，”我丈夫突然说，“康拉德根本没有任何的悲剧意识，有的只是对不可避免性的认知。而且对他来说，不可避免性绝非类似于古希腊之必要性原

则的实现，而只是一个事件的自然发展而已。”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六人行》（*A Set of Six*）里“决斗”那则故事，原本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也没将什么原则带入戏剧，其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显得那么牵强，让人感觉近乎荒谬。其中没任何的所涉因素在剧中能产生效用。可在实际人际事务中，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起着某种作用，如果我们能予以识别，我们会觉得，我们命运的一个新的阶段似乎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剧作家的妻子说，这说法没错，却不相干。在她看来，康拉德的作品暗含着一种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并非用确切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而是蕴含于其语言节奏之中。“切克！切克！”康斯坦丁说，“一首伟大的交响乐，必然有其各种主题，及其乐曲所赋予的感情色彩。还有，听……”他说，一部艺术作品里的不可避免性意识，与科学上的因果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如果说一部艺术作品具有创造性，那么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是新的，必须在某些地方超越前面各个阶段的内涵，第一阶段与最后一个阶段的连缀关系，必须具有柏格森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性。他又补充道，这是要给这种创造性一个机会，使之创造出一种既不可预知，又不可避免的效果来。而且，在这过程中，艺术家不可干涉他笔下的人物，迫使他们去印证某个道德观点，因为这将粗暴地把他们拉回到可预知的道路上来。“没错，托尔斯泰一直以来采取的就是这一方法，”剧作家说，“尽管如此，他仍让我们心悦诚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不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说，“我觉得他本该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却选择成为继犹大之后的第二伟大的叛逆者。”“我也这么认为！”刚在桌边坐下来的诗人说道，“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周围的酒瓶越来越多，我们在饭馆里逗留到凌晨五点。直到那会儿，我们还在讨论尼采对于音乐的态度。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同一家餐馆，与克罗地亚党的一位编辑领导和他的妻子会餐。他所在的克罗地亚党如今正在联邦体制下，为争取自治权而战斗。瓦勒塔当时在场，康斯坦丁却没来。这位编辑，虽然他本人在血统上也是塞尔维亚人，却不愿跟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同坐一桌。格雷戈里维奇也没来，不仅是出于这一原因，还在于他认为这位编辑就是邪恶的化身。那天晚上，他曾前来喝了一杯白兰地，但当听到我们晚上准备前去的地方，他马上变得跟“布鲁托”似的沮丧烦躁，一脸嫉恨，因为这世界的种种罪恶而面色发青。不过，这位编辑同样愿意为了斯拉夫事业而万死不辞。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他曾经在战前坐牢。如今，他仍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仍坚持战前英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从事着自己的运动。他既攻击南斯拉夫政府针对克罗地亚人所采取的压迫手段，也反对接受匈牙利和意大利支持、对政府采取恐怖主义暴力对抗的克罗地亚人。即便因此失去仅有的朋友，他也不在乎。他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绅士，一位知识分子，一个道德主义者。对于看不惯的一切，他都奋起攻击，从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

我们在谈论政治局势的时候，一位年轻漂亮的俄国女子跑到我们桌来。她只能与我们一起待半个小时，因为她正在指导一部关于普希金的戏剧。这部剧是她自己创作的，几晚前曾在国家剧院上演，但失败了。她带来消息说，这令人惊讶的复活节如今招来了一场暴风雪。她金色的头发上，完美无瑕的肌肤上，包裹着黑色连衣裙的柔媚的身上，雪花正在融化。因为这融化的雪花，她体内的血液奔腾得愈加欢快了。而演出的失败也像一朵雪花，在她身上融化着，使得她洋溢着热烈的情绪。“他们对我的戏剧太苛刻啦！”她大叫道。像通常的俄国女子那样，因为喜极大笑，她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剧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平平庸庸！”编辑笑盈盈地欣赏着她光彩照人的美丽，试图批评她编排的戏剧。他说，戏剧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乃是最难以处理的艺术形式之一。所有的天才都曾在某个时候尝试过这东西，而且这类剧本大多数他都曾读过。我意识到，这些人长于这样的普世性措辞。这位编辑和他妻子，在他们的母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外，还懂得——而且相当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以及希腊语。

“几乎所有这些戏剧，”编辑继续道，“都很糟糕。”戏剧要求专注于其主题，但这些主题在天性上太过铺张，只有具备特殊艺术天赋的人，才能妥善处置这一问题。而如果像她这样，选择一位伟人作为戏剧的主题，又将会极大地增加这一难度。因为，还有什么东西比一位伟人的灵魂更具多面性，更难以把握呢？事实上，伟人的灵魂往往具有一种张力，让人无法简单将其归纳为必要的几条要点，以帮助人们获得对于伟人的哪怕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一点在普希金身上尤为突出。我们有谁能理解普希金呢？说到此，编辑、编辑的妻子、瓦勒塔、那位俄国女子都开始讨论起来。他们的脸凑拢到桌子中间，形成一个容光焕发的正方形。讨论以法语开始，继而转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最后以俄语结束。我和丈夫坐在那里，气得要跳起来。我们只是通过翻译才对普希金有所了解。我们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似乎有点介乎《唐璜》与温思罗普·麦克沃思·普雷德（Winthrop Mockworth Praed）之间。与普希金的短篇小说相比，我们更喜欢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显然我们错了，因为受制于语言障碍，我们无缘识得那些在明眼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像一头骡子与一匹在德比赛马会上获胜的马驹之间的差别那么显而易见。

不过那位俄国女子站起身来。她必须回剧院去。戏剧最后一幕，普希金临死时，一群人将从普希金的家里蜂拥出来，她必须亲自指导。很明显，这是她离我们而去的真实理由，而不是借口。没有什么比这能更显著地展现出这些人高度的文明水平：他们共同讨论一部当中一位创作的作品，竟能如此超然客观。但在她离开之前，她做了最后一次辩护。有一小会儿，她发现自己与普希金的经验有了某种重叠。即便这统一的部分在普希金身上只占了很小的比例，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因为它可能为理解整个普希金

提供一个线索。编辑像男性通常的那样，目光很奇怪地穿过她的气势，直视她的美艳，说道——尽管不过是戏谑她——“的确啊，经验！你确定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吗？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人生体验，能从事写作吗？”她的回答有些闪烁其词，那语气让人觉得，某一天她可能会拥有一个秘密，但她又太过单纯，不知道那秘密到底为何物，尽管她在接近三十岁时——如果不是三十出头——便已结了婚：“我不想讨论这个，因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不会那么简单！”但跟着，她的脸上重新笑哈哈地泛起皱纹：“有时候，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又是那么紧密！想想看，这最后一幕，里面有一个女的，她的哭喊声常常对其他人起着引领的作用，并且对戏剧的结尾起到了很重要的艺术效果，他们总是那么忧伤。观众无法听清楚拥挤的演员说的是什么，他们只能抓住整句话的语调。因为这位女子语气里传递出来的确实是焦急和悲伤，我听见她必然会说的话。她在哭喊：‘哦，上帝！哦，上帝呀！让普希金在开往我居住的郊区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出发前死去吧！’”她哈哈一笑，转过身去，但又朝我们转过身来：“这样子我可不喜欢！表演艺术有着一种固有的荒唐，演员们必须让每一个人都哭泣，他们自己却不能哭；如果他们自己不哭，他们必然会在心底里嘲笑那些抹泪的人！”她全身一颤，真希望自己从没写过这剧本，从没尝试要在戏剧领域崭露头角，她就像一个孩子，选错了生日庆祝方式。她轻轻一拂嘴角上的忧伤，哈哈笑着，转身离去。就交谈讨论而言，这是在萨格勒布的具有代表性的一天。

谢斯汀

“这地方真让人愉快啊。”第二天早上我丈夫说。这天是复活节星期天，我们正在回顾着前一天是如何的尽兴和开心，服务员送来的早餐盘里盛着染色的复活节鸡蛋——这是酒店赠送的礼物。“当然啦，奥地利为这地方下的功夫可不少呢。”一位英格兰人说。这位英格兰人是我丈夫在伦敦的朋友，当时也住在这宾馆，于是过来和我们共进早餐。“我想是这样，”丈夫说，接着马上又说，“不对，我这是在说什么？不可能的，因为这跟奥地利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奥地利人的确也会在咖啡馆小饭馆一坐几个小时，也喜欢喋喋不休地谈个没完，但他们没有这种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没有这种智慧，也不具有这样的多语能力，他们不会将普世文学摊开在地上，就好像那是一个破布袋——事实也的确如此——然后从中找寻一个很可能不存在的碎片，不过这碎片很可能又是仅仅存在于他们自己脑子里的文学奥秘的一部分。在维也纳的文化人家里，他们经常举办聚会，聆听人们高声朗读大师作品：就在几个月前，我曾在一个维也纳银行家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傍晚，听人朗诵维尔德甘斯的诗歌。不过，在南斯拉夫人的聚会上，却不可能朗诵任何东西，除非你事先将客人们绑起来，并且将他们的嘴堵住。”

这时，康斯坦丁和格雷戈里维奇走进房间来，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与那么一些人为伍，他们到现在对我们还有些不冷不热的。“奥地利为你们做过些什么？”我丈夫问道。“什么也没做，”康斯坦丁说，“它没这个能耐。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能为一个像塞尔维亚这样拥有辉煌历史的民族做什么呢？”“我说的是克罗地亚。”我丈夫说。格雷戈里维奇似乎在观察镜中的自己一般，他不安地说：“那回答仍站得住脚。”“可奥地利人有自己的历史啊。”我丈夫表示不赞同地说道。“不，”格雷戈里维奇说，“我们才是它的历史。我们作为整体的斯拉夫人，尤其是我们克罗地亚人。没有我们，奥地利人就没有历史，而且要不是我们站在他们与土耳其人之间，维也纳如今可能是一个穆斯林城市了。”那英格兰人哈哈笑了，好似刚才听到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格雷戈里维奇看着他，那表情似乎在说这笑是一种亵渎。“就在昨天便有决定说，欧洲不应被伊斯兰化，这难道还是小事吗？”他问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英格兰人问道。“意思就是，1683年，土耳其人围困维也纳，被赶了回去，”我丈夫说，“就是如果没被赶回去，土耳其很可能就会横扫整个欧洲。”“是真的吗？”英格兰人问道。“是真的。”我丈夫说。“可那不是昨天的事啊。”英格兰人说。“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就等于在昨天，”我丈夫说，“而且我也认为他们有道理。事件并不遥远，想起来还让人不安。那次打击本可能摧毁我们整个西欧文明，我们不应忘记，那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但是问问他们，”英格兰人说，“是

否奥地利就不曾在卫生保健方面为他们做过不少事情。”格雷戈里维奇铁青着脸，紧紧地盯着镜子深处。“你们的朋友对于维也纳的尖顶塔可能被宣礼塔取代一事无动于衷，这无疑是希望我们宽恕奥地利人，因为他们在给我们的英雄建造地下密牢的同时，也给我们建造了必要的茅棚。你们确定，”他的话仿佛从牙缝里挤出，“要去谢斯汀村听弥撒吗？有可能这一路上，这位英格兰人不会觉得有趣吧？”

我们驾车穿越一片地界。那景色，我在中国画上经常看到：山坡林木参差，上面白雪覆盖，就像一只只淹没在糖粉里的刺猬。在一个山头上，矗立着一座小教堂。教堂亮彩盈门，似乎里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绽放着朱红、金黄与蔚蓝的色彩，以及家纺布那特有的粗糙而温暖的白色。这些色彩，随着歌声而颤动。妇女们的头上，包着红色手绢，手绢上印着黄色树叶和孔雀羽毛的花纹。她们的上衣密密匝匝地绣着花朵，白色的裙子下面，是粗厚的红色或白色长袜。她们的男人也都身着盛装，染色的羊皮夹克上缝饰着各种花型，亚麻布的衬衣前襟上绣着十字绣花纹，纽扣是玛丽亚·特蕾莎银币，或大块的青绿色矿石，家纺布长裤扎在做工精致的靴子里。他们的盛装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眼球，是因为现在并非夏天。那装束，就像王侯式的华衮锦缎，或爱斯科赛马会上的人们穿的那种绫罗绸缎，却又不失谨慎谦逊。因为如果是王侯，他头顶上还会有一顶金色的伞盖，而参加爱斯科赛马会的人群也会距离挡风避雨的篷顶不远。可这些人的盛装，却是为冬季里的土路设计的。在这样的地方，到处是白雪，可一旦雪化掉，路面便会是齐膝深的泥泞。这些服装也显得尤其奢华，因为多少时日，甚至多少年月被花费在了他们所穿的衣物绣饰上，而这些都拜恶劣的天气所赐。那种奢华也渗透到他们的歌声里。那歌声，从衣服包裹的躯体里倾泻出来，着实让这宗教仪式彻底发生了变化。西欧的宗教音乐几乎总是那么如泣如诉，那么稚气，那般哀情，似要骗得某种疗治病痛与不幸的方法。那哀诉里却又流淌着一种沉溺于疾病痛楚中的受虐狂的快感。可是，这里的歌声，言说的却是健康与富足。

那些男人站在教堂的右侧，妇女站在左侧。在东正教中亦是这样的习俗，这样安排也非常合理。在一个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仪式上，男人与女人因为对现实所持的全然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也可能各站一方。他们不适宜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在家庭中，男人与女人试图分享各自对于现实社会的观点，可是这样的努力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从这分列两侧的会众中所涌出的歌声，绝对无所欲求，不会装模作样地模仿小孩，不会假装酸楚为甜美、疼痛为健康。它纯纯粹粹就是爱戴之声。如果有那么一个作为一切美善之源泉的神，这便理所当然是奉献给他的礼赞；如果只有美善，这同样是理所当然的礼赞。同时，他们的朝拜，一如他们的盛装，因了他们所处的境况而令人惊异。这些人既没有财富，亦没有安全感，从来就没有过这些东西，他们站在造物主面前，想的不是可以企求

什么，而是自己能奉献什么。置身于他们中间，就像看见一个果园，里面沉甸甸的都是苹果，或者一片田野，里面是成熟待收的麦子。它们被赋予了人的意志，并且尽自己之丰足，广施泛予。

这不仅仅缘于这些人的信仰。也有一些人，所持信仰与他们一样坚固，可他们的朝拜带来的却是贫穷。当海涅说，亚眠大教堂只可能建造于过去的时代，因为那时的人有坚定的信仰，而我们现代人有的只是个人之见，而要建造一座大教堂，仅仅有个人之见是不够的，他只说对了一半，也因此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持有这种坚定信仰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次的宗教仪式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构成这一会众的人，信仰是绝无仅有的健康而强烈。弥撒结束后，我们走出教堂，站在教堂院门前，注视着那些男男女女穿越很深的积雪，挤挤扎扎地沿着一条小路，朝村子里走去。他们那兴奋的神情，是展现于教堂里的那种特有激情的一种泛化表现。我在南斯拉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的确没有看错。

“难道不漂亮吗，克罗地亚人的服装？”格雷戈里维奇问道。他的眼睛绽放着光彩，他整个人因为高兴而让人觉得陌生。“穿那种衣服的女孩们，她们难道不可爱吗？那些年轻小伙儿难道不帅气吗？而且他们非常虔诚。”“的确，”我说，“我从来没听见过唱得如此充满感情的弥撒。”“我说的不是这个，”他怒冲冲地说，“我是说他们虔诚的克罗地亚爱国主义精神。”似乎谢斯汀的居民穿戴这样漂亮的服饰，不是习俗使然，而是出于一种主动而威武雄壮的选择。像萨格勒布周围的大多数农民那样，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穿上寻常的西欧款式服装，但他们又时时记得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安东·斯达切维奇就埋葬在他们的教堂墓园里，他们知道对于他来说，一切属于克罗地亚的东西都非常宝贵。我们来到墓园，站在他的白雪覆盖的墓前。此时的格雷戈里维奇，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大，虽然身体并没挺拔站直，而是像一株垂柳般伏在坟墓栅栏上。他告诉我们斯达切维奇如何建立起右翼党，如何既与奥地利又与匈牙利对抗，试图通过谈判，使自己的祖国重新获得八百年前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斯达切维奇有一句座右铭，‘克罗地亚只需要上帝和克罗地亚人民’，”格雷戈里维奇说，“19世纪的匈牙利，魅力四射，国家富庶，战无不胜而又残忍，我们克罗地亚年轻人，安乐于此，本可能忘掉了我们的祖国。是他，三十年来，让我们明白过来，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我们将会如同因为犯罪而失去自己的灵魂。”我们觉察到，这白雪覆盖的周遭世界还穿着一件外套，一件寂然无声的外套；我们闻到从下方村子里飘来的柴火烟味。“小时候，我被带去见他，”格雷戈里维奇说，他的声音激动而紧张，就像一位威尔士福音布道者，“他母亲是塞尔维亚人。”“但到她结婚那会儿，她已经被接纳为真教信徒（True Church）。”格雷戈里维奇皱了皱眉说。

我们从墓园出来，我和康斯坦丁踏上雪花纷飞的小路，正好三个人从身旁

走过。他们面色黧黑，跟印度人没什么两样，携着鼓和喇叭。“啊哈！吉卜赛人。”康斯坦丁说。我们朝他们笑了笑，似乎看见这样的画面——在某个农场厨房里面挤满了人，这些人衣着比春天还鲜艳，个个开怀大笑，准备着尽享堆成山一样的羊肉和猪肉，畅饮如同井水一样多的美酒。但这几个人绷着脸看着我们，其中一个恨恨地说：“没错，我们是吉卜赛人。”康斯坦丁和我都吃了一惊，站在雪里，彼此对望一下，然后默然地往前走去。在南斯拉夫东部的一些地区，在塞尔维亚，在马其顿，那里的吉卜赛人都因为自己是吉卜赛人而自豪，其他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农民，因为除了农民，实际上再没别的其他人了——都很敬佩他们的才能，敬佩他们能歌善舞的天赋，因为这些农民不会这些东西。他们羡慕吉卜赛人可以免于劳作与律令之苦，不必像农民那样遭受累累重压。对于那些比自己开心快乐的人，我感到在内心从来是这种态度。康斯坦丁和我都感到难以理解，这几个吉卜赛人会觉得我们在轻视他们，或者说，若我们真的轻视他们，还会大声地表露出来。

整个世界不再令人开心。白雪似乎无非只是一种天气，柴火的烟味也不再让人陶醉。“告诉你吧，中欧人跟克罗地亚人太相近了，”康斯坦丁说，“他们是很好的人，非常非常好，但他们受了西欧人的毒害。在德国和奥地利，他们瞧不起吉卜赛人。他们有几个看似非常在理的借口。吉卜赛的艺术不能激起人们的尊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贬低了大众艺术，只在意名家大师。如果我去弹奏李斯特戏谑喜剧丑角的乐曲，而且弹得非常快，嘣嘣嘣，啾啾啾，他们也会认为比那三个人的音乐美妙得多，尽管后者与某些特定场景百分之百契合。同时，吉卜赛人非常穷。资本主义制度鄙视不能带来财富的人。而且，西欧人洁癖太重，吉卜赛人则赋予肮脏充分的存在权利，甚至对其过于宽容了。我们塞尔维亚人不是资产阶级，因此以上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让我们讨厌吉卜赛人。而且相信我，我们的世界更加舒坦。”

我回头看那几个吉卜赛人。此时，他们缩成一团，顶着横扫山顶的凛冽寒风，正往山上爬去。自我们从教堂出来，生活就变得无与伦比地贫穷。宗教典仪的繁复，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农民与吉卜赛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不会有剥夺感和需求感。然而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里，人人都感到某种不足，因为有钱的人没艺术，有艺术的人没钱。在这斯拉夫图景里面，入侵了某种外来的、致命的东西，美德已没了立锥之地。

两座城堡

没错，德国对克罗地亚世界的影响，就像无法摆脱的影子。第二天，我们还会见识到这一点。格雷戈里维奇安排我们到乡下去过复活节星期一。同行的有康斯坦丁、瓦勒塔和一些克罗地亚的年轻医生。看得出来，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怨恨非常深，因此，见我们与康斯坦丁和格雷戈里维奇结伴而来（而这两位正是南斯拉夫思想观点的代表），极少有克罗地亚人愿意给我们好脸色。瓦勒塔前来看我们，是出于对我的友谊，但这情景也让他略感尴尬，虽然他将这感觉掩藏在心里。这些年轻的医生准备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打算先参观一座归属于一个奥地利大家族的城堡——每年有一段时间，城堡里仍有人居住；然后，将前往另一座城堡。这后一座城堡曾经也是那个家族的，不过现在成了一家健康保险协会的肺结核疗养院。这给了他们一个职业考察的借口。然而复活节晚上下了整整一夜的雪，第二天早上醒来，冷得跟北极似的。我们仍打电话给瓦勒塔和那些医生，请他们过来共进早餐，尽管此次出行安排显然不得不取消了。他们如约而至，我们发现跟这些年轻人相处很愉快。他们毕业于萨格勒布大学，期望着能去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继续深造。我们一边喝咖啡、吃水煮蛋，一边聊得很开心。突然，门开了，格雷戈里维奇走了进来。我们发现我们做错事了。

让读者理解格雷戈里维奇这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不是因为一小部分格雷戈里维奇分子，欧洲东半部（也许还包括另外的一半）有可能已沦为伊斯兰世界；自由的传统可能在哈布斯堡王朝，在罗曼诺夫王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永远死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变成一片混乱，而不会成为一种至今犹有不少用途的制度。他那样的人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而且常常是好的影响。他走进来就以责备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还没准备好吗？"我们抬起头望着他，我丈夫问道："可天气不是太糟了吗？"他回答道："太阳没有出来，但那片乡村仍在那里，不是吗？而且雪也不太深。""你确定吗？"我丈夫带着怀疑的口吻问道。"我非常确定，"格雷戈里维奇回答说，"我给一位朋友打过电话，一位专攻机械运输的朋友，我给他讲了我们车辆的构造情况，他的意见是两座城堡我们都仍然可以去。"

无论在此前还是后来往往如此，格雷戈里维奇证明了斯拉夫人的根本素质，确非一般可能认为的仅仅是一种想象。他是典型的，而且让人感到亲近的斯拉夫人，但他没一点儿想象力。他无法理解，在实验中，几种实实在在的元素合在一起，会产生出新的东西来。比如，他不让我们去萨格勒布的剧院。"不，我不会给你们买票的，"他抑制住心中的义愤说道，声音

就像是从地穴里传出来，“我不会让你们把钱那样浪费掉。即使是说得很慢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你们也不容易听懂，你丈夫甚至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你们去我们的剧院有什么意思呢？”他以为，看戏剧就是通过欣赏作者对戏剧人物的安排以及由戏剧人物传达给观众的语言和行动，获取相关信息的活动。至于行动可以用作揣测语言的基础，演员的外表装扮，他们声音的抑扬高低，观众对于他们表演的反应，不仅能帮助理解戏剧，而且可以加深对其生成的文化土壤的了解，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无法理解的。而眼下，他以为去乡下走一趟，便是去考察那一地区的自然与政治的地形图，因此无论任何天气都显然是没问题的，虽然让人不太好受。尽管如此，其斯拉夫人特有的激情令英国人或美国人感到困惑不安，因为其激烈的程度，只有在具有高度想象力的西欧人身上才看得到。他居高临下地站在我们面前，头发灰白，脸上的皱纹如一道道犁沟，有点“布鲁托”似的气咻咻的，因为激烈的思想而颤抖：“这些打退堂鼓的人，不去看克罗地亚的乡村世界，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有负于克罗地亚。”他对于克罗地亚的热爱，是一种火山似的激情喷涌；其火焰不因自己见识的局限——其他大多数人热爱克罗地亚，都是有备而来的——而受到影响，因为他希望与塞尔维亚人联合起来。一旦发生任何危机，那烈火会无情地将他吞噬。

我们非常窘迫，站起身，鱼贯而出，上了几辆汽车。事实上，一开始天气的确不是太糟。我们离开镇子时，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路上遇到好些匆匆忙忙赶去集市的妇女。她们头上戴着红色方巾，肩上披着红色披肩，下身穿白色的裙子，一只手里举着红色的雨伞，另一只手高高地提起裙子，露出红色的羊毛长袜，有的更是露出她们洁白的粗亚麻布底裤，底裤的边脚绣了精致的英格兰刺绣。她们那一举一动，有着一种勃鲁盖尔式的幽默效果，好似在将她们自己艰难前行的动作风格化，以与大自然相统一。从她们的脸来看，她们一点也不粗野。这一点，在年老的妇女身上尤为明显。斯拉夫人与其他种族的人不一样，他们年老时比其他种族的人漂亮。岁月的风霜，使他们的肌肉更加贴近骨骼，而不是松弛垮塌。这些缎带般的农民，嘻嘻哈哈地从我们旁边跑过，像一幅连环漫画。她们跳进路边的田地里，继续演绎着她们的幽默，脾气好极了——因为汽车在她们侧面掀起层层泥泞，我们遇着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跳得老远，蹦进雪地里，以免衣服被打湿弄脏。但她们对此开开玩笑就过去了。有一个村子，其灰泥的房屋全都涂为深紫色，在遍地白雪与灰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尤其深邃且充满悸动的活力。一位可爱的女孩，笑嘻嘻地将一把伞举在身前，扮着小丑的动作让我们和她自己发笑。她的动作极尽优雅，却又非常滑稽搞怪。

之后，我们在路上再没遇见任何人。天空下起大雪，在地上堆积起来。一家农舍门前，有些人面带微笑，挥舞着手，冻得直跳，砰砰地敲着屋门。我们从一个开阔的村庄穿过，整个村子的地面好似用深暗的洪水制成的玻

璃铺砌而成。漫天大雪中，一片白桦林，看上去好似一队舞蹈着的赤裸仙女。然后，又是一幅中国山水图景。林木茂密的山峦，覆盖着貂绒般的白雪，一路绵延伸展，徐徐地将整个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不时地，画卷被破坏，林木图案骤然中断，除了作为画布的丝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山峦隐没，所见只是迷雾。有时候，雾气稀薄处，我们会看见一座有着粗鄙的尖塔、黄油颜色的城堡。他们告诉我们，奥地利或匈牙利的某某家族曾在此居住，如今这地方又用作了什么——纺织厂、罐头厂、康复院。

天越来越冷。我们在一个小镇停下来，进了一家宾馆，喝了一些梅子白兰地暖和身子。这种酒是南斯拉夫标准的休闲饮品。店主跟我们说话时显得很自豪。他告诉我们，在集市上，他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克罗地亚爱国者纪念碑；在不远的地方，他们还发现了一具史前人类的骨骸。我们说我们知道那是咋回事。可怜的店主人曾乘坐格雷戈里维奇的车四处兜风。这让格雷戈里维奇非常高兴，因为那些年轻的克罗地亚人可以放下他们对南斯拉夫的仇恨，稍稍跟他开开玩笑了。他那开心的样子，让人感到心酸。事实上，当我们因为他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受害人的样子而又喝了一轮梅子白兰地，对他表示敬意时，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又上路，朝着更加崎岖、积雪更深的山区行进。在一座小山顶上，我们的车陷进了雪堆不能动弹。附近一家农舍跑出来几个农民，因为看到机器自我愚弄，都又是喊叫又是大笑。他们一会儿就将车子从雪堆里拖了出来，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急急忙忙想赶回去把这糗事告诉自家的马儿。

再之后，山林的积雪是如此之厚，树干显得像一些线条，而树枝之纤细则是任何画工皆不及的。一座座山峦脚下的村庄房屋，只能显出一个大体的轮廓，看不见半点细节。那些房屋变作一排排柔和的暗影，屋顶四周缀着洁白的雪绒。山峦的上方，一层迷雾好似晦暗的白色污迹，横亘在纯黑白的世界与暗灰色的天空之间。天地间没有任何的色彩，除了三样东西偶尔点染出几许淡淡的金色。这场雪来得太晚，此时杨柳已绽出新芽。柳枝太过纤弱，承受不住雪的重压，新芽亦细小得难以识别。白雪皑皑的大地上，每棵柳树都像一个金绿色的幽灵。田野上还有鸟雀飞翔。它们突然冲入空中，好似被一些看不见的巨人抛来抛去地玩耍。这些鸟儿的胸脯呈淡金色。道路的两侧，雪在堆积得最厚的地方整块地掉落下去，露出来一丛丛迎春花。迎春花有跟鸟儿胸脯一样的颜色。有时，道路越过一条溪涧，我们俯瞰涧边的垂柳。从这一角度看去，绿金色的柳枝上携着淡淡的白雪，那柳树像是一个因哀恸而匍匐在地上的白色的人体，又像一个因为自杀，从天空的城垛上跃下的天使。

我们没看见任何人影。曾有一次，有一匹马，在雪白的田野背景下显出刺眼的灰暗，因为情欲炽盛而焦躁不安，因为恐惧，也因为享受，眼珠儿直

转，胃口极好地从食物中寻得安抚。马也明显知道可以从中获得安抚，并且追寻着它宣称的自己所恐惧之物。它跃过低矮的树篱，在我们前面沿着公路奔逃；从田野对面的一个农庄里跑出来一个人，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皮外套，显得格外抢眼。他还不忘记回头小心地关上门，似乎挡住的不仅仅是屋外那极度的严寒，还有某种真实不虚的破坏性的火的元素。当他抓住马，将它拉离公路，我们的司机大声地代表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和抱歉。但他没有回答。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扭转马头，紧贴在他肩上。那马因为情欲没得到宣泄，显得极度焦躁沮丧。从那个人眉毛嘴唇挤成一堆的样子看，他几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因为太过寒冷，他脑子里已无法再想别的事情。表面上看，整个世界白雪皑皑，茫茫一片，成了模糊的一体。而实际上，每一匹马，甚至每一个人，都被这刺骨的冰冷空气隔绝开来，被隔离在一个不正常的自我空间里。

我们穿过一个村子，时值正午，却如同午夜，铺天盖地茫茫一片，每家每户的门窗都紧闭着。“想想看，”瓦勒塔说，“在所有这些屋舍里，坐着的可都是公爵和公爵夫人、男爵和男爵夫人呢。”这村里的农民曾经款待过一位君主。当时，这位君主因为他那些大臣的愚蠢，一天狩猎下来，疲惫不堪，受了伤，跌跌撞撞的，孤身一人。后来，他正式册封整个村子的人为贵族。再往前不远便是我们此行的终点。我们从车上下来，抬头看见一个大宅门，门里面是几个奢华的马厩。再往里去依稀可辨的便是一个个的“庭院”——英国19世纪乔治王时期和摄政时期艺术风格之后的那种庭院，灌木丛丛，花费不菲，却一无用处。这些庭院倾斜而下，直至一座极其陡峭的圆锥顶山峦脚下。山顶的山峦上是一些看似贝利奥尔学院的建筑。当我们正在那里张口发呆之际，有迷雾般的东西突然向我们扑来。瞬间，四周的一切都笼罩在暴雪之中。洋洋洒洒的雪花如飞旋的碎纸屑。四下不见一个人。

“他们可都是怎么啦？”格雷戈里维奇问道。他走上前，砰砰地敲打门房小屋的门。只见上边窗口露出一张受到惊吓的面孔，他大声质问道：“尼科莱去什么地方啦？尼科莱怎么没来这里接我们呀？”“他在上面的城堡里，”门房说，“他以为你们不会来了。”“以为我们不会来！”格雷戈里维奇大叫道，“他怎么会认为我们不来呢？”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瓦勒塔、那些克罗地亚人、我丈夫和我竟然理解不了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道理：既然一个人想去参观一座城堡，他就一定会去的，任凭天气如何，因为城堡必然就在那；不过，他又原谅了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些知识分子，难免有点儿稀奇古怪的想法。他不耐烦地说：“行吧，我们自己上去找他。”我们沿着人工开凿的曲折小路和石级，朝圆锥形山顶的山上爬去。两旁的杉树，因为层层叠叠的树枝和树枝上面堆积的白雪，呈现出黑白相间的纹理，如一匹匹斑马。因为大雪，此刻我们已看不见看门人，只听到他朝着城堡大声叫喊：“尼科莱！尼科莱！他们来啦！”我因为穿着一件松鼠绒大

衣，倒是暖和，可男人们个个冻得直发抖。我们一起走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最后终于走上一条环绕城墙的宽阔道路。帅气的年轻农民尼科莱，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看见我们，丢下正用来为我们清扫路面的扫帚，朝格雷戈里维奇跑过来，一面大叫道："你们太厉害啦，这样的天气，路上多难走啊！""有上帝在呢，"格雷戈里维奇说，"大家都什么意思呀？快开门，快开门！"

当门打开时，这次冒着极度严寒的行旅，被证明毫无意义。因为，说实在的，城堡里没任何东西可与这荒凉的季节相匹配，可与那狂乱的骏马和战栗的飞鸟相匹配，与格雷戈里维奇和他的人民相匹配。一座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堡垒，被圈在一栋富丽堂皇的巨大建筑里面。这座受沃尔特·司各特启发而造的建筑，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建筑学的灵感，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文学的想象；虽然拥有城堡的家族曾有着非同一般的才智和自由思想，而且成为克罗地亚爱国主义者，但他们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受到奥匈帝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墙角直到屋顶的大面积墙面上，满满的都是狩猎战利品。然而，无论怎样，这些都永远不可能给人的一种富足的印象。我记得一个故事里讲，有人听见一位匈牙利老伯爵临死前喃喃自语："那么上帝会说，'伯爵啊，你是怎样度过自己一生的呀'？于是我只得说，'主啊，我射杀了好多好多的猎物呢'。哦，天啦！哦，天啦！那似乎并不够啊。"只有傻子才会贬低狩猎的作用，因为狩猎不仅是一种高档次的娱乐活动，而且除了在已彻底机械化的国家外，还是最有价值的教育方式之一。拿破仑最有智慧的一位元帅马尔蒙解释说，在他记忆里，自十二岁起，他就被迫在每天两点至日落之间狩猎。这一活动给了他极其完备的训练，因此在后来整个军旅生涯中，任何艰苦卓绝的环境都不曾使他慌乱。然而，作为给予上帝的唯一献礼，这却是不够的，还可能被怀疑是否正确。墙上的这些战利品言说着19世纪的狩猎竞技活动。这种狩猎实际上是一种人工化了的活动，是拿了农民制造的猎枪，去捕猎人工喂养的动物。因此，从留下的纪念照片看，那时候典型的猎手基本上都是坐着的时间比站着多，腆着一个大肚腩。

城堡里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具，样子可憎之极，都是19世纪后半叶，奥匈帝国时期流行的东西。这些家具之庞大，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到底有什么用处。如此大的尺寸，只是迎合了这样的一种庸俗观点：越大就越富丽堂皇。家具上面的雕刻，更是将其糟蹋得不成样子，使高贵而素雅的木头材质显得粗鄙轻浮。要是能找到被他们用这些丑陋得吓人的家具换掉的旧有家具丢在什么地方，一定会很有趣。在维也纳的玛利亚希尔夫大街，有一个叫作移动仓库的最为漂亮的展览会。其主要的展品为玛丽亚·特蕾莎用过的家具和帝国皇家家具。那些皇家家具，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从图腾汉厅路最高档的公司买回新家具来重新装修他们的皇宫时，被打入冷宫，堆弃在了阁楼上。

城堡里还有不计其数的拙劣绘画，都是那一时代的东西：巨幅的面色羞赧的裸体画，足以让食人族馋涎欲滴；描绘历史事件的巨幅静态图画，看上去似乎图画上所有的人物都吃得太饱。这家族里某个女人耽于业余艺术之乐。她本人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的女人，一位时尚的肖像画家曾给她画像。画中的她，一如爱德华七世所欣赏的那种女性，犹如一匹英格兰拉车马，精力充沛，光彩照人。她站立着，身穿粉红绸缎的舞会长裙，使劲地闻着插在一个巨大水晶花瓶里的一大束娇艳欲滴的玫瑰。她那模样，仿佛用她有力的呼吸，将花朵从水中吸出来。这一巨幅的精力过剩图占据了城堡墙面相当大的面积，四周是一些意大利农家女子图画。图画里的女子，或者捧着手鼓，或者拿着柠檬枝，或者抱着双耳细颈的椭圆土罐。整个画所展现出来的——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够蠢”。

还有一些该家族男性成员的画像。他们形体伟岸，身穿白色与金色搭配的匈牙利将军制服，神情庄严，精神振奋，因为相信自己精于一种有着双重功用的仪式：一可确立起自己的个人优越性，二可留存他们所能理解的文明。在这地方看见他们，那情形实在让人怜悯，就如走进一个挤在窄逼阴暗的阁楼、食不果腹的人家，去看这家里一些曾名噪一时、在舞台上扮演过国王和皇帝的家庭成员的照片。有人也许会说，尽管所有这些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显得这家人很贫穷，但它们也显示出一种优越于它们所来自的粗野的克罗地亚社会的状况。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家族成员肖像所描画的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的数代人，个个头颅高昂，充满自豪。他们的五官组合，显得聪颖睿智，被艺术家固定在画布上。这些画作的艺术成就，其画面之统一协调，至少不亚于我们都铎王室的画家所画的肖像。这些画像也提供了一种图文材料，证明德国的影响一无是处，除了教会了他们腐化堕落。

那腐化堕落的影响非常深远。有一阵子，我游离于人群，转回一间卧室，从窗户望出去，好再看看那方小湖的迷人景致。此时的湖泊变成了一片纯白的雪域，躺卧在圆锥形山峦下，四周围着一些低矮的树林。我发现格雷戈里维奇坐在窗台上，背对着外面，环视着周围那些丑陋的画像和家具，脸上一副梦幻的、心醉神迷的表情。“要能这样子生活，该是很快乐的吧。”他说。他的语气里没有嫉妒，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向往。听他说出心中所构想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他自己现有的生活，这还是头一次——他现有的生活里，有的只是痛苦、危险与艰难。我可以肯定，不是生活在这城堡的人所拥有的钱财，不是温暖他们的熊熊炉火，亦不是他们所享用的丰盛大餐，而是他们那种优雅高贵，他们亲近文化的机会，让他无比羡慕。我之前从未想过，一个民族被他们的敌人占领统治时会遭受怎样的不幸。这种人整个一生，都在为克罗地亚民族摆脱匈牙利的统治、为自由而斗争；他遭受了诱惑，拔高了匈牙利的价值观，贬低了克罗地亚的价值观，而后者，却是他借以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最根本依托。他曾不得不

一再告诫自己和其他人，匈牙利人在不断地将最美好的东西掠走，给克罗地亚人民留下的只是最糟糕的东西——实际上，就物质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事实。然而，人的思维有时不善于区分这种细微的差别。其结果是，他相信匈牙利人在任何方面，所拥有的都是最好的东西，认为这个世界，这大批发霉的鹿角以及二流的绘画、三流的家具，都要优越于在教堂里歌唱的那个农民世界，尽管他们唱得那么充满激情，那么有腔有调，让我们的诗人充满嫉妒，因为后者清楚自己缺失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尽管他们依循典制，身穿如此华彩的服装，让我们的画家也嫉妒，因为后者明白自己缺失的正是这样的直觉。

在前往疗养院的路上，一行人此刻更加沉默了。那些年轻人饥饿难耐。所有人的鞋都湿了。天空灰蒙蒙的，更大的雪似要扑来。此时的路上，房屋也越来越稀少，好长时间才能看见一户人家。我完全能理解他们心中或多或少的担忧，因为一旦汽车抛锚，我们将不得不步行相当远的路程，才可能找到栖身之所。不过，似乎没人怪罪格雷戈里维奇。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在追随他心中的那颗明星。

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才到达疗养院。那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巴洛克风格城堡，坐落于一座小山的山顶。这城堡曾经与另一座城堡同属于一个家族。但这个家族如今已放弃了该城堡，因为在极其激进的《土地改革纲要》下，城堡周围的所有土地都被分给了佃农。这一改革纲要，是南斯拉夫政府在战后开始推行的。来这一处城堡参观，较之于另一处没那么令人扫兴，因为这地方真正是斯拉夫特色的。我们刚走到门前，便有一大帮人涌出来迎接我们。我丈夫对事情一贯漫不经心，就知道傻乐，他始终没明白过来这城堡早已改造成了疗养院，还以为他们都是这个家族的仆人，心里还嘀咕着这样的家风竟然能保留到现在。然而，他们只是些患者。他们从屋里涌出来，有男人、女人、小孩，混作一团，有的身穿平常的西式服装，有的是农民装束，一些男人头戴穆斯林菲斯帽，因为经管这家疗养院的健康保险协会吸纳来的人员来自整个南斯拉夫。他们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奇怪，完全不像医院的病人。没有谁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在英国这样的机构里，除了那些更狂野的收容人员，如流浪汉和怪人，其他所有人脸上都传达着这样一副神情。没有谁假装喜欢拿浆洗的被褥当作隔断生活的界线，或假装承认医生护士的权威让人乐于接受，或他们为摆脱医院千篇一律的作息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一点儿小打小闹，或他们会像周日学校的孩童那样，看见老师如老鼠见到猫。相反，眼前的这些人跟我们一样，是十足的成年人的模样。

当然，这部分缘于他们的种族信仰。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南斯拉夫尚没有任何阶级之分的地区，那些地方只有农民。因此，他们还缺乏这样一种意识——既然进了医院，一个劳动者便等于将自己置于他上司的手中，他就

必须表现得不具有危险性，以讨好眼前的上司。相反，这里的疾病理论貌似与西欧医院里的不一样。在办公室，我们见到院方的负责人和他的三位助理。院长是塞尔维亚人，长期定居克罗地亚，在政治上也亲克罗地亚。这几个人，在英国人的眼里都显得很怪异，没一点儿医生的气质。这不是说他们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恰恰相反，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一种果决，甚至是大权在握的气度和风范。然而，在他们头脑中，却没有如下的图景：通向哈利街与贵族爵位的亮堂堂的医院走廊，充分考虑到病人需要的精心安排与设计，对病人以应有的礼待，管理只是一种附带的责任而非中心任务。这些对于大多数的英国医生来说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医学人才自戕其基本素养，也是让人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一素养要求他们强烈地专注于身体问题方面的真相，培养出一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和甘于淡泊的精神。这种克制与淡泊，是与任何追逐外在世界的心灵不兼容的。可这些人却有着一种纯粹的主动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表现为一种喋喋不休的争执。他们可能更像斗牛士。

当然，他们的确是斗牛士。那牛是肺结核。不多时，欢迎我们的仪式结束。如果我是去参观一家英国的疗养院，身冻脚湿的，我将不得不先去护士长的房里。这样时间就给浪费了。可在这地方，我们握过手后，便急急忙忙直奔散热器而去。我们坐在旁边，脱下鞋子，连着袜子将脚跟紧贴在热烘烘的铁片上。与此同时，那些医生则围着我们，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斗牛战术”。我们是否知道，肺结核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惩罚？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化速度太快了。农民来到城市，全然不懂得卫生问题。他们只是看到写出来的工资很高，就被吸引来了。而事实上，他们的工资远不足以购买像样的住房或衣物。而且因为极少能得到医治，肺结核患者被送进医院也等于无法接受治疗，只能任其传染。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巴尔干人。说到这里，他们眼里突然火光闪现。任何人听过德国人或奥地利人说“巴尔干的”这一修饰词语，都能够理解其原因——他们那口吻里，毫不掩饰地带着极其强烈的鄙视之情。他们说，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肺结核也这么普遍。

我对于疗养院多少有过一些了解，而且是触目惊心的。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我环顾四周。看得出来，这家疗养院一方面条件极其恶劣，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奢华。我们打开第一扇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这建筑的装饰，与这时代很不合拍。我们陡然间跨入模糊昏暗之境，大中午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袭来。那是一个家庭礼拜堂，里面一尊丰乳镀金的巴洛克风格圣母玛利亚像，以及十多个胖乎乎的天使，像气球般飘浮在圣坛的上方。此外还有两尊其家族成员的大理石塑像，憔悴枯瘦，立在他们的坟墓之上。一队修女，黑白色的衣袍宽大铺展。她们个头纤细，如一只只果核包藏在肥厚的果肉之中。她们以膝关节为轴，转过身来看我们这些入侵者都是些什么人。女修道院院长打了一个友善的手势——与圣坛后面主持典仪

的圣母一模一样的风范，修女们停止了吟唱。直至我们参观结束，她们才继续。在西欧，那一手势可能有三百年都不曾有人见到过。我想，要把这样一座17世纪的城堡改作医院，这应当不是件容易的事。城堡有三层楼，四周是宽阔的庭院。城堡房间的天花板高得出奇，地板由石头和大理石铺成。居住在城堡里的人也与当下的时代如此貌合神离，任何与健康卫生关联的，一切科学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定然让他们觉得完全不可理喻。

但那地方又非常干净，干净得不可思议，干净得犹如一艘战舰。这里至少有某种东西，令英国医院的专家也不得不点头赞许，不过，或许也是他唯一会赞许之处。我们到达时，疗养院里的患者出门迎接我们。他们那模样，会让西方理论界大为惊讶。很显然，这些患者心中都认定一种假象，认为自己真的明白自己的病症所在，而且也没人试图去搅扰他们的快乐。今天是看望日，平日城堡里女士们使用的宽敞客厅，经过一番打理，装饰上19世纪晚期、表现福安之岛的意大利风格的壁画，甜美得有些腻人。那些女人坐着，手持手绢，举至唇前，一如茶花女，凄婉清丽，动人心扉；男人们则展现出一种日出的景象——混杂着年轻诗人济慈式的日落晖晕。他们的家人，谁也没想要打搅他们这戏剧化的造型，只是同情地注视着他们，一如普通观众。没有访客的患者在休息；当我们走进病房，他们都躺在床上，拉上被子甚至盖住嘴巴。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灰色的苍穹，因为飞雪飘舞，摇曳变幻，天空或明或暗，却始终可见。他们瑟瑟发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他们的眼睛从被子边上露出来，显得特别大，似乎充分感受着我们的健康与他们的病状之间的反差。事实上，从他们昏昏欲睡和被催眠了的茫然目光里所散发出来的暗黑光芒可以看出，他们所处困境的怪异性近来变得愈加明显——他们陷于这样一种矛盾境地：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接受他们身体视之为敌人的寒冷，不得不像拒绝死神那样，排斥众所周知的生命所必需的温暖。我们一旁的医生似乎对于这种诗歌一般的张力感到理所当然。他们谁也没有任何给病人打气鼓劲的举动，也没有任何强装乐观的空洞乞怜。而在英国，对于任何明知自己身体境况的患者，医生都会没完没了地拿这样的举动和语言来烦扰他们。老实说，这些医生的忍耐力真可谓强大。当我们走过一道走廊，走廊望出去就是院子，透过墙壁上的窗子，我们看见一扇窗外，有个黑影在瑟瑟颤抖——几乎可以肯定应该是两个黑影，因为强烈的相互倾慕而合为了一体。“没错，”院长说，“他们有时会恋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有时事情会因此而彻底变成另一番景象，他们会对生活生起一份新的激情，而且恢复得非常好。”这便是对我们西方人的所有良心不安的回答。那些病人恢复得非常好。让他们去扮演那些伟大的悲剧角色，他们也像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样，会体验到那种极大的愉悦感。他们的表演并不缺乏对度的把握，并不缺乏人情味，亦不缺乏相应的知识，这也是他们获允参加这样的演出的原因——而在西方，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的人是不可能具备这种能力的，他们无法应对这种脑子里充满死亡与爱恋的

危险思想的病人；这里的人却具有如此的智慧，他们完全无须将患者脑中的这种负载之物清除。

这些医生自己的人生也显得极其丰富。他们心中体验到的那种权威的快意，恰如一位科学家将其知识用于一群原始人。言谈里他们称那些农民是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动物。他们必须连哄带骗，设下圈套让那些农民往里面钻，同时以大棒威慑，才能使他们乖乖地接受治疗，因为只有如此，他们体内的生命之火才不致熄灭。而一旦生命之火熄灭，他们将既不美，也不再有活力。的确，所有殖民统治者都是施以这样的手法，可这些医生却是用他们不曾机械僵化的种族的不曾堕落毁坏的目光，在关注呵护着一种可爱的东西。尽管他们与患者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就如一位大学生与一位农民的距离，但那道鸿沟却因一种同根意识而得以天堑相通——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人，他们的先辈也都曾是朝夕相伴的农民。这里的每位医生都是一个魔法师，他们运用自己的咒语，在挽救着他父亲和母亲的生命。我想象，也正是这样一幅情景，向人们解释了苏联政府官员为什么在社会服务工作中会表现出特有的激情。通常我们都觉得，这只是共产体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效应，但这种激情在曾经沙皇治下的如今的巴尔干各省，在土耳其，也同样存在啊。古旧与时新之融合无间，有时简直让人心醉神迷。这些医生，因为一个肺萎陷病例手术相当成功，而为他们的X光室和手术舞台欣喜陶醉。然后，他们领着我们匆匆地穿过几条走廊，走下一条古旧的黟黑似铁的石砌楼梯，穿过一道古旧的锃亮如玻璃的木门，来到一间厨房——巨大的穹顶下，屋子里光线暗弱，只有呼啦啦声响如森林夜风的炉火在近处闪烁光芒。他们对这一切，亦是一脸陶醉。长条形的餐桌，桌面粗厚似树干，身穿白袍的漂亮修女们，给井然有序的秩序以最后几笔润色——这里的妇女，每天吃过饭后，要对所有物件进行两次收拾打理，使其纤尘不染，一一归于原位。我们见着的最最漂亮的一位修女，是在一间储藏室里。储藏室有我在伦敦的公寓一半那么大，她站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满是用干果、蛋白、糖和精细面粉做成的小甜饼。所有斯拉夫人都非常喜欢这种小饼干。我们进去，看见她正好拿起一块甜饼在吃。她一口将甜饼咽下去，面对男人们的哄然大笑，脸上毫无羞色。但那镇定里却又是你难以想象的忙乱——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娇嫩的上唇内侧还沾着些甜饼细屑。正当此时，有人突然想起来我们的饭准备好了。

我们被带到楼上的医生食堂。呈现于眼前的是更多稀奇的古董。似乎附近什么地方，有着一条梅子白兰地之河。接着，开场是偌大一个浅底盘子，里面装的是冷餐肉。我想，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吃到如此大的一盘肉。有脂嫩的吮指乳猪，你甚至可以像抹黄油一样把它敷在面包上。还有小牛肉、火腿、香肠和口条，都是原汁原味，原料上乘。另外，还有大块的黄油、肥腻的奶酪。接着又是烙饼，里面的馅是碎牛排、蘑菇和鸡肝。再接着是童子鸡，在四周围起一圈的是香喷喷的米饭，米饭下面铺着嫩蔬菜。

而它的附近似乎也有着一条白葡萄酒的河流。再然后是一盘木梨、樱桃和鲜桃，以及一堆小甜饼——就是我们刚才发现的那位漂亮的修女吃的那种。我们放开手脚大吃大喝。瓦勒塔凑近耳边跟我说："你必须放开肚子吃，你知道，如果你不多吃点，他们会觉得你不喜欢他们的饭菜。我们斯拉夫人的一个习俗，就是给客人备下太多吃的，这是一种炫耀，不过当然是出于善意啦。客人吃得越多，表示客人越开心。我们真是一个原始民族，我觉得。"我倒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不停地吃，中间只被打断过一次。当时一位修女从门外探进头来，眼睛睁得圆圆的，惊呼了一声。院长对其中一位较年轻的医生说了些什么，那医生脱下外套，卷起袖子，快步跑出了房间。"两个病人在谈论政治，"院长解释说，"这是不允许的，但有时他们还是要谈。不过也没什么严重的，他们没有武器。继续吃吧，继续吃吧。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在疗养院自己的土地上的或周边的土地上种的，并由我们心灵手巧的修女备办的。还有，你们要知道，那些患者跟你们吃的一样。当然，我们这是贵宾宴。不过任何时候，我们给他们的食物都跟这同样丰盛，因为食物很便宜，我们也没必要克扣。""是的，"另一位医生向我扬扬杯子说，"当我们将患者送回家，他们都会比先前增重五磅、十磅甚至十五磅。"

这些是斯拉夫人真实的声音。在这里的人们看来，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增添美好的东西。而在西方，我们认为的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方法，却是将生活中不好的东西去掉。对于我们来说，一个让人满意的患者，也就是被阉割了所有成年人习性的人——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合适的医院饭食，应该是去除了一切毒素和刺激物的东西，如去头斩尾的清蒸鱼，去核的煨西梅脯。而在这里，病人可以保留成年人习性，可以有他们的原始野性，可以闷闷不乐，可以拒不配合；如果他乐意培养一种诗人情怀，或者演绎一番个人激情，以帮助自己跨过危险，那就最好。医生想要扭转的，是肺结核细菌，而非患者本人；医生也无非是另一人而已，除了他还有着治愈患者的强烈使命感。在他看来，医院最好的饮食就应该是给嘴巴尽可能提供各种汤食。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一论点并无什么明显不妥——因为鸡肉和果盘是疗养院标准的配食，而且也很好吃。一位医生向我举杯致意，我也举杯回敬，心里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这一丰富的世界——一个做加法而非做减法的世界——进行交流。我想起在谢斯汀的礼拜活动，还有那里陌生的气氛。西方的朝拜者来到圣坛前，企求神主从他们自己身上减去一些东西；通过假装幼稚无辜，从自己身上减去一些危险的成人德行。而谢斯汀的朝拜者来到圣坛前，则是出于一种加法的习惯——他们将自己的崇拜之心奉献给神主，从而通过想象的自我实现方式，将自己所膜拜的圣德加诸自己身上。这等同于一笔物质财富，浩大亦让人心安——我在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就发现了。当时，我一头走进了有着无限财富的宝库，其耀目如印度戈尔康达的红宝石，如加拿大克朗代克河上的金矿。这些财富以一切形式呈现出来——除了具体物质的形式。

正在这时，院长举杯祝我和我丈夫身体健康。当他说“我们一直在尽力做好，只是我们太穷了”，在我听起来却有些滑稽，这正如有钱人跟他们的穷亲戚诉苦，说自己必须缴纳多少多少所得税。

“可既然这里和谢斯汀都有着如此斯拉夫式的丰盛富足，”我心里颇为不解，“自来到这里，我为何却极少觉得享受呢？”

但我的注意力被一声破裂声给吸引过去了，这破裂声撕裂了当时的情景。院长正告诉我丈夫和我，能邀请我们来到克罗地亚，他感到多么的高兴，格雷戈里维奇突然从桌上俯身过来，纠正他的说法。“到南斯拉夫。”他说。那口吻，就如一位老师急切地提醒他的学生，表达要讲求事实，要准确。桌上一片沉默。“到南斯拉夫。”他又说了一遍。他习惯性紧蹙的眉宇间，严峻的神态依然矗立。然而，他的双眼却颓然失神，如一条年迈的狗，明知它年轻的主人不愿带它出去溜达，却仍心存妄想。又沉默了片刻，院长说道：“没错，我要说我欢迎他们来到南斯拉夫。我是谁呀，身为一个塞尔维亚人，怎么可以拒绝施与一位克罗地亚人如此恩惠呢？”之后，他们都善意地戏谑格雷戈里维奇；不过有一片刻，从他们的话语里，却可以听出来那种真正穷困的哀号，一种极度恐惧的，因某种特定政治气候而致的哀号。那种政治气候，我们在爱尔兰已相当熟悉。它滋生于旧有的不公的基础上。一个骄傲的民族，习得了一种抵御外来压迫的习惯。当他们终于赶走了压迫者，他们却忘了达成协定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忘了一个社会一旦获得安宁，便可以去追求许许多多的快乐。他们只是一个劲地继续纠缠，从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零零碎碎的各种不公中，扒拉出大量的素材来，而不知道这些东西需从这样或那样的途径打理解决。如此的政治气候，在一个社会中会形成一种漏洞。慷慨的热情、纯粹的艺术、抽象的思想，都会从中流泻而过，最后无影无踪。剩下来的，便唯有那些冥顽不化的固态物，无论争执还是爱，都无法使其融化。这般仇恨、偏见、怨毒的砾石，没有任何价值。但这种情形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总会有一些人生来充满善意，能闭合起那漏洞。然而，这样的美好善意，当贫穷导致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匮乏时，其效应必然受到削弱。而在克罗地亚，时不时地，我都能感觉到极度的穷困。

萨格勒布IV

在克罗地亚，政治的争端没个尽头。永远也不可能有尽头。

由于我们走在菜市场附近，脚底下满是红红绿绿的卷心菜叶子、橘子皮和灰色的石头，就像马赛克似的。我示意瓦勒塔和康斯坦丁看这些漂亮的图案，我甚至为之倾倒，但我无法将他们从沉重的不认同状态中拉出来。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所呈递的体验于他们并非如此有趣，以至于当我们走到一个装着一只灰色和粉色相间的鹦鹉的鸟笼前，面前摆放着许多标示运势的卡片，我乐得大叫：“我们来算命！”但康斯坦丁和瓦勒塔只是看着鸟儿，眼神里都隐含着这样一种希望——对方不会有任何的未来。于是我放下自己那份钱，鹦鹉给我叼出来一张卡片。我将卡片递给瓦勒塔，他纵声大笑，将卡片扔还给我：“噢，聪明的鸟儿！上面说，‘你身边是一帮坏朋友，你必须赶紧摆脱他们’！”他扬了扬帽子，大笑着穿过人群。“在你遵命而行之前，且先跟你说声再见吧！”他转头大声道——但他突然变得严肃，唯恐我们真当他是弃我们而去，说道：“我晚上再来看你们，大概七点。”

整个午饭时间，他们一直争吵不休。上午我们参观了镇上的各处景点，陪同的有一位克罗地亚女士和康斯坦丁。喝汤时，我告诉瓦勒塔说，我们非常喜欢她。康斯坦丁一下子被引爆了：“我当时就不喜欢她。她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你们在健康合作社诊所的时候，你没听见她说什么吗？她说那一切在奥地利时期都维护得非常好。是这样说的，而且语气里充满遗憾。”“噢，也是事实啊。”瓦勒塔说。“是没错，的确是事实，”康斯坦丁说，“可我们决不能为此感到遗憾。任何真正的斯拉夫人都不会为此感到遗憾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一个真正的人身为斯拉夫血统，他就会知道身为斯拉夫人的重要意义所在，因为那是上帝赋予他的身份，他应该坚守这种身份。有时奥地利人娇纵你，有时匈牙利人也这样，他们都不过是希望你与另一方对抗，以坐收渔利。如此得来的好处非常肮脏。他们毁坏了你作为斯拉夫人的身份。还不如你什么都没有，但与你的斯拉夫兄弟一道，做一个自由的人。”他顿了顿，但瓦勒塔默然没说话，继续吃着自己的饭。“你不觉得这样更好吗？”康斯坦丁问道。他微微点了点头。“呵，如果你对这也没什么强烈感受，你就啥也感受不了啦！”康斯坦丁说，嗓门提高了些。“噢，那是，我对此感受很强烈，”瓦勒塔声音轻柔地说，而后又更加轻柔地说，“与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一道，做一个自由的人该会好得多。”

有一会儿，康斯坦丁觉得很满足，继续吃饭。突然，他扔下手中刀

叉："你这是说什么呀？该会好得多……你的意思是并非如此了？""我的意思是并非完全如此。"瓦勒塔说。"怎么说并非完全如此？"康斯坦丁问道。他像一头公牛一样头低沉下来。瓦勒塔耸了耸肩。康斯坦丁突然间变得颓然无力，哀伤地问道："可是，我们不是兄弟吗，我们克罗地亚人跟塞尔维亚人？""是。"瓦勒塔说。他的话语很轻柔，却非因陌生才会有的那种自我掩饰，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感情。他的脸色纸一样白。"可在南斯拉夫，"他沉痛地说，"却并非完全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似乎塞尔维亚人是大哥哥，而我们克罗地亚人是小弟弟，基于某项法律条文，就如同英国人的法律一样，兄长被赋予一切，而小弟弟却一无所有。""哦，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康斯坦丁呻吟道，"你认为你们所有的钱都流往了贝尔格莱德，你们却几乎没得着任何回报，相反我们却洪水般往你们的国家派任塞尔维亚官员，并且不让任何克罗地亚人位居实权职位。我清楚得很！"

"你可能清楚得很，"瓦勒塔说，"但我们也一样清楚：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谁会视而不见。""我没叫你视而不见，"康斯坦丁说，他开始像一头公牛般咆哮起来，"我是叫你看清楚这一点。你们以前也没有自己的钱可花，在匈牙利统治下的时候。你们所有的钱都被送去了布达佩斯，送给了那里的地主或税务员，你们得到了一些铁路，没错，一些医院，没错，一些公路，没错，但那些花费不及你们钱财的一半，同时你们还被德意志化和马扎尔化，你们的灵魂变得粗暴。可如今你们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是南方斯拉夫民族王国的一部分，这一王国的存在，便是为了看顾你们的灵魂，而为了捍卫这个王国，我们必须有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让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老实地待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必须给塞尔维亚人许多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塞尔维亚人在跟土耳其作战，而你们却安全地站在我们身后；而且我们还得为波斯尼亚做更多的事，因为匈牙利人当时在那里什么也没干；我们必须为马其顿做一切的一切，因为土耳其人直到1912年才离开那里；我们必须沥干沼泽，修建学校，建造军用道路，这一切既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你却不愿睁眼看看！"

"不，我看见了，"瓦勒塔说，"但如果说你们想要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南斯拉夫，你们就应该提升塞尔维亚的学校，使之达到克罗地亚那些学校的水准，而不是把克罗地亚的学校拉低至塞尔维亚的水准。""现在你终于表现出来你什么都没看见了，"康斯坦丁哀号道，"这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让全国各地都有优秀的学校，而不是某一地区有非常优秀的学校。一个链条的强劲程度和它最薄弱的环节息息相关。就算你们克罗地亚的男孩女孩能阅读印度斯坦语，绘画技艺如意大利画家拉斐尔，而如果马其顿的年轻人整晚见谁都一阵砰砰嘭嘭——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的钱不流进贝尔格莱德，我们会觉得更有把握让我们的钱切实地用在修建马其顿的学校上，"瓦勒塔说，"你必须原谅我们担心大量的钱被贝尔格莱德截流了。""贝尔格莱德当

然要截流啦！”康斯坦丁说，他嗓门越来越高，虽然平时都很低沉，“我们必须建立一座首都。我们必须建立一座首都，也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也是南斯拉夫的一分子！所有西欧人都鄙视我们，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小，我们的国家不漂亮。他们错了，因为我们没理由要一座多大的首都，因为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可是你必须给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像小孩子，只有庞大的东西，亮闪闪的东西，才会让他们刮目相看。你还记得战前，奥地利的王公大臣是如何视我们如渣土的吗？因为维也纳放眼望去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宫殿，而我们却一无所有，除了这贫穷的小城——直到五十年前，这地方仍驻扎着一支土耳其卫戍部队，尽管这算不了什么，因为在那时节，我们正像用榔锤敲核桃般地捣向他们。”

“倘若在贝尔格莱德修建的只是政府机关和宾馆，我们克罗地亚人可能没意见，”瓦勒塔说，“可据我们所知，在建的还有很多私人住房，而且是为经过政治改造的对象修建的。”“没这回事，我发誓没这回事。”康斯坦丁叫道。“你是在告诉我，”瓦勒塔问道，“所有塞尔维亚官员都很诚实吗？”康斯坦丁身子在座位上直晃。“我说的全都四四思，”他说——舌头不听使唤，“是事实”三个字全成了平舌音，“我是一个非常曾思（诚实）的人。”这倒是事实：在他的人生中，经他手的钱不在少数，却没任何一分钱夹带在他指缝中。“我也承认，”他语气沉重地继续道，“在我们塞尔维亚，有时候一些人是不（诚实）。可我们又能如何呢？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人手不够，战争中我们死那么多人。百分之九十啊。”他哀号道：“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都战死在这场战争中。”后来据我了解，这也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征召我们克罗地亚人担任行政工作呢？”瓦勒塔问道，“有那么多的克罗地亚人，世界上谁也不敢说他们不值得信任。”“可我们怎么能让你们克罗地亚人担任行政职位呀？”康斯坦丁破口而出地喊道，“你们不忠诚！”“怎么可能，”瓦勒塔问道，嘴唇苍白，“指望我们忠诚，如果你们老这样对待我们？”“但我这就告诉你，”康斯坦丁悲痛地说，“你们不忠诚，我们怎么可能不这样对待你们？”

绝对的一个死结。这一事态，给人心里注满了悲凉。康斯坦丁一把推开餐盘，说道：“瓦勒塔，我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我看不出你们俩谁有任何问题，”我插嘴道，“我们从健康合作社诊所和你们分别后，那位克罗地亚女士带我们参观了民族志博物馆。你们斯拉夫各民族都是怎样的天才啊！我还从没见过如此丰富的各式各样的设计，什么都可以激起灵感，而且都美到极致。一条衣裙，一个复活节彩蛋，一个黄油搅拌器。”我知道自己的调停方式很无力，却也只能这样了。我发现，每次有斯拉夫人争吵，常常都是这样的效果。他们那辩论的激情，将空气中所有的能量都吸了过去，以至于它轨道之外的一切，都只能无力地扑腾几下。“我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康斯坦丁又重复了一遍，一面打手势让我别插嘴，“在克罗地亚这地方，你们既是律师也是战士。你们一

直都是优秀的律师，你们自始至终就是律师。八百年来，你们一直都在审判匈牙利。你们总是对你们国王的外交开幕词吹毛求疵，你们总是为你们的班的权力争吵不休，你们总在社会的自治与隶属两个问题上拉锯论争，你们就像寒鸦一样，总是对二元君主制下你们的权利喋喋不休，你们一直长篇累牍，花费不知能铺成多少英亩地的纸张讨论匈牙利——克罗地亚妥协方案。也正因为如此，你们如今更似律师，而非战士，因为自从18世纪你们与土耳其人交过战，与匈牙利马扎尔人短暂交手之后，你们就不再是战士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建造南斯拉夫，我们必须在心底去除律师的个性，更应像个战士，我们必须放眼看待保全我们性命这样的简单问题。你们必须抛弃你们所有的渺小权利，并说我们拥有一项更大的权利，斯拉夫各民族站在一起的权利，我们必须牺牲我们自己的所有权利，以保护那一伟大的权利。”

瓦勒塔再次耸了耸肩。“对此你有什么话说啊？”康斯坦丁咆哮道，“我来告诉你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们这里的人全都是知识分子，很糟糕的那种知识分子。你们自我吹嘘，就因为萨格勒布是一座老城，但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在塞尔维亚任何别的地方，都有一座老城，而且尽管我们也有小说家、诗人以及一切的一切，他们如今却超过不止一代人不住在任何城市里。”（这是一种高超的塞尔维亚语法，否定词叠一堆。）“因此，农民知道的东西他们也一样知道。他们清楚什么是不能反抗的，什么必须顺势而为。一个人当然可以开垦没有被开垦的土地，但他会十二分地遵照大地的意见，在春天播种，而不会在冬天或夏天播种。可是在城里，你们不懂这个，你们可以畅行无阻，你们可以对抗一切，除了机动车、火车、有轨电车，你们不敢蒙着脑袋撞上去外，对其他一切你们都无所畏惧。因此，你们是知识分子，总是唱反调的那种伪知识分子。上帝啊上帝，做一个站在行动者对立面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啊！他总能如此地智高一等，他总能挑出来各种小毛病。可是创造，却要难得多。因此，做批评家容易，做诗人难。”他突然猛地扔下一把叉子：“但我应该说，做一个糟糕的批评家更容易。要做一个有见地的批评家，有时你必须创造，并亲身体验怎样的创作是好的，怎样是不好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成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我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你们却不是诗人，你们克罗地亚人，你们并不创造。你们总是耍小聪明，你们总是站在对立面赢取点数，就像在玩游戏。”他如一头饿狮，猛地扑在自己的果酱薄饼上，然后，嘴里塞满食物，继续咆哮道：“你们萨格勒布的人都这个样。一直以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咖啡馆，所有克罗地亚人都这样对我说，‘太让人恶心了，你们在贝尔格莱德跟意大利签署的那个贸易协定’！可这些克罗地亚人都是谁呀，是谁接受意大利的帮助来暗杀我们国王的，是谁一直号叫说你们的农民如何如何贫穷的，是谁，如果我们屈尊俯就，为了让农民们多一点儿经济收入，而与意大利人签署贸易协定，就开始攻击我们？哦，就你们这一切的小心眼小手段，你们真是太可怕

了。”

有一会儿，瓦勒塔没有答话。在克罗地亚式的辩论中，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那就是克罗地亚人不会在餐馆里大喊大叫，也不会在满嘴食物时说话。“你是说我们受到的统治很好吗？”他终于说，“你是说没有人无缘无故被逮捕和投入监狱，被野蛮对待？你是说自克罗地亚变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这里没人遭受过虐待？”他全身颤抖，脸庞上掠过令人害怕的恐惧，我敢肯定，他一定是记起来自己曾亲眼所见的种种邪恶暴行，那些暴行曾让他五脏翻滚。康斯坦丁几乎大叫了起来。“啊，上帝！那都是他们的错，”他争辩道，一面指着我丈夫和我，“这些英国人都是伪君子，他们假装说统治人民不需要运用暴力，原因是在他们帝国的很多地区，他们只是统治愿意接受统治的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没必要使用武力，于是他们假装这是一种通例，尽管在印度，那里的人民因为不愿被统治，很多人被殴打和投进监牢。就此问题，我不会责怪英国人。必须这样，如果说一个种族要拥有超越另一种族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种族拥有超越另一种族的权力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南斯拉夫，一个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自治的王国，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了南斯拉夫做出一切可能的牺牲。”“我明白你的理论了，”瓦勒塔说，“我们必须让塞尔维亚人虐待我们克罗地亚人，因为在南斯拉夫名下，我们可以不被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虐待。”“噢，上帝呀！噢，上帝！”康斯坦丁叫嚷道，“我很高兴我不是克罗地亚人，而是一名塞尔维亚人，因为虽然我自己非常聪明，但塞尔维亚民族却不那么聪明；聪明也不是他们的正务，他们的正务一直是赶走土耳其人，保护其独立不受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侵害，因此他们抱定一点，为能打开门，他们不惜拿脑袋撞上去。相信我，处于我们这样的地位——这更为重要。可是，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可知道我跟克罗地亚人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我想要卷起大衣，躺在大街中央，头枕在我的大衣上，对那些马匹和车辆说，‘驶过来吧，我已经恶心死啦。’在这场对话中，最让人恐惧的是，你永远没有错，而我却从来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这样永远说下去，直到你的永远没错把我俩都置于死地为止。”“有人已经死了。”瓦勒塔说。

萨格勒布V

下午余下的时间向我们证明了，某种程度上康斯坦丁是对的：克罗地亚人受奥地利人影响，犹如罹受了某种复杂的疾病，已变得非常孱弱。

瓦勒塔从鹦鹉笼前离开我们后，康斯坦丁说：“现在我们得赶紧了，因为下午还有两件事情要做。我们必须去参观大教堂的藏宝室，然后还必须去舞蹈家那里，她答应过我们在她公寓里给我们跳舞的。”他走在我们旁边，脸色沉郁，眼睛看着人行道，然后突然叫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不嫌麻烦要理那年轻人，他没什么重要性，只是一个普通的克罗地亚人而已，一个典型的克罗地亚人。”我们沉默了一下，然后来到大教堂前的广场。他又一次突然嚷道：“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可怕，这些克罗地亚人，他们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可怕。上帝在造克罗地亚人时，弄得太糟糕了。我告诉你们在战争时期曾发生的事情。在塞尔维亚有一座山，我们彻夜都在跟奥地利部队战斗，以争夺这座山。一时我们抢夺了过来，一时他们又抢夺了去。最后，我们终于占领了整座山，当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大喊让他们投降，夜色中他们回答：‘帝国的士兵是不会投降的。’——他们说的是和我们同样的语言。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克罗地亚人，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认真的，于是他们又向我们冲过来，我们只好杀死他们，到天明，他们全死了，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

正说到这里，大教堂朱褐色的楼面映入我们眼帘。康斯坦丁踮着脚，对教堂看守人说我们想要参观藏宝室，看守人于是忙乱地到处找钥匙。一位看守人，身穿普通的长裤和长袖衬衫，正将复活节装点圣坛的几盆夹竹桃搬开。因为费劲，也不高兴做这事情，他撮起嘴唇，绷紧了脸。夹竹桃树枝在他周围乱舞，就如古意大利萨宾人的手臂。“他们找钥匙要花很长时间的，”康斯坦丁带着倦意说，他倚在一根台柱上，抬头仰望着台柱高处的花饰，“我不想让你们觉得克罗地亚人不好。斯拉夫各民族的人都非常好。在奥匈帝国时期，他们都是最优秀的战士。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在所有的前线。哎，这是啥？”一位牧师过来说，必须派人去拿钥匙，很快就会拿来。随后他跑向一扇小门——在接下来的一刻钟里，有五六个人从这个门不停地进进出出，为找钥匙的事奔忙。“我呢，作为一个塞尔维亚人，对于应多快找到钥匙这种事，不像你们英国人觉得那么重要，”康斯坦丁说，“但我想给你们说明的是，在萨格勒布，找钥匙速度也不及你们那么快。不过我肯定，在这地方，他们成天都会跟你们说，‘我们不像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我们这地方做事很讲效率，我们做事跟在维也纳一样’。”的确如此。无论是在银行、宾馆还是博物馆，他们都一直

这样跟我们讲。

终于，一位牧师手里拿着钥匙过来，领我们登上一段石梯，来到藏宝室前。藏宝室有一扇巨大的防盗门，是在一个10世纪双折象牙雕失窃后安装的。若干年后，这块象牙雕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博物馆被发现。防盗门费了好一段时间才打开，实在是非同一般的复杂。牧师进了屋，随后又马上跑出来，拿着一个圣餐杯。显然，他是很自豪的，尽管那圣餐杯并不算十分稀奇，不过是16世纪的作品而已。出于某种原因，所有克罗地亚牧师，无论是在克罗地亚当地的，还是在达尔马提亚的，都对文艺复兴时期拙劣的作品有一份特殊的喜爱。对于拜占庭时期的作品，他们只看重它们的年代，以及其过分堆砌贵重金属的手法。对于中世纪的作品，他们往往斥之为粗鄙。牧师对这个圣餐杯简直心醉神迷，他把圣餐杯放在藏宝室外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让我们站在那里欣赏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说我们必须看看一位16世纪主教的镶嵌珠宝的法冠，并领我们进了藏宝室。看过这件银器后，我们又被带去观看那个双折象牙雕。很悦目的一件牙雕，却不太能让人叫好，因为有些局促。上面的人物很生动传神，本可以传递出一种神秘的意旨，却未能表达出来，因为那些人物太过拥挤，就像一首诗，所有文字都挤成了一堆。我们还被带去看了那个假的象牙雕，也就是窃贼为避免短时间里被发觉，用以替换的赝品。这事有些离谱，因为虽然那赝品将原件所有细节都复制得十分相像，但无论大小比例还是色彩明暗，都与原作相去甚远，使得两样东西极不相像。很可能复件是在某个手工作坊雕刻的，也许是在意大利。制作人从没见过原件，只是照着照片制作的。

正当我们在讨论这些，牧师突然一声尖叫，跑出了房间，康斯坦丁则大笑起来。他解释说：“他记起来把圣餐杯放在外面桌子上啦。”我说：“有什么可笑呢？我们谁都可能这样的。”“不是的，”康斯坦丁说，“你丈夫就绝不会这样子，因为他是英国人。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样子，因为你是女人，因此你不会有某种十分确定的个性。但我肯定会的，那位牧师也肯定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会这样，而他因为是克罗地亚人，他便认为自己跟德国人或英国人一样，不会那样。当然我要笑啦。这跟找钥匙一样滑稽。”

牧师回来后又带我们参观了彩饰图案的《圣经·诗篇》。其中的一部，上面的记录尤其让我们喜欢，百看不厌——一颗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者的灵魂，在教堂里寻得了最高的满足与躲避纷扰时代的庇护之所。在其圣书的空白边缘，作者绘制了许多的城镇，前面是可以游泳的海湾；许多的草地，春天在这些草地上微笑，四百年不曾倦怠；还有许多的娇艳的裸体人像，其肌体因为被迫运动而非常健康。我们本以为作者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有多么悠闲自在，却不料往下翻一页，便发现他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甜

美依旧，却让人感到神秘难解——他画了一个猎人，躺在树林里睡着了，梦里林间空地上有很多人，在一堆熊熊燃烧的火堆旁，猎人被一些雌鹿切成一块一块的，雌鹿在闻着烤肉的美妙香味；一群野兔在追赶着猎狗，猎狗口吐白沫，惊惶不已，一瘸一拐地将它的躯体挤进笼子里。画中的每一笔都在问："如果还有痛苦与残忍，什么是蓝色的大海、春天和可爱的胴体呢？"他从过去走出来对我们说话，可惜只是一瞬便又折身回去了——因为牧师更希望我们去看他的圣衣，而不是他的书。"说真的，它们真的好漂亮。"康斯坦丁说。这些衣服由绣花锦缎和压印天鹅绒做成，绝大部分来自意大利，有的在时间上远至16世纪。"可是看上去好差劲呀！"我说。"你可真难伺候呢。"他说。"不，不是的，"我说，"但比起我们在民族志博物馆看到的款式设计，这些衣服显得太缺乏创意，太普通啦。"

我不是要讨好康斯坦丁。圣衣上的这些设计属于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类型，谁要是在博物馆看见，想要把它们画下来，会觉得很无奈，因为这些设计图案太没章法了。它们既非自然主义的，亦不遵循任何几何规则；常常是画几朵并置的花，以达到色彩的和谐搭配，然后用一些线条连接起来。这些线条因为规划不当，显得很刺眼，不过又被那些色彩的搭配掩饰了起来。而斯拉夫刺绣则是基于合理的线条规划，线条往前伸展，给人一种自然感，让人觉得水到渠成，因此描摹时，铅笔一点也不觉得别扭牵强。这正是康斯坦丁所言的"顺势而为"。同时，斯拉夫设计具有极鲜明的个性，却不违反传统定则，而意大利设计遵循的是一定数量的模型定规。"你说得对，"康斯坦丁和气地说，"我们是很神奇的民族。也因此，我们只想做斯拉夫人，不愿做任何其他人。任何其他的人对我们来说都太贫乏了。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去舞蹈家那里了，她为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个舞伴，因此我们不能迟到。"

舞蹈家住在一栋现代化公寓楼的顶层。她的练舞室有金黄色的地板，强烈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照进来，明亮如一泓池水。虽然舞伴还没到，但她已开始在舞池里摇曳旋转，如一只鸟儿低翔于水面，如雨前的燕子般轻盈翻飞。到了房间尽头，她回转身，又一路跳着舞向我们问好。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又充满活力，似乎她的美当中携着一种激烈的冷艳。她双眸明亮，面颊绯红，她似乎并不在这里，而是正沿路奔上一座雪峰的雪檐，奔往某个冰雪仙宫。她具有她这行业所需的一切美，天生具有舞蹈家的修长双腿，其完美堪与俄国芭蕾舞演员尼任斯基媲美。到我们跟前之前，她停住舞步，指向挂在墙上的一个镀金桂冠花环。她右手指向花环，左脚跟略略往后一撤，这一造型，简直完美。我走向前去看那花环，发现是她在一次柏林舞蹈节上得的奖。"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康斯坦丁说，"她在盛大的民间舞蹈节上夺得二等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荣誉。"

我丈夫说："请告诉她，我们觉得她的裙子非常非常漂亮。这是克罗地亚

乡姑裙吗？”“噢，不是的！”康斯坦丁说，“不对，我的上帝呀，我弄错了，是乡姑裙。”他跪下身去看那裙子。裙子用白色亚麻布制成，上面绣有图案非常纯粹的红色和白色的花朵。“没错，”他说，“这是一条克罗地亚乡姑裙，不过她做了改版，融入了西方理念。她还大大减轻了裙子重量。嗯，我们会看到的。舞伴来啦。”我们注视着女孩轻移舞步，双脚好似并非实体，舞步也只是湍流上的点点印痕。她的裙子在身体周围水一样地飘动，那节奏与舞动的脚步的节奏正好相反。她面含微笑，向看不见的舞伴们伸出双手，与之分享这一荣耀而宝贵的、令人陶醉的时刻。她魔术般凭空将她的舞伴幻化得几乎真实如在眼前，那么率直而真诚，与她互相调笑嬉戏。进而又因羞涩，一切都变得那么微妙，有一片刻，所有的笑声都消失了，在空中，她通过自己高超的舞姿，编织出一则缠绵悱恻的浪漫故事。她腰身稳立如树干，头和胸部往后仰垂，犹如一枝向后开放的花朵，但因恐劲风吹摧，她出于自我防卫而笑出声来，于是，舞蹈又回复轻快的节奏。

当她停下舞步时，我们都开始鼓掌。可是等她去换衣服，前脚一走，康斯坦丁就对我说：“太糟糕了，是不是？”“是的，太令人意外了，”我说，“但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她裙子的缘故。”我丈夫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在我看来，我们刚才看到的舞蹈应该是相当优秀了，几乎没什么臆造的东西，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这让人意外。”“不，你当然不明白了，但你太太能明白，因为她曾到过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她知道一个斯拉夫女性怎样跳舞才自然。她知道，在我们这，一个女人是不能这样跳舞的。这跟我们的观念是完全违背的。一个女人决不能像男人那样跳跃，以显示她有多强壮，不能像男人那样大笑，以显示她有多开心。她另有一套规则。她四处走动时必须穿上厚重的衣服，不能是轻薄的衣服，而是厚重的，厚重的衣服，这样她们的动作会显得僵直，像一尊塑像，而且她们的表情必须专注如一，就像塑像的表情；而当她们跳舞时，她们必须身形移动却似乎脚不见动，好似一尊塑像被抬起在人面前。这种东西你无法理解，但对于我们来说却理应如此。我们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一致。”“这东西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呢，还是只是你刚才想到的呢？”我丈夫问道。“我刚刚想到这样表述的，”康斯坦丁哈哈一笑说，“但这并不与之相违，因为我像歌德一样，是一个着魔很深的人，我的思想就代表了人之天性的自我意识。不过说真的，你妻子会告诉你事实的确如此。”“是的，”我说，“他说的没错。她们拖沓脚步走来走去，形如死尸，可不知怎的看上去却很自然。”

当舞蹈家回来时，她的一身打扮更是对斯拉夫传统的严重冒犯。事实上，在达尔马提亚一个叫作莱卡的地区，那里是喀斯特地带，在光秃秃的石灰岩群山之上，繁衍生息着一群乐观而自信的山地人。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们像极了19世纪早期，迷恋拜伦的某女士收入相册的那类人物。而这女孩的装束，恰似这种女扮男装的哑剧男主角。一条连衣裙，上面紧身，下

身是燕麦色亚麻褶皱短裙，配上一个五彩的毛皮袋，头上扎着典型的莱卡地区的男式装饰头巾，戴一顶橘黄冠黑边的帽子，一绺乌黑的刘海垂挂在右侧耳朵和颈上。这打扮跟她简直是绝配。她的两条腿也堪称完美。她的舞蹈却不仅节奏非常快，而且腾挪跳跃，是十足的男式舞蹈。她跳舞的方式，就如一个女孩为了强调自己是女孩，而刻意做出一些典型的男性化行为。最后，她以踮立脚尖收尾，左手抚臀，右手食指轻触下巴，双眉挑起，一副风情模样——没什么比这更显中性美的了。

不过，舞蹈中僭越与混淆两性特征的这种行为，却并非让人极其失望的原因所在。我对这种沮丧并不陌生，在美国我曾常有这感受。有多少次，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因为所观看的有色人种舞蹈演员突然用上一个属于“白人”舞蹈的舞步或姿势。前一瞬间还在浑身乱扭、模仿性高潮模样，后一刻陡然变成洛伊·富勒式的平淡波动，或者贞洁而有力的芭蕾弹跳——这后一刻似乎比前一刻更龌龊更有失端庄。我在看到白人舞蹈演员学有色人种的舞蹈动作时，也常常体验到这样一种莫名震惊。比如“摘樱桃”这一舞蹈造型，如果是让黑人男女舞蹈者来表演，完全不会让人产生不悦的感觉——舞蹈者双脚分开站立，双膝弯曲，双臂向上伸展，同时十指做出采摘高空中看不见的累累果实的动作。可是，如果一个白人来表演这动作，就会让人感到恶心和憎恶，让人觉得这是对野蛮兽性的一种模仿。这同样的感受，这近乎文化变态的不伦不类的舞蹈所给我的感受，在初看这女孩跳舞时是不安，第二次更为严重，待到第三次时，已达到让人痛苦的程度——因为第三次时，她向我们展示了，她不仅仅会跳民间舞蹈。这是夜总会里的那种惯常的歌舞，上发条的玩偶娃娃舞蹈，是最最老掉牙的凭空想象的陈腐动作，没半点儿趣味，就如谜语“什么时候门不是门？”一样无聊。而且这是我所见过的，那种舞蹈的最无聊最让人难受的翻版。这位克罗地亚女孩是如此高贵优雅，因此她犯这样的傻，样子比那些傻瓜跳这舞蹈还要傻不知多少倍。舞蹈结尾，她奔过光彩明亮的舞池，赤裸的手臂靠在那个金色的花环上，在她脚下，倒映出破碎了的美丽倒影。“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授给我一等奖。”她笑着说。“可怜的小东西，”康斯坦丁说，“她应该像一尊塑像，你妻子会告诉你的。”

萨格勒布VI

我们登上山，去观看圣马可教堂门廊上的古老雕塑。这些沧桑的精神象征，自13世纪以来，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建。“这古老的广场是城市的心脏，”康斯坦丁说，“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的心脏，圣马可广场又是萨格勒布的心脏，而且我认为，它过去只塌陷过一次，然后屈服于鞑靼人，彻底屈服了。不过如今，他们给这广场重新命名，叫作史蒂芬·拉迪奇广场——是用克罗地亚农民党伟大领袖的名字命名的。该领袖于1928年，在贝尔格莱德议会大厦被刺杀。在克罗地亚这地方，他们说是我们塞尔维亚人干的，他们说是亚历山大国王策划的，”康斯坦丁说，他嗓门提高，几乎是在号叫，“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是被他所指责的贪污腐败的疯子、黑山代表枪杀的。黑山人是个荷马时代的民族，他们不理解现代生活；他们以为，谁要是攻击损毁你的荣誉，你就直接杀掉他，事情就是这样子。可克罗地亚人不明白这个，因为他们从不出门；他们从没想过要走出达尔马提亚。而且亚历山大国王干吗要杀拉迪奇呀？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拉迪奇被杀，克罗地亚人会气疯的，会与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联合，会来杀他。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因此，如果指责国王取消宪法，也不要忘了这一事情。亚历山大国王一直都知道自己会被杀。这也证明了你们英国自由主义者缺乏想象力，你们忘了，当一个人明白自己将被杀害时，他的政策当然会有所不同。”

下山回到城里，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喝巧克力，直到康斯坦丁说：“好吧，你们必须走了。你们千万不能让瓦勒塔久等。”因为他跟我们住同一家宾馆，而且看上去很疲惫，于是我说：“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但他不愿意。“我晚一点来。”他说。我敢肯定他是怕在宾馆休息室遇见瓦勒塔，他不敢承认瓦勒塔想见的是我们，而不是他。这位塞尔维亚人，虽然表面上很强硬，显得有些木讷，有时却又很孩子气，为克罗地亚人的冷漠感到很受伤害。我的一些法国朋友，一次在萨格勒布参加一个什么国际会议，陪同的有一位塞尔维亚人，一个中年外交官，当有人进屋来宣布，克罗地亚友好委员会将不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出席会议告别宴，这位塞尔维亚外交官突然大哭起来。这故事还有更让人伤心的地方，那就是，每个克罗地亚人都把塞尔维亚人视为会折磨自己的宪兵，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真有这事。

我们赶到宾馆时，发现瓦勒塔在等着我们，于是带他去我们房间喝梅子白兰地。我们很开心又见着他，尽管刚不久才见过他。他站在窗前，拉开窗帘，一脸厌弃地看着电线杆与我们之间斜织飘飞的雪花。“我们带给你们的这复活节太糟糕啦！”他笑道，一面举杯至唇前，笑吟吟地看着我们。

那容光焕发的神情，通常会被看成叛国者馈赠给敌人的礼物，在他身上却没任何其他含义，只是一种善意和充分的信任。他接着向我们道歉，因为午餐时自己说话太粗鲁。“我实在是忍不住，”他说，“我知道康斯坦丁是很不错的一个人，但他老护着贝尔格莱德，你们应该能理解我们的反应。我真担心因为你们只是打这国家匆匆而过，未必能看到我们克罗地亚人所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当然，自从1931年，国王向我们归还了部分宪法权利，一切都要好多了；国王死后，一切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仍十分可怕。”

“你们想象不出，”当我们端着酒杯搁在膝盖上，都围炉火坐下时，他说道，“这里的审查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可知道，那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相当于斯大林跟萧伯纳和威尔斯之间的一场三角论辩——是怎么给压制下去的吗？想想那是多么荒谬！当然啦，那也没什么，因为是从国外来的东西，也不可能被称作什么划时代的巨作，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伟大的人民却为此受到迫害。你们听说过X.Y.事件吗？他是位剧作家，也是我们当今世上真正最最伟大的作家。但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噢，我们在剧院从来看不到他的戏剧。他们根本不让他的剧作上演。这不仅影响到我们，也影响到他本人，因为他非常非常穷。他们不让他有任何机会挣钱。当一些人为他安排，请他在我们的一个大礼堂做一场讲座，所有票都卖出去了，但是警察还是在讲座开始的二十四小时前阻止了这事，其理由是，万一礼堂里发生骚乱，他们没法控制场面。想想，这是怎样的胡扯。我们克罗地亚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骚乱，但我们不会在X.Y.做讲座时制造骚乱。而且真的，我不是夸张，这一切都意味着伟大的X.Y.就要被饿死了。”

“但听一下，”我丈夫说，“是只有南斯拉夫政府才不让X.Y.说话的吗？是否有可能克罗地亚教权党也非常紧张，觉得他不应说话呢？”瓦勒塔样子好像很不自在。“没错，是有。”他说。“他们反对任何的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我丈夫追问道，“而且他们支持严格的审查制度，是吧？”“是的。”瓦勒塔说。“那么，当你们为言论自由，为新闻自由而抗争，你们克罗地亚人就不仅是在与塞尔维亚人战斗，也是在跟你们自己的教权党进行战斗吧？”“是这样，”瓦勒塔赞同说，而后又悲哀地补充道，“我们的教权党非常暴力。”他的话里有一句潜台词，这潜台词让他感到罪恶。克罗地亚教权党势力，不能简单归结说是源于上帝。这一党派与一些制造是非的组织有着很深的渊源，因为它起源于19世纪由安东·斯达切维奇领导的右翼党，而该党的前身，则是约瑟夫·弗兰克博士领导的极右翼党。这两个党派都狭隘而暴力，愚忠于自己的党派信条，极其激烈地公开仇视犹太人（同样仇视自由主义），仇视东正教（又因为所有塞尔维亚人都是东正教教徒，也同样仇视塞尔维亚人）。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也是反对奥匈帝国的一个证据，即其反叛者过于紧张焦虑的特质。似乎所有人都被施了麻醉剂，都被耗损殆尽，除非是被某种内在的烦心事所刺激，他们很少有高声说话的。曾有人提及，科苏特，这位匈牙利马扎尔爱国主义者，斯拉夫人的祸害，其本人是百分之百的斯洛伐克人，血脉里没有一丝马扎尔血统。还有斯达切维奇，如康斯坦丁在他墓前对我们所言，虽然他对塞尔维亚人恨之入骨，他的生母却是一位塞尔维亚人。还有约瑟夫·弗兰克博士，一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其本人却是犹太人。诸如此类的斯拉夫爱国者，对于憎恨其斯拉夫臣民的奥匈帝国，无疑是正中下怀。是这些人，使得奥匈帝国运用分而治之的地域法则，轻松地实现其统治。声名远扬的班库恩-赫德瓦里，以统治克罗地亚人的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当时就故意采取赋予人口占少数的塞尔维亚人特权的手段，致使克罗地亚人嫉恨他们，因此也就不会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联合起来反抗匈牙利人统治的危险了。

这一统治手段给普通百姓造成的内在影响，从20世纪初期直至战争爆发，不计其数的关乎克罗地亚人且让奥匈帝国颜面尽失的审判之某一场中，可窥一斑。这一案件就是著名的“阿格拉姆审判”——阿格拉姆即萨格勒布的奥地利名称。五十三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被指控与塞尔维亚的自由塞尔维亚人密谋，试图反抗奥匈帝国。这指控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一手烹制者就是愚蠢而冷血的劳赫男爵，以及属犹大与富歇之流的奥地利外交部长埃伦塔尔伯爵。至于证据，他们从来不必求之于奥地利人或马扎尔人。公诉方几乎公然做伪证，他们带来的二百七十个证人也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这些证人个个都巴不得宣誓做证，令他们的斯拉夫同胞的性命断送于自己所痛恨的政府之手。然而，除了宗教，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并无任何不同。

因此，一直以来，克罗地亚教权党都是依靠对塞尔维亚的仇恨作为其运作之动力的。这一仇恨，自然会创造出物质化的形式。塞尔维亚人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回击。从来没见过东正教对罗马天主教徒有任何的宽容。19世纪，爱好和平的斯拉夫爱国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斯特罗斯梅尔，曾有一次宣布有意访问塞尔维亚。结果塞尔维亚政府不得不羞愧坦承，自己不能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然而，在克罗地亚之外，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反塞尔维亚的情绪却因这一最巨大的刺激而滋生蔓延。在过去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梵蒂冈越来越倾向于教皇权力的绝对化，教会人选里意大利人也越来越占绝对优势；而且自1914年战后，它也越来越恐惧共产主义。真能期望罗马天主教会喜欢南斯拉夫吗？——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克罗地亚人跟身为天主教徒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曾有着稳固的合作关系，如今人口数量却少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而后者让人觉得其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似乎并无真正敌意，它会喜欢吗？

有两点迹象——一小一大——可以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南斯拉夫的态度。许多年来，在所有斯拉夫国家都有针对年轻斯拉夫人的体育协会，称为“索科尔体育协会”，或者“雄鹰体育协会”。这种组织机构的前身，首创于捷克斯洛伐克。在这里，男孩和女孩们将获得体育训练，并被教授以民族主义传统和爱国者的种种责任。事实上，意大利法西斯党就是模仿这些组织组建了巴利拉和前卫队。战后，罗马天主教会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同时建立起与之对抗的社团，取名叫“雄鹰社”。不过实在让人难以明白，除了削弱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国家的忠诚外，他们走这一步棋的动机何在；教会不太可能害怕“雄鹰体育协会”会干涉其成员的宗教信仰，因为捷克和克罗地亚的“雄鹰体育协会”里，占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天主教教徒。罗马天主教会亲意大利、反斯拉夫态度的另一更为重要的证据是，依照《和平条约》，斯洛文尼亚人被合并入意大利，这让斯洛文尼亚人很不开心，罗马教会却对此表现出一副铁石心肠。在欧洲，除了德国的蒂罗尔人，这六十万人是受到最不公对待的少数族群。“当他们像虫子一样涌入某个居住地，他们会扰乱一个民族群体吗？这就是居住在我们境内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与道德境况。”《意大利人》曾如是说。教皇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1929年签署的宗教协定，不曾充分保护斯拉夫少数派的宗教权益。斯洛文尼亚人不再享有在教堂采用斯洛文尼亚礼拜仪式的权利——而他们对这项权利却是高度看重的。斯拉夫人是如此热爱他们的语言，因此这一举动被看作是对斯拉夫灵魂的敌视。

因此，相信罗马天主教会会喜欢并理解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甚至期望它化解过去在他们之间累积起的人为仇恨，都是不理智的。“你不觉得吗，瓦勒塔，”我丈夫说，“贝尔格莱德政府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与教会讨价还价，在反共产主义运动中给教会以支持，条件是要求将反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分裂运动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瓦勒塔迟疑了一下。“可能是吧。”他说，一面用修长的手指玩弄着一个坐垫的流苏。“还有一件事情，”我丈夫说，“就是目前那个宗教协定[注]。”他一时没说话。1937年，南斯拉夫所有塞尔维亚地区的人都拿起武器起来反抗，因为政府与教皇庇护签署了一项协定，赋予了罗马天主教会相对于东正教会的巨大的优先权：在任何罗马天主教教徒数量较之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的城镇，所有的学校，无一例外，必须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徒母亲与东正教父亲的孩子，必须信仰罗马天主教，即使母亲为父亲教会所接纳；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士兵较之于信仰东正教的士兵，被给予极大参加宗教活动的方便，如此等等。这些条款因为太过于偏向罗马天主教教徒，政府因此极力阻挠塞尔维亚民众或外国人士得到该协定的文本文件。“没错，”瓦勒塔叹了一口气说，“这无耻的协定。在克罗地亚，我们没任何人喜欢它，你们知道的。”

“是的，我想你们克罗地亚人也不会喜欢，”我丈夫说，“可是你们的教会喜

欢。而且你不觉得，如果教会没获得某些好处作为交换条件，它绝不至于扭曲来自贝尔格莱德的那些条文？我强烈地怀疑教会曾对贝尔格莱德政府这样说，‘如果你们做出这些让步，我们就保证克罗地亚农民党绝对不会严重威胁到南斯拉夫王国的稳定。’”瓦勒塔不安地晃了晃身子。“哦，肯定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他喃喃自语道。“可还有其他什么缘由吗，贝尔格莱德政府竟然批准这样荒唐可笑的协定？”我丈夫追问道。“我想象不出来，”瓦勒塔说，“唉，我想你是对的！”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再次看着借着街灯驱散黑暗的明晃晃的白雪。

“正因为你们在此处的悲剧处境，”我丈夫说，“才使得你们克罗地亚人第一次发现你们的教会与你们的民族背道而驰，同时也发现，你们可以通过将罪责推给南斯拉夫宪法，来避免看清这一事实，可不是吗？克罗地亚人，跟其他所有斯拉夫人一样，也是一个有着民主精神、喜欢思索的民族。你们曾长久以来，生活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你们指责它干涉个人权利的一切行为。因为伟大的斯特罗斯梅尔亲克罗地亚，而他是一位主教，所以你们甚至视罗马天主教会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重量级对手，进而视之为自由的保护神。如今哈布斯堡统治者被彻底扫除，你们应该看明白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民主，一点也不喜欢探究性的思考；较之实际存在的压迫——如果这压迫是源于君主统治或极权政治——它远为害怕哪怕是最最微弱的社会革命的威胁，而且除了它自己的话语权，它对任何自由表达的需要都彻彻底底没任何体谅之心。你们应该进而正视这一艰难的任务，决定你们是否甘愿为了教会所施与你们的精神福祉，而接受它的这一偏私。可是，你们却一直在拖延这一决断，任由教会将自己对言论、新闻自由的一切压制，都归咎于贝尔格莱德。”

“有可能你是对的，”瓦勒塔一边说，一边走回来，在炉火前坐下，“在这地方，没什么是轮廓分明的。”“你们从不曾认认真真讨论过那些首要的原则吗？”我丈夫问道，“社会革命这件事，克罗地亚那些政界人物，比如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马特切克，你们是怎么看的？”“我们从没谈论过那样的事情，还为时过早。”瓦勒塔说。“但如果说他们想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他们就必须对自己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一个想法吧？”“不，”瓦勒塔回答说，“讨论这样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噢，我知道这样不对，幼稚、愚蠢，但我们民族的人的确这么觉得。”

那些克罗地亚领导者，他们总是这么觉得。桌上放着一沓纸，是我辛苦努力的结晶。我尝试了好几个星期，以弄明白那些最伟大的克罗地亚领导者，对那位被谋杀的史蒂芬·拉迪奇持什么样的意见。那些努力都白费了，除了提供了这么一个证据，即证明了斯拉夫各民族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因为拉迪奇跟托尔斯泰如出一辙。他废话连篇，一句接一句，但没人介意；他们都喜欢倾听，而且听得激情昂扬。他有个习惯，喜欢用寓言的方

式讲话，因此显得幼稚，让人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有时候，他的一场演讲会持续半天时间，而所讲实质内容却与人类经验完全相反，可他的听众爱戴他如智者、如圣人，甚至愿意为他去死。最能体现他身上的克罗地亚特点的是，他呼吁推举农民为农村代表，以对阵城镇代表。这是他自己的发明。战前，一个人如果经常光顾萨格勒布的咖啡馆和饭店，很可能遇见所有其他的克罗地亚政治人物，但拉迪奇与他差不多同样知名的兄弟安东，则严守一条规则——从不出入咖啡馆或饭店，为的是固守农民身份，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这在南斯拉夫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克罗地亚却不一样，因为这里资产阶级存在的时间太长，已与农民阶层疏离。若是在塞尔维亚或马其顿，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耐烦，因为那里最穷的农民也习惯于坐在咖啡馆。

在其追随者的脑子里，拉迪奇种下的肯定是混乱，几乎别无他物。他说话总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他已拟好计划，克罗地亚农民立马就会富裕起来。可事实上，在这世界上，没任何人，甚至是斯大林，敢声言自己有能力纠正这个极其不正常的分配方式——在所有劳动者中，粮食生产者的所得是最糟糕的。拉迪奇唯一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提议是，废除南斯拉夫的中央集权制，建立联邦制——他却不知，这一制度将令克罗地亚农民的经济地位纹丝不动。其余都是一大堆严重自相矛盾的东西。很可能，除了圣奥古斯丁，就再没人如此经常、如此激烈地自相矛盾了。

他是一位亲哈布斯堡分子，在战争爆发之际做过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号召克罗地亚人保卫他们的皇帝。直至后来的和平时期，他的这一态度仍没真正改变。而他却一直鼓吹克罗地亚人应该在南斯拉夫王国内建立一个共和国，理由是，无产阶级在共和国制度下比在君主制度下，会生活得更美好。他不仅同时是亲哈布斯堡分子和共和主义者，还与列宁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并通过苏俄取得节节胜利。虽然说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表示认同，但他又有着严格的种族理论。基于这些理论，他很瞧不起南斯拉夫南方各地区的许多民众，并强烈指责塞尔维亚人允许诸如瓦拉几亚人——巴尔干一个古老并颇受尊重的游牧民族——担任政府公职。不过，有人说他出访苏俄并非出于任何意识形态目的，而是因为跟所有斯拉夫人一样，他喜欢旅游。虽然他曾在维也纳、柏林、巴黎生活（在这些地方获取过大学学位——跟托尔斯泰如出一辙，亦不过是方从烤箱里拎出来的一个农民），并游览过伦敦和罗马，却从没去过莫斯科。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此次出访并没能帮助他给克罗地亚思想一个确切的界定——尤其是不久之后，当他成了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的一位亲密朋友，他一会儿指责国王干涉议会制度，一会儿又催促国王建立军事独裁。与此同时，在塞尔维亚人拒绝让克罗地亚人参与一切政府事务这一问题上，他还剥夺了克罗地亚人任何申诉的权利。他命令克罗地亚议员放弃

在贝尔格莱德议会的席位——而更明智的办法本应该是，让他们形成一个阻碍和讨价还价的团体。要形成对于拉迪奇的某种观感并不难，只要稍稍想象一下帕内尔（Parnell）式的爱尔兰政治人物的个人魅力就可以。帕内尔一度同时拥有以下身份：土地改革者、斯图尔特正统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共产主义支持者、雅利安种族理论鼓吹者、英国国王之亲密朋友——对这位英国国王，他随自己心情，给他推荐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他让爱尔兰成员退出圣史蒂芬教派，自己却时常出入伦敦。也难怪，拉迪奇领导的党派，甚至在他的继任者马特切克任内，也只能提出一些极其模棱两可的纲领来。

“没任何东西，”瓦勒塔说，“在这地方有任何的形态。那些我在巴黎或伦敦时看来似乎很明显的运动，到了萨格勒布这地方，就变得让人完完全全看不明白了。在这地方，除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局势，一切都不重要。这一点，我承认，从来没任何进展。”“可这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丈夫说，“因为一场运动可能一路涌到你们这里来，比如说从德国，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局势以及其他一切一扫而尽，让你们没了任何辩论的机会。”“你说得完全正确，”瓦勒塔说，“这个我清楚，我非常清楚，但我又觉得毫无办法。”当然没办法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如果其臣民受到阻碍，无法讨论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不可能因为它自身的腐朽，而带给帝国每个角落以自由。当帝国的日常规范崩溃，这些人便会感觉自己像流离失所的儿童，不得不自我照料；他们四处流浪，放任自我于本能的恐惧、敌对和激昂，直至理性挺身而出，取得支配地位。我曾来到南斯拉夫，试图弄明白历史对于血肉生命之意义。现在我终于明白，因为一个帝国的逝去，生命亦可能随波逐流；我终于明白，一个充斥着强壮男女、佳肴美酒的世界，依然可能犹似一场影子秀：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杰出的人，可能会坐在炉火旁烘烤着自己的双手，徒然地期望将并非居于肉体之中的严寒扔掉。瓦勒塔是一个态度鲜明的人。他高贵、友善、寻根问底，而非粗鄙、残忍与愚蠢。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会有那样的选择——因为他天性并不怯懦。可他必须有某种确定的东西，使他有可能待之以高贵、友善和寻根问底才行。然而，这里什么也没有。也因为如此，他坐在我们的壁炉旁的时候，才显得有点儿像幽灵。当我看着瓦勒塔又一次漫步到窗前，拉开窗帘，我在想，萨格勒布是否是一个没有实在性的城市，一如飘落的雪花般没有根底，从黑暗的虚空中坠落，跌入街灯的光影之中。这就是奥地利统治对于个体的克罗地亚人的影响。

---

1. 该协定因为塞尔维亚人的激烈反对和克罗地亚人的冷淡态度，于1938年被废止。这完全是梵蒂冈一手策划的。——作者注

萨格勒布VII

政治，老是政治。半夜时分我们的卧室门上传来一阵敲门声——因为政治。“可能是电报。”我丈夫一面说着，一面一跃而起，伸手去摸电灯开关。结果却是康斯坦丁。“我恐怕是来晚了，非常晚了。直到刚才，我都在几个咖啡馆跟那些克罗地亚人讨论南斯拉夫政治局势的问题。必须有人给他们讲讲才行，他们实在是太不明事理了。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明天将启程去贝尔格莱德，一大早就出发，比你们动身去苏夏克（Sushak）还早，因为那边已给我来电话，说我必须回去，他们需要我，因为没任何人像我一样做得好。我本想给你们留一个纸条告诉你们这事的，可还有另外的事情我必须向你们解释。我曾说过已被杀害的拉迪奇和在世的马特切克的一些不那么好的事情——你们最好把睡衣穿上，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给你们解释这事——但我希望你们明白的是，虽然他们一点也不聪明，没法明白必须有一个南斯拉夫，但他们很曾（诚）实。他们谁都不会接受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钱财。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会唾弃前往意大利和匈牙利训练营接受恐怖训练的人。这些人很不一样，我告诉你们……”

不过，我们还是天一亮就醒了。丈夫对我说：“我们还从没去看过梅斯特洛维奇的雕塑，克罗地亚伟大的爱国者斯特罗斯梅尔主教的塑像。就在这宾馆外的公共花园里，我们现在就看看去。”于是，我们在黎明穿好衣服，跟大厅里擦洗地板的女工们说了声“打扰”，然后借着昏暗的晨光，在暗黑的灌木丛与土褐色的月桂树丛中找到那位主教。即使塑像是出自一个偏好粗犷美的雕塑家之手，主教的形象也自有其夺目之俊美。梅斯特洛维奇放弃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只是简单复制出主教之美，并赋予它一层权威的面纱。他模仿米开朗琪罗雕造摩西的手法，在塑像浓密的波浪状头发间，安置了许多突起的角状形体。我很想知道梅斯特洛维奇是否见过他的模特——他很可能见过，因为斯特罗斯梅尔活了九十岁，1905年才去世。

那时，这一耀眼人物已然为克罗地亚解放事业英勇而不懈地奔走呼号，无畏地指责奥匈帝国暴政，达五十六年之久。他因为在传道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现，三十四岁时便被晋升为贾科沃主教，所辖教区包括帝国斯拉夫人居住的广阔区域，并且，他立即宣称自己是热忱的亲克罗地亚派。克罗地亚人遭受种种不公对待的表现之一，就是这一主教辖区的税敛极其繁重，尽管这里的农民贫穷与无知的严重程度，让外来者着实感到震惊甚至惊骇。他将这大量的税收都用在克罗地亚人身上，让所有人都大感惊异。匈牙利人一直试图将克罗地亚人马扎尔化，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极尽所能地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只让他们接受最初级的教育。他却资助建立起许多中学，为教士建立起多所神学院，并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教

学；他资助过许多南部斯拉夫文字工作者，其中既有克罗地亚人也有塞尔维亚人；最为重要的是，他坚决支持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使用斯拉夫语而不必用拉丁文祷告的权利。这最后一点是他们的一项古老特权。9世纪时，他们还是一个自由民族，为皈依罗马天主教，他们通过西里尔和美多德从罗马教会争取来这一权利。他还建立了萨格勒布大学。这不仅是出于教育之必需，亦是赋予克罗地亚人一个适当的社会地位。因为在奥匈帝国，跟在德国和美国一样，接受大学教育具有一种社会阶层方面的意义——与白领阶层具有同等的精神地位。克罗地亚人有了一所大学，就不会被贬斥为农民。他能够增进欧洲其他人对于克罗地亚人的亲近之情，因为他跟许多法国杰出人士是朋友，跟英国阿克顿男爵和格拉德斯通先生经常通信，并很受敬重。

在整个一生的奋争过程中，他没得到官方任何的支持。他都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教皇利奥十三世喜欢他，敬重他，但想让克罗地亚教会染上意大利色彩的教皇至上主义派却憎恶他，因为他是反对“教皇无误论”的三个人之一。在这一问题上，他与阿克顿男爵是一致的，但与更近的天主教邻居心生不和。这些人痛恨他，因为他维护斯拉夫人的权利，允许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祈祷。他们还发现他顽固得可悲。在斯拉夫传道先驱美多德千年诞辰之际，他给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发去一封表达同道友爱的问候电报，他的天主教教友们，尤其是匈牙利人，感到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对这一圣座的侮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即使远在天涯也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敞开的家门的归属感，是罗马天主教会赋予其教徒最甜蜜的福祉。但他一无所有。走出自己的教区，从那些本应是他兄弟的人那里，他得到的只有冷漠和傲慢。

奥匈帝国的迫害并不能吓倒斯特罗斯梅尔。克罗地亚人爱他太甚，而在自由的斯拉夫城邦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带有这么一群心怀不满的斯拉夫人，是不安全的。但奥匈帝国的压迫一直烦扰着他。当他前去萨格勒布为斯拉夫学院开幕剪彩，街道上四处涌动着欢呼的人群，但政府禁止任何的装饰和彩灯。他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迫使维也纳同意开办萨格勒布大学，而直到募齐所需资金的五年后，学校章程才获得批准。因为伊丽莎白的发明，匈牙利被赋予二元君主制的新地位后，在就克罗地亚人以什么条件归入匈牙利的谈判期间，斯特罗斯梅尔被放逐至法国。他因为纪念美多德而发电报给东正教，惹来了大麻烦。麻烦达到顶峰时，他被传唤至斯克拉沃尼亚，匈牙利的一个行政区。当时，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在那里出席演习活动。弗朗茨·约瑟夫借此机会，对他进行公开侮辱，尽管那时他已经七十岁高龄。这对他是一个痛苦的打击，因为他热爱奥地利，事实上他本人亦是奥地利血统，希望让克罗地亚人忠诚于奥地利，感到满意，不再反叛——尽管从克罗地亚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有这权利。他想以此保护奥匈帝国。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奥匈皇帝，叫他警惕将导致他的权力分崩离析的关

键：萨拉热窝问题。他告诉皇帝，如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对波斯尼亚统治无方，就会加重帝国内的斯拉夫人民的不满，直至任何政府都无力承受，最后哈布斯堡王朝必将崩溃。

然而，这一生涯之神奇处，不仅在于其英勇无畏，亦在于其轻松欢快。斯特罗斯梅尔是一位光明之子，不为黑暗与恐惧所惑。就其个人而言，他很像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罗密欧，身形苗条，四肢修长，头发卷曲，怀里的朱丽叶则极尽优美。欧洲名流去拜读他写下的记录性文字，发现它们也特别生动有趣。这位外国人经过一夜的旅途，抵达距离文明世界非常遥远的一个小车站。接待他的是一名年轻的教士，跟随教士的有一位仆从，据描述是“一位土匪一样的士兵，蓄着长长的八字胡，穿一套轻骑兵军装”。士兵扶他坐上一辆四轮遮篷马车，拉车的四匹马是灰色斑点的利比扎品种。这一品种的马如今在维也纳的西班牙马术学校里仍能看到。二十二英里路程，他们走了两个半小时。末了，在一个小集镇附近，他们终于抵达一处真正的宫殿。那是一座19世纪的建筑，这一点很不幸，尤其是在这些地方。有一种说法是，品位的败坏多少与民主的增长相关联。但奥匈帝国完全不赞同这一说法。在它最后的八十年里，它对于极权主义和图腾汉厅路上的梅普尔先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不过，这里有着许许多多堪与任何宫殿相称的东西：一条壮观的林荫大道，道旁是主教年轻时栽种的意大利白杨；一座非常漂亮的公园，里面的景观为主教亲自设计；许多的温室和冬景园林——一位东行而去的旅人，除非到达苏俄的大型种植园，否则从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的一路上，是再也见不着这样的景观的。

客人在敞开的窗边吃早餐。窗外邻近处有一片阿拉伯树胶林，馥郁的芬芳从窗外漫进来。早餐有产自家庭农场的无比美味的黄油和奶油，有维也纳咖啡和用从布达佩斯运来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卷。后来，他又被带去瞻视主教所建的天主教堂。教堂里，农民们自豪地穿着斯拉夫盛装，正在聆听斯拉夫语祷告。然后，他回到宫殿，又去参观画馆。画馆里的艺术作品由斯特罗斯梅尔收集，是为萨格勒布的博物馆准备的。他的坦率言辞动人心扉。他说他非常高兴，因为帝国的反对，博物馆奠基被拖延，他才有了借口将这些画留在自己家中。中午一顿大餐后，主教展出了他收集的金质和银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圣餐杯。这些十字架和圣餐杯展现出斯拉夫人的高超工艺，制造时间可追溯到10世纪至14世纪。他指出，这些物件标志着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水平。然后，主教会带着客人参观他的家庭农场，去看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自己饲养的利比扎马，看他为优化当地畜牧品种而引进的瑞士牛，以及示范性的奶牛场。他还会陪同客人去鹿苑漫步。在鹿苑的一角，有一片他从伐木工人斧子下挽救下来的巴尔干原生林，四周围着尖桩栅栏，以防止仍在这一地区肆虐的狼群进入。晚饭前，客人得到片刻的休息。主教给他送去一些评论性期刊和报纸：《泰晤士报》《两

个世界杂志》《经济学家杂志》《新诗集》，等等。

晚餐的饭菜和酒水同样美味。饭后是几个小时的交谈，在座者仪态优雅，所谈内容却让人震动。斯特罗斯梅尔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都讲得绝顶漂亮，尤其是音调优美的法语，更是让法国人的耳朵如被施了魔法。然而，他只有在讲拉丁语时，表达得最清楚。这也是他最偏爱的表达媒介。任何听他讲拉丁语的人，即使是梵蒂冈大会上的那些大学者，听见这种并不那么尘世化的语言从他嘴里吐出，竟能如此可爱，都不无惊讶。在他的言谈中，似乎满溢着早期拉丁语赞美诗那种明澈的美。早期的基督徒和他一样，受着一种激情的驱使。这种激情所具有的品质，正好打破了拉丁语这一语言的种种局限。这一激情，对于斯特罗斯梅尔而言，则是使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永远保有一颗无上宽仁之心的原因所在。当他谈起自己深爱的克罗地亚人，谈起他们事业的种种胜利，谈起自己与那些伟大人物的友情，犹似一只百灵鸟在半空中歌唱。而当他谈起自己与罗马和哈布斯堡皇室的抗争，他同样兴致勃勃，就像一位得意扬扬的运动员，在回忆自己曾参加的那些最著名的赛事。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的人们，本来是忧心忡忡地来通知他岌岌可危的处境，待打道回府之时，对他却有了不曾有过的满满的信心。

这一性格，并非我们在生活中了解到的那样。它属于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久久地悬于我们面前，恰如莫扎特的一首咏叹调萦绕于我们耳畔，绵绵不绝。基于我们人类下作的习惯——考虑到人类的状况，这一点相当必要——我们对他充满疑虑，我们想找出隐藏于鲜花下面的毒蛇。我们谁都明白，被魔法师迷惑，误将他们的魔咒认作一种承诺，会是怎样的结果。伴着这一误以为的迷人的承诺，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防备地生活了，在纵情欢笑中彼此保持慷慨与包容。可我们所有人后来发现，魔咒终究是魔咒而非承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绝对毫无意义，除了可能显示出在它们出生之前，它们母亲的肾上腺功能非常棒之外。实际上，那样的人往往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宽容，因为使他们为魔咒所迷惑的乐天性情，让他们觉得并不需要友善举动的滋养调剂，一样能过得非常快乐。他们往往很克制，避免对那样的愚蠢行为发表鄙视的意见，因为相互宽宏大量的结果对他们有着某些用处。可即便如此，当见到某种离谱的宽松状态，见到有白痴对自私自利这一有效运行机制横加干涉时，他们还是常常掩饰不住心中的鄙夷。因此，那些魔法师的自传，常常横插进来一个最让人痛苦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和残暴行径。因此我们在斯特罗斯梅尔的故事中，等候着那种黑暗的篇章出现。可是，我们没有等到这样的篇章。

似乎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于他来说，也能带来与高脚酒杯、意大利绘画、马、牛、咖啡以及鲜花这些俗世享受同样的快感。他拒斥残暴，恰似憎恶跛脚的马；拒斥背信弃义，犹如厌恶咖啡里的菊苣。在精神世界这终极与

至高的职责之下，他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却丝毫无损。这比禁欲主义者哪怕最严厉的禁欲誓言还要困难不知多少倍。他舍恨而取爱，并为这一偏向做出种种牺牲。唯一留下与他为伴的，就是克罗地亚人了。而他为了克罗地亚人，也放弃了所有其他的人。不过，当克罗地亚领导人犯下某些错误而可能导致怨毒与迫害行为时——类似的事情在这地方，在每次解放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他又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对。虽然为使克罗地亚人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甘愿失去一切，他却绝不会在斯拉夫人中间挑起任何对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的仇恨，也决不允许有人说弗朗茨·约瑟夫国王任何的坏话。同样，尽管他为宣扬罗马天主教信仰满怀热忱，不遗余力，他却绝不参与任何迫害东正教教会的行为，虽然东正教使得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互相敌对。他还给自己招来一件极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反对反犹太主义。在这地方，由于封建制度将农民绑定在土地上，从而给了犹太人垄断贸易与各种职业的机会，反犹太主义的滋生是不可避免的。三十六年来，他面带微笑，对朋友们用以喂养他们胸中那头野兽的一切言论，都毅然予以否定。他身处险境，时时都可能将自己的朋友变成敌人，尽管他珍视友谊胜过一切。从这克罗地亚的政治乱局中，在这我所描述的一路走向无尽怨恨与穷困的国土上，这可爱的人儿却能活出一番甜美与康乐的滋味来。

“这是现代历史上最美的生命之一了。”我丈夫说。我们离开了在大雨下微笑着的可爱雕像。

在火车站，我们发现老好人格雷戈里维奇和瓦勒塔在那里，等着跟我们说再见。他们肩并肩站在站台上，两个敌人，清晨的大雨滴打在他们翻起来的大衣衣领上。雨滴顺流而下，流进瓦勒塔颈中，他笑哈哈地扭动着脖子。格雷戈里维奇则只是在如注的大雨里缩着头。“啥都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不动声色地说，“就连季节也变了。”我们都明白，他是把自己对政治的失望，跟这天气联系在一起了。前一天，我们还看见他把自己的失望跟那些注定——这也本可想象得到——走向虚无、孤立无依的现象联系起来。

我们，康斯坦丁、我丈夫和我，曾去格雷戈里维奇位于大教堂背后的山丘上的小寓所，跟他一起喝茶。他那套寓所，以及他的家人，俱是契诃夫笔下那种上帝的杰作。格雷戈里维奇的妻子差不多跟他一样高，而且一样瘦削。每大约一分钟，她就要抬手摸头，动作那么惊恐，完全失去自控，以致弄乱了额头上方的头发。那些头发竖起来，如一道交缠的栅栏——此即所谓的假发，我们对此很熟悉，19世纪低等王族成员额头上就是这样的发式。最后，她总算捋顺头发，使之与自己姣好而忧郁的面庞形成一个大约六十度的角度，将头发固定好。她这样的举动本来是很滑稽的，若非铸就了一身贵族气质，若非在她很可能在刚结婚不久的那些年里便形成了这个

习惯——那时格雷戈里维奇跟瓦勒塔一样年轻，而那时的萨格勒布仍笼罩在一条匈牙利禁令之下，每次敲门都可能意味着警察上门来逮捕他，而且事实上也不止一次真是如此。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非常矮，圆滚滚的，拥有快乐无边的性格——对于格雷戈里维奇夫妇，这真是件惊人的作品，就如两位严肃的作者联手创作，最后推出来一首搞笑的五行体打油诗。我们曾听人说起过她：她想嫁给一位年轻的军官，却不能如愿，因为军队相关规定不允许他娶嫁妆少于一定数额的新娘，而格雷戈里维奇存款所在的银行发布了一道延期偿付的声明。但她特别爱笑，穿一件印有黄色小花朵的连衣裙。在这套小寓所里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一只白色的小卷毛狗，很漂亮，毛发被修剪得非常整齐，不过很老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它叫得很凶。它显然是习惯了在这样的周日下午好好睡上一觉，认为访客的到来这样的革新行为无非添乱。它气得全身发抖，密切注视着我们被领进客厅，走进那间不大的书房。书房与客厅相对，中间隔一道拱门。房间里摆满了厚重的奥地利家具，上面摆放着印花的皮坐垫和绣花的垫子，整套摆设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怀旧情调，似乎住这屋里的人远比实际上的主人要老得多。书房里，几张桌子上面满是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稿，有几千乃至上万张，肯定至少有七十五万字。格雷戈里维奇告诉我们说，这是他那部讲述自己的战争体会的作品的打印稿，不过才写了一半。可现在，他又开始怀疑，写这样一本书从道义上讲是否恰当。为找话说——因为大家都默不作声——我丈夫看着书架，发现很多书都磨损得相当严重，于是说："我想你特别喜欢自己这些书吧？"格雷戈里维奇沉思了片刻，然后说："不。"谈话再次中断。

"噢！噢！噢！"康斯坦丁指着一个地方大叫道。我们全部转过身去，看见那只卷毛狗在地毯上方便。这可怜的家伙，美梦被打碎，也只能这样表示一下抗议了。只是，不得不承认，那景象确实极为不雅，因为它剪过毛的四肢加之上身泡沫般蓬松的白色卷毛，让人不由得想起芭蕾舞演员的模样。格雷戈里维奇和他妻子满脸惊恐地跳了起来，冲上前去。小狗后腿站立，前脚搭在格雷戈里维奇的手上，呜呜地发出低声的挑衅，申诉着自己的周日下午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高大的格雷戈里维奇躬下身去，一脸斥责的严肃表情，似乎那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犯错的成年人。他妻子则拿了一根细竹条打小狗。那根细竹条是他们的女儿从门厅拿过来的，此时她脸上早已没了笑容。格雷戈里维奇那神情让我想起圣奥古斯丁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圣奥古斯丁正在对多纳图教派一位主教施刑。他说："如果你能明白我心中是多么悲伤，能明白为了拯救你我是多么忧心，你或许会为自己的灵魂感到悲怜的。"

小狗被撵到门外过道里——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地毯中央它抗议的

结果还摊在那里。我们尽可能淡化这件事情，却发现格雷戈里维奇一家人因为我们若无其事的态度而明显很受伤害。似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正好碰上他们的一个儿子醉醺醺地回家，或身上戴着克罗地亚分裂党党徽，而在这样可怕的时刻，我们却在那里嘻嘻哈哈地打闹。气氛紧张得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一直神情严肃的康斯坦丁向钢琴走了过去，俨然一副处理紧急事件的政府官员模样，开始弹奏起巴赫的一首庄严肃穆的圣歌，以表示对这一悲剧事件的认同，以及基于直觉判断，世界终会复归理性。面对面瘫坐在两张扶手椅里的格雷戈里维奇夫妇，此时手脚完全舒展，一面听着音乐，一面点了点头，表示从这乐曲中体会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安慰。不一会儿，一位上了年纪的仆人，一身农民装束，提着一把毛刷和一只簸箕进屋来。看见狗这副德行，竟然对一群上等人开这种玩笑，她笑得合不拢嘴。

在她打扫的时候，康斯坦丁开始弹奏起莫扎特的一首更沉静一些、不那么超验主义风格的奏鸣曲，一首很适合重建尘世间庄重得体气氛的乐曲；她走出房间后，他弹罢亨德尔的一个凯旋短章，从钢琴前站起身。格雷戈里维奇夫人向他鞠了一躬，似乎是感谢他绅士风度十足地、恰如其分地成功处理了一场社交灾难。而康斯坦丁呢，气度恰似海涅，欣然领受对方的鞠躬致谢。接着，格雷戈里维奇夫人开始跟我拉拉杂杂地聊起来，尤其是关于恶劣的天气，以及这样的天气对萨格勒布各种社交节日的影响。与此同时，她丈夫将我丈夫招呼到一旁去，表面上是要给他看一部装帧精美、写一位早期克罗地亚国王如何死去的书，实则声音嘶哑、气咻咻地叨叨自己也曾喂养这小狗的父亲和祖母，它们怎么也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来。“没有谁，无论是人还是兽类，像它那样。我们心中的理想形象，想想我们的理想形象都怎么啦……我们的爱国者都怎么啦……”

但在我们亲爱的瓦勒塔看来，这跟政治毫无关系。他喜欢舞文弄墨，是一位诗人。假使克罗地亚拥有和平，他将怎样回报于世界！可克罗地亚如何能实现和平呢？一些人说，如果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敢于以封建制度改造瑞士模式，和平一夜之间就可以贯彻下去。那将改变克罗地亚历史黯淡的气象，会让克罗地亚人感觉到底赢得了一次胜利，会赋予他们民族生活以适当的形式。然而这一方式却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假设克罗地亚取得独立，农民却发现自己贫困依旧，那么，一场引发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而农民中的中产阶级和保守派，也必定会想办法将自己的国家交给某个外国势力，很可能是纳粹或法西斯分子，以保证社会稳定。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也必定会因为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东正教教会而大喜过望。倘若如此，无论对于格雷戈里维奇还是瓦勒塔来说，克罗地亚都将再无宁日。他俩都是地道的斯拉夫人，谁都不可能容忍外国势力的统治——首先因为那是外来势力，其次因为那是法西斯分子。陡然间，他们在我眼里，都变得那么奇怪和天真，就如新闻片第一部分里

乘船登上马赛码头的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我拉下窗帘，以便能将他们，我的两位亲爱的朋友，看得更清楚。他们彼此敌对，却又有着联手的可能。在我看来，他们因为共同的英雄主义命运，关系远比过去要紧密。奥匈帝国遗留下来这样可怕的复杂关系，却还有人试图回到那种状态。在这样的复杂关系里，谁也不可能对，谁也不可能错，未来一片黯淡。

---

1. 西里尔和美多德（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826—869，815—885），东罗马帝国著名传教士，同时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封圣，被称为“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

达尔马提亚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苏夏克

火车驶过一个乡村，到处都是洪水，黑压压一片。再往前，已看不见乡村，只有某种抽象的病态景象。弥漫的雾气迷蒙了山野，放眼所见，唯有迷雾。然后，我们穿梭于群山之中。山里新近下了雪，地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山间树木挺立，呈现为奇特的几何图形。白色的三角形将每一枝丫的顶端与树干相连。我看见一根树枝不堪重压，折断下来，掉落在被它打散的一堆粉末之中。一道道的山谷——我曾在夏季见过，知道那里到处是嶙峋乱石，有的石头有汽车那么大——被填平如湖面，白漫漫如天鹅绒。我对此颇有几分抱怨，因为我原是想让丈夫看看前一年我曾见过的番红花。当时，那些番红花依在树下，犹如一抹抹紫色的光线；还有那从狮棕色石头缝间冒出来、鲜红耀眼的银莲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等我们到了达尔马提亚，到了海边，就好了。"可是，午后不久，越过东一道、西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光秃秃的山陵，我们所看到的亚得里亚海，却似乎比苏格兰狭长的海湾还要荒凉。天空、岛屿、海面，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瘀伤。

我还是认了吧。幸运的是，阴沉的天气并非旅途中的一切。任是怎样的天气，放在北达尔马提亚海岸，也只能使这里显得更加阴郁。如此极致的阴郁气质，竟有了一种震慑人心的奢华之感，几乎令心灵不堪重负。山陵赤裸，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在我们英国人看来只有采石场才有的景象，在这里却举目都是。秃秃的山石便是它的景致。铁轨经过这赤裸山岩，却令人再难相信它还能通向别处。似乎，很可能是绝望的人们为逃离贫瘠而追寻至此，却注定仍要死于贫瘠。事实上，这些光秃的山陵的确令人深感绝望。每当下雨，雨水形成滚滚山洪沿山坡冲刷而下，卷走山上的泥土，而非浸入地下滋养土壤。农民们尽可能从山脚下收拢泥土，再把它们重新搬回山坡上，保持在台地梯田里。可土壤并不足够，那些梯田台地也常常被山洪冲垮。

人这种生物是不称职的，正如赤裸的达尔马提亚山陵所昭示的。因为这些山峦曾经也被密林覆盖。达尔马提亚那些最早期的居民，伊利里亚人和古罗马人，在山中肆意砍伐；第一批斯拉夫定居者同样乱砍滥伐，因为他们来自树木永不匮乏的巴尔干半岛原始森林地区。然后，从1066年诺曼征服到142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匈牙利人与威尼斯人互相争夺这一海岸的控制权。两个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都没什么建树可言。最终，威尼斯共和国夺得控制权。之后，它表现出一种从来只顾自己、对待他人财产大手大脚的做派。

他们将达尔马提亚剩余的森林砍伐一空，以建造舰船、修建宫殿。他们浪

费掉的木材远比真正使用的多得多。威尼斯政府尤其低能。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因为斯拉夫人怨声载道，也缘于共和国政府对其臣民的严厉指控：极其大量的木材被下级官员偷偷拿去市场上出卖；一而再，再而三地，运送到造船厂的木材远远超过海军所需，不得不就地堆积，任其烂掉。如此大规模的伐尽砍光之后，重新种植就很难了。北风在这一地带的冬季尤其猛烈，对苗木场摧残极大。而那些农民，越贫穷越只能依赖养山羊——这种天性活泼的动物对于植树造林的重要性不甚敏感。穷困的农民有时也会偷盗，而偷小树又比偷成年大树相对容易。因此，无论南斯拉夫政府如何努力，其大陆和各岛屿仍亮闪闪如磨损严重的燧石。

裸露的山陵，呼号的年轻人，这些都是人的失职的结果，是治国无能的表现。这便是北达尔马提亚给人的最直观的印象。我们到达苏夏克不一会儿，就遇到我们在此地遇见的第一个年轻人。我们先是环绕港口漫步一圈，眼前的棕色色调港口十分漂亮。然后，我们驱车前往特尔沙（Trsat），一个位于苏夏克后面的高地上的村子，距其两三英里路程。因为当地的教堂，特尔沙每年有来客数万。

教堂本身并没什么有趣的，甚至也不好看，除了前面一片吸引人的三角形广场和广场边上的一圈七叶树。但它因一个特殊的身份而引人瞩目——据说，圣母玛利亚、耶稣和圣约翰在拿撒勒居住的圣所曾于1291年至1294年的三年零七个月里落脚此处，那时他们正在前往洛雷托的途中，而洛雷托也是如今的圣所所在地。

这一传说让我很着迷，它给“神的道路奥秘难测”一语赋予了新的意义。而一幅图画上，一座不大的房屋从空中飘过，也是一个可爱的例证，证明宗教非理性的功用，同时，也证明宗教对人的激励作用。它提出，宇宙有时会从它必要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这激发了种种最美妙的奇迹发生。那些就事论事、缺乏想象力的人一直以来常为此而不胜其悲。一位名叫尤斯塔斯的英国牧师，19世纪初曾访问洛雷托。他写道，这一传说使得他许多更为合乎常理的信仰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更不要说那圣所竟只是一个茅舍，或一间木屋，湮没于渺无人迹的森林之中，隐匿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这个国家因为十到十二个世纪以来接连的内战、外敌侵略，以及革命运动，几乎成为一片荒野”。这可不行。栖息于特尔沙的圣所所在地，实际上距离当时弗朗科潘家族所居住的城堡非常近。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人类会平白无故地撒谎。而且撒谎也是一种必需，不然那些不懂得诗何以为诗的诗人怎么能创作出作品来呢？

我们继续前进，来到弗朗科潘城堡。历史悠久的城堡相当于苏格兰古玩市场上一个摊位，城垛之内，挤满了圆形和方形的塔楼、礼拜堂、地牢，以及住宅。其间满是各种花木和爬藤——并非缘于茂盛，而是由于疏于打理。已发现的最早期砖石建筑为伊利里亚人所建，还有很多是朱利乌斯·恺

撒时代的罗马人所建。我们爬上一座罗马高塔，看见棕色的苏夏克躺在蔚蓝大海的岸边。一条深色的山谷，从城里一直往上伸延，于天际的高处将一座大山劈为两半。

我们一行共七人，一个不大的团队，探索着这座城堡：我们俩，一位中年法国人和他金黄头发、颇有女高音特质的妻子，一对度蜜月的德国夫妇——如现在德国人通常的样子，在跟外国人交往时，一副愤愤不平的痛苦表情——以及一位黝黑英俊的年轻人，达尔马提亚人，来自海岸某个较远的城镇，是来度假的。早先，他跟大家比较疏远，只偶尔在远处出现，或者我们已从圆塔下来，才看见塔边上他的身影，或看见踏着荆棘走入地牢入口的一个影子。当一个巨大的奇观呈现于我们眼前，我们彻底把他给忘了。我们看见一套建造在城堡之中的住宅，建造者是19世纪初期一位爱尔兰裔奥地利将军，名叫马歇尔·纽金特。纽金特家族有一个习俗，跟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和南部诸州早期移民一样，家人去世后，都葬在自己屋里。但其他那些流落异乡的人，都将死去的亲人葬在他们的园林里，纽金特家族则将他们的亲人安放在家里的壁龛中，高出地面，棺材竖立，前面封以大理石块。

这点让我很是不解。据我所知，唯一采取竖葬的民族是古爱尔兰人。他们头脑刻板，希望在审判日到来之时，被发现随时准备直面敌人。可是纽金特家族祖籍英格兰，直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从未见过爱尔兰是什么样子。不过，下一件更为奇特的事情让我们很快忘了这一迷惑。园丁告诉我们，和纽金特死去的亲人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陌生人。具体是怎么回事，他描述时说话太快，我们一开始没听明白。我们难以置信地重复着他的话："萧伯纳先生的姑妈？""是的，夫人。"我们仍觉得有必要再确认一下，之前是用意大利语问的，现在又分别换成法语、德语、斯洛文尼亚语问了一遍："萧伯纳先生的姑妈？"这一时刻，奥伦多夫已等了一百年。园丁每次都是点点头。而就在墓碑上，真有一个高贵血统的标记，其优雅与萧伯纳并无不相宜之处——墓碑上刻着"简·萧"。但正当我们可以弄明白她怎么会在这里时，那位黝黑的年轻人突然从我们中间冒出来，放开嗓子大叫。

他似乎在一面爬满藤蔓的墙上发现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明城堡门票为五第纳尔，但我们都被收了十第纳尔。一第纳尔约等于一便士。我猜想这情况也可能事出有因，价目表可能早就换了。但年轻人暴跳如雷。大多数人一辈子所有的怨恨加起来，也不及他这会儿心中的感受。"十个第纳尔啊！"他叫道。他是用德语说的，以便我们能听明白，能分享他的暴怒。"十第纳尔可不少呀，十第纳尔太贵了，贵得太过分啦！"他又换回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因为讲母语不存在障碍，指责起园丁来可以更加酣畅淋漓。"你简直就是奥地利人！"他朝园丁高声叫道，"你简直就是意大利

人！”狂怒席卷他全身，再从他的舌尖涌出来。很显然这一本领是一种主动练就的宝贵才艺。他被这一才艺左右，忍受不了此地严重的不公。他不得不离我们而去。他一边朝着某个看不见的人高声抗议，跳得越来越高——似乎为够上他自己冲天的叫喊声，一边冲出人群，跑出弗朗科潘家族城堡，奔向那纯洁的一家子所曾待过——似乎是短短的三年零七个月——的地方去了。

“疯子。”法国人说。“太吓人啦！”他妻子说。“野蛮！”德国夫妇说。他们错了。这一行事风格不过来源于达尔马提亚的历史：先是伊利里亚被罗马征服，然后罗马被蛮族征服；然后是三百年的匈牙利与威尼斯冲突；再然后是四百年的威尼斯压迫，其中的大部分时间，还必须与土耳其人对抗；在法国统治下充满希望的几年，很快又因为拿破仑的败落而受挫；又经一百年的奥地利乱治。身在如此混乱的境况，一个人也只有通过大喊大叫和发怒，才能求得生存。

且让我来理一理这个民族所处的困境。因为这一故事是西欧人——还包括英国人和美国人——单靠自己弄不明白的。我们且看看弗朗科潘家族是怎样的人。有人说他们祖籍意大利，与罗马弗兰吉帕尼家族有渊源。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这只是后来人的杜撰。他们是典型的达尔马提亚贵族，血统未知，很可能是当斯拉夫人因外族入侵而精疲力竭之际君临斯拉夫民族的外民族，他们自己也可能就是蛮族血统。自然，他们之所以拥有这种优势地位，并非缘于其高尚的道德或者优越的文化，而是因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坚定不移：一直以来，毫不手软地砍掉对方头颅或将对方扔出窗外或令其窒息致死。他们也因此而生活于极度恐惧的痛苦之中。他们随时可能遭遇维也纳或匈牙利的武装进攻，如果他们有偏向其中任何一方的嫌疑。他们的财产对于海盗来说，简直就是万千诱惑。他们的追随者，甚至他们自己的家人，都时时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因此为能换得一己苟安，往往不惜背叛他们的最高领主而投靠强敌。也因此，领主们谁也不敢信任。我们都很熟悉15世纪时的一位名叫伊万·弗朗科潘的伯爵，他是九个儿子中的长子——其他八个合力反对他。为了自我保护，他采用当时通行的法律途径，选定威尼斯共和国为自己的继承方。这样，即便他的兄弟或其他人想暗杀他，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可当他夺得他兄弟的两座城堡时，这才发现，他们为求自保，采用了同样的遗嘱防范手段，将匈牙利伯爵定为他们的继承方。他于是漂洋过海，逃亡至自己所有的一座叫克尔克的岛上，然后疯了。他抱定这样的想法，认为必须拥有无限的钱财，方能使自己免于灾难。他夺尽他土地上的农民的每一枚硬币。为了夺取一店半铺，他不惜谋害为逃避土耳其人而流落到他岛上的难民。惊恐的岛民将岛屿割让给威尼斯地方代表，条件是带走这可怜的疯子。

城堡四周光秃秃的山陵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四个世纪自私的掠

夺。然后是带来希望的法国人占领时期。园丁充满自豪地带领我们参观了一座整饬过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礼拜堂。礼拜堂的建造，是对旧时古典主义风格的精致模仿。这一点非常明显，一眼就看得出来建造者属于学会了欣赏管弦乐、用精致茶杯喝茶的新生文明。山墙顶端竖有一个十字架，两边坡面上坐着两尊胸部丰满的主妇像。其中一个头部被一颗愚蠢的炸弹炸掉。炸弹是邓南遮的一架飞机丢下来的，当时他正占据着苏夏克的近邻阜姆，即里耶卡。礼拜堂靠近天花板的壁缘上横书着“Mir Yunaka”。我将这句话翻译给我丈夫听，因为我很乐意展示自己在塞尔维亚语方面的精微知识，尽管常常并不十分必要。那句话的意思是：愿英雄们安息。这一礼拜堂建于法国占领期。那也是达尔马提亚和平的八年。整个历史上和平的八年。长不过如此。

1806年时，拿破仑手下仍有不少正值青春的天才，才使得他在打败奥地利后，接管了这块版图，并建立起伊利里亚高地省与伊利里亚低地省。这两个省范围包括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现在归属于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后面的斯拉夫地区。他有意组建一个文明的斯拉夫国家，这个国家将包括当时土耳其信仰基督教的各省份。这将促进东南欧的和平稳定，并使其亲近法国。他任命马尔蒙元帅为这两个伊利里亚省的省长。这一安排非常合适，因为马尔蒙尽管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假道学，却能力非凡，且颇具声望。他热爱达尔马提亚。那挚爱之情是如此深沉，以至于在他的回忆录里，当写到伊利里亚，他就像一位小男生，用了他惯有的浮泛夸耀的行文风格，文辞里满是无忧无虑的快乐。他深爱斯拉夫人。西欧人批评他们，他却袒护他们。他们并不懒惰，他气咻咻地说，他们只是太饥饿。他给他们吃的，带领他们沿亚得里亚海修建起宽阔的道路，并像公鸡一样为道路的建成大声叫好。他们也并非野蛮民族，他声称，他们只是没有学校，因此他给他们修建起了无数的学校。当他看见他们对信仰充满热诚，便又大力促成宗教机构的建立，尽管他本人觉得信仰没什么用处，还不如强化军队条令有效果。

要是马尔蒙的意志可以决定这段历史，他将终其一生，像一位慈父般关照着达尔马提亚，为它服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努力收效甚微。至1811年他辞职后，这个地区的商贸完全被毁，法庭因为贪污腐化而形同虚设，人民被税吏盘剥得只剩下骨头。民众也没有了任何形式的自由。因为，他不过是马尔蒙而已，一个善良、公正、理智的人，一个谁也不会称其为伟大的人。然而，却没任何人否认拿破仑的伟大，尽管他既不善良，也不公正，更不理智。

当今有一帮历史学者，带着近乎情欲一般的狂烈，宣称拿破仑仁慈与智慧的光芒将永远照耀。很难说，如果读过他在伊利里亚省的问题上与马尔蒙的通信，他们对拿破仑是否还会持有这样的看法。他的书信风格极其轻

浮，令人讨厌。他对马尔蒙的称呼，带着同性恋女主角挑逗的口吻。信中的内容，也于矫正此印象无任何补益。至此，除了自己的王位，他已全然将他的帝国抛到了脑后。对于自己滞留于达尔马提亚的部队，他没半点的关心；在气候极端、荒瘠的海岸，为保持士兵健康，马尔蒙坚持要求拨付的必要给养，拿破仑拒绝予以批准；马尔蒙意欲培养出一个健壮而忠诚的民族，将他们纳入文明的体系之中，拿破仑却丝毫不为所动。渐渐地，他彻底不再理睬马尔蒙的来信，他的财政部对于划拨给达尔马提亚的经费，亦是锱铢必较。最后，他重修行政省宪章，将省长职位降格为普通省级长官——除了让人感到难堪，再无其他目的。马尔蒙别无选择，只能辞职重返军队。不过，他天生就是做殖民地管理者的料，这样的天才，实属罕见。

拿破仑派去达尔马提亚接替马尔蒙的人，便是他奇怪的糟糕品行的明证。首先是伯特兰将军。这位将军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与他的皇帝一同被捕。以他对待达尔马提亚人的方式，这也是罪有应得。对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民族，一个因为必须抵御伊斯兰教，而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基督教启示的民族，他却拿浅陋的18世纪法国反教权主义的禁令来限制他们。这些神秘主义者，实际上也是成绩斐然的法理学家——尽管西欧人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对此并不了解——自古就被赋予了充分契合当地需要的法律和习俗，他却向他们强制推行一种新的法制万灵药——《拿破仑法典》。然而，伯特兰又远比他的继任者要好。阿布兰特什公爵朱诺，以其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优雅的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达到其事业的顶峰。他举办了一场政府舞会，从宏伟的大理石台阶走下来，在炫目的枝形吊灯照耀下，身上一丝不挂，语无伦次，变成了疯子。不过别急，还有奥特朗托公爵富歇：一位变节的牧师，也是法国大革命最无情的屠夫之一。在他担任警务部长期间，他是所有叛徒中最无耻的一位，除了犹大，再没第二人可比。他憎恨拿破仑，却又热爱他；他从不曾忠诚于拿破仑，却又终究没胆量背叛他。这其中有着某种令人恶心的精神上的卖弄风骚，有着某种腐烂流脓的爱恋。因为他的主子那时已被打败，富歇到达尔马提亚上任，只是出于一种忠诚的发酵作用，实际上也是被激起了一种高尚的勇气。在这遥远的国度，正当拿破仑的未来之梦被西欧击碎，富歇白日里整天扮演着安全长官的职分，走过场混日子；夜里则没命地筹备着撤退计划。“一步一步地——这样，才不致造成损失——”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他撤退至威尼斯，从短命的伊利里亚，毫发无损或几近毫发无损地，带走所有的行政官员、资金，以及大部分有价值的物品。”的确了不起。不过，从一个为保护西欧不受土耳其入侵而使自己穷困如丐帮的饥饿国家将“资金，以及大部分有价值的物品”撤走，无论从什么样的会计意义上来说，都算不得诚实。

除非这个世界最终摈弃它那恶劣习性，代之以仁慈、公正与真实，否则我

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那位年轻人要一边跑一边大叫，似乎要气疯掉。

塞尼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非同一般地早，以便在登上我们那艘小汽轮之前，可以越过从苏夏克流往阜姆的河上的那座桥，过去瞧瞧。我们发现一座梦一般的小城，让人头痛似裂的那种梦。它最初的模样，滚圆、坚实，因为阳光照晒而显得黝黑，与任何南方的浮夸港口并无二致。但是，因为种种合约，这座城市已被蹂躏得有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构造。一张平面图上，本来理性的建筑师为理性的人们将街道房屋规划得整整齐齐，却蠢不可及地硬生生挤进来另一组建筑，在街中间竖起一道道高墙。原本毗邻的人家要见面，不仅得绕道而行，还要办理各种手续，因此得花上半个小时。更有一些地方，压根儿不是什么前线，比如某个广场中央，或是贯通码头各部分的一座桥上，身穿制服的人员一步跨上前来，厉声要求出示护照，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就如因为良心不安，睡梦里突然冒出来的人物一样。

“这对许多人来说，”当我们在这障碍重重的城市里游荡时，我丈夫说，“也就意味着无尽的灾难。”事实的确如此。因此，很多的老人都对他们的儿子说：“我们给毁了。”很多的律师对寡妇说：“恐怕什么也没有了，一切都没了。”所有这一切的不幸，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英国人的无能。1915年协约国与意大利签订的《伦敦条约》，意在贿赂意大利人，引诱他们在战争中加入协约国一方。除了亚得里亚海上一座岛屿，条约允诺将原属奥匈帝国的整个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和所有岛屿划归意大利。条约由奥克斯福德男爵和格雷男爵起草。这在他们，以及外交部其他官员，都是一种极大的羞耻。因为，该条约给这片领土上的斯拉夫栖息者套上了一个外来的新枷锁，而他们本来是一直希望起来反抗同盟国，支持协约国的。而且，意大利人占领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对塞尔维亚的安全也造成威胁——而在所有协约国中，塞尔维亚做出的牺牲是最大的。这些理由足以说明意大利人不应该占有达尔马提亚，反之则找不出任何理由，因为这里的意大利人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幸而《伦敦条约》在凡尔赛被宣告无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劳合·乔治首相和威尔逊总统。然而，这条约已然产生影响。它给了意大利无度的贪婪以暗示，已开启了这个国家哄骗、强求与掠夺的节奏。于是，它声称阜姆属于意大利，理由是那里的居民是意大利人，并在城里进行人口普查以证明此说辞——在普查中将其人口占总数的25%的一个城区排除在外。欧洲其他国家对于这一稀奇的证据的主张，使意大利政府很受打击。但那之后，邓南遮冒险将其志愿军派遣至阜姆。这一举措之冒失、暴力与劳而无功，恰似他那些糟糕透顶的文学作品。此举给该地带来严重的混乱，并引

致流血。他最后被迫放弃，然而敲诈勒索的要求已经提出，南斯拉夫不得不拿领土来换取和平。1920年，南斯拉夫将达尔马提亚首府扎拉、三座达尔马提亚岛屿，以及的里雅斯特背后的内陆腹地让给意大利，并就阜姆达成协议——这些协议，最终造就了这座港口城市今天的模样。

这段历史，每当一位女性默想起来，都愤然难平。当我听闻一个国家的人们，因其对一位完全秃顶的女作家的狂热，不惜将这个国家掀个底朝天，甚至走向战争的边缘时，我愿意相信，女权主义的战争已然结束，女性已拥有了跟男性同等的地位。多年前在佛罗伦萨，当看到邓南遮赋予男性的独有特权，我还曾感到无比惊讶。俯身于朗阿诺宾馆阳台上，我曾看见下面一队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喇叭齐鸣，旗帜飘扬，鲜花挥动，人声鼎沸；脚下更远处，一枚蛋映射着5月的太阳灿烂的光芒。这里，在阜姆，一位秃头的男作家，被放任毁灭一座城市；一位秃头的女作家，却不会获允建造一座城市。我怒气冲冲地登上小汽轮。汽轮载着我们和另外二十位乘客，以及它所能容纳的牛和羊，向南朝拉布岛驶去。我们就这样启程，摇摇晃晃地激起冷冰冰的浪花。

光秃秃的山陵白惨惨的，如剔尽的骨头。我睡着了，因为六点就起了床。不一会儿，丈夫摇晃我的肩膀，把我摇醒，说："你必须上甲板来。到塞尼了。"我随他上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港口。这港口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很多港口没什么区别：在码头的周围，鳞次栉比的高耸房屋沐浴着温暖的色调；两三座钟楼沿一座山挣扎而上，直奔一座废弃的城堡；攀爬而上的人群被包裹在一道道城墙之中。我哀叹了一声，记起来这些攀爬的人群不仅证明了人力之不济，更证明了人与野兽无异。我还记起，在此地，那些强国因为自己的富足而嘲笑别国之不幸，既无感恩之心，亦无慈悲之怀。

塞尼是克罗地亚乌斯科克游击队的故乡。他们并非爱德华·利尔[注]所斥为的野兽。他们只是些难民。他们跟被希特勒驱赶而逃走的犹太人、罗马天主教教徒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是难民。他们发现——正如那些人之所为——当一扇门向他们关闭，其他本应为他们敞开的门也突然间紧闭起来。他们从自己的家园被赶走，被基督教世界弃绝，被道德的世界抛弃，被赶进一个受到诅咒的微型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罪恶。他们原本都是些品性无可指责的斯拉夫人。在土耳其人横扫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之时，他们逃离家园，组建起一支奇特的家庭部队，由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并在多年里展开过许多次卓有成效的后卫战斗。最后，他们在通往达尔马提亚山区的关隘处驻扎下来，身后是宏伟的斯普利特港。在1532年之后的五年时间里，他们单枪匹马，阻击了土耳其人的进攻。然后，非常突然地，他们的基督教邻居让他们放弃这一据点。威尼斯刚跟土耳其签订了一项条约，与土耳其的友谊比基督教历史学者乐意记住的要亲密得多。它说服奥地利：将这一关隘作为缓兵之计让给土耳其，是明智之举。

然后，这些功勋卓著的乌斯科克游击队员从山上来到海岸边，在塞尼这座小城定居下来。直至那时，他们仍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与决心。而现在，他们又展现出他们天才的本领。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靠近阿尔巴尼亚的达尔马提亚南部海岸，大多数则来自内陆。无论如何，他们之中海军军官非常少。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确立起自己作为强大海军势力的地位。

这并非单是因为野蛮，或他们选择铤而走险。乌斯科克游击战士简直是造船天才。他们设计出符合达尔马提亚海岸特殊要求的特别船只。这种船跟古代伊利里亚人借以令罗马舰队不堪其扰的船只很相似：两者都是可以在狭窄海湾航行的轻便小船，没有停泊港口时，可以直接拖上岸来。同时，他们还发展出高超的航海技术，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塞尼的环境。这里，大陆与克尔克岛之间的海峡宽达十英里左右，北风可长驱直入，然后在岛尾与通向大洋的另一海峡相交，因此这里的浪涛比沿岸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汹涌。我们进入塞尼时，见到的就是这般情形：一股巨浪，比我们所曾见过的任何海浪都要巨大，直接拍向码头。乌斯科克游击队发明了一种方法，利用这里恶劣的天气作为屏障，抵御外敌的入侵。而他们自己，则可在巨浪中穿梭而毫发无损。因此，他们在亚得里亚海上，将土耳其的船舰追逐得上下逃窜，或施以抢劫，或将它们击沉。年复一年，他们越来越精于这一游戏。如果考虑到他们最多不过两千人，这一成就实在令人惊叹。要是威尼斯舰队的水手有乌斯科克游击队那份能耐，土耳其人在16世纪中期就能被赶出欧洲水域，也就是，被赶出欧洲。

然而，威尼斯正日渐衰落——主要是精神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其悲剧之根源在于治国无方、在政治上举棋不定，而并非真的欠缺什么物质资源。

它试图以其他方式抚慰土耳其——停止对其进行海上攻击。在乌斯科克游击队看来，这些基督教大国的妥协退让，不啻他们背信弃义的最后宣言。乌斯科克游击队中，所有中年及更年长的人都还记忆犹新，他们是如何残忍地被土耳其人从自己的家园赶出来的。他们一直相信，侵扰打击土耳其人，不仅是对其罪恶的惩罚，亦是为上帝和圣子服务。他们曾因为自己的劳作，而得到教会的祈福。格雷戈里十三世甚至曾给他们一大笔补贴。可如今，他们却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不为其他罪愆，只因他们攻击了它的敌人。他们不仅精神上遭受背叛，肉体上同样遭到背叛。他们将怎样生活？在此之前，他们都是靠打劫土耳其的船只自己养活自己，手段也非常合法——既然他们被土耳其人夺去了他们的家园。可如今，这一切都没了。那些基督教大国也没有任何建议。当时，和现在一样，一个难民的境况，必然激起他想办法使自己不至于饿死的意识。乌斯科克游击队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公然对抗威尼斯和奥地利，将他们的船只和土耳其的船只一并打劫。

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厘清乌斯科克游击队的故事，并非对他们的奉承。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严守战争的法度与规矩，从来只攻击土耳其的船只。直到1566年，才第一次有乌斯科克游击队攻击基督教国家船只的记载。那之后，不用说，故事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成了海上匪徒。他们养成了持枪歹徒所具有的一切性格：绝对忠诚直至牙缝、无可比拟的勇气、野蛮残忍、贪婪，而且极为奇怪的是，他们也非常铺张浪费。正如一位芝加哥骗子，多年里挣得五位数的收入，却一分钱也不会留给他寡居的妻子，乌斯科克游击队的人也是如此。大海为他们带来极尽丰富的财物供他们肆意掠取，但他们倘若有幸能活至晚年，常常陷入赤贫。此外，正如在偷盗者身上会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也被其他人，被那些诚实、正直的人掠夺。据说，他们会贿赂奥地利那些最高长官，甚至包括中央政府所在地格拉茨的官员。还有人说，一位犹太商人可能会认出来某位高贵的太太胸前所戴的珠宝，是他在亚得里亚海上亲眼看见一位劫匪伸手从别人身上夺去的。据称，正是因为这种交易的存在，奥地利人在乌斯科克游击队变身海盗后，才会对他们放任自流。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威尼斯官员时常从乌斯科克手中购买战利品，然后拿去威尼斯市场谋取利润。

短短一段时间里，这些人心中的道德冲突就得以平息。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都会有游览活动，费用由塞尼港全体人员予以资助。每个人，包括政府官员、士兵、私人家庭、教士僧侣，都自己出一部分钱，然后从战利品中抽取相应比例份额的资助。教会接受了它缴纳的什一税。如果谋杀不曾是那样的游览活动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如果暴行不曾像夏天的森林大火从一棵树蔓延至另一棵树那样，从一颗心传递至另一颗心，整件事情几乎可以是有趣的。乌斯科克游击队后来的一些战绩让人反胃：他们会手刃活生生的敌人，剖腹掏心，并将敌人的心脏吃掉。如此的罪恶行为不仅让他们自己丧失了灵魂，也作践了整个斯拉夫民族的道德水平，因为达尔马提亚农民因知晓乌斯科克游击队的来历而不便指责他们。道德的败坏有如传染病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欧洲所有的恶棍都听闻，在亚得里亚海上为非作歹会有好果子吃。于是，那些胆大的都急匆匆地赶来塞尼。这证实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那么健康，因为这些人当中有的尚属于富有阶层。1618年，一群乌斯科克游击队成员在威尼斯被绞死，其中九个人是英国人。而这九人中，五个人属于纹章学意义上的绅士，还有一位来自大英帝国一个最高贵的家族。

有时候，历史与臭鼬气味之间的区别很难分辨。威尼斯与奥地利双方都用这些人的堕落作为他们欺骗游戏中额外的王牌。奥地利人假装要镇压他们，实则巴不得他们去侵扰威尼斯。威尼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换取与土耳其的友谊。可那种友谊却不过是装模作样，它不曾真正为那些土耳其船只感到过伤心。同时，它也乐意有一条合法的途径，用以发泄自己对奥地利的不满。双方的虚情假意的明证，是他们都拒绝应允乌斯科克游击队的要

求——这一要求，五十年来被不间断地提出来，即让他们移居到内陆，给他们一个维持生计的办法，或者耕作土地，或者行军打仗。一次又一次地，这些不幸的人们解释说，他们除了做海盗，别无谋生之途。他们解释说，一旦他们得到任何其他获取食物之道，他们就立即放弃这一行当。然而，尽管威尼斯和奥地利，一个仍非常富足，另一个也正一天比一天富有，却就每一条款讨价还价，最后不了了之。一次，一项计划被提出来：卖掉塞尼周围当年尚在的松树林和山毛榉树林，以此收入在奥地利边境修建城堡，供乌斯科克游击队的人居住。这一计划最后落空，原因是双方都不同意先期支付一笔大约五十英镑的款项。与此同时，乌斯科克游击队被禁止前往任何准备好地块、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他们亦被严令禁止服役于外国军队。他们有如被列强关在一所监狱，身在其间，除了做海盗，别无选择。而这些强国，却装出一副恐惧他们的罪恶的样子。

最后，他们的问题在奥地利与威尼斯之间一场怪异的战争中得以解决。在此次战争中，乌斯科克被几个想要打仗的人拿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场几乎毫无缘由，亦无任何结果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也必定给悲惨的达尔马提亚农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不过，幸运的是，因为战争被认为是因乌斯科克游击队而起，故而《和平条约》也必须处理他们的问题。无数的人被绞死和砍头，其余的人，按照他们自己五十年来的诉求，被迁往了内陆。不过，转运他们的方式显然很不友善。也没有为他们修建的坚固的城堡，或充满希望的村庄，因为没人知道他们确切的行踪。有人说，在奥地利最南端的阿尔卑斯山上发现了他们的后代；又有人觉得，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见过他们。人们担心他们的种子散落在了乱石嶙峋的地面上。这确实让人难过，因为那样的种子太宝贵了。

我们来到下面的小餐厅，吃了一顿简单、粗材质、味道很不错的午餐。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年轻人，相貌英俊，满脸怒气，跟我们在特尔沙遇到的那位，为十第纳尔而大喊着向他的上帝申诉的年轻人非常相像。事实上，他们的确属于同一类人。因为盘子刚端上来，这位年轻人便怒不可遏地一把将盘子推开。“这汤冷啦！”他叫道，浓密的眉毛直成一条线，“这汤冷得跟海水似的！”可他并不是冲着汤在叫喊，而是冲着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奥地利人、法国人、塞尔维亚人（如果他是克罗地亚人），或克罗地亚人（如果他是塞尔维亚人）。我因此而对他充满敬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自始以来，那些巨人们相互勾结，骗走了他的民族所有的财物。他的先辈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因为他们有勇气叫喊，有勇气拒绝冷汤，拒绝死亡，拒绝成为海盗的命运，拒绝被放逐至遥远的山坡上。

---

1. 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 1812—1888），英国谐趣诗（nonsense poems）诗人。

拉布

大海一片绿色，坚硬如玻璃。重重浪峰就像一道道骑兵障碍，矗立于我们与天际纯净的、映着淡淡绿光的深铜色岛屿之间。我们的目的地是拉布岛。它就躺在我们前方，岛上的山坡跟克尔克的一样光秃，海岸上则翠绿如春。当我们靠得更近，我丈夫说："只是些灌木，没错，低矮的树木和灌木丛。"但一小会儿后，他又叫道："只有灌木，真的！不信你闻！呵呵，我先前听说过，但一直不敢肯定。"仍有一段距离，差不多半英里远，但桃金娘、迷迭香和百里香浓郁的芳香如阳光一般，让人身心舒畅。穿过可爱的云雾，我们慢慢驶进拉布港。抬眼间，一座世界上最为美丽的城市闯进视线。城市很小，可以一眼看见它的全貌，似乎它只是一栋建筑。那景象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快意。想象一下那种感觉：你发现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盈耳的是从不停歇的乐章，你每走几步，乐章便会不同，却总那么精致。在拉布，与之相媲美的还有视觉上的精致。城市沿山脊而建，从山脊上可鸟瞰下面的港口。房屋用石材砌成，有时呈银白色，有时在盛午和日落时分，呈玫红色和金黄色，在荫翳处，则有时呈蓝色和淡紫色，而无论呈现何种色调，因为其白色的底色，便总显得那么温雅，恰到好处。城市里四座钟楼高耸，间距不一地沿山脊而立。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这些钟楼相互间，以及钟楼与城市的整体格局之间，都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和谐。我们坐在岸上一棵松树下吃橘子，城市就卧于我们面前，仿佛在向我们诉说。这种诉说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并非由文字构成。然后，我们脱掉衣服，游出五十码，踏水停下来，因为这座小城又化作另一句可爱的话语。从分隔它与邻近岛屿的每一码海峡，从蜿蜒游弋于内陆农庄与橄榄树梯田直至岛屿中央光秃的山地间的每一码道路，都可以看出来，这城市化成了一串无穷无尽的妙言丽句。然而，这一切精妙的语句又是以最简单的形式予以提示的：一个灰色的、与地面齐平的长方形，四个较小的长方形垂直矗立其上。欧几里得的语言也不曾比这更简单。

这座岛屿位于野蛮的弗朗科潘家族居所的视野之内，地处被土耳其人与乌斯科克游击队的令人憎恶的行动污染的海域。因此，当看到拉布这不曾遭到任何搅扰的美，看到这片光秃之地竟然有着如此优雅、似经过精心打造的艺术之美，实在让人感到惊讶。虽然拉布岛的面积与许多村子的大小差不多，它却是一座城市、一个文化中心，是一片由人们——当他们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得到保障以后——用他们的双手和头脑造就的梦幻之境。港口边有一座气势宏伟的白色广场，广场的露台由三只互相累叠的狮子支撑，每一只都那么器宇轩昂。狮面大小恰到好处，其巨大足以让你过目难忘，却又不至于大到与近旁的物体极不相称。从广场这里，一条条街道或直通城市的山脊，或绕山基而行。放眼皆是的门廊、窗户和圆柱，使每一

条通道都似通向某一私密圣境。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石头如蕨叶般生长于壁柱上方，被饰以花朵，形成一个盾形纹章状的花环。盾形花环的上沿，又装饰着精致的麦穗图案。另有一户人家的门，开向一个隐世的花园。门前小路的上方，是几个丘比特，手握从一套盾牌和盔甲里垂落下来的月桂绳。盾牌与盔甲上是一只沉思的鹰。其中一个丘比特将手中的月桂绳向前递出。这一姿势，表达了文艺复兴的宏愿："愿一切的王国，权力与荣耀归于人类。"所有拉布人的家门口都开始感知到五个世纪的厚重。首先，那些柱子开始歪斜；其次，一块石头已掉落下来，留下一道裂缝，一朵花从那缝隙里探出一颗鲜红的脑袋来。然而，这番不染纤尘的凋敝，即使放在一位伟大帝王居住的宫殿里，他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

拉布大教堂也有着同样的私家气派。山脊上有一个不大的广场，边缘凸崖参差，外面是垂直而下的悬崖，直抵脚底下的海岸。让视线穿过如士兵般挺拔的芦荟花和刀剑般的芦荟叶片，可以直接看到大海和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大教堂就建在这地方，玫红色大理石与汉白玉交织，作为装饰的假拱门有着可爱的弧度。它跟很多私属小教堂差不多大小，并透出一种不知陌生人为何物的性情。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教堂之外，是恐惧，是海盗，是土耳其人；教堂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它又被海岛小城这一社区围在其中。因为相信只有熟识的人才会来访，所以他们的房屋设计都带有一种雍容与信任的气氛。也因此，这座大教堂同时具有了居家的亲切感与优雅的气质。在精神上，它具有威尼斯的风格，但这并不是说它真出自威尼斯人之手：我们英国诺曼式的和哥特式的教堂来源于法国，却并非由法国人建造。这座教堂让人记起来威尼斯画家卡拉瓦乔与贝利尼画作中骨白色的建筑底色，记起来那微妙的框架结构世界——虔诚却又充满戏谑的趣味，繁复华美却又显露出单纯的气息。教堂的内部设计可能出自一位面具制造商之手。他心怀无限敬意，视大弥撒为最精妙的面具。唱诗台高踞观看者之上。六大跨步之上是唱诗班所在位置，上面气势庄严的一排排牧师专座表明，坐在这些位子上的都是某位伟大神主的仆人。另有一段楼梯通往祭坛，祭坛上罩着一个高高的圣体伞，显得气势恢宏。

这是旧时教堂格局的一部分，建造于一千年前的斯拉夫独立时期，是想象力所及的最为优美的建筑格局之一种。六根精细材质的云母大理石支柱，顶上的华盖由一整块巨大的岩石雕琢而成，但因设计精巧、安放得当而看上去轻如烛台。教堂的六道拱门花环环绕。这些花环雕刻之精致，胜过下面城里贵族门口的徽章标志。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教堂是贵族官邸中的贵族官邸。层层叠叠的伞盖均涂成柔和的红色，上面的穹顶是柔和的蓝色，其色调之优雅，恰似晚近时期出自画家保罗·韦罗内塞手下的威尼斯庆典画。修建这座大教堂的人文明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竟会觉得，一位神主并不因其崇拜者捶胸顿足的哀号而高兴，而是因为他们的开心而快乐，因为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自制与尊严而喜悦。一度，拉布岛每年都要

向威尼斯总督缴纳十磅丝绸的贡赋。而通过这一建筑，它向总督中的总督缴纳了一份丝绸般优雅的贡赋。

到了正午时分，有人前来关闭大教堂。我们从教堂出来，明晃晃的阳光正从雷雨云的缝隙透下来，照得我们睁不开眼。一群妇女微笑着用意大利语跟我们打招呼，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们并非意大利人，因为她们说话完全没有拉丁语那个味儿。她们脸上颧骨低平，线条分明，毫无矫饰之感，是典型的斯拉夫族的标记。她们身体直挺挺的。但她们的民族并不凶狠野蛮，不曾将比他们更温和的人们，因其过分的温和而从他们的家园赶走。正是这些人，而非任何其他人，造就了拉布岛。在大教堂门口的上方，建造者雕刻了一幅圣母哀子图，图中圣母玛利亚抱着死去基督的尸体。她看上去跟这些妇女一个模样。她脊背僵直地坐着，下巴仰起，怀里抱着死去的基督，他真的死了——如若没死，何以使人们如此激动？——如一只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羊，如一只被剥皮的羔羊，像婴儿一般被她们当中的一位妇女抱在怀中。这位圣母玛利亚哀伤的神情里无一丝做作，而她的儿子也是那样真切地死去了。在这里，悲剧以其本来的意义得到最充分的接受；对于生命本质的承认没有遭遇任何排斥与拒绝；画中也没有任何以悲苦为甜蜜的装模作样。当一个人面临危险，万不可像绵羊一样将羊毛拉下来遮住眼睛自欺欺人，因为刀剑果真落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除非他对生命自有一番认识，对死亡不屑一顾。

我们头顶的一只钟突然敲响报时，我被吓了一跳。那些妇女放声大笑，脸上泛着些睡意。正午的热浪涌入这座城市，她们似乎也难抵这热浪带来的困意。是圣克里斯多福钟楼发出的声音。这座钟楼是拉布岛四座钟楼中最漂亮的。据说，这只大钟——旧时关于许多钟也有这样的传言——建造的时候，市民们来到铸造厂，将他们的金银首饰丢进熔炉。自然，建造出来的钟因为这些金属声音变得柔和，如一只年长、伟大而智慧的鸽子的鸣叫。我丈夫靠在一座宫殿的墙上，抬头望着那座钟楼说："瞧瞧那玩意儿，它是按欧几里得的方子配制的：总共四层，最底层是入口，往上一层墙上开两扇窗，每扇窗户中间用一根柱子分开。再上一层也是两扇窗，每扇窗户用两根柱子分开。最上面一层一扇窗，中间用三根柱子分开。再上面是有十七根立柱的一排栏杆，每数到第五根粗一圈。再往上是塔尖。七百年前建这钟楼的那人怎么会知道，这样简朴的造型之于我的眼睛，跟报喜钟的乐音之于我的耳朵，会有同样的效果呢？他肯定非同一般地狡黠，才会用石头做出这一有关音符般流动的世界的承诺，才会建造出这样一个充满启示的几何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任何的转角。"

这之外的乡野，在拉布城的周围，再看不到任何启示，只有神秘。这种神秘亦是寓于石头之中的，却非经过加工的石头；它寓于达尔马提亚那可怕的光秃秃的山石，寓于那些以化作飞尘为目的的浅薄、稀松的可怕土壤之

中，寓于那里人们那可怕的、每个人都似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般的脸上。那里到处都是台地。在光秃的高山上，是种植橄榄的台地；山谷中是种植橄榄的台地；在山谷的深沟里，也是石墙围砌起来的田地，里面是抽芽的普通作物或野草，其茂盛之异常，给人的感觉好似滔滔洪水。在这些围砌起来的土地上，黑色的身影在拼命地劳作。灰色天空反射下来的如注的光线下，每一块台地，每一片田土，都似一个舞台。在这些舞台上，那些黑色的身影在表演着他们各自特有的劳作、绝望、痛苦的舞剧。当我们从石堤上走过，那些妇女从劳作中抬起头来看我们，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了人间所曾有过的悲苦。她们的身旁，小羊羔天真快乐地蹦跳着。还有成年的山羊，也蹦蹦跳跳的，只是不再天真。它们脚下的仙客来泛着淡紫色的光晕。这些动物和花草似乎很幸运，因为它们不是人类，而那些人类，刚刚从一场瘟疫的利口边逃过。从橄榄台地上，那些男人低头往下看。他们的脸因为浑身使着劲儿而紧绷。那些在他们站立处下方的橄榄树，虽然夏季的干旱和冬季含盐的飓风将它们拧弯如开塞钻模样，相比较而言，却也算是幸运的了。有时在这些堤道上会遇到向我们行乞的人。他们并不显得卑微、低贱，他们只是饥饿。他们干瘦的双手从身前直直地伸出来。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亟须救济，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提出这样的要求。看得出来，他们是这里最贫穷的生物——最穷的农民。他们无钱为自己缝制一件农民服，以向人们展示他们村的人亦有技能、有品位、有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清一色地穿着黑色的破烂衣服。

在这农村地区，岛民都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距离城门半小时路程之外，我们发现这里的农民只会讲几个意大利语词汇。这些都是事实。这些瘦瘠的斯拉夫人，无依无靠。在他们脸上，有着那种斯拉夫人特有的神情——他们直觉里都很清楚自己当前处境的对立面是什么模样。因此，当事不遂愿，那样的意识会让他们感到更加难受。穷人凹陷的目光背后闪烁着财富的图景，病人深知健康的滋味，不幸者哀泣时，他们的鼻孔里翕动着幸福的气息。我们发现，身负这种不熟悉的悲苦，使得他们具有了某种统一性。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因为他们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于不同的地势而生存——虽然这样的地势差异并不一定太明显。在此处，相距几百码的范围内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地势差异。我们第一次踏上这座岛屿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沿一条石堤而行。这条堤道从一片山脉光秃的低坡上穿过，山脉尽头是一个河口。一路上，在地里劳作的人向我们讨要东西。他们身体瘦削，动作迟缓，那样的不幸刺目得让人不敢直视。然后，我们来到河口上的一个有着坚实土地的村子。这里可以同时享有大海带来的财富和河口肥沃土壤带来的富足，因此这里的人们要胖一些，也更有活力。

就这样，我们一路过来，经历了富有、贫穷、富有、贫穷。不觉间，我们来到一个内陆海湾的岸边，一面高耸的悬崖矗立面前，没有任何道路可以

绕得过去。我们碰见一位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的老人，坐在几块大石头旁的一棵松树下，在一小片深入港口的海岬上，看护着一些山羊。他对我们的困境很关心，似乎觉得自己是我们的主人。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竟会向我们讨要东西。正当这时，一位年轻渔人驾着一艘划艇过来，载我们渡过这片水域，送我们到了海湾对面的村子。此时太阳初落，水面上荡漾着七彩的粼粼波光。年轻人只收取了渡船费，不愿再接受基于任何其他理由的钱。

可我们上岸后，走了大约半英里，再次踏上了大风横扫的光秃秃的土地。我们遇见一位老人，跟海岬上那个老人很相像，如两颗豌豆，难分彼此。他行乞时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且看起来很可怜。他从路边杂生的灌木丛中采了一些花，立在黄昏里，希望能碰上有游客从这里路过。这样的机会可说少之又少，因为来岛上的游客都是中年德国人，而他们从来不会走出城区半英里。整个这片区域都非常穷。我们遇见一些衣衫褴褛、毫无生气的男女，在黄昏里匆匆地赶路。他们表情木然，因为饥饿而步履沉重。然而，突然间，人性中那种欢快、可爱、充满幻想的光辉出现在我们眼前。它让人在生活的重压下跳起来挣脱束缚，于看似没有选择的境况下，展示出选择的决心；让人于赤贫之境，仍敢于拥有自己的好恶，敢于喜欢亮丽的色彩。我们遇到一群人，横在堤道中间，站在一名年轻人前面，沉浸在欢乐之中。那名年轻人在展示他身上的那套新衣服。这些人尽情地仔细打量着他的新衣服，用手指轻轻捻着，嘴里发出惊叹的声音。因为这衣服虽然只是传统的西式服装样式，却是用宝石绿的平绒裁剪而成。在此黄昏时刻，各种色彩融化又凝聚，花园里的花儿看起来颜色更加纯净，亦更加光艳照人。那身西服就像一团绿色的火焰，紧紧围绕着它的那些黑色身影，幻化为某种非实体的存在，却又带着无比的快乐。

到第二天，海岛之贫穷更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第一站是岛屿北部。这个地区因为高地的保护，或多或少地避免了受到北风的侵袭。但这个时候，我们正往南面去。那一带没什么能阻挡横扫拉布岛与邻近一座岛屿间的海峡的狂风。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都冷酷而绝望。这里大部分房屋都非常大，有的几乎和城堡一般大小。这里的土地所有制传统，使得一大家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很方便，即便是关系很远的堂表兄弟姐妹。在一座极其穷困的人家的巨大家宅当中，有的东西尤其让人害怕。那是一种诺尔庄园或布莱尼姆宫式的不幸。其中的一户人家，黑洞洞的门敞开着，似乎是黑暗正从里面涌出来，而不是光亮从外面透进去。在门口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为游人准备的鲜花。我丈夫一手插进自己的口袋，掏出来三个半第纳尔，仔细瞧着到底是多少。小男孩因为紧张而发抖。他按捺不住，伸出小手一把抢夺过去，奔进了屋里。但他并没把四个硬币都抢夺过去，而只抢了一枚。他是害怕我丈夫可能会只给他半第纳尔。之后，我们路过一个盲人乞丐，他蹲在一处岸边，旁边有一个小女

孩。我们给了十第纳尔——相当于十个便士。小女孩摇晃着他，朝他耳朵里大声喊叫，给他一个硬币让他摸，然后又摇晃他。对于老人没意识到是怎样的好运气降临在了他身上这件事，她非常愤怒。而老乞丐仍是一个劲地喋喋抱怨着。

最让我们伤心欲绝的，不是那些托钵者，而是一个女人。她中等年纪，体态颇为不俗，坐在离道路有些距离的一道石墙上，一副绝望的神情。我们半个小时后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在这个地方，同样有着人性美妙的迸发，展现出人类开怀大笑的才能，以及好奇心与创造力。不远处的一个岔路口上，我们看见一小群人正扎堆闲聊。一时间，他们不再说话，都转头笑哈哈地看着他们正领往市场的羊羔那搞笑的模样。他们眼神里透着顽皮，看看白羊身上淡奶油色的毛卷，又看看黑羊身上深棕色的毛卷。小羊们跳到空中，年轻而富于弹性的脊背弓起，前蹄笨拙地悬在空中，几乎跟它们同样笨拙的后蹄碰在一起，整个身子也几乎蜷成了一个圈。这些人并没因为粗鄙的生活而变得麻木。

离开海岛那天，我们去攀登岛上的最高峰。领队的是一位彬彬有礼、很聪明的年轻人。他破烂的衣衫让人怜悯，尽管他居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屋里，并且显然是一笔颇为不错的财产的共同继承人。山顶上，咸咸的空气纯净而透明，阳光强烈却不伤人。因为离这里不远就是希腊，而那儿的阳光就是一种恩赐，即使将近盛夏，也可以不戴太阳镜出去。在我们脚下，许多狮棕色的岛屿卧在一片暗蓝色的大海之中。东面，大陆上矗立着的紫灰色山峰，直插浓密如一片高踞的大洲的白云之中；西面，远处长长的海岛如图画中天使举起的一幅幅画卷。我们斜倚在一扇门上，因为别无选择。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一座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坐的山峰——除非你不怕被尖利的石头扎得千疮百孔。我们在休息之际，试图对这座岛的状况寻出个解释。它没有明显的理由该这么穷。亚得里亚海的这片海域，鱼类非常丰富，包括优质的鲭鱼。这岛上很多地区都可以产出油、葡萄酒和谷物，还可以养殖绵羊和猪。有人说是这里的人太懒了，不愿干活。拉布城里有位维也纳籍犹太人，开了一家照相馆。他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们宁愿伸手乞讨，也不愿意执犁耕地。”但他说话时，眼里闪耀着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他所表达的不是别的，不过是在奥地利王国的德意志臣民的秉性驱使下的，对所有其他民族臣民的愤恨和鄙视。一位在拉布工作的塞尔维亚医生告诉我们，这些岛民所得食物太少，没法指望他们干活。我记得马尔蒙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达尔马提亚人的懒惰是出了名的。可当他写他们在得到定期而充足的食物配给后去修建道路的事时，有关懒惰的言辞就从他笔下彻底消失了。

这海岛的忧郁气质，其原因不在当下，而在过去。只是到了现在，自战争之后，自达尔马提亚成为一个斯拉夫国家的一部分之后，它才有了机会享

受其经济天赋带来的好处。自那之后，世界市场遭遇重重灭顶之灾，没一个社会群体不生活得举步维艰——除非它有早些时候的积蓄可以仰仗。但拉布岛从来没有这样的积蓄可以依赖。其中一些阻碍因素源于上帝之手，而非人力所能回避。这里曾经瘟疫肆虐。但将面包从拉布岛民众口中夺走，大部分却是帝国所为。这样的草率与残忍，在任何强权国家统治并非自己同族的其他民族，却不通过赋予其臣民可能的最大自治权以保全自身时，都难以避免。冷藏技术发明之前，威尼斯使得达尔马提亚渔民难以凭借当时唯一的办法获取利润——这些可怜的人们没有盐可以用来腌制他们的鱼，因为盐属于政府专卖，不仅价格出奇昂贵，而且分配严重不均。此处，威尼斯政府还限制达尔马提亚的船只建造。它是铁了心要将这一地区置于穷困与依附的地位。曾有一次，它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这一点。它下令摧毁用以养蚕的所有桑树，以及全部的橄榄树。这一法令，因为达尔马提亚人威胁要起义暴动才被取消。然而此时，大片大片的桑树都已被砍伐。事实上，威尼斯发现还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几乎所有达尔马提亚的商品，除了谷类（须缴纳10%的出口关税），都必须按威尼斯人规定的价格在威尼斯出售。而任何威尼斯想取悦的政权，如奥地利、安科纳、那不勒斯、西西里、马耳他，都可以来达尔马提亚海岸出售他们的商品。这一不平衡的政策，最终导致严重的货币流通困难。这一切恶意的财政干涉，催生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海关官员。而这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不事生产的走私大军。

这一原因，足以使拉布岛陷于穷困。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得它更加穷困。这些达尔马提亚海岛上的男男女女，脸上那神情让人想到受难的基督，完全没什么奇怪的。威尼斯共和国并不总是用武器与土耳其人战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满足于依靠贿赂所占领领地上的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以削弱侵略者的力量。而用于贿赂的钱财，并非出自威尼斯，而是从达尔马提亚人民那里搜刮来的。鱼腐烂了，还有一些东西依然完好；谷物交过10%的税赋后，羊毛、葡萄酒和油料在威尼斯市场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货主仍有一些结余。从这些残余中，最后的一枚达克特仍被榨取出来进贡给土耳其人。这些达尔马提亚人付出了自己口中的面包，保护了西欧，使其免于伊斯兰世界的侵袭。而讽刺的是，这种保护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如今我们当中某些胸怀宽广的人，或为了使自己胸怀宽广而变得没心没肺的人，竟轻快地声称也许达尔马提亚人本无须做此牺牲，因为一个伊斯兰化的西欧并不会比我们现在的状况更糟。他们的愚蠢，单以“巴尔干”这个词便足以证明。这个词让人立刻联想到一种为实现其彻底的改造而公然违背人类美德与智慧的混乱局面。根据我个人的记忆亦可以确认这种愚蠢：我只要闭上眼睛，闻一闻某座马其顿城市——某座曾经令人引以为荣，后来在太长时间里被土耳其占领的城市——的那尘土、那沉闷、那狂暴的愤怒、那绝望，便可以知道。西欧的确劣迹斑斑，它粗鄙、肤浅、在经济上暴虐无度，但这里的人们却不知道在奥斯曼帝国

统治下的基督教各省人民那生不如死的遭遇。正是拉布岛的居民们，使我们免于这样的灾难——我得说，正挽救着我。坐在石墙上的那个女人身陷穷困，因为那些理应传给她的黄金，被用来从土耳其人那里换得了我的安全。我感到无能为力、困窘难安，站在这高山之巅，看着下面砌着层层台地的海岛，看着我的救星们，看着他们渺小如黑色的蚂蚁，四处奔走，试图补救他们的命运。

斯普利特I

斯普利特不同于达尔马提亚所有其他城市，它具有一种那不勒斯风情。除了几处私家住宅有庭院外，这座城市看不出任何的威尼斯精神气质——那种堂皇的、物质主义的气息，像一个骄傲的幽灵，回来提醒人们，他失败过一百万次。它让人想起那不勒斯，因为它同样是一个悲剧的、有着辉煌建筑的绞肉机。多少个世纪以来，这里混杂而居的各民族人民在历史的驱赶下，慌乱地穿行在那些废弃了的城堡的高墙、地窖与下水道间。而此时，因为时事陡转，他们又被驱赶至光天化日之下，身上干净整洁，很容易就习惯了现代人的衣着举止。但他们又与整个世界永远隔离，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在黑暗岁月中穿行，彼此间习得的共同语言与思想让外人感到晦涩。

旅客踏上海岸的那一刻，斯普利特就向他们展示出它特有的环境氛围。夜里，巨大的白色亚历山大大帝号邮轮将我们从拉布城送过来。我们从邮轮上下来，这地方的历史在我们的右边和左边同时展开。我们的左面是一个海产市场。渔船就是摊位。肯定是既做水手又当摊贩的男人从各座岛上将货物运过来，将船迎面驶进码头，然后将货物分小堆罗列船头。通常那些货物都是可怜巴巴的一小堆，比如碰伤的苹果、破烂的菜叶、泛黄的干鱼块，但卖货物的人并不可怜。他们看上去跟自己出售的干鱼一样坚韧。他们站在货物旁，身上散发着力量与自豪。这片海岸，除了食物，还提供给人们其他的东西。它吝啬于给予人们生活的手段，却让他们能生存下去。我们的右边是一排商铺，即任何港口前都有的咖啡馆和各色杂货铺。高踞这些建筑头顶的房屋，挤在戴克里先宫殿外围走廊巨大的科林斯式的柱子之间。

因为斯普利特就是戴克里先的宫殿：公元305年，他从在位二十年的皇帝宝座上退位后亲手修建了它。城市已溢出宫墙之外，但其核心仍位于那四扇大门之内。戴克里先建造这座宫殿时，选址在罗马城镇萨罗纳叶的城郊范围。萨罗纳叶距离这里不远，位于山区与海岸平原之间的缓坡带上。那地方曾被希腊定居者占领，这些定居者借用至今仍茂盛地生长在这里的芳香灌木的名字，给它起名为阿斯帕拉顿。7世纪时，阿瓦尔人袭击了达尔马提亚。这是一个烧杀抢掠的野蛮部落，后来在中世纪时，他们因为从东欧和中欧掠夺了太多的黄金，并将这些黄金积存起来，而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他们横扫萨罗纳叶，用大火与刀剑使这座城市毁于一旦。大部分人被杀害，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及时逃到了海岛上。这些海岛给予他们的庇护微乎其微。他们在那些日子里遭受的寒冷与饥渴至今仍留存于普遍的传说中。不久，他们潜回大陆，发现除了戴克里先的宫殿还勉强可以住人，其

余一切都被毁灭殆尽。他们于是在宫殿处搭建起栖身之所，在这本该是和平的日子里艰难度日。他们现在仍住在那地方，而和平从未到来。他们遭到匈奴人、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奥地利人的袭击。他们中有人会说，尽管打败了过去的这些敌人，他们仍没能赢得和平。在多个世纪的战争过程中，这座宫殿和那些难民已然建立起一种完美的互生关系。曾经这宫殿给他们提供过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今他们又成为它的支撑。战后曾有过一场运动，想疏散斯普利特居民，拆掉挤在宫殿墙壁与柱子之间的那些房屋，恢复宫殿往昔的雄伟壮丽。但那些勘测人员很快发现，如果居民们都搬走了，戴克里先的这一宏伟工程也将轰然坍塌。这些神色忧郁、匆匆行走于大街小巷的人们，曾经接受过那些石头的帮助，如今又反过来帮了它们的忙。

“我很想立马进宫殿去，”我丈夫说，“要是我们把罗伯特·亚当关于雕刻的那本书带来就完美了。”那念头肯定也曾出现在许多斯普利特的访客的头脑中。亚当关于戴克里先宫殿的那本书，是对许多今日事物之源头的有趣揭示。书本身很精美，对作者而言也是一种荣耀。1757年，亚当从威尼斯来到这里，绘制了一系列图画，目的在于展示宫殿初建时的面貌，促进人们对“古代大型私家建筑”的了解。这一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力和勇气，因为宫殿最初的规划的所有想法，早在数个世纪前就已失传。他不得不通过那些现代建筑，追寻旧墙壁的蛛丝马迹，而且常常因为居民和官方的怀疑而受阻。该城的威尼斯总督确信他是个间谍，想将他驱逐出境。但威尼斯守备部队总司令碰巧是苏格兰人，其手下的一位克罗地亚军官则受过足够的教育，能明白亚当是怎样一个人。他们帮他获允在一位士兵的监督下，继续他的工作。

间接的结果是，这造就了乔治时代那些最优秀的建筑——强调空间、变化和优美壮观。通常，当我们看见波特曼广场上的某个建筑立面，或波特兰广场的一道门，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罗马时期的达尔马提亚。直接的结果就是这部图绘迷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图画由巴尔托洛奇创作。这些图画虽然在实用的意义上具有精确的特质，却也是浪漫主义传统的优美例证，在这种传统下，艺术家在刻画景物时拥有充分的自由度，一如钓鱼人可以爱怎么描绘就怎么描绘一条鱼。达尔马提亚的山巅被描绘为可怕的剑客，直刺天空中的黑色的敌人；罗马炮塔与塔器都有着一种超自然的圆实模样，如一位患了腮腺炎的神仙；草木像步兵战士，踏着废墟前进；穿着华丽服饰的农民摆着各种漂亮的姿势，位于画面前景之中——一位穷人妇女，我记得尤其清楚，调动起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胸部，试图将一只鸡卖给两个戴头巾的犹太人，他们和她一样，有着身陷穷困的维罗纳人的特征。在某些图画的角落可以看到亚当本人和他的法国助手克莱里索，头戴三角帽，身穿长大衣，精神抖擞地不停画着，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莫扎特《恋爱学堂》里那两个年轻人的样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能找到这样一

本极为轻松的好书，如一朵花或一枚果脯那么怡人，它是一直以来给我庇护和滋养的我们的严肃、高贵的艺术的基础。

“不错，”我对丈夫说，“真讨厌，人无法精确地记住图画。要是我们带着那本书，看看这座宫殿到底给了两个世纪前的一个人以怎样的印象，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印象——而我们对于建筑的鉴赏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托他所赐——该是多棒啊！”“那我们干吗不带上那本书呢？”我丈夫问道。“噢，那书简直比石头还重，”我说，“我在盥洗室的磅秤上称过。”“你称它干吗？”我丈夫问。“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除了自己这堆骨肉外，我已经不再知道任何别的东西的重量，”我说，“因此我拿起它来，以便让我的心思别有所寄。”“啊，好吧！”我丈夫道，“我发觉相比于别人的显微镜观察法，你这方法更有神秘性，我都没法再信任法布尔和其他昆虫学家啦。但告诉我，我们为什么没把书带来，即便它比石头还重那么一点？我们运费还是挤得出来的呀。它本可以给我们带来乐趣的。为什么我们没带上呢？”“噢，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用处，”我说，“我们可不能扛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大街小巷到处跑。”“不，我们可以的，”我丈夫说，“我们可以雇一架独轮手推车，走到哪儿推到哪儿。”“可是别人会觉得我们脑子有问题！”我叫道。“哦，会吗？”我丈夫反驳道，“我正想看看路人会是怎样的反应。我们认为怪异的东西，这些斯拉夫人都觉得很正常。只要能满足实用目的，没什么能让他们觉得怪异的。我在想，他们在路上看到这样的东西会不会觉得古怪——因为说到底，我们真的想在这地方看到亚当的书。”“不知道，”我说，“不过菲利普·汤姆森就站在我们宾馆门口，我们可以去问问他。”

菲利普·汤姆森教授斯普利特人英语，愿意学的都可以来学。他骨骼精细，为人讲究，严守戒律，对什么都比较冷淡，整个世界他只喜欢达尔马提亚。而整个达尔马提亚，他又最喜欢斯普利特这地方。上午在我们宾馆外面的广场上，我们曾跟他一起喝咖啡——很不错却无必要的午前茶。那是一个仿威尼斯风格的广场，却涂着红色灰泥，里面种着棕榈树，看起来花了不少工夫，不过确实很好看。我们向他提起这一问题。“噢，不过这里的人会觉得非常怪异的，如果你们在大街上推着一架独轮车四处转，上面装一本书，走走停停，不时翻看里面的图画，”菲利普说，“你们显然不了解，在斯普利特，我们随时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我们跟塞尔维亚人一丁点儿也不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什么感觉，爱笑就笑，爱哭就哭。如果想锻炼锻炼，他们也许会推着车在街上溜达。这就是我们不喜欢塞尔维亚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我们看来，一个有自尊的人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候都必须谨言慎行，以免招致别人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好解释了斯普利特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这是一种自我批评式的戏谑和幽默：最好是在别人嘲笑你之前，先自我嘲笑。不过，这种观念的另一个结果是形式上的拘泥。我想这是缘于我们随时随地都处于别人的注视之下，而这些

人，达尔马提亚、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奥地利人，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加优秀。”

“然而所有这一切，”菲利普继续道，“也体现出斯普利特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似乎斯普利特的性格确凿地摆在那儿，我可以将它所有的居民纳入这一界定之中？嗯，那是可以的。不过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斯普利特旧城区是个很小的地方，比这宫殿大不了多少，另外包括宫墙外围的一圈，但你们所看到的延伸至周边山陵和海岸的部分，是新建的。这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战后才来的，有的找工作找到了这里，有的是从被划给了意大利的斯拉夫领土前来逃难的难民。你们看到广场正对面那位深色皮肤的漂亮女人了吗？她是我的一名很优秀的学生，扎拉一被移交给意大利人，她的家庭就跟城里所有最好的家庭一样离开了那地方。如今，扎拉的历史跟以前已大不相同。就我听到的消息，那地方的气氛也大不一样了。但这个女人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其他跟她一起迁移的人，已经完全被斯普利特吸收了。他们与任何当地人之间都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曾看着他们一步步地转变，一个缓慢但确凿的过程，无可逆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行为体系的非常奇特的胜利。这胜利与经济地位无关。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富有，但他们非常优雅。”

这座城市的确并不富裕。之后，我们与菲利普在一家餐馆共进午餐。餐馆不大，却非普通的一个小餐馆。来这里就餐的人体面、高雅，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要么是商界人士。餐厅给我们每人两个薄煎饼作为甜点。这种中间夹果酱馅的煎饼在中欧到处都有人吃。巴尔干人从拜占庭人那里学来这种煎饼的制作方法，拜占庭人叫这种饼帕拉饼。我们最多只能吃完一个，因为我们的饭食——在这些地区几乎都是如此——不仅味道好，而且分量非常足。“我用纸袋将饼打包让这两位客人带回去好吗？”服务员问道。我们觉得不用。但服务员对我们的真诚表示怀疑。“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这里吗？”他问菲利普，“他们不知道我们随时乐意为我们的客人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是在市里那些新开的宾馆，我完全能够理解，那儿的服务员会很不乐意这样做。如我们所知，那些宾馆是建立在奢华摆阔的基础上的。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这样，我们知道，上帝给予我们的食物不是拿来浪费的，因此他们不必感到难为情。”“我不觉得他们拒绝你善意的建议是因为他们觉得难为情，”菲利普反应很快，说道，“你知道，他们住在一家大宾馆，反正也得在那里进餐，因此这饼他们拿回去真的没什么用。”

服务员接受了这一解释，转身走了，但很快又折回来。“但如果这两位客人把饼带回去，”他坚持道，“他们就用不着点整份套餐了。他们可以只要一份汤和一个荤菜，饭后上楼吃这个当甜点。”“非常感谢你考虑得这么周到，”菲利普说，仍没犯糊涂，“不过我这两位朋友是包餐的。”“但这样也

不错啊，”服务员说，“要是这位夫人夜里觉得饿了，就可以伸手在床边找到个冷煎饼的。”我并不这么想，不过他这番善意让人难以忘记。而他的这种节约意识——并不疯狂，而是带着一种冷静的热切——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在戴克里先的宫殿里，多少年以来，许多举止非常温文尔雅的人，肯定都已在某些时节学会了将他们的腰带紧紧勒起。而且不用说，他们所处的环境——甚至直到今天，这里仍展示出一种非常端庄高雅的气质——也会促成他们的优雅举止。

当然，作为罗马建筑风格的一个案例，它并不算十分特别。相较于罗马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广场、帕拉蒂尼山来说，它远为逊色，但就其对于历史延续性的揭示而言，它的价值非同寻常。穿过码头边夹在杂货铺之间的一道门，就直接进入了古代。站在四个世纪前罗马宫殿满是廊柱的庭院里：前方，是帝王殿堂的入口；往左，是戴克里先的陵寝，也即如今的大教堂；往右，是医神爱斯库拉皮厄斯神庙——跟学习拉丁语的学童，或在阿尔玛塔德玛时期时常前去皇家艺术院的老太太们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只是里面到处都挤满了人。斯普利特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即四万四千人——居住在宫殿的九英亩地的区域内，余下五分之四的人口从早到晚都穿行其间，因为穿越宫殿区的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通道是从港口到新城区最便捷的道路。这五分之一居住在宫殿区域内的人，密密匝匝挤在通道两侧，他们的房屋彼此紧挨，就像蜂巢里的一个个蜂穴，将戴克里先的建筑师们留下的每一片空地都占满了。比如，你要是站在非常开阔的庭院里，按理说是可以看到爱斯库拉皮厄斯神庙的，但事实上你看不见。廊柱环绕的内院在那一方向上的空隙，被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给完全挡住了。这些房屋凸出的阳台，与近旁廊柱上的楣构，以及紧贴廊柱基脚的敞开的门口，在一条线上。

不过，这并不让人觉得凌乱，或是觉得对原有建筑有什么损害。谁要是反对宫殿的子嗣们因地制宜筑墙成屋，就跟为一个因为养育了一大家子光彩照人的子女而失去了少女面容的女人感到遗憾一样，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些因地制宜的建设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原来是墙壁的地方依然是墙壁，人们并没有因为新造房屋而偷取原来的建筑材料，对原建筑造成损坏。因此，在旁人看去，这些建筑就像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如神庙或格雷客栈。这里只有一个不和谐的景观。在皇家殿堂内院这片非常漂亮但不大的开放地带的中间，安放着由梅斯特洛维奇雕刻的一位4世纪主教的塑像——这位主教为斯拉夫人赢得了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没人说得准这座塑像是好还是不好。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能看到这座塑像的唯一原因是，它有二十四英尺高。没有谁见过比这更不虔敬、更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它打乱了这宫殿建筑的比例，让人觉得宫殿建筑矮小而凌乱，因为塑像的头与廊柱齐平，而它站立处的通道却只有四十英尺宽。这的确过分了，因为在近旁的一面矮墙上，立着一个从埃及来的暗色调花岗

岩斯芬克斯雕像。这是宫殿原有装饰的一部分，却比宫殿本身年代久远得多，其历史比宫殿的历史长一千七百年，是埃及雕塑黄金时代的作品。虽然这座斯芬克斯长不足五英尺，但材质致密，堪称完美。相形之下，主教塑像显得瘦长而难看，质地轻飘，脆薄不堪，就如有时在法国尼斯，透过仓库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的、留备来年狂欢节使用的木偶。

游人想不明白，梅斯特洛维奇为什么要将这尊塑像安置在这个地方，也不明白为何管理方会迁就他的这一想法。如果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情感，如果说它被当作斯拉夫人战胜罗马统治的一个标志，那么当事人就没一个懂得历史。因为戴克里先的宫殿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伊利里亚人，也即达尔马提亚本地血统的居民——他们的血液无疑也在大多数现代达尔马提亚人身上流淌——已有效地控制了罗马帝国；它代表着一次最漂亮的报仇雪恨。罗马摧毁了伊利里亚古文明。其原因也许没别的，就因为它是一个帝国，有这个本事。但后来当它需要聪明的统治人才以抵御野蛮的侵略者时，伊利里亚却给它提供了十三位统治者和防御者。这其中，只有一位遭受失败。其余所有人都配得上赋予他们的这一称号：世界秩序的拯救者——尽管从最终结果来说，如他们所知，这个世界是无法恢复到过去的模样的。这些人中，有两位是最伟大的，一个是戴克里先，一个是君士坦丁。有人说，两人中间，戴克里先更伟大。

他的陵寝非常精致优美，与他相配。那是一座穹顶建筑，外面呈八边形，内部呈圆面。设计很不合理，建筑内部有一圈双层的柱子，上层的柱子直接搭在下面的柱子上。这些柱子完全没有实际功用，唯一的作用就是支撑它们自己过于花哨的楣构和柱头，还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宝贵的空间。戴克里先来到罗马时，世界的花朵已然开过，格调已为人们所遗忘。这里起初肯定是黑洞洞的，因为所有的窗户都是几个世纪之后才建造的。因为里面一片漆黑，设计上沉闷无趣，又带着东方文化色彩，因此有人认为，戴克里先建造它的目的并非用作神庙或陵寝。人们曾怀疑，他是喋血的、非精神性的、蛊惑人心的密特拉教的信徒，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军人，又对东方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种狂热的波斯宗教为当时很多军团所接受。因此，他在这地方试图仿造这样一个洞窟，以供手下士兵祭拜这位来自太阳的神灵。然而，这座建筑不仅阴暗潮湿，派不上什么用场，建筑设计也非常奇怪。里面到处是不协调的构造，比如柱顶与柱上楣构便缺乏一体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建筑师所使用的材料是旧时的建筑剩下的材料，因此不得不尽可能将这一块块材料拼接起来。戴克里先对罗马帝国的建设很多时候也使用了这一手法。他将另一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残余部件，嵌入一栋宏伟浩大的新型建筑之中。

在这座将旧边角料拼接起来以呈现新貌的宫殿中，这位长于实施权宜之计的帝王肯定有过一些更好的时刻。从他所发布的法令来看，他应该是非常

睿智的，不至于没意识到他的这堆石头摆放得并不是那么恰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只是彻底被所处时代给糟蹋了。他很可能也想拥有真实的权力，拥有将自己所处环境指引向一个和谐前景的权力，而非虚设的权力，拥有发布命令并令出必行的权力；他肯定明白自己在罗马并不能真正施展拳脚。如果我们少时被告知的事情是事实，即罗马之所以衰落，是因为道德的堕落，这对他来说可能还好一些。然而，生活从来不是如此简单，人类也少有这样的强大力量。无论人们放纵情欲的程度如何，无论他们无所克制还是有所克制，都无太大差别，这很少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个杰出的人要么是禁欲主义者，要么就是一个浪荡子。而普通人则发现，无论是禁欲独身，还是滥交无度，都同样困难。就我们所知，罗马帝国的道德堕落告诉我们，绝对权力是一种毒药。罗马人，作为一个在根本上缺乏艺术趣味的民族，对色情描写情有独钟，他们常常满足于对在此毒药作用下的个人与家庭的描绘。

要是普遍的道德堕落就是帝国败落的原因，戴克里先应该是可以应对的，他毕竟是一个很擅长恃强凌弱的军人。然而，这问题太过普遍，根深蒂固有如茅草。罗马帝国曾是一个农民之邦，后来发展为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地主与大工业主形成专制统治。为对抗专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奋起反抗。然后，资产阶级又成了专制统治者。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残羹冷炙贿赂城市无产者，但农民却成了他们的敌人。军队里都是农民，因为乡村地区的人更健康。因此，到3世纪，军队与资产阶级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后出现了伊利里亚皇帝，也就是世界秩序的拯救者。据说，秩序得以回归。

然而，这位最伟大的伊利里亚皇帝肯定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维护得来的是混乱局面。他所颁布的法令，其断然的语气如阅兵场上的训话，要求帝国的每一个人坚守自己岗位，尽职尽责，完成这样或那样的公共义务，并获取这样或那样的私人奖赏。他的计划透出他非凡的创造能力。但这不过是杂耍演员的平衡游戏，仅此而已。它对于罗马社会根本性的罪恶丝毫没起到矫正作用。也很难指望它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戴克里先出生太晚，没赶上罗马文化更稳固的时期，不能通过讨论首要原则来为社会谋取福祉。终其一生，他都在与暴力战斗。这些暴力使他陷于眼下的事情而无力自拔。二十一年来，他维持着帝国表面上的平稳。然而，腐烂却在继续：道路在坍塌；陆地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海洋时常遭到海盗的侵袭；农业因为实物征税和强迫的义务劳动干扰，而几近荒芜，良田变成了荒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为维持庞大且开支巨大的中央行政机构，余留的有钱阶层遭到税务官员层层盘剥。外敌的入侵只是一个浅近的危险，真正的问题却是帝国内部因为种种经济问题而羸弱不堪。对于这些问题，在4世纪初，没人能有解决的办法。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中期的今天，这些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很多人都曾写过戴克里先放弃帝王权力，退隐于他的故乡伊利里亚的事迹，似乎这有什么不正常，需要特别地解释说明似的。一些虔诚信众认为，戴克里先是因为迫害过基督徒，深感悔恨而无心继续从政。不过，实在没什么说法比这更牵强的了。他刚获选担任皇帝，就主动和一位地位与他齐平以及两位地位稍低的同僚共掌国事。这也就是所谓的四人统治制度。被误认为是戴克里先所为的迫害事件，实际上是他的一位同僚加莱里乌斯所为。而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到那时候，他应该是很想休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五十九岁，患严重疾病已一年；他在位也已二十一年之久。他一生充满艰辛。他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应征入伍。当时有两个达尔马提亚军团，他加入了其中一个。自那以后，他不断升迁，担当军事重责和立法职务。暴力肯定是倒尽了如此一位有才智的人的胃口，但他又不得不时不时地施行暴力。为能当选军事委员会的恺撒，他不得不利剑出鞘，插入可能成为他竞争对手的同僚军官的胸膛。事实上，既然他自己如此频繁地诉诸暴力，他肯定也害怕自己最终会沦为暴力的受难者。一个靠利剑统治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稳定，只要这利剑不断地从一人之手传递至另一人之手，从年老者传递给年轻人。

在他的宫殿的厅堂里——那些厅堂肯定极其寒冷阴暗，因为它们只在屋顶有几个洞——他不可能找到他所寻求的安宁。世界的混乱状况愈演愈烈。四人制的政府里，成员们互相争吵。一些人死了，新人上任，但新的成员一样难缠。他们出于自己的贪婪，将帝国撕裂。突如其来且出乎人们意料地，他们开始染指戴克里先的家族血缘。戴克里先有一位妻子，名叫普里斯卡，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瓦莱里娅。他非常爱她们。她们也都是基督徒。我们没见戴克里先对此有过任何异议。当遇上古代遗制与现代世界形成心理上的失衡时，他还曾转而求助于瓦莱里娅。他当选为皇帝后，先是与马克西米安一人共享权力，后又在同僚的队伍中加入了另外两名将军，加莱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后两者被接纳后，戴克里先收养了加莱里乌斯为嗣子，马克西米安收养了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为嗣子，并且两位养父都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自己的养子，虽然这意味着两个养子都必须休掉他们现有的妻子。

瓦莱里娅的婚姻生活肯定相当可怕，因为加莱里乌斯生性残暴，暴力令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而且他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但她从照料他的私生子坎迪迪安乌斯中寻得慰藉。最后，加莱里乌斯死了。在他临终的床上，他颁布命令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她要不是因为非常富有，可能会自此享得一些幸福时光的。但因为她很有钱，加莱里乌斯的继任人马克西曼·达亚想娶她为妻，虽然他自己已有一个妻子。她拒绝了他，马克西曼于是以欺骗罪将她告上法庭。她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被害得家破人亡，她的一些女性朋友被杀害。她与坎迪迪安乌斯被流放到叙利亚的沙漠中。只有在某些特别的神秘的意义上，女性才是被保护的对象。

在这些黑暗的厅堂里，戴克里先向因为他自己创造的四人权力体制而登上权力宝座的人恳请宽仁。他请求马克西曼·达亚允许瓦莱里娅回到阿斯帕拉顿，但遭到拒绝。不过，后来瓦莱里娅似乎安全了，因为马克西曼·达亚死了，她和坎迪迪安乌斯得以从四个恺撒中的李锡尼那里获得庇护。一开始，李锡尼颇为友善地接纳了他们。这显得很合乎情理，因为他之晋升恺撒，得益于死去的加莱里乌斯的帮助。看似他们在他这里寻得了永久的安全，可他突然转身与他们为敌，并谋害了小男孩——不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残忍、愚蠢，在那时杀人流血是一件很时尚的事。瓦莱里娅身穿平民服装，设法逃了出来，然后消失了。对戴克里先而言，尽管他深爱自己的女儿，这一切却似乎没给他造成多严重的打击，它们不过是吞噬一切的愈来愈深的暗夜中的一道暗影而已。因为戴克里先不断收到信件，要求他去拜访李锡尼与他的同盟恺撒君士坦丁。他借口年老多病推脱，但邀请信愈来愈显得来者不善。他处于被卷入四人制君主间争端的危险之中。迟早，其中一方或另一方会要他的命。大约在313年至316年间，他死了，据说是服毒自尽。也有人认为他死得更早一些。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听说314年他女儿从希腊萨洛尼卡的藏身地被找到，并就地砍头，扔进了大海。

当戴克里先遭遇这一切时，他是什么感受呢？痛苦，那是肯定的。人们很多时候都感到痛苦，只是很少承认而已。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是历史将这样的痛苦强加给我们的。否认人类命运之可怕本质并没有什么意义。戴克里先肯定感受到了一种痛苦，因为他是一位健康的农民，当他为自己女儿的安危而犹疑不定时，他的五脏六腑一定翻滚不宁。另一种痛苦则是因为，尽管他生为农民，却是出生于一个文明世界的农民，而在文明教化中培养出来的才智，当用来理解源于野蛮、残暴行为的经验时，根本行不通。再有一种痛苦则是因为，当一个人从一个方面的成功走向另一方面的成功，最后迎面而来的却是全方位的失败，这总是非常糟糕的。而他便是这样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所有的成功因非人的力量而归于零。如果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帝王，能坦然接受普通民众的拥戴，他应该能预见这样的结果，并做好准备。他是怎样承受这一切痛苦的？如果他走进后来作为他陵寝的建筑里去寻求安慰，如果如某些人所认为的，这座建筑是朱庇特神庙，那么他几乎得不到什么安慰。若非农村天真的泛灵论，或城市里为遏制追逐成功的狂热而采取的手段，异教学说必然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它信心百倍地宣称要为人们提供一种淡泊隐忍的教义。那些杰出的人可能会为自己寻得这一教义，却发现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说该建筑是一座密特拉神窟，那么他肯定曾看着这位神灵的高耸的雕像割裂公牛的喉咙，并且肯定曾对自己说："嗯，世界正是如此。我很清楚。鲜血在流淌，生命在继续。可这又怎么样呢？这一过程不让人感觉恶心吗？"但密特拉神没有给出答案。

很可能戴克里先从他宫殿的现世的一面，从它的辉煌壮观中，寻得了心理的慰藉。有人认为，他修建这座城堡跟在罗马修建浴场出于同样的原因：希望为大量饥饿而闲懒的无产者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但要是戴克里先不喜欢富丽堂皇的东西，他也不会想到建造这些气势宏伟的公共建筑。事实上，从他做皇帝时，宫廷里那排场讲究的仪式典礼，就可以看出来他对这方面的热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他赋予这种恢宏壮丽以一种不变且极致的特征。要见到这位神圣的皇帝越来越不容易。有幸获此殊荣的人也必须在他面前三跪九叩，毕恭毕敬，犹似朝拜圣人中的圣人。此时的皇帝，俨然成了各种无解谜团的焦点。但他的出现却是另一番模样，像大山似的巍然矗立，身穿圣衣，极尽华丽，行动僵直，衣服上缀满各种世上所知的最精美贵重的、由能工巧匠打造的玉石与金银徽章，显得熠熠生辉。来拜访他的客人，即使是他同宗族的人，也必须下跪，亲吻他衣袍的边角。

戴克里先既然厘定了这样的礼节仪式，也必然得到过某些慰藉——从阿斯帕拉顿那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从伸展至亚得里亚海的拱形高墙，从它的四个城镇一般大小的独立行政区，从那十七座瞭望塔，那充斥眼目的大理石，那些等候着骄傲的游行队伍的石柱廊，那些盛气凌人地贯通黑暗、通往深处的帝王宅邸的通衢之中。衣袍刺绣之繁复、质料之硬挺，可以使装在衣袍中的躯体忘掉自己的纤弱。华丽的王冠可以使脑袋忘记它尚未思忖到行动的计划。既然一座宫殿能够将大山之硬核掏出来，将一片乡野变得可以遮风避雨，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能自我打造，以对抗命运的某些重大动作。但有一个考虑可能干扰了戴克里先试图继续留在阿斯帕拉顿的计划。使他想到用宏大壮丽的办法帮助树立政府的绝对权威的，并非他只拜访过一次的罗马。他是从波斯获得这一灵感的。那里宏伟的宫殿、精细而动人的典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是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拜访波斯的，这次拜访是为了摧毁萨珊王朝。他所倚重的象征之物，已被他自己证明了其无效性。

在他死后，他以肉体的方式，继续拥有着这座宫殿，他的坟墓就安置于陵寝的中心。大约三十年后，一个女人因为偷盗他石棺上的紫色柩衣而被处以死刑。一次奇怪、疯狂的犯罪，绝望而富于想象力；也是一种批评——对此，到现在戴克里先可能也会认同，因为他没能修好的帝国之墙坍塌了，灾难如海水般冲向民众。亚得里亚海岸被汪达尔海盗抢掠；罗马在六十年里三次被蛮族洗劫；匈奴人将多瑙河沿岸夷为平地；萨罗纳叶城里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这里却暂时是悬崖边上的一小片安全之地，平常的生活一如既往。这似乎也证明了，建一所宫殿作为避难所颇有道理。伊利里亚一直以来都以其纺织品而著称。在罗马的卡彼托山博物馆里，有一尊奥古斯都皇帝的塑像。在塑像的盾牌上，有一个伊利里亚人，穿一件齐膝长的短袍，没有系腰带，却有袖子，饰之以从两肩至短袍下摆褶边的饰带。这

是我们第一次认识法衣这东西。3世纪时，教皇下令给所有的烈士都穿上这种衣服下葬。至今在西欧的教堂，所有执事和执行主教都还穿这样的服饰。而英国国王在加冕仪式上，亦是这样的装束。无论历史可能玩弄怎样野蛮的游戏，在伊利里亚，总有织布机转动的声响。在阿斯帕拉顿一处颇为不小的地方建有一家大型工厂，工厂里都是女工。那里不仅生产罗马军队军服，亦产出平民服装。

不过，其他一些事件却又证明，一座宫殿毫无庇护作用。5世纪中叶，达尔马提亚出了一位天才，名叫马塞林努斯。他忠诚地服务于军队，条件是允许他宣誓效忠于罗马皇帝，以独立王国国王的身份统治达尔马提亚。罗马帝国本来可以以这样的城邦构成的联邦而继续存在。这些城邦疆域大小适度，在古罗马效率原则与公共精神的基础上，由地方上有政治抱负的人治理。马塞林努斯占据了戴克里先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官署。凭着勇气、智慧与旺盛的精力，他保护他的臣民，在他们心中重新树立起堂堂威仪。然而，十三年温和而辉煌的统治后，他前往西西里担任皇帝，目的是领导一支远征军打击非洲的汪达尔人。在那里，他被一位名叫里西梅尔的日耳曼将领下令谋杀。这位日耳曼将领是蛮族的一员，当时蛮族正着力从内部摧毁罗马帝国。他们用不着地方统治者，因为这些统治者想通过扩大他们的疆土，增强自己的军事与经济力量，以巩固罗马帝国。他们想要的是一片没有防御能力的疆域，从这里他们可以招兵买马，组建起一支国际部队。这最后一位世界秩序的拯救者，在他本可以创立一番功业的地方，却没能寻得安全。

几年后，他的侄子——当时人们叫他朱利乌斯·尼波斯，或朱利乌斯侄子——代替他叔父统治达尔马提亚。他被称为西方皇帝。这一称号并非表示对他的支持。“自大狂，自大狂，敢来就宰了你。”但因为这一称号乃东方皇帝所授予，他也不敢拒绝。他不得不即刻将一位竞争对手撵走。为了安抚对手，他任命对方做萨罗纳叶主教。喜欢妙笔生花的编年史家描绘说，他扯下竞争对手身上的帝国徽章，将他遣送去一个理发店，削去了他的头发，然后送他到一名神职人员那里，神职人员将主教职位授予了他。这一步骤很有成效，因为这防止了他的竞争对手向他施以报复。朱利乌斯侄子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因为他面临着无穷无尽的充满敌意的蛮族敌人，有来自帝国内部的，也有来自帝国外部的。他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他的达尔马提亚总司令奥雷斯蒂斯掌管高卢。这个奥雷斯蒂斯，是一个伊利里亚冒险家，一度做过匈人王阿提拉的书记。这一记录永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他娶了一位罗马贵族的女儿为妻，因此在罗马贵族中地位获得擢升，从而能够说服他的主子，宣布他自己的儿子罗穆卢斯为皇帝。

朱利乌斯侄子回到阿斯帕拉顿，在那儿生活了五年时间。其间，奥雷斯蒂

斯被一位名叫奥多亚塞的蛮族军官谋杀。很让人不解的是，这位蛮族军官制定了一项计划，以支持罗穆卢斯的事业。他很倾慕罗穆卢斯的年轻美貌，因而成为其王位背后的支持力量。480年，两位达尔马提亚伯爵，维克托与奥维达——前者是一位罗马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后者属于蛮族——直接进入戴克里先的宫殿，背信弃义地杀害了朱利乌斯。他是合法选举的最后一位西方皇帝。刺杀他的人满心以为此举可以讨得奥多亚塞欢心。蛮族奥维达希望自己能当上达尔马提亚国王，他需要得到皇族的支持。但奥多亚塞跟另一个谋杀者里西梅尔一样敌视地区统治者，因此在达尔马提亚的一次惩罚性战争结束时，亲手杀死了奥维达。后来，奥多亚塞自己又被东哥特族国王狄奥多里克所杀。当时，狄奥多里克与他签署了一项条约，然后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宴会。狄奥多里克一剑将奥多亚塞刺了个对穿，并屠杀了他所有的部属。谋杀。谋杀。谋杀。谋杀。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戴克里先的石棺失踪了。差不多一百七十年来，它一直摆在那里，牢牢地嵌在陵寝的中央，为聪明的游人们所津津乐道。然后突然间，石棺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是一群存有报复心的基督徒将它扔进了海里。不过，这样的行为只能被一小部分心怀仇恨的人理解，因为自这位皇帝死后，基督教就已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无法认为石棺是被阿瓦尔侵略者破坏，因为他们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抵达这里的海岸的。很可能这一失踪事件远不是那么复杂。任蛮族人四处谋杀，在阿斯帕拉顿，日常的生活不曾被打断。织造厂里，梭子依然循环往复地在织机上来回。毋庸置疑，戴克里先的陵寝仍须不断地清洁和修复。很有可能某一天，附近院子的主人说，“嗯，你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一面毕恭毕敬地在一旁看着，一面想着自己竟然会成为如此一个神圣之物的看护人。也有可能安放石棺的工匠再没回来，城市遭到来自陆地或海上的威胁，工匠们、雇用他们的官方，还有这院子的主人，都抗击敌人去了。然后不久，可能有人会提起那座石棺：“我在想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来把石棺搬回去。”然而，骚乱仍在继续，人们觉得最好是将神庙里的珍宝分散保存。后来，可能因为家族秘密链断裂——或是因为暴力死亡，或者甚至是因为突然的自然死亡——使得石棺所在地再无人知晓，只留下某种令人感到似乎很重要的隐约的记忆。某一天，一位妇女会说起这东西：“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一直以来就放在这里。里面装满了古旧的东西。”她说得没错。这里面满是些古旧的东西：作为人的戴克里先的遗骨，作为皇帝的戴克里先的衣袍，由上等人强加于各民族的世界秩序之理念——这些人自以为很懂，就因为他们有行动力。阿斯帕拉顿，地球秩序伟大拯救者的宫殿，已然远逝。它已变成斯普利特，一个普通百姓的城市。这些平民百姓有能力在厨房、工场或织造厂的范围内建立起秩序，但因受到那些试图建立世界秩序的上等人的严重阻碍而无法发挥这一能力。

我敢肯定，某一天，戴克里先的石棺会从斯普利特某个古老而心不在焉的

家庭的地窖里冒出来。在达尔马提亚思想的地窖里，在这个它当今的哲学建立之根基中，这位老皇帝也将同时被找到。在英国，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持有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因为每一代人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历史处境，他们兴奋不已，其中有足够的可以讲述给他们的儿女和孙辈听，而不必从他们的父亲和祖父身上去找的故事。在所有这些使人印象深刻的大事件中，中央政府扮演了一个怎么说也还不算太丢脸的角色，至少就自己的国家来说是这样，并且往往都值得赞许。我们觉得，掌控全国公共服务的国家机构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抱负的。它赋予每一个普通人以机会，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施展着维护事物有序状态的能力。

然而，如果英国历史上最近一次面目清晰的历史事件是420年罗马军团的打道回府，如果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内乱的时期，是黑斯廷斯战争以及欧洲大陆各帝制国家间一系列的侵略与调停行动，让这一时代的我们仍记忆犹新，那么事情将是另外一番模样。那么，国家这一理念对于我们将犹如葡萄酒，要想享受饮酒之乐，必须做到适可而止，以免于醉酒和暴力、骚乱和穷困。我们会明白，一定程度的国家机构是必要的，掌控权是奢侈中的奢侈。但我们却会认为国王与政治家都是些捣蛋鬼，他们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会时不时地将我们从我们的房子里赶至路边的沟渠，使我们靠吃树根野果为生。很容易想见我们将抱有的不同态度——我们只要设想一下，要是没有维多利亚或伊丽莎白甚或安妮，要是博迪西娅对英国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对“女王”一词会是怎样的反应。

这便是斯普利特人的处境——事实上所有达尔马提亚人都身在这样的处境。他们明白戴克里先失败了，未能修复这个世界，也明白他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因此，他们直觉里一听到任何中央权力机构就会全身紧绷，似乎这种机构是他们的敌人。愤怒的年轻人四处奔走呼号。然而，他们身上既有伊利里亚人的血液，也有斯拉夫人的血液。他们与养育了戴克里先和其他世界秩序拯救者的民族同宗同种。他们对于权力的诱惑极其敏感。因此，他们无法割裂与中央权力机构之间天生的血缘。那些年轻人无法坐下来，为别的什么事情生气。外人如果当这是没教养、乱使性子，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对他们的经历的一种极端敏感的反应而已，在历代对他们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的帝国的统治下，这种敏感曾对他们的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当世界面临邪恶统治的时候，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极有用处的。

斯普利特II

8世纪时，戴克里先的陵寝被改造为大教堂。很显然，它仍是一座大型异教建筑，尽管13世纪时，基督徒在里面建了一座很不错的钟楼，并装上了反映基督生活二十八个场景的门，且之后继续往建筑里填补虔敬物件，直到最后把整座建筑弄得像个储藏室。在修建钟楼和安装教堂门的同时，他们还修建了一个极为漂亮壮观的讲坛，上面饰以长着翅膀的野兽，以及两座漂亮的15世纪坟墓，其中一座展示着基督受鞭图，创作者为达尔马提亚的乔治。那些试图表明这片斯拉夫海岸原是一片蛮荒之地、是威尼斯文化滋养了它的人认为，乔治也就是乔治·奥尔西尼——他们这样说没别的理由，唯一的证据就是他的一个儿子或侄子以此名字自谓。一个人，如果不深入了解斯拉夫民族主义斗争史，在达尔马提亚就什么也不可能看见，哪怕是一幅基督受鞭图。大教堂的历史即为之所左右。这里是运动的中心，就获允在祷告中使用斯拉夫语来说，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不过，有两位斯普利特神职人员，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位是13世纪斯巴拉多的执事托马斯。他极好地写下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是当代外国人中仅知的见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并听过他布道的人。另一位是17世纪的大主教马克·安东尼·德·多米尼斯，一位典型的斯拉夫人，既聪明又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来自拉布城一座非常精致的哥特式宫殿。虽说是位大主教，并给那座陵寝增加了现在的唱诗班，他主要的兴趣却是科学研究。一天——早在牛顿之前半个多世纪——在做弥撒时，他突然发现了太阳光谱。笛卡儿很大一部分成就都是建立在他的发现的基础上的，歌德在他关于色彩理论的书中也曾提到这位主教。很不幸，他对宗教问题产生了兴趣，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他这样的高级教士而言，简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久，他为新教教义所折服，然后通过朋友亨利·沃顿——“夜幕下卑微的美”的作者，时任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的影响力，获得任命成为温莎教区司铎、萨沃伊教区主持，以及伯克郡丘陵地区西伊尔斯利教区牧师。然后，他发表了一部名为“教会共和国”的书，对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种种怀疑缠绕着他，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自己错了。在转向斯拉夫信仰的问题上，他认为人们并非没有道理。他前往罗马，去与教皇讨论此事。但那位教皇死了，而他的继任者却没这么宽容。多米尼斯被投入圣安吉洛城堡，并死在城堡地牢里。后来，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对他进行审判，判定他有罪，于是将他的尸骨掘出，连同他的著作一并烧掉。

然而，尽管斯普利特在其编年史上，因为民族主义问题模糊了其宗教生活，我们却必须记住，人类的很多活动是没有记录在案的。斯普利特人非常虔诚。那天晚上教授前来与我们一起用餐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教

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拉丁语学者，是一生研究斯普利特与萨罗纳叶古文化的著名学者布里奇的学生、助手和好友。他年近七十，却充满青春的无比魅力。遇到开心的事，他满心欢喜，不夹带任何因过去种种失望而累积的愤愤难平。他相信，整个生命进程的任何时刻都可能轻轻一转，然后一切都从此变得美好适意。他的行为举止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合宜，但与此同时，他又极其强烈地具有地方性格。“谢谢，我不吃龙虾，”他对我们说，“我知道那东西非常不错，但就如跟我情况相同的许多人一样，我们只得放弃健壮的体魄，不敢过多地运动，我消化不好。”然后，他将胡椒瓶一举倒空，把全部的胡椒粉都撒进汤里，整个汤面上黑乎乎地浮了一层。“瞧，”他说，“我吃东西多讲究。我从来都很注意多吃胡椒，因为这东西对健康相当有益。什么，你们不知道这个？但你们要相信，一个人如果胡椒吃太少，是很难高寿的。”我简直着了迷。那位阿贝·福蒂斯，18世纪时曾来此海岸游历，达尔马提亚人吃掉的数量惊人的胡椒，以及他们对胡椒可以治病的深信不疑，曾让他惊讶不已。

作为一位极其爱国的人士，他自然也会谈起民族主义的问题。事实上，他的一番话更让我明白了，达尔马提亚人历史上最近一次不得不臣服于外来政权，是何等不合适，何等让人厌烦。面前的这个人，简直是一位牛津大学导师的亚得里亚翻版。就天性而言，他可以在学问追求中找到人生所有的满足。但从年轻时直至整个成年阶段，他都是一个以组织反抗奥地利政府为己任的党派的积极成员，而且在他值得尊重的大家庭里，没有一人不曾跟他一样，深深地投身于反叛活动。“我的一位兄弟，”他告诉我们说，“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达尔马提亚爱国者，因为他惹上麻烦的事整个欧洲的报纸都报道了。因为尽管他是位牧师，有自己的堂区，奥地利人仍将他从达尔马提亚驱逐出境。不过，他并没因此遭多少难，因为伟大的斯特罗斯梅尔主教将他纳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在萨格勒布附近分配给他一个堂区。”

“这一切的困境对我来说却是何等的幸运！”他红光满面，高声叫道，“因为当我准备去维也纳的大学求学时，斯特罗斯梅尔主教邀请我去见他。那是我整个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时间过去很久很久了，那时我才十九岁，但对那一切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进去的时候，那房间明亮如复活节的圣坛。这并非因为那些枝形吊灯，尽管这些灯的确非常漂亮，而是因为在场的那些人。除了优雅、俊美得惊人的斯特罗斯梅尔主教本人，另外还有至少二十人，都是些知名人物，我们民族卓越的贵族，或学者，或艺术家，或外国要人，或极美、极优秀的女性。众所周知，斯特罗斯梅尔主教对于女性的美丽之殷勤尊重，一如他对于世间一切美好的创造物之喜爱。

“可别以为这不过是一次世俗的宴会。在这场宴会上，这位伟大的人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风姿。首先，我们站立在桌前，由他本人做餐前祷告。他

那优美的拉丁语，任何别的人也讲不出，只有天使才可能说得这么好。然后我们坐下来，进餐时，一位年轻的牧师给我们朗诵了一段《圣约翰福音》，然后又读了一则《伊索寓言》。接着，主教开始发起谈话。尽管与会客人如此之多，但谈话人人都能参与，而且整场宴会非常精彩，简直超乎人的想象。这当然是他的功劳，但看上去又不是。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就像树林里的鸟儿自自然然地鸣唱，而它们各自的音符自然而然便合奏成一曲智慧的乐章，任何哲学家也不能与它们相媲美。呜呼！何其可叹，世间竟有如此的完美；何其可悲，如此的完美却已不再。我想在场的人，除了几位女性，其他都已死了，因为当时在宴会上，我算是最年轻的了。但对逝去之物的情感，古人很善于领会，也比我们更善于表达。”他低声念诵了几段拉丁语诗句。非常典型的斯拉夫人个性，他一句也没提及在这宴会上的社交尴尬给他带来的困扰。在任何其他国家，一个十九岁少年，并不富有，来自偏远城镇，到首都参加一个由当时一位最著名人物举办的宴会，都可能会感到怯场。但塞尔维亚人跟克罗地亚人一样，都是具有极强民主意识的人。他们阶级差别感很弱。而斯普利特，作为一座自由而古老的城市，凭其宽广的面积与并不逊色的富庶，更不会觉得比萨格勒布低一等。不过呢，也可能斯特罗斯梅尔主教是着意不让这位少年感到紧张吧。

“我的表达有误，”教授再次开口时说，“如果我暗示了斯特罗斯梅尔主教给了我什么激励的话。因为说实话，我不曾受过谁的什么激励。我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从来没这个必要。奥地利政府从没过分地迫害我们，因此也没号召我们去做英雄。它不过是拿针扎扎我们，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绅士和哲人。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在战争期间，不过也不是那么糟。”似乎奥地利刚对塞尔维亚宣战，斯普利特所有对奥地利政府抱有敌意，也就是所有杰出甚至是有名望的公民，便都遭到逮捕，并从奥地利到匈牙利，一路作为塞尔维亚战俘游街示众。“德语相当于我的母语，”教授说，“我却不得不站在那里，听他们把我说成一名东正教牧师——就因为我的胡子。与这次牢狱遭遇相关的一些情形实在不那么令人愉快。不过，我们别只记着这些事情，还是记着那些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东西吧。它给我们带来了自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朋友。没错，许多英国朋友。因为战后，很多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士兵来到这里，我们非常喜欢他们。我估计你们不认识海军上将威廉·费希尔吧？”“不认识，”我丈夫说，“但我认识他的兄弟H. A. L.费希尔，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之一。”“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教授叫道，“他曾随舰队来过这里几次，我就像热爱兄长一样越来越喜欢他。跟你说吧，他就像一位古代英雄！”

他的眼睛绽放着光彩。在这地方，一如在塞尔维亚，极少有男性娇弱如女子的，任何男人称赞别的男人都不会引起他人多想。因此，有时你会发

觉，男人与男人之间，同道与同道之间，英雄与英雄之间，流淌着一股浓烈的喜爱之情。教授谈了好长时间的海军上将费希尔，谈到他坚韧的品格，他的睿智与耐心，他可爱的小调皮，他欢快的荷马似的狡黠，以及他雷鸣般的笑声。“啊！”他最后惊叹道，“我一个劲儿地谈我的朋友，竟没注意到自己喝了这么多的红酒。这可对身体不好，除非多喝些黑咖啡。这咖啡浓吗？”“我怕是的，”我说，“非常浓。”“你怕什么呢？”教授问道，“越浓越有益于健康。你不知道吗？”

教授和我丈夫聊了一会儿他们最喜欢的文学经典的版本后，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我于是说：“我叫了菲利普·汤姆森忙完后过来。他不能来参加晚宴，因为有课，但十点钟会过来。我希望你会喜欢他。”“我没跟他会过面，”教授说，“不过见过他这个人，我相信我会喜欢他的。”“嗯，他很迷人。感情很细腻的一个人。”我说。“我不是说这个，”教授说，“我相信自己会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我注意到他极为虔诚、严守教规。在大斋节期间，我去过我的教堂几次，发现他像个孩子般在祷告。”当菲利普·汤姆森进来，教授跟他打招呼，带着一种特别的既信任又有所保留的友善，似乎他清楚他们之间有着某些共同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却又是无法共享的。

我们首先谈起我们南来这海滨城市斯普利特的意图。“你们真的必须去玛丽亚山看看，就是城市脚下的那座山，”菲利普说，“那上面最漂亮了，满山都是松树，望出去是大海和海岛。”“嗯，的确，”我说，“我去年去过，这回还想去。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罗伯特·亚当的画作上，这山上一棵树都没有，一片光秃秃的，尽是石头。我想是奥地利人种的吧？”“才不是，”教授大叫道，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可以告诉你是谁种的吗？是我亲手种的，我种的。我在档案馆里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那座山上曾经树木茂盛，但它们被砍伐了拿去建造威尼斯战舰了。于是，我萌生了这一想法：不妨重新给它栽上树木。然后我发起了一个团体来做这工作。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举动是疯了，我可怜的妻子还收到匿名信，说应该把我送精神病院去。但我还是募集起资金，相信我，都是达尔马提亚人捐助的。不，奥地利人什么也没帮我们，威尼斯人也是。我们只是学了威尼斯的建筑风格，仅此而已。如果要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该说是学习了他们的建筑风格。更准确地说，威尼斯人与达尔马提亚人都是从同样的源泉获得灵感，然后将其推向一个新的运动……”

我们又回到斯拉夫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上，但我们没有深究，而是任它永久而神秘地深埋在达尔马提亚人的心底。“我不认为威尼斯人在这里的人民身上留下了任何永久的痕迹，”教授说，“除了他们谩骂亵渎的习惯。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汤姆森先生，走在斯普利特街头，充耳都是粗言秽语？”“我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菲利普说，“他们那样使用圣人的名字，

让人不得不紧紧捂住耳朵。”他们神情严肃地摇摇头。我看见一个罕见的场面——生来就信仰天主教的一个外国人，其宗教热忱，竟与一位刚刚皈依的英国人不相上下。在教授身上，我看到那同样的斯拉夫宗教热情。这样的热情，曾使得谢斯汀唱颂歌的男女信众的歌声时而黯淡，时而热情迸发。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热情在他的身上，似乎不仅仅因为他温和的性情而显得更为强烈，还因为他的城市长久以来的悲苦生活，因为它对自己的悲剧的沉思，因为它拒绝肤浅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灾难所带来的伤悲与荒芜，而带有一种特殊的厚重感。

在斯普利特城里走一走，你一定会发现，这座被围于城墙中的城市，其生活远比我们西欧散漫铺陈的城镇的生活集中得多；会发现它一直致力于通过虔诚的信仰，为自己的经历找到一种崇高的解释。第二天上午，教授带我们去看宫殿的金门。这座金门最能让人看出来它在戴克里先时代的最初模样。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大门，上面有藤蔓垂挂的壁龛、小柱子和一道狭窄的小门。穿过这道狭窄的小门，整洁而柔韧的斯普利特人，一个接一个地赶往下面的港口。从这座大门旁边，我们爬上一组台阶。一位修女打开一道门让我们进去。再爬上更多的台阶，我们看到被重重宫墙包围的一座小教堂。这座教堂有大约七百年的历史。尽管因为那座丑陋而拙劣的现代天主教教堂，小教堂的外观遭到损坏，但它仍因为其修长的石头屏风，因为屏风上的雕刻，而唤起人们无限的情愫。这些雕刻，字迹鲜活如露珠，表达着一个民族从信仰中找到一种仁慈的神奇力量，以帮助他们赶走生命中的种种恐惧。我们一旁的那位修女，片刻不停地跟教授说话，她的声音沉静里暗藏惊叹，那一词一字亦如露珠般清新。她告诉教授，看护这座圣马丁教堂的小修道会的院长越来越老了，病得很厉害，但仍非常坚强。修女虽然说话声音沉静，但她并非视这一切为理所当然，似乎在这地球上，这还是头一次痛苦与坚强在互相搏斗。她及她所属的群体，都不会简单地视苦难为单纯的苦难，她们务必竭尽她们灵魂的全部力量，以追索苦难之结果，排除一切其他可能，探求有关宇宙的如人类般善良的一种解释。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又前往另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是为纪念圣母玛利亚而建的，建在一座拱道的上边，事实上亦在宫殿的一道大门之内。教堂没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在南欧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教堂。灰色建筑，柔韧的线条，似在温和地陈说，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信仰，即使只有百合花的力量，亦能承担起生活的重压。这座教堂与达尔马提亚城镇里那些更小的教堂一样，属于一个兄弟会，由镇上的大约二十人维持。他们用此教堂作为祈祷和慈善活动的一个中心，并在这里娶妻、为孩子洗礼，死后也葬在这里。兄弟会一位做泥水匠的成员，出于对教授的尊重，放下手中的活儿带我们参观了这所教堂。他身穿工作服，上面沾满一道道白色的灰浆，静静地站立着，拘谨如皇族家中的一位侍从，正向臣民们展示着帝王的殿堂

——这位平民使者，向我们传递着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认识过的传统。

我们是在爱斯库拉皮厄斯神庙认识到这一传统的。神庙位于戴克里先陵寝庭院的对面，如今被用作洗礼堂。这样改作他用，戴克里先也许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们最后一眼瞥见的他的私人生活，是他对自己的基督徒石匠大为光火，因为石匠拒绝为他雕塑爱斯库拉皮厄斯神像。在那地方，我们看见一块10世纪的石碑，上面的雕刻很粗糙，一些人说代表的是对基督的爱，另有人说是克罗地亚臣民对他们一位国王的崇敬。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位雕刻者——他雕刻时刻意采用了拜占庭风格，无论刻画的是凡俗人事，还是超凡物境。西罗马帝国崩塌后，达尔马提亚有过三十年充满危险的独立，然后跌入东罗马帝国，跌入拜占庭的统治之下。该帝国有着真正的政教合一政体，皇帝被赋予对于他的臣民的绝对权力，只因他宣誓绝对臣服于上帝。宫廷里的典礼仪式都是宗教式的。那块石碑的存在表明，这一神圣芭蕾下的政体构想，深深地影响了其治下人民的想象力，即使是在最最边远的地区亦是如此。

这位工人虔诚的态度、优雅的举止，虽然说有天性的基础成分，却也带着艺术熏陶和教养的成效，就如护卫队经过训练，脱去了其凶悍的原始情感。这也证明了，拜占庭传统不是简单地扩散到了这些地区，而是同时起到了种种激发作用。这名男子是斯拉夫人。他金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海蓝色的眼睛，都证明了这一点。拜占庭文化在这一从俄罗斯中部平原进入巴尔干的种族中扎下了新的根系。这个种族原先是纯粹的蛮族。在基督纪元的前几个世纪，任何东西对他们都产生不了半点儿影响，因此他们显然跟地球上所有丝毫不为基督教文化所动的民族属于同一类别。他们一路屠杀，肆意折磨他人，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到处放火，所到之处一片焦土，却无任何目的。他们跟随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一路扑向达尔马提亚海岸，他们的使命就是毁灭。却不料，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掉转矛头，将他们变为奴隶。于是他们奋起反抗。愤怒的年轻人四处奔走呼号。他们的声音被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听见，他允诺，如果他们将匈奴人和阿瓦尔人赶出伊利里亚，他们就可以作为帝国臣民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他又附加了一个条件：他们必须皈依基督教。有谁承想，斯拉夫人与基督教的这一联姻，竟能开出如此充满激情的花朵来？有谁承想，一群烧杀抢掠之徒，竟也会执着于精神的追求、智慧的探究，也会相信神奇之物，相信表象后面存有真相，也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展开各种可能揭示真理的论辩？历史有时与遗传的作用一样让人无法理解。她最不可预知的作为，亦常常是她最辉煌的杰作。

萨罗纳叶

这是最沉闷的一个复活节。教授领着我们登上伟大的罗马城遗迹萨罗纳叶，它本该是全世界最美的一个景观，但我们看见的却全然是另一番模样。这里的石柱、石梯与石棺，都淹没于茂盛的各种花草之中，往上是高高的橄榄树台地。从这些台地上，可以俯瞰下面的大海和海中许多的岛屿。这样的地方，贺拉斯应该会很喜欢光顾——身后跟一个提着午餐篮的仆人。这是历史的不和谐音符之一——对罗马这样一个看上去生动如画、充满道德暗喻的城市，一个罗马诗人所能欣赏的，却不过是一堆废墟而已。然而，我们更是半点儿也欣赏不了，因为我们乘车从斯普利特过来，四英里的路途上，大雨狠狠地挠着我们的脸。到了萨罗纳叶，大雨更是变得凶残。我们被逼无奈，只能钻进一所不大的房子里。房子里是各种地图和铭文，它是伟大的布里奇监督发掘工作时建的，用于居住。他死后，这栋房屋被改造为一座博物馆。

我们并不孤单。这房子里挤满了小姑娘，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由两三个修女带着。她们聚在一起，跟世界上任何地方这样的女孩一样，看着都比一堆英国女孩子让人舒心。她们看起来正非常沉静地等着长大。她们期待长大，看护她们的人也期待着她们长大，但她们谁也没半点儿着急的模样。她们身上没有任何像英国孩子一样不快乐的表现。在英国，人们总试图把小孩子教得俯首帖耳、死气沉沉，让人看不出任何她们将会长大成人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位小姑娘会高扬下巴，一头直发，为自己的平凡却又显得咄咄逼人而自豪。也没任何漂亮的女孩会急不可耐地提早宣示她们女性的身份。不过当然，在一个很少有同性恋的国度，女孩子也很容易成长出女性的柔美来。

不过，我在想这些小可爱在萨罗纳叶这地方都学些什么。我怀疑她们接受的是一种偏向阳刚的教育。事实上，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她们都是由修女教导的。而这些修女所接受的，就是她们自身以及世界阳刚的一面。之所以看得出来，是因为在她们这一性别的人群中，她们是唯一像男人一样，喜欢精致的衣服、爱穿制服的人。我担心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她们会渐渐给自己灌入一些男性身上的可怕的恶劣习性。甚至有可能，她们正教给这些女孩关于罗马的一些和我上学时学习的同样的东西：可疑的道德赞美，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天知道，事实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用来讲罗马的好处，而不用撒谎。我可以作证。我是在苏格兰上的学，由于这一国家对女性的很奇怪的角色规定，因此，我们只学拉丁语，不学希腊语，接受的是一种愚蠢的跛脚式教育。但即使是对这种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教授经典的方法，我仍然满心感激——尽管我在学习拉丁语以及其他各种语言方面

脑子愚笨，所学的大部分东西也都已忘记。因为它给了我力量，让我找到了学习各种罗曼语言的个人方法；它培养了我的历史意识，让我明白各种社会建制，比如法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之所为；它还给予了我——而且至今仍给予我——对于文学的极大的兴趣。我喜欢双语对照本，或者说我需要双语对照本，但一旦拥有了它，我便可以极大地欣赏我的拉丁语诗句。时至今天，当读到那无比精妙、无尽悲伤的诗句时，我仍激动不已：

美丽的花儿啊，被南风摧残；

清澈的泉水啊，被野猪玷污。

同时，在我看来，对于现代人的思想状况，如果不回到拉丁语文学，不了解在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注入之前，欧洲文化的原来模样，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

但我感到很遗憾的是，为教给我这一快乐与知识，我的老师竟会觉得有必要如此教导我——以他们以及任何其他人所掌握的未经证实的事实，过分地将罗马帝国强调为一股无比强大的文明力量，强调它随着疆域的扩展，将物质与道德的康乐传布至整个古老的世界。我被教导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使用武力手段扩展疆土的力量，萌生于一位智慧而有道德的天才，这使他们能够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铺设一条最好的生活道路。我发现，这样的臆断牢牢地根植于接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尤其是那些跟我一样，接受了同样偏颇的拉丁语教育的人——所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中。而那些没受过任何这样的教育的人，其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偏见甚至更为强烈。年复一年，我越来越对他们持批评的意见。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那些被罗马帝国强加上罗马文化的民族，就没有他们自己更美好的文化，与当地情况更契合。罗马人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文化，但如果纳粹毁灭了当代法国和英国文化的所有记录，后人也可能怀疑我们的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我们至少可以从出现于罗马帝国的非洲民族的天赋这一点上，看出疑点。当时，罗马帝国毁坏了迦太基，翻来覆去地将这片土地犁上了三遍，它毁灭了一个与之相当，甚至更为优秀的文明。卡米尔·朱利安先生所创造的高卢历史上的伟大工程表明，当罗马来到法国，它阻碍了一个一流文明的发展进程。斯特泽高斯基怀疑，它也曾给日耳曼各部落带来混乱。从最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来看，似乎很可能事实的确如此。这些研究发现，一些法典，即使是那些游牧民族的法典，放在当时所有的罗马法典中，也半点不落后。如果他们不是迫于外来侵略，不得不花更多精力抵抗战争，他们很可能会继续推进他们的社会制度建设。很有可能的情况是，罗马之所以有能力征服外国领土，是因为它将恰恰应该用来培养他们治理外国领土的能力

的资源，用在发展武力征服的手段上了。结果是，它太过严重地欠缺这一方面的能力，以致对其自身，它也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最终毁于这种无能为力。

我敢肯定，那些小女孩接受的教育告诉她们，对于斯普利特是罗马城的一个子嗣，她们应该感到自豪。然而，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人，都说不好罗马人征服伊利里亚到底是不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否恰恰走到了文明延伸的反面。伊利里亚有它自己的过去。它与古希腊有着历史的纽带，与马其顿有过敌对与联盟交替的双重关系。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和祖母都是伊利里亚公主，他和他父亲都曾为反对她们的国家而参加过大型的战役。在罗马时期，很少有关于伊利里亚的消息，除了来自罗马官方渠道的那些。但即便如此，从这些信息之中也可以看出来那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他们有一位非常能干而且勇敢的女王，叫托伊塔。她不是那种某个穿兽皮的原始部落可以培养得出来的君王。她和她的臣民被指控有海盗行为，调查结果证明，这是为征服亚得里亚海群岛的行动——如果由罗马人来实施这一行动，历史将认为这是件很值得称道的事情——找的借口。又有指控说，托伊塔谋杀了两位或是三位罗马大使。他们是受命前来指控她的人民在海上的侮慢行为的。但据说，这几个人是在伊利里亚境外被土匪给杀了的。此外有必要注意一下这个人，波利比乌斯，一个罗马人中的罗马人。他这样解释了有一次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向伊利里亚人发动战争的原因：

> 罗马人将法罗斯国王德米特里奥斯赶出伊利里亚后，他们对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再也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元老院希望，在长时间的和平生活中，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意大利人变成一个柔弱的民族——因为自波斯战争与马其顿远征结束，已经过去超过十一年时间了。通过与达尔马提亚的战争，他们可以重新唤醒人民心中燃烧的激情，并与此同时，给伊利里亚人一个教训，迫使他们臣服于罗马的统治。这就是罗马帝国向达尔马提亚人宣战的缘由。但他们告诉其他国家的借口是，达尔马提亚人轻慢了他们的大使。

萨罗纳叶的小女孩，试试用你的手指头算出这一数目。罗马花了两百五十年的战争，才给伊利里亚人带来和平。然后，他们经历了五十年的纷扰、一百年的和平。我不能不这样想：他们本来有能力自己赢得这样的和平的，因为之后他们不得不接管了罗马政府，为其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帝王名单。之后，他们突然陷入动乱与灾难的深渊——其最糟糕的典型，是蛮族的入侵，主要是因为害怕罗马帝国的扩张。假设意大利心满意足于自己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致力于打造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假设伊利里亚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可能会有效得多地抵御外敌入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目不是这样算的。记着，当修女们告诫你说，当心男人向

你求偶时他们嘴里的谎言的时候，你要知道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任何时候，他们的脑子在求偶时会好使一些。正是在他们谈论政府和军队的时候，他们满嘴是奇谈怪论和危险的胡言乱语，以讨好他们灵魂深处那些疯狂的想法。这对你完全是不利因素，因为他们向你求爱时，你是以势均力敌的姿态面对他们的谎言，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女性相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极少有反抗能力。

尽管如此，因为雨停了，我们终于可以在萨罗纳叶的罗马废墟中漫步，这于我们所有人，包括修女和那些小可爱、教授、我和我丈夫，都是一件开心美事。灰色与银色的在羞怯的阳光下闪耀的橄榄树叶，深灰色的被雨水浸湿的废墟，银灰色的高大的剑叶芦荟，暗绿色的松柏，我们身后黑魆魆的群山，横卧我们前方的银色大海，以及点缀其中的灰色岛屿；在我们脚下，被暴雨摧残的花儿看上去就像绛红色的纸屑。教授非常开心，如雨后的鸟儿。他给我们读碑文，赋予那些拉丁文语义本身所没有的甜美。这些文字，自他幼小时，就已在他的灵魂深处酝酿醇熟。他带着我们穿过那些更多地是被时间磨蚀而非战争毁坏的石头残桩与柱基、神庙台阶、公共浴室、教堂、城墙。一次又一次地，这地方被哥特人和匈奴人夺来抢去，直到639年，最终被阿瓦尔人夷为平地——也是因此，这座城市里的教堂有着一种著名战场的庄严。在此，基督教严峻而简朴的训示——最好别做一个野蛮的人，即使只有靠野蛮才能取得胜利——在蛮族的实际影响下，经受了考验。在此时刻，可以确定的是，只有通过野蛮手段才可能获取胜利。在大教堂的洗礼堂里，环绕洗礼盆的内厅留存了下来。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台阶——赤身裸体的人沿台阶而下，身上因为涂抹圣油而发亮，三天的禁食使得他们脚步不稳；他们下到圣水里，被浸泡三次然后提上来，心中充满神圣的信仰，相信笼罩在涂抹者身上的死亡被神奇地转变成了快乐，他们从此获得了拯救。从最冷静的理性主义观点来看，必须说他们的确没错。在这里，蛮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里，他们彻底依循了专事破坏的纯粹天性，依循了他们对于残忍的狂热。然而，教授温和的美德、兄弟会教堂的泥水匠那虔诚的善意，都表明那些接受了基督洗礼的人们仍然活着，而没有被野蛮同化。

修女们带了那些小可爱环游这一奇迹的遗址是很不错的，她们自己也是构成该奇迹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从一位修女身旁走过，一如过去，我议论说，一般的女性信众给人印象很不好，因为她们脸上有着一副确信无疑的神情。这种态度出现在男性身上很自然，亦不可避免，因为他们不借助远远超出确凿事实的哲学学说就很难生存。但这在女性身上则完全不合适，因为女性天生对生命中未解的神秘事物有着特别的兴趣，因此完全可以做个怀疑主义者。我非常担心这些修女的知识里，在真理的面包中夹杂着大量的胡话。比如，她们会被教导，不加怀疑地相信教会的那些并非反映事实真相的论断。这些论断来自某些神职人员对某些阳刚气质的沉迷：比如

它自诩自身永世不变，在早先的年代便已获得了关于一切事物的某种智慧，包括永恒的和现世的——对此，它已一步一步揭示出来，并且从不会自相抵触。当然，我们有权设想，如果教会不曾发生变化，它会更好；甚至我们不妨梦想，要是我们的身体能永远保持年轻健康，我们大家都会更加幸福。然而这一切无非白日梦而已，因为教会在改变，我们在变老。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证据就写在那些雨水浸湿的灰色石头上。

“看，”教授说，“这是我们最有趣，也非常触动人心的一座坟墓。”一位丈夫将他深爱的妻子安葬于此。铭文中，他自豪地说，自己在她十八岁时就将她娶回了家，并忠贞地陪伴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心底的哀伤，必定因为他自觉他俩一直严守被认可的基督教教义而被抚平。也是在这一时期，元老院议员西奥多曾对异教信仰大为愤怒，因为朱诺有十二个孩子。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多神化非常美好，就如一个新的星座的诞生。但这位因之而叫嚷的基督徒，却对“一位像母猪一样下崽的女神”感到耻辱，并为这一意见而死——他为阻止官方中立的意图，放火烧了朱诺的神庙。大约在这时候，圣杰罗姆宣称，他之所以看重婚姻，是因为婚姻可养育处子。他劝告一位寡妇不要再婚——其所呈缘由让我们想起他是一位达尔马提亚人——并说，这一海岸的居民从来不曾以节制而著称。“婚姻中的种种考验，”他告诉富利娅夫人说，“您在婚姻生活中已有体会。您因为受够了它而感到恶心，跟吃了太多的鹌鹑肉一样。您品尝过它最苦的胆汁，您已将那些酸腐的不健康的食物全部吐出，您已缓解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胃。为什么您要再次将已证明对您有害的东西装进去呢？这是狗重食其呕秽，洗净的猪又往泥潭里打滚啊。”急于希望得到救赎的萨罗纳叶夫妇，必然是相信，只要他们遵照教会的清规戒律，戒绝一切尘世欲望，就不会被弃而不顾的。

要是他们知道，几个世纪之后，因为他们在婚姻中保持如此的贞洁，教会将迫害他们，甚至判处他们死刑，他们定会大感吃惊。因为，在这片海岸上，将有从巴尔干半岛内陆传来的清教异端邪说传播。这种邪说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叫法有所不同，如保罗教派、帕塔伦教派、波格米尔教派或卡特里教派。尽管名字不同，它们都热情地鼓吹将人的精神从物质的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并深信坚守贞洁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不二法门。它的优势在于，人所避之，它却趋之。这一宗教观是人类所有特点中最让人讨厌的之一。它成了东正教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后者不仅从教理上对其进行攻击，还用上了火与剑。正因为它如此强调贞洁问题，教会方凡是听到传言说任何已婚夫妇有不谨行夫妻之道的，便像狼一样对其施以严厉的惩罚。由于这被视为一种检验标准，一个被指控为异端的人甚至会以如下的证据来表明他信奉正教：饮酒、吃肉、与妻子同床。因此，这对萨罗纳叶夫妇，如果他们在这同一个地方，时间晚个五六百年，奉行他们这样贞洁的夫妇生活，他们是不可能如此在一起三十三年的。他们可能遭遇与他们

所景仰的基督教烈士同样的命运，不过却是被扣以异教徒甚至更低等的罪名。然而即使是如此变化，可能也不如再后来的变化更让他们费解——教会对他们节欲不节欲无所谓，只要他们不阻止仍因任何交合而怀上的孩子的出生即可。他们三十三年枯燥得让人想打哈欠的生活，可能会比殉道还糟糕。

看着这群小可爱，身穿蓝色外套，头戴草帽，在一个湿漉漉的日子，在这些石棺间，被诱导着接受一种男性的迷信，也许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但教授领着我们来到一座坟前，这座坟墓给了我们怀抱这样的希望的理由：她们不会遭受任何伤害，她们女性的天性会保护她们。墓碑上的拉丁铭文字迹非常难认，肯定是在立碑的当儿，那个古老的世界正遭受着它最后一次痛苦。那一刻，大地颤抖，柱子倾塌，一个善良的人竖立起这一石碑，以纪念她离去的丈夫。她说，他是如此强壮，在他死后几个月，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非常非常爱他。末了，她伸出手臂，以非常夸张的姿势，将两个不同概念的世界拉拢到一起，以保护她丈夫不被任何危险侵袭，她将他同时托付给耶稣和命运三女神。赶在黑暗来临之前，她凭着一种健全的心智、一种美好的感情，竭尽了自己所能，尽管带着一种将阳刚之气理想化的倾向。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小可爱，无论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她们一样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特罗吉尔

从斯普利特乘坐汽轮到特罗吉尔是一个小时的路程，船上满是德国人。我越来越怀疑自己不可能认识到真相。我的理解，部分缘于我自己的阅读和听闻，部分缘于在德国所见过的游行队伍。我的印象是，德国人都是健美的运动能手，意志坚强，做事高效，却有着危险的侵略性。自从踏上达尔马提亚，无论我们歇脚于任何宾馆，乘坐任何汽轮，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都是德国游客。他们要么滚圆如梨子，要么瘦如竹竿，脖子上则清一色地堆着太多的肉；他们看起来非常胆怯，迷迷糊糊，跟所有游客一样做事没半点条理，也半点没有不友善的表现。我想，这并没什么矛盾的，只能说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一方是饮食无度的年轻禁卫军，另一方是深受困扰、营养不良、不为社会所关注的另一群体。这些人便属于这另一群体。不过，他们仍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一分子。因为汽轮沿海岸的一个个小港口一路走走停停，每次栈桥上都会站着一群达尔马提亚人，他们高挑、瘦削，高傲地挺直身躯，这些游客瞪着他们，言语之间似乎他们都是些奇怪而危险的动物。德国人对于斯拉夫人的仇恨再次复活，并且被强化了。

一片乳白色的海面上，两艘水上滑行艇在我们左右两侧时而飞奔，时而缓缓游弋。这时，我们已经到了特罗吉尔城。城市坐落于一座袖珍的岛上，占据整座小岛，位于另一座较大的岛屿背风的方向。它也是那种金棕色的城市——那种黄灿灿的表皮酥脆的甜酥饼的颜色，奶油糖果的颜色，油酥馅饼的颜色，有时候是明晃晃的肉汁的颜色。它光溜溜地立在那里，美腿修长，因为它原有的城墙被拔掉了。是撒拉逊人推掉这些城墙的，威尼斯人和匈牙利人再没允许它们被重建。如今看起来，这座城市就像种在花钵里的一株植物，花钵被打碎了，但土壤和树根依然抱在一起。码头上，斯拉夫化的威尼斯宫殿矗立。像伊斯兰内室那种格子图案的框架固定在阳台上，将那些宫殿石砌的阳台封起来。这种建筑风格展示出一种西方与东方的交汇，来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后来又因与土耳其人的亲近而得以永久化。在这些表面之下的是这样一种证据，它证明了生活常常如梦幻一般，既疯狂混乱，又前后相续。读彼得罗纽斯·阿比特的小说《萨迪利空》，就像飞越一座满是七弯八拐的街巷的城市，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特罗吉尔的小街小巷弯弯曲曲就像肠道。正是在特罗吉尔，《萨迪利空》手抄本于1650年被发现。当然，这本书不是在这座城市写的。要真是的话，小说中的描写与这城市建筑一模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部著作却在失踪数个世纪之后，在这里重见天日。二者之相互贴切，恰如这城市的色彩般精妙，如那些尖顶建筑与这城市融为一体。

这种贴切还不止于此：因为彼得罗纽斯·阿比特骨子里是一个清教徒，要是

生逢其时，他会发现自己与保罗派或帕塔伦派或波格米尔派或卡特里教派或任何其他与此类似的异端邪说，这些建立于波斯信仰摩尼教基础上的、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而性则是物质最邪恶的体现的宗教信仰，不谋而合。

交配的快乐何其污秽而短暂，

过后又是何其懊丧。

性爱的快乐是如此粗俗而短暂，他如是说，激情之后是极度的无聊。于是，他继续向他心爱的人祈求，他们不应像牲口一样为交配而交配，而应躺在一起，嘴唇贴着嘴唇，别无其他举动，以免于辛劳与羞耻。这一劝诫之含义体现于《特里马乔的晚餐》（*Trimalchio's Supper*）中。该作表示，彼得罗纽斯是同性恋，害怕跟女人在一起会硬不起来。也许同样的解释也存在于大多数这些异端邪说的追随者的心底。但他合理解释了自己的动机，特罗吉尔亦是如此。这是一座积习难改的异端之城。

这里起初是一个希腊人定居点，后来成为一座罗马城市，再后来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它又被游荡的保罗派信徒占据。12世纪时，这座城市被撒拉逊人洗劫，居民被驱散到大陆上的村庄。然而，这并未打断异端的传统，因为当匈牙利国王将他们聚拢，把他们重新安置在他们的岛上，他们很快又接受了卡特里教派思想的影响。这一教派从保加利亚到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沿海，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这样的旧态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摩尼教——因为这些异端邪说不妨并成一类，置于它们母教的名下——代表了热切的人们对于年代久远、积重难返、违背圣灵教诲而犯下罪恶的宗教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样的宗教装出一副迄今什么都已知的模样，因此可以定下一个体系的教规教义，以保证人们得到拯救。最开始，它是为了反对琐罗亚斯德教的极端宿命论，因为后者声称人的命运由星宿决定，人唯一的任务就是谨言慎行，以完成这一宿命。感情激越的摩尼创造了一个神话，表明宇宙是一片道德成就的田地。他一是受了基督教的启发，因为基督教已渗入许多东方人的心中；二是受到一位阿拉姆天文学家所创立的宇宙论的影响。这位天文学家想象，太初之时，有两个王国，一个是光明王国，一个是黑暗王国。它们彼此相邻而又相安无事。后来，因为黑暗王国的入侵，两个王国混为一体。这就是当今世界之来历。摩尼恰当地将它称为“迷乱世界”。从此，光明界——其与美德和理性同一——的人的任务就是要找回被黑暗物质——其与邪恶和野蛮同一——囚禁的光明粒子，让它们重放光明。

这实际上是极为有用的一个生命观念。但摩尼教的一个缺陷是，其创立者和追随者都严重缺乏想象力，认为他们所言并非比喻，而是一字一句描述

的都是宇宙铁一样的物质事实。在他们嘴里，黄道十二宫就像疏浚河道的挖泥机，将光明粒子挽救出来，储存在太阳和月亮之中。他们的意思毫不含糊，认为星座便是这样的东西。这一直接理解文字表面意义的特点，致使信徒的日常奉行都成了一种寻宝活动，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难堪。要说粪便为何物的话，那显然是黑暗王国的一分子。因此，摩尼教教士——也即"上帝的选民"——的任务就是服用大剂量的泻药，而且是堂而皇之地服用。几个世纪之后，当善于发明创造的中世纪欧洲人，开始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令人厌恶之物的喜爱——我们身上最令人憎恨的一种品性——时，这一日常奉行不仅荒谬，而且危险。一个自然人，未受过教育的矫正，不会热爱美或快乐或和平，也不想吃喝和享乐。总体而言，他会厌恶酒、女人和歌曲，而更喜欢斋戒，喜欢在哀伤中悲鸣，并且不生育子女。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要举办宴会就需要建立友谊，就得花钱；要享乐就必须培养坚毅、隐忍的品格，就得有聪明才智；要娶妻生子就必须承担养活他们的沉重义务，而更沉重的一项义务是还必须爱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慷慨的种种表现。而自然人却是吝啬的。其吝啬占据摩尼教之日常奉行，并极尽其效用，直到整个昏头昏脑的欧洲都可能接受它为止——事实上，是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不惮于采用一切手段，甚至是大规模谋杀，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才使他们不致为其所蛊惑。

我们有一个习惯，倾向于同情被捕猎的兔子。但读过较多关于西欧异端分子的文字后，我们不禁怀疑，在此，这些被捕猎的与其说是兔子，毋宁说是自负的臭鼬。在朗格多克，这一信仰似乎有过一些令人愉快的转变，但异教欧洲呈现给我们的，绝大多数都是令人恐怖的场面，其中无以计数的人为有权实践可能是某个疯狂的丧葬人员编造的恶作剧，而欣然就死，甘当烈士。其中一种尤其可怕的宗教仪式，是对天主教临终涂油礼的一种拙劣模仿，被称作"纯洁灵魂礼"。每一个快死的人都要被教士询问，是愿意做一个自白者，还是愿意做烈士。如果做自白者，就三天时间里不给他任何吃的或喝的东西，除了一丁点水；如果想要做烈士，一只枕头就会压在临死者的嘴上，同时有人给他念诵某种祷告经文。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如果他活了下来，就会被升格为牧师。这一极其愚蠢的可怕行为，常常被用作一种自杀手段——这些异教徒对此却甚是上瘾。而因为他们相信死亡时经受痛苦，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可以免于这样的痛苦，于是那些十足的狂热者为实现这一目的，便吞食碎玻璃。这一信仰还给予了某些被动谋杀手段以鼓励。患者看护人被鼓动当死亡临近时，积极掐灭生命。具体操作方式，可以从法国的一个案例看出来：一个女人给她还是婴儿的孙子施行"纯洁灵魂礼"，阻止孩子的母亲给它喂奶，直至孩子最后死亡。根据这一恋尸癖以及广为接受的性肮脏的教义，他们更将之推向极致，甚至禁止女儿触碰自己的父亲，即使他非常苍老，女儿是护士也不行。数以百万的人为之达到了一种迷狂的程度。整个近代史的境况可以从这一异端邪说在西欧得到广泛接受的状况中推演出来：其内在之恶意，舍爱而求恨，舍和

平求战争，有勇气死，却无勇气生。

这不可能是这些异端邪说的全部真实面貌。其与生俱来的如此高尚的构想，必然也会结出某些高尚的果实。它自身的光明粒子不可能全部消散无踪。然而，它的成就却被敌人连同它的种种失败一并踩入泥坑了。匈奴人与阿瓦尔人都不及东正教军队勇猛，后者将阿比尔派教徒、卡特里派教徒清扫得如此干净。巴尔干各国的异教徒幸免于如此的扫荡，只是因为这些地方为土耳其人所占领——不过，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各种社会建制的摧毁程度并不亚于前者，只是原因大不相同而已。正好在特罗吉尔这地方，保存有摩尼教文化的一个样本。城市中央有一座大教堂，矗立在一个彩旗飘扬的广场上。人们从13世纪开始修建这座教堂，以取代另一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大教堂。那座教堂被撒拉逊人烧毁后，人们又坚持使用了它几个世纪。长久以来，它一直是帕塔伦异端教派的一个据点。其信众都是非常善于隐藏自己信仰的行家里手，因此至少有一次，在其历史上，曾担任主教，掌管教堂圣坛。在通往这座大教堂钟楼的门廊里，有一个上有雕刻的入口。这是我所曾见过的最宏大、最纯粹的摩尼教艺术作品。自然，在法国也有许多异教徒建筑的标本，不过那些建筑因为法国本身灿烂的文化而被改造了。在这地方，新生而充满活力的摩尼教，被嫁接在了罗马与拜占庭文化遥远而垂死的枝丫之上。

这是13世纪一位雕刻家的作品。雕刻家叫拉多万，也叫开心坛主。它第一眼就让你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的繁复感，同样的相互冲突的无序，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慢慢渗透、转化，其中每一种形式都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因为如果一种形式果真能实现其意义，秩序就不存在了，只余下一种秩序就在前头的暗示。在门的上方，刻有许多基督生平的场景，但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第一个场景是他的受洗图，中间是他被钉在十字架的受难图，最后一幅图表现的是他接受东方三贤的顶礼。这些场景的描绘，带着一种原始的好奇心，同时显示出一种高度的文化知性，承认那样的好奇心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满足。似乎艺术家心中的一个小孩发问道："这些滑稽的人在干吗？"而他心中那个敏锐的成人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我想……"在门的外侧边缘，一左一右，站立着亚当和夏娃，代表着我们被剥夺和扭曲的命运；他们分别站在一只雄狮和一只母狮上，狮子代表着动物的世界，以及我们与之分享的大自然。在旁边的一组图里，雕刻家将不搭调的事物两两置于一组：绵羊与牡鹿、河马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美人鱼与耶稣使徒。再旁边一列，他展现的是自己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劈柴、制革、做香肠、杀猪、行军打仗。而对于这些凡世图景，艺术家内心的孩子一如先前那样，急切地问道："这些滑稽的人在干吗？"那位成人仍犹疑不定地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我想……"

我们有一种出自东正基督教的、与摩尼教迥异的态度。如果常人真的为光

明粒子或神圣之光渗透，如异教徒所相信的那样，如果因为常人的种种行为，而使这一渗透的难度或高或低，那么每一个个体及其使命，必定可以通过严密的分析估算出来。但如果普通人有灵魂，作为其可识鉴的一部分，如东正教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这灵魂因为人的堕落而染上罪恶，但只要信仰上帝，参与圣事，遵守特定的道德准则，这种罪恶是可以清除的，那么，就不必对个体进行分析，只要遵循一定程式即可。这一差异正好和西欧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差异相吻合——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最初的体认。在西方，聊天被看作一种愉快地打发时间或交流有用信息的方式。而在斯拉夫，人们认为，一群人聚在一起，就应该共享他们的经验，而不断走近获得救赎的世界。在西方，行为被要求遵循一个为人们所认可的模式——这一模式因为人们意志孱弱或刚愎自用而被偏离。而在斯拉夫，一个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就为检验这些行为方式到底属于黑暗还是光明。实际上，在西方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斯拉夫人却酷爱对其进行辩论和验证，也因此而必然陷入痛苦与病态的境地。这一精神气质，从拉多万的想象那充满好奇、热衷探索的特质中，可以看出来。

摩尼教与斯拉夫精神气质之间，拉多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首先，都缺乏高潮。东正教基督徒认为，宇宙通过一定的设计而展示出其自身的真理。这一设计，就如一部结构比例适度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识别，而且令人愉悦。一群不会多得记不过来，也很容易相互区分的人，共同演出一部戏剧。戏剧开始是“创世纪”，然后在“道成肉身”中达到高潮，继而在“最后审判日”与接着的“天国”中获得圆满。摩尼教信徒认为，为数众多的人——常常极难分辨彼此——致力于找到逸散的光明粒子。这一过程，只有当找寻工作完成，才可能达到高潮。这一点，反映于拉多万的想象力出奇地平淡、主题缺乏相应明暗变化的作品中；反映于斯拉夫人乐于通宵达旦、无止无休地交谈的状态中；反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连绵不绝、不曾懈怠的精神振奋之中。

另一相似点，看似一种悖论：一方面是对邪恶的激烈抗击，另一方面是对邪恶本质的容忍。在西方，我们对此很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认定，若对于罪恶发自内心地敌视，必然没兴趣对之细加审视，而只希望将其彻底铲除。但根据摩尼教的教义，没必要对黑暗采取行动，除非它缠绕住了光明。当黑暗王国与光明王国比肩而立，彼此各行其是，那么黑暗王国并没有什么侵犯行为。这一态度，在拉多万对生活不完美形态的忠实再现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非正常事物作为主题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踪迹。而另外的一个相似点，在拉多万的作品中则尤为显眼。他所雕刻的表现“迷乱世界”景象的柱子，托在那些身处彻底黑暗世界的人的肩上。这些人包括犹太人、土耳其人和非基督教信徒。有一种直白而毫不觉得难堪的观点认为，有的人生来便注定遭受痛苦，得不到人类正义原则的公平对

待。加尔文就曾满怀痛苦地承认这一点。但在这里完全看不出这样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对他笔下的那位创造了这一混乱世界的神主有过任何抱怨。这可能是因为，跟希腊人一样，摩尼教信徒认为上帝并非造物主，而是秩序安排者，或者甚至只是必须对其进行整饬的神圣存在体。

罗马天主教会所急切期盼的结果是，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西方持彻底正统的观点，而不能持有任何摩尼教的知见。它以简单的手法，从肉体上将所有不愿放弃异端观念的群体彻底消灭了。然而，在东南欧，人们经受了如此旷日持久的困扰——先是内战和亚洲人入侵，然后是土耳其占领——东正教教会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构来迫害那些异教徒，即便它有心这样做。在那些地方，摩尼教在形式上最终消亡。因为其传说之复杂与虚幻的本质，其宗教仪式之不合礼仪和残忍扭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其哲学思想却留存了下来，并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的头脑之中。在从巴尔干半岛通向其余世界的土耳其大门关闭之前，这一思想向北方传布，影响了俄国这片新的大地。几个世纪之后，因为这一思想的启发，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一代令欧洲瞠目结舌的巨人。19世纪的俄国小说家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的最新复活，这种思想因其太过高贵的品质，永远不可能彻底湮灭。

不过，你不禁想知道，较之于正统思想，这一异端邪说是如何在充满危险的年代给人以慰藉的：是否特罗吉尔的摩尼教信徒与萨罗纳叶的基督教教徒一样，对他们的信仰深信不疑。摩尼教信徒可能会声称，就外敌入侵而言，这一信仰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九死一生，逃过了写满历史的各种灭亡。教授领着我们从大教堂继续前行，观看了那样的图景。我们从城里出来，到了码头，在我们穿过的一道大门前，作为威尼斯占领标记的漂亮的圣马可石狮依然矗立。石狮之上是特罗吉尔的保护神圣乔万尼·奥尔西尼。大约在诺曼征服时期，他曾担任主教。他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因为帮助罗马教皇压制斯拉夫语祷告有功而被封为圣人。横跨一道海峡之上的是一座桥梁，桥面贴了大理石，上面是无数松柏流光溢彩的影子。桥梁将特罗吉尔与一片大陆相连。在这片陆地上，光秃的石灰岩群山脚下，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一小片地势平坦的天堂。庄园的园林围墙上，胡椒树长长的绿叶垂挂；一道道锻铁大门里透出紫荆树斑驳不安的紫色花朵。“你们看，距离非常近了，太近了，已经不可能再近啦。”教授说。

他所指的是1241年，拉多万刚刚开始那个入口的艺术创作之时。蒙古人意在扩张成吉思汗为他们创立的帝国，征服了俄国，横扫欧洲直至匈牙利，贝拉国王和他的王公贵族不得不逃亡。当他徒劳地向其他基督教国家寻求救援之际，侵略者继续扑向维也纳，然后挥兵南下，直奔克罗地亚，一路烧杀抢掠。贝拉国王试图在萨格勒布站稳脚跟，令他的希腊妻子和三个孩子前往海边寻求安身之所。当国王惊恐万分地与他们会合时，他们正仓皇

游荡于斯普利特与克利希要塞之间的地带——就在克利希要塞后面的山区里。即使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恐怕也难以想象像蒙古人入侵这样可怕的行为。不可否认，蒙古帝国的建立，对于人类精神来说终究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因为它，欧洲得以接触到亚洲文化。然而，正如培尔·金特所言："尽管上帝为他的子民考虑得很周到，但就历史的精简和优化方面而言，不，完全不是那样！"

国王和一大群衣衫褴褛、口齿不清的王公贵族、士兵、教士，一路上扛着匈牙利圣明的史蒂芬国王的遗体，以及许许多多从他们的教堂搬出来的圣物，在海岸上来回游走。斯普利特隆重地接待了他们，然而国王暴怒如一个被吓坏的小孩，拒绝了城里人们的问候。他们提供给他的庇护没什么用。他们可能不知道，他却很清楚。他已见识过蒙古人。他要求他们提供一艘船，送他去岛上。黄种骑兵不可能骑马渡海。但根本没有现成的船只。他愤怒地大声叫喊，带着皇后和他的一班人马直奔特罗吉尔而去。这地方距离很多岛屿都很近。他逃到邻近的一座岛上——这岛至今还叫"国王避难所"。一部分随从跟他一起去了岛上，但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特罗吉尔。当夜幕降临，困倦的男男女女在城里席地而卧。因为困乏，因为饥饿，因为恐惧，他们精疲力竭，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可以容身，他们便顺势躺下——在任何房间的地板上、任何宫殿或茅棚里、每一座教堂的任何角落、拉多万打造的入口下、广场与街巷的石块地面上、码头上。他们的财物随便丢在身旁便睡着了。每一艘船上都满满覆盖着仰面而卧的沉睡的身躯，每个岛屿的礁石上也都躺满了人。

蒙古人追赶到沿海一带。没什么能够阻止他们。然而，面对大海，他们不得不止住了脚步。他们相信国王一定是在克利希或斯普利特，而在这两处地方他们都遭遇了阻碍。斯普利特人所提供的保护并非国王认为的那样不足为道。蒙古人习惯了在没有障碍的大地上展开行动，当遭遇来自大海围困之地或严重崎岖不平的地势上的抵抗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但他们还是找到了通向特罗吉尔的道路。他们派了一位信使登上这座横跨海峡的桥，如同任何年代的侵略者，用威胁的语言高声喊话——道义上则一派胡言——"战无不胜的卡衣丹有令：不得维护他人的罪恶，务必将我们的敌人交给我们，以免你们也卷入那样的罪恶，遭到无谓的毁灭。"对于信使本人，传递这一信息肯定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极端时刻——或者是出于一种变态的快乐，或者是因为痛苦。因为听过他叫喊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像斯拉夫人一样讲着斯拉夫语。他肯定要么是叛徒，要么是战俘。要么他是在将他所痛恨的自己民族的人民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因此从他嘴里出来的话才甜如蜜；要么他热爱自己的人民，他发现自己的话苦如胆汁。

特罗吉尔城里的守卫没有回答，因为国王有令，叫他们不要作声。接着我们看到了非常罕见的一幕，历史沿着一种我们在私人生活中熟识的线路发

展下来。在生活中，我们都听见过那种关键性的话语，它解开了悲剧的锁链，在它之后，唯有爱与幸福；在它之后，什么都不曾发生，生活一如往昔地继续，只有一片反高潮的真空。但在历史上，累卵往往终将倾覆。在特罗吉尔，情况却非如此。在这一重要的时刻之后，什么都没发生。信使喊叫出他有震慑力的口信，守卫默不作声，旋即，蒙古人便回家去了。有人认为正当他们在考虑到底是蹚水而过，还是从桥上越过这道海峡时，他们接到消息说，他们的最高统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在亚洲战死，王位继承起了争端。他们急急忙忙一路小跑而回，只是仍顺路烧杀抢掠，途经南达尔马提亚，在那里放火烧了可爱的科托尔城，又经过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特罗吉尔在危急关头有了喘息的时间。国王从藏身的小岛回来，带着他的王公贵族、他的军队、他的教士、死去的圣史蒂芬，以及神圣的金银珠宝，回他的匈牙利去了。但皇后不得不在达尔马提亚滞留了一段时间，直至她的两个在逃亡途中染病的小女儿卡塔丽娜和玛格丽塔死去。她们的坟墓至今还能见于斯普利特的戴克里先陵寝。

让人至今难以解开的一个秘密是：特罗吉尔的异教徒在蒙古人的利剑悬于他们头顶时，是否依靠着他们的信仰，是否对其感到过厌烦。不过，有一点可以推知的是，总体而言，这一信仰不曾给他们造成伤害，因为从中世纪步入文艺复兴，他们在艺术与勇气方面都有着傲人的成绩。比拉多万的作品晚了两百年的大教堂里面，在繁复无比的穹顶之下，是一种精美的图案，由石头雕刻而成，石头上有一朵暖灰色花朵。这里有一个洗礼池。洗礼池装饰过度，不过在那一系列的精致装饰板上，每一块上面都有一个淘气的胖娃娃，手持一个火炬，从正要关闭的沉重的门里用力挤出来。表面上，这是对永生概念的某种阐释，实则更可能是出于文艺复兴时人们对漂亮小男孩的喜爱。到处是让人喜欢的不大的宫殿，威尼斯哥特风格，带阳台、格子窗，布局紧凑美丽，上面满是如爬藤般的优雅的装饰。其中在大教堂对面的一座最是可爱，即奇皮齐一家人的官邸。正是从这座官邸里发现了《萨迪利空》一书。在特罗吉尔这地方，寓于丰富的建筑中的历史事件，就如浸在糖浆里的黄蜂。

当你走进奇皮齐宫殿的庭院，会发现两艘旧船的船头雕饰，一个雕的是一位优雅的胜利女神，另一个是一只巨大的公鸡。两个雕饰都立在一根很长的铁柄上，铁柄由一只长长的铁手举起。从特征上看，它们都显得非常狂暴，似乎由一群绝望的人打造。一个船头雕饰所属的战舰，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中，由特罗吉尔资助，装载特罗吉尔士兵，指挥者是路易斯·奇皮齐；另一个属于一艘被其俘获的土耳其战舰。回到家里，他把这两个雕饰放在那，自此之后，再没移过地方。我们再一次意识到西方对这一海岸所欠下的债。土耳其人的海军力量在勒班陀被摧毁后，再也没有重建起来。击垮土耳其舰队的战舰包括：一百一十四艘威尼斯战船、一百零三艘西班牙战船、教皇出的十二艘、萨沃伊公爵出的四艘、来自马耳他的三艘、来

自达尔马提亚七座城市的七艘——尽管当此之时，海岸地区遭受抢掠，已是一贫如洗。甚至连被彻底摧毁的拉布和克尔克也各出了战船一艘。而特罗吉尔尽管贫穷，也同样捐献了极大的一笔钱财——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威尼斯人一直强迫这个城市缴纳钱物，用以贿赂大陆上的土耳其军官和一般政府官员，因此其贫困可想而知。不单是拉布，还有特罗吉尔，事实上包括这片海岸上的每一个社会团体，都不仅捐出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还为西方的安全而流血牺牲。

既然特罗吉尔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创造了如此美丽的艺术成绩，展现出如此的勇气，游客有可能认为，外来统治对于达尔马提亚并非坏事。但想想这种看法是何等肤浅，就如一群游客来到孤儿院，看见孩子们脸洗得干干净净，做的手工活漂亮齐整，就忘记了慈善机构里的生活在所难免的不公不义。海岸居民不仅被他们的外来主人掠去了金钱，还夺走了道德规范。“进达尔马提亚教堂来，”教授说，“你们会看见我们在这里是何等野蛮，何等的可怕而美丽的野蛮。”在那座精致的教堂里有一座坟墓，是一位贵族遗孀为她被谋杀的丈夫修建的。一只暴怒的母狮，雕刻精细而满怀虔诚，跟任何圣母哀子像里的圣母一样。母狮昂首向天，柔软而湿润的嘴上写满复仇的愿望。“刻入石头里的是一种家族世仇，”教授说，“家族世仇在这里就如在科西嘉那样，简直是一种诅咒，因为上帝将我们创造成一个非常喜欢争吵的民族，而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则鼓励我们之间任何的不和，这样我们就不能团结一致，也就更便于他们征服和统治。”

15世纪时，当特罗吉尔最终变成为威尼斯的一部分之后，这一政策更是变得可怕。难民常常给接收他们的国家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伴随他们而来的文化习惯，必定会与他们在新家所面临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当土耳其人横扫巴尔干半岛时，一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主变成穆斯林，获允保有自己的土地，而那些坚持自己信仰的人则逃往了达尔马提亚。他们是纯粹的封建领主，在西欧，这一类型的地主很早以前就已消失。他们不能理解达尔马提亚各城市的宪法，因为根据这一宪法，贵族和平民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利，但除此以外，所有人都受到平等的保护。这些难民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必须礼貌地对待那些没有法律地位、被公认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而且如果他们不遵守这样的规矩，那些贵族同样会反对他们。不过，事实上，一些缺乏民主精神的贵族憎恨平民，在这一点上很乐意站在难民一方。因此，这在民众间引发了广泛的争执。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争执会得以矫正的，要不是威尼斯人从中看到机会，认为这正好可以为他们“分而治之”的邪恶准则所用。他们私底下对各方都给予支持，以使他们互相争斗，同时禁止任何本可以改善社会境况的立法改革。

不过，他们喜欢更简单的恶行。17世纪时，特罗吉尔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代表人物，一位才华横溢的文艺复兴绅士，名叫乔万尼·卢修斯，或者约万

·卢奇齐。他正是波斯尼亚难民的后裔，在罗马接受教育，其后一生致力于对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历史的研究。其巨著《达尔马提亚与克罗地亚王国》至今仍是一部经典之作。他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因为尽管他写这本书时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对真理的热爱却主使着他。但一个与他有世仇的人受威尼斯指使，扳倒了他。那是一个贵族家庭成员——该家族与卢奇齐家族是积怨已久的政敌——名叫保罗·德·安德烈斯。其本人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正着手于一部对抗性著作。他向当局告密，说卢奇齐正在搜集资料，意图证明威尼斯人违反了达尔马提亚各城市古老的宪法。后来，当威尼斯总督前来特罗吉尔访问，提出要借住卢奇齐宫殿，约万·卢奇齐借口说妹妹病重不方便婉拒。于是安德烈斯再次向当局告发，这一次是揭发他的对手撒谎。随即，卢奇齐被投入监狱，与一般罪犯关押在一起。与此同时，一队囚犯将他的家人悉数赶出他们的官邸。总督霸占了他的家。卢奇齐本人正要被处以笞刑，但特罗吉尔的主教动用教会权力救了他，并帮他获允前往罗马避难。三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后，他客死在罗马。这对于一个爱国者，真可谓是一个奢侈的惩罚。

“我们一直以来实在是太需要和平了，一丁点儿和平都好，”教授说，“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过任何和平。我这就要带你们去看一个政权遗迹，这个政权曾给过我们美好的和平承诺。但我预先提醒你们，你们会笑话它，这遗迹并没有它应有的壮观。”他带领我们绕过城市宽阔的边缘——这地方的码头上曾矗立着城墙——来到岛屿的北端。没一会儿就走到了，因为这城市出奇地小，不用十分钟你就可以走遍。“仔细看个清楚吧！”教授说。我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这片土地上惊人一幕：珍贵的建筑，没一座不是那么美妙绝伦、那么似真似幻，或者说那么高贵。一座中世纪塔楼旁边，一块废弃的地上，立着一座没了屋顶的很小的神庙。礼拜堂建在一个平台上，平台由粗加工的石头砌成，没一点儿古风的感觉，完全看不出是给神灵献祭的地方，直接唤起的是公园里某个下午时光的记忆，简直是一个户外音乐演奏台。“可不是法国风格的？”教授说，“如此简洁，对这地方沉郁的悲剧色彩和它的过去如此地不敬，却又如此地令人赞叹。瞧这四周，曾经全是奔涌的海水。直到我们有了南斯拉夫，沿岸给这城市带来疟疾的沼泽地才被排干。而要排干沼泽，就必须挖深海峡，让海水从海岸后退。但当时马尔蒙元帅修建这座观景台时，这地方还处于波涛之中。天热的时候，他常常跟他手下的那些军官坐在那里玩牌。这让我们觉得特别好玩：玩牌是如此一种无忧无虑的娱乐活动，而马尔蒙却是一位英雄，一位大英雄，是唯一一位真心对我们好的外国统治者。虽然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原谅那些征服者，但又发现在心底，我们承认要是法国人在这里待的时间更久该会多好。”

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景台，在处理生活中的小事小物上充满敬意，不温不火，为原本并不神圣的东西赋予了一种法国式的神圣色彩。这比那头

母狮那张抽搐的、湿漉漉的嗜血的嘴要好——没错，要好不知多少。对此它很清楚，并将其隐匿在了身后。它在这怡然自得中，在这廊柱之间，在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之上，宣告着刀剑被取代。因为实际上，马尔蒙可能一度在这地方过得特别开心。首先，他极其不喜欢自己的妻子，在这地方，相隔遥远，他能有充分的余地与她周旋。其次，他非常喜爱这地方本身，他是喜欢斯拉夫性格的人之一，他发现相比之下，其他民族的人都死气沉沉的，很没劲。再次，他也喜欢作为一个远离家乡的殖民地总督，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当然，他也非常虚荣。”教授说道，语气里透着不以为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来没明白为什么大家反对虚荣，除非它使人受到蒙蔽，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而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

而如果马尔蒙不虚荣，他将是个假正经。在观景台上玩牌时，他一定非常开心。他从来基于理性与德行生活。他本可能脾气非常火爆，多亏有这样聪明的设施，使得他温和了许多。他在创建的是一番事业。当别的许多人为满足他们的勃勃野心，而不得不诉诸暴力和贪婪，他却一举之间既赢得了成功，又在一个原本野蛮的土地上，播种了和平的规矩礼节、学识修养与卫生习惯。他非常诚实地面对帝国与生俱来的道德问题，甚至不曾给自己的诚实打折扣。在回忆录里——作为一个行军打仗的人，他已写得很不错了——他承认一个国家要想控制外国领土，不对被征服人民采取些手腕是不可能的。他毫不掩饰地记下特定情况下的一些具体事例。当时，他发现有必要玩玩政治手腕，在朋友中间煽动不和，以确立起法国的权威。场面可能是这样的：在他等着某位伙伴出牌时，他抬眼望着波光荡漾的亚得里亚海，或是滚滚热浪中仿佛如大海般颤动的狮棕色群山，迷糊间他意识到那个内在的自我不停问着自己的问题：“我在做什么？这样做好吗？”他无意间听到的回答当然不会是自吹自擂：它本可能为自己所参与其中的过程而自豪，但想到自己参与的广度，它可能就变得谦逊了。宇宙混乱无序，它唯一令人讨厌的就是混乱无序。人类被赋予了——无论其赋予者是一种人格力量还是非人格力量，都无所谓——一种对秩序的预见力。他可以纠正宇宙的无序状态，将它编队为一个闪亮的和谐整体。马尔蒙曾挥剑指着一个圆鼓鼓的柱子底座，命令它变直；他曾举起他师长般的教鞭，于是一根倾倒的柱子重新立了起来。他可能不会要求更少，但也不会要求更多；他可能对自己尽己所能地发挥出自己有限的力量，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不过在这地方，还有着一种更宏大、更黑暗的智慧。城市的边上，立着这个由六根脆弱的柱子支撑起来的观景台。在特罗吉尔市中心，立着那座大教堂，教堂的柱廊显得气氛沉重，雕刻着拉多万的预言。他宣布，人类自身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就如这宇宙，人类是光明与黑暗的融合体；因此，人类必须致力于解放光明粒子，而不是改造宇宙，因为鉴于光明与黑暗互相融合这一缘由，宇宙是邪恶的，必须弃之不顾。由于它让人难以承受的

神秘难解性，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它远远比东正基督教教义要难，远远比后者神秘。它加诸人类一项极大的责任，使人类认识到其人生就是一场救赎行动。与此同时，它又告知人类，他们因为遭受天谴而彻头彻尾地被污毁了，唯一可开展救赎行动的介质也同样被玷污了。它认为，这项责任之所以值得接受，并终将戴上成功的桂冠，不过是因为其抽象的本质，不过是因为光明终究是光明，因此值得热爱。

这可能如拉多万之所想，并且从马尔蒙的经验中得到印证——他后来再在观景台上玩牌，可能一点也不开心。很多人称拿破仑“人王”，他在成年时期赞同摩尼教的思想观念。开始时，他是一位光明战士。马尔蒙在与他共事的过程中，肯定也觉得，他是在驱赶源自法国大革命失败、源自欧洲乱局的黑暗。事实上，对于他们之间的这一关系，他几乎再没其他喜欢的理由。这是人类非理性的一个最为奇怪的例子：真正了解拿破仑的人觉得拿破仑并不可爱，甚至有点让人讨厌；而无数他死后很久才出生的人，除了他们所共知的文字记载，再无其他认识他的途径，却固执地爱戴他，并指责马尔蒙对拿破仑冷漠，不知感恩。但正如马尔蒙在回忆录里所解释的，他在年轻时就认识了拿破仑，从来就没真正喜欢过他；他也没理由要对拿破仑感恩戴德，因为他每一步的军衔晋升，都是靠自己实实在在的功绩挣来的，在任何其他军队，他也会获得这样的晋级。他和拿破仑并肩战斗，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为国家秩序而战斗。

突然间，拿破仑的灵魂里开始流淌出黑暗。他身上的光芒曾经是白色的，此时却变成黑色。从他与属下间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非常喜欢与其主旨无关的纷争，并且非常兴奋，就跟性能力衰退、无力做爱的症状一模一样。马尔蒙在他的回忆录里，以一个有着敏锐洞察力与精准笔触却缺乏想象力的人的角度，记录了当时拿破仑寻求在他身上满足自己胃口的事。这让他既不安，又感到恶心。1809年那次战役期间，一场漂亮而疲乏的战斗之后，马尔蒙回到司令部汇报战况，拿破仑却满脸的不高兴，跟他嘟囔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当马尔蒙回到驻地的破屋子里，他一头倒下，心中充满了痛苦的疲惫与屈辱。更让他极度伤心且不解的是，他的房间里涌进越来越多的人来。突然间，他发现大家都是来祝贺他的。那两个半小时的唠叨，原来是拿破仑想给他晋升元帅军衔增加一点调料：就像一位恋人，蠢头蠢脑的那种，可能先挑事儿跟爱人吵一架，再送给他或她一份礼物。但马尔蒙的兴趣在于战争的艺术，在于法国，在于建立起一种他认为最有利于法国的国际秩序。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一级军衔晋升到上一级军衔，这事再自然不过了，也是惯例使然，凭什么要被伴以无礼相待，伴以对他感情的粗暴践踏。他带着克制记下来这些话。他写这些时，拿破仑早已经陨落。但在这彬彬有礼的文字背后，却有着一个困惑不解的声音。如果拿破仑觉得我足够优秀，值得晋升为元帅，这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对此不开心呢？马尔蒙在任何地方都喜欢开心的事

情。他心中有光明，他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光明王国。

当他第一次前往达尔马提亚，在他和拿破仑身上的光明肯定都在起着积极作用，要将自身从忍受已久的囚禁中，从这些被黑暗淹没的国土上解放出来。一个强大、和平的伊利里亚，就要从几乎自有史以来便一直处于其中的战争与混乱的状态中冉冉升起，本可以明亮如一轮冲破乌云的明月。在拿破仑的人生中，一度，整个欧洲在法国面前都似乎毫无抵抗之力，只为身披那不朽的光明，重新升起。但只几个月之间，前景倏然变化。就像发生了日食——摩尼教信徒可能会认识到其根本所在。在拿破仑身上，此时似乎只剩下黑暗。在马尔蒙的信函中，他向拿破仑呈列了自己关于一个灿烂的伊利里亚的构想，作为理想化的欧洲前景的一部分，请求他给予帮助，包括人力、钱财以及道义上的支持，以实现这一理想。拿破仑对马尔蒙的所有请求置之不理，回信冷嘲热讽，或者干脆不回信。

在这观景台上，马尔蒙肯定觉得自己很难再专心一意于玩牌了。最后，我们知道，他一把将牌扔在桌上，把椅子往后一推，起身走开了，并从此离开了达尔马提亚。他身上也存在毛病。他也是一个人，身上兼具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因此，他并不是全副身心地想让光明获取胜利；他乐见黑暗继续存在，乐见这个宇宙，这迷乱的世界留存下来。他，以及所有与他有同样理性的人，都表露出这一问题。他们将权力留在拿破仑手中，而此时的拿破仑早已失却理性，正如早年追求荣誉一样追寻着耻辱。他不听谋臣劝告，奔赴西班牙，奔赴俄国，不为别的，只为一次长途旅行，而最终奔向黑暗。但他这一变化在民众中没有激起恐惧，相反，民众对他的激情达到了一个高潮，似乎这就是他荣誉所及之极致。民众疯狂崇拜的伟大人物不必善良，甚至不需要有才华，但他们必须展现出光明与黑暗的融合一体性，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性；他们甚至必须承诺，以黑暗占据优势的方式，宇宙当永远保持它不完美的状态。

拿破仑将欧洲安全地带回失败的边缘之后——相比于天堂，欧洲人更喜欢这种状态——达尔马提亚在一百年时间里什么变化也没有。奥地利统治是纯粹的负面作用。斯拉夫人被激起了对讲意大利语的地区的仇视。这些地区的人要么是从未与斯拉夫人融合的罗马定居者的后裔，要么是威尼斯移民。它们之间既无相关性，商业贸易也少得可怜——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铁路规划，都是鼓励它们自身兴旺发达，而使斯拉夫国家与整个欧洲相隔绝的。在特罗吉尔，野草生长在街道和广场上。但其城市生活的传统仍不曾断绝。战后，一如达尔马提亚海岸上许多其他城镇，特罗吉尔为意大利人所觊觎。后者于1919年9月的一个深夜，派出一小支部队将它夺下。城市本来应该有八名南斯拉夫士兵守卫的，但就在前一天傍晚，这些士兵毫无戒心地接受了一些亲意大利分子的殷勤好意，结果全都人事不省。因此，城里的人们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城市已经落在了意大利士兵手里。

但这座城里只有五个亲意大利家庭，其余的人扑向入侵者，徒手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一位妇女冲向照管一挺机枪的四个男人，将机枪从他们手中夺了过来；许多其他的人将躲进人家院子里的意大利逃兵赶出来，对他们拳打脚踢，扯去他们的头盔，拔掉他们的腰带。“我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教授说，“因为对于一位女士来说，这样暴烈的行为是很不成体统的。她们不是泼妇，她们是淑女。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她们的姓氏许多个世纪以来，在特罗吉尔编年史里都备受尊重，她们任何人也没有忘记她们祖先的伟大功绩。”

城市里现在一片寂静：它是一座空旷的城市，因为它跟拉布城一样，遭受了一场瘟疫的重创，人口再没能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因为直至最近都一直严重侵扰着它的疟疾导致了不孕不育。但它仍然存在着。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在整个欧洲，到处都有传言说，它已经完全毁了。在大教堂近旁，有一个凉廊，它是那座古老的法院的门厅。具体有多古老已无法追溯，因为法院是用被撒拉逊人毁掉的古城和附近的罗马定居地的残砖断石建造起来的。奥地利占领时期，它被淹没在废墟里。是南斯拉夫政府给它盖上屋顶，将它整饬一新的。尽管如此，在所有反斯拉夫的圈子里，这却成了南斯拉夫人野蛮的一个标志——就因为一点小小的瑕疵。事情原是这样的：15世纪晚期的时候，在法官们就座的石桌后面的墙上，塑有一头圣马可的长有翅膀的狮子，环绕着它的是一些圣人和象征正义的标志。每一个达尔马提亚的城镇都在某处或多处的墙上、门上，或公共建筑上，有那么一座雕塑，而且一般都很漂亮。通常，狮子身上呈波浪图案，显得富丽堂皇，让人想起来，这种我们现在所知晓的艺术造型，是布龙齐诺和帕里斯·波登首先采用的，雕像用黄铜取代黄金作为材质，就像梅·韦斯特[注]。从照片判断，凉廊里的这头狮子可谓这类雕塑中一件非常杰出的代表作——一朵石头材质的镀金百合。奥地利人在达尔马提亚的时候，这头狮子一直暴露于风吹雨打之中。不过，南斯拉夫人将这里修葺好后，它便获得了适当的保护。

但不幸的是，1932年，大约圣诞的时候，一群特罗吉尔年轻人，喝醉了酒，他们更狂放、更单纯的感情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于是记起来，意大利人曾试图盗取他们的城市，而且至今贼心不死。他们给这头狮子和城市港口的另一头狮子造成了严重损毁。它们差不多被彻底砸烂了。在一家博物馆的墙壁上，它们依然存在着，形状基本上还看得出来是狮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件，证明了人没变成四脚着地的动物纯属运气，除此再没别的意义。然而，意大利却借此机会，向达尔马提亚展示出它非比寻常的种种企图来。整个意大利，举国都是反对南斯拉夫政府的示威游行，组织者是两个专门这样捣乱的社团：“尚未收复的达尔马提亚”和“达尔马提亚亲善者”。墨索里尼本人就曾宣称，从这些醉酒年轻人温和的街头习气中，他看到“一种清清楚楚的仇恨心态，一种对意大利非常明确的反抗……这是

一场经过事先周密策划的阴谋……其负责党派的成员就隐藏在各级统治阶层中……特罗吉尔的狮子被破坏了，但它们从被打烂后的废墟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地站了起来，作为一个有生命的象征，作为一个承诺”。为维持和平，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忍气吞声。更糟糕的是，它进一步强化了对自己人民残酷无情的传统，镇压在南斯拉夫各地自然发起的、反对意大利的对抗性游行。

墨索里尼此行径之邪恶与荒谬性，我们可以从如下类比中估量出来：科克市一群醉酒的小男生，损毁了几面英国占领时期留下来的英国国旗，结果英国国内发起了大规模敌视爱尔兰的游行示威活动。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意大利人态度之变态，因为我们还得记住，一百四十年前，特罗吉尔就从威尼斯的统治下独立了出来，因此到那时，除了威尼斯人，无论罗马人还是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的人，都不该产生这样的想法，觉得圣马可狮子事件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顶多不过激起一点对威尼斯的情感支持。这一盛大的佯装的情感，导致了一个伪造的事实。先是整个意大利，进而是中欧，进而是全世界，都认为特罗吉尔毁坏了城里所有的历史古迹，甚至将他们的整个城市都毁掉了。“啥，你们去了特罗吉尔？”我第一次访问达尔马提亚之后，在伦敦避难的一位德国教授对我说，“野蛮的南斯拉夫人把所有值得一看的东西都夷为平地了，可不值得你走这一遭啊。唉，要是你在我去那地方的时候，也就是战争爆发的两年前去那里访问，该有多好啊！你完全想象不出当时有多美！”中世纪的欧洲非常无知，它相信有独角兽和美人鱼，它论辩一颗针尖上能容下多少天使跳舞。现代欧洲之愚蠢，则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令人惬意的装饰性标志，它没有引领我们对存在之不同位面的真实情况进行论辩。出于种种卑劣的动机，它自欺欺人，对于一座在奔涌的浪涛中巍然屹立的城市，对于它七百年来依然故我的古老建筑与古老家族，它竟然说它们不存在。

---

1. 梅·韦斯特（Mae West, 1893—1980），好莱坞女演员。

斯普利特III

我丈夫在给我读《达尔马提亚史》里的一则童话。故事是关于皇帝戴克里先的，整个这片海岸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黑山，都在讲着这故事，它是我们都知道的希腊神话中关于国王迈达斯的那个故事的翻版。故事似乎讲的是他身体上藏有一个很好笑的秘密，整个世界上，除了他的理发师，谁都不知道：他的耳朵有点像驴耳，头上长有公羊一样的角。因此，他的每个理发师给他理过一次发，就再也不见了踪迹。最后，有一位理发师，是一个寡妇的独子，被告知第二天必须给皇上修胡子。他害怕得要命，但他母亲告诉他不要绝望，给他做了一个小饼，用自己的乳汁润湿，告诉儿子说："你在给皇帝修面时，吃一小块这饼。"他于是照办了。戴克里先闻到那面饼奇特的香味，就要了一小块吃。他非常喜欢，却又发现那味道很特别，感觉是尝过却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的东西。"你母亲用什么浸润这面饼的？"他问道。"她自己的乳汁。"理发师回答说。"这么说，我们是兄弟了，我不能杀你。"皇帝说。之后的故事发展人们都很熟悉了：理发师活了下来，但被要求发誓保守秘密。但他受不了这秘密的困扰，于是悄悄告诉了一支芦苇，这支芦管被村里的孩子做成了一支芦笛，每次吹奏，芦笛都会重述一遍这个秘密。

"斯拉夫人口口相传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具斯拉夫特色啦，"我丈夫说，"这里面包含着对于权力观的非常激烈的批评。创造这个故事的民间想象，当为皇帝高高在上的威风以及他对一个社会的作用负责。因为它认为，只有当一个皇帝，按照惯例，是一位超人，身上不具有人性当中包含的那些略低一等的特征时，他才可以施行自己的权力，他的臣民才可臣服于他。因此，皇帝为保护这一惯例不被破坏，就必须获允采取某些举措——而一般人如果出于私人目的这样做，则是不被接受的。但在这一故事中，表面上是那位母亲救了儿子，实则是本性的力量在起作用。以斯特林堡注的意见来看，这位母亲是女人之可恨的一个绝佳代表。她拆解了男人依靠生命之原始事实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对于这些事实，男人们达成共识，不予理会，以便超越它们。她向皇帝证明，从根本上来说，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为维持一种有用的惯例而杀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行为，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却也是在杀害自己的兄弟。不过，在这故事中她也没有获得胜利，因为故事警告说，一旦这种惯例被打开一道缺口，它必将崩溃：理发师所知道的，村子里的孩子不用多久也必然会知道，进而必然导致混乱无序的局面。这个故事取得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但为了保持这种平衡，它同时表现出一种偏颇。因为这一偏颇，使得斯拉夫人自此很难安定于某一政府的统治，进而导致一种动荡的政治生活。"

“我在想那女人放进面饼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一个成年儿子的守寡母亲竟还有乳汁，可得做大量解释才说得过去。不过我们的朋友到底在干吗呢？已经八点半啦。”因为我们在卧室在等待着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X先生和X夫人。他们将带我们前去参加城里的慈善节，到时将有舞蹈表演和歌舞晚餐。我们还将跟我们另外的朋友，A先生和A夫人见面，我们将与他们四人共度今宵。“嗯，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我丈夫说，“因为他们说好七点钟来的。”“那我们下楼用餐吧。”我请求道。“算了，”我丈夫说，“要是我们下去的话，肯定会吃得很多，因为这里的食物实在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在舞会上还要吃，我们就会变成酒囊饭袋式的西欧人啦。要是你饿了，那是你自己的错，是你拒绝了那位服务员的建议，不把那么好吃的冷煎饼带回来的。”就在我们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之后不到几分钟，X先生与X夫人传来口信说他们已到了宾馆大厅，不过很希望我们先不下去，而是让他们上来，因为他们有一件私人事情要跟我们说。

他们一脚踏进屋，X夫人——一个月光与烟灰黑的影子构成的精致人儿——将她厚厚的大衣从她纤弱的身躯上抖落下来，就如歌剧前面的宣叙调。她和她出奇英俊的丈夫都异常兴奋，让人都不自觉地想到意大利歌剧。一出悲剧，却不痛苦，演技精湛，拿捏得当，又百分之百真诚。他俩同时开始跟我们道歉，因为让我们等久了，因为没能尽其可能地向我们致以最热烈的全方位的殷勤款待。但他们发现A先生晚上的计划已没法实施。绝对没可能。让人太意外的是，A先生竟会另行安排。要不是他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要不是他刚在美国待了几年才回来，要不是他的妻子是捷克人，他根本就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因为这些，非常自然地，毫无疑问地，使他不了解斯普利特的公众舆论情况。

当X夫妇两个小时前接到A先生的信，他们说，他们一下子都瘫软了，惊恐地瞪着对方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将他们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不是为方便我们，A先生是不会提出这建议的。因此，难道为实现达尔马提亚殷勤好客的理想，他们便有责任不理会这一举动将冒犯斯普利特的公众舆论？为做决断，他们前去拜访了一位朋友，一位九十岁的法官，斯普利特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的成员，跟X先生的母亲有亲戚关系。他告诉他们说，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棘手，不过他相信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善解人意，因此不太可能会希望他们冒犯他们生养之地的感情。法官还补充说，我们在国王加冕的时候出来旅行，而没留在英国，说明我们很有可能是某个政府反对党的成员，因此也一定更能理解他们的立场。于是，X夫妇又前去拜访A夫妇。当他们听完这番道理，他们也明白了过来，并当即表示歉意。但无论如何，他们仍不得不去参加节日，因为他们已答应做一项比赛的评委。事实上，他们提出了另一项安排供我们考虑，如果我们生主人的气——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更改了待客计划。

我们觉得不值得为这么一件事情激动，并意识到他们太过于高估了我们的反应，以为我们那么容易受伤害。此刻我们的感受恰如两只自在的蟾蜍的感受——当亨利·詹姆斯与伊迪丝·华顿两人中的后者微妙地坚持认为，应该平等地对待它们/他们。“我给你们倒杯白兰地吧，我从伦敦带来的。”我丈夫说。我看得出来，这可怜的家伙在尽力表现得很大度，很有修养——尽管事实并非他们贴给我们的标签的样子。我们慢慢地喝着白兰地，尽量在这场危机中都不致失态。接着，他们继续解释说，A先生忘了，这次慈善节举办的目的是筹集善款，以帮助穷人解决看病就医问题。组织者是Y医生及其夫人，他们是从如今已移交给了意大利人的达尔马提亚的扎拉市移民来的犹太人。他们差不多是市里唯一知名的亲南斯拉夫人士。他们筹集起钱，可能会用于与一些机构合作。但这些机构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是政府建立的。因此，慈善节遭到斯普利特所有有名望的家族的抵制。这些人属于X夫妇或A夫妇的同一社会阶层。如果我们想去，其他的人可以带我们前往。但X夫妇俩叠声向我们宣告，好似威尔第早期作品里的二重奏，他俩绝对不可能带我们去。

我们忍住没提醒他们，将来某一天，他们可能会遇上某些真正值得担心的事。我们暗示说，因为我们已答应我们的一位非常客气的店主朋友，要去参加这次慈善节，我们希望能遵守诺言。我们的确去了，那场面也让我们非常开心。那些漂亮的年轻人，在他们父母充满爱怜的注视下，表演优美，而又显得不自在。这场景，我们在埃克塞特，在爱丁堡，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都曾见过。有那么些机构的存在是普遍性的，而如果其中有哪家机构被证明动机美好而单纯，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两位组织者，医生和他夫人，非常有趣又令人同情。他们似乎身在斯普利特人的传统之外，这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犹太人：热心、理想主义、聪明，对于联合与集权化过于轻信。他们常常以为，怨恨和愚蠢只是特定地方的问题，任何一般的政府都会致力于予以矫正。这一乐观主义心态，因为他们认识到的确存在着一股团结的力量——总体而言，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一力量是善的——而进一步得到强化。他俩都在学习英语。说起这个，他们脸上洋溢出快乐的笑容。似乎在他们看来——而且似乎比我看得清楚得多——他们正与自由主义接通地气。但这不过是他们盲目的乌托邦理想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理想认为，如果举办足够多的这类慈善活动，如果足够多的人学习一门外语——而非学好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政府给出足够多包容的誓言，那么贫困、战争与不幸便会结束。我唯一能希望的是，在我们这咄咄逼人的时代，抱着那样于人无害的观点，他们最终能够寿终正寝。

娱乐会演结束后，我们的四位朋友，X夫妇与A夫妇，在城里那家最大的咖啡馆与我们会面。我们一得机会便问他们，他们以及他们的世界为何反对南斯拉夫政府。他们一开始的回答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话。他们眼睛睁

大，鼻孔扩展。一个自然而然的例外是捷克人A夫人，她跟我们一样，相形之下，似乎有点让人讨厌。我们实际上是在观看一群赛马奔驰，非常漂亮、具有专长的动物，展现出它们与众不同的能力：对抗。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们这样一心地反抗，实质上挽救了西欧不致落入伊斯兰之手。我们很少有人会对质朴无华、司空见惯的德行表示感谢，却会对我眼前的这种斗篷佩剑的浪漫主义心怀感激。而他们自身之存在亦须归功于此。只因如此，他们才不致毁灭于罗马之手，不致毁灭于野蛮侵略者之手，不致毁灭于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之手。但与此同时，一个没想毁灭他们而是希望与他们合作的政府，肯定会发现这种态度简直不可理喻，因为自然地，它有时表现得似乎让人觉得它是在自寻毁灭。

“给我讲讲，”我丈夫说，“有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们觉得应该反对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X夫妇异口同声道。“这个国家，”X先生解释说，“非同一般地贫穷。你们简直没法相信，这城市里的穷人到底有多穷，这城市之外的几乎全国所有的人民到底有多穷。政府什么也不帮我们，反而向我们征税，拿去用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正在修建整条整条街道的办公楼，没一个部委办公楼不像一座宫殿。这公平吗，当我们在这里忍饥挨饿？”“战前，那不过是一个很小很穷的小村庄，”X夫人说，“猪圈一样的一个镇，看到都让人想笑，尤其如果你去过萨格勒布的话。可现在，他们正将它建设得跟日内瓦一样，一些公共建筑高达六七层楼，用的全是我们的血汗钱。”“可你们不觉得这是必要的吗？”我丈夫问道，“因为塞尔维亚在战前的曾经的首都也像贝尔格莱德这个样子，结果奥地利外交部瞧不起塞尔维亚外交官员，当他们是来高宅大院提无理要求的农场工人。”“但塞尔维亚人跟我们不一样，”X夫人含糊地说，“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像我们斯普利特这样的传统。因此，贝尔格莱德怎么可以跟我们比，能有我们斯普利特这么漂亮？”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问题的，”A先生说，“因为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较长。达尔马提亚受到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统治，对我来说并不那么让人惊讶，因为我曾在密尔沃基生活多年。那地方发展得很不错，虽然属于华盛顿管辖，但两者之间的距离比斯普利特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大得多。我也去过华盛顿，非常不错的一个城市，我明白这的确有必要，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些漂亮的建筑。但我之所以反对贝尔格莱德，是因为它的管理能力非常糟糕。噢，我知道美国政坛也有贪污腐败，但你们不明白在这地方贪污腐败到底有多严重。问题还不止这个，如X所说，钱到了贝尔格莱德，其结果就不消说了。它粘在那些人手心，而且是以一种最恶心的方式粘在了他们手上。在贝尔格莱德，太多的人都发了财，而且是发大财，通过私吞公款的手段。他们只有在这上面，办事才有点效率。这样白痴的混账政府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么说，比在奥地利统治下还要糟吗？”我丈夫问道。他们非常吃惊地看着他。“那才不是，”A先生说，“奥地利人效率可一点也不低的。他们都是杀手。看看他们在这地方，在铁路问题上都是怎么做的吧！”他们全都愤怒而反感地叫嚷起来。“可不是，想想看，”X先生说，“铁路修到斯普利特外面就不修了，目的是让我们这里成为一个孤港。”“而且我们除非绕道布达佩斯，否则根本去不了奥地利。”A先生说。“但这是奥地利主使的。”X先生说。“奥地利主使的！”捷克人A夫人叫道。“告诉我什么时候讲德语的人不是以欺负斯拉夫人为乐？而在你们国家却有人，”她对我们道，“很同情捷克斯洛伐克的说德语的少数族裔。有人如此善心大发，还筹集资金，为短吻鳄幼崽提供奶瓶。”

但我丈夫坚持他的意见：“那么你们觉得奥地利人在什么方面做事有效率呢？仅仅在暗杀上？”“不用说那方面了，”A先生说，“他们在日常行政管理方面，也比我们现在的政府高效得多。以我的家族为例：他们有几个都是大学教授。如今，年长的，奥地利统治时退休的，在领取养老金问题上从来没遇到过任何麻烦。以前他们领他们的工资，后来他们退休了，他们填写表格，他们领取规定的退休金。就这么简单。可现在，事情简直一团糟。我有一位叔父，一位数学教授，几个月前退的休。他填写了所有规定的表格，可直到现在还一分钱养老金也没拿到。那些文件还没从贝尔格莱德返回来，没别的原因，就因为管理一团糨糊。”“在我这行业也一样，”X先生说，“我是律师，家族型职业，我有几个老辈亲戚是法官。什么养老金、职务任命，甚至包括审判日期，只要是要从贝尔格莱德来的，都这样子。真是无数的麻烦，无限的混乱。我们斯普利特不习惯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管理事情虽可能简单，却一码是一码，清楚明了。”“嗯，没错，”A夫人说，“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让我们斯普利特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但有些事自然是你们内部的事务，可这些事你们同样无法有效应对，”我丈夫说，“你们靠自己无法摆脱奥地利，你们靠自己无法自我保护，如果奥地利再回来，或者如果意大利也想这样控制你们。”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眼睛里放着光彩。“那是肯定，那是肯定。”“而且虽然说有部分钱在贝尔格莱德被人挪用了——这在任何新兴国家都在所难免，”我丈夫说，“但大量的资金肯定是用在了正事上的。而且，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也是很好的例子。我没去过那些地方，不过我妻子告诉我，自土耳其的占领之后，如今那里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亲眼看到上千英里的修得非常不错的军用公路，看到大片大片已经排干了的沼泽，如今再也没有了瘴气，还有许多的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没错，那些地方过去什么都没有。”X先生淡淡地说。“他们几乎是野蛮人。”X夫人皱了皱鼻，嫌弃地说。“你们去过那些地方吗？”我丈夫问道。他们摇了摇头。从斯普利特到老塞尔维亚，两天平顺的路程，到马其顿中心区，三天路

程。“我们要去那些地方可不容易，”X夫人说，“在斯普利特，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到那些地方会不习惯。”

当我们回到宾馆房里，我丈夫说：“所有这些太让人难过了。多少男男女女为南斯拉夫着想，为建立起一个南方斯拉夫政权而出生入死，可是在这里，这些非常迷人的人，却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痛感不满。在我看来，无论南斯拉夫有多糟，他们却也没有给它一个机会，让它证明自己有多少优点。这些人天生就是反叛者，后天接受的教育亦是如此。他们一见到任何政府便会大叫起来，好似政府是毒蛇，并抓起棍子就要棒杀它。就此而言，他们的想象力显得很弱。迄今为止他们所见识的所有政府，所有与他们相关的政府，都是毒蛇。尽管如此，这样的态度却是件遗憾的事——如果他们碰巧有一次，遇上一个并非毒蛇的政府。

“而且，我看不出这些人如何能够融入任何现代政府。他们本质上是自由城市之子。因为所有这些城市，即使在他们遭受着外来剥削和压迫时，也拥有宪章，这赋予他们非常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在匈牙利统治时期，这些城市也享受着同样的自由，就像国中之国，就如亨利一世时候的伦敦市。他们的权利被威尼斯无休无止地削弱。但他们还是成功地保住了其中的大部分权利。他们不得不为威尼斯陆军和海军服兵役，他们的贸易也为各种强加的禁令所毁，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却一直是自己火炉旁的主人。他们难以想象真有任何中央集权政府不是邪恶的。当他们摆脱了奥地利，他们脑海深处肯定有过一个幼稚的想法，以为同时摆脱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可以回到中世纪的状况。天啊！天啊！”

“看，”我说，“我正看着广场上的三个人在说话。他们的样子非常生动有趣，过来看看。”我丈夫关了灯，过来在窗子旁边坐下。广场在月光下白亮如水，19世纪的威尼斯建筑笼罩在暗影里，细节变得模糊，只看得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使之看上去像古老、地道而精致的本地建筑。码头上，所有船只都已入睡，仿佛四周都是些无生命的事物，只有它们酣然入眠。船上的灯光迷蒙如梦。在一棵棕榈树沉睡的树干与树叶狂乱的影子之间，站着三个人。他们动作敏捷利索，躲躲藏藏，就像我们初到斯普利特时见到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的父辈曾像老鼠一样，在戴克里先的宫墙之内，走过那些狂暴的世纪。有时，当他们声音提高，我们能听见他们那些热烈的嘲讽；有时，他们的动作使他们仿佛化身为英雄，正用锁链缚住某个并不存在的人，并奚落着对方。“没错，他们非常棒，”我丈夫说，“虽然他们可能没什么高尚的思想见解，他们却从自己强烈的存在意识中，从认同自我标准的努力中，从对终极正误观念的坚守中，显现出了他们的高贵。你看他们那神态，似乎如果一个人视力良好，便能在他们身后看见高低排列的天使的翅膀以及那宝座本身；而在他们所鄙视的那人身后，只有远古的污泥，一片混乱。这些人与我们有着深远的差异。他们一点也不多愁善感，

却极端具有诗人气质。看看对那些引发他们激情，进而形成他们的驱动力量的一切，他们都是怎样检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判断的！要是我，我会多么讨厌统治这样的人：不接受任何关于政府的观点，坚持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对其进行检验，就像一个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也就是说，当他们应当对政府形成一个公正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却拒斥任何关于它的说法与观点。”

我们一直注视着那三个人，直至他们强烈的情绪渐渐显出些许倦怠。他们对那一个并不在场的人已极尽冷嘲热讽，要继续嘲弄似乎已没什么劲。沉沉夜色只留给了那些酣睡的船只，留给了那些暂时显得浪漫而完美的威尼斯拱形建筑。“上床去吧，”我丈夫说，“我给你读另外一则故事，据沃伊诺维奇说是达尔马提亚农民讲述皇帝戴克里先的。”这个故事比前一个要可爱。故事里，戴克里先的女儿瓦莱里娅被描绘为其父亲的受害者。它不是按照事实，说她本来嫁得一个如意郎君，只是后来的发展严重偏离了方向，而是将事情改编成了一个悲剧的童话。根据这一故事，她有一大群追求者，但她父亲却给她从中挑选了一位让她无法忍受的王子。她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为此被父亲关进了宫殿里的一间地牢。但上帝站在她这边。每年一次，看不见的手会打开她牢房的门，她身穿黄金做的衣服，乘坐金光灿烂的马车，马车由长有翅膀的马儿拉着，在这城里游玩。她的现身是一种福祉，任何人如果能拦住马车与她拥抱，都将一生幸福。每次戴克里先听说她要来城里游玩，就派士兵将街上的人赶走。可是人们非常崇拜瓦莱里娅，拒不离开。于是，戴克里先决定将她杀死。但是，瓦莱里娅牢房的墙熔化了，任戴克里先使尽一切手段，也无法找到她在哪里。根据这一传说，她至今还活着，每隔一百年，她都会回来与她的崇拜者相见。没人知道这一百年时间里，她会在什么时候前来拜访，尽管如此，她通常都会选在圣诞的时候降临。当人们在大教堂做午夜弥撒时，一队幽灵将踏上征程，从萨罗纳叶出发，一路蜿蜒而至斯普利特；在队伍的最后面，年轻可爱的瓦莱里娅坐在她金色的马车上，任何人拥抱过她，就可以获得终身的幸福。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她至今仍然批评政府当局，与她异教徒的父亲不和。不过，她不参加基督教弥撒。

“瞧，这故事将权力思想整个连根拔起了，”我丈夫说，“它否定了对于政府理所当然的认可。因为权力宣称自己知道生活应当如何，应当开具何种处方；政府宣称有能力执行这一处方。但斯拉夫人知道，如这一故事所示，生活，也即瓦莱里娅，本质上是不可预知的，她时常会制造一些事件。这样的事件，没有任何可能的处方可以预先开定。如果有任何聪明的人想控制她，她会变得像鳗鱼一样不可捉摸。他们明白，是生活，而非权力或政府，给予了我们幸福与快乐，而且常常是在我们最不曾预想的时候，她突然来到了我们身边。了解了瓦莱里娅，他们不可能再尊重戴克里先；但他们仍制造了一个戴克里先，他们就是戴克里先，他们完全清楚权力与政府

的必要性。”

船上

乘坐另一艘白色的大汽轮，我们沿海岸一路顺风来到科楚拉。在一个港口，我们遇到了从萨尔茨堡至萨格勒布期间曾一道旅行的两对德国夫妇之中年长的那一对，然后在另一港口送他们上岸。他们嚷嚷着欢迎欢迎，直奔我们而来，见到我们尤其高兴，因为他们在度假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让他们尤其地高兴。那男的不再一副病容，似乎与他妻子因为一种通常被新奇事物所激发的满足感而显得特别亲密，两个人好似出来度蜜月。“这地方真不错，”他们乐呵呵地说，“让人什么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从这些非犹太白种雅利安人眼里，似乎可以找到宇宙险恶用心的新证据。这样的证据在暂时从德国自我放逐出来期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而当此时，英、法、美全国各地，如此多的犹太人却在为他们纳粹统治下的祖国德国而悲哀，其哀伤犹如黄疸病般刺眼。当他们下船上岸去，又一位达尔马提亚的愤怒青年，冷漠地注视着他们。“我是赫瓦尔的一名酒店经理。”他说。赫瓦尔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坐落于与之同名的一个海岛上，以空气清新著称，那沁人心脾的味道，令人仿佛置身一片盛开的玫瑰花海之中。这种味道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里叫“佤尔”——带着一股在这种语言里很少见的乖张气质。“你们的朋友很快就要来找我，并向我提出各种刁蛮的要求。德国人，他们真是很奇怪的民族。换作我们宁愿待在家里，他们却偏喜欢出来旅游。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消费，旅游有什么好玩的啊？但这些德国人到这里来，一分一毫精打细算，却一点也不觉得害臊。除非是一位在萨格勒布或威尼斯的穷学生，或者是生了病，必须做温泉熏蒸治疗，那倒也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位来度假的游客来说，这似乎实在是有损尊严了。”之前我也曾觉得，斯拉夫人跟西班牙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些话的语气很有西班牙人的口吻，觉得大手大脚地花钱是一种固有的美德，就如诚实，无论于己是否划算，都应毫无保留，毫不吝啬。

这愤怒的青年，怒冲冲地瞪着从我们船边冲刷而过的、纹理如大理石般的蓝白相间的海水。“我曾读过杰克逊写的一部关于达尔马提亚的巨著，”我丈夫安抚他说，“说赫瓦尔岛上的居民通过蒸馏迷迭香液、用野菊制成一种杀虫剂，以及酿造一种名叫普罗赛柯的甜葡萄酒，很能挣钱。不知他们现在还做这些有趣的事情不？”“啥也不干了，”年轻人眉头怒结，回答道，“整个夏季，他们都搞旅游，接待游客；整个冬季，就谈政治。政治、政治还是政治，想到政治我就恶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和平啊？为什么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冲突呀？”他怒不可遏，与在特尔沙时那个对园丁恼怒的年轻人，或者在去拉布的船上为一钵冷汤大为愤怒的另一个年轻人一样。不过，他生气的原因却是在于有另外两位那样的人。我丈夫试图安抚他，告诉他在英国，我们也面临着政治生活的严重恶化，甚至

是国民品格的恶化，因为我们缺乏有效的反对力量。“可是在这里，除了争端还是争端！”年轻人大叫道。

有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站在我们旁边。他举起一只手，遮住左边的脸。这时，他贴近身子，显然是很严厉地跟那位愤怒的年轻人说了些什么。年轻人转过身，没精打采地对我们说：“这个人，一位赫瓦尔本地人，说我不应该这样跟你们说话，因为这可能使你们不来赫瓦尔旅游了。不用说，这里当然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我希望自己没有给你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吧？”那位中年人用德语打断道：“对，你们千万不要对他的话太上心，因为虽然说在赫瓦尔我们一天到晚吵吵嚷嚷的，跟所有斯拉夫人一样（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诅咒），却没有改变这地方超乎寻常的美景。你们千万别不来看我们，真的，千万别。”“我们这会儿还去不了，”我丈夫说，“因为我们已定好了计划，今天要去科楚拉。但回来时，我们会尽可能去赫瓦尔瞧瞧。”“对，你们一定要去！因为，虽然我不想对一座姊妹岛屿无礼，而且说真的，整个达尔马提亚都非常漂亮，但比起赫瓦尔，科楚拉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他接着开始谈起他们那条主大街是如何宽阔，大理石铺砌的街道两旁15世纪的宫殿林立，因为岁月的洗礼而呈一片温暖的金色；谈到那座威尼斯旧军火库，下面是一个供战舰进出的干船坞，上面是一个剧院——巴尔干半岛的第一座剧院，依然保持着17世纪时的原有风貌，虽然包厢的帘子已纤薄如纸；谈到矗立在一个很小的海岬上的方济会修道院，说里面珍藏的那幅《最后的晚餐》画得实在太漂亮了，一位荣升英国公爵的叫罗斯柴尔德的人曾想买这幅画，开出的沙弗林金币可以覆盖整张画布；还谈到在俯瞰城市的山上建造的那座花园，我们那位亲爱的斯普利特的教授的学生修建的，他希望能超过老师在玛丽亚山上种植树木的成就——在我看来，这堪称人文主义教育成就的一个伟大证据。他讲述这些的时候，不时冒出来一些活生生的词语，仿佛他家乡美丽的景色就展现在眼前。然后，他的手放了下来，不再觉得那么有必要掩盖从太阳穴直至下巴，布满整个左半边脸的焰色斑。当汽轮驶进赫瓦尔港，一切尽如他所言。他的手也放下来搁在了身旁。

待这些新朋友离我们而去，我们已经行驶至海峡的中段。我拾起一本旅游手册，很快又放下，气咻咻地对丈夫说：“这本旅游手册是跟我一样性别的人写的，这人不仅愚蠢，而且常年窝在家里。对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她都在胡编乱造，简直错误连篇，让人觉得她很可能从来没去过任何这些城市，而且从来也没见识过什么是风景，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我觉得啊，”我丈夫说，“你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怎么说也没必要老低头盯着任何旅游手册，你不妨抬头看看那些岛屿，真的越来越漂亮了，因为上面长出了一些树木。不过，我很怀疑你来科楚拉这地方，是不是心里很不安，不到最后一刻，不愿面对现实。”“嗯，我也觉得，”我承认说，“我必须承认我对此的确很不安，因为我无法相信它真的会具有我去年所认为的

那种启示性特质。你看，去年从斯普利特去杜布罗夫尼克的途中，我没有看到它。我在甲板上的一条椅子上睡着了，等我突然醒来，我们已经躺在一个城墙包围的小城的码头边了。小城是奶油色的，就像蘑菇或某些小狗的颜色。城市蔓延在一个低矮浑圆的半岛上，中间一座教堂塔楼高耸，像一朵花的雌蕊。城墙将城市围了个密不透风，要不是那座极为漂亮的圣马可狮子让人认出来这些高墙乃艺术之作，我们还当它们是天然的崖壁。

“码头边站着一群人，其中男性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我们在西欧习惯了的印象。女性很少。那些男的都非常帅，肩背宽阔，长腿直发，神态怡然，没有一丝为自己英俊的长相而感到的羞怯——这景象，只有在一个极少有同性恋的地方才看得到。他们的脸背向汽轮，都扭头盯着一条从陡峭的城里通向码头的街道。突然间，整个码头一片寂静，码头边所有房屋的窗户都打开了，那群人移向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通向舷梯的宽敞大道。接着四个人走出来，沿这条街道而下，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空气是如此寂静，你甚至能听见抬担架的人快步踩踏在尘土路面的那轻轻的脚步声。当他们走出街道，街口马上挤满了人，都站在那里张嘴凝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这一定是这城里一个非常可怕的悲剧，因为这女孩特别特别漂亮，跟科楚拉一样美丽。她病得非常重。她脸上的暗影成蓝色。一位水手说，她这是要被送往杜布罗夫尼克的一家医院。但我敢肯定，这并非出自她本人的意愿。很显然，她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她双手松弛展开，放在洋红色的床罩上。当他们将她躺卧的担架转过来，以便登上舷梯时，她睁开眼睛，望着高大的轮船，脸上露出带着敌意的神情。她讨厌这船，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东西，而她自己什么也不想要。在她的身后，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人群形成一道严实的墙壁，人们紧紧地望着我们，似乎我们身上有着某种征兆、某种奇迹。

“但人群又一次分开了。另外四个人急匆匆过来，这一次抬的是一张椅子，椅子上绑着一个年老的女人——如此地苍老，似乎她与她的血肉之躯已没了什么相干。她似乎是由闪耀的智慧与某种超乎枯瘦躯体的物质构成的，这种物质与一只满身结节的、非常苍老的龙虾那坚硬的身体部位很相似。她望着汽轮，脸上充满难以抑制的期许。这代表着某种希望，好过她内心所恐惧的虚无。当担架手停下来将她运上舷梯，她从椅子上抬起身子，形成一个弯曲的象形符号，表达出对生命的热爱。她发出愤怒的声音，就像是驱赶在中途突然停下了的骡子。

“这样的场景，本身便值得一看。不过，它也代表了南斯拉夫，代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一种生活，我曾经有机会见识过它。在西欧，或是美国，我很难有机会看到一位严重患病的老太太或小女孩，除非她们是我的亲戚或好朋友——结果我作为个人对她们的兴趣，将分散我对她们身上所代表的普遍性格的关注。我可能根据众多微妙的表征进行揣测——事实上

我也是这样做的——认为对于生命的期许，表现为对食物的欲望，虽然并非任何简单的品味过程。经验常常导致人们做出对生活有害的判断。如果他们病倒了，又仍然对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持有这样的意见，且性格过于暴烈的话，他们可能会因之而丧命。但如果他们活得够长久，他们似乎又被另一种力量控制——生命活力的秘密内核。在芬兰语里有个词语“sisu”，说的就是潜藏在人体内的这种终极特质。这种特质不会受到损害，当一个人失却勇气，知觉变得一片黑暗，它将出来主导生命，使它无论认为存在的意义如何，都坚持不放弃，继续活下去。这可能只是说，我们的骨骼希望存留住它习惯了的血肉衣服，眼球害怕赤裸的感觉，害怕没有了目光里各种色彩的保护；但也可能是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某种有利于生命的观点，而这种观点还不为我们的大脑所理解。但问题是，在南斯拉夫这地方，我无须从平庸生活的废墟中四处扒拉，以寻找对这一过程的喻指之物：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出现在街上，便在众人面前，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诠释。是在科楚拉，我才第一次对此有了一个认识。因此，很自然地，我心里很不安，害怕发现那座城市不如我预想的美丽，害怕巴尔干人的生活会与别的地方人们的生活一模一样。”

---

1.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被誉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

科楚拉I

然而，我们却发现，我对科楚拉的看法完全正确。“别纠结这事了，”我丈夫说道，“至于你的其他追寻，诸如，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要得到一份启示，如果我是你，我会打消这念头。就算你得到了，你也未必会喜欢。”我们在订好的位于码头边的旅馆房间里，边说边打开行李。这旅馆要么是仿的威尼斯宫殿，要么出自一个自出生起就习惯了宫殿生活的人之手。旅馆不错，房间打扫得有一种赎罪般的洁净，这种洁净度有时能在南部国家见到：那些女人，从早到晚跪在走廊里，一遍又一遍地擦洗地板，紧瘪着嘴低声自言自语，像在祷告。旅馆带着地中海传统厨房的味道，只有孱弱者才受不了这味道，因为它证实了珍贵的植物是可以在缺水少土的地域生长的，证实了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争斗与苦难，那些女人仍保留着在锅里加一小撮辛辣调料的精神，还证实了，要使人类陷入渴求索然无味的诅咒之中，得有怎样的城市文明的超强进攻。与我们同住这家旅馆的有两个男人——一身花里胡哨打扮，面色严肃，如同头戴花冠的恺撒——以及他们的两位夫人。夫人们都身穿斗篷装，那模样，似乎她们跟莫扎特歌剧《唐璜》里的唐纳·安娜与唐纳·爱尔维拉一样，都是为寻艳探奇而来的。这几位就如苏夏克葡萄酒交易会上的点缀品与他们的妻子。

“我想躺半个小时。”我看着干净的淡蓝色粗布床单说。床单光洁如新，明显是经过彻底洗熨的。“我就在这里坐会儿，看看地图，”我丈夫说。他很习惯于用这种阳刚的方式进行自我催眠。但我俩都没如愿，因为有人敲门，说是有两位这座城里的先生在楼下等我们。他们收到斯普利特的一位朋友的信，给他们说了我们的情况。我们全然不知道这两个人会是谁。我丈夫猜是生活在科楚拉废墟中的性情温和的古董商人，就像年老的鸽子；我猜是迂腐得发霉的爱尔兰乡绅。我们下楼来，看到两位英俊的男人，都刚步入中年的模样，正吩咐旅馆老板娘，晚餐一定要为我们做条上好的鱼，配上岛上自酿的某种红酒。那场面，就像是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一幅栩栩如生的威尼斯画作。争辩中，几个人脑袋凑拢在一起：两个男人展胸舒臂，手势夸张；女人低头哈腰，整个身子都躬了下去，一一应承着。两个男人中，一个脑袋硕大、身子浑圆，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红衣主教；另一位如一名西特韦尔(注)，眼眸清澈如水晶，凝视的眼神，让人不敢直视。他们打了个如英国国家美术馆般一字展开的手势，让老板娘退下了，转身来迎接我们。他们表示很乐意当我们的导游，领我们在这城市游玩。如果我们愿意，他们现在就可以带我们前往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表达了谢意，并表示行程由他们决定。那位有着西特韦尔凝视眼神的先生说：“或许你们愿意看看我们新建的蒸汽面包坊吧。”

我和我丈夫都没答话。我们都觉得泄气，怎么也想不明白，不知他凭什么会认为我们想去看一间新蒸汽面包坊。我们只能假设，他认为我们是来自痴迷于机械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又或许他怀疑我们以为达尔马提亚人吃不起面包，或只能吃肮脏的手工作坊做的面包。好在像红衣主教的那位将话题转移开了——虽然说转移并不十分确切——说道：“噢，不过你们可能见过很多、很多的蒸汽面包坊；或许你们更想去参观我们古老的教堂和宫殿。”

我们顺着城墙，沿着环绕这不大的半岛前端的码头往前走，然后踏上了一条陡斜的狭窄街道，进入城里。街道上宫殿林立，凸出的阳台彼此连接，有的宫殿之间有天桥相连。我们发现这小城就像一座蜂巢，里面鳞次栉比，满是各种各样的建筑。这些房屋排列之整齐有序，令数学家也叹为观止。但其内质扰动不安，仿佛蜂蜜已经发酵，变成了蜂蜜酒。陪同我们的男士彬彬有礼，通过他们只言片语的谈话，我们能感觉出，他们一定是充分意识到，在我们眼里，科楚拉该是何等美丽，因为他们了解西方的大城市，比如柏林和巴黎，发现那些城市很脏，也很不讲究，无非是肌肉结实一些罢了。他们一面飞快地爬上一条条陡峭的街道，一面给我们讲这个城市的历史笑话，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然后又为他们打破沉寂道歉，坦陈说16世纪那场瘟疫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再没补足：那场瘟疫夺去了七千人中五千人的生命。像文艺复兴时期红衣主教的那位尤其爱笑，笑声隆隆如雷。那笑声，似乎将某一特定事情的趣味，与对整个生活的极大满足感连为一体。他们领着我们来到大教堂前的一个小广场上。广场铺砌得非常平整，让人感觉如同置身某个贵族之家的院落。他说：“我们经常来这个地方散步聊天，我们说话的声音常常非常大。这一习惯从未改变。我们的档案室里满是牧师们的抱怨，说我们在外面聊天的声音太大，以致他们在大教堂里都听不到自己做弥撒的声音。”他隆隆地笑着。“我们也打球，”“西特维尔”说，“他们对这个也很不满。”“这让我记起来雅可波·法加尼奥的故事，”“红衣主教”说，“他是17世纪时托斯卡纳的一位牧师，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传教士，也是个非常不错的伙伴。统领亚得里亚海威尼斯舰队的舰队司令邀请他一起乘船巡游。他们到这里后，水手们都上岸游玩。于是，我们城里的人向他们，甚至连同海军司令和他的朋友，发起挑战，进行棒球比赛。因为没谁球技比得上这位牧师，于是他长袍一扎，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展示。我们都为他大声喝彩。但是，这件事让我们本地的牧师们非常愤慨，当大斋节来临，尽管雅可波神父与舰队都还在这里，他们却拒绝让雅可波神父进入大教堂布道。然而，就在我们主教去世后不久，海军司令去向罗马教皇游说，让雅可波神父接替主教的位置，作为对我们当地牧师的报复。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教。”

广场上肯定是笑声回荡，强壮的男人那豪爽的笑声。不过事情总是如此，有光明，就有黑暗。在那些棒球手的头顶，大教堂就像一只长颈鹿高踞其

上——因为建筑师很清楚，自己必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面上施展手脚。不过，教堂奇怪的外貌却是缘于其装饰的错杂混乱，其中满载着斯拉夫人心中悲剧的思想意识。因为科楚拉，一如特罗吉尔，在根本上也是一座斯拉夫城镇。其装饰到底有多怪异，可根据中门与玫瑰花饰的窗户上方、从山形墙上伸出来的那个雕塑看出来。那是一尊极具现实主义特征的半身雕像，雕的是一位装扮极为华丽的老妇人。雕像不算丑陋，却如一些人所言，感情太过投入了，因为那不过是14世纪给教会捐赠钱财的匈牙利皇后的塑像而已。正如在特罗吉尔市的拉多万的创作，它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特性的一种表现。或许是为演练这一形而上学幻想曲，19世纪的一位主教在大教堂里布下了一个拼图游戏，将拼图各部分相互调换，从而建成了一座可怕却也切合实际的讲坛。而教堂的外面，其美丽仍让人觉得神秘难解，部分是因为大教堂的广场对面，抬眼望去，便是一座没有了屋顶的宫殿废墟。宫殿的窗户就像怒目而视的一只只眼睛，大理石的花饰窗格与天空相映衬；宫殿楼层间的转角处，许多树木已根深蒂固，从阳台上旁逸斜出，枝叶婆娑，如狂乱的头发。

“那是啥？”“红衣主教”说，“太遗憾了，那是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在16世纪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死了，就把这房子给烧了，以杀死病菌。之后我们一直没钱重建。不过，我现在要带你们去参观另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位于一条陡峭街道的脚下，在它身上，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已为文艺复兴所消融。从这座教堂可以看出，建筑的春天已然结束，已进入暖洋洋的恹恹夏日。这些人，在这样的夏日时光里，远比我们惬意，因为他们对那之后我们所走过的寒冬一无所知，他们不清楚摄政街的故事。不过，他们尤其喜欢这座教堂，出于一个与建筑无关的原因。他们告诉我们这教堂由一个兄弟会负责照管，并给我们解释这个兄弟会是做什么的。但当他们发现我们已经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便马上闭了嘴。他们没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就是这一兄弟会的成员，不过这很明显。他们轻车熟路，就像带生人参观自己的家，领着我们登上一段楼梯，越过一道横跨一个巷道的桥梁，进入一间兄弟会存放记录和其他宝贝的屋子。我们都在房间里坐下来，他们看着那些资料和宝贝，脸上带着笑，那种温柔而神秘的微笑。他们来此地方，以寻求一种超凡的佑护，享受一种神秘、令人精神振奋的更高级的兄弟情谊。这屋子本身就让人惊奇。屋里悬挂着二十张左右拜占庭风格的耶稣画像，上面是神像本真的颜色，也就是，烟熏火燎的颜色；上面承载着神像真实不虚的神谕，也就是，精神由物质升华而出，其形式恰似一团火焰，却又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对此，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面含着微笑，说道：“你们瞧，我们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民族——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水手。”这些东西，事实上，曾遭到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科楚拉人的洗劫。他们数次从东正教各圣地出发，进行远征，有时可以说是海军行动，有时却实际上是海盗行径。“人们前来这里，想购买这些东西。”“红衣主教”懒懒地说。他一只手捂着嘴哈哈一笑，一边带着敬畏的神情扫视那

些物品，似乎觉得它们实实在在地充满了神奇的力量。

“不过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必再担心贫穷的人民会经不住外国人的诱惑而与他们的商品说再见。”那位“西特韦尔”说。“我们也将不需要靠旅游来挣钱，虽然有这样的收入我们也不会拒绝，”“红衣主教”说，“我们将能够完全像其他民族一样生活，依靠我们的产品，待我们修复了威尼斯人和奥地利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之后。我们不仅是水手，我们还会建造船舶。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材。我们在达尔马提亚有很多木材，比你们在其他海岛上见到的可能还要多，但还不够。来看看我们在这方面都做了怎样的努力。”我们从城市靠内陆一侧的一道门出去，走下一段极漂亮的石阶，转眼已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车上挤满了人，他们都认识我们的导游，导游也认识他们。好像有某种魔力，他们的神情都迅速转变，对我们的两位导游充满尊重，不过行为举止上却彼此平等。汽车将开往科楚拉南边、位于一座山顶的一个村子。到了山麓，我们就下了车，从一条小路进入一片松林。没一会儿，“红衣主教”停了下来，一手抚着一棵高大松树粗大的树干说：“这些树是我祖父做市长的时候栽种的。”然后，在更深处的一个山谷里，他在一片树木更低矮、树干也更细小的树林前停下来，说：“这些树是我父亲做市长的时候种的。”再后来，在一处山嘴的皱褶处，从山嘴往上，是一片无可救药的光秃山坡，除了零星单调的灌木外，满眼是沉闷的赭黄色；我们来到一片松苗园前，这些树苗还不及人胯高。“这些树是我栽的，我现在是市长。”他说。他站在林间，双臂展开在树苗之上，懒洋洋地笑着：“我这些可怜的孩子是不是太瘦小啦？但他们会长大的。”

我们穿过一片更浓密的松林，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处台地。台地上有一些桌子和长凳，供人们周日出来散步时休息吃饭。因为早晨一大早就出门，我们都累了，便提出可否歇一会儿。于是，我们在桌子一旁坐下，他们坐在桌子对面。他们告诉我们在植树造林方面他们有何打算，政府又是如何肯帮助他们。然后，他们说起威尼斯人是如何砍伐森林，奥地利人在林木再造方面如何没什么作为。他们原本都是贵族，说起这些时，却露出阴谋者般的愠怒与卑劣神情。他们咬牙切齿地扳着指头，下唇前戳。然后，“红衣主教”突然恢复了高贵的仪态，抬头透过树林望着天空，高声说道：“现在情况好多了，虽然仍有很多困难，但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解除了，我们自由了，一切进展都很顺利。你们歇够了吗？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我们一路都步行回去，先是路过一个小海湾，海湾两边是一些欣欣向荣的现代别墅，为富裕的克罗地亚人所有；然后沿着一条本可能让人觉得尘垢飞扬的道路继续前行——但因为途中有一座纪念碑，它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在一处地方，一些石凳，秉承着新古典主义传统，围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半圆，旁边有一块石碑，表达了对英国军队的谢意——当时法国人

被赶走，英国人占领了这座岛屿，管理了这地方两年时间，直至1815年签署《和平条约》，才将这岛屿连同整个达尔马提亚，移交奥地利。我们英国人当时属于一个另类。我们善于建造，我们长于治理，我们给了这些岛屿一种民主的制度。他们完全保留了这一制度，并继承法国人在公共建设方面高效的传统，修建起许多非常不错的道路和港口。放在如今，我们恐怕会在这里遍地修建铁皮小屋，我们可能受唐宁街驱使，给当地人以痛击，以免放纵他们进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革命运动，我们可能以挣得一个镇压者的恶名而告终，而不会取得任何压迫所带来的成果。

有某种东西已改变了我们。我们所选取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们。几分钟之后，当我们回到科楚拉，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导游带我们走进海岸上的其中一个船坞。我们走过一个院子，里面堆满了木材——那种干净、拥有端正品性的东西，院子的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刨花。我们进入了一间工棚。工棚里站着三个人，正在仔细打量着一艘快艇尚未完工的船体外壳。层层叠接的木材被整饬如鸟翅的羽毛，船体形状干净利落就像一只飞鸟。真是件遗憾的事情，这么漂亮的船体很大一部分都得淹没在水下。站在船体前面的三个人，一人手里非常沉稳地举着一张蓝图；一人一面拿一把尺子在量船身，一面记录下丈量结果；另一人在一旁看着，说话带着权威的语气。三个人都非常俊美，浓密的金色直发，古铜肤色，高高的颧骨将他们宽大的嘴部肌肉往上提拉，胸膛宽阔，弓形的脚上面，两条腿长而富有弹力。这就是男人，他们可以与他们的妻子生养子女，他们能对某些材料进行改造塑形，以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我想起西方世界塑造的两类男人：一类是都市人，他们架着眼镜，不以为耻，似乎觉得它是素质而非缺陷的象征；他们一个个长得肥头大耳；他们会开车，却对物质世界的其他东西缺乏控制力，他们会摁按钮，会拧电灯开关，却并不理解其结果；他们在市场走高时挣钱，市场走低时赔钱。一类是鼻子抬得老高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某某的秘书，要么在外交部就职；他们脾气乖张，说话的声音让人听着想笑，身子弱不禁风；他们懂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他们需要懂得的东西又实在太多。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建造无能，为什么我们统治无方，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尊严。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如此，但在我们最喜爱的各阶层中，有太多的人属于此类情况。

那种感觉很奇怪，让人伤心欲绝：当你无意间闯入一个世界，发现那里的男人仍是男人，女人仍不失为女人。我在科楚拉，好多次感到惶恐，因为我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达尔马提亚文化将席卷西方世界；相反，我却可以看见很多理由，让我担心，长远来看，西方文化终将淹没达尔马提亚。我们从船坞出来，穿过公路，去拜访一位老太太。她居住的地方，是一座中产阶级气息的宫殿，四百年来一直归属于她丈夫的家族。我们穿过一个精美的穹顶通道，被领进宫殿的花园。我们站在花园里一个紫藤棚架下，抬头望着那些窗户的花饰窗格——因盐碱气候的作用，石头变成了绝美的

琥珀色与焦茶色，更极大地增添了窗户的韵味——因为我们被告知需要等一会儿，老太太正在家庭礼拜堂里做某种虔诚功课，还没结束。礼拜堂是一栋拱形尖顶的室外建筑，位于拥挤的花丛之间，靠近一面有壁龛的墙壁，壁龛下是希腊神话里的信使特里同和一位仙女。礼拜堂的台阶上放着一些蜡烛和一盒火柴，还有一袋洗涤碱放在一张报纸上。一开始，我当这是这个家族经济衰落的一个标志，但转念一想，又自问何曾有证据说明这座宫殿原本是干净整洁的？所有的历史回忆录，描绘的都是某种奢华富丽与邋遢惰怠的混合。很可能整洁为中产阶级的创造物之一，他们因为受了细菌理论的惊吓，而更加坚定地倾向袒露无遗、纤尘不染的清教信仰。布歇著名的蓬巴杜夫人画像也表现出，即使是她，公职人物中的理想代表，也将个人物品在地上随处丢放。礼拜堂台阶上，那居家似的凌乱，因此也不过证明着，这栋房屋而今还不是博物馆。

终于，这家的老太太从家庭礼拜堂出来，身上一股虔敬的厨房味儿，其浓郁与经典性毫不逊色于我们宾馆厨房的味道。她很有长者气度，虽然并不算老。可以看出来，她曾经非常可爱。一出现她便开始与我丈夫调笑打趣。我很确定她绝对清醒地明白，并且是从必须意识到这一情况的第一刻起就已明白，自己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可她同样知道，重新使一使那些曾经让她那年代的男子们神魂颠倒的招式，可给对方带来同样的快意——就如一个忠实的戏迷，看到某位年老的知名女演员为自己演练她广为人喜爱的朱丽叶时，那同样的感受。因此，我们再次欣赏到她的声音、脸庞、肢体所共同演奏的那种兴高采烈，那种对她的爱慕者的承诺，告诉他们，不仅她自己，而且她整个人生都永永远远地、出人意料地让人感到快乐。一番拉力赛式的漫长的恭维、揶揄与调笑之后，市里某处的钟声敲响，于是我们都侧耳静听。

钟声停止后，大家一时都没说话。我丈夫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心里暖烘烘的，感觉很满足，因为这种“高龄”的魅力里并无性吸引之虞，就像一杯陈年的葡萄酒，其中的酒精都已挥发了。他说道：“太奇妙了，好安静。”她放弃了表演，跟他说话不再一副愁绪缱绻的模样，却仍似沉浸在那过往的快乐时光里，那种恼怒的神情，就像一个人年轻时非常喜欢赛马，现在却再也不能去参加运动会了一样：“太安静啦。只有当旁边有小孩子，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又开始笑，我才喜欢这样的安静。”她的语气绝对自信，就像说的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意见。一个家庭有孩子比没孩子还是好。她以此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自己的人生以及自豪便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似乎她自己就是一个孩子，一个脆弱的孩子，神奇地逃脱了死亡的魔爪，并夸口自己任何疾病都无法侵入。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稳，因为在她当时的世界，男人们很为做父亲而自豪。他们为女性身形构造之精妙，为她们壮实的身体而感到惊奇、充满感激，因为她们使得怀上孩子成为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她们有能力孕育和抚养孩子；他们认

为，一个儿女绕膝的母亲，跟一位有钱的男人一样富有。因为这些男性的态度有益于她这样的女性行为，她这无比的骄傲便显得非常可爱，犹如百合花的喇叭。要是她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男人要么失去了对孩子的欲望，要么因为贫穷或对战争的恐惧而无暇顾及生儿育女——她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她有一半的可能会——或多半会——因自己的性别而遭到厌弃。她的子宫，本来是她的法宝，却可能变为一个危险之源，甚至可能对她最基本的价值观造成直接打击，而且某一天，会使她的丈夫觉得，自己从她身上获取的快乐，值不上自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很可怕的是，这一命运即使没有将她吞没，也定然会毁灭很多她的家族成员、她的同类。在她的许多不带一丝忧惧的言语里，这种威胁也确凿无疑地存在——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以及她丈夫所有的先辈都曾是船长，她的儿子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不再做船长了，而是当上了大型汽轮公司的代理商。

“红衣主教”对我说：“你看样子非常累了。在我带你们去我们家会见我父母之前，我们先去码头上一家咖啡馆坐坐，你可以休息一下。”这安排我觉得相当奇怪，不过倒也不错。在我们喝着非常可口的浓烈的咖啡的当儿，两人又谈起树木的事情；谈到建造多艘快艇，以打造新的游客交通往来办法的可能性；谈到渔业船队；谈到意大利人所犯下的错误——他们不该夺占南边那座岛屿拉格斯塔，因为那里鱼类特别丰富。“当人们得知那个条约后，所有斯拉夫人都离开了那地方。”“西特韦尔”说。“他们至今没能使意大利人移民到那座岛屿，”“红衣主教”说，“因为他们都是些蠢货，比奥地利人还糟糕。想想看，他们竟然想用意大利渔民来殖民这座岛屿，还以一个被杀的意大利飞行员的名字重新命名该岛。想想当你与农民打交道，这都是怎样的傻事。也只有城里人才会想得出这样的愚蠢花招。”笑声从他嘴里滚滚涌出。“你们习惯于私下面对面地讨论政治问题，”我丈夫说，“这做法在我们看来很好笑。不是通过报纸和收音机，以一对百万，或在会堂里，以一对千或以一对百，而只是以私下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红衣主教”谦逊地回答说：“一个人只能尽己所能，以免于被毁灭。不过来见见我父亲吧，他比我更聪明。”

我们回到城里，却不过是再一次偏离主题。“红衣主教”手轻轻一挥，将我们打发进了一个庭院。庭院里是两列狭长的房屋，屋外建有扶栏，非常漂亮。因为这里是孤儿院，一张张好奇而严肃的斯拉夫孩子的脸蛋，从扶栏的栏杆间伸出来；他们的上方，是年轻修女打褶的衣裙与表情温婉而淡漠的脸庞。“红衣主教”的出现，在孤儿们当中引发一阵叽叽喳喳的尖叫，修女们则迅速转身过来，向他躬身行礼，让人想起天使的演化。我们离去时，孤儿院里一片失望的哀号。“红衣主教”领着我们快步转过一个拐角，走上另一条街，来到他中世纪气质的家。

一是因为自身幢幢的暗影，二是因为黄昏，庭院显得很暗。淡白的光影，

从落霞渲染的静穆上空，从因为瘟疫放火焚烧后只剩骨架的宫殿顶部渗透下来，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庭院的这幅景象构成了宫殿的第四面墙壁。宫殿看上去比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上想象的还要奇异。在宫殿的底层，一棵树立在一扇窗户前，像一位女子在往庭院里张望。在高于树顶的楼层，有的地方长出了簇簇野花——在摇曳的夕照下，有如灰色波斯猫的色泽。花簇从消失的椽子留下的空洞里突兀出来，姿势就像杂技演员探身去够高空秋千。庭院本身透出的某种信息表明，它比这宫殿更为古老。因为里面到处是雕刻的石头，围墙的石块上或者刻有铭文，或者刻有许多浅浮雕。院子里立有许多塑像，或塑像的碎块，其中有的是罗马时期的。里面还有无限繁多的各色生物：从铅制的蓄水箱或石棺里冒出来的花朵，肉质多叶的植物与古铜色叶背的蕨类植物——许多都生长在一些很小的花钵里，一条条细绳将花钵稳稳地悬挂在雕塑凹凸的地方。这让我们想起来一些东西，在这雨水丰沛的春季他有时会忘了：这里是远南地区，在某些季节，看到一棵草都会觉得是一种奇迹，任何东西能在一个花钵里乖乖地生根发芽，都被视为一种征兆和安慰。在庭院的另一边，正对这废墟的，是另一座宫殿，也是威尼斯哥特式风格，15世纪的建筑，不过却完好无损。它大门洞开，可看到一间黑漆漆的房间。再往里的一个房间有灯，一架枝形吊灯，散发着柔和的白光。“红衣主教”此时正领着我们往这矜持甚至有些排斥人的内屋走去。但我停下脚步，仔细欣赏着那铅制蓄水箱上繁复的印花图案。他告诉我说：“那些是我们家族的纹章。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用那样的蓄水池了。我们有了现代的方法。瞧，在这院子的下面，有一个大型的蓄水池。”他脚跟在坚硬的铺筑地面用力一跺，地面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惊出一株植物上的小鸟，哗地飞回它毁弃的宫殿里的家去了。“树与水，”“西特韦尔”说，“在岛上，对于我们来说比黄金还宝贵。”“在南斯拉夫的统治下，我们将要多少有多少。”“红衣主教”说。

我们在门口又停下来，去把弄那只巨大的门环。这门环可能是出自乔万尼·波隆那之手：中间是海神尼普顿，两侧是两只尾部翘起的海豚——无论出自谁之手，都可以说非常华丽。走进屋里，我们发现这同样华丽的气韵，如这座城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囿于空间限制，比例被缩小。这里的家具表现出19世纪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影响，虽然并不失假髻与裙衬之优雅，却因为使用的粗质材料如绳绒线与棱纹平布、长绒棉和马鬃，而显得粗硬。在第二个房间，枝形吊灯下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位白发的老太太，六十多岁，穿一件黑色天鹅绒晚礼服。从她跟我们打招呼那庄严的气度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她儿子在带我们来她家前，要让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稍做歇息。在这宫殿里，社交生活是极其正式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最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艺术，来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一种在跟与自己极少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人交往时运用的社交艺术，过滤掉互动中任何可能的趣味，没有任何做作勉强的亲密。但这却轻薄如空气，是毫无分量的剑术过招。老太太跟我说话时，用的是母亲辈的口吻，略带恭维又不失体面：听

起来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实际要大，但又不致过于夸张。然后，像一位海船船长宅邸的女主人一般地，她又开始跟我丈夫讲话，那语气，完全是当自己是一个女人、他是一个男人在说话。不过，她这表演很可能不曾为时间所改变：因为，他们之间社会角色的差异意味着，在她整个一生中，虽然她肯定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美貌在男人眼里就如一盏航标灯，但她定然也坚信，任何的性暗示，无论多么隐晦，都必须只能是在自己最亲近的家人面前表露。一位常常独守空房的海船船长夫人，必然是贞洁如冰雪，但很可能有不少男人看着她时，心中充满了怜惜，心想她要是自己妻子该多好。然而，这位夫人对她丈夫是如此忠心不二，这宫殿的女王，对即使是那样毫无邪念、满怀敬意的欲望形式，她也退避三舍。她因此——因为她的职业就是妻子和母亲——而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女性典型，只不过显得太遥远、太虚幻，几近抽象而不可捉摸。

当她丈夫出来时，他的神情仪态与她一样高贵：修长的身材，脸上蓄了络腮胡，狼一般机警——这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显得很奇怪。那斗牛士似的矫健的步伐，让人犹如见到了西塞尔伯爵。他连忙道歉，用的是意大利语，而刚进屋跟他儿子说话时却讲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在想，”他说，“我们最好是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以此为证据，对意大利的谎言信以为真，以为这片海岸上的种族和语言都属于意大利人。那是宣传，是在撒谎。他们就是那样地厚颜无耻，公然否认我们的血统和我们的语言，他们说谎从来都不脸红。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不惜给我们找麻烦，强迫我们更改姓名。恰好我们原本姓氏结尾为‘-i’，虽然我们是纯正的斯拉夫人。这名字并非斯拉夫语，而是意大利姓氏词尾。其原因是，16世纪时，我们决定使用我们家族一位成员的基督教教名为姓氏。他是一位大英雄，在保卫坎迪亚的战役中被土耳其人杀死。这本来是我们家族的一大荣耀，在此情形下，意大利人却试图将它变成我们的一个耻辱，假称说我们这姓氏证明，我们，作为科楚拉一个有影响力的贵族家族，是意大利血统。他们没什么无耻的事情干不出来。”

正当此时，一瓶细颈玻璃瓶装的葡萄酒和一些小糕点送了进来。我们举杯祝彼此身体健康。我丈夫解释说我们是多么地高兴，能有机会与他们相见，并参观他们家的老房子。很奇怪的是，从他们的回答来看，似乎相对于系在线绳上的花钵里的那些小株的蕨类植物，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宫殿的石头上承载的那些荣耀有那么值得自豪。“曾经，”老先生说，眼睛里闪亮着光彩，“我院子里有植物，也有鸟雀。”他儿子开始笑起来，老夫人将手绢举至唇前，噘着嘴，脑袋左右直摇晃。“看上去非常漂亮，它们在笼子里面，它们的歌声像天使一样，”老先生一脸严肃地继续道，“可我妻子不喜欢在院子里养鸟，她非常不喜欢，所以现在这些鸟都不在了。我可以说说这事儿吗，耶丽特莎？我可以说说这事儿吗？没错，我最好是讲出来给大家听听。这种事，他们绝对不会听说过。他们绝不会听说过，一个女人

竟如此地恶毒。”

显然，我们这是参与到了他们一个最逗趣的家庭笑话中。“想想看，”他告诉我们说，语气里装出一副非常恐惧的样子，“复活节的上午，我们正在院子里款待一大帮朋友。我妻子突然站起身，走到一个个鸟笼前，一面打开所有笼子门，一面说：‘基督复活了，整个世界一片欢腾，汝辈亦欢腾吧，鸟儿，飞吧，飞回家去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又不能跳起来骂她，我们的朋友都安坐着，面含微笑，还当是什么恰得其时的有趣的善举，很符合复活节这一气氛。曾有女人这样戏耍她丈夫的吗？我问你，先生，你妻子有这样戏弄过你吗？”她丈夫，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充满敬意地看着她。她只是耸耸肩，一脸无所谓地说：“喔，把鸟儿关在笼子里，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不过，马上我们又回到了达尔马提亚冲突的历史这一话题上来。老先生对我们说：“我想你们在我们这里会玩得很开心。不过你们必须有所体谅才好。我们在某些方面，仍很落后，未开化，因为为保卫西方，我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们与土耳其战斗，接着又与土耳其战斗，再然后还与土耳其战斗。因为这个，我们摆脱不了威尼斯的暴虐统治，因此它才得以拿我们作为它的临终之榻，利用我们的生命作它腐朽其中的床褥。法国人要好一些，可他们随身带来了他们革命的缺陷。在这地方，尤其是特罗吉尔，有过一些让人伤心的场面，雅各宾派的政治主张引发了人们的反抗。但对你们国家的人，我们唯有最快乐的记忆。唉，1815年的《和平条约》，算是一个错误，将我们移交给了奥匈帝国，那个不必要的组织。摧毁土耳其之后，这个组织即应当终止存在。它的继续存在，不过是以其优秀的各臣服民族为代价，以换来粗鄙之气与轻浮风尚。”“奥地利人是所有我们见过的压迫者当中最坏的，”他儿子说，“因为威尼斯，在统治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已快要死亡，因此没有精力来控制我们的精神。而奥地利，直至大战之初，一直觉得自己精力十足。他们踢我们时，那靴子确实够劲。”“我们有四代人生活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他父亲说，“并且经常为这原因奋起反抗。奥地利人不是因为贫穷，恰恰是因为富有，而不愿重造我们被毁掉的森林，不愿给我们水，并且征收盐税，使我们的渔场无法对鱼进行保鲜。他们恨我们之中那些自身幸运却又保卫我们斯拉夫同胞中不那么幸运者的事业的人。”“不过，这对女性来说尤其不容易，”他妻子说，“因为男人永远都在为政治而奔忙。”

老先生温柔地看着她。“我妻子这是假装不正经，”他说，“不过，她完全是承袭了达尔马提亚女性勇敢无畏的传统品质。事实上，这一传统在科楚拉的延续，尤其充满了荣耀。1571年，我们的一位威尼斯无赖总督，扔下我们逃往扎拉，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在海上作战，一个由妇女和孩子组成的守备部队成功地保卫了我们的城市，击退了臭名昭著的土耳其海盗乌里兹·阿

里的进攻。顺便补充一句，这人并非土耳其人，而是一个叛徒，不过是那些意大利人当中的一员。可以说，我妻子就是那些女性的一位不折不扣的继承人，因为面对危险，我从没见过她退缩过。”“也许我没这么勇敢，”她说，“不过虽然如此，有时确实很无聊。”无论怎么说，我看得出来他对他妻子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她那标准的表情，我曾经见过，在战前俄国革命者妻子的脸上，或在阿方索统治时期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妻子的脸上。两道眉毛微微上挑，因此之间的空地非常平滑，眼帘低垂——正是随时预备迎接沉重打击的人脸上的那种表情。而她的下巴前翘，双唇果决地弯曲成笑容：打击者尚未出手，她便已表现出对之的不屑一顾，并将自己的灵魂放置到了一个他无法企及的地方。“你有过害怕吗？”我问道。“一次又一次我都有理由感到害怕，因为我丈夫的那种行为方式，”她回答说，“但感谢上帝，当我儿子长大成人时，我们在南斯拉夫统治之下，已经安全了。”

“你听她这话，就知道南斯拉夫对于我们达尔马提亚人的意义了。”老先生说。说罢，他顿了顿。我感觉他是在找词语表达一直在他脑子里的什么东西，因为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们，而且这东西他一定是非常痛恨的。“我很高兴，”他继续道，“你们前来参观我们南斯拉夫。但我想你们来得太急了一点。这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必须的结果。正如我妻子给你们说的，它已经意味着安全，一种我们从未知晓过的安全，一种自时间之始便不曾有过的安全。然而，你们务必记得加富尔[注]之所言：‘如今意大利建立起来了，但我们还没有意大利人。’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南斯拉夫拥有了国家机器，却还没学会如何让它运作。我们中很多人不相信这一国家机器的种种可能性，他们不明白……”——他的双手痛苦地动了动——“它对于我们斯拉夫人的意义所在。”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而滞塞，谈起克罗地亚人的不满，谈到马特切克运动。从他儿子的不安，以及他妻子从轻快转而默然不语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家人感到仍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这最后的一层包围圈比任何其他的都更让他们难以承受——因为这些敌人跟他们属于同一血缘。这些人一千年来一直记得自己是斯拉夫人，无论面临着任何帝国的威胁，他们始终认为不能恨自己的斯拉夫同胞。可现在，他们眼看着他们的同胞正密谋反对南斯拉夫，这给了意大利再次作为压迫者凌驾于他们头上的机会，在他们看来，必须恨这些人，必须毫不怜惜地将他们彻底清除，就像过去清理那些变节投靠土耳其的本民族人一样。

老先生仍在继续说着：“你会感到难以置信，但我们中间有一些人，那些塞尔维亚人，思想严重走入歧途，甚至希望将克罗地亚人从我们斯拉夫同胞中孤立出去；事实上，我们与塞尔维亚人之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不同的习惯与行为方式，因为他们遭受了我们所不曾遭受的不幸境遇——许多世纪以来为土耳其人所奴役。但他们不仅是兄弟，还给予了我们巨大的馈赠。我记得很多年前，你们尊敬的塞顿–沃森教授来我这里做客，他对我

说：‘想争取斯拉夫完全独立，你们这是疯了，你们唯一能期望的，就是作为奥匈帝国治下的斯拉夫公民得到充分平等的权利。相对于任何斯拉夫政权，它都太强大了。’但后来在1914年初，他再次回来，刚好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打败了土耳其，他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当我看到塞尔维亚人在抗击土耳其战争中的表现，我绝不相信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和你们克罗地亚人打不败奥匈帝国军队。’他说得很对，是塞尔维亚人的胜利给了我们希望。我因此觉得很恶心，一个人仅仅因为习惯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一点矛盾，就可以蔑视其解放者。”他说话的语气，像一个典型的行事干净利落的人，惯于干净利落地下决断，惯于对事情做出明确的估算——当需要做出某种妥协与让步时，这很有必要。给他一千年时间，他也无法理解克罗地亚世界，一个因为遭受德国毒害而被削弱了的世界。它变成了一个浓云迷雾的平台，上面是飘忽不定的人格，本质是斯拉夫的，质地却模糊不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高潮。

“还有，这个马特切克运动，”老先生叫道，“也就是布尔什维克运动！是共产主义者运动！说必须有一场社会革命，这是怎样的胡扯淡呀？只要有工作做，民众有工资挣，有其他福利，除此之外，还有啥经济问题呢？如果我们在科楚拉建起渔场和造船工业，我们的岛民就会有足够的钱，想要什么都会有。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他看着我们，那眼神，就如一只苍老雄鹰的眼神，奋力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同时又担心自己可能错了。他知道自己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却不明白到底错在哪儿。我们想，他这尴尬境地是缘于他的年龄，但当我们看他儿子时，却发现他儿子脸上也是那一模一样的神情。他的语气里没了平素的权威，说道：“这都是那些煽动者干的好事，比如过去的墨索里尼。”很可能他指的是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分子的墨索里尼，曾在斯普利特组织了一场码头工人罢工。这些人的经历非常丰富。

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里又非常贫穷。我发现，他们工作起来具有很多优势，拥有许多内在的天赋。多少个世纪以来，不曾间断的残酷的压制使他们不得不做懦夫，做背宗叛祖的不肖子孙，因此现在，勇气与忠诚，似乎转而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献身于公共事业，神圣有如牧师。不过，他们的工作也有一个缺陷。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还不曾被详细讨论过。达尔马提亚还处于威尼斯统治之下时，一股雅各宾狂热潮曾传到这里。但这一热病已被彻底治愈，先是为威尼斯人所医治，其后又被法国人医治。1848年，革命思想的大潮重新席卷了整个欧洲，却没传到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因为在科苏特统治时期，匈牙利暴动将矛头转而指向了斯拉夫民族，而克罗地亚人又不得不违背他们民族的利益，为哈布斯堡皇室及其反动势力战斗。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没有谁讨论过这种可能性——即在不断扩张的工业文明中，将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作为维护和平的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手段。他们完全不曾有机会理解信奉

这一原则的人们——后者发觉，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成员拥有超乎其他成员的经济权，将不可能保障社会的每个成员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于是提出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作为科楚拉贵族，这一家庭非常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所有焦虑，无非是某种东西的现代版本而已：平民起义。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之进行抵制，因为他们明白民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他们正竭尽全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之获取这些东西。水，他们需要这个；还有树。他们误解却并无恶意，他们的思想因为善举与公众精神而鲜亮，却又为不远处的喧嚷而感到迷乱。他们所具备的公民事务方面的详尽知识，还不足以让他们面对这样的喧嚷。父亲、母亲、儿子，围坐在枝形吊灯下白色的桌椅前；外面，庭院里一片漆黑，此时已是夜色沉沉。

---

1. 此处或指美国画家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的画作《西特韦尔一家》中的人物。
2. 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科楚拉II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醒来，听见爱伦·特里注的声音。那腔调，跟我还是小女孩时，她在爱丁堡的皇家剧院说话时一样。她盛气凌人的声音提高后，成为一种喊叫："杀了克劳迪奥！"——这命令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根本上说，对方是罪有应得，不过，它也引发了某些问题。有人站出来疾呼，以简单的方式处置罪恶，总的来说是件好事，虽说任何人如果知道了一切真相，理解了善与恶整个的秘密，都不会说那样的话。或许是昨晚我去拜访的那户人家有什么东西让我想起来这些话。之后我又睡着了，后来再被一阵歌声吵醒。那歌声有一点沙哑，有一点狼嚎一样的粗粝，满是自得其乐的气息。当我走到窗前，码头上站着一群年轻人，每人带着一个包裹。"肯定是新应召入伍的军人，"我丈夫说，"在等着汽轮送他们去大陆。""对，"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开始训练。你看，这些年轻人干干净净的，却很奇怪地都穿得非常破烂。他们都铆足劲儿，以显得精神抖擞，可同时他们都穿着旧衣服，而把新衣服留在了家里。""我们赶紧洗漱，然后下去看看他们登船。"

我们从宾馆前门出来，手里还端着咖啡，一艘白色的汽轮顺着半岛驶过来，可爱如一位女士，醉醺醺却如一位爵爷。它严重地朝海岸一侧倾斜，因为船上已经装了一大群年轻人，他们全跑到了这一边，想看看科楚拉。"是来接新兵的汽轮。"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说。他讲着英语，是在美国学的。"是的。"我们说。"他们是去大陆上服兵役的。"他继续道。"是的。"我们说。"他们这是去为南斯拉夫服兵役，"他说，"但他们是忠诚的达尔马提亚人，他们是忠诚的克罗地亚人。你们听到他们唱的这些歌，全是反对政府的歌曲。"他脸上带着一种凝固的却几乎漫不经心的微笑。这微笑代表了一种嘲讽，一种自我养成的第二天性——他已然忘记了笑容的第一天性，或者它的任何其他缘由。我记起康斯坦丁曾给我说过的一席话。"我们斯拉夫人喜欢可怕的东西，"他说，"常常，当我们感到极为愤慨时，可怕的表情便会呈现在我们脸上。我们因为喜欢可怕的东西，于是将它们留存在心里，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嘲讽的微笑、蔑视的表情，或没任何含义的漠然神情。这情形，也是那些布尔什维克遭遇的结果之一。革命变成了一种龇牙咧嘴的表情。"在这里，事情大概同样不妙。

当船更加靠近，我们听见靠在栏杆上的年轻人，与码头上的年轻人一样，唱的也是同样的充满愤怒与希望的歌曲。待船靠近码头，船上与码头上的歌声汇成了同一首歌曲。船上的一些人等不及跳板放下来就要上岸。他们叫喊一声让下面的人让开，便从栏杆上直接跳上码头。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了野山羊一样的活力，他们表情沉静、执拗而内敛。他们从我们身旁跑过

去，一转眼又折回来，腋下夹着一码长的面包，静静地站在那些科楚拉年轻人身后，因为已踏上一个新的征程而脸上充满了陶醉。那些科楚拉年轻人站在那里，相比之下却显得焦躁不安：新的征程尚未开始，而他们家人的伤悲让他们心烦意乱。将这两群人团结起来的，是这黑云压顶般的不满的歌曲。我们进宾馆去给第二块小面包涂上黄油，再出来时，船已装上码头上的人，向大海驶去。它已驶离海岸有几百码远，比之前更加醉醺醺的样子，因为装的人更多，倾斜得更加厉害。这些新上船的年轻人高声地唱着歌，挤在栏杆边，向他们渐远的伤心欲绝的亲人挥手作别。他们的亲人此时正顺着码头，往半岛末端的圆塔方向走去，以便在船离开海湾，驶进大海峡时，还能再见船一眼。他们螃蟹一样地横着身子往前走，头扭向一侧，这样可以一秒不漏地看见他们深爱之人的身影。很显然，他们的感动不是因为精神甚或是情感上的痛苦，而是五脏六腑隐隐作痛所致。当儿女取道海上，离自己远去，让人罹受折磨的，往往是这方面的痛苦。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曾有过经典的描绘：当他起帆，从非洲前往意大利，他母亲莫妮卡是如何伤心。不一会儿，船已远去，人群往回走，所有人步子都非常快，并低头抹着鼻子。

我们发现“红衣主教”“西特韦尔”和一位俊俏的女士突然出现在我们旁边。那位女士是“西特韦尔”的妻子。就我们来看，一件很遗憾却也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位女士只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俄语——她在黑山俄国沙皇皇后寄宿学校时学会的——这让人多少明白了意大利为何要如此对待达尔马提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真正的走向。他们带我们走下码头，登上一艘快艇。我们乘坐快艇，在蓝白相映、和风习习的早晨，环绕岛屿游玩了一圈。此时的科楚拉，就如金器商的一个玩具，像一只用贵重金属做成的乌龟，如坐在舞台上那般坐落在半岛上。快艇突突地经过一片郊区别墅，别墅粉白相间，就像许多糖制杏仁。再经过一两处海岬，我们来到一个海湾，其宽阔可谓壮观，其狭小似可坐拥怀中。海湾的入口，是一片荒地和一些乱石，往后，是橄榄树台地与杏树园，再往上，是荒山和一些低矮灌木。一条小路通向荒山山坳里的一个高处的村庄。“红衣主教”笑着告诉我们，这个村里的居民简直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烦透了，一直缠着政府，要求修一条从山上下到海湾的更好走的道路。“于是我们说：‘可为什么呢？你们有通往科楚拉的一条非常漂亮的大路啊！’他们说：‘可是科楚拉不是我们的港口，这个海湾才是我们真正的港口。’所以说，你们瞧，一个小世界跟一个大世界一样，都非常愚蠢。”

正说着，我们又驶入更远的一个海湾。我们让船自己在水上飘荡。绿色的海水晶莹闪烁，纯净如冰块，但很轻柔。“我们可以买片地吗？”我们问道，“可以建一栋别墅吗？”这想法够愚蠢的。从伦敦到这地方，乘火车加轮船要两天两夜。而且我估计，那么晚才开始学的一门语言，无论于我丈夫还是我，一辈子都别想讲得多熟练。然而，这些海湾令人陶醉的蛮荒，

这在阳光烘烤下咸咸的空气，灌木林那沁人心脾的馨香，这座小城那完美的景致，如果有这些作为舞台的布景，已完全用不着其他装饰。“可以啊，你们可以买，没问题呀，你们可以建。”他们说。“不过，有一样东西，”“红衣主教”说，语气一点儿不像是在忽悠外人，“有一样东西你们会发现不充足。那就是水。这就是麻烦所在，事情总是环环相扣的。这里的人想挣钱，就必须有水。但因为他们没钱，所以无力修建蓄水池储水。因此，他们又无法挣到钱。不过，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终将解决的。”

当我们动身朝对面海岸驶去——看模样像一个岛屿，实则是佩列萨奇半岛——这些科楚拉人还在说水的问题。“我们曾遭遇过一次巨大的失望，”“西特韦尔”说，“在那边佩列萨奇上，有一股泉水，对那里的居民来说用途不大，于是有人提出说，我们可以筹钱修建一条管道，穿过海峡，接到我们岛上。可是老天！到最后一刻我们发现，时不时地，尤其在干旱季节，我们最需要水的时候，泉水竟是咸的。”“你们来自英国，”“红衣主教”说，“无法明白我们有多失望。可尽管如此，我们也绝对没什么可抱怨的。当缺水最严重时，他们就会从斯普利特派出一艘船，给我们运水来。”

当我们驶近岸边，船身下的水体如淡绿的宝石，阳光洒落，可见到水底的沙子。我们登上一个不大的石头码头。码头前，一些渔民在他们有着铁锈色船帆的船里，大声向我们的朋友打招呼，就像中世纪社会各阶层还相处融洽的时候，尚是自由民的平民跟贵族打招呼一样。我们走下船来，沿着海岸上一长排不大的房屋和园林漫步。“红衣主教”说：“就是这个村子，所有退休的船长，只要可能，都会来这地方居住。”船长都是非常理性的。这个村子里没任何不正常的东西。这地方的任何东西，无不是遵照强有力的传统习俗，而臻于完美。每栋房屋、每座花园，都非常漂亮。房屋和花园都很小巧，均非奢华浪费之辈所造；大部分都是新的，亦不是追求完美的先辈遗留之物。

甚至是非常公事化的邮局，也透出一股可爱的端庄之气。一条小路，穿过一座简朴而庄重的微型花园，直接通到一栋小型建筑前。这座房屋是用达尔马提亚的石头建造的，朴素如干酪，华丽却如大理石。进门后是一条凉爽而干净的通道，上面是精致的穹顶，前方一个很高的油漆铁架台挡住了去路。铁架台设计精致，每一弯一拐都那么恰到好处，里面摆放着一些鲜花，取拿时务必格外地轻柔小心。一个女人，彬彬有礼却态度疏远，从房屋后面出来，一面严肃地跟“红衣主教”讲本地的一件什么事情，一面给我掐了一小束香气恰到好处的鲜花。路途上经过的行人与她神情相似，我们走过的那些房屋也都跟这间屋子一个模样。这里的人都很悠游自在，他们对于生计之中的某些方面掌握得是如此精湛，这些技能已化作了他们的第二天性。要是买下科楚拉岛上的那个海湾，我们会不明白应该建造怎样的

房屋，我们肯定得费尽心思考虑这一问题，即便最终建成，也仍会顾此失彼。但这些人的文化告诉了他们，既然必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他们应当如何活得最好。

接着，我们又走进另一家的花园。这家房屋更大，也更漂亮，不过却空着。从一棵柑橘树上，“红衣主教”折给我一根枝条，上面沉甸甸的，既有果实，也有花朵。“这房子属于，”他抬头看着荒弃的房屋说，“一些克罗地亚人。一群可怜的家伙，买下了它打算改造成宾馆，却不曾考虑到没钱改造或经营它。”虽然他是如此讲求实际的一个人，说到这一非同小可的疏忽大意时，却好像没多大事儿，不值得问谁对谁错似的，就好比患个麻疹或是失明。如举着君王的权杖般，我一路举着柑橘枝，直至我们来到一座教堂前。一个很小的教堂，属于教堂里的袖珍版。一棵柏树，占据教堂三分之一的宽度，比教堂高四分之一，完全算不得树中之王，却使教堂相形之下，形如侏儒。不过小归小，看得出来，教堂极好地保留了传统风尚，可谓大教堂的小兄弟。我们站在草坪上，惊羡于它微缩的壮观，“红衣主教”则朝独立于教堂之外的钟塔走过去，拉动了绳子——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走到哪里，一切都向他敞开。深沉的钟声余音在空中尚未散尽，“红衣主教”指着我们身后的路上，说：“快看！那景象你们如今已不常能见着啦。”

一位老先生正在散步，衣服干净整洁，红光满面，白色的络腮胡与横跨脸庞的髭须连为一体，上身穿一件短外套，下身一条水手裤。从气质上看，他应该是一个率直而通情达理的人，但时间正渐渐掩盖了他这一性格，因为当他看见我们时，他正叽里咕噜地，似乎与某些幽灵般的朋友说着话。因为年老，他走路像喝醉了酒。“Zdravo！”“红衣主教”说——这是斯拉夫人见面打招呼的通常方式，意思是“恭喜发财！”“Zdravo。”老人答道，那声音像是从一道深渊的对岸传过来的。“我跟你们说过吧，所有退休的船长都想来这地方居住。这就是其中的一位。从他的弗朗茨·约瑟夫式的络腮胡，你们可以看出，他曾经在奥地利海军服役。我想，所有来自维也纳的事物中，我唯一真正喜欢的，就是这样年纪的老人脸上那连鬓胡子了。”我们目送老人继续蹒跚地往前走去。他忘记了我们，重新招呼他那班幽灵朋友，接着他们的争论。“上帝怜悯我们，”“红衣主教”说，“南斯拉夫是必须的。但几乎也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它，才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一个像一只迷途狗一样的善良的灵魂。”

一度，船带着我们绕过一片淡宝石绿色的水域，贴近海滩而行，距离岸上的房屋与花园只有一石之遥。要不是这些房屋和园林太过简朴，它们完全可以作为绝美的舞台背景。然后，我们行驶至离海岸更远的地方，看见从海岸一带狭窄的肥沃土地往上，是层层台地垒起来的橄榄林和杏树园；再往上，是悬崖，除了少数的灌木，几乎一片光秃；悬崖之上是一片高山平

地，上面又是许多的橄榄树和杏树，以及稀稀落落、黑压压的柏树和一些村庄与教堂；在这之上，是光秃秃的一座座山峰，反射着正午阳光，犹如一面镜子。再往前，不见了肥沃的土地。此时，悬崖之下是一片斜坡，坡地上长满低矮灌木，芳香弥漫，尽管我膝头放着那枝鲜花盛开的柑橘枝，仍能闻到灌木的香味。继续往前，是一片浓密的柏树林，尽管黑压压的，形式简洁质朴，却展现出一种奢华的面目。这种奢华，通常出自一种稀缺之物的丰沛呈现。然后，群山向海湾跌落，形成一道纯粹由石头构成的低矮山脊。平坦的海岸上，是一座悦人的城镇。“这地方是奥雷比奇，”“红衣主教”说，“瞧，沿整个码头的那一排大字：‘热烈欢迎来到亚得里亚海。’这是这城市向我们可怜的亚历山大国王献上的问候语，他当时正沿这海岸而上，乘船前往马赛，去那里等死。他没时间在这地方逗留，于是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向他表达敬意。”我们啧啧地表示感兴趣，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句献词，而没有看另一句话——某位大胆的年轻人刻在上方一块石头的上沿的一句话，这行字有一位巨人那么高：“Zhive Matchek”，意为“马特切克万岁”。马特切克，南斯拉夫的敌人，经济斗争的一个标志。但这经济斗争并未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唤起同情，尽管他们可以对买了宾馆却无钱经营的克罗地亚人表示善意，对奥地利年老的海军军官表示善意。其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经历没有使他们为此做好准备。

海峡的对面，科楚拉可爱的形状显得很小很小，整个呈一片柔和的金色。我们越过一片海域，朝科楚拉驶去。此时，这片海域的海水变成了更明亮的翠绿色。四周小岛星罗棋布，如破碎的苏格兰；崎岖突兀的山石与荒野，有着格兰屏群山的恢宏气势，却不过一个小围场的面积。我们的船从距它们一两英尺的地方滑过。海水是如此深而沉静。这里因为是海鸥下蛋的地方，因此经常有人光顾。当我们的船突突地从这里经过，海鸥们飞入空中，在我们头顶一圈又一圈飞过，朝我们尖声叫着，就如我们是土耳其人，或是海盗。在另一座小岛边，一艘船被拉上岸边的一片小卵石空地，三个渔人在灌木丛里睡觉，旁边丢着一些瓶子和空篮子。一个人听见我们的船的声音，抬起头来，惺忪睡眼在正午的阳光下眨了眨，确认了我们的位置，看清楚是我们，抬起一只手，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恭喜发财！”，又躺了下去，似乎是回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另外两人没有醒，只是防范性地动了动，似乎在保护自己的睡眠不被惊扰。

“他们应该是天一亮就开始捕鱼了，这些老小伙儿。”“西特韦尔”说。我们驶过另一座更为荒凉的小岛。小岛的顶上是平的，并不宽，大概有五个渔民可能在这上面午休过。“我们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条约就是在这座岛上签订的。”“红衣主教”说。人们争先恐后地从各条船上涌出，爬上这石头炮台，它原始、野蛮，身上挂着各种珠宝，因为这海岸既沉溺于暴力，亦沉溺于珠宝。商人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向贵族们兜售珍珠和绿宝石，各座城市的珠宝商数量多得惊人。一度，单单科楚拉城里的珠宝商就有三十二

家。又经过几座那样的小岛，我们来到一座较大的岛屿，名叫巴迪亚。这座岛屿清楚地展现出达尔马提亚人生活中那神秘的气质。一座修道院矗立在四周一片松林之间。这地方曾有一座将近千年的修道院，这座是后来建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里冥思苦修。但因为它地处海滨，地势平坦，难以防御，距离科楚拉和大陆又远，海盗经常来此屠杀僧侣，抢劫圣坛；其他僧侣前来替补前人的位置，然后又被杀害和抢劫。这一系列虔诚的悲剧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如果说这地方是什么圣事遗址，或者是一片荒漠，极其适于断除与世间的一切联系，以与超自然的神灵相契合，那还可以理解。可巴迪亚没有任何值得一谈的故事，唯有僧侣与海盗之间令人百思不解、百折不挠的关系。而这修道院，舒适地躺卧在它的园林间，就如苏塞克斯郡的一栋庄园房屋，没有任何神圣气象。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是恰切相配的虐待狂与受虐狂，二者一样疯癫，从虐待与受虐中寻得一种变态的快感。仅此而已。

换作是修女，如果发现环境如此恶劣，应该会回家去了。我们登岸前曾这样想。到后来，我才明白了。我们穿过打理精细的园林，绕过回廊，进入教堂。教堂回廊混合了威尼斯哥特式、早期文艺复兴以及传统古典建筑的风格，却处理得极具天才，看上去赏心悦目，好像纯粹就是一种统一的风格。教堂里，本地金黄的石头建筑材料，因为平整的图式设计而显得非常绚丽。虽然这是一所方济会修道院，一所男童学校，圣坛前却有一位非常漂亮的修女，在擦洗地板。她跪坐在地板上，腰肢婀娜纤细，当我们被带领参观一个木质十字架时，脸上露出主人般的自豪。这十字架是科索沃战争时，因为巴尔干基督教国家被打败，由逃出来的难民带来科楚拉的。十字架的两面都有一个写实主义的耶稣受难图，一面清楚地看得出来他已经死了，一面清楚地看得出来他还活着。修女那笑容，就像一位农人的女儿，见陌生人来到她父亲的牛栏，满脸惊讶地观看她家的一头双头牛。如果她是这教堂的执事，当有海盗来袭，包括这十字架以及所有其他圣物，她都会收拾起来，使个简单的花招，将它们塞进干草或卷心菜堆里，然后一船一船地将它们运回安全的地方。

她非常理性。达尔马提亚文明里，没什么东西有那么珍贵。一切取决于农民式的质朴判断。我们离开巴迪亚，驾船突突地回到科楚拉岛，驶进一个群山怀抱的海湾。山上有许多堡坎护持的葡萄园台地，城堡一样的农舍，坐落于无花果树与桑树组成的树林间，显得低矮而结实。连接这些房屋的道路，在厚实的墙壁间穿梭，翻过斜坡，爬上阶梯，就是整个世界的军队，踩踏一年时间，也不能将它们踏平成这样。葡萄酒总会让制酒人懂得，一切都应交付时间，在它的作用下，事物将一点一点地，日积月累地，最终臻于完美。“在那边海岬上，”“红衣主教”指着一个荒凉的海岬说，“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讲述了我们科楚拉人的来历。上个世纪（19世纪），一位考古学家在那地方考察，发现一份石刻，里面记载了五百名

希腊殖民者的名字。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在那地方定居了下来。”“不是说一百人吗？”“西特韦尔”问道。“这个不重要，”“红衣主教”说，“重要的是他们是希腊人。也就是说，这地方曾是古希腊的一部分，不曾被土耳其人征服，从不曾像古希腊那样，遭受任何形式的征服。因为，如你们所见，尽管历经匈牙利、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统治，我们依然故我。”我面带微笑，只是听着，就像听人吹牛，接着却忘记了笑。古希腊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引得如此多的少年郎爱慕追求？是她青春如朝阳的身体与灵魂，她纤尘不染的美好，有人可能会说。这样说也没错，与我们自早上踏上船以来的一路上大部分之所见，很是相宜。这种说法，或许是缘于如此的景象：船长村那极其严格的中规中矩，费了极大力气在大山上开垦的橄榄园和杏树园，奥雷比奇城及其清晰而雄健有力的标语与反对标语，小岛上的渔夫，在巴迪亚圣坛前擦洗金色石头地板的那位农家修女，葡萄园以及那些壮实的城堡与堡垒。那一声言，当然与我们最后拜访的这座岛屿亦完全吻合。

“你们肯定看见了，”“西特韦尔”说，“那边有一个巨大的采石场。我们海岸上绝大多数漂亮的建筑，用的石头都是来自这里。他们说，杜布罗夫尼克市教区牧师的官邸也是用这里的石头建造的。”我们从采石场前缓缓驶过，距离如此之近，可以看见杂草在乱石丛中摇曳，也看到某种肯定超乎一座石料之城的东西。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某些丑陋的矛盾景象。比如，满足人类最迫切需求、为之种植粮食的人，收入却非常低，亦很少获得尊重。另一个表现是，一些人从地下切割出来石头，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居所，而且促使居住者变得优雅端庄，但切割石头的人自己却地位卑贱。而即使是最拙劣的建筑师，在捣弄石头时，其设计也不可能显得鄙俗。借助石头，无论他们心中有怎样的奇思妙想，也都能够展现出来。可是，在大多数出产石料的村子，可以看见，贫穷就如饥饿的鲨鱼，吞噬着村民。在法国，我曾访问过一个村子，那里的工人居住在他们用双手在一座中世纪城堡墙壁上挖出的洞穴里，没有照明，没有供水。但这里不一样。这海岛就像一座圣殿，我们眼前这座村庄就像圣殿里的圣坛。

这村庄地处海滨，位于一座绵延而低矮的山下，这个地方被散布的采石场撕裂，栽了一些柏树。村庄的房舍建造形状得当，既可以抵御冬季狂风，又不显得阴郁，不会把春天与夏日拒之门外。房屋石头呈可食用物品的颜色，有的为淡黄蜂蜜色，有的为馅饼皮颜色，有的为某些甜瓜的颜色。这地方不仅有自生自长的鲜花，还有人工种植的花卉。在一面墙壁的窗下，旱金莲花金色与深红的花朵，像是印在上面。一家屋外的一张桌子上方是葡萄叶结成的一座凉亭。透过房门，可以看见里面对称的两排叠放的木桶。三三两两的行人，沿着街道往前走去。他们因为认识我们的朋友，觉得他们值得尊重，于是向他们举手致敬。不过对于我们，他们没有兴趣，

收敛了容颜，又沉浸在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就如那位继续睡着自个儿的觉的渔民。四个小孩在逗他们的一只山羊和它的幼崽玩。他们扭头看了看，又继续玩他们的了。一位妇女正在她家花园里擦洗一张桌子。她一面伸直胳膊，撑在桌子上歇一口气，一面想我们会是什么人；休息够了，便丢开好奇心，继续干她的活儿。这里的屋舍与人们所构成的一幅生活图景，与我们所知道的西方世界不同，却并不比西方差。

我的表达能力有限。一个人无法描绘鱼的生活，一条鱼也无法描绘人的生活。如果我问自己，假设我们不是在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的途中，乘船从这经过，而是自始就被扔在这岛上，我会有怎样的发现，这会给我某种启发和提示。我将找不到会读写的人，上帝明鉴。南斯拉夫将近一半的人口不会读写。我想我知道这些男男女女属于哪一半。从他们房舍那简单却极具艺术美感的建筑，从他们栽种的花草，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曾让印刷字钝化了他们的双眼。我将再也找不到敦厚宽仁。这并非什么甜美幸福的岛屿。这里的男女，如果发现一个人没什么价值，他们的目光会冷若岩石。要是他们觉得有必要残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诉诸这种手段，就如出于吃喝拉撒的需要。与这些缺失相对的，我将欣然地见到这里的人们守持着动物一样的行为规范，四处游荡，身体健壮而心安神定，脸上没有任何悔意。这行为规范中还包括这样一种天分，这种天分我们在一些可爱的动物身上可以看见，即保持它们皮毛和洞穴的干净。走近仔细打量可以看见，在这个采石场村子，令人憎恶的贫穷也不曾得到根除，但到处都是那么干净、那么整洁。不过，并非像动物那样的是人们的平静安定。他们找到某种节制生活之流的方法，以免于浪费。他们的生活既无奢侈，亦无饥馑，唯有长久的快乐。在村头，一位渔夫坐在一块石头上，脚边放着渔网和一个诱捕龙虾的笼子。他低着头，正拿一把刀子在做一件捕鱼工具。从他娴熟的动作看得出来，他做这动作已经千百次了，可他身上仍洋溢着快乐，柔韧中透出对这工作的兴趣，就像是第一次做这东西。而在这岛上，一切均是如此。这地方作为采石场已超过一千年之久，看上去却如新建的一般。此时已过正午，然而其明丽却如朝日初升。一些男人，和一位坐在门阶花丛中的女人，年岁均已非常高，身上却不见任何迟暮枯朽景象。

岛屿距离岸边一码左右的最后一块石头上，站着一个小男孩，阳光下粼粼波光的海面，形成一条颤动而明亮的线条，横过他赤裸的胸部。他抬头向我们看了一眼，微笑着挥挥手，便又退回深思，一如他们所有人，又沉浸于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汉弗莱·佩恩在其著作《雅典卫城的古代大理石雕塑》里的一句话，经查证，它是这样说的："大多数雅典古代头像，无论其人物性格如何，都有着同样生动的表情——他们这表情，并无其他特别意义，只不过表现了他们自身生气勃勃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我对"红衣主教"说："你们在这地方拥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只属于你们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他以

一种不甚赞同的口吻回答说："我想是吧。"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是说你们的建筑、你们的文字传统，我是说这里人们生活的方式。"他答道："正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加快了行进的速度，驶过松林间的修道院，驶过发现古希腊石碑的海岬，终于可以看见前头的科楚拉城。"我很希望，""红衣主教"说，"你们能再回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农民。政治问题毁掉了居住在城市里的我们，可也必须有人处理这问题才行。"

就在这时，当城市街道已能分辨出来，快艇却停了下来，在海面打着转儿。"西特韦尔"说："我们科楚拉人，是一百或五百希腊人的后裔。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保卫西方免受土耳其人的侵略。马可·波罗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位同胞。可就算如此，我们的快艇有时还是会坏掉。"船夫在船舱里弄得叮当响，检修着机器，绿色的海水则展现出它的威力，将我们拽向海风习习的海峡。"他们会赶不上去杜布罗夫尼克的轮船的。""西特韦尔"说。"很急吗，"红衣主教问道，"你们今天必须前往杜布罗夫尼克吗？""是的。"我丈夫说。在我们南面，一艘划艇在阳光明丽的水面闲荡。"红衣主教"站起来，伸手做成漏斗状，朝划艇大声呼喊。不见什么动静。"红衣主教"舌头在牙齿上弹得嗑哒有声，说："那家人从来反应就很慢。从来就这样子。"如果弄明白他说"从来"是从什么时候以来，会让人觉得很好玩：很可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如此。不过，他又继续喊叫，马上，那艘船开始朝我们驶过来。最后我们发现，船上有两个年轻人，很显然，刚才他们一直沉浸于他们的情感世界之中：一位女孩，头发颜色比她古铜色的皮肤稍浅，不过是同样的色调；那男孩，似乎刚被"红衣主教"的呼喊声从千里之外叫回来，当他明白过来我们的意图，待我们从自己船上跨进他船里，他便躬身伏在船桨上，双臂沉稳有力，眉头坚定地结在一起。那女孩，嘴里吮吸着一根花茎，看到他那勇猛无畏的神情，脸上泛起一种静静的欣喜，不过似乎也并不觉得意外。我们身后，一片开阔的乳白色明亮水域之外，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快艇，此时变成了一座庄严的民族纪念碑，因为"红衣主教"仍挺直站着，低头在看着船夫。他显得非常悠闲自在，因为已将我们送上这艘船。不过，他却在注视着船夫，不是要责怪他的任何失误，而是在判断他的能力。远远望去，他就像中世纪城市广场的一根粗壮的大理石柱子。在这些广场上，城市的旗帜常常迎风飘扬。

---

1. 爱伦·特里（Ellen Terry, 1847—1928），英国知名舞台剧女演员。

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I

“我们给康斯坦丁拍个电报吧，让他早点到萨拉热窝接我们，”我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说，“我受不了杜布罗夫尼克。”“也许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城市附近的某家宾馆，你会觉得更喜欢一些。”我丈夫说。“事实上我也不会喜欢的，”我说，“去年我住的就是城郊的一家宾馆。那些宾馆挤满了人，要不就是度蜜月的，要不就是从来没有过蜜月的。吃饭时，我往桌子四周打量，发现到处都是喝了一半的酒瓶，标签上潦草地写着房间号。我觉得这是这世界上最令人沮丧的景象了。”“是的，的确，”我丈夫说，“我似乎也是这感受，当我常常看到有人违背戈特弗里德·凯勒(注)的禁令：‘Lass die Augen fassen, was die Wimper hält von dem goldnen Ueberfluss der Welt’——‘且让双眸满盛眼帘所及的这世界流溢的金色吧。’不过，如果离城更近一点，你也许会更喜欢。”“不，”我说，“什么也没这里可爱。”

我们在格鲁兹港附近下风方向的一家宾馆下榻，港口距离杜布罗夫尼克市有两三英里距离。杜布罗夫尼克，过去也叫拉古萨，直到归属南斯拉夫，才改为现在这个名称。拉古萨虽然是地道的伊利里亚地名，但因为听上去像意大利语，于是被改掉了——这似乎是一个有些牵强的理由。朝宾馆窗户下方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港口里船只上的索具与烟囱；视野越过密密匝匝的波浪，对面是一面山坡，上面建满了别墅。这些别墅掩映在它们的花园里，透出一种它们的建筑所未及的富足气息。那片景致实际上是再造品。这是杜布罗夫尼克的一处郊区，贵族们曾在此建有他们的夏季行宫——威尼斯哥特式建筑，装饰以来自西方和东方的珍宝，四周是堡坎垒砌的花园，以及树丛和果园，可爱如意大利的菲耶索莱或瓦隆布罗萨。因为在这地方，达尔马提亚海岸荒凉的景象一扫而空，从北方来的旅人可能会以为这便是它基本的特征。这些房屋在多次的拿破仑战争中被毁坏、被抢掠，后来又被烧毁；19世纪和20世纪，在原来的地基上，人们又建起来漂亮却难识旧貌的别墅。然而，历史留在这片风景之上的，还不止这一混乱景象。紧临港口上方的缓坡地带，建有一座巨大的蜜金色别墅。别墅拱廊相连，露台处处，阳台上紫藤垂挂，一层叠一层的柑橘树、柏树、栗树、橄榄树与棕榈树，一直延伸至山顶。其坚固与奥地利所有建筑并无二致，不过它应该像我们巴思和特威克纳姆的那些华而不实的建筑一样，采用拉毛粉饰的方法，因为这别墅是为伊丽莎白皇后建的。不过，一是因为她自己心神不安，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害怕斯拉夫人，因此，她只来过这地方一两次，每次不过几天时间。

“这地方，”我说，“跟杜布罗夫尼克任何奇特的东西一样，我觉得就那么回事。”“不可能吧，”我丈夫说，“杜布罗夫尼克很精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

精致的城市了。”“没错，”我说，“可我还是不喜欢，我觉得这对斯拉夫人而言，是一种特有的实验，特有的性格，特有的成功。我不喜欢这城市。它让我想起来英格兰最苦难的岁月。”“没错，”我丈夫说，“我明白，当你想起它的历史。但我们不妨只欣赏它的外观吧，它的外观也是独特的。”事实上，他说得没错，因为它和威尼斯同样珍贵，和卡拉瓦乔与贝利尼画笔下的威尼斯完全有得一比，虽然比提香和丁托列托笔下的威尼斯稍有逊色。第一次来此游玩，应当选在黄昏将临未临之际。这一时刻，通往城墙的林荫道上，因为两旁高大的树木掩映，已是一派黄昏景象，虽然在开阔地带，在跨过护城河通向城门的桥上，日暮的天光才有些泛白。在那城门口，你又会被另一个历史复杂性之例证迷住。城门的上方，是一幅梅斯特洛维奇浅浮雕，画面中一位国王骑在一匹马上。这是对塞尔维亚彼得国王的纪念，亦是典型化了的一种表现手法。彼得国王是亚历山大国王的父亲，在德拉加和她丈夫遇刺后继承了王位。这幅作品非常非常漂亮。对于那些只在国际展览中见识过梅斯特洛维奇作品的人，这幅作品将令他们惊讶不已。他们会发现，一位画家，为民族精神所启发，以特定的一个地方为背景，同样可以创作出何等优秀的作品。这幅浮雕，完美地表现了一个农民国家理想的统治者形象。这一典型化的表现手法，实际上，也暗指了所有塞尔维亚农民心目中的英雄——传说中的马可国王。这位国王会自己给自己的坐骑梳洗毛发。而且这马是他自己从集市上以合理的价格买回来的。不过，他也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任何人，无论是利用武力，还是利用手中的财富，都无法使他为自己人民谋福祉的责任感有丝毫退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幅浮雕竟会登上与农民政府背道而驰的一座城市的城墙上——数世纪以来，这城市一直维护着最严格的贵族制度，和能够想象的最狭义的资产阶级精神气质。这一不谐和画面，也解释了在杜布罗夫尼克，人们对于南斯拉夫理想的某种程度的冷漠态度。同时，这浮雕本身也似一种讽刺：想想，当列强摧毁杜布罗夫尼克后，整个地球上，除了塞尔维亚农民政府，没有任何国家对它伸出过援手。

首次来此游览，最理想的是在黄昏时分，正当天光泛起淡淡蓝色之际进入城门，来到城门内侧正中间有一座15世纪那不勒斯建筑师奥诺弗里奥·德·拉·卡瓦所建喷泉的开阔地面。这喷泉是一件艺术杰作，有一座小型礼拜堂大小，一个圆顶形的砖石建筑，上面有十四个喷水嘴，每个喷嘴从一块上有雕刻的饰板中飞跃而出，饰板嵌在一块镶板的中间，镶板又被两根修长的壁柱分隔成一个檐槽，檐槽里的水源源不断地环绕喷泉奔流：实用如任何的饮马槽，可爱而振奋人心如一座圣坛。喷泉高出地面的两级台阶上，总是摆着一些地毯，地毯商贩则在一旁闲聊。在这时候，所有的猫都变成了灰色，所有的地毯都非常漂亮。那各种各样的色彩，融化在傍晚的天光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艳丽。广场的一侧，是又一座模样平凡素朴的小教堂，如同我们在退休船长居住的村子里看到的那座教堂的城里姊妹。这种教堂，达尔马提亚人随处都有修建，而且建得特别好。在这一时刻，教堂

金色的石头赋予它一种特有的静谧，似乎在欣赏自己那独有的落日。这日落，比普通的日落显得更悠长。教堂上有一面带着尘世气息的玫瑰红窗户，非常漂亮，如新娘胸前的那枚胸针。教堂旁边是一座方济会女修道院，修道院哥特式入口上方，是毫不含糊、真实可感的圣母哀子像。看圣母玛利亚那神情，好像如果她能掌控，她会阻止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她对自己儿子这壮丽的命运，脸上毫无欣喜之色。她不是地位低下的农民，她是一位贵族；可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天命，也别想让她有半点动心。广场对面是一个旧军火库。军火库的正面被打通了一道拱形通道，人们从这通道过去，前往另一边的一个花园。花园的树林间，灯火明亮，有音乐声传出。其背景，是高大的城墙，显得壮实有力，诚恳无虚饰。

再往前是城市的主大街，一条石头铺砌的宽敞大道，禁止带轮的交通工具进入。街道两旁，是俏丽的17世纪屋舍，房屋的底层被用作商铺。这个时候正是巡游上演的时刻。这一习俗，是所有南斯拉夫城镇社交生活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几乎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城镇和村庄均如此。所有的人，都按一般的标准，穿戴整齐，汇入游行的队伍。在一个通常穿着都是质地优良的家纺布或工厂加工布料的城镇，我从没看见过任何人参加巡游时穿着破旧的打补丁的衣服——虽然在非常贫困的地区，我也曾见过整个巡游队伍都穿着体面的破烂衣服。日落时分，巡游队伍在城市主大街上来回地漫步，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时间。前一会儿，除了三五个去商店购物或是坐在户外咖啡吧休息的人外，街上空空如也；眨眼间，整条街便已挤满了人，城里凡是觉得有能力加入这样的社交生活的人，全出来了。每个人都高抬着头，挺直身躯，以便别人能看见自己；每个人都嘴里念念叨叨说着什么，都比私下里显得开心一些；每个人都试图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然而，这一企图却败于它自己之手，因为这么多的人，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来回移动，渐渐地，由于黑夜的降临，变得彼此越来越难以分别，使每个人都不过是一条河流里的一颗小水滴，而且是一条并不会永远流淌的河流中的一颗小水滴。前一瞬，城市的生命之流阻塞了整条街道；后一刻，空荡荡的街面便留给了茫茫黑夜。

不过，只要巡游还在继续，因其在地球上这一角落所具有的意义，它因此便是一种生活形态。在这地方，在杜布罗夫尼克，生活仍具有着某种价值内涵，某种威尼斯年少时节定然有过的东西。一个擅长制作质地优良的面包的城市，也学会了制作质地优良的蛋糕。一个凭着理性与勤劳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已将优雅发展为强有力的第二天性。一百三十年前，杜布罗夫尼克便不再是一个共和国，然而其建筑所铸就的辉煌却不曾改变，人民仍生气勃勃，并能享受这勃勃生气之快乐。这里，达尔马提亚的城市生活展现出一种大都市的面貌。跟随这巡游的队伍，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伦敦、巴黎与纽约所追求的梦境之中；在这梦想中，人们从自己的生活之地出发，从自己的卷心菜菜地出发，愿意行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再无距离的

限制，生活中再无任何微小的快乐不可以购得——只要这世界不断地走向更加富裕。这一梦想不应被鄙薄；它源于人更为温情脉脉的内心，没有被冷酷所污损，生发于这样一种愿望：希望能逃脱于隐含在人与地球一切相互关系中的恐惧。在大城市如伦敦或巴黎或纽约，甚或后来的威尼斯，这一梦想都不可能实现；而在大不过杜布罗夫尼克这样的城市，无论过去抑或现在距离白菜菜园都不太远的这样一个城市，也许还可能实现。因为，只要是天气好的夜晚，总会有一些乡下的农民，进入城墙之内，来加入这巡游的队伍。

若要细品这巡游活动以及这城市的风味，最好是暂别这主大街一会儿，拐进旁边的某条小巷。从这些陡峭狭窄的巷道，可以登上城墙。这城市所坐落的半岛，被城墙勾勒出一个略带方形的轮廓。一排排密密匝匝的房屋——此时此刻只属于熟睡的孩子、老人和年轻女仆——门口与阳台上，都有着繁复的雕刻。所有房屋都沉浸在春日弥漫的芬芳里。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会让人恶俗地认为，一个城镇，除了房屋就不应该再有其他。雕饰的门口与阳台，与鲜花交相辉映。因为是傍晚，这些花儿看上去是黑的，它们在白天则是一片鲜红色。高高的墙壁之后，无数小花园在散发着它们甜美的芬芳。再看主大街上，从这些房屋与花园里出来的人们，潮水般涌向他们的集市广场，途中经过某尊你在其他城镇，比如德国不来梅的市政厅前可能曾见过的塑像。据说，这些塑像所代表的是英雄奥兰多或罗兰，他们曾打败撒拉逊人：他们的存在，标志着一座城市属于思想开明、法纪严明的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人群的左侧，是海关与铸币楼。它的三层楼，记载了他们的先辈三个世纪来的历史。14世纪时，共和国的公民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海关，也就是一个收取包裹的地方。那个年代，人们的手很灵巧，海关的院子堪称完美。一百年后，因为寄来的包裹太多，加之公民文化修养提高，人们于是在上面建起了第二层，用于文学聚会和社会集会。建筑极尽了威尼斯哥特式风格可爱的一面。由于社会繁荣、经济交往的复杂化，之后的一百年，出于需要，人们又在顶层加盖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漂亮的铸币厂；纯粹为了追求奢华，他们又在海关对面修建了一个回廊。因为主导这几次修建的人都属于同一血缘，身处于唯有他们才可能创造出来的文化环境之中，所以这些不同的建筑风格，才能由一种内在的精神统一于一体。这栋建筑呈现着一种轻快、清新、简洁的迷人魅力。

那些杜布罗夫尼克人在暗影里游荡，那些房屋则从他们周围往上攀爬，奔向夜幕降临前的片刻、悬垂于地球之上的那一抹白色的天光。这天光，因为电灯更粗糙的白光而被惊扰、驱散。海关的对面是圣布莱斯教堂，一堆巨大的巴洛克建筑，立在一个有扶手栏杆的平台上，像一个里面充满着无限世界的被系住的气球。前面是一座古旧的钟塔，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玩具钟：每到一个小时，两个巨大的铜人便会出来敲打一面钟。人群于是抬起

头来，观看敲钟的铜人，一如数百年来他们父辈那模样。钟塔的旁边，是一个城市咖啡店，一座雄伟的建筑，人们在这里吃得舒心，还可眺望远处的港口。因为此时，我们已到了半岛的另一面，从拱门吹进来的海风带着咸味。然后往右，是教区牧师的宅邸，一座无可比拟的建筑，是杜布罗夫尼克乃至达尔马提亚的一份特殊的荣耀，是佛罗伦萨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开罗基与人称奥尔西尼的达尔马提亚建筑师乔治的作品。房屋结构简单，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底层外围是一个六拱回廊，上面一层有八面哥特式窗户。但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完整性，两端原来各有一座塔楼，如今不在了。尽管如此，其效果却是完整的，很令人喜欢。就如所有的建筑杰作，它表达了对其屋顶下将要举行的活动的见解。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是对上帝及神圣之特性的一种思考；维也纳的美景宫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考量。教区牧师官邸平衡的建筑布局手法，其弧形的拱门与辐射状的柱顶所显示的富饶，表达了一种井然有序而又富有创造力的社会理想。在一个坦率得惊人的城市，一个有头有尾、有着明晰历史的城市，这建筑又是其中最明白晓畅的。这是生活之一目了然——南斯拉夫的一种特有性格，至少在它不曾受到条顿人混乱生活影响的地区是如此——的又一例证。

巡游的人们说：“这是我们父辈造就的城市。”城市说：“这些是我们所造就的男女。”假如你转入旁边一家小餐馆，吃个晚餐——最好是来一份英国版的——展现在你面前的，出自该研究领域一位真正学者之手的冷餐肉大选集，其蕴含的各种意义足够你思考一晚上。当然，其中也有着明显的杜布罗夫尼克含义。它曾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不是受保护国，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是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除了斯普利特附近几英亩不足为道的土地外，唯一的一片从不曾落入无论匈牙利还是威尼斯之统治的领土。它作为一个共和国，堪称一个奇迹：在这么一个宽度可能不及半英里的半岛上，却曾诞生了一个经济强国。从杜布罗夫尼克出发，一个个商队曾取道陆路，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这里是通往东方的门槛。它利用地势之利，充分发挥其商业、金融与航海天才，任何所知世界都有它的船只熟悉的身影。与此同时，在南欧所有重要的港口——以及北欧部分港口——它还拥有工厂和仓储；它在巴尔干国家持有煤矿与石矿投资。其历史为一个词语所照亮：“商船队”。而在拉古萨，这不过就是“船只”的意思而已。其卓著程度，相当于伦敦市——比如说它自亨利三世当政以来，以其自有的弹丸之地，以及后来通过征服与购买而渐次获取的三四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在整个大英帝国商业收入中，占有了主要部分。这是杜布罗夫尼克最主要的一个奇迹。除此之外，还有它对土耳其的抵抗——无数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一直垂涎于这一港口，想要将它当作一个进入亚得里亚海和入侵意大利的关键入口，却囿于杜布罗夫尼克抵抗者天才的外交手段，从来没敢下手。

然而，在一个人端详这城市之际，其他的一些问题会跟着涌入脑中。首当

其冲的是，历史过程中可观察到的文明积累的严重缺失。因为粗心且粗暴的自然力的作用，人类的功绩被永久地抹去了。这地方，其立足之根基在于人类野蛮的同类相残。因为杜布罗夫尼克最初的定居者，是从古希腊城市埃皮达鲁斯——距离这里海岸往南十英里路程——和古罗马城市萨罗纳叶逃亡出来的难民。当时，这两座城市被野蛮民族所毁。后来，作为野蛮民族军队一部分的斯拉夫人来到这些地方，对杜布罗夫尼克进行了扩建。那时，这里还受着更为强大的凶恶力量——火灾与地震——的可怕侵袭。其中一些火灾可以归咎于人为原因。因为，它的欣欣向荣——当归功于希腊罗马文化与斯拉夫人强大创造力之融合——意味着非常容易招致外来的攻击，所以人们不得不将这乱石嶙峋的半岛打造成一座城堡，并且囤积大量的枪支弹药。而火药爆炸尤其容易引发火灾。二十七年时间里，教区牧师的宅邸曾因此两度被大火夷为平地。然而，较之于地震所造成的破坏，那样的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城门处圆顶喷泉旁的那座外貌朴素的小教堂，就是16世纪时，一次震后余生的人作为感恩而修建的。当时，先是第一次震动使大量房屋倒塌，它们时值五千英镑；之后十八个月，余震持续不断。很明显，这一地区每二十年就会有一次程度不同的地震。不过最严重的是1667年那场灾难。海水四次从港口往外倾覆，每一次水底的石头都裸露了出来；然后每次海水又倒灌回来，巨大的海浪将许多船只摔向码头和悬崖，船只撞得粉碎。大部分的公共建筑和许多人家的房屋被毁坏，共和国教区牧师与五千国民被埋在这些废墟之下。接着是火灾，再然后是成群结队如狼似虎的农民，因为不堪威尼斯的暴虐统治和土耳其人的战火，从山上涌下来，将剩余之物抢了个精光。

因为一个奇特的机会，我们有缘清楚地见识到，因为那场灾难，在建筑发展的历程上我们都损失了些什么东西。在教区牧师宅邸正对面的那座巴洛克教堂里，有一尊两英尺高的银质圣布莱斯微型塑像。他是这城市的守护神，手里托着一个银质的杜布罗夫尼克震前模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城市，有如童话故事里的景致。模型尤其细致地表现了大教堂和城市主大街的景象。那座大教堂为狮心王理查一世所建。他因为在这海岸的一次海难中幸免于难，于是修了这座感恩教堂。这座13世纪的建筑，宏伟壮丽，极具特色。模型上的主大街，是商业自豪感的一种独特表达。一字排开的房舍，上面俨然如宫殿，下面则用作商铺和办公室。同时，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被毁掉的还有海量的绘画、雕塑、织品、珠宝、书籍。这些东西，因为这城市数个世纪来繁盛的贸易，为共和国从西方和东方吸引而来。事实上，我们得知有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其严重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看见它，会感到何等神奇。在波斯尼亚有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既野蛮又文明，他们是拜占庭文明间接的后裔。在理论说教、咬文嚼字上，他们可以跟罗马匹敌；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野蛮，杀人不眨

眼。这一社会群体被土耳其毁灭。15世纪末期，波斯尼亚最后一位国王被其私生子谋杀——该人后来被马霍米特一世活剥了皮——其遗孀凯瑟琳逃到杜布罗夫尼克，然后一直生活在此地，直到最后前往罗马告别自己的生命。离去前，她将一些插画丰富、装帧精美的赞美诗书籍，赠送给了方济会修道院的僧侣。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图书馆。如果这些图书保留下来，我们将可以一瞥现在只能猜测的那个世界——可惜整座图书馆都被毁了。

将任何灾祸归咎于自然有何意义呢？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歹毒，几乎每次都会踏一只脚进来，利用自然灾难的机会，制造更加严重的大灾祸。正当此时，趁其绝望无助，土耳其人突然趁火打劫，尽管此前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卡拉·穆斯塔法，土耳其内阁总理，一个酒疯子，装模作样地宣称，杜布罗夫尼克民众被迫武装反抗山里卑鄙的抢劫者，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上，是对土耳其国民的侵犯。以此种理由，以及其他一些关税协议争端作为借口，他提出一百万达克特——相当于将近五十万英镑——的赔款要求。同时，他还要求，所有地震中死去的人的财产，都应交给奥斯曼帝国政府；（他还突然宣布）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为土耳其所有。十五年时间里，共和国不得不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将侵略者拒之门外。当此之时，土耳其人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轮番打击，已是摇摇欲坠，因此，杜布罗夫尼克凭着其商业实力与外交天才，成功抵挡住了土耳其人的侵略。商业力量与外交策略是它唯一的武器。作为宣誓保护基督教世界与欧洲秩序的法国，本应对共和国施以援手，但路易十四却连小指头也不愿抬一下。这部分是因为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曾是西班牙的同盟，部分则是因为形同行尸走肉的曼特农夫人，那常常令男人们爱不释手的母短吻鳄极品，在他身上点燃了亲近耶稣会的熊熊烈火，因此任何关于共和国公使是一个詹森教派信徒的谣言，都足以令他取消援助行动。

那个关于四位使节前去与土耳其政府申辩的故事，是人类正义的一个经典明证，差不多可以看作一种承诺：对于人类之邪恶，尚有东西可与之抗衡。卡博迦与布基亚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去陈言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土耳其所使用的手段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他们直接将承认共和国为土耳其领土的文件摆在卡博迦与布基亚面前，威胁加辱骂，告诉他们必须在上面签字。他们拒绝签字。接连数小时的威逼恐吓，使他们神情恍惚、精疲力竭，但他们仍然拒绝签字。于是，他们被关进一座发生过瘟疫的监狱。在那里面，他们一躺就是数年，偶尔会在包装纸上，用自己的粪便写一些短讯，让人偷送回国。他们的同僚，博纳和戈齐，前往萨拉热窝，向土耳其驻波斯尼亚的帕夏重申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但同样被投入监狱。一次，土耳其与俄国在多瑙河上交战，两人被拖在土耳其军队后面，戴上脚镣手铐，扔进当地一个疟疾泛滥地区的一座堡垒的地牢里，并被告知，如果不在卡博迦与布基亚在君士坦丁堡拒绝签署的文件上签字，就休想出来。博

纳死在了那地方。一位驻扎该地区的拉古萨牧师，站在他身旁，给他做最后的圣礼，却遭到狱卒的阻止。要不是土耳其人在维也纳郊外被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打败，不知还有多少那样的殉道者将受杜布罗夫尼克派遣而断送生命。卡拉·穆斯塔法被处死，而这在共和国所引发的恐惧，其可怕程度，与我们今天所曾感受的任何恐惧一模一样。

一个光荣的故事，却令人伤心。要是人类取道一条阳关大道，如果火灾与瘟疫不曾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如果地震不曾将人们吞噬，如果人们不因与其创造力相匹敌的邪恶而自甘堕落，而自寻毁灭，人类将创造怎样的辉煌呢！至少可以说，在这场障碍赛中，杜布罗夫尼克跑出了优异的成绩。然而，当考虑到为赢得这胜利，它自始以来就商业与外交方面都做了怎样的操练时，这场面也就不再那么值得令人兴奋了。达尔马提亚所有的城市，阶层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城市法律就司法、法定权利与经济管理，根据人们所属的阶级，做出了公正的规定，同时也极为不公地将人们限定在自己所属的阶级，无论其贡献如何。开始的时候，这是出于历史的需要。一个移居地，最初的移民白手起家，打下经济基础，建立起一种文化——毋论好坏——当他们坚持要将一切可能的社会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不愿与后来者分享时，他们也许既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出于一种公心，因为这些后来者可能是野蛮民族，或是因为多年残酷战事而道德堕落的难民。可是，从海岸上每一座城市都在上演的持续不断的叛乱以及可怕的大屠杀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已经遭到滥用。比如说，在赫瓦尔，一个空气馨香的岛上，曾经有一位牧师手举耶稣受难像，而平民们面对着受难像宣誓，誓言要杀光所有的贵族。十字架上的耶稣鼻子流下鲜血，那牧师倒地而死。尽管如此，平民们仍不放弃誓言，当着教区牧师的面，在司法大厅里屠杀了许多的贵族。威尼斯为施以惩罚，派出舰队远征，这些平民被打败，最后落得死的死、残的残。

这一阶级制度，在杜布罗夫尼克从未引发如此强烈的叛乱，部分是因为良好的社会经济福利堵住了所有的不满，部分是因为他们极难有成功的机会。但它却以一种比任何地方更为严格的形式存在着。人们被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工匠。最后一个阶级在政府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担任公职。平民也没有选举权，但可能担任某些不重要的公职，虽然只能由贵族任命。政府实际大权完全掌控在贵族手中。国家最高统治权最终在大议会。该机构构成者为所有十八岁以上、在称之为《金色书》的花名册里被确认为贵族的家庭成员。该议会将执行权委托给一个由四十五人组成的元老院。元老院除紧急情况特殊安排，一般每周聚首四次。元老院又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七人委员会（直到其震前，该委员会曾多至十一个人），负责实施司法权，以及处理所有外交事务；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维护宪法的遵守与实施；以及一个六人委员会，负责掌管国家财政。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执行机构，不过从以上所述大概已可以看出

共和国的构成情况。千万别忘了，这些阶级被分隔于各自生活的空间，其严格程度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任何一个阶级的成员，都不得与另外两个阶级的成员结婚；如果结婚，便将失去自己在本阶级中原有的地位，他们的孩子必须归属到父母中地位较低的一方。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情况，让人难以想象。

有趣的是，这一制度竟然可历久不衰，尽管由于经济的普遍繁荣，各阶级之间所有实际存在的差距已被抹平，平民，甚至工匠，无论财富还是文化修养都不比任何贵族差。同样有趣的是，即使是各阶级内部因为分歧而出现裂隙，这一制度居然仍能继续维持。1808年，当马尔蒙来到杜布罗夫尼克，发现贵族被分为两派，一个叫萨拉曼卡派，另一个叫索邦派。这两派得名于两百五十年前一个很小的事件，即西班牙查理五世与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的一次论争。正好在1667年的地震中，相当大比例的贵族阶级被摧毁，因此有必要从平民中增补一些人，以重振其势力。萨拉曼卡派一方成员认同西班牙绝对主义，不愿意以平等地位对待增补贵族；而索邦派，也就是亲法派的成员，倾向于自由主义，要求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接纳他们。这一事件中，另一可能因素是，这次地震中，索邦派成员死伤尤为严重，希望能恢复原有数量。尽管两派地位完全平等，在议会里平起平坐，但他们之间没任何社会交往，走在街上连招呼都不会打一个。两派成员交结不当，其后果跟不同阶级交结不当同样严重。

不过，共和国给这不好将就的胃口所提供的，远不止这一块面包。事实上，人类彼此间蔑视的欲望，跟人类自我蔑视的渴望没多大差别。同样，那些平民也被分为两个帮派：圣安东尼派和圣拉撒鲁斯派。两派彼此充满怨毒情绪，关系一如萨拉曼卡派与索邦派。尽管有如此的纷争不和，这种三级体制仍能继续存在，这说明，该体制实际上是构成共和国的不同种族长期以来各自习俗的一种融合体——比如说，一种古典贵族制度的变体。这种贵族制度曾嫁接于伊利里亚某个古代社会组织，只是我们对此组织一无所知。对此变体，后来者斯拉夫人觉得很满意——虽然他们自己倾向于民主——因为尽管有内部分歧、争吵，但这种社会结构非常稳固。“无论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一位罗马皇帝，当写到最初的斯拉夫部落进入帝国疆域时，怒冲冲地说，“不用多久，他们便会陷入内部纷争，因为他们相互间充满憎恨，根本无法彼此接纳。”

当然，该制度可并不愚蠢。你也许会想，它何以能持久不衰，但你却不能质疑这长盛不衰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共和国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帝国，它必须通过谈判，将它们拒于一臂之外，以免遭覆灭：首先是匈牙利，然后是威尼斯，再然后是土耳其。外交事务就是它的内部事务，处理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绝对保密，决不能让任何帝国知晓另一帝国对共和国，或共和国对另一帝国，所做的任何承诺；任何贪婪的团伙也不被允许知晓共和

国确切的资源数量。因此，它完全有理由建立起一个统治阶层，他们因为被赋予极高的特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其社会现状。他们会以父传子受的方式传授他们的外交艺术。因为人数少，出现泄密事件，也易于追查。他们人数的确不多。15世纪时，共和国总人口多达数万人，而贵族只有三十五家。因为都住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所以他们来来去去很容易被其他人监视。

可让人费解的是，这么一个极端保守的贵族政府，竟然会发展出如此一种倾向——这倾向常常被认为是民主制度才有的特征。杜布罗夫尼克最害怕的是出现独占鳌头的人物。很明显，杜布罗夫尼克宪法借鉴了威尼斯的宪法，其为防止这种可怕情况的发生而制定的条款，则是区别于威尼斯宪法的主要所在。元老院选举实行的是终身制，圈子很小，外交官都是世袭的。但是当选者必须每年接受认可。他们一百万个小心，深恐有任何元老把持过大权力，搞一言堂。教区牧师身穿气派的红色丝绸托加袍，左肩上搭一条黑色天鹅绒坎肩，来去都有乐师和二十位宫廷卫士簇拥着。但他的任期只有一个月，且再想当选，必须间隔两年。如此短暂的任期，是万分焦虑的几次修订的结果，因为任期最初被定为三个月，然后减为两个月，最后压缩为一个月。当选的教区牧师在任职期间，就像囚犯一样只能在这宅邸里活动，只能在有国事活动时，比如因职务所需前去隆重参拜大教堂，才可以出去。

地位较低的职位同样受着种种限制。主管司法与外交的七人委员会须每年重选，而且个人不能连续当选。处理所有宪法问题的三人委员会任期也只有一年。管理国家财政的六人委员会任期为三年。此外还有一些规定，以防止任何特定年龄的人把持权力。七人委员会只要达到成年就可当选其成员，但最年轻的必须做外交部部长；三人委员会则其中所有人都必须在五十岁以上。这些规定，因其有效性，而被证明完全是合理的。唯有一次，在杜布罗夫尼克非常早的历史时期，曾有一位贵族试图搞独裁，最后被迫自杀。后来，7世纪时，一些贵族受萨沃伊公爵引诱，密谋篡权，但在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假面舞会上，经全体人民一致同意，他们遭到逮捕。

对个人特权的恐惧，并非这一贵族社会唯一的特质——这一特质常常让人想起与之相反的案例。在杜布罗夫尼克历史上，有太多的东西，在我们清教资本主义者中间都找得到其反例。尽管重视教育是达尔马提亚城镇里的这个民族普遍的传统，甚至要求也非常高，但这里的贵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尼斯驻斯普利特总督曾抱怨说，那些年轻人从牛津学成回来，脑子里装满了颠覆性思想。不过，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他们却不会将教育视作一种阶级特权。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送去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大学学习，还兴建公立学校，向所有三个阶级的子女开放。同时，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医疗体系，其中包括整个文明世界的第一所育婴堂。此

外，在处理住房问题上，他们也非常先进。早期的一次地震后，他们着手制定了一份城市规划图，将整个社会的利益都纳入考虑之中。他们的供水设施，作为一个工程项目，不仅领先于时代，而且尝试将供水接通到每一个家庭。

在贩奴问题上，他们还是遥遥先行的慈善家，并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环境。1417年，他们通过了当时的第一部反奴隶制法令——除此之外就只有我们英国颁布过法令，不允许贩卖人口的船只进出布里斯托港。他们对于这一罪恶的斥责，绝非因为它不关乎自身利益，因为从地中海的贩奴贸易中，它可以挣得大把的钱财，而且居住在海岸远北地区的某些商人也从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收益；还须记住的是，在巴尔干国家，由于封建制的复活——该制度在欧洲其余地区早已绝迹——共和国治下的，或与之交好的很多民族，都视农奴制为理所当然。但大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人若贩卖奴隶，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及六个月监禁，“因为以模拟我们造物主上帝形状而创造的人形东西来换取利益，将其像野兽一样进行买卖，必定是卑鄙、邪恶、令人恶心的，是违反一切人性的，也必定致使我们的城市蒙受巨大的耻辱”。五十年后，他们进一步收紧这项法令，制定了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并附加规定：如果贩奴者在当局指定的期限内仍不释放受害人，恢复其自由，贩奴者将被处以绞刑。整整三个世纪里，直至地中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彻底绝迹，富庶的共和国公民之间一种最受欢迎的慈善行为就是赎买奴隶，让他们获得自由。

杜布罗夫尼克还有其他一些辉格党所偏爱的政策措施：比如，严格坚持执行避难权。1389年，土耳其人在科索沃打败塞尔维亚人，其中一位战败的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逃往杜布罗夫尼克避难，受到热情款待，尽管当时共和国与土耳其是同盟。当苏丹穆拉德提出抗议，要求将乔治·布兰科维奇移交给土耳其，元老院的回复是：“我们，拉古萨人，只遵照我们的信条而生活，根据该信条，倘若你逃至此地，我们也一样会给你提供庇护。”但共和国不仅在政治生活，还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特质，我们西方人都很熟悉。该国建筑设施极其舒适，配以最好的饮食和家具，但他们的奢华却严格地限定于特定的方面。直至共和国灭亡五十年之后，杜布罗夫尼克才有了剧院，还是奥地利人修建的。15世纪时——在欧洲其余地方，这是一个极尽欢乐的时期——帕拉狄乌斯写道：“为体现拉古萨人教育孩子是何等严格和勤奋，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大家，在他们的城市，任何艺术表演都被认为是无法忍受的，除了文学。任何竞技表演者或杂技演员靠近，都会被赶走（对于文学与经商，他们则不会干涉），以免他们的年轻人被那样低级趣味的表演带坏了。”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肯定也有许多富有的家庭，如银行家和制造商的家，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睡的是爱尔兰质地最好的亚麻被褥，围绕身边

的都是品质最好的红木家具，以及利德先生与西德尼·库珀先生最优秀的作品（以及——感谢约翰·罗斯金——或许还有一些真正优秀的意大利画作），但他们却不曾踏入任何剧院或音乐厅或马戏团。不过，共和国与英国并驾齐驱的甚至更重要的一点，则体现于两国国民中更富有阶层的业余爱好上。英国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商业人士，尤其是贵格会教徒，他们在空闲时间，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喜欢搞一些研究。在杜布罗夫尼克，情况亦是如此。这里的国民对文学都有着一定的品味，虽然这样的训练——比如创作一些格式极其严格的古体或意大利诗体的诗歌——之于文学，就如林木修剪法之于园林艺术。不过，他们真正热衷的，却是数学和物理科学。在这方面，他们培养了许多的业余爱好者，以及一些专业人才。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罗杰·约瑟夫·博斯科维奇，一位狂野的斯拉夫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式人物，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一位诗人和外交家。在他——以及那些与他有着同样热情的同胞——的作品里面，有对科学的赞歌。他们视科学为照亮上帝作品的明灯。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英国同样阶级的人群中，也产生了同样的不计其数的作品。

不过，相似之处还不止于这些。有那么一个案例，可用以指控英国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信奉英国国教，发展成为自由主义者，追随格拉德斯通先生，取得节节胜利，又培养他们的孩子追随奥克斯福德伯爵与劳合·乔治先生，直至他们信仰的黎明时刻。可以指控他们的慈善行为，因为他们将面包分给平民百姓，致使他们可能忘记他们的主人夺走了一切的生产与分配手段，而将他们置于彻底的经济依附地位。还可以指控他们，他们的善举不过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腰包；尽管他们欢迎英帝国之外的科苏特或马志尼或任何其他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却对英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态漠不关心。亦可指控他们，因为他们所描绘的我们向有色民族的出口“《圣经》、朗姆酒、来复枪”，语言刻薄，严重不符合事实，因为有这样的合理说法：“国旗与贸易同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阶级的美德，而使如上指控不值得为之脸热心跳地予以讨论。不过，以上指控中亦有足够的合理之处，使得我们也无法认为被指控者是一个理想的群体，或孕育了他们的那个社会有如天堂般美好。就杜布罗夫尼克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共和国极其虔诚。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在谈论基督教。在它的《金色书》里，有一段对共和国长官的祈祷文。它这样写道：“主啊，万能的天父啊，选择了这个共和国为你效忠的天父啊，我们恳请你，根据你的意愿，和我们的需要，为我们选择管理者吧：让他们因此敬畏你，谨守你神圣的戒令，让他们以真正仁爱之心，珍视我们，引领我们。阿门。”从不曾有任何其他城市，有如此多的教堂和礼拜堂；从不曾有任何其他民族，如此虔诚地遵从教会的戒律。但是，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却又有某些与此不一致的东西。考虑到杜布罗夫尼克与贪婪蚕食基督教世界的奥斯曼帝

国之间的关系，它还有权骄傲而挑剔地自诩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么？其他的达尔马提亚城市不及威尼斯——尤其远远不及共和国——对土耳其人那么态度恭敬。它从没有与土耳其交战，而是向它纳贡、纳贡，还是纳贡。

每年，两位公使从该城市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随行带去大量的金达克特。其数量，在几番增加后达到一万五千金币。他们身穿被称作立法院制服的特殊服装，蓄起长长的胡子，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帖，与他们的家人一一拥别，出席在大教堂举行的弥撒，在教区牧师宅邸的穹顶下接受他一路平安的祝福，然后，带着出纳、理发师、一大群随从官吏和翻译、一队武装卫士和一位携带便携式圣坛的牧师，踏上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十五天之旅。旅途并不算太危险，因为共和国往来商队已使这条路线成了一条贸易官道。不过，使节必须在那里驻留十二个月，直至下两位使节前来接替他们的位置。而且，一方面性命掌控在对方手中，一方面却要与这样一个喜怒无常的暴虐异邦进行微妙的商业谈判，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通常他们都会非常英勇而出色地完成任务。然而，他们与土耳其人的交易不仅仅限于商业方面。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还必须展开大量的行贿活动，因为对奥斯曼政府各级大小官员，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必须按级别高低，付给他们相应的小费。随着土耳其帝国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变得臃肿笨拙，地方官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笔负担也逐年增加。到后来，不仅要付给奥斯曼政府种种款项，连派驻黑塞哥维那的军事长官、驻波斯尼亚的帕夏以及他们手下的职员，都有必要打点。

这一切本来也没什么，如果杜布罗夫尼克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海陆军方面不如人的独立商业王国，承认自己极其看重自己的商业贸易与独立地位，因此不惜为此付给土耳其人巨额的赎金的话。可这对于一个自诩狂热地严守基督教教义的国家而言，实在不是那么让人舒坦。当然，也可以说，正因为杜布罗夫尼克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才使它有可能向被土耳其人征服的领土上的那些基督徒提供大量的帮助；任何有它商队根据地的地方——包括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甚至土耳其全国各地城镇——的基督徒都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和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共和国争得权利，对于进出口奥斯曼帝国的商品只需要支付2%，有时1.5%的税率，而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则必须支付5%的关税。但没用。没什么能让这处境散发出玫瑰花的馨香。倘若狄更斯得知这些情况，他对杜布罗夫尼克的观感，可能会如他对自己笔下的查德班得[注]先生的一样；而要是让切斯特顿[注]来处理这些材料，他可能会如憎恨可可一样憎恨杜布罗夫尼克。

一个国家，如此狂热而近乎严苛地宣誓信奉基督教，甚至拒绝东正教教会踏入其国门半步，却与土耳其人如此亲昵，尤其让人心中不好受。理论上，共和国对宗教信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实际中，如果这花朵开在异

国土壤上，它会觉得它更漂亮可人。虽然来杜布罗夫尼克的许多游客，甚至一些当地人，都信仰东正教，但他们是不被允许在共和国境内参加任何礼拜活动的。很有趣的是，18世纪时，这一规定因凯瑟琳大帝而引发严重麻烦。当时，她的舰队前来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收拾土耳其的海上残余力量，她的情人奥尔洛夫担任舰队司令。奥尔洛夫向共和国递交了一份协议，协议界定了凯瑟琳大帝的中立地位，同时提出要求，杜布罗夫尼克须修建一座供公众使用的东正教教堂，在城里开设俄国领事馆，以保护俄国人以及所有东正教信徒。第二条要求得到批准，但第一条遭到拒绝。教皇本人亦重申，罗马天主教会将不遗余力，以前所未有的愤慨与热情与东正教会进行斗争，只要敌人所代表的是异教思想，而非建立分支教会；无论这场战斗会给不幸的巴尔干半岛各族人民带来怎样的苦难，他都在所不惜。

俄国呈送给共和国的协议，其他各项要求都令人满意，但就这一项，一位杜布罗夫尼克公使前往圣彼得堡，历时三年据理力争，最后借助奥地利和波兰的影响，且因普鲁士驻俄国大使个人恰好也很喜欢这美丽的城市，才终于使谈判取得胜利。这些北方人对南方之喜爱，简直无可救药。结果，两年后，奥尔洛夫不得不与杜布罗夫尼克签订一项条约，允许俄国向杜布罗夫尼克派驻一位领事，不过只是为了保护俄国臣民，他可以在自己的官邸修建一座礼拜堂，其本国的国民可以在此依照东正教仪式进行礼拜。作为交换条件，杜布罗夫尼克有权在俄国海域从事贸易活动。人们观察历史时，却将剧院望远镜拿倒了。据记录说，这位共和国公使签订完条约后，径直去了罗马，在那里受到最热忱的款待，因为他以及共和国“禁止修建希腊东正教礼拜堂”，为神圣的天主教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此一件小事，也几乎可称得上伟大了。因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变化，领事任命一事从此搁置，于是共和国同意在距离城门之外一英里多的一片荒地上，修建一座小型的礼拜堂。1804年，当共和国又一次被要求允许其信仰东正教的国民自由开展宗教活动，它断然拒绝了。

这一偏狭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覆灭。在维也纳会议上，沙皇亚历山大本来可以救它的。这样一个缺乏自我防卫能力的小国，本也可能引起信奉神秘自由主义的他的恻隐之心。可当他想起自己的祖母一再为共和国所冒犯，自己所信仰的宗教遭到共和国的迫害，他便拒绝为之提供保护。但如果认为共和国维护罗马教皇，是出于对其宗教原则的忠诚，而置自己的全球利益于不顾，那就错了。有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无异于对其英国原型的一番又一番羞辱——当服务于一者，它同时也为另一者服务。在它被法国人抛弃后，一位奥地利专员前来接管杜布罗夫尼克，他对这里的一位贵族说，这城市宗教建筑之多，简直让他惊讶。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任何这些建筑，对于我们，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话的确是事实。这个与东正教国家直

接接壤的国家，因为对罗马天主教会如此之热忱，而得到两大势力的保护：西班牙和罗马教皇。不过，这同样不是如玫瑰花那样的甜美。

共和国这暧昧的性格，值得好好思考，因为这一性格，对现代有利于天主教——它不证明那种信仰之优劣利弊，而只批评现代教育的不鲜明的个性——的温和宣传中时常运用的一个论点颇有影响。偶尔有人提出，加入罗马天主教会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较之于新教，它更有助于养成一种愉快、稳健、温厚的性格。当然，对于这样的说法，教会本身也会嗤之以鼻。罗马天主教会所要求的一种精神状态，是相信某些历史事件事实上乃是依照教会导师们的界定而发生的，相信对于生命的诠释，真实不虚、自始至终地包含于他们的教诲之中。如果说只要加入某一教派，就必定会养成所有其他人所不能容忍的性格，那么这跟信仰之效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不明白这道理的人，只会将他们浅陋的论点变得更糟，他们宣称说，罗马天主教会不支持两种不受待见的人：清教徒，以及他们含混不清的兄弟，伪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而新教教会支持他们。然而，历代以来，清教徒却不断地涌现——以宗教或者非宗教的形式，以异教徒或者基督教教徒的身份，以东正教教徒或者异端的身份，以天主教或者新教的名义，以自然神论或者理性主义的姿态——无论何种情况，当局总是有时予以鼓励，有时又对之进行打击。事实上，新教之所以看似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情有独钟，其中是有缘由的。因为地理位置，而非心理倾向，使之成为北方国家中与反对改革派相抗衡的天然力量。可是，在杜布罗夫尼克这地方，在拉古萨共和国这地方，却有着一部完整的历史，头尾俱全，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一片完全不曾受过新教任何污染的土地上，这样类型的人仍可能涌现出来，并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默许。

---

1.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作家，现实主义诗人。

2. 查德班得（Chadband），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人物。

3. 切斯特顿（Chesterton），疑似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英国作家，G. K.切斯特顿（G. K.Chesterton，1874—1936）。

远行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I察夫塔特

道路沿海岸往前延伸，海岸两旁乱石嶙峋的堤岸上，茂密的金雀花如金色的头发。我们头上与脚下的山坡上，植被之茂盛让人惊讶，尽管即使在这地方，雨水亦将春季正常的威力稀释得只余下四分之一。到处都是香气怡人的灌木丛，以及一丛丛的夹竹桃和灰蓝色剑叶的芦荟。下面较低的山坡上是一片片橄榄地和一排排的柏树。这些生机勃发的树木，呈黑色而非绿色，看上去很奇怪。此外，还有橡树——这个名字在杜布罗夫尼克人那里表示“小橡树林”。在一些有几码见方的平整地方，长着些树干粗大的族长似的悬铃木，其伸展开来的枝丫，足以将一大群嫔妃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海面看起来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因为这海域里没有岛屿，它无缘分享海岛起伏挺拔的盛宴。放眼望去，前方一片平坦，两旁植被茂盛，犹如一条通往救赎的道路。古时候，这海岸原是潘神崇拜的一个中心。

不过，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的居所。在这条路上，往山里去的一段路程上的某处，有一个山洞，卡德摩斯和他妻子就是在这山洞里痛苦地实现他们的变形的。他们深为自己孩子的不幸感到痛苦——其子被赫拉所迫害——于是企求神灵将他们变成蛇。奥维德曾写道，当卡德摩斯完成变形后：

> 他舔了舔他妻子的脸，然后爬进她那可爱而熟悉的胸脯，紧紧地缠绕着她，去找寻那个他那么熟悉的喉咙。所有在场的人——因为有朋友跟他们在一起——都恐惧得直哆嗦。但她轻轻抚摸着这冠顶的爬行动物那光滑的颈项——突然间，地上现出两条互相缠绕的蛇。过了一小会儿，它们游动身躯，钻进了旁边的树林。啊，在他们还是人身时，他们既不惧怕也不会伤害人，他们是那么温和，而现在，他们仍旧记得曾经的自己。

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象征手法，表现了人伤心欲绝时的那种木然状态。他们变得智慧了；他们从往昔的友伴身上寻得慰藉。可他们失去了曾经的人身，他们的各种知觉不再遵循曾经的神经路径，他们不再有城堡一样坚固的骨骼，唯一剩下的，只有那长长的、游走的、翻滚的伤痛。但卡德摩斯的遭遇，也许部分是掌管这海岸的神灵的一个阴谋，因为他创造了文字，成了潘神崇拜最大的敌人。他让人类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他使快乐与悲伤成了危险的东西，因为他为人类提供了纪念快乐与悲伤的手段，人们借之分析快乐与悲伤，也因之感到恐惧。

到这里，这海岸上奇怪的事件还没结束。我们从圣杰罗姆的生平，了解到圣伊拉里安的故事。4世纪的时候，这位圣人前往埃皮达鲁斯——这城市为希腊人所建，距这里不远——发现整个这一地区的人都生活于恐惧之中，因为在这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怪物，能用呼吸将农民和牧羊人吸进它的洞里。这当然是卡德摩斯了；文学作品总是不缺少读者。圣伊拉里安来到洞口，画了一个十字符号，命令恶龙出来。它于是乖乖地从洞里出来，温顺无比地跟着圣人回埃皮达鲁斯去了：所有值得一提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一种被拯救的愿望。于是圣人对这城里的人说："码一堆柴火。"柴堆码好后，他对恶龙说道："躺到柴堆上面去。"它于是躺上柴堆。城里人点燃柴堆，它只是静静地躺在上面，直至烧成灰烬。毫无疑问，它就是卡德摩斯，这就是文学作品。这并非一条龙，而是凤凰，将从灰烬里浴火再生；异教文学行将灭亡，基督教文学即将诞生。

那之后，埃皮达鲁斯曾两次更名。7世纪时，它为蛮族所毁，城里居民逃往北面十英里的地方，建立起杜布罗夫尼克，或者说拉古萨。但过后不久，一些流落他乡的人又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城里，重新建起一座较简陋的城市，更名曰拉古萨·韦齐亚。而今它被称作察夫塔特，据说是拉丁文"城市"一词的斯拉夫语读音。我们在那地方逗留了一些时间，发现关于圣伊拉里安与那条恶龙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像是虚构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城市位于一个半岛的两座像驼峰的山峦上。从那蜿蜒的道路，仍能看见那条龙跟随在圣人身后、一路逶迤而行的身影。它温驯如水，唯一支撑着它的是内心的那份觉知，知道自己将从烈火中获得新生，而那些将点燃柴火的人，也将获得他们自己对于死亡的认识。它很清楚，当我们一千五百年后来访此地，我们应当能在我们的脑海里，看见它前往自己殉道之地的途中所经过的那些高宅大院，那些将火炬伸向柴堆的优雅而神情严肃的人们。它也明白为什么。它知道，有一天，水手和佃农们会来到这座城市的废墟中生活，会从那些被放火焚烧、被砸毁了的宅邸废墟中，挖出来上面有雕像或雕刻纹饰的东西，用来建造他们屋舍的墙壁。这些东西至今还可以看见，就如穷人纽扣孔里的花朵。它知道，农民的铁锹有一天会伸向半岛的某个地方——那地方，当这城市还归属于希腊的时候，曾是一片珠光宝气之地；之后，那些从不知道什么叫基本需求得以满足的人们，他们饥饿的胸口上、粗糙的手指上，那些精雕细镂的宝石，将唤醒一个由优雅而严肃的男男女女构成的一个逝去的世界，否则，这个世界将尘封地下不见一丝痕迹。"躺下，"圣伊拉里安不得不对那条龙说，"躺下，别再笑了。"

然而，甚至是到了这一步，一如在别的任何地方，故事仍没有完结。这地方有两个航海家族，发了财，成了知名的船主。然后，就在战后，其中一家的一位女子嫁入另一家，企望梅斯特洛维奇会为她、她父亲、她母亲、她兄弟建造一座陵墓。她与雕刻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商谈，然后突然，她及她父亲、兄弟相继去世，从医学上找不到什么明确的原因；她母亲还没

来得及最后拟定计划实施的方案，也跟着他们去了。这一事件，既表现出某种极壮烈的东西，又表现了斯拉夫人的某种性格。他们曾决心用他们的死，来激发人们对于死亡的分析，并且毫不迟疑地将他们的决定付诸实施。

梅斯特洛维奇仿照“天使之后”礼拜堂的形式，建造了这座陵墓。陵墓位于半岛其中一座山峰的公墓里，掩映于苍柏之间。这是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喜欢在不确定性中探索新的形式：其中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四个音乐男童天使，让人想到奥伯利·比亚兹莱笔下那惊世骇俗的日本浮世绘式的作品。任何人也不可能对这样令人不安的事实视而不见：因为土耳其的占领，整整五百年时间里，南方斯拉夫的艺术彻底被清除，当它重拾创造性天才之际，却发现自己又被敌视文化艺术的奥地利，将自己与欧洲其余国家在那期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相隔阻。不过，从那礼拜堂里可以发现，偶尔也有一些作品非常精致地诠释了那一理论——唯一的一种理论，不将个人之死亡看作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之根源，认为仁慈的上帝在人类宿命的脚下，铺有一张如马戏团秋千表演者身下铺的那种网。这样的护佑非人类所敢于提供的。一位父亲如果这样糟糕地护着他儿子，他将被判处死刑。可是死亡，和认识死亡之意义，却比从死亡中被挽救回来，是一种更美好的命运归宿。梅斯特洛维奇所展开的这一讨论，不是通过文学暗示的方法，而是他作为一位雕塑家，以形式展现出来的。

然而，这一海岸归属于潘神崇拜。在这座陵墓里，卡德摩斯走得太远，他所探究的问题，超出了凡夫俗子记忆和关注的范围，因此，他遭到了惩罚。负责这公墓的司事，也即负责给游人指示那坟墓所在的人，是位乐天派，对丧葬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就如这是足球或赛马。他本人也尝试过雕塑。他的雕刻全是对梅斯特洛维奇作品的拙劣模仿，粗糙得刺眼；每件仿作都是对梅斯特洛维奇的批评，其严厉超过他的任何一位艺术对手之恶毒。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有一些折磨，一条龙对之惧怕的程度，胜过对于火葬柴堆。

II珀拉斯特

从萨夫塔特起，道路开始转向内陆，并经过达尔马提亚的一处山谷。那些山谷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们明显过分浮夸。冬天里它们居然还是湖泊，非常深的湖泊，而非沼泽，你可以在里面游泳、垂钓，甚至乘坐相当大规模的船泛舟其上。我曾见过一面湖有德文特湖那么狭长。春天时，一只看不见的手拔掉塞子，湖水便从石灰岩的地下通道流入大海，然后这里再看不见德文特湖的踪影，而变成了一片干燥、极为适合耕种的土地。之后，我们回到海边，来到新海尔采格城。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疲惫不堪的军事建筑——这些工程，不同时期里，既有波斯尼亚人，也有土耳其人、威尼斯人以及西班牙人的功劳——之间，紫藤、果树的花与黄玫瑰，泡沫一般冒出来。远处，我们看见——但没前去拜访，因为时间不合适——那座16世纪时圣萨维那修建的修道院。在这座修道院里，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曾向自己正式宣布自己即将死去。他曾多次来此访问，但当他就在启航前往法国之前抵达这里时，却没有拉响到访的铃声，宣布一位客人即将光临。他只是从一旁走过，拉响了一声丧钟。

值得注意的是，他每次在那地方现身，都表明南斯拉夫政府面临着其固有的某些困难。走遍整个国家，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座东正教修道院。他出于虔诚而前来修道院访问，并不曾让北方及沿海的臣民多爱他一分，他们无意分享这教堂中的珍宝在他心中激起的强烈兴趣——这些珍宝包括属于尼曼雅皇室的一些圣物，该伟大王朝曾建立起塞尔维亚帝国——因为那些皇帝与他们没什么历史渊源。但如果卡拉乔治家族没有得到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以及得到他们中世纪历史之自豪感的激励，他们永远不可能将土耳其人赶走，或在大战中保住自己不受侵害，或是将他们的斯拉夫同胞从奥地利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正如梅奇尼科夫所言，大自然充满不和谐，而其中最大的不和谐，很可能是我们对大自然和谐运转的期望。

我们经过一段海岸，其秀美犹似河畔，虽然海岸边恶狠狠地徘徊着海战的身影：一个个造船厂，以及海里铁鲨鱼似的鱼雷艇与潜水艇。但突然间，景致变得可爱起来。我们走进了科托尔湾，那蜿蜒曲折的自然港湾，你一生都会读到关于它的文字。这海湾就像挪威的一个峡湾，给人的感觉是，它较之于一般风景的差别，就如芭蕾舞与散步的差别一样。海峡形状越来越宽阔，海面也随之越来越平静。狭窄处宛如一条河流；至宽处，空阔如一海湾；然后，如一条披肩般将自己一把扔出去，丢在嶙峋山崖之间，扭曲蜿蜒得让人不知所措。在我们头顶上方，陡峭的山坡上有许多壁架，将春天分列为不同的阶段：有时是初春纯净得没一点杂色的嫩绿树林，镶上这一带正在花期的果树；有时只是一抹极淡极淡的轻雾，笼着冬季黑沉沉

的树木与土壤；至最高处，直刺天穹的，是白雪皑皑的洛夫琴山最高峰。但相对于挪威，这地方更有一份属于达尔马提亚的殊荣：沿海岸的许多地段，都是成片的威尼斯哥特式宫殿和教堂。

海峡渐渐收拢至最窄处。在这里，一位匈牙利国王曾用一条铁链将它锁了起来。我们经过一个瀑布。以石灰岩之乡惯有的做派，瀑布从地下岩石缝隙中径直喷涌而出，流入世界上最早有人居住的城镇之一里尚。该城市曾是古代伊利里亚的首都，是托伊塔女王的栖身之地。城市很小，已被打击得早没了生气，因为自哥特人时代以来，它一再受到外敌侵袭，还曾遭受地震之灾。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皇储鲁道夫需要学习克罗地亚语时，宫廷为他选的教师，既不是维也纳或萨格勒布的博学的教授，也不是达尔马提亚某城市的任何温文尔雅的绅士，而是这城里的一位地方乡绅。[注]尽管这城市备受侵扰，它却保留着这海岸原汁原味的气息，带有些海船船长所居住的在科楚拉对面的那市镇坚忍不拔的特质；古铜色的渔网挂在金色与淡紫色的石头上。

顺着峡湾往前几英里路程，珀拉斯特变得更加明丽，视野也更开阔，它漂亮的威尼斯哥特式建筑被抹上一层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因为在港口旁边有一座没有完工的教堂，差不多还只是一道洞开的拱门，立在一座非常大、建造完整的教堂前面，与其钟塔构成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就如惊慌失措的人在其上司面前，又如《哈姆雷特》里奥菲莉娅在皇后面前的那种样子。许多宫殿因为地震而开裂，东倒西歪，里面长满紫荆树、无花果树和杨木，紫藤——这种超级柔术表演者——悬挂在有着各种雕刻图案的栏杆上，然后奋力穿过上一层楼的一面格子窗，爬进了房里。不过，在珀拉斯特，无论耳之所闻，眼之所见，都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它的名字曾进入彼得大帝的生活，在他其中一个五年计划中，他曾派遣十六位年轻贵族，与当地船长一道下海，学习航海技术。这些男孩，肯定为这些全新的东西，为这南方土地，为这大海，为这艰苦的训练，而苦不堪言。位于这海湾之中，有两座岛屿，在大约两百到三百码的地方。两座岛上到处是低矮的建筑；一座岛光秃秃全是石头，另一座岛上还好有一些柏树。看到这第二座岛屿，任何游人都必定突然生起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而之后又可能觉得这反应很好笑。

但产生这种感觉是正常的。正是以这座岛屿为背景，瑞士象征主义画家阿诺德·勃克林创作了他令人恐惧的画作《死亡之岛》，描绘了巴博斯与幼帝因为不小心而被小妖精抓去的场景。不过，其原型与画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看那岛屿，你会觉得它与你的通常经验相反，就好像是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有一女子，熏黑的脸上擦抹了脂粉，可仔细一看才发现，事实上她是一位被太阳晒黑了的运动健将。这是非常简朴的一座岛屿，上面质朴的石头和树木，似乎是经过精心罗列的。一位船夫划船将我们送过去。

我们发现一座12世纪的最中规中矩而素净的本笃会小修道院，虽然被损毁，却还算完整。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小会儿，发现一些气势庄严的墓碑——据船夫说，它们属于居住于大陆宫殿中的一些家族。我们可以看见，在岸边和山腰上，那些宫殿仍掩映在春绿的树木之中。尽管这地方呈现出一种威尼斯风貌，墓碑上的名字却全是斯拉夫语的。

但我们的船夫显然是希望我们挪个步，因为他不停地扭头看另外那座岛屿，并解释说那边的那座巴洛克式教堂非常漂亮，曾有许多的奇迹剧在那里上演。“他不喜欢我们待在这地方，”我说，“也许这地方有蛇吧。”可当我们划船上了另一座岛，才明白他之所以要带我们来这个岛屿，是因为他就住在这岛上，他的狗等着他回去陪它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认为这很重要，倒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狗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动物。它土褐色的亚麻短纤维外套，给人似乎没打理过的印象。很显然一般来说狗都比较注重梳妆打扮，可是这一只，一眼就看得出来，它根本不在乎这个。它脑子里装的全是神圣的东西。它雪莉酒颜色的眼睛里热忱燃烧，正适宜神奇的圣洁之地，因为它的情感表达能力是如此丰富，任何一点批评的态度都难以藏在心里。

如果说这只狗有什么错误，那就是上帝应该有所保留，不该赋予其创造物过多的情感。它跑过来迎接船夫——而他离开顶多才不到半个小时——并且向我们表达了它的友好，就像是将一瓶香膏抹在我们脚上，然后用它的毛发为我们将双脚擦洗干净。它举动极其夸张，跟它所居住的环境简直是绝配。这是一座人工岛，围绕一块不大的礁石筑起来的。上面由大理石铺筑整平，然后建起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神圣是神圣，却线条膨胀，似某位营养良好的女圣人的胸脯。遗弃在教堂之外平地上的，是一件可爱却古怪的家具，或者说石艺作品：一张很大的大理石桌子，由下面一个蹲伏的巨人托着。教堂里面挂着一些意大利风格的绘画，还算看得过去。后面的背景墙上是大约两千枚献贡的银制小牌，是银匠工艺之大荟萃，亦是虔诚信徒不同情感表现之集合。这其中，有一幅大的图案，也是一幅杰作：浅浮雕的画面，展现的是土耳其人从山上冲下来，进攻珀拉斯特，并被击退的情景。这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因为其自身所代表的罪恶，而被坚强不屈的人们一代代留存了下来。

我们离去时，那只狗答应为我们灵魂之得到拯救而祷告，并表示愿意在圣母的圣坛前燃起一支蜡烛，祈福它主人前往海岸及返回的途中一路平安。我建议带它跟我们一起上船去，免得它如此焦虑，但它对此一万个不乐意，甚至船夫也感到大为吃惊。我估计它发过誓，绝不离开这岛屿半步。当我们划船渐渐远去，它绕圈奔跑着，压低着脑袋，狂吠不止。它身后那道拱门显得完全是个奢侈物，那弧形的圆拱，甜美如勺子里滴溜下来的一滴糖浆，古老的里尚海岸边，大海映在拱门框里，犹如一面灰色的镜子。

我为狗的放弃感到有点儿脸红，同时又很高兴还好没有猫在一旁冷笑。对其精神导师来说，这只猫肯定就如一根在背的芒刺。

---

1. 我正打算向一位维也纳历史学者询问其原因，这时发生德奥合并事件，因此没收到任何回音。——作者注

III科托尔

这个地方有座城市，叫多布罗塔，由沿海岸的一溜宫殿和教堂构成，绵延四英里之长。它是一座城市，一座光荣的城市——因为共和国在与土耳其人的海战中取得的伟大功绩。这里的一座教堂里，存放着从哈德希·易卜拉欣身上夺下来的包头巾。当时在比雷埃夫斯，他被来自这教区的两名战士用剑刺倒。这地方并没有沉寂下去，尽管也曾遭受地震袭击，但紫荆树沾满尘土的紫色花朵突然从开裂的墙壁间冒出来。南斯拉夫海军和邮轮从多布罗塔带来许多的船员。大海给予这些地方不绝的生命力。

同样，在科托尔，也可能有过死亡。它曾是一座大城市，属于中世纪伟大的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被土耳其人毁坏之后，它先是归属于匈牙利，然后是威尼斯，变得极其富庶。从杜布罗夫尼克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要从这地方经过，此外它也有自己的商队，与意大利进行海上贸易。这城市里建有三十座家庭礼拜堂，而且座座都修得有模有样。但所有这一切，因为拿破仑对其国际贸易的攻击而突然中止。因为这个，以及他对这一安分守己的海岸发动的实际战争，一个温和而兼容并包的文化就此毁灭了。后来，奥地利的统治又不遗余力地压制它任何复苏的举动。这周围大量的山区——尤其是里尚山区——部族都拒不认同奥地利的统治，于是奥地利在这海岸安置军警，长期对这里的人们进行打压。由于其治理之无能，这地方一直处于贫穷落后且怨气积郁的境地。

它处于峡湾的末端，几乎与大山脚下的丘陵垂直相接。一条著名的道路沿着这大山而上，通向采蒂涅。各种军事防御工事，将这座城市给封闭了起来。这地方总是有些冷。冬天里，太阳照射只有五个小时，夏天里也不够长，不足以消除冬日积聚起来的寒意。迷宫似的巷道与手帕大小的广场，将人从一道盛景带入另一道盛景。一座10世纪的大教堂，尽管粗糙，正门却做工非常精细。两座塔楼连接，构成教堂入口，形成一个拱门。往里走，有一个9世纪教堂的大门，矗立在同样的位置上，上面是非常漂亮的雕刻。上面发绺一样交错的图案，如我们凯尔特边境的风格，节奏安排倒恰到好处。其上，两只魔鬼攫住两个逃跑的灵魂。画面上所有的人物形象，既暴烈又神情安宁。教堂里面有一个藏宝库，如一位富有女人的首饰盒，历经岁月与磨难，已懒于整理，珠宝凌乱地扔在盒里——不过仍满满当当的，尽管它曾遭遇拿破仑军队的光顾，而且拿破仑曾发布多道征用令。我从没见过如此蔚然大观的献贡品，全是些银制的胳膊和腿。其中还有一些让人动容的十字架，基督徒与土耳其人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人们曾带着它们走南闯北。教堂一旁是一栋主教宅邸，浑圆的建筑，上面爬满开花的藤蔓。

继续往前走，在冷冽的巷道间，矗立着一座12世纪的东正教教堂。在科托尔这地方，有许多的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通道里，还有一座独立的微型教堂，一个盒子中的盒子，奇迹中的奇迹。这让我记起来一个本已忘了的景象，即东方教堂与西方教堂的差异：前者阴暗、封闭而神秘，后者圣坛上灯火明亮，一切都展露无遗。转过一个冰冷的拐角，又是一座罗马风格的教堂，修建于14世纪，却被饰以罗马异教的苍鹰图案。教堂里有一个基督受难十字架，冠冕由真正的荆棘制成，头发用刨花做成。这个十字架，是17世纪一位博学的僧侣——肯定是个大骗子——献给米开朗琪罗的。从这里，登上一个侧坛前的数步台阶，透过玻璃罩，可以俯瞰下面神圣的奥萨那——一位黑山圣人，死去已近四百年，只遗留下一些衣服和皮肤碎片，以及几块骸骨，透出一种令人激动又哀恸的甜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怎样改变了斯拉夫人的性格。在南斯拉夫信仰东正教的地区，人们认为，虽然女性可以是信徒，但修道生活却非她们的本分，因此这里很少能见到修女。

“科托尔一切都不曾改变。”一个人不禁会想。这一点，我们觉得从我们的导游身上可以得到证实：他坚持认为，每年2月的一天，科托尔的确有大事发生。那一天，水手协会的成员会身穿中世纪服饰，扛着他们先辈抗击土耳其人的武器，在大街小巷上游行。大教堂里也会举行仪式——非常独特的仪式，严格地讲，我觉得是不被允许的——宝库里的遗物被陈列在圣坛上，两位领头的城市居民轮流焚香祷告，一位是天主教教徒，一位是东正教教徒。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权威宝座很远，斯拉夫人都属于个体主义者。“至今场面仍非常盛大吗？”我们心怀疑虑地问道。“那肯定，”我们的导游说，“我们失去了商人，但水手还在。后者更为重要。”

听见身上大衣磨破到已看得见纱线的人如此的回答，让人觉得很是认同。为证明自己所说是真的，他带我们穿过城门，来到码头上，自豪地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水手。”他们漫步在这淡抹的夕阳之中，身后弧形的大山匍匐在峡湾之上，如一道势头已去的波浪；他们形容慵懒，如歇鞍的骏马；他们带有醉意的平静的脸上，积蓄着能量——如果某一天身处比雷埃夫斯，或遭遇一个戴包头巾的海盗从一旁经过，他们知道当如何将此能量释放出来。“要不是我出生在战争时期，自小多病，”导游说，“我应该也会做水手。”

IV格鲁达附近的家

我们的司机是一位斯瓦比亚人的儿子，也就是说，一位德国人。与许多家族一道，他们家也被玛丽娅·特蕾莎安排在位于布达佩斯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多瑙河一带的土地上定居，因为土耳其占领期间，这些地方没有了人烟，必须重新殖民。他父亲在他出生之前来到杜布罗夫尼克。除了斯拉夫人，他没见过任何其他人。不过很显然，斯拉夫人给他的印象非常怪异，让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放纵得无以复加。他本人，尤其在讲英语的时候，言语间试图矫正这一过度现象。因此，当我们接近格鲁达村子时，他扭过头说："这里的人蛮不错的。"后来证明，他的意思是说，这一地区的男女，从面貌上，与男神、女神难分彼此。辽阔的宇宙中，散落着许多奇特的小片土地，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美。这地方便是其中的一块。

"但这个，"司机自问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在我们回去杜布罗夫尼克的途中，再次经过这村子时，司机这样自己问自己，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激情。三个年轻女孩，可爱如林子里的报春花，一面朝我们走来，一面笑着，伸出她们的双手，嘴里喊着"便士，便士"，似乎她们不仅是在要钱，也是在对乞讨与行善一并予以嘲讽。因为我们已在回程，不赶时间，便使劲儿敲了敲玻璃，让司机停下来。他一面抱怨，一面慢慢将车停下。"她们会来要钱。"他说。"这有什么吗？"我丈夫说。事实上，她们为要钱，可是做了漂亮准备的，因为作为掩护，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小束鲜花。

"便士，便士！"她们笑着，叫喊着，而我们充满爱怜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这绝非某种民族倾向将自身强加于一般大众——每一个精子都尽己所能创造出各自的美来。她们一位头发黑色，一位栗色，一位灰金色；她们唯一相同的，是她们金色的肌肤，纤美的眉毛，丰润而俏丽的嘴，挺直的身材，和她们身上粗厚的黑色羊毛外衣。"你有零钱吗，亲爱的？我身上没了。"我丈夫满脸善心地问道。"一便士零钱也没了。"我回答说，然后转身向司机。"给我三个十便士的硬币。"我说。"三个十便士的硬币！"他一字一顿地惊呼道，"但你可万万不能给她们三十便士。三十便士啊！这样太不好了。她们根本就不应该乞讨。乞讨是丢人的事。而且就算是情有可原，三十便士也实在太多了。"

他这样说的确很有道理。老实说，他完全是正确的，我们这样是错的。可她们是如此漂亮，而尽管她们这么漂亮，终其一生，她们都将在贫穷中度过，这太不公平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断然否定。女人从一出生，就被告知必须漂亮；如果长得丑，一切都将与她们无缘——

这一因果缘由，几乎是赤裸裸地毫无掩饰。也因此，漂亮的女性就理应什么都不缺。“麻烦了，我想给她们，”我恳求司机道，“就三个十便士的硬币。按汇率，这一点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不算多大一笔钱。”

他没有即刻回答。以他的性格，对任何社会规范是如此看重，雇主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也不至于狠心拒绝。最后，他说：“我身上只有一个十便士的硬币。”我接过硬币的同时，我俩都明白他在撒谎。他气鼓鼓地重新发动汽车，三个可爱的女孩站在一旁，笑哈哈地跟我们挥手道别。这时，天上下起了小雨，飘洒在她们身上，她们脚下的道路因为被雨打湿，泛着亮光。她们身后，堤岸上奶油泡沫似的柽柳，黄昏时色彩变得比白日里更淡，黄色的花朵却更显浓郁。“我在想这几个女孩都多大年纪了。”汽车驶出几英里后，我丈夫说。“我们问问司机吧。他是本地人，应该知道。”司机回答道：“她们大概十五六岁。这么小就被鼓励做事不知礼数，老了以后会变成啥样子？”

杜布罗夫尼克II

外出远行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大教堂的藏宝室。如今参观要容易多了，虽然每星期在固定时段也只能参观一两次。战前奥地利统治时期，整个达尔马提亚基本上停滞不前，这座教堂亦是如此。游客很难进教堂，因为在那黑暗的世界，牧师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游客与其说是来观光毋宁说更可能是来偷东西的。现在来此一游仍费时费力，因为达尔马提亚人，跟克罗地亚人一样，有时，要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办特定的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困难。他们觉得，这只有塞尔维亚人才做得到。我们与一大群其他游客，坐在这宏伟的巴洛克建筑的大教堂里，坐在这奶油色的、俊美而透着尘世气息的建筑中，比预定时间多等了半个小时或更久。然后，一位牧师，不算老，却已是大腹便便，带着钥匙姗姗进来，领着我们穿过一层层安全门，进入教堂的藏宝室。藏宝室的中间，有一道低矮的锥刺栅栏，将房间隔成两半。我们顺着栅栏排成一排，与此同时，牧师进到栅栏后面，打开环绕房间、从地面一直排至屋顶的无数橱柜。他从橱柜里将其中的东西一个个取出来，拿过来给我们看。他沿着栅栏缓步走过去，以便我们每个人都能看个仔细。

有的物品的确相当漂亮。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著名的圣骨匣，里面装的是圣布莱斯的头骨。匣子呈颅盖形状，有六英寸高，六英寸宽，上面镶嵌着二十四枚珐琅片。这些珐琅片都是11世纪拜占庭作品，质地简朴，上面是细密的圣人肖像。另外还有一些不错的拜占庭以及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的物品，不过牧师似乎觉得，较之于藏宝室里那无数文艺复兴时期的稀疏平常的物件，这些东西没那么有趣。虽然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天主教牧师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但他们却少有鉴赏家的品位和才气——而这一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牧师那里，却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这一位牧师，对于艺术还算是有一点儿亲近。不一会儿，他展示给我们一个现代十字架。高度的自然主义风格，却非常克制，很令人触动。这十字架是城里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制作的。我旁边一位身材粗壮的瑞士妇女问，雕刻者是否兑现了他的承诺。牧师回答说：“噢，没有，他二十四岁时因为酗酒死了。总是这德行，这些艺术家。”“的确，真的是！”那些瑞士人赞同道，然后耸耸肩，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松弛的脸上露出一种庆幸的优越神气，觉得其民族务必超乎他们想象地严格要求自己。

但这些人自认是艺术热爱者。紧接着，牧师又从橱柜里取出来一件物品。他先在手中晃了晃，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然后才拿过来展示给观众们看。观众发出一片啧啧赞叹，就如看见焰火表演的基座时那样。我伸长了脖子，但除了看见一件造型令人困惑、外表破烂的银器外，别的啥也没看

清楚。当它移动到那位瑞士女人面前，我才看明白那是一套面盆与大口水壶。这东西在许多旅游指南里都有提及，被认为是所有收藏中的镇馆之宝。据说它们是1470年时某位大主教留给他侄子的。但哪怕一头瞎眼且白痴的牛也看得出来，根本不是那回事。而这样的丢脸的事情还在后头。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看了、摸了觉得难受的，也没什么比这更违逆一个人常识的了。面盆里面，零乱地点缀着一些极其写实的羊齿草叶和贝壳花纹。其间，是同样写实的鳝鱼、蜥蜴和蜗牛，所有釉彩也都是它们的本色。那般煞费苦心、极尽精巧，犹如一块块湿疹。为补上让人堵心的最后一笔，这些动物只是被松弛地粘在面盆上，使它们可以晃动，好给人一种移动的错觉。虽然杜布罗夫尼克很美丽，但这件东西却丑陋得难以言表。我对第二件物品之厌恶，说明了为什么我会对前一件物品之艺术性持怀疑态度。这城里的人将此可怕之作看作一件艺术杰作。也就是说，他们所瞻视的是一件赝品，一件只是模仿自然而不阐释自然的自然主义之作。这一理论认为，所有我们能够和需要做的，就是模仿自然。该理论没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宇宙之中，不明白我们迫切地需要敏锐的人去对每一种现象进行观察，弄清其本质，以及它与其余存在世界之关系。他们没明白我们需要信息，他们以为一切我们都已知晓，因此在知识的这最末一环节，我们便可以制定出完善而确定的规则，以指导人的思想与行为。这一思想，只会是一个将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陷阱，因为人一旦接受了这一思想，便会如野兽般，在无知中死去，而不会迈出走向救赎的任何一步。然而，它却筑在杜布罗夫尼克的每一面墙壁里，化为每一座拱门的拱心石，化为每一座修道院的水井。环绕他们身边的便是真正的艺术，这些艺术之作正耐心地走向被发现之旅，并最终与现实合一，因为只买最好的是他们一贯的原则。他们过去也常常买到最好的东西。可他们假装说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实则根本还未动身。他们当表象为真实。这也是为什么，杜布罗夫尼克尽管很美，却遍地饥渴。

但牧师以为我想再仔细看看这面盆。他从栅栏上俯身，尽可能靠近我。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件粗鄙庸俗之作，要远比一件劣质艺术品给人的打击要沉痛得多。我的右手因为痛苦，放在障碍栅栏的一根尖桩顶上，竟不知道缩回来。此时牧师那浑圆的肚子稳稳地压过来，将我的右手牢牢地压在桩尖上。我发出一声惊呼，他却以为是因为他那美丽的面盆惹得我大声惊叹。他脸上带着恩赐的神情，身子更加靠近过来，我也更加清晰地看见它可憎的每个细节。他肚子越来越重地压在我的手上，我的疼痛升格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我试图引起他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于是伸展开手指，抽动了几下。可这似乎毫无效果，那坚实而有弹性的肚子紧紧地压在我的手上面，仍纹丝不动。

这真是让人感到无比惊奇。一个人时至中年，才发现自己好多过去信以为

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竟然是错的，真让人觉得奇怪。我想要说话，但唯一冒进我脑子的话语却形式不当，我立马就意识到了，并拒绝了这样的措辞——“Ton ventre, dein Bauch, il tuo ventre, tvoy drob[注]——我决不能这样说话，”我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说——votre ventre, Ihr Bauch, il suo ventre, vash drob[注]。”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位牧师说这样的话，仍让人觉得怪异。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来，尽管我痛得龇牙咧嘴。人生中，这样棘手的局面有时来得太迟，就如遭遇海难时，维吉妮娅拒绝与保罗游上岸，因为她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我只是发出一声低沉的痛苦呻吟。牧师终于认定我是一位极为敏感的人，他身子往后仰了一下，再俯身上前。我丈夫甚至对此更是确信无疑，他紧紧地抱住我的腰，把我拖开。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牧师身子往后一缩，面盆险些滑落。但我心中的快意却因担心我丈夫快要勒死我了而被冲淡。我摊开手掌，掌心里一个伤口汩汩地往外冒血。“噢，对不起！”牧师说，一面俯身过来，躬身微笑。我觉得，考虑到这同样的伤口放在一位圣人身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此言太轻巧了。“可，亲爱的，这怎么啦？”我丈夫问道。“牧师的肚子把我的手压在尖桩上刺的。”我乏力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丈夫叫道，“他应该感觉得到呀！”“没，”我说，“这个，我们都有错。”“怎么了？”我一旁那位瑞士妇女问道。“牧师肚子给压的。”我说。也许语气有些粗鲁，但我感觉就要晕倒了。

她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转头看向她丈夫。除了此时已转回到橱柜的牧师外，她丈夫连同房间里所有其他人，目光都聚集到我身上。我听见她说：“她说是牧师肚子给压的。”他看着我，双眉紧锁。他旁边的人用手肘轻轻推了他一下，我听见他重复了一遍那句话，回应对方的询问：“她说是牧师肚子给压的。”我听见旁边那人满脸狐疑地重复了一遍，然后听见他又将这话传递给了他旁边的人。虽然牧师拿着与面盆成套的大口水壶过来，里面晃荡着一把上釉的银质草茎，与面盆一样面目可憎，却再没能聚拢他的观众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用几种各自不同的语言，在互相传着那句话：“她说是牧师肚子给压的。”这不公平，他们这样只是看着我，而不看牧师。“我们走吧。”我说。

来到屋外的露天坝，我靠在一根柱子上，不停地甩着手，想将疼痛甩掉。我问我丈夫，他是否觉得赋予这套面盆与水壶如此的意义，其中有着某种典型的杜布罗夫尼克特点，而且很丢人。我们谈及这城市或许并未找到它真正的价值所在。但就在我们谈论这问题时，我们听见附近什么地方传来风笛的乐声。我们虽然仍说着话，却同时挪开脚步去寻找吹笛的人。“但共和国起过作用，”我丈夫说，“你不能否认共和国起过作用。”“是的，”我赞同道，“的确如此。”音乐引着我们向那边的集市走去。集市就在大教堂

的后面。那是一片不规则的地面，四周是一些宫殿似的建筑。从这些结实的建筑身上，透出来一股商铺的气息。朝海的城墙，一坡台阶之上，是一些与天相接的巴洛克拱形建筑。集市里坐着一些俊得刺眼的农民，身穿深色的达尔马提亚服饰，脚边堆放着他们的农产品。其中一些人也听见了风笛声，正朝音乐声的方向奔去。我们跟着他们过去，发现在一栋穹顶建筑外面，站着一群人——换在过去，这穹顶的建筑会是某个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的一部分，或许是形成一个通道，两旁是政府办公楼。不过如今，它却像是用作了马厩，因为地上有马粪。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地上会有一个翻倒的桶，一张纸铺开在上面，纸上放着个一便士一只的那种墨水瓶，和一支非常大的深红色羽毛笔。就在打开的大门门口里侧，站着一位年纪非常大的老人，穿一件有金色饰带的上衣，一条波斯尼亚纯黑长裤，正在吹奏风笛。风笛非常精美，用雕花梨木做成，蓝布的风袋已经褪色。他已将所有农民都背的那种手织袋放在地上，虽然这地方并不是他的地盘。他吹奏时神情非常庄重，额头紧蹙，似乎在将所吹奏的乐曲演绎出一种奇妙的东方韵调；他所有的听众也都神情庄重，全身心地跟随着他的韵调。

“你看他们，”我说，“他们都是斯拉夫人，他们相信，又一位弥赛亚随时都可能诞生。不是由任何女性所生，因为这样的生殖方式太平淡无奇，而是生自任何一种非人的父母，任何突发事件，任何思想。我喜欢他们这样的信仰，这也是我不喜欢杜布罗夫尼克的原因，因为它虽然完完全全是一座斯拉夫城市，却失却了这一信仰，假意认为不会再有别的弥赛亚了。”“但等一下，”我丈夫说，“看看这些人。他们都非常穷。他们很可能是共和国最低阶层的工匠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从不曾掌握权力。你不觉得，他们之所以持有这令你敬佩的信仰，可能正是因为这缘故——这一神秘主义的期待，渴望不断地得到启示，使人类一层一层地接近真理，直至归于圆满，并证实之前所有阶段的知识都不过是愚痴无明之见而已？杜布罗夫尼克的其他人必须施行权力，他们必须担当职责。任何人，如果不自信已通晓一切需要懂得的知识，或许都没法承担起这样的担当，也因此，不会犯下任何严重的错误。也许，这一神秘的信仰只是寓于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之中，一如他们的悠闲与头脑发昏，以帮助统治我们其余的人。”

“那么，就得承认，统治者的地位应该低于被统治者，”我说，“因为事实是，我们对真实世界了解得还不够，还应当花费更多的生命来进行探寻。”“但除非说服一个社会的人去恭维他们，否则你就找不到谁来担负执行权力的职责了，”我丈夫说，“而且也无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位谁高谁低，只如我们所见，人群里的这些人有着如此的神情，从被压迫者脸上能清楚地看见如此的智慧。”“可他们饿着肚子呀，”我说，“而且过去他们常常被折磨，遭受恶劣对待。”“这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既然被统治者更具道德优越性，”我丈夫说，“就如那些统治者，作为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他们无法企及道德的高地，这也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亲爱

的，你讨厌杜布罗夫尼克，是因为它存在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无论你还是任何别的谁，都无法回答。”

---

1. 各种语言版本的“你的肚子”。
2. 各种语言版本的“您的肚子”。

黑塞哥维那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特雷比涅

杜布罗夫尼克的所有游客周三或周六都会去特雷比涅的集市。集市在黑塞哥维那边境。直至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反叛者将它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来，并又于1878年被奥地利人从前者手中夺走之前，特雷比涅一直处于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这是展现了在土耳其人征服之下的斯拉夫人生活状况的、距离达尔马提亚海岸最近的城市。开始一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察夫塔特那条路。沿山坡而下一直到海边，分别是垒筑起来的橄榄地、柏树林以及小片的田地，顺序跟英国园林一样。然后，道路突然左转，朝一面长满金雀花的荒凉山坡往上延伸。金雀花一片金色，煞是好看。再往前，便只是纯粹的荒山野岭，偶尔一条谷地打破这荒凉。在这些山谷的谷底，有一片建有围墙的田土——河谷都算不上，顶多是一个小浅洼——可作耕种之用。在这样毫无遮挡的山石上，夏天的太阳肯定够吓人的。我们继续往上攀爬，便也明白了，当暴雨来袭，又会是怎样一种铺天盖地、无处可逃的境地。

等天色清亮起来，我们发现自己正一步一滑地沿一面谷坡往下走，下面是一片宽阔而肥沃的河谷，肉实地躺在群山怀抱间。一条胖乎乎的河流，灰绿色的壮实身躯，穿过谷地，从杨树林出来，至桦树林又隐没了踪影。两场阵雨的间隔，我们突然看见那座俊俏的城市，一副抬头伏卧的模样，如所有土耳其城市，绿树掩映，因为许多清真寺的宣礼塔而显得精致。它们应是城市文明所曾有过的最悦目的建筑之林。它们并不像基督教塔楼或尖顶塔那样，公开宣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是举起一根白色的手指，说："这是一个人类社群，你看仔细了，我们不是田野里的动物。"我抬头望着那大山，心里想，有哪一道溪谷曾看见过我崇敬的珍妮·默库斯的赫赫战功呢？

女孩珍妮，19世纪末最动人的人物之一，倘若圣女贞德时运不济，没被烧死，她也会如那女孩一样，遭遇如此不幸的结局。珍妮1839年出生于巴达维亚，父亲为荷属东印度总督。她母亲是瓦龙人，来自一个牧师家庭，曾与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离异。珍妮有四个兄弟、四个姐妹，她排行第六。她五岁时，父亲去世，她被带回荷兰，与她母亲一起住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一直到她九岁。之后母亲去世，她又随一位舅父生活。舅父是一名牧师，将她培养成了一名激进的神秘主义者，她热切地期待着耶稣再一次降临。

二十一岁时，她碰巧继承了一笔遗产。绝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不曾继承过如此大的一笔遗产。她特殊的信仰告诉她，应怎样恰如其分地使用这笔

钱。她前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买下一块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地皮，为基督修建了一栋别墅。她在那地方居住了十五年，一直巴望着她神圣的客人光临，并将对土耳其人的刻骨仇恨视为她日常生活的一个成果。

当听说波斯尼亚发生起义，她立即打点行装，奔赴巴尔干半岛，加入了起义队伍。她认识了黑塞哥维那首领卢比布拉迪奇，然后立即投入野外作战，并加入由一位法国军官指挥的非正规军团。极少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作战，因为这方面的记录非常之少——对于欧洲这一段重要而耻辱的历史，一切都只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我们找到一则关于她的记载：一个冬天的夜里，当她所在部队的其余所有人都拔腿开撤，她却独自一人前往山中，试图引燃一颗地雷，炸毁土耳其人的城堡，但因为炸药被冻住，没能点着。这几乎是她作为一位战士，我们所能看见的唯一一份记录。

珍妮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她对手中财富的开支方式。她耗尽了最后一个便士，用于为起义部队购买克虏伯军火。可起义刚刚取得胜利，奥地利人就赶来抢占这个国家，并在入侵的过程中将她俘虏。她被释放，并获允在杜布罗夫尼克居住，但她躲过当局的眼睛，翻山越岭逃往贝尔格莱德，加入了塞尔维亚军队。贝尔格莱德全城的人在她的窗下举行了一场小夜曲火炬晚会。她头发金黄，戴着一顶黑山圆帽，出现在阳台上。

不过，再没有了战争。超级大国们大笔一挥，将一桩凌辱行径确定为长久现实，这一现实直到三十五年后才得以纠正——在接着的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更为惨痛的代价，使人类文明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珍妮没什么事好做，也没钱捐给民族主义的巴尔干基金会。土耳其人夺占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她为基督准备的房子，很自然地，没有付给她任何补偿。我们发现她搬到了法国的里维埃拉，过着贫困的生活。有时，她会回荷兰去看望她的家人。但她家人视她为耻辱，很不喜欢她的到来，因为她总喜欢讲述她那些离奇的冒险故事，身穿怪异的非正规军团及女执事服装，抽粗大的黑雪茄，对基督的信仰仍太过于迷狂。据说，有一两次，她曾在年轻的亲属面前谈起自己失去的精神事业，后来，这些年轻人为追求这些事业，付出了他们的整个人生。那些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的亲属，尽管非常富有，却将他们的无动于衷发挥到极致，任她在生命的最后那些年，在乌得勒支靠教会救济度日。1897年，当她去世时，他们不仅连丧葬费都不出，还在这之后尽自己权力所及，将她存在的所有记录销毁得一干二净。

有必要注意的一点是，关于珍妮·默库斯，没有任何不好的传闻。从没有人怀疑过她的纯洁。但她最终也没能赢得一个殉道者的身份，那些她不惜为之献出她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人都很穷，没什么影响力。因此，如果恰得其时地在西方一个重要的罗马天主教成员国家，她本可以凭着这一系列的行动为自己赢得最崇高的荣誉，结果却只为自己挣得一个非常滑稽的狼藉

之名，被与前卫自行车手或布卢默夫人归为同类人等。

我们从一些崖面凹凸的陡峭山崖间经过，山崖下有一些草坪，山崖之间曾是奥地利军营。“我记起来曾经有人给我讲过的这地方的一件事。”我说。“什么事？”我丈夫问道。“没啥，没啥，”我说，“我晚点再给你说。”“瞧，你能看出来奥地利人曾经来过这地方，”我丈夫说，“这里到处都是栗树。”“没错，很多人曾在这些树下喝奶油咖啡。”我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集市，便下了车。我们刚走没几步，我们的塞尔维亚司机叫住了我们：“你们最好是带上这个人做你们的向导。”这让我们有些吃惊，因为我们来此只是为了看那些身上穿戴着他们特有服饰的农民，以及任何能找到的有趣的清真寺。而这向导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一看就知道他判断不了什么有趣什么没趣。“有必要吗？”我丈夫问道。“没必要，”司机有些不乐意地承认说，不过又补充道，“不过，这人很诚实，会讲德语，你们只需破费十便士就行了。”他说到那数字时，语气里带着某种冷峻，显然是记起了在格鲁达遇到的那三位可爱的女孩。

但我觉得，这是他对南斯拉夫复杂的种族情形的一种反应。他是斯瓦比亚人，终其一生都夹在克罗地亚人与达尔马提亚人中间讨生活。所有那些从不了解土耳其统治下的凄苦生活的斯拉夫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马其顿的斯拉夫同胞，都严重心怀不满，对这些曾在他们的土耳其主子面前地位卑微的同胞恨之入骨。这就好比在英国北部、东部以及南海岸的人一直过着和现在一样的生活，而我们国家其余地区的民众，多少个世纪以来，被外国压迫者狠狠地踩在脚下，命运一如南非南部诸州的白种垃圾。倘是如此，当一个布莱顿人带一个法国人去巴斯，承认他所看到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文盲是自己的英国同胞，他可能会感到非常尴尬。当然，不同的人表现出这种尴尬的方式不同。如果他们属于易于怨恨的一类，他们会直接表现出对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亲戚的讨厌。但这位司机性格温和，是一个很有良知的人，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会视这些人为应当救助的对象。毫无疑问，离开之前，他会将自己身上的零钱给这里的某个人；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用来示范一下在格鲁达令他痛惜的那些浪费，应该派上怎样的用场。

那位向导结果恰如我们预想。这天的集市显得很冷清。昨晚通宵的暴雨横扫了整片山区，而且刚刚开年不久，庄稼离成熟还早，大多数农民都觉得不值得清早就起来，赶七八英里路，来特雷比涅赶集。集市里站着几个俊俏的妇女，面前摆着一些菜蔬。她们俊俏得冷峻，一如她们头上那素净的圆帽，和她们用素净的腰带扎起来的、收拢的黑色衣裙。我们看见一位游客端起一架相机，瞄准其中两位。她们不慢不紧地扭转身去，嘴里严肃的闲聊仍在继续，但只将她们的背影朝向相机镜头。这些人都是纯粹的乡下妇女，她们脚上是典型的农民穿的那种辫状人字拖。从她们的动作看得出

来，她们习惯了长途跋涉；她们那身形，好似每个人头上都罩着一顶看不见的沉重的帽子——我觉得，这表明了一种永无宁日的沉重负担与疲乏。不过，她们中间另外还有一些妇女，即偏远山区的妇女，相对于这些妇女，她们却又算得上是城里太太了。其他那些妇女，眼神显得温和而又富于野性，如扛枷的牛的眼神。因为所处气候之恶劣超过其他妇女之所见，生活也更加艰辛，她们的皮肤更为粗糙。在她们身上，不仅寻不着任何优雅的气息，也看不见一点整洁的样子。她们粗厚的毛哔叽外衣上，绣着美艳的图案，做工却非常粗糙——如果此处粗糙并非是指俗气，而是指粗朴的话，当然也不是说有如史前文物那么古朴。男人与男人也有区别。有的体型粗壮，坚若磐石，有的就似石头本身，表情迟钝，除了为风霜日晒而动容。

同时，集市上还有许多的穆斯林，男的头戴红色的土耳其毡帽，女的头戴黑色的面纱，身上裹一件宽大的棉布直筒罩衣，罩衣的腰部位置用一根细绳系着。“土耳其人。”向导说。他这是胡说。南斯拉夫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除了在马其顿最南边的那些，全是斯拉夫人。他们的先辈，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时是因为他们是波格米尔异教信徒，不想遭到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而遵从土耳其人，改为穆斯林的。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情况更为明显，真正的土耳其人在这两个地方被奥地利人占领时就已经走了。“看！”我丈夫说。我发现他为那些土耳其毡帽和面纱感到欣喜若狂，因为他虽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待过一些时间，但那是很早之前，阿塔图尔克统治及其改革时期的事了。“你认为面纱可以增加女性魅力吗？”我问道。“嗯，某种程度上是，”他回答说，“她们看上去样子都像阿伯丁小猎犬，全身遮个严实，只露出黑色的嘴巴，像要干什么坏事。”一个女人止住脚步，想卖给他一些看着就让人讨厌的、四角有花边的白色丝质手帕。他在织品上的品位是古典的，她很不幸，另外六个试图在特雷比涅各地点卖同样手绢给他的人，命运也好不了。“我不喜欢她们的手绢，也不喜欢她们，”他肯定地说，“不用说，她们绝对是值得尊重的，但她们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招摇过市的样子，像《淘气两兄弟》里的人物那样不男不女的，让我想起连环画里的艾丽·斯洛珀和那些小女孩，以及罗马诺老伙计，还有品昆与鹈鹕。”

这样的奇特情景我们还会遇到。我们的向导带我们穷尽了特雷比涅所有可以去的地方，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带我们走下一条街，去参观一家靴子店，并满怀敬意地说：“巴蒂亚。”之后，我们本来决定打道回杜布罗夫尼克，但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穆斯林小男孩递给我们一张传单，说游客可以去参观城里的一栋土耳其老房子。这房屋曾是奥斯曼帝国一位著名帕夏的家，里面的家具和藏书室都一丝未动，保存完好。我们在郊外找到这栋房子，四周花园里是丁香和李树，春风拂过，鲜花绽放。那房屋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非常漂亮，充分展示了土耳其人在建造既明亮

又通风的乡间房屋方面的天分，仅次于我们乔治王时期的建筑，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好，因为他们修建的房屋没有暗角，没有给仆人住的狗洞一样的房间，也没有因为太大而不得不生热取暖的房间。

房屋建造得很结实，窗明几净，非常雅致，上面往外凸出的楼层，带有格子窗户，为女眷所居住；下面两层里是一些《一千零一夜》里描述那样的物品，都牢牢固定起来，以防止被强盗搬走。在一个类似乡间庭院——甚至就是一个农家小院——的对面，是仆人住的房子，厨房和餐桌都在那边。从外层楼梯上跑下来一个笑盈盈的可爱的小女孩，大约有十六岁，没戴面纱，不过下身穿着一条只有这里的穆斯林女性才穿的那种长裤（虽然在南斯拉夫其他地方，别的女性也穿这种裤子）。她身后，跟着下来一位年长的男子，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身穿一件绸缎双排扣礼服。看见我们，小女孩笑靥绽放，对我们表示欢迎。那笑容，对于任何讲究礼仪规矩的社会圈子而言，都显得太过夸张。她那动作手势，犹似在给我们表演一出歌舞喜剧。她的长裤是亮粉色的。“土耳其女孩。”穿双排扣礼服的男子说用德语说。“那她为什么没戴面纱呢？”我丈夫问。“她还太小。”穿双排扣礼服男脱口而出，口气里颇有别意。

我们有些犹豫，将脸转向特雷比涅方向。“请进，请进，”穿双排扣礼服的男子大声叫道，将身子挡在我们与特雷比涅之间，“我会带你们参观所有的东西，古老的土耳其房屋，大帕夏的女眷居住的地方，一切都保存完好。”他将我们赶上楼梯，像牧羊人一样领着我们穿过大门，进入一个在当时来说已相当不错的小房间。他指着那些格子窗，字正腔圆地说：“那些女眷就住这里面，漂亮的土耳其女人，穿着漂亮的土耳其服饰。”他打开一个橱柜，搬出来一大堆衣服——这样的衣服，在南斯拉夫曾经的土耳其占领省份的任何一家旧衣铺都可能找到。“非常精细，全是手工做的，”他指着那些镶着金色饰带的短上衣与绣花胸衣说，“还有，看这，裤子！”他将一件白色上等细麻布下装递到我们面前。裤子脚踝位置折叠过来，做成金灿灿的翻边，任何在家经常要做女眷活儿的人，都绝不可能穿这样的裤子。“透光的。”他说。明显他这是患了快乐性大脑瘙痒症。他有些腼腆地，一个箭步，打开另一个橱柜，取出来一张褥垫。“这褥垫从来没离开过房间，”他说，“需要时他们就会把它拿出来。”不幸的是还有第三个橱柜，里面是铺了地砖的地面，还有一个水罐。“这是盥洗室，土耳其女士自我清洁的地方，所有土耳其女士都非常干净，香喷喷的。”他脸上做出一副妖娆的表情，一侧髋部前送，一只手放在上面，将水罐底朝上高举头顶，保持着那姿势。

我们冷淡的反应并没能阻止他，他又跑向另一房间。一个典型的土耳其人家的客厅，里面除了靠墙的一条长椅和一两张奥斯曼时代的桌子外，没有任何其他家具。另外，墙壁上装饰有一些小地毯，平整地钉在墙上。我兴

奋地嚷了一声，因为从房间窗户望出去，景色实在太美啦。从城市上面的坡地上看到的那条灰绿色的河流，此时正从低洼的草地上穿流而过。一架水车在水流中转动着。草地上的草非常深，点缀着许多淡雅的花儿。河岸边银色的白桦树刚刚发出的新叶，看过去如河水一般清冷。沿着这河流，一定有过一位——如果东方微型画上的传说不是完全撒谎——年轻的王子，头戴一顶鱼鹰形状的土耳其帽，身穿刺绣衣服，英俊潇洒——虽然后来变得非常胖——手腕上托着一只猎鹰，徘徊在这河岸，意气风发地吟诗抒怀，表达自己爱情的悲伤。

“我会非常感激，”双排扣礼服男说，“如果出生高贵的女士赏脸听我说话。她肯定可以之后再去看那景色。”“要我把他扔楼下去吗？”我丈夫问。“不必，”我说，“我发现他本身就令人着迷。”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看看什么样的人会来安排我的生活，如果我够不幸，或准确地说，够迷人，做了一家妓院的囚奴。因此，当他厉声要求我们坐在地上，听他给我们描述正式的土耳其宴会是怎样的过程时，我们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他一字一句都暴露出他那德行，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会觉得所有这些习俗都很奇特，并认为我们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好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并在我挣扎着从地板上爬起来时，很机械地斜瞄了一眼我的脚踝，“我现在带你们去参观女眷房间。里面是土耳其女孩，非常漂亮的土耳其女孩。”

在过道里一面窗户前，他停了下来，指给我们看仆人房屋顶上的一个望所。“过去，一位宦官经常坐在那里面，注意有谁进入这房屋。”他说。“宦官。”他重复了一遍，华丽丽的语气与那个词极为不协调。然后，他猛地推开一扇门，好让我们看那房间。我们看见三个女孩朝我们转过身来，装出很害怕的样子，一只手护脸，另一只手胡乱地去抓放在她们旁边桌子上的彩色手帕，却没有抓得起来。与此同时，看守也假装恐惧的样子，砰地将门关起来。“上帝明鉴，是品昆与鹈鹕。”我丈夫说。然后，看守敲了敲门，一副关切的神情显得尤其夸张。等到里面的人召唤，他才带着我们慢慢进屋去。“典型的漂亮的土耳其姑娘。”他说。事实却非如此。她们没像几乎所有南斯拉夫穆斯林那样，用面纱将整张脸遮住，却用有点像基督教农民女性拿来遮头发的手帕罩着脸，然后在脑后胡乱打一个结，以便将眼睛和眉头露出来。“她们这是在制作我们漂亮的土耳其手工艺品。”他解释说。事实却非如此。土耳其刺绣和纺织非常之精细，而其中两位村女托在手里的手帕却看着很刺眼，我丈夫在集市上就拒绝过了；第三位坐在一架织布机前，上面有一张地毯，看起来压根儿不该织一根线，却已完成了四分之一。

我们默默地打量了她们一会儿。见我丈夫在看她们，她们在座位上扭扭捏捏，朝着我丈夫吃吃地笑。虽然出于不同的考虑，他和我都觉得这样很不

合适。然后，看守说：“好吧，我们就不打扰这些女士了。”一面色眯眯地朝我点点头，带着我丈夫出了房间。我觉得很不解，不过以为他是要带我丈夫去看什么漂亮的土耳其“猥亵的图画儿”，因此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他们刚一出去，留下我一人与那些女子在一起，她们立即解下面纱——原来她们并不算难看，虽然满脸上下都是雀斑，镶了太多的金牙。她们建议我买一些她们的刺眼的手帕，但我拒绝了。我打算等我丈夫回来，让他给她们一些钱。

为打发时间，我向织布机前的那位女子走过去，站在她旁边，低头看着她的手，装着想看她是怎样织地毯的。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我突然意识到，她很生气，也很尴尬。她跟我差不多，根本就不懂怎样织地毯；而另外两个女子也不懂针线，不过是把手帕拿在手里，将穿了线的针扎在上面而已。她们全都开始大笑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什么，脸上恨恨的表情。我心想，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一个人懂得一丁点儿外语知识，最后登堂入室却不是取道正门，而是从后门溜进去的。我曾听人用塞尔维亚语朗诵诗歌和布道，懂行的人都说是杰作，可我从来没听懂一个字。但这些年轻女子议论我、我丈夫、我父亲以及我母亲的话，我大部分都听得明明白白。

这场景太可怕了，因为她们不仅话语尖刻，而且很不高兴。她们觉得很丢脸，因为我发现了她们既不会刺绣，亦不会纺织——因为巴尔干半岛的妇女，只有城里最穷的人才不会针线、不会织布。她们比任何农民还穷，没可能弄到布匹或纱线，因为她们没有绵羊。这场面不仅本身可怜，其背后所隐含的东西同样可怜，如果想到特雷比涅以及整个南斯拉夫的穆斯林男女，他们的举止是如此温雅，生活是如此体面；那场面也是一种悲伤，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已死亡，并被埋葬在了自己人生之中，被装在一个腐朽帝国的棺材里——这些穷困的人正模仿着腐朽帝国的种种形态，并进一步玷污它。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撇下她们，一面穿过房屋，一面叫喊着我丈夫。找人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因为我打开一两个房间的门，发现裸露的地板上全是一些箱子和包裹，里面塞满了东西，但都敞开着，没有关上或扎起来，似乎这地方曾经有人打算逃跑，却又放弃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希望逃离的灾难遍布这世界。

我提高了嗓门，他终于应声，声音从大门旁一个房间传过来。“他带你去干什么啦？”我问道。“什么也没干，就想让你见识一下，那些村女揭下面纱后会给你怎样惊艳的体验。”我丈夫说。看守走上前来，说：“我刚才带你丈夫参观了这些漂亮的土耳其书籍；这些书在这房子里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他猛地将一本陈旧的《古兰经》塞在我手里。书自然展开，那页夹着一个小圆标签，上面印有一些古斯拉夫文字。“哦，上帝！哦，上帝，”我说，“这是萨拉热窝一家二手书店的标记。”“真的，那就太他妈蠢

了，”我丈夫说，“这就像是白痴的幽灵，在公墓里他们坟墓的周围玩装神弄鬼的把戏。”我们从房子里出来，来到院子里。看守尾随出来，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们并不喜欢他的招待。“他们会讲塞尔维亚语不会？”他问我们的向导。“不，我想不会。”我们的向导回答道。他一脸困惑，决定假装生活仍如他所熟悉的方式，继续前行。于是，他一只手举至额前，对我们的惠顾或者说嘲弄，按其民族风俗，给我们来了个土耳其式的致谢——至于到底是惠顾，还是嘲弄，他并不介意，只要我们打赏了他小费。他说：“你们刚才已经与一位土耳其绅士晤了面，也看见了所有土耳其绅士过去都是怎样生活的。”我丈夫给了他钱，我们快步离开了这地方。向导说：“你们参观得还满意吧？觉得有不有趣呢？”我丈夫问道：“那人是谁？”“曾经是这房屋的主人的仆人。”向导说。“谁是这房屋的主人？”我丈夫问。“一位穆斯林贵族，”向导说，“他家曾经非常富有，但现在穷了。他把这房子装饰了一下，然后让他仆人在这里负责管理。我想他所有的钱基本上就是来自这里的收入。他住在乡下很远的地方，那地方生活开销非常低。”

当我们乘车出了城，我说：“我讨厌一个帝国里的行尸走肉，他们比什么都臭。真是太臭了，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一生中是否有过健康。”“我想你很难让人相信，”我丈夫说，“那地方不承载着一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的某些壮丽辉煌。”“当然，”我承认说，“但其丑陋胜过其美丽。我希望你不会告诉我，帝国法律是为无法无天的民众设置的。帝国就是靠破坏法律而得以存在的。”此刻，在我们脚下的是奥地利人修建的一些巨大的军营，营房之间是一些检阅场。我再次记起，当天上午，我们出门去放松一下，当我们的车驶入特雷比涅时，自己讨厌说及的事情。这地方的黑塞哥维那人，发现一个帝国跟另一帝国没啥区别，奥地利比土耳其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军营之间，奥地利帝国曾屠杀了八十个人。其缘由，任何有史以来人类所制定的律法书上，都不会认定为合理的杀人口实。

1914年，有消息传来，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杀害。遍及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奥地利当局，逮捕了所有他们所知道的、在情感上反对奥地利的农民。一些人被判刑坐牢，其余都被绞死。关于这些人与暗杀事件是否有任何的牵连，他们根本没做任何调查——事实上，谁与这事都毫无瓜葛。在此营房之间的草地上，奥地利人抓来七十个塞尔维亚人当作陪葬品，其中包括三名妇女——如我们在集市上见到的那种。我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在萨拉热窝曾遇到一个人，他的一位亲戚就是在那里被杀害的。他还保存着南斯拉夫政府从奥地利警察档案中找到的屠杀场面的照片。这些照片展示出绞刑根子里的非正义性：被绞死者样子非常丑陋，他们连一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人那样的尊严都没有，虽然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钉十字架低。那些女人模样尤其不堪，她们身着长裙，就像一具具塑像，如康斯坦丁所谓的斯拉夫女子舞蹈时应

具有的模样。他们大都表情惊讶。我记得有一位牧师，从双排的绞刑架中间，被带往他自己的绞刑位置时，写在他脸上的不是恐惧，而只是吃惊。这事实上非常自然，因为吃惊应该是大多数受难者的主要情感反应。他们不可能想到这样的罪名会落在自己头上，因为尽管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但都以为只会从距离特雷比涅很远的少数几个城镇抓人。当他们听闻这件事时，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与其有任何关联。

“这场景，是帝国伪善的典型体现。它们假装强大，却又如此懦弱，总是需要毁灭最可堪怜悯、最弱小的个体，作为自我防护。”我说。“不过，一个帝国，”我丈夫提醒我道，“所能采取的动作，却是单一民族国家所办不到的。要不是因为有以同样的联合力量组成的奥地利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永远赖在欧洲了。”“但一旦土耳其人被打败，他们这样的联合帝国就再没必要了呀，”我反驳道，“19世纪时，土耳其人被打得一败涂地，奥斯曼在全世界的眼皮之下分崩离析，可奥地利人仍继续奴役各民族人民，使其屈服于自己脚下，那模样似乎在他们家门口，仍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可怕敌人似的。”“不错，但那会儿有俄国人。”我丈夫说。“没错，但沙皇俄国已经腐朽堕落，没谁有必要害怕它。”我说。“这个，非常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了解另一个国家，”我丈夫说，“一国似乎很难确切地知道另一国何时会蓄谋发动战争。上次战争，英国和塞尔维亚都曾被严重蒙骗了，以为俄国会给他们如何如何的支持。德国同样被它的同盟国奥地利严重蒙骗，后者结果被证明简直柔弱如水。”“可是这些国家的行为真是荒唐之极！”我叫道，“要是我四处奔走，强迫别人——无论这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妨碍和不便——与我结盟，建立起一个防御同盟，以抗击一个被认为可能伤害我的人，却从没想过要调查一下，这些伙伴是否足够强壮，能否帮助我，或者敌人是否足够强大，足以伤害到我，我会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傻瓜。”“但适用于个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国家，”我丈夫说，“两者情况很不一样。”事实上，我觉得自己这是以一个女性的方式，在犯白痴。一个过度局限于自我的人，就如诊所里的护士，无法理解我听说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遇刺时心中的震动。但同样地，我丈夫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是出于一种男性的视角，且同样极其愚蠢。

当我们在回格鲁兹宾馆的途中，走出很长一段路，过了杜布罗夫尼克市，行至城郊拉帕德护坡围砌的可爱花园间时，我丈夫说：“当我们在特雷比涅那白痴房子，那不见王子的《王子复仇记》、排除了性交的妓院里时，我忍不住想起来我们在那边的农家遇见的那可怜的伙计。”一两个晚上之前，我们曾步行爬上大海边上的一座松林覆盖的小山——佩特卡的山顶，欣赏过日落最美的景致之后，漫步穿过橄榄林，回杜布罗夫尼克吃晚饭。我们走迷了路，天黑的时候，我们绕进一片果园旁的一户农家。那房屋一看就非常老旧，修得非常结实，很有一种城堡的气势。但房屋好些地方都已露出腐败的迹象，露台之间的台阶在我们脚下崩坏；一条路引我们来到

一个畜栏，里面只伶仃地站着一只绵羊；另一条路领我们来到一个洞穴口关闭的木门前。我们摸黑返回静悄悄的农房主体建筑这边，听见从一面敞开的窗户传出来高低起伏的说话声。那起伏的节奏，暗示着一种格调，明白语气克制之必要性，并于此克制之中，展示出心智之无限自由。我俩都认定，住在这房子里的人，一定见过大世面，通晓多种语言，也许是杜布罗夫尼克落魄的贵族，或者是来自萨格勒布的某家庭，把这里当成绝佳的度假别墅。

我们信心满满地敲了敲门，准备好用德语问路。可来开门的，是一个身穿农民服装、头戴土耳其毡帽的男子；他身后，屋里的亮光来自悬挂在墙壁上的一盏油灯，地面铺了石板，散乱地丢放着几个麻袋和木桶，与其说是不爱整洁，不如说是因为穷困。房间的里侧坐着一名女子，优雅地侧过身，抬起一只手遮住脸——那姿态，我们之后在特雷比涅的那座土耳其房屋，曾见过那几个女孩拙劣而亵渎的模仿。男子个子很高，脸朝着我们，黑乎乎地看不清面容。我丈夫用德语和意大利语跟他说话，他只纹丝不动。然后，我用自己蹩脚的塞尔维亚语，问他哪条路可以回杜布罗夫尼克，他一字一顿礼貌地告诉我，我们必须转过这房子的屋角，顺着一面朝着陆地方向的围墙往前走。然后，我说了句“Sbogom”——意思是“上帝保佑”，为塞尔维亚人的道别用语。他也同样回了一句，语气里尽可能不带一丝的嘲讽。我察觉自己重音读错了，将头一个音节降调短音念成了升调长音。

我们在黑暗中撤身绕过房屋转角，找到围墙边一条卵石道路。我们正站在那里，身后房屋的一扇门突然开了，高大的男子又站在门前。“对！”说完，他又关上门。显然他是出来看我们是否找到了路，不过那样子却把我们吓了一跳，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似乎这人身体上完完全全是一个大男人，是百分之百的成年人，一位地道的斯拉夫人，却有着穆斯林典型的热情与侠义心肠，因为在这半已颓毁的农房里，没有那么多物质的东西需要打理，而退回至某种他依稀记得的儿时状态。就如一个人坐在阁楼上，看着村庄街道上过往的行人，心里想道：“他们看不见我，我坐在这地方看着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如果我扔一个苹果到他们跟前，他们猜不到苹果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如是，这高大的男子，坐在这城堡里，也告诉自己说：“他们不会知道这边有扇门，我一开门，他们一定会吓一跳。”因为这游戏，那空阔的夜晚也比平常过得快乐一些。

我看着山坡下面的大海，说：“真奇怪，这地方竟住着穆斯林。而这地方不过不久前才重新安置人口的。直到世界大战前，这一地区基本上仍是拿破仑战争摧毁之后的模样。啊，这是多么让人恶心的一个故事！瞧，整天里，我们看见的都是帝国罪恶与愚蠢的明证；而在这地方，我们又看见，如果一个人为帝国思想所洗脑，他会变得多么地可怕和愚蠢。”“没错，”我

丈夫说，“杜布罗夫尼克的结局，是其中一个最可怕的故事。”

1805年普雷斯堡合约之后，法俄两国挑起战事，杜布罗夫尼克发现自己被夹在两军之间。多少年来，共和国练就了一身保持中立的本领，然而在此局势下，任何谈判都派不上用场。黑山境内是俄国人，斯普利特远南地区是法国人。当此之际，卡博迦伯爵提议杜布罗夫尼克居民可以请求苏丹，赋予他们土耳其国籍，并允许他们在某座土耳其岛屿上定居，以继续维护他们的传统。这项计划被放弃了，因为拿破仑慷慨的承诺，让他们打开了国门。这意味着他们的商业被毁掉了，至少说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因为那之后，在所有与法国交战国家的港口，杜布罗夫尼克的船只都被置于禁运之列。同时，这也意味着，俄国与黑山共和国的军队将入侵他们的领土，抢劫并烧毁他们在拉帕德和格鲁兹优美的郊外所有的夏日别墅，砸倒别墅的铸铁大门，毁坏大理石的露台，捣毁他们的玫瑰园、夹竹桃林以及果园。被烧毁的不仅有他们自己的房屋，更有他们的主人过去一千年来、从东西方所搜集来的最珍贵的珠宝。俄国人和黑山人激情满怀，挥兵南下，因为他们相信——出于公众交流的时间差，以及地理知识的缺失——他们这样做是在保卫基督教，防止法国大革命无神论思想的蔓延。

拿破仑获得胜利，杜布罗夫尼克的民众于是期望，既然他们与他是同盟，敌军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应当得到补偿。然而，他派马尔蒙元帅前往设在教区牧师官邸的元老院，宣读了一项法令。其中第一条为：“拉古萨共和国已终止存在。”这一举动显示，拿破仑不管有时装作怎样，在道德上，并不比今天的独裁者优越多少。这是一项犹大式的法案。他曾因为承诺杜布罗夫尼克独立而获得后者的支持。当他设立伊利里亚各省份时，曾公开宣称，自己非常珍视斯拉夫人民自由的事业；如今，他却宣布巴尔干版图上仅有的独立斯拉夫社会群体为无效。他为自己发动的战争和侵略辩护说，自己意在维护欧洲的稳定；可当他发现自己手下的一件稳定之经典杰作时，却随手将它丢弃，并将之踏进泥淖。

这一背信弃义之举，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拿破仑剥夺了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却没有给予它任何补偿。他废除了共和国宪法，使得那些贵族群起而反之，因为他本应如威尼斯在亚得里亚其他城市通常的做法那样，从这些贵族中挑选自己的管理者的。因此，在达尔马提亚，他就这样犯下一个又一个的大错。仓促的改革中，他废除原来的法律规定，令农民永远不能拥有土地，而只能世代承租，也因此土地不可以被买卖。在这极度穷困之地，这不啻一个灾难，因为这样的话，农民的土地就可能被剥夺用于抵债。同时，他还将恐吓庇护七世签订宗教协定的手法用在这片土地上，贿赂教会，使其成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引发信众激烈的反对，信众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践踏。这最后一项法令并不见得更受欢迎，因为负责施行法令的，为一姓丹多洛的文职长官，一位威尼斯

人，但并非该贵族姓氏的家族成员，而是犹太后代，只是依照当时习俗，洗礼时改姓了其教父的姓氏。这种种错误，加之拿破仑无情的冷漠，致使马尔蒙再无心于该地区的发展，因此人们很难再相信，1808年的拿破仑还是一个天才。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直至世纪之交，他仍是一位天才。似乎，帝国意图抬举的，结果却贬损了，一如其在征服区，意图压制的，结果却蓬勃而起了。

路上

因为康斯坦丁发来电报，说他第二天将抵达萨拉热窝，我们只好告别杜布罗夫尼克，尽管大雨挥霍无度，前方道路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一位爱尔兰朋友陪了我们一段路程，因为我们正好顺路，可以送他到沿海岸走位于前方大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家农房，他就寄宿在那里。有时，他会让我们跳下车，透过奔泻而下的溪流，一睹某个奇迹。也因此，我们得见奥姆巴拉的源头——那可真是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奇观：只见河口，却不见任何河流。我们所曾看到的那条穿过特雷比涅的灰绿色河流，在城市不远处，便突然消失于地下，然后在石灰岩的地底下，不知经过怎样的左冲右突，穿行二十英里后，又冒出地面——这里就是它的出口之一。一壁悬崖，一棵绿树，之间一股河水奔流而出。奔流的河水至一处桥下便骤然而止，让人来不及做一分钟的准备，便已铺成一条如泰晤士河金斯顿段那样宽阔的河流，然后一派恣肆汪洋，美轮美奂，如歌剧般满载罗曼蒂克情调，伴随着两岸林间花丛里一溜的别墅与教堂，浩浩荡荡奔向大海。

因贪看美景，我们被浇得浑身湿透。我们很乐意在我们朋友寄宿的人家避一两分钟雨，在火炉边取取暖，会一会他令人喜欢的房东太太。正好此时，房东太太的两位朋友顺道来看她，一位是男的，从高高的山上的一个村子下来，另一位是个女的，从山脚下一个很有一段距离的村子上来。房东太太的姑母的葬礼——就在几天前——之后，他们就打电话说要来看望她。我们的爱尔兰朋友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这葬礼似乎非常奇怪，因为这地方木材十分稀缺昂贵，老太太完全没用棺木，直接是用上好的桌布给缠裹起来的。但因为石头很便宜，这家人给她修建了一个如公爵陵墓一样的墓室。从山上村子下来的那个男的先走。当房东太太送他出门时，我们的爱尔兰朋友问山脚下来的女人道："他人似乎很不错啊。""你觉得呢？"女人说。她鼻子差不多就要翻转了过来。"嗯？你觉得不是吗？"我们的朋友问道。"这个……"女人说，"在我们这一片，大家不是太喜欢那村子里的人。""为啥不喜欢呢？"我们的朋友问。"这个……首先的一个原因是，有时你上那里去，闻到有白菜汤的味道，于是你说：'味道不错啊。'他们会说：'哦，我们刚刚吃完白菜汤。'"有片刻大家都没说话。然后，我们的朋友又追问道："那么说，他们不请你吃了？""噢，是的。""这样有什么不好吗？""这样非常好。可是，你瞧，我们这下面可以种白菜，

他们上面种不了，但他们从不跟我们买，而我们却时常丢白菜。因此，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想。”

---

1.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当时的女子服装设计师。

莫斯塔尔

瓢泼大雨一直下着，让人实在觉得没趣，我后来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已到了一片不同的乡村。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光秃秃的大山与一个怪异山谷之间的一带岩架上向前延伸。如同很多山谷，这山谷亦是在冬天里湖面宽阔，夏天则变为旱地。尽管下着大雨，雨水却从地下滤走，树木与低矮的树篱在如镜的水面上浮动，与它们自身的倒影，以及正从愈见稀薄的积水中探出它肥沃身躯的土壤，相映成趣。我们经过一个大型的烟草厂，进入梅特科维奇。如所有其他内河港口，码头边也停泊着一些海船，因为太大，显得与这港口很不协调。我们在这里的一家宾馆歇脚，喝杯咖啡，才第一次注意到，曾被土耳其占领的巴尔干地区，那病态、灰扑扑、睡眼惺忪如白日梦的气象。在这家宾馆，我看到最接近西方的土耳其式盥洗间，过去我从不曾见过：地面上有一个坑，坑的两边是放脚的两个洼地；一个水龙头放出来的水，顺着一个与手中的活计多少有些关联的沟槽流过来。对于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这足够有效，可令人尴尬的是，这个却证明了，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实践方式。

后来，我们驱车行驶在一片苏格兰似的崎岖乡村。尽管下着劈头盖脸的倾盆大雨，这里的人们走起路来却依然腰板挺直。他们身穿黑色的羊毛雨衣，或是编织得很厚的草衣，如同盖屋顶的那种草垫；有的顶着加厚的宽大白色亚麻罩衣，头部的位置是一个窄小的凹陷，肩部宽阔，长度及腰。后一种穿着的人，看上去像披挂整齐、准备进行什么庄严的恶作剧的检察官，不过没有谁做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那些妇女和女孩子，发出一阵阵欢笑，奔跑着躲避我们的车轮向她们溅起的泥浆，似乎这是什么好玩的游戏。穆斯林的墓地开始向死者宣扬有关漠然的教诲。那些石墩——如果所纪念的尸首为男性，则上面刻一个包头巾的图案；如果是女性，则上面什么也不刻——在这被雨水打得趴在地上的茂密深草和野鸢尾间，东倒西歪地立着。一个残破的罗马拱门下，蹲着一位老牧羊人，护着自己的包头巾。那黄色的包头巾表明，他曾去过麦加朝圣。

雨住了，我们正沿着一条宽阔的上行山谷行进，越过许多的牧场和一条宽阔的河流，我们看见一座优雅的穆斯林小城，里面矗立着许多可爱的宣礼塔。小城规划精致，城中的塔楼，因为宣礼塔而显得更加雅致。围墙的花园中，羽毛似的茂密枝叶掩映下，是一座座红色屋顶的房屋。我们没有进城，而是继续前行，途经一个有飞机库的小型飞机场，再经过一些兵营，和一座在任何稍大的黑山城郊都能见着的烟草厂，最后到达莫斯塔尔，驶向“Starimost”——旧大桥。一转眼，那座桥便已进入我们的视线。人们称此桥为罗马皇帝图拉真所建，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它其实出自中世纪土耳

其工匠之手。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桥梁之一。一道修长的圆拱卧于两座圆塔之间，中间位置的桥栏呈浅浅的弧形。

站在桥下看它，它是美丽的；站在桥上看风景，风景同样怡人。灰绿色的河上，千百只燕子上下穿梭飞舞；河的两岸，树林与灌木丛间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座清真寺和白色的房屋。似乎这河水穿流而过的是人迹未至的山陵，而不是一座有着两万居民的城市。河上看不见一只旧锡罐，或一片纸屑。这当然不是因为有人做过清洁。在巴尔干半岛，人们常常更倾向于坐下来，看着乱糟糟的场面，讨论其本质或根源，而不是将它清理干净。更可能是因为，穆斯林热爱大自然，尤其是流淌的河水。因为爱，他们不会乱丢乱扔，玷污了它的秀美。如我前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所感受到的那样，我再次惊讶于穆斯林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他们修建起漂亮的城镇和村庄。我从没见过有任何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或西班牙，于一片建筑群落中，每一座房屋都有着那样始终如一的品位，无论身居其中，还是由远处观之，都如此赏心悦目。土耳其房屋的建筑格局，都是下面楼层内敛而牢固，上面楼层往外突出，满是窗户。这种结构，既简单，又合理。我没见过任何的房屋有他们的房屋那样整洁的室内。较之那样超然的井井有条，西方的屋内摆设就显得太邋遢了。然而，直至奥地利人到来，莫斯塔尔从来没有宾馆，除了一些满是臭虫的简陋小屋。穆斯林随便当街宰杀动物的习惯也极难改变。即使现在，一般的穆斯林店铺，也与穆斯林人家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些店铺就像一个个破落的小洞，正面常常没有玻璃，一定冬天寒冷如冰窟，夏天闷热如蒸笼；里面货物的摆放也相当杂乱。在一家文具店，那些图片式的贺卡常常摆在阳光下，直至晒褪色，练习本也是泛黄了还摆在那里。在一家针织品店，各种布匹摇摇欲坠、乱七八糟地码成一堆。唯一例外的是面包店，里面扁形长面包与圆形小面包，被摆成各种迷人的几何图案；还有蔬菜水果店，那些蔬菜，无论色彩还是形状，一眼就让人喜欢。事实上，在任何穆斯林的生活中，都很容易看到极度的讲究与极度的邋遢之间势均力敌的张力。你很难预知，何处，或何以，一种情形，或另一种情形，会占据上风。清真寺是全世界参拜神祇的场所中最干净整洁的地方，但任何人，如果试图以此假定穆斯林脑子里，神圣与整洁二者互为关联，就要失望了，当他一抬眼看到某座清真寺，因为某种原因，比如人口迁徙，而被废弃不再使用，会发现，他们会任其破败，令人想起西欧最破烂的贫民窟。

我们宾馆的咖啡馆非常大，占据了整个底楼。咖啡馆中间是两张台球桌。晚餐我们吃的是他们的特色菜品——鳟鱼，很出名，但我们觉得非常难吃，就如鱼跟蛞蝓的杂交品。不过，我们也吃到了一流的奶酪蛋奶酥。上菜速度之慢，简直超乎你的想象。两道菜品之间，我们都看报纸，看完后又东张西望。穆斯林们从街上进来，头上戴着醒目的土耳其毡帽。他们将

毡帽挂起来，走到他们的座位上，一边玩国际跳棋，一边喝黑咖啡，不再是穆斯林，而仅仅是男人而已。一束束白亮的灯光下，年轻军官在有节奏地来回穿梭。灯光倾泻在酸性绿的台球桌上，台球发出冷淡的碰撞声。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巴尔干情绪，怠惰苟且，顺从命运。似乎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个人进屋，挂起他的土耳其毡帽，然后解释说——措辞刚好足以让人理解，让人不致觉得是疯言乱语——所有桌前的人务必在原地等待，直到两位正在玩台球的军官打完一百万局比赛，并且众人永恒的命运将由球局的结果而定；而这样的要求却被人们接受了，人们一面看报，一面安静地坐着等待。

在莫斯塔尔这地方，我们的旅程真正具有冒险性的阶段开始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时每一口呼吸里都存在着的某种东西不见了。我们穿衣，吃早餐，眼睛都一直盯着我们窗下的集市广场。那景象，既可看作一种对约定习俗的遵循，亦可看作一种对教义的遵从。在我们注视下的这些人，也都坚定地持守着他们特定的信仰。他们有的是穆斯林，有的是天主教教徒，有的是东正教教徒。对于婚嫁、对于出生、对于死亡，他们依据各自的信仰，以及隐藏其后的更古老的信仰，举行着一成不变的仪式。然而，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又高度地个体化。他们或来或往，或饮或食，不为任何公共作息时间所限定；他们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极具私人性，其理据于别的任何人，可能毫无可取之处。我们脚下自由流动的人群，所展示出来的一种态度，与我们观看人们早上前去上班、走过伦敦桥时所看见的精神气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这同时表现在他们的脸上。从他们的脸上，透出来他们从未与人充分分享的所思所想，透出一种怀疑、嘲讽与悠长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还没有什么得到了最终审判。

此外，这还表现于他们的穿着上。无论是这地方，抑或任何其他地方，没任何神经尚正常的人敢于百分之百由着兴之所至地穿衣打扮。这些穆斯林，均以特定的规定方式，戴着面纱或头巾，因为这表明了他们与辉煌的前奥斯曼帝国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在这地方，一座最小的村庄、一座城镇、一片城郊，甚而是一条街道，都可能有它独具个性的服饰风格。男性较之女性，服饰变化要小一些，因为在这些地区，男性已发展出一种非常适合于他们的经典服饰。镶有饰带的直挺上衣，给人一种很正式的印象，一种主人身份的感觉；长裤从臀部直至脚踝，衬托出双腿的轮廓，而大腿间宽松的造型也使两腿显得更长。不过，女性呈现给我们的则是万千变化。我们很喜欢其中的两位妇女，头发灰白，表情严峻，就像英格兰马盖特小镇上的房东太太，在非常具有创造性地讨论一天的简朴伙食安排。直到一名男孩推着独轮车走开，我们才看到她们又长又宽松的哔叽布料的灯笼裤。其他女性穿的是紧身胸衣、短外套，下身是宽松的裤子，每件服饰都用不同种类的印花布料——如我们乡下用作窗帘的那种花布——做成。

尽管这些人穿的是穆斯林式的裤子，她们却是基督徒，因为她们脸上没有戴面纱，她们只将我们称之为苏格兰佩斯利涡纹旋花呢披巾的东西松松地罩在头上。穆斯林妇女四处走动时，都笼着黑色面罩，身上裹着棉质的罩袍，上面常常饰以冷色调的条纹，如灰色、石板蓝与抽象的红色。在莫斯塔尔才能看到这样的装束，否则你得走很远很远，至土耳其斯坦，才能再见着——我曾听人这样说过。

这样的装束，一方面愚笨地缺乏实用性，另一方面又很能激发人的想象。人们之所以喜欢南斯拉夫式的穆斯林装束，是因为在炎热的天气，这给人带来很大方便。因为在这些地区，酷热是个得仔细对待的问题。即使是在莫斯塔尔，夏天也让人受不了。棉布罩袍可以保持头发和衣服干净，面纱可以保护面部不受灰尘、虫子和毒辣阳光的损伤。真正的东方穆斯林戴的那种很重的马鬃面纱起不了这效果——戴上那种面纱后，集聚的灰尘，因为鼻孔和嘴里呼出的湿气，而活生生变成泥浆，但薄纱或棉质的黑面纱则不仅无害，还好处多多。然而，我们很难为莫斯塔尔传统的服饰辩护：黑色或蓝色布料的男式外套，女性穿起来简直大得离谱；僵硬的军服领，耸得非常高，大概高达八到十英寸，内侧——而非外侧——用金线绣着花纹。这种衣服从来不是作为外套穿的。女性将衣服披在身上，将它的两肩位置拉到头顶上，于是僵硬的衣领前倾，突伸在她前面，犹如一个面甲；如果将两侧边缘拉拢，她就不用再戴面纱了。两条袖子，就这样悬着，或用针缝在背后，然而裙子仍然无药可救，只能任其在地上拖拽。

我们问过宾馆的人、莫斯塔尔几位经商的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穆斯林，对于这样特别的服装，当地是否有什么关于其来历的传说，因为这似乎是为纪念某个事件而诞生的——譬如，当时某位妇女，穿上她丈夫的衣服，装扮成男人，以施行某种勇武的行动。然而即使真有这样的传说，也已没人记得了。这样的服装也可能是某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因为只有悠闲自在的妇女，不想出门就无须出门，才可能觉得它穿起来舒适，不易被弄脏。雨湿天气或道路崎岖的情况下，这种衣服穿起来都极其不方便。而且，穿上这衣服，也没法背、抱或拉孩子。但也可能，其长久存在，主要是缘于它诗性的价值，作为对穿着者性别的一种象征性的标记。

它有着一种梦幻的力量，是一件可以有几种不同阐释的艺术之作，同时又一次性地解释了几个现实层面的问题。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穿一件高大男人的外套，是在以一种简单而戏谑的方式，展现出男性与女性间的对比，就如沉重与轻盈、粗野与柔弱、动辄碎裂与虽然易碎却为温柔和快乐的缘故而被倍加呵护之对比。这使得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好似父亲与女儿的关系。小女孩穿着她爸爸的外套，躲藏在衣服深处笑爸爸，假装自己穿的是一件魔法衣，可以隐身，爸爸找不着自己。衣服之宽大，有利于引发这样的想象。黑塞哥维那人个子很高，但较之于身上

这外套，仍不够魁梧。我身高接近五英尺四，我丈夫将近六英尺二。如果我用这种方式穿上他的大衣，衣服褶边与我的脚踝还会有相当一段距离。但莫斯塔尔的这种服装几乎拖到了人的脚背上。

不过，这也从一种更凶险的视角展现了女性：男性每每看见她们，都会感到害怕。那黑乎乎的面甲，犹如猛禽的喙；衣领里侧闪耀的金线，暗示着种种私密与诱捕之快感。一支火炬，被指向这想象之火焰，而这些火焰，又须以痛苦、绝望与快乐的种种梦想作为燃料。这种外套，以其质朴而又难以捉摸的美，特别而惊人地凸显出所有这些遮掩女性面目的东方服装，其内在的固有意义。该意义并不直接与性方面的问题相关联；它源出一种更为非个人性的，甚至是玄妙难以捉摸的，尽管原始得让人厌恶的思想状态。那面纱，恒久化了并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情境：男性在与死亡联合时，正如任何终有一死之物，憎恨着他的同类的生存及其对生命的延续，而他尤其仇恨女性，因为她是生命诞生的工具，他伸手至地上，找寻污秽之物，敷在她脸上，以玷污她鼻孔里的生命气息。所有戴面纱的女性身上，都透着一种与她们可能承受的种种妨碍很不相称的忧郁感。如莫斯塔尔的女性，即使当她们似乎正匆忙赶往秘密、欢愉而纵情的床笫，她们身上仍普遍透着一种对死亡臣服的暗示，一种生者试图拒斥生命的徒劳的尝试。

波斯尼亚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波斯尼亚

路上

一位身穿白袍的穆斯林妇女行走在繁花锦簇的果园里，她面露戚色，怀里满抱鸢尾花——我们离开黑塞哥维那平原时，最后见到的便是这幅画面。一路行来皆是崇山峻岭，起初荒凉广袤、山岩嶙峋，可算是粗陋不堪。随后我们沿河而行，河水奔流湍急，而水势随春林渐缓，林中栎叶嫩红初现，树林尽头，雪峰相连。数条支流汇入河中。见惯了该国石灰岩遍布的异象，这可算是一份馈赠。河水由石头表面流出，纯洁无染。一股湍流奔流入河，激得河水飞漱溅射，打破了一河的宁静，令人观之心惊。岸边卵石旁藜芦簇生，淡绿的花朵花期正好。

不久，地形渐趋缓和，山势随林地起伏愈显柔和，渐渐化作青山远黛，衬出近处的瀑布、果树和绿茵，交织成一幅简约而柔美的图画。“林间幽谷”这一说法再次实至名归。顺着山谷可眺望见亚布拉尼察，也就是白杨镇。奥地利人当年在莫斯塔尔时，将其视作消遣享乐的好去处，军官们会不时冒着酷暑去那里赌赌钱、赛赛马。镇里宣礼塔林立，近处一片高原，其间阡陌纵横，遍植玉米，其时玉米才发新绿，却是一派勃勃生机，其势之勃发，堪比一流女高音唱出的C大调。果园里樱粉李白，错落于原野之间。我们沿街而行，夹道种着白蜡树，枝头缀着或青铜色或金黄色的花蕾；一群可爱的孩子雀跃着跑出校门，冲我们行了个礼，以示礼貌和好奇。不久，我们又在一个吉卜赛人的营地帐篷外见到了另一群可爱的孩子。帐篷由纯黑色帆布搭成，中间是一根横梁，两头用绳子紧系于地上。随行司机是斯瓦比亚人，他唯恐我们给孩子们钱，于是飞驰而过，速度之快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

一座名为“小马村”的整洁的村庄依桥而建，仿佛一条长鞭环绕山谷。村里的小咖啡馆内，男人们随意而坐，啜饮着咖啡。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居然有如此众多的都市风情的咖啡馆，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阵惊异。公路渐渐攀升，路边则是反向流淌的溪流，仿佛一幅回放的电影画面。我们穿行于树林间，林中树木枝头尚未生出花蕾。经过一个高耸的山口时，我们回头望了望身后巨大的雪峰群，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穿过了雪峰的底部，再次置身于具有瑞士风情的乡间，河边夹岸长着淡黄色的报春花。我们来到更丰饶的村庄，满目所见是各色人等。身手灵活、拥有蜜色肌肤的吉卜赛人，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料好似戈尔德斯格林酒店的窗帘布一般，颜色绚丽，仿佛是黎明的朝阳、黄昏的落日；他们一边向我们打招呼，一边放声大笑。朝公路走了过来的穆斯林女人，脸上未着面纱，见到我们就背过身

去，直到我们走过她们了才转过身来，要不就就近寻一面墙，脸贴着墙站着。我们来到一处开阔的山谷，两侧群山相接，山的走势奇特怪异，既非绵延东西，也非伸展南北，而是朝着四面八方纵横捭阖。于是，景色常常是移步换景，而大地延绵不绝，气象万千，足可媲美大海。

“快到萨拉热窝了，”我说，“山谷尽头就是了。”虽然我说得没错，但我们还是费了好一阵功夫才到达那儿。因为主要道路正在维修，我们不得不绕行了很长的一段路，而路况又极糟，溅起的泥水比车身还高，如此走了一英里，我们的脸上和外套上都满是泥水了。这个国家果真贫穷落后，不是谁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

萨拉热窝I

“看看，”我说，“萨拉热窝的河水是红色的。我觉得这有些过分了。错误的移情真不该被用在那种痛苦的事情上。”“没错，简直跟宣传海报一样明目张胆。”我丈夫回答道。我们正站在一座桥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要是在1914年6月28日早上转过路堤时，没有遭到一个名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的波斯尼亚人的枪击，他们的车就会开上这座桥了。

我们感到不寒而栗。穿过桥到了对岸，岸边有一座小公园，里面有一间咖啡馆。我们坐下来喝咖啡，观赏着四周遍植的郁李和白色丁香花，打量着周围的人群，他们也跟鲜花一样，颇有些看头。邻桌坐着一位穆斯林妇女，身着淡紫、紫红及靛蓝三色条纹的丝绸套衫。她从层叠的衣衫间伸出一只纤长的手来，从玻璃杯里舀出一点水，倒进咖啡杯里。她面前放的是一杯土耳其咖啡，咖啡粉末浮在杯中，而倒进去的冷水可使粉末沉到杯底。她又伸出手来把面纱掀起了一些，高度恰好到她用另一只手将杯子举到的唇边位置。她不喝咖啡时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微风轻拂她黑色的面纱，紧贴在脸上。她的沉静不似西方妇女的惯常举止，然而她露出嘴唇和下巴来，肤色白皙耀眼，又显得她完全不是亚洲人。不远处，两位穆斯林男子坐在长凳上谈论政治，手指不断地敲打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两人身材都精悍瘦长，长着一头深棕色头发，蓝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珠里光芒四射：要不是头戴土耳其毡帽，他们简直就是丹麦海船上的船长了。

乍一到此，我们就留意到这座城市的景象另有一番不同，而一路游览下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领略了其独特之处。我们本以为当地的服饰是亚洲民族的独特标志，是他们与欧洲边境地区交通往来的有力证据，但身着当地服饰的人却绝非亚洲人，而是，比方说，拉丁民族的人。这使得萨拉热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奇装异服的舞池。此外，城里也弥漫着一番浮华奢靡的气氛，这里的人们矢志不渝地追求着享乐，毫无疑问，为了举办一场盛宴，他们即便铺张奢侈也在所不惜。然而，严格说来，这种浮华却是一种错觉，因为萨拉热窝本是一座赤贫的城市，这里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达不到我们西方大城市的水准。但这里也不乏家底殷实、小有富足的人。当地的穆斯林对商贸业嗤之以鼻却坐拥土地，他们的后人继承了财产，要么做了官，要么成了专业人士，他们瞧不起的商贸业则成了基督徒的专营，于是那些基督徒又渐渐成了城里富裕的特权阶级，完全不可与农村地区备受欺压的基督徒们同日而语。这里也有犹太人的聚居地，他们的父辈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颁布驱逐令后从西班牙辗转到此，随后又与另一支古老的犹太民族融和，后者却自古以来就已在巴尔干地区定居了；这样，他们既得到了财富，又获得了文化。流经此地的红色河流折成了V字形，位于

此地的萨拉热窝富庶繁华，沿峡谷底部而上，蜿蜒矗立。市郊地势开阔，果树林间一座座漂亮的房屋错落有致，一派欢欣景象。这里的人活得十分舒坦惬意，可以鸟瞰萨拉热窝林立的清真寺宣礼塔，也可以俯瞰沿河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高大杨树林。就连这里去世的人也被增色不少，因为郊外一亩亩层叠而上的土地里，散布着穆斯林的墓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透露出几分精心考究，墓地里的野花蔓草生机勃勃，一如它处，大理石做成的墓碑就斜斜地竖立在这些花草之间。

萨拉热窝的奢华其实无关富庶，倒是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息息相关。这里的人热衷于享乐，其狂热之甚，不但没有丝毫犹疑，甚至可以说是死心塌地，即便用小心翼翼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们绝不浪费哪怕一点一滴的乐趣。在这里，穿红着金、披蓝挂绿也没什么不妥——女人们都这样穿；镇上的穆斯林集市一溜儿排开好几英里，家家店铺大门敞开，店里挂满了手帕和披肩，上面印着明艳夺目的图案，颇得人们的青睐。要是在西方，也只有豪奢的人才敢去找用色大胆、剑走偏锋的服装设计师，来缝制如此艳丽的衣服。集市对面富丽堂皇的清真寺里，男人们在大理石喷泉里洗手洗脸，礼拜时间一到，就口念祷词，匍匐在地，脸上满是气定神闲、淡泊宁静的怡然惬意，这也成了他们声名远播的日常功课。在穆斯林饭馆里可以买到车轮馅饼——油光闪亮的酥油面饼，做成叶片厚薄，里面裹着菠菜。这种食物意味着，人们不必为嗜食肥甘厚味而感到羞愧。男人们的目光老是围着戴着面纱的女人打转，而女人们步态款款，表明她们对男人的打量心知肚明。往来之间，倒显出一番柔情蜜意，值得花些时间去想象、去品味，因为这是男欢女爱的情意之花。这种不动声色的郎情妾意在穆斯林传统中由来已久，也许依旧在穆斯林中最为盛行，但在犹太教教徒和基督徒的脸上也能找到这种泰然自若，相比之下，清教徒的清心寡欲也好，放荡子的放浪形骸也罢，反倒显出云泥之别了。我们曾以为，他们这样会破坏清净的美，但在这儿，我们却不禁怀疑，他们完全有必要抛弃戒律，这样才能领悟到生活的精髓。

虽然萨拉热窝个性极其鲜明，其历史却并不比其他城市更悠久。这里最初是个采矿的小镇，在城里的山峰上能看到一座土耳其式样的城防古堡，奥地利人后来将其修复了。古堡后面是一条矿山巷道，杜布罗夫尼克来的商人曾在那儿采矿。但这绝不是说萨拉热窝也有现代矿业城市的那种漫不经心和轻率鲁莽。过去，在人们意识到尽管这里的矿藏足够丰富，但其生活习惯却使他们脆弱得不堪一击之前，跟其他任何一座产业前途光明的城市一样，这座矿业城市也清醒而自信。然而，这座城市于1464年沦陷于土耳其人之手时，它既非气势恢宏，也非兵强马壮。当时波斯尼亚的首府是亚伊采，这是一种惯常叫法，但其实没什么提示作用。往北九十英里开外的山区，就是首府的所在地。但萨拉热窝沦陷后，其中心地位反倒愈来愈重要，各种不同的人性特点在此得以凸显，其中一种完全可以被归结为地域

特性，却异常鲜明，让人为之感到震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摩尼教的异端邪说不光影响了达尔马提亚，在特罗吉尔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还深深地植根在了波斯尼亚，而当时在波斯尼亚有个叫作波格米尔的教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其中既有封建贵族，也有农民。我们对这个教派所知不多，只能从其敌对教派那里得到一些了解，然而这些人又尽是些睁眼说瞎话的人。该教派的理念来自其名字“波格米尔”，在古斯拉夫语里这是“上帝给予怜悯”的意思，从该教派存留的修行方式可推知，他们祈祷时往往沉迷其中，喜不自禁，斯拉夫人对这种方式可谓驾轻就熟，且该教派还修改了其二元论的教义，以适应斯拉夫人的品位。他们否定了清教教义，并吸纳了一些基督教创立之前的信仰和习俗，诸如一些特定地方有自然神灵出没的迷信观念，或在特定时间采集草药并配合咒语使用，等等；该教派还赋予其教义以政治因素，使其更具斯拉夫性格特点。当代历史学家指出，波格米尔教派其实不算异端，而是一种教会分裂，它体现了一种企图，即强大的民族派别想成立地方性教会，使这一教会既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也不依附于东正教。

且不论波格米尔教派究竟为何，至少在近二百五十年间，它经受住了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野蛮袭击，满足了绝大多数波斯尼亚民众的宗教诉求。相较之下，罗马天主教又是两者之中更危险的那个，这倒不是因为东正教更具宽容的美德——君士坦丁堡议会曾下令应该对波格米尔教派处以火刑。这是因为东部的政治局势对东正教越来越不利，最后土耳其人来了，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在他们看来，东正教就连对异端分子实施宗教迫害都不够格。罗马天主教却没有遭到这种迫使其软化的迫害。尽管它一度对异端分子不是那么严厉苛刻，比如说，他们对法国卡洛林王朝的犹太教教徒和阿里乌斯派教徒就温和有加，但最终在世俗偏见和君主的野心的作用下，他们向反对其信仰的人举起了手中的剑。

12世纪末，达尔马提亚有一位国王想占领波斯尼亚，于是向罗马教皇抱怨，说这里到处都是异端分子，并恳请教皇让匈牙利的国王把他们驱逐出去。干涉体制由此开始，但久久没有收到任何成效。1221年，波斯尼亚境内只有波格米尔教派的牧师，受其影响，波斯尼亚举国皆极虔诚。但教会此时却已狂热上头，到1247年，教皇竭力鼓动波斯尼亚大主教，向他描述他的前任们如何通过抛弃大部分信仰、杀死或驱逐成千上万波斯尼亚囚徒以让自身的领悟获得拯救。然而，波斯尼亚人民不为所动，仍虔诚执着于波格米尔教派，一旦教皇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譬如对韦尔多教派实施宗教迫害时，或者东西教会经历大分裂时，波斯尼亚人又开始拥立自己的教派了。最后，波格米尔教派终于成了正规的国家宗教。

但教皇却在波斯尼亚问题上下足了赌注。跟讨伐巴勒斯坦一样，他乐此不疲地说服十字东征军，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他们征讨这片土地；他派出大批

传教士，而传教士们也的确表现得光辉英勇，并多次殉教；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对邻国的君主施加政治压力，唆使他们入侵波斯尼亚，使其遭受战火和杀戮的荼毒；他还扶持天主教的篡权者登上了波斯尼亚的王位，让这个王国陷入持久的混乱，使其绝无可能实现国家统一。至此，教皇不惜最后放手一搏，他扶持了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国王。西吉斯蒙德当时手握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两个王国，却一心渴望着将波斯尼亚收入自己囊中。这一举措完全无助于秩序的恢复。西吉斯蒙德生性轻浮狂妄，喜欢铤而走险，他对斯拉夫的兴致不大，这一点从后来他将达尔马提亚割让给威尼斯就可见一斑。但教皇却颁布了谕令，号召全体基督徒加入十字军，讨伐土耳其人、叛教的阿里乌教徒以及相信异端邪说的波斯尼亚人。于是，西吉斯蒙德大兴战事，让饱受折磨的斯拉夫国土再度苦不堪言，最后他大获全胜，活捉了波斯尼亚的国王。然而波斯尼亚人却不买他的账，很快又拥立了一位国王，而新国王也是一位虔诚的波格米尔教徒。不久，西吉斯蒙德将被捕的国王打发回国，新老国王为王权而彼此对抗，于是这个饱经蹂躏的国家再度陷入了内战之中。

当时是1415年。1389年，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失利，随后的二十六年中，土耳其人不断蚕食着波斯尼亚的边境地区，他们甚至在该国的南部地区站稳了脚跟，就连孩子都能看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土耳其人向波格米尔派提出条件，声称只要他们不做基督教教徒，而转做穆斯林，且不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发动攻击，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保护其土地上的财产安全，并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波格米尔派本就在教皇的谕令中与土耳其人同列为全体基督教教徒的敌人，后来又遭到过侵略，所以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土耳其人的条件。要不是当时罗马教皇容不下他们，土耳其人也就不会在后来拥有欧洲的土地五百年之久了。五十年后，这一蠢行终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波斯尼亚全境都被土耳其占领了，土耳其人还在继续向匈牙利和中欧推进。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在位时间短暂的天主教国王，将一群波格米尔派信徒逐出了波斯尼亚，后者的同伴则被戴上镣链，押解到罗马去接受“仁慈的改造”。这些波格米尔派信徒们为了保卫黑塞哥维那山区，与土耳其人继续对抗了二十年。

但故事并未结束。正如历史上其他一些危急关头一样，唯有在这种时刻，人性中一些古怪而又卑劣的特性才会显露出来。总有那么一类惊世骇俗的人，他们的抵抗方式就是投降。不妨假设这类人是女人。男人受其吸引，朝她靠近，觉得再没有别的女人比她更温顺了。男人当她是自己的所有物，这女人也毫无异议，这让男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些瞧不起她。但突然间，男人发现自己全部的生活都受到这个女人的影响，身体愈来愈离不开这个女人，也习惯了跟这个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是没了她，连吃饭都要食而不知其味了。

到这个时候，男人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并没能征服她的心，他甚至都不能肯定这个女人到底爱不爱他，甚至是否喜欢过他，或有没有经常想起他。然后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她一开始就不加抗拒，不过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无关紧要呢？他甚至会怀疑，这女人是因为恨他，才允许自己介入她的生活，想让自己在她面前暴露无遗，这样她才能抓住他的弱点以鄙视他。男人天生就是善于结怨而不善爱人的动物，在他看来，这说不定就是事情的真相。男人想要找出真相可就得备受煎熬了，而且他也不可能找得到真相，因为这女人天生就善于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男人不得不放弃这番枉费的功夫，它发现这般境地里既无温暖，亦无光明，既无果腹之物，也没有遮风挡雨的庇护，只换来了对未知敌人的深深恐惧，于是他只能承受独居的痛苦，直到爱上别人才算结束；要不然他就得让自己变得不再是自己，这样才能为那女人所接受，而要做出转变，就得扭曲自己的真性情。不管他怎么做，这女人都会越发强势，越发从容不迫，但若想胁迫她就范，那这女人就会比强势更强势，比从容不迫更加从容不迫。

斯拉夫人在欧洲史上曾两度扮演过这个女人的角色。第一次，情况比较简单，俄国人让拿破仑深入自己的腹地，结果拿破仑发现自己被困于茫茫白雪和焦土灰烬之中，他的戎马生涯注定就此终结。第二次则发生于萨拉热窝本地。信奉异端邪说的波斯尼亚贵族们将自己的国家交给了土耳其人，以此换得宗教自由和土地所有权，但他们心里明白，土耳其乃是敌人。斯拉夫人好奇善思，而土耳其人的语言里就找不出跟“感兴趣”有关的只言片语，于是，他们乐得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世上可能没有哪两个民族比这两个更彼此反感的了。跟榨干其他新占的领土一样，土耳其人开始用同样的方法向波斯尼亚摊派苛捐杂税，也用同样的体制招募新兵，两个民族之间的反感越发强烈。占领波斯尼亚不久后，土耳其人开始撤离，他们从斯拉夫男孩中挑选出战士，充当土耳其新军或是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这些男孩打小就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姓氏，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在何处，长大后也不能娶妻生子，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听凭苏丹驱使的战争武器，跟长矛和炮弹一样残酷无情。

这些苛捐杂税，波斯尼亚人都忍受了，除此之外，他们也别无他法。但带头向土耳其人屈服的两个波斯尼亚贵族却来到这个矿业城镇，建立起了一个名为波斯纳塞莱的城市，城市的起点就在群山上的萨莱古堡。他们虽然臣服于人，倒也适应了这一身份，颜面无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有一点应该谨记：这些人绝不会把自己视作叛徒，那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既然穆罕默德承认了基督神圣不可侵犯，穆斯林们也毫不反对在基督教教堂里膜拜基督，加之这种异端教派本身就亚洲味儿十足，于是信奉这种教派的人也就不会认为自己是背弃了基督教、借着穆斯林的保护来敬奉自己的神明了。时至今天，萨拉热窝的穆斯林仍旧会特意在每周二晚上去帕多瓦的

圣安东尼教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觉得，他们是向土耳其人让步才争取到了自己的独立，当初若是向罗马天主教会屈服，他们也就得不到这么多的自由了。就这样，他们在自己的新城镇里安顿下来，牢牢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享受着土耳其人不断扩张的财富带来的好处。

毫无疑问，当时的土耳其人骄奢淫逸，于是，这座城镇也就享乐成风了。其富庶程度究竟如何呢？通过一场惨败的战事，我们可以一窥究竟。杜布罗夫尼克当时有一位滋扰得百姓苦不堪言的大宰相，名叫卡拉·穆斯塔法，他在维也纳郊区的一场战事中败北了，而他所驻扎的营地奢华之致，欧洲人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看了个目瞪口呆。他的供给无比丰富，随行带了两万头水牛、两万头公牛、两万匹骆驼、两万匹骡子，一万只羊，而所携的玉米、砂糖、咖啡、蜂蜜和油脂足够一个国家的口粮。当时波兰的国王扬·索别斯基在给王后的信中写道，他的驻地之大可媲美华沙，卑微的波兰人对此根本无法想象。这位大宰相的帐篷——这个我倒知道，因为我曾在维也纳见过——实在是绣工精美、色彩绚烂的珍品。营地里还有浴室，水里加了香精，有带有喷泉的花园、华丽的卧榻、闪闪发光的灯盏、枝形大吊灯，以及价值连城的地毯，甚至豢养了很多动物，飞禽走兽游鱼样样不缺。卡拉·穆斯塔法逃亡前毁掉了他的两件心头好，他觉得这两件东西太过美好，决不能容忍卑贱的基督教教徒来享用。其中之一是他姿容绝世的妻子，另一件则是他所饲养的鸵鸟。当时的萨拉热窝奢华富足，一切物资应有尽有，其风气存留至今，从清真寺里，从花格窗棂间，从外墙环绕的花园中，无不透露出来。

但是，无论波斯尼亚人多么耽于享乐，他们却绝不懒散。萨拉热窝当时是穆斯林新贵们的聚居地，同时也是波斯尼亚裔土耳其禁卫军的总部所在地。然而，这些禁卫军却总是无法达成其长官的意愿。事实证明，他们所受的教育无法使其忘记自己的奴隶身份。他们坚持说塞尔维亚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爱国心，而且，他们还坚持要娶妻敛财。他们根本算不上奥斯曼帝国用来残忍镇压波斯尼亚贵族的代表，相反，这两者其实是朋友和盟友的关系。土耳其朝廷发现自己对这种状况束手无策，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禁卫军也是斯拉夫人，且对波斯尼亚的禁卫军有着明显的好感，如此一来，就不能指望用他们来对抗波斯尼亚的禁卫军了。朝廷也没有其他的资源可用，因为它之前就把波斯尼亚的基督教领袖消灭殆尽，如此一来，基督徒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站出来为镇压自己的敌人战斗了。

就这样，在奥斯曼帝国的边陲之地，一座自由的城邦崛起了，斯拉夫人在这里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奉守着遵从斯拉夫法律和风俗的宪法，藐视着一切外来的干预。城里甚至通过了一条法规，禁止波斯尼亚的高官帕夏在城里逗留的时间超过一个晚上。如此，帕夏头晚还被待以招待贵客之道，第二天一早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到了城门口。奥斯曼帝国绝无可能把萨拉热

窝作为政府所在地，只得将政府设在五十英里开外的一座较小的城镇——特拉夫尼克。但就算在那儿，帕夏也不能自己说了算。只要萨拉热窝的禁卫军一向土耳其朝廷申诉，帕夏就得卷铺盖走人。怪就怪在，唯独有一项权利，朝廷却说什么也不肯放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对两位官员的任免权，用以确保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纷争可以得到公正解决。但在当时，就算已经指派了官员，萨拉热窝城邦仍旧可以打发他们离开。土耳其的苏丹和高官们肯定常常会想："可是，我们又何曾征服过这些人了呢？唉，我们怎么就会以为征服了这些人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就这样，这座山城安然无恙地存在了几百年。因其自成一体，即便在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遭受重创时——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打消征服欧洲的念头——这座城市也能承受其失利的影响。但17世纪末的某一天，厄运终于降临了。欧根亲王带领骑兵部队从匈牙利一路驰来，伫立在山谷尽头的一座山丘上，俯瞰着这座城市。接下来，斯拉夫人空前地团结起来，波斯尼亚人使了个计谋——后来俄罗斯人也用了同样的计谋来对付拿破仑。欧根亲王得知，这座城镇已是一座弃城了。它就在眼前，空无一人，只待人攫取。欧根亲王反倒审慎起来，尽管他也急切地想一睹这座东方边陲之城的风采，尽管他也觉得这座城镇的奢华之风颇对自己的胃口，但他终究裹足不前了。他领着一大群基督教的难民，掉头回到了多瑙河，然后带他们去了自己在奥地利的领地。也许，正是这次撤军，才使得欧根亲王和拿破仑之间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之后又过了一百年，萨拉热窝依然故我，繁华富庶，桀骜不驯。再接下来，伟大的革新派苏丹出现了——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他们明白，如果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垮掉，就必须重建它。他们决意重组禁卫军，然而由于该计划难以实施，他们便把禁卫兵解散了。放在今天，这完全是非法政体凌驾于完全合法的行政机构之上发号施令。这两位苏丹还决定改革土地和税收体制，然而这一举措却把农民变成了饥肠辘辘的奴隶。于萨拉热窝人民而言，再没什么比这些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虽然封建体制在欧洲其他地方几乎尽数消亡了，但萨拉热窝的禁卫军和波斯尼亚的贵族们却一直通力合作，竭力维系这一体制不发生变动，他们还坚持提议，取消对基督教农奴的资格限制，以免其重燃历史积怨。居住在波斯尼亚市区的穆斯林贵族们痛恨这些基督教的农奴，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或东正教领袖们的后裔，或其追随者的后人，就是因为这些人容不下波格米尔教派，才使得城门洞开，侵略者长驱直入。

因此，萨拉热窝的禁卫军和穆斯林贵族们并肩作战，对抗这两位苏丹。禁卫军拒不解散，君士坦丁堡的禁卫军被铲除后，在萨拉热窝仍能看到被封禁的禁卫军制服：蓝色皮外套、绣花上衣、高耸的包头巾，军衔较高的军

官的头巾上会饰有极乐鸟的羽毛；高帮皮靴，依军衔不同，分为红黄黑三色。他们一度只得从城里撤退到山上的堡垒里，但不久之后，堡垒也被中央军攻陷了。波斯尼亚的贵族被砍头了，帕夏全面控制了整座城市，一直统治了四个世纪。但几个月后，即1828年的7月，萨拉热窝人终于复仇了，在其邻近的一座名为维索科的城镇的人民的帮助下，萨拉热窝人攻进城里，整整屠城三日，对侵略者大肆杀戮。他们的胜利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之后再无人胆敢来犯，这样一直到了1850年。之后他们为某朝土耳其帝国所败，但不久之后，这个帝国也战败了，并在二十多年后被波斯尼亚的农民驱逐了出去。这对恋人终于毁掉了对方，但他们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对恋人。这座美丽的城市一直在诉说着这对恋人之间的执迷不悟；诉说着斯拉夫人如何不为所动，如何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一切；诉说着他们如何抵抗，从未服输；诉说着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野心勃勃，急不可耐地想要征服斯拉夫人，然而斯拉夫人却从不屈服，哪怕是对自己，也毫不屈服。

萨拉热窝II

我们知道，天黑之前，我们应该睡上一觉，因为康斯坦丁要从贝尔格莱德过来，他会待到很晚，留下来谈天。但我们在集市逛了很久，看一群男人排成一排等着烫毡帽。这个过程很有趣。一家蒸汽腾腾的铺子里，两个穆斯林正在干活，他们人手一顶毡帽，将帽子快速套在一个毡帽形的锥形卷筒上，卷筒里面可以加热，就跟熨斗一样；接着在毡帽上再套上一个卷筒，往下旋紧，最后将毡帽取下，脸上露出慈母般的表情来。“穆斯林肯定都极好整洁，”我丈夫道，跟着又补充说，“但是，这情形肯定非比寻常。若是平常也这样，这样的铺子肯定还有很多。明天肯定是什么节日。我们去问问酒店里的人。”但我们实在太累了，把这事都给忘了，一觉睡到了很晚，康斯坦丁只得给我们送来一条消息，说他已经到了，等不及想去吃晚饭了。

我们下了楼，康斯坦丁正在大厅里站着，跟两个男人谈着话，那两人身材高挑，皮肤黝黑，气度不凡，面色有些发黄，睫毛很长，带着一种塞法尔迪犹太人特有的矜持尊贵。“我跟你们说过，我朋友遍天下，”康斯坦丁说，“这两位是我朋友，都很喜欢我。他们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会讲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时期那种柔和悦耳的西班牙语，不像现在的西班牙语，跟德语一样刺耳，完全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这位是拉禅博士，他是银行家，这位是马里根博士，他是法官。我觉得他们人都特别好，都是循规蹈矩、谨慎小心的人，从没出过差错。他们这就带我们去一家咖啡厅，可以吃些东西，但他们带我们去那里倒不是为了吃东西，他们听说那里有个姑娘，特别会唱波斯尼亚的歌曲，萨拉热窝有这么多的清真寺并非毫无原因，这里是真正的东方，姑娘会唱波斯尼亚的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儿，尽管他们是很认真的人。”

两人跟我们打了招呼，态度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我们沿街来到了那家咖啡厅。看得出，他们喜欢康斯坦丁，一半是因为他是个颇有名气的诗人，一半则是因为他跟小狗一样逗趣好玩。但到了门口，他们又踌躇起来了，考虑要不要带我们去这种地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太太觉得这地方不错，”他们说，“可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对英国来的女士而言，这地方就会显得奇怪了。这里有时会有舞娘……喏，现在就有一个。”舞台上站着一个丰满的女人，穿着粉色穆斯林长裤和胸罩，上面缀满了亮片，她正和着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顺时针扭动着肚子，我们一进门，她又改变了扭动的部位，开始沿逆时针方向扭动她那硕大而坚挺的乳房了。这情景有点像冷硬的机械魔术：好像两只加农炮炮弹，一左一右地转动，但又有种看不见的引力，牵引着它们紧挨在一起。“您太太不介意吗？”法官和银

行家问道。“我想不会的。”我丈夫回答说。就在我们沿走廊往前走的当儿，一只加农炮不动了，另一只则转得比先前还快。忽然，那女人熟稔又热情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法官和银行家不动声色，仿佛没有听到。落座后，他们继续沉默，我感到有些尴尬，便解释说：“又碰到这个女人了，真是太神奇了。”“您说什么？”法官问道。“太神奇了，”我重复道，“居然又碰到这个女人了。我去年在马其顿遇到过她。”“哦，她认识的那个人就是您呐！”法官和银行家齐声叫道。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还以为那女人认识的人是我丈夫。

再次看到她，我十分高兴。去年复活节时，我和康斯坦丁还在斯科普里，他带我去了穆斯林教区的一家夜总会。我们通常以为那种娱乐方式放荡不羁，只有现代西方才有。其实，在古代和贫穷落后的近东地区，这种娱乐方式才更常见。我觉得，只要在马其顿，随便一个有点规模的村子都能找出至少一家这样的咖啡厅来，里面有女孩子演唱，有音乐伴奏。斯科普里的人口还不到七万，这样的咖啡厅就有很多，其中有一家夜总会，规模不在巴黎的特罗卡德罗之下。我们观看的小型穆斯林卡巴莱歌舞表演中，有一家小店的表演最为精彩，演员包括一个吉卜赛男人，负责唱歌和弹古斯勒琴，一个美貌非凡的塞尔维亚歌手，还有一个更为美貌的吉卜赛女孩儿，负责唱歌和跳舞，还有就是这位肚皮舞舞娘，名叫阿斯特拉。阿斯特拉走了过来，桌上的盘盏都被她碰得嘎嘎作响，此间我得知她是萨洛尼卡的犹太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下令驱逐的另一支难民的后裔，至今仍说西班牙语。我叫她隔天到酒店来找我，给我上肚皮舞课。

她十点就到了，比我预料中要早，穿着一件奇形怪状的长礼服，脸上化着蹩脚又生硬的妆，一望而知，她几乎没怎么盛装打扮过，似乎她宁愿待在那些差不离的房子里，当个家庭主妇。肚皮舞课上得不怎么成功。我能丝毫不差地跟上动作，她说，我学得倒是不赖，但就是达不到那个效果。“您瞧啊，夫人，”她开口道，她曾在一间教会学校学过一个学期的法语，讲起话来也是一字一顿的，“您身上没什么货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指责说瘦得过分了。我估计阿斯特拉体重大概有一百六十磅左右，但她并不像那些肥胖的西方女性，身上没有松垮垮的肥肉，而是结实又有弹性。舞蹈课没上好，我们干脆坐下来聊天了。她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有一个姐姐。她姐姐嫁给了一个在萨洛尼卡工作的英国人，现在住在英格兰的伊灵，有两个漂亮的小女儿，分别叫作米莉和丽莉，像洋娃娃一样漂亮可爱。她们住得太远了，远得叫人害怕。她自己是个寡妇，丈夫本是一个希腊的货车司机，结婚才三年，出车祸死了。她还有一个儿子，十岁大。她的理想就是送他去法语学校上学，就她本人的经历看来，她觉得没有哪种教育比法语教育“更富自由精神”了。但是，他现在上的是一所南斯拉夫的学校，学习也很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又聪明又用功的孩子，可是她还是想给他更好的教育。

说起她的工作，她感到非常不快。她并没有明确地说里面都包括些什么，但我们都觉得本来就该如此。其实她以往工作过的地方，希腊也好，保加利亚也好，南斯拉夫北部也好，都还不算差，可最近，她只有在塞尔维亚南部才能找得到工作，在那些夜总会里，客人大多是土耳其人。她举手拍了拍额头，摇摇头说："您不知道，夫人，土耳其人有多愚蠢。"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发现她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她跟那些土耳其客人无话可说，所以她觉得苦恼不堪。她的长礼服滑到了大腿的一侧，露出雪白的麻纱内衣，还有洗净了的身子，跟打扫干净的厨房案板一样清清白白，一点儿都不色情了。她端庄得体，而且说出来的话也知情达理。

可她的话却听得人胆战心惊。塞尔维亚南部的土耳其人跟萨拉热窝斯拉夫裔的穆斯林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土耳其人。他们是科索沃战争后被安置在此的土耳其人，阿塔图尔克总统都禁止土耳其人如此做派了，可他们仍旧我行我素。要是人们都不用头脑思考，一心只想着征伐侵略，最后就会变成他们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知道什么是胜利，却不知道胜利总有个尽头；他们得来的一切都留不住，因为要留住胜利，需要智慧，而这又是他们一开始就摈弃了的东西。所以，他们衰败了，衰败之后，便是长期的蒙羞受辱。曾经，塞利姆和苏莱曼的军队纵横驰骋了半个欧洲，秣马厉兵，骁勇善战，战无不胜。苏丹和高官们声色犬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一旦找到了，就另辟疆场，继续搜寻，庭院里每每有供他们玩乐的喷泉，处处花园都修建了外墙，接着他们就开始横征暴敛起来。末了，这位不再年轻的卡巴莱舞娘，褪去了性感妖娆，一身的简朴端庄，她坐在床边，一语道出这让人心惊的真相："您不知道，夫人，土耳其人有多愚蠢。"

那天下午，阿斯特拉没过多久就来到我们桌边，她告诉我说，她希望能在萨拉热窝再待几个星期，在这儿要比在斯科普里快乐。"这儿的人，"她断言，"更成熟。"她刚走开，我就发现背后站着杜布罗夫尼克来的那位斯瓦比亚司机，可我们当天下午就把钱付给他了。"那女人为什么和你说话？"他问。他老是打断我的话，我总是不知如何回答。我觉得，要是跟他说，"关你啥事儿啊"，他肯定会操着传奇剧里那种让人厌恶的口音，回答"我就是真理"或者"我就是良知"，完全有可能如此。于是，我结巴着回答："我认识她。""你不可能认识这种人，"他说，"你是说，你去过她表演的咖啡厅？""是啊，是啊，"我答道，"在斯科普里认识的，她这个人很不错，有个儿子，她很爱她儿子。""你怎么知道她有个儿子？"司机问。"她告诉我的。"我说。"这种人说的话，你不必句句都当真。"司机道。"可是，我肯定她说的都是真的，"我冲口而出，"我真替她感到难过。"司机瞧了我一眼，目光貌似异常谦恭，却又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敬意，他转头看着我丈夫，叹了口气，仿佛在提醒自己，要在这儿找到帮手是不可能了。他忽然俯身拿起我的手提包说："我来这儿是想说，我记起来了，我说过要帮你把汽油弄上去的油渍去掉的，我这就把包拿出去，把油污弄掉。"接

着他一鞠躬，离开了。我思忖着：“这人可太有责任心了，可我现在没法补粉了，这可真麻烦。”当然，他其实不会真的觉得我需要什么粉饼的。

但是，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有个出奇英俊的年轻人朝我们走了过来，满脸愤愤然的表情。比起在达尔马提亚碰到的那个年轻人，他的愤怒更胜一筹。显然，他认识康斯坦丁，还有那位法官和银行家，可他并没有正式跟他们打招呼。他有着青铜色的头发，湛蓝色的眼睛，目光炯炯。下午我们在公园里碰到两个在谈论政治的穆斯林，没准儿这就是他们的兄弟。他嚷道：“那些该死的土耳其人又怎么了？”法官和银行家都默不作声，康斯坦丁则回答说：“那个，我又没有让他们这样做。”可年轻人不肯罢休：“可是你也效力于我们那个宝贝儿土耳其政府，不是吗？”“没错，”康斯坦丁回答道，“一来，是为了我的祖国；二来，可能部分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心灵，我不搞对立，甘心舍弃那种心安理得。”“这样说来，你也许可以解释一下，你们这些贝尔格莱德的流氓政客，为什么会想出这种法子，来羞辱我们波斯尼亚人。”年轻人道。“他们不公正，”他抡起手臂，使劲儿挥舞，嘴里嚷嚷着，“我们也就忍了。我们眼看着他们羞辱我们克罗地亚的兄弟，眼看着他们朝那些热爱自由的人脸上吐口水。可他们那样做，还算有理可循，要么是为了把钱揣进腰包，要么是为了维持暴政。可这场滑稽秀又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除了伤害我们波斯尼亚人的自尊，再没有别的意义了。你是否可以好心地为我们解释一下，说说你们这群恶棍盗匪为什么会异想天开，莫名其妙地想出这么个招数来羞辱我们的人民，而我们本该去羞辱别人，而不是受到羞辱呢？”

法官朝我侧过身来，低声道：“没事儿，夫人，他们就是谈点儿政治话题。”“土耳其政府到底做了什么羞辱波斯尼亚的事？”我问。“据政府安排，”银行家回答说，“土耳其的首相和作战部长现在正在贝尔格莱德，讨论我们跟他们的军事结盟。他们明天要来这儿，穆斯林民众要前去欢迎。”“啊，”我丈夫道，“怪不得那么多人去熨毡帽呢。那个，是不是很多人一聊到他们的访问，反应就像这位年轻人一样？”“不是的”，银行家回答，“这是个很激进的年轻人。”“我可不这么认为。”法官道，语气有些悲哀。

正说着，那年轻人忽然一拳砸在桌上，冲康斯坦丁大吼道：“卖主求荣的犹大！卖主求荣的犹大！”“不，”可怜的康斯坦丁一边反驳，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后退，“我不是卖主求荣的犹大。其实，我也不敢肯定自己像十二门徒里的哪一个，可能是个子最小、最温和的那个，十二个人中脾气最好的那一个。”接着他埋头吃起了肉串，肉串上串着一小片一小片的肉，上面撒满了调料，已用烤肉叉子叉着烤熟了。等他放下肉串，他那漆黑的圆眼睛里已经泛起了泪光，满眼都是失落的神色。“其实那个年轻人说的那事，我也挺不待见的。可今天这事还真不友善。亲爱的主啊，真希望年轻

人能对我们这代人友善点儿，我们在战争里受的苦够多了，要不是我们，他们现在还在给奥地利人为奴为仆呢。”

银行家小心翼翼道：“你觉得这次访问真的明智吗？”康斯坦丁无力地答道：“我觉得还是明智的，我们的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是不会做蠢事的。”“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反对呢？”我丈夫问道。“这个嘛，就连我都知道一些，”康斯坦丁答道，“土耳其人本是压迫我们的人，我们把他们赶了出去，这样我们基督徒就自由了。可现在土耳其人得到基督教政权的同意，要来跟穆斯林会面，而穆斯林又是拥护压迫我们的土耳其人的。要我看，这事儿也透着些古怪。”“但怎么可能呢，”我丈夫道，“大家的年纪都不算老，都不可能亲身经历过土耳其人的压迫，怎么会对他们的反感如此强烈呢？”

那三人一同看向我丈夫，好像他完全在胡说八道一般。“嗯？”我丈夫道，“土耳其人不就是在1878年被赶出这里的吗？”“啊，不对，不对！”三人异口同声叫道。“你不知道，”康斯坦丁解释道，“土耳其皇帝是在1878年离开了，可斯拉夫穆斯林留了下来，奥地利人后来接管了，斯拉夫穆斯林还是一样活得惬意无比。他们颇得奥地利人的宠爱，远比基督徒得宠，也远比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得宠。”“为什么会这样？”我丈夫问道。“因为分而治之的原则。”银行家答道。从受害人嘴里听到这么一句话，实在是感觉怪异。“是这样，城里住着五六万人，”银行家继续说，“有我们犹太人，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另一种则是中欧和亚洲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是一类。其次，还有基督教斯拉夫人，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这是另一类。但他们唯恐我们忘记彼此间的差异，于是又捧出了穆斯林人，这便是第三类人，是他们用来对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盟友。”

他们讲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些日子里这里一直笼罩在奥地利人和穆斯林人专制统治的双重阴影之下。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叛逆的愠色，脸色也渐渐地阴沉了起来。他们二人皆出身富贵，颇有家族势力，对于这种身份的人，专制统治其实影响甚微。但对于当地农民和贫困城市的居民而言，这种统治就严苛异常了，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曾遭监禁或鞭笞之灾，甚至有人被处以死刑。但对于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而言，有一种挑衅和屈辱感却是挥之不去、令人不胜其烦的。穆斯林可以上最好的中学和最好的大学，行政机关里为他们留着最好的职位，他们应邀去各种官方举办的宴会，总是受到贵宾待遇，他们祈祷时，就连火车都要停下来等待。土耳其的土地法规极大地有利于穆斯林的利益，却损害了基督徒的利益，而天主教出身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却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全部法规，唯恐触动分毫。后来斯拉夫人将土耳其人赶了出去，奥地利人答应建立卫戍部队保护当地的基督徒，以防止土耳其人再次回来，从而又强行占领了波斯尼亚，而他们却

继续羞辱当地的基督徒。这一切在两人看来，都成了一种伪善，点燃了他们熊熊的仇恨之火，他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永远无法原谅。

显然，尽管这两人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们对这种仇恨也深有感触。他们将土耳其人比作猪狗，一提到这些字眼，就透出比西方人强烈得多的憎恶来，而土耳其人无疑也同样憎恶他们。单看这点，就知道形势无比复杂了。“我到柏林去攻读学位时，”银行家道，“常常感到羞愧不已。德国人平等地待我，而在自己的国家，比起那些头上戴着毡帽的土耳其人，比起那些亚洲人，我反倒要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他的话语里明显透着太多纠缠不清的情感。后来我丈夫问道：“可是，穆斯林这个团体是不是足够重要、足够活跃，所以不管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呢？”律师和银行家同声回答道：“啊，那当然啰。”康斯坦丁又接着解释道：“没错，穆斯林是极其聪明圆滑的，比我们要聪明多了。伊斯兰教教了他们很多东西，比方说，要是他们当中有某个人快过生日了，就不要四处乱跑、随便开枪。政府倒是一直想和穆斯林和解来着。现任内阁斯帕霍先生是交通部的部长，他就是本市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很不错的一个人。”法官和银行家一同微笑起来，表示赞同。他俩说了许久，字里行间都是仇恨的情绪，这时候却突然生出一股地方爱国热情来，就连仇恨都暂时忘却了。

末了，该离开了。“其实，是你们的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不对，”银行家终于开口道，“倒不是我们不喜欢穆斯林。打那场战争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相交甚好。可政府选他们做代表，允许他们正式接见土耳其政府的代表，而土耳其政府又一度极尽所能地镇压和践踏我们，事情就不那么好了。”我们站起身来，阿斯特拉身着粉红色穆斯林衣裤，全身包裹着亮片，她像一颗硕大的海绵球一样从舞台上跳了下来，跟我们道别。我本打算送她一份礼物，可又记起司机早些时候把我的手袋拿去清洗了，于是我让她第二天到酒店里来见我。我们正要出门，那位斯瓦比亚司机突然又出现了。原来这座卡巴莱餐厅四下装饰着灌木和攀缘植物，以便将餐桌隐匿其间，好让餐厅有一种露天啤酒馆的感觉，司机便从其中的一张餐桌边站了起来。他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将手袋递还给我，而我发现他正是为了这时候的胜利才将自己藏了起来，这样就算我对我那不该结交的朋友一时起了善心，也没法找到他，没法拿到钱了。

“还有，请注意，”他一边说，一边忧心忡忡地将我丈夫和我依次打量了一遍，然后又从我打量回了我丈夫，显然为我们的缺乏常识而苦恼不堪，“明天早上最好留在屋里，土耳其总理和作战部长要来访问穆斯林了，可能会有骚乱。无论如何，这不适合你们，到时会有很多的人。”他一脸权威地开口对自己理想国度中的臣民发话了，好像那世界真实地存在，而他的权威也真实可靠一样，因为他那颗冥顽不灵的脑袋早就认定

了：有钱人就应该是讲道理的人，就不会把钱施舍给不该施舍的人，就应该在外面不那么安全的时候待在屋子里。他那盲人一般的眼神里流露出乞求的神情，要我们记得自己是英国人，所以别跟这些斯拉夫人一般行事。

萨拉热窝III

睡着之后，我只醒来过一次，听到宣礼官们趁着天光未明，大声地宣讲，声音从市里成百上千座的清真寺里传来，说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声音听来极其悲伤，犹如半夜枭啼，又如深夜狐啸。宣礼官们不过在宣示他们的宇宙观，而狐枭之类也不过是在遵从其表达的基本需求；而这宣讲声，虽本意不过如此，却比任何言论都更具概括力，说明人生本该如此，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正要再次睡着，却听见我丈夫梦呓般地道：“真奇怪，太奇怪了。”“什么太奇怪了？”我问道。“那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说他在柏林留学时，觉得羞愧，因为他在那儿受到平等对待，而在这儿，他得到的待遇却比穆斯林们低一等，他说这话时语气那么自豪，我真好奇他现在是怎么看待德国的。”

那天早上，我们起得并不晚，但康斯坦丁比我们先下楼了，正在餐厅里吃早餐。北欧人不喜欢康斯坦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做事仅凭活力就行了，而他们则须有道德因素刺激才行。他体内鲜红的血液鲜活健康，能让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根本无须昏沉半天来下定决心，他的脉搏蓬勃健旺，根本无须用毅力来强迫。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著作中记载，他们很少为外物所动，除了集所有美德于一体的异教徒。虽然康斯坦丁那天早上精神饱满，但他一点也不开心。“看看这些旗帜，”他说道，“今天是萨拉热窝的大日子。瞧着吧，我带你们去看个遍。”但说这话时，他却一脸的闷闷不乐。

我估摸着，他可能在偷偷揣摩朋友们的心思：他们会好奇当天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说实在的，从餐厅窗户往外一望，就能看到络绎不绝的一队人打这儿经过，男人无不戴着土耳其式样的毡帽，女人则全部黑纱遮面，这情形怎么也叫人高兴不起来。我自己看到这样的男男女女倒觉得没什么，可换了另一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本就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又让别族的人落了下风，别人看他们的眼光自然就不同了。“我明白，这样的仪式能激起种种担忧。”我尽可能温和地道。“我们最好出发吧，”康斯坦丁道，他并没有理会我说的话，“贝尔格莱德过来的那伙人不会来火车站了，他们在大马路中央一个特设的小火车站就把火车给停下来了，离博物馆不远，但离这儿有很长一段路呢。”

我们搭了一段路的车，后来不得不下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因为康斯坦丁持有政府护照，而我们要到火车站的接站处去，我们获准走在街道中央，夹道两边都满满地站着面戴黑纱的女人和头戴毡帽的男人，偶尔才能稀稀拉拉地见到几个基督教教徒。走了两三百码后，我说：“看来穆斯林占了绝大多数啊。”人群拥挤不堪，却又看起来面目模糊、统一无比。男人们都

神情木然，唯一的表情就是遵循什么准绳的那种沉毅，仿佛木雕泥塑一般；他们都寄望于同一个念头。女人们虽然把脸给遮了起来，但从她们等待的身影里可以看出，她们同样怀揣着这个希望。细雨开始洒落在他们丝质的或棉质的罩衫上，可他们纹丝不动，虽然大多数人都带了雨伞，但只有几个人将伞撑了起来。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已然加入了某种神圣的仪式。一些看热闹的人排成了游行队列，手里拿着题着字的小旗帜，字迹虽不甚娴熟，却很是整洁，有的甚至题的是土耳其的文字；更多的人则拿着南斯拉夫的旗帜，站得整整齐齐，并不挥动旗帜，而是任由旗帜静静地垂着。还有很多小孩，端正地站着，正好候在火车停靠的地方。我看了看表，发觉我们已在人群中走了十分钟。萨拉热窝有三万名穆斯林，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脸上带着从前的那种忠诚，全神贯注地看着，看得满脸的痴迷、满脸的陶醉。毫无疑问，他们也知道，从前的仇恨同样让人难以释怀。

我们到达小火车站到得正是时候，火车正缓缓地滑进车站，停了下来。人群中发出一小阵欢呼声，人们挥舞起了旗帜。然而车厢里的人还没出来，欢呼也就没什么意思，人群便又停下来等着。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市长携其随从上前迎接交通部部长斯帕霍先生——他个子挺高，一脸乐呵呵的表情——还有南斯拉夫作战部长莫里茨将军。将军体格魁伟，周身上下挂着些沉甸甸的玩意儿，像一头负重的公牛，好展示他力气非凡。他有着戈林希望拥有的外表。人群里传出阵阵小声的欢呼以示欢迎。人们心里按捺了好几天，本想热烈欢呼一番，这时却发不出声来了。大概大家本以为斯帕霍先生和将军身后会跟着大批扈从，这时却发现他们身后居然空无一人。在场的还有两个头戴礼帽、身穿修身西服的小个子男人，看上去衣冠楚楚、光鲜整洁，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殖民地公职机构里供职的法国人，只不过皮肤较黑罢了。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认出他们其实是土耳其的首相伊斯麦特·伊诺努和作战部长卡齐姆·奥查利普。

即便认出来了，人们也没有欢呼。两位先生头上戴着礼帽。他们面前站着的几千号人，全都戴着土耳其毡帽或蒙着面纱。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早就下令了，这种穿着在土耳其国内是犯罪。这样一来，两人看向众人的神情里满是厌恶，藏都藏不住。他们虽然面色漠然，倒也并非全无表情。在英国人看来，这就好比这么一回事：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某殖民地得以神奇地保留了下来，那里的人又一直延续着英国人的习惯，这时殖民地来人了，英国人得在大英帝国某处接见他们，还要装得如同亲兄弟一般亲热。

穆斯林市长向二人宣读了欢迎致辞，自然，他俩一个字也没听懂。两人不懂塞尔维亚语，萨拉热窝人又不通土耳其语，这甜言蜜语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俩只得等着莫里茨将军将致辞翻译成法语。在他们等着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人盯着远处的一幢建筑深深地看了几眼，接着面部一阵

抽搐，然后就扭头看向了其他地方。原来，这个恋旧的家伙将这些阁楼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瞧见了那面绿底新月旗，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国旗。他们两位及其领袖都将这旗帜视为灾祸的象征，这一灾祸差一点儿就让他们亡国灭种了。将军翻译完了，他们又操着比将军更娴熟的法语回应了一番，听上去比法式法语更悦耳、轻快一些。随后他们静静地站着，目光却一直聚焦在最近的屋顶，刚好不用看到这群人：戴着毡帽、蒙着面纱，一片红色的头顶和黑色的嘴部，实在是奇形怪状。将军接着又把他们客气得过头的发言译成了塞尔维亚语。他们告诉萨拉热窝的穆斯林，他们能感受到人们对于统一南斯拉夫这个理念的高度热忱，并指出，南斯拉夫人民若不成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其他大国便可肆意践踏整个巴尔干半岛。但自始至终，对于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渊源，他们却只字未提，更不曾提及伊斯兰教。

两人照例行了礼，随后钻进一辆汽车朝市区驶去。人群仍没有欢呼送行。只有那些能瞧见火车站站台的人才意识到，那两位正是土耳其的部长先生们。但即便看清楚了，还是有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觉得，肯定有什么安排搞错了。人群后面本来安排了一小队人，手里拿着旗帜，这时也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列队欢迎了，这样耽搁了一阵，等他们最终决定挤到路边来，为时已晚。人群已离开了人行道，冒着细雨回城了，他们一语不发，缓缓地走着，就好像扑了个空，又被打发回去一样。

讲了五百年的故事终于结束了，我们亲眼见证了故事的结局，亲眼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它就在我们面前倾塌倒地，就像一个躺在椅子上的人，从上面颓然地滑了下来一般。但悲剧终究画上了句号。奥斯曼帝国很久以前就不用再忍受苦楚了，我们倒是看到了眼前那种酸楚的悲痛。试想，波斯尼亚的斯拉夫人就像一个不可征服的女人，但最终还是为时间所征服，于是她向旧情人求救了，但回应她的人，虽然有着旧情人的姓，实际上却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情人的儿子，那儿子冷冷地看着她，只当她是家史里丢人现眼的一幕。想到这里，我们都不禁要同情心大起了。

萨拉热窝IV

“真高兴今年春天天气不好，”我说，“要不然，我就看不到清真寺屋顶上的落雪了。虽然不怎么协调，但有种说不出的赏心悦目。”“可你不是爱看李花吗？这样一来就全给冻死了，”康斯坦丁说道，“而且这太糟了，因为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我们有小部分人靠着木材和矿产过活，但大部分人还是以养猪和种李树为生。不过说到你，我就得庆幸天气不好了，要是天气好点儿，你准会随时都想上山；正因为天气不好，你才认识了我的朋友。难道你不觉得，这座城市里的生活特别惬意吗？”“是啊，”我丈夫答道，“我在伊斯坦布尔就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可四处都没找到，部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部分也是因为那些人都忙着搞改革，都有崇高的动机，想提升他们自身的吸引力。”“我本来喜欢这一切，”我说道，“直到那天下午，土耳其的部长来了，我去集市参观了清真寺。后来想想，这就好像有位不认识的人在拔牙，我却非得在一边看热闹一样。可这全是我的错。”

我选在那天下午参观清真寺，真是一点儿也没有经过脑子。去了以后，我发现院子里到处是穆斯林，正等在那里，因为有传言说，土耳其的部长要去参观。他们脸上依旧带着那种忠诚的神情，看上去却僵硬木然，那天早上在火车站，我也在人们的脸上看到过同样的表情，可如今，这表情中还混杂了一种执拗，就像小孩子脸上那种倔强的神情：明知道一件事不可能发生，偏要不停地说了又说，好像这样就可以成功了一样。基督徒若在这时去打扰他们，实在是有失妥当；女人这时去打扰，也一样不妥。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要是男人连俗事都解决不了，那么男女关系就只能分崩离析了。我甚至犹豫了好久，考虑要不要去看看那些赏心悦目的瓦片？要不要去品味清真寺正面那些斑驳沧桑的拱门？要不要走到里面去？那里像极了一个宽敞明亮的体育馆，专门用来调剂和放松心情。要不要去看看里面的地毯？那都是三百年以来信徒们捐赠的。对于一个被夺去了武器的武士而言，从前的消遣之物就是今天的耻辱。

但我们在萨拉热窝逗留时，也就只有这么一次不太愉悦的经历。其实在这次游历期间，这座城市就像张开双臂，给我们来了个温柔的拥抱，因为所有阶层的人都从穆斯林那儿学到了一种本领，让生活过得尽可能地有滋有味。我们的犹太教朋友虽然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但他们的生活倒过得颇为轻松。他们都尽可能地追求一种惬意的生活，穆罕默德在和平年代就教导自己的子民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去拜访了那位银行家，他的办公楼又宽敞又时新，几乎可以说是摩天大楼了。他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没有丝毫的保留，这倒并非完全出于人情世故，因为他本就是一个十分睿智的人——有时不堪睿智的重负，说话都有些结巴，可能从前犹太教的圣人们也

是这样的吧。除非有证据证明我们不是朋友，否则他宁可拿我们当朋友看。他可不傻，要是有什么证据，他不会视而不见，可他什么也没看出来。

落座后，有人给我们端来几杯饮料，那是一种清甜的草药饮料，不同于其他茶和咖啡之类的饮料。我们发出惊喜的赞叹声，他却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土耳其饮料，凡是在萨拉热窝到我们办公室来的人，我们都会给他们来上一杯。据说有壮阳的作用。"他有些忍俊不禁，但为了礼貌起见，他并没笑出声来。"想象一下，"他说，"上个月有位德国工程师来了，我把这件事跟他说了，结果他去买了两公斤这种草药。真是了不起的民族哪。"他接着又聊起了他生活的城市，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无异于情人眼里的西施，因为他跟任何一个外乡人一样，都为其美丽而心折不已。为了能让我们很好地领略这城市的魅力，他早已从自己的亲戚中挑了两名年轻女子准备带我们去观光，他此时把她们叫了进来。两名女子推门而入。她们身上明显带着斯拉夫人的那种独特的魅力：自由、乐天、满脑袋的奇思妙想；她们谙熟大家闺秀之道，更显得风姿楚楚。她们已经嫁人了，也深爱自己的丈夫，银行家不过是她们的一个亲戚朋友而已，我丈夫也亲口承认，她们给他的感觉，不过如莎翁《皆大欢喜》里的那位侍臣所说的那样："从今以后，在比现世更美好的世界里，我会更渴慕你的爱情，更仰慕你的知识。"可尽管她们严守礼数，银行家和我丈夫依旧浮想联翩：要是能金屋藏娇，养几个穿着丝绸锦缎的小甜心该是怎样的人间乐事啊！她们会躲在格子窗后，娇笑着迈着碎步跑开，只有追到里间，再找上一找，才能把她们找出来；她们会唱着歌儿，弹着古斯勒琴，拿男人打趣，被男人吓倒，然后又拿他们打趣，如此乐此不疲，而旁人也觉得无可厚非。

我记录了一个奇迹。银行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本是个内心冷静审慎的人，不会轻信于人，也不带一丁点儿个人喜好，但关于这件事，我可说是确定无疑。一方面，银行家能力非凡、正直诚信，就算以西方最严苛的标准衡量，他都算得上奋发努力了。另一方面，银行家深谙生活之道，在处理公务之余也不忘享受一番。好几次同那两位女眷外出归来，我们都发现他的办公室里茶香四溢，或咖啡香味扑鼻，有插着牙签的土耳其软糖供人享用，宾主高声谈笑，满室华贵之气。还有一次，我们在银行家的办公室里看到六幅有关萨拉热窝的画作堆放在沙发上、墙角边，那场景好似吉卜赛人驾着大篷车满载着法兰克艺术精品自北而来。这批画是银行家买下的，他极其热爱萨拉热窝这座城市。那两位女士在画作间好奇地来回打量品评，尽情表露个人好恶，透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善变。她们或许厌倦了世人熟知的技法，可毫无疑问，对艺术家而言鼓励创新更为重要。

"这些画如何？"银行家问我。我真希望他没问我这个问题。这些画出自柏林一位犹太难民之手，这位画家情感细腻、工于笔法，然而正是每幅作品

中展现出的这种气质毁了他。运笔浓重、线条苍劲，透出画家的热情与作为清教徒的信仰——清教徒相信如果在创作时倾注全身力量，艺术家必能创造出精品。在这位犹太画家笔下，树木轮廓刚毅，或许如此轮廓需要力量支撑，或许这种刚毅即为不屈不挠的存在，所以即使对树木形状的感知带着些许稚气，他依旧相信这样的作品雄浑有力。而迫使画家背井离乡的法令与这异教观点如出一辙。因为将犹太人赶出德国是一种强势行为，因为它制造伤害与动乱，所以它被奉为强悍有力的治国之道，而只有一个白痴才能看出它将导致国家的种种麻烦。

我如是回答，银行家示意我们夫妻二人跟他一起来到窗边，留下两位女士继续对着画作叽叽喳喳地争论不休。如同圣贤忏悔一般，他凝重地微扬嘴角，说道："我始终记得头一次跟你们见面时说出的那些蠢话。我说，作为犹太人，我乐得在柏林享受平等的待遇，因为自己在萨拉热窝低人一等。那番话太幼稚，好比一个男人正竭力吹嘘自己与某人的友谊时，对方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他是一个愚蠢讨厌的傻瓜。"他顿了顿，看向窗外。那里清真寺林立，铺着瓷砖的集市屋顶、老旧旅社的穹顶隐藏其间；护卫着这座城市的杨树，好似魁梧的土耳其禁卫军士兵复活了一般。"你知道，尽管一个人一生生活在德国，那里却不能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这一点令人不解。但是他还可以回归自己温暖的家园。我很庆幸，萨拉热窝正是我的归宿。"

离开窗边，他伫立在画作前，两位女眷一左一右挽着他，一个声音悠然婉转，建议说银行家一定得将那幅画有小东正教教堂的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另一个则尖声叫嚷，让他必须把它扔掉或是烧掉，或者直接丢给清道夫"独眼马可"。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期许太低。他的办公室里有着土耳其最好的生活；而他的正直品性、对卑微的摒弃，以及解释个人经历时的一本正经，无不透露出德国哲学对身居要职者的最好的影响。人们称呼犹太人为旧衣商，我认为这极为妥当。制作华丽的服饰，稍后丢弃，撒野胡跑，弄得自己满身泥浆，这正是我们这些外族人特有的疯狂，所以周围有些旧衣商也是不错的。

萨拉热窝的犹太人真是一个神奇的族群。布尔布尔和她丈夫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两人是我遇到的最擅长对艺术品做出恰当设计并使之具备慰藉意义的人。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亲戚，血管里流淌的相同血液代表着财富和律法，因为他们来自一个被自由派犹太人称作正统的犹太家庭，对规则的遵守严苛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的父亲，"布尔布尔说道，她的丈夫叫康斯坦丁，人称塞利姆，"是一位如僧侣般生活的犹太人。对他而言，晨曦日暮皆是仪式，他非常强势，认为全世界皆应如此。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正在杜布罗夫尼克海里游泳的塞利姆，一看到站在海滩上的父亲，立马变换泳姿，变得庄重无比，双手异常缓慢地从水中扬起，头向上仰，神

情凝重地望着自己的鼻子。”

这番话颇为可信，塞利姆品德高贵，为人谦逊，好比一件从前辈处继承的衣物，由于前任主人们的反复穿戴，衣服面料已不再僵硬。他个子非常高，却有着他那样身高的人难有的宽肩膀。这种体型很像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塑造的神像，风格固定，体型巨大；他的面部也如雕刻般坚毅，即便上一秒的表情还有着智慧与想象的灵动，下一秒也能满是律法强权，将前者驱散得了无踪迹。与他们夫妻首次外出就餐的那个晚上，塞利姆的一个习惯就让我们印象深刻：一想到重要事情时，即便正走在大街上，他也会突然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讲完。他停下的地点转瞬成为西奈神山，从容不迫的神情和不容置疑的权威让人仿佛看到米开朗琪罗笔下的摩西，米开朗琪罗虽试图将之神化，可摩西作为一个有着分裂与好战意图的异教徒，艺术家很难在自己信守的律法范围内将他充分塑造出来。

夫妇俩一开口说话，魅力更是展露无遗。许多西班牙裔犹太人发音时舌尖音律婉转悠长，这对夫妇更是个中翘楚。出于对西方教义的尊重，塞利姆说话略显拘谨，因为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男性在纠正发音前不大可能音调优美，而单调乏味的发音习惯只要体面合宜，也算男人的个性。而他的妻子说起话来，唇齿之间似有旋律回转，蕴含着动物般的清洁纯净，这就是我们称她为“布尔布尔”的缘故，这个词在波斯语中代表着夜莺。只有愉悦能催生如此嗓音，恰如一砖一瓦才可堆砌成屋。一个人不可能如此讲话，除非他或她热爱着许多其他的声音——风吹动树林、轻拂绿草的声响，乐器发出的色彩斑斓的音符，瓶子里流出的红酒或园中大理石沟渠间淌下的水流的汩汩声——所有这些声音，许多西方人闻所未闻，由于理智的暴政，他们早已腐朽不堪，耳朵不会接收任何不带争论的信息。聆听布尔布尔的话语，你会相信人类重归了创世纪里那个新生洁净的晨曦。她的确颇有造诣，聪慧地将技巧揉入音律之中，将音乐引向完美结局。她运用在闺房里练习的技法，独具匠心，成就了自己的朴素无邪。

布尔布尔不同于西方女性。她美得好似一幅波斯女人的肖像画，那种神采我原以为是艺术创作的惯用手法，如今却不得不承认那是她大而水灵的眼睛、娇艳欲滴的红唇、映衬着白色背景的乌黑长发以及明亮动人的皮肤散发出的炫目光芒。那种光芒好似覆在她身上的透明硬纱，将她笼罩其间加以保护。即使某人碰到她，也不太可能真正接触到她的身体。带着这层保护，她清纯而慷慨，总是急于将快乐带给朋友，即便他们如我们这般初来乍到。在咖啡馆里，如果一位男士端着一盘土耳其甜点经过，除非确信自己能叫他把它端回来让我们品尝一番，否则她会面带戚色。乘车外出时，看见花店正售卖幽谷初生的百合，她会让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去买来一些送给我们，那种坚定的态度我们往往是在自私自利而非利他的情形下看到。把我们带到一间有著名吉卜赛歌手驻唱的咖啡馆后，她才浑身轻松，

像极了一位了解孩子所需并成功取得某件物品的母亲。她不喜四季变换，因为那让她无法充分热情地招待朋友：不是隆冬季节，她没法儿带我们去萨拉热窝的高海拔山区滑雪；不是盛夏时分，她也不能邀请我们去乡间别墅度假。要是有谁狠心地当着她的面说，自己要是有一百万英镑会更加快乐，而她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她会为此而神伤，哪怕知道对方是在开玩笑。

即便如此，布尔布尔也毫不懈怠。她享受生活的愉悦，也努力将这份快乐传递给他人，那份耀眼的纯真同某些女性对享乐的憎恶一样，绝对而纯粹。她接受伊斯兰教教义，明白一个人必须在某一领域对某人绝对忠诚，将其他人完全排除在外，在这一领域内，热情慷慨的本质将得到绝对践行，没有一丝保留。这个领域就是婚姻。丈夫是她的全部，她也跟丈夫以外的人讲话，那人可以是母亲、姐妹、朋友、护士、女性赞助人，但绝不可能是男性。她如虔诚的修女般纯贞，而这份纯贞不是对幸福的放弃，反倒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圆满。丰富的个性让她兼具多面风格。有时，她看上去特别与众不同——当我们站在临街露台俯视街道时，看到她蒙着黑纱在街道上走着，尽管身旁还有十来个与她相同装扮的女性，我们也会立刻喊道："快看，那是布尔布尔。"又有些时候，她是如此传统，努力迎合要求，看上去毫无个性可言，不过是一盏盛满传统的圣杯罢了。

的确，在萨拉热窝你能碰上各式全然陌生的人物。我们曾经在杜布罗夫尼克参观过一家颇具品位的古董店，老板是一位叫哈桑诺维奇的年轻人，我的丈夫在这家店里为我买下了迄今为止我所拥有的最华美的服饰——一件有着一百五十年历史的波斯锦缎礼袍，金色树状图案映衬着一抹浅紫，那其实是一块红酒渍。购买过程十分轻松惬意，好几个晚上，老板都以咖啡款待我们，还让弟弟们拿来班亚卢卡奶酪让我们品尝，那味道同法国普索罗奶酪相似，他们拿了很多，多到像是为了赎清原罪而献出贡品一般。哈桑诺维奇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将我们介绍给他认识，他是萨拉热窝的一位大古董商，随后邀请我们去他位于郊外的坡地别墅做客。

我们来到哈桑诺维奇父亲的别墅，欣赏着这个富裕的穆斯林家庭，他们的房子洁净透亮得如同水晶一般，墙边没有任何笨重的家具，只摆放着几把长沙发椅，挂在墙上的毛毯织物华美至极。我们和这位父亲聊起他儿子及其经营的古董店，还跟他提及在旅行中碰到的有趣现象。一连好几个晚上，我们总能看到有一位不知来自英国、美国还是德国的美女坐在柜台旁饥渴地盯着我们，每晚的女孩都不一样，但她们的眼神却相似，像一头瞪羚正注视着在河里搅弄泥浆的河马，打算等它停下后再跳进河里喝水。老哈桑诺维奇抚弄着自己的山羊胡，用满意的口吻说道："小猫也会捉老鼠。"之后我被引进内室，把这等趣事告诉他的妻子，十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虽然四十出头，却美丽异常，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怡然平和。在我看

来，连她在内，科楚拉的女人都很可怜，她们相信自己通过某些考验而获得幸福，却对亲身参与考验的那份幸运浑然不知。和其他妇女一样，老哈桑诺维奇的妻子也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一个族群需要女性发挥作用时，这些考验才具有意义，而对战争或者现代工业的迷恋注定使这种需要被人彻底遗忘。

可我们对于老哈桑诺维奇先生的最终印象远不止他良好的家庭生活。见面伊始，我便饱受困扰，对他的容貌感到莫名的熟悉，突然，我的丈夫想起之前确实见过他好几次。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于1914年6月28日清晨访问萨拉热窝市政厅时，老先生正是应邀而来准备接见他们的客人之一，那时的他是一位活跃的穆斯林政治家。接见人群站立在市政厅大门两侧，站在最右边的他正好被相机捕捉到，此后这张照片被不断转载，预示着这对身负厄运的夫妇正走向死亡。那一天对老哈桑诺维奇先生而言必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奥地利人以牺牲基督徒为代价对穆斯林施以恩宠，换取穆斯林对自己的狂热支持的做法，被那张照片披露出的人群构成无情地驳斥：那天早晨拍摄的其他照片均反映出，当普林西普被捕时，扑向他的人群全都戴着毡帽。

我认为老先生对那张照片的喜爱应该远甚于对当天的种种经历。当与他熟识并和我们一同前往拜访的朋友同老先生谈起土耳其外长访问一事时，他以公式化的口吻作答，巧妙地遮掩了内心的伤痛和对方提及此事的难堪。令人惊讶的是，无论行家雅士还是市井小民皆对这次访问表现出强烈的失望。可我猜想，如果时光倒流，在爱尔兰出现一位急欲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掌权总统，当他向美国派出外交使者乞求对方抛弃旧的天主教民族主义时，爱尔兰裔美国人受到的伤害应该更大吧，他们甚至会闭上眼睛拒绝接受这一切发生的可能性。这个比较恰如其分，因为这里就好比位于美国小镇上的一间爱尔兰病房，人们意识到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行动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反应都将催生出相当强大的政治体，它像一台放置在地下室的蒸馏器，在屋子底下悄然运转。

但是，即便是同一段历史，它对待各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萨拉热窝市场每周三开市，位于城市中心一个破旧的空旷地带，靠近传统集市，周围大部分是糕点店，专营菠菜馅或肉馅的大车轮饼。乡下人不多，他们天亮后才开始陆续抵达，这一过程一直要持续到早上十一点，因为他们从家里出发需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市场。越来越多的鸽子选择在市场里的两间小售货亭顶部筑巢栖息。市场按照货品种类划分区域：这边贩卖粮食谷物，那边出售羊毛制品，比你想象中的更多的人在出售天平；还有专营鱼干、腌肉的货摊，鱼干、腌肉起源于中世纪，闻起来腐臭不已，被制成大块出售。在市场的尽头还有刺绣等物品，可都是讨厌的机器对当地手工织物的复制罢了。市场里有很多穆斯林妇女，基督徒也随处可见，人数还不少，

相较穆斯林可能更多。这些基督徒看上去都好似英雄一般。

男人们的打扮最是精致，深红色的头巾绕过头和咽喉位置。这身装束表示他们来自高山村落，那里的大风夹杂着山顶积雪呼啸掠过；有时，头巾还有另一个作用，因为在很多类似的高山村落里流行着一种叫作甲状腺肿大的疾病。这些男人自诩为黑盗客的后代。黑盗客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一群在高原山地避难的基督徒，他们于每年圣乔治日当天下山抢劫各个村落里的土耳其人，因为那时树木繁盛茂密，足以藏身。他们相信只有坚持《旧约》指明的道路，人才能到达至高的位置。我始终无法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者为何会轻视自己在这一地区碰到的穆斯林或者基督教农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波斯尼亚人都能让旅行者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这些人异常高大强壮，步履稳健，结合着优雅与力量。他们肤色黝黑，颧骨突出，蓄着长长的八字胡。他们身穿带有厚重装饰的土布外衣，系着彩色腰带（通常是跟头饰一样的深红色），传统的波斯尼亚衣袋位于两腿中间部位，勾勒出臀部和身体侧面的轮廓，皮制的鞋子在脚尖处向上尖尖卷起。这群波斯尼亚人好似穿着铠甲一般，彰显着其好战精神。我听人说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强大得可怕。女人们必须服侍男人用餐，必须不时地挨顿好打，必须一直工作到死，哪怕怀着孩子也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儿，必须在男人骑马时快步跟随。

可我对此又有些许困惑。看起来上帝似乎并不存在？所有真实可信的证据都显示，传闻中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丁点儿受压迫的样子。和男人们一样，她们体态优美健壮——但和男性的漂亮体格不同。一位阅历丰富的牧羊人曾经告诉我，就他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他们一样充分懂得男女平等的价值。当男人们展现男子气概时，女人们会变得坚毅，而当女人们表现出女子风韵时，男人们也会柔软许多。此番理论在这里不断得到证实。这里的女人关注的英雄是男性而非女性，她们身材高大，美貌被遮挡得严严实实。但是，我敢打赌，她们的精神是自由的。她们通过了我了解的那些重要考验。首先，即便韶华逝去，她们依旧保持快乐的心情。同巴尔干地区所有市场一样，这个市场里的老年妇女远远多于年轻女孩；市场为一群中老年妇女开设了一个专门区域，女人们穿着自己用手工土布制成的波斯尼亚马裤站在路边，交换着各个村里的八卦消息。我没有在她们任何人的脸上看到饥饿或是悔恨。虽然她们看上去个个都对艰难困苦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也能看出人生阅历让她们坚信此生的价值。

有一点，据我们观察，表现得相当明显，那就是这些女人能够很好地满足个人基本需求。这并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她们跟自己男人的夫妻生活有多么地和谐融洽。许多十六岁出嫁并育有一大堆子女的拉丁美洲妇女看上去就体形臃肿、神情萎靡。和所有其他物欲经历一样，性的价值由精神所决定；对自由的偏好顽固地影响着大脑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妇女

从未被奴役。她们拥有自由的印记；她们拥有智慧。这不仅仅反映在她们肆意狂笑、嘲弄揶揄的行为上。女人们并不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她们也会时不时地参加一些华丽正式的宴会。市场里的年轻女子本就不多，我们看到其中一位找到她的两位长辈：她扬起光洁的小脸凑到对方唇边，后者吻了吻她的脸颊，随后女子俯下身来轻吻她们的手。优雅如凡尔赛的宫廷礼仪也不过如此。她们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智慧高贵异常。

我们跟在其中一位女士后面，毫无疑问，她就是今世的伏尔泰。她几乎是一位女巨人；灰色偏红的头发随意垂在耳际，发型看似凌乱，但远胜梳得整齐垂顺，这是一种对宇宙的痴迷，让人不愿为存在的简单力学浪费哪怕一秒时间，围巾下的头发用一根干净的白布条扎起，围巾绕过下巴，固定在头顶位置；深色裙装配白色粗麻布袖套，外罩绿色天鹅绒夹克，干净整洁，奔放不羁。她在市场内到处闲逛，走路姿势像极了男人，看到有趣的事情会不时地停下脚步。玩笑为她的面部带来些许表情，好似投入水中的石块打破了一池寂静。开口大笑间竟让人瞥见她口中仅有的一颗牙齿。眼珠一转，她转身来到市场低矮一侧，然后一边慢慢往回走，一边将刚刚碰到的好玩事情说给沿途碰到的每个女人听。我不住地骂自己，因为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能确定：一讲到笑话，她的发音就会更加尖细短促，引来笑声一片。一路走回市场上方，听众变得所剩无几，一抹空虚茫然袭来，她会不安地在货摊间徘徊，直到发现能够展现个人智慧的又一个机会。

不只是鹤立鸡群。那位女士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她的聪慧，更在于她聪慧的程度。不久，我们在附近街道一角发现了一条过道，卖完东西的女人慵懒地站在那里等公共汽车。我们也凑上前去站着，与她们隔着一段距离，表现出一副正在等人而对周围情形漠不关心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用耳朵记录下了她们真实的谈话方式，虽然我们对那些词汇一无所知，那种睿智的气息仍清晰可辨。这些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国人所谓的文明社会测试：她们能够实践大众交流之艺术。音节彼此完美相接；谈话的调性明暗交替，嘲弄的批评纠正了冷静的判断，又有另一次裁决紧随其后，而一手好牌常因一阵笑声散落满桌，游戏不得不重新开始。

这些女人都不识字。当一个男孩拿着一份巴蒂亚鞋的广告经过时，她们得请一位熟识的男人为她们念出来。她们也因此没有承受任何因权利被剥夺而产生的痛苦。任何一位合格的作家都知道，仅有极小一部分的文学作品能够更多而非部分地弥补人们因学习阅读而经历的伤害。这些女人充分利用手中资源，成为自己的艺术家。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民谣讲述着一种细腻而富于诗意的生活状态，认真观察任何一个群体也能发现这一点。我留意过两位老妇一段时间，她们沿着这条过道走向俱乐部时被一个高个子老男人给拦住了，即便这里遍地英才，那男人在人生得意时也必定是出色

的。他将手杖挥舞得如同权杖一般，跟她们讲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因为对方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老妇们方能毫不掩饰自己的表情。太过自恋遮蔽了男人的美貌，人生风光时他无疑也曾是个英俊无比的帅哥。老妇们笑得虽不刺耳，却也透出些许信息。她们与他相识已久：她们知道，三十年前，当他说自己在津渡宪兵部当差时，他其实并没多大胆量；她们也知道后来在要塞的残垣断壁间遭遇土耳其人时，他勇敢了许多；她们记得他风光富裕的岁月，也知晓他穷困潦倒的时光。她们听到过村子里流传的那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她们用宽容怜悯、公平正义之心评判他，这正是自由精神之体现。待男人讲完故事，她们适时给予笑容来奉承，好像他们三人依旧年轻。

我怀疑这些女人其实并非真的被男人奴役，不过是使了些伎俩欺骗男人支持自己的自由精神罢了。男人们确实有些胆怯，生性容易沮丧，不乐意干那些经证实女人们也能干好的事情。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衰退就痛苦地揭示出这一点：让妻子惊讶的是，男人失业后，一旦她们自己找到工作，她们便得背负起养家的重任，自此再无好运可言。因为她们的丈夫要么愤怒地针对自己，成为敌人，要么堕落放任，如婴儿般完全依赖自己，不再工作。可要是女人们假装自己比男人地位低下，无法代替他们出去工作，并通过一些独特的仪式象征性地贬低自己，比如让男人们先享用食物，并随侍在旁，男人们便定会竭尽全力继续工作，断然不会费心阻挠这些地位低下的女人们的思想言行。

这样做风险巨大。它将婚姻变成一场赌博，因为那些谦卑的行为包含了对一系列经济与公民权利的放弃，仁慈温柔的丈夫绝不会占妻子的便宜——这适合绝大多数丈夫——但内心恶毒的丈夫却将贪婪无度地对妻子进行剥削。即便身处现代工业世界，这场交易仍是徒劳，它只在妻子唯有打击丈夫自信心这样一种手段的情形下才是有益的。在西方文明世界里，工作的不稳定与职场的虚伪让男人们精力不再充沛，无法通过女性竞争对手的退出来恢复原始能力，而女性也不能从自我牺牲中获取任何好处。事实是，合同里只有甲方，没有乙方。此外，在西方社会，婚姻的赌注可能让人损失巨大。跟一个踏上火车去异地求职的男人相比，一个与村庄紧密联系、不离开土地就无法摆脱妻子的男人其实并不危险。不过，对这种刻意为之的卑鄙行为的最大反对来自这样一个观点：就女性而言，这种行为是有意识的欺骗，而人类只有彼此真诚，生活才能顺利向前。尽管如此，在这个折中妥协的世界里，荣誉对成功人士而言都是应有的权利，它催生了外形冷酷、内心快乐的男人与昂首阔步、肆意大笑的女人，这些女人听从天性的指挥，而非男性的命令。

萨拉热窝V

一天早晨，我们漫步在河边，一道耀眼的光线从澄净的天空射下，投映在积水中。一个穆斯林男孩抱着满满一捧新鲜润泽的紫丁香向我们兜售。一只鸽子在积水中抖动翅膀，清洗身体，四溅的水珠如同钻石一般。“春天到了，”康斯坦丁说，“我想明天我们去伊利扎旅行，应该会是个好天气，后天去亚伊采天气会更好。是的，天气会很晴朗，一切都会很美好。”对国家感到满意时，他会迈着列队行进般的步伐，肚子向前凸出，像极了一位怀孕的母亲。“但是看看那天晚上告诉你们的那些事情吧，”当我们走向河堤看到市政厅时，他对我们说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穆斯林屈居于奥地利人之下。看看这栋建筑，自从土耳其人被驱逐出波斯尼亚后，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穆斯林却把它当作清真寺使用。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也否认了自己的信仰。”

事实上，穆斯林最有理由抱怨这座市政厅，因为他们在萨拉热窝的建筑风格一贯精致美丽、持重又富于亲和力，即使到了现代，也忠于传统。可是这座市政厅却由一位奥地利建筑师设计。它色彩粗糙，有一个笨重的两层楼高的凉廊以及严重磨损的拱门，建筑物布满了小小的圆形窗户，显现其富裕程度远胜洗礼盆中的贪婪，而带有精巧纹饰的飞檐呈现出一种低劣版本的东方特质。旁边的清真寺宣礼塔则像一只盯着狗出洋相的猫。

然而，市政厅内部却一派和谐，并尤为敞亮；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旅游局，由一位刚步入中年且对这座城市充满热爱的男人负责管理。他一会儿给我们分发关于这座城市的照片，一会儿又停下来洋洋得意地欣赏那些照片，当听到康斯坦丁说，“请带这些英国人参观那间曾经举行过接见仪式的房间吧，那次接见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大公夫人为同胞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停止了照片分发。仿佛受到称赞一般，旅游局局长朝我们深鞠一躬，然后引我们来到一个中央大厅。大厅里有一个戴着毡帽的男子，一个穿着黑色灯笼裤的女人，还有一对贫困却令人尊敬的老夫妇正在慢吞吞地爬楼梯，很难看出这对夫妇是否来自南肯辛顿，还有一个年轻男子正拿着古斯勒琴下楼，要不是他拿着那把琴，他肯定会被当成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我们走进在穆斯林典礼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会议厅。“在这里的都是穆斯林，”旅游局局长说道，“即便我们现在是南斯拉夫人，市长也还是由穆斯林担任，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穆斯林由此获得慰藉。这对我们或许有好处，可即使对我们没有一点儿帮助，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不管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也不管我们为这座城市做了什么——虽然我们正在为它创造美好——最初建造这座城市的天才是穆斯林，除了穆斯林，还是穆斯林。”

这三个接见室正如其外观一般奢华。它们模仿君士坦丁堡的某些著名建筑，装饰得既迂腐又荒唐，拱顶好似镀金的蜂巢，拱顶与金光耀眼的柱子间形成的凹槽仿佛倒立的罗马烛台。这可以被视作华丽的复制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抄袭者无法从骨子里理解华丽的精髓。这种建筑的视觉冲击令我头晕目眩。我闭上双眼，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眼下，这种眩晕的感觉让我感到这世界确实在天旋地转。

“这就是我和我父亲当时所站位置，”旅游局局长说，“父亲同众人一道在一楼大厅迎接大公夫妇，看到大公红着脸怒气冲天地走了进来。因为刚刚一个叫查布里诺维奇的年轻人在河堤附近向大公投掷了一枚炸弹，炸伤了他的副官。当倒霉的市长开始致欢迎辞时，大公用一种尖锐的声调高声喊道：‘一切都糟透了，我花钱到这里旅行，而你们却向我扔炸弹，这是一种暴行。’这时，大公夫人轻声安抚，他才冷静下来说：‘嗯，没事了，你继续说吧。’但在市长结束讲话时又出现另一番场景，轮到大公致辞，带着发言稿的秘书却不知所踪。后来大公终于拿到发言稿了，却又像疯了一样，因为那手稿上溅满了副官的鲜血。

“尽管如此，大公还是坚持念完了发言稿，然后与大公夫人一起来到楼上的接见室。在这种令人惊恐的情形下，父亲走到我身边，紧攥着我的手，带着我跟在后面。这时，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公，但并不是像注视着一位主宰者那样。我们觉得他完全不像一名皇室成员，因为他看起来如此奇怪——像踏正步一般，高抬起脚，阔步行走。我觉得他在掩饰内心的恐慌。

“我跟你说，那完全不像接见。大公跟军事长官波蒂奥雷克将军谈话，嘲笑对方无能，无法维持秩序。我们沉默了，不是因为他打动了我们，而是因为他不再是那个波斯尼亚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令大家尴尬的是，我们都清楚他一旦外出就将被刺杀的事实。不，这不是一件已被公之于众的事情。可我们都知道人们怎样看待他跟奥地利人，我们也了解，如果一个人扔出一颗炸弹失败了，会有另一个人接着扔炸弹，如果又失败了，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人继续下去。告诉你，这让我对这次接见产生了一种异样情绪。接着我记得他走到露台——然后——俯瞰着整座萨拉热窝城。是的，他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手搭在栏杆上。”

露台前面，小镇景色在河对面的一个缓坡上慢慢浮现。挺拔的杨树林间矗立着坚固的城镇建筑，白色别墅群建在更高的果林中，而最高的还得是穆斯林的白色圆柱体墓碑，斜插在茂密粗糙的草地上，就像飞镖穿过镖板般醒目。杉木林则与崖壁相会于天际。在弗朗茨·斐迪南眼中，这城镇美景最是让人心旷神怡，尽管已是6月，却雨水充沛。可如果就此臆测这般美景给他带来了快乐，又是极不正确的。他从根本上属于哈布斯堡王朝，那就是说，血统总能让他的关心从自然转向人为，即使这比任何原始事物更为

可怕。在他看到奥地利人为了满足守备部队和派驻官员的需要而在前方某处修建的大型啤酒厂时，弗朗茨·斐迪南或许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些在波斯尼亚随处可见的啤酒厂反映了奥地利外交政策中的侵略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卑劣后果。然而当这里还属于土耳其的时候，和政府官员有来往的投机商人们就意识到了奥地利的占领和吞并计划，于是建立了这些啤酒厂。这些人还为冒犯当地资源给出合理的理由。在这里喝啤酒是非常没必要的，因为这里有很多价廉物美的红酒。可奥地利人的就是好，而斯拉夫人的就是差。

说弗朗茨·斐迪南远离自然并不公平。在他身后的房间里，很多人带着一颗客观的敬畏之心看着他，这种心情由任何一个将死之人引发。但这种敬畏也可以认为是由拥挤造成，到底有多拥挤，那就只能由那些决定有多少天使在针尖上起舞的人和那些死在他枪下的无数鸟兽冤魂决定了。他是一名出色的狩猎者，这对男人而言是件好事，他的眼疾手快以及任何时候都能吃苦耐劳就是证明。但是弗朗茨·斐迪南却将这种天赋用于凶残屠杀。他喜欢杀戮，除了杀戮还是杀戮，杀戮的目的和那些为了觅食而狩猎或者那些追求原始生活以牢记狩猎的最初目的的人不同。那把为他量身定制的曼利夏步枪使他在狩猎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德国皇帝威廉举办的一次野猪狩猎比赛中，六十头野猪被同时放出来，弗朗茨·斐迪南就以杀死五十九头野猪和射伤最后一头野猪腿部的成绩斩获桂冠。在捷克城堡举行的为期一天的赛事中，他将2150个小型项目的奖牌收入囊中。在被刺杀前，他还表达过自己对于猎杀了第三千只牡鹿的满足。

他用残忍的屠杀表达对几乎整个世界的怨恨。更准确地说，除了他的妻儿，他反抗全世界。他感到自己遭到了生活的背叛，长期跟慢性危险疾病做抗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令人不解的是，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弗朗茨·斐迪南都用尽半生时间与肺结核做斗争。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由于环境所迫而一直痛苦着，亚历山大却没有陷于这样的境遇。操纵哈布斯堡皇室宫廷的那些目无法纪又残忍的官员们专门针对他。这些年来，弗朗茨·斐迪南好像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皇室总管认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为了得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对自己财务管理的褒奖便削减了他的开支。尽管弗朗茨·斐迪南继承了很多艺术精品，但这个可怜人却只有微薄的津贴，甚至他的医生获得的也是过低的报酬，并备受侮辱。这种不公对待直到他的健康明显恢复后才结束，而此时的他已被仇恨笼罩，尽管不能射杀敌人，但心里的怨恨总能在射杀动物的过程中得到些许释放。

弗朗茨·斐迪南对这种做法并无任何愧疚之心。他是一个不知道亲切优雅为何物的男人。例如，普法战争前，他就曾与汉高·多纳司马克伯爵有过纠纷，这位德国贵族年轻时曾是一位驻巴黎的狂妄外交官，在巴黎协商赔偿条款时与妓女拉·帕伊瓦的婚事震惊了世界，此后性格逐渐变得沉稳，成为

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这位长者在西里西亚购置了地产，并通过出售这片土地上成熟的木材以及实施详细的再造林计划来赚回本钱。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猎物容易对树苗造成损害，基于这样的想法，汉高·多纳司马克伯爵将它租给大公以收取租金。由于大公让猎物数量大大增加，致使树苗完全没有成长的可能，伯爵当然有理由提高租金。就是这位大公，在皇室成员里常常见得到的那种对金钱态度反复无常之人，认为这种行为是毫无意义的贪婪之举。他一边通知伯爵自己要结束租约，一边把这片地域作为狩猎场所加以破坏以示惩罚。在余下的日子里，他忙着组织狩猎，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猎物驱赶至枪下，被枪杀的猎物数量之巨大，以至于大屠杀在其面前也毫无意义，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迷乱的人们已然忘记自己正在杀戮。然而，大公和他的手下也发现生命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胜于他，于是将一部分狩猎任务交给一位维也纳制造商，除了同样爱好杀伐，此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还不够，猎手们不顾狩猎限制，不择手段地准备杀光余下的所有动物。林中的生命仍然一息尚存，因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们还在踩踏着遍野的蕨类植物，轻晃着树木枝条，大公为此几度怒火中烧，以致呕吐、腹痛，令观者恶心不已。

由此可以设想，被圣朱利安医院牧师残忍杀死的猎物在牧师即将完成使命杀害生身父母的当晚出现在其面前，那么按照弗朗茨·斐迪南的计算，五十万死于他枪下的野兽也会在那天出现在萨拉热窝的接见大厅里。你能想象，那么一个空间，从地上直至深红色与金色相间的穹顶，各种毛皮与羽毛的幽灵充塞其间，仿佛是直达穹顶的钟乳石，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一只只雄鹿，它们鹿角的空隙里挤满山鹬、鹌鹑、野鸡、鹧鸪、雷鸟，等等；一头头野猪，毛发竖立，胁腹贴着胁腹，宽阔的肚腹下面的空间里，层层叠叠挤压着各种兔子。这些动物的眼睛清澈而漆黑如水，它们将欢快地看着屠杀它们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一如当初它们自己那番模样。作为一名伟大的猎手，弗朗茨·斐迪南不仅枪法卓越，围猎能力也一流。他尤其以自己为捕捉野兔的技巧做出的改进为傲：助猎者呈梨形编队，将所有野兔驱赶到他所在的方向，让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比其他猎手收获更多猎物。没有任何一只野兽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智慧从这种围猎中逃脱，哪怕是同类中的天才也不能。对猎物而言，天地被助猎者们缩小为一个小点，到那里必死无疑；所以它们和他在一起。如果奇迹出现，即使他转过身来对着身后满屋子的人发表演讲，一改往常的侵略性，让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受难同胞，他们也无法拯救他。如果奇迹出现，即使他那反应迟钝的愚笨头脑变得聪慧敏捷，它也无法为他指明一条生路逃出萨拉热窝。很久以前，他和他血管中流淌的血液已经将助猎者们放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他们一路驱赶着他，把他的世界缩窄为一个小点，普林西普的子弹在那里等待着他。

弗朗茨·斐迪南的母亲是眼窝凹陷的阿农吉亚塔，外祖父是西西里王国国王

邦巴，这位国王是波旁王朝中最糟糕的白痴暴君之一，在1848年后对臣民进行大屠杀，最终被逐出那不勒斯，退隐到一个军事堡垒中，继续像中世纪专制君主般生活，直到50年代末期。国王将肺结核和固执、偏激、怀疑的脾性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憎恶都给了弗朗茨·斐迪南，让他心怀侵略的欲望，与哈布斯堡皇室的狭隘、目无法纪结合在一起，终使他成为脱离皇室就不能生存的人。在他为了自己的肺部健康去埃及度过整个冬天期间，在他看来很有必要，且了解他的人也对之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的是，他侮辱了奥地利大使。二十多岁时，他在朝野已经到处树敌，放纵、无知的政治怨恨使得他的敌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憎恨匈牙利，科苏特这个名字令他尤其愤怒。当他接见一个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尽管他不信任他们，他还是跟对方谈起匈牙利人："就绅士而言，这些人来到了欧洲真是件粗俗不堪的事。"这句话无疑是历史上皇室言行失当的典范。

他梦想着用三位一体君主制取代二元君主制，在这一政体中，德国与捷克构成第一部分，匈牙利构成第二部分，而南斯拉夫构成第三部分——包括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那。这让克罗地亚人满意。只有他们满意。多数德裔奥地利人会因与捷克人联合且与南斯拉夫人享受同等待遇而恼怒；匈牙利会因失去对南斯拉夫的掌控而愤怒不已；非天主教的南斯拉夫人则既害怕成为天主教的传教对象，又憎恨自己与塞尔维亚联盟的雄心壮志就此被斩断。因此，在这个方案中，他树敌众多。即使后来及时放弃了这个方案，他也不能通过公开表明心意的方式迅速化敌为友。由于他是王位的继承者，他只能通过缓和的方式与私下沟通来宣布他的政策。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过于微妙而不便公开谈论的理由促使他放弃了三位一体的君主制计划。为了在堂兄弗雷德里克大公和伊莎贝拉大公夫人所生的众多女儿中挑选心仪的新娘，1889年，时年三十三岁的他礼节性地拜访了他们在捷克的家。然而，他却爱上了大公夫人的侍女。那位女士二十三岁，名叫索菲·霍泰克，出身贵族却生活贫穷。他不顾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强烈反对，坚持与她结婚，皇帝向他指出，根据哈布斯堡皇室法律——君主政体的秘密法规——出身卑微的女性不能登上宝座成为皇帝的妻子。

这不是一个是否给予许可的问题，而是一条既定的法律。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坚持娶索菲，那么他必须按照贵贱通婚的方式为他们婚姻中尚未出生的孩子放弃所有的继承权；他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娶她，好比一个妻子在世且没有离婚的男子无法娶第二个女人一样，尽管这样做只是违反了王朝的不成文规定，并未触犯公开的律法。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缓和了这个严厉的判决。年轻的科苏特公开宣称，根据匈牙利法律，当大公登基时，他的妻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将成为匈牙利的皇后，他们的孩子也必须享有完整的继承权。虽然不喜欢匈牙利人，但这还是减少了弗朗茨·斐迪南对匈牙利

这个国家的厌恶之感。他仍然打算修改奥匈帝国的宪法机制，但不再那样严厉地惩罚匈牙利人，将他们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剥离开来。但这不是他能公然宣称的原因。其次，出于外交理由，他也不能承认自己越来越害怕塞尔维亚日趋强大的力量。他忧心忡忡，唯恐南斯拉夫各省份形成联盟会勾起塞尔维亚的野心，并使它获得目标一致的盟友。所以，随着这项不得人心的政策的颁布以及随后的无力撤销，第一批助猎者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围猎行动。

他的婚姻为他人树立了标杆。弗朗茨·斐迪南脑子迟钝，无法理解保持一致的必要性。这明显表现在他热衷收集古玩的爱好上：只要是古董，他就会不加区别地积极买下。有一次，他去参观一座乡村教堂，一位头脑简单的牧师向他吹嘘自己跟一位犹太商人做成了一笔漂亮买卖，那个犹太人用一个崭新的圣坛跟他交换破旧的圣坛。弗朗茨·斐迪南立刻坐下给教区主教写信，请求主教下令教区内的牧师不准变卖教堂财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正是这个命令阻止了一笔亵渎神灵的交易——他希望购买一块墓碑放置在他的私人教堂里。关于婚姻，他也表现出一种相似的不一致性。他的一生建立在赋予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特权之上，因为哈布斯堡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其纯正血统，为整个奥地利所珍视。他无法理解的是，正是因为这种纯正为特权提供了理由，所以那些玷污了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人无法享受特权。妻儿无法享有皇室荣誉，他将之视为对自己的侮辱，一种痛苦的、无缘由的伤害。

他的不一致性并未就此结束。他本身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目无法纪的典型，然而当皇室成员和朝廷官员们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婚姻时，他却无法体谅对方。他确有憎恨的正当目标，一个和他同样奇怪的角色。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宫廷大臣，蒙特诺佛亲王，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奇怪的欧洲人之一；他是莎士比亚在最后一刻决定不用在《李尔王》或《奥赛罗》里的角色，这个角色被粗心地搁置以致其变幻为现实中的人。他是一位兼具高雅品位与审美勇气的男士，庇护着维也纳的艺术家们对抗冷漠的朝廷和鲁莽的资产阶级。他尤其喜欢奥地利音乐家马勒指挥的爱乐乐团，给予其特别关照。但他的父亲是可怜人玛丽·路易斯的私生子——后世历史学家们并不支持她与拿破仑的政治联姻完美幸福的观点，后来她在奈佩格男爵怀里寻求庇护。作为显贵的私生子，他父亲跟其他婚生子女同享尊贵，可这种高贵偏偏又只能体现在婚生子女的纯正血统上，这种热情而诗意的恶性疯狂让这位富于想象力的男人迷惑不解。他反复观察着哈布斯堡皇室礼节的各个规定，仿佛看着一壶如果精心调制、改换配方，便能让人长生不老的毒药。职责使然，当他需要对王位继承人那贵贱通婚的妻子出席宫廷典礼做出必要的调整时，“现在轮到马钱子碱（布鲁生）了”，他一定会这么说。索菲伯爵夫人被完全排除在奥地利宫廷事务之外；她不能陪同丈夫一起出席为外国皇室举行的家族聚会及宴会，或者那些高级宫廷舞会；即使在被

允许参加的半公开宫廷舞会上，她的丈夫也不得不让一位大公夫人挽着他的胳膊走在队列的最前方，而她则被迫跟在最后面，站在最年轻的公主后面。皇帝竭尽所能地缓和状况，他将索菲封为霍恩贝格女公爵。但饱受困扰的蒙特诺佛依旧在她身边徘徊，抓住一切可能不遗余力地羞辱她，没有什么事情比阻止她乘坐宫廷四轮马车或是将她出席任何场合时的礼仪和随从减少到最低限度更让他开心的了。

要是弗朗茨·斐迪南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就能博取众人同情来慰藉自己和夫人经受的苦难，可他的行为注定令人厌恶。当他的兄弟，费迪南·查尔斯，一个拥有富于文学品味的高雅灵魂却注定因为肺痨而英年早逝的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出身并不显贵的女人时，弗朗茨·斐迪南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段婚姻，还跟病中的兄弟激烈争吵。当听到别人指出他自己也是为了爱情而结婚时，弗朗茨·斐迪南愤怒地回答说这两件事根本不具备可比性，因为索菲·霍泰克出身贵族而他兄弟的妻子不过是一名大学教授的女儿罢了。如此性情，如此缺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人情味，令他被所有朋友孤立。因此，他用党羽取而代之。欧根亲王修建的宏伟华丽的美景宫成为他在维也纳的寓所。这座宫殿也随之成为历史学家库比克所说的影子政府的核心。他任命自己的军事大臣，而对待侄子总是异常亲切宽容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此时显然并不老练，将自己手中的军权交付给了那位军事大臣。这位大臣负责的不仅仅是军事事务。多亏了朝廷的愚蠢和恶劣行径，弗朗茨·斐迪南才能将奥地利境内那些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忽视或者排斥的有识之士纷纷纳入麾下，这些人在才能上不容小觑，在数量上更加不可轻视。在弗朗茨·斐迪南的帮助下，这些人一点一点地与皇帝的温和政策抗争，以折中的方式帮助了他实现他的信仰；他们甚至为他起草了一份防止奥匈帝国分裂的被草率称为改革的计划，一旦弗朗茨·约瑟夫逝世，弗朗茨·斐迪南登上王座，这个计划就将实施。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成为更多助猎者的目标。它自然激起弗朗茨·约瑟夫王朝所有人的憎恨，而他的很多下属也变成他公开或隐秘的敌人。他越来越不受欢迎。一想到自己的后代无法继承皇室的未来，他就变得异常卑鄙贪婪，行事也越发乖张傲慢。小人物对他心存怨念，大人物对他心怀猜疑。他们都意识到，虽然当其他人对此视而不见时，他能精明地看出奥匈帝国正在瓦解，但究其根本，他是愚蠢又残酷的，对他来说，一切不过是恰当选择统治对象的问题而已。一些人害怕他会施行中世纪的镇压政策；另一些人则担心特殊利益受损，特别是在匈牙利，这里必然遵循帝国重组的安排。当德国的威廉皇帝对弗朗茨·斐迪南的兴趣越来越明显，甚至曾去弗朗茨的乡间别墅拜访他并与之在重大事件上长时间交谈时，此类恐惧持续增加。最近一次拜访就发生在大公准备前往萨拉热窝的两星期前。据传闻，在那一次，德国皇帝向弗朗茨·斐迪南阐释了重组欧洲版图的计划。奥匈帝国与日耳曼帝国结为盟友，弗朗茨·斐迪南的大儿子将成为横跨波罗的海与

黑海的新波兰王国国王，小儿子被指定为弗朗茨·斐迪南的法定继承人，兼任波希米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他的侄子查尔斯则留在德意志奥地利当国王。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时刻，德国皇帝威廉的脑海中有很多重要计划，如若不然，他断然不会上门拜访。确切可知的是，弗朗茨·斐迪南当时必然严厉抨击了匈牙利的贵族阶层。而更可以肯定的是，此番言论被德国皇帝转述给了第三人。

比起四处树敌，弗朗茨·斐迪南的行为还对他造成了更糟糕的影响。他让随时可能翻脸为敌的黑帮之流成为朋友，而对朋友的深入了解便可成为这些人手中的致命武器。弗朗茨·斐迪南的智慧突出表现在对某种潜在威胁的洞察力。1907年，他察觉出时为奥地利某部长的埃伦塔尔，一个聪明的骗子，已经成功地将帝国临时占领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转变成其他大国的兼并对象。既然埃伦塔尔在弥留之际举荐贝希托尔德继承他的职位，那么那个无能的战争分子也算得上是弗朗茨·斐迪南计划中的一颗棋子了。但是，他最器重的人还是亲自任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此人毫无怜悯之心，不但自诩为伟大的士兵，还自认是个政客，一心想主导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一直认为必须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这样方能保全奥匈帝国。“恐怕我们的宿敌已经强化军备，正蓄势待发准备出击奥匈帝国，”他在一份1907年呈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此后还有很多这样的内容，“我们必须抢抓先机对脆弱的敌人进行清算。”七年间，这种痴迷幻想终趋狂热。明确表示“施行温和政策”、绝不允许发动进攻战争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获得埃伦塔尔支持，于1911年黜免了康拉德的职务，改任他为军事监察长。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党羽仍然支持他，包括数量众多的实业家、银行家、记者和政客，他们对战前维也纳的颓败堕落十分清楚。贝希托尔德对康拉德印象深刻，于1912年命他再次出任总参谋长一职。康拉德向贝希托尔德鼓吹着同样的信条。“摆脱困境的方法，”他在给贝希托尔德的信中写道，“就是不计后果地击败塞尔维亚。”

而此时弗朗茨·斐迪南的看法却发生了改变。他受德国皇帝的影响越来越深，而此时德国无意战争，特别是以巴尔干半岛为借口的战争。他钦佩德国人，认为德国人也许对此类事务很在行。康拉德被激怒了，他认为弗朗茨·斐迪南应该说服德国支持奥地利，这样即使对塞尔维亚的攻击蔓延成一场大范围的冲突，他也能感到胜券在握，这说明康德拉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贝希托尔德在1913年却不得不告诉康拉德：“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坚决反对战争。”此时的康拉德因为绝望变得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他对贝希托尔德的影响力足以让后者拒绝会晤到维也纳参与谈判的塞尔维亚首相，这次谈判涵盖所有可能产生争议的问题。他还说服贝希托尔德拒绝接受由皇帝和大公提出的所有温和条件。这滔天大罪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去咒骂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始作俑者。然而，康拉德本性难移，1913年，他利用一件发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微不

足道的事件试图令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调动军队对抗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弗朗茨·约瑟夫，高压政治的产物，一位有着非凡坚定信念的八十七岁老人，无声地抵抗着，即使贝希托尔德支持康拉德。这一次，弗朗茨·斐迪南与老皇帝站在一起。

不久，另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削弱了康拉德手中的筹码。雷德尔上校，既是布拉格兵团的总参谋长，又曾经担任过奥地利间谍活动的首领，在俄罗斯服役期间间谍身份暴露。他还是一名同性恋者，被勒索者操控。军官同僚给了他一把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让他自杀。这次事件令弗朗茨·斐迪南对康拉德愤怒至极，认为他需要为雷德尔在间谍部门就职和其死亡方式负责。他的愤怒一方面出于道德理性，即认为一个同性恋者不应被给予这样的职位；另一方面则来自这类人被勒索后承担的特殊责任，这冒犯了他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任何人都不应被迫自杀。将最后一点归咎于康拉德实属不公平，因为当军人犯下可耻罪行时，用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结束生命是一条明确的军规。至此，弗朗茨·斐迪南和康拉德成了敌人。

两人的敌对在1913年的秋后表现得确定无疑。在波希米亚的陆军演习中，弗朗茨·斐迪南狠狠地羞辱了从前的挚友，却又断然拒绝后者的辞呈。然而，他明确表示拒绝的唯一原因在于担心康拉德的辞职会在公众心中造成不良影响。1914年6月，康拉德极度绝望，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对这个男人都心怀怨恨，这个男人既羞辱了自己又拒绝参与战争对付塞尔维亚，而这场战争在康拉德看来对于拯救祖国十分必要。

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的一点是，康拉德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人。他本人曾讲述了一次与贝希托尔德关于德国威廉亲王的谈话——亲王被派往阿尔巴尼亚担任国王。“希望不会发生意外。”贝希托尔德说。“如果真发生点儿什么，我们该怎么做？”“什么也不做。”“被暗杀了怎么办？”贝希托尔德又问。“即便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还是什么都不能做，”康拉德说，“会有人接替他登上王位的。只要不受外国势力影响，谁登上王位对我们来说都是合适的。”当意识到他们刚刚拒绝了威廉亲王宁愿住在游艇上也不要和那些顽抗的臣民居住在山林小屋的合理要求时，这次交谈变得更加激烈。

弗朗茨·斐迪南被许多这样的敌人包围着，可是他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抵达萨拉热窝却不能归咎于他的敌人。这一天对他而言具有某种个人意义。1900年6月28日，他来到霍夫堡皇宫，当着皇帝、皇室成员以及所有大臣的面，用哽咽的声音宣布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将放弃皇室权力。对南斯拉夫人民而言，这一天也意义非凡。那是他们的圣维特斯日。这些圣人起初是异教的神祇，但他们中的很多幸运地在基督教历法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圣维特斯即位列其间。圣维特斯最早被称为维德，是一位芬兰-乌戈尔神祇。这一天还是科索沃战争的周年纪念日，五个世纪前，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打败。对于生活在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来说，

这一天是神圣的哀悼日，面对耻辱，他们发誓要将之磨灭，直到1912年，当塞尔维亚人在库马诺沃战胜土耳其人时，这份耻辱才总算被完全洗涮。到1913年为止，塞尔维亚还处于战争时期，到了1914年，塞尔维亚人才第一次用欢乐和崇敬来庆祝圣维特斯日。弗朗茨·斐迪南很清楚自己是塞尔维亚的敌人。他也明白如果在节日前夕抵达波斯尼亚，在塞尔维亚边境进行军事演习，并于节日当天访问萨拉热窝，会被认为是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嘲讽，等于告诉他们尽管塞尔维亚人从土耳其那里重获自由，但仍然有很多斯拉夫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此次出访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有人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试图找寻对于这个行为的某些解释，看看他是否是迫于外界压力。可要是人能够按照个人意愿出行，那么弗朗茨·斐迪南也会选择前往萨拉热窝。他本人下令进行军事演习，并决定亲自参加。在场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告诉他并不需要亲自前往，除非他本人希望。然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他可能并不清楚当时整个波斯尼亚都充斥着反抗的热潮，该地区几乎所有学生都加入了某些社会组织参与革命。皇室成员间的疏离让他无法知晓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所以他得采取行动消除无知。但此时他的性情决定了他的死亡。塞尔维亚政府——它通过此举为暗杀行动提供了摆脱所有道德责任的借口——派遣驻维也纳的大臣向联盟财长比林斯基发出警告说，弗朗茨·斐迪南提出的访问计划必定激怒波黑边境的斯拉夫人，并可能引发政府无法掌控的局面。比林斯基负责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民政事务。然而，他是一位奥地利籍波兰人，斐迪南憎恨他的民族，曾经强烈地表达过厌恶之情，认为波兰人不能在政府担任要职。比林斯基还是老皇帝的心腹，倡导在斯拉夫地区实行安抚政策。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尽责地向大公传达这个信息时，人们不仅怀疑他的警告，在某种意义上，大家从心理和生理上也对之产生抵触。

弗朗茨·斐迪南并未把他与军队访问波斯尼亚的安排提前告知奥地利或匈牙利政府，当人们早起涌向市集或者指责政府当局时，他好似在勤勉地工作。他将印制的出访计划分发到所有政府部门，却唯独没有给联盟财政部；他还下令萨拉热窝城外的军事演习结束后在伊利扎举行舞会，不得邀请任何财政部的官员参加。这就好比一位来自威尔士的王子，在印度境内游玩的同时还狠狠地指责印度政府及其各个行政部门。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此次出行是由军方负责所有的行程安排，所以弗朗茨·斐迪南能够很容易地在帝国境内让自己的妻子第一次享受到皇室的尊贵特权。而一旦地方当局介入，那么，没有长时间的磋商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结果是致命而血腥的。考虑到他的种种不雅使俩引发的愤怒情绪，比林斯基在不确定弗朗茨·斐迪南是否前往时绝不可能为他的萨拉热窝之行提供保护。不能参与讨论访问行程意味着他甚至无法对街道治安进行监管。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心安排，弗朗茨·斐迪南让那些本该负责保护

他安全的人员处于无法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境地。

当弗朗茨·斐迪南从露台回到接见室时，他重新容光焕发，面色安详，因为他亲眼看见了那位特工的最后命运，那人是这次围猎行动的关键人物。他的妻子正在市政厅楼上接见穆斯林妇女并屈尊欣赏对方的民族服饰与礼仪，这是蛮族征服古老文明后的习惯，那些妇女都来自城里的穆斯林望族。现在她提议改变行程安排，要和丈夫一起去医院探望那位被查布里诺维奇击伤的副官。我们对大公夫人在当天事件发生时的态度一无所知。她不擅交谈。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她的外表和行为。我们知道她有一张克制着欲望的、痛苦的、阴沉的脸庞，在女性被当成笼中鸟一般被男人豢养的当时，她不但接受了这个广为流行的传统，还表现出如同军士般的刚毅严格。我们知道她给人的印象总是醉心权势、心胸狭窄，善于逢迎是她讨人喜爱的主要因素，而迎合通常是那些缺少爱心、喜欢嘲弄他人的人爱干的事情。

但我们也明白她和弗朗茨·斐迪南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伟大爱情。他们从彼此身上找寻到一份永恒的信任，即生活的意义是善；一方给予另一方明确的承诺，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用无尽的智慧与善意支持对方。那些最了解他们的人相信，两人关系融洽，从不会因为婚姻带来的磨难而相互指责。也就是说，即便如弗朗茨·斐迪南这般的蠢猪和索菲·霍泰克伯爵夫人那般心胸狭隘的泼妇也同这些人的最终想象不一样。要让自己毫发无伤，那些和他们夫妇打交道的人就不得不采用这些务实的想法，即最真实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是美好的。

即使在索菲·霍泰克展露美好时，她也是危险的。和丈夫一样，她认为没有保持一致的必要，而一致性恰恰是这个社会的黏合剂。出身贵族的她强烈憎恨自己贵贱通婚的地位。她感到让一位霍泰克家族的人受此待遇是无耻的行为。她从未想过霍泰克家族之所以尊贵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和一个在当时出于某些缘由具备纯粹效力的制度和谐相容，同更尊贵的哈布斯堡家族和谐相容；如果那些理由不复存在，哈布斯堡家族的至高权力将随之消失，霍泰克家族也会失去他们的显赫声名。

不幸的是，她固执地想找出法律与这种不一致性之间的关联。她做到了。英国法官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她发现弗朗茨·斐迪南宣布自己的孩子放弃继承权的誓言与王位继承法相悖，据说她还向斐迪南强调过这一点。没人能代替尚未出生的孩子立下誓言；这相当不公。她从没想过哈布斯堡家族需要这些不公正的誓言来维系王朝，如果他们被迫接受绝对的公正，那么哈布斯堡王朝或将分崩离析，她的孩子也会再次失去王位。

因此，索菲·霍泰克伯爵夫人必须像一位古板的法学家，承受着种种艰难处境；她身处的环境似乎总在倔强地抵抗着一种完美却会为她带来重大个人

灾难的强加模式。然而，她还有一段更为辛酸的个人悲惨经历。她相信弗朗茨·斐迪南已经到了要发疯的地步。据记载，她曾暗示她的家族律师并明确告诉一个密友说，她认为自己的丈夫随时可能患上某种精神疾病。这仅仅是那部批判文集的一部分，标题就叫作“妻与夫”。但是当前有很多关于弗朗茨·斐迪南的故事显示，他的暴力倾向有时候背离理智，且表现得相当明显。弗朗茨·斐迪南在结束与德国皇帝的会晤后乘坐火车离开柏林，负责管理皇室列车的捷克官员向捷克分裂党党首汇报说，当弗朗茨·斐迪南在目的地下车后，他们发现他所在车厢内的物品被用剑戳成了碎片；而在英国访问期间，他待人接物缺乏教养，其方式和程度完全有别于权贵们平时的反常行为。

这位夫人不仅外患众多，内敌更远甚其他。据我们所知，她的精神承受着极大痛苦，这一点可以从她的宗教生活中得到证实。早期的教会条例明确规定，除极少数情况外，东正教教徒不被允许从圣餐或告解忏悔中受益。这项规定无疑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灵魂被认为不够强大，无法完成人神间的永久联合，而审判定罪太快则让罪行的宽恕变得失真。限制对圣礼的参与能防止圣礼被当作法术，使其不会成为罪犯抢劫时的护身符。借助罗马天主教会从早期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一次革新，教皇利奥十世消除了这些限制，使得虔诚的宗教信徒得以随时与主沟通忏悔。可索菲·霍泰克伯爵夫人却频繁地利用这项许可，以致不断地与引领自己精神生活的主教发生矛盾。她与丈夫住在伊利扎城外的一家旅店里，其中一间客房被布置成礼拜堂，那天早晨她和她丈夫参加了弥撒。没有主的保佑让他们趋吉避凶，他们哪里都不能去，而去医院探望受伤副官的提议最终为夫妇俩引来祸端。

人们一直无法理解这段关于这次提议的对话。只有认为说话者喝醉酒或者整夜发高烧才能理解这场谈话。可他们是清醒的，即使十分恐惧，他们也得面对，在6月某日上午十点面对。弗朗茨·斐迪南实际上询问过波蒂奥雷克将军在他们夫妇驱车离开市政厅时是否会有人投掷炸弹。这个问题太过白痴。如果将军对第一次可能发生的袭击都无法掌握足够的情报，那么他对于第二次袭击的看法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很显然，不管是弗朗茨·斐迪南还是波蒂奥雷克都理应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建议。路面警戒显然不够，不然查布里诺维奇的刺杀就无法得手。基于这个理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应当待在市政厅里，直到七万名士兵从城外不远处赶到这里站岗设防。人们会认为，只要男人们意识到有责任保护女人这件事，这个计划就理应被提出来。

可没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弗朗茨·斐迪南提出的问题令人吃惊，波蒂奥雷克给出的答案更让人惊讶，他确信不会有第二次刺杀行为。答案让人吃惊的部分在于他的轻率，他肯定清楚，只要稍做调查就能发现相比七年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萨拉热窝的访问，这次他没有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安全采

取任何防范措施。在皇帝访问期间，生人一律严禁入城，反奥者只能待在家里，街道上设置双重警戒，密探遍布其间。只有在知道波蒂奥雷克事先得到保证，不管弗朗茨·斐迪南发生什么事，事后他都不用担心，因为绝不会有后续调查的情况下，这件事才是可以相信的。的确，要不是有人先前目睹了弗朗茨·斐迪南被刺杀的情景——两人同乘一辆车，如果发生刺杀事件，波蒂奥雷克也难逃一死——波蒂奥雷克很容易被怀疑故意置弗朗茨·斐迪南于死地。波蒂奥雷克跟康拉德政见相同，两人都认为一场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具有神圣的必要性，波蒂奥雷克曾写信给康拉德表达过自己孤注一掷的观点：如果不能对塞尔维亚动武，那他将冒险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在波斯尼亚军事演习期间，波蒂奥雷克属于康拉德的阵营，彼时的康拉德仍然对自己被弗朗茨·斐迪南免职一事耿耿于怀。两人都相当清楚，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弗朗茨·斐迪南的刺杀行动将为对塞宣战提供完美的借口。尽管如此，人们相信波蒂奥雷克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因为对他而言，要想在荒郊野外计划刺杀大公再容易不过。人们也难以相信他的同谋者会同意让波蒂奥雷克冒着生命危险去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因为将军的影响力及军事能力对他们有利，他们不可能弃而不顾。

然而，关于此次谈话还有一个小插曲，只能用弗朗茨·斐迪南随行人员中那彻底无情的背叛来解释。大家一致认为皇家车队在离开市政厅后应该按照原来宣布的几百码路线行进：他们会沿着码头行驶到第二座桥，之后按照新路线沿着码头直行前往医院，而不是向右转向驶进一个连接城里主要购物中心的小巷。这条路线的主要优势在于让潜伏在最初那几百码路线上的人群中的阴谋者无法得逞，正如波蒂奥雷克之前承诺的那样，汽车会以更快的速度行驶，如此想来，大公夫妇有充分的机会活着离开萨拉热窝。如果有人能就上述任何一点给司机下达命令，夫妇俩或许不会丧命。但要么是波蒂奥雷克没有给下属下达过任何命令，要么就是受命的下属没有把命令继续向下传达。

哪种假设都不会被人轻易接受。即使考虑到奥地利人草率，侍候皇室的卫兵侍从也断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尽管这次过失不可能偶然发生，但是这次过失在导致弗朗茨·斐迪南死亡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预见的。没有向任何一位在楼道列队恭候的市政官员告别，大公夫妇与波蒂奥雷克径直走向码头，坐上汽车。据说，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看上去忧心忡忡，深受震惊，面无表情。奥地利将军哈拉赫伯爵跳上汽车左边的脚踏板，抽出长剑屈膝下蹲，准备用生命守护这对皇室夫妇。队伍由萨拉热窝副市长和一位波斯尼亚国会议员乘坐的汽车带领前进。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误就是没有人通知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司机线路变更事宜。第一辆汽车来到桥上，随后转向右边，开入小巷。御驾司机见到这种情况完全手足无措，因为波蒂奥雷克边打他的肩膀边喊道：“你在干什么？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必须

沿着码头一直开。”

困惑的司机没有被告知继续前行的重要性，而是将车稳稳地停在小巷与码头的转角处。汽车刚好停在一位名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的年轻人面前，他不仅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还跟查布里诺维奇一样是叛乱分子。他没能在市政厅成功地掏枪杀死大公，正在准备第二次行动。当时，汽车已经熄火，普林西普能够瞄准目标并且击中弗朗茨·斐迪南的心脏。普林西普的枪法并不精湛，如果不是这一次给司机的指令出错，他永远不可能射中目标。哈拉赫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身处汽车左侧，而普林西普位于汽车右侧。看到大公臃肿的身体朝前倾倒，他端起手枪瞄准普林西普。要不是索菲，他已经杀死了普林西普，索菲扑过去为弗朗茨·斐迪南挡下了第二颗子弹，最后一次向丈夫表达了自己伟大的爱情。在弗朗茨·斐迪南对她轻声说“索菲，索菲，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时，她已经死亡，十五分钟后，弗朗茨·斐迪南也咽下最后一口气。你我的生活因此遭受重创，可对波斯尼亚人来说则不然，他们通过这次死亡行动获得了重生。

我靠在露台边说道：“我永远无法理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并不是说证据太少，反倒是因为证据太多。首先，这只是一起谋杀事件，而事件中却出现了两位凶手：一位是普林西普，另一位则被臆想为侍奉弗朗茨·斐迪南的其中一位或几位侍从，而他们不是同一人。其次，这次事件被定性为自杀而非谋杀。即使已经出现被害人，也还是没有人会拼命地从任何一方面去证明这次事件一定是谋杀。同时，这些杀人犯，即使杀了人，也没有受害人那么可怜，他们是矛盾的综合体，既对灾难强烈渴望，也对灾难怨声载道，这通常让人联想到犯罪未遂或者被告席上的卑劣小偷。然而，他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崇尚死亡的社会，一个沉思野兽的死亡、沉思严格制度下灵魂的消亡、沉思帝国压迫下人的灭亡并从中寻找快乐的社会，所以他们不应该为这个社会的病态受到指责。

“那天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旅游局局长说，“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大公那微弱有趣的声音和他如牵线木偶般嚣张的步态。”我向下面的街道望去，看到一个长得并不像大公的人，他来自山区，身形高瘦，面带憔悴，头上戴着深红色的围巾，正大步朝前走，那步伐好比力量的舞蹈，沉着而冷静。我对康斯坦丁说：“像那种男人和暗杀事件有关系吗？”“直接来讲，没有，”康斯坦丁答道，“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间接联系。但事实上，所有真正的阴谋者都来自萨拉热窝本地。待我向你说明这一切发生的地点后，你会更加明白。但我们现在必须返回旅游局办公室跟这位先生喝杯咖啡再离开。”

当我们走出市政大厅时，落日余晖中，远处花园里的李花闪耀着，似乎从未接受过融雪的洗礼。“即使山地突兀不平，”我说，“但它的轮廓是如此柔软。生活在这座城市就像漫步在怒放的花间。”“这里的万事万物都是美好

的，”康斯坦丁感叹道，“试想，只有当我成长为一个成熟男人时，这里才会是我的家乡。而那时，它的美却将成为让我心痛的耻辱，因为我是一个塞尔维亚人，而萨拉热窝却是一座被占领的斯拉夫城市。”“打住，打住”，我说，“照你这么想，那纽约和波士顿的美也将成为让我心痛的耻辱啰？”“不全是，不全是，”他说，“你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的气质跟英国截然相反，这种气质让即便拥有纯正英国血统的美国人也跟你完全不同，就好比俄罗斯也与巴尔干不同，以至于俄罗斯兄弟跟我们一点儿不像。但是波斯尼亚的气质跟塞尔维亚相同，这里的人除了不善言谈之外和我们几乎没有差异。除此之外，你在美国的亲友并没有被外族统治，你们都反感外族统治。要是德国人占领了美国，你在那里看到新英格兰地区的各个村落被普鲁士军队管理，那时候你将哀叹自己跟美国同胞应该再次团结在一起。”“我明白。”我说。我看向那一大片外表漆成面包色的营房，奥地利人特意将营房修在一块地势突出之地。那一片建筑好似在说，“众所周知，无须谈论，我们随时可以行动”——本就愚蠢的观点，对于擅长思考的斯拉夫人而言则更显愚蠢。

“我告诉你们，”康斯坦丁说，“在萨拉热窝所有属于奥地利的东西都是错误的。看看我们正在走的这段河堤，修得倒是漂亮笔直，可就是一点不像我们南斯拉夫人、基督徒或者穆斯林修筑的堤坝。我们喜爱自然本身，我们不想设定一个尺度来规范她必须看起来那样、禁止她坚持内心或者回归本性。瞧瞧，就在这个角落，普林西普杀死了大公，你们看这个地方是多么适合进行刺杀啊。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年轻人沿着这条小巷朝前走，看到讨厌的奥地利人就会赶走对方。萨拉热窝的所有街道都很狭窄，很多街道还迂回蜿蜒，每所房子都有自己的主人，都建在这片由奥地利人打造的平坦空地上，这块土地呈长条形，上面修建的房屋十分类似。看，在那角落里还有一块纪念这次事件的石碑。”

我读过许多对于这块石碑的谩骂之词，认为它是一个对罪行得手的野蛮记录。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曾在著作《未知的战争》（*The Unknown War*）一书中这样评论：“普林西普死于狱中，近年来，他的同胞们为他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以记载他跟他们自己犯下的恶行。”事实上，这是一块非常简朴的黑色石碑，它的历史目的不过是用来记录暗杀发生的具体地点而已，它被放置在街道上方，漫不经心的路人不会察觉到它。碑文内容如下：“在这个极具历史意义之地，圣维特斯日，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成为自由的发起者。”考虑到奥地利统治在波斯尼亚引发的强烈仇恨，这些话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克制。字面意思已经证实了“自由的发起者”这个称谓的含义：事实上，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一直遭受奴役，直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刺杀事件引发的战争结束后才重获自由。而这番率直的声明很难震撼任何一个纵容奥地利进行领土兼并的西方国家。

要解决问题必须首先找到问题症结。康斯坦丁和我正抬头看着石碑时，旁边走过一位南斯拉夫显贵，他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绅士，在欧洲所有大城市里为他的同行们所熟知。他向我们打招呼并抬头看向石碑，说道："这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啊。""是的，是的。"康斯坦丁小心谨慎地说，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彼此对立，而他害怕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康斯坦丁。"那人说。"不会了，不会了。"康斯坦丁说道。"不能再有刺杀行动了，康斯坦丁。"那人继续道。"不会了，不会了。"康斯坦丁忙说。"再也不要有克罗地亚人因为自己来自克罗地亚而被人枪杀了，康斯坦丁。"那人厉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那样做，"康斯坦丁叹气道，"这场事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些人在煽动骚乱！""好吧，再也不能发生这种事了。"他的朋友说。但是当他转过身去再次看向石碑时，他的眼里弥漫着悲伤。"但是上帝已经原谅了我们所有人！"他说，"至于那次意外，那是一个必然事件。"

我问康斯坦丁："你认为这位先生会认识普林西普吗？"他回答说："我认为不会。他比普林西普大十岁。除非他们的家人是朋友，他才会认识普林西普这般年纪的人，可贫穷的普林西普没有这样的家庭，自然也无法结识这种富家子弟。他只是一个从山区来到萨拉热窝接受教育的穷小子，除了学校同学，谁都不认识。"事实上，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普林西普是萨拉热窝一位出身卑微的青年阴谋家。他是斯拉夫人，而他的祖父却是一位来历不明的移民。当拥有纯正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遭到波斯尼亚暴动势力驱逐时，他的祖父出现在了波斯尼亚与达尔马提亚交界处的一个村庄里，并强占了一间被土耳其人腾空的房子。这个男人有点儿古怪，他穿了一件奇特的银色皮夹克，上面还挂着一些铃铛。这种打扮让村民们觉得既奇怪又华丽，且专家也无法判定是否为巴尔干地区一种已知的着装习俗。由于着装怪异，当地村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普林西普"，即"王子"的意思。也正因为这个绰号，在暗杀发生后，到处流传着一个荒谬的传闻，说普林西普的父亲是被杀的鲁道夫王子的私生子。然而，老普林西普的确只是一个农民，娶了一个来自黑山的贫苦女人，在一贫如洗中组建了家庭。在土耳其人被波斯尼亚反抗者驱逐后，奥地利人又入侵并占领了波斯尼亚，土耳其统治时期的土地制度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波斯尼亚的农民们还是饥不果腹。他的一个孩子后来当了邮递员，娶了一个充满力量感的黑塞哥维那女人。这个女人在贫瘠的山区一共生育了九个孩子，其中六个夭折了，人们认为是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她对剩下的三个儿子寄予厚望，将他们送到城里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自己挣钱交学费。第一个儿子成了医生；第二个儿子成了商人，年纪轻轻就当选为市长。第三个儿子就是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两个不利因素下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他身体孱弱，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革命与战争纷扰的世界中。

以前的欧洲，有两个最压迫人民的独裁国家全天候努力地为自己和所有其

他欧洲国家提供革命素材。不管是出于军事暴政还是公众自由的目的，俄罗斯催生出众多具有革命思想的作家，而奥地利帝国则孕育了无数能够胜任革命行动的人。俄罗斯的势力通过几种途径进入波斯尼亚，其中有些令人颇感始料未及。沙皇俄国出于政治目的在黑山首都采蒂涅为科托尔地区的上层保留了一间女子寄宿学校，许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甚至克罗地亚的贵族家庭都会把女儿送到那里接受教育。正如所有有任性子女的家长预料的那样，这些小宝贝稍后会被要求使用学校规定学习的俄语去阅读斯特普尼亚克、克鲁泡特金以及托尔斯泰的作品。这是一条在富裕阶层中为革命运动争取宽容的狭窄通道，此时革命运动之风已经横扫所有南斯拉夫的青年男性，他们热烈讨论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并对沙皇俄国为倡导上述思想而兴起的恐怖主义手法进行实验。

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相比俄罗斯兄弟，波斯尼亚人在最近的和最不吸引人的活动中处于劣势：他们表现得更像罪犯，因为他们更具道德品质。在俄罗斯革命期间，当发现人民领袖加蓬神父由于蒙特卡罗之行的安抚作用，竟然向警方自荐当间谍时，人们自1906年起对于革命的困惑和希望幻灭的情绪逐渐增多。他们在1909年受到更大打击。阿西夫，俄罗斯最大最强的恐怖组织头目，被证实最初的工作就是警察密探，尽管成功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内政部长普列韦和塞尔日大公爵的暗杀行动，但他暗杀前者的部分原因是他是犹太人，不喜欢普列韦的反犹太主义政策，另一部分则是他想加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以便从警方获取更高的报酬，而暗杀大公爵是为了帮助那些在法院想摆脱公爵的人。这使得所有真诚的革命家们意识到革命队伍里充斥着背叛，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挽救的可能是一个警察密探或者隐藏得更深的宫廷阴谋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在战争前的几年间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南斯拉夫人不是叛徒。的确有一些，甚至许多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为了筹集资金，伪造各自国家政党与塞尔维亚政府合谋的证据，并将之出售给奥匈帝国。但他们总是进行大肆宣传，而他们的证据伪造得非常拙劣以至于最有失公正的法院都难以认可；他们拿出应当被传送出去的电报的记录，记录上显示的却是接收而非发送的信息；他们公布相关爱国团体的记录的照片，证实了这份记录的尺寸肯定超过3.3英尺宽13英寸长：一份精美的高仿品罢了，并不是真正的社团记录。帝国官员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也都不曾真正采取措施来对付这些破坏社会和平者，而这些人似乎拥有犯罪的特权，这就好比在一些乡村里，盗贼被赋予了偷窃的特权，尽管行为大胆乖张但是只要他贪心适度，大家也不会太过在意，因为即便他得手，这个地方的损失也不至于太惨重。

但是真正以向当局出卖同志为目的而参加革命活动的叛徒和内奸，在南斯拉夫人中总是极个别的，因此恐怖组织能更好地活动。他们在大中院校中

的渗透程度令人咋舌，直到有人想起，由于居民贫困和奥地利帝国强行实施的有缺陷的教育体系，每个学阶学生的学龄比西方惯常的年龄高出两至三岁。

在1912年至1913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击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果给了这批年轻人的恐怖主义思维以新的启发。他们急欲挣脱帝国这具腐朽的尸体并与一个年轻成功的民主国家联合；通过不断涌现的社会团体和爱国刊物，他们逐渐形成了通过直接实施针对统治者的暴力行动来实现自我解放的思想。然而，暴力行动无法改变令人讨厌的分配问题，事实证明那些极度渴望登台表演的人正是那些最没有表演天赋的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是高贵的士兵，他们擅长射击，有着狮子般的雄心。但他们也是可叹、凄惨的恐怖主义者，比俄罗斯人更加奉行个人主义，秘密社会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更像玩具而非黏合剂。他们常常就为了去和同僚讨论一件暴行而长途跋涉，而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方面对改革举措中的某些其他方面饶有兴致，例如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把炸弹放置在火车上。志向满怀时，他们失去的常常不是勇气而是在关键时刻的头脑，或许对于实施此类暗杀行动而言最便利的地方便是在城镇的人群中——“暗杀”在法语这门大陆语言中表示针对政府首脑实施的犯罪——而年轻的斯拉夫人并不习惯跟一大帮人聚在一起。他认为，正如英国吉卜赛诗人W. H.戴维斯将自己设想为身处城市之中，“那就像一匹靠近烈火的马”。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代人面对死亡的勇气变得坚毅，它也用经验加上酸腐的金钱训练出下一代人，并帮助某些国家获得这些经验和金钱。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在意大利受训，杀死了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的匈牙利人，则代表着迄今无人能及的恐怖主义最高等级的专业技能。

然而在战争爆发前的日子里，南斯拉夫人是有着满腔热血却令人同情的局外人。他们中的典型就是年轻的泽热伊奇，一位来自黑塞哥维那村庄的帅气的塞尔维亚小伙子，他决定在1910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刺杀皇帝。目标确定后，他一路跟着老皇帝从萨拉热窝到莫斯塔尔，又从莫斯塔尔到伊利扎，虽然手里攥着左轮手枪，但他从未开过一枪。这以后，他又决定去刺杀波斯尼亚总督瓦尔萨宁将军，将军特别厌恶南斯拉夫人，因为他是一个克罗地亚叛徒。当将军驱车前往参加萨拉热窝议会会议时，泽热伊奇在一座桥上等待将军的到来。他朝将军开了五枪，可五枪都射偏了。第六枪他射向了自己的前额。据说瓦尔萨宁将军下车走到他的尸体旁，狠狠地踢了又踢，这个举动令所有年轻的南斯拉夫人痛苦牢记。这个可怜男孩的失败只是同胞们的多次失败中的一例。1912年6月，另一个波斯尼亚人试图在萨格勒布的街道上刺杀克罗地亚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干掉了两个人，却没能杀死那位指挥官。1913年8月，一个年轻的克罗地亚人试图刺杀克罗地亚新上任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最后仅仅让对方受了点伤。1914年3月，又一个年轻的克罗地亚人在萨格勒布歌剧院

里试图枪杀最高军事指挥官和利奥·波德大公时被逮捕。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事态格局。许多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要么游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要么晚上偷偷溜过有边防战士驻守的黑山边境，就为了加入并不正规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马其顿的前哨。所有这些年轻人在操练武器的过程中获得了技巧和钢铁般的意志力，而待在家里的人就像那些暗杀者一样无能至极。

普林西普并不在参加过巴尔干半岛战争的那帮年轻波斯尼亚人之列。他很快厌倦了萨拉热窝的学校生活，那时的学校已经沦为混乱之地，学生们对政治不满，尤其讨厌奥匈帝国教育当局设置的具有倾向性的课程。于是他选择待在自己的陋室里闭门不出并大量阅读哲学和政治学书籍，如此猛烈且没有方向性的学习损害了他的健康和精神。当然，他常常因为经济窘迫而食不果腹。最终，他认为自己最好移居到塞尔维亚并去贝尔格莱德的一所中学开始学习，于是年仅十七岁的他于1912年5月迈出了这一步。他的一个哥哥给了他一些钱，他自己也通过给一些小男孩当家教挣了一点儿钱，可这必将是一段贫穷饥饿的旅程。在贝尔格莱德，学习研究让他极度快乐，要不是巴尔干半岛爆发战争，他也许已成为一位内心满足的学者。他立刻自愿入伍，并被送往一所位于塞尔维亚南部的训练中心，如果只需要勇敢的话，他或许早已成为一名一流的战士。可他那孱弱的身体不堪重负，他只得退伍。

普林西普的耻辱被提升到一个痛苦的程度，据说，是因为另一个和他关系不好的士兵在他离开军营时对他咧嘴一笑，说道：“滚出去，坏家伙。”尽管他回到贝尔格莱德后通过努力学习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他还是为自己无法在斯拉夫军队服役，未能证明自己的英雄价值而痛苦不堪。碰巧的是，在塞尔维亚他与一个来自萨拉热窝的名叫查布里诺维奇的年轻印刷工成了好朋友。查布里诺维奇与他同岁，因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已经被迫离开波斯尼亚五年。关于这位年轻人的资料有许多，言辞都不太狂热，都是些牢骚之语而非不利之词。他的同伴们也发现他的饱满热情和叨叨絮语令人生厌不安，但需要记住的是，这些杰出之士，尤其在他们年轻时，其笑声和悲伤以大众标准来看都稍显过分，经常令普通人不快。查布里诺维奇的古怪之处可能就在于他最初的壮举。而他也在努力克服跟父亲关系极端敌对导致的麻烦。不管怎样，对普林西普而言他无疑是个可以接受的朋友，这也证明他很有头脑。

他们在学校或咖啡馆里共同结识了一些萨拉热窝朋友。其中一位叫达尼洛·伊里奇，是名敏感易怒的年轻男教师，一个极不受欢迎的禁欲主义者。据说他曾于巴尔干战争期间在塞尔维亚军队服役，但仅仅是一名传令兵。为了不顾一切地大干一场，他从1914年年初开始便致力于成立一个恐怖组

织，不过，除了他，再没人具体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个叫普沙拉的年轻人，有一天，他从报纸上剪取了一段刊登着弗朗茨·斐迪南有意访问波斯尼亚的文章，随后将它从萨拉热窝寄给了在贝尔格莱德的查布里诺维奇。有些人说普沙拉只是有意暗示会有麻烦发生，并非要制造事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有一个亲戚是一名为奥地利警方效力的密探。如果他或者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是内奸的话，他们也别指望能成大事。查布里诺维奇把那篇文章拿给普林西普看，然后两人决定返回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茨·斐迪南。

但他们需要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武器。他们一开始想到向国防协会要炸弹，但自身良好的意识告诉他们那是行不通的。国防协会是一个在政府保护下采取公开行动且受人尊敬的团体，即便是被恶政困惑而完全麻木的孩子们也知道，不能指望这个组织出手帮助刺杀一位外国皇室成员。此外，他们都有指导着国防协会的那种个性经验，明白自己是中世纪塞尔维亚模式中过时、虔诚且保守的塞尔维亚人，这帮整天泡在咖啡馆沉浸于自由思想中的波斯尼亚孩子让他们震惊不已。当查布里诺维奇向该组织寻求帮助时，一位年老的塞尔维亚上尉发现这个小伙子身上竟然揣着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他大吃一惊并将之没收。

不幸的是，他们此时遇上了一个叫斯格诺维奇的波斯尼亚难民，此人对他们的计划有所耳闻，想帮助他们弄到些炸药。他其实是一个名为“黑手会”的秘密组织成员，或者说，他与该组织存在着某种关联。该组织在塞尔维亚历史上扮演着邪恶的角色，成员都是杀害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官员们的直系后裔，那帮官员将奥布伦诺维奇王朝更替为卡拉乔治维奇王朝。而没有参与这场阴谋的卡拉乔治维奇家族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结果，但他们始终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存在，并频频与其作对。“黑手会”因此反对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统治，致力于发动对奥战争并建立一个巴尔干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他们的首领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有着毋庸置疑的才华与乖张的个性，人称“蜜蜂”，曾一度担任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头儿。他从一个居住在瑞士洛桑的名叫格奇诺维奇的波斯尼亚革命者那里得到伊里奇及其团伙的信息。时年二十二岁的格奇诺维奇在南斯拉夫族中，尤其是在波斯尼亚人中，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拥有超凡的能力；在他死后，其遗著由托洛茨基整理编辑成册。经他指示，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才得以接近斯格诺维奇，随后通过一名叫作坦科斯奇的官员跟另一位十九岁的波斯尼亚青年格拉贝茨联手，坦科斯奇曾参与谋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

坦科斯奇把小伙子们带到森林想看看他们枪法如何——个个糟糕透顶，普林西普略好一些。一切就绪，他为他们配备了随身炸弹、手枪以及氢氰酸以确保行动不出意外，不被警察察觉。随后，他将这几个年轻人通过地下

路线送往萨拉热窝，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走私目的，那些无法通过边境检查的人，可以在友好的亲斯拉夫的民众的帮助下利用这条路线穿越边境。他们被两个受命于“黑手会”的警卫偷运至波斯尼亚，众多巴尔干农夫及商人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感到十分为难，可又不敢拒绝革命组织成员提出的帮助要求。就这样，这几个年轻人得到军火后潜入了萨拉热窝。

由于阴谋者们的无能，除非有奇迹出现，他们方能完成这趟旅程。查布里诺维奇话太多。那些善良正义的人们好几次都惊慌失措，产生了向警察告密的异心，他们宁愿冒着被革命复仇的危险也不愿成为共犯被绞死。伊里奇也完全无法胜任任务。他被安排去一处铁路交叉点取炸弹，而他十分恐慌，没能完成任务。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个藏有炸弹的糖罐依然放在公共候车室里，上面搭着一件大衣，车站的猫在上面舒舒服服地睡着大觉。不幸的是，伊里奇最终鼓起勇气，将炸弹带回住所，藏在卧室的沙发底下。他助长了一些人的权力膨胀，那些人极其不当地在增加使用武器的频率。他招募了一个叫作梅美德巴什奇的穆斯林，此人性格怪异，早已表露出与恐怖主义分裂的念头。1913年1月，他和一个穆斯林朋友去图卢兹拜访了托洛茨基的朋友，那位了不起的格奇诺维奇。伊里奇给了梅美德巴什奇一些武器和毒药，让他去取波蒂奥雷克将军的性命，可他跟友人在路上考虑再三决定放弃，把这些武器和毒药从车厢窗户扔了出去。伊里奇还招收了两名分别叫作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的男学生，并教他们使用左轮手枪，尽管他本人终其一生也未扣过一次扳机。大公访问前夕，伊里奇一会儿劝说这对不相配的搭档联合起来表达爱国心，一会儿又让他们把这事儿忘了，就此分道扬镳。而他自己在某一刻也恐惧万分，登上火车一路行至距离萨拉热窝一百英里远的布罗德镇。可他最后还是回到萨拉热窝，虽然直到最后他还在不时力劝跟他同住的普林西普放弃行刺。鉴于查布里诺维奇的气质不适合恐怖主义活动，伊里奇对他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不信任。可以想象，只要不在圣维特斯日访问萨拉热窝，弗朗茨·斐迪南的性命是再安全不过的了。

这几乎就要成真。那一天，伊里奇下定决心将暗杀行动进行到底，并向部署在街头巷尾的反叛者们下达了命令。这些人太过天真，对伊里奇不参与此次暗杀行动似乎也不觉得奇怪。他们被告知在河堤各个行动点的位置安排：梅美德巴什奇首先行动，然后是查布里诺维奇，然后是丘布里洛维奇，再然后是波波维奇，再之后轮到普林西普（如今那座桥的桥头还刻有他的名字），位于对面街道的格拉贝茨排在最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容易预言。梅美德巴什奇并没有扔出炸弹。相反，他只是看着车子经过，然后跑到火车站跳上一辆开往黑山的火车。黑山是由各个部落组建而成的国家，他在那里得到其中一个部落的庇护，他的家族与该部落关系友好，部落成员们将他藏匿于位于山区的住所内。不久，他去了法国，而这并不是

他冒险之旅的终点。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他以不亚于铁面人[注]的神秘莫测为世人所知。男学生丘布里洛维奇被告知一旦梅美德巴什奇扔出炸弹，他就用左轮手枪结束任务，而如果梅美德巴什奇失败了，他就要扔出自己手中的炸弹。然而，他什么也没做。另一个学生波波维奇亦是如此。他不可能使用炸弹或是手枪，因为站在一个警察身旁让他紧张万分。查布里诺维奇倒是扔出了炸弹，可又扔得太高太远。他吞下随身携带的氢氰酸并跳下河堤。可氢氰酸并没有发挥药效，他最终被警察逮捕。听到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的炸弹响声，普林西普以为任务完成，所以只是静静地站着。但是当汽车经过，看到那对皇室夫妇依然活着，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走向一间咖啡馆，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让自己平静下来。格拉贝茨同样被这一声爆炸声欺骗，让机会白白溜走。如果不是下属接二连三的错误举动致使车速减慢，让他成为普林西普面前的一个固定目标，弗朗茨·斐迪南本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萨拉热窝，而普林西普恰巧又是一位深思熟虑的真正反叛者，他喝完咖啡正返回先前的街道，被自己和同伴的失败吓得目瞪口呆，尽管没有对政权造成任何损失，但是这次失败将使这个国家面临恐怖的惩罚。最终，子弹还是不情不愿地从枪口射出，进入他们热切期盼的受害者的身体里。

---

1. 铁面人（the Man in the Iron Mask），法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世神秘。

萨拉热窝VI

康斯坦丁说："你看到这群白痴做的最后一件荒唐事儿了吗？"桥的两端修建粗糙，道路两边石料散落。"他们在这里，这个连当地最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会对其感到怜悯的地方树立了一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夫人的雕像，而不是在应该给予其大量补偿的维也纳。战争结束后，我们一接管该镇，这尊雕像就被运走了。"雕像也许仍然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某个后院内，也许碎成了奇形怪状的雕石，又或许翻倒在长草丛中。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霍泰克的命运在他们死后仍在继续，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我们并不创造自己的命运，命运也不单单是在我们匆忙走过一生的过程中由我们的性格所遵循的一种模式。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一生中出席了一个又一个盛大场合，却也在一次仪式的布置中被疯狂地剥夺了生命，当他们躺在灵柩中就是如此。他们的遗体被运送到维也纳，冰冷的坟墓被期望为他们最终的归宿。然而他们立刻就被卷入侮辱和仇恨的漩涡中心，这漩涡堂皇而错杂，令世界震惊，就连这片习惯于恐怖的土地也对之深感震惊。

对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的灵柩到达维也纳后遭受的傲慢无礼，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能因此受到责备。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八十七岁高龄，他的夫人被谋杀，他的儿子要么被谋杀了，要么是个谋杀者且自杀了。当他听说他的继承人、侄子、敌人，其夫人还是皇族耻辱的斐迪南被暗杀的消息时，可以想象，他崩溃了。这个场景让弗朗茨·约瑟夫想起了极大地亵渎神明的一幕：当他第一次听到贵贱通婚的想法时，他说上帝纠正了一个他无法改正的错误。但是安排维也纳葬礼的过失必须归咎于皇帝的宫廷大臣——蒙特诺佛亲王。他在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霍泰克生前用礼仪规矩作弄他们，在他们死后还用同样的武器纠缠他们。

只有精神错乱能够解释蒙特诺佛亲王关于葬礼的反常安排。他不仅仅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偶尔也展示出人性和勇敢的一面。1913年3月，他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抵制了康拉德把奥地利卷入一场无缘无故的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争的企图，他以非凡的机智、理性和原则履行了他的职责。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当发现是由他自己负责安置一对与他有着多年恩怨的夫妇遗体到坟墓的时候，会觉得理所应当采用一种特殊的礼仪。

他安排运送遗体回国的列车延迟至夜间抵达。到站的列车上恐怖地溅洒着一名被杀害的铁路员工的血。蒙特诺佛做了两个反常安排。他规定新皇位继承人查尔斯大公不得接车，但年轻的查尔斯坚持接车。他也试图在皇家教堂举行葬礼期间不把索菲·霍泰克的灵柩放在她丈夫身旁，可弗朗茨·约

瑟夫皇帝不同意。然而蒙特诺佛也取得了部分成功。索菲的灵柩被放在更低的位置，象征着她较低的地位。大公的灵柩上摆放着他生前全部的荣誉徽章，而索菲的灵柩上只摆放着这位前任侍女的白色手套和黑色扇子。皇室成员中没有人送花圈，除了史蒂芬妮。史蒂芬妮是鲁道夫王储的遗孀，长期以来跟亲戚们关系恶劣。唯一的鲜花是一个白玫瑰花组成的十字架，是由这对死去夫妇的两个孩子送上的，外国的君主们还送来些花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出席了葬礼，随后教堂关闭，以免公众有机会对逝者表达敬意。

蒙特诺佛试图将两者的灵柩在坟墓中分开安置。他提议弗朗茨·斐迪南的遗体应该安放在嘉布遣会教堂的哈布斯堡皇家公墓，而他妻子的遗体应该安放在夫妇俩位于多瑙河畔的阿斯泰滕城堡的教堂内。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曾下令自己也要安葬在阿斯泰滕。蒙特诺佛听从了这个决定，但宣布在将灵柩留放在西车站后他的职责就结束了。市殡仪员不得不做好所有安排将灵柩放在开往珀希拉恩的列车上并将灵柩运过多瑙河抵达城堡。珀希拉恩是通往阿斯泰滕的车站。但在蒙特诺佛阻止下，殡仪队直到深夜才从教堂出发，使他们的任务变得困难。一百多名穿着还算符合皇室葬礼服饰要求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最高贵族出现，以示抗议，他们闯入队伍，步行向车站进发。

凌晨一点钟，火车将灵柩和送葬者们送抵珀希拉恩。他们发现车站并没有做好迎接准备，因为没有黑纱帐和红地毯。这对于一个痴迷礼仪和浮华的民族来说是极不可思议的。但是很快他们就有了愤恨的可靠理由。灵柩被搁放在站台上，一场震耳欲聋的，令人头晕目眩、全身浸透的暴风雨随之即来。夜间葬礼的劣势变得明显。没有哪个负责送葬队伍的人知道附近的村庄在哪儿，因此送葬者们无法找到庇护所，不得不挤进这座小车站内，这妨碍了葬礼的实际进行。有人提议将灵柩送到邻近的教堂举行进一步的宗教仪式，但是在大雨中灵车无法装载，而这些送葬者们也确实不知道在深夜里该跟着灵车去哪里。所以困惑的牧师就把灵柩供奉在拥挤狭小的候车厅内，候车厅里还有列车时刻表和滨海度假胜地的广告。雨终于停了，队伍开始向城堡行进。不时传来的电闪雷鸣让拉灵车的十六匹马不断失控。队伍安全到达多瑙河畔的一个码头时已是黎明时分。在一片寂静中侍从们将马匹哄诱上渡船。侍从们全身湿透，雨水从衣服上不断流入脚底。送葬者们在河岸边等待上船，看着这条渡船心怀感激。但是当渡船行至河中间时，最新的一道闪电划过天幕，最新的一声霹雳炸响。大公灵车前面牵引左侧马杆的那匹马暴跳起来，后车轮滑出渡船船舷。当渡船到达河对岸时，惊慌的马匹摇晃不稳，侍从们几乎无力握住马具，只是疲惫惊恐地挣扎叫喊，而灵柩滑入水中。

奇怪的是，正是这样一幕场景使得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应该爆发一场欧洲战

争成为理所当然。许多士兵、军官和权势人物都目睹了葬礼举行，他们的反应是激动、不理性的。假如依照其民族风俗安静地下葬弗朗茨·斐迪南，许多奥地利人只会对他有短暂的严肃同情，然后想起他诸多的错误。他们当然会想到是弗朗茨·斐迪南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在塞尔维亚节日之际，对塞尔维亚边境地区进行了一次不得体且具有侵略性的访问。他们可能也会想到这些品质不单单属于他自己，也体现在他的家族身上。弗朗茨·斐迪南魔女之夜般的葬礼恰当的结局莫过于蒙特诺佛亲王解职、奥地利宪法大幅修改、哈布斯堡家族及王朝的影响力下降以及维也纳尝试恢复道德。但是要采取以上任何一个行动，奥地利都不得不照照镜子。奥地利反而倾向于把自己激发成一个对有关斐迪南的记忆的忠诚的愤怒者。人们只能想起弗朗茨·斐迪南曾是弗朗茨·约瑟夫的敌人，而现在弗朗茨·约瑟夫亵渎了他的遗体。皇帝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而身为一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弗朗茨·斐迪南也必定像皇帝一样神圣。有人认为，如果弗朗茨·斐迪南生前与这位老头儿及他的朝廷存在争执的话，他就很可能是正确的。人们对于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贝希托尔德，对于此二人所促成的帝国侵略政策都迸发出狂热之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和贝希托尔德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的人选。但是死者是义愤填膺的；他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说他已经消除了这些苗头，也不能去抗议这些他曾批判的人以为他报仇为由推出他曾废止的政策。整个维也纳都觉得弗朗茨·约瑟夫的和平主义应被嘲笑为一个老人的愚蠢，而奥地利应该向塞尔维亚宣战。

宣战的理由是指控塞尔维亚政府唆使阴谋者刺杀了弗朗茨·斐迪南。在过去二十年间，特别是1918年非常明显，慵懒愤世的自我批评情绪困扰着这些大国，在这样的情绪背景下，人们经常假设这样的指控是有证据的。许多论文和书籍都已明确陈述过塞尔维亚政府知晓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茨的谋杀企图，为他们提供了炸弹和左轮手枪，并把他们送回波斯尼亚。有时人们甚至提出是俄国和塞尔维亚两国政府共同犯下罪行。

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能够支撑这些指控。

一位研究欧洲事务的当代著名作家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塞尔维亚政府和俄国政府的复杂性。我问过他权威性何在，他说没有。一个并不亲塞尔维亚的著名英国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一战”爆发后他就一直在找寻关于塞尔维亚犯罪的证据，但是一无所获，连一点犯罪的迹象都没有找到。

显然，是一些塞尔维亚个人教唆了这些谋杀犯并为他们提供了武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塞尔维亚政府负有责任。如果某些与德·瓦勒拉毫无关系的爱尔兰人为爱尔兰裔美国人提供炸弹并谋杀了罗斯福总统，美国是不会因此向爱尔兰宣战的。在开战理由确定之前爱尔兰人跟他们的政府就应该先建立联系。但是塞尔维亚政府与斯格诺维奇、坦科斯奇，以及给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格拉贝茨提供炸弹的不明身份个人之间没有被发现任

何牵连。他们确实是“黑手会”成员。“黑手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对卡拉乔尔杰王朝以及当时掌握政权的政党都怀有野蛮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一种虚构，它体现在塞尔维亚哨兵在帮助谋杀者越过边界时采取了防止被发现的措施这一点上。

只有两个原因似乎证明塞尔维亚政府的嫌疑。第一个是炸弹上的标记，这些标记清楚地表明炸弹是由位于克拉古耶瓦茨的塞尔维亚国家兵工厂制造的。这条证据看起来足以定罪，但实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巴尔干战争期间，大量的炸弹被分发给非正规兵团和常规部队。许多士兵把这些炸弹储存备用，以备日后平民生活出现困难时的需要。搜索许多塞尔维亚农场的外围建筑都会发现一些炸弹储存。坦科斯奇想得到多少炸弹都没有困难，也无须向当局申请。另外一个颇具嫌疑的情况是几名塞尔维亚军官否认对罪行负有责任，而另外几名军官假设确定预先知道这起谋杀，而预先知道就近乎对这起谋杀负实际责任。这个情况的价值在巴尔干奇特的政治氛围中是要打折扣的。一个世纪以前斯拉夫人中没有哪个政治领导人能够站出来，直到在与土耳其人的游击战中那位表现杰出的领导人出现——这场战争常常涉及很难分辨是否是暗杀的行动。正因如此，一个完全受巴尔干传统滋养、农民出身的政治家，比如塞尔维亚总理巴希奇先生，在被怀疑串通他人谋杀一个国家敌人时所感受到的尴尬，与同时期的英国人，比如巴尔弗先生或者阿斯奎斯先生所感受到的相比肯定不同。毕竟一个爱尔兰政客，只要考虑到选民的善意，就不会觉得迫切需要把自己从被指控参与谋杀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嫌疑中开脱出来。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见面的线索，也没有任何书信让巴希奇先生与这些谋杀者建立起无论多么遥远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包含与先前或之后成为他敌人的人之间的调解内容。必然会有中间人，可他们从未显露身份，尽管这个民族好辩多话。巴希奇手下的教育部长名叫柳芭·约万诺维奇，他不停地写文章吹嘘说，他与贝尔格莱德的朋友几个星期前就已经知晓了萨拉热窝的行刺阴谋。但不厚道的研究员们发现，七年前对于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谋杀事件他也发表过相同言论，而那起阴谋的成员愤慨地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和他之间毫无瓜葛。事实上，约万诺维奇先生在巴尔干的角色，就好比无缘无故系了一条老式伊顿领带的英国人。

另一方面，有压倒性的理由证明塞尔维亚政府不会支持这个或者其他任何阴谋。在那个特殊时期，塞尔维亚不想发动战争。卡拉乔治维奇王朝肯定急切地希望避免战争。由于健康长期欠佳，彼得国王刚刚任命儿子亚历山大为摄政王，而且共和党也注意到国王不得不忽略掉皇长子乔治，因为乔治精神错乱，不可救药。巴希奇先生和他的政府更不可能渴望战争，因为要为普选做准备，他们的机构处于无组织状态。皇室家族和部长们都对塞尔维亚的军情忧虑不安。他们的国家虽然赢得了两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却因此被消耗殆尽。没有钱，没有运输，没有军火，只有一支彻底厌恶斗

争的农民军队。他们不会知道什么补救措施，因为补救措施不存在。理论上他们只能依靠来自法国、俄国以及有可能来自大不列颠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在奥地利入侵的情况下，地理因素会阻止这些大国给予其实际援助。

事实上，卡拉乔治维奇王朝及其政府非常清楚，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只能指望以一种最为痛苦的方式溃败，而只有他们的同盟国，无论是谁，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赢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获得赔偿。如果和平能够维持，卡拉乔治维奇王朝及其政府就可以巩固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果实，开发他们征服的领土，组织被忽视的资源。无可否认，塞尔维亚意图最终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以及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省份。但当时还不是恰当时机。如果它想以此种方式实现目的，它就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而事实上，它确实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三分之一的人口去实现一个理想。有很多反面证据表明它没有如此选择。在谋杀案发生时，塞尔维亚的预备役士兵刚刚完成年度训练返回家乡，总司令在一处奥地利温泉疗养，也没有哪个参加完巴尔干战争返回家乡的奥地利斯拉夫人接到要跨越边界的通知。但正面证据更为明显。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简略地要求不仅对方要惩罚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塞尔维亚人员，而且要在塞尔维亚设置奥地利及匈牙利官员镇压泛斯拉夫主义。除了一些细节问题，巴希奇先生几乎屈从了全部要求，并且请求说他不同意的条款不应被视为拒绝，而应该交由海牙国际法庭进行仲裁。这一点可以看出塞尔维亚的态度里没有好战的迹象。如果它为了使战争成为可能而促使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话，那么它现在快要丢掉自己的优势了。

除了最有偏见的人之外的所有人都应该承认塞尔维亚政府是无辜的。但罪行就重重地压在“黑手会”身上。事实上，这次事件中还有另外一段曲折的故事。似乎很可以确定的是，罪行不是出于完全的意图。我们可以怀疑，当“蜜蜂”将这几个年轻人派往波斯尼亚时，他是否真有哪一瞬间相信他们会成功实施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他和当局一样清楚本国的军事和经济困难，也和他们一样不想要战争。而如果他真的想，他也不会选择这几个特工。当这些阴谋者第一次引起他注意的时候，只不过是两个十九岁的弱小男孩——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他了解到他们在萨拉热窝唯一的革命联系是通过伊里奇；这条信息来自格奇诺维奇，他是个知道波斯尼亚所有动乱的流亡犯，同时他也一定知道伊里奇在恐怖行动方面是多么地缺乏经验。“蜜蜂”也一定从手下那里了解到普林西普枪法不错，而查布里诺维奇以及后来加入他们的格拉贝茨，甚至无法将子弹射进墙壁。他肯定意识到了左轮手枪在这些不熟练的人手中几乎无用，而炸弹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这些炸弹不是俄国恐怖分子使用的一旦触发就爆炸的那种，而是在堑壕战中使用的炸弹，投掷前必须碰击坚硬的实物，几秒钟后才会爆

炸。在人群中投掷这种炸弹是极为困难的，任何士兵都怀疑查布里诺维奇从来没有命中过目标。

反之，“蜜蜂”稍费点力气就能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军火，此外，那些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具备熟练射击和投掷炸弹技巧的塞尔维亚爱国者，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就认识一个黑塞哥维那人。他是一个非凡的射击手、老练的士兵。他就愿意接受“黑手会”指派去暗杀压迫斯拉夫民族的任何人。他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疯了。”他的提议从未被接受。人们很想知道“蜜蜂”的性格是不是像与他同时期的人们认为的那样。他渴望鲜血，跟很多事情有所牵连。尽管不是主谋，但他参与了针对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谋杀活动。他其余的名声来自他自己承认参与策划谋杀黑山国王尼古拉、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德意志末代皇帝恺撒以及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然而前三位君主是因病而死，最后一位当时仍然在世。“蜜蜂”沉迷于对流血事件和叛国通敌的幻想中，他没有将此幻想变成事实，有可能因为相对于事实他更倾向于富有诗意的幻想，也有可能因为他理性地考虑到了自己的肤色和种族。

有个真实情况告诉我们，“黑手会”确实轻看了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当时的记录中读到，拿出左轮手枪或者炸弹想刺杀这个或者那个奥地利专制工具的那些男孩儿们，最后却丧失勇气，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中。这种失败的企图肯定比记录下的要多很多。“黑手会”自然就成为有此类企图的孩子们向其要求提供武器帮助的团体；能够知道“黑手会”有多频繁地发放那些从未使用过的军火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看起来重复工作滋生了武器分类中的马虎大意。因为当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拿出斯格诺维奇和坦科斯奇提供的氢氰酸的时候，它对两个人都没有作用。模糊的说法是“坏掉了”，但氢氰酸不属于那种会不幸坏掉的物品。简单地打开，那氢氰酸却没有迅速挥发。斯格诺维奇和坦科斯奇给孩子们的就是白水或者其他无毒液体。如果他们确信这起谋杀的效果，他们就不会用此类物品替代。他们一定知道假如孩子们成功了，拷打招供之后他们就会陷入极端恐惧中，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三年后，塞尔维亚政府处决了“蜜蜂”，对于他的秘密审判成为巴尔干地区历史上最令人疑惑的事件之一；唯一清楚的事情是，他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联。坦科斯奇和斯格诺维奇则以更不为人知的方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只有一个参与此次谋杀行动的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普林西普觉得他应该干掉弗朗茨·斐迪南，他把他射死了。但其他人都违其意而行之。那对梦想着将帝国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夫妇，交出了最基本的呼吸权利。幻想着胜利和武力统治的将军们却注定要一败涂地，让自己的军队和国家遭受重创。谋杀者们想投掷炸弹，却无法做到。伊里奇对于谋杀者的命运感到畏惧，只是他的社会价值观迫使他参与其中。在维也纳，为了防御傲慢无

礼的罪行，蒙特诺佛亲王对神圣的哈布斯堡皇室加强了保卫。这种防御措施从奥地利帝国扩展到了流亡犯聚集地区。这些与那个圣维特斯日事件相关联的人物的共同命运之中存在着一种精致的适当性；这些圣维特斯日疾病的受害者们无法抑制地倾向于无意识的运动。

萨拉热窝VII

“你们应该到东正教公墓看看这些可怜孩子的坟墓，”康斯坦丁说，“非常令人触动，你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了。”两天后，在一名法官和银行家的引导下，我们开始了这次旅程。在我们到达之前，康斯坦丁就隐藏不住故事的高潮了。当我们驱车行至山路的半途时，他觉得该告诉我们了。他说道：“可怜的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格拉贝茨以及另外三个和他们在一起的孩子就在那座坟墓里，太可怕了！他们不能被绞死，法律对此是禁止的。在奥地利帝国，二十一岁以下是不能被处以绞刑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他们都没有时间老死，‘一战’结束前他们就全死掉了。”

这确实是这段历史最糟糕的部分。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构成奥地利帝国的这些国家内很难建立起人性化的刑罚方法，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后来建立的国家中的少数官员理直气壮地认为暴力是统治手法的组成部分。萨拉热窝事件的结局表明波斯尼亚人也没必要庆祝自己被奥地利转手给土耳其人统治。

塞尔维亚的氢氰酸失效后，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都尝试了其他自杀方式，却都失败了。普林西普用左轮手枪对准太阳穴，却被一个好事之徒夺走了手枪。查布里诺维奇跳进河里，被警察捞了起来。当时他的一句话由于存在对一个塞尔维亚语单词的误解招致了德国作家们的长期嘲讽。逮捕他的一名警察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中提到，“我给了他一拳，我问他，‘你怎么不继续了？你是个塞尔维亚人，不是吗？’”他说查布里诺维奇用一句已经被过于以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回答他说：“是的，我是一个塞尔维亚英雄。”这被外国评论员们视为表现出查布里诺维奇的极度愚蠢以及他被激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特征。“Yunak”这个单词的基本含义是英雄，但是它的第二含义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这名警察想说查布里诺维奇嘴里说出的是“是的，我是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问道“你是从哪里得到枪的”，然后他会得到答复“从我们的组织得来的”。但查布里诺维奇有说服力地否认了这个对话，哪怕是以这种方式。这就是历史深深隐藏的一面。

这两个青年人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被关进了监狱。圣维特斯日的第二天，监狱与萨拉热窝的任何地方都差不多，因为当地爆发了一场反对斯拉夫人的动乱。动乱的第一轮就摧毁了萨拉热窝最好的酒店以及塞尔维亚一家报社的办公室。次日，动乱演变为一场针对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居民的有组织屠杀。当然，同时还有对塞尔维亚人的反对情绪。许多穆斯林为失去他们的保护者感到悲伤。一些虔诚的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对他们教友的

虔诚感到后悔；大家知道，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克罗地亚的牧师和学生也参与了暴动。但波蒂奥雷克将军还要策划更多的人参加暴动。示威者主要包括贫困的天主教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他们中的多数人来到新建的工厂工作，却陷入令人同情的痛苦泥沼。警察告诉这些不幸的穷光蛋，要是他们想放火抢劫，当局会手下留情，并且他们最好是狠狠地放火抢劫，免得不幸降临到这座城市。

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霍泰克已经死亡，不再需要保护，但数千名军人却进入城区，这一举动让暴动的人群对于警察的提醒印象更为深刻。他们有足够多的人来构成三人纵深的长线将灵柩从教堂传递到火车站。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克罗地亚人和奥地利人。随后他们带着刺刀，高唱着反对塞尔维亚的歌曲徒步前进。他们没有干涉那些骚乱者，他们也不愿严肃处理那些没有积极参与暴乱的人。毫无疑问，人们很简单地领会到这点暗示并享受了特许。人性并不那么美好。

但是这场动乱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高压政治下的无助的受害者。萨拉热窝的一位塞尔维亚权贵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地方拥有一幢房子、一家酒店、一个咖啡馆、几间仓库以及马厩。所有这些，从地窖到房顶，都被有条不紊地洗劫一空。街头的暴乱者们行动就没有如此这般地系统了。当局并没有出手制止那些拿着铁锹谨慎而缓慢地将塞尔维亚人的房屋夷为平地的人。就这样，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物质损失达到二十万英镑。并非所有人都无意识地参与暴乱，许多克罗地亚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冒着生命危险为塞尔维亚人提供庇护，然而死亡的人数太多，以至于数字被封锁了。

没有哪个暴乱者被关押起来，也没有哪个军官或政府官员因为没能维持秩序而遭到降职处理。所以，每一个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数超过塞尔维亚人的省市及大一点的村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爆发了骚乱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这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策略，以此抚慰当局，以免自己因没能保护好弗朗茨·斐迪南而受惩罚。但是他有什么理由担心受到惩罚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随后他就得到晋升了。同时，几百名学生被投进监狱，与之一起的是所有有名的塞尔维亚人，或是教师，或是牧师，或是宗教人员，甚至是戒酒协会成员。“一战”刚刚爆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开始了。巴利是位于萨拉热窝上游地区的冬季运动度假村，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有六十个人惨遭杀害。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使得匈牙利的堡垒据点满是俘虏，一半以上的俘虏都死在地牢里。

奥地利开战的理由是自卫，但这个理由很难用来解释萨拉热窝的暴动。它把自卫延伸得太过遥远，用铁锹拆除了当时自然只是理论上被视为挑衅者的房屋。此外，已经被逮捕的那些青年人接受了审问，当局必定怀疑谋杀阴谋可能也牵涉到少数无足轻重的个人，在各个省市发生暴动之前，这种怀疑肯定变成了必然。因为那些俘虏交代了很多。他们以及后来被逮捕的

朋友们都惨遭折磨。普林西普被捆绑在一根橡木梁上，只能用脚趾尖站立。格拉贝茨被罚跪在一只滚动的桶上，不断跌进令人窒息的尘土中，他还被放进一件约束衣中被一遍又一遍地拉扯；当他由于疼痛和缺少睡眠昏厥时，那种异常强壮而凶残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牧羊犬又被放进了他的牢房。很明显，查布里诺维奇逃脱了这些折磨，曾被朋友抱怨的喋喋不休此时派上了用场：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了警察很多事情，直到审判结束他们才发现其所言非真。他捏造了一个非常精明的故事，说是共济会指使了他对弗朗茨·斐迪南的谋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天主教教徒。这个故事转移了贝尔格莱德的嫌疑。但是伊里奇也被逮捕了，对他的折磨足够让他交代全部。让无所畏惧的人先掷出一击吧；但这意味着所有那些不情不愿帮助他越过边境的农夫、商人以及所有在糕饼店里与他闲聊过反抗的学生们，与这些阴谋者一起，都被投进了监狱。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会被逮捕，因为奥地利军队此时已经越过了塞尔维亚边境并取得了部分海关记录，因此能够追踪密谋者入境的路线。这些同谋者在审判前等待了一段时间，这对西方的俘虏来说简直糟糕透顶，但这些奇怪的激进却又冷静的孩子们看起来多少还有些享受，尽管希望的延迟一度让他们痛心。他们在监狱中听到了塞尔维亚军队渡过德里纳河时的枪声，他们期待被营救。但是枪响声却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后来，塞尔维亚战俘也被送进这个监狱。

10月12日，审判开始。这是我们的世界里一种典型的精神错乱，因为在审判前十周，奥地利就已经以塞尔维亚对萨拉热窝事件负有责任为由向其宣战，尽管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判定这种责任是否存在。长期以来，这次审判公众是毫不知情的。只有个别德国和奥地利高级官方报纸被允许派通讯员参加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查布里诺维奇有一次非常聪明地妨碍了审判的进行，他谈到审判是秘密开庭的，当庭长问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指出没有反对派的媒体代表出席。对此庭长给出了回应：“什么！根据你的理解，只有当反对派的代表获准进入法庭才能开庭吗？”这很像我们经常从纳粹那里听到的稀奇古怪的回答。当然，那时也没有英国或者法国的通讯员；这次审判也只能是慢慢地、部分地被揭示给公众。送到维也纳的官方报告正本在那里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才在萨拉热窝发现了报告副本。可以读一下该报告的法语版本；要小心阅读德语版本，因为德语版本为了维护查布里诺维奇捏造的有关共济会的证词，充斥着大量篡改和曲解。这份报告的唯一英文版本收录在史蒂芬·格拉汉姆先生那部令人钦佩的小说《圣维特斯日》（*St. Vitus' Day*）中。

也正因此，现在海外关于这场谋杀有很多误解。这次谋杀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难。人们说：“你们知道弗朗茨·斐迪南没有机会，因为假如普林西普失败了，街上还有七个人要射杀他。”这是市政厅里穆斯林的看法，可这不正确。普林西普不是第一个，但确实是最后一个行刺者，其余行刺者都证

明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人们还认为这些谋杀者是危险的狂热分子，或者至少是堕落之人。但是事实上，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不仅神志正常，还愉悦而有尊严，并且他们的证据和发言展示出他们的个人能力以及较高的文化素养。即使是那些憎恨暴力和狭隘情绪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些审判记录打开了一个并不令人讨厌的世界。

当然审判是混乱不堪的。当一个学生走上被告席，他从是否有前科开始被质问。是的，他曾经因为在一场政治骚乱中殴打教室里的老师蹲了半个月监狱。一个农夫不停哭泣，他被指控帮助谋杀者放置炸弹。这就是他们这类遵纪守法之人的命运：他们生活在重担之间，上有压迫的政府，下有变革的社会极度渴望变得具有压迫性。他们问这个农夫为什么看到炸弹不向警察告发这些阴谋者，他说："没有家族首领的同意，我们不能去做那样的事。"他被判处绞刑，尽管后来被减刑为二十年监禁，还是死在狱中。其他的囚犯表现出斯拉夫民族基本的团结性，他们的谈话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征，脱离向世俗轻快前进的队伍，安心缓慢地讨论精神问题。庭长对一个学生说道："你说你是信教的……那你是一名东正教教徒。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宗教禁止杀人吗？你的信仰是认真的还是表面的？"这个孩子沉思后答道："是的，表面的。"另一个学生解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神秘性，他声称他的爱国主义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而宗教信仰也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奥地利是多么地没有能力为这些有天赋的人带来有秩序的生活——而既然如此它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审判程序令人震惊的混乱不堪就体现出这一点。日期几乎没有被提及，律师想到什么话题就提出来，而不是根据任何逻辑程序。

没有人对伊里奇进行任何反控，尽管很明显他表现得非常不好。一些囚犯带着尊严为生命而战，基本上没有抛弃他们坚定的信仰。然而很明显，普林西普属于另一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总是心情平静，无私忘我，警觉地辩护和解释个人想法，但对人身攻击漠不关心。他没有说出一句不明智、不宽宏大量的话。很有意思的是，在报告记录里，他声称自己是以一个憎恨奥地利人带来贫穷的农民身份犯下罪行的。

但查布里诺维奇则是另一个好榜样，尽管他经常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人们读过这些记录之后就可以非常好地理解了。他一度用一个聪明而模糊的笑话阻碍了审判进行，笑话虽没有完全成功，却也激怒了那些愚蠢的人，这也充分显示出他非常有能力。他以非凡的技巧让他虚构的共济会的故事得以继续。普林西普则与许久之后才到来的英国和法国左翼青年进行了一场辩论。查布里诺维奇以前是一名和平主义者。确实，尽管是一名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但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劝说了很多同学不去参加塞尔维亚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以至于他不能确定他试图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行为是否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关于使用武力是

否正确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被完全说服。他在宣判前对法庭的供词中将此观点表露无遗。他没有祈求宽恕，他恰如其分地将自身罪责归咎于受压迫省份那污浊的氛围，在那里，每个诚实的人都变成了反叛分子，暗杀成为美德的表现。但普林西普总是认为现在并不是波斯尼亚人钻研基本原则的时候。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孩童的他就曾在萨拉热窝与信奉托尔斯泰的人进行过一场冷冰冰的狼狈争论。他说道："说对这次犯罪企图的鼓动来源于我们组织外部的人是在玩弄真相。我们提出了这个想法，我们也把它付诸实践。我们热爱人民。我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了。"

审判按照事先期望的那样进行。被告方辩护律师的发言显示，在奥地利为一名遭政府控诉的囚犯找辩护律师跟在纳粹德国一样困难。为一名囚犯辩护的克罗地亚律师极不愿意提出辩护论点。他开始辩护时说："我们听说过杰出的特别法庭，但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为一个塞尔维亚人辩护对我来说极为痛苦。"但有一位辩护律师鲁道夫·伊斯特勒博士视自己为英雄。他勇敢无畏地指出，在斯拉夫省份对叛国罪的持续审判只能被解释为治理无方。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他的这种无畏更加令人钦佩。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怎能被允许完成辩护是件令人好奇的事。他声称，指控这些囚犯密谋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奥地利帝国分割出去是荒唐的，因为兼并这几个省份的法律基础并不令人满意，总之，兼并没有通过恰当的方式获得批准。很显然第一条提议可以被怀疑，但是第二条足够合理。奥地利和匈牙利议会都没有依据必需的《合并法案》进行投票。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是又一种草率行为。但这给这起事件增加了一种奇妙联系，即普林西普拥有法律权利前往萨拉热窝的任何地方，而弗朗茨·斐迪南却没有一点儿权利。

当然，一切皆是徒劳。伊里奇、一位校长、一个退休的电影放映员、那个哭泣的农夫以及一个斯多葛学派人士被判处绞刑，他们都参与了藏匿和运送弹药。四个月后，前三人在萨拉热窝被绞死。后两人得到缓刑，分别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和终身监禁。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以及格拉贝茨要不是未满二十一岁，肯定也会被判处绞刑。他们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每月禁食一天，每年6月28日要在地牢里待上二十四小时。其余阴谋者被判处从三年到终身不等的时间长度的监禁。这些判决并不十分过分。要是在英国，普林西普可能会被处以绞刑。虽然如此，沉思这个结局时也不能没有恐惧和怜悯之情。十三名密谋者被关进奥地利监狱。三年半后，"一战"结束。在战争结束前，已有九人死于狱中。

我们很清楚对普林西普的缓慢谋杀，是如何通过斯拉夫警卫和医生实施的。他被带到一处建于18世纪、位于布拉格和德雷斯顿之间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要塞。奥地利人不肯把他留在萨拉热窝，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战争并没

有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们担心波斯尼亚会落入塞尔维亚人手中。普林西普被关进一间地下牢房，要塞里污水汇集成沼泽，恶臭充斥着整座监狱。他戴着镣铐，没有取暖器，没有书可读。圣维特斯日当天，他的一根肋骨断裂，一只胳膊骨折，却没有得到恰当的医疗护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他的这只胳膊变成结节状并化脓，身体也感染了病菌。他曾三次自杀未遂。在监狱里，求生或求死的方法都很少。1917年，他的前臂因败血症过于严重而不得不实施截肢。此时，查布里诺维奇跟格拉贝茨都已死亡，据说是死于肺结核。至少格拉贝茨在被逮捕前是个非常健康的孩子。手术后，普林西普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他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尽管由于截肢再也不用戴手铐，但是腿上依然套着沉重的脚镣。他于1918年春天死去。他在深夜被埋葬，当局采取了大量措施隐藏其埋葬地点。但奥地利帝国还要最后一次展示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马虎大意。挖墓穴的士兵里有一个斯拉夫人，他仔细地记下了墓穴位置；和平之后，他把信息给了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根据残缺的外形确认了普林西普的尸体。

普林西普看起来像是在狱中勇敢地承受了很多苦难。他的死以及我们听到的他生前的所有事迹中都有一种高贵节操。他将自己全身心地献给每一个大事件，以便彻底领悟这一事件如何揭示宇宙之本质。他只是一个渺小的精神错乱的狂热者，在监狱里跟他成为朋友的捷克医生提供了证据，揭露出普林西普在他参与的那部分谋杀事件中表现出了怎样的克制和深思熟虑。从法庭记录来看，人们会猜测他没有私人关系，他可能是个孤儿，无论如何都会专心于政治活动。然而他却不断对那位捷克医生谈及自己亲爱的母亲、兄弟、兄弟的孩子以及他爱过并希望迎娶的一个女孩，尽管他从没吻过她。

查布里诺维奇受到了不同的惩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更为幸运。他碰巧在监狱里与弗朗茨·韦费尔有过短暂接触。弗朗茨·韦费尔是战后奥地利最伟大的作家，他当时在那里做医务兵。韦费尔在一篇文章中记录到，他很震惊地发现自己之前想象的那位残忍疯狂的斯拉夫刺客竟是一个温和柔弱的男孩，对自己的悲痛只微微一笑。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确认，查布里诺维奇在监狱里展现的品质是对普林西普单一思维的对立或者补充，这惹恼了他那些没有天赋的朋友们。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经验，玩弄它，讨论它，夸大它，轻视它，抱怨它，嘲笑它，试着用上他所有的智慧和情感潜能。这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摧毁的暴政一样令人憎恶。尽管不可否认，如果奥地利帝国不是在其走向崩溃之际凌驾于他们头上的话，他们也许会是好人，甚至是伟大的人。但是帝国巨大的脆弱性里已潜藏着这样的灾难。

在公墓里，我们暂时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公墓如此优美地坐落在这如碗状倾斜的小镇上。在萨拉热窝，这已是司空见惯的风景。萨拉热窝的山脉轮廓参差错杂，永远呈现出一幅全新画面，思绪会脱离生命融

进这环境里。当我们经过公墓大门时，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又忘记了身处此地的理由。离这些坟墓不远的草地上有一座新坟，上面竖着一个木质十字架，残破的黏土上插着几根燃烧的蜡烛。一位年轻军官站立坟前，面如蜡色，身体痛苦地摇晃，声音细微地做着祈祷。他的制服极为整洁。然而当我们悲痛地注视着他时，他解开了外套，像是要脱衣服，但立即又系上了扣子，仿佛他是一个护士，在从容不迫地照料着自己错乱的神经。

这就是斯拉夫人，这就是斯拉夫人应该具有的模样。他完全沉浸在痛苦当中，他在学习死亡的意义，而且与之相关的知识他都不会拒绝，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他绝不会选择感受阴影更少的痛苦；如果他感受到的是欢乐，他会允许自己去感受所有可能的欢愉。他只知道在痛苦或者欢愉中，他决不能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是身体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保护他自己以及他的人民，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的道路上经受考验并获得关于宇宙的启示。

没有其他更好的生活方式能让人理解自身命运、远离邪恶生活。可是对于无数欧洲人、对于无数大不列颠人而言，这个患有麻风病的人令人作呕。感受痛苦并不舒服，疯子才会对痛苦敞开心扉。要承认由于缺乏知识，我们对于自己的野蛮愚蠢行径几乎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是令人不快的。更令人不快的是，整个一生我们都要学习，尽管知道我们仍然会在无知中死去，我们仍有义务继续学习、了解痛苦。要做这些事就需要对完全隐秘和未知之事抱有信心，就需要丢弃所有保证舒适存在的既得物品和必然事物，唯恐它们会在一次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甚至绝不舒适的旅行中阻碍我们。因此，欧洲许多不渴望真理的人会说：“让我们杀掉这些献身于疯狂的斯拉夫人吧，让我们奴役他们，以免他们让财富变得没有价值并最终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可不乐意见到我们。”

法官和银行家说：“看，他们在这儿。”靠近公墓的栅栏的位置，萨拉热窝事件的密谋者躺在三块厚厚的石板下，其中有人被处以绞刑，还有五个死于监狱中；泽热伊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试图谋杀波斯尼亚总督瓦尔萨宁将军，但被踢倒在地。中间的石板被提高了。普林西普的尸体就在这块石板下面，左右两边是其他人的尸体，孩子们的尸体在一边，大人们的尸体在另外一边，因为这个国家普遍认为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差别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坟墓很不起眼。好像是一双随意的手把他们扫进了石屉里面。石板上摆放着一个破旧的花圈，锈迹斑斑的灯台上闪烁着几支蜡烛。这种凌乱没有任何意义。穆斯林习惯于真实地对待死亡，他们认为死亡留给我们人类的就是化为泥土的过程。他们只为与终身制度相关的神职人员、统治者或者伟大的军人建造坟墓，而这些坟墓从任何意义上来讲都算是纪念碑。穆斯林对待这些坟墓时会更为小心地保持虔诚，而不是使其保持整洁。毕竟，杂草丛生的石板比光滑的大理石更为适合纪念

死亡。这种态度非常合理，以至于从穆斯林传播到了一个又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冷漠无情。那位在新坟墓十字架前摇晃身体的军官或许直至死亡也无法完全摆脱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把这个坟墓装饰成花园的过程中他能获得任何满足。当我们站在破旧纪念碑旁边时，公墓外一位路过的老妇人停住脚步，她的脸压在栅栏上，朝下看了看石板，又退回去开始祈祷。不一会儿，一名驾驶装载着蔬菜的货车路过的年轻男子也跟着老妇人一块儿祈祷，他惊奇地注视着坟墓，用手在额头和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

他们的脸上丝毫没有像安德里亚斯·霍弗注眼睛里闪烁的那种雀跃情绪。他们像是在思索一个秘密，他们确实如此，因为萨拉热窝事件如历史、如生命般神秘。在所有这些被扫入大石屉的人当中，只有普林西普一个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次彻底的行动。查布里诺维奇假设他们的行为是实验的基础。他的这种想象只来自大脑，而非来自鲜血。其他人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想象起来很有意思的事件，我们在宇宙中感受到的惰性断然不会使其发生，这种惰性是生命对人类意志的抵抗，尤其是在做出任何特殊努力的时候。对剩下的人而言，对那些非自愿帮助谋杀者越过塞尔维亚边界的不幸农夫和商人而言，此次事件一定像是他们国土上的麻烦变成了像瘟疫或者饥荒一样盲目的灾难。但是像普林西普认为的，行动从没发生过。从一开始这个行动就与另外一个行动纠缠在一起。可怕的是，看起来根本没有人相信的一场谋杀却作为一种幻想继续存在，因为有些人向往它。这些人要求得到的所有尊重基于他们的务实品质，当误入幻想的包围圈时，他们会丢弃所有的克制。这两个行动中有一个如此强大，以至于杀害了数百万人，留给我们文明社会的所有生物某种程度的残缺。我把它当作神秘事件来记述，因为在我看来，在所有西方人看来，这个行动就是以神秘的方式发生的。但是对于实实在在看到它发生的人及在其东部的一些国家而言，这是一次神圣的解放运动。这些民族中也包括西方必须承认拥有智慧和文明的民族。

这次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在以下矛盾之处不失为生命的象征：它宽松散漫，缺乏决心，却成立了紧密组织并顽固地追求结局；它出乎意料，不合逻辑，却遵循由因到果的直线联系；它是件坏事，却也是件好事。它表明人类意志可以做任何事，表明意外可以达成一切，表明一个人要是坚持获取知识，他就会为一个徒劳的理由丢弃和平，因为对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知道得越多，它就变得愈加费解。它也表明道德判断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灵魂应当选择生命。当波斯尼亚人选择生命而谋杀弗朗茨·费迪南的时候，也为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选择了死亡。而如果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也能够选择生命的话，他们也就为波斯尼亚人选择了死亡。这些数字无法相加。为这种计算绞尽脑汁是疯狂的。但是除了做这种计算之外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只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算术工具……我们经过那座新坟走出公墓，那里的那位年轻军官正试图以一种斯拉夫的方式做着这种计算。阳光突然闪现，使得烛火比黑暗更为阴郁。他身体向前摇摆得太剧烈，以至于不得不抓住十字架稳住自己。自律使得他又站稳了脚跟。

---

1. 安德里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1767—1810），拿破仑战争时期奥地利的爱国志士、军事首领和人民英雄。

伊利扎

我们出发前往萨拉热窝外的一个村庄。奥地利人在这个村庄修建了一座赛马场，弗朗茨·斐迪南在遇刺的前天夜里就在这个地方。路况糟糕透了，车颠簸得让我们就像弹起的皮球。康斯坦丁的前额上挂了个泥点。他告诉我们说：“萨拉热窝像一个村庄般拥有灵魂，尽管它是座城镇。那么，为什么一个村庄会有灵魂呢？因为它得到了灌溉冲洗，因为那里有河水流经，有气流通过。如果水流经城市，它就不再是水，它不清澈了，可能会引起一只骆驼的挑剔；如果空气吹过城市，它不能被称作风，它在房屋之间丧失了力量。因此宗教变得合乎道德，富有哲理，能够赎罪，而不是变成一种迷幻或者宇宙论。”“但是在萨拉热窝，”此时车子从一条车辙中抬升起来，不像是来自发动机的运转，倒像是老虎跳出深坑的运动，他继续说道，“有一种充满生机的观念灌溉着这座城市，使它像一个村庄般清新。在这里，斯拉夫人，非常好的斯拉夫人，他们被赋予感知和思索的强大能力。他们在这里遇到了最辉煌的土耳其帝国，也就是最辉煌的伊斯兰教和波斯。我们吸取了它的精华，包括军国主义、自豪感以及最为重要的爱的观念。如今奢华不再，军国主义也已消失殆尽。那天上午在火车站你们也看到了关于自豪感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存在着爱。这是一个美好的观念，它可以更新和再生，它就是清澈的水和强劲的风。”

“这种爱的观念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丈夫问道，他刚被汽车颠到双膝点地。康斯坦丁无法从我瘦小的后背移开身体，他说：“这种爱的观念使还是小男孩的我们专心致志地阅读《一千零一夜》，这样外婆就会经常说‘他是多么热爱阅读，我们必须让他做一名牧师’。顺便问一下，在整个欧洲，甚至在你们本国的幼儿园里，这本书被视为一本儿童读物，这不很特别吗？好像我们的文明对过于在天真的氛围中培养孩子的做法感到担忧，却不承认这一点。它让另一个种族以一种异国情调和伪装的方式来掌管所有被禁止的知识，这样它就可以不被当作不能解读的东方护身符，尽管这些特征从审美角度来看都值得赞赏。”“关于这种爱的观念，”我的丈夫边努力恢复坐姿，边揩去眼镜上的泥巴并说道，“你是指带来消息的丑陋老妪，黑暗房间里的漂亮女人以及坛子里的潜伏之物？”“是的，就是这样，”康斯坦丁说，“老妪谨慎地追求需要信仰的场合，面纱下闪烁的眼神一瞬即逝，格架上的围巾如波浪般摇摆，顿时成为美丽的承诺和对狡黠及勇气的挑战，因为坛子里可能藏有机智的埋伏，可能会有宦官的宝剑带来的死亡。它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他重复说道，像摇篮里的婴孩般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尽管此时他实际上悬浮于空气之中，“这种爱的观念要求爱情应该突如其来，具

有秘密性和危险性。你们来自西方，对于爱情没有这样的观念。在你们看来，爱情必定如同植物生长般缓慢进行：男人和女人必须经过数月来彻底了解彼此的性格，必须许下庄重的誓言来满足彼此的需求。你们也认为假如男人想立即向女人示爱，对女人来说是一种侮辱，而假如尚未相处很长时间，女人就把自己献给男人，那么这个女人也毫无价值。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真理。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巴黎，尽管我有两个情妇，有时我也会到街上带回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野蛮人，因此我可以不必等待。那没有什么。但是爱情可以是突如其来的，并与此完全不同。它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以至于一次邂逅就可以激发出爱情，仅仅这次邂逅就可以让情人得到满足。

“如果你能让他们一生一世在一起，你就不能在老妪打开房门后给他们仅此一夜的时间。不，这车不会翻。明年你们再回来的时候这条路会更好。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并且我们会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没有时间。单单是眼神的一瞥就能够恰当地激发出这种爱情来。假如最细微的接触都不足以表明爱情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爱情，不能被称为最根本的亲切感。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应该是突如其来的。

“爱情必须是神秘的，因为嫉妒既是这种突然来临的爱情，也是另一种缓慢发生的爱情的一部分。一个创造了奇迹、让一个女人幸福了四十年的男人不能够忍受四十年里的某一夜，这个女人的幸福需要另外一个男人来满足。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只见过一面，就让这一次见面在女人的记忆中留下极好的印象，犹如在月亮上度过的夜晚，他也不能够忍受他不是由这个女人擦鼻涕的十一个孩子的父亲。因此这些男人不可以知道彼此。我们为我们的荣誉会像公牛一样咆哮，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种爱情也一定是危险的，否则它就不是这种爱情。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会珍惜一件事物，除非他为此事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这是庸俗的。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知道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掀起面纱可能会有死亡的危险，当她还没有接收到这种伟大而突如其来的爱情暗示时，她很可能会掀起面纱——如果她只是个野蛮人。其实，如果没有危险意识，女人和她的情人也不能彻底地完成这种爱情。他们不会闭上理性的眼睛而让自己陷入激情的深渊，除非他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体验激情或者其他任何事。

“我认为，这种爱情的观念比其他国家所知晓的任何事物都更为了不起。法国人为了生命而做爱；所以，像生活一样，它常常变成低于它自身的某物，变成一些日常琐事。德国人为了死亡而做爱；他们喜欢脱掉便装而穿上制服，因为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被杀掉，因此他们喜欢脱离安全而随意的社会关系并释放性行为的毁灭性力量。《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选择性亲和力》就是如此，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他们过于滥交以至于性行为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诋毁法国人和德国人，因

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热爱都是必要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使得对生命和死亡的热爱在单一经历中合而为一。这样的情人会立刻意识到危险的极端性，以及让危险变得既可怕又充满挑战性的事情。”

“但那就是所有冒险的实质，”我的丈夫说道，“其实它是——”“是的，是的，你说的是事实，”康斯坦丁说，当他认为说话的人不应再多谈时经常这样打断对方，“正是这种爱的观念赋予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生命力。这种传统存在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即使是现在，有时也会有老妇人递送这种消息，而这个消息只能由一人阅读，并且我认为如果没有祭品安抚神或者女神的话，小镇高处山腰上那些小餐馆周围的李树就不会如此自由地开花。”“你认为，”我的丈夫说道，“长了一半的玫瑰绝不会那么红。”“但是我敢肯定，”康斯坦丁继续说道，“这个观念赋予小镇一种特殊的风雅。小镇里，男人女人们的生活中有另一种内容，因为他们的心里容纳得下第二种爱情。他们没有因其压抑性而受到伤害，并且他们满怀希望。我想这就是这里有那么多嘴唇和眼睛里闪露出孩童般光泽的女人的原因，以及这里的男人不痛苦怨恨，不匆忙草率的原因。感官享受也是一种神秘主义，”——他大声说道——“一个种族能为自己创造什么更好的东西呢？但是这里是伊利扎，是我们神奇的伊利扎！”他一下子从甜蜜的遐思跳跃到令人震惊的愤慨中：“伊利扎，我们的‘波特金村’！他们建造这个村庄，向外国游客展示他们如何将文明施加于我们这些野蛮落后的人身上，就如波特金在草原上修建村庄给外国使者留下俄国繁荣的印象一样，‘空心村’前一天被修建，后一天被拆毁。来吧，在我们的野蛮之地看看他们的文明！”

眼前的公园一半是杂草丛生，灌木丛后等待我们的是温泉浴场，但这座温泉浴场实在不令人满意。在以前它肯定被维护得更好，现在它看起来与其他任何南斯拉夫温泉浴场都一样。农夫跟小店主们经常光顾这些浴场。里面一片狼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浴场了。这个地方的建筑艺术并无魅力。一条游廊通向中心餐馆和丁点儿大的泵房，连着一排不像样的酒店。每一座建筑都被厚重的门廊栏杆和工艺粗糙的阳台以及精致的木制品拥堵得喘不过气。此时所有酒店都关门了，直到高温将人们驱赶出城市，它们才会开门营业；我们漫步寻找波斯尼亚酒店的业主。波斯尼亚酒店是这里最大的酒店，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霍泰克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夜。“我想他们保留了为迎接这对夫妇到来而修建的小礼堂，”康斯坦丁说道，“并且我知道他们使斐迪南夫妇的房间保留原样，因为我见过那个房间。这个套房常常被皇室家族或者总督预订，它完全是穆斯林风格，一种了不起的穆斯林风格。战争期间我在伦敦停留了五天，它就像我在你们伦敦见到的卡多马咖啡馆：一式的嵌花小桌上杂乱地摆放着许多东西，而就像你们看到的，穆斯林房屋的主要家具是灯。我也想让你们见见我的朋友，他是这个温泉浴场的主管。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而他妻子的妹妹会很愿意

和你们谈论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她们不读其他任何东西，她们是伊妮德和格尼薇儿。”他挥舞着手臂，好似长袖飘飘，伸长脖子，像极了一只天鹅，“来了一个拿着钥匙的人。”

然而他们仅仅打开了波斯尼亚酒店拱廊里一间小店铺的门，但是这个人很愿意交谈。“他说，”康斯坦丁说道，“他们尽全力让这个地方保持清洁，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夏天来这里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并不富有，不像那些奥地利、德国和英国贵族，过去常常来这里看波斯尼亚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是多么的美好。但是他不会让这个地方变得不同，从孩提时起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且热爱这个地方，因为他是个非常爱国的南斯拉夫人。但是伊利扎真是令人厌恶。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只修建了这些酒店和我现在就要带你们去看的赛马场。所有来此亲眼见识过的达官贵人会说，‘啊，波斯尼亚是这样的，除过草的砾石道路，崭新的房屋和美味的啤酒，太便宜这些斯拉夫牲畜了’。”他模仿着贵夫人的语气，脸从一边转向另一边，旋转着一把在想象中打开的阳伞。

带着钥匙的那个人一直注视着。他突然把钥匙扔到路面上并越过我们开始向地平线处大声呼喊——像特尔沙的年轻人，像船上拿到冷掉的汤的年轻人，像来自赫瓦尔的酒店经理。“是啊，是啊，”他大声叫喊道，“他们让我们的男人和女人跟着他们跳科洛舞，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土著人，就是野蛮人，而我们不得不给他们跳舞，就好像我们是展会上的熊一样。”他弯腰捡起钥匙，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把钥匙扔在地上。“身为士兵的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士兵，当一个男人投入战斗时，他可能会被叫到他的上帝面前，他们让我们基督徒戴毡帽！是的，该死的土耳其人的毡帽是我们全部四个波斯尼亚兵团的头饰！”

他又一次捡起钥匙，引导我们沿着走廊到了火车站。以巴登巴登或者马里昂巴德的风格来看，这座火车站确实非常宏伟。我说：“我感觉这里荒诞而令人不快。”“我带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让你们高兴，”康斯坦丁说道，“我带你们来看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你们高兴，这个你们应该理解。那么现在，请看我指给你们的地方。这座火车站很脏乱，不是吗？油漆已经脱落了，铁丝网笼里没有生长着鲜花。你们能看看车站外那片砾石中央的那棵栗子树吗？你们看到在那棵栗子树周围长满了杂草吗？现在，我要进行一个测试。假如你得救了，假如你知道灵魂是什么、民族是什么，你们就能发现这棵树现在长在杂草丛中，要比在干干净净的环境中长得更好，因为这些杂草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它们就象征着我们尚能在波斯尼亚维持的秩序，而干干净净来自另一个民族，并且因此毫无意义，它们不能在这里继续存在，因为它们不是这个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我说，“我不认为英国人废除殉夫自焚旧俗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也不认为白人神父们在非洲

行医治病是错误的。”“难道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必须做吗？”康斯坦丁说道，“我们南斯拉夫人在马其顿消灭了疟疾，并且我们正在解救被土耳其人践踏进烂泥里的农民。但这些事情本应该由自己民族来完成，而不是靠局外人来做。”“瞎扯，”我的丈夫说道，“如果一个民族彻底地屈服了，无法保持独立和维持自己的风俗，那么局外人就必须介入，帮助它重新站起来。麻烦在于这种喜欢帮助不幸民族的局外人不会去着手帮忙，除非他们集团中的其他成员看到能够从中牟取到军事或者商业利益。但是如果你指的是一旦波斯尼亚人摆脱了土耳其人的束缚，奥地利人没有为其提供什么，且在这里无事可做，而波斯尼亚人仍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古老斯拉夫文化残余来照看他们自己，那么我同意你的观点。”“呃，你说的是正确的，但是很不简练，”康斯坦丁抱怨道，“我说的不完全正确，但是却如此地干净利落。”

但是在这花园般的平原上由这座赛马场所绘出的黑白图案之处，奥地利人干涉的无关性看起来最为明显。此时的景色非常迷人。跑道上满是觅食于鲜草丛中的牛羊。舒适、悠然的贪婪之心驱使着牛羊，谈不上是风的活跃气流从绵延回萨拉热窝的巨大茶色山谷中静静地倾泻下来，微弱的牧铃声婉转悠扬。没有长草的泥土呈现出一抹红色；挺拔的白杨树犹如一道道喷射而出的绿金色寒光。平原上散布着基督徒粗糙的白色农场和村舍；在每一个景色宜人的斜坡上都矗立着一幢穆斯林乡间别墅，平稳坚定地闪耀着白色的光泽，与果园上空的洁白云朵交相辉映。一幢别墅矗立在赛马场近旁的小山上，有一种紧凑的愉悦感，犹如按照制作玫瑰花瓣果酱的方法浓缩的甘泉，蒸馏大量泉水方能装满一小罐。

而洁白的栏杆当然能够引起另一种欢乐。在兰伯恩丘陵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我看到过一群奔驰的骏马仿佛一行优美的诗词。我想起《约伯记》作者关于骏马这样说道：“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它在山谷中刨地自喜其力……号角每发声，它说，呵哈；它从远处闻着战场的气息，又听见军长大发雷霆和兵丁呐喊……”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快乐，但是对于忍饥挨饿的波斯尼亚农民来说，它又是多么地无关紧要，对于萨拉热窝而言，又是多么地无关痛痒，多么地傲慢粗野。我眼前的景象因为重现出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奥地利社会，色彩令人忧伤，正如梅特涅所预料到的，假如帝国被允许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它必定会变成这样。平淡乏味从坟墓里爬出来，对着草坪喋喋不休：戴着稻草帽的女人有着宽下巴、充满活力而冷酷的眼睛以及金黄的卷发，穿着浅色衬衫和长裙，束着宽宽的腰带；男人表情仿佛口技表演者的玩偶般极为鲜明，有着倾斜的肩胛和僵直的后背。他们大声地喋喋不休，带有生活在消极世界里的人那种夸张的积极性。他们是能够从自身中发动“摆脱罗马”运动的天主教教徒，他们是按照地方标准生活的世界公民，他们受礼仪约束却不承认纪律，虽是鉴赏家的后代，却既不创造也不欣赏伟大的艺术，他们为了一个军人阶级的地位牺牲了所有

的公民利益，战争一爆发，这个军人阶级在每一个方面都完全地平民化，除了它杰出的自杀勇气。

这些人统治、改变、教化着我们在萨拉热窝见过的男人女人们：拥有良好礼貌和学习传统的犹太人；拥有灯光通明的房屋、鲜花盛开的花园并致力于和平的穆斯林；我们在集市里看到过的灵魂获得智慧的老妇；迈着大步，显示出耐力的男人，他知道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当为暴君跳舞或者戴着土耳其毡帽去见他的上帝，正如眼前我们这位拿着钥匙的朋友。对于自东西方有往来起就穿着波斯绸缎的人来说，这些身着长裙和衬衫的女人已然成为时尚的榜样；那些后背僵直的男人前来命令指挥，好比那位在新坟墓边摇晃身体的军官。建造者们来到拥有一百座清真寺的萨拉热窝教授而非学习。他们修建了这些糟糕的酒店，看起来酒店狭小游廊的一端仿佛通向贝克街上的老德鲁斯集市。

特热波维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沿着通往特热波维奇的山路驱车离开了萨拉热窝。山路过于靠近萨拉热窝，又过于陡峭。在这里是看不到城镇的，伸长脖子也充其量只能看到山麓。我们在半山腰停下车，站在岩脊上俯视脚下的果园和乡间别墅，它们就像赛马场旁边的别墅一样，仿佛一小罐一小罐的泉水果酱。一些吉卜赛人站在我们上方的一块岩脊上，八九名女孩穿着夹克和印花布料的裤子，两个男孩在她们面前手舞足蹈，他们穿着皮凉鞋，向上翻起的脚趾看起来就像公鸡爪子。就像他带我们参观城市时做的那样，康斯坦丁用他圆胖的小手臂做出某种手势让这几个吉卜赛人在我们附近打起滚来。许多有学问的人从报纸上康斯坦丁的漫画中认识了他；不识字的人则通过他惊人的敏捷性认识了他。在街角处，他只要挥动一只传神的手臂，我们旁边的男男女女就会用老百姓看到诗人的双重表情注视着他：如同一个成年人观看玩耍的孩童时愉悦的恣意神情，如同一个孩童等待着成年人为他讲述一个神话时狂喜的期盼表情，两种表情混合其中。这些吉卜赛人跑下长满绿草的山坡，站成五颜六色的一圈，对着我们咯咯傻笑。风吹动着他们的长裤，让他们抱紧肩上的披巾。他们给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带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内容，让他们过得不会很糟糕。就好像一个人可以去向一朵鲜花示爱，或者让狐狸和野兔在一个派对上演奏音乐。

道路上方高处的岩石上生长着藜芦，呈现出浅绿色，那里还生长着报春花、樱草、仙客来以及褪去紫色的番红花。然后我们看到了雪，薄薄地覆盖在裸岩上，铺洒在松林间。在雪深之处，我们离开汽车，步行经过一间小屋。要不是房子里有人拨动着古斯勒琴演奏出音乐，我们会误以为这是一间瑞士小木屋。我们来到一处结冰的肩状山峰，厚厚的积雪下面是一道隐蔽的裂缝。我们周围是冒着青烟的波斯尼亚高地，高处的灌木丛辉映着去年秋天的红色，尽管在一些山谷中春天的第一次触碰已经为一片灌木林或者一座高山渲染出蓬勃的翠绿色。这些高地和山谷绵延得恰到好处，向各个方向依次延伸一英里，使得这番景色仿佛一组旋转木马。在这断裂、炽烈的高地之上，竖立着一道琥珀色的云墙。云墙之上两座不知名的山脉拔地而起，一座山脉上的皑皑白雪映照出对于我们而言已然暗淡的午后光明，另一座山脉则烘托出尚未降临的绯红色夜晚。我们看不到萨拉热窝，向下延伸的山谷是一条白水河的巨大河床，蜿蜒曲折的河流渐渐变得宽阔，最终分流作几条小河，白茫茫一片地消散在薄雾中。在近处所有的高地上，羊肠小径纵横交错，连接着散布在茶色山谷里的村落；尽管有些村落有一两英里远，仍有阵阵孩童玩耍声和犬吠声传来。

天气寒冷，我们返回那间小屋。小屋里悬挂着少年国王、国王母亲以及被

谋杀的国王父亲的画像，我们坐在这些画像下喝着热咖啡。南斯拉夫的每个公共场所，甚至是在克罗地亚，都能够看到这些画像。我想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些反塞尔维亚的领土上，是因为一些慈善机构把画像卖到这里而没有人愿意拒绝，但是在其他地方，在那些仍然保有把国王视为人民神父的中世纪观念的地方，它们几乎有着圣像般的地位。一位英俊的青年坐在房间后面，正弹奏着古斯勒琴歌唱，显然他是这间木屋的主人。和他一起的还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无论是从松弛的肌肉、扁平的颧骨还是紧紧缩拢的嘴巴来看，他们都具有斯拉夫人典型的相貌特征。画像中那位被谋杀的国王父亲表情亦是如此，出于对谋杀或者肺结核病所带来的死亡的恐惧，他的表情凝滞呆板。

康斯坦丁喝完咖啡，推开杯子，说道："你们看到这些事物，就努力把它们全部记住吧，因为不久你们就不得不回英国了。我想起我从一个修道士那里听来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亚历山大国王一次去他的修道院观赏壁画的情形。这些壁画中有13世纪时我们古老帝国的塞尔维亚国王的画像，我提醒你们，那些是真画像。在一幅画像前，亚历山大国王站了足足四十五分钟，眼睛直直地盯着画像里的国王，表情十分可怕，就像一个人看到他死去的父亲又活过来时的表情一样。修道士问他是否对这位国王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说：'不是的。我必须崇拜所有的塞尔维亚国王。我必须了解所有的国王，这样新王朝才能建立在旧王朝之上。我必须特别努力地去了解这位国王，因为没有关于他的文字资料让他足够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你们看，他是个神秘主义者，并且因为他的神秘主义的来源是南斯拉夫，所以南斯拉夫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了解他。"

他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弄乱了他黑色的小卷发。"南斯拉夫以外没有人理解我们，"他抱怨道，"我们的名声很不好，特别是在那些傲慢的人中间，他们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秘主义者，而且不像他们那样富有智慧。啊！那位热纳维耶芙·塔布伊夫人在巴黎的报纸上是怎么写我们的呀！她怀疑我们的天性就反对民主，可我们塞尔维亚人除了民主还企盼什么呢？然而我们却不能够拥有民主，因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盯着我们说，'呀，这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必须过来解救你们'。实际上，当她犯下这个错误的时候她并不是出于品德高尚，她之所以犯错是由于憎恨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她憎恨他也不是因为斯托亚迪诺维奇是个坏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对立的。她身材娇小，有些瘦削，形容优雅；他体形硕大，胸膛结实，行动时全身肌肉都会跟着抖动；她觉得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很难维持，而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跟随着他，他仿佛一匹骏马；热爱国家时她是高尚的，而他热爱祖国就像他流汗那般自然；大体上他喜欢喝各种各样的酒，包括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香槟、我们国家生产的小酒和法国的好酒，而她只能喝一点产自一个特殊温泉的矿泉水，她有一个特殊的矿泉水来源。所以他们憎恨彼此。而她由于耽于空想并因此耻于憎恨那些带

着那种精神的人，所以她就假装自己憎恨南斯拉夫。然而就她从事的工作而言，她是伟大的，却又不如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那般伟大。恕我冒犯你的夫人了，我亲爱的先生，我知道她也是一位女作家。”

在南斯拉夫，除了康斯坦丁，我还从没有听到任何其他人称赞斯托亚迪诺维奇。但康斯坦丁是个诚挚的人。他把脸贴在桌子上，合十的双手在前额上摆来摆去。“有一件事情，”我说，“从我站在那些谋杀者的坟墓前起就一直困扰着我，而你上午在伊利扎所说的话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困惑。听我讲，哈布斯堡王朝显著的德国特性以及它不得不对匈牙利人做出的妥协，意味着奥匈帝国会镇压国内的斯拉夫人，帝国也会担心塞尔维亚王国会成为那些不满对象潜在的危险同盟。同时奥匈帝国的经济条件也意味着肯定迟早会爆发叛乱，而那些不满的斯拉夫人极有可能在斗争中首先跳出来。因此准确地说，1914年爆发的这场战争是注定迟早要发生的。”“毫无疑问，”康斯坦丁说道，“1912年它就几乎发生了，当时弗朗茨·斐迪南的朋友们差点就先发制人，成功掀起一场针对阿尔巴尼亚的战争了。”“那么1914年6月28号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显得毫不重要了。”我说道。康斯坦丁沉默片刻。在我们身后弹奏古斯勒琴的男人停了下来，好像他明白我们说了些什么。康斯坦丁说：“在某种意义上你是正确的。那些小家伙没必要去死。我们注定会有这场世界大战。”“真是浪费！”我说道。“嗯，我知道萨拉热窝是这样一座城市：当她发现她的辉煌时刻是一种幻想、一种愚蠢和一种简单的奢侈的时候，她还能平静地忍受，”康斯坦丁说道，“她会在河边散步，她会坐在庭院的果树下而不会哭泣。”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她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她不会哭泣是因为她知道我们是错误的。她通过这次谋杀事件带来了战争，并使南部的斯拉夫人将这场战争据为己有。在我们费解的语言背后，在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那些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错误的谎言背后，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这场战争并在战争中殉难的人来说，这场战争的起因——且远不止战争的起因——成了永恒的秘密。也许那就是为我们南部斯拉夫人所知道的而对其他人隐藏的秘密。我不知道。”“我多么希望，”他站起身来说道，“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留在这里。这里楼上的小房间很舒适，带着整洁的粗布被单，而且十分安静。虽说这里有很多噪音，但都是有意义的，比如鸣叫的鸟儿，而城里的噪音毫无意义。但是假如明天我们要去亚伊采的话，我们就必须现在去山下的镇子里。”

天还没黑。我们下山时仍然能够看到路边的仙客来、报春花和樱草，带着那种在不充足的光线下看见的花朵的甜蜜的阴郁。当我们下到半山腰时，黄昏呈现出一片深蓝色。当来到我们曾在吉卜赛人旁边站着的那块小山丘时，我们停下了车子，俯视萨拉热窝零星的灯光。而我们车里的司机指着这座城市向我们呼叫。“他是让你们听听钟声，”康斯坦丁说道，“整座城市都听得到钟声，这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当土耳其人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没有教堂的钟声。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祖父告诉他六十年前不

允许有钟声响起，而他现在对钟声的存在感到骄傲。”

特拉夫尼克

次日清晨在离开萨拉热窝的路上，我们停下车来买了些橙子，我还在腿上放满了白色紫罗兰、樱草花和金盏花；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清晨在山谷中的穿行。这些山谷仿佛经过了能人布朗的美化，梯田被开垦得如此优美，向上攀爬的林地与山顶沼泽之间的界线是如此优雅。这部分是地质变化造成的，但这一带的人们也的确有着最为灵巧的双手。这里的人极为贫穷，却可以用有限的材料创造出奇迹。我们现在来到一处名为基斯利亚克的小温泉，温泉虽然很古老，但是在土耳其时代很受欢迎，尤其是在犹太人当中。我猜想，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人经济水平和在美国每周收入不超过四十美元的人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和音乐喜剧的布景一样漂亮。主要街道上有一座长而低矮的帕克酒店，粉刷得洁白如雪，每扇窗户边上都晾晒着一个明亮的花纹床垫，图案极其漂亮。如果不是出于必要的话，这些床垫绝不会仅仅摆放在床边。

为了欣赏这处温泉，我们下了车。蹚过一条小溪到了一片松树林，林子里修建了一间朴素的澡堂，还有几处可供饮用的泉水。桥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穆斯林对着流动的溪水沉思。通常，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流水，哪里就会有一位穆斯林老人对其沉思。他礼貌地加入我们，并指给我们附近的一处咖啡馆。那是在杨柳丛中的泉水上修建的一座木亭，他认为那里特别舒适。然后他带我们来到喝水的摊点，见到了一位基督徒园丁。他给了我们几杯水喝。这水尝起来有股浓烈的金属味道。我们信步穿过松林，来到一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碑上的金色铭文已被野蛮地挖去。几步之外，跟随着我们的穆斯林老人和园丁走上前来告诉我们，人们建造这个碑是为了纪念奥地利军队对波斯尼亚叛乱分子取得的胜利。“你们会让这些东西保持现在的样子吗？”康斯坦丁问道。他们说他们会的。我们都坐在一条长椅上，我喝完了我的那杯水。

“我想待在这里，我不想再走了。”我说。“是这位穆斯林让你有此感觉的，”康斯坦丁说道，“这是穆斯林的一门伟大的艺术。注意，这十分有趣，因为，你看他，他像这个园丁一样是个斯拉夫人，而这个园丁却没有这种艺术。土耳其人和他的宗教令他如此优雅地坐在那里而不做任何事情。他会心满意足地整天坐在这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确实现在的状态是最令人愉悦的，因为我们可以听到潺潺流水，可以看到树梢上的朵朵云彩，我们还可以抽烟，有时还可以相互说说客套话。”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半小时。那感觉就像是在巴斯找到了一个愉快的家庭，那家人彬彬有礼，家具漂亮，仿佛完全摆脱了现代的纷扰。但这里没有那种经常困扰着我们内心的关于所得税的焦虑。即使是这里的穆斯林，

也穷得不能再穷了：这位穆斯林穿着整整齐齐地缝着补丁的旧衣服，他的皮凉鞋是用绳子扎紧的。

路上四处可见这番贫穷景象。清真寺已不再是由砖石砌成的，而是用灰泥粗糙粉刷的，就像那些农场建筑，屋顶是倾斜的，木质宣礼塔摇摇晃晃。但是它们的设计仍然有一丝典雅。女人们白亚麻衬衫外的短上衣和深色的长裤上以及脸色阴郁的男人们的衬衫上都带有精致的刺绣。我们可能很难与其中一些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有马的人会带着仇视的目光看我们，因为马一看到汽车，不管我们开得多慢，都会不可避免地挣脱缰绳。我们已把两辆运干草的马车送进了水沟。汽车在这里是如此罕见，以至于这些人带着一种庄严的责备之情看着我们，如同看待一个坚持用一种古怪的运输方式而给其他行人带来不便的俗人。但是那些没有马的人却带着一丝特殊的敬意望着我们，因为汽车很少从这里经过，在他们看来，我的丈夫和康斯坦丁肯定是来自贝尔格莱德的重要官员。当我们经过时，这些人带着一种固定的严肃表情立正敬礼。“看他们的脸，”康斯坦丁说，“他们始终认为他们必须为南斯拉夫而死，并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那样去做，但是现在我们要求另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应该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我们来到一个宽阔的山谷。阵阵春风匆匆掠过湿润的翠绿色牧场，穿过树林。在冬天已经离去的地方，树林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而在冬天仍然徘徊的地方，树林还是一片古铜色。在我们到来之前，一群粉红色的小猪和红色的小马驹慌慌张张地奔跑着，衣着比山谷低处的人更为炫丽的男男女女追赶着它们，却又停下来欢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远方的山脉若隐若现，岩脊上有大片修道院建筑。这些是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后留下的少数遗迹之一，而非兵营。奥地利帝国曾在这里设立了总部，企图使归属于东正教的波斯尼亚人变成天主教教徒。在这里已生活七百年之久的多米尼加人和圣方济会修士得到了耶稣会士的增援，但不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这些山脉脚下，我们接触到了这座城镇。土耳其人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作特拉夫尼克，即“草城”。在这花园般的山谷里，高耸的倾斜的屋顶下优美地坐落着一幢幢狭窄的房屋，犹如一只只蹲坐在绿油油的公园里的可爱猫咪。隐于视野、精心组合起来的这种小巧之物可算是穆斯林果树和花朵平铺的洁白色与宣礼塔垂直的洁白色之间的完美结合。自从萨拉热窝不愿对土耳其称臣纳贡起，这座城镇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的两个世纪里是波斯尼亚首府所在地以及帕夏的驻地。这座城镇的都市色彩十分明显，尽管它被赋予了野餐地一般的乡村风格。“基斯利亚克的穆斯林都想在这里拥有一座房子，”我的丈夫说道，“如果他允许自己想要他还没有的东西的话。”

我们曾在萨拉热窝受邀与一位可爱的犹太女孩的父母共同参加一场午宴，我们叫这位女孩布尔布尔，我们在一座公寓楼里找到了他们家，从那座公

寓楼里看出去，穿过主要道路是繁花盛开的谷地，而山顶上是波斯尼亚国王修建的一座古堡。我们到了他们家，另一种文明的味道扑鼻而来。我们在那里的出现引起了后悔的叫声。那位父亲站在门廊的阴影里，尽管年近六十，仍然英俊，他的相貌我已在波斯画像中看过多次，大眼炯炯有神，身形魁梧硕大。他有着西班牙籍犹太后裔那种甜美而不让人厌烦的嗓音。他告诉我们他为让我们进来而感到惭愧，因为他那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看的东西。他认为我们是想拜访他位于城镇几英里外的工厂，所以他事先在那里给我们点了一顿真正适合我们的大餐，并解释说他不能陪同我们，因为他的夫人扭伤了脚踝，在她康复之前他都要陪她吃饭。他为他犯了这个错误而向我们鞠躬致歉。但是从昏暗房间传来和他嗓音一样甜美的妇人声音，要求他带这些陌生人进家里来。那声音如慈母般热情，仿佛渴望做些什么来安慰我们这些外乡人，又好似孩童般迫不及待地想要把玩新玩具。

她躺在沙发上，像受伤的鸟儿一样颤动着手臂防止伤痛向下拉拽她的身体；她的美丽令人惊讶。她至少快五十岁了，她不是一个没有被岁月标记的奇迹，但是在旁观者看来，她和布尔布尔一样美丽。当然事实可能不是如此。当贺拉斯写出“哦，比她美丽的母亲更漂亮的女儿”时，他关于这个普遍规律的认识肯定是正确的，源自与皮下堆积的脂肪以及内分泌腺的作用密切相关的原因。然而在这里他会是错误的。他应该忽视他的韵律，写道“比她美丽的女儿更漂亮的母亲”，因为这里有比最美丽的女儿还要漂亮的母亲。布尔布尔是犹太人种里能被想象出的最完美形象的体现，但是只要看一眼这个女人，就会觉得她比其他所有女人更加美丽可爱。年龄不重要，因为年龄对于她而言没有像对于绝大多数西方女人来说那样的意义：她从不感到沮丧，她漂亮的身体和优雅的行为常常得到美丽的赞许。

我和我丈夫坐在她的身边，像对着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般微笑着；她为她不得不临时准备的粗茶淡饭向我们表达歉意，并越过我们的头顶指示她的厨师，那声音悠扬不生硬，然后她开始问我们一些以西方标准来看都算是私人的问题，假如她希望在我们离开她家之前能够迅速地喜欢上我们的话，那么她这样做就是极其明智的。彩色笼子里的金丝雀突然一阵纤细而狂乱的鸣叫，他们看了看它，温和地笑了，这笑声并不会伤害它的感情。这只金丝雀似乎是他带回家用来在她必须躺在沙发上时分散她的注意力的。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他带给她的礼物堆满了房间：一支精雕细琢的长笛、一块织锦、一本带有彩色插图的描述18世纪意大利旅行的书籍、一个琥珀色盒子——我猜是松糕，因为她每天都要待在房间里。他们家沉浸在接受和施与的往来中。

他们伤心地看着我们吃饭，为在工厂里给我们准备的真正适合我们的那顿饭轻声表达歉意。但是我们没有感到不满意。我们吃到了家庭自制的意大

利面、在油中连煮三天却爽滑不油腻的“西班牙鸡蛋”、纤美小羊羔的羊排、纯白而精致的干羊奶酪、完全保留了夏天原味的桃子和柑橘果汁，以及为斯拉夫人民所喜爱的无色白兰地拉克酒。吃饭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在萨拉热窝与他们女儿的见面，他们像猫咪一样自豪而高兴地伸展着腰腿，承认我们关于他们女儿的所言都是真实的，并且列举出她的一些我们可能没机会留意到的成就。而赞美他的家人所能引起的一个英国人的反应，可能不外乎是不安的微笑和不以为然的喃喃自语。

但是这里距离英国路途遥远。康斯坦丁继续讲述着他在萨拉热窝听来的以及更多他从贝尔格莱德带来的关于大使的八卦新闻。在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他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时，我环顾着这个房间。显然它有着地域特征；花费很长时间才从维也纳、柏林、巴黎或者伦敦运送到这里的任何东西，考虑到必定是些陈旧怪异而带有异域风格之物，都经过了很大程度的修饰。但是在这个房间里，在其主人的一言一行中，都饱含着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比维也纳、柏林、巴黎或者伦敦的传统更为局限，但在其范围内，它同样古老、可靠而实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这些人都会无所畏惧地面对。他们会用一种结合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情。他们所有人都贪图享乐，这可能是来自萨拉热窝的启发，也许是土耳其人不得不为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这种对享乐的贪恋是稳定的，不似流水，而是犹太人为延续其种族而选定的精神气质。这种享乐与民族意愿融为一体，可能会激怒那些西方道德家——他们相信并倾向于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吃掉自己的蛋糕或拥有它。随后我去了这家人的洗手间洗手并梳理头发。每面墙上都有赤裸的仙女在丛林里舞蹈的檐壁图案，一些图案里还显露着这些过时的奶油色美女们的乳房和大腿。这天真烂漫地显示出这些人将沐浴视为袒露的赤裸，而将赤裸视为一种带来无边乐趣的工具。其纯粹性是穆斯林闺房精神的写照。这些人可能会让他们如此了解的肉体燃烧于熊熊火焰中，假如这样做可以拯救他们更珍贵的肉体、他们的孩子的话，这使得这种闺房精神如同白雪一般纯洁。

因此像平民老百姓说的那样，一个人通过两种方式都可以拥有它。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像这些人一样，处于一种追求如意生活的常态中，那么他能够拥有的比他猜想的还要多。我们可能认为这没有什么难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些西方人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在实际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会浑然不觉。告别时这个女人温柔的姿态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先是拿起沙发旁边花瓶里所有的丁香花，并把它们给了我，之后又感觉这还不足以表达礼节，她又让我把花放下，从桌子上拿起一只香水瓶，在我的手上洒了点香水，轻轻地揉擦着我的皮肤。这是一个人可以想象的最为亲切的道别，而在我出生的西方世界里，这种方式不会得到认同。

我的脑海里仿佛听到一个西方女人的评论：“亲爱的，太可怕了，她抓着

我的手，用某种最令人讨厌的香水来擦拭我的双手。我好几天都不能摆脱这种味道。”当然她们的讲究挑剔会是虚假的，因为这香水是上品，由保加利亚玫瑰油提炼而成，香味既醇厚又清淡。在这些事情上这些人的判断力绝对可靠，因为在波斯尼亚与沙皇格勒的奢侈品贸易中——他们将君士坦丁堡称作沙皇格勒——他们得到了数世纪的相关教导；而她也假设我们这种人有着类似的教育经历，会认为这种香水是一流的。她同样假设我会接受一件礼物，而这件礼物表示一位两个小时前还不认识我的人现在是喜欢我的。事实上，她假设我也更喜欢惬意的事物。想起一个英国人被介绍给一个陌生人时脸上严肃僵硬的表情，我认为她的假设太过鲁莽。

在我们离开这座城镇前，她的丈夫带着我们闲逛。一条小巷蜿蜒穿行于清真寺、别墅与公园间。公园里绽放着许多梅花、丁香花以及鸢尾花，而灌木丛中四处都是孩子们玩耍魔女球的天真童趣。特拉夫尼克现在已经改变了样貌，它不再是视野中的那样一个图像，它是立体的，它是一种存在，是一个朋友或者敌人。我们爬上了一座古堡，它现在是一处军事要塞。我们在那里遇见一群非常严肃的年轻士兵。斯拉夫士兵即使是在喝醉酒的状态下看起来仍然虔诚投入。这些清醒的男孩们，像修女一样保卫着他们白色的城镇和浅绿色的山谷。我们想拜访指挥官，但是士兵们说他睡着了。在告诉我们之前，他们看了我们一会儿，带着审判的语气谈论着些什么，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指挥官是个神圣的人物，为这三个没有穿制服的男人和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去打扰他会是对他的亵渎。他们用焦虑的语气跟我们道别，仿佛希望确定他们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对他们而言所有的事情都关系重大。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下一座长满绿草的小山，来到林中的一个大水塘旁边。尽管丛林就在穆斯林聚居的城镇边缘，神奇的是这里却没有受到污染。这个水塘由三处泉水注入，每一处泉水都在淡紫色仙客来花丛的遮掩下喷涌而出。水塘被一堵陡峭的石墙拦截，石墙一端被凿出一条渠道，水流就通过这条银白色沟槽喷涌而出，看去如水晶般坚实。我们欣赏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这水塘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又回到主干道，找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隐藏在一个穆斯林墓地的角落里，附近几座遮有天篷的帕夏坟墓很是气派。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下来，喝着黑咖啡，用牙签吃着土耳其软糖。一阵徐徐微风摇动着桌子上方开花的树木，拂动着一根坍塌在地的帕夏坟墓柱子周围的青草。一些贫困却高贵的穆斯林来到咖啡馆里坐下。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支撑家庭的明显手段，倒有些足够有效的无形方法。他们不显尴尬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窘迫；男人们谈论着乡下的消遣娱乐。布尔布尔的父亲说这里是进行冬季射击游戏的好地方。

似乎这里冬季的雪会很厚，而且野兽会从高地下来，饥肠辘辘地徘徊在城

郊。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在自家花园外散步，枪里装着钢珠子弹。他停下来看到一丛黑色灌木竟然神奇地没有为大雪覆盖。那里站起一头熊来，并打了个趔趄。他的朋友举枪射击。子弹穿过熊的眼睛射进了脑袋里，那熊蹒跚两步，猛冲一阵，倒毙在地。他自己有一次在一个11月的午后开车去工厂的途中，看到一群狼正追赶着一群山羊猛冲下山。他停下车来观看。它们直直地冲下来，就像我们在水坝旁看到飞流直下的水柱一样。它们扑到山羊背上恣意撕咬。他听到山羊骨头碎裂的声音，犹如枪声一般响亮。那群狼填饱了肚子，又拖着山羊余下的尸骨冲回到山里。他觉得从他看到那群狼到它们消失在视野中，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

他指向远处的山脉。“只有在冬天你才能看到它们，”他说，“但是它们仍然在那高处等着我们和山羊。”我们惊奇地看着那光秃秃的石头所形成的高地，那里充斥着熊踉跄笨重的敌意以及狼群的贪婪。但是当我们降低视线，才发现我们自己也被其他人惊奇地注视着。他们同样在推测着我们的出现背后会隐藏着什么。一位农妇一看到我们就在路上停下了脚步。她身材瘦削，发质如干草般暗淡僵直，一张大嘴巴像门一样。在这个文明世界里的几乎任何人面前，她都是如此傲慢乖僻，如此处于绝对劣势，而她又是如此地毫不知晓自己身处劣势，以至于我让康斯坦丁去给她照张相片，她欢快地叫嚷着，在照相机前向前伸出下巴，双臂交叉，全部体重压在脚跟上，显示出男人式的骄傲；我想在她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告诉她还存在着一种女人的骄傲。

她很贫穷。我的天啊，她太贫穷了。她像拉布岛上的人们一样贫穷。无袖的白色哔叽外套、亚麻长裙以及头上围裹的粗糙头巾无不沾染着岁月的痕迹。外套上的羊毛绣饰已经破损，看起来就像一整团飞散的绒毛。这套衣着肯定穿了很长时间。要想达到这种状态，一定不止一代人穿过这些衣服。她很可能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但这对她而言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有些其他方面的成功。可以看出她聪慧而坚忍，是个女英雄。尽管这样，看到她仍然会让人觉得痛心，因为她祖先所遭受的奴役使她变得畸形，就像她可能因为风湿病而变残疾一样。她眼睛周围和鼻孔下方深深的凹陷，脖颈上青黄色的凹槽，都证明着不断累积的剥夺和贫困。这剥夺与贫困就像她破旧的衣服一样传自那些所谓的拉雅人，那些被赎身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购买生存权利的基督教农奴。东方国家在波斯尼亚既赋予一些东西，又夺走一些东西。

亚伊采I

离开特拉夫尼克的道路在一阵倾盆大雨中延伸至一个高处的山口，山口前后被紫色云雾围绕，同时闪电犹如巨大的剪刀，剪碎并修复这层层云雾。暴风雨中的报春花卷成了一团泥浆，藜芦绿色的钟形叶片被击打得匍匐在岩石之上。我们在山谷背面看到一个高耸的蓝色洞穴，那里空气宁静，阳光明媚。之后我们来到一座破败不堪的村庄，房屋简陋，道路泥泞，颜色素朴却饶有魅力。这个村庄名叫瓦库夫，是一个土耳其词汇，意思是宗教财产；这个单词的复数形式是“伊瓦库夫”，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让我不愿意学习土耳其语的事情。这个村庄之所以被唤作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附近的土地由虔诚的穆斯林提供给清真寺以及慈善机构，而几百名在此耕作的劳工就住在这个村庄里。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这些财产得到特殊看护，这些劳工也受到优惠待遇。事实上，这些劳工仅仅是农业工人，他们的地位在奥地利人统治时期无论如何要比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更好些。现如今，穆斯林政党虽然很好地看管着财产，却让这座村庄处于一种温和的混乱状态中，这不是真正的混乱，这是波斯尼亚仍然留存的奥斯曼帝国特征。

滂沱大雨使得主要道路泥泞不堪，我们只看到了一位老人，缠裹的白色头巾表明他是一名伊斯兰教牧师。他像一只讨厌的猫一样踮着脚尖跨过街上的泥淖，走向一座摇摇晃晃的木质清真寺。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是在女人看来，这座村镇使人烦恼，因为向外突出的楼层上闺房正在腐朽的格子窗就要从已经腐烂的窗扉上脱落下来了。男人把女人当作奢侈品来养活的行为是鲁莽的，除非他们有能力向女人保证满足奢侈品这一基本需求。如果男人因为他们的缘故要求女人不再去市场上，那么他们必须承诺他们会把市场上最好的东西带回闺房；这是所有聪明的穆斯林都承认的唯一理解，正是基于这点理解，闺房可以是任何地方，但绝不是男性发泄性欲和喋喋不休的地方。但是假如他们没有信守这雄心勃勃的承诺的话，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什么责任需要承担，他们就应该服从制度安排，让女人重获自由并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闺房的窗户上有被木板封住的孔洞以及用一块布捆绑在窗扉上的格架，这象征着对他人背信弃义的寒酸失败，就像陷入困境的旅游公司一样。

离开瓦库夫村后，我们穿过一个山谷，那里仿佛是中国景观，树木在垂直的深渊上彼此交错。突然我们发现来到了一处瀑布，它是亚伊采引以为自豪的首席荣耀。那个村镇位于一座小山之上，一条深沟将这座小山与覆盖着森林与村落的宽广山脉分隔开来，一条从这个村镇奔泻而下的河流跨越了一百英尺的距离汇入一条沿着深沟流淌的河流。司机和康斯坦丁跑到峭

壁边缘大声地呼喊着。所有的南斯拉夫人将水视为一种神圣的物质，而一个瀑布就是神一半的化身。我的丈夫和我在光滑的岩石中蹒跚而行，远远望去，奔流而下的水仿佛纤纤玉腿，腾起的水花犹如少女裙装。当我们转身回望时，看到康斯坦丁坐在一块石头上。他挥动着短小的胳膊，转动着长着黑色卷发的尖尖脑袋，我们知道在他附近有只鸟儿翱翔在瀑布上空，欢欣于一片凉爽中，欢欣于拍打在它微小身体上的水花中，欢欣于对它振翅飞翔的勇气所形成的挑战中。从康斯坦丁翻转的厚实手腕以及他转动的短小脖颈上，我们对此确信无疑。他的手和头同时告诉我们，当风吹拂着从悬崖上激流而下的瀑布，水花像被吹起的头巾一样浮动时，那只鸟儿感受到了怎样的恐惧。康斯坦丁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无所不知，他又一无所知。

我们听到了笑声。河对面的山坡上有三个农村女孩正在走路，她们绚丽的服饰显露着一丝土耳其式的优雅，这让人想起在这个地区“富裕”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穿着天鹅绒”，而康斯坦丁的飞鸟芭蕾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她们咯咯地笑作一团，观看了几分钟的表演，然后迸发出不无调侃的欢叫声，诙谐地模仿他挥舞着手臂，转动着脑袋。当康斯坦丁假装愤怒地站起来对她们咆哮时，她们也假装害怕地尖叫起来，并沿着小径穿过一块繁花盛开的田野逃进丛林中，然后又穿过一块田野。在水花中盘旋的鸟儿受到惊吓，四散地飞进深渊里。那三个女孩牵着手大声地欢笑着，仰着头走进一片深幽的丛林，然后消失不见了。康斯坦丁向前蹲下，把头放在膝盖上，像是睡着了。

天气转凉，我们唤醒了他，一起在鲜花盛开的树下缓慢地向城镇走去。“亚伊采”的意思就是小鸡蛋，或者按照诗意的说法，指的是腹股沟或睾丸。我无法说出是什么类别的诗。这个城镇特别漂亮。它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坡上，犹如嵌在河流上方高原里的一枚鸡蛋，那里的房屋与花园在山坡上围成一个圈，形成一个巨大的壁垒。看上去这是一个不乏水源的地方。看上去它自然也有着十足的皇室风采，因为它是波斯尼亚国王宝座的所在地，而石砌的城墙与防御工事也十分坚固，因为它曾在一个世纪里痛苦地抵挡着土耳其人，又在1878年以自杀式的顽固反抗对抗了奥地利人。现在这里一片繁荣景象，部分得益于定居于此的土耳其富商的馈赠，部分则是因为饲养家猪、种植李树以及编织地毯和加工皮革的丰富产业，如今这里的发展并不那么糟糕。

奥地利人曾试图在这里发展他们的旅游交通，这就是亚伊采有那么多蒂罗尔风格的老式酒店的原因。高高的床上铺着明晃晃的床单，使人联想起冰镐和早起，看到这张床，我很愿意躺上去睡一觉。但是永不疲惫的康斯坦丁已经找到一位向导，是一位面色苍白、瘦骨嶙峋的小伙子。他很可能是患了肺结核，因为结核病一直困扰着这片土地。我们看到农民们一整天坐

在地上，即使是雨后不久也这样坐着，然而他们很少患上风湿病。但是这里的肺结核就跟西部群岛上的一样凶残。似乎是在闷热的夜里，在过于拥挤的房屋中人们患上了肺结核。这位小伙子是个更糟糕的基督徒，他贫困的生活没有像贫穷的穆斯林的生活那样拥有显著的秘密精神食粮得以维系。他咳嗽着带领我们在一群凝视着我们，却没有向我们乞讨的孩子面前穿过洁白的街道，来到一块园地，那里的台阶通向地面。

我们走在走廊和门厅里，两边的原生岩石透露出潮湿的寒气。黑色的穹顶神秘地耸立在我们头顶上方。黑色的宝座下令要人们献上一件祭品，祭品就被摆放在黑色的祭坛上，就被放置在黑色的墓穴里；宝座、祭坛以及墓穴上都标记着黑色的新月和星星。“这里是波格米尔派教徒的地下墓穴。”这位向导说道。我却不以为然。它们很可能是一些波斯尼亚贵族家庭的陵寝，只是被土耳其人抽去了骨骸。但是这些墓穴揭露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偏好，会让人觉得这与世隔绝的信仰富有吸引力。这座地下宫殿犹如在童年时期实现而从未忘记的幻想：一座神殿在深夜中被挖掘出来，围在一起的神父尽管被称为“男低音歌手”，却沉默无语。他们用电筒引导着新信徒穿过由巨神统治的巨大石柱走廊，到达最深处最黑暗的圣殿，在那里，他们用无形耳语或者魔法仪式对抗黑暗。秘密被揭开了。

我感觉到一种愉悦的刺激。“这应该是一部歌剧的布景。”我想到。但是那位脸色苍白、强而有力的神秘之主坐在宝座上，怒吼着那令人敬畏的审判，如果没有他这个形象的存在，剧情就不会发展下去。我想不出什么事件会让其脸色极为苍白而与原生岩石的黑暗不相上下，我也不得不问自己，假如这位神秘之主如此强大，他又为什么不得不在楼下工作呢。我想起当莫扎特利用我们对神秘洞穴及庄严符号的喜爱而谱写《魔笛》时，他和歌词作者最终没有理睬尚未解决的情节，揣着衣兜，吹着口哨回家了。我也想起，这一连串的幻想最初与基督教密切相关，但是当基督教变得值得尊敬、教堂成为造币厂或法庭一样的国家建筑时，它就脱离了基督教，之后与异教走到了一起；之后，当宗教宽容传遍欧洲、异教对此持有异议时，它就采纳了政治动荡和革命，就像这是它的领域一般。由此，欧洲的秘密组织，尤其是那些大学社团，得为1848年发生的事件负责。现在的我面对着这种狂热幻想的物质表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我无法将这种狂想作为通向任何富于想象的位置的踏脚石；我可以看到1848年事件之后又是如何引发了1849年、1850年以及随后在所有平顺之年和多事之秋里发生的一切；我可以看出常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运动在歌剧上演伊始夺取权利后又是如何销声匿迹。

“来吧，”康斯坦丁说道，“亚伊采有很多东西值得一看，你们不要再等了。我有两个朋友在这里经营一家化工厂，你们明天该见见他们，他们在这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密特拉神(注)的祭坛，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看。”当

我们从地下墓穴出来时，夜幕即将降临。天色昏黄，等待我们的孩童们在铺着鹅卵石的地面上投下巨大的影子。我们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处果园。我们推开篱笆墙上的门，沿着一条小径走到一间棚屋前。棚屋里漆黑一片，这位向导递给我们几支蜡烛。我们举起蜡烛，蜡烛的光芒使我们得见太阳神。

那是一座标准的密特拉神祭坛雕塑。一位身长翅膀的年轻男子，戴着一顶佛里吉亚头盔，斗篷被风吹起。他坐在一头下蹲的公牛身上，左膝抵住牛臀，右腿沿着牛的侧腹向下伸展，用他穿着靴子的脚踩住牛蹄。他的左手牵着牛鼻向后拉拽牛头，用右手将一把刀刺进牛的颈部。密特拉神不是阿波罗神，他只是一位健壮的屠夫，而且他的神性只存在于他的能力之中，这种能力使他超过普通的屠夫。这是他的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就此创造了世界。从公牛的伤口处流出的血液和骨髓化为葡萄和小麦，它在痛苦中射出的精种在月光照耀下幻化成几种动物，而捕获它肉体的密特拉神犬将它的灵魂带入阴间，成为兽群的守护神，为它的种群提供自己业已失去的安全。

这尊浅浮雕令人格外印象深刻。它解释出为什么这个宗教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据说它差一点就取代了基督教。但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普通民众中并没有它的追随者，除了罗马帝国士兵和官员的驻地，从来没在别处发现过它的圣殿，而且它在一般意义上排斥女性崇拜者。但是它受到了官员阶级珍贵的崇拜，也就是在垂死的帝国里唯一生活稳定幸福的那群人；并且它必然也有一些基督教的活力，因为它的内容包含甚广。基督徒憎恨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引起了一场可怕的竞争，更是因为这种牺牲性地杀掉公牛看起来像是对耶稣受难的拙劣模仿，而这也不是两种信仰唯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德尔图良注说："魔鬼的工作是妨碍真相，他虚构令人盲目崇拜的神秘事物，仿效圣礼的真实面貌……如果我的记忆可靠的话，他让他自己的战士在额头上涂画密特拉神的符号，他纪念献祭上来的面包，主持伪装的复活，用宝剑打开通向加冕之路。"他同样感到恼怒，因为密特拉神的一些追随者们信奉童贞。这不会取悦某些人。

然而密特拉教有它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力量，这个也许我们所知晓的能够立即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是它的主旨。密特拉神是万军之主，是胜利之神，他照射在国王及王子身上的光辉意味着成功。对那头公牛的屠杀是对这种从不弃之不用的力量的幻想，这种力量可以将失败本身转化为一种极端的动力。密特拉神征服了那头公牛，就是说精神和肉体之合力征服了只有肉体的力量。但是浪费任何种类的任何力量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尤其是在那头令人满意的远古公牛形象上，因此人们赋予其魔法，使之在一瞬间成为所有动植物的生命之源，从而它的死就变得微不足道。它在死亡之时甚至摧毁了死亡，因为作为兽群的保护神，它保证了它那个强而有力的种

群的继续存在。力量贯穿在这个传说中，就仿佛亚伊采的瀑布，虽从高处坠落，却完好无损，凯旋奔流，给予并哺育生命。

光线如此昏暗，以至于即使点燃蜡烛我们看到的也很少。但是观看这尊雕像的最好方法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指尖去触摸。我把手放在底座上，轻轻抚碰着密特拉神和那头公牛。雕像散发着一种力量。密特拉神夹紧在公牛身上的双腿，让人遐想着骑行、攀岩以及滑雪时由平衡所引发的全部乐趣；那刀柄几乎让人感到刺痛，公牛的喉咙因新生的生命而绷紧着。我把手从正中间的画面移开。左右两边是举圣火者，一个高举着圣火，象征着黎明、春天和出生，另一个让圣火下垂，象征着黄昏、冬天和死亡。这种信仰如何改变早晨？它又如何改善夜晚？它能给出生提供怎样的解释，它又如何能缓解死亡？我的指尖找不到答案。

正中间的画面显示出力量是辉煌灿烂的，是一切之源；一切事物必然是由力量产生的，因为产生一切的根源就被称为力量。这就是说，这正中间的画面证明了X＝X＝X。这其中不包括其他关系，比如加法、减法或者乘法关系。我的这种想象全部停止了，因为在这地下室里的行程已经结束，而我们也刚刚离去。我想到这其中的亚洲元素里还被附加了另外一种制度，有点像是共济会，他们让信徒在入会仪式上依次扮演乌鸦、神秘者、战士、狮子、波斯人、太阳使者和父亲。每个级别都有它神圣的面具，这来自更为古老的宗教遗俗。但是当一个信徒戴着狮头面具行走在队列中时，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回家。所以密特拉教衰落了，由那些像任何基督徒一样光荣死去的殉道者们所捍卫，而基督教则凭借能够为想象提供无限素材的复杂性获得了胜利。

我们穿过一片果树林，果树盛开的花朵在夜色辉映下呈现出玫瑰红色。我们爬上这座城镇的高处，就站在高高的陡峭瓦顶房屋、新建成的教堂和古老的清真寺之间。蒙着面纱的女人，在突然打开的窗扉外，斜靠在阳台上；十来只不同品种的小花狗从干净整洁的小花园跑出来，狺狺叫着示意我们离开。最后我们来到一处小山顶上的堡垒，那里耸立着一堵宽厚的墙壁和两座弯拱的塔楼。这座堡垒是那些热衷于拜占庭文化的波斯尼亚国王们修建的，被土耳其人占领了数百年。然而，除了间或显示毫不相干的风景之外，它从本质上很好地体现了法国的浪漫主义。当我们绕着遍布草丛的宽阔城垛四处走动时，绵延山脉的绯红色正在褪去，一轮金黄的落日正披着石楠紫色的光衣缓缓落下；从下面的城镇里传来阵阵斯拉夫孩童刚健坚忍的哭喊声。但是在这城郭范围内，所有的事物都呈现着黑白灰三色，显得既优雅又忧郁。

堡垒里面有一个深深下沉的广场，就像是围绕在一座法国城堡周边一样。

广场上几座石砌建筑年久失修，显现出休伯特·罗伯特(注)画作里的废墟风

格；有一条长长的柏树林荫大道，场景很适合情侣的告别——或是因他们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将因衰老而死去，或是因一个修女的幽灵的出现；还有草地，在这草地上，穿着薄纱的芭蕾女孩应该会随着肖邦的音乐翩翩起舞。正是基于这些奇幻式的存在，这堡垒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情绪。随着天空中的颜色渐渐消失，这暗淡的水晶穹顶上，模糊地闪烁着犹如泪滴般明亮的星星，灰色山峦上的森林一片黑暗，像是在哀痛，仿佛这地下广场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的风格感染了周边环境。高高悬挂的月亮照耀着草地、柏树和废墟，白花和细霜就降临在这月光下。我们感到一种痛苦的温柔，但那是一种满足感；康斯坦丁开始谈起他学习柏格森哲学的学生时光，就像他被深深感动时常做的那样。

但是我的心驱使着我，就像在黑色的墓穴里，在密特拉神的祭坛前一样，将这番情景作为想象的出发点。我又一次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去旅行。废墟已然成为废墟，里面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如果那两个情人遭受到绝症的折磨，那么那就是他们的结局。如果一个修女的幽灵出现，那么她可能会揭开一个秘密，比如她孩子的坟墓的位置，但这完全不重要，因为她是个幽灵，而假如死后的世界存在的话，活着的一切事物便显得微不足道；或者她会消失，会使所有的事物依然如故。舞者间或会停下舞步，踩着他们颤抖的步点退入柏树林荫下，直到他们挥别的手臂不再为月光照耀。这美妙的幻象，所有的构成情节都不会有所发展。男人们比我更能够感觉这一点。浪漫主义者很难融入这幻象中去展开他们的故事，也很难找到理由解释他们的角色的孤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常引入乱伦这种实际上流行于意志薄弱人群中的罪行，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几代之后种族会死于无聊、每个家庭都仅仅局限于传宗接代的反对意见持有开放态度。更有甚者，浪漫主义者绝不会完成他们的故事；他们会破产，情节将置于死亡手中，而死亡这位接收者会以强制性的葬礼结束情节。

我们回到酒店，停下来，透过夜色看着教堂里商店式的橱窗，一具玻璃棺嵌入墙中，棺内躺着波斯尼亚最后一任国王。他是一名篡位者和迫害者，却备受尊崇，因为他是一位斯拉夫统治者，而不是土耳其统治者。我在我房间里明亮的高床上躺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下楼吃晚餐。这是我自小女孩时期以来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晚餐。晚餐上有鸡汤，一大碗深红色的小龙虾，很香的鲑鱼，一沓果酱馅薄煎饼，像极了在斯普利特时服务员拿来让我消除深夜饥饿感的果酱煎饼，还有上好的达尔马提亚酒。我对康斯坦丁讲起我看到亚伊采之后的一些感想，他回复说："是的，有这些十分愉悦却不刺激的感觉很奇怪；那些景象会使我们因一种精妙复杂的愉悦感而颤抖，却不会打开任何途径使我们的思想可以旅行，就像老士兵会沿着道路行军一样，因为那是他们分内之事。听着，我会跟你说，这很可悲，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途径。因为我们的思想能够沿其行进的一些途径对我们而言却并不是好地方。

“让我给你讲一个亚伊采的故事。这对土耳其人来讲是个好地方，这里是他们通往欧洲中部的关键所在，很多年里他们都想占有这个地方。一位叫作彼得·凯格勒维奇的波斯尼亚将军守护亚伊采达七年之久，直至山穷水尽。他知道如果再有一次攻击，他就无法抵挡了。就在那时，他听说土耳其军队离开了他们的营地，并在一个峡谷中集结，准备用云梯对堡垒实施突然袭击。他派遣一名间谍向土耳其人透露，将军看到他们离开军营非常高兴，并告诉所有的士兵，‘现在你们可以欢笑、感到高兴，因为敌人已经远去，你们可以唱歌喝酒睡觉，并且明天，在圣乔治日，你们的女人和女孩可以像往常一样根据我们的习俗去山里用露水洗脸，唱歌跳舞’。但是土耳其人感到疑惑不解，在黎明仍埋伏以待，他们看到亚伊采所有的女人和女孩们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从家中走出，走下陡峭的街道，来到河边的草地和梯田上。是的，就是今天下午那些最鲁莽的人所在之处。在那里，她们用露水清洗自己可爱的小脸，然后弹起古斯勒琴，其他人加入其中，跳起了科洛舞。可怜而弱小的人们啊，他们的手指必定冰冷异常，我不知道她们唱得好不好，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胸口都藏有一把匕首，以备计划失败时之用。

“然后，当土耳其人听到她们歌唱并看到她们跳舞时，他们开始认为那名间谍所讲的话一定是真实的，而这处堡垒就会像是已经到手的熟透的果实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总是像饿狼一样对女人饥渴不已，于是在开始抢劫并屠杀这座城镇之前，他们离开了云梯，跑去强奸那些可怜而弱小的女人们。当他们到达河边的林地和沼泽地时，埋伏于此地的基督徒们就冲出来消灭了他们。而那些如此勇敢的弱小女人们也回到了这座她们拯救了的城市，并在许多年里没有沦为奴隶。

“现在，这就是一个会让思想前行的故事，特别是假如这个故事属于一个善良的男人或者女人。彼得·凯格勒维奇是一个狡猾的人，但狡猾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土耳其人以及诸如此类的邪恶之人才有可能被消灭。那些弱小的女人们非常勇敢，为了拯救她们的城市和信仰，她们投入了一切；而且勇敢也是正确的，因为总会有邪恶。所有这些都如此美丽，因为那些弱小的女人唱歌跳舞时尤为可爱，而且她们也为她们的斯拉夫男人所信任，他们之间必定拥有高尚的爱情。而土耳其人的欲望则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引以为耻的其他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却又非常令人兴奋，讨人喜欢。圣乔治日也是最美好的节日，我们的山脉非常漂亮，而亚伊采是最美丽的城镇。这样一个男人在他自己讲述那个故事时就会给予自己极大的快乐，并且他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相似的事情，将他自己视为彼得·凯格勒维奇，那些最可爱的弱小女人们因他而勇敢，他的全部敌人死在沼泽地里，脸部都浸在水下；基于此，他可以建立一种简单而真实的哲学，这种哲学使得一个男人的生命意义较之前更加丰富。现在，你能否告诉我，有什么是一个男人在平静的时期也能像在这样的战争场景中那样轻易地想到的事

情吗？所以，当我的人民不能专心致志于自由生活时，当他们就像我在路边向你提起‘他们始终认为他们必须为南斯拉夫而死，并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那样去做，但是现在我们要求另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应该幸福快乐地活下去’的那些人时，请不要鄙视他们。你也看到，我们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所开始的任何一种途径根本不会通向什么地方，那些途径并不是途径，只不过是在大热天里能够休息一两分钟的小树林或者能够进去但又必须出来的树丛。你会发现我们塞尔维亚人不是如此。我们更为单纯，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所要考虑的事情，那就是战争，不只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是宏伟的，我们还要考虑哪一场战争是不必要的。通过这些思考我们的思想就会踏上不同的途径。但是现在你必须去睡觉了，你看起来很疲惫。”

---

1. 密特拉神（Mithras），密特拉教是流行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代秘密宗教。该教只接受男性入教，崇拜密特拉神。
2. 德尔图良（Tertullian, 150—230），早期基督教的著名神学家。
3. 休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 1733—1808），法国画家。

亚伊采II

“你必须立刻醒来。”我的丈夫说道。但时间还没到第二天早晨。房间里满是月光，我的手表告诉我自己在床上只睡了半小时。“起来穿好衣服”，我的丈夫催促着我，“楼下有位牙科女医生。”我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杯梅子白兰地。“她的嗓音像流水一样，”他继续说道，“而且她说她会给我们唱这个地区尤为动听的塞尔维亚民族歌曲。”“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冷冷地问道。“她是查布里诺维奇的妹妹，就是第一个想要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然后自己跳入河里的那个男孩的妹妹。她是这里一位卫生官员的妻子，她自己也在从医。萨拉热窝有人写信告诉她我们要来。快点下来。我必须回到她那儿去，康斯坦丁正在给他贝尔格莱德的办事处打电话，而她现在是单独一个人。”

他极为小心谨慎地离开了我，而我并不惊讶，因为当我来到楼下时，我看到的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人。她并不年轻，从任何方面来看，她都算不上漂亮，但是她强健且灵敏，娇媚而迷人。她有着斯拉夫人的美丽基础，那就是好看的头部骨骼。她的肌肤莹白透亮，在她张嘴说话之前，她的眼睛就能够表达自己，她还有着清澈流利、不会变老的嗓音，当她八十岁时，她的声音仍然会像是来自一位充满生气、满怀希望的少女。她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告诉我们说她来带我们去她家，我们可以在她家里喝喝咖啡，见见她的丈夫，我们就这样走出酒店来到月光照耀下的城里。

她与我们第一次见面略显害羞，因为康斯坦丁仍然在打电话，我们不得不自己去。她以知道道路为由，像一匹马驹般跑在前头，但是在我们爬上一条小巷时，她的亲切友好使得她折回我们身旁。“你们会想看看的。”她边说着，边指着一堵白色墙壁上的小窗户。我们已经留意到了吟唱圣歌的声音，并且发现我们正窥探着一座清真寺，大约有一百名穆斯林正在进行晚间礼拜。透过昏暗的灯光，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渴望地伸展开手臂，以一种受约束的军事敬礼方式向下拍击直到他们整个身体弯曲，额头触地，不带丝毫个人情感。他们的礼拜声犹如砰然的拉弓声。之后，他们起身放松，我们想一定是礼拜结束了，但是他们又紧绷着向上伸展，再一次敲击地板。看起来完成这套动作就像做了一套高水平的体操一样使人身体健朗、精力充沛。确实，伊斯兰教的仪式比其他伟大宗教的任何礼拜仪式进行的程度都深。一天当中一个穆斯林必须做五次礼拜，在礼拜过程中他必须数次高扬手臂然后跪倒在地。考虑到人们往往喜爱体育运动却又需要外力强迫才会真的参与其中，这种仪式很可能就是伊斯兰教广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我们观看着他们的礼拜仪式直到一名戴着毡帽的穆斯林转头看着我们。偷窥如此坚定地基于成功的自信以及队伍的团结的表演让人感觉怪

异，也很心虚，倒不是因为其中一位处于失利和被击败的队伍一方，而是因为最终的战斗问题并不和事先料想的一样。我们随后来到矗立在堡垒阴影下的一栋几层高的公寓建筑前，我们被带入她家，表明获得了一次胜利，但这胜利很可能是属于昨天的，只不过还没有被今天宣布为完全无效罢了。

这种房间在欧洲随处可见。墙壁被粉刷得明亮，光洁的地板上铺着简单的地毯；房间里悬挂着现代风格的画作，色彩浓郁而鲜亮；上等的木质家具，纯手工雕饰；餐具柜上摆放着一大盘水果；搁板及桌子上堆放着很多书，作者有诸如萧伯纳和威尔斯、阿道司·赫胥黎和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曼和罗曼·罗兰，以及高尔基等。这种房间与不论是在伦敦或巴黎、马德里或维也纳，还是在奥斯陆或佛罗伦萨的房间都有着相同的意义。它暗示着自上一次战争结束后，一种需求得以膨胀，保守思想得以恢复。但是它也证明主人拥有高贵的品质。他们有着对洁净的热情，有强烈的责任感，亲切地对待孩童，缓和城市扩张对年轻生命带来的威胁，厌恶暴力，在权威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勇敢地准备批评权威。这样的房间当然也隐含着主人的某些缺点。他们倾向于教条主义，倾向于相信生活要比其本身更为简单；他们假设男人真的通情达理，甚至在涉及性和种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并基于这些原则认为生活可以立即被简化成为一种秩序。他们也倾向于怀疑过去、轻信现在；他们会相信任何蠢货的话，去食用形式被扭曲了的谷物，而鄙视古代社会所推崇的酒肉食品。然而，较之于肮脏、不负责任、暴力、对待孩童的粗心大意、怯懦及奴性等这些人用于发动战争的缘由，这都是些通过经验便可纠正的缺点。

只有那些恶毒的偏执者们才会憎恨这样的房间。即使是那些相信生活有比人们赋予它的更丰富的内容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些房间是配得上神裔的神殿。有些人酸溜溜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形成于这种房间。这不是事实。那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负有责任的俄国流亡者是坐在凌乱的床上的，就像在凡尔赛或者任何中世纪城堡杂乱的房间。他们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永远不会收拾房间的，除非他们没有了权力。而那些居住在这收拾整洁、经过装饰的房间里的人只希望提供服务。当死后我们其他人被诅咒下地狱时，他们会得救。

可以看得出这位医生丈夫像他的妻子一样有着救赎之心：他英俊的脸庞流露出亲切、自律和希望。他们为我们端来咖啡，我们向他们讲述美妙的旅行，他们也谈起当他们不得不去贝尔格莱德大学接受培训时思乡之情是多么地浓厚，以及当他们回来并在此行医时他们又是多么地欢喜。他们严肃地谈及自己的工作，这对于他们本国人而言非常奇怪，我们只从非洲或者亚洲的殖民者以及传教士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谈论。但是他们就处在殖民者和传教士的位置上，因为奥地利使得波斯尼亚人处在非洲人和亚洲人的位

置上。“他们没有为我们做什么，”这位医生说道，“他们在这里的三十六年间里，什么都没做。你们可以考察一下。去找找他们留在身后的那些建筑物。你们会找到很多军营、酒店，以及很少的——少得可怜的——学校。没有医院。没有水库。没有给人们居住的房屋。”他们告诉我们，战后他们离开波斯尼亚去塞尔维亚学习时，他们对塞尔维亚农民优越的命运感到震惊。他的国家遭受到了入侵和洗劫，但是他的吃饭穿衣比起他的波斯尼亚兄弟来要好很多。“自由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这位牙科医生说道，“免受劫掠。”我严肃地想到1805年至1914年间，有很多英国旅行者所写的书都坚定地认为与那些自由的塞尔维亚人相比，先是在土耳其、之后是在奥地利的统治下的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境遇要好得多。假如能够证明这与土耳其人以及奥地利人知道如何招待一个西方游客，而自由的塞尔维亚人缺少金钱和经验的这一事实背景毫不相干的话，那么这会让人觉得很愉快。

最后康斯坦丁进来了，他们亲切地向他打招呼。在我们喝完为他端上的一轮礼仪性的咖啡后，他用塞尔维亚语跟这位牙科医生谈话，查布里诺维奇的妹妹突然涨红了脸转向我们，眼神嘴角都流露出欢喜渴望之情，仿佛回想起一段不幸但辉煌的爱情往事。“康斯坦丁要我给你们讲讲我的哥哥，”她说，“但是这段故事太长了，而且对外国人来说也很难理解。这个会帮助你们理解其中一些内容。”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关于那次谋杀事件的相册，那是战后萨拉热窝的警察局长寄给她的。她把相册摊开在我们面前，然后踱来踱去，用手遮住脸，那种愉悦的紧张感控制着她，让她的身体一直颤抖着，除了当她的责任感组织起她的情绪的时候。大部分照片我们之前都看到过，它们显示出萨拉热窝的街道，那两位已经吃饱而身体肿胀的可怜受害者被推向死亡，以及脆弱而笨拙的谋杀者只掌握了那快速射击的一瞬间，之后就落入街头人群的力量的掌控之中。这些人在这一天较之于受害者或者谋杀者，看起来都显得更为强壮和自主，以至于他们可能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种族。但是有一些惊人的恐怖照片。那是在暗杀事件之后，在还没有对犯罪展开调查之前，数百名几乎没有听说过行刺事件的波斯尼亚农民就被处死了。还有一些尤为可怕的男人照片。除了不公平、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治理不善、贫穷以及这不应得的死亡之外，他们对其他事物一概不知，而现在他们歪着脖子，伸展着身体，以一种冷峻自豪的口吻说道：“尽管如此，我还是我。”还有一些农村妇女的照片。她们被挂在绞刑架上，在那飘飘长裙中，如画像上的圣人一般僵硬。有几张照片是关于不同城镇的军营，这些大屠杀的发生地的。每一张照片都显示出在那个夏日人群聚集、仿佛正在举行一场公园派对的地方，每张脸庞都标示着极端的痛苦和残暴。这些照片是如此奇怪而耐人寻味，以至于我丢失了过去的自己，开始重新找寻自我，那种迷失就像有时一个人在一列火车上或者陌生的酒店里醒来时那样。可能我们都已死去，而我还在看着一些我们种族的死亡斗争记录。

这位牙科医生走近我，声音依旧甜美，即使所说的内容包含极度的痛苦，她叫喊地说道：“但是我们没有那最糟糕的部分的记录，就是在监狱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些事情应该为人所知，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了而不被人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要想知道他都遭受了些什么，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你们想不到我的哥哥是多么地羸弱。他是如此的——好。要不是有压迫，他绝不会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所以在监狱里，杀死他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我问道：“他们说他一定会死，因为在进监狱之前他就已经得了肺结核，这是真的吗？”“不，不，不，”她断然否认，“在他们抓住他之前，他从来没有得过任何病，从来没有！”之后为了纠正一时冲动，她努力用自律约束自己，解释道：“根据我的医学培训，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他是否遭受到任何种类的病痛的折磨。非常诚实地讲，我不这么认为，我根本想不起任何确切的症状。他不强壮，他有得黏膜炎和支气管炎的趋势，但除此之外真的再无其他。但是当我们的人民看到一个瘦削虚弱的男孩或者女孩时，就会习惯性地说：‘他看起来像是得了肺病。’而奥地利人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开脱。”

我总是很有兴趣知道，在伟大的历史瞬间之后，那些与主人公有着自然联系的女人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想知道当圣莫妮卡的儿子圣奥古斯丁听到花园里的一个孩童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并随后皈依了基督教时，圣莫妮卡都做了些什么；她是怎样和圣奥古斯丁被迫抛弃的小嗣女的家庭交涉的；她是怎样打发那位陪同圣奥古斯丁度过困难婚约时期的情妇的；她又是怎样放弃租赁位于米兰的房子的。你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我对这位牙科医生说：“请告诉我在暗杀事件后，你和你的母亲都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她说：“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可怜的母亲来说有多糟糕。她对政治一无所知，她还是个年轻女孩时就嫁出去了，她生了好几个孩子。我的父亲非常严厉，他除了命令她或者责骂她之外，几乎不让她开口或者对她说话，她十分茫然。然后这事件就突然发生了！她最年长的孩子企图杀掉大公及其妻子——且不谈其他事情，她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重大了，是不应该发生的。之后，就在当天晚上，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她不知道没有了男人，没有了父亲或者丈夫之后会怎样。当时我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用。我是个女孩，只有十五岁。她像一只被吓坏了的动物。但是第二天一早，一位邻居爬进后花园对她说，‘快，你们必须逃跑，一群暴徒正要来杀你们’，她和我不得不带上我哥哥和那五个年纪尚小的孩子，来到后花园，穿过另一间房子来到街上，在街道的另一边，有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庇护。当我们弄清楚情况时，那群暴徒已经毁掉了我们的家。她当时非常勇敢。但是她很久都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生活阅历还没有让她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事情。

“后来，她在临死之前才知道我的哥哥非常勇敢地做了一些历史所要求的事情，但起初它只是一种耻辱和一场灾难。你们看吧，她长时间对发生在

我们身上的可怕事情不知所措。我们与其他许多波斯尼亚人被带到一处匈牙利境内的集中营。她和我不得不整天洗衣服来挣钱糊口，可即便如此，我的弟弟妹妹们也总是挨饿，我们也是这样，而且我们身边的许多人都死掉了。那就像一个地狱，我们还在哀悼可怜的弟弟内德耶里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他已经死去的事实。战争结束后，情况仍然糟糕，因为有一天他们过来释放了我们，将我们逐出了集中营。我们身无分文，无处可去，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并且因为饱受苦难，我们是那么虚弱、愚蠢和困惑。那是一场噩梦。之后我们找到父亲，在原先的房子里安定下来并一起生活。然而时间并不长，她的时日所剩不多，只活了一两年。我会给你们看张照片，那是她临死前几天躺在床上的照片。”

她起身去拿照片。康斯坦丁像是准备好了如果我没有同情心就会恨我一样，对我说：“这是我们人民的习惯，他们不仅仅会在婚礼和洗礼仪式上给他们挚爱的人拍照片，在他们死去的时候也要拍照片，我们并不排斥他们的痛苦。”这显示出我们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异。我无法想象我所知道的英国人会拍摄这样的照片，也想象不出他们会保存偶然拍下的这种照片，或者拿给一个陌生人看。这位母亲靠着枕头支撑着，她的脸因为疾病而消瘦变形。我想她肯定是患了癌症，她就像即将凋谢的花瓣一样；她的眼睛回顾着她的一生，并惊讶地审视着将她的生命带到终点的周围环境。孩子们的脸压在她瘦削的肩膀和萎缩的胸上，他们的健康对照出母亲的疾病，他们对母亲惊讶的表情感到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排斥任何一部分痛苦，这痛苦强烈地刺穿了他们，并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康斯坦丁不必感到恐慌，我感觉他的人民和我的人民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同证明了我们的低劣。害怕痛苦也就是害怕快乐；由于我们不拍摄临终之榻的相片，拍摄婚礼和洗礼的照片也并没有太大意义。“想想看吧，”这位牙科医生说道，“我想起关于这张照片的一件悲伤而有趣的事情。我们派人去请照相师，并聚在床前。随后当我们告诉我父亲照相师就要到了而他不能出现在照片里时，我们发现他受到了伤害。他没有意识到对于我们而言是他造成了她的殉难，对我们来说让他出现在体现她痛苦的照片里，这感觉太古怪了，就像牧羊人的妻子所感受的那样——牧羊人受到一头狼的致命袭击，而牧羊人的最后一张照片里还有这头狼出现。这表明他在他的严厉上是多么无辜，他又是怎样因为没有那种能够料想到后果的敏感而选择并坚持了一个完整角色。”

“他就是这样。”这位医生说道，他正翻看着他妻子拿出的她母亲的相册。他递给我们一张一位农民装束的男人的照片，上面的这张脸仿佛完全是用墨索里尼般的好斗表情“化妆”成的。男人以一种挑衅的姿势站在一些横幅前，那些横幅上写着具有爱国性质的塞尔维亚语题词。“他是一名非常严厉的波斯尼亚爱国主义者，”康斯坦丁说道，“这些是他的秘密民族主义团

体的横幅。他总在反抗，总在反抗。”牙科医生捡起这张照片看了一会儿，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样，她摇摇头又把照片放下。“在那个房子里，从来没有过温柔的话语。”她说道。她的脸埋在手里，然后开始笑道：“我能想起那时对我来说很糟糕，但是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被选中在学校颁奖仪式上为我们班朗诵。”“是的，”这位医生说道，“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这事总是会让我笑个不停！”“是的，请讲吧。”我说道。

“那是我们还住在特雷比涅的时候，”这位牙科医生说道，“我哥哥和我都雄心勃勃，想接受教育，所以我学习很努力，是我们班上的优等生。因此我被选中在学校颁奖仪式上朗诵。颁奖仪式是一件大事，所有官员都会参加，甚至一些官员还会带他们的妻子来，更别说是镇上的所有人了。然而，当听说我被选中后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其他所有被选中为班级朗诵的小女孩都会因为这个场合而拥有新裙子、轻便鞋和长袜子，而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会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当中没有人有，从来没有。我们只要想要什么，父亲就觉得有义务拒绝掉，以免我们被宠坏，变得放纵。求母亲去为我们说情也没用。那只会让我们更加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他当时想证明他才是家里的主人。

“但是我看到他为我被选中而感到自豪。我发现他拿着刊登出被选中学生姓名的当地报纸给他的朋友看。所以我异常小心地接近他。我并不诚实，但我通常对他很诚实，不论他打了我多少次。但是这一次——啊，我太想要一件柔软漂亮的裙子了！所以我走过去告诉他我多么想要新裙子和新鞋子，并且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些，因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都会在那里，假如我穿着旧衣服的话，他们会嘲笑我这个塞尔维亚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的，’他说，‘我知道了，你必须有新裙子、新鞋子以及新长袜。必须这么做。’我应该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听到他说这话时我的心是怎样跳动的。

“但我没有意识到告诉我我能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仍然是我的这位父亲，因此接下来这些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也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这位可怜而亲爱的人开始将鞋袜以及裙子看作他人生哲学的表达。他变得笑容满面，神秘兮兮，他对待我就像是他打算要给我一些好处似的，而我因为年龄小还不能理解这好处，但是当我全然了解这好处时，我感到非常震惊。终于，在颁奖仪式的前一天，他带着我去看他为我准备了什么。我们到了一个鞋匠那里，他已经给我做好了一双靴子。这靴子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不管怎么长，我的脚都不会超过靴子。这靴子是如此结实，以至于假如我从洪水中走过，我的脚也会是干的。那皮革是那么粗糙厚实，像来自大象皮或者犀牛皮一样。有好几个星期他都在打听特雷比涅的哪个鞋匠能用坚固的皮革做出最结实的鞋子。我穿上靴子，心里念叨着：‘不能这

样’。

“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裁缝那里，那裁缝让我试穿了一件像我的靴子一样糟糕的裙子。有好几个星期这个可怜人都在逛布料店，试图寻找最结实且永远不会穿坏的布料。他找到了能用来建造军舰之类的材料，我无法告诉你们那材料的样子。它几乎不能折叠。这材料被一个裁缝做成了我的裙子。之所以选这个裁缝，是因为这位老人绝不会向现代服饰风格妥协，他裁剪的衣服就像山里人穿戴的那样，更像是你们套在牛马身上的那种布料。根据我父亲的指示，他把我的裙子做得太大，这样很多年里我的身体都不会长过它。这裙子甚至还有深长的卷边，感觉像木板一样，即使当我长成一位成年女性时，它对我来说还是足够长。裙子的上衣甚至还有附加层，像斗篷一样可以抽出来，为的是日后我的乳房还会长大。

“我没办法告诉你当我穿上这个恐怖的东西时做何感想。但是距离颁奖仪式只有一两天时间了。可即便离颁奖仪式还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时间，我也仍然无能为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这样的幽默，所以这使我很害怕。我感觉干涉他的这种状态会导致我无法面对的可怕事情。对于这件事情，哥哥待我倒是极为友好，我扑进他怀里哭泣。母亲什么也帮不上，因为她被我的父亲搞得太迷茫了，她只是说‘嘘，嘘，你千万不要让他生气！’所以，在颁奖仪式那天我哭着溜进了学校。所有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友好；他们立刻就明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很严厉。到了我朗诵的时候，我就穿着那双讨厌的新靴子笨重地走在舞台上，那靴子很适合一个农民在被洪水淹没的山谷中工作。我脸色绯红，这是很合理的，因为我肯定是这世上最荒唐可笑的景象，我更像一座堡垒，而不是一个小女孩。我站在那里，在我看来这就是无尽的战争中的又一场战役，而假如我想有所作为的话，我这一生都将继续与父亲作战，所以我尽我所能地开始了朗诵。

“我相信观众们也很友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被卷入一种离奇的状态中。我感觉我的思想被堵住了，好像有根木棒阻止我的感情向着自然的方向流淌，对一个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孩子来说，这自然令人憎恨。让我踌躇的是我在观众席中看到了我的父亲。他坐得很靠后，因为作为一个天生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塞尔维亚人，他自然不会坐在前面那些奥地利和匈牙利官员就座的地方。但是他坐在镇上人们的前面，因为他备受尊敬。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而且我能看到他脸上洋溢着之前我从没看到过的一种感觉，就是最终，在他坎坷的生活里，就这一次，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他的女儿想得到合理的东西，他满足了她的心愿，并且给了她更多，这样从那时起，他就确定他能够得到更多那种他所渴望的感激与顺从。我不能爱他，但也不能恨他。哦，这可怜的人啊，这可怜的人啊！”

她突然迸发出一阵痛苦而有爱心的笑声；她的手指，像是不自觉使然，将她母亲的照片翻过来，正面朝下，仿佛保护这位死去的女人免受正被这些记忆唤醒的远古敌人的侵害一般。“我父亲有太多滑稽的事迹，”她继续说道，“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人民，不论多么贫穷，他们都很喜欢拍照。我父亲也是如此。每当事情看起来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就想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照相师那里，然后拍上一张他在孩子们中间的照片。但是当他跟我们其中任何一个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跑进房间里把我们的照片从合照中剪出来，但是他不会将其销毁。也许他是个原始魔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民，把孩子们的照片烧掉或者将其丢进废纸篓里看起来很像是要杀掉他们。他把剪下来的照片保存在盒子里，并且当他又喜欢我们时，他就会把剪下来的部分粘回到合照上，因此我们的一些照片总有着最特别的外形。我会看到有一天合照里我的妹妹不见了，然后她又回来了，她的照片又被粘进合照里——哦，亲爱的，哦，亲爱的，这个可怜的男人啊！”

她又一次掩面而笑。她丈夫理智而英俊的脸上也挂着笑容，开始说道：“他从没想过可以愉快地引导家庭生活，这太不同寻常了。战后很久，有一次在贝尔格莱德，他走进来发现我正坐在我们经常去的一家咖啡馆里，并且问我我的妻子在哪里。我说：‘我和她约的是六点钟在这里见面，但是她还没有来。’他说：‘但是已经六点半了。今天晚上你必须为此打她一个耳光。’然后我说：‘但是我娶您的女儿，恰恰是因为我知道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她绝不会让我等她，并且无论如何我都相当乐意坐在这里读报纸喝咖啡，此外我不喜欢打女人，特别是我深爱的女人。所以为什么我要打您女儿一个耳光呢？’这让他很吃惊。即使我说了一些真正肮脏、真正无情而卑鄙的话，也不能比这更让他心烦了。他觉得我是在冲击社会的基础。”

“然而，你们可知道，”这位牙科医生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接受了所有事情。他过去常常谈起我的整个生活，我的职业，甚至我的婚姻，仿佛这些是他为之计划并努力的事情。”“是的，的确是，”那位医生说道，“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有一次我妻子不在，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他对我说：‘哦，你知道你有理由感谢我。我把我女儿抚养成人，这样她就成为一个通晓事理的女孩，不像那么多的女人一样只对愚蠢感兴趣。而现在你拥有一个妻子，她有着你可以引以为豪的职业身份，你可以平等地对待她。’”“现在你们怎么想呢？”这位牙科医生高兴地说道。但是她的脸色变了。她竖起了她的食指。“那不是我的一个小孩吗？”“是的，”这位医生说道，“我相信我一分钟前听到了哭声，但是我不确定。”“你该告诉我。”这位牙科医生用妹妹般的责备口气说道。“你介意去看看我的宝贝们吗？”她问我说。而当我们走过走廊时，她向我解释说：“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宝贝。我那非常可爱的妹妹，就是我给你看的照片上用头抵在我母亲肩膀上的那个，她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但最近去世了。因为她的丈夫住在城

里，而且不得不非常辛苦地工作，所以我们收养了这几个小孩。”

孩子们躺在一个大房间的两张床上，四颗明亮的小虎头对着指南针的四个方向。最小的一个脚放在枕头上，脑袋枕在姐姐的肚皮上。当牙科医生打开灯时，他们稍稍扭动，略显焦躁，但是他们有着动物所没有的、几乎如植物般的宁静。对于被妥善抚育的孩童，丁尼生曾这样描述：“婴儿像是跌落在草地上的果实。”在摆好他们的身体并给他们盖好被子后，这位牙科医生笑了。她关掉灯，我们踮着脚走过走廊，她说：“你明白，使一个现有的家庭像这个样子是件好笑的事情。抚养这四个孩子，既严肃又奇妙。突然间就有了四把小牙刷、四双小拖鞋和四套小浴衣，所有这些就像一个童话故事。”她回到了起居室，比她离开那会儿平静多了。“现在你们将听到几首波斯尼亚民歌。”说着，她的嗓音便悠扬婉转开来，仿佛她的声音很高兴她的心给它自由，任它歌唱。

亚伊采III

当我醒来看到照耀在窗外树梢上鲜绿色的阳光时，我的丈夫已经醒了并若有所思，他膝盖上蜷，双手扣在头背后。“昨天晚上很有趣，”他说，“她爱着她的哥哥，可对她而言，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父亲才是重要人物。她不得不谈起他，因为在她看来，他才是家里一切事情的主要根源，在她眼里，甚至萨拉热窝事件也仅仅是他导致的结果。”“我记得审讯里有一段奇怪的记录表明她的哥哥也有同样的观点。在这儿，把它拿过来，就在椅子上。”我看到了，因为我们带着一份莫赛特翻译的庭审记录法语版。“是的，”我说，“它最终是正确的。这位父亲出席了几次枯燥的诉讼，并证明其他人因为他儿子在他们家冒犯了一位亲奥地利的公务员且拒绝道歉就殴打他、呵斥他，还把他关进警察局，等等。最后他们读了一份这位父亲所写的证词，明显有些重要的段落是关于父亲对儿子的看法的。他抱怨孩子们的忘恩负义，并且表示希望他们也会得到他们下一代同样方式的对待。”我想起昨晚我见到的那几个圆胖的孩子，在通风的卧室里心满意足地熟睡着，我为逝去的人颤抖。“法庭庭长问查布里诺维奇：‘你知道你是个多么忘恩负义的儿子吗？’而查布里诺维奇的回答很是惊人。他说：‘我不想谴责我的父亲，但是如果我被更好地抚养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里的长凳上了。’诚然，吞并波斯尼亚使得他和他的朋友们去谋杀大公变得不可避免，但是一个人会说这是谁的案件，这就很奇怪了。现在嘲讽弗洛伊德是一种时尚，但是其他人不能料想到在查布里诺维奇的思想中，他对父亲的反抗与他对哈布斯堡王朝代表的反抗看起来完全是一回事，所以当法庭向他提出一个关于这两个反抗的问题时，他不是用一个成年人的理由，而是用一个叛逆孩子的理由来作答。那些攻击国家元首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客观的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为了解决对父母的孩子气的怨恨所构成的精神困扰，这是多么准确地证明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啊！”

“但是等一下，等一下，”我的丈夫说道，“我刚刚想起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我突然想到，塞顿–沃森是不是在他的《萨拉热窝》一书中提到查布里诺维奇是一名服务于奥匈帝国政府的波斯尼亚塞族间谍的儿子？”“为什么？他是这么说的！”我惊叫道，“现在我想起来了，史蒂芬·格拉汉姆在《圣维特斯日》一书中也是这么说的。”“这太不寻常了，”我的丈夫说道，“因为塞顿–沃森绝不会出错，他就是他自己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史蒂芬·格拉汉姆偶尔会犯错，但是在所有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他自己那些含糊不清的方式都是精确的。”我说道。“但是这些仍然不会是正确的，”我的丈夫说道，“那女孩谈话时受到了如此强烈的记忆影响，就像是催眠药作用在她身上一样，我认为她没有撒谎，即便她想撒谎。并且她从没提及此事；相反她提及了一些与此相悖的事情，她也给我们看了那张他

父亲站在一个塞尔维亚爱国组织横幅中间的照片。如果他是一个密探，那么他也算是一个背叛的犹大，而查布里诺维奇的妹妹不可能容忍留他在家，更别说给陌生人看那张照片了。”

“不，确实，”我说道，“我不认为假如她知道他是个密探，她还会向我们提及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查布里诺维奇不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在萨拉热窝的法庭上，他不在乎说过的那些反政府言论。如果他的父亲是一名政府特工，他会向全世界揭发他父亲，就像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会揭发他的父亲是一名反革命分子一样。然而在查布里诺维奇的所有证词记录文件中，以及在他对其他目击者证词的无数评论中，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的父亲是斯拉夫事业的叛徒’。他说自己抱怨过父亲在家里悬挂着塞尔维亚国旗和奥地利国旗，但是就他父亲而言，那不是一种个人行为，那是符合警察局条例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萨拉热窝的人民都在遵守。但是查布里诺维奇没有揭发他父亲的其他行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吗？”我的丈夫继续说道。“至少那位牙科医生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因为假如塞顿–沃森和史蒂芬·格拉汉姆散布这个故事，那么肯定是因为他们有确实可靠的根据和一些消息来源。这件事肯定有段时间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一个谜，”我的丈夫说道，“我们还是起床吧，只要下楼我们就会找到康斯坦丁，而他可能为我们解开这个谜。”

我们在楼下发现康斯坦丁正在用早餐，那早餐丰盛得如同晚餐般让人羡慕。“你们偶然发现了令人非常兴奋、非常厌恶，又非常恐惧的事情，”康斯坦丁说，“但是也非常愉快，因为它是圣人殉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能问一下，你们找到了很棒的咖啡和面包吗？”“是的，是的。”我们说道。“我的人民知道如何生活，”他轻声细语，继续说道，“不幸的是，战争爆发后我们四处奔走。除了记录下我们所做的事情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书写萨拉热窝历史的工作就落入了少数足够聪明而着眼于未来的人手中。那么，因为没有报纸，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庭审报告，严谨的历史学家们就没有什么材料能拿来用于研究，而且谋杀事件发生期间停留在波斯尼亚并与那些密谋者有过联系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自由地进行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他当然认识那些谋杀者，他自己也曾参加过学生革命运动。无可否认，他非常全面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所有写作有关这次谋杀事件的内容的外国人都跑来咨询他。然而不幸的是，战后不久，这位年轻人遇到了查布里诺维奇的妹妹并疯狂地爱上了她。许多男人对她的感觉都是如此，她的声音让人觉得她仿佛就是一个维拉（塞尔维亚仙女，一位森林女神），并且会在林间草地上和一个人永远舞蹈。但是她不会爱上他，那时她就已经要嫁给你们昨晚见到的那位医生了。这位年轻人用了太长太长的时间来改变她的心意，但无法做到。所以他离开了，然后在他看来查布里诺维奇的全家人都不怎么好，他于是想用他的嘲弄来摧毁他们。所以在他所有的写作和言论中，查布里诺维奇好像终究不是一个英

雄。这里一点嘲弄，那里一点忍无可忍，他就这样毁掉了查布里诺维奇。”

“我能看出你说的是事实，”我大声说，“我能看出将查布里诺维奇描述成一个内心烦躁、喋喋不休、歇斯底里的人，可能是出于一种对像他妹妹那样活泼可爱、喜怒无常、娴熟流畅的性格带有偏见的看法。”“是的，”康斯坦丁说道，“关于查布里诺维奇的传言，没有什么是全然不真实的，但是都略带恶意而微不足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查布里诺维奇的父亲是个密探的说法不予理睬。我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知道他的女儿听说了此事，而且我知道她是善良而真诚的女人，以至于除非她已经调查并发现没有根据，否则她是不会否认的。而如果她发现此事并非毫无根据，那么她绝不会再提起他的名字。”

“多么残忍的谎言啊！”我叫喊道。“哦，这不全然是一个谎言，”康斯坦丁说道，“我认为那个人不会故意撒谎。但是他爱着这个女人，因为她并不爱自己，他就想证明她以及与她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毫无意义，在这种思维状态下，他认为如果他想达到目的的话，这些事实就需要承载着他当然不会看到的意义。这里，我猜想他仅仅是曲解了一些事件，或者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想想查布里诺维奇的父亲。他是一个顽固的自我主义者，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主观主义者；在他看来，宇宙的每个部分通过自我分离体现出最基本的背叛，而他不在其中。在我给你们展示的这个事例中（我会展示给你们我的国家所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孩子们在他眼中是如此忘恩负义和不近人情。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一个爱国组织中，他的同志们仅仅因为某些细微的政策意见与他的看法相左，便偶尔，或者经常地要密谋反对他以及他们的事业。然后很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作为对同志们的威胁，他声称要给予他们挫折并上当地警察局告发他们。这种威胁可能被真实地实施在某些简单的人物身上，他们可能受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件误导而相信他已经将此话付诸实践，尽管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其他一些不简单但是狠毒的人可能散布了他已经这么做了的消息，因为不能指望这样一个人不会结下很多仇敌。此外，也许仅仅有一次，查布里诺维奇的父亲可能向警察告发了某个波斯尼亚革命运动中他视为危险的人物。沙皇俄国时期的革命分子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排除那些因为言行失检或者不遵守纪律而被认为不受欢迎的同志。这里我们的人民很少使用这种方法，但要想到这个人是个例外，他就是他自己的法律，他真有可能做过那种事。但我仍然不相信他对他的塞尔维亚同胞们有过任何形式的带有目的性的背叛，并从奥匈帝国政府领取薪水。”“讲这样一个故事真是可惜！”我说。“不，不可惜，”康斯坦丁说道，“有其他东西可以帮助解读它。假如一个女人不帮一个男人的小忙，把她的身体和灵魂交给他，不论她是否喜欢他，在他看来，一个单纯的事实就是她是一个麻风病患者，她父亲是个出卖国家的驼背老头，而她母亲则是个跛子娼妓。而且，那位年轻人和查布

里诺维奇彼此之间一开始就有些许反感。我想他或者提供了证据，或者写了证词，而查布里诺维奇的评论方式让人觉得缺少同情心——”

就在此时，一个肤色白皙、身着暗色系西式服饰的人来到我们桌旁。他像极了梅特林克戏剧里在巴尔干地区国家间传递信息的次要角色。他对康斯坦丁说了些什么，让康斯坦丁高兴地呼喊起来，并递给他一张字条。“喝完你们的咖啡，你们英国人总是在吃东西。”康斯坦丁喊道。他撕毁了那张字条，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表达着他对那字条的喜悦之情。“我在这里有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想要见我。他们是化学品制造商，并且他们让我们去密特拉神庙，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将神庙展示给你们。当然了，他们想要见的人是我，因为我们年轻时在俄国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催促我们上车并驶往那家化工厂。工厂坐落在城镇郊区的草地果园间，其都市风格与周围不相协调。工厂修建得十分坚固，可以认为是合乎19世纪中欧风格的工业建筑。此时两名经理并不在工厂，康斯坦丁站在那里，陷入一种忘形的失落中，喊道：“是他们让我来这里的啊！”边说边在口袋里搜寻那张收到的字条。“你在酒店撕掉了那张字条。”我说道。“你们英国人很了不起，”康斯坦丁说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庆幸的是此时驶来一辆大轿车，车里几乎直立式地坐着两个彪形大汉。他们走向康斯坦丁，亲吻他，拍拍他的屁股，用熊一般可爱的嗓音亲切地叫喊着。他们有一会儿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夫妇俩，他们对与康斯坦丁的重聚感到如此欣喜，他们明显将他看作兄弟，看作好斗的公鸡，看作魔法师。他们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在俄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同志！啊，优秀的小诗人！”

但是过了片刻，康斯坦丁告诉他们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他们都兴奋得脸红起来，因为预想到他们将有半小时的时间沉迷于他们神秘的激情——一般说来是考古，具体说来就是密特拉神庙。他们迈着大步带我们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一片田地来到一处果园。他们来自最西化的斯拉夫国家，其中一个是克罗地亚人，另外一个高个子来自斯洛文尼亚，过去曾经在匈牙利待过，但是他们二人看起来都是极其普通的斯拉夫人，就像我们认为俄国人应有的那副模样。那位高个子属于那种风格的俄国人：看起来像是身材魁梧的中国佬。当我们来到果园才发现门的钥匙落在工厂里，但是他们提高嗓门像痛苦的熊一样吼起来，然后一个身着漂亮梅红色农民服饰的工人爬了上来。了解事情原委后他转身离开，回来时带着一把斧子，开始砍果园的一部分木栅栏，那木栅栏相当坚固。当他在砍栅栏时，一位极其端庄、令人尊敬的穆斯林长者走近我们。他戴着得体的洁白色头巾，显示出他的职位。他在向男人们打过招呼后就加入了我们当中，没有什么可以理解的原因，因为他对我们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都漠不关心。栅栏上打开了个缺口，除了那位穆斯林伊玛目，我们都由这里进到果园里面。在他看来，观看表现人物形象的雕塑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所以在一大片李花下，他背对神殿坐在一根树枝上。

密特拉教的神秘在这个上午很是明显。前天晚上，我已经亲眼看到了雕像的轮廓，并用指尖感受了那创造出巨大象征力量的平面。现在我可以看到设计的情感寓意及其细节。神像的脸上只有坚定的表情，但是坚定的表情还不足以填满面部；那头公牛的生殖器硕大无比，这一点几乎不能否认，让另外一头公牛相形见绌。攻击他们的蝎子体型庞大。粗野正被粗野的附带物粗野地谋杀。难怪不允许女人有这种崇拜，因为它有着与众不同的阳刚之气。所有女人都相信有一天会发生无比愉快之事，随后整个生活都会惬意无比。而所有男人则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做出极不愉快之事，之后生活仍将继续，所以他们高举这尊雕像来证明关于这些愉快与不愉快事情的考虑是琐碎而多余的。女性的信仰中有着被动的缺点，当然这更为可取。它背后有着某种逻辑。如果发生了一件无比愉快的事情，人类在这事件的影响范围内就可能尝到甜头，而生活也将因此更加和谐。但是没有理由推想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除了玷污参与人的声誉并耗尽他们的生命外，还会产生什么影响。葡萄和小麦起源于这头死去公牛的血液和骨髓，动物起源于它的精种，这并不是事实。死去公牛的血液、骨髓以及精种凝结腐烂，散发出阵阵恶臭。

这两位巨人谦恭地展示着这个疯狂的祭坛，因为他们也是男性。康斯坦丁已经爬上一个倒置的篮子，正在探查边线上另外的符号标志。他们突然瞥见了他，看着他那胖乎乎的样子，喊道：“啊，好一个康斯坦丁，还像从前一样，还是这副样子！”他们张开手臂喊他，他走下来让他们再一次拍打并拥抱自己。这三个人都开始喊叫：“你记得吗？你记得吗？”我正在听着一段历史，却无从理解它。就我所知，这段历史在西方历史中并无记载，却相当重要。在塞尔维亚军队被德国及奥地利入侵者驱逐出他们的国家，经过著名的阿尔巴尼亚撤退到达亚得里亚海之后，若干幸存者被送往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些塞尔维亚人当中有些成为非共产党人，有些则加入了共产党。一些在国内接触过俄国革命宣传的人物在克伦斯基[注]政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有些人被杀害，有些则追随了列宁；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大多也被杀掉了。幸存者寥寥无几，我们见到的那些人也仅仅是依靠运气和超自然的勇气才得以逃脱。

我眼前的这三名幸存者笑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相互靠在一起才能站稳脚跟。他们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那位克罗地亚人在哄笑中喘着气说道：“我们三个当时都在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和圣保罗要塞。”“是的，夫人，”那位斯洛文尼亚的高个子补充说道，“我和我们可爱的小康斯坦丁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之后我们被判处死刑，我们两个都是。”就在此时，康斯坦丁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以至于他在给我们讲这笑话时身体前跌后仰，喘着粗气。他指着那个斯洛文尼亚人，气喘吁吁地说道：“想想吧，他被两次判处死刑。两次啊！两次啊！”想到此事，他们就弯身坐在祭坛角落的空地上，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最后那个斯洛文尼亚

人站起身来，擦着眼睛，略带歉意地对我们说："啊，夫人，你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只是太年轻。"

---

1.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克伦斯基（Kerensky，1881—1970），全名为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曾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

耶泽洛

那天上午，我们沿着瀑布的流水形成的小河溯流而上几英里。河流贯穿一座漂亮的宽阔山谷，每隔半英里左右，浅浅的小瀑布就会将其阻断。柳树荫下，小瀑布美丽地流淌在河湾凹地间。河谷的下游，四五个磨坊在这些小瀑布对面一字排开，小木屋下，一种奇妙的装置正在运行，那是涡轮的原始形式。康斯坦丁用他那肥厚的声音得意地说道："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人民几百年前发明了涡轮。"但是现在，这些磨坊都坐落在较高的位置，因为几年前亚伊采遭受了二十三次地震，一次山崩改变了河流的走向。为了让康斯坦丁高兴，我们停下车来走进一个磨坊，却又突然丧失了勇气，因为地板上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躺在毯子里。他醒来只粲然一笑，好像暗示着我们都是从犯似的，复又闭上了眼睛。我们继续沿河前行。河流变得开阔，注入眼前的一个湖泊。湖泊犹如一面雨灰色的镜子，映射出明亮而模糊的景象：田园般的山坡向上绵延至高地黑暗的森林。这与波斯尼亚的风景十分相像，几乎就是一幅精心渲染的山水画。湖泊的尽端华丽地分为两条溪流，一个村庄坐落在繁花盛开的树丛中，将两条溪流联系在一起。村庄里的尖塔优美如枝头的繁花。

村庄里的一些房屋，那好看但已经破碎的木质部分以及铺盖着瓦片却忽视掉排水功能的屋顶，体现出一种由贫困所扼杀的关于高雅的重要传统。但是某些房屋依然保留了这种传统，在它们合适的比例以及朴实的装饰中，干净整洁和新灰泥使其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纯朴美观，这足以使人奇怪地想起简·奥斯汀笔下巴斯城中一些更为朴素、更具乡村风味的寓所。丁香、郁金香花开遍地。周围除了几个可爱的孩童外再无他人。那些正在丁香花丛中腐坏的房屋中，有一幢的楼上装有格栅栏。从这楼上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低沉却充满智慧，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她在唱一首波斯尼亚民歌，歌声中充盈着一种因为没有完全获得某种美好事物而产生的疲惫感。那些讲述东方男人们仅凭闺房歌声就为了一个女人而面对死亡的故事变得真实可信起来。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站在桥上，看着清澈如空气般的流水梳洗着桥墩上的绿色草丛时，我们听到另一个这样的声音从一幢整洁美观的基督教式样的房屋里传来。那房屋与一座木质清真寺被一排白杨树隔开。那个声音虽更加平静、更显年轻，却急迫依然，急迫地期望从喉咙里宣扬出美丽来，急迫地期望在音乐中陈述一个问题。这两个女人都精妙而令人兴奋地使用了某种巴尔干地区歌曲所独有的特征：在每一句歌词之间都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停顿。像是发言者提出了她的观点，然后宇宙用沉默面对着她，她想通过证明她的观点改变这个事实。你非常确定，它问道，你是正确的吗？你非常确定不值得去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然后那悠扬的旋律又振作起来，再一次通过增强论据来努力改变那呆滞的沉默。

我们在河边的一个小餐厅里喝着咖啡。一名警察过来查看这些陌生人的身份。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兵，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胡须灰白浓密。“哦，近来可好啊，老胡子？”康斯坦丁问道，一只手搭在这位老人肩上。他的答话中有些内容让人相信这个老人是一个士兵，一位反叛者，一名黑盗客的后代。他脸红了，愉快地笑着。餐厅老板的儿子是一个十几岁的快乐男孩。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储存在浮箱里的褐鲑鱼和蠕动的大龙虾，这使得他很讨我们喜欢。河对岸是一栋华丽的穆斯林住宅，色彩艳丽如树下堆放的圣诞礼物。花园里精准地生长着如同装饰物般的植物，我们猜想那只能是来自种花人的花瓶里的插花。靠近水边还有一座凉亭，让我再一次想起简·奥斯汀笔下的巴斯城。对于那些喜欢凉爽、喜欢树荫、喜欢能够向外看去而又不被看到的人而言，这样的庇护所看起来是如此之小。也许在有路经过的埃文河畔以及大宅子的花园墙上能够找着这样的庇护所。巴斯及其周围地区的城镇可能的确很小，但不能被视为乡巴佬村庄，而且它对那种私有而不贪婪的快乐的享受，比如有围墙的花园，据我所知是英国最接近穆斯林的部分。

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溜了进来，瘦弱的肩膀上背负的重物几乎将她压弯了。餐厅老板的妻子在角落里小声抱怨着什么，这位戴着面纱的女人就伸直腰板走开了，留下三件波蕾若外套给我们看。村里的一个女人想卖掉它们，之前她家境富裕，现在却极为贫困。我们将三件外套摆在长凳上，尴尬地看着价格，因为价格只有一英镑。外套都是用天鹅绒制成的，有深粉红、柔红色以及紫色的，而且它们都是用金色饰带缝合而成，使得天鹅绒看起来在这一设计中仅仅作为一种稳定因素，在硬壳里无论被怎么挤压揉捏也绝不会失去其重要作用。这件紫色的外套融入了某个女人的聪明和灵巧。紫色和金色属于浓重的色彩，所以她将淡紫色和玫瑰红色的小纽扣分成或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点缀在各处，有的集中，有的分散，总能够减轻色彩对视觉的冲击。“做这件外套的女人可能还在村子里，”我说道，“我看出来这些外套很旧，但也许是她在很年轻的时候缝制的。”然而我错了，因为这件外套用了一种19世纪早期的印花棉布作衬里。“这样的一个人被岁月卷走，真是令人恼火，”我说道，“但是我应该保存她的作品，我要把这件波蕾若外套带回家展示给其他人看，他们都会喜欢它，我也会在遗嘱中将它留给喜欢它的人，这样就能从过去把它拯救出来。”“关于这个你无法确定，”康斯坦丁说道，“过去可是有着巨大胃口的。可能有一天没有人会认为这件波蕾若外套很漂亮，那时的它看起来或是单调乏味，或是荒唐可笑，甚至对从破袋子里拿出它的人来说是邪恶的。

“你想的是有些标准不会改变。但我要给你讲述一个关于我们刚刚离开的城镇，也就是亚伊采的故事。它会向你证明，美丽的物品，甚至在整个民族眼中都很神圣的物品，几代人之后可能也会失去原有的价值。当波斯尼亚落入土耳其之手时，许多方济会的修士都留在了原地，只有亚伊采一个

教堂里的修士们逃到海岸边，并驾船驶向威尼斯。他们逃跑是为了拯救他们教堂里的瑰宝，圣路加的遗体。那具遗体是塞尔维亚暴君乔治·布兰科维奇的一个女儿赠送给他们的，土耳其人在伊庇鲁斯得到它之后，乔治·布兰科维奇用了三万达克特将其从土耳其人手中赎出。但是当这些可怜的方济会修士来到威尼斯时，情况并不乐观，他们受到了攻击，就好像他们是异教徒并带着一位错误的神一样。因为意大利已经有了圣路加的遗体：一些帕多瓦的本笃会修士们已经拥有了他，拥有了三百年之久，而他就是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

“来自亚伊采的方济会修士们不得不在威尼斯，在教皇使节面前，在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审判中捍卫他们的头衔。最终，教皇使节说道：‘你们说的是正确的，你们的珍宝才是真正的圣路加。’然而方济会修士们总是十分清贫，而且很不快乐，因为帕多瓦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撤销这项裁决。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作为支持。他们拥有的圣路加遗体是没有头的，而亚伊采的圣路加遗体是完整的，但是大约在580年，皇帝提比留就将圣路加的头部给了圣格列高利。那个头仍然在梵蒂冈，而且即使在教皇使节宣布亚伊采的全尸才是真正的圣路加遗体后，它仍然被展示给众生。毫无疑问他发现要想合乎逻辑十分困难，因为罗马的另一座教堂长期凭借圣路加的一只胳膊治愈病人，而这自然就成为圣路加的第三具遗体。

“今天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故事不荒谬，除了那些非常单纯之人，过于单纯的人，还有蠢货们。那些信仰遗骸力量的人以及那些严肃的人会请求你不要谈起这样的事情，这样就不用想起我们的祖先曾是多么愚蠢地将一件美好的事情变成一件蠢事。但是大多数人，不管他们相信与否，只会笑笑作罢。但是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这创造出奇迹的两个头和三只手臂的尸体上看不出任何荒谬之处；他们也不感到怀疑，因为很多修士通过这样的尸体赚了很多钱。他们看到了其他事情，这使得他们给尸体增加了一个头，又增加了一个头，又使其变回一个头，使其有两只手臂，之后又增加了一只手臂，最后又使它变回两只手臂，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就我而言，我很厌恶当我阅读历史时，曾经这里有些什么事情，而现在什么都没有。它向我展示出人们一直在吃着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未经消化就会排出体外的食物。”

路上

有位在湖中央的小船里钓鱼的男人站起身来挥舞着宽大的衣袖，像是在打招呼。但他一定是位掌控自然神力的仙人，而且心情很不愉快，因为就在此时，滂沱大雨落在了我们身上。我们在路上什么也看不清。一直行至瓦库夫，我们才看到身穿鲜亮纺布围裙的基督徒妇女、戴着毡帽的穆斯林男

人以及戴着黑色面纱的穆斯林妇女站在片刻阳光下的泥巴里，售卖着小堆的蔬菜以及精瘦而饥肠辘辘的家畜。然后，雨再一次降临。当我们在瓦库夫改变道路后，我们在这条新路上几乎也看不到什么，除了有一次我们离开车子站在石台上那布满巨大坟墓的黑刺李树丛边。据说这些坟墓里埋葬的是死去的波格米尔教徒，他们有着极为严苛的品性，这些都属于他们异端邪说的表现。然而这些在一阵突然闪现的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的黑刺李树救赎了他们。然后我们来到坐落在平坦原野上的一个城镇，那里有一个枯燥无聊的军事基地，已经废除了“闲杂人等不得停留”等禁令。“这个，”康斯坦丁说道，“是奥地利人统治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驻地。”

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将车停在一个相当大的酒店外面，走进一家餐厅，里面的人出奇多，包括很多军官。他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默默地用餐，只有一些私下的低声窃语。我想他们到这个镇上也许是为了参加某个大人物的葬礼。坐下来后，我问康斯坦丁情况是不是这样，他温和地说：“不是的，我想这里一定有几名将军。”事实正像他说的那样。四名军官中有两名将军从桌边起身走了出去。他们刚一出门，整个空间立刻响起一阵交谈声，嘈杂如一群伦敦的鸽子。在饭菜上桌前很久就有葡萄酒上上来，非常可口，酒色鲜红，口感甜美，虽然不像法国红酒，但是真的不错。当女店主过来时，我们正想知道这酒产自哪里，因为它的名字不能给出什么提示。我突然发现她靠在我的椅背上。她是一位年迈的犹太人，戴着栗色假发，连连弯身奉承着我们。我们问她关于这酒的事，她回答说：“这酒产自匈牙利。”“什么？”康斯坦丁说道，“不可能来自匈牙利，太便宜了。这酒不可能支付了任何关税，它一定产自南斯拉夫。”“不是的，”她说，“这酒确实产自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

有人叫她，她就走开了。她迈着习惯性的步子，走时仍不忘继续奉承我们，甚至在桌子之间，也要伸出合十的双手，没有目的地从左往右一一鞠躬。康斯坦丁说：“她为什么说伏伊伏丁那属于匈牙利呢？战争结束后伏伊伏丁那就是我们的领土了，它是巴纳特地区的中心。她一定是出于某些原因还停留在奥地利人的过去。”之后，我们只一心想着我们的食物。那食物非常棒，不是巴尔干地区风味，而是中欧特色。有没放辣椒粉的蔬菜汤、维也纳风味的炖羊肉以及非常好吃的苹果卷饼。在我们用餐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又晃晃悠悠地来到我们身旁。我的丈夫对她说：“您给我们上的德国菜真是美味，您的德语说得也很漂亮。我能请问一下您是在哪里学的德语吗？”“德语是我的母语，”她答道，并解释说她出生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上的某个小镇，“但是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了，我亲爱的。”她卖弄风情地重复道，以老鸨般恶心的温柔将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可以感受到她肮脏的天鹅绒手套里僵硬的手掌。想起过去五十二年里她肯定经常为男人们带来所有迫切需要的妓院生活，真是令人作呕。人们会看到她擦干醉汉的呕吐物，打着某个柔软洁白的身体让其摆出

所要求的姿势并强制检查对方有没有患性病，拽着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的手臂让她不要哭泣，拿着盆子并可能直接参与绝望而凶残的堕胎。“我很高兴你们喝了我的薄酒。我也很高兴你们吃了我的苹果卷饼。”她略带勾引地一边说着一边弯腰退向门边。“是的，”康斯坦丁说道，“你们说的真是一点不假。我猜想她差不多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女时就来到这里和那些军官们混在一起。我想她以前一定很漂亮。她年龄大了以后就置办了一间房子。所以奥地利人就在我们这些野蛮的斯拉夫人中传播文化。所以她总是会渴望她亲爱的奥地利人，并说伏伊伏丁那属于匈牙利。”

当他说这些时，那位老妇人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一位中年男子以及两个三十或四十出头的妇女。他们坐在我们附近。我们本就来得晚，现在餐厅里几乎没人了，所以她和她的家人开始吃饭。很明显那位老人是她的兄弟，其他的人是她的孩子，都是她拙劣的模仿品。在赋予她活力的家族中，有某种毒药一直毒害着她的家人，唯独宽恕了她自己。在她的全盛时期，她一定如塞米拉米斯[注]般富有而果决，但这些特征在其他人身上却成为东方垃圾。他们犹如一堆骨头，拖着颀长弯曲的身体，站不稳的脚跟最后被压成一个钝角。很明显当饭菜盛上来时，这种拙劣的模仿达到了一种残酷的程度。他们不能正常地进食。汤总是从他们的嘴角流出经过下巴滴进盘子里。坐在首座的女店主端起美味的汤，用一只不颤抖的手捂住嘴唇，用疲倦而温柔的眼神看着他们，偶尔说上一句话或者递上纸巾暗示掉落的食物，对她而言，她的生活就像一个成功支撑起来的十字架，一种她可以引以为豪的精神胜利。不能过于草率地否认这一点。然而，她就是残忍；她就是污秽。

---

1. 塞米拉米斯（Semiramic），传说中古巴比伦国的皇后，在其丈夫死后主持国政。

萨拉热窝VIII

我们参加了布尔布尔的一个派对。她在河边码头上有一处住宅，距离弗朗茨·斐迪南被杀害的那个角落并不远。这幢现代化住宅的漂亮要归功于土耳其的传统风格，屋内灯火通明，没有不必要的家具，在一楼会客厅的地板上沿窗处有一个凸起的高台，这是一种穆斯林房屋常见的迷人特征。那里的家具都是人们所能获得的同类家具中最好的，但是这类家具并不怎么样。在巴尔干地区，除了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有很少的巴洛克式家具之外，没有精美的欧式家具。这与北欧的情况形成对比，那里富有的丹麦和瑞典商人以及俄国地主们将齐本德尔式家具和谢拉顿式家具的信息传播到了波罗的海。土耳其人的统治切断了巴尔干地区与北欧及其他欧洲艺术传统的联系。而当巴尔干地区人民接触到这些艺术传统时，又要通过中欧的介入，但中欧除了巴洛克式及比德迈厄式的家具之外，就绝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家具了，那里的家具设计全部是建立在幻想而不是合理的设计原则之上的，所以找不到橱柜制作的流派。在19世纪，奥地利比其他任何国家，可能俄国除外，品味退化得更为迅速，所以她在选择家具这些事情上，将一种腐朽的时尚强加给了巴尔干地区人民。一个毫不知晓其行业的大师在过去发现了什么的人，其所制作的书柜和餐具柜可能仅仅是大盒子；如果那个人相信数量可以代替质量的话，那么这些盒子自然会非常地巨大而笨拙。

但是布尔布尔购买的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所能制造出的最好的家具，而且她的地毯和窗帘都属于漂亮的东方风格；这房屋的每一寸都洁净且有阳光照射，都有一种认真而悠闲的打理家务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出于对尘土烦躁的厌恶，而是出于对整洁感性的偏爱。她自己不慌不忙，一件凉爽的裙子使得她令人垂涎的美丽像一块甜瓜果肉般清凉而不冰冷。她的丈夫和蔼可亲而稍显呆板，温文尔雅却略显柔弱，但是他不可动摇，不可磨灭，就像依照温柔亲切的神的模样而被用于雕刻的一整块花岗岩石。他们还有其他客人，包括他姐姐和他姐姐的儿子，后者正在萨格勒布学习科学；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明亮的大眼和秾纤合宜的身材，这传递出萨拉热窝有着非凡美貌的传统。有很多犹太人对自己丑陋的容貌深感厌恶，这是他们的不幸。由此所引发的排斥并没有因为其他犹太人长得漂亮便得到抵消，因为他们太过漂亮，因为他们非凡的美貌使得非犹太人群中吝啬而微不足道的人们惶恐不安。这种情况在英国人中最为常见。英国人承受不住任何丰富或者慷慨的事物，他们认为鸭子太过油腻，香贝丹葡萄酒太过醇厚，会在节日里穿着单调的衣服去丑恶的地方。许多非犹太人，其中包括很多英国人，他们仅仅因为憎恨这些人的完美外表而走出了这个房间。

这里的谈话对于一个外国游客来说，也许太过美妙。就这次谈话而言，康斯坦丁算是这些人中的艺术家。他会利用东方叙事者的那种古老技巧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支持这位明星，他们不仅理解他在讲什么，他们也知道规矩，会给他提示。这样的谈话要求注意力、识别力、欣赏力以及所有形式的付出，而我们吝啬的西方人不会情愿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一个英国人对这样的集会可能感受到的主要异议是它的成功以及它表现成功时缺乏的羞愧。我们从桌边站起身来，走进那间阳光充沛、挂着窗帘的屋子，喝了杯咖啡。咖啡里面打了个鸡蛋，这样能比用牛奶更微妙地稀释黑咖啡的苦涩味道，之后，如俗语所说，我们有了一点音乐。一点音乐！

布尔布尔拿起她的古斯勒琴，用精妙却刻意节制的声音唱了很多首波斯尼亚民歌。她的歌声与湖边那个女人的歌声不同，因为她不是斯拉夫人，她没有遭受过斯拉夫生活中基本的悲剧。那感觉就像是她在花园里重复着她所听到的墙外狂热的斯拉夫人的悲叹声。她淘气地唱了一首情歌，眼睛盯着我丈夫的脸庞，因为在这个国家唱这样的歌曲时人们习惯于紧紧盯着爱人的脸庞。大家都笑了，因为大家知道一个英国人会觉得这样很尴尬。但是他表现得很是无畏，他们上来拍打他的后背并告诉他他们认为他是个好家伙。这也让我想起了简·奥斯汀笔下的巴斯城，这样的一则幽默使得洒满新月月光的会客厅里气氛活跃了起来。

现在布尔布尔将古斯勒琴放在她丈夫的手中，说道："轮到你唱了。"她带着崇拜的目光转向她的客人们，解释说："我唱了，而且唱得很好，但他还没唱，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是实话。他的嗓音像一位半梦半醒的上帝制造出的催眠雷声。他唱了一首塞尔维亚歌曲，比大多数歌曲都要长。歌曲唱的是康斯坦丁出生的沙巴茨镇的帕夏。歌曲中的主人公是个酒鬼和赌徒：这首歌让人怅然若失，就像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的在赌场里或者牌桌上的人一样，些许的酒精以及对数字狂热的思考使得他与其他任何事物隔绝开来。帕夏输光了自己的财产，身无分文地坐在华丽空荡的房屋里。他像一个被剥夺了毒品的吗啡中毒者般承受着痛苦，因为他无法赌博了。带着一种悠闲的冷酷心情，这个酒鬼命令把他的母亲带到奴隶市场上当成一个仆人卖掉。但是他那漂亮高贵的年轻妻子走过来，用更为伤心却又从容的态度告诉他他必须把她带到奴隶市场上卖掉，而不是把他的母亲，因为这也是丢脸的事，那也是丢脸的事，而一个人应该选择丢脸程度较轻的。这首歌曲呈现出礼仪框架的毁灭，它着手讨论了醉酒的悲哀和长期恶习的冰冷结果，检查它们，仿佛它们是有奇怪色彩的花朵。

但在稍后的一曲里，他停顿下来，微笑着，重复着最后一句歌词，然后唱出了舒曼歌曲里的一句，很像是把一首歌曲转换出不同的音调。那位研习科学的学生走向了钢琴，大家都加入了舒曼的歌曲片段中。他们把《两个

掷弹兵》（*The Two Grenadiers*）演绎得很好，由康斯坦丁站在屋中央，边唱边跳，直到他张开双臂，怒喝道“我的恺撒，我被俘虏的恺撒”。篮子里那只显然是布尔布尔唯一偏爱的愚蠢小白狗醒过来，叫唤着跳上前，急切地想提供任何所需的帮助。他们都笑了。他们并不为欢笑而感到羞耻，笑声是愉快的，而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共同享受愉快的事物。然后他们又开始了歌唱，但是这次是在嘲弄，一首接一首地纠缠着德国浪漫主义，从《蓝莓和玫瑰》（*Myrtillen und Rosen*）到《可怜的彼得》（*Poor Peter*）。矮胖的康斯坦丁在吃过午饭后因为高兴而脸色红润。他依然在那只温和而疑惑的小狗的陪伴下，扮演着可怜的彼得。（“可怜的彼得蹒跚着走过去，脸色苍白如僵尸，心中充满了恐惧。”）尽管滑稽，但是他们优美地唱完了四个部分，而且他们的戏仿是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严肃批判。但是康斯坦丁举手示意他们停止，并说道：“够了。现在让我们通过联络伟大的北欧神话所具有的天赋来恢复一下精神吧。我们不都是雅利安人吗？”然后他们就进入了《指环》（*Ring*）歌剧里的场景，考虑到康斯坦丁以《卡门》歌剧里的角色身份唱着歌，他们表演得很不错。为什么是《卡门》呢？他们知道答案。那是因为尼采在他有名的一段话里表示他相信瓦格纳所需要的是比才（Bizet）精神的注入。因此，在这一次《指环》的表演中，齐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德在吉卜赛人的陪伴下才得以度过困难，“呦——嗬——嘿”与“哈巴拉涅”混合在一起。如此精湛的音乐技巧和如此丰富的文学引喻，根据我的经验，很少会成为英国人午餐聚会的后续节目。

当我们鼓掌时，我们的银行家朋友，带着一直以来对所有特定问题都表现出的温和欢乐以及对我们的通常状态表现出的忧郁，默默走进了房间。我们有几天没看到他了。布尔布尔暂时从唱歌的人群中走出来让他亲吻自己的手，然后在我们身边站了一会儿，直到他们招呼她回去，她才带着满含歉意的绝美笑容离开我们，尽管她很高兴再唱一曲。我想，她关于幸福完美的想法应该是发现自己在给世界上所有人喂糖梅。银行家笑着看了一会儿他的朋友们，然后问我们是如何享受这趟波斯尼亚之旅的。我说：“它的美丽超过了一切。特拉夫尼克非常秀丽，而亚伊采更好。但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查布里诺维奇的妹妹。”“你就像是童话里说‘比起任何宝贝，我更喜欢人类’的那个矮人，”他说道，“我确信你是正确的，在任何旅途中你都不会看到比她更好的人了。她的确高尚。”我也谈到了耶泽洛和那几件外套，谈到了瓦库夫和那些穿着深红色围裙的女人们，最后谈到了我们吃饭时那个餐厅里的恐怖老妇人。“你们相当正确，”他说，“她应该是你们猜想的那样。我想我确实听说过那个老妇人。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些事情，在于奥地利人统治期间访问过波斯尼亚的英国游客所撰写的任何一本书中，你们都不会读到这些故事。”“要我说的话，它们不太明智。”我赞同地说道。那天早上我一直在读一本我认为很愚蠢的书。那位作者神魂颠倒地游荡在一群奥地利和匈牙利军官中，祝贺他们引入的桑树成为波斯尼亚在土耳其

人统治下最为突出的景色，并且恭喜总督的妻子，“不失公正地被称为‘波斯尼亚女王’”，祝贺她将手工艺教授给那些像在耶泽洛制作出紫色波蕾若外套的女人们一样的人。“你们知道，在被兼并前后，我们无论何时都不是一个容易统治的民族。所有的士兵都有工资，就好像他们在服现役，而且公务员的薪水也高得离奇。这就意味着很多‘军营花朵’来到我们的国家，并依靠这些拥有大量钱财而没有正常消费方式的男人们过上好生活。这有点克朗代克淘金热的味道。这些女人中有许多许多的妓女，其中又以匈牙利人居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缺少美德的民族，而是因为土地制度使大量农民生活贫困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把女儿们卖出去为这个世界服务，不然就得看着她们忍饥挨饿。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匈牙利语就成了一种英勇的语言，甚至就像在伦敦的法语一样。”

他暂停了谈话。唱歌的人们已经终止了他们的歌剧，正在唱着以前最爱的歌曲。“让我们唱‘哇——哇——哇’吧，”康斯坦丁说道，而没有人不会马上想到他指的是“唉，唉，唉”。“错误，”银行家继续说道，“并不在于这些女人，而在于奥匈帝国。这些女人总是十分善良和蔼，并且获得每一种被允许的道德胜利。但是奥匈帝国，尽管自命不凡地信奉罗马天主教，它自己却在我们国家组织了一个妓院体系，违背了天主教所有关于贞洁的劝告，而这不能以军队的需求为理由。当然他们在萨拉热窝开设的这些妓院都远远超过了驻防部队和公务员的要求。当时有五家规模很大且价格昂贵的妓院，比如‘红色之星’‘蓝色之星’‘绿色之星’，等等，其中‘五场比赛’和‘最后的格罗申’这两家是为普通士兵服务的。这是他们对我们城镇所做的缺德事，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犹太人有着自己的传统美德，那时还没有受到干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纯洁的父权制民族，那里的男人肯定存在一种极为苛刻的纯洁性，他们会杀掉任何一个毁掉他妻子或女儿贞操的男人，所有准则失效的事情都由吉卜赛人来应对，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国间扮演着驱除耻辱的孤独角色。但是我们从来不了解卖淫，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说，知道花很少的钱就能够享用一个漂亮女孩的消息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对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而言，妓院里的家具也揭示出西方的奢华。那些不是来自富有家庭的人们之前从没见过大镜子、铺着红色天鹅绒的黄金座椅，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恐怕天主教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组织设立这些妓院时所犯下的不仅仅是对于纯洁的罪行，他同样犯下了谋害其他人灵魂的罪行。因为我相信他的目的是腐化萨拉热窝所有的年轻人，这样我们的民族主义精神就会被扼杀，而波斯尼亚就更容易统治。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行动。腐化的想法本身十分甜美，因为奥地利人仇恨着斯拉夫人，每个德国人都仇恨着斯拉夫人，而仅有的死亡或者仅有的压迫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

他补充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能否理解仇恨可以多么强大。我认为你们英国人不理解，因为你们如此幸运以至于没有其他人的仇恨能够触碰到

你们，而且你们自己也没有理由仇恨任何人。请让我指出，你们在特拉夫尼克和亚伊采的旅途中有一样东西没有看到。你们没看到波斯尼亚王国。你们看到了一些堡垒，可能还有一两座教堂，很可能还有瓦克基奇家族的殡葬用拱顶。其他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然而，威尼斯总督有一次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在我们面前，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国正在燃烧！’他指的就是波斯尼亚。征服可以吞噬一切。土耳其人消耗了波斯尼亚，奥地利人又尽其所能地消耗残存下来的一点点，但是他们的牙齿都还虚弱无力。但有时我会害怕，唯恐他们会长出像土耳其人一样强壮的下颚。”

中册




塞尔维亚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塞尔维亚

火车上

清早，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车站地板上到处躺着的睡觉的农民中间走过，离开了萨拉热窝。在西方，我们对农民的了解都不真实。我们被教导说他们几乎都是一些扎根土地的冷漠之人，不喜欢人造之物。这一点完全不真实，因为那些农民喜欢旅行，比起骑马来更喜欢乘坐火车旅行。我第一次谈及此事是在旧西班牙。在英国中部，火车接驳处总是挤满了人，因为有无数商机促使人们出行，但在这里，火车上全是农民，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离开家园的物质动机。在萨拉热窝审判案的记录中，囚犯和目击证人的流动性远远大于英国任何一个富裕中产阶级以下的人。自从这个国家开始自治，各种限制就变少了，每趟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挤满了欢乐的人，就好像他们要去看足球优胜杯决赛，但是其实他们没有看优胜杯决赛或其他什么的计划。

离开萨拉热窝的旅程很有意思，舒适可爱却又难以捉摸。火车启程于城市所在盆地的最底部，就像从碗底沿着碗壁向上盘绕，然后从某个边缘的缺口出来。在缺口处有个很高的车站，在那里可以最后一次俯瞰上百座宣礼塔、白色房子以及绿色火焰般的白杨树。从那之后，火车穿过一片满是高山和松树的宛如瑞士乡间的地带，时不时经过一些矗立着宣礼塔的村庄，直到它进入一个树木繁茂的长长峡谷，迎来一片壮观的景色。两条河流从一块巨大的岩石两侧呼啸而下，交汇到一起，河水多年的冲击将岩石冲出了一个剃刀形状的前突。我们有时看风景，有时睡觉，还经常听康斯坦丁说话，他在这次十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一直在跟我们或者其他乘客聊天。我第一次来南斯拉夫的时候，康斯坦丁带我去马其顿做一个关于它的广播节目，当我们到达斯科普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逃跑，因为从贝尔格莱德出发的十二个小时里他都在跟我讲话，而我觉得我必须一直听他讲。现在，我知道康斯坦丁聊天的时候就像一个职业网球选手，他并不盼望我们这些业余选手能够一直跟上他，只是期待我们玩接力，所以我有时候并没有听，直到我听到他开始讲最好的故事的某个惯用语。

“当你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对我的丈夫说，“你一定得见见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德国人。她非常非常漂亮，来自德国一个很古老的家族。她的家人不希望她嫁给我，所以我拐着她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跟我的关系都不太好，我努力讨他们欢心，但并不总是那么幸运。要知道，我岳母是一个路德教牧师的遗孀，我很清楚那和我的教派不同，但是我想欧洲只有两个基督教分支，一个是东正教，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现在我知

道我岳母不是东正教教徒，因为她憎恶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东正教教徒，所以，在我看来，路德教教徒应该是某种天主教教徒。也许是某种天主教分支，允许牧师结婚的那种。有一天我和我妻子到山里陪我的岳母，我正在阳台上吃早餐，我妻子还没下来，当时阳光普照，咖啡味道很好，周围又有很多鲜花，我觉得很快乐，就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对老太太友好一点了。’于是我对她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教皇生病了，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因为我对教皇很有好感，然后我告诉她各种让我觉得教皇是一个好人和智者的事例。我指着远处的雪峰，说爬上如此高峰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教皇经常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登山者；我接着又谈到教皇谕令，夸奖它们充满智慧、小心谨慎。我岳母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惊讶，因为通常是我一直说，其他人什么都不说。之后，我妻子下来了，我岳母站起来对她喊道：‘看你嫁的这个野蛮人，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上，坐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赞美教皇，赞美那个魔鬼！’

“她尝试对我友好一些，可经常也不太成功，尽管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喜欢我。就拿白啤酒的事来说吧。你知道白啤酒吗？那是世界上最淡最无味的东西了，那些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喜欢喝它。他们去树林和湖边的露天啤酒店，喝着白啤酒，用他们的小眼睛欣赏着德国美景，那是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喝到的最愚蠢的东西，因为它一点味儿都没有，也不能让你喝醉。它就像液体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只是它的无味让人觉得恶心，所以他们当中有点羞耻心的人就不喜欢喝，会加一点覆盆子糖浆。可也有些对‘淡而无味’不羞愧的人不用任何调味品去破坏它的原味，他们会点‘一杯什么也不加的白啤酒’。‘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加’。那些小资产阶级被问到想要什么时回答说，‘我想要它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呢？那是迷失，那是十足的无可救药，但是他们很快乐，他们坐在露天啤酒店里，要上一杯‘什么也不加’。这很有趣，这是宇宙中的某种不和谐，提醒我们上帝在处理令人讨厌的材料时，做得多么出色。有一次，我在岳母面前说起这事，然后你知道吗，她从那以后都给我喝那可怕的白啤酒。我妻子尝试告诉她不应该这样做，而她却说，‘你这傻瓜，我听到他说他很喜欢“什么也不加”’，我妻子说，‘不，你弄错了，他喜欢的是“什么也不加”这个说法’，然后我岳母说，‘你怎么胡说八道，为什么他要听到别人说白啤酒不加覆盆子糖浆就高兴？’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我必须喝白啤酒，尽管我是个塞尔维亚人，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地主和农民。”

我们正经过木材之乡，在河边，我们看见伐木工人正在激流之上撑着堆满木材的大筏子。“哪天你们一定要这样旅行，”康斯坦丁说，“在河水平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歌声。”我们经过维舍格勒，那个镇子里有很多新木材堆和旧房子，还有一些宣礼塔跟一座宽阔的棕色桥梁，桥上有一个穆斯林正骑着一匹驮马，他一定年纪很大了，或者来自遥远的南方，因为在我见过的所有波斯尼亚穆斯林中，唯独他戴着那种穆斯林头巾，而不

是土耳其人戴的那种毡帽。然后我小睡了一会儿，在一个小镇醒来，那里没有宣礼塔，也没有其他伊斯兰痕迹，仿佛我们身在苏塞克斯郡的某个村庄。事实上，我们是在塞尔维亚。我们下车站在月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呼吸着塞尔维亚的空气。它和波斯尼亚的空气不同，就像在苏格兰，高地和低地的空气也不同；它更干燥、更油酥，就像人们对糕点的描述一样。如果有人不知道在亚伊采或者埃蒂夫湖深呼吸是一种享受，而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兰莫缪尔丘陵深呼吸是另一种享受，那么他一定是感觉中枢有缺陷，也不能区分不同的水的区别。月台上正举行一个庆典，因为我们火车上有一位军官，一个二十来岁的浅色头发小伙子，他曾经在镇上的卫戍部队服役，之后被调到南方，现在正要回到北方去接受新的更高职位的任命。镇上的人提前听说了他会经过这里，于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聚集到这里恭贺他晋升。从火车抵达到离开时他们的欢呼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很喜欢他；但是当他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羞涩地静静站着，显然是因为军队荣耀的神圣感，因为从他们的说话中可以得知，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晋升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职位。他站在他们面前，非常感动，带着光荣的严肃，长期的训练让他身体坚实、肩宽腰瘦。他有着一张让西方人迷惑的斯拉夫脸庞，因为他的眉眼和颧骨看着刚毅英气，嘴唇和我们预想的一样棱角分明，嘴唇很薄，却饱满，又透着机敏。我喜欢看他穿着整洁的橄榄绿军装站在那里的样子；我喜欢孩子们仰头看着他时的面孔，想到他质朴的、捍卫一切的人生而恍惚。人生中有比打仗更好的事情，但是只有当做这些事情的人通过打仗赢得选择权，人生才会更好。

“我的家乡叫沙巴茨，”康斯坦丁说，我开始听，因为他的好故事都是以这些话开头，“在沙巴茨，我们都是一些很真实的人。那里不像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大城市很多人的言行举止都很相似。我们就是自己，每个人都不同。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必去模仿哪个为人称道的阶层来拔高自己。我们只有全心遵照自己的品性，才能使自己变得出色。所有的塞尔维亚乡镇都是这样，沙巴茨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自豪的镇子，我们走自己的路。当年迈的彼得国王来到沙巴茨的时候，他问一个农民日子过得怎样，那个农民回答说多亏了生猪交易和走私，他过得很好。我们完全不在乎，但我们又在乎很多。那个农民会告诉国王他走私触犯了法律，但他会为国王而死。在战争中我们是一个很勇敢的镇子。法国人巩固了我们镇的城防，就像巩固凡尔登的那样。

“我想带你们去看看沙巴茨。但是它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了。你们到了那里可能不会失望，但我应该会，因为我应该没法向你们介绍我年轻时在那里认识的那些人了，他们现在都死了。有的人真的既友善又古怪。我很喜欢一位老人，也很喜欢他的妻子。他靠缝制军装发了财，他做事很实在，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爱国者，不会去欺骗那些贫穷的士兵。有了钱他就可以追随他心中的狂热，对新东西的狂热，科

学、机器、人造物、现代的东西，等等。你们可能不记得了，因为你们比我们先经历了那一段对这些东西的狂热时期。一部分是因为你们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他的模仿者们，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看法，那时的我们相信美国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和工厂。我自己也有一点狂热，在他面前我谈论过这些事，所以我和那位老人关系变得很好，在那之后，他有时会让人叫我去他家吃东西，因为他去过贝尔格莱德或者诺维萨德，带回了一听蔬菜或者水果罐头。所以我常常和他还有他的妻子一起坐在乡野田间，那里长着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和蔬菜，我们咂嘴品尝着一些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芦笋酱或者芜菁味桃子，讨论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得到拯救，到时我们都住在地下城市，吃着腌制食物，在人工水箱里培育婴儿，可以永生不死。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随着年岁渐长，我已经不再对那些东西狂热，但那个老人一直坚信，而他妻子——我觉得她从来都不相信这些——只是因为很爱他，就一直追随着他。我说过他很富有，所以他能买到我们镇上的第一台缝纫机，然后是第一台留声机，然后是第一辆汽车，我们那时还没有可以开汽车的大路，所以汽车对他毫无用处，但是它让他欣喜若狂。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满足了他的热情，多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他的房子里全是这些东西。他有很多很古怪的钟，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表盘隐蔽，会发光，将时间投影到天花板上，这在黑暗中很不错，但是对我的朋友们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总是很早就上床，像狗一样一觉睡到太阳升起。他还在家里装了一个厕所，而且总是换成更新的样式。有些厕所样子很奇怪，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东西，我也不能想象发明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有些厕所里你要这样那样操作，但是为什么在厕所里你要这样那样呢？那里本来应该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清楚他要怎样做的地方。我朋友的衣服也很奇怪。他当然不穿农民服饰，但是一旦他习惯西式服装后，他也开始反对它们，比如他拥有用摁扣固定的领带以及与马甲连在一起的裤子。他妻子的衣服则被他改得更加糟糕，他让她裙子下面穿上灯笼裤。我们那里的女人那时都不穿灯笼裤，不知道什么原因，灯笼裤让她们觉得很震惊。从土耳其人那里她们知道了裤子，她们也认识裙子，但是裙子里面穿裤子，这让她们觉得不体面。老人听说胸罩后，他也让人去买来，让他妻子穿上。她是一个年老的农妇，身体非常结实，所以她的胸罩都被撑得很大，而且很明显，一点都不合身。但是，他很骄傲自己拥有一切现代的东西，所以他忍不住告诉别人说她像一个美国女人，穿着灯笼裤和胸罩，那个可怜的女人脸涨得通红，非常痛苦，因为我们的女人都很谦逊。但是她都忍下来了，因为她很爱他。

“我知道她有多么爱他，因为我开始走近她的内心。你知道年轻人都很没心没肺，所以当我长大成年，吃罐装蔬菜对我来说不再是件光彩事儿，我开始在背后偷笑我的老朋友。在索邦神学院[注]读完一年级，我从巴黎回

去看他们，我恶作剧地跟他们讲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新机器的荒谬故事。其中一些机器可能已经存在，事实上有一些从那之后确实诞生了。我记得我告诉他们一个美国人发明了一个系统，房子和火车凭借它可以永远保持同样的温度，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这是空调，现在当然是真的，但在当时只是一个谎言。然后我继续讲了更多荒谬的故事，直到我说，‘我差点都忘了，有位知名的外科医生，马特尔医生，发明了一个人造女人。太奇妙了’。我的老朋友对我说，‘人造女人？那是什么？一个人造的女人！天啊！告诉我一切！’所以我继续说啊说啊，说了很多完全虚假的东西，一点都不诚实，而我的朋友听得眼睛越睁越大，然后我看见他妻子的眼睛也睁得很大，却满是痛苦。然后我的老朋友对我说，‘你一定要帮我买一个，你一定要帮我买到一个人造女人！’他都买得起，你知道，我意识到她早知道他会这样说，所以她非常伤心，因为她知道她是他真正的妻子，但是她不能阻止他去得到一个人造的情妇。所以我说它还没做好，马特尔医生正在改善它，现在买不到它。我费劲地讲些其他东西，好让他忘记那个人造女人的事，我喝了更多梅子白兰地，假装喝醉了。但是在我动身前，他来到我家，告诉我要给他带回个人造女人，他不管那有多贵，为了这样一个奇迹，他愿意卖掉他拥有的一切。

“后来，每次我从巴黎放假回来都是这样。我去他们家，他会跟我聊一会儿其他东西，这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小男孩，他知道他一定要先跟叔叔聊一会儿天，然后才能问，‘您没忘记我的玩具火车吧？’迟早他会说，‘现在说说那个人造女人。她做好了吗？’我就摇头说，‘不，她还没做好’。我就看见他妻子的脸变得幸福、年轻、柔和。她又可以拥有他更久一点了。随后我解释说马特尔医生是一个十分谨慎、伟大的外科医生，他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很慢，追求完美。然后我举手遮住嘴巴不让她听到，跟他说某个不雅的故事，关于那个人造女人怎样在实验中崩溃掉，但是老人还是瞪大眼睛仔细倾听。她去了厨房，给我端来她最好的食物，一些特别腌制的食物或者是一块乳猪肉，她本来要把这些留给神父的，但是我说了人造女人还没有准备好，我看见她变得很喜欢我，就像母亲喜欢儿子一样。我很懊悔，不该讲那个愚蠢的笑话让她伤心。有一次，我因为吹了寒风染上了肺病，严重得好像我要像我姐姐那样死去了——她死的时候才十六岁。她来探望我，我觉得很羞愧，对她说：‘阿姨，你对我太好了。我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她眼中带泪地回答：‘你就像一个儿子一样对我好。既然有那样一个伟大的人在研究它，你以为我头脑简单，不知道那个人造女人一定早就做好了？你告诉我丈夫它还没做好，只是因为你知道我无法忍受我家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什么也没法说了。我不能向她忏悔我一直在捉弄他们，这样就相当于说她丈夫一直是个傻瓜。镇上的很多人都嘲笑他，她比他更清楚这一点，并且为了他，她很讨厌他们。我不能承认我站在他们那一边，她会觉得我背叛了她。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是亲吻了她的手，告诉她我会一直保护她的心不被那个人造女人伤害。

“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就是战争前的最后一年，所以我根本没有放假回家，我忙着跟随柏格森学习哲学，跟随万达·兰多芙丝卡学习钢琴，之后几年我成了一名士兵，家乡所有的人都被赶走了，所以似乎询问他们怎样了或者在哪儿都没有了意义。又过了好多年我才听说我那两个老朋友的遭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不仅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且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斯拉夫人的典型故事。我们是无忧无虑的人，充满了‘轻松’，直到变得像铅一样重，然后我们会无缘无故地跳进河里，如果我们的‘轻松’还没有像铅一样重，那我们会说那是为了运动，但是那就改变了整件事。你还记得吗？不，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我们都读过，在世纪末，人们相信人性变了，我们都变得颓废，我们都会去自杀。‘世纪末’，就是这个词。一切东西都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到这个国家，这个说法很晚才传到这儿，那是在1913年，也是在那时它被翻译成了德语，变得沉重、病态，让人害怕。这个可怜的愚蠢的老人听说了它，然后他明白了，最时髦的事情就是自杀，所以他自杀了。有段时间他变得非常忧郁，就像其他老人研究下棋一样研究它，然后走进他的马厩，上吊死了，就为了赶时髦，为了能有一个人造的死亡而不是自然的死亡。我觉得他可能确定永生的存在，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个自由思想家，我认为他从没想过自己死后会不再活着。他的妻子在不久之后也上吊了，但是我觉得她没有什么时髦的理由，而是一些最古老的理由。在沙巴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确实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让人悲伤的了。”

我睡着了，在一个全是镜子的世界醒来。它们在铁轨两边延伸，树篱在上面映出窄窄的影子。我们正穿过洪水区，每年多瑙河中游平原和它的支流流域都深受其害，但对我来说，我一直喜欢水，我觉得这么多水只不过是乐上加乐。之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处于纯粹的快乐中。在这段时间我半睡半醒，有时非常清楚地看到洪水在我眼前，只是我出神了，想起了其他一些我从小了解的关于死亡和毁灭的事情；有时我又陷入梦境，眼前还留着那些景色，只是加了一些幻想和梦中欣赏的风景的说不出的意义。事实上，那些景色就算不神秘，至少在外观上也令人感到陌生，这是当时的暮色带来的奇特效果。光明正远离大地，但一切都还很清晰。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当时有我们看不见的月亮在发光，被洪水淹没的田野仍然像白天一样清晰地映照出它们边缘的树篱、高地和村庄；尽管每次睁开眼睛时暮色更浓，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簇娇嫩的蓝色花朵。它们不仅美丽，还有一种超越本身的更深刻意义，至少在我睡着的时候好像是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说不清楚，也没法弄清楚，就像读一些英语诗歌的叠句时的感觉，比如“远处城郭下的铃铛”(注)。

但是此刻，在我眼前的洪水被抹掉了，彻底得就像天空中伸出一只巨手，将土撒在水面，它们开始是泥巴，然后形成了土地。那时，康斯坦丁回到

了我们的卧车包厢，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之前的离开，他的脸色紫红，眼眶湿热，他的手掌、他的声音、他那短短的黑色卷发似乎都在控诉着命运。他坐到了我还在睡觉的丈夫的脚上，然后说："在这趟火车上，我碰见了我这辈子第一个真正爱过的女孩。她是我们沙巴茨镇上的人，我们曾结伴上学，然后等我们长到懂事的年纪——在我们塞尔维亚人中间不算太晚——我们彼此完全相爱了。现在的她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她眼睛下的细纹比你还多，但还是可以看出她过去确实非常美丽，而且她现在还很健康，我们的女人有时就是这样健康，我母亲也是这样健康——这对她的丈夫好，也对她的孩子好——甚至还有一点强壮。你知道我母亲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如果我能在战争前娶到这个女孩子，然后战后回到她身边，那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事，因为从战场上回来后我有过一段可怕的日子，如果有一位这样好的女人陪在我身边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她不要我了，尽管我们相爱了两年，在我离开沙巴茨去索邦神学院的时候，她很高兴看到我要离开了，去巴黎的路上我很高兴，这看起来不错，而且理应如此，我作为男人要离开她这位女人，去很远的地方，有新的冒险。但是我知道其实并不是那样，她已经厌烦我了。我没有给她写过信，因为我害怕她不会回信。

"但是现在，我在火车上又看见了她，我知道事情发展成这样很惋惜，我对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年轻的时候，长相英俊，父亲也很富有，你已经知道我是一个诗人，并且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神童"，但是你不要我了，尽管我觉得你曾经爱过我。是什么让你那样？'刚开始她不肯告诉我，但是我问了她很久，然后她说：'唉，你烦了我这么久，我告诉你吧。你什么都太多了！你比其他人说得更多，当你弹钢琴时也比其他人弹得更多，你爱起来也比别人爱得更多，什么都是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现在是我不明白了。我谈论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见过很多有趣的事情，一百个人中都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见识过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你丈夫就没有见过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钢琴弹得很好，当我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对任何女人来说，和我在一起是一次充满热情的经历。而且你一定要问问我亲爱的妻子，我是不是对家人很好，我是不是为我的孩子做了一切事情。行了，这些都是好事，为什么说我做太多了？我确定她一开始爱我，当她在这火车上看见我的时候她很高兴，她的眼里闪烁着喜悦。可为什么那时候她变得厌倦，让我去巴黎，让一切结束呢？为什么她现在生气了，告诉我说太多了？我只与人为善，只想做个温和幸福的人，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敌人？我要回去问她，因为她说的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不合情理的，而她是个很通情达理的女人。"

等他走了，我的丈夫叹了口气说："康斯坦丁这老伙计。我一辈子都没有坐火车的时候碰到过我过去爱的哪个女人。实际上，最接近的一次是我有一次到诺福克去探望我过去在阿宾汉姆学校时的舍监。那确实很惬意。但

是真的我宁愿就这样了。在我看来，爱人相见最恰当的地方是火车终点站，而不是火车上。”“然而，现在是我跟着你一起旅行。”我提醒他。“是的，亲爱的，是你。”他闭上眼睛说。

过了一会儿，我也睡着了；等我醒来时他还在睡觉，那时已是深夜，一位乘务员告诉我已经快到贝尔格莱德了。我们装起书籍，收好行李，然后去找康斯坦丁。他之前在另一个卧车包厢的角落睡着了，现在半醒着坐在那里，他的手指插进他那浓密的黑色卷发中，对着天花板上的灯微笑。他提到的他爱过的第一个女人不见踪影，他说："我醒来的时候，想起还在巴黎读书时发生的一件妙事。有一次，柏格森在上课时讲起了比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过现在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我觉得你可能没听说过他，因为你是一位银行家，而你的妻子当然更没有听说过。柏格森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去读他，他只是稍微讲起了他，就像他随意地转了一下手上的钻戒一样。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索邦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坐下阅读，柏格森也来到了图书馆，他经常来图书馆工作，他从我身边走过，弯腰看我在读什么。当他看见是什么书的时候，他微笑，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这样，我做给你看。”他从他那浓密黝黑的卷发中抽出他那胖乎乎的手，动作中有一种真正的美感。“这件事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把它从我这儿夺走。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有很多敌人，但那时我在巴黎，那本来就是一种不可能的荣耀，而且柏格森摸过我的头。”他坐在那里，脚放到地板上，脚趾向上翘起，眨动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有着一种永远不会被夺走的快乐。

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跟其他任何地方的大火车站一样。从一个充斥着浓烈地方特色的世界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特色、非常国际化因而令人熟悉的地方，这种感觉非常奇怪。拱顶上的灯发出无色的光，灯下站着康斯坦丁的妻子格尔达，一位结实的中年女性，她有着典型的德国人外貌，浅色的头发茂密却不成形，灰色的眼睛颜色很淡又很清澈，看上去好像是那些只是为了装饰房子、几乎隐蔽不显的空空壁龛。她穿着灰色的外套和裙子，戴着一顶德国风格的小帽子，在匆匆走过的黑压压人群中，她站在那里，好像对自己很满意，因为她以自己的与众不同为荣。我们从火车里走出来，康斯坦丁跑过去拥抱她，而她从他的肩头对着我们微笑，带着顺从的快乐。然后她跟我打招呼，我的丈夫被介绍给她。这就像是在汉堡或者柏林举办的茶会一样，带着一种只有德国人才有的傲慢的、给人压力的氛围。不是尊贵，任何对那种气派最轻微的冒犯都被认为是愚蠢的行为；不是简单，家具、衣着和食物上都要求投入大量细致的工作；也不是法国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因为那需以技术为基础，一个人要想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定要集中才智，冷静稳定地对待。而参加这类茶会的人却根本无意关注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抱着一种态度，认为只要有可观的支出，他

们就应该买到被别人服侍的权利。然而他们，包括格尔达，没有什么为之狂热的东西，他们只是想要大众都尊重的东西，比如连贯和稳重。这是积极的特点，它的积极甚至让人印象深刻，和消极的一面结合成了一个动态的整体，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康斯坦丁和我丈夫去找一个丢失的手提箱了，我和格尔达站在一起，陷入一种温和不安的沉默。她从我的手上拿过我的书，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递回给我，轻轻摇头，嘴角含笑，带着同情的轻蔑。那本书是佩兴斯·肯普的《治疗仪式》，关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民间医学研究，它描述的一些处方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早期以及基督教之前的神话，还有拜占庭、希腊和东方文化。我对格尔达的神情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好的书，于是我问她："你读过它吗？""没有，"她说，再次微笑和摇头，"但是我不相信它。我不是一个'神秘论者'。""但是它完全不是那种书，"我说，"它的作者是斯拉夫语言研究学校的毕业生，她同时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她游历全国去收集传说和习俗，然后分析它们。"格尔达继续微笑，沉浸在优越感带给她的满足中，因为她想到肯普小姐的诗意幻想和我的轻信。"但是这是一本伟大的研究著作。"我坚持说。肯普小姐明显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不在乎格尔达怎样评价我的智商，但是对我来说，没有读过一本书就批判它——尽管读过这本书的人提出了正面保证——还坚持自己的判断，这是违背常理的行为。"它的出版商是一家叫费伯的出版社，"我继续说，"他们不会出版你想象的那类书。"她转了九十度，不再面向我，她的微笑飞腾到我们上空：我能看见她的灵魂，因为想到我、肯普小姐以及费伯出版社的愚蠢而飘浮起来，不断地上升、不断地延伸，直至填满整个火车站高大的拱顶。抛开现实的约束，它没有理由不这样。

---

1. 巴黎大学旧称。

2. 该句原文为：the bailey beareth the bell away。

贝尔格莱德I

我们正在房间里吃早餐，一个女服务员有事走了进来，她是那种肤色灰白、头发黝黑的女人，这种女人在白天也像浸润在月光下一般。我们认出了对方，开始热情地交谈。她叫安吉拉，是斯洛文尼亚人，去年我在这家旅馆住的时候患了登革热，那时她对我很好。她是个非常最温柔可亲的女人，却也有一种最奇怪的歇斯底里。也许跟她幼时经历的战争有关，她是一个最纯正的排外主义者，她觉得除她种族之外的任何种族都让人恶心。但是她又不想对她的人类同胞有着爱以外的感觉，所以她把对他们的憎恨转化为一种信念，她认为他们都散发着某种令人极其不快的强烈气味。这种信念让她作为一个旅馆女仆的生活变成了一次非凡的嗅觉探险，因为这个旅馆经常有各个国家的人入住。她摇摇晃晃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去完成工作，铺床的时候几乎需要戴上防毒面具。她的政治信念让她对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印象很糟糕，所以对她来说，这些人闻起来像是肥料堆，像是煤气罐旁边的空间，还像是皮革制造厂。尤其是希腊人。当她讲起自己在一个套房中的日常工作，里面住着一个年轻富有的希腊商人，她的脸上会表现出一种痛彻心扉的生理恐惧，就好像一个矿工讲起了可能会引发灾难的瓦斯。对她来说，匈牙利人虽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却并不会让人不快，只是和人类应该呼出的气味极其不同罢了。但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绝对让她的鼻腔非常讨厌，法国人闻起来则邪恶而令人困惑，我猜想可能就像一个乡下女人在药剂师商店里闻到气味时的感觉，因为她几乎不知道眼前那些商品的用途。

国家越遥远，她就知道得越少，也因此闻不到更多味道，所以对着瑞典人和芬兰人，她那可以闻到各种气味的鼻子就失灵了。为了测试她，我告诉她我不是真正的英格兰人，而是一半苏格兰血统、一半英格兰与爱尔兰混血血统。这扰乱了她的注意力，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苏格兰人或者爱尔兰人，所以听到我对苏格兰人和波斯尼亚人的相似性解释后，她立马就站在苏格兰那边，马上觉得英格兰与爱尔兰混血就像是斯洛文尼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当中的奥地利或者匈牙利地主，或者是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当中的土耳其地主。她一边给我铺床一边大声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闻起来像什么了。”那总是某种珍贵却模糊且不被大众欣赏的气味，比如一些罕见草药，又或者是一些用途很少的木头。但是这种比喻让人有一点愉快，因为她相信苏格兰人像波斯尼亚人。不管我或者其他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闻起来怎样，她的努力并不让人讨厌，因为旅馆里那些外国客人散发出的难闻瘴气被驱除掉了，被精心地换成一种香味，比玫瑰花苞或者药草园的香味更浓烈，因为那是想象出来的气味，它弥漫在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住的房间。

“现在我到了这里，看到这个旅馆不错，而且这里的人都很友好，对你生病心里感到好受一些了，”我的丈夫说，“但是我在报纸上读到你在贝尔格莱德的一间旅馆中生病了的时候，我还没收到你的信，那太可怕了。我想到的是维也纳人说起的贝尔格莱德，大地的尽头，一个野蛮人的村庄。”“很抱歉当时我试图向你隐瞒这件事，”我说，“毕竟那时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病情时，我也很吃惊。因为它说我那时被两个医生治疗。但是每天都有三位先生进来，揭开我胸前的衣服，然后将头靠在我的胸上，我希望他们都是专业医生。总的来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我是在这里生病。那时我体温很高，觉得很难受，安吉拉和另外两个女仆还有一个男仆来到我房间，站在床尾哭了几乎一个下午。我的护士也哭了很多次。我非常庆幸。”“但是你总是说自己讨厌吵闹。”我的丈夫说。“我确实讨厌，因为当我痊愈后我会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我回答说，“但是当我生病时，那是唯一可以鼓励和触动裹在毯子里的我的事情。死亡是一个悲剧。它可能会在下一刻变成其他东西，但是在那之前它意味着离开太阳和春天。我坚信如果我在四十岁出头就死去的话，这对我和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一个悲剧，所以那些脆弱的人因为这样一个可能性而号啕大哭，忽视那些更健壮的病人正在按铃，这合乎常理。我很确定，比起躺在疗养院，每个人都假装一个人人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刻并没有发生，倒不如在一个小屋中死去，周围的人因为要失去一个人而痛哭，并为他的逝世感到悲怆，这样更令人振奋。”

“我明白了，”我的丈夫说，“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人们都那样做的话，他们将不能承受耐心照顾久病之人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长远打算，”我说，“而且我不相信它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比短期打算更有优越性。记得有一次我跟两位英国女士一起在希腊散步，其中一个是讨人喜欢的迪莉斯·鲍威尔，我们去看海美塔斯山山脚某地的一只大理石狮子。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些农民正在重新粉刷一座小教堂，那座教堂是为纪念一位基督教圣徒而建的，他把这只狮子（事实上这只狮子很古老，比任何基督教圣徒还早了几个世纪）变成大理石。他们正从教堂离开，突然有个人惊恐地停住了脚步，那里，路边的草很高，他低头看，然后大声向同伴叫喊，他的同伴也低头看，然后也大声喊叫。有的人跪在地上，有的人跑回教堂，又拿着东西回来了。我们走到那儿，发现第一个农民停下脚步是因为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昏倒了，老人又饿又渴，疲倦不堪。有个农民给我们解释，老人是那种‘没有谷物的人’，是不知什么原因而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在乡间流浪，希望能被人雇用。他尴尬地说，英国女士们可能觉得这难以置信，这种人竟然存在，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在希腊这样的贫穷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发现这很令人尴尬。但是我忘记了这点，让我觉得高兴的是他们对老人表现出了令人愉快的善意，他们把外套和披风折起来，让他睡在上面，把酒瓶和面包递到他的嘴边，大声说，他在这样的天气里还要四处流浪，还没有食物，真是太糟糕了。

“然后我的一个同伴说：‘对，他们就这样，刚开始对有困难的人非常友善，但是他们就像孩子，很快就厌倦了。有个人在雅典英属殖民地发烧生病了，那时他正在山里散步，有些农民把他带回家，精心照顾了他几天，然后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我觉得有些不快，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古老传统和文明习性之间的不同。短期疾病比长期病痛更多，至少在一个人可能要依靠陌生人的情况中；对我而言，严重疾病比慢性痛苦更需要同情，因为后者给了人时间来防御。那确实是让我觉得苦涩的东西。在我跟你结婚前，曾经有两次，我亲密的朋友写信问我近况如何，以及我有什么计划，我只能回信告诉他们一个极其特别的灾难降临到我身上，就像是一个邪恶的继母冬天派我去树林里，命令我要采一篮野草莓才能回来，极其痛苦。两次我都没有收到她们的回音。之后，我见到了我的朋友，她们每个人都告诉我听到我的消息时非常震惊，却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表达同情，而且她们叮嘱我一定要记得她们是我的朋友，直到永远。确实那两个女人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但是这只给了我一种变味了的愉快，它让我知道那两个很熟悉我、和我相处很好的人，没有因为我的信想到做点什么来救救我，那时我都快要寂寞痛苦死了，而且这种不能让人振奋的关系很可能要持续一生。对我来说，如果有人大喊，说我这样不幸福、非常可怜，那样对我好多了，就像那些农民发现路边的老人时做的那样。”

我的丈夫说：“我很好奇。我确实很好奇。这大概跟经济学有点关系。”“究竟是什么？”我嘲笑地说。“我很受触动，你的朋友们也很受触动，因为我们害怕过度的情绪，”他解释说，“我相信这是因为西方人总是像考虑物质财富一样考虑个人情绪。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人一点一点地攒起钱，如果花掉了它，那就可能再也没法得到它了，因为他赚钱的环境可能不能再重来，而且无论如何他都要用很长时间来积攒资本，所以考虑到人生短暂，一点点奢侈都可能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财产损失。但是一个农民的物质财富来自土地；他知道，就算他某年很浪费，夏天和秋天都会给他以补给，甚至干旱、冰霜、洪水的危险都不会严重到像资本和收入的巨大不平衡，以及为此要做的大量的节衣缩食。因此即使是一个富有且慷慨的人，可能在花销上比一个贫穷节俭的农民还要焦虑。我想，就因为这样，我们西方世界的人都有节省支出的本能，而农民没有。我之前觉得安吉拉和那些侍者在你床边哭泣是种错误行为，这种想法真的完全没有逻辑基础，只是一种愚蠢的情感转移跟困惑罢了。”“但是有实际的便利，”我说，“因为我们在城镇不能像在村庄里那样大声号叫、恸哭、悲泣。想想那些去了巴黎的外乡人，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那是最恐怖而不是最不恐怖的城市，就是因为巴黎人在争吵伤心时表现得好比是些住在只有三十栋房子的小村里的居民一样，哭泣声在那些高楼、人行道上回响，夸张得如同地狱。”

电话响了起来，我丈夫接起来。他放下话筒说：“康斯坦丁的妻子要上来

看我们。”我在梳妆台前坐下，开始在脸上搽粉，眼睛却瞥着窗外的景色。贝尔格莱德坐落于多瑙河和支流萨瓦河之间的山脊上，而塞尔维亚国王旅馆更是在山脊高处，所以在街道对面的公寓楼群和房屋之间，我看到了平静的洪水。侍者拿走了我们的早餐盘，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他说：“是啊，真可惜，你们吃不到新鲜鱼子酱了，因为现在水位太高，他们抓不到鱼。”我丈夫说：“什么？你们有鱼子酱？”“你最好点一份，”侍者回答说，“在哪里你还能吃到这种鱼子酱呢？众所周知，塞尔维亚有世界上最好的鱼子酱。”

在他走后，我们都为他那番爱国话语感到高兴，我终于记得要给我丈夫看一首诗，我发现一位塞尔维亚作家米切奇在自己的书中对它有所引用：

塞尔维亚的天空是湛蓝色，

坐镇主场的真实的塞尔维亚神，

周围的塞族天使纯净的声音，

歌唱他们伟大的种族的荣耀。

格尔达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大笑着读诗，我们又重复给她听。她微笑着说：“所以，你已经喜爱上了塞尔维亚人？”“完全没有。”我说。“那样很愚蠢，”她说，“你不可能喜欢愚蠢的人。”“不，我们可以。”我丈夫说，坚信我们的权利。

似乎这个话题不能顺畅地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说起其他事情；过了一会儿，按照迷人的德国礼节，她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跟我握手，感谢以前我从伦敦寄给她的一只手袋。然后我们给她看了一些在波斯尼亚买的东西，其中有一幅波斯瓷砖画，上面是一位王子骑着白马，小心翼翼地拿出水果给一只小鸟，小鸟也小心翼翼地伸出喙接住，背后风景很是精致，还有一件用金线织成的外套；这一切都很愉快。片刻之后，我们升华到了一种特别的德国式满足中，那种我在火车站时提到的格尔达身上的满足感，对此我丈夫倒是很自在，因为他在德国生活了很久，但是我就觉得极其不舒服，因为我不理解这种感觉的根据是什么，我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去破坏它。在现在的场合，我觉得，它的根据是我们是一群被选中的人，我们是鉴赏家，能够鉴赏一些很多人完全不能欣赏的作品，而且我们能从这种享受中得到安逸。她看起来很幸福，变得更年轻了，我想起了康斯坦丁夸耀过她的美貌。突然，我记起了友谊和友谊之美，在伦敦或者其他首都很难有这样的友谊，因为那里的人会因为过分亲密的关系而痛苦，然后我意识

到对于这个远离家乡的德国女人而言，她一定对能够和我的丈夫交谈感到很欣慰，他的德语很地道，和她不相上下，因为他在汉堡学习德语，而她来自不来梅。

想到这些事，我在谈话停顿的时候说：“在萨拉热窝我们见到了康斯坦丁很多旧友，他们都很爱他，这着实让人高兴。”但是格尔达没有接话。我丈夫以为她没有听见，开始列举我们在波斯尼亚遇见的家庭或个人，以及他们对我们说过的一些关于康斯坦丁的真实故事。她还是无动于衷，似乎她在隐藏某种痛苦的情绪；我的丈夫害怕她以为康斯坦丁的那些朋友对她不友好，就说：“而且那些见过你的人都提到很后悔没能多见见你。”他如实地告诉她，布尔布尔的父母还特别热心地问起了她，康斯坦丁和她去波斯尼亚度蜜月的时候，那对老夫妇还在特拉夫尼克招待过他们。格尔达耸了耸肩说：“我不记得他们了。”“真可惜！”我大声说，“他们是一对很棒的夫妇。”但是在我准备讲更多他们的事情之前，她打断了我，仿佛我讲了太久让她无聊的东西一样，冷淡而疲倦地问我：“我是在十二年前见过这些人的，我怎么可能对他们感兴趣？”她不耐烦地安排我们那天下午去她家喝茶，然后很快起身离开。

“我不明白，”我的丈夫之后说，那时我们从旅馆出来，走去它旁边的卡莱梅格丹城堡，那是贝尔格莱德的一处美景，而且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公园之一，“通常妻子或者丈夫都会很高兴知道伴侣有很多朋友，哪怕是出于表面或者世故的原因。当然，除非他们彼此讨厌。你觉得格尔达讨厌康斯坦丁吗？”“我不知道，”我说，“康斯坦丁觉得她很喜欢自己。当然，如果她愿意的话，她一定能让你觉得她很喜欢她的丈夫，而康斯坦丁当然很喜欢她。”“我知道了！”我丈夫大声说，“我提到的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真奇怪，现在的德国人真是充满各种暗示。”“就像哮喘一样，”我说，“突然之间他们的灵魂就喘不过气来了，你就得记住，那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过敏。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她和我们在一起时很高兴，我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就像在她自己的国家被认可的群体一样。突然我们谈起了康斯坦丁的朋友，我们抛弃了我们的阵营，去了敌人那边，我们站在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那边，而这些人的怪异一直让她深感苦恼，让她的流亡充满苦涩。”“对，真可惜她不能调整自己的情绪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我的丈夫说，“她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谴责无疑就是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结构。不过这没关系，她可能还是一位很好的女性，而且有很多优点。”

我们现在到公园了，它的魅力让我们放下了刚才的事情，就像好的公园理应发挥的作用那样。我们穿过一块区域，在所有公园里都常见的那种区域，不管哪里的公园，在那里都有保姆们看着她们的孩子在紫丁香花丛、池塘边以及已故伟人的半身雕像旁玩耍，而尚在人世的雕像原型就坐在保姆身旁的长椅上写作或者阅读一些从发亮的皮质文件夹中拿出的书。然后

有一片精心设计的花园，中间有一座巨大美丽的雕像，那是梅斯特洛维奇创作的，献给大战中在南斯拉夫战死的法国人，它展现了一个沐浴在勇气海洋中的人物形象。很多人可能想要把它挪走，换成一块更温和的大理石。但是这座公园令人愉快之处就是这样一种创新，它没有赢得将残酷挪出大门的权利。因为这是贝尔格莱德一座古老的堡垒，而在贝尔格莱德，直到大战结束前和平都只是一场梦。

自从这个地区有人类存在以来，这个海岬一定对那些抓住了它的人意味着生，对没抓住的人意味着死。岬首伸至两条大河之间，朝东俯视广阔的潘诺尼亚平原（我所知道的最平坦的平原），平原穿过匈牙利一直延伸至欧洲中部。在它后面，是起伏的乡村和森林。在这里，当然不是最开始的时候，伊利里亚人建造了一个高台来抵抗罗马人，最后被赶出去了。在这里，罗马人建造了高台来抵抗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最后被赶出去了。在这里，斯拉夫人联合匈奴人，却被他们压迫，然后在拜占庭人的统治下享受了一段短暂的和平，但是又被匈牙利人入侵，直到拜占庭和匈牙利之间的战争将一支胜利的希腊军队带到这块岩石脚下。之后，塞尔维亚人来到这里，创造了尼曼雅王朝时期的帝国荣耀；在这里，心胸狭窄的塞尔维亚国王们没能守住那份荣耀，对土耳其人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但是匈牙利人，带着典型的基督教的轻浮，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都宣称拥有这块地方的主权，不断骚扰塞尔维亚人，从而导致他们不能回击土耳其军队。因此贝尔格莱德在1521年落入苏莱曼大帝手中。五年后，匈牙利人缴付了赋税，那时，土耳其人在莫哈奇打败了他们，然后奴役了他们一百五十年。后来，形势逆转，疯癫的卡拉·穆斯塔法，当时的大宰相，在维也纳城外战败，被带到这里，勒死于此。随后，在1688年，奥地利人将他们扫除出去，占领了堡垒，但是两年后又失去了它，它一直没有被重新占领，直到1717年萨沃伊的欧根亲王得到了它。

这就是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就跟欧洲历史的其他章节一样，让人想知道，人类像一个疯狂的中世纪医生那样习惯让自己流血，在这过程中失去了什么。但是，也许我们错过的也没有什么被浪费。那些被保留下来绽开花苞的，经常开出非常可憎的花朵。在1739年，通过一个可怕的背叛性条约，奥地利人将贝尔格莱德和它的塞尔维亚居民交给了土耳其。然而，这对塞尔维亚人并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的灾难，因为他们一直被奥地利人压迫统治，很多人已经逃到了土耳其境内，尽管他们在那里的境遇也只是稍好一点而已。

然而，在1792年，奥地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签署了一个条约，给了塞尔维亚人一些好处，当然他们制定这个条约只是为了自身安全。按照条约，任何土耳其禁卫军士兵都不能被招入贝尔格莱德或者其他任何塞尔维亚城镇的卫戍部队。这样是为了避免奥地利的边境在战时被直接侵略，实际上是强

加了一个无人区给塞尔维亚。但是，对塞尔维亚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从统治军队阶层的无约束暴政下获得了解放。接下来几年，哈吉·穆斯塔法帕夏开始统治这里，他是一位难得一见的表现出殖民统治才能的土耳其人，深受他的基督徒爱戴，因此他以“塞尔维亚人的母亲”闻名，这是一个古怪的头衔，由一群极其军事化的人赠予另一群军事化的人中一个长着胡须的代表。但是，由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这个条约变得无效。土耳其禁卫军又回来了。他们用计潜入堡垒，谋杀了睿智的哈吉·穆斯塔法，又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奸淫掳掠的暴政。

为了反抗他们，“黑乔治”卡拉乔尔杰，王朝的建立者，一位天才的养猪农民，在1804年发动了起义。他率兵围攻了这个堡垒，堡垒最终在1806年移交给他。他在1810年攻陷帕拉钦和克鲁舍瓦茨，解放了整个国家。但是在1813年，塞尔维亚与俄国结盟共抗土耳其，随后被没帮上什么忙的俄国背叛，土耳其人又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们对卡拉乔尔杰的起义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们屠杀了所有没来得及躲进舒马迪亚避难所的男性，舒马迪亚被叫作“树林之地”，位于贝尔格莱德南部，覆盖了塞尔维亚古老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很多妇女儿童沦为奴隶。但是之后，另外一个塞尔维亚人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领导了起义，他说服俄国人支持他起义对抗奥斯曼帝国。起义成功了。太成功了。俄国不想塞尔维亚自由，而是想将它纳入俄罗斯沙皇帝国的版图。但是塞尔维亚人表现出了足够的斗志，贝尔格莱德不可能被误以为是自由的塞尔维亚首都以外的任何东西。塞尔维亚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了。为了防止它过于自由，它被强迫允许土耳其军队的一支卫戍部队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堡垒。

这引发了很多暴力事件。不可能不这样。强国总是来到这里，将暴力事件变成受伤和屈辱，有时是出于贪婪和卑鄙，有时是出于纯粹的愚蠢。他们的罪行从1862年6月英国人的举动中可窥一斑。6月的一天晚上，两个坐在喷泉前的土耳其士兵和一个塞尔维亚年轻人发生争吵后杀死了他。在接下来的混乱中，一位塞尔维亚警察被杀死，另一个受了伤。这引发了持续整晚的种族暴乱。塞尔维亚内阁、外国领事以及土耳其帕夏聚在一起商量措施停息暴乱。据说，本来要恢复和平了，但是要塞中的卫戍部队突然对贝尔格莱德开火。这个不幸的城镇被轰炸了四个小时。直到外国领事勇敢地将他们的帐篷驻扎在城镇和要塞之间的斜坡上，炮火才得以停息。在这之后，英国外交部采取了一个愚蠢得让人难忘的措施。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约翰·罗素勋爵认为这次暴乱的起因是塞尔维亚人违反了他们对土耳其的条约义务，所以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那就是奥地利应该入侵塞尔维亚。幸运的是，意识到此刻最为危险的奥地利没有派兵。记得在四年后，英国利用自身影响使土耳其宫廷从塞尔维亚撤兵，这是一大慰藉。学习英国政治的外国学生一定会很困惑地发现，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因为一个保守党政府取代了自由党政府。

但是这次撤兵还是没有给要塞带来和平。前面是虎视眈眈的匈牙利和奥地利，身后是垂涎欲滴的俄国。两边都想从垂死的奥斯曼帝国手上夺走巴尔干地区。当年轻的塞尔维亚试图安抚奥地利，俄国勃然大怒。在它的暴怒下，它资助保加利亚人对抗塞尔维亚人，让他们对巴尔干的统治权充满希望，从那以后，国际局势变得复杂、令人苦恼。之后，列强在柏林会议上会面，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送给了奥地利帝国，塞尔维亚变得无助。1905年，塞尔维亚为了抵抗奥地利的经济入侵，发起了一次关税战，也被称为“猪战”，并且同保加利亚人组建了海关同盟。因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怨恨与日俱增，直到1914年普林西普的子弹成为中欧盛怒的催化剂，然后奥地利从多瑙河轰炸了这个要塞。1915年它被奥地利军队占领，直到1918年才重获自由。现在，它的城墙以及缓坡斑斓的蓝粉砖墙后藏着很多小小的花园、古老的半月堡和长满堡垒的三色紫罗兰、郁金香、勿忘我。这是我知道的最美丽、最勇敢的乐观主义：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南斯拉夫人留着梅斯特洛维奇创作的雕像是聪明之举，为的就是提醒他们同类的愚蠢暴行。

在卡莱梅格丹城堡还有另一个梅斯特洛维奇创作的雕像。它是南斯拉夫自己的战争纪念碑，一个荣耀的裸体人物。没法将它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站在岬首一根圆柱的顶部，远远高出水平面；人像后背对着城堡，这是观众所能看到的全部。这不是雕塑家的本意，也不是为了某种象征意义做出的牺牲，尽管这样很贴切，南斯拉夫军队之魂就应该朝外警惕和警告匈牙利、奥地利。它被这样放置是因为这个雕像明显是男性，所以贝尔格莱德的市政当局拒绝把它放置在城镇街道中，理由是它可能会冒犯端庄的女性。但是塞尔维亚人并不仅仅是过分守礼的农民，他们还是艺术家，他们了解手工艺，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塑造一个男性形象时，把它塑造成真正的男性是很自然的事；议员们因此觉得没有哪个清教徒会讨厌这个雕像，而他们农民般节俭的本性告诉他们，知名大师用昂贵材料精心雕刻的雕像被扔掉的话是缺德的浪费。于是它就被放到上面了，臀部在正面。

它看上去很美丽，周围的景色映衬出它的轮廓。现在所有的风景都在洪水覆盖之下，就像一个人正在沐浴；大地的脸，也就是树木和房屋，都在水面之上，但是大地的身体被完全淹没。卡莱梅格丹城堡的岬首下有一段开满紫色丁香花的斜坡，洪水甚至正危及斜坡之下的低处平台。但是那里低处的灰色兵营里面还住着人；在一个操练场泛着珍珠光泽的地面上，一大群士兵三三两两地走着路，他们戴着哥萨克帽子，猩红色的马裤上面是长裙式的长外套。这个场景就像芭蕾舞的开场，因为每个人都训练有素，身体完美地挺直。在大院中有两个鸽舍，一个是悦目的淡翡翠绿色，另一个是土褐色。有时，一些士兵会在某个鸽舍下面停住脚步，大喊或者拍手，这样鸽子们就拍打着翅膀呼啦一下飞了出来，飞过一段低低的拱桥，落到一个波纹形的铁皮屋顶上。但是大部分时候，这些年轻人四处散步，他们

交谈时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密，但那没有同性恋的色彩，而是一种比我们在西方知道的更激烈冒险的男性友谊。看到他们，就能理解军队的各种密谋，那是塞尔维亚在过去五十年的特殊难题。

现在，洪水表面分成了多股汹涌的波浪，阳光刺破灰紫色的云层，照耀在波浪上，波浪看上去成了一根根粗糙、颤抖的银条。我们浑身发抖，躲进堡垒中。堡垒巨大。它的建造遵循了东方传统，即要求统治者用住所的面积来象征他的伟大。南斯拉夫政府因为没时间或者没钱，还没有接管它的某些部分。迷宫般的走廊和小房间还保留着土耳其人七十年前离开时的样子；在其他部分，有军械库、兵营、办公室、网球场和一间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一个令人感到恐怖和费解的展品，就是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被暗杀时乘坐的汽车。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当局会让它留在这个国家。那是一辆老式汽车——1934年时已经有七年车龄，在一次撞车后被粗略地重装了车身——它最早被用来运输那些阶层比较高的囚犯。据说，法国司机抗议过开着这样一辆破铜烂铁的车来接送国王。这辆汽车确实应该在贝尔格莱德，因为它完美地代表着西方列强对待巴尔干地区的方式。在堡垒靠近陆地一侧，还有一个可爱的惠普斯奈德式的动物园。灰色天空映衬出鲜花和动物的颜色：一头雄狮和一头雌狮在像黄宝石般闪烁的溪流边饮水。但是这没有用处，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回到了旅馆。

贝尔格莱德II

我们午饭吃得太多。在贝尔格莱德很容易养成这个习惯，只要你够胆量去吃当地农家食物，那些食物因为城市慷慨的供应而非常丰盛，还带有土耳其传统的纯正风味。这里的汤、炖肉和意大利调味饭跟我知道的任何别的地方的一样好。坐在桌前的人都吃着来自同一个厨房的食物——丰富的食物，不太好消化，但一点都不会味道寡淡。其中有些食物确实很不好消化，不知道是什么食材，肯定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精致的菜肴中。据说贝尔格莱德是欧洲谍报事务的中心，这里有些人可能就是间谍。我们正在吃鸡肝烩饭，其中一个有此嫌疑的人走到我们桌前，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以前在维也纳的一家夜总会见过他。我想起了我们的见面，我问他在奥地利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我来自西班牙，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发财。"他还说："我希望给这里带来一场斗牛赛，但是牛不肯来。"这当然不是指什么惊人的动物灵性，而是说这动物从有斗牛的地区被运到没有斗牛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海关官员值得注意的态度变化。这可怜的牲畜在旅程开始时是一个生命荣耀的象征，因为有望以牺牲的方式死去，旅程结束时则像一个堕落的女孩，被主张不流血的人道主义者给拯救。今天，我问了这个意大利人一个相似的问题，他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回答。"我要拿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采矿许可证了，"他说，"波斯尼亚的一个黄铜矿。""但是，"我想，"黄铜，它不肯来。"

这个人是一个冒险者，和大部分西方冒险家有同样的理由：他太虚弱、太愚蠢，不能适应普通生活的套路，不能融入那些真正重要的生意人之间，那些人包括实业家、金融家等，要是波斯尼亚的采矿许可证真的有价值的话，他们早就拿到手了，在这个旅馆也可以看见他们正在吃午饭。但是那些正在桌上给他们提供国家资源的南斯拉夫本地人看上去也像冒险家，尽管是出于另外的原因。他们会偏离因为商业需要而制定的严格道路，因为他们日常生活太积极，而不是太消极。他们身强体壮，畅快吃喝，肆意欢笑，所以刚到中年他们的脸上就跟演员一样满是皱纹。中午时分，在这个旅馆或者贝尔格莱德的其他大旅馆里都能见到这些南斯拉夫人，他们表现出的活力与英国人的聚会形成了惊人对比。英国人，如果他们恰好精力充沛，通常会用他们的礼仪来否认这一点。这些南斯拉夫人一辈子没有体验过身体疼痛。然而，所有相关的历史因素理应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南斯拉夫人都肯定参加了最可怕的战争，而四十岁以下的所有成年人都在童年经历了贫困和危险，而这些从来没有危及过法国、英国或者德国的孩子。

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些英国外交官——通常是一个柔弱阶层中的柔弱之人

——会讨厌在巴尔干人中担任职位，但是我也能猜到另外一个他们讨厌此事的原因。这些南斯拉夫人不仅身体很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精力充沛地行动，而且他们会采取何种形式的行动也完全无法预测。在南斯拉夫的村庄，你可以看出农民们旺盛的精力，可以预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可能在情绪和情绪表达方面极具个性，但是他们遵从经验的传统。而在这里，你就不能确定了。在旅馆餐厅中的这些人并没有在任何共同的准则下团结起来。这让他们有着野生动物般陌生而神秘的性格：在卡莱梅格丹城堡溪边饮水的雄狮和雌狮的感受和思想都比这些快乐健康的人更可知。我徒劳地问自己："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也问了自己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对自己无法完成之事又会有何感想？"我记得那些生活在巴尔干的英国人曾告诉过我，在这里，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不诚实和谨慎、粗俗和精致、贪婪和慷慨，政客在同一天而不是他们事业的不同时段同时在爱国和盗用公款上登峰造极，一个人能从容不迫地施行酷刑和杀人，并突然转向最温和的慈善。这当然意味着，不仅是我，南斯拉夫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还不够熟悉。一定是这样，因为就在三十五年前，塞尔维亚还没有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那样规模的城镇。因此，南斯拉夫人不能被责怪，如果他们还没有想出一种行为传统来适应这种环境的话。

要过城市生活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关于这点，我们之后看到了更多迹象，那时我们外出观看儿童游行。每年的这一天，4月24日，儿童们都会列队前进，顺着贝尔格莱德的山脊，穿过街道来到位于公园附近的大教堂里接受牧首祝福。我们站在中央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周围是一群着迷的父母，以及疲倦的哥哥和姐姐，他们因为年纪太大，不能参加游行，还有活泼可爱、上蹿下跳的弟弟妹妹，他们不能参加则是因为太小，所以大部分都得到了气球作为补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担忧，因为每个小孩都穿着为了这个场合买的新衣服，而头顶上方最糟糕的春天天气正单调乏味地变化着，有时会下一阵黄豆大的暴雨；游行队伍已经迟到了四十分钟。

然而，每当人群中有一个小孩没抓住气球时，这一切就都被抛诸脑后，我们看着气球缓慢升起，就好像在考虑自由的好处，越过清扫过的街道两旁宽阔的水沟。然后我们都大笑起来，而当气球常因风力不足，摇摇晃晃落到马路对面的人群头上，然后它的主人又去拿回它时，我们就笑得更大声了。其中有一次这样的失而复得特别有趣。一只红色的气球被吹得比其他气球都高，有二楼的窗户那么高，然后时高时低，犹豫着，慢慢地飞到了街道对面，它的主人，一个穿着天蓝色毛哔叽外套的小男孩，就在它下面摇摇晃晃地跑动，焦虑的身体表现出惊恐，就像一个人看到股市崩溃时的样子一样。"它要走了。它走了。不，它还没有。看，没事的。不，没机会了。"我们前面一个拉着警戒线的紫色脸庞的老士兵全身颤抖，发出一阵笑声，谁都会忍不住笑，除非那人习惯把什么都隐藏起来。三个女学生

本来出于青少年的做作而非常拘谨，现在她们就像已经成了妇人一样放松大笑。

但是尽管有这些乐趣，这个场景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好看，因为那些小孩子很明显都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冷风中等了很久。”我的丈夫认为。但这不是理由，因为队列中轻快走着的孩子们也同样脸色苍白，眼睛头发暗淡无光。“我不明白！”我说，“为什么塞尔维亚人长大后都极其健康，小孩子却那么虚弱？”人群中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位端庄的法国女人接过话茬，她的神态就像是伸出拇指来拿一枚李子，而在英格兰自从玛丽亚·埃奇沃思[注]时代我们就没有熟练地表现过这种神态：“那是因为他们整个冬天都让孩子们留在室内。你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几乎不懂给小孩子足够新鲜空气和锻炼的重要性。”她自鸣得意地停顿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还有蔬菜。这是他们另一个无知的地方。他们总是给小孩子吃很多肉，一些沙拉，是的，但是他们几乎不吃绿色蔬菜。”

这就是说，事实上，塞尔维亚人还没有掌握在城市养育孩子的技巧，那些技巧确实很难学会，尤其是关于冬天的技巧。因为在乡下，农民的孩子一定得出门，无论天气怎样，都得去帮忙料理庄稼或者家畜。他们不用专门提议就能得到新鲜空气和锻炼。但是城市里的男人和女人们还要在听说和想到很多知识后才能明白，在冷天毫无理由地让小孩子出门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明显冷酷的事情。而食物问题也许没有那个法国女人说得那样紧要；因为据说塞尔维亚人用匈牙利红辣椒给汤和炖肉调味，它补偿了绿色蔬菜的不足。过度的肉类也是对孩子真正的伤害，但是他们的父母很难避免这点。因为在乡村，一个农民能够吃很多肉，并且从中受益，所以当他来到城市，他很难意识到他的体力源泉突然变成了一种危险。

他们在学习一种新的技巧，但是他们的教育条件不理想。“塞尔维亚人认为拥有一个伟大的首都非常重要，这真是一个灾难，”我对丈夫说，“想想那些新部门，看看这些可怜的老师。”“不幸的是，塞尔维亚人做得很对，”我的丈夫说，“战前的旧贝尔格莱德对任何塞尔维亚人来说都绝对不算丢脸，除了五百五十年前在科索沃被打败，然后让土耳其人顺流北上的那些人。但是在每一本德国、奥地利、法国或者英国的关于巴尔干的书里，总是会提起这个来批判它，而且这也总被外交官揶揄。但是我同意你，那些老师看起来非常不幸。”因为那些老师非常贫穷，就像他们管着的小孩一样，同样苍白虚弱得令人侧目。

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尊严感，而且通常他们都有着沉思和奉献的面容。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教师这份职业提供的不是农民离开土地后最渴望的那种稳定的工作，而是一种特殊的英雄式声望。在巴尔干战争以前，所有的年轻男女，只要有机会读书，都选择了师范文凭，然后前往当时还是土耳

其省份的老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为了基督徒国民的利益，列强强迫土耳其允许外国教职人员建立学校；但是其结果几乎一点都不符合这样一个善意干涉的预期。从世界起源以来，没有哪个地方像这样同时高度教化而又未曾开化。马其顿对整个欧洲都至关重要，因为只要能在这里立足，通过实际占领或者经济影响，任何势力就有机会继承垂死的奥斯曼帝国领土。所以这片土地上盖满了学校，里面的教职人员是些民族主义宣传家，他们来自隔壁的巴尔干国家，他们的职责超过了正常的教学行为。马其顿的大部分人口是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主要有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者希腊人的性格特点，尽管当他们或者他们的地区被不同国家统治时，他们也会改变性格。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因此也都在这里建立了学校，希望能把马其顿的小孩变成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者希腊人，这样可以指望他们去要求将这个省的主权转移到任何能保障他们信仰的国家手上。在竞相建立学校的过程中，很多学校的男女老师都被枪杀，或者没有被枪杀，那是因为他们先开枪了。这种情况到战前都还没有完全结束。直到几年前，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希望让马其顿脱离南斯拉夫并成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他们经常攻击南斯拉夫学校，谋杀教职工，但是很多塞尔维亚老师都志愿在南方先任职几年，再在家乡安定下来。所以南斯拉夫的老师经常既是英雄，又是狂热思想的仆人；但是当他们走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时，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食物、保暖的衣服、漂亮的住处或者所有需要的书。

我们必须承认，这座城市有饥饿的教育阶层、臃肿的政府机构以及剧增的剥削阶级，它时不时展现出一个丑陋的外观。我不喜欢贝尔格莱德，那天晚上我坐在旅馆的休息室里看着酒吧里挤满了红脸庞、粗脖子的矮胖男人，他们的黑色胡须如猿猴毛发般没有光泽。他们在楼上一间私人房间开什么会议，其中有两个外国访客，一个面色苍白、略显普通、身材圆润，像一块巨大的荷兰奶酪，另一个是犹太人，就像希特勒看见的犹太人一样。我想他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梦想永远都不会成真，尽管他们满怀希望。每个人都做得很好，除了这里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普通大众，他们将是被瓜分的对象。欧洲其他地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它已经有过它的机会，如果它永远不用这些机会来整顿它的财政系统，情况会更糟糕。南斯拉夫，这个必须塑造自己身体和灵魂的新国家，正在经受更严重的侵犯。

这些金融的、工业的冒险家对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很难算得清楚。在金钱方面，我不相信有贝尔格莱德以外的南斯拉夫人宣称的那么多。南斯拉夫大量的财富来自船运和木材，而且这些财富跟在英格兰或者美国一样合法。其他的，不管赚了多少，都只是一些不起眼的零碎财富。在贝尔格莱德，可能有一些大别墅，它们的主人解释不出建造所需的资金来源；但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别墅并没有多少。那里也没有多少大汽车，或者昂贵的餐馆，或者珠宝，或者皮货商。在我看来，似乎整个投机商只吞并了他们国

家商品中的一小部分，不像英格兰和美国那样理所当然地让给伦敦和华尔街。但是对农民群体来说，这些给中产阶级的回报似乎太高了；确实，社会中的这些私掠行为会给一个新兴国家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客被一些古怪的想法控制，那么形成的政党就会很少。建立政党需要一些天然分类：支持镇压与支持自由的人，支持市民与支持农民的人，支持军队与支持金融工业的人，诸如此类。有时，这些群体区分明确，有时则会合并成更少更大的群体。但是，这些分类数目有限，他们的组合也有限。可如果一个国家有一千个金融家或者工业家，他们能够（尤其当他们是斯拉夫人时）将政治生活变成各种各样的像一群银鱼般狡猾的小群体。1921年宪法颁布后的十年间，南斯拉夫曾经有二十五个不同的政党执政。这个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土地政策，而在十三个月里换过的农业部长却多达五个。

正是为了结束这种强盗式的混乱，亚历山大一世迈出了灾难性的一步，他在1929年宣布独裁。这似乎让情况变得更好，但是大部分南斯拉夫人说完全没有产生变化，因为最终走马上任的是被全国人民痛恨的斯托亚迪诺维奇。我真的从来没有听任何南斯拉夫人表达过对他的钦佩，除了康斯坦丁跟一个头脑简单的达尔马提亚法官。据说，他被痛恨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暴君，反对自由。他打压言论出版自由，把他的反对者都投进监狱严刑拷打，让他们忍饥挨饿。很难衡量这些谴责的公正性。必须承认的是，如果一个人在南斯拉夫被关进监狱，他很可能会被虐待。这里从土耳其和奥地利继承了一个很坏的刑罚传统。我认识一个非常开明的塞尔维亚官员，他费了很大劲儿才说服下属接受严刑拷打不是一个盘问口供的好方式。但是情况变得复杂了，当他们不再折磨囚犯，便以一种在我们西方的监狱闻所未闻的慈父般的态度对待他们。

一个外乡人很难弄清楚斯托亚迪诺维奇到底有没有囚禁很多人。我的印象是，这个政权比德国纳粹或者意大利法西斯更宽容。我听到过不满者坐在咖啡馆或者靠在巷子窗户边大声地、尽情地说着政府的坏话，我也从普通邮政收到过我的南斯拉夫朋友们大骂首相的信件，他们还签上了名字。我还听人说过很多有关暴行的故事，但是我们调查发现，它们要么子虚乌有，要么过分夸张。举个例子，在克罗地亚，有人告诉我一个克罗地亚人被流放到马其顿的一个镇子，而且被迫每两个小时向宪兵队报告一次；但是有一位支持克罗地亚、反政府的马其顿人就住在那个镇子，他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遭受这样古怪的惩罚。还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就因为在餐馆吃饭时对同伴说了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坏话而被判长期徒刑；但事实上只不过是治安官建议他下次不要那么大声地说话而已。

可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手有时候也会重重落下。有时是令人恼怒地落在知识分子的头上。我就认识一个品德极高尚的地方律师因为一次有叛国嫌疑的

谈话坐了两个月牢，而证据来自一个卑鄙的名流，此人战前就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奥地利间谍。对知识分子真正的伤害不在于这类案件的数量或者判刑的严重性，而在于知道这些事发生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不安全感。但是我认为，这只手致命地落在了工人阶级头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有一次在夜班火车上碰到一群悲惨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一个波斯尼亚工业小镇，要被押送到萨拉热窝。所有的人都戴着镣铐。宪兵队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我猜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在南斯拉夫很罕见，因为这种思想对一个自耕农国家没有什么吸引力，共产国际很少在这片土地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词被扩展到包括最温和的“左”倾行为。这些年轻人可能没做什么错事，不过是试图组织一个工会。我觉得，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政权把全部力量都用在了这些方面。

考虑到这个偏见，就能了解那些更认真的南斯拉夫人为什么痛恨斯托亚迪诺维奇。他们知道可恶的监狱系统不可能立刻得到改善，他们也知道自己经常对政府苛刻无礼。但是他们不会原谅他，因为他代表酒吧里那些有着私掠行径的粗脖子矮个男人。这些人是他的同盟，他们一起对其他南斯拉夫人不利。他们对农民不利，对挨饿的教师不利，对那些被带到城镇、陷入贫困之中如待屠宰羔羊般的工人不利。

这似乎有道理，但是我想这不是真的。虽然斯托亚迪诺维奇代表着贝尔格莱德的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利益，但是他可能不会打算成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我认识一些和他做过生意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他都诚实甚至慷慨地对待他们，似乎带着某种奥古斯都式的风度，这几乎不符合他对国家利益不在乎的说法。我怀疑，真相是他令人吃惊的幼稚，而且这种幼稚还带着一种过时的模式。这个线索就在每天晚上任何人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广播里。1937年的南斯拉夫新闻简报肯定有它的特色。很少听到有关少年国王和他母亲玛丽亚王太后的新闻，更多的消息是关于摄政王保罗亲王和他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为了让彼得国王拥有私人的少年时期，这本来是个恰当的想法，但是它被乡村地方人士误解为这象征着保罗亲王的野心——也许他想篡夺王位。但是任何皇室成员的消息都没有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消息多。每次我在南斯拉夫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首相前一天所做的任何事的详细报道，只有新闻播报员是一个正在边境驱赶入侵者的军队指挥官时，那腔调才算合宜。

这可能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假装恺撒主义的另一个迹象；确实，在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后期，他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想法，他在会议上让年轻人反复齐声大喊“领袖！领袖！领袖！”，就像德国的“元首！元首！元首！”，那样最不符合斯拉夫人的性格了。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从欧洲其他地方传来的前恺撒主义时代的遗风。“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康斯坦丁有次对我说，“很羡慕资本主义。”“羡慕资本主义？”我重

复，“为什么？他怎么能那样？资本主义试图解决人类怎样从土地上得到稳定生计的问题，而土地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可能有人会说，除非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想出一些能有比俄国革命更好结局的理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它更成功的理论了。但是当然它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好，当然它只能让人不满，而不是羡慕。”“这是你的想法，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可不这样想。他知道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人把一切都抢走了；而且他觉得，情况将变得很美妙，如果很多外国资金流进来以后生出更多的金钱，如果我们有像美国那样很多的工厂，壮观的白色宫殿，里面装满各种精细的机器，它们转动时就像在钢铁上演奏的交响乐，倾吐出各种崭新干净的东西给我们人民，倾吐出薪水的金色河流，让我们买得起一切东西。”“但是有时钱并不能生钱，”我说，“有时它夭折了，然后社会上只剩下一些尸体。至于那些工厂，它们可能看上去像宫殿，但是在里面工作的人绝对不会被当作王子和公主，而薪水的河流，它是金色的，正如多瑙河是蓝色的，经常在晚上把这些人冲回肮脏的贫民窟。”“你是一个女人，你想要一切都是漂漂亮亮的，”康斯坦丁说，“你看不到冷酷无情的美妙；至于金钱，斯托亚迪诺维奇是一个聪明人。他会保证这里没有美国那样的经济萧条。”

这里的有些东西，因为缺乏经验而让人同情，它们与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主义极其不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他们通过一种严格控制的神奇仪式给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一种抚慰和承诺。而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不知道这些受害者数量巨大到可以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把他们看作失败者，软弱无能，他们在个人生活中也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他们绝望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可能变成一种充沛的力量，能超过成功产生的力量。在这种错觉里，他的举动都带有一种特别的轻率。他不明白，允许那些失败的人，越多越好，通过组织把自己转化成一些看上去更像是成功的东西，那才是聪明的决定，所以他不能够明白——在这方面他跟英国和美国的有产阶级中很多人一样——工会主义不是瓦解而是稳定政权的力量。

这些人，就像酒吧里坐着的这些人，他们怎么能知道别的呢？当西方列强开始工业革命，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的奴隶；直到今天百分之八十七的南斯拉夫人还是农场工人；莱斯科瓦茨被称为“南斯拉夫的曼彻斯特”，但是和曼彻斯特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宜人小镇，有两万居民，他们不费劲就可以有干净的脸；也从来没有听说贝尔格莱德在哪段时期有过一些破产的银行家，从这座城市所不曾拥有的摩天酒店抬起的窗口，宛如天堂滴落的温柔露水一般跌落在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冒险家没有从书本和新闻中学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呢？印刷的文字从来不能阻止任何人去犯某些错误。《曼侬·莱斯戈》(注)不能阻止一个男人爱上妓女，没有哪个年老的女人会赶走自己年轻的爱人，就因为她读了《漂亮朋

友》注。堆积如山的经济类出版物已经证实，在市场萎缩、产品增加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建立约翰公司；但是德国人还在计划从殖民扩张中获取这样的财富。

我对酒吧里的那些人感到一阵厌恶，他们正是这个错误的执行者。我发觉他们很像上个世纪（19世纪）某些西方城市里的典型形象，长得像一些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控制巴黎的金融冒险家，像上个世纪（19世纪）90年代一些报纸插画中金融城里的人，那些人被叫作企业创立者——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一叫法了。他们不仅愚蠢地复制出一个不甚完美的制度，他们自己模仿的那类人也已经被证明不能抓住这个制度提供的成功机会。我能想象这个旅馆里的人也会犯下如此错误。它将放弃它那美味醇厚的意大利汤饭，它的炖肉将不再覆盖一层辣椒红油，它将雇用一些女仆，她们不会在生病的客人床前哀号，她们的鼻子不会抽动，不会在希腊人面前就像嗅觉灵敏的动物一样笃定，在芬兰人面前心存怀疑。它将不会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法国旅馆，它将变成一列不会移动的国际快车，就像那些大型的西班牙酒店。

我想，贝尔格莱德已经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在一段时间之前，它还是一个巴尔干村庄。它有自己的特点：勇于反抗、生存的决绝、殉道般的清贫。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巴尔干村庄；它坐落的海岬因为人们流淌的鲜血变得神圣，他们为了一个简单的诉求而死，那就是既然这个种族被创造出来，他们就应该被允许活下去。现代的贝尔格莱德在海岬上修满了街道，那些街道本来在别的地方就已经建得很好了。我对南斯拉夫的迷恋突然变少了。我第一次来游历的时候，被波斯尼亚可爱的自然风景和巧致迷住了，而且我在马其顿见识了那里人们独一无二的美好生活。当马其顿人相爱、唱歌、敬拜上帝、看守羊群的时候，他们给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带来了一种诗意的想法，那就是不相信表面，要去实际调查。他们生来就拥有一种品质，济慈认为这种品质远胜过其他品质，能造就一个“有成就的人，尤其是在文学上，莎士比亚就拥有这种品质”。“负面能力”，他如此称呼，让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的怀疑状态，不会急躁地去追寻真相和理智”。但是，马其顿直到1913年才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此之前，它在土耳其的暴政下保持稳定，就像在中世纪的情况一样——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败开始。马其顿也许应该被当作一座博物馆，它不能代表外面的生活。它和现代世界接触了仅仅二十五年。塞尔维亚则不是这样的隐居状态。它在1815年获得解放。一个世纪以来它接触了19世纪特有的毒药。我可能走了很长一段路来看落日，它在我眼前逐渐消逝在一个恶劣天气的夜色中。

但是，这个危险的恶化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实现。这家旅馆可能已在盼望摆脱自己粗俗的特点，仿效萨沃伊酒店、克利翁酒店以及广场酒店，但是它的尝试进行得不怎么样。一个新来的人到了酒吧；那些矮胖小个子现

在正充满爱心和信任地大喊，跟同类打招呼，他会为了一定数额的金钱背叛他们，他们也一样，他们向他举杯，像小孩子玩“表达单词的意义”游戏一样夸张地拍他的背。我可能在伦敦、巴黎或者纽约见过这个场景。但是在这些城市里，我从来没见过旅馆大门被缓缓打开，一个农民不疾不徐、轻轻松松地走进来，胳膊下夹着一只黑色羔羊。他站在报纸架旁边，上面出售《真理报》、《政治报》、《大陆每日邮报》、《今晚巴黎》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人，有着浅色的直发，高颧骨，目光清澈。他穿着西式套装，又套了件羊皮外套、一顶黑色圆帽，还有脚尖翘起的皮凉鞋；在他现成的衬衫上，他的母亲又加了一些刺绣。他四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人。他两次走到酒吧门口，仔细看着那些矮胖小个子的脸，很明显他在等他们那种人；确实，南斯拉夫的中产阶级都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们任何人都有可能有这样一个表弟或者侄子。但是他找的人不在那里，所以他又回到报纸架旁边。他一直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幅壁画中的拜占庭国王，黑色羔羊在他胳膊的禁锢下扭来扭去，有时在它扭过头时，它的眼睛照进了灯光，如同小小的发光盘一样闪光。

---

1. 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1768—1849），英国女作家，以儿童故事和有关教育问题的著作称著于世。
2. 《曼侬·莱斯戈》（*Manon Lescaut*），法国著名古典小说。
3. 《漂亮朋友》（*Bel Ami*），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长篇小说。

托波拉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照约定来到康斯坦丁家，准备和格尔达一起去参观一座未完工的无名战士纪念馆，它在距离贝尔格莱德十二英里的阿瓦拉山上，我们还打算去欧普莱纳茨参观卡拉乔治维奇陵墓。这次远行一开始就糟糕透顶。格尔达穿着整齐的新衣服开门，在门厅正式迎接我们，这时康斯坦丁的老母亲悄悄走了进来。她之前突然嘴馋想起了某种食物，于是她扎上方头巾，穿着斗篷和拖鞋一路走到市场，然后她希望不要被任何人看见就回到房子里。结果我们都在那儿，“出身高贵”地站在过道里。所以格尔达看着地板，因为羞愧而难为情，尽管从她的肤色上其实看不出任何变化，而可怜的老母亲则低着她那贝多芬式的头。这非常不对，因为她真的是一个极好的钢琴家，巴尔扎克式的睡袍是所有艺术家常见的衣服。如果不带着一点不修边幅或者其他类似意味，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创作。整洁和有序都很好，但那只是针对外科医生或者护士的要求。席勒知道这一点，他总是把烂苹果放在写字台里，当他需要灵感时就打开抽屉，这样他就可以观察苹果的棕褐色外皮，呼吸其过度成熟的气味。

但是，格尔达还不能约束康斯坦丁。他一点都没感到羞愧，还把我们叫进自己的书房。我们发现他穿着白底条纹的睡衣和睡袍，显得又胖又圆，他的头发卷曲，夹克纽扣之间探出一些微微卷曲的黑色毛发。“啊，她也是你的爱人。”我的丈夫指着康斯坦丁桌子上的一张相片说道，那是路德维希创造的维纳斯从泡沫中升起的三联画。“为什么不呢？”康斯坦丁说，“她很完美，因为她就是她，而不是别的东西。她的姿势中没有爱国、宣传、哲学或者宗教，她只是说，‘我正上升到喜悦中’。”他那肥胖粗短的手掌在空气中划过，把他同维纳斯一样提升到甜蜜陶醉的氛围中。他作为一个丑陋的人类，直觉地知道作为美神的一切东西。“那个雕像完全不同于你在南塞尔维亚见过的壁画，以及你丈夫将在欧普莱纳克山看到的亚历山大一世给陵墓装饰的马赛克复制品。那些东西没有愉悦感，全是些爱国、传播、哲学和宗教，虽然同样也有上升，有飘浮，有狂喜，但那是可怕的。”他的嘴里塞满面包和咖啡，但是他的手挥舞着，而且把灯调得更亮。

“你是一个聪明人，尽管你是一个银行家，”他对我的丈夫说，“所以你在欧普莱纳克山不会弄错，你会认为那些马赛克象征着你将在马其顿、在南塞尔维亚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它们本身。一幅绘制的壁画就是一幅绘制的壁画，一幅马赛克壁画就是一幅马赛克壁画，一幅本该被绘制的壁画被做成马赛克形式，那就成了杂种了，杂种应该是那些欢快的小狗，而不是大型的艺术作品。曾经有一次我遭受了这种该死的折磨，那时，我在德国，

我必须安排好我们的国王和一个德国马赛克工匠见面，但是这个折磨一则是因为我的艺术良心，二则是那个工匠是这世上最慢吞吞的人。他是一个高大肥胖的人，长着大胡子，他讲起话来“这个……这个……这个……”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大声说，‘我的先生，你能不能讲快点，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然后他勃然大怒地回答，但是还是以很慢的速度，‘不，我不能说很快，因为我们在制作马赛克，我们做事都很慢，我们在创造永恒’。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永恒，我觉得它只是永久，这两者完全不一样。”

他站在门廊处说：“今天天气很好，明天天气也会很好，我很高兴我们明天会去弗鲁什卡·格拉。我还没告诉过你们，在多瑙河边的山上有一些古老的修道院，叫作弗鲁什卡·格拉，也就是法兰克山；它们本身都很美丽，而且它们解释了贝尔格莱德以及你们今天要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们开车沿着林荫大道走，那里挤满了闲暇的人群，因为是星期天，甚至那些来市场的人都不急不忙。因为同样的原因，一些男学生或坐或躺在学生宿舍的窗户旁，有着经常锻炼的年轻人才有的如猫一般的可爱慵懒。其中一个窗户边有一个男孩子，他比其他人肤色更黑、脾气更暴躁，他向前探身，正在做一场嘲讽意味的演讲，下面的人大笑，举起手来，带着讽刺的恨意大喊：“斯托亚迪诺维奇万岁！”报纸经常把这样的学生形容成共产主义者，他们其中一部分人也会认领这个称呼。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一点都不准确。这些人只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享受了很多阶级自由。他们过去只受土耳其人奴役，那些都是外国征服者，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没有服从过任何属于自己血统的大地主，所以他们觉得去批评那些他们自己人担任的首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既然他们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他们从来没有被彼得大帝或者凯瑟琳大帝教过服从中央集权。如果他们要反抗政府，他们会以独立的小团体方式采取行动，就像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那样，他们永远都不会甘心成为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系统中顺从的一分子。当他们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代表乡村反对城镇，代表村庄反对贝尔格莱德，代表农民反对工业家；因为那个原因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斯托亚迪诺维奇。

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出来，驶向遥远的阿瓦拉山幽暗的圆顶。我们穿过一片起伏的乡村，它和苏格兰低地简直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土地是红色的，表面看上去更鲜艳。这里有一些农民富足的迹象，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普罗旺斯厨师经过毛雷斯一侧的村庄时下的定论：“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没有人很富有，但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财产。”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好地描述一个国家了，我觉得，所以我心情很好。我高兴地发现格尔达也是这样。她面容平静，正在跟我的丈夫进行传统德国式的闲聊，她正经历一种特别的德国式体验，一种让我觉得很迷人的体验。它最简单的形式经常被展示在那些过时的德国儿童书本中。小女孩坐着马车到达了科隆宾馆，她们的

心像小鸟一样歌唱。“我们的爸爸，”她们歌颂，“是一位从汉诺威来的国家顾问先生，我们的妈妈是一位标准的国家顾问夫人，我们是两个规规矩矩的小女孩，穿着漂亮崭新的出游长外套，我们要去莱茵兰，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景观之一，而且一切，一切都很神圣。”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从来不会这样，就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和行为而感到幼稚谦逊的喜悦，而且这两者都不值一提。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高兴，但是我们又都太具奥古斯丁的风度，因而讨厌自己的身份，或者假装出这种讨厌。我很高兴地听到格尔达在开车时自言自语道：“我来自一个路德教牧师的古老家庭，我是一个南斯拉夫官员的妻子，我正陪着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有文化的牛津毕业生和银行家，还有他的妻子，她是一位作家，我们一起去看两个有趣的纪念馆，今天天气不错。”

道路绕着阿瓦拉山的圆顶蜿蜒盘旋了一圈又一圈，穿过树林。新叶泛绿，嫩芽赤褐，蓝色的蔓长春花覆盖了整片树林。我们下了车，爬到那个未完工的荒凉建筑顶部。那个建筑被用来支撑巨大的斯托亚迪诺维奇纪念碑。我们在最顶上停下脚步，有些尴尬地看着一个不常见的士兵场景。远处斜坡上，两排士兵面对面站着，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什么闪光的东西。一个军官从喉咙中咆哮着喊出一个命令，就好像是一个瞬间降下血海的咒语。士兵们把那些闪光的东西举到唇边，原来是锡制杯子，然后我们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可能是地底下的鸟儿在唱歌。然后军官又凶横地大喊，每个士兵都喷出一口液体，它在阳光下呈银色。他们正在操练漱口来抵抗流感。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自然。如果过去的塞尔维亚英雄被他们的沙皇下令在女性游客面前漱口，他们也会服从命令。兵役看起来是唯一可以让斯拉夫人平静的东西。我们在大学宿舍窗户边看到的那些学生和这些士兵的区别，就像是在法国公立学校那些一路上闲逛聊天穿过地方小镇街道回家的女学生，跟一所极其昂贵的修道院学校培养出来的静止的、程式化产物之间的区别。

我们又下了山，停在一个斯托亚迪诺维奇纪念馆的模型前，它被放到了一辆卡车上面。坟墓的天花板将使用巨大平静的女像柱支撑——她们是塞尔维亚女性农民，平静的男孩儿的母亲们。我们看着现在那个粗糙矮小的纪念碑（它可能是某个手艺平常的石匠雕琢出来的），摆放着各国政府之前放到纪念碑上的花环。它们由阴郁的蜡菊和写着金色字母的粗糙国旗丝带组成，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尘土气味。那些金色字母拼出的单词和国旗结合在一起是一幅非常恐怖的画面。这些花环在任何情况下都令人不快，因为它们很官方，由一些心事重重的政府官员当作一个次要国事活动的某个条款下令送来。这些国事活动不能激发人民真正的感情浪潮，反倒是它们的起源提醒了人们：巴尔干历史，或者所有的历史，都很恶心。

有一个花环是纳粹德国送来的，现在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的土地，但是

它又被奥地利的精神吞并；维也纳通过希特勒，就像希特勒通过鲁伊格、舍内雷尔以及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样，传达出一条自恋信息以及对被选中的条顿人以外的所有人的憎恶的颤抖。条顿人是对斯拉夫人最有毒害作用的人类。另外一个花环是意大利送来的，意大利出于贪婪不断地骚扰达尔马提亚，它给杀死亚历山大一世的刺客送去武器，还教会他们怎样使用。这是一种肮脏的滑稽戏，在私人生活中几乎无可匹敌，这些列强在这个对这群人有着神圣意义的坟墓上献上花环，而他们又想把这群人尽快地送进坟墓。这是人们的控诉，这些人被迫旁观，而他们的敌人前来玷污他们的圣地，仅仅是因为还没有发现什么政治安排能够扼杀因南斯拉夫与中欧和意大利邻近而出现的危险。

我变得充满了女权主义式的愤怒。我想要破坏那个斯托亚迪诺维奇纪念馆的模型，它代表没有悔恨的农民女性。既然男性不用经历生养孩子的劳累，那么他们应该提供一个可以让孩子生存和发挥人类潜能的环境，这才合乎情理。这个恶心的小房间展示出他们在这一方面多么失败，而且失败程度是女性完全比不上的，除非百分之九十的女人生孩子时都流产。然而格尔达很喜欢这些花环。“我们的父亲是一位国家顾问先生……”我伸出手，摸了摸意大利的献花，咕哝着说出我的厌恶，但是格尔达只是皱起鼻子，狡猾一笑，就像是一个小姑娘看见她的保姆说脏话一样。

我们沿着一条宜人的公路开车离开阿瓦拉山，这条路经过河边湿草地，那里的柳树长在潺潺溪流边，果园中茂密的树叶遮住了最后的花朵，葡萄园就像墓场一样光秃秃的，因为还是春天，它们的枝干被剥得干干净净。就像加来海峡，这个塞尔维亚的乡村极不协调地呈现出整洁的耕地与邋遢的村庄。这些村庄都很大，因为除了附近的大城镇，这里没有零散的田庄。不管一个农民的土地在哪儿，他都住在村庄里，晚上赶着牲畜回家，早上再赶出去。在土耳其占领期间，这种习俗证明了它的方便性，因为它使基督徒在晚上能够一起抵抗非正规军或者土匪的劫掠，但是它的来源比那个还要更早。斯拉夫社会系统的根基是“扎德鲁加”——每个成员平等分享劳动力以及共同拥有土地收成的家庭，由共同推举出的一位长者进行统治，一般是群体中最老的人，有时候也可能会年轻点儿，如果他表现出杰出的能力，有时还可能是女性。长者和他的妻子住在中间的房子中，其他人住在和它相连的房间或者临近的房子里。当后代人数开始对那块土地的资源造成过度的压力时，“扎德鲁加”自然而然地就分裂了，但是它通常至少包括三代人，一般有一百多个人。因此，乡村生活和孤独之间的沉闷联系从来没有让塞尔维亚像其他地方一样沮丧消沉；甚至一些很不起眼的小村庄那长长的主要街道会延伸到山下和溪流边，然后沿着另一边的山坡往上，在那里，整洁的果园和葡萄园的耕种者懒洋洋地靠在破败不堪的咖啡馆外面，他们自己看上去一点都不整洁。

他们确实看上去不整洁。凶猛是这个地区人民的特点。他们宁愿抛洒热血，这与他们跟“黑盗客”明显的亲缘关系有关，也和伟大的领袖卡拉乔尔杰有关。因为我们已经到达塞尔维亚的第一个解放者展示自己暴力和力量的舞台了。在道路转弯处，我们停下来看着当年卡拉乔尔杰和他的牧人们一起骑马跟在猪群后面走过的地方，那时土耳其禁卫军回来当权，谋杀了偏向塞尔维亚的穆斯塔法帕夏，且正在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个重要的塞尔维亚人。透过沙尘他看见了一群土耳其士兵武器的反光，他和牧人们毫不犹豫地策马掉头跑进路边的橡树林，把猪群留在路上自生自灭。之后我们到了那个村庄，卡拉乔尔杰在那里与两个塞尔维亚将领以及五百名普通士兵会面，然后被推选为1804年第一次暴乱的指挥官。这位忧郁勇敢的巨人，不仅是一只跳跃的猛虎，还拥有真正的军事天赋，因为一些稀奇的原因，他不想接受这个职位，后来一个真实的目击者向我们述说了他的理由。卡拉乔尔杰说：“我想和你们并肩前去，而不是在你们的前面去。”当他们逼他说出原因的时候，他告诉他们：“首先，你们还没有学会当兵打仗，因为这个，过几天后，你们会向土耳其人投降，然后你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其次，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肯定不会按你们的喜好做什么事。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一点点背叛——一点点犹豫——我会杀了他，绞死他，用最可怕的方式惩罚他。”

这不仅是为使纪律严明所做的威胁，也是他对自己在爱国主义压力下所犯暴行的忏悔性暗示。很多年前，年轻的他参加了一次起义，他和他的继父一起赶着他们的牛群逃向奥地利边境。当他们来到萨瓦河边，继父没有了勇气，声称他要回头去乞求土耳其人的原谅。卡拉乔尔杰相信他从土耳其人那里只会得到折磨，所以在绝望中，他掏出手枪，杀死了老人。然后他继续前往下一个村庄，请求村庄首领帮他埋葬尸体，把他的牛群作为报酬留了下来。当时卡拉乔尔杰被推选为人民的首领，这说明了他们和他自己的性格缺陷不是一种让人舒服的传统的谦逊，而是一种没有激情的精准，这是典型的斯拉夫性格。但是，东方可以和西方相会。那三个首领见面的房子已经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学校，里面有一座塔，很像一座小小的郊区公共图书馆。

我们经过了一个温泉，它和我们在波斯尼亚见过的温泉不一样，也不像巴斯、维希和巴登巴登的温泉。这里没有漂亮的淑女绅士寻求某种模糊不明的休养疗效，农民们从一条栗树林荫道大步走下来，走向泉水，他们很清楚水对自己肠胃的作用，清楚他们祖先知道的东西，那就是水里有诸神。旁边有一个结实简陋的“酒店”，有人去过西方看过怎样建造它，而且在调查的时候目瞪口呆地凝视过它的模型。由于是星期天，很多小男孩在贩卖一盘盘烤饼和肉卷，因为塞尔维亚人几乎像苏格兰人一样喜欢面包类食物；其他人在卖一些小的皮凉鞋，整个南斯拉夫都穿这种样式的，它们有一个向上翘起的足尖，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很适合作为一个x的象征，x是

指斯拉夫人在人类通常性格以外的东西。对那个x的评估变成一个越来越有趣的问题，当我们驱车沿着小路进到卡拉乔尔杰的村庄托波拉（那是塞尔维亚语中表示“白杨树”的两个单词之一）时，那里有他的同胞站在泥泞之中。他们身上都带有斯拉夫人的神秘感，它沉沉地压在他们的黑色额发上，穿过他们皱起的眉毛，笼罩在一片操场上，那里过去是卡拉乔尔杰的马厩。主街将我们引向一片村庄绿地，它延伸到一座教堂旁边的斜坡，那座教堂的圆顶和墙壁被步枪射得千疮百孔，然后是一个有长廊的农舍，再过去是卡拉乔尔杰的家，现在成为索科尔总部的象征。树下的座位上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妇，他们的凶猛变成了一种温柔和蔼的高贵，讲究地穿着羊皮袄和自家缝制的农民服装。

一个老人过来带我们走进教堂，教堂里面充满了东正教仪式的黑暗魔法，他告诉我们卡拉乔尔杰曾经来这里参加过圣餐仪式，而且在死后多年他的骸骨也一直在此安息，直到被搬到一个巨大崭新的陵墓中，就在半英里远的欧普莱纳克山上。“那时骸骨放在哪儿？”我问道。“在地底下”，老人说，“在一个不远的山谷中。在奥布伦诺维奇成为塞尔维亚领袖之后，他逃亡到这里，奥布伦诺维奇派人来杀他，可能想用他的头去安抚苏丹。但是之后奥布伦诺维奇的妻子变得惊恐不安，因为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她让人把卡拉乔尔杰的骸骨挖出来送回这里。”在我们身后的黑暗中，格尔达吃吃地笑着。我们惊讶地转过身，发现她看上去特别开心。“他们是这样一些野蛮人。”她解释说。老人困惑地凝视她，好像她可能生病了或者不开心，然后慢慢地继续讲话，中间还疑惑、亲切地瞥了她好几眼。他给我们展示那个将整个圣坛和教堂隔开的圣幛，它上面有一些朴素的雕刻，是一些农民视角的神圣故事，仿照14世纪风格，尽管木头还很新。“这是三个兄弟为我们雕刻的，”他说，“两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三兄弟建造了斯科普里圣救世主教堂里有名的圣幛和讲坛。他们的手艺父子相传。八年前他们住在这里，制造了这个屏风。现在，他们在尼什待了很多年，在做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漂亮屏风。他们为卡拉乔尔杰做出了最好的作品。”他打开圣幛对着圣坛的御门，然后他的脸悲伤地皱了起来。“上帝曾经给过我们很大的仁慈。当我们的亚历山大国王去保加利亚的时候，他停留在索非亚的三天，我们日夜都在这里做弥撒，所以尽管很多保加利亚人恨我们，心思恶毒，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在他身上，他安全地回来了。但是，请上帝原谅我们，当他去法国时，我们没有做弥撒，因为我们以为他到了朋友当中。”历史再次散发出恶臭，在这里尤其令人不快。一只狼做的最让人不快的行为，也比不上那些不像狼、只是狼王国的一些文明管理者对动物园和马戏团的狼所做之事。

在返回汽车之前，我们在绿地上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野蛮的小教堂，看着那个野蛮的农舍外那些凶狠的孩子，他们刚刚结束被爱国激情鼓励的体育活动而精神饱满，我们也看着座位上那些凶狠又英俊的老人。“‘杀猫的

方法很多，不必非用奶油呛死它。’现在我知道这句谚语的意思了，”我的丈夫说，“可以看到，在波斯尼亚，斯拉夫人确实给土耳其塞了很多奶油，他们用大规模改变的信仰填饱了它，把它阻挡在萨拉热窝外面。但是在这里，奶油并没有成为问题。塞尔维亚人打土耳其人，然后对方打回来，之后他们又打回去。我们在这些人身上看到的是正常的表情，它也出现在打仗的士兵脸上，他们刚刚结束长期的徒手格斗，从战壕中出来，但是觉得他们可能被伏击了。”但是后来我们走到那个陵墓，它的白色穹顶从林木公园中冒出头来，当我们从它那马赛克装饰的干燥粗糙的金色拱顶下走过的时候，他说：“但是，这是其他的东西。这个特别的地方，它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吗？还是它只是这些卡拉乔治维奇家族成员的一个幻想？”

那个献给圣乔治的教堂很新，外观很漂亮。忠实于拜占庭的传统导致很多小教堂变得很丑陋，因为它对纯粹结构的依赖凸显了糟糕的机器切割和丑陋的岩石缺陷；但是它也自动地给那些以精致材料和精湛技艺建造的教堂增加了某种雄伟跟内敛。欧普莱纳克由老国王彼得一世于1912年下令建造，但是在大战期间它成了一片废墟。1922年亚历山大国王重建它，并且增添了他父亲最早计划时明显没有想过的两个特征。亚历山大从托波拉的乡村教堂取出卡拉乔尔杰的骸骨，把它们埋葬在右边半圆室的一块大理石平板之下，也就是说，就在皇室宝座的旁边。在任何尊贵的东正教教堂中都会供奉皇室宝座，在这里，它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绿色大理石宝座，放置在一只白色和金色的雄鹰之上。亚历山大国王认为卡拉乔治维奇家族成员中只有一个值得埋葬在教堂中，而不是在墓室里，那就是彼得一世，他被葬在左边半圆室的另一块大理石平板之下。这暗示了一个正在统治的国王通常不会对他们的王朝采取的关键态度：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卡拉乔治维奇统治者——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的儿子，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

亚历山大一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那些马赛克装饰；彼得国王计划只用一些短短的、千疮百孔的军旗装饰，它们经历了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从大理石的柱子上垂落下来。确实从一开始，由于它在艺术上的不得体，这些马赛克让人很是困惑不安。它不仅仅是在炫耀用马赛克来绘制的壁画，看到它们的时候人们还会不断地分心，因为它们不能让人找到创作原本想要满足的状态。这些壁画源自拜占庭：在艺术史上合适的名字叫作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上面本来应该固定着一些纤细的火焰般的形状，该用一些适当稀薄的火焰般的颜料来表现出流畅和透明，但是它们被篡改成一些像沙子一样的不透明的混杂物质。下令制造这些马赛克的人肯定缺乏任何良好的审美感知。但是它们组成了一部极其巧妙准确的中世纪塞尔维亚艺术百科全书。抬头看着它们，人们会说：“那个是来自格拉查尼察的‘圣母玛利亚的安息’，那个是来自德查尼的‘圣乔治的生平’，那个是来自佩奇的‘逃往

埃及’。”即使看到这些艺术作品时没有得到真正的强烈愉悦之感，人们也可以感知到一些关于它们应该传达何种愉悦感的有用信息。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想要在他的家族陵墓的拱顶上展示一部中世纪塞尔维亚艺术百科全书呢？”我的丈夫问，“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英国国王建造一个全是狮心王理查典故的陵墓一样。”“唉，那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遥远的过去，”我说，“而且他们从那段辉煌直接进入了被土耳其征服的悲惨历史。”“但是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和这些塞尔维亚人之间有什么真正的连贯性吗？”我的丈夫问。“当然有，”我说，“一旦你离开贝尔格莱德就能看到。”“但是这些壁画真美，”我的丈夫说，“这是来自拜占庭的真正遗产。对于拜占庭艺术的伟大时期来说，它明显太脆弱了，但是它有一种恰好的僧侣气质，一种想要将一切东西摆好位置的真实欲望，这些位置揭示出最低和最高的关系，甚至包括上帝本身。”然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但是这些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的壁画在哪里？”他问。“在修道院，”我说，“有些在塞尔维亚，有些最漂亮的壁画在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米勒舍沃修道院和奇卡修道院，但还有很多在老塞尔维亚和南部塞尔维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塞尔维亚地区，”我的丈夫说，“所以这座建筑和它极其昂贵的马赛克对于任何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或者斯洛文尼亚人而言毫无意义。但是，这是他们的国王陵墓，极其适合他。我的理解是，南斯拉夫有必要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注定的和谐。”

我们走向亚历山大一世埋葬自己的墓室，但是一幅美丽的壁画又将我丈夫吸引回来。“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个特别的事，”他说，“我只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巴尔干国王，他有着不幸的独裁倾向。他好像有一个荣耀的诗意想法，那些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才有过的想法。他在巴尔干战争中收复了他的人民的古老领土，而且试图——康斯坦丁有次说过它是什么？——‘移植他的王朝’到他们古老的王国树干上，这样逝去的将会重生。这个想法与单纯的征服非常不同。这些壁画对他的人民说，‘这是你们的过去，所以这是你们的现在’。但是，告诉我，还有比这个更学究的设想吗？我们在外面看到的那些暴徒真的能够回应这样一个想法吗？”“我不清楚，”我说，“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来自他们。”“胡说八道，”我的丈夫说，“我拒绝相信那些年轻的暴徒会因为缺少他们祖先在14世纪享受过的拜占庭壁画而烦躁。”“好吧，我向你保证，他们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我说，“他们记得很多诗歌。”“他们看起来可不是这样。”我丈夫说。“噢，不是亚瑟·休·克拉夫，”我说，想起我的丈夫有一次试图给我读一首他认为还过得去的诗时的痛苦，“但是他们记得几千行讲述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打败的民间诗歌，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印象。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他们对那些塞尔维亚军队医院中的病人进行过测试，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它，结果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也许吧。”我的丈夫说。

坟墓顶上悬挂的墓室灯照亮了长长的拱廊。很多死去的卡拉乔治维奇家族成员在这里安息，尽管卡拉乔尔杰才死去一百二十年，不少人躺在这里的时间是他们寿命的几倍。这个家族，尽管很有权势，身体却很虚弱。他们中有小孩、少年、二十来岁的年轻妻子，他们的名字在颤抖的灯光中暗示着虚弱、头痛、发烧。亚历山大一世的墓穴旁，铁台上的蜡烛发出更强烈的光，他躺在墓室圣坛的一端，在缟玛瑙的厚板之下。六个男人和女人正在点燃新的蜡烛，把它们放到铁台上，他们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喃喃细语，跪下来，然后收起他们的粗野来亲吻闪烁的缟玛瑙；这种狂热，我听说，也出现在列宁的墓前。按照国王的遗嘱，他躺在他的母亲旁边——她在他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死于肺结核。在这个墓室里，巨大的大理石地基建基于他的后代们的叛逆之上，这是这个乡村的核心，防御性的仇恨像茂密的森林一样生长，一切都是哀伤的、渴望的、温柔的和怀旧的。

弗兰兹斯塔尔

我们头顶的天空湛蓝金黄，在这样的多雨春天很是少见。我们周围的地方可能也是这样的天气，但是我们不清楚。我们被困在一个旅馆庭院中。庭院里没什么显眼的东西。它面积倒是很大；周围的房间都很舒适，没有一点斯拉夫风格，建成这样好像是为了让拥挤都不会引起争吵，而且都很温暖、野性和宜人；在一根穿过庭院的绳索上，挂着猩红色的毯子、白色床单和绣着红色十字绣的毛巾；墙边的花坛中樱草跟郁金香有趣地挺直了枝干。这里值得看的东西能在十秒钟内看完。

这个小旅馆也没有建在一个有趣的地方。外面是一个村庄，有一条非常宽阔却很泥泞的街道，旁边是一些平房和商店。有时，一头母驴拉着一辆小车经过，它的驹子另外套着挽具跟在旁边；他们就是这样让马从小习惯运输的。有时，一群肮脏的肥猪漫步走过，明显没有人管。真的没有理由来参观这样一个村庄，尤其是在星期一的下午，这里没有什么人正在展示他们的有趣特征。

我们也不是为这个旅馆的食物而来。格尔达、康斯坦丁、我丈夫和我，我们四人的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满盘腊肠，它们的味道在同类腊肠中本就不怎样，此刻的味道尤其让人讨厌，因为它们既不冷也不热。肝香肠尤其恐怖，在我们的嘴唇和上腭都留下了一层油腻。

我们夫妇俩来到这里，甚至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不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无知而被人欺骗，相信这个村庄很有趣。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要来这里。我们被告知应该来这里。昨天晚上，从托波拉回来后，我们坐在旅馆里吃晚饭，不安地谈论着格尔达。在一天的旅行中，她表现出对我们的失望。当我们对塞尔维亚的东西表现出赞赏或者好奇的时候，她就表现得好像我们让她失望了，背叛了一些我们应当共同遵守的标准一般：就像一个特别愚蠢的英国人在印度对那些对当地艺术哲学感兴趣的游客的反应一样。“但是她比那还糟糕，”我的丈夫说，“今天下午，她对我说了一些让我非常震惊的事，那时你正在给托波拉的教堂画一张速写。她告诉我说，塞尔维亚人认为奥地利人没有权利轰炸贝尔格莱德，因为它是一个未设防的城镇。我不明白这是否只是一种大众化的态度，还是有识之士的严肃见解。所以我问她：‘你丈夫也这样认为吗？’她露出狡黠的微笑，说：‘是的，他会这样说，但是他是一个好官员。’在我看来，那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外国妻子能说出的最无纪律、最不忠的话了。”就在那时，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告诉我们康斯坦丁打电话过来了。我的丈夫回来时说：“康斯坦丁告诉我们明天我们不会去弗鲁什卡·格拉，而是后天去。明天他想和我们一起去一个叫

作弗兰兹斯塔尔的地方，并在那里吃午饭。”“弗兰兹斯塔尔？为什么去弗兰兹斯塔尔？”我说。“那是一个郊区，住着斯瓦比亚人，他们是一些德国人，被玛丽亚·特蕾莎派来殖民这块被土耳其人忽视的土地。但是如果我们白天到那儿，也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去贝尔格莱德或者下地工作了。那里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吗？”“我也这样问了康斯坦丁，”我的丈夫说，“但是他只说——就像他已经尽力一般——那些斯瓦比亚女孩穿了十到二十条裙子。”

第二天，我们发现，对话的第二部分可以由第一部分来解释，那时我们跨过多瑙河，正寻路去泽蒙，它过去是从匈牙利边境过来的第一个小镇，现在仅仅因为其庞大的鹳群闻名。随着我们开车接近弗兰兹斯塔尔，格尔达脸上的陶醉感越来越浓。现在，她坐在这个庭院的桌前，吃着温热的腊肠，她的脸因为完全的满足变得柔和。康斯坦丁看着她，温柔地笑出声。“这是不是很特别，德国人的爱国主义？”他问我们，“我妻子很幸福，因为这个小村庄很有德国特色，她觉得周围都是德国的东西。”我们很难给出有用的回应。我自己很喜欢英国，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生活在罗马，碰巧我要招待几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我不会坚持让他们取消参观蒂沃利或者弗拉斯卡蒂的行程，在一个英国茶室待上一天。“你能相信吗？”康斯坦丁继续欢喜地说，“她不同意成为我的妻子，直到我承认查理曼大帝是个德国人。他们就像岩石一样，这些德国人。”我们一阵沉默。丈夫和我都在深思，按照纳粹的想法，查理曼大帝不是德国人，而是德国人的压迫者。因为我们不敢发表什么轻率的评价，也不能发表严肃的评价，我们开始两眼走神。在我们头上，被忽视的天空很壮丽。我们听到小旅馆的门砰地一响，不知哪里的一只鹦鹉开始尖叫。一个穿着扎成束状的裙子的女孩走进庭院，放下一只大口水罐，从砖砌的井台里拉起一只木桶，从井里给自己舀了一些水。“看，”可怜的康斯坦丁胆怯地说，“她穿了很多条裙子，可能有十条或者二十条。”

弗鲁什卡·格拉

我们站在某个叫作“塞尔维亚蜂后”的协会杂乱的房间里，我没法集中精神去听康斯坦丁跟协会职员们的谈话，他们正向我们解释这个协会是什么。我们七点从贝尔格莱德出发，用了两个小时到达诺维萨德，这段旅程本来应该很愉快，因为火车经过了薄雾笼罩的多瑙河洪水旁的奇幻风景，可实际上很不愉快，因为很明显格尔达已经决定讨厌我们了。她的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她那不费任何动作的神秘难测都暗示出她是高贵、耐心、勤勉、质朴、谦虚之人，而我们则是物质、浮躁、懒散、奢侈、好争吵之人。此时的她正站在房间一角，在与我们说话的人的后面，沉默地表现这种诽谤性的装模作样。

我理解他们正在告诉我的，牧首阿西尼厄斯三世在17世纪末期建立了这座小镇。1689年，塞尔维亚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以失败告终，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提议在自己的领土上为他们提供一处避难所，并且使他们拥有完全的宗教崇拜和一定的自治权。那里已经有一部分塞尔维亚移民，他们是在土耳其人占据匈牙利的时候迁徙过去的。牧首接受了这个提议，带领三万个塞尔维亚家庭渡过多瑙河，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包括最南端的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其中一些人在这个以前叫作“新城”的地方定居下来。很多人又逃回了土耳其的领土，因为皇帝毁约了，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用财政和军事赋税榨尽他们的血汗，而且禁止他们使用东正教仪式。其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那是在玛丽亚·特蕾莎宽容大度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的统治下，这些塞尔维亚难民才得到了诚实的对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于1823年建立了“塞尔维亚蜂后”这个文学协会。不幸的是，我们参观它的总部时，这里已经被转交给油漆工了，他们焦虑地说。

我们回答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协会保留的东西；然后我们抽出靠墙堆放的一些画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一些典型的绘画，19世纪整个欧洲充斥着这种风格的作品，只有法国除外，有太多18世纪优秀画家的自然风格作品风靡法国。这些绘画中的男人们都长髭斜肩，女人们都梳着光亮、中分的发型，穿着僵硬的笼状胸衣，斯拉夫人特征被缩小为一种易怒的表情。“他们迁徙到这儿，”我的丈夫咕哝道，“是在塞尔维亚-拜占庭文化灭亡的三百年后。我猜测那种连续性已经被完全打破了，那个亚历山大国王不过是一个空谈理论者，实行民族主义的——”他停顿一下，“理论。”他不确定地补充道。他已经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对着亮光，画上的她眼睛很大，在升华韵律的高潮中保持着僵硬的表情。塞尔维亚人，确实没有在来这里的路上丢掉他们所有的行李。

“我要向你们展示一切的东西，”康斯坦丁说，“一切的东西，我都要展示给你们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要给你们看卡尔洛夫奇牧首区，从阿西尼厄斯的伟大迁徙以来，那里就是塞尔维亚教会总部，然后我们再去参观弗鲁什卡·格拉修道院。”所以我们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小镇，这个小镇非常宜人，而且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家的爱丁堡，它和这个小镇一样有着自己鲜明独有的特性。道路引着我们走进河边美丽起伏的绿色乡村。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教堂前停下，那座教堂看起来就是那种改过信仰的建筑的模样。在土耳其人统治匈牙利的一百五十年间，它是一座清真寺；从18世纪初起它成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清真寺的气氛还萦绕其中：它有一排宽阔的看台俯视水面，那里本来应该坐着一些头戴土耳其毡帽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心满意足，享受秘密的闲暇。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眼前绵延数英里的水面让我们心情平静，水面像光线一样灰白，垂下的柳树形成了一些黑色的标记，有花环、同心结和翻花绳。我们从泥泞中挣扎回去，那些是暗色的中欧泥浆，它们从来都不能被控制，除非是严重的干旱，那就成了更严重的折磨，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车轮前升起浓厚的波涛，甚至在卡尔洛夫奇的主要街道上占据上风，尽管那是一个漂亮小镇。

牧首区是一座19世纪的石头宫殿，它的拜占庭建筑风格中带有奥地利的稳健，拱门和阳台非常华美。我们走了几步台阶来到华丽的前门，按门铃，然后看着四周的花园，它们被装饰成一种正式的华丽风格，里面的很多花坛被布置成各种复杂的形状，周围是低矮的盒状树篱，还有很多丁香花丛，开着特别深的紫色花朵。门没有开。我们又按了按门铃，握拳敲门，然后回到车上鸣笛。什么动静也没有。康斯坦丁拍着手对着没人回应的建筑大喊：“喂！喂！”花园让人很是费解，在那些精心料理的盒状树篱中间，花坛里挤满了野草，一张白色涂漆的金属丝制成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花园椅被单独摆放在一块宽阔的砾石空地上，散发出一种被骗的社交感，就好像它发疯了，以为旁边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园椅子。一些孩子从街上跑过来，跟着我们。我们找不到园丁，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是一扇门，打开后，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一些石架，用来储存果酱。我们放弃了进去的打算，停下来嗅那些茂密的紫丁香花。这时，一个拿着橙子的老人从我们没发现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告诉我们牧首在贝尔格莱德，但是有几位牧师在附近印刷厂里劳作，他会去请一位过来。

朝我们走来的是一位高大的牧师，他有着高贵英俊的外表，穿着一件设计复杂的斗篷——东方教堂里所有的衣服都源于拜占庭，让人回想起它的荣耀。他彬彬有礼，热情地问候康斯坦丁和格尔达，但是他落到我们身上的目光带着一定程度的冰冷和责备。我很惊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东正教的传教士倾向于将英国人当作他们同样的教派成员来对待；但是，我猜测在这里，作为总部，他们可能对教会分裂和异端邪说的解释更加严格。但他还是很客气地告诉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参观牧首区，而且想让我们看看印

刷厂，他对此特别关心，因为他是宣传的领头人。

印刷厂位于花园后面，一片由小巷和外屋组成的无人涉足的整洁的乡野之地，到处都有茂密的紫丁香，还有一些小溪流向多瑙河。一棵扭曲的古老果树的绿荫遮盖住整个庭院，我们穿过庭院进入一个满是灰尘的房间，里面有一老一少两个牧师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前，桌子上有墨水池、钢笔和吸墨纸，这些都属于非常早期的文具。一包包被胡乱捆好的没有艺术感的小册子，摆放在桌子上面，虽然不是乱七八糟，但也摆得很业余。我们走下一两步台阶进入排字车间，那里有个人站在倾斜的托盘前面，正在设置用奇异的古斯拉夫语字体印刷的工序，这种字体只用在东正教弥撒书里面，不用于任何世俗写作。我们走上一两步又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些年轻姑娘在捆绑小册子，虽然谈不上很熟练，但是非常虔诚。随后在另外一个房间，不记得是上了还是下了两步台阶，但是肯定不在同一平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位身体扭曲的有趣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向上螺旋的精神而变得畸形，就跟埃尔·格列柯喜欢画的那种圣人一样。他往印刷机里投放纸张，好像他正在训练自己记住这个可怜的没思维的东西只有在一定节奏下才能完成它的神圣工作。我们可能正在参观英国小镇里一些天真顽固、不谙世事的人信仰的那种异端邪教的小规模办公室。确实，我知道在苏塞克斯郡有一个商店属于某个教派，它们相信使上帝满意的方式就是仪式性的饮水，这正好类似于此类低调狂热机构。然而这个印刷厂类似于一个属于英国国教且设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贝斯宫里的印刷社。

牧师穿过厨房去叫一个仆人开门，我们还不得不在牧首区的前门等上几分钟。然后，门被缓缓打开，里面有一位干瘪瘦小的管家往外看着我们。他看到我的丈夫和我，似乎噘起了嘴。“早上好，”康斯坦丁说，走进去，“最近过得怎样呀？”“波拉克，波拉克。”小个子回答，意思是“马马虎虎”。“哎呀，他说话像俄国人。”康斯坦丁说，然后跟他讲了一会儿话。“是的，”康斯坦丁接着说，“他是一个俄国军官，他很虔诚，想要成为僧侣，但是他有一位妻子，所以他们让他在这里当管家。”至少他在一个可以让他想起家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俄国，但是我去过一些属于沙皇俄国的地方，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我很熟悉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那些以前属于俄国富人的别墅，而且我能认出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些装饰和建筑群，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

它的一些元素在其他国家也能见到。在19世纪男爵们在河滨大道、中东和西方建起的更为古老的大厦中可以看见一些和它相似的东西；其内部同样有大量复杂的穿孔木构件。这里也有少许用贝壳制成的相框和盒子，它们在英国海滨小镇也能买到；它们也让人联想到在德国地方商店里人们买来互相赠送的礼物，比如一些顶端用粉红色的大理石雕成雄鹿头的雨伞。这里其实有西方文明中的各种坏品位的痕迹，包括最幼稚庸俗的品位；奇怪

的是，这里明显没有法国对欧洲其他部分的经典温和的影响痕迹，尽管它深受路易十四传播的镀金影响。然而这里也时不时地展示出某种卓越得让西方羞愧的品位。这里有一种热情，是我们对美热爱的根源，为艺术努力的根源；这是对美丽物质、彩色宝石、闪烁钻石、金银水晶的热情。这里不仅有艺术的根基，还有艺术本身，有构想出浩瀚跟简单想法的想象力，就像一个游牧民族在平原上往上看，看着云端时想到的东西。这里也有工艺的感觉；这个游牧民习惯捡起软铁丝并扭成骏马和野兽的模样，他能够评判这些形状，因为他骑过前者去捕猎后者，所以他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它们的身体。

或许我们正在看的根本不是坏品位的表现，而是一个有着完美品位的权势人物的困惑，他本来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里，而且那些纯洁的物质要么由那种品位塑造，要么被忽视，然后他刚刚进入另一个世界，里面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小工艺品，它们是其他人品位的结晶，与他的品位相去甚远，所以他没能公正地形成对其价值的估量。由于鞑靼人的占领，强大的俄国人被阻挡在西方艺术之外。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接触过它。这仅仅是一个巨人的极大无知；它也是一个巨人的极大粗俗。在太多的情况中，他解决疑惑的方式就是考虑这些物品的金钱价值，或者考虑那些可能身居高位但是不懂历史之人的标准。但他是一个巨人，这是他比那些矮个子普通人的高超之处。

这个牧首区有一个房间，确实非常豪华，那是一间会议室，里面有一张华丽的宝座和一些深红色窗帘，它们可能来自维也纳某间最华美的宫殿，但是源于一个更大、更戏剧化的灵感。其他东西都有一点点怪诞，还有一些非常怪诞。我们在一间小起居室里坐下，康斯坦丁跟那个牧师和管家聊天；我说到这些家具与在任何一位英国大主教的府邸中看到的都不同。它是由黑檀木打造的家具套装，包含椅子、桌子和书橱，都装饰着镀金雕刻，那些雕刻有三到四英寸长，是一些半裸到腰的女人，她们的胸脯轮廓清晰。它们被很显眼地安置在书橱的壁柱、圆桌的桌腿以及椅子扶手上。它们当然证明了东正教对待性的态度就是没有兴奋感地对待它，而且我确信没有人会用色情的目光打量这些雕刻。尽管如此，将它们作为一个基督教教会的屋内装饰是一个幼稚的选择。

“但是，为什么，”我对康斯坦丁说，“那位牧师和管家看着我们夫妻俩，好像很恨我们似的？”“噢，那不是针对你们，”康斯坦丁说，“只因为他们恨英国人。”“哈，哈，哈！”格尔达大声地笑了，就跟谢里登喜剧全明星重映中表演的人一样，“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竟然会有人讨厌英国人。”“但是他们对英国人又有多少了解呢？”我的丈夫问道。“那个老军官很讨厌英国人，”康斯坦丁解释说，“因为他说正是乔治·布坎南爵士开启了俄国革命。”我们思考片刻后才记起乔治·布坎南爵士于1917年出任英国驻

圣彼得堡的大使。“但是他不觉得也许克伦斯基和列宁与此有一点点关系吗？”我的丈夫问。当问到那个管家时，他摇了摇头，不耐烦地说出一大串流畅的句子。“他说，”康斯坦丁翻译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像克伦斯基和列宁那种无足轻重的人怎么可能和发动一场革命有关？那一定是某个像乔治·布坎南爵士那样有真正影响力的人所为。”

“现在，请问一下那位牧师他为什么讨厌英国人。”我说。“那是因为他认为劳合·乔治本来可以挽救罗曼诺夫王朝，”康斯坦丁说，“但是我不懂他什么意思。”“我知道他的意思，”我说，“他听说过那个故事，布尔什维克本来允许沙皇、皇后和他们的家人来英国，但是劳合·乔治不同意。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故事没有一句真话，劳合·乔治的最大敌人都不能证实这个故事。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表示要把那些可怜的人交给我们，也没有一点证据表明如果他们被这样要求，他们就会这样做。”但是牧师只是摇头，他那美丽的棕色眼睛表明他根本不会跟人争论，就好像他是一只被阉过的雄鹿一样。“和这些好人讨论没有用，”康斯坦丁说，“因为这座房子里的所有人全都站在白俄罗斯那边。牧首对布尔什维克很生气，他认为只要罗曼诺夫复辟，所有的欧洲问题都能被解决，我们也可以进入黄金时代，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英格兰没有这样做。”我担忧地想起印刷厂中那一堆堆小册子，那如饼干颜色的粗糙纸张、灰白僵硬的字体，我想知道它们被设计的时候揭示了何种令人震惊的信息，因为这些小册子有时就被用来在政治事务中指导东正教教徒。

但是在我们动身去弗鲁什卡·格拉之前，那位穿着庄严斗篷的牧师让我们去参观牧首区教堂，它就在宫殿隔壁；我们一到那儿，我们所见过的无效率感和无艺术感都出现在眼前，且看起来合情合理。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中有一个白色和金色组成的剧院，一些教区附属的神学院学生正在参加四旬斋弥撒。牧师们从巨大的圣幛御门进进出出，圣幛上有很多镀金圣像。牧师们走来走去，华丽的圣坛不时闪烁着光辉，圣坛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遮掩起来，以免人们长时间看着它，忘记了它的本质，就像那些凝视太阳很久的人，最后不觉得它是光线的来源反而觉得它只是一个黑色的圆圈。学生们的声音肯定了被遮掩的圣坛荣耀，并且宣告了它的迷人、美好与和谐。仪式的进行中，我们都恭敬地跪倒，前额贴近地面。“只有在圣周才必须这样做，”康斯坦丁在我耳边边道歉边喘气地说，“抱歉。”他觉得由于必须采取这种态度，英国人的尊严可能被冒犯。但是其实有机会参与这个仪式让人觉得非常愉快，就算基督教的传说都不是真的，它还是使人振奋、勇气倍增，因为它表明这种经历中有一些极其美丽的东西，而且我们不应吝啬自己的爱和侍奉。它让人提前预防那持续恶心的疯狂，以及对令人讨厌的事物而不是令人愉悦的事物的偏爱。这是东方教堂独特的贡献。它是拜占庭的孩子，这种文明偏好视觉艺术而不是文学，且被一条越来越宽的鸿沟将其与理智的西方分隔了一千五百年。因此，它没有被诱惑去用原始的

教堂教义作为某种哲学和道德系统的基础，那些哲学和道德基础肆无忌惮地宣称要阅读上帝的想法；它把它所有的力量都用于完成弥撒，这种公共的艺术形式或许使人们时不时地去领悟为什么人们相信上帝存在。鉴于这些完美的成就，这个东方教堂的教士应该被原谅，即使他们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得无能，缺乏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知晓的那些画家和音乐家的常识。他们有自己的秩序，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遵守我们的秩序就去指责他们。

弗鲁什卡·格拉，也就是法兰克山，它被叫作这个名字是由于某个没人会感兴趣的历史原因，它坐落在多瑙河南岸。我们必须开车穿过山脉去寻找那些17世纪移居者修建的修道院，因为它们散落在南边的斜坡上，回望西伯利亚。一旦车行至山顶，我们发现自己身处最迷人的圆形群山之中。山上覆盖着金色的树林，不是春天的那种绿色；树林一直往下延伸至广袤的绿紫色平原，巨大的云彩在地面投射出块块阴影。我们停下车来，在山谷上的一家旅馆吃饭，那个山谷位于平原的金色螺旋状部位。这本来应该很愉快，因为这是一个徒步旅行中心，我们周围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是一些放了假的老师，因为快到复活节了。对那些刚从世界大战中解放出来的国人而言，简单的出门远足就是最好的享受。曾经属于哈布斯堡的地方是这样，曾经属于俄国的波罗的海诸国也是如此，如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但是本可享受的远足我们却没有那般享受，因为格尔达站在了和平协议的错误一边。

康斯坦丁正在说："太多了，我们塞尔维亚人欠那些在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太多了，他们能够把他们国王的遗体带到这儿，还有他们的财富，还延续了他们的文化。"格尔达生气地打断了他，"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被允许留在这里？""这不是被允许留在这里的问题，"康斯坦丁说，"他们被奥地利国王邀请到这儿。""胡说，"格尔达说，"一个人不会邀请一群人来他的国家，并且让他们居住。""但是有时候会，"康斯坦丁说，"奥地利国王想要塞尔维亚士兵保护他的土地，对抗土耳其人，所以交换条件就是他承诺给他们土地。""但是如果奥地利给了塞尔维亚人土地，那么南斯拉夫将匈牙利人赶出这部分国土就太不感恩了，"格尔达说，"它应该还是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没有欠匈牙利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撕毁了对塞尔维亚人的所有承诺，"康斯坦丁说，"而且既然奥匈帝国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就按照自主权的原则重组了它，因为这里的塞尔维亚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更多，所以当然它应该属于南斯拉夫。"

为了换个话题，康斯坦丁继续说："到处都有塞尔维亚人，上帝保佑。你们德国有文德人[注]，他们人数众多，其中还有一些名人，比如伟大的莱辛，他就是一个文德人。他们属于斯拉夫人。""但是他们肯定都不记得了。"我的丈夫说。"他们当然记得，"康斯坦丁说，"在战前和战后，各有

一次文德人分裂运动，它的总部就设在萨克森。我对这个很清楚，因为在1913年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德累斯顿，当我们说自己是斯拉夫人时，酒店门童完全不让我们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也很同情那些站在他们民族那边的人，但是如果你们说你们是斯拉夫人的话，你们会给我惹来警察。’而且当他看我们的护照时，他几乎不能相信世界上还有个叫塞尔维亚的国家。”“但是如果所有的文德人都是斯拉夫人，”格尔达说，“为什么我们不把他们从德国送到斯拉夫国家，把他们占去的土地让给真正的德国人呢？”“那么斯拉夫人，”我说，“可能开始考虑把所有住在弗兰兹斯塔尔这个地方的德国殖民者都送回德国了。”“呦，他们可能会这样。”格尔达说，看上去愁眉苦脸，因为她的理想计划是通过压制和驱逐来打造干净纯洁的日耳曼欧洲，这计划出现了一个障碍。她用塞尔维亚语对她丈夫说：“这个女人真不懂待人处事。”“我知道，亲爱的，”他温柔地回答，“别介意，欣赏风景。”

她做不到。她的眼睛里溢满了愤怒的泪水，脸的下半部分恼怒得鼓了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或是做些什么，就在那时，有人打开了收音机，莫扎特的交响曲在整个餐馆流淌，我们都忘记了格尔达。康斯坦丁开始哼唱旋律，他那又胖又短的手跟随莫扎特的灵魂飞舞，就和在亚伊采追随瀑布旁的小鸟动作一样。我们都感受到莫扎特作品中散发出的舒适，这是一种真实的、物质的舒适，就像一杯白兰地带来的那种温暖，而且能看到它的效力，我想知道它的本质可能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一部分是莫扎特用来消除生活中的匆忙这个想法的技巧性花招。他创造的气氛穿过听众的脑海，但是没有停留；它们不是闲逛的样子。但是它们确实从不仓促，也从不轻率慌乱，它们不会溅起泥泞，也不会扬起尘土。如果我们把创造这些效果的手段评价为某个技巧性手段，这样确实不恰当。因为这些手段改变了运用它的作品的内容，展示出一个幻想的世界，那里的人们不再被时间烦扰，而是接受它的规律，与它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我们与时间的斗争是我们的基础冲突中最压抑的一个；它阻碍了我们的成就和理解力，而那些是我们生活的理由。这个斗争对我们的负担有多重，这可以根据自身偏好来判断。无论我们的信仰多么地超自然，我们都能感受到基督是不同于圣保罗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想象基督匆匆忙忙，也不可能想象圣保罗不那样做。

但那不是音乐的全部；它不仅仅是一个天国风格的象征。动作停止了。很明显，有一个争论，它太精细深刻了，不能用言语表达——因为音乐相比文学能处理更多东西——它被声明，然后被解决，得到某个真实的结论。如果我们这些听众遭遇过引起这个争论的情况，我们就会知晓答案，如果我们够敏锐，能够听出它，我们就不需要极度痛苦地自己找寻答案。但是我们的耳朵里逐渐充满了餐馆里的寻常声响，喋喋不休、刀叉碰撞，音乐对我们有多么小又多么大影响就变得显而易见。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特别

的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对上百万不喜欢音乐的人而言没有任何作用，而且它对我们来说确实不够清楚，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活的话，它需要更清楚一些。为了理解这个答案，我们都还要用很多年的时间学习聆听音乐；我们想要在必要的时候回顾它，我们就还得练习记忆和诠释的能力。一个工具不应该对使用它的人做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解答中，莫扎特只发现了一部分。当我们考虑到它们的发现需要多么伟大的天才，这个发现就很巨大；但和恼人问题的数量相比较，它又显得很小；而他的才能则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超越他。艺术甚至不能覆盖生活之一角，只能涉及这里或者那里的一两个结点，彼此相隔遥远，和整个图案也没有联系。我们怎么能希望它能够给这块庞大复杂的织物，那逆着宇宙之风摆动的帆，带来秩序和美呢？然而，随着音乐从我们头顶墙壁上的神奇盒子里喷涌而出，它承诺我们，一切都会很好，有时，我们的生活会像它一样可爱。但是也许它并没有给出这样的承诺；也许，唯一真实的是，当人们以这样的音调说话，那是在表达温柔守护的爱。而音乐家在作曲过程中使用它们，可能只是因为他发现它们适合某些一定规模的娱乐性安排。

在平原某处，天空堆积着厚厚的乌云；一道闪电穿透云层。头顶上方，风暴即将来袭，在黑暗和泛绿的透彻光线的变幻之间，我们动身前往弗鲁什卡·格拉的四座修道院，这是一次能直接和过去接触的震撼之旅。就好像一个人沿着南部丘陵开车，从大道上掉头，之后沿着侧路进入萨灵顿、华盛顿和斯泰宁，然后发现一些建筑，里面的人经历了理查二世的悲剧，最近才脱下了丧服，他们的哭泣声几乎还没有平静下来。那些修道院有一些奇异之处，立即就引人注目，它们虽然跟拜占庭相距甚远，但都按照拜占庭风格修建，那些僧侣、修女或者朝圣者的房间围成一个圆方形的开放空间，教堂位于正中。尽管有些修道院被烧毁后又按照奥地利巴洛克风格重建，但它们还是遵从了最早的平面图，不会被误认为受到任何最近的或者西方建筑的启发。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修道院已经按奥地利风格重新修建。在它四边形的庭院上空是一个圆形屋顶，如白色珊瑚般华美，在墨黑色天空奇怪的暴风雨光线中看上去光彩夺目；它处身果园之中，树干上依稀可见一些枝叶。它可能是在海勒南塔尔，距维也纳有一小时路程。但是在里面，我们发现东方思想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圣坛前建有一面墙，遮挡光线流动以积累黑暗，因为在黑暗中奥秘可以产生神圣的威力。修道院藏有一位圣人的遗物。那是一个四处流浪抵抗土耳其人的黑塞哥维那士兵，开始时隶属于一位塞尔维亚君主，后来听命于一位匈牙利国王。传说中，土耳其人占领了埋葬他的小镇，他们很害怕，因为发现从他的坟墓里发出一道道光线，他们去找到他们的埃米尔注，埃米尔发现那个死人的身份后昏厥过去，之后就把那具尸体送给了这座修道院的僧侣。因为这位埃米尔是一个叛徒，曾经被土耳其人囚禁，靠抛弃自己的信仰买到性命；他不仅是黑塞哥维那

人，实际上他和那个死者还有亲属关系。这个奇迹般的消息后来传到当时在德国避难的那位圣人的遗孀耳里，她违抗土耳其人找到了这座修道院，在附近成为一位修道者，死后也被葬在这里，就在丈夫身旁。

这可能发生在昨天，它也确实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修道院现在被一些白俄罗斯修女管理，她们都戴着一顶紧紧的黑色帽子，上面的黑面纱垂到肩头，这是一种悲伤的头饰，她们都还沉浸在流亡的悲痛中。我们很难将她们的不幸和修道院建立者的不幸清楚地区分开来，事实上，其他人也做不到。康斯坦丁在方形庭院里的一座坟墓前停下脚步，告诉我里面安眠的是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在17世纪的迁徙中死去；站在我们旁边的两个年轻的见习修女惊讶地呼叫，她们的父母离开祖国之后才生下她们，她们被一种生来的对沙皇的怀旧情结吸引到这儿，而她们一直以为她是她们团体的一员，在从俄国来这儿的路上去世。

暗色的天空越压越低，一些修道院在过早出现的暮色中闪烁着光亮。康斯坦丁觉得如果我们要被困在暴雨中，最好是在一个有更多东西可以参观的修道院里，所以我们在一阵雨点有便士硬币大小的暴雨中匆忙跑回车上。电闪雷鸣中我们又冲进了克鲁斯代尔修道院，它也曾经被烧毁过，所以外面是奥地利风格，但保留了古老的核心部分。它比其他修道院历史更久远。在科索沃战争中，斯拉夫军队的首领拉扎尔大公在战场上被杀死，军队残余被他的亲属继承，其中一个不幸的继承人，名叫史蒂芬，其命运比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更令人惋惜。他的父亲被迫签署条约，将女儿嫁给穆拉德苏丹，派他前去陪伴。但是当苏丹和岳父开始战争，苏丹就挖掉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以免他拿起武器参战。他的眼前一片黑暗，跌跌撞撞地穿过巴尔干半岛，有时作为俘虏被人从一个监狱拖到另一个监狱，然后被释放，回到多瑙河边父亲的营地，跟着父亲再次流亡。他的父亲死去了；他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像他一样也被苏丹弄瞎了双眼——开始自相残杀；他的母亲也死了，据说是中了毒；他的盲眼兄弟逃走了，成为阿索斯山上的一个僧侣；他那获得胜利的兄弟后来也死了。尽管这位死去的篡位者已经指定了他的继承人，但是一群贵族抓住史蒂芬，就像玩捉迷藏游戏一样推得他团团转，迫使他宣称自己是塞尔维亚的君主。塞尔维亚人看到自己面对着匈牙利和土耳其敌人，还可能遭遇内战，就冲向他，将他五花大绑押送着赶出他们的国家。他再次在巴尔干半岛跌跌撞撞地流浪，有时被他无情的支持者推回塞尔维亚，然后又被他那不情愿的臣民打出去，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温柔耐心的坚忍。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在阿尔巴尼亚找到了永久的避难所，在那里，伟大的英雄斯坎德培很喜欢他，把自己的女儿安吉丽娜女公爵嫁给了他。但是土耳其人也来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盲人再次无家可归。最后，在意大利，死亡带走了他。他的遗孀和两个儿子，身无分文，开始重新流浪，匈牙利出于仁慈让他们留在这里。一个儿子成为牧师，建立了这座修道院，最后他们三个人都躺在圣坛前同一个墓穴

里。在这座黑暗的教堂中，圣幛上奢华的、斑斓的镀金闪烁着光辉，我们看到了安吉丽娜女公爵那瘦削却优雅的手，它又黑又干瘪，上面戴着几只不可剥夺的、代表着身份的戒指。

但是这里还葬着其他皇室成员。在地板的一块圆形红色岩石下，埋葬着米兰·奥布伦诺维奇国王，他因为执政不成功，于1889年被迫退位。他几乎跟史蒂芬一样流浪，只是他的流浪路程更舒适，从贝尔格莱德到维也纳和巴黎，不是被外面的土耳其人紧追不舍，而是被里面的土耳其人驱赶。他在克鲁斯代尔修道院不仅仅有一座坟墓，在教堂的墙上还有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为他竖立的一块纪念碑。“为什么不呢？”康斯坦丁说，“米兰站在奥地利那边，他把我们的国家当作奥地利的附属国来治理。”之后，我们来到修道院的宝库，它不在教堂里面，一道闪电驱散了不自然的黄昏，让我们看见外面狂风中被吹得东歪西倒的树木，还有宝库里的拜占庭教堂圣衣、中世纪圣餐杯跟十字架、古代手稿以及茶杯碗碟——上面绘制着斯拉夫风格的灰色美丽花朵，还有银茶壶、咖啡壶、酒杯、酒瓶之类的物品，这些杂乱的东西都是米兰国王的最后收藏。米兰国王留下一份奇怪的遗嘱，将家中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后者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这儿。

“其实很简单，他几乎不在意把这些东西留给谁，只要不是留给他的妻子纳塔利娅王后。”康斯坦丁说。“她被葬在这里吗？”我问。“不，完全不是，”康斯坦丁说，他的否定口吻在这种联系中听起来很愉快，“她还没有去世，她住在巴黎，非常贫穷。不久前，政府被迫阻止一家德国公司拍一部关于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电影，她还就此事写了一封信。”“而且她永远不会被葬在这里，”修道院院长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以前是个牧师，十年前爱妻去世后就成了僧侣，“是这样的，除非她死前被光明指引，因为她在大概三十年前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她做的这件事很奇怪，因为我们的人民对她很友善，而且当她的丈夫恶劣地对待她时，我们站在了她那边。”

另一个房间里摆放着米兰国王起居室里的所有家具；闪烁着华美气息的80年代的沉闷沙龙，墙上挂着这个被毁家庭的肖像——米兰国王，像一个痛苦的丑角，像猫一样地咧嘴笑，非常美丽的纳塔利娅王后，还有他们那肥胖的儿子亚历山大，跟他父亲一样长得像猫，只是这次这只猫病愈了，还有德拉加王后，她长得平淡乏味，即使现在我们认出她的害怕表情，我们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她的脸看起来还是完全索然无味。“我们的辛普森夫人。”康斯坦丁指着她的画像说。“是的！是的！我们的辛普森夫人。”院长大声说，哈哈大笑起来。这里还有米兰国王的卧室，有着红木家具，还有更多这些不幸之人的画像，他们被保存在悲剧中，就像琥珀里的苍蝇。

在我们离开前，我又回到了那个宝库，最后看了一眼那些刺绣，两张照片

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些塞尔维亚农民、士兵和牧师在雪地中前进的照片，他们神情悲怆，正将米兰的遗体送去坟墓。“他们为什么对米兰·奥布伦诺维奇如此热情？”我问康斯坦丁，“他治理国家很糟糕，他的私人生活也很差。我注意到甚至修道院院长提到他时也说他表现恶劣。”“米兰·奥布伦诺维奇是怎样的人，这都没有关系，”康斯坦丁说，“他是自土耳其的征服后我们的第一位加冕国王。当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像火炬一样在史蒂芬·杜尚皇帝手中熊熊燃烧，但是之后它变得昏暗，在安吉丽娜女公爵那个可怜丈夫的手上，它在风中摇晃着熄灭了。那个熄灭的火炬被卡拉乔尔杰重新点燃，在他的继任者迈克·奥布伦诺维奇亲王的手上，它变得明亮，然后米兰成为国王，火炬的光亮愈发稳定，尽管他不该是拿着火炬的人，但是那是我们古老的尼曼雅王朝举起的同一个火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他做过什么事呢？这些塞尔维亚人在雪中追随的不是米兰，而是他们的国王，它是塞尔维亚力量的化身。”

暴风雨平息了，我们再次开车驶向平原，现在的空气清新透彻，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晰，我们可以看到被几英里绿色锋利草叶刺破的丰饶的春天大地，村庄外的池塘里映照出清晰的蓝天白云。我们掉头回到丘陵牧区，从一座小山谷进去，马上到了一些隐蔽的苹果园和一个漂亮的峡谷，它像德文郡、诺曼底呈现的任何东西一样甜美。在苹果树和紫荆树掩映的白墙后面，我们发现了一座修道院，里面有一座惊人的教堂，它是那些移居的人穷其想象建造而成的；它是一个融合物，美丽而混乱，既有拜占庭风格，又有巴洛克风格，既有14世纪东方格调，又有18世纪西方韵味。就在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位俄国僧侣朝我们走来，那是一个年轻人，像我们在第一家修道院见到的那些修女一样，他一定是在父母离开俄国之后出生的。他很俊美，我只在俄国人身上见过他这种眼睛，看上去就像舞台上的明火一样危险，因为它们格外地闪烁光芒。他带着疏离的微笑告诉我们，修道院院长出去了；我们很失望，因为院长不仅是普里比切维奇家族的人，还是一位著名民主政治家的弟弟，那位政治家在亚历山大国王独裁期间死在流亡途中。“真可惜，”康斯坦丁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给这些英国人看看这里有趣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那个俄国僧侣说，“我们只有一位塞尔维亚国王的遗体。”他讲话不带半点傲慢，可说出的话却跟周遭环境完全格格不入，无论它们多么地热情友好，这是某种白俄罗斯移民的特征。

我们说，我们觉得那就足够有趣了；然后他带着我们走进那座风格混杂的精致教堂，里面光亮美丽。两个漂亮姑娘正站在梯凳上擦窗户，她们噔噔噔下来，跟着我们，微笑欢迎，同时虔诚地喃喃细语，那时我们正走向国王的石棺。俄国僧侣抬起它的盖子，让我们看了看被一块生锈的银质方布覆盖的国王遗体，但是他没有为我们揭开方布。他耸了耸肩，说只有在国王日才能这样做；他虽然漫不经心，但宗教狂热不仅明显在他的经验范围

内，且从未远离他，要不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更像女帽店里的店员，拒绝从橱窗里拿出一顶帽子。但是我们背后的两个姑娘非常失望地深深叹了口气。

“这是乌罗什，史蒂芬·杜尚的儿子，”康斯坦丁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可怜人，几年内就失去了父亲所有的王国。”“然而他还很受人尊敬。”我说。“那是肯定的。”康斯坦丁说。“但是那些尊敬他的人知道他做过什么吗？”我问，“比如这些姑娘，她们知道他毁掉了塞尔维亚帝国，导致了科索沃战争吗？”“嗯，我不能说她们能通过历史考试，”康斯坦丁说，“但是她们一定知道他的软弱和他的失败。然而，那一点儿都不重要。他属于我们古老的王朝，他属于尼曼雅王朝，尼曼雅王朝是很神圣的王朝。这个王权不仅是我们的国家力量的工具，对我们还有宗教的意义。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坟墓上写着‘神圣的出身’；这位乌罗什，尽管他被来自世俗力量的篡位者杀死，他仍然成为我们教堂的殉道者。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虔诚。这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尼曼雅王朝将基督教和统一同时带给我们塞尔维亚人。我们之前当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现存的教堂。然后这个卓越的小诸侯家族，来自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黑山无名村庄，他们来到了这里，在几年内做到了罗马在任何国家花了几个世纪才做到的事。第一个统治塞尔维亚的尼曼雅国王，斯特凡·尼曼雅，禅位给他的儿子斯特凡，然后成了一位僧侣，被称为圣西缅，他是一位真正的圣人——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他的坟墓中流出的油创造了很多奇迹；他的一个儿子成了我们的圣萨瓦，他是阿索斯山上的一位僧侣，在哥哥的王位不安全时离开了修道院，他将塞尔维亚变成了教会与政府紧密结合的结构，尽管在之后的六十年里，王位继承者都很无能，却没人能够拆开它。但是萨瓦既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圣人，也是一位朝圣者，他拜访了底比斯的僧侣。他的哥哥，斯特凡二世，也是一位圣人。斯特凡二世在垂死之际，派人请圣萨瓦来接纳他成为一位僧侣，但是圣萨瓦到得太迟；但是上帝恩赐他从死亡中站起来宣誓成为僧侣，所以他的尸体站起来，就任了圣职。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忘记圣人和国王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的早期历史造就的。”

“再见，”那位俄国僧侣站在门口说，“院长一定会很遗憾没能见到你们，尤其因为你们是英国人。他现在到邮局投诉去了，因为一些来自英国的书籍还没有收到；我想这些书是某个叫作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组织送给他的。”我们离开了群山，重新回到平原上，现在那里又要开始暴风雨了，随后我们又从另外一个山谷回到山中，让人震惊的是，那个山谷和威尔特郡的某个丘陵角落很像。歪扭的荆棘树种在铺着草皮的简陋沟渠旁；道路尽头是山腰，上面开着一个用金属包好的矿井口，我们进了一个煤矿村庄，它像任何国家和大陆的同类村庄一样单调，但因为刷了石灰水而看起来光彩耀眼。在它的直角街道处我们迷了路，停下车询问一群男孩子去弗尔德尼克修道院的路。其中一个男孩子站上车门的脚踏板给我们指路，他

带着我们下到村子中间的沼泽地。我们必须小心地前进，因为里面还有一条铁轨。“看上面，看上面，”男孩说，指着我们眼前的山腰，“那里就是弗尔德尼克修道院，看它的墙多么雄伟，看它多么富有，还有那些葡萄园和果园。”我们顺着一条金绿色的白杨树大道走到门口，男孩告诉我们他将来要成为一名僧侣，我们碰见他的时候和他同行的那些男孩都有同样的选择。“为什么？”康斯坦丁问，“是不是在你们出生的时候，你们的母亲承诺将你们献给上帝？”“不，不，”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主意。我们喜欢这个修道院，只要可以的话，我们就来这里，在这里，我们总是觉得很快乐，我们想要终身侍奉它。”

弗尔德尼克修道院比其他修道院都更大，这很自然，因为它独一无二的收藏吸引了很多朝圣者；由于这些朝圣者带来的财富，这座庞大的两层方形庭院得以修葺一新，四处刷了石灰，布置得像一座花园，种着李树和日本海棠。它的教堂也跟其他教堂不同。它似乎拒绝了拜占庭的指示，不认为魔法一定只在黑暗中出现。阳光直接照耀在镀金圣幛和五彩宝座上，在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反射出琥珀色的光。它可以这样做，因为这里没有必要制造魔法。魔法已经存在于放置在圣幛前的棺材中，里面装着在科索沃战争中殒命的拉扎尔大公的遗体。

他穿着淡红色和金色的浮花锦缎长袍躺在里面。一块黑布遮住了他的头以及头与肩膀间的空缺。干瘪、棕色的手，近乎黑色，交叉在他的胯部，手上还戴着几只表示他的阶层地位的闪亮戒指。萎缩的脚上套着新式袜子，还穿上了柔软的蓝色丝绸和金线交织的中世纪靴子。他的身体萎缩程度简直难以置信，髋骨和肩膀将锦缎都撑起了尖角。他就跟站在贾罗或者威尔士煤矿小镇街头的人群一样可怜。就像他们，他意味着失败、希望的破灭、权力的浪费。他也意味着死亡，但是这个没那么重要。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已实现，所有的权力都已行使，谁又会憎恨死亡呢？满足了的生命一定会经过某个理想的点，从那之后进入接受死亡的状态。但是失败就是失败，而且很苦涩；不仅因为尊严，更因为它会磨钝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是人被赋予的用来对抗充满敌意的宇宙并寄托救赎之期盼的唯一工具。当这个人遭遇失败，不仅他的意志经受挫折，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念，人类精神的广阔运动都将经受挫折。拉扎尔大公乌黑坚韧的手上戴着几枚华丽的戒指，它们诉说着这件事；他的葬礼盛况高雅，入殓仪式美丽庄严，这些都表明了和他一起被毁灭的东西的价值。我伸出一根手指抚摸那双坚硬干枯的手，它们五百年前就已没有了脉搏。这里写下这个人的可怜命运，因为所有的形势对他都很不利，只有当无数情况对他有利，他才能够得到他应得的胜利；但是生活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的痕迹。

在一间黑暗狭窄的宝库里，凌乱地堆放着一些古代手稿，上面竟然奇怪地挤入了一本陶赫尼茨版本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此外还有一些拉扎尔

大公的所有物：他和贵族们在战前宣誓的圣像、喝水的高脚杯和某个城市的模型。毫无疑问，任何一样东西都是真品。土耳其人允许拉扎尔大公的遗孀带走他的尸体和他所有的私人物品，一段时间后，她把它们都放在了拿云力卡修道院，那是他自己修建的修道院，坐落在塞尔维亚境内的贝尔格莱德南边去尼什的路上。它经常被土耳其人袭击和毁坏，所以，移居者于1683年带走了所有遗物，建立了这座新的修道院作为居住地，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拿云力卡修道院。我跪下来，透过橱柜的玻璃窗去看那些珍贵的物品。圣像被毁坏了，但是非常美丽：它的背景是一群紧紧依偎的高飞圣人，这是想象的产物，因仪式的体验而显得规矩正式。还有一块天鹅绒布片，过去是绯红色，现在呈红褐色，上面用镀银丝线绣着字，很多字——一篇祷文，一首诗。

那是尤菲米娅王妃缝制的，她是一位被土耳其人杀死的塞尔维亚王子的遗孀，在拉扎尔大公的王庭避难。拉扎尔大公在科索沃殒命后，她和他的遗孀米莉察一起前往卢伯斯廷亚修道院，在那里她们两人都成为修女。尤菲米娅王妃很有刺绣天赋。欧洲早期最有名的绣品中有两个就是她的作品：阿索斯山上的一座塞尔维亚修道院，赫兰达尔修道院的教堂中圣堂大门的门帘，还有四旬斋时放在圣坛上的一块布——现存放于罗马尼亚的普特纳修道院。在修道院的静谧中，她绣出一块墓布盖住拉扎尔大公被割断的头颅，在上面她用针写了一封信给他。

“您在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中长大，噢，拉扎尔王子，噢，新的殉道者，”她在开头写道，“上帝的力量使您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王更强壮、更有名。您统治了您父亲的国土，您恰当地给您治下的基督徒带来了幸福。在勇气与虔诚中，您去打仗对抗毒蛇穆拉德，上帝教堂的敌人，因为您的心不能忍受看见伊兹梅尔的主人统治基督徒的国家。您下定了决心，如果您失败了，您就会离开这个尘世力量的坍塌要塞，染上自己的鲜血，与天国国王的主人们同在。

“您实现了您的两个愿望。您杀死了毒蛇，您从上帝那里赢得了殉道者的王冠。所以不要忘记您心爱的子孙，他们因为您的死亡被抛下无人照管，而您在享受天堂无尽的喜悦。很多烦恼和痛苦降临在您心爱的子孙身上，他们的人生在悲痛中度过，因为伊兹梅尔的子孙统治着他们，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帮助。所以我们乞求您向人类的主宰祈祷，为了您心爱的子孙和所有用爱和信念侍奉他们的人。因为您的子孙被疾病缠身，已经忘记了，噢，殉道者，您对他们的仁慈。但是尽管您离开了尘世，您知道子孙的烦恼和痛苦；既然您是殉道者，您在上帝面前定有一定的自由权。

“所以在授予您殉道者王冠的天堂国王面前跪拜吧；乞求他让您心爱的子孙长寿、幸福、顺心；乞求他让东正教可以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巍然屹立；乞求他，万物的征服者，让您心爱的子孙，斯特凡王子和弗克王子，

战胜他们所有的敌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敌人。如果上帝赐予我们他的帮助，我们将赞美您、感激您。聚集您的同伴，神圣的殉道者们，和他们一起向上帝祈祷。呼唤圣乔治，唤醒圣迪米特里厄斯，劝导圣西奥多，带上圣墨尔库留斯和圣普罗科皮尤斯；别忘记了色巴思的四十位殉道者，在那里，您心爱的子孙，斯特凡王子和弗克王子，现在是苏丹军队的封臣。祈祷他们会得到上帝的帮助，您也要来帮助我们，无论您在哪里。

“看看我微薄的供品，在您心中放大它们；因为我的赞美完全配不上你，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但是您，我尊敬的统治者和神圣的殉道者，过去您对世俗的、短暂的东西都很慷慨，您将会更自由地赐予我们您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伟大永恒之物。当我作为一个流亡的陌生人找您之时，您给予过我需要的东西，现在我祈祷您能拯救我，平静我的灵魂和身体里的狂野风暴。这是尤菲米娅真心的供奉，噢，荣福圣人。”

---

1. 文德人（Wends），斯拉夫部落集团的统称。
2. 埃米尔（emir），伊斯兰教国家中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

贝尔格莱德III

造就现代贝尔格莱德的——尽管没人能从城市的外观猜出来——是一种复兴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荣耀的有意识的努力。欧普莱纳克山的怀旧壁画真实揭示了这份占据主导地位的幻想，这不仅是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幻想，也是塞尔维亚人的幻想。尼曼雅王朝和它的财富、文化还鲜活地存活在农民的记忆中，一部分原因是东正教教堂，因为它们一直恰当地提醒着他们，他们曾经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基督教国家，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民谣。这些民谣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没有艺术感。大概在科索沃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塞尔维亚人根据很早就经由达尔马提亚传到巴尔干半岛的英雄史诗，或多或少地集体创造了这些歌谣。从那以后，这个国家的所有艺术创造力，否认了其他所有的发泄渠道，被全部倾注到这些歌谣中；到了18世纪晚期，民歌在西方开始衰落，却在这里焕发新生，因为法国大革命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和自由观念发现它们完美的表达已经存在于这些被奴役人民创造的挽歌之中。因此，参加1804年第一次对抗土耳其的起义的塞尔维亚人，一点都不像那些仅仅为了对抗某种直接不公的落后的人。他们不仅在起义；他们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的继承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重新创造这个文明。

弗鲁什卡·格拉的修道院和拉扎尔大公发暗的遗体很可能对这次起义有着直接影响。卡拉乔尔杰从塞尔维亚逃走，在路上他杀死了他的继父，之后他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一段时间后他就擅离职守，成了山里的一个“黑盗客”，因为他相信在分配勋章时他被不公平地忽视了，但是他最终重新加入军团，被他的上校接纳，因为后者很钦佩他的人格，并在土耳其与奥地利的战争之后雇用卡拉乔尔杰为弗鲁什卡·格拉的森林游骑兵。他在那里待了很多年，之后贝尔格莱德的新帕夏哈吉·穆斯塔法——被称为“塞尔维亚人的母亲”——的和善诱使卡拉乔尔杰回到了塞尔维亚。因此，他有过一段思想上的经历，但是这点通常没有被讲到，他只是被描述为一个养猪人；实际上，他在经济方面的状况也和这个词暗示的意思不一样。他是一个生猪贩子，而且生意规模很大，当他被推选为塞尔维亚司令官时，他的年收入大概有一千英镑。尽管奥斯曼帝国省份的普通基督教居民大都一贫如洗，还是有一些人例外地享有非常可观的富足；按照革命通常的悖论情形，起义的人是这些例外之人，而不是那些被压迫的大众。

塞尔维亚人选择卡拉乔尔杰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并不清楚。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尽管他在奥地利军队服过役，但是他似乎并没有获得任何特别的荣誉。他的性格绝对暴躁反复：有时持续几天心不在焉，或者因为捕风捉影的怀疑而一阵暴怒。但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即使站在一群高个子中间，

他还是很高大，有着炽烈如火的双眼、乱糟糟的炭黑色头发、英俊的面庞，尽管脸上带着深深的恐惧神色，还有奇怪的响亮嗓音。他是一个天生的勇士，战争就是他鼻孔里的呼吸。在所有事情当中，他最喜欢参与骑兵冲锋，在最激烈的时刻从马上跳起来，用步枪开展贴身近战；他用左手开枪，因为在早年的某次作战中他的右手被撞得粉碎。他的勇气为他带来了声望，但他还另外得到了些奇怪的、几乎神秘莫测的声望，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有钱人，他抛弃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更明显的享乐。那些富裕的塞尔维亚叛逆者都习惯去模仿土耳其帕夏，穿着丝绸衣服，使用金制挽具和雕花武器，还在家里摆出一定的排场。但是卡拉乔尔杰像农民一样穿衣、居住、动手劳作。

这些都显示出了卡拉乔尔杰的与众不同，但这不是他之后表现出的那种程度或者类型的与众不同。他在九年时间里证明了自己是欧洲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杰出，不仅是一名战斗的士兵，还是一位策略家；他指挥军队侵扰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军队——有时多到三倍，这是他的军事天赋最惊人的胜利之一，但是更惊人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过什么参谋学院。他也是一个有手腕的外交官，不仅在治理他的人民上——他必须给他们灌输“统一”这个重要观点——他还耍弄奥地利和俄国去对抗土耳其，却没有在塞尔维亚的独立上做出妥协。他建立起某种政府系统来推翻土耳其暴政，在这一过程中，他表现得像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确实，他在其中展现了自己最不可思议的天赋。

很明显，叛乱者的强大个性将国家置于另一种形式混乱的危险境地，尽管这种混乱正是他们想要纠正的东西。在一些地方军队将领的治理下，国家很可能会分崩离析，因为他们互相争吵，使巴尔干的基督徒们陷入一种不统一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曾经在四百年前让他们在土耳其人面前无能为力。为了控制局势，卡拉乔尔杰成立了一个由将领们组成的国民议会，他们在每年新年时开会讨论所有军队事务，包括战术、战略、政治、财政以及纪律等事务。但是，这明显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一些塞尔维亚将领去拜访沙皇，不久之后一个新的机构组建起来。他们途中又去了波兰的哈尔科夫，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位叫作菲利波维奇的律师，他出生在诺维萨德，是17世纪塞尔维亚移居者的后裔。他提议说，他可以随同他们一起回去，在塞尔维亚建立立法和司法系统。他们同意了，带他去见卡拉乔尔杰。卡拉乔尔杰一直忠实于弗鲁什卡·格拉的影响，因此十分欢迎菲利波维奇，让他继续工作。

于是，菲利波维奇坐下来，给塞尔维亚政府起草了一份宪法。他创立了一个苏维埃，或者叫作委员会，从不同的地区总共选取出十二个人，并且由各自地区支付报酬给他们，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他组织成立了这个机构，并且担任了书记一职。他的一封信件被留存至今，他在信中出售

塞尔维亚领土内土耳其人的房屋和土地以充军资，确定税收，组织地方行政官员系统，并教育苏维埃代表们权利的准确本质，同时告诫他们预防腐败。他还颁布了一部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法典。很难想到历史上还有别的人单枪匹马地承担过比这更全面的工作；有意思的是，菲利波维奇从来都不是一个激昂的爱国者。他接受这个职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为了逃离哈尔科夫的气候，因为他觉得那很讨厌。但是他有真正的守法主义者思想，最高意义上的守法主义者思想，而且他很高兴能够给一个混乱的社会带来秩序。很明显这种高兴得到了卡拉乔尔杰的回应，尽管他的本性截然不同。

他热情地支持菲利波维奇宏伟的教育方案。那个时候，塞尔维亚仅有的学校都在修道院里，就读这些学校非常不便，因为僧侣们承担不起那些不能帮他们耕种土地的学生的食宿，而这种不足的教育往往要耗费好几年时间。在菲利波维奇的指导下，苏维埃在每个大城镇都建立了一所小学，然后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所中学，提供更全面的课程。这让卡拉乔尔杰很高兴，虽然自己不能读书写字，但他是教育的忠实信徒，且总是让他的追随者记住把一切事务书面记录下来的好处，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一样目不识丁。

菲利波维奇英年早逝后，卡拉乔尔杰还是继续执行他的远大计划。随着时间的流逝，参议院很明显并不能如预期那样平衡国民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反叛军将领的权力才是这块土地上唯一的真正权力，很快，他们就间接控制了苏维埃，就像他们直接控制了国民议会一样。看起来他们不仅可能分裂国家，导致它在遭到外来侵略时无能为力，而且他们会变成和土耳其帕夏一样的贪婪压迫的专制君主。为了解决这个威胁，卡拉乔尔杰将两个最有权势的将领革职，然后利用自己作为国家指挥官的声望控制了苏维埃，迫使它以全部人民的利益为重。他采取这种态度，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受斯拉夫民主传统的影响，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作为一名士兵，他知道国家统一对于一个不断受到外国势力威胁的国家而言是多么重要。

卡拉乔尔杰坚持严厉地工作；他看起来的确是个严峻之人，因为他奋斗的实质是艰苦朴素。他对抗的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异教奢侈的践行者。在对抗的第一阶段，与他交战的是最擅长这种奢侈生活的土耳其人——那些叛变的土耳其禁卫军士兵，他们给萨拉热窝带来了沉醉的享乐之风，他们之所以反叛改革派的塞利姆苏丹，就是因为后者尝试执行朴素的全新军资分配方案。卡拉乔尔杰的一个追随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记录。1805年战役之前的一天晚上，塞尔维亚士兵驻扎在俯瞰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帕拉钦的高地。沟渠已经挖好，卡拉乔尔杰检查了它们，确定明天战役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他在一座大炮上坐下，问他的军官有没有什么梅子白兰地。他们给他取来了一小瓶梅子白兰地，还有一些玉米面包，他喝了几

口，把酒瓶递给他们，把玉米面包也分了出去。他们看着山下的帕拉钦，它在黑暗中闪烁着灯光。灯光很明亮，看上去就像烈火在熊熊燃烧。卡拉乔尔杰的一个随从，一个叫史蒂芬的抄写员，只是一个秘书，因为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个好士兵，俯视着那座城镇说道："请让我对着那些土耳其人放一炮！"卡拉乔尔杰笑话他，但是他继续乞求："让我发射一颗炮弹，就一颗，对着宫殿！"卡拉乔尔杰讥笑他说："但是你可能会杀死帕夏！""嗯，为什么不呢？"抄写员史蒂芬问。"唉，"卡拉乔尔杰说，"你一定不能这样做。你可能会让他的孩子变成孤儿，然后没人给他们买鞋子，然后他们光着脚到处跑的时候可能会着凉，然后发烧死掉。"但是史蒂芬抄写员一直缠着他，最后达成心愿，非常不熟练地瞄准、放炮。炮弹像闪电一样划破空气，直接朝帕夏的宫殿飞去。一瞬间，长笛、管风琴、鼓声戛然而止，灯光熄灭，一片黑暗和寂静。卡拉乔尔杰在很多时候的反叛肯定就像这颗致命的炮弹，终止了一切光明和音乐，带来了黑夜。

从他的开端并不能推断出他的结局。过了一段时间，他指挥的战争改变了形式。塞尔维亚人开始暴乱的目的是摆脱达希斯，一位土耳其禁卫军将领，这些叛变的将领拒绝服从苏丹的命令，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君主。但是当塞尔维亚人将四名将领砍头之后，他们开始梦想将自己从土耳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确实，尽管他们服侍苏丹，苏丹还是背叛了他们，这让他们意识到这样做很有必要。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且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改变。当拿破仑打败奥地利，土耳其人被英国和俄国掠夺时，塞尔维亚人还可以抱有希望。但拿破仑的光辉黯淡了，俄国成为一个心事重重且常常不忠的同盟，而伟大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重新整治了土耳其。最后，在1813年，一支五万人的塞尔维亚军队面对着一支人数是他们三倍的军队。他们肯定会失败，但是塞尔维亚人知道，就算对方人数更多，只要他们做充分的抵抗，他们就能够赢得和平谈判的机会，但是卡拉乔尔杰丢脸地直接跑掉了。他退却了，而他本来应该补充增援力量，以此支持不断遭受袭击的军队，那支军队正在建造一座雄伟的堡垒来抵抗土耳其大军。他的军官们突然发现他没有留下一句解释就抛弃了他们。有一段时间他在乡间流浪，然后他渡过多瑙河逃回了诺维萨德和弗鲁什卡·格拉。

没有人知道卡拉乔尔杰为什么这样做。他也从来没有公开进行过任何辩解。在那之前，连他最大的敌人都从来没有指责过他懦弱或者不关心国家。很可能疲惫释放了他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因素造成了他早期的忧郁和心不在焉。他的家庭生活一直是一个悲剧。他谋杀了他的继父，但是那并不是他被迫对家庭犯下的唯一暴行。他有一个弟弟很不成器，还犯下了强奸罪。这种罪行被认为至少和谋杀一样严重。穆斯林经常对基督徒犯下这种罪行，所以一个基督徒强奸另一个基督徒被认为不仅是性犯罪，还有叛教的意味。所以卡拉乔尔杰下令将他的弟弟吊死在房门上，并禁止他的母亲为儿子服丧。这是法定程序，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

方，但是斯拉夫人的兄弟关系都特别亲近，所以即使他个人心肠很硬，他带着种族印记的那个自我也一定感到非常惊恐。

他过着一种极其忙碌的生活，像拿破仑一样。考虑到他目不识丁，这给他作为总指挥官和首相的工作带来了诸多障碍，而且他那时已经五十一岁了，其辛劳更可以想见。在日常工作之外，他还必须具备相当强的侦探能力和不间断的理解力。他所有的时间都被用来仔细检查那些反叛将领的言行，他必须通过他们来完成工作，他还要判断他们忠诚与否，如果不忠诚，就要决定击杀他们的最佳时刻。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掐灭各种阴谋，不仅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国家。难怪在这样九年噩梦缠身的生活后，他忘记了自己的本性，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也许这也和那位科索沃重要的传奇人物有关：拉扎尔大公没有胜利，也没能保护他的人民，他那发黑的遗体经过颠沛流离之后流落在弗鲁什卡·格拉，但是他塑造了卡拉乔尔杰和其他塞尔维亚人的性格。那种强大的影响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塞尔维亚人总是将卡拉乔尔杰尊为他们的自由的建立者，即使他失败了，他们也没有减少任何敬意。

这位伟人的神秘陨落还有一个插曲。四年后，卡拉乔尔杰回到了塞尔维亚。那时，这个国家正被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统治，他是卡拉乔尔杰的死敌，因为他怀疑卡拉乔尔杰杀死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因此，卡拉乔尔杰不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此行将面临的死亡。而且如果仔细审视他回来的表面原因，这次旅程比乍看起来更像自取灭亡。尽管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一样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但塞尔维亚人从来都不信任希腊人，因为土耳其人废除了塞尔维亚牧首区，命令希腊牧师来管理塞尔维亚人，这些旧恨宿怨多得使他们没法成功结成联盟。卡拉乔尔杰知道这一点，在他统治塞尔维亚期间，他也因为这个原因，没让他的国家和希腊反叛者有过半点瓜葛。但是在1817年，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正在跟苏丹进行一场最微妙的谈判，卡拉乔尔杰作为一个希腊革命协会“民族协会”的代理人回到了塞尔维亚，劝说塞尔维亚人在希腊起义的同时也举行起义。他一定知道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想杀他灭口，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也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一定知道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非常有可能将他灭口。他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杀死，当时他正在一个洞穴中睡觉。

但是并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自杀倾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自己也有这种倾向，尽管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奥布伦诺维奇的宫殿还矗立在贝尔格莱德。那是一座土耳其式宅院，有一个突出的顶层，空气清新、光线充足，还安装了很多水管。在贝尔格莱德保罗亲王博物馆的第一层还能看到他和妻子穿过的长袍。它们比展示在旁边的卡拉乔尔杰的衣服华丽多了，就像某个土耳其帕夏和他的女眷穿过的衣服。确实，他给别人的印象就像一位帕夏，交叉着双腿坐在丝缎垫子上，包着头巾。米洛什

着眼于那些卡拉乔尔杰似乎已经将之从塞尔维亚人身上赶出去的特质上，也就是奢侈和享乐，它们造就了萨拉热窝，它们也导致了帕拉钦被点燃。他无意驱逐它们，而是把它们从穆斯林的所有物变成基督徒的所有物。

他有能力安排这种转变。他只能追随卡拉乔尔杰的方向，但是他在这种追随中加入了自己的天赋。卡拉乔尔杰在1813年渡过多瑙河逃走，尊他为领袖的大部分将领都像迷失的羊群一样逃窜流亡。米洛什站在原地，平静地等待恐惧，他知道土耳其人一旦回来，那种恐惧将在整个国家爆发。一开始是屠杀，还有刺刑、断肢和炮烙；然后是有条不紊的劫掠，这种行为在法律的伪装下变得尤其恶劣。各种各样的土耳其人出现了，声称他们是一些被叛乱的塞尔维亚人赶出去的地主、商人，认领各种肯定从来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和财富。这些冒领都被同意了。塞尔维亚人民变得一贫如洗。

米洛什微笑着，温和地等在一旁。他竭力取悦贝尔格莱德的新帕夏苏莱曼。米洛什曾经在战场上重创过苏莱曼，苏莱曼反而因此尊重他，而且由于米洛什对卡拉乔尔杰的仇恨众人皆知，因此苏莱曼信任他。苏莱曼任命他为三个大区的总督，他则用表现得非常鲜明的彻底臣服来回报这份荣誉。他不断劝告塞尔维亚人放下武器，放弃反抗土耳其人。当一些反叛者聚集在他治下的某个地区，他马上前去，劝说他们投降，告诉他们苏莱曼承诺会赦免他们。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他们当中有一百五十人被斩首，大概四十人被钉在尖桩上；米洛什本人被遣送至贝尔格莱德，然后被囚禁。他用贿赂的手段逃了出来。这些反叛者能动用的资源比现代读者想象的多得多。他回到了家，找到那些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发狂的人群，使他们相信马上又将有一轮大屠杀。然后他断定最好现在开始行动，于是当上了他们的领袖。六个月后他将土耳其人赶了出去。

我们必须承认，米洛什从来没有跟卡拉乔尔杰一样面对那么巨大的困难，而且他取得这一最令人费解的胜利的原因是土耳其指挥官突然下令撤军，这就跟卡拉乔尔杰的严重背叛一样令人费解。但是米洛什表现出了跟他的竞争对手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天赋，之后他还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更伟大的外交家，而且通过一个极其重要的举动，证明了他还是至少同样伟大的政治家。胜利之后，他先是表面上公开宣称对苏丹的臣服，然后便用无限的狡诈和耐心坐下来协商他的国家的独立。他知道怎样恰到好处地利用土耳其对俄国的畏惧，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让俄国军队援助塞尔维亚不是一件易事。土耳其对它的外交关系感到非常放心，他就威胁要依附这个或者那个强国；当土耳其对此不安时，他又宽慰对方，保证会保持中立。他有着绝对可靠的嗅觉，知道什么时候要贿赂哪位帕夏，什么时候要威胁哪位大宰相。他花了十八年时间，千方百计地从土耳其宫廷索取到塞尔维亚的独立，那时欧洲没有任何人觉得土耳其宫廷会对他妥协，除非土耳其帝国瓦解。确实，他赢得的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土耳保留了在它

的一些城镇，尤其是贝尔格莱德驻扎卫戍部队的权利，而且拒绝承诺不再插手塞尔维亚的内政。但是这是实际的独立。土耳其军官及其正规部队、非正规兵团都不再在这个国家随意漫步。

紧接着那次胜利的是米洛什展现其政治手腕的重要举动。《阿德里安堡条约》给予了塞尔维亚有效的自由，附加了一些让人苦恼却并不严重的限制，而且移交给了米洛什广阔的皇室领地。他本可以把它们作为奖赏分给自己的追随者，建立一个他可以依仗其权力的庞大地主阶级，但他却把土地作为小地产分给人民，并且保证塞尔维亚会是一个农民国家，从而赋予它幸福和独有的特色。他在他的国家展现出了各种军事和外交才能，而这个伟大的举动可以说是他事业的顶峰，它本来可以使他成为欧洲最受爱戴的统治者，但是他自己使得他的声誉远非如此。多年来他都在实施一种特别令人讨厌的、毫无必要的专制统治。他当然要为他的两个政治对手的死亡负责。即使因为土耳其的占领所导致的混乱，在这个国家谋杀还不是那么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他毫无理由地占领一个塞尔维亚同胞的房子和土地，按自己的意愿让其劳作，或者封闭公共林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猪群牧场，就没有任何开脱的理由了。

当他变得越来越有权势，他也表现出越来越多令人震惊的邪恶。苏丹任命他为塞尔维亚的第一位王子，这本来应该让他清醒，却似乎让他变得像是喝醉了。他让他的臣民用奥地利货币向土耳其缴纳贡税，自己却用土耳其货币转交，利用差额中饱私囊。他坚持自己殴打、惩罚他的军官的权力。他的以下作为更激怒了他的臣民：他垄断了盐业，而塞尔维亚本就非常缺盐，只能从瓦拉几亚进口；他把他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利润全部投资到了瓦拉几亚地产上，计划一旦被免职，就去那里。这几乎是在招惹民怨。他有一位出众的妻子，露比莎王后，她在年轻的时候多次跟他一起站在战场上，用英雄的痛骂激励勇士；她给丈夫煮饭，每天在桌前等他，并且以严惩任何吸引她丈夫目光的女人而闻名，她的手段非常可怕，据说有些女人因此而死掉。很显然，他的专制让她觉得他发疯了，她乞求他的朋友去提醒他，他正把自己送上绞刑架。

但是绞刑架正是他想要的。1838年，一部宪法被推到他面前，那是列强演出的一场闹剧。俄国和土耳其认为，如果塞尔维亚有宪法，它们就能实际保证和诠释它，所以沙皇尼古拉和苏丹穆罕默德，欧洲的两位声名显赫的专制君主，强迫塞尔维亚立宪。因而，帕默斯顿[注]和路易·菲利普，两位自由主义和议会权力的倡导者，发现他们被迫要去敦促米洛什成为专制君主。这场忙乱似乎很荒谬。为什么一位立宪制下的君主比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更容易受外部势力影响，这点并不清楚，可能是某个外交部门的某个愚蠢的年轻人引发了整场争论。但是俄国和土耳其赢了，一部宪法被送到了高兴的塞尔维亚人民面前。

米洛什拒绝执行它。实际上，他试图完全扣留它，但是他的反对者知道了这部宪法的存在。一群坚定的人聚在一起，领头的是一个叫福特切奇的将领，他曾经是米洛什最勇敢的助手，但是主人残忍又愚蠢的任性结束了他的忠诚。有一天他们包围了米洛什的房子，遣送了他的护卫队，还有那些专门服侍露比莎王后的人。她走到丈夫旁边，当他看见她，他说："唉，你看，你站在我的敌人那边也没有用了。他们也带走了你的护卫队。"她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就如何处置米洛什讨论了很久。一些将领声称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一定要处死他。但是他是塞尔维亚自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的第一个王子，这些塞尔维亚人继承下来的坚定的，甚至是迷信的王朝意识让他们认为，由于这种象征意义，他变得神圣无比。他们决定，他必须让位给长子米兰，然后被流放。当人们将决定告诉米洛什，他说："如果他们不再想要我，那好，我不会打扰他们了。"他签署了退位契约。两天后，他渡过萨瓦河到了奥地利的领土。很多人，甚至包括福特切奇，看见他的时候都哭了。福特切奇扔了一块石头到河里，对米洛什大声说："此石漂浮之日，便是你返回塞尔维亚之时。""我将作为塞尔维亚的统治者死去。"米洛什回答道，船夫划着船，载着他，连同他那奇怪、愚蠢且不太虔诚的想法。

---

1. 帕默斯顿（Palmerston, 1784—1865），英国政治家，自由党创建人之一，于1855—1865年担任英国首相。

贝尔格莱德IV

福特切奇和他的追随者接受米洛什退位的行为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怪诞，更像是有关图腾和禁忌的问题。因为米洛什的继承人完全不适合做统治者，至少当时是这样。他总是很娇弱，此时更已病重，以至于人们都不能将他父亲垮台的消息告诉他。他在几个星期后就去世了，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塞尔维亚王子。其弟迈克还是一个孩子，由于当时任命了一些实际上是摄政者的顾问，迈克的继位遭遇了一些必然出现的阻碍。土耳其突然非常坚持任命这批顾问，并且指定了福特切奇和一位叫帕特尼尔维奇的将领，此人和土耳其关系亲密，且强烈反对米洛什。塞尔维亚人不喜欢这些顾问，因为他们是土耳其指定的人，而且支持土耳其。迈克痛恨他们的存在，因为他希望自己执政，而他个人对他们的怨恨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父亲的敌意。当时还存在一个更复杂的情况，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人正在组织一场将他赶下王位的阴谋活动。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其他成员向来想法各异，此时却难得地团结起来，一致反对他。米洛什的两个弟弟还留在塞尔维亚，其中一个赞成废黜迈克，因为他自己没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另外一个则想驱逐他的侄子，因为他觉得这个男孩将来会把事情弄糟，某一天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会被谋杀。在国外，露比莎王后也和这场阴谋关系密切，她的理由是，如果要被枪击，她宁愿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的儿子，成为靶子。

这个男孩精神抖擞地面对着这个复杂的情况。事实上，他继承了父亲所有的天赋，还拥有更好的性格来使用这些天赋。他应对了可恶的福特切奇，这个人背叛米洛什的时候满怀勇气和爱国激情，但是现在他的成就要打上折扣了，因为他的表现显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背叛都是他唯一的反应。于是迈克流放了福特切奇。但是这种精神激起了农民们的疑心，尤其加深了这种怀疑的是，当时他迫切需要将塞尔维亚货币贬值、增加税收，而福特切奇曾经为了让自己驱逐米洛什的行动得到民心，狡猾地减税了。农民们害怕他会跟他父亲一样肆无忌惮地抢走他们的钱财和权利，所以当福特切奇伪装成宪法的捍卫者回到塞尔维亚时，他们拿起武器追随他。迈克知道福特切奇得到了苏丹的支持，因而他出兵攻打他，自信能够让他的国家摆脱土耳其宗主权的最后一丝痕迹，而且他的人民一定会赞成他。他惊愕地发现那些受骗的农民在追随福特切奇，而他自己的军队，由于不满，则四散逃开。他的尊严让他解散了仍然对他忠诚的那部分部队，将那些从各个省赶来支持他的农民送回家，然后去了奥地利领土。这是巴尔干历史上的悖论式的事件之一：尽管那些反对迈克的塞尔维亚人是被无知、愚蠢、否定论驱使，之后的事件却证明他们帮了国家很大的忙。

福特切奇胜利地进入贝尔格莱德，被尊为“国家领袖”，但是他的直觉使他摒弃了天真的想法，所以他没有让自己进一步成为王子。他迫使国民议会同意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成为王子，那样似乎对他比较好，尽管我们无法想象个中原委。亚历山大是卡拉乔尔杰的儿子，当时三十六岁，为人正直、理智、不爱争辩，但是性格不突出。这引发了塞尔维亚统治权在奥布伦诺维奇和卡拉乔治维奇两大家族间的奇怪的动荡，而这一点被西方严重误解了。它被认为是两大家族之间的血腥冲突。甚至H. W.坦珀利（H. W. Temperley）也在《塞尔维亚史》（*History of Serbia*）中写道，“一个世纪以来，两个家族的拥护者持续进行着可怕的争斗，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奥布伦诺维奇被刺杀”，并在其他地方谴责“这个可怕的血腥世仇”。但是，其实当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谋杀卡拉乔尔杰时，这就是两大家族彼此犯下的最后一桩罪行了。从那以后只有一个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人死于暴力，那就是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他在马赛被刺杀，但那几乎不可能是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人所为，因为当时这个家族已经消亡了。有两个奥布伦诺维奇死于暴力，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何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人应该为此负责。一位卡拉乔治维奇被罢黜，一位奥布伦诺维奇被迫退位，但这两次都与对方家族无关。事实上，退位的奥布伦诺维奇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在19世纪晚期之前，这两大家族间是否有任何实际的仇恨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他们之间肯定没有什么仇恨了。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已经说服卡拉乔尔杰的遗孀相信他与她丈夫的死亡无关；在他的邀请下，她带着孩子们从匈牙利回到了塞尔维亚，并且接受了一笔抚恤金来抚养他们。在年轻的迈克王子执政期间，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非常高兴地充当着他的忠实助手。他当然不是通过对奥布伦诺维奇家族发动攻击获取王位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也不需要费劲解释他们为什么在十七年后，也就是1859年，驱逐了他。亚历山大开始了他沉闷的统治，其中夹杂着俄国和土耳其引发的很多骚乱。王朝制度的俄国非常震惊，因为它发现塞尔维亚将一位世袭制的王子丢到一边，而且它认为这件事应该征求它的意见。土耳其已经承认了亚历山大，并且让俄国也这样做。最后俄国暴躁地同意承认亚历山大，但提出他的继位必须经过自由大选，且条件是流放讨厌的福特切奇和他的同僚帕特尼尔维奇——两人都支持土耳其。因此福特切奇一直想着阴谋诡计，却一无所获。但是当这些骚动安定下来，一个新的情况到来了，而亚历山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失败。

历史学家说他软弱。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发现了自身的软弱。它再次诞生，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是一个小国家；它将明白，尤其到了20世纪更是悲剧般地清楚认识到，在现代局势下，一个小国家的独立只是一个糟糕的笑话。1848年，亚历山大和塞尔维亚遭受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深深的羞辱。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起兵反抗奥地利

政府。在叛变的斯拉夫人科苏特的带领下，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出了对所有斯拉夫人最恶毒的敌意，因此诺维萨德和弗鲁什卡·格拉的塞族人迅速起义反抗匈牙利。就在那时，克罗地亚人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叶拉契奇的领导下进军匈牙利。塞尔维亚人民感到非常羞耻和痛苦，因为他们的兄弟，那些17世纪移居者的后裔，拉扎尔大公的发黑遗体的守卫者，正面临危险，而他们不能前去帮助他们。因为俄国不允许它去，以防奥地利打败斯拉夫人，并且将被打败的塞尔维亚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所以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只能袖手旁观。在那时的多瑙河畔，塞族人为了生存而战，而且战败了。一万两千名塞尔维亚志愿者前去帮助他们，但是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国家只能表现得像一个懦夫。

六年后，他的人民再次觉得他羞辱了他们。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塞尔维亚渴望和俄国并肩对抗土耳其。福特切奇，这个塞尔维亚的梦魇，以前因为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而被流放，现在他回国了，态度变成反对土耳其、支持俄国，他说服了全国人民选举他做首相。不用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来推动他声称的这一目标。他是一个纯粹的消极主义者。一支土耳其军队从南方向塞尔维亚推进，一支奥地利军队渡过河流在贝尔格莱德与它交锋。亚历山大只能再一次无所作为，这导致全国人民极其不满。

他正在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农民们对此并不能理解。他们只看到他没有抵抗他们古老的敌人土耳其，还有他完全屈从于奥地利，而他们现在对奥地利的仇恨和对土耳其的一样多——这非常合情合理，因为尽管诺维萨德的塞尔维亚人帮助奥地利击败了叛乱的马扎尔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却背叛了他们，正如他背叛了那些向他表达过同样忠诚的克罗地亚人。几年后他把他们交回给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正在实施报复，开始了无情的马扎尔化进程，也就是否认塞尔维亚人的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传统。被激怒的塞尔维亚人失去了耐心，而且，不用说，福特切奇迅速地将他们的不满情绪调动了起来。此外，参议员们也密谋要谋杀亚历山大。这个密谋失败了，但是也不需要密谋了，国民议会召开会议，全体一致地要求国王退位，并且要求召回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

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服从了这个安排，米洛什带着他的儿子迈克回来了。老人现在已经七十八岁了，历史记载称他非常享受自己归来的那天。奥地利人拒绝让他乘坐他们的汽船过河，所以他坐着划艇回来，就像在他告诉福特切奇他将以塞尔维亚的统治者身份死去的那天一样。他一上岸就发表了一段巧妙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他打算忽视土耳其提出的要求，即使他们不许塞尔维亚采取王位世袭制。“我唯一关心的，”他对欢呼的人群说，“就是让你们幸福，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我爱你们，如同爱我唯一的儿子，你们的王位继承人，迈克王子。”这段话非常强硬地明确了这一事宜，所以土耳其人几乎不愿意去争论。然后这个老

人，带着他很有特色的热情，拾起了他二十年前放下的工作。从记载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的愉快，因为他首先采取的举动之一就是把福特切奇关进监狱。在那里，福特切奇很快死掉了。土耳其人希望能检查他的遗体，但是米洛什拒绝了，说他们最好不要这样。

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二十个月，在此期间，他运用他以前使用过的粗鲁外交技巧数次挫败土耳其，他和他的人民都为此感到高兴。他只执政了这么短时间，也无所谓，因为他只能拿出那个技巧而已。如果他能活得更久一点，他就肯定要面对那个艰难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小国家的无助，这个事实已经击溃了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也一定会击溃他，因为他也没有应对办法。但是他的儿子迈克就很不同，他在位期间展示了那些让他在1842年被流放的骗子和傻瓜为他们的国家做了件什么样的好事。因为为了寻找如何使自己能够胜任王位的明确答案，这当中的时间他全用在增长学识和游历西欧国家首都上了。他眼前的迫切问题是将一个中世纪国家改造为一个足够现代的国家，这样它才能够抵抗现代的帝国。他用自己从来没有失败过的天赋改造着这个国家。

首先，迈克给塞尔维亚带来了内部秩序。他设计了一部法典，它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也要求所有人的服从，以此使这个国家铭记法律的概念。统治者再也不能够把他的敌人带到法官面前，而法官们摸摸帽子，就给出统治者想要的判决。他和他的所有臣民都必须面对蒙住双眼的正义。他改造了政体，规定苏维埃的所有成员不再对苏丹负责，而是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官方负责，而且苏维埃应当从属于民主的国民议会。为了建立秩序，他也采取了一项有力的措施，建立了一支由法国教员管理的常规军队。在那之前，塞尔维亚的军事力量只是把一些将领的私人部队组合起来，而这些将领只是间歇性地服从中央的命令，还总是被福特切奇那样多管闲事的人利用。迈克做的这件事遭到了几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其中奥地利想吞并塞尔维亚，土耳其想重新占领它，而英国一直亲近土耳其。只有俄国和法国友好地对待它。

其次，他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塞尔维亚，因为此前他们还占据着重要的城镇要塞。迈克继位两年后发生了那次著名的事件：两名塞尔维亚人被两名土耳其人杀死，贝尔格莱德的居民自然开始示威，负责卡莱梅格丹堡垒的帕夏竟指挥部队轰炸这个开放的城镇长达五个小时，直到他被外国领事们强行阻止。迈克于是利用这件事来证明，一个活跃的发展中国家是无法忍受妥协于一个治理糟糕的国家留下的这些令人震惊的痕迹的，而且他使用了西方列强能够理解的措辞来表达这种愤恨。他派自己美丽又能干的妻子尤利娅·胡尼奥迪去伦敦，在那里，她能通过科布登和帕默斯顿影响英国的公众舆论。很快他使英国、法国、俄国甚至奥地利一起支持他对土耳其撤走它的卫戍部队的要求。他也展示了他父亲的外交技巧，因为他的措辞既能

使土耳其同意签署文件，又不会让它觉得丢了面子。

第三，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外交策略。他知道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而且他比父亲更强大，他也知道他能通过哄骗和威胁从列强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但这还不够，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之所以目前进展良好，只是因为那些帝国正在休眠。当它们真正需要扩张而开始行动时，他的狡诈将变成徒劳，它们会像抢劫孩子一样轻而易举地横扫他的弱小国家。少年时失去王位之后，他首先跟他父亲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中间。他参观过弗鲁什卡·格拉圣殿，看过他们民族那些古代荣耀的遗物。从诺维萨德、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学者那里，他了解到这些荣耀曾经多么真实，而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曾经深受拜占庭文明影响，差点成为这种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但是土耳其人的到来阻止了这件事。他学了很多知识，清楚巴尔干权力之争的重心在过去曾经从东方转向西方，又从西方转向东方，胜利有时属于塞尔维亚人，有时属于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并不属于某种纯粹的血统，他们与土耳其人、匈牙利人还有芬兰人相似，但是他们的血统与斯拉夫血统相互渗透，且他们也使用斯拉夫语。现在他们与塞尔维亚人有另外一种联系——他们也被土耳其人征服，且现在还在被奴役。迈克相信团结南部斯拉夫人是一件荣耀的事。独立的黑山当然会成为他的同盟者；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都处于奥匈帝国强有力的暴政之下，所以他不能与他们联手，既然如此，也许联合保加利亚人是一个更聪明的决定，因为土耳其在此的统治比较松懈，相较而言他更容易接触到保加利亚人，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更急切地想帮助解放他们的盟友。然后，广袤的疆土将再次出现，它实实在在地属于斯拉夫人，它拥有令人赞叹的自由。

这个诞生于诗意且富于历史想象的梦想，立即被迈克用他的实践意识扩大了。一些小国家或者过去被土耳其压迫，或者现在还在被压迫，即使它们不是斯拉夫国家，为什么不用这个共同的经历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有效的联盟，然后一起打败土耳其呢？他筹划了一个巴尔干联盟，将塞尔维亚、黑山与希腊联合起来，这些地方的人确实都有斯拉夫血统，还有罗马尼亚，还要接受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黑塞哥维那人、马其顿人和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只要他们起来反抗那些压迫者。实际上，他与希腊和罗马尼亚已经达成协议，并派遣了塞尔维亚宣传员在所有被奴役的斯拉夫人中展开工作，同时加强国内的军事力量。他的计划遭到强烈阻挠，因为英国和法国，出于不可思议的愚蠢，联合奥匈帝国一起来指责他。很难想象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年轻而繁荣的巴尔干联盟将是欧洲和平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如果在奥地利的东方，那些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民组成一面坚固的墙，奥地利只能接受它的限制，1914年的大战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迈克只能错过那些可以实现计划的明显机会。为了打发时间，他打算修改宪法，把它变得更民主。当时是

1868年6月10日，他去托普西德公园散步，那是贝尔格莱德城外一座宜人的公园，站在公园巨大的岩石山脊上可以看到萨瓦河对面的贝尔格莱德。陪同他的是他的表妹和表妹的女儿卡塔琳娜，一个非常聪明的跛脚女孩，据说他正和她相爱，但是他不能娶她，因为他们的亲属关系在东正教体系中属于禁止通婚的范畴。他前段时间和他的匈牙利妻子尤利娅·胡尼奥迪离婚了，离婚的理由至今都很神秘；她后来嫁给了阿伦伯格公爵，五十一年后，也就是1919年，在维也纳逝世。当时有三个人拿着刀朝他们冲过来，袭击了他们。卡塔琳娜受了伤，她的母亲跟迈克被杀死。再一次，世界大战被推得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和大灾难之间的另一面墙被拆毁了。

有人宣称这次刺杀是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的杰作，有一个塞尔维亚法庭还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但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证据。亚历山大那时已经六十一岁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也完全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很难相信他会决定杀死他的继任者、一个他知道他的人民爱戴的人，然后去重新占有王位，尤其在考虑到以下情况的前提下：彼时，一个庞大而费力的计划已经开始，任何王子想要留住脑袋的话，都必须成功地完成这个计划。更难想象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安排了暗杀，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抢夺被谋杀人的权力，而且，他在这个罪行发生的前后都没有离开过他在匈牙利的庄园。

接下来，亚历山大更奇怪地没有任何行动。迈克的婚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子嗣，所以塞尔维亚内阁出于无奈，宣布年幼的米兰为新的统治者。那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是米洛什某个兄弟的孙子。他们的血缘关系非常遥远，甚至有人怀疑它根本不存在。在这个男孩未成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或者其他任何不满分子有无数机会夺取王位，但是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一直没有出现。那些刺客可能宣称他们是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拥护者。卡拉乔治维奇家族当然有拥护者。很多人和迈克政见不合，他的执政效率太高，所以不能使所有人满意；他们每个人都去拜访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喝着没完没了的黑咖啡抱怨着。如果他们上了年纪，而且记得过去腐败的好时光，那么他们最有可能是凶手。但是刺杀迈克·奥布伦诺维奇的人非常年轻，精力充沛。据说他们和奥地利警方有联系，而迈克的死亡正好对奥地利有利。

贝尔格莱德V

听到迈克的死讯，每个斯拉夫人都非常悲伤。很明显，没有露面的列强也很不安。1868年6月9日的中午，一个叫作马塔或者马修的农民，从一个叫作乌日策的城市的街道跑过，大声喊道："兄弟们！兄弟们！站起来，救救我们的王子！他们正在无情地谋杀他！看，他们正在用土耳其弯刀砍他！看，看，鲜血！救救他！救救他！"警察以为他发疯了，逮捕了他。但是当第二天迈克在托普西德被刺杀的消息传到乌日策后，情况看起来就变得严重了。市长审查了马塔，猜测他一定跟这次阴谋有关，但是他能证明这完全不可能，而且整个乡村的人都自告奋勇地做证，说他是一位预言家，经常预言一些还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在远方的事情。然后，市长让马塔说出他预见的未来，并且让一位秘书写了下来。这些记录让市长印象深刻，所以他把它们呈给了内务部长。这也引起了部长的注意。部长下令将马塔带到贝尔格莱德，然后马塔在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里坐了几天，对着一位官员进行口述。这些记录被编入档案，只被逐渐地披露给皇室或者与内阁相关的人。但是乌日策市长手上的记录没有被严格守护。它们变得尽人皆知，最后还被出版，出版物销往全国。

马塔预见了未来五十年巴尔干的全部历史。他说："迈克的王位将被一个小孩继承，有段时间这个国家将由三位摄政者管理。当他长大成年，他们的关系将恶化。他很聪明但是情绪反复，他将成为塞尔维亚痛苦的根源，只要他在位，这个国家就完全没有和平或者安全可言。他将发起很多次战争，扩大国家疆土；他将不仅是一位亲王，还会获得加冕成为国王。但是，将来总有很多动乱。最终，他会退位，死在流放途中，那时他还没有衰老。他将有一个儿子，那是他憎恶的妻子的孩子。对塞尔维亚来说，这个儿子意味着更多的痛苦。他的统治将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他也会有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他将在三十岁前死去，他的家族也将跟着他灭亡。另外一个家族将统治塞尔维亚，但是新国王将在三年后消失，然后人民将遭受无法形容的极度痛苦。那时将有反叛和流血，然后一个大国将入侵我们的国家。那个大国会折磨我们。那将是一段非常悲伤、艰难的日子，所以那些活着的人经过教堂墓地时，都会说，'噢，坟墓，请打开，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来休息。噢，你们这些死了的人多么幸福，不用遭受我们所遭受的动乱和不幸'。但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将来临……"

他还说了其他事，它们还没被实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买不到克里玛的马塔预言。难怪那些受到预言惊吓的人非常忧虑，因为他对米兰及其儿子的所有预言都成了现实。米兰的不称职对他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灾难。很可能他根本不是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位美丽却有

失体统的罗马尼亚贵族，有人怀疑他的父亲不是罗马尼亚人，而且跟奥布伦诺维奇家族根本没有一丁点儿血缘关系。当米兰长大成年后出现在国民议会中，一位议员便坐在椅子上，解释说他不打算站起来，除非他看见这个年轻人的出生证明。无论如何，即使米兰是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人，他的成长过程也让他表现得不像如此。这个家族的人之所以能够拥有勇气、活力和狡诈，是因为他们过着农民和士兵的生活。但是米兰的童年是在巴黎、维也纳、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那些并不算最好的皇宫和酒店里度过的，他那对互相憎恶的父母一会儿宠爱他，一会儿忽视他。尽管他们一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很有可能成为迈克的继位者，但似乎没人重视他的教育。他长大成人后，没有任何长处，除了极端的审美感受力，而如果他看见了自己的话，这种审美也会起来反抗。他从思想到身体都是一个彻底的"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

他的婚姻也确实像马塔预言的那样完全失败。在他十九岁时，他的大臣们正在和圣彼得堡商议，打算让他和一位年轻的俄国公主结亲，他却宣布与纳塔利娅·凯斯科小姐订婚，她是一个俄国上校的女儿，属于摩尔达维亚的低等贵族，有着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黎凡特人的奇特混杂血统。这对夫妇在婚礼后离开大教堂时，贝尔格莱德突降雷雨，皇室马车的马匹咆哮惊跑，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纳塔利娅是个让人讨厌的孩子，而且对她嫁给的那个孩子很残忍。当他向她展示自己最好的独特一面时，她总是嗤之以鼻。因为曾经听她说过她喜欢铃兰，他就让人在一整片田地里都种上了铃兰，这是一个阔佬在内心深受触动时可能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当它们完全绽放时，他带她去观赏，而她对这种奢侈感到困惑和恼怒。一整片田地的铃兰！她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时期都表现出这种冷淡。尽管她外表极其性感，长着杏核大眼和完美如女奴般的撩人曲线，内心深处坚守的却是俄国乡土社会那种守旧思想，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和契诃夫的大部分作品都描写过它们，因此她对她丈夫的热情感到深深的愤恨。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亚历山大，出生时他的父亲二十一岁，他的母亲二十岁。在那以后米兰有了一个情妇，一个丑陋、聪慧的黎凡特希腊人，她比他大了十岁，也许是一个俄国间谍。纳塔利娅立刻变得狭隘任性，她完全没有克制自己对这件事的公开愤恨，尤其是当那个情妇生下一个儿子时。贝尔格莱德的人非常震惊地看到他们的亲王和妻子公开争吵。这些甚至不是农民的行为方式，当然它们也不是什么好的行为。

米兰作为一个统治者也跟作为丈夫一样失败。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民再次反抗土耳其人时，他从北方进军攻打土耳其人，而黑山的尼古拉亲王从西南方向进军。亲王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因此强行签署了一份有利于和平的协议。而米兰却失败了，依靠俄国的干涉才免于灾难。这就导致塞尔维亚国内开始了一场罢黜米兰的运动，他们希望让尼古拉亲王取而代之，但是这场运动很快就不再活跃，因为黑山人一旦停止打仗，他们性

格中明显的缺陷就显露无遗。这也引发了一场更活跃、更持久的运动，人们希望召回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因为他和波斯尼亚反叛军一起战斗时，展现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士兵，也是一个卓越的人。很难指责米兰的失败或者他的补救措施。他率军反抗土耳其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而且在一个有序的现代国家，天才没有早熟的机会。如果他生活在卡拉乔尔杰和米洛什所在的老塞尔维亚，他会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会知道为了保住王位，必须安抚或者用计谋击败十几个狡猾的老将领，并同时赢得他们的尊重。那是迈克·奥布雷诺维奇接受过的训练。讽刺的是，这种训练使得迈克有能力清除这种野蛮的环境，而事实证明，要完成国家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一个塞尔维亚统治者显然有必要接受这种环境的磨砺，他的继承人也不例外。

之后的一场对抗土耳其的战役让人满意。但是很遗憾的是米兰不能胜任签订条约的任务。他同意了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签署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而这份条约不可避免地将在很多年里，甚至是永久地毁坏迈克·奥布伦诺维奇的南部斯拉夫联盟的梦想，因为俄国扩大了其附属国保加利亚的疆域。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本可以合法地反对这个做法，他却没有这么做。巴尔干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分裂了。后来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其召开的唯一目的就是签署一份条约，它将剥夺民主的斯拉夫人的自由，将他们推向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统治。由于没有巴尔干联盟作为筹码，米兰完全无能为力，他回到了可怜的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面对的情况。

1881年，米兰和奥地利签署了一份秘密协约，拱手让他的国家变成奥地利的附属国，这也不足为奇。他承诺再也不试图解救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以此换回一个含糊的承诺：如果他对马其顿的土耳其人宣战，奥地利将支持他。但是他其实不太可能宣战。此外，他还同意逐渐将他的王国交给奥地利控制。在贝尔格莱德的奥地利军队使馆随员常常到王宫给米兰下达命令。有人怀疑，米兰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个叛国行为中得到了经济补偿。这增加了这场交易的不光彩之处，但是如果认为这证明了米兰的动机是简单的唯利是图，那就太肤浅了。很显然，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认为那些侵略的帝国，包括土耳其、俄国和奥地利，使他不可能保证他的国家的独立，尽管他被认为有责任去保证它。

米兰出卖了多瑙河沿岸的国土，一年后他宣称自己为国王，并且在奇卡修道院举行涂油礼，所有的尼曼雅王朝国王都曾经在这里加冕。它是一座绯红色的教堂，矗立在一片与英国湖区最漂亮的区域相似的土地上，它被庄严地奉献给皇室仪式。每位国王来举行加冕礼，墙上都会为他开辟一扇新的门，等他走出去，它就再次被人用砖头砌好。米兰的地位晋升并没有能安抚人民。他因为酗酒而声名狼藉，挥霍无度到了疯狂的地步，和他妻子

的关系已经非常丢脸；而且由于他和奥匈帝国的秘密协约，他在政治上的行为也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疯子一样反复无常。他的大多数大臣和所有公众完全不知道那份协约，因此他们都对许多事情大惑不解，比如他们的国王会突然放弃某个项目，而他之前还完全赞同它，且它对塞尔维亚有利，或是提出一个似乎毫无意义的计划，只有鲍尔豪斯广场[注]才知道它的背景，而且以上这些事经常发生。这是典型的奥地利式的“草率”，那些对米兰下达命令之人完全懒得让米兰既可以服从命令，又不会与他的人民产生争执。1883年，一些地区起兵反叛，之后被残酷镇压。

小亚历山大九岁时，他的父母就以最不体面的方式分居了。他们之间恶毒的仇恨和无礼严重得就像斯特林堡在他的喜剧《离婚》中描写的那样。纳塔利娅有一次恶劣地绑架了这个孩子，把他带到威斯巴登，然后米兰通过德国警方同样恶劣地把他带了回来。他们唯一一次暂停争吵，是因为米兰愚蠢地向保加利亚宣战，最后导致了1886年的丢脸战败。到了1888年，用尽所有手段迫害妻子的米兰开始考虑离婚，尽管他没有任何理据，因为她并没有任何品德问题。他说服塞尔维亚主教长将一些俄国沙皇通过大主教的敕令离婚作为先例。这让他的人民感到深深的震惊，他们现在知道自己的国王是个彻底的混蛋。他的财政部不断面对他在欧洲几乎每个首都进行过兑现的支票，还有债主们的讨债信；他的军事失败对一个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比对西方国家的更为巨大。很明显，即使米兰自己对现在的局势感到满意，他的支持者也并不痛快。1890年1月，他试图用一部自由宪法来安抚臣民，但是三个月后，他突然不加解释地让位给自己才十二岁的儿子。这份新宪法和退位很可能跟奥地利有关：塞尔维亚对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的冷静性格的兴趣与日俱增，奥地利试图解决这件事，因为如果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登上王位，他当然永远不会顺从于外国势力。

在成年之前，亚历山大通过三位摄政者治理国家，其中两位是军人，人称“瑕疵将军”，因为在与保加利亚的战争中他们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故，第三位是一个政治大亨，一直都是米兰的亲信。他们完全不是理想的父亲和母亲角色的扮演者，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米兰坚持把孩子留给他们看护，而且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被允许见他的母亲，或者和她有任何联系。这可能不完全是出于家庭仇恨。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尤其是在他们糟糕的婚姻后期，似乎有某些政治缘由。纳塔利娅非常亲俄，而且很可能她发现了米兰和奥地利的秘密协约。从她的一些言辞记录中几乎可以确定她已经知情。可能米兰害怕在他们的儿子还不能谨慎地意识到它的全部后果之前，她会将此事透露给他听。

无论这个禁令原因如何，纳塔利娅都把它变成了最粗俗的事。她来到贝尔格莱德，经常站在大门口，脸贴在门上，抬头看窗户背后她那心爱的儿子，那个她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事去保护的儿子。她在附近的一栋房子中住

下来，当年轻的国王每天出行时，她就从阳台探出身去。她也秘密地让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发布一些消息，那些消息还是她当王后时知道的，且对塞尔维亚不利。最后摄政者通过议会仓促推出了一条法案，不允许米兰国王和纳塔利娅王后哪怕是短暂地在塞尔维亚居住。这法案包括了父母双方，以免摄政者被人指责偏袒。其实他们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喜欢米兰，因为他带着一大笔补助被送到国外，却在巴黎和维也纳迅速欠下大笔债务。法案通过后，政府立即要求纳塔利娅离开贝尔格莱德，她拒绝了，因此他们派出一位警察局长和他的手下去把她送到多瑙河上的一艘汽船上。她锁上门，警察只能从屋顶爬进去。他们开着一辆汽车带她走，但是她的美丽和悲伤却激起一群年轻人的同情心，他们试图去解救她。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杀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了伤，她对那群年轻人讲话，乞求他们散开，声称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的流血事件继续发生，她将立刻离开贝尔格莱德。

亚历山大十七岁了，长成一个身体结实、戴着眼镜的懦弱男孩。他请摄政者和内阁首席部长们到王宫共进晚餐。他们兴致勃勃地来了。他们都是自由党成员，但据说，在这个让人困惑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坦慕尼派的政客，更关心机器而不是意识形态，而且他们刚刚略施小计骗倒了一群激进党人，而那些人其实也根本算不上是激进分子，只是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民主保守派，他们的政治纲领具有从扎德鲁加系统发展出来的古老斯拉夫共产主义倾向。但是在他们吃完饭前，王宫侍卫副官走了进来，低声对国王说了些什么，随后国王点点头，站起身来，说："先生们，我刚才已经对塞尔维亚的所有卫戍部队宣布了，对所有的官方宣布了，对所有的人民宣布了，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宣布，我声明，我已经成年，现在我将亲自管理这个国家。感谢你们，摄政者们，感谢你们的服务，现在我将接替你们。我也感谢你们，内阁的先生们，感谢你们的服务，你们也被解除职位了。今晚你们不能离开王宫。你们可以作为我的客人留在这里，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将成为我的囚犯。"

那些人沉默了片刻，然后他们跳起来，绕着桌子冲向年轻的国王，威胁地大喊和抗议。副官拔出剑，阻止了他们，然后沉默地走向房间一边关闭的门，推开门，一群士兵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我把你们交给陆军中校泰瑞奇，你们要无异议地服从他的命令，我要去军队接受效忠宣誓。"说完，国王离开了大厅。第二天上午，摄政者和部长们被释放回家，他们在街道上看到张贴的皇室告示，上面说亚历山大国王注意到自由党政府的违法行为，担心如果继续忍受他们的作为，将使国家陷入内战，因此他宣布自己已成年，将亲自掌握权力。人们从房子中出来，读了告示，跑回家，悬挂出他们的旗帜，然后跑到王宫前的庭院，为这个终于证明了自己属于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人欢呼。

这次事件和它随后扫兴的结局只有一种解释；为什么亚历山大做出了这样

一个杰出的动作却再没有第二个，为什么他之后表现得仿佛他只希望比他父亲对臣民更加反复无常和残酷无情，这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线索在于他说过的一段关于和奥地利的秘密协约的话，还有一些他明显自相矛盾的行为。似乎毫无疑问的是，之后他将他父亲签署的那个协约称为“叛国行为”。在他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召唤那些民族主义的、支持民主的和反西方的激进分子执政。但是仅仅一年后，他就非法地革除了他们的权力，然后废除了过去二十年的宪法改革，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让一个叫作进步党的不起眼的亲奥政党在议会中协助他执政。但是，这个时候的亚历山大和母亲纳塔利娅的感情还很好，尽管她支持激进分子也支持俄国，他经常离开国家和她一起度假，很明显，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被政见不合所破坏。最后，国王召回了他那在国外过着丑闻式生活的父亲，并任命他为总司令，这让全国上下既诧异又愤怒。这还不完全是一个灾难。米兰绝对不是一个傻瓜。他在巴黎过着放纵生活之余，收集了很多在19世纪还不出名的大师画作，塞尚的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曾经属于他。尽管在战场上不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他的时尚感却使他成为和平时期军队的优秀组织者。但是他从迫害激进分子和亲俄分子中获得乐趣，其中很多人被他迫害致死。自从塞尔维亚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它还没有如此堕落过。

如果根据某个不相关的证据做一些假设，这些事件就可以被充分理解了。1892年，那份秘密协约的一份复制文件落到了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爱国者的手上，他就是拉扎洛维奇·赫贝利安诺维奇亲王，拉扎尔大公的后裔，他告知了欧洲媒体这件事。塞尔维亚的摄政者明确地否认了它的存在，奥匈帝国也通过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议会明确否认。如果亚历山大发现了这份协约真的存在——也许是通过纳塔利娅的一些秘密通信，他那年轻的理想主义可能会抗拒它，进而使他决定以一个从隐秘的暴君手上拯救国家的救星形象出现在他的国家面前。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赶走摄政者，并且在规定时间的前一年就执掌大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倾向于那些反对奥地利的激进分子。但是当他和奥地利公使进行第一次谈话时，他便会知道那个让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无能为力并让他父亲崩溃的恐怖现实。他很可能被告知，任何公开披露和否认那份协约的行为都会被奥地利当作不善之举，奥地利将随之入侵，杀死他，让一位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人取而代之。这个男孩清醒过来，试图妥协。他会对协约缄口不言，但是他会继续支持激进分子。奥地利逐步施压。亚历山大年复一年地统治国家，却没有向他的人民披露协约，这让他越来越难坚持他的独立。他不能转向他的人民，要求他们支持他对抗外国压迫者，因为他被证实长期是压迫者的代理人。所以他被迫沿着一条黑暗的走廊后退，拿着手枪指着自己的胸口，迎来未知的恐怖结局，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他扔掉了手枪，不在意能不能再次捡起它。他爱上了一个亲俄的塞尔维亚女人。

1. 在本书中，指奥地利政府方面。

贝尔格莱德VI

这个时期的塞尔维亚人非常不幸。他们是一群依靠传统过活的人，五百年来这个传统从来没有使他们失望，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忘记他们的基督徒骑士力量比伊斯兰的征服力量好很多。他们的生命寄托是圣萨瓦、史蒂芬·杜尚，是马可国王和拉扎尔大公。但是米兰和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他们可能根本不属于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甚至也不是塞尔维亚人，而且他们彻头彻尾地、从本质上属于19世纪，因此他们可能都是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一些配角，不可能对那些中世纪的名人有丝毫兴趣。米兰迷恋现代的西方，周围也是和他一样迷恋它的人，但是他们表达迷恋的方式不像购买塞尚作品那样值得赞美。他特别喜欢外交部部长切多米尔·米亚托维奇，这个人曾经支持他签署和奥地利的秘密协约，并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塞尔维亚的书，在书中诋毁塞尔维亚教堂。他用令人吃惊的腔调叙述他带一些“尊贵的英国绅士”去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尼什主教，主教叫他告诉他的朋友们，“相比送我们圣经，送我们一些枪支炮弹会好很多”。这个回答，当然可能出自任何早期教会的主教之口。把教导人民这件事交给我们，这本书写道，帮助我们打战，对抗那些把受洗的信徒贩为奴隶的异教徒。在塞尔维亚的边境还有很多这样的奴隶，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上不可能得到救赎，除非巴尔干再次拥有强大的基督徒力量。塞尔维亚人民的命运让他们把所有天赋都用在了那个庞大的主题上，但是像米亚托维奇这样的人想要塞尔维亚人搁置这个主题；相反，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西方那种干净轻快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就好像把“五月花”号、印第安人、乔治·华盛顿和西部拓荒者全部从美国赶走，只剩下布朗克斯和派克大街。

塞尔维亚的传统没有灭绝。塞尔维亚人没有忘记科索沃战场。他们只是感觉科索沃每天都被那对父子的漠不关心给亵渎，而那对父子正以一种奇怪的违宪合作关系来统治他们。他们也意识到，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甚至无法认为他们真的受这对父子统治。这个民族非常敏锐，政治经验非常丰富，而且生性多疑，他们不可能遗漏对亚历山大的反复无常的、可怕的暴政的解释。但是如果承认了它，就等于承认塞尔维亚永远不能独立，承认尽管它摆脱了土耳其，现在它还是要落到奥地利或者俄国的监护之下——这是对拉扎尔大公的侮辱，科索沃的失败将永远都不能得到救赎。塞尔维亚人变得情绪化、充满幻觉和创造力；而他们承受的真正迫害出自米兰派出的反俄国、反激进分子的间谍，这给他们的幻想染上了一种颜色，一种徘徊不去的、神秘的暴力色彩。

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和他的家庭教师就经常在贝

尔格莱德城外的皇家公园散步，陪同他们的是一个叫作史蒂芬·邦斯尔的美国新闻记者，还有一个叫道格拉斯·道森的英国军队使馆随员——之后成为乔治五世的皇室总管。有一天，这两个外国人谈到在多瑙河里游泳的乐趣，他们非常震惊地发现这个小男孩不会游泳。于是他们给他在树林间找到一个水池，然后不顾家庭教师的抗议，教给了他人生第一堂游泳课。他们非常痛心地看到他脱去衣服后露出来的那糟糕的身体。他身体畸形，看上去头重脚轻，长着笨拙的肩膀和长长的手臂、瘦削的腰部和大腿，还有八字脚。他一能够游过这个大概三十英尺宽的水池，就骄傲地对他那忧虑的老师说：“现在你不用害怕告诉摄政者这些绅士教我游泳了，他们是我的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国王会游泳了。”

亚历山大从来没有失去对游泳的兴趣。自从解除了摄政者的职权，他就经常去比亚里茨拜访他的母亲，每次去那儿，很多时间他都在大海里游泳或者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的同伴之一是纳塔利娅王后的首席侍女，一位非常美丽的寡妇，比他大十岁，名叫德拉加·马申。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爱上了她。她是第一个使他感兴趣的女性。他之前不愿意结婚，而且讨厌与女性交往，这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他有生理缺陷。但是在1894年到1897年之间的某天，他难以抑制对她的激情，在晚上强行闯进她的卧室。然而，她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赶了出去，然后锁上了房门。她的敌人认为这是她狡诈的证据，但是按照国王自己的叙述，她用了很大的力气，一个别有用心的女人不会冒险这么用力。亚历山大当时所处的状态几乎让他可以这样说：“也许你掩饰你的爱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你要把我踢下楼？”

在这之后故事变得不清不楚。1897年秋天的某天，纳塔利娅王后发现了一封亚历山大写给德拉加的信，她立刻大发脾气，作为一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中年女性，她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同寻常。我们不清楚她为什么对德拉加十分愤怒，因为德拉加虽然非常不谨慎地让亚历山大给她写信，却极其谨慎地回信说她会留在本地，不会去贝尔格莱德。但是，纳塔利娅马上解雇了德拉加，把她赶了出去，坐下来给她所有的朋友写信说自己的侍女是一个叛徒和荡妇。这马上导致德拉加只能依靠自己的财产——每年大约有一百英镑——养活自己，而且这关闭了她能找到新雇主的唯一社交圈。因此，她被迫回到在贝尔格莱德的家。纳塔利娅王后讨厌他们的恋情，但是她其实使它的发生变成必然。因此，有些人怀疑她是利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在她儿子的王宫中安插了一个亲俄间谍，并让人以为她完全没做这样的事。但是这种怀疑没有事实根据，因为她明显真的怨恨她的儿子，而且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些事没有什么理由，不过是一个愚蠢而庸俗的女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的事情罢了。

很难想象比年轻的亚历山大在1897年冬天所经历的生活更复杂的情况了。由于与母亲的争吵，他和父亲的关系变得亲近。他父亲最近才回国当总司

令，但是其亲奥行为已经让他这个塞尔维亚爱国者感到尴尬。亚历山大去梅拉诺度假，德拉加正在那里，尽管按照他之后让人信服的叙述，她那时还不是他的情妇。在那里，有一个叫作伊斯沃尔斯基的俄国驻巴伐利亚外交官前来拜访他。这位外交官完全了解他对奥地利的反对程度以及变成亲俄派的可能性，然后向他的上级报告说，尽管德拉加造成了年轻国王和他亲俄派母亲之间的不和，但她自己也有亲俄影响力。他似乎很可能安排了一些交易，以德拉加为中介，目的是避开亚历山大父亲的注意。这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可能引起塞尔维亚人民兴趣和同情的东西，但是它必须被保密。所以亚历山大和德拉加回到了贝尔格莱德，看上去只是一个专横国王跟一个贪财情妇的简单形象。

什么时候人们普遍的看法成了现实，这一点仍然不为人所知。亚历山大宣称那发生在她在比亚里茨把他赶出卧室的三年后，但是那个场景可能发生在1894年到1897年之间的任何时候。有可能她在回到贝尔格莱德很久之后才委身于他，或者是就在他们在1900年结婚的日子的不久前。但是人们没有理由猜测他们的关系出人意料地纯洁。德拉加住在王宫附近的一幢很漂亮的小房子里，靠她自己的财产她完全不可能拥有那样的房子；国王经常来看她。人们很自然地推断她是他的情妇，但这种推断引起的感受则很不自然。不久之后，她被人们痛恨，自世界诞生以来都很少有女人像她那样被人痛恨，没有哪个残忍的母亲、女杀人犯像她那样被人厌恶。我听说过一位在匈牙利的塞尔维亚学者，出生在多瑙河上流，其伟大著作被贝尔格莱德学会授予荣誉，但尽管他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自由的塞尔维亚对他来说也是一块神圣的土地，他却不会前来接受他的荣誉。对他来说，贝尔格莱德被德拉加的存在给完全污染了。

这一诽谤传遍了整个欧洲，当国王和她结婚时，所有的国家都瞧不起这件事。她被认为出身低贱、生活堕落，而她现在的照片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照片上的她面部浮肿，下巴周围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粗糙。但是除了放荡，还有其他东西会加深这些特征。比如说，眼泪。传言的第一部分肯定不真实，因为她的出身与奥布伦诺维奇家族是平等的。她的外祖父叫作尼古拉·吕尼维扎，是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的朋友，一位富有的养牛农民，因为资助对抗土耳其的起义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她更直接的先人很可怜，但非常可敬。她的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去世，但是在发疯前，他一直是沙巴茨的一位非常能干、受欢迎的地方行政长官。他突然崩溃，使得他的大家庭入不敷出，德拉加作为年长的孩子之一，在十七岁时就嫁给一个采矿工程师兼公务员。她丈夫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堕落的人，但出生于一个非常成功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知名医生，他的一个哥哥在军队担任很高的职位。

关于传言的第二部分，人们意见非常一致，因此没有辩护的可能。直到今

天，塞尔维亚的大众还是认为，在亚历山大之前，她毫无疑问有过很多情人，而且她完全可以被称为一个生活放荡的女人。尽管要挑战这种全体通过的确定性总是很鲁莽，但是学习历史的人肯定想知道德拉加·马申何时何地能够放荡地生活。她出生于1866年。1884年，十八岁生日之前，她嫁给了她的丈夫。他很快就生病了，因为酗酒导致了身体紊乱，而她照顾他，除了有些时候她必须躲开他的虐待，一直到他在1885年去世。她变成寡妇后生活拮据，但也没有拮据到付不起食宿。她的不幸状态引起了纳塔利娅王后的注意，她让德拉加学习几门外语，并为做侍女做准备。这段时间她经常在王宫服侍，所以有谣言说她是米兰国王的情妇，尽管米兰其实非常讨厌她。从1889年开始，她和纳塔利娅王后一起出游；1890年，她住进纳塔利娅在比亚里茨的房子中。如果她的坏名声真的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只可能是在1885到1889年之间，在她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她在贝尔格莱德过着非常放荡的生活，以至于到1897年还被人记得。但是纳塔利娅王后比白雪还纯洁，她就像冻雨一样纯洁，她让一个名誉受损的女人做她的侍从的概率，不会高于维多利亚女王这么做的概率，而且她以清楚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一切事情而闻名。如果在1885年德拉加的故事这样丰富和奇怪，以致过了八年都没有被人遗忘，那么纳塔利娅王后从来没有听说它们就太奇怪了。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在数不清的情人的怀抱中度过了青春，竟然会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愿意接受这样一份工作，一辈子留在纳塔利娅王后的宫廷里，那实际上相当于一座修道院，尤其是她还很美丽，她可以在欧洲的任何首都做交际花。

这里有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之处。那个对她的控告很幼稚，我们应该由此有所警觉。弗拉登·杰奥尔杰维奇是一个犹太无赖，他是进步党首相，精通恐怖主义、盗取国家文件和敲诈勒索，他受到某种驱使谴责她，说她借给他的某位家人一个俄国虚无主义者写的一本不道德的书，那是格拉德斯通先生最喜欢的书，玛丽·巴什克尔特塞夫(注)的《日记》。更聪明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注意德拉加照片中那明显的清醒又了无生气的奇怪表情——即使是她最早期的照片，当中也出现了那种表情——并且理解它们的暗示：一个女人在十九岁时就知道了有一个发疯的父亲和一个酗酒的丈夫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么她可能会对生活的探险保持一定的谨慎。她的坏名声可能有两个源头：一个适用范围有限但是有效，来自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另一个像彗星一样不受约束，它是人们心中的诗歌，因为一个火热的命运而开始燃烧。

前面已经提到过，德拉加·马申有一个在军队任职的夫兄：亚历山大·马申上校。他跟大部分家人都很讨厌她。很难相信他们有正当理由去讨厌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不可能严重冒犯她的丈夫，他比她年纪大很多，而且在他们一年的短暂婚姻期间他因为过度酗酒而生病了。产生这种情绪的可能的原因，是一群顽固的人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个对一位陌生人造成了伤害，

而他们不愿意在这个陌生人面前低头。对马申上校来说，当她成为亚历山大的情妇，这种讨厌更是看起来合乎情理，因为他是卡拉乔治维奇的拥趸，尽管他也从米兰国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恩惠。毫无疑问，马申上校作为一名优秀士兵，在军中很受欢迎，他四处散布有关她有多糟糕的言论。

除此以外，人们仇恨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还因为他拿走了他们为科索沃复仇的梦想，因为他破坏了他们的自由国家的完整，因为他正在侮辱他们古老传统的体现，因为他正庸俗化他们的风格——他们朴素的拜占庭光辉，那个风格造就了瘦削而具威胁性的男人以及耐心而静如止水的女人，他们就像壁画中的古老的国王和圣人一样。而因为一个男人爱着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灵魂，或者至少是对其灵魂发出的呼唤的回应，所以他们认为德拉加是亚历山大的灵魂，因此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她完全是邪恶的，就像我们通常天真地构想出我们的敌人那样。

她肯定知道人们的恨意，而且充满恐惧。看起来好像她带有某种自然的犬儒主义，她觉得爱人的热情一旦消逝，她就可以获得自由了。据说他给了她两万英镑，很可能她希望在某个法国海滨疗养地安静地度过余生，在那里，种着棕榈的海滨广场尽头有一家赌场，还有装着百叶窗的粉红色别墅。这种幻想看起来可能像天堂一样，因为她身边的巴尔干政治局势越来越复杂，成了她的噩梦。1899年2月，宫廷中的奥地利势力，主要以米兰国王为代表，坚持中止与俄国的关系。同年7月，米兰国王正从贝尔格莱德城堡坐车回王宫，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拿着左轮手枪对他开枪。这个刺客是一个亲俄的波斯尼亚革命党。跟他的同类一样——普林西普除外——他没有命中。米兰国王以这件事为借口，把很多他私人的和政治上的敌人都投进监狱，而他，以及几个大臣——他们地位足够高，有自己的见解——都相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才是雇用刺客的人。

这段时间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我们难以知晓，因为它主要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王宫。不过，亚历山大明显恢复了冷静，他安静地按照维也纳的指令拖着脚步往前走，直到1900年3月，不幸地，奥地利外交部部长戈卢乔斯基伯爵想到一个霸道的命令：让他立即娶一位德国公主。奥匈帝国在处置塞尔维亚时，总是表现得特别无能，而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众所周知，亚历山大还在狂热地爱着他的情妇，而且他还不到二十四岁，没有任何理由催促他马上结婚。但是亚历山大的大臣们服从了来自维也纳的命令，强迫他承诺年底会结婚。他们还不如贝尔格莱德的警察局长那样有清楚的常识。警察局长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相信德拉加靠魔法药剂迷住了亚历山大。听到这个承诺后，他脱口而出：“好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完全蛊惑了国王，他坚定地认为他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丈夫。如果他答应你们他会在一年内结婚，他的意思是跟德拉加·马申结婚。”

他是对的。7月8日，亚历山大对全世界宣布，他打算娶他的情妇。他挑选了他的父亲和首相在欧洲不同地方度假的时刻。因为他事先下令给他们提供不同的电码本，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浪费了很多时间互相发送对方看不懂的信息。但是在国内，他不可能用这样的简单手段来改变他所面临的反对浪潮。我们都知道他在某个情况中是如何面对的。他对他的某个大臣说了一通话，用的是恋人们的共同语言，我们甚至可能认出它们，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也有人用过它们。

“你知道，弗卡辛，”他说，“我没有其他人那样的童年或者少年时光……我从来没有任何抱负，甚至没想过成为国王。我戴上王冠，不是因为我爱它，而是因为那是我的责任。你一定也注意到了。……现在我爱这个女人，我爱她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人或者东西，她是唯一让我感到极其幸福的女人，只有当她成为我的妻子，我才能把自己整个的生命献给人民的利益。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能够让我忘记过去生活的痛苦，使我感到幸福。这个女人因此是我的守护天使，她给了我力量去耐心承受我要承受的一切。这个女人就是——德拉加女士，潘达·吕尼维扎的女儿。……我坚决要娶她。不要攻击她来侮辱我。……她是一位纯洁高尚的女性，只有她的敌人才说她的坏话。……她知道没有她和她的爱我就活不下去，在这之后她才委身于我。是的，我热烈地爱着她，没有她我就不能活下去。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和德拉加的婚姻，无论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愿意放弃我的王位，以每年三百六十英镑的收入和德拉加生活，而不要王位和每年有四万八千英镑收入的属地。我知道我和她的婚姻会遇到超凡的困难，因此我把自己献给了她，我的身体和灵魂，因此我已经使她不可能离开我。你应该知道她一直拒绝成为王后。只有我知道为了赢得她的同意，我经历了怎样的困难。而现在，我终于攻破了她的反抗，你们却前来制造困难！你们对我毫无怜悯吗？你们希望强迫我永远离开吗？因为你应该知道，如果我不能作为国王娶德拉加，我会永远离开塞尔维亚，以个人身份娶她。”

他的大臣们并没有被他的雄辩打动。全国传遍了国王将结婚的消息，带着一种他们即便在面临土耳其入侵时也不会感觉到的黑色恐怖的情绪。国王向人民宣布订婚的当天，内阁解散了，并且派了两名内阁成员去告诉德拉加·马申，她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按照他们的想法，如果她拒绝，那么一定要绑架她离开；而她的想法肯定是，她的生命不再安全。她马上同意了他们的命令，但是她很自然地询问是否能够等到她的女佣收好她的衣服和文件，在此期间她可以前去国王不可能找得到的她的一个朋友家。一旦她收拾好东西，她就会很高兴地过河去匈牙利。两位大臣同意了。

但是就在那时，她的悲剧源头伸出一只手，把她拖进了末日。她有两个弟弟，都是军官。他们似乎都继承了他们父亲精神不稳定的特征。他们反复

无常、饶舌、傲慢、极其无礼，而且完全不为他们姐姐的奇怪地位感到难为情。毫无疑问，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德拉加的不受欢迎。不幸的是，就在那天早上，两个弟弟当中更坏的那个正好跟姐姐在一起，当她的女仆在收拾东西，她走进马车时，她悄悄告诉了他自己准备找其借宿的朋友的名字。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绑架或者面临死亡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预防措施。但两个小时后国王来看他的情妇，这个弟弟告诉了国王那个朋友的名字，这就不自然了。国王马上驾车前去德拉加的藏身之所，用自己的马车把她带回来，然后当时就在那里给她戴上了一枚订婚钻戒，留下重兵守护她。

首都在四天之内都是一片混乱。一个接一个的代表来到王宫，强烈要求国王不要娶他喜欢的那个女人，理由是她年纪大，是他的情妇，而且有堕落的习惯，然后他们没有受到惩罚就被允许离开了，这显示出这个民族的奇怪行为准则。在一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长期被侵犯的国家，这非常令人意外。但是斯拉夫人天性上讲求民主，甚至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普通人都被公认有权讨论统治者的事务，只要是极其重要的事务。这些代表离开了，制订了很多计划来面对这个情况。有些人想召回米兰国王，取代他的儿子，其他人想到彼得·卡拉乔治维奇，还有一些人回到最早的流放德拉加的计划，并补充了预防措施，就是将亚历山大关起来，直到德拉加离开这个国家。毫无疑问，军队想通过反叛来阻止这场婚姻，剩下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

他们无疑可以想出一个能够得到广泛支持的计划，但是第五天有一个通告发布出来，使得所有对国王婚姻的反对都无法奏效。沙皇尼古拉宣称他赞同这次订婚，并且派出一个特使来恭喜亚历山大和德拉加。不仅如此，沙皇还表示他准备做他们婚礼的“库姆”——库姆是指证婚人，按照东正教的仪式，他在婚姻中的作用比我们在西方知道的相应角色更重要，因为他就像这场婚姻的教父。亚历山大的反对者几乎都是亲俄派。他们不能再反对他了，既然他明显要从对奥地利表示忠诚转向对俄国；这次婚姻也看起来不一样了，因为沙皇将赋予它他的精神权威。贝尔格莱德陷入沉默，这种沉默依然意义深远，因为它来自困惑而不是满意。这个地方之所以有机会安定下来，是因为米兰国王一直没有回到塞尔维亚。大陆通讯社发表了他的一封有关这场婚姻的信件，这封信按理应该送给他儿子，但是看起来是为了新闻用途而写成；他帮助奥地利当局进行诽谤贝尔格莱德的活动。他的儿子对将军们下令，只要他的父亲试图重返塞尔维亚，就要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枪杀他。这个场景其实完全不是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家庭生活里某个令人惊讶的高潮，它不可能实现，因为米兰于1901年在维也纳逝世。他的遗体和家庭所有物都被送到了弗鲁什卡·格拉的克鲁斯代尔修道院，被放置在那些他从来不感兴趣的神圣的塞尔维亚物品之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讽刺了。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把它们送到那里是很好理解的。“把它

们和其他斯拉夫垃圾放到一起。”他可能这样说过。因为米兰没有完成使塞尔维亚成为奥地利附属国的任务，所以从那以后，在哈布斯堡眼里，他和所有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既可憎又没用。

但是贝尔格莱德的沉默被打破了。公众是如此厌恶德拉加，以至于他们必须找到话语来消除腐蚀内心的痛苦。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德拉加不是亚历山大的好妻子。她似乎总是充满慷慨的母性，温柔地对待他。也没有记载说她站在世界的一边来反对他，对他表达出他的缺乏尊严，或者表现出身体上的厌恶。尽管一些大臣承认了她的德行，但是这并没有让她变得受欢迎，因为还有其他的反对力量。有一件神秘的事触动了人们的原始本能。人们普遍相信，德拉加没法生育，因为她做过某项外科手术。这似乎并不可能。如果她在法国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手术，任何人似乎都不可能得知这件事，除了她的直接亲属以外，而他们几乎不可能散布这个消息。当时是19世纪，无论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它更不可能发生在她去法国之前，因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极少需要做这种手术。如果德拉加真的做过这项手术，她在结婚后不久宣称她怀孕了，就有点难以置信了，因为照顾她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甚至危及她的生命。此外，一位有名的法国妇科医生检查了她的身体，确认她怀孕了。虽然时髦的医生们正变得有些粗心大意，但是很难想象有哪个医生竟然会没有注意到怀孕的母亲缺少了子宫；也不可能是因为他收了贿赂，国库空虚的亚历山大也给不出贿赂。

在1901年的春天，有些谣言说德拉加被误诊了，或者她撒谎了。俄国沙皇表示可以借给他们两个他自己的内科医生。因为他做了婚礼的库姆，所以他将来必须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教父，而且他很可能听说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流言蜚语，发觉自己轻率地支持了这对不受欢迎的夫妇，因而想避免一切可疑的后续情况。这两个俄国内科医生宣称德拉加没有怀孕，但是他们解释得很清楚，这不是因为她做过这项外科手术，而是因为她生病了。他们也明确地说明，这种疾病的症状可能很容易误导德拉加，让她以为自己怀孕了，而法国妇科医生的诊断，在它被给出的时候，可能也是合理的。

这种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的心中正在形成一个形象，一个他们总是仇恨并且令他们在仇恨中辗转反侧的形象，那是一个代表死亡的女人，一个妓女和不孕的女人。这个故事让他们转向了新的民间传说，他们非常担忧其中的各种隐喻，各种各样的危险，尤其是令他们恐惧的鲜血，以及对王权的威胁、对种族的污染。不久之后，人们相信德拉加企图把她妹妹佩特罗维奇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并为他骗得王位继承人的身份，但是被沙皇阻挠了。佩特罗维奇怀孕这件事是真的；德拉加发现自己怀孕是错的，在惊慌之中她想“狸猫换太子”，这也许是真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只有那些

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的人可以指责她。由于她那两个肯定是发疯了的顽劣弟弟的行为，她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危险。塞尔维亚人表达自己的高昂情绪的习惯性方式是对天空放枪，这已经吓着了很多游客，但是这两个年轻人在这方面的放纵程度甚至吓到了塞尔维亚人自己。他们也坚持要求，每当他们走进咖啡馆或者餐馆时，乐队必须演奏国歌。有谣言说他们中的某一个会被收养为王位继承人。即使并非他们自己散播了这一谣言，至少他们的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支持着这一说法，并使得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开端。

从德拉加的照片可以看出，她迅速地变得粗壮、衰老和呆笨。一份颇具敌意的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克里玛的马塔预言的文章，而她沉思着她那已经被预言的命运。她不是一个傻瓜，她一定已经意识到，她丈夫的统治是一个可悲的大灾难。不再依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没有丝毫的好处。如果说奥地利给了亚历山大一些坏建议，那么俄国则完全没有给过他建议。这更加糟糕，因为尽管他坐上王位十年了，他还是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独立地统治国家。他对稳固了俄国的专制统治的治理程序一无所知。长久以来，他捍卫他的王冠和生存的方式就是交替使用阿谀奉承和恐怖活动，他想不出任何其他手段。

1901年，他公布了一部新的民主宪法，然后几乎马上与全国选举出来执行宪法的激进党争吵。很快他又废除了它，任命辛撒马科维奇将军，开始军事独裁。政府的职能停止了。国家财政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兰干的坏事。军队和政府官员不能定期领饷。贿赂腐蚀了每个行业。任何人的自由都没有保障。由于奥地利长时间的监护，以及亚历山大无力从监护的终止中获益，这个国家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呈现出一种让人们感到完全困惑的场面。

1903年4月，一群暴乱者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被射杀。5月有一场大选，所有收回的选票都明显被政府篡改了。6月11日晚，辛撒马科维奇将军去见亚历山大国王，告诉国王他不能再肩负治理国家的责任了，因为人民都坚定地反对他。这个消息让国王感到愤怒和沮丧，痛骂了他一顿。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国王承认这次辞职很合理，并且请求他的首相继续执政，直到找到继任者。大概十点钟，会面结束了，国王和王后做出了最后一个轻率举动。每天晚上都有一支军乐队在王宫前的花园里演奏，拥挤的人群走来走去。这一天，国王和王后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围在四周的是德拉加的妹妹们，包括那个据说帮助了德拉加密谋一个假的王位继承人的妹妹，还有她那两个野心勃勃的疯狂的弟弟。透过越来越浓的夜色，人们带着恨意看着这个皇室家庭，他们的恨意强烈到令人窒息，即将达到一个高潮。与此同时，辛撒马科维奇已经回家，端着一杯红酒坐下来跟妻子谈话。他们没有睡觉，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的大女儿，一个二十一岁的女

孩，嫁给了一个叫作米尔科维奇的年轻军官，那天晚上他在守卫王宫，而她随时可能在她自己家中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在隔壁。另一个原因是，辛撒马科维奇和妻子都为他的辞职感到悲伤，担心它会招致国王的反感。

在咖啡馆和花园餐厅里，夏天大群的常客坐着聆听吉卜赛乐队的演奏，看着树丛间的萤火虫。在卡莱梅格丹城堡旁边有一家叫作“塞尔维亚王冠”的旅馆，它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拥有一种萦绕着浪漫和神秘气息的优雅，仿佛鬼魂正推开百叶窗，赶赴在更富于激情的过去年代定下的约会。城堡里有一道长廊，在温暖的晚上它是敞开的，在6月11日的这个晚上，这里正在举行迈克·奥布伦诺维奇被谋杀的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一群军官坐在那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中的一个就是“蜜蜂”，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十年后他将分发枪支和炮弹给那些来自萨拉热窝的青年，他们想杀死弗朗茨·斐迪南。这群军官喝了很多梅子白兰地，然后他们不断地要求乐队演奏那支向王后表示敬意的曲子——“德拉加王后科洛舞”，这是每次王后出现在公众面前乐队都会演奏的曲子。他们至少起身了一次，跟着曲子跳科洛舞，这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舞蹈，跳法是人们将手臂搭在彼此的肩膀上，组成一个圆圈，跟着复杂的节奏跺着脚。他们跳科洛舞是很寻常的事。至今士兵们都随时可能这样做，在他们的营房外面或者当他们要在公共场所等待的时候，比如说在火车站。但是考虑到德拉加不受欢迎，这些军官跳“德拉加王后科洛舞”就很不寻常了。很多旁观者认为他们的醉酒解释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明显醉了。

十一点之后他们很快离开了，朝王宫走去。他们和其他几群军官会合，那些军官这个晚上待在不同的咖啡馆和军官俱乐部。有些人同样满脸通红，吵吵闹闹，有些人却非常清醒，能够很好地完成他们在密谋中被安排的任务。其中一个就是德拉加的夫兄，马申上校。他领导这些士兵对抗王宫，其动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卑鄙的。他从米兰国王那里得到过很多钱，因为米兰经常派他去完成一些有趣的任务；他还是1899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的塞尔维亚代表之一，尽管这是极其不妥的。亚历山大和德拉加一结婚，米兰就离开了国家，然后逝世了，这些好处都没有了。本来他就因为德拉加未能鉴别他弟弟的震颤性谵妄而怨恨她，这件事一定成了火上浇油。人们从未听说过马申的什么高尚的行为。但是这次密谋的其他领头人却非同寻常。其中有一个伟大的人，他拥有公认的勇气和智慧，面对诱惑时能保持廉洁，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农民出身，总是对农民忠诚。他的家庭评价说他是一个无私的人，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温和。这些领头人的追随者也是有着不同品格的人。有一些人去王宫，准备谋杀和抢劫；其他人前去要求亚历山大退位，承诺安全地护送他和他的妻子越过边界，条件是他不能指定吕尼维扎兄弟中的任何一人成为他的继任者。八十六个密谋者当中，有二十六人那天从分散的卫戍部队中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收到了马申的电

报，让他们以任何有用的理由离开，赶来贝尔格莱德，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将发生什么。

一些人从餐厅离开，去往某些团的营地，这样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可以阻止士兵离开营地去保卫王宫。其他人去往王宫，发出之前安排好的信号，这样皇室侍从就会过来打开外面的门，领他们进入国王的卧室。但是这位侍从已经后悔同意参与密谋了，而且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的方式处理了自己的悔意。他没有向国王出卖他的同伴，他只是坐在门厅里的一张椅子上，醉得不省人事，这样当他们前来，他就不必理会他们了。最后他们只能用一些炸药筒炸开锁住的大门。这惊动了王宫内外。国王的侍从武官冲向电话，却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然后电灯熄灭，可能是因为爆炸损坏了电力系统，或者，有人说，是因为侍从武官拉下了中央电闸。在外面，从附近一些警察局跑出来一些警察，他们发现街上的暴徒，开始开枪。但是他们认为的暴徒实际是第六团，他们被某个密谋者从营房中带出来，所以这些士兵开枪还击。战斗持续了一刻钟，但后来那个将第六团带来王宫的谎言同样传到了警察那边：第六团被告知亚历山大国王正把德拉加王后赶出王宫，她和她的家人都要被送过边界，所以他们被派来维持城里的秩序。警察立刻停止了行动。相同的谎言也解除了王宫的警卫。所有的人都站着，沉默、困惑、全身僵硬，因为他们对这个女人的仇恨。

皇室侍从从睡梦中惊醒，踉跄着冲向大门。密谋者们大喊说他背叛了他们，“蜜蜂”开枪杀死了他。这个执着的暗杀密谋者，一生都梦想着谋杀各个皇室成员，却没有亲手杀死任何人的记录，除了这个眩晕的无足轻重的人。密谋者们很恐慌，耳边是街头战斗的喧闹声，随后他们去了附近的一位医生的房子里，问他要蜡烛。他们告诉这位医生德拉加被驱逐了，他很高兴地给了他们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密谋者们匆忙进入王宫，不清楚他们还有多少时间来做他们计划好的事，在转动的阴影和杂乱的家具间踉踉跄跄地走着。欧洲的很多王朝都无法抗拒地被某种室内装修风格吸引，而王宫就是这种风格的完美体现，因而他们摸索着经过很多物品，包括很多道珠帘、一只在保加利亚战争期间被射杀的巨大黑熊的标本、从古老的土耳其宫殿搬来的大理石喷泉，以及大量的放置着小古玩、手鼓、土耳其水烟壶的临时小桌。他们跌跌撞撞，碰翻了很多东西，试图找到去国王卧室的路。有时敌人从阴影中跑出来，那是王宫侍卫队当中的忠诚成员，他们立即被杀死。其中一个就是米尔科维奇，辛撒马科维奇长女的丈夫，他的妻子当晚正在分娩。

关于如何处置这些保皇党，意见很快产生分歧。有些人只想推翻国王和王后，其他人想要彻底的谋杀，而且这样做了。当密谋者们在黑暗中摸索到国王卧室时，他们发现国王和王后已经离开，那时这些密谋者肯定彼此还有所猜疑。毫无疑问，他们刚刚离开，因为床铺还是温热的，而且一本法

国小说被扔在床头的桌子上，正面朝下地打开着。现在密谋者们有理由感觉到真正的害怕了。如果国王已经离开，去叫醒那些仍然忠诚的士兵，他们都将丢掉性命。他们下令把刚才在楼下被开枪打伤的侍从武官带上楼来，盘问他。这位侍从武官尽管虚弱且承受着疼痛，可还是理智而伶俐地撒谎来争取时间。首先他说服他们下楼去搜索地窖，他们在那里搜了一个小时。他们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人，又跑上楼，重新彻底搜索房间，一些人举着蜡烛，其他人拔出剑，戳到沙发底下，刺破窗帘，在墙上敲打来试探暗门。他们变得越来越绝望。

与此同时，两位军官被安排带上一群士兵去辛撒马科维奇家。当他们敲门时，将军和他的妻子以为是有人从他们女儿的房子过来报信。但是由于他们刚刚正讨论着他的辞职后果，因此他对实际的来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倒是客气冷静地接待了他们。那个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被派来把他拘禁在自己的房子里，直到他该去王宫交出公章的时候。将军还是没有表现出惊讶，他招待他们，仿佛他们是一些来执行公务的士兵，他请他们坐下，递给他们香烟。他们抽了一会儿烟。高级军官表现出焦虑，这让他的下级感到很疑惑，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派来杀死将军的。过了片刻，将军起身说道：“我去叫人送咖啡来。”他刚转身对着他的客人们，高级军官就举起左轮手枪，对着他连开三枪。这个暗杀者非常沮丧地站着，大喊他被命令做这样的事，而下级军官跪下来，抱起那个垂死的人。“陛下，陛下，”辛撒马科维奇用最后一口气说，“我一直对您忠诚。您不应该对我做这样的事。”然后他带着这个错误的认识死去了。

在王宫中，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正躲在一个通向他们卧室的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几乎只有衣柜大小，平时用来挂她的衣服，以及让她的女仆在里面缝纫熨烫。本来还有一条秘密通道，那是米兰国王专门为应对这种情况建造的，但是亚历山大轻蔑地让人用砖堵上了它。这个衣柜房间的外侧门上贴着和墙壁上一样的墙纸，所以完全骗过了密谋者，也或许是他们只能借着烛光搜查的缘故。国王和王后一直保持着安静，直到他们的敌人盘问过侍从武官，然后跌跌撞撞地下楼去地窖。然后国王走到窗户边，对着他模糊看见的站在王宫周围的花园中的士兵大喊。但是他们都离得很远，而他正靠在一个黑暗的窗户边，而且他们被告知王宫侍卫队的军官们正在保护他们的国王抵御德拉加和她家族的密谋活动。他们沉默地站在原地。对德拉加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咒语，变成了施加于这座城市上的一个魔法，它封住了所有居民的嘴巴，也麻痹了他们的身体。

这对皇室夫妇似乎一度放弃了拯救自己的尝试，而开始给自己体面地穿上衣服。国王正穿着裤子和一件红色丝绸衬衫，而德拉加发现了散落的一件白色丝绸胸衣、一条裙子还有一双黄色的袜子。她不敢打开橱柜去拿衣服，害怕会弄出声音，而且他们在黑暗中。他们的煎熬持续了大概两个小

时。然后站在窗户边的王后看见了一个军官走进下面的花园，从他走路的样子，她认出了他是宫廷卫队的指挥官。她探出身子，对着他大喊：“过来救你们的国王！他现在有危险！”指挥官停下来，抬头看了看，确定了那是她。他举起左轮手枪，朝她开枪——或者是对着奥地利帝国，对着我们邪恶的大地，对着我们这些被污染的人类，对着罪恶。这是一次目标不明的射击，因为她其实不是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难怪他没有打中。

这个指挥官绕路走到门厅，发现那些密谋者手中拿着他们的剑，正在和垂死的侍从武官争吵，他就要说服他们去搜索附近的另外一栋建筑了。指挥官告诉他们，他看见王后在国王卧室附近的一个窗户边。他们马上跑回去，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放衣柜的房间。他们从王宫庭院的柴棚拿来一把斧头，一个军官拿着斧头砍向四面墙壁，终于他们发现了门。它被锁上了。到底是密谋者把门砸开了，还是国王和王后得到安全承诺后拉开了门闩，这点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我们只知道，最后他们站在他们的卧室里，一个肥胖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一个粗壮臃肿的中年女人，衣饰华美，面对着一群军官，后者颤抖的手举着淌着蜡的蜡烛，还拿着剑和左轮手枪。

马申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品德高尚的领头人。这个人问国王是否会退位，国王的回答是一个儿子所能够说出的最痛苦的话：“不，我不是米兰国王，我不会被几个军官吓住。”然后，房间里的所有左轮手枪立刻开火，亚历山大倒在德拉加的怀抱中。他大喊：“米多！米多！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米多是辛撒马科维奇的昵称。亚历山大死去了，他以为他被那个在一个小时前已经死去的人下令刺杀，而那个人以为是亚历山大下令刺杀了他。然后左轮手枪再次开火，德拉加倒在地板上。房间里的大部分人陷入疯狂之中。他们剥光了那两具尸体身上的衣服，拿剑猛刺，划破他们的脸，剖开他们的肚子。一些没有发狂的人大喊，告诉他们既然行动已经完成，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国王和王后的拥护者可能会进来逮捕他们。然而，这并没有让场面恢复得体。那些剥衣服和刺尸体的人带着可怕的清醒神志，将赤裸的尸体从窗口扔到了下面的花园。这是基于常识的明智做法，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因为它表明国王和王后都已经死了，现在没人去保护他们，也没有人需要被保护了，因为奥布伦诺维奇家族没有剩下任何人可以继承王位了。但是这样做给这个场面增加了另外一个不得体之处。亚历山大的手臂总是比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强壮，而他还有最后一丝生命，所以当他被扔下去时，他的一只手抓住了阳台边缘，一个军官只能用剑割断他的手指以让他放手。当他坠到草坪上，他的另外一只手握住了一些草叶。

天已破晓。尽管当时是6月，四点钟的时候还是下了会儿雨。俄国公使走出他的公使馆，那里和王宫隔着一条栗树大道。他整晚都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这场悲剧。尽管他肯定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去拯救国王和王后，但他

没有干涉，也没有在他得知这场密谋的时候干涉，那发生在两三天前。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提前知道了它。米亚托维奇先生，当时的塞尔维亚驻伦敦公使，三个月前在W. T. 斯特德先生举办的降神会上就得到了关于它的详细描述。通灵者伯切尔夫人，带着非凡的准确性，设想了这个场景。至少这是在场的来自芬斯伯里公园的所有人的想法，尽管有个来自豪恩斯洛的先生什么都没有听到。而在那之后，其他人都从更唯物主义的渠道收到了暗示。奥地利政府知道了它，它的边境军队的一些行动只能用那个预知来解释。但是它没有向它的敌人亚历山大发出警告。俄国公使也没有发出警告给这位极其不令人满意的朋友，他如此不受欢迎，如此笨拙，尤其是，如此不幸运。但是一位绅士总有他的底线。俄国公使走进花园，走向那些正站在那里的军官，指向尸体。“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把他们抬进宫殿。不要把他们留在雨中让公众看到。”被记录下来的这句话，足以象征列强在巴尔干地区施加教化影响的本质和程度。

---

1. 玛丽·巴什克尔特塞夫（Marie Bashkirtseff，1858—1884），俄国女艺术家，自传《日记》是其代表作。

贝尔格莱德VII

从那以后，这座城市就像玫瑰花一样绽放。塞尔维亚变得再次年轻，它精力充沛，它甩着头从沉睡中醒来，充满力量地面对清晨，因为德拉加死了，因为这个坏女人被杀死了。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犯下的那些真正的恶行——或者至少是他同意的——监禁、鞭打、腐败和欺诈，都被迅速地遗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讲起这事的时候，都仿佛认为他被谋杀是因为他是德拉加的丈夫，仿佛他被谋杀次于德拉加被谋杀，仿佛这些谋杀是为了净化瘟疫，而那个瘟疫就是德拉加。

这是一个谜。因为德拉加无足轻重。她是出现在历史中的最消极无意义的人物之一。在她的生命中，似乎她从来没有说过或者做过什么事情能够让人在五分钟后还记得。她代表着散文——代表着它的缺陷，它在如实陈述方面的局限性，它在唤醒和启迪意义上的缺乏。她的敌人发现很难指控她，因为她没有给他们提供可以做出任何推论的材料；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的朋友也没法为她辩护。当她走进房间，她没有做什么高贵的事，也没有做什么低贱的事，如果站起来很好，她就站起来，如果坐下去更好，她就坐下去。似乎除了亚历山大没有哪个男人爱她，尽管有些女人对她有一种保护性的友好，但她们谈起她来也不觉得她哪里有趣。

这样一个女人不可能犯下严重的罪行，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有被这样指控过。她谋划拿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做王位继承人，这可以算作丢人的行为，如果她真的这样做过的话。但是这可以被搁置一边，因为在她当上王后之前，塞尔维亚人对德拉加的仇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种仇恨的表面原因是，她作为一个寡妇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很不道德。让我们想象一下那确切而言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如果那是真实的话。一个美丽而沉闷的年轻女人住在贝尔格莱德某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墙上挂着很多家庭照片和一两块劣质的鲜艳挂毯，木地板上有一两块同样劣质的地毯。有时，有些男人来找她，他们也许像她一样年轻标致，因为她还没有贫穷到需要接受不合自己心意的情人。接下来是谈天。如果有人不得不倾听它，它的平庸肯定会让人感到痛苦，但这种谈天不是犯罪，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安宁或者生命。他们很快停止说话，开始拥抱，这是很自然的事，大概是纯粹的动物本能。如果德拉加的头号敌人说的最糟糕的事是真的，他们随后去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们在床上躺下来。一旦他们在那里，自然本能让他们只会做某些动作。如果不是神经过敏，这些动作并不讨厌，有些人觉得它们令人愉快，有些人觉得令人不快，但它们被公认只能由其结果来进行伦理学评价，因为它们自身除了短暂、惊人的意义，几乎没有别的意义。

这样的事固然不是人们希望在一个皇室名人的历史中发现的东西。一个王后应该只知道永久的爱情，就像一个国王应该只知道从不失败的勇气。但是必须重申的是，在德拉加有任何成为王后的可能性之前，她就已经被讨厌——那让人们普遍想象出的场景有非凡的效果。那个场景可能已经导致私生子的出生，但是它没有。它可能已经导致性病的传染，但是它没有。然而，可能性给它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即便如此，塞尔维亚人竟然为这样一个场景而慌乱、疯狂，这个场景仅仅因为蒙上了恐惧的阴影而变暗，这很不寻常，因为他们本来就很熟悉那些在本质上就是黑色的场景。他们习惯于谋杀、从森林树枝间飞出的子弹、勒紧第二天会被宣称为自杀的俘虏的脖子上的绳索。他们习惯于欺诈的审判、撒谎的证人、受贿的法官、冤枉的监禁和被盗的罚款。然而却是德拉加使他们的血液冲到眼睛，使他们看不见东西，她使他们拔出剑来开始完成职务之外的谋杀，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使他们应当杀死她。他们可能没有理由让亚历山大活下来，因为他的顽固和他野心勃勃的命运感使他抓紧权力，即使这意味着毁坏国家的和平。但是德拉加本应该安全地被送上火车，送到帕西和尼斯之间的某地度过余生。这些密谋者完全没有理由，在那个充满恐慌的夜晚，在那些临时小桌和珠帘之间跌跌撞撞，不断犯下恶劣的罪行。

但要否认这个行动不断变化的影响，那就愚蠢了。首先，行动如预期般朝着堕落的方向发展。密谋者不仅谋杀了国王、王后、首相，还谋杀了军政大臣以及德拉加的两个弟弟。这两个年轻人被带到军团营房，被王宫侍卫队的指挥官盘问，他就是那个从花园对着德拉加开枪的人。“陛下和王后现在死了，”他带着残忍的嘲讽对他们说，“轮到尊贵的阁下来指挥行动了。不要犹豫。我们是你们忠实的臣民。恳求你们下命令。但是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建议你们，你们最好只要一杯水和一根烟。”然后他们被带到庭院，被一群士兵开枪杀死，指挥的人正是坦科斯奇中尉，“蜜蜂”的朋友，十一年后协助运送了武器给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大屠杀之后注定要出现混乱，王宫和被杀大臣们的房子被洗劫一空。但是一天之内军队就被制服了，政府事务的处理也良好地继续了下去。一个临时政府被组建起来，然后政府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宗教仪式，它不是任何弥撒书里面描述的仪式。大臣们和密谋者们都参加了，之后，一个代表团被派到日内瓦去邀请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登位。

彼得·卡拉乔治维奇事前完全不知道这起谋杀，这是无可争辩的。他的最坏的敌人也从来没有认真地宣称有人请教过他，一些密谋者也承认他们不敢告诉他。当时他已五十七岁，性格刚正不阿，而且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知道了他们的打算，他会顽固地向当局告发他们。作为一个王位觊觎者，他的生涯很奇怪。他是伟大的卡拉乔尔杰的孙子，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842年到1858年间毫无激情地统治过国家。因为父亲的民主原则，他被尽可能地当作农民的孩子带大，每天早上都从王宫出

发，去国立学校读书。父亲退位后，他被送到日内瓦的一家寄宿学校，那里非常成功地给他留下了终身影响。直到逝世，他都在本性上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但也被移植了一个勤勉认真的瑞士清教徒性格。他到他父亲位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庄园度假，学习耕作原理；后来他选择成为士兵，在十七岁的时候去往法国，入读梅斯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受了伤，被授予勋章；有次为了逃脱被俘的命运，他在隆冬时节游过卢瓦尔河，这给他埋下了病根，晚年时他因风湿病而瘸腿。还有一段关于他的古怪的短文，描述了他在战役期间某个安静的早上，冲进一个法国镇子的一所房子中，他解释说他在街上听到了脚踏式风琴的音调，乞求他们允许他在上面演奏，然后他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呼哧呼哧地弹奏着塞尔维亚的民族旋律。

他保持着由来已久的严肃和单纯。他是否曾知道脚踏式风琴不高雅，这很难说。但是其他住在巴黎的家人可能已经教过他，恰当的东西应该是覆盖着日本刺绣的三角钢琴。他的弟弟阿西尼厄斯是一名风度翩翩的俄国军官，后来成为有名的花花公子；亚历克西斯和博日达尔是他年轻的堂弟，从玛丽·巴什克尔特塞夫的《日记》中能够读到很多有关他们的故事。其实，在贝尔格莱德保罗亲王博物馆里，尽管有一些上好的柯罗、德加、凡·高、马蒂斯的作品，但是最有趣的展品之一还是玛丽画的年轻时蓄着胡须的博日达尔，他靠在装饰着橙色旱金莲花的阳台上，俯瞰秋色中泛着银光的巴黎。这个年轻人成了一名不错的水彩画家，写过几本洛蒂风格的东方游记，里面几乎全是关于颜色的形容词；他是莎拉·贝恩哈特的密友，经常参加化装舞会，因为他能从其中得到阿里尔风格的欢乐。亚历克西斯和他都在一些极其有趣和精美的东西上花钱如流水。他们明显不是人们预期的一个塞尔维亚养猪人兼叛军将领的孙子的模样。但是似乎所有对应着卡拉乔尔杰个性特征的基因都被以几乎让人不舒服的纯度传给了彼得。

离开军队后，彼得在法国住了一段时间，学习法律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1875年，他去波斯尼亚参加反抗土耳其的起义，在整整三年的战役期间，他持续不断地指挥一群非正规兵团士兵。战火停息后，他去往塞尔维亚，不是为了索要王位，而是为了再次看看他出生的国家。很快他就被警察驱逐出境了。五年后他去了黑山，帮助尼古拉王子整顿军队，并娶了他的一个女儿。她于1889年死于肺结核，留下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此时，他已经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岳父，因为他怀着正义感认为他的岳父既不诚实又不光彩，所以他带着家人搬到了日内瓦。

在那里，他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他的钱几乎不够养活家人。一些在瑞士的人认为，彼得靠做一些抄写法律文件之类的工作来贴补家用。他完全独自担起了家庭责任。他租了几间带家具的房间，请了一位表姐做孩子们的

保姆——之前是三个孩子，现在是四个，因为他的弟弟阿西尼厄斯在俄国娶了一个富裕的平民家族——德米多夫家的女儿，但是他们已经分居，留下一个小男孩（现在的保罗亲王）无家可归。彼得温柔、焦虑、朴素地抚养着他们。他给他们启蒙教育，然后一直严格地观察着他们的道德举止。同时作为一个塞尔维亚人和瑞士人，他觉得一个人必须成为一名士兵，而且一定要是一个好人。出于这个信念，他对四个孩子进行训练，但是这些训练似乎并不愉快。他们都劳累过度了。他们必须在白天去普通的瑞士小学上学，接受全日制教育，晚上则从一个塞尔维亚家庭教师和他们的父亲那里学习塞尔维亚的语言、历史和文学。他们也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1896年，他们母亲的妹妹海伦嫁给了意大利王储，她邀请这些孩子去罗马参加婚礼，她很喜欢他们，但是小女儿不被允许前去，因为她在学校的成绩不好。

但是他很和蔼、慈爱。要理解他对孩子们的严厉，一定要记住他非常不认同自己的家人。他觉得阿西尼厄斯可能可以除外，因为他是一个好士兵，但是他瑞士性格的那一面还是使他对他的弟弟有很不认同之处，因为他是一个冲劲十足的俄国军官，而且是奥萝拉·德米多夫的前夫。至于博日达尔和亚历克西斯，他觉得他们就是堕落本身。亚历克西斯娶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小姐，为了取悦她，他想让彼得靠后站，由他来当王位觊觎者。他指出，至少他有钱资助自己索取王位。在彼得看来，这是最不神圣的建议，因此他冷淡地继续用科索沃传说教导他的孩子们，如果他们没能及时学习，就不让他们吃饭，他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可以防止他们变得像他们的亲戚。但是他还是注意到，他的大儿子乔治表现出了一些明显迹象，有亚历克西斯和博日达尔身上的那种让他不喜欢的不稳定魅力，以及——也许更严重——使卡拉乔尔杰的天赋变得黯淡的情绪化暴力。

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彼得在1898年接受了沙皇的提议，送他的三个孩子去圣彼得堡，让他们在王宫中自由生活，并且在俄国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如果孩子们在瑞典或者法国接受教育，他的倾向自由的思想肯定更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他只能提供匮乏的食物、不舒服的住所、缺乏建议的教育，他再也不能用这样的条件来面对抚养孩子的责任，而这时有了这个慷慨的选择。但是尽管这件事改善了他的家庭命运，它也让他开启了一种极不舒服的生活秩序。小保罗刚开始不能被带去俄国，因为一些和他父母的纠纷有关的缘故，所以他得留在日内瓦，由彼得王子和他的表姐照顾，直到后来才去了俄国。但是彼得王子需要知道他的孩子仍然是一些塞尔维亚好人，没有被俄国化，所以他在假期前去看望他们。旅途中他极其节俭。这些旅程并没有被浪费。他的二儿子亚历山大令人惊讶地丝毫未受罗曼诺夫奢侈之风的影响，践行着父亲的节俭、正派，而且在圣彼得堡发展了塞尔维亚社交圈。这个人身上的罗马式品德是真切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彰显。

贝尔格莱德的谋杀新闻肯定让彼得·卡拉乔治维奇感到难以形容的恶心。他从来没有用哪怕是最微小的可疑行动去索要塞尔维亚王位。他曾宣称，他相信自己是塞尔维亚正当的统治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塞尔维亚人需要，他就愿意拿起权杖；然后他把它留在那里了。现在站在一个军队军官的角度，他面对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事：军队密谋。站在一个士兵的角度，他面对着第二肮脏的事：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一名受害者还是女人，还涉及大量醉酒之人。当他去咖啡馆阅读早上的报纸，发现他们给他的国家抹上了这个污点，而且——在第一秒的震惊之后它一定真的吓到了他——这也给他自己的名字抹上了污点，这一定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当国民议会推选他当国王，他面对着一个正派的人曾经面对过的最不愉快的困境之一。他知道如果他接受王位，全世界都会怀疑他参与了这起谋杀的合谋，他会被其他所有的君主排斥，他将陷入最致命的个人危险，因为任何兵变都无例外地符合那条规律，那就是其胃口会因它被喂的东西而变大。但是他知道塞尔维亚需要一个好国王，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可能治理得好。他也知道塞尔维亚的很多人相信他可以将他们从暴政中解救出来。也有可能沙皇给他的孩子们提供教育，条件就是当有机会的时候，他将回到贝尔格莱德，保护他的国家，阻止奥布伦诺维奇家族帮助奥地利吞食国家。

当国民议会的二十四名代表到达日内瓦给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献上塞尔维亚的王冠时，他僵硬地接受了。没有拖延，没有等待欧洲的兴奋平息下来，他坐上火车，在刺杀发生的十三天后抵达了贝尔格莱德。那时，所有列强，除了奥地利和俄国，都已撤回他们的外交代表，以此表示鄙视。彼得非常庄重地向他的人民致意，这明白地表示，是他认可他们，而不是他们认可他。他颁布的第一条法案就是撤销对外国报纸的审查制度。没有哪份从国外来的报纸应该被扣押或者用墨水涂黑。“塞尔维亚，”彼得说，没有进一步解释自己，“应该从此以后知道其他国家对它有怎样的看法。”

他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处置那些弑君者。那些卡拉乔治维奇家族过度热心的辩护者建议他采取彻底明确的方式处置他们，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有本历史书说他在三年内免除了他们所有人的职务。这不是真的。彼得认识到那些密谋者有不同的罪行，其中一些人品德高尚，他们出于公共精神犯下罪行，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让它变得如此血腥。即使在强大的外国压力之下，他也拒绝革除这些人的职务。其中一个就是著名的密施茨将军，他在巴尔干战争中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士兵，在世界大战中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更伟大的战士。但是，彼得承认其他人是卑鄙的，表示迟早要解除他们的职务：马申就是其中一个。彼得也不会迫害那些谴责罪行的人。到达的四个月后，他正在检阅一个军团，一名中尉走出队列，当着他的面大喊说，亚历山大的鲜血仍然在呐喊着要复仇。这个年轻人被军队开除，但是没有遭到别的惩罚。很快，那些更卑鄙的弑君者联合起来保护自己，

并且在1907年刺杀了反弑君者团体的领导。彼得借助那次刺杀，以及奥地利想要驱逐他并将塞尔维亚的王位给一个英裔德国人的企图，使民众清醒过来。他告诉他的人民，如果他们坚持表现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就注定会被关进笼子和被人看守。但是，他自己很清楚，尽管他以此净化了民意，却并没有成功地围捕住所有具有危险性格的密谋者。他们的首领就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因为一种非凡的个人魅力，他在军中广受欢迎，因此被保护了起来。

但是弑君者的问题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重要。这可能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想到牺牲德拉加之后，人们精神振奋，发现自己能轻易而愉快地实现惊人成就，它就不算什么了。彼得用最简单、最日内瓦风格的精神开始了改革方案。到达当天，管家前来询问他更喜欢哪种菜单，他大声说道："菜单！菜单！我没有时间挑菜单！永远都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东西！"他的时间确实很少，因为他开始亲自走路去改革。他不带任何军事护卫走进一家医院，如果他发现所有的医生都出去了——这在田园时代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他会在访客本上写道："彼得国王来过这里。"他会参观一所学校，如果他发现孩子们在玩耍，而老师们忧郁地交换着他们的抱怨，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彼得国王来过这里。"然而，他进而着手处理那些抱怨，它们折磨着医生们和老师们，还有塞尔维亚的很多公务员和士兵，还导致了很多混乱行为；他确保他们能够定期得到报酬。这种瑞士式的诚实，尽管在它起源的地方有时似乎过犹不及，却触动了经过了三十五年米兰和亚历山大统治的塞尔维亚人，让他们觉得很独特，具有异国风味。它给他们的触动就如同他们的民族服装给我们的触动一般。他们目瞪口呆地站着，而彼得凭借他持续的正直给他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秩序，甚至赢得了一些国际金融家的尊重。亚历山大抵押塞尔维亚全部铁路系统都没法得到贷款，而彼得愉快地借到了贷款，金额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徒劳乞求的九倍。

塞尔维亚人迎来了他们的曙光。他们追随着他走在全新的道路上，那是塞尔维亚五百年来都没有踏上的一条道路，通向一个金色的、繁茂的成功世界，在那里，成功不是仅仅得自刀剑，还可以依靠犁耙、织布机、钢笔、刷子还有天平来赢取。自从土耳其的征服以来，失落的拜占庭文明第一次展现出复兴的迹象，最终，暴政和反抗之间的无聊的互生过程似乎将被一种真正多样化的生活取代。塞尔维亚人张开了他们的翅膀，他们直飞冲天。当奥地利看见他们，它勃然大怒，设计了一个陷阱，想让塞尔维亚回到它的监护之下。彼得国王重组军队，任命他的弟弟阿西尼厄斯·卡拉乔治维奇为指挥官，并提议从法国购买一批大炮；他和保加利亚达成了一项非常友好的关税协议。维也纳严厉地训斥他：与保加利亚的协议必须撤销，大炮也必须从奥地利定购。彼得国王拒绝了；他的首相尼古拉·巴希奇也拒绝了，他是塞尔维亚的"劳合·乔治"，一个精明的理想主义者；极其兴奋的

塞尔维亚人也拒绝了。“奥布伦诺维奇家族已经走了，而卡拉乔治维奇家族还在这里，我们不再是奴隶。”他们说。

奥地利随后宣布对塞尔维亚人的经济战争。看起来它似乎一定能够取胜，而且会很轻松地取胜。塞尔维亚只有一个产业，也就是养猪业，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他们的牲畜产品的关税提高到让人望而却步的程度，这样就能一举扼杀他们百分之九十的贸易。然而，塞尔维亚人勒紧裤腰带，很快在法国、埃及，甚至英格兰找到了新的市场，而奥地利的猪肉价格则飙升到了荒谬的高度。“猪战”持续了五年，从1905年到1910年。随着失败变得愈发明显，奥地利明确表明它不会接受失败。1908年，令人憎恨的埃伦塔尔决定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它们被吞并将对奥地利和黑海之间的所有国家造成威胁。这意味着哈布斯堡没能通过经济战制伏塞尔维亚，打算某天通过武力来算账。塞尔维亚人再一次张开了翅膀，直飞冲天。“如果有奥地利，”他们说，“那也有俄国。我们不需要在任何国家面前卑躬屈膝；我们是强大的民族，我们的强大会给我们带来盟友。”这是真的，既然如今他们有一个不能被收买，也不会让他的大臣们出卖他们自己的国王。

这肯定是彼得国王最幸福也最悲伤的时刻。从奥布伦诺维奇家族接手的混乱而饱受屈辱的塞尔维亚，和现在这个能和大国谈判的自豪又刚强的国家之间的对比，的确是现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个人成就之一。但是，那些随着他的胜利出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完全让他感到高兴。过去在流亡期间，他不得不接受让俄国抚养他的孩子，现在他不得不接受俄国对他的臣民的保护。但是，作为民主的塞尔维亚人、自由的瑞士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论自由》的译者，他不可能赞同俄国的专制统治；他的节俭肯定被罗曼诺夫王朝的奢华排斥；他也知道南部斯拉夫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俄国那个名叫泛斯拉夫主义的运动。在1870年代，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土耳其人试图消除希腊和塞尔维亚在马其顿的影响力，他们建立了保加利亚大主教区，目的就是使马其顿教堂的管理不受希腊牧首区约束。这个大主教区不可避免地反对塞尔维亚民族，因为塞尔维亚民族想要他们自己教堂的自治权；俄国支持这个大主教区，因为它害怕奥匈帝国及其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所以希望马其顿没有任何塞尔维亚民族，所以它拨款给保加利亚的教堂、学校和报社，唯一目标就是把塞族人变成保加利亚人。事实上，俄国已经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破坏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很有必要，如果南部斯拉夫人要坚持反抗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话。俄国有时会收回它的立场，但是它又经常故态复萌。它不是彼得国王这个“磐石”国王会选择的那种稳定的盟友。

彼得还有另外一件更私人的伤心事。他的长子，乔治王储，在政治事务中非常突出，成了一个暴力、主战的政党领袖和受人崇拜的偶像。他的魅

力、勇气和能力毋庸置疑，他甚至有良好的判断力。当欧洲的其他人还在盲目相信奥地利军队的效率时，他就已经预测到它在第一次长期压力之下的崩溃。但是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张力，过去在日内瓦时他父亲还为此感到伤心，现在它开花结果，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庞然大物。彼得国王不能用简明的方式和他打交道，而这本来应该是最好的方式。他在军中很受欢迎，尤其受那些弑君密谋者中品行不端的军官的欢迎，因此隔离他将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但在1909年他陷入了麻烦。他愤怒地暴打自己的男仆并杀死了他。按照最宽厚的叙述，他发现男仆在读他的信件，因此将男仆踢下楼梯，他无意对他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随后，国王强硬地要求王储放弃王位继承权，将它交给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尽管他觉得有必要让乔治继续保留军队职务。王朝的一些恶毒批评家说，这是亚历山大实施阴谋的结果，但他那时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沉默男孩，还是圣彼得堡军事学院的学生，而且在他父亲掌权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只短暂地回过塞尔维亚几次。彼得国王，现在已经六十五岁了，召唤这个男孩从俄国回来帮助他对抗外敌内患，但是他不可能完全清楚亚历山大的品行。

现在，命运掌控了他的王国。奥地利的挑衅变得越发无礼。1909年1月在萨格勒布有一场壮观的审判，奥地利帝国的五十三名塞族公民被指控串通塞尔维亚政府密谋反对他们的国家，然后基于一些明显属于伪造或很轻率的证据，其中三十一人被宣判有罪。1909年3月，奥地利外交部交给哈布斯堡家族史官弗里德永博士一些伪造的文件，据说它们证明了塞尔维亚政府的一些成员不仅指导了而且资助了一个新的对抗帝国的阴谋。彼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发布了一份严厉声明，称呼那些奥地利人骗子，五十多名塞尔维亚政治家支持那份声明，他们提起诉讼，指控维也纳的弗里德永博士诽谤。随后的审判毫无疑问地显示他的所有证据都是伪造的。塞尔维亚人微笑着回家，并为一定会来临的战争做准备。他们相信它不会马上来临：俄国已经因为波斯尼亚被吞并而非常恼怒，它的恼怒是塞尔维亚人背后的一堵要塞墙壁，奥地利人能明显地看到它。

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做一些事。马其顿还没有获得救赎，它还是奥斯曼帝国手中的一个基督教省份：一个恶政的地狱，恶政五百年以来从未停歇，除了在20世纪初受到国际控制的短暂时期，随后仅仅因为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憎恶，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终结了这段时期。现在，它陷入虚假黎明后一个更深的黑暗之中。青年土耳其运动突然推翻了苏丹的统治，制定了一部宪法，承诺给予所有臣民自由，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很快，青年土耳其党就变得不过是老土耳其的儿子，配以普鲁士的军事训练，并开始着手实施一项残暴的计划，即剥夺马其顿基督徒的公民资格。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憎恶此事不仅因为他们的巴尔干灵魂，还因为它触犯了他们的私利。如果奥地利人拥有一个延伸到黑海的帝国，他们会沿着瓦尔达尔山谷穿过塞尔维亚，控制萨洛尼卡港口附近的爱琴海，如果塞

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要抵抗入侵，会受到严重阻碍，因为马其顿，作为它们的敌人土耳其人手中的一个混乱的长条形国家，将横亘在它们与盟友希腊之间。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要赶走土耳其人。带着那份决心，塞尔维亚人迎来了非凡的幸福。当我们发现自己能够实现一个长期温暖着我们想象力的幻想，并以此满足一些现实的要求，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满足了。这些塞尔维亚人，生活在现代的塞尔维亚，必须实现弗鲁什卡·格拉修道院中的那首诗所写下的内容，也就是拉扎尔大公深色的遗体所体现的那首诗。他们要选择的，不是他们是否把白日梦变成现实，而是拥有白日梦的生存或者没有白日梦的死亡。

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哪场战争拥有1912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的那种浪漫品质。塞尔维亚人骑马朝南方前进，像恋爱中的人一样容光焕发。整个西方都认为他们是一些野蛮的传奇历险人物，也是一群傻瓜，因为他们正朝着从未被打败的敌人前进，而且他们的敌人拥有不配取得的生存魔法。对这些专心致志的军队来说，这根本不重要，他们沉浸在自己丰富的悲剧梦想中。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一年中只有四个月气候尚可忍受；那里有沙尘暴和疟疾，还有在艺术中被描绘成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的人；在那里，他们决意将自己献给战争的恐惧。恐惧接受了他们。夏天灼烧他们，冬天把他们埋进雪中；在糟糕的土耳其式道路上，他们的军需部门经常持续几天出问题，所以他们只能吃树根和浆果；伤员和疟疾病患身体扭曲地躺在无情的岩石之间；他们忍受暴行，他们也犯下暴行。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脑海中是斯拉夫帝国的宏伟画面，经历了时间和失败，它依然强大，就像棺材中的拉扎尔大公。可以这样想象：亚历山大王储的脑海中充满了一种特别的荣耀感，那僵硬的形式和炽热的气息完全属于拜占庭风格，因为卡拉乔治维奇家族不允许他们有其他的诗歌。

三个月内，诗歌完成了。到1912年12月，在欧洲历史中存在了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被毁灭。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当着西方震惊的人们的面大笑。一切本应进展顺利，但是西方在对巴尔干地区的处理中展现出了一种过分全面而持续的特质，以至于最纯净的成就也不能免遭玷污。可能有必要记住的是，在1876年，斯拉夫人曾经有过一次同样的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被骗走。首先是俄国的无能使得他们签下不令人满意的《圣斯特法诺条约》，然后是所有大国——以英国为首——联合犯下的愚蠢罪行，他们将这份条约换成了伤害更大的《柏林条约》，这份条约是为了维持土耳其在欧洲的存在而专门签署的。这也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引起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争吵；它还引起了一些阴谋，导致保加利亚的王位在1887年被一个有着折磨人的冲动和丑陋生活的人继承，他就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斐迪南亲王。在他统治期间，他灌溉、照料着腐败，仿佛它是花朵一样。保加利亚混乱的政治，常常被视为巴尔干地区的耻辱的证明，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可憎的亲王带来的。他一直是奥

地利的工具，尽管他对背信弃义的偏爱导致所有关于他性格的说法很难成形。卡拉乔治维奇家族把塞尔维亚从奥地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就成为奥地利越来越疯狂的反俄国和反塞尔维亚政策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由于人民的意愿，他被迫联合塞尔维亚参加巴尔干战争，而事实上，他的奥地利主人告诉他，他们不反对他这样做，只要他准备好在最后耍犹大的把戏。他确实这样做了。

斐迪南向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保证，他已经从效忠奥地利转向效忠俄国。他和他们签订契约，和他们一起打仗，尽管不是作为想象中的最令人满意的盟友。在金钱和军需方面他特别吝啬，但是在制造“事件”时他慷慨地犯错误，而这些事件的直接目的本是唤起公众的同情。他手下的恶棍之一给训练有素的强盗分发炸弹，让他们用炸弹去炸清真寺，这自然使愤怒的穆斯林冲出来屠杀基督徒。这既使被屠杀的基督徒不高兴，也使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不高兴，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中立的旁观者当作嫌疑人。然而，这样的事就是斐迪南灵魂的主旋律。后来，当和平降临时，他确保导致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冲突成为它首先的结果。《圣斯特法诺条约》给予保加利亚大量领地，使它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了除非她是巴尔干半岛真正的解放者才应当拥有的地位，而三个民族参战时笼统地默认当保加利亚做出了这样的行动，条约则生效。但是它没有做到。斐迪南不擅长管理他那英勇的军队，导致他们实际上甚至都没能完成他们在战争中应该完成的那部分任务；而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库马诺沃战役，是塞尔维亚人独自打赢的。很自然，由于塞尔维亚的特别贡献，它理应在和平协议上要求一些奖励，奖励的形式应该是它和它的盟友希腊之间的共同边界以及萨洛尼卡的海岸线的进入权。这对它的生存来说完全必要，因为奥地利最近从土耳其领土的残骸中创造了一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傀儡国家，它将成为奥地利控制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根据地。

但是斐迪南无礼地抵制了这些合理要求。他按照奥地利的要求玩着犹大的把戏，在战争末期，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播下了争执的种子，不惜在必要时背叛国民的好名声。1913年的夏天，和平协议尚在讨论之中，他就开始在他的军队里散播各种关于塞尔维亚人的谎言。然后在6月28日——那天是圣维特斯节，基督徒在科索沃战败的纪念日，将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霍泰克也在这个日子被刺杀——斐迪南发出了一些命令，甚至他自己的政府都不被允许知道这些命令。很多保加利亚军官和塞尔维亚军官一起进餐，庆祝收复科索沃，但当这些保加利亚军官回到堑壕时，他们被告知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因此他们必须在第二天清早突袭塞尔维亚军队。这是巴尔干历史上最卑鄙的事件之一。它不是一个斯拉夫人会做出的事；它不是巴尔干中世纪风格的残余；它的罪责不能被放到土耳其的门前。它是19世纪条顿主义的成果。

尽管塞尔维亚人背后被捅刀，但是他们继续带着梦想去实现他们的诗篇。那个梦想的强大魔法，那首咒语一般的诗，将刀子变钝。他们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和罗马尼亚人包围了斐迪南，但他泰然自若。他相信他的死期还没到。他于1913年末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签订了一个秘密契约，保加利亚的所有资源任由奥地利和德国安排，条件是如果他继续在位，他将得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如果他被人民放逐，他将得到丰厚的抚恤金。然后，他着手通过贷款使保加利亚成为德国的奴隶，议会在一个最奇特的场景中同意了这件事情。斐迪南的首相面对议会，手上拿着左轮手枪，尽管如此，反对的代表们仍扔出墨水台和书籍，重重地砸烂了议会前座。欧洲政客决心要让德国人坐上王位，以此使巴尔干地区开化。天使们肯定会对此感到很困惑，因为在贝尔格莱德，巴尔干半岛唯一由斯拉夫人统治的国家的首都，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好。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一段时间内给塞尔维亚人的生活投下了一片野蛮行为的红色阴影，否认这一点会有一点轻率。那个清晨堑壕上的背叛式袭击，尽管其罪责在保加利亚的国王而不是人民，却产生了一种以暴制暴的仇恨。第一个塞尔维亚官员去安顿刚刚获得的领土，他表现得仿佛他们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但是彼得国王的自由主义平静地料理了一个久经战火的民族的炎症。这是他个人的困难任务和巴尔干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困难中的一个典型，在与马其顿的暴虐、狡猾的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最精明的助手正是其中一个弑君者。这只老虎，爪子上流着血，前肢交叉；这只金色的野兽变成了一个金色的年轻人；教堂和国家、爱和暴力、生命和死亡，就像在拜占庭时一样重新融合在一起。

这个转变几乎还没完成就受到了威胁，这个威胁极具冲击力，令人震惊。整个欧洲，尤其是塞尔维亚，都知道同盟国正在准备一场侵略战争，却都没有预料到它们准备在1914年开始行动。这些年，大国的情报部门报告的东西从来没有被出版，尽管那肯定比任何数量的外交信件更有启发性。但是据说，出于某种原因，法国和俄国都相信德国和奥地利要等到1916年才会宣战，当然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俄国在1914年的头几个月向几个利益相关方宣布它还没有准备好战争。所以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霍泰克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时，塞尔维亚处于惊愕之下的恍惚之中，而且它开始确定敌人将拿这次谋杀作为立即进攻的借口。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时刻了。塞尔维亚农民军从1912年开始打仗，到了此时，士兵们要么已经回了家，要么正思念着家乡。军械库中没有武器，国库也没有钱去买武器。还有一个艰难的国内局势。彼得国王现在已经完全瘸腿，因为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为了逃脱追捕，在卢瓦尔河游泳，因此染上了风湿；仅在十天前他任命他的小儿子亚历山大为摄政王，亚历山大之前已经取代他的哥哥乔治成为王储，而由于乔治在巴尔干战争中表现英勇，他的拥护者非常激动和愤怒。似乎一个复活的塞尔维亚的历史将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戛然结束。

由于俄国的官方行为，一些塞尔维亚人产生了怀疑。首相尼古拉·巴希奇不相信奥地利的公开抗议很严重，正在去雅典拜访韦尼泽洛斯的他在半路上被召回贝尔格莱德，处理贝希托尔德伯爵发出的著名的最后通牒。尽管奥地利外交部门的一名高层官员被派去萨拉热窝调查这次事件，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推断塞尔维亚政府和这次刺杀之间有联系，但是这份最后通牒还是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十一项要求。塞尔维亚政府被要求：

（1）承认煽动了这一罪行的政策，发布对此的供认状，承诺将来按照维也纳的指示行事；供认状在贝尔格莱德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由彼得国王向塞尔维亚军队宣读。

（2）查禁所有煽动对奥匈帝国的仇恨和指使破坏其领土完整的出版物。

（3）解散国防协会（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协会，它与那个罪行没有任何关联），查禁其他任何参与反奥匈帝国宣传的协会。

（4）从塞尔维亚教育系统中清除任何可能引起不利行为的宣传内容。

（5）开除所有因进行过这种宣传而有罪的军官和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可能马上或者晚些时候由维也纳传达过来。

（6）接受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的合作”，以查禁这些宣传。

（7）对与罪行有牵连的人进行司法调查，并且允许奥匈帝国代表参与其中。

（8）即刻逮捕坦科斯奇上校和米兰·斯格诺维奇，这两个塞尔维亚人给萨拉热窝的刺客提供了武器。

（9）监督塞尔维亚边境，防止任何武器和爆炸物通过，开除帮助刺客通过的海关官员。

（10）解释塞尔维亚高级官员在刺杀后给出的“不合理的”说法。

（11）立即向维也纳报告以上所有措施的执行情况。

塞尔维亚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接受或者拒绝这份最后通牒。

要接受它不容易。第五条和第六条要求意味着塞尔维亚必须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精神属国，这些条件肯定在不久之后就会导致一些挑衅事件发生，接下来就是杀戮和吞并。然而，塞尔维亚政府还是接受了这份最后通牒，只对其中三条提出保留意见。它指出，由于国家的宪法，它不可能遵从奥地

利的某些要求，例如干涉出版自由，除非有立法变更，而它不可能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制定立法变更，但是它愿意将这些事项交给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进行仲裁。巴希奇带着这份代表着他的国家的屈从、耻辱的文件，在7月26日晚上六点前的几分钟到达奥地利公使馆。尽管公使馆离火车站有一刻钟的路程，奥地利公使和他的部下在六点半的时候坐上了去边境的火车，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接受被拒绝了。这三条保留意见比他希望的情况更好，尽管即使完全没有保留意见也没有关系，因为奥地利外交部门的法律顾问已经递来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如何对塞尔维亚宣战，无论它对最后通牒有怎样的回应。“如果塞尔维亚宣布它‘全部’接受我们的要求，没有任何抗议，我们仍然可以反对，理由是它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据，证明它执行了这些必须‘立刻’或者全速执行的条款，而它必须‘不得延误地’告知我们他们执行了这些条款。”

就这样，塞尔维亚落入了陷阱，整个欧洲也难逃劫数。贝希托尔德伯爵和他的朋友，那个已经决心开战的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一起说服了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收回反对，随后通过谎称塞尔维亚军队已经对一个多瑙河港口的卫戍部队开火，赢得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同意。最终的宣战文件在7月28日发出。所有那些破坏和平的阴谋家明显能预见它的后果。如果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而且将它的手一直伸到黑海，俄国肯定要介入。因为一些从本卷已经写到的角度看起来可能一点都不轻率的原因，俄国不想让奥地利帝国成为它的另一个前线邻居，它也不想看到斯拉夫人臣服于日耳曼人。德国肯定会借援助奥地利这个借口加入战争，因为它自己也垂涎俄国的领土、渴望波罗的海已久，而且因为它现在找到了攻击法国的借口。法国是俄国的盟友，已经表现出自1870年战败以来力量恢复的危险信号。数百万人立即被交到黑暗势力手上，而这些势力与在塞尔维亚的势力同样残酷。

贝尔格莱德马上遭到轰炸。一支三十五万人的军队负隅抵抗，他们没有大炮可以用来回击，武器非常匮乏，以至于在有些军团两个士兵只能有一支步枪。他们放弃了贝尔格莱德，他们唯一的城镇，这个象征着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让拜占庭重生的地方，往后撤军，带着苦涩和震惊。但是贝尔格莱德并没有陷落。有一名上校指挥着一支独立师守卫它，上校炸掉了多瑙河上的那座铁桥，阻挠了奥地利军队过河，然后让海关官员和留下来的市民穿上临时制作的军装，于是奥地利间谍误报称有一支人数很多的卫戍部队。依靠奇迹，它未受损害。同时，塞尔维亚军队改变路线，跳起来咬住奥地利的咽喉，不到一个月就将奥地利人赶出了国家，这震惊了全世界。他们甚至攻进了奥地利的领土，踏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地区，还有弗鲁什卡·格拉。

但是奥地利帝国有人数上的优势。它在此刻没有多少其他东西了；它一次

又一次表现出缺少德行甚至常识，学习历史的人肯定会惊叹它竟然跟18世纪的奥地利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它利用了自己拥有的优势，在9月份重新派出了它的军队。这次他们享受了一个确实可耻的优势。在第一次入侵的时候，他们毁坏村庄，掠夺庄稼，烧毁房屋，谋杀平民——已知至少有三百零六名妇女被杀害，很多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五岁以下的儿童也厄运难逃。所以，当塞尔维亚军队撤退到已经被毁坏的乡村，它没法提供食物给他们，反而增加了沮丧，而且难民如洪水般涌入这里，他们有些是塞尔维亚人，有些来自奥匈帝国的斯拉夫地区，所有人都深陷饥饿，双腿酸痛，讲着敌人的恶意暴行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精神和更高命令的话，他们可能早已陷入恐慌。彼得国王跛着脚来到一些军队中间，他们正在动摇，因为他们没法回应敌人的炮火，国王就像一位荷马史诗里的将军，对他们说："英雄们，你们发过两个誓言：一个对我，你们的国王，一个对你们的国家。我解除你们的第一个誓言，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除第二个。如果你们决定要回自己的家，而且如果我们胜利了，你们不应该遭受痛苦。"

他们没有回家。密施茨将军，那个彼得国王曾经拒绝解除其职务的严肃的、不情愿的弑君者，任命了一千五百个年轻学生作为非委任军官来领导士兵。这些年轻人，战争之前在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巴黎读书，最后只有一百四十个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武器突然被送到军人手上，那是英国送来的武器。这些人已经筋疲力尽，不再依靠经验活着，而是靠人类的普遍常识；这些年轻人完全没有经验，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同样原始的知识，同样地，他们忘记了普遍的慎重的观点，即死亡令人不快；他们如此看待死亡、生命和荣耀：仿佛他们是一千年前已经死去的英雄，或者是不会死亡的诸神。他们再次猛然冲向奥地利人。12月底，他们夺回了贝尔格莱德。他们取下在王宫上空飘荡的匈牙利国旗，把它放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彼得国王和他的将军们走到人群中，和群众一起感谢上帝。他们必须感谢上帝，因为他真正暂停了自然规律；因为当奥地利人从边境撤退的时候，那里留下来的奥地利俘虏比塞尔维亚的士兵要多。

没人知道彼得国王对未来的打算。在他年老时，他变得更偏向塞尔维亚人的性格，日内瓦的痕迹不如以前强烈。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勇士国王，一个尼曼雅王朝的重生者。但是，据说，亚历山大王储，这个圣彼得堡军事学院的苍白书生，知道这次胜利不过是一次喘息的机会，随后肯定会有一场猛攻，而那将意味着塞尔维亚的失败。这个国家明显地受到了一次重创，它比以往任何军事行动造成的伤害都严重，这肯定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恐惧。一些奥地利军队来自加利西亚省的某些地区，斑疹伤寒是那里的流行病，而他们把病菌带了过来。在一个食物紧缺、水源被污染、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是死去的士兵和动物的尸体而人们无力清理的地方，发烧很快就传播开来。医院系统，尤其是收复的土耳其省份的医院系统，完全不能

处理这一疾病的泛滥，事实上，它杀死了塞尔维亚三分之一的医生。一些外国卫生组织前来，其中埃尔茜·英格利斯的苏格兰女子医院留下了不朽的荣耀。自己也患了内科病的亚历山大亲自巡视全国上下，组织医疗服务。

1915年夏天，奥地利与塞尔维亚洽谈，提议单独媾和。那天在尼什，天气酷热，国民议会拒绝了他们，表示他们决心继续战争，直到从奥地利的枷锁中解放出所有的斯拉夫人。这意味着彼得、亚历山大和巴希奇开始认为，除非一直以来都存在并威胁着他们国家的残暴力量解除武装、分崩离析，否则他们国家的生命不值得维持。他们认为，如果法国、英格兰和俄国能摧毁强大的同盟国的话，让他们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更好的选择。

他们在酷热和尘土中等待着。在他们周围，难民在一片饥荒的土地上流浪；拿着武器等待的士兵已经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在中世纪的卫生和军需条件下奋战了三年；附近的边境地区聚集了很多敌人，而他们的协约国英国和法国不允许他们驱散敌人。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英国和法国正在与德国打仗，但他们仍然相信那个传说，认为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中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即使这样一种看法的唯一证据是它是其中最德国化的国家；协约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看法，那就是说服保加利亚人去对抗德国人、保卫塞尔维亚人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即便就在两年前他们还攻打、侮辱了塞尔维亚人。因此他们禁止塞尔维亚人去攻打正在边界集结的保加利亚军队，塞尔维亚人本来可以轻易地打败他们。当塞尔维亚请求二十五万人去击退迫在眉睫的入侵时，他们的回答同样令人震惊，他们正安排保加利亚人向这些军队提供物资。他们通过把罗马尼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土地送给保加利亚来实现这些行动。这自然导致罗马尼亚和希腊反对协约国，并使塞尔维亚人心中充满困惑与痛苦。

9月份，入侵开始。到10月份的时候，塞尔维亚军队只剩下二十五万人，面对着三十万人的奥德联军——由伟大的军事家马肯森指挥，同时，还有同样数量的保加利亚人。现在这个国家只能死去了。士兵们缓慢地撤退，做最后的抵抗，留下了平民，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儿，面对着一个必然无比可怕的压迫的夜晚。僧侣们从修道院出来，跟随着士兵，他们推着的牛车上放着棺材，当路面太糟糕的时候他们就把棺材扛在肩上，棺材里是中世纪塞尔维亚国王的遗体，那些神圣的尼曼雅王朝国王的遗体一定不能被玷污。彼得国王也坐在牛车上，因为在秋天的寒意中，他患了风湿的四肢已经完全瘫痪。撤退开始后没多久，亚历山大王子也这样了。他整年被内科病折磨，现在病情已变得非常严重，所以他都不能再骑马。医生将他带到一个农舍，给他做了阑尾手术。然后他被裹上紧得像寿衣一样的绷带，放到一副担架上，随着军队前进。这就像一幅拜占庭壁画上的某个奇特细节，它不太真实，几乎不可能是真的，却有效地象征了一个真相，就

是这个国家将死去，在它死亡的路上，它带着他们的国王，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他们都卧着，无法动弹。

撤退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场上做了最后一次抵抗，就在不久前，在创造者的另一个梦里，科索沃知道了胜利：在那里，拉扎尔维奇大公证明了失败可以持续五百年。敌人的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着，那是恶魔的最新工具。他们最后一次尝试摆脱保加利亚人，转向了黑山的屏障，科索沃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阿尔巴尼亚群山。很多士兵和难民都不愿面对通向流亡的冰封道路，他们转身逃向塞尔维亚，他们被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屠杀，那些人一直是土耳其人喜欢的臣民，他们痛苦地憎恨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征服行动。军队里的其他人服从了命令，他们必须迈出这绝望的一步，希望一些人能够活下来，凭借英国和法国的帮助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上重组军队。当他们来到群山山脚，哭泣的炮兵用手榴弹和燃烧汽油毁掉了他们的大炮。在悬崖边缘，道路变得狭窄，只够骑马通过，开车的士兵将车开到角落，跳下车，让车旋转着飞向空中。然后所有人开始步行翻越他们与大海之间的五千英尺高峰。还有些人选择了别的路径，但是无论选择哪条路，他们的命运都一样。他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和白雪中步履艰难地前进着，12月的寒风刺破了他们破烂的军装。很多人倒地死去，其中一些人是饿死的。他们正穿过欧洲最贫瘠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他们，而且黑山国王下令禁止臣民给出任何东西，因为他和奥地利达成了背叛性的协议，尽管他是塞尔维亚的盟友和彼得国王的岳父。塞尔维亚人只能吃路边死去的动物的生肉，或者吃自己的靴子。一些人死于痢疾。一些人被阿尔巴尼亚狙击手开枪射死。在二十五万塞尔维亚士兵中，十万人面对着这样的死亡。有三万六千个男孩子还不到入伍年龄，他们加入撤退是为了躲避奥地利人，其中两万多人在这条路上死去。还有五万奥地利和德国战俘，他们只能跟随塞尔维亚人，因为他们自己军队的当权者拒绝交换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永远没有从山上走下来。

当幸存者到达海边，他们发现协约国再次辜负了他们。他们到达的港口被奥地利潜艇击沉的一些船只堵塞，所以既不可能有食物运来，也不可能有船来运走他们。他们只能继续挨着饿朝南边跋涉。他们的安全多依靠意大利负责，而意大利已经签署了《伦敦条约》，它明白塞尔维亚如果奇迹般地得到重建，肯定会争论那份愚蠢文件对斯拉夫领土的分配。最后法国和英国安排将塞尔维亚人送到希腊的科孚岛，因为希腊对协约国有一份义务，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外交手段也不能使这份义务失效。塞尔维亚人仍然非常饥饿，他们被安置到用来运送他们的小船上。就在第一艘船准备离岸的几个小时前，有一艘运粮船在港口外面的海峡被击沉，一块块面包仍然在波涛中漂浮。很多塞尔维亚人只见过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从来没有见过更深的水域，一些人从船上跳下去，想要蹚水过去捡面包，他们马上沉了下去。其他人知道北方的河流或者奥赫里德湖或者普雷斯帕湖，他们试

图阻止那些想要跳下船的人，他们扭打在一起弄翻了一些船只。因此很多人都被淹死了。

在科孚岛上，塞尔维亚军队倒下，睡着了。一些人永远没有醒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燃料也短缺。持续几个星期的每天晚上，船只都将因为严重饥饿和疾病而无法康复的人抛到大海里。到了春天，天气一变暖和，很多人就动弹起来，伸展身体，抬头看着阳光，他们那金色、年轻而狡猾的模样，就像他们在巴尔干战争时那样。亚历山大恢复了健康，赶赴巴黎、罗马和伦敦，向协约国力陈一支远征军的价值，它可以使用萨洛尼卡作为基地，攻打同盟国在塞尔维亚留下的军队。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军队得到操练，再次装备起武器，再次被鼓舞起来。到了夏天，他们开始攻打萨洛尼卡。在他们被赶出塞尔维亚的一年后，他们又回到了塞尔维亚的土地上，攻打保加利亚人。1916年11月，他们拼尽全力夺取了凯马克莎兰——它的意思是“黄油搅拌器”。它俯视马其顿的南部平原和朝北的道路，曾经被认为坚不可摧。事实上，近东战役结束了。但是战争在其他战区还没有充分成熟，他们还不能安全地收获胜利，所以塞尔维亚军队坐在马其顿等待。1917年夏天，塞尔维亚政府和南部斯拉夫的一个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宣言，宣布成立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一个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民主议会制的君主国家，它将平等对待三大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使用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事实上，他们宣布奥匈帝国被摧毁了，在它的废墟中他们正在成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王国，以此来继承八百年前拜占庭的荣耀。那首诗现在被写成了。在1918年的秋天，塞尔维亚军队，作为协约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冲进敌人的军队，将保加利亚人驱赶回保加利亚，将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赶回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国家——它失去了所有的制度，甚至所有的特点，除了从他们的诗歌中升起的一些不满情绪，而那些诗歌太缥缈和残暴，以至于无法真正被写下。一个更具诗意的国家要在世界大战停战的十三天前的贝尔格莱德找寻。

贝尔格莱德VIII

对这个故事来说怎样的续篇才不是令人扫兴的结尾呢？国家命运达到的这个高度从来没有被超越，只有罕见的几次同样高度的出现。这与个人生活不同，因为思想拥有无限的创造性，永远可以超越任何外在事件。可能对彼得国王而言，战争只是一段更伟大的经历的序曲。他没有参加1918年的战役，因为那个时候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他去了希腊，甚至在塞尔维亚获得胜利之时都没有离开那儿。政府进入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也没有在场。一直到1919年年末，他还逗留在原地；之后他继续往北走，最远只到了阿兰德洛瓦茨，也就是位于托波拉的卡拉乔治维奇家族老家附近那个简陋破旧的温泉。有一天，他毫无预警地回到贝尔格莱德，人们没有认出他，因为他在希腊的时候蓄起了像牧师一样长长的白胡须。摄政王和人民欢迎他，乞求他在王宫住下，但他不肯这样做，他说，既然他已经不再是国王，那样做就是错误的。这证明了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古怪之处，还有他们对自己皇室成员身份的矛盾态度。亚历山大没有搬进王宫，尽管它崭新又舒适。他在城市主要街道上的一栋简单的单层楼房中安了家，房屋装修得几乎跟战时参谋部一样简陋。

后来彼得住进了一座俯瞰托普西德公园的别墅里，曾经在那座公园里，塞尔维亚的迈克亲王被谋杀，年幼的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学会了游泳。彼得过着越来越像隐居的生活。他对他的人民并不冷漠。他剪掉了胡子，因为他们抱怨它遮住了他们敬爱的国王。但是他所有的精力都被投入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关系中。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现在不是一个团结的家族。亚历山大忙着将南斯拉夫这个新国家变成现实，他从白天工作到半夜。彼得的弟弟阿西尼厄斯性格轻浮，就像他的堂弟亚历克西斯和博日达尔，那两个知名的花花公子，他回到了巴黎，在那里他将证明有很多条道路通向平静的晚年。阿西尼厄斯和奥萝拉·德米多夫的儿子，保罗亲王，实际上是摄政王的秘书，就像摄政王一样勤奋工作。一片乌云降到彼得唯一的女儿叶琳娜和她的亲戚头上。她嫁给了康斯坦丁大公，现在她在俄国革命中被抓了起来。她的丈夫已经被杀，而她被关进了监狱，靠一个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塞尔维亚军官干涉才被释放。她一回到贝尔格莱德就开始有谣言传播，说她从俄国逃出来的一些情况使卡拉乔治维奇家族非常生气。谣言说，他们认为她同意了一些可耻的条件才获得自由，或者她没有体面地注意那些条件。这些可能是局外人编织的一些幻想，用来解释那场对局内人有更多无聊意义的争吵。但是事实是，大公夫人很快离开了南斯拉夫，定居在瑞士。家里除了彼得的大儿子乔治就没有别的人了。

彼得之前剥夺了乔治生来拥有的权利，把属于他的王冠给了他的弟弟，那

之后乔治变得日益疯狂焦躁。父亲和儿子一起住在托普西德安静的别墅中，这可能被认为很危险。但是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彼得非常温柔地疼爱他的儿子，这种疼爱引导了他远离悲剧。老国王不再是日内瓦和法国造就的那种性格，他失去了西方的观念，不再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有着看得懂的模式。当乔治反常地大笑大哭或者毫无理由地对着夜空开枪时，他都不会被吓倒。如果他那英俊儿子的灵魂游荡到别人跟不上的地方，那么可能他也在寻找智慧。他们住在一起，彼此给予了一种完美的爱。老人在1921年夏天失去理智，患上了精神疾病，乔治用耐心与善意照顾他。当他逝世的时候，摄政王正在巴黎，这个信息让他完全崩溃，因此他的医生禁止他回贝尔格莱德参加葬礼。所以乔治是他父亲的主要哀悼者，他十分庄严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普通人眼前。亚历山大的敌人说那是因为兄弟仇恨，但是那些偶尔和这位哥哥接触的外国人并不持有这样的看法。

由于他的责任，亚历山大的私人生活受到约束。他必须与外面的世界斗争，所以扫兴的结局就是他的命运；他憎恨它，因为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荷马对生命的观念鼓励的统治者。每一天都应该是黎明，每个人都应该是英雄，宝剑应该被用来匡扶正义。相反，他发现自己被一些琐碎卑鄙的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他预见到了它们，但是其他人的愚昧使他不能避开它们，所以它们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他不能开展建立国家的真正事务，因为，如果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不能保证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团结。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希望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纳入他的王国。战争伊始，他所希望的，不是一个南斯拉夫，不是一个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而是一个更伟大的塞尔维亚，它将在塞尔维亚王国的基础上，加上奥匈帝国所有以塞族人——指的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他属于那种思想流派，它认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非常大，以至于这种区别超越了民族或者语言的统一。

毫无疑问，这个更加伟大的塞尔维亚将成为比南斯拉夫更方便的实体，但是它只能依靠两个条件存在：在东方得到俄国的支持，在西方与讲德语的天主教斯拉夫国家分开。然而，1917年，俄国沙皇政权变成废墟，在奥地利帝国的所有斯拉夫臣民中，捷克人非常高效地组织起来，他们说服调停国信赖他们能够由一个独立的国家管理。所以塞尔维亚需要天主教斯拉夫人，他们也需要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当时叫作南斯拉夫王国，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性格的不相容并没有因此消失，这导致国王面对无数麻烦。

亚历山大不能镇静地承受这些纠纷，可能是因为他在战时遭遇的个人悲剧。我们现在知道，当他还是圣彼得堡军事学院的学生时，他爱上了沙皇

的某个女儿，尽管她那时还是一个女学生。他向他的父亲提起这件事，他父亲询问沙皇，当这个女孩长到合适的年纪时，亚历山大能否被允许成为求婚者，他得到了赞同的回答。1914年1月，塞尔维亚首相巴希奇先生去俄国询问，既然巴尔干战争已经结束，亚历山大能否开始他的求婚，然后他得到了许可。如果战争没有爆发的话，亚历山大很可能会在他被任命为摄政王后很快着手操办此事。

我们不能确定这次求婚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知道沙皇的女儿们被允许在这方面有自己的选择，而沙皇皇后则希望她们都不要嫁出俄国。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亚历山大的一片真心。他不是仅仅想成为沙皇某个女儿的丈夫。他想要这位特别的女孩成为他的妻子。1917年3月，消息传来，沙皇退位，他和他的家人都落到了革命者手中。1918年7月的某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在叶卡特琳堡被处死，当时的亚历山大正在马其顿的闷热平原上。亚历山大对布尔什维克的怨恨，看起来可以合理地归咎于这件事情，它至少和他的情绪化意见或者政治偏见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似乎看不到其他女人的存在。他父亲死后，他四处寻觅一位妻子，但只是为了王朝考虑；尽管罗马尼亚的玛丽公主非常美丽，但他选择她可能只是因为她和英国的联系以及她的罗曼诺夫血统。但是他确实一心一意地爱着她，他们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很大幸福，也给他带来了三个儿子。她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妻子，因为从她的母亲，也就是著名的玛丽王后那里，她继承了亚历山大缺少的流利言谈能力和聪明头脑。她喜欢以最高车速翻过山峰到亚得里亚海边，她喜欢飞翔的感觉。她也有一种渴求舒适的本能，这在巴尔干地区很受欢迎。在托波拉的卡拉乔治维奇野蛮而荣耀的老家和欧普莱纳克山的拜占庭对庄严和死亡的宏大宣言之间，在一些果树葡萄园之间，王后规划了一间小屋，在那里，她和亚历山大还有孩子们一起过着一种未经雕琢却也文明亲切的生活，维多利亚女王使这种生活成为欧洲皇室的普遍形式。卡拉乔治维奇家族总是沉浸在他们可怕而辉煌的历史的浪潮中，现在他们终于能够来到水面呼吸片刻了。

国王得到了婚姻的安慰，也许，还有雄心的慰藉。因为他仍然充满雄心壮志。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童年时，他是一个王位觊觎者的儿子，处于几乎可笑的贫困中，住在日内瓦的一间狭窄公寓里；作为一个少年，他被高举到离罗曼诺夫王位只差一步的地位；作为一个青年，他推翻了压迫人民五百年的帝国统治；在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之前，他逐退了另外一个帝国，那个欧洲列强中最难应付的帝国，让史蒂芬·杜尚的荣耀得以重生。据说，他还打算走得更远。他从来不赞成被加冕。尽管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卡拉乔治维奇家族应该被移植在尼曼雅王朝之上，但在他举行涂油礼时，奇卡修道院没有按照古老习俗为他在绯红色墙上开辟一扇新

门、仪式完成后再重新砌好。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想推迟仪式，推迟到他可能不是被加冕为国王，而是被加冕为皇帝时——那个帝国，比史蒂芬·杜尚所知的还要伟大。

亚历山大对俄国的国内情况很感兴趣，而且他相信布尔什维克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二十至三十年。在此期间，他希望建立一个巴尔干联盟，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真正联盟，当布尔什维克崩溃的时候，它将进入俄国，拯救北部斯拉夫人。到时他将在奇卡修道院被加冕为塞尔维亚的国王和所有俄国人的皇帝。

这个梦想并没有像西方读者认为的那样疯狂。南部斯拉夫人喜欢俄国，无论它是在白色政权还是红色政权的统治下，但是他觉得它不像他自己那样有能力，而且在他看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并不会比他征服土耳其人更艰难。而且这也不是纯粹的侵略。国王相信，他的信念是对的，斯拉夫人需要保护自己以对抗意大利、匈牙利和说德语的民族，他们越团结越好。但是无论他的计划还是理由，都需要艰巨的努力。不过，他的心里赞同艰巨的努力；让他痛苦得无法承受的是，与此同时他还要调解那些渺小之人的细微分歧。

南斯拉夫的主要弊病，与在战争中消耗着每个欧洲国家的弊病一样：缺少青年和中年人。塞尔维亚失去了五分之三的人力，还失去了十分之九的那些成为非委任军官的大学生。克罗地亚人为奥地利帝国打仗时吃尽苦头。它就像凋落的花朵，而它在战争中总是这样。没有年轻能干的领导出现，战前的政治家因为年纪和责任筋疲力尽，一些二流的冒险家为了利益，正利用人才的缺乏带来的机会谋得职位，而心烦意乱的普通士兵为这些令人不满的领导争吵。国王一直因为职业军人不能区分争论和兵变而感到痛苦，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些真正的理由来说明他的臣民的政治争论令人担心。

这个情况中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在这个时代所有打仗的国家里普遍存在：旧式的自由主义面临着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尽管在国王年轻时，他的哥哥坚信法西斯主义，他也被诱惑，考虑过它，但是他一直被教导成为老式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将一直保持这样。但是情况不允许。维持出版自由非常艰难，尤其当它被不同党派用来鼓吹刺杀对方领袖时。混乱非常严重时，法庭不敢宣判罪行最严重的骚乱者有罪，也很难做到一定要经过审判才把人关进监狱。而且国王不能跟他的自由主义臣民讨论，因为他无法理解知识分子。

他可能更能理解艺术家。他的成长过程一直沉浸在一首历史诗歌里，他非常热情地喜欢音乐，他的表弟、最亲密的朋友保罗亲王，爱好伟大的绘画。但是他和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共同点。他不能理解——也许这是因为他

算是一个艺术家——他们为什么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抑制一下自己的批判才能。在黑山高耸的杜米托尔山下，有一个幽暗的、表面光滑如镜的湖，湖面倒映着很多雪峰，它们在影子中显得双倍纯洁，既有它们自己那雪的纯洁，又有倒影那黑色的、清澈如水般的纯洁。国王曾经在这座湖边搭上帐篷住了十三天。他对一个送公务文件至此的秘书说——古板的声音颤抖着——“如果贝尔格莱德那些知识分子能够像我一样，来到这里，看着这座湖，他们就不会……不会……”从那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句愚蠢的话，他们正在捍卫人权，他们正在抗议无辜的人被关进监狱以及言论自由被镇压。但是对一个已经实现弗鲁什卡·格拉幻想的人而言，这不是一句蠢话。

国王不能理解任何战后左翼的东西，而且比人们对他这样年纪的人预期的情况更严重，这对他进一步地不利。他的很多国民赞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一些人加入共产党，他觉得这完全是恶毒的行为。他问，如果他用武力对待克罗地亚人，无论是多么微小的行动，那些人都会非常震惊，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毫无怨言地接受红色政权的大屠杀？他提出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意愿去理解它的答案，因为他在想着一个被谋杀的女孩。别人告诉他，这种态度是对抗贫困的起义的一部分，他回答说这样的起义没有必要，因为他的王国中的人们比他们以前的情况好多了，而且如果国家能够安定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有希望继续下去。他的回答非常准确，但是很不切题。一个饥饿的人正在承受绝对的不舒服感，即便别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也相信，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经常更饥饿，他的父亲一直以来比他还饿，他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安慰。

国王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和平。在贝尔格莱德曾经有过一次德国绘画展，那些绘画是由南斯拉夫驻柏林公使馆的一个塞尔维亚官员挑选的。当国王去参观的时候，他认真地检查了那些作品，然后召唤了那个官员。他没有恭喜他，反而冷冰冰地责备他选了凯绥·柯勒惠支(注)的一些揭露战争恐惧的油画。这件事或者其他事情表现出他对和平主义的厌恶，这被左翼用来证明他的嗜血，但是他们完全弄错了。在现代历史上，很少有将军像他那样充分地经历过战争的恐惧，他并不具有那种将喜怒付诸行动的性格。但是他相信，南斯拉夫可能必须再次为它的生命而战，因此他认为抑制斗志意味着走向自杀。他完全忘记了，知识分子的恰当功能是在人们眼前维持一些道德价值，即使它们不能马上被付诸实践。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他的处境使他不可避免地忘记了这一点。

国王推断南斯拉夫可能要再次为生命而战，这一点当然完全正确。这些年，很多丑陋之人被提拔起来，相比起来，墨索里尼看起来似乎是个亲切、几乎不会冒犯别人的人，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的性格其实与此完全相反。普通罪犯的脸在精神病医院里让人放心，但在火车车厢里就可能

让人讨厌和害怕。墨索里尼一上台，他在南斯拉夫事务中就扮演着完全邪恶的角色。因为他们拥有达尔马提亚，他就尖叫着羞辱他们，而且不断激起骚乱和暴动，而这还算是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最无罪的方面。南斯拉夫有两个主要的政治不满中心——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在那里，墨索里尼试图残忍地摧毁国内和平。在克罗地亚，他发现刚开始很难取得立足点，因为那些反叛者大都是一些有着高尚节操的人，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并且知道羔羊请狐狸帮忙打狼会有什么结果。但是马其顿人马上变得更加暴力、更加无知。他们的例子很让人惋惜，因为它是古老的美德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被糟蹋的结果。马其顿人，这个豪爽的民族，当年他们展开一个有时公开、有时秘密的叛乱，持续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为巴尔干战争铺平了道路。叛乱的组织者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著名的I. M. R. O.注——它由保加利亚马其顿人于1893年成立，他们都是一些嗜血之徒，然而也是伟大的英雄和可怜的受害者。

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土耳其人被赶了出去，马其顿被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瓜分。保加利亚非常憎恨划分领土的条款。一些保加利亚人希望拥有完全属于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其他人则想要一个独立的马其顿，一个完全自由的梦想之国，尽管它将来必须依靠资助，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国外重新移民进来；还有一些人想要一个联邦制国家，和瑞士相似。这些政党成员都是一些与生俱来的革命者，他们再也不愿意过着顺从的生活，就像一个女裁缝不能成为一个芭蕾舞者一样。他们被激怒了，因为南斯拉夫严厉地强迫它最近获得的领土上的很多保加利亚居民使用塞尔维亚语，将他们的名字改成塞尔维亚形式，而且很多南斯拉夫官员也不称职，事实上与以前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表现得一样糟糕，因此同样（也很自然地）被怨恨。他们因此重新组建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把它变成一个反对南斯拉夫王国的组织。

他们立即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总部设在边境附近，不断地突袭冲过边境，在南斯拉夫马其顿纵火、抢劫、杀戮，就跟过去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一样。他们造成的损害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为当地农民被恐吓，不敢向官员报告他们的损失，但是据说在1924至1934年间，已知的死于暴力的人数就超过一千。这段恐怖时期本来可能永远不会被载入编年史，因为南斯拉夫或者保加利亚政府为了维持秩序，都不希望公开它们丢脸的无能，但是雅典特快列车上的乘客凝视着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边境带刺铁丝网缠绕的连续防线、甲板掩蔽部、堡垒以及探照灯岗哨，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知道，欧洲理论上处于和平状态。每座桥梁、每条隧道、每个岗哨都由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即便如此，雅典快车上的乘客有时会突然停止凝视跟震惊，因为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喜欢将炸弹带上国际列车，这样一来，爆炸就会被全世界报道，让他们的事业为世人所知。但是如果乘客有幸能继续思考，他可能会想，是常备军的袭击导致了这个周密的防御体系，但

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怎么能够负担得起维持常备军的费用？众所周知，马其顿农民是欧洲最穷的人。

除了从车厢窗户看到的这个令人吃惊的场景，还有更多理由让人想到这个问题。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保加利亚和国外都出版了报纸和宣传册。它在西方所有国家的首都设立了宣传办公室。它擅长奇怪而缓慢的刺杀行动，而这些行动都需要耗费很多金钱：它可能派一个成员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谋杀它的事业敌人，但是那个成员被命令不要马上行动，而是在敌人身边住几个月后再动手。它也在索非亚运行一个昂贵而有效的系统，在很多年内控制了保加利亚政治。事实上，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了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党，谋杀了农民党的伟大领袖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击溃了共产党，尽管共产党的人数已达到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这个最后的功绩之中，它得益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优柔寡断，他叫季米特洛夫，将来他会因为在国会纵火案中完全不优柔寡断的表现而闻名。但是这个功绩和其他功绩都耗费金钱。有一些钱来自马其顿支持者心甘情愿的馈赠。有一些是通过一个高效的非法税收系统从马其顿人那里偷来的，无论这些人是否是支持者。那个税务官，无论他是不是保加利亚马其顿的信徒，他的亲人在这个国家，他非常在意他们的安全，所以他对税收有两方面的需求：一部分付给保加利亚政府，另一部分，金额大概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借由他转给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但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意大利。

如果亚历山大有时残忍地对待那些和外国势力合谋威胁人民安全的反叛者，残忍地对待那些完全看不到密谋暗示的知识分子，他不完全该受指责。情况太让人困惑了。他很难看出来，相比于对抗不满分子的敌意行动，他与大敌和解的行动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害，后者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看起来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胜利，而且绝对是他最伟大的道德胜利。实际上，这是使他生命的最后六年变得黑暗的动乱根源。从一开始，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史蒂芬·拉迪奇就是国王的眼中钉。甚至甘地都不像他那么吸引追随者。尽管他指导他们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他自己却宣称这些方向都是一致的，因为他带领他们走的道路全部都是远离塞尔维亚的道路。战前，他反对匈牙利，但是非常赞同奥地利，非常尊敬哈布斯堡，而且他倡议创造一个三位一体的王国，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征服了塞尔维亚的更大的克罗地亚。战后，他宣扬建立一个不会向农民征税的、有着独立共和政体的克罗地亚，阻止克罗地亚代表去贝尔格莱德接受他们在国民议会的位置，并且攻击政府，攻击方式之激烈，使得他时不时被监禁都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

到了1923年，情况应该已经有很大改变。他到伦敦，《泰晤士报》前编辑斯蒂德·韦翰先生，一个罕见地能够理解巴尔干局势的英国人，强烈要求他

放弃他的共和主义，着手清除南斯拉夫体制中的一些不民主的元素，将它转换成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制。拉迪奇之后说，他被说服了。但是当他回到南斯拉夫，他忘记告诉别人自己内心的转变，随后他被监禁，他的政党被宣布为不合法，主要因为他在回国时经过了俄国。国王和政府的这个惩罚举动是暴躁脾气下的不理智的举动，但也不像看起来那么愚蠢。拉迪奇自己的叙述是，他去拜访列宁，建议他放弃布尔什维克，建立一个农民共和政体。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游历的部分原因是他对旅行的过度喜爱。但是布尔什维克当中冷静的旁观者相信，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利用贝尔格莱德对社会革命的恐惧来要挟它，而且好像他在那里的时候，加入了农民国际。然而，一被关进监狱，他就派人请来他的侄子，向他口述了一份自己对君主政体和宪法的信仰声明。

国王一得知这份声明，就立即任命拉迪奇为教育部长，而且给他的非法政党中的三位重要成员安排了内阁岗位。尽管这是拉迪奇的追随者们收到的第一个暗示，表示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计划，他们似乎也没有片刻的惊慌失措，这证明了克罗地亚人的奇怪天性。拉迪奇直接从监狱出发去往国王的宫殿，在那里，这两个敌人坐下，谈了几个小时，彼此一见如故。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五年。皇室家庭变得很喜欢他，他也经常作为密友来到王宫。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王后喜欢跟他讲英语。随着他的视力下降，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拿起他的盘子，帮他切碎食物。国王开始喜欢他，超过了自战争以来他对任何政治家的喜爱。

1928年，灾祸降临了。这个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人们抱怨着它的动乱。有一些动乱不可避免：国家货币有必要改为统一单位，随之产生了一定的通货膨胀。一些动乱可能可以轻易地被避免：那些政党不断地分裂成越来越小的派系，因此，任何政府都几乎不可能执政足够长的时间来开展有效的行动。在十年内，有二十一个政党拯救过南斯拉夫，发生过二十五次政府变更。拉迪奇仍然是部长。说老实话，他没有给这里的政治生活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也没有做什么事使自己与长期攻击他的其他部长们区分开来。此时，尽管他理论上是左派，他却突然要求军事独裁。“我们的国家军队，”他告诉国王说，“是我们的民族自豪的最完美呈现，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领袖，他足够强大，能够无情地驱除腐败以及目无法纪，摧毁政府中的党派性，战胜那种正将我们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监狱的政治恐怖主义。”这既激怒了政治寄生虫，也激怒了南斯拉夫那些真诚的民主人士，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展了反腐败运动，对那些他认为使独裁成为必要的滥用职权行为做出定义，点名犯下这些罪行的人。

那些更卑鄙的报纸叫嚣要他的鲜血，它们真的想要某人去杀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他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自己也没有考虑清楚。在一个最迫切需要冷静的情况中，他表现得充满挑衅意味；他的狂暴也完全不经约束。

他能在议会站起来，把其他的部长同僚叫作猪。而且很不幸的是，他从奥地利得来的日耳曼偏见使他不屑于谈论德国影响范围以外的所有民族。在国王和王后的影响下，他才艰难地学习接受塞尔维亚人，但在他眼中，更辽阔的南斯拉夫王国当中更偏远的地区的人，就跟美国南方人眼中的黑人差不多。他把“辛卡”这个词作为一种侮辱，就好像它的意思是一种人类杂种，尽管辛卡是指一个牧羊人民族，他们从拜占庭时期就在马其顿高地可敬地劳作。他完全感受不到南斯拉夫的梦想诗篇，以及那种在错误和残酷中仍然鼓舞着它的仁慈。在他眼中，以及在大部分克罗地亚人眼中，人们被从伊斯兰教的势力下拯救出来，在这个国家的庇护下恢复到基督教文明，这完全没有意义。

6月在塞尔维亚历史上不是一个好月份。1928年6月20日，有一位叫普尼沙·拉契奇的黑山代表和其他人一起被指控腐败，他走进国民议会，拿着左轮手枪开了五枪。当场死去的有一个叫巴萨瑞彻克的克罗地亚代表，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聪明人；拉迪奇的侄子保罗和另外两个克罗地亚代表也受了轻伤，拉迪奇本人则受到致命伤害。六个星期后，这个奇怪的、难以定义的天才逝世。国王一直守在他的床前，脸色苍白，痛苦地颤抖，在这个受伤的人最疼痛的时候紧握着他的手。在这几个星期内，有一场可悲的争论，之后的事件使它变成了令人悲痛的讽刺。“等你好了，”国王说，“你一定要出任首相。”“不，不，”拉迪奇回答，“首相一定要是一位将军。”他已经挑选了一位叫萨科维奇的将军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其他人可以看出所有这样的谈话都没有用处，很快他就被送回在萨格勒布的家等待死亡。临终时，他说了很多愿望，它们在之后几年里变成了痛苦的讽刺，因为他的追随者中没有任何人想为他的死亡复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将开始最彻底、最慷慨的和解。

由于拉迪奇的死，亚历山大被人指责，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从拉迪奇的死亡中，他失去了很多，却几乎没有收获什么。但是因为其中看似真实的成分，一个将卡拉乔治维奇家族和谋杀绑在一起的险恶联想还是被提出来针对他。塞尔维亚的迈克亲王、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国王和德拉加王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霍泰克，这些人都被谋杀了，他们都是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敌人。人们也回想起，在战争期间的萨洛尼卡，著名的“蜜蜂”，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被发现试图谋杀亚历山大。根据一些微小得古怪的证据，他被宣布有罪，随后被枪毙。斯拉夫人喜欢给彼此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叙述这些故事的乐趣中，人们忘记了拉迪奇在五年前就不再是国王的敌人。

针对普尼沙·拉契奇的判决让所有这些对国王的怀疑被进一步确认。拉契奇被判定患有精神病，送去一家精神病医院。这被人们认为是为了避开执行死刑而采取的诡计。但是很多反叛者，包括克罗地亚人，他们犯了谋杀

罪，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监禁，而且普尼沙·拉契奇确实很有可能患有精神病。他是一个能力卓越的人，尽管他在巴黎学习法律，实际上，他一直是一个原始部落的酋长，在建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秩序过程中做出了宝贵贡献。这涉及了一定的野蛮镇压，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和支持奥地利的黑山人正劫掠塞尔维亚村庄，谋杀游客，割断电话线。受过训练的非正规兵团经常情绪失控。他们看到了太多的恐怖，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害怕，这让他们灵敏的大脑无所适从。1919年，普尼沙·拉契奇逮捕了一位英国船长，那位船长当时正作为同盟委员会成员游历全国，诉讼记录显露出拉契奇在一定程度上的带有幻觉的傲慢。

但是无论拉契奇神志正常与否，这几乎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国王和政府都很难判处他死刑。他深受黑山部落爱戴，他们也是他的选民。他身体非常强壮，即时在雄健的人群中也非常突出，而且毫无疑问，他很有勇气。此外，他在作为法官审判本地争端时表现出的精明公正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那些部落成员眼中，对于他犯下的谋杀，他肯定有正当理由，因为拉迪奇侵犯了他的名誉。如果拉契奇被法庭以贪污罪判决，他们将认为这是那个正入侵他们生活的新国家的另一个胜利，而且这个国家被证实，无论好坏，都不能抗拒。但是政府（要记得拉契奇也是其中一员）从来没有起诉拉契奇。所以对于部落成员而言，他们面对着一种古老的熟悉情况：两个酋长暗中损害彼此的信誉，分出胜负的唯一方法就是谋杀。政府可能对行贿之类的事很生气，尽管那看起来不够合理，因为部落成员认为向强者、伟人进贡是自然惯例。但是当涉及酋长间谋杀这样的传统大场面时，那些时髦复杂的想法毫无用武之地。鉴于这种态度，处决拉契奇可能在黑山人当中引发严重动乱。另外，此时，我们得再次面对早期不那么亲切的墨索里尼。为了进一步推进他对阿尔巴尼亚的企图，他资助了很多黑山叛乱士兵，他肯定会利用拉契奇的死激起全副武装的反叛。如果国王干涉审判的公正，假借精神病的理由使拉契奇免受应得的惩罚，这对国王很有利，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一定这样做了。由于没有独立医委会对普尼沙·拉契奇的诊断，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

在那次灾祸之后，一切都进展得不顺利。国王在政治舞台上变得孤立无援。下一步显然是要成立一个同盟部。但是不可能任命一个塞尔维亚人。既然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徒被一个东正教成员杀死，整个信仰都应该做出自我惩罚的举动。经证实，也不可能任命一个克罗地亚人，因为拉迪奇的继任者马特切克，以及其他所有克罗地亚代表，除了几个怪人之外，都回到了萨格勒布，拒绝再在国民议会中担任职位。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和拉迪奇的愿望相反。他们不可能想过，由于他们对他的忠诚，他们不应该蔑视塞尔维亚人，因为他被一个黑山人杀死，而塞尔维亚人与黑山人关系不好众人皆知。而且，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跟塞尔维亚人合作，

他们就可以从塞尔维亚人那里得到各种他们想要的让步，即使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权。这些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克罗地亚农民党宁愿对那些在拉迪奇死后继续攻击他的卑鄙报纸报道做出反应，对那些鼓励报纸的塞尔维亚政治大亨做出反应，尽管由于国王的反对，它们几乎没有机会存活。

留下来的只有斯洛文尼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科罗舍茨神父，他被任命为首相。斯洛文尼亚人是一群不易激动的理智之人，他们比他们的同胞有更好的和平生活的机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很多冲突根源在于他们有相同的语言，因此，塞尔维亚官员能够被派去管理克罗地亚地区。但是斯洛文尼亚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非常不同，所以斯洛文尼亚人只能由自己人和平地治理。塞尔维亚人本来应该认识到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他们没有那样的机会主义者性格，所以他们能够被信任自治。但是教会安排给斯洛文尼亚人一位不符合他们标准的领导。安东·科罗舍茨曾经是匈牙利最后一任皇后齐塔皇后的告解神父，他是哈布斯堡培养出来的严肃保守的天主教教徒的典型代表。他的灵魂因此看不见古老的和现代的世界呈现出的基本问题，而是匆匆走进一种礼仪缠身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断档期，它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这使他成为一个政治密谋的老手，一个令人讨厌的麻烦政客。他回应动乱时期挑战的愚蠢习惯就是将国家的所有弊端都归咎于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发动的革命运动。但是，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很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实际上没有共济会成员，而塞尔维亚是世界上唯一的共济会保守力量聚集的地方。碰巧在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在位期间，贝尔格莱德共济会分会的领袖是一个支持奥地利、反对民主的政治家，他将贝尔格莱德分会变成同维也纳、布达佩斯分会密谋的中心，在那个时候，所有富有进步的同情心的共济会成员都退出了，再也没有重新加入。科罗舍茨对南斯拉夫政治的所有干预都处于这一层次，因此在这场危机中，他证明了自己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他的失败导致国王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听从拉迪奇的建议，确立军事独裁。1929年1月，六个月的骚乱之后，他解散了议会，任命萨科维奇将军为首相，首相只对国王负责，不对代表负责。这完全违背了卡拉乔治维奇的传统，因为它侵犯了宪法，而这个王朝一直是立宪制的捍卫者。国王狭隘、强烈地关注着自己的王位，他一定知道从决定专制地使用权力的那一刻起，他在自己权力的根基上就放上了一把斧头，而且萨科维奇将军不能做任何事来修复这一损害。拉迪奇的性格本质上反复无常，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建议国王将他自己和这个国家托付给这个不出名的人。萨科维奇那可敬但不杰出的军事生涯没能给他带来声望，而且，他是一个对政治阴谋满怀热情的人，完全不知道任何政治原则。

然而，他是国王的完美工具。有人说，拉迪奇提议他成为独裁者，只是为

了使他显露出他的低效和空虚；这种迂回的风格确实可能是拉迪奇的特点。萨科维奇完全不知所措，只能听从国王。南斯拉夫事务在一段时间里表面上得到了改善，因为独裁使很多必要的改革生效了——很多与公共事业有关，由于地区及个人的反对，它们过去在国民议会被搁置。在之前的十年里，议会只通过了一百一十条法规。国王和萨科维奇在十二个月内通过了一百一十八条法规和五百三十五条次要法令，它们大部分都符合人民愿望。他们也颁布了新的刑法和民法。然后，针对独裁的天罚降临在国王身上，让他无法动弹。独裁者抓紧权力，权力屈服于他，因为议会不能解决那些让人民烦恼的基本问题。但是议会之所以不能完成任务，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头脑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其他小问题可能是故意没有完成，因为个人、阶层或者地区发现“现状”对他们有利。但是没有人能够隐瞒战争、贫困之类大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一个特别复杂的想法的存在——例如一个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一定不可能被保密，因为它肯定是众多思想活跃的人日积月累的思索的结果。一个人不可能独自想出这样的解决方法，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范围非常小，尤其在顶层。一个独裁者可能拥有一个乡村傻瓜没有的主意，但是极其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独裁者能够有一个想法，而一群被选举出来的人没有过相似的想法，尤其考虑到其中一些人必然智力卓越，因为智力在竞争中很有用处。南斯拉夫主要的问题在于贫困及其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间的敌对状态。当国王处理了那些能够用一个坚定清楚的签名解决的拖欠工作后，他就开始面对这些问题，进而意识到他并不能比国民议会更好地解决它们。

他做了几个英勇的尝试。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他尝试发展国家工业，但是好运没有眷顾他，因为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始于1929年秋天。无论如何，南斯拉夫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除非他找到了为什么全世界拒绝为他的食物支付好价格的答案，它才能变得繁荣。他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化解国民之间的敌意，这些措施显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迂腐又教条的人，在道德方面认真，在思维方面幼稚，而且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绝望和孤独。这个问题错综复杂。它源于一个国家内部包含了两种斯拉夫人：一种斯拉夫人继承了拜占庭的文化传统和东正教的原始基督教教义，而且由于科索沃战败和随后的五百年奴役，他们的思想中渗透着关于生命的悲剧观念；另一种斯拉夫人受奥地利影响，被融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系统，精神上被罗马天主教统治，他们的格调来自一次其他斯拉夫人没有经历过的文艺复兴，这段经历虽然让他们不安，但不是悲剧。这两群人的差异就像豹子和猞猁，为了使他们和好，国王实施了一些措施，但是它们简单得让人流泪。

他把国家的名字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成“南斯拉夫王国”，意思是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然后，他禁止使用过去的地区名称，如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还有其他名字，他把全国分成九个省，根据流经它们的河流的名字来命名，除了达尔马提亚——它被叫作海滨省。他禁止

过去的地区政党存在。这样，他透露出一种无知的希望，就是如果克罗地亚人被叫作萨瓦河省人，那些居民就会忘记他们是克罗地亚人，他们会不再希望投票给马特切克，并且学会尊重马其顿人，因为他们变成了发达河省的居民。于是，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塞尔维亚，有着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光荣历史，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塞尔维亚军团的英雄主义曾经让世界惊叹，但是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旗帜送到博物馆，打着毫无意义的南斯拉夫的崭新军旗行进。对塞尔维亚而言，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毫无疑问，国王此时为了安抚克罗地亚人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使他与他的罗马天主教臣民看起来没那么疏远，他松懈了自己对东正教的虔诚。他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它不仅冒犯了塞尔维亚人，还非常不合常理：他试图废除塞尔维亚地区使用的西里尔字母，将其替换成克罗地亚人和西欧地区使用的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对塞尔维亚人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希腊字母的一种变形，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前来宣讲福音，为了使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创造了这些字母。而且它比拉丁字母更适合用来表示斯拉夫语言中独有的辅音，事实上它也是毗邻的保加利亚语使用的字母体系，它也和俄国所使用的字母体系几乎相同，而且任何聪明人几天之内就能掌握它。

这些措施加深了国王和他的塞尔维亚臣民之间的鸿沟，也没有让他更靠近克罗地亚人一丝一毫。奇怪的是，尽管拉迪奇本人催促国王建立军事独裁，他的追随者们却比任何人都仇视它。就在那时，意大利发现了踏足克罗地亚的机会，试图在那里重施故技，就如它在马其顿一样。它有优势在匈牙利找到乐意与它合作的同盟，因为匈牙利被南斯拉夫夺走了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富饶的多瑙河畔地区，渴望复仇，但是复仇在这片土地上更艰难。克罗地亚人践行着反抗匈牙利统治的坚定政策，但主要是消极的政策；他们的统治者，不像土耳其人，没有让他们习惯于谋杀的想法。所以意大利和匈牙利雇用了恐怖分子，目的是组织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同样路线的运动，但是刚开始时收效甚微。在那时或者之后，他们都没有赢过克罗地亚农民党或者事实上任何其他克罗地亚政党。据说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新组织最多有三十个积极拥护者；尽管它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建立了训练营，却找不到人训练。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派特工去往克罗地亚人寻找财富的任何地方，比如法国、比利时、南美甚至美国，告诉他们塞尔维亚人如何屠杀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的荒诞故事，以此拉拢他们。但就连这项措施也不是很成功，匈牙利训练营只能去诱骗边境的南斯拉夫农民并绑架他们。

但是克罗地亚恐怖分子成功了。他们效率极高。他们向全世界散发叛国的报纸和小册子，其中很多报纸和小册子写得很有煽动力。他们在维也纳成立了宣传办公室，它非常能干，不择手段，极大地伤害了国王的感受，而且成功地毒害了欧洲舆论；他们在这里的行为就跟在保加利亚边境的国际

列车上放置炸弹一样成功。这给南斯拉夫政府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通常是外国人受了伤，去找他们政府的麻烦；没受伤的外国人则对那些用来保护他们的措施表现出奇怪的恼怒。在一名警官正在搜查座位和行李架的时候，一名英国或者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离开车厢，而且他很可能写信回国攻击国王的专横统治，并且补充评论搜查者的愁眉苦脸，尽管一群冒着生命危险做事的人看起来愁眉苦脸应属情理之中。和马其顿一样，那里也经常出现大批运送给反叛军的武器。炸弹、手榴弹、步枪和机关枪被一些走私者带上车，这些走私犯经常杀死南斯拉夫边境的守卫。它们被存在军火库中，然后恐怖分子拿着它们去炸掉萨格勒布正在举行仪式的东正教教堂，或者对着住满征兵的营区宿舍开火，实施一些诸如此类的行动。

没人前来帮助国王。只有一个人，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战后南斯拉夫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和政治家，被期待提出政策。他来自一个伟大的家族，是神圣的阿西尼厄斯在17世纪带领到匈牙利的移民的后裔，在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独立运动中表现得很勇敢。然而，他唯一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国王退位，将王国转变成共和国。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东正教赋予了国王稳固的地位，在塞尔维亚人民心中，他是上帝任命的国家元首；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政界没有哪位候选总统能够用自己的品格取代那种凝聚力。但是国王因为这个愚蠢的错误雷霆大怒。普里比切维奇的报纸被查禁，他在自己家被逮捕。

每个人都辜负了他。萨科维奇辞职了，他直接承认他们一起将南斯拉夫弄得乱七八糟，这伤害了国王，让他无法忍受。科罗舍茨神父要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自治权，国王再次雷霆大怒，下令将他软禁在达尔马提亚。他有理由感到愤恨。科罗舍茨一直受着南斯拉夫的慷慨对待，而且他以对制度的尊重著称，这是一直以来让他能够吃掉民主牌的王牌，而这个制度应该也包括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然后拉迪奇的继任者马特切克提出有关克罗地亚自治权的要求，他被逮捕并判处三年监禁。对此，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义愤填膺，但是国王毫不妥协。有必要记住的可以为他辩护的一点是，这些计划都完全行不通。王国中的天主教斯拉夫人，一共有五百五十万人，他们没有可能维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不可避免地被意大利吸收，其他人则被匈牙利吸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生活在意大利的四十万斯洛文尼亚人的境况，加之战前伏伊伏丁那省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受匈牙利压迫折磨的记忆，它们准确地告诉我们这样的吸收意味着什么。这些吞并不仅仅意味着被吞并者的苦难，还会把敌人的军队带到塞尔维亚人的壁炉边，到时，塞尔维亚人会像他们在19世纪中期那样贫困。还剩下联邦制这个解决方法。但是，那个地区已经陷入一个敌对外国势力资助和组织起来的暴乱之中，让一个君主在那个地区施行联邦制，这对他要求太高了。

所以，国王动用自己的智慧来处理克罗地亚，结果证明这种智慧远远不够。他不能派兵去处理动乱。承认内战存在有损国家声誉，的确，这在真实的国家事务中非常少见。当时，很多在克罗地亚游历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分裂，大多数人也没有遭遇任何人身危险之类的事情。所以政府没有派士兵，而是派去塞尔维亚人或者支持塞尔维亚人的宪兵，毫无疑问，他们可怕而残暴地对待克罗地亚人。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首先，他们是南斯拉夫王国这个创想的忠实信徒，并且认为那些斯拉夫人是一些非常邪恶的人，因为他们竟要抛弃他们的斯拉夫同胞转而投奔非斯拉夫人，因此暴打他们能够让他们变好。其次，克罗地亚人怀着敌意对待他们，这吓到了他们，作为一些远离家园的陌生人，他们觉得用任何手段解除敌人的武装都很合理。必须记住，当他们处理那些受意大利资助的恐怖分子时，他们是在和一些习惯使用肉刑的人打交道，据说，那些人会先折磨一个人三天，然后再杀死他。既然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警察面对着不同种类的克罗地亚持异议者，而且他们没法区分他们，因此一些温和无害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残忍的对待，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而按照摩西律法，这种对待只适合用在职业刺客和虐待者身上。这意味着很多人，包括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在克罗地亚警察局被殴打和虐待。

然而，警察残暴的另一个原因是警察部门很难维持纪律，它总是比军队更难控制，因为它以更小更分散的群体的形式运作。无论贝尔格莱德下达什么命令，它都不能确保贝尔格莱德的命令在克罗地亚得到遵守。另外，还有一个干扰因素，那就是遗留下来的可怕的警察传统，它在曾经属于哈布斯堡的所有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坏的形式，而在曾经属于土耳其的所有地区还有一种更坏的形式。警察被认为应该上交满意的结果给国家最高权力，而且他们最好不能被更低层的人质疑他们得到这些结果的过程以防后者打击报复。这就助长了一种进取精神，它们通常表现得让人后悔，在克罗地亚更明显地让人后悔，因为警察开始谋杀克罗地亚政治家，因为他们觉得除掉这些人可能会使他们执行任务更方便，他们还组织了一群叫“切特尼克”的恶棍，让他们四处袭击克罗地亚爱国者，驱散爱国集会，因为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能亲自做这些事，他们害怕被报告到最高权力层。

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夸大。暴行并没有随时随地发生。反倒是拉迪奇和马特切克，由于他们感情用事，愚蠢地管理，没能将政治局势转为自己的优势，对于他们的追随者的痛苦，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怎么夸大都不过分。但是，这仍是一个可憎的情况。尽管因为警察的独立性，国王没有听说全部真相，但他听到的也足以使他意识到镇压政策是一个错误，他必须尝试采用另外一个和解政策，因为即使它失败了，它听起来也比另一个好一些。但是，他奇怪地顽固坚持着自己的政策。据说，他的顽固还有一个国际解释：他错误地把当时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纳维尔·亨德森爵士对他个人的感情当作对自己政治行动的赞同。按照这个说法，他犯了一个可悲的

错误：他相信他的独裁赢得了英国人的青睐，单是这个理由就使得这种做法值得继续。

每个独立思考的克罗地亚人现在都开始反对塞尔维亚人，他们被推入外国恐怖分子的怀抱。1931年9月，国王想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主意，他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实际上废除了民众代表原则。他建立了一个由八十七名成员组成的参议院，其中至少有五十一名成员将由国王提名。部长们直接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他们也将由国王提名。投票不再是匿名和自愿的，而是公开的、强制的。因此，自由的议会被废除，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很久以前就只存在于记忆中。克罗地亚人只能采取他们能够做到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他们秘密武装自己，向外国舆论呼吁。这正是墨索里尼想要的，然而国王没有撤回命令的迹象。

他已经失去了克罗地亚人，而他也不能留住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觉得新宪法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可怕的举动，因为民主是他们基督教或者农业社会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这部新宪法是由一个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人提出的，这就双倍地可怕了。有一个人多年来和国王一起在计划收复的地区发展教育，他对国王充满爱戴之情，但他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当他去王宫觐见国王时，他几乎不能跟他说话。“我的话已经没用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凝视他，好像我在问他，‘这样一件事真的是您做的吗？’，尽管他肯定注意到了我的忧虑，而且我觉得他很喜欢我，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是继续谈话，愉快而冷静地谈话，就像一个老师让一个孩子感到沮丧，因为她做了一些他不能理解的事，而她还不能解释。”可能有一个解释。国王告诉了一些人，他打算给这个国家一部比之前所有宪法都更民主的宪法，只要局势使他相信他能够安全地采取这个行动，而且他似乎说话算话。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国王真的热爱民主，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憎恨它。一个已经确定存在权利的国家中的政治原则在一个还没有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国家中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国王或许相信作为一种国家的或者王朝的传统，民主有它的价值所在，当他积累了足够的外交政策的成果，当他在备受威胁的边境上建起坚固和平之墙，当他能够承受国内冲突的时候，他就可能恢复它。

因为国王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远比他在处理内政问题方面成功。在国际层面，他的天真烂漫没有背叛他，反而启发了他。这种天真使他向他们古老的敌人伸出手，对方惊讶地放下武器，然后发现他们内心的友好开始苏醒和回应他。由于俄国的怂恿和斐迪南国王激发的怨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充满敌意，但是国王否认了这种敌意的存在，这样他为一个最有必要的结构打下了基础，它可能会促进他的人民乃至整个欧洲的和平。最近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运气衰落，这倒给他帮了不少忙。这个组织在马其顿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因为南斯拉夫的管理正在迅速改善，而且南斯拉夫马

其顿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被游击队不断袭击骚扰并被迫缴付过多的非法税款，他们的生活可能远不会那么难受。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放弃了他们将居住地交给保加利亚的愿望。很多人从来没有顺从过南斯拉夫的统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发自内心地厌倦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劫掠的人一出现，他们就和塞尔维亚邻居一起拿起步枪回敬他们。

因此，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撤退了，把它所有的注意力转向在保加利亚的工作，在那里它一直起到了一个法西斯政党的作用，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直到它成为一个政权中的独立政权。它的财力非常庞大，因为它有外国的援助和从保加利亚马其顿及南斯拉夫马其顿征收来的非法税赋。六年里，单单从烟草业它就收到了一百多万英镑。但是，它的主要资源是它的残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残酷使保加利亚的政治生活变得一片狼藉。索非亚的居民非常讨人喜欢，他们外表漂亮，受过良好教育，但是这座城市落入一伙野蛮人手中，它仿佛被巫师奴役，呆滞地凝视着几乎每天在开放街道上发生的暗杀。所有人的生活都受恐怖和肮脏影响。每家商店都要缴税给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才能开门，而且都要按照征用令为它的追随者供应货物。每家旅馆必须给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预留好房间，在一楼给领导留两间，更高的楼层给普通成员留三间。一种古老的英雄主义呈现出与阿尔·卡彭的相似性。事实上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以及大部分保加利亚人为此深感羞愧。因为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对追随者的唯一影响力就是它宣称将解放南斯拉夫的马其顿，鲍里斯决定破坏它的计划，宣布对南斯拉夫实施不可变更的全新友好政策。从那以后，这个寄生的政权将要与它的宿主搏斗才能活下来。被劫掠的农民和商店主，更不用说烟草业的商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友好关系带来的便利，尽管他们可能对南斯拉夫王国之类的国家没有任何依恋之情。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领导们被处死、监禁或者驱逐，追随者们则被殴打和解散，保加利亚转向了一种更正常的生活。

要不是亚历山大国王热切地接受鲍里斯国王的亲近，这次和解不可能实现。他访问了索非亚和瓦尔纳，这其实是历史上君主有过的最无畏的举动之一，它使保加利亚人对他产生好感。所有巴尔干人都喜欢勇敢的人。因为意大利对一些保加利亚政客的影响以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长期的彼此仇恨的倾向，鲍里斯国王迟迟没有对这个新的友好关系给出适当的外交表达，亚历山大国王访问了其他地方来催促他。他的目的是联合毗邻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使欧洲东南部不受侵犯，以此来阻止意大利。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拜访穆斯塔法·凯末尔(注)，凯末尔冲着他微笑，他的眼睛揭示了巴尔干人再一次捉弄了土耳其人——他们虽然被征服，但是他们还是在自我统治，因为这双眼睛是蓝色的，也就是说，阿塔图尔克，跟一些苏丹、几个大宰相还有土耳其禁卫军士兵中的精英一样，至少有一半斯拉夫血统。国王去了希腊，开始了一些谈判，尽管希腊政客的性格与他不

合，谈判还是最终得以完成。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于1933年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保加利亚一发现自己要以一对三，就改变了主意，在1934年签署加入。

但是，即便这些成就也不能让亚历山大国王相信这个世界跟二十年前他所认为的同样友好，当时正值巴尔干战争后期，他还是一个年轻人：那时这个世界肯定很友好，值得人们在上面挥霍华美的诗意，以及弗鲁什卡·格拉幻想之类的梦想。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与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穆斯塔法·凯末尔告诉过他，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俄国的支持，无论它是白色还是红色的，对巴尔干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它想抵抗西方入侵的话。但是他的情况当中还有一些比这更令人讨厌的方面，它们肯定在他外交远游的一开始就打击了他，让他意识到某些荣耀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拥有简单的形态，或是像利剑一样闪闪发光。

他和保加利亚国王最早的会面表现出王权传统的衰落，一种军乐声音的变小，如果它能透过历史被听见的话。恰好在1930年，鲍里斯国王娶了意大利的乔万娜公主，她是亚历山大的表妹，因为他们各自的母亲是黑山的两姐妹公主。由于这个表亲关系，两位国王拘谨地进行了首次见面。据描述，在从巴黎和伦敦回到索非亚的路上，乔万娜王后深受血浓于水的想法影响，觉得她一定要见见亚历山大国王，尽管其实从1913年后她就再没见过他，那时的他二十五岁，而她才六岁。作为回应，亚历山大国王来到了火车站，东方快车总会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起坐在一间候车室里喝咖啡，那间候车室被专门装修成这种场合惯常采用的阴暗风格。这两个国家已有一些来往，但是鲍里斯国王不敢做出更多友好的表示，以免亚历山大国王邀请他去王宫。但是一旦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月台上，乔万娜王后加快了外交速度，她亲吻了亚历山大国王，仿佛她真的计划好了这样做，她拥抱他，仿佛他们之间有强烈的亲善，只要他们允许，这种友好可以给他们提供很多帮助。亚历山大国王因此不像通常那样拘谨，变得随和，他们在候车室中一起聊天、欢笑，带着彼此真正忠诚、信任的那种温暖。这次见面缘于意大利皇室家庭的一个成员对墨索里尼的反抗。三位国王血统的继承人正恐慌地密谋给人民带来和平，而不顾一个铁匠的儿子。

拜占庭的牧师和皇帝们不可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场景，尼曼雅的国王们，甚至推选卡拉乔尔杰和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成为王子统治他们的塞尔维亚农民都不能想象它。当然，他们将说，一个国王必须拥有一切权力，其他人可能抢夺他的权杖，但是只要他抓住了它，权力就是他的。当然，他们和他们的臣民会同意，人民从来不会生出自己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因素让他们对确定的事实变得困惑。世上存在两种人。一种人自古以

来一直没有变化，他们在村庄、小镇和首府里面劳作。还有一种全新的人，他们出生在19世纪欧洲在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建造起来的新城市里。这些城市庞大而复杂，在处理它们自己的结构问题的过程中，它们失去了与周边乡村的一切关系，所以尽管它们被叫作首府，它们实际上不是，因为首应该和身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城镇只按照富人的生理利益进行规划，不关心穷人的身体和灵魂。此类新人被骗走了他们的种族传统，没有得到智慧的传承；他们没有在花园中长大，而是在机器上劳作，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都缺乏技艺方面的教育；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这种智慧和教育，因为他们生活在空前的挫折和不安全的情况中。一个没有传统和技艺的人会迷失，读书对他而言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他缺乏准确的判断力，不能对所读之物去伪存真。

这些新人当中的某些人，凭借一种可能可以被称为上帝恩典的奇迹，抵抗住了针对他们传统的袭击，他们拥有和旧的那类人当中最好的一些人同样优秀的品质。但是还有那些不再抵抗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成熟，非常幼稚，他们对他们的挫折和需要的反应就像婴儿对饥饿的反应一样——尖叫着敲打离他们最近的东西。其中一个这样的人，叫卢切尼，他在1898年杀死了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但是他的同类从那之后开始掌握权力。这不是说他们变得更聪明或者发现了治疗痛苦的配方，只是因为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当意识到他们的人数时，他们学会了尖叫着喊出自己的抱怨以及命令。所以，当亚历山大成功地让巴尔干国家相互达成了谅解，正访问法国讨论新生国家的未来关系时，他在马赛被袭击，凶手不是一个饥饿的流浪汉，而是一位统治者，他正要欺辱本国有王室血统的人，正如他过去欺辱农民和工人一样。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出现了，它比最近时期的任何政府都更让人厌恶，尽管它们已经足够令人讨厌了。通过《柏林条约》，列强使巴尔干的艰难永远持续了下来。它们是很多身居高位者的丑陋死亡的元凶——塞尔维亚的迈克王子因为奥地利的密谋被杀死；要不是奥地利的诡计，德拉加王后和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本来可以活到老；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霍泰克由于奥地利的恶政而注定死亡。它们还催生了很多低层丑陋之人：卢切尼和墨索里尼绝对不会出现在一个公正的经济制度中。但是至少当它们犯下罪恶时，它们知道罪恶的存在，至少它们知道善与恶。但是这个世界的新统治者不知道这点。“暴力，”墨索里尼用狂悖无耻的明显腔调说，“非常道德，比妥协和交易更道德。”时代已经倒退。看起来人们好像开始不知道做好人比做坏人更聪明，顺从比凶猛更安全，明智比疯狂更合适。他不仅正在忽视《登山训众》，他也忘记了赞美诗作者所知道的东西。而且既然这些东西有其道理，那么一旦一个人遗忘了它们，他必然要去重新发现它们，带着巨大的痛苦。

贝尔格莱德知道所有的一切，带着忧虑期盼它的未来。因为，说实话，它是一个悲伤的城市。即便在春天，年轻恋人在卡莱梅格丹城堡的花丛中漫

步，长者坐在餐馆中充满希望地热烈谈论政治，因为他们的鼻腔中充满烤羊羔和乳猪的味道，它潜在的情绪也仍是一种秋天般的疑虑。冬天将很漫长、很艰难。是否值得为了将来而度过它呢？这些思考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冬天是什么，也不是懦夫。这种情绪是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的性格在这座首都留下的深刻痕迹之一。它仍然是他的城市。如果某个在修道院画下壁画的中世纪塞尔维亚人苏醒过来，在贝尔格莱德的一面墙上作画，他肯定会画被谋杀的国王躺在棺材架上飘浮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如果这幅画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象征，它将表现出国王固执而矜持的脸因为疑虑而变化，它的矜持被打破，透露出对它的固执是否有任何作用的怀疑。

每位塞尔维亚统治者都通过他的统治证明了一些东西。这个奇怪的主权国，比美国更新、和拜占庭一样古老的主权国，不止一次证明了一个小国能够打败一个庞大的帝国；它也不断证明，即使在胜利的情况下，作为大国中间的一个小国家有多么可怕。在亚历山大治下，它再次证明了这些，但也证明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他的国家领土扩张到了他的人民的文化界限之外，塞尔维亚被迫负罪。很明显，按照道德要求，数量小的人群就应该形成小国家，而捍卫道德要求的代价看起来比人类能够承受的更大。当国王挺直身体坐车穿过贝尔格莱德的街道时，他肯定清楚这一点。作为一名独裁者，他是欧洲第一个认识到独裁对真正的秩序是多么有害的统治者。当他躺在棺材架上飘浮在城市上空时，他肯定更清楚这一点。因为谋杀他的人实际上未受惩罚。法国几乎不敢审判那个刺客；国际联盟咕哝了一些非难的话，但是这些话不会得罪任何人。

---

1. 凯绥·柯勒惠支（Kä the Kollwitz, 1867—1945），德国版画家、雕塑家。
2.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the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 Organization）的简称。
3. 凯末尔（Mustapha Kemal, 1881—1938），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土耳其革命家，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

贝尔格莱德IX

我们急切地想离开贝尔格莱德，跟康斯坦丁一起开始穿越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的旅程，尽管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其实有两次让我们窘迫的时刻，我们转弯太快，撞见康斯坦丁和格尔达正处于完全的情绪失控之中，格尔达正在哭泣，不顾路人坦率的斯拉夫式的打量，康斯坦丁因为悲痛而脸红。但是我们觉得康斯坦丁的生活涵盖了古怪的整个范围，包括痛苦的古怪和愉快的古怪，所以我们几乎不觉得惊讶。我们在这座城市感到沮丧，不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而是因为它弥漫着令人扫兴的结尾的气氛。自从亚历山大国王逝世后，没有什么真正的事情发生。这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奇迹，而不是扫兴的结尾。谋杀他的人杀死他，其目的是使这个国家在被攻击的时候群龙无首，不能自我保护，然而攻击从来没有发生。

这种局面显得很神秘，尽管肯定有一两个明显因素造成了这个局面。第一个是南斯拉夫王国对国王死亡的反应。它没有四分五裂，它的人民反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自从彼得国王退位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地团结。这个国家的每一部分，甚至克罗地亚都陷入悲痛之中。任何国家，只要没有陷入本能的懒惰，当它失去它的元首，无论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会打心底里感到悲痛，而善于分析的斯拉夫人很清楚，尽管亚历山大做过很多严酷的蠢事，他实质上是他的人民的神父。世界上不仅有好人和坏人，还有坏的好人和好的坏人。一个坏的好人所有个人行为都遵从公认的道德标准，但是他的整个人生描绘出一幅让上帝不悦的图案。一个好的坏人可能犯下各种错误和罪恶，但是他实质上总是将使经验服从最高定律的责任放在一切事务之首。南斯拉夫人知道亚历山大国王属于后面这一类人。他们很清楚，尽管他把他们当中太多人送进监狱，但当时的他正试图赋予南斯拉夫一种光荣的命运，使它能够保留自己的天赋。所以克罗地亚没有发生叛乱，那些跟随国王的棺材架穿过贝尔格莱德街道的外国皇室和政治家都对整座城市里那奇怪而柔和的哭泣声感到非常惊讶。

南斯拉夫没有遭到长期谋划的袭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列强的秘密态度比它们公开展示出来的更加厚颜无耻。刺杀发生后，英国皇家舰队立即在亚得里亚海部署；法国则有可能查出了比他们预期的更多的有关谋杀的事，而且它可能可以以故意扰乱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举行的对凶手的审判为筹码索要“回报”。它们当时的政策保住了和平，但这并不能用来开脱它们的罪责，因为那时发动战争远远不如在之后发动那么危险，而且这让欧洲的每一个极权主义暴徒都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和平时期杀死了一个外国国王，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所有诚实的

人都心灰意冷。

在贝尔格莱德，那片阴影一点也没有被消除。生命的热烈与智慧也不能使这个地方免于陷入僵局。很多人敢想，但是没有人行动——除了那些金融家和工业冒险家，斯托亚迪诺维奇一直被公认代表着他们，他“羡慕”资本主义，他受到那个神话的启发，即在整个欧洲，衰落的资本主义将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复苏。错误经常比真相更猛烈地刺激有机体，就像癌细胞比健康细胞在宿主身上会激起更强烈的反应。有些人的想法有着更真实的根据，但是他们只是等待自己的怀疑主义得到解决。他们习惯于从法国、英国和俄国身上汲取力量。但是在国际联盟面前，法国和英国对亚历山大国王被谋杀一事没有说实话，这使他们深感震惊，所以他们不再以这两个国家为精神寄托，他们只是好奇地观望。他们不能从西欧获取任何精神慰藉，除非我们给他们一些新证据证明我们的价值。他们仍然尊重俄国，但是不像过去巴尔干地区长期被俄国的神秘主义或者革命理论影响的时候那样了，因为那时的俄国在它那独特而隐秘的长城背后显得非常遥远，它就像天堂，或者可能对另一些人而言，就像地狱。

有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行动，部分是因为大众想象的那种神话式的特点。仿佛人们对自己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位首脑，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因为我们的国王还没长大成人，所以我们不能像在一个国家内那样生活，我们一定要维持和平，直到年幼的彼得能够统治我们。”这是一个足够聪明的决定；但是当大众的想法过紧地抓住它的原始趣味、抓住它最早的童话故事时，它就变成了愚蠢。亚历山大国王留下了三位摄政者，在他的儿子成年之前，他们将一直统治南斯拉夫：他的表弟保罗亲王，他的医生兼克罗地亚总督（他是克罗地亚人）以及一个待命的将军。那些非皇室成员的摄政者在性格和影响力上都不突出，所以即使他们想反对保罗亲王，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全国都觉得保罗亲王拥有唯一有效的摄政权力。这可能是真的。就外人来看，他的表现非常值得赞扬，尽管他讨厌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对艺术有一种独有的兴趣——这对一个有着纯正的斯拉夫血统的人来说非常奇怪——而且众所周知，他宁愿在佛罗伦萨做一名鉴赏家，也不愿意留在几乎没有风景的贝尔格莱德，被束缚在乏味的管理工作上。也许因为这种在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的愿望，也许因为他的那种使他能在混乱的卡拉乔治维奇家族中冷静生活的谨慎，他总能响应南斯拉夫的各种势力，而不是统治他们。他对斯托亚迪诺维奇非常友好，对着斯托亚迪诺维奇为他引见的列强鞠躬微笑，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

对于一个知道自己从本性上就不是统治者的人而言，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时期，这完全不是一种愚蠢的对策。但是人们内心喜欢创造神话，他们把他看作童话故事里的摄政王，认为他渴望篡夺被他抚养的孩子的王位，他赞成那些篡位者，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以及他们那些最愚蠢、最

没有同情心的行为。他被认为有一个野蛮的灵魂，被一种悼念着罗曼诺夫而且忠实于德米多夫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点燃。然而，作为一个西方绘画的爱好者，他的生命法则明显是品味，他看起来不大可能会对教宗尼古拉三世的庸俗宫廷怀有热情的怀旧情结，而且阿西尼厄斯·卡拉乔治维奇和奥萝拉·德米多夫离婚的情况也让他们的儿子不可能与母亲的家庭在感情上达成正常的一致。从种种迹象看来，保罗亲王的政治主张不是源于俄国，而是源于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接触到的英国中上层阶级。那并不是说它们都完美地契合巴尔干的情况，但是它们之中的不合适因素与沙皇专制的蒙昧主义完全不同。贝尔格莱德的自由主义没有一次不鼓舞人心，因为它是一棵茁壮的树，深深扎根在斯拉夫民族的天性中。但是也有很多次，似乎这种自由主义再也不能有效地投入战斗，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农民可靠的理智传统，偏爱那些城市的意见，而那些意见不过是一些聪明的猜测罢了。

“但是你将看到，这里的一切都会进展顺利，”我对丈夫说，我正坐在旅馆房间的梳妆台前，戴上帽子准备同格尔达和康斯坦丁一起喝茶，“只要我们去了马其顿。你将看到那里有一个巴尔干天才，他非常强大，所以他的人民永远不会毁灭，他们能够在精神生活中躲避肉体的死亡，甚至躲避智力与道德的死亡。”“在我看来，那似乎很奇怪，”我丈夫说，“我一生都听说马其顿是长久的弊政和废墟的象征。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常常听说它，那里的人残杀其他人，而那些人应该被认为是他们的兄弟。”“但那并不久远，”我说，“我也记得这些说法。在大概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我听过那些年长的人说起马其顿肮脏的争端，但我现在知道，那是在土耳其和列强在1903年签订《米尔茨施泰格协约》之后的境况。那是一个可怕的交易。它支持列强派驻军队维持马其顿治安，而且它是由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外交部部长，戈卢乔斯基和兰斯多夫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间狩猎小屋里共同起草的。碰巧戈卢乔斯基这个聪明人对射击的喜爱超过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喜爱，而兰斯多夫这个愚蠢的人对写作的喜爱又远胜其他。所以，戈卢乔斯基每天从早到晚带着他的枪出去，留下兰斯多夫起草协约。很显然，他回来的时候累得没有心情去读它，而欧洲其他外交官明显也同样喜欢射击，因为他们全体通过了一个愚蠢的条款，它宣布一旦马其顿被恢复秩序，土耳其行政区将被重新划分，这样它们就能够与人种学意义上的区域一致。这自然激起了最血腥的内战。因为这个条款吓坏了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他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纯粹的人种学区域，他们看到自己将被转交到人数占多数的民族手上，无论他们是谁，无论那个数字有多么小。因此每个民族都袭击另两个民族，尽量杀死对方，目的是将他们的人数减少到无可置疑的少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一位叫作杰罗甘的英国女士访问了马其顿，向外交部报告了屠杀原因，列强们才懒洋洋地聚集起来，撤销了那个条款。但是，当然，在那之前有五个世纪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磨难。在马其顿竟然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这听起来令人惊讶，但是上次我在那里的时候，它给我的印象是

那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拥有更多东西。”

我们很早就动身去茶会，因为我们想去参观保罗亲王博物馆，这位摄政王在主大街新王宫的一个侧厅里装满了绘画和古物，我们想去最后看一看这些东西。一些是他自己的收藏，其他的是塞尔维亚政府藏品的遗存，它从1842年开始搜集它们，但在战争中有很多被掠夺或损坏。其中有一个在马其顿发现的可爱金器，它属于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前迈锡尼文明遗物，还有一些从拜占庭和中世纪塞尔维亚流传下来的美丽金制品和珐琅，卡拉乔治维奇家族和奥布伦诺维奇家族早期穿过的长袍、用过的家具和武器，一些德国和奥地利的糟糕绘画，一些法国的非常好的绘画，一些英国的不错的绘画，一些斯拉夫绘画，几乎没有个性可言，只是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作品的模仿品而已，还有一些斯拉夫雕塑，非常有特点，但是由于它们试图牢牢抓住完好的传统，因而显得扭曲。要不是我们认识一些身上显示着塞尔维亚国家生活之延续性——人们无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朋友，中世纪作品里平静的确定性和现代作品里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我们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有时会去一家咖啡馆，点上红酒和热卤香肠，一直坐到快半夜，在那里我们听一对罗马尼亚姐妹唱歌，她们长得很漂亮，像家养的鸟儿一样丰满，喜欢把头靠在一起，咧开嘴微笑，就像我小时候见到的菲利斯·戴尔和赞娜·戴尔拍照经常用的姿势。前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得体，非常自信，但是明显不是城里人，可能是某个大村庄里最富有的农民的儿子，他被这两姐妹迷倒了，而且是毫不偏心地迷恋，这让我们觉得是在心理学上的奇怪现象，但是那两姐妹却觉得没有什么，接受了这件事。我们毫不怀疑，他对她们的热情是一种很具实用性的天性。在这里，在博物馆，我们看见了他们三人，站在某些中世纪圣像和圣骨箱前，年轻人手舞足蹈，骄傲地大喊，向两个女孩解释，第一个尼曼雅国王是圣西缅的父亲，他建造了阿索斯山上的赫兰达尔修道院。她们看起来很感兴趣，而且肃然起敬。

我们来到康斯坦丁家，他为我们打开门，就像一个快乐的小佛陀，他在表现好客的时候总是这样，而格尔达在她的茶桌后等待我们，穿着简洁的灰色丝绸裙子，显得沉着优雅，没有哭过的痕迹。两个小孩在茶桌旁玩耍，这是两个奇迹般的小东西，因为他们身上综合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仍然固执地保持分离的状态。他们飞快的一瞥立即显示出德国的浪漫的激进主义、犹太人精明敏捷的概率计算以及斯拉夫人的分析洞察力。他们有一种有趣的冷静，我第一次遇见康斯坦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第一次到南斯拉夫的时候，由于一些工作上的事，我被带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快到中午了，为了完成讨论，我们只能一起吃午饭。康斯坦丁打电话回家，说：“是你吗，我的乖儿子？告诉你妈妈，我不回来吃午饭了，因为我跟一位英国女士私奔了。”我坐在桌子对面，听到了那个小孩用听不懂的语言回答他，像冰水一样冷酷。“你觉得，”他问，“那个英国女士有什么

特征吗？”那个是大儿子，但是小儿子也有一种这样的态度，他严肃地意识到必须在放纵的天性上强加一种形式。现在全家聚在一起，能看出来他们认为康斯坦丁和他的母亲都是那种放纵的导管。他们在这一观点上表现得理智。他们愿意承认这两个人的奇怪状态有某种益处，且很有趣，但是他们不会对它需要得到控制这一点视而不见。

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有点伤心，我知道他们是错的，他们从格尔达那里继承了一个错误以及她的西方传统。康斯坦丁也许需要控制，因为他的处境，其中最不利的情况就是他向西方投降；但是康斯坦丁的母亲表现出她自己能够忍受很多东西，她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适应生活。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美貌——一定是脱俗的美貌——送给她一个聪颖体贴的丈夫、一个叫康斯坦丁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就在战争前，巴尔干地区灾难性的肺结核，带走了她的女儿。然后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战争；她的丈夫死于斑疹伤寒，她的儿子被派去俄国，然后失踪了。与此同时，她的家园被德国人占领，她没有任何财产，谋得了一份当护士的工作，战争结束后，她也失业了，差点饿死，直到生活变得正常，那时她成功招收了一些学生，给他们上音乐课。即便那样，她还是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战争结束三年后，她才听说康斯坦丁还活着。人们相信一个农民妇女可能忍受这一切，因为她从出生就被训练在挫折之下保持沉默。但是，这个女人是一位音乐家，一位诠释性的艺术家，她的训练都指向公开表达她的感受。按照通常的推测，她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极致的悲痛并为此而死，这是一种特别的死亡，它也是一种完满。但是她就在这里，她的脸饱经折磨，但不是因为她的痛苦，而是因为她发现不可能找得出人性准确的真相，那就是说，不可能找得到艺术尝试的一个稳定基础。

“那你可以告诉我！”当我们告诉她，我们上次见过她之后去了加拿大时，她大声说，“史克里亚宾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所有加拿大人最喜欢的音乐家？”我们回答说，我们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见闻都不能让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对我而言，这真的让人难以相信，”她解释说，“但是今年冬天，有一位加拿大教授来到贝尔格莱德，他向我保证，在他的国家，人们最喜欢的音乐家不是贝多芬、莫扎特或者瓦格纳，而是史克里亚宾，而且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协会推广他的作品，叫史克里亚宾协会。但是这不可能，因为史克里亚宾本人会承认，如果他是某个人‘最喜欢’的作曲家，那个人根本不可能欣赏他。一个每顿饭都吃龙虾、喝香槟的人永远都不能宣称自己是龙虾和香槟方面的美食家。同样，史克里亚宾的作品太‘难’了。”她把手指竖起来，僵硬地分开，每根手指都表现出在技术问题前的难堪。“很少有人能够演奏他，很少有人能通过聆听他而真正熟悉他。而且，在那样一个大国，一个大部分被白雪覆盖的地方，很多居民靠捕捉野兽谋生，而史克里亚宾是他们最喜爱的作曲家，这是个多么荒谬的想法啊。”

“是的，妈妈，”康斯坦丁说，“但是你是不是忘了，史克里亚宾本人也出生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大国，那里也有很多人捕捉野兽？”“是，是，”老太太说，“但我相信，在整个俄国你都找不到一个人会说史克里亚宾是俄国人最喜爱的作曲家。”“但是，也许，妈妈，”康斯坦丁说，“他们在加拿大捉的是一种不同的动物。”“一种不同的动物？可那有什么关系？”他的母亲茫然地惊叫，她冥思苦想，直到她看见康斯坦丁对我们眨眼，然后她笑着大声说，“啊，等你老了，每个人都嘲笑你，甚至包括你那可怜的小傻瓜儿子，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很快，我们就感觉到格尔达觉得这不是招待我们的恰当方式。她对我们的印象变差，因为我们喜欢这样随意地讨论音乐，这种谈话真的不可能有任何价值，因为它没有涉及音乐的理念或者历史。如果我们说起某些特定的音乐场合，而且引起她谈论这些场合，因而建立起我们共同的文化乐趣，那样就会好得多：如果我们，比如说，提起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听了一曲贝多芬交响乐，问她在哪里听过它。现在我们谈话的话题已经转向了食物和在南斯拉夫家庭完成的烹饪数量，她谈道，她周围的事物正好缺少那种高雅。她傲慢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塞尔维亚家庭邀请客人来喝茶，那位家庭主妇就会亲自去烤蛋糕和饼干。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她说起这事的时候耸了耸肩，表示她不是这样的，因为她桌子上的食物明显是从商店买回来的。她用冷淡的语调描绘出了她会如何表达她的好客：一个人走下楼，衣着体面，拿着鼓鼓的钱包，如果她住在柏林，她就会去克兰茨勒咖啡馆，如果住在维也纳就去德梅尔咖啡馆，如果是在布达佩斯就去吉尔波咖啡馆，然后向侍者打招呼，侍者们会因为这个人的声誉而表现得恭恭敬敬，然后她会选择精美的糕点和花式小蛋糕，它们不仅让她的朋友大饱口福，而且能够被认出来，它们来自克兰茨勒、德梅尔或者吉尔波。

她认为我丈夫和我会跟她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会跟她一起持有这种冷淡而强大、从容不迫的理念，一起反对塞尔维亚野蛮人，那些人竟然让一个女人在火炉前劳碌出汗，就好像她请不起其他女人来为她工作一样，而实际上可能确实是这样。我们很难解释，我们觉得她大错特错。我们喜欢克兰茨勒的苹果派，我们到维也纳也一定会买德梅尔的核桃仁蛋糕，有一次我们在布达佩斯和朋友午餐，却很丢脸地迟到了，因为我们转身走进吉尔波去品尝那塞满了奶油和草莓的蛋白酥皮筒。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走进商店买一块蛋糕，他买到的就是蛋糕，而不是其他东西，它可能非常好，但那只是一块蛋糕；而一个人走进厨房，做了一块蛋糕，因为一些她尊重而且可能喜欢的人要来她的桌前吃蛋糕，她正奏出一个低音符，可能贝多芬和莫扎特演奏得都不如她低沉。我们相信创造比付钱更好。英国其实比德国更早拥有中产阶级，而我们发现，中产阶级放弃使用双手，失去的其实比获得的多。但是，宇宙中最宽的鸿沟就是这边的生机勃勃的体验和那边的哈欠连天。

格尔达讲话的时候，康斯坦丁一直看着她，带着过度的赞同，不断点头微笑。他明显想让她安心，而且想把她推荐给我们，这让我们想起了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我们两次看见他们不和的状态。想到在这些场面以外，他们热烈地享受着对彼此的满足，就是现在正让整个房间变得温暖的这种满足，我们感到震惊。不过当然，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幸福的婚姻。当我们起身告辞时，康斯坦丁告诉我们，他送我们走一段路回去，那时我们才看到，他不仅对她微笑，也对我们微笑，他的微笑和真正微笑的关系，就像假牙和真牙的关系，它履行着表示友善的功能，但是那块有机体已经没有了正常的自然的动作。我能感觉到，即使是在黑暗中他也还在微笑，那时，我们正漫步走过他那漂亮房子所在陋巷的隐蔽处，走进林荫大道，那里各种机构和部门的灰色混凝土建筑闪烁着低于电力标准的昏暗灯光。我们来到城市中心，看着那边乱哄哄的热闹场面，人们从透出黄色灯光的咖啡馆里匆匆地进进出出，形成缓慢而黑暗的欢乐人潮，这时他脸上仍然带着过度的高兴表情，嘴角扬起，说道："现在，我要回去了。"但是他没有握住我丈夫向他伸出的手，而是盯着对面街道的巡游队伍。两个吉卜赛人，像锡克教教徒一样又瘦又黑，头上缠着红色破布，轻轻地走过，他们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躺着一捆东西。那东西动弹了一下，坐起来，原来是一个年长的美丽女人，穿着鲜艳颜色的衣服，她看着我们，眼睛大睁，充满严肃的赞赏，像先知一样挥舞着手臂，大喊了几个罗马尼亚单词，它们带着启示的精神。有一瞬间，我们对她的不理解似乎是一个最大的灾难。但是她身体变软，躺回去，又变成了一捆东西。她只是喝醉了。康斯坦丁心不在焉地说，仿佛他的灵魂正完全跟着巡游的人潮前进："那个……我的妻子已经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去马其顿了。"

我站在那里，吓呆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马其顿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我一直期盼着要把它展示给我丈夫看，但是，现在这个讨厌的女人居然要跟我们一起去，况且她还不喜欢我们夫妇俩。这就像带着一个吹毛求疵的敌人一起度蜜月。这个建议不仅使人在合理的情感层面无法忍受，还造成了无数实际的难题。我们在马其顿能够乘坐的汽车和马车都很小，坐不下四个人，三个人就比较舒服。格尔达将是我们的客人，就同康斯坦丁一样，而对于彼此强烈反感的人而言，维持主客关系本就不易。而且她蔑视一切属于斯拉夫而非德国的东西，这种情绪将在马其顿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因为马其顿是南斯拉夫最有斯拉夫特点的地区，它不仅是非德国的，还是非西方的，带有强烈的拜占庭风格，甚至亚洲风格。"但是她不会喜欢！"我喊道。"我告诉过她很多、很多次！"康斯坦丁哭着说。我丈夫弯下身看着他，他的镜片闪烁着一种光芒，看上去是威胁，其实是恐慌。"你的妻子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他说。"但是她要，她要！"康斯坦丁大喊，"她整晚都在哭，因为我不肯带她去，我都睡不了觉。而且她说，如果我不带她去，她就会自杀！我又不能让你们独自去，因为部长希望我陪同前往！我告诉你们，她肯定会和我们一起去！"说完，他转身离开，

走得很快。我丈夫和我站在那里，瞪着眼睛看着彼此，感觉就像卡夫卡书中描述的人，因为一些无名的罪过，被一个隐形的、无名的当权者判处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奇异惩罚。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他被迫跟一个不喜欢的人一起旅行，而这个人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力，无论是在情感、对国家的认同，还是经济上的影响力。

所以，耶稣受难日（按照东正教的日历）早上八点，我们四人从贝尔格莱德车站出发去马其顿。我们夫妻二人从旅馆坐车出来，经过卡莱梅格丹城堡一角，那里有一段朝向河边的陡峭堤岸，柽柳的花朵使它呈现出一片深红色。清晨的阳光快乐地照射在城市周围灰色的辽阔的水面，也在山顶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别墅上闪烁，那座别墅跟所有土耳其别墅一样，精致地适合任何本质新鲜的东西，适合春天和清晨。到了车站，我们发现格尔达和康斯坦丁还没到，就在月台上的咖啡厅坐下来吃着漂亮的巴勒斯坦橙，它们的果肉就像亮闪闪的金色水晶。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博士，他是康斯坦丁的同事，我跟他曾经有过一些官方来往，他前来送别，带给我一束红玫瑰。他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喝了点咖啡，我们一直聊天，一直到康斯坦丁和格尔达明显真的迟到了很久，我们开始来回走动，又担心又恼火。

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出现，我们只能在火车发动那一刻跳上火车，等火车开动了，那个博士从窗口递给我玫瑰花。我丈夫和我忙着收拾我们的行李，拿出坐垫和书籍，因为我们将在火车上度过十二个小时。但是，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格尔达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低头望着那束玫瑰，一脸怨恨，康斯坦丁伸出一只胳膊抱着她，正在试图安慰她。“是，这很坏，”他说，“当然他应该也给你送花。”我丈夫和我吃惊地看着他，因为很明显，年轻的博士过来送给我玫瑰，这是一个非个人的官方行为，而他忍住没有给格尔达带任何花正是因为她对他有私人的价值。“但是，恐怕，”康斯坦丁说，“这个年轻人真的不如我希望的那样知道怎样表现，因为，看，这不是他应当送给我们朋友的花。”“对，当然不是！”格尔达热烈地同意，然后他们一起低头盯着那些玫瑰，摇着头。

“告诉我，”康斯坦丁转向我丈夫说道，“在你的国度，如果一个人要去车站给一个他不是很熟悉的女士送行，他应该送什么花？”我的丈夫一阵狂笑，说：“在我们国家，他会去花店，要一些漂亮的花。”格尔达看起来对此很反感，坐下来，盯着窗外。康斯坦丁用非常震惊困惑的腔调说：“哦！这是要讲规矩的！”“什么？”我丈夫问，粗率地笑着。我从康斯坦丁的解释得知，在游历中欧的旅途中，我收到的全都是康乃馨，而我讨厌这种花，那并不是不凑巧——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嫁给了一个银行家。尽管我从来没有察觉，但人们其实为了不让我自视甚高煞费苦心，按规矩，我到达的时候收到的花，还有逗留期间收到的花，都应该比较节

制。“只有在送别的时候，”康斯坦丁说，“送的花束应该真的很大。还有颜色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就是这个问题。有一些颜色，尤其是玫瑰的颜色，完全是私人的，那些表示礼节的礼物不适合用这些颜色。我们年轻的朋友就是违反了这个原则。这些玫瑰几乎是绯红色的。”我的丈夫转过身来对着我，带着怀疑的神情，但是康斯坦丁并没有笑。他的眼中有怀疑，好像他在想是否他妻子错了，而且是否他以前过于夸大了我们的高雅程度。

这里的塞尔维亚乡村非常可爱，就像苏格兰低地和新英格兰的混合体，很多泛着金绿色的柳树、一片绽放着朵朵白色雏菊的草地以及少女般的树林持续几个小时不停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午餐时间到了，我们来到餐车享用巴尔干地区的火车上供应的辛辣而朴素的饭菜。我们刚坐下来，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人就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对着一位老人大喊，穿着穗带装饰的紫色农民服装的那位老人继续吃着饭。“这没什么，”帮我们点菜的侍者说，“他们只是两位议会议员。”“对，”康斯坦丁说，“那个穿着农民服装的，以支持斯托亚迪诺维奇而闻名，另外一个则是反对者。”就在这时，反对者弯腰看了看对手的盘子，然后直起腰来大声说：“我看你这现在正在吃这么多的鱼。难怪你没兴趣采取措施控制洪水，我猜你喜欢洪水，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大量的鱼。”随后，他坐了下来，可马上又跳起来叫道：“如果你不去修更好的路，我们省的人就要变成分离主义者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军团，一个就够了，因为军队里只有那些乌合之众才会为你们卖命。”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继续吃饭。

我们沿着通道回去，一个人从他的车厢跑出来，两只手抓住康斯坦丁。“看看他，”康斯坦丁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塞尔维亚老爱国者。”他个头矮小，身体粗壮，虽然很胖，但很灵活，头和脸上都长着粗硬的毛发。“看呀，他的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头发，”康斯坦丁继续说，“他都差不多是个老人家了。我要请他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因为他很喜欢我，你们也可以观察他。”他在我们这边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座位上蹦来蹦去，因为他在激烈地攻击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不是因为它的保守，而是因为它的创新。“这个国家已经堕落了，”他大喊，“因为军队里竟然有那么多非塞尔维亚人！你想想，竟然有克罗地亚上校。一个克罗地亚上校，想想都愚蠢，就像一个女传教士！我告诉你，克罗地亚人被奥地利的影响给永远毁掉了，他们就像堕落的女人，他们不能被救起来了。”他时不时地停下来，指给我和我丈夫看窗外某处风景，他觉得外来者不应该错过它们。“他们看起来是好人，”他说起我们，但是叹了口气，沮丧地补充道，“但是他们毕竟来自西方，是欧洲人，毫无疑问，他们同情这个可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切东西都被质疑。”

“当然，他现在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康斯坦丁对我们解释，“他就像一位苏

醒过来的中世纪英雄。”尽管他非常富有，而且在自己的地区有很多事物要照看，但是他年轻时常常在他的家乡和马其顿之间冲来冲去，在那里他是一个非正规兵团的士兵，杀死了很多土耳其人。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像雄狮一样战斗，和平之后，作为对他的褒奖，他被任命为“南方塞尔维亚的领主”（马其顿的行政头衔）。“但是，”康斯坦丁说，“就他的职位而言，他的想法不够现代。他非常勇敢，这是当然的，而且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条件，因为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工作了，他要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野蛮的黑山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太率直，太喜夸大，太具有荷马史诗风格。他希望把马其顿重新改造成五百年前的模样，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看见一间荒废的教堂或者一座城堡——如果它们过去属于塞尔维亚人，后来被土耳其人毁掉了——他就会把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从他们的住处带走，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劳动力去重建它们，而且他派出重兵看守他们。当人们说‘你不能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可为什么不呢？他们过去拆毁了它们，不是吗？’。”

“亚历山大国王对这事表现得很仁慈，尽管他没有让他在那里待很久，因为现在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给他安排了其他他能做得更好的工作。现在这个人很快乐地建造了很多教堂，因为他很虔诚，教堂和国家对他来说是一回事。他的目标是超过我们中世纪的米卢廷国王，那位国王修建了三十七座修道院。”他弯腰看着对面，问这位爱国者他的纪录是多少，老人潇洒地摸了摸自己乌黑的胡子，宣布道：“四十六。”“他最喜欢的，”康斯坦丁说，“是一座在科索沃战场附近的小教堂，那座教堂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建造的。它耗费了两百英镑，装饰着一些壁画，它们在他和教会之间一个争论很久的话题上给了他某种满足。你看，我们的中世纪国王，尼曼雅王朝的国王，都被认为是圣人，除了一个臭名昭著蔑视教会的罪人，他就是那个修建了三十七座修道院的米卢廷国王。他们都是圣人，因为他们都是拜占庭模式的神权社会领袖，因为他们捍卫基督教，反抗异教徒土耳其人。卡拉乔尔杰和卡拉乔治维奇家族也将教会和国家连为一体，他们也真正赶走了土耳其人，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同样承认他们是圣人。但是，今天的教会当然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这种想法亵渎了上帝，而且他们告诉他不要这样不敬。然而，在那里，他的小教堂远离人烟，所以他让人画了一些壁画，描绘了卡拉乔尔杰、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老彼得国王，当然，还有亚历山大国王，他们都拥有巨大的光环，就像金制的汤盘一样。他请了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帮他画那些壁画，艺术家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不想画，但是这位爱国者就像公牛一样对着他咆哮，抓着腰带，好像在找他的手枪，于是艺术家说，‘噢，他们当然应该是圣人，他们都应该是圣人！’。然后，当牧首过来举行小教堂奉献礼时，这个人把所有描绘着带着旗帜的皇室新圣人壁画给遮了起来，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的母亲非常虔诚，她在教堂的地板上跪了很多个小

时，祈祷他的这些罪恶能得到原谅。”

“现在告诉你的朋友们，我们来到了塞尔维亚的中心。”这个爱国者吩咐康斯坦丁。“我们就要进入的这座城市叫克拉古耶瓦茨，”康斯坦丁解释说，“它是舒马迪亚州的大城市，舒马迪亚的意思是‘多林木地区’，大部分塞尔维亚塞族人都来自此地，他们是起义对抗土耳其人的中坚力量。现在还有很多军火在这里制造。”“叫他们看那边的亚历山大国王纪念碑，”爱国者说，“外国人看看这个东西很好，它使他看起来很结实，肩膀宽阔，像一个国王的样子，虽然上帝知道这个可怜人其实身体像学生一样单薄。但是现在让他们看另一边的窗户，天啊！”“为什么？”康斯坦丁问，“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看不到塞尔维亚逝者纪念碑了。”“这正是我希望的。”爱国者说。“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康斯坦丁接着问，“人们都认为那座塞尔维亚母亲的雕像很好。”“那正是我不想他们看见的东西，”他坚持，“塞尔维亚女人的胸脯很好，但是他们竖起的这个雕像像牙签一样。”“他从来不考虑女人的胸脯，除了从爱国者的角度，”康斯坦丁解释说，“他的国家就是他的一切。他就像一个好僧侣般纯洁。”

火车又行驶了一段路程，他到站了。一个穿着羊皮外套的农民，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前来接他。那个农民拿起他的行李，看着他对我们说再见，脸上带着体贴忠诚的谦逊微笑。“我很高兴我回来了！”爱国者大喊，“这里是这个国家的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您知道！哪天你们一定要来这里看我！”他抬头看着天空，微笑，然后看着站台边沿路生长的菩提树的树枝，骄傲得颤抖。“这些菩提树啊！很漂亮，是不是？是我十年前种下的！”“十年？不可能！”康斯坦丁惊叫，“你肯定是说二十年！”“不，我说十年，”爱国者说，转身看着他的仆人，“我种这些树不超过十年，对不对，萨沙？”“是二十二年。”萨沙说。“萨沙，你是一个傻瓜，一个傻瓜的儿子！”爱国者大喊。“二十二年前您种下了这些树！”那个农民答道，提高了嗓门。“那怎么可能，”爱国者尖叫，“那时——”火车开动，我们进入了另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想不想坐到这个角落？”我问格尔达，“我觉得你坐这边的话，能从窗户看到最多东西。”“那肯定很有意思，毫无疑问，”格尔达说，“如果谁哪怕有一丁点儿想看窗外的话。”火车继续往前奔驰，进入了下午，进入了傍晚，进入了深夜，进入了马其顿。

马其顿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斯科普里I

出了车站，我表现得像一位专业导游，挥着手示意大家看那些躲在黑暗背后的财富。车站坐落于斯科普里新城区主干道的尽头，除了灯光昏暗、鹅卵石铺路和鲜有汽车之外，它跟英国工业小镇内一个中等购物中心周边的几百码场地无异，到处都是毫无特色的工业制成品，仿佛头皮经年累月已布满头皮屑。车站背后是一处叫作阿特拉斯的高地，地势一路抬高延伸至天际，月光浸润的云朵透出大理石般的纹路，四周的和暖空气中竟还藏有丁香花的香气，隐匿于背街后院的小咖啡馆里传来阵阵游乐欢唱之声，是马其顿人的那种干涩的声音。此时发生的一件事给这座城市带来韵律，也引发骚动。两匹马拉着一架小马车在鹅卵石路上哒哒地行进着，人群也被催促着一路前行，鞋跟碰撞地面发出声响，他们的目的地一致。“看呀，大家都去教堂参加复活节仪式了，”康斯坦丁说，“如果不想错过仪式，我们去旅店放好行李后得马上出发，现在已经快午夜12点了。”“我得先换一双鞋，”我说，因为一只鞋的鞋跟在出站时掉了，“同时你可以请他们为我们准备一辆马车。”

可下楼后我们发现他们什么也没做。起居室里，格尔达像阿索斯山上一位正思索着自己肚脐的古代僧侣般静静地坐着发呆，我的不解人意令她陷入沉思，康斯坦丁则在她发怒前紧张地承受着她的指责。本该为我们去取马车的小伙子手里正干着别的活儿，所以我们只好自己返回车站，一辆破旧的马车等在那里。马车只能容纳三人，非要再挤一个就非常危险。马车沿着主干道嘎吱嘎吱地跨过瓦尔达尔桥朝着广场前进，我丈夫则伸长脖子，满脸惊讶地看着那栋污染此地景致的恐怖建筑。赶走土耳其人之后，斯拉夫人成为马其顿的主人，他们欣喜万分，推倒了已在此优越之地矗立三个世纪之久的清真寺。令人遗憾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军官俱乐部，这栋房子位居全欧洲最丑建筑之列：外墙涂着芜菁色水泥，看上去像煮鱼锅和陵墓的结合，比方说一条巨型鳕鱼的墓穴。我丈夫被这栋建筑的外形惊呆了，差点儿摔下马车跌到鹅卵石地上，我大声叫道：“讨厌的马车！”“我们本可以租一辆好点儿的马车”，格尔达说，“要是我们能提早一些的话。”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复活节已被格尔达取消不复存在，除了混乱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而此时我们正行驶在桥上，瓦尔达尔河泛起阵阵凉意，那些离开雪山不久就变得水量充沛的河流大都携带着如蛇一般的冰冷寒意。堤岸的路灯让漆黑如墨的河水变为盛满金色油液的池塘，微波荡漾；路灯后面新建的住宅，样式虽简单朴实，却充分考虑了居家传统，黑暗中显露出其非西式的外形；城市的高处矗立着一座城堡，堡内灯火通明，灯光透出窗户让人仿佛看到点点繁星。我们驶过大桥拐上堤岸。河水从身旁奔流而

过，朵朵云彩飘过头顶上方的墨色苍穹，一群人在人行道上慢吞吞地走着，彼此挨得太近以致无法加快步伐，他们服饰的颜色在夜晚显得略深，衬得脸色稍白。前方传来阵阵节日的欢乐声响，一群人朝着教堂一路游览着慢慢前行，这是复活节信众的一个独具魅力的习俗。也许他们是去看大象吧。我们走下马车加入队列，跟大家一起缓慢地走进一条小巷，一座教堂出现在面前，建筑外形看上去既不像教堂也不像马戏剧院，倒像是一栋华丽的双层农房。

建筑内部也古怪异常。它始建于一百年前，当时的苏丹放任基督徒修建教堂，不过这些基督徒通常得贿赂当地的帕夏，否则苏丹的许可形同虚设。有四兄弟负责建造这座教堂，他们曾在巴尔干半岛及意大利学习石匠手艺。四兄弟中的老大据说是个文盲，所以他们的作品混杂着文明与无知，透出一种奇怪的风韵。他们对于复杂式样的处理出色却幼稚，这些完全不搭的式样被一个根本不了解这些艺术形式起源和本质的人强行搭配在一起。拜占庭式的穹顶让原本极高的意大利长形会堂平行屋顶形成突然的凹陷；装饰隔板在上影线处守护着亚洲长廊的秘密；为国王和主教准备的两把雕刻座椅摆放在教堂左右两侧，体现出粗俗的拉文纳风格；神坛被置放在高处，因为巴尔干的建造者们已经习惯了清真寺内宣教台敏拜尔的高度，敏拜尔通常位于一段如梯子般陡直的长楼梯顶端；教堂四周安装着铰链窗，样式粗放、率真，透亮的窗玻璃被包裹在铁框内，和人们在农场看到的一样。

在这栋昏暗阴沉的奇怪建筑里，很多人正手持未点燃的细蜡烛站立等候。圣坛前的屏障被称为圣幛，是东正教特有的建筑元素。此处的圣幛是一堵挂着十字架的墙，坚决护卫着饱受威胁的圣物。圣幛的高度在幽暗中展现出一种朦胧的深沉厚重，各种圣像及镀金雕刻装饰让其更显绚丽豪华。那些置于圣像光轮中和手中的银盘闪着月亮般的微光。屋顶垂下的枝形吊灯灯光昏暗；教堂正中的圣台上，蜡烛发出一缕微弱的光，圣台上摆放着的一件刺绣圣袍代表着死去的基督。大多数人已经向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绣袍致礼，他们静静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上了年纪的人通常按照男右女左的顺序站立，年轻人则往往不遵守这个规矩。一排阶梯环绕教堂四周，一排人站于他人之后、阶梯之上，整个景象十分气派，有着超乎想象的优雅，也许皇帝在宫内的礼拜堂里也会下令如此。此时还有很多人围着圣台向基督遗体致敬。圣台被漆成蓝绿色，点缀着花朵图案；圣台上方撑着华盖，最上面一层的格子框架已经破旧不堪，看上去就像一个18世纪的床架。华盖以机器缝制的蕾丝覆盖，圣台上的绣袍上摆放着一卷厚厚的福音书和一些硬币，都是信众们留下的，东西并不贵重。繁重的工作和窘迫的生活如同伤疤在老年男人们的脸上留下刻痕；穿着西式服装的年轻男人们则打扮得如同海豹一般油亮光鲜；老妇们灰白的发辫垂至腰际，毛哔叽衣服外面罩着黑色绣布，绣布破损严重，因为年代过于久远，都是她们年轻

时绣的；年轻女孩们有的头上插着花，身上穿着厚厚的羊皮衣物，有的则打扮得跟来自美国纽约帕尔默斯格林或者罗彻斯特的姑娘差不多。但所有这些人都来到圣台前，低垂着眼帘盯着那块绣布，神情悲伤而恍惚。他们带着绝对的崇拜之情弯腰亲吻绣袍，那正是每个女人对于挚爱的男人的感情，然而比起她对爱人做出的任何不当行为，这份情感更有可能让两人的关系以痛苦收场，如果她能感受到这份情感的话。人们对这种男人女人们的崇敬之情感到奇怪之余，也诧异于这种情绪竟不会引发对崇敬对象的怨恨或奇怪想法。

一个脸蛋圆润可人却显得蠢笨的年轻女子经过圣台。她戴着德巴尔发饰，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饰品：一块亚麻细布织成的头巾上绣满了纯红色或者玫瑰色的圆形装饰，这些刺绣中间还暗藏着一个深红色或紫色的十字架，仿佛要躲开公众视线一般。每位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绣十字架，但它们都是精品，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愁的宗教圣符。在那女子俯身向圣台致敬之际，我轻轻拉了拉丈夫的衣袖说道："看呀，她是从德巴尔来的。"丈夫一边点头一边重复我的话说："是的，她是从德巴尔来的。"那亲切的神情令我诧异，因为我从没跟他说过有关德巴尔的事情。随后，复活节仪式突然开始了。一列神职人员穿过圣幛走进教堂，信徒们轻轻哼诵着狮吼赞歌，这一派宗教并不强迫神父保持独身，也不要求信徒必须反战，人们手中的蜡烛被相继点燃，整个教堂笼罩在一片轻柔的淡黄色烛光中。

神父们拿起圣袍带到圣台外，围着教堂走了三圈，让圣袍凌空绕过信众的头顶，信众们则手持蜡烛吟唱赞美基督升天的圣歌，这是复活节最重要的时刻。我和康斯坦丁一年前来到斯科普里时曾加入过这个游行队列，而此刻我希望再来一次。如花一般的微黄烛光、冷冽的星光和月色、神父们亮闪的法衣与十字架，以及那些倚在自家窗前跟着灯火阑珊处的游行队列一起晃动身体的身影，一起成就了这一生动画面的极致的圆满。可这还不够，这里有真正的复活节，有着对冬夏、冷热、明暗、生死、增减之差异的认知。人们开始重新感知某些以前不断经历却被忽视的重要事件的真正价值。但这次我们无法加入行进队列，因为仪式开始时，我们还在教堂圣幛外的队伍的最尾端，在我们靠近大门时，三圈绕行仪式已经结束。而当位于队列最前方的大主教停在门口布道时，我们才刚走到教堂前厅，每一个拜占庭式的教堂都有前厅，这个教堂的前厅既大又世俗，因为当时的建造者们习惯于清真寺那种高大的门廊样式，穆斯林都很喜欢坐在门廊下闲聊，谈商议政。

当我们站在那里时，我特别害怕，因为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会带来不适，这些人手上又拿着烛火，我担心他们会引发火灾。可当我看到坐在对面窗台上的那位农妇时，我忘掉了担忧。她是一个典型的马其顿人，而马其顿人

正是我此次回到这里的原因之一。她的年纪大约是饱经风霜的五十岁——事实上，马其顿女性似乎从不再是少女的那一刻起便看起来这般沧桑。一块黑布从她的头部垂到肩部，那头巾的折痕、高贵的身躯以及遭痛苦碾压的肉体正是壁画和马赛克图画中常见的拜占庭的圣母玛利亚形象。她用粗糙的手护卫着蜡烛，低头注视着烛光，仿佛在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赤褐色羊皮夹克的袖子上绣着一片颇具风格的红黑树林，可以看出这种样式源于两千年前，由优雅的波斯妇女们创造。这正是马其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奇迹。

较其他人而言，她和她的先祖们承受了太多痛苦。此地一位颇具眼力的观察家曾这样说过，在大战前降生在此的每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在大战后出生）终其一生至少要面对一次残酷的死亡景象。伴随着周而复始的叛乱、屠杀、社会暴动，她于土耳其暴政末期降生在这个世界。尽管她居住的村庄没有遭遇屠杀，她肯定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向她保证她的村庄日后不会遭此厄运。之后，她长大了，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途还有霍乱和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侵袭蔓延。再后来，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兴起，而生活还是极度贫困。私人财产、人身安全、分娩关怀，她什么都不曾拥有，这是任何一位西方女性无法想象的。然而她有两样让西方女性羡慕的东西。第一是力量，可怕的、冷酷的马其顿之力——除非一枪毙命，否则她的家族不惧炮火侵袭，遭驱逐时，他们能熬过山区的严冬，能在瘟疫肆虐后顽强存活，能就着面包和辣椒长久地活下去。她像陷于卵石的凹陷中一般陷于贫困和匮乏，却保存着拜占庭最后的传统。

我们都知道拜占庭。它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代表着一段极其迷人的文明。不足在于，这个帝国完全不重视国家经济，无法言说的饥饿的痛苦让人民几近发狂。早期的皇帝们通过金角湾从亚洲为这个衰落的帝国引入并完善了一整套宫廷礼仪，让所有观者知晓借由视觉和听觉表达出的灵魂深意。教会也跟国家合作，学习治国之道，将弥撒提升为人灵互动的至上杰作；皇帝在理论上是神设在世上的总督，教会用很多仪式让人们不断接触神旨君令，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高贵艺术，在建筑、绘画、马赛克镶嵌、金属制作以及纺织等方面都能看出人们对于重大经历的表达，让所有其他的艺术形式稍显幼稚或粗糙。我们明白这些成就并非来自工艺技艺，而是来自真正灵性的痕迹，因为拜占庭人能够在四百年间高贵、体面地活着，知道自己注定有一天将被残虐的土耳其人连根毁灭。在那种心理阴影下，他们不仅学会了克制和坚韧，甚至在厄运来临的最后时分，他们还继续充实地活着，继续创造，促成一个新兴画派的新芽萌动。

我们知道这一切，但仅仅是知道而已。可这位女士正用尽生命去了解这一切，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存在于知与未知之中。土耳其实施的暴政剥

夺了她享受西方所有文明福祉的权利；她能依靠的只有翻转君士坦丁堡之杯后洒出的甜蜜。因此，她的行为内在都是拜占庭式的。拿起针，她就能本能地照着拜占庭式花样在亚麻布上飞针走线，她信守拜占庭理念，即人必须打扮，每时每刻都得打扮自己，华丽地打扮自己。她坐在那儿，倔强地坚持着自己手上的工作。这种坚持不是物质带来的偶然结果，它代表着一种社会信仰。她相信跟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相比，一个想得到尊重的人举止应当更加庄重高贵。她的背挺得笔直，她也绝不轻易展露笑颜。也因为如此，她并不觉得教堂仪式有任何的枯燥沉闷之处。参加教堂活动时，她可以坐上好久，安静满足地照看烛火，看着行动缓慢、表情庄重的神父，壮美庄严之情油然而生，并由此生出崇拜之心。她这样做并不是在瞪大双眼看西洋镜，也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她的心中怀揣着热情，就是这份热情令当时来到这里参与饥荒救援的救助人员震惊不已。这里的饥荒总是在对基督徒的反抗的镇压之后接踵而至。一次又一次，土耳其人不停地对不喜欢的村庄杀烧抢掠，当地村民被勒令移居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村民们总是回答说那或许是最明智的抉择，可他们不能抛弃自己的教会。这不关乎迷信。拜占庭风格的分支已经在圣坛前通过了那个它的母体曾经通过的测试，它防止厄运演变为堕落。这位妇人的脸上没有怨恨，只有尊贵，尽管还有些许对悲伤的感知，可她一心想着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高贵与崇拜。

此时，大主教站在教堂门口，他是一个高贵的人物，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法衣上金色丝线熠熠发光，法冠、牧杖和胸前的十字闪着宝石般的光芒。他的法衣糅合了古代贤哲的斗篷、罗马执政官的肩布以及拜占庭皇帝的束腰外衣和长手套等特点，一针一线皆透露出其与生俱来的高贵尊严。大主教用他那浑厚圆润的嗓音宣布基督已经升天，昏黄烛光映衬下的张张脸庞发出信仰的呼喊。随后他开始祈祷，诵读《福音书》上的一段我无法确定出自何处的文字，之后继续发表讲话，将塞尔维亚二十五年前把信仰基督教的马其顿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跟基督的复活相提并论。这实际是直截了当的南斯拉夫式传道，这种方式大部分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在政治舞台上得到实现。

我们的现代性大受震撼。这不是创新，而是对教会传统的延续。“和人体一样，政体也是由很多部分和其成员构成的，而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是皇帝和牧首，”一位拜占庭神学家如是写道，“人的快乐平和取决于身心和谐，政治组织亦如此，皇帝与神职人员之间也需要达成完美的一致。”正因为只作为一个宗教存在的东正教从不宣称自己是哲学、道德和政治学的最终掌握者，它才不会像基督教在西方世界那样引发此类难题。东正教曾经认为教会的主要职责是施展法术，通过仪式唤起人们最需要的精神体验，他们现在依然秉持这种观点。教会还有责任树立行为道德的普世准则。如果世俗政权参加仪式并接受这个准则，那么它就有权要求来自教权

的支持，而教权也有权提供支持，除非它自身遭受侵犯无法给予援助。事实是，只要世俗政权不插手宗教事务，教会将从政治上支持世俗政权。这种态度必然为所有国家教会所接纳，对教堂而言也没有任何麻烦，因为它并不就世俗和神性话题提出最终主张。

东正教并非自愿放弃该项主张。拜占庭历史上不间断的麻烦迫使教会不得不宣布放弃。只有话题具有可预言性，最终主张的提出才有可能。欧洲现在的有序生活每次只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维持几年时间，不过如果仅就这些混乱的同质性而言，整个西欧地区已经足够有序，让智者们能够制定一些他们稳妥地宣称为不朽的原则，因为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思维和行动提供了有效支持。东欧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东欧历史上的动乱发生得很频繁，影响巨大。拜占庭帝国无法预见未来，帝国饱受着基督徒们残忍无情的侵略，这些人本为解救位于耶路撒冷的基督陵墓而来，却停下脚步掠夺君士坦丁堡，一尝那更加直接的欢愉；拜占庭帝国也清楚亚洲人必来入侵，它就像一位梦魇缠身之人求助无门。自此以后，帝国的才华从思辨转向艺术，教会对教义只有保留之责而无须发展它。教会专注于弥撒带来的荣耀，弥撒能用法术对抗那些已知和未知的恶灵。为此，它招致了各方批评，被认为是一个迷信的奥秘，内容过时且缺乏生命力。但是，它确实很好地缓解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基于以上历史缘由，没有一位信徒因为大主教的布道实际上是一段支持政府的演讲而感到震惊。而因为巴尔干严禁宗教与反战思潮之间的任何形式的纠缠，我也确信没人会因为大主教年轻时曾在非正规兵团服役而大惊失色。这支非正规兵团于大战前在马其顿境内对土耳其人开展游击战，军中有着各色人等。一部分人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奉行禁欲修行之道，这些人大都出身良好，来自未被占领的斯拉夫国家，他们不断骚扰土耳其军队，尤其是那些被派去惩罚基督教村庄的军队，他们还设立非官方法庭挽救土耳其占领区业已崩溃的法律体系。一部分人是乐于屠杀土耳其人的极端分子，他们甚至更乐于参与针对可疑叛徒的大清洗运动。另有一些人是粗野的民族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行动正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自然表现方式。还有些人属于流氓无赖之辈，他们参军就是为了杀人越货。各色人物的立场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使得西方研习历史的人很难对近东政治形成清晰的概念。对目睹一队武装士兵迫近自己村庄的马其顿农夫而言，这种理解也很难，相当难。

事实上，大主教属于让人敬重的士兵之列。即使他择友不当，那位农妇也不会忧虑不安，她还是会小心护着烛火，感激涕零地望着他。他是一个很棒的魔法师。他知道如何穿衣、如何说话、如何致礼，让她体会到爱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的美好。他是一个魔法师，而让她更为惊讶的是，他不是自己的敌人。她的族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一直急迫地需要从特工密探那里

找到这种能带给他们慰藉的独特魔法，那些特工密探们一方面提供魔法，另一方面却不时地策划着要消灭他们。教会在18世纪时落入法纳尔人手中，他们是在君士坦丁堡安家立业的富裕希腊人，与土耳其人狼狈为奸；当他们的穆斯林主人鼓动他们攻击斯拉夫人时，他们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不愉快，尽管他们还保留着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力促苏丹同意让已是囊中物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巴尔干地区的所有教会。他们对所有宗教仪式征收重税，甚至在为逝者祈祷时也不忘榨干农民身上的最后几便士，就这样，教会沦为被精心设计来剥削斯拉夫人的财政机构。他们不仅掠夺信众们的物质财富，还努力剥夺他们最为珍视的无形财产——他们的民族身份。有一部分虔诚的斯拉夫人仍然选择当牧师。但如果这部分人不能背叛自己的种族血统，忘记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或者保加利亚人的话，他们就只能成为希腊神职人员的仆役，要是忤逆了主人，就会在举行圣礼前被带到本族信众面前当众抽打以示惩戒。除了那些已经受到限制的南部小省区，这些希腊人还在当地发起针对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的抵制运动，旨在强化希腊语在马其顿全境的使用。

时间来到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察觉到来自希腊人的巨大威胁，有一些希腊人已经在希腊王国实现了独立，而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爆发的骚乱每隔十年就会加剧。苏丹想出一个延续土耳其残酷统治的新办法，即分而治之，并于1870年任命一位保加利亚总主教负责管理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境内所有的教堂。“总主教”这个词就是对拜占庭传统的一种奇怪延续。它最早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用来称呼总督的，比如拉文纳总督就是代表拜占庭在意大利行使权力的官员。可这个词也反映出饱受土耳其摧残的拜占庭传统的堕落退化：教会神职很难用现代名称来定义，而且在不同的年代，这些名称确实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它被解释为被指派到该省区履行政治使命的总主教，可这位总主教又无法获得明确的支持以确保自己能够打败对手、完成任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好比英国政府向澳大利亚派驻一名大主教开展宗教事务，同时强迫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放弃民族身份，成为英格兰的子民，与此同时又不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现有苏格兰和爱尔兰宗教力量及政治组织的反抗。苏丹并没有召回在马其顿的希腊神职人员，后者为了保留权力进行了激烈反抗。而看到掌管教会的保加利亚人比起希腊人也好不了多少，塞尔维亚人自然也武力相向。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以超过五十万人的和平与温和生活为代价保存了帝国，避免了希腊、塞尔维亚以及保加利亚联合的危机。

残酷的宗教冲突及杀戮一直持续到巴尔干战争结束。坐在窗台上的那位女士不算年轻，她肯定记得斯科普里南部某马其顿教区里的希腊大主教，他对斯拉夫人的憎恨确实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因为他很难从他们的肉体伤害中获得满足。有一次，他指挥一帮刺客去杀害一位藏在某处养伤的保加利亚领袖。他们成功得手。他们切下那人的头颅将它带回大主教宫作为证

明，大主教收下人头并付给他们一笔丰厚的酬金。那颗人头面目可怖，下颚被子弹击碎。即便如此，这位大主教还是给人头拍照，把照片放大并悬挂在信徒接见室的墙上，这样一来，信徒们或许都能得到点儿教训。许多敏感高雅的女人，比如坐在窗台上的这位，只能从这位与本族为敌的暴徒口中听到基督升天的宣告。这位毕业于西方某大学的大主教极富个人魅力。一想到这种令人讨厌的不一致性预示着这个复杂的世界无法做到始终如一，并常常让人不快，我的手就禁不住颤抖起来，烛光摇曳。

大主教还在讲话，空气开始变得灼热，热气缭绕中弥散着蜂蜜的香气，因为律法规定教堂使用的所有蜡烛必须以蜂蜡制成。之前的关于火灾的担忧又开始困扰着我，对恐怖历史的阵阵反感以及对重蹈覆辙的忧心忡忡也随之而来。火苗迅速蔓延，燃烧物无力招架，唯有燃烧，化为灰烬。人类喜欢折磨自己的同胞，他们屈从于自己的不当欲望，放任悲剧持续好几百年，眼睁睁地看着人们痛苦挣扎乃至消亡。即使人生之快乐自我展现为宇宙中起决定作用的特有品质，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空气中弥漫着蜂蜜的味道，但我快被热死了。月光下，喷泉旁，玫瑰绽放，夜莺歌唱，一切无形的、无比美好的事物都将归于尘土，直到又一次创世纪的到来方得解放，重见天日。我让自己最充分地感受着这样的恐惧，又感到这种做法有点奢侈，因为我面对着这位马其顿妇女，而在我所遇见过的人当中，她能在恐惧这件事情上给出最多的证明。她的叙述中没有过分乐观的东西。人们可以大喊说开往布莱顿的列车将于11点15分从6号站台驶出，却只能低声地谈论敏感新闻，因为不论以艺术还是经验的形式，要在认知的边缘获取真知都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她并没有公开宣称人必得救赎，她就是简简单单地认为比起她所知的其他年份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在结束时不会有更多的死亡，仅此而已。她的身体饱经摧残，却仍在那粗糙而高雅的衣着之下透出一种骄傲的气质，它显示出，死亡可能会持续五百年时间，但那些死去的事物却又是不死的。

斯科普里II

下楼吃早餐前，我丈夫让我从盥洗室的窗户朝外看。旅馆后面的斯科普里一派繁荣的都市景象，让人难以理解：整齐铺设的公园路面，满目的紫丁香花和无花果树，枝叶被大雨打得上下摇晃，整齐排列的新建住宅，每栋住宅旁都有一个小茅屋，跟房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工人正踩在摇摇晃晃的楼梯顶部，在铺着红棕色瓦片的斜屋顶下干活。这些灰泥瓦房从骨子里透着一种令人愉悦却单调乏味的浪漫主义。米老鼠米妮或许会选择其中一栋作为她跟米奇的第一个新家，因为这里到处是塔楼跟门廊，还有很多好笑的小露台，迪士尼先生的镜头一定能捕捉到站在露台上给花浇水的米妮，正用她甜美纯净的嗓音哼唱着温柔的抒情曲。

其中一个露台下方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土耳其人，一个拥有真正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和生活在马其顿的大多数穆斯林一样。他衣衫褴褛，头上戴着过时的土耳其毡帽，鞋子的鞋尖部分已经开裂。露台下方的空间足以供他避雨容身，他伸直身体，一边望着哗哗落下的雨点，一边用省力的姿势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他的手肘搁在门阶上，这样把食物塞进四周胡须浓密的嘴巴时无须将手抬得过高。“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绝望的人，”我丈夫说，“我看他是一个土耳其人，有着坚不可摧的英俊气质，可他又不像我在阿塔图尔克时期见过的土耳其人。”“可怜人啊，”我说，“他是这里最后的土耳其人。1870年代波斯尼亚被奥地利占领，那里的土耳其人迁居斯科普里，斯科普里的土耳其族群不断壮大。斯拉夫穆斯林选择留在波斯尼亚，同时留下的还有出身良好、能适应西式生活的土耳其人。有相当一部分来到斯科普里的土耳其人或许从未真正融入这里，因为斯科普里已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社会。自战争以来，那些生活在巴尔干地区且愿意接受阿塔图尔克改革的土耳其人被遣送回国，社会进一步拆分、整合。不管怎样，我就是喜欢这个男人。”“没错，”我丈夫说，“这不是我们以为的死气沉沉，而是在困难情形下的一种强大的快乐能力。”

我们下楼坐在靠窗的位置享用早餐，喝着拌有香甜羊奶凝块的咖啡，吃着特别棒的穆斯林烤卷，享受着斯科普里的美丽景致。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景色之一，而这都是因为那位土耳其人的出现。整个斯科普里大约有75000名居民，其中土耳其人超过10000人，他们最早为这座城市赋予了色彩。这里的清真寺宣礼塔虽然数量没有萨拉热窝的多，但都颇具威严。因为斯科普里的基督教势力十分强大，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常常会戏剧性地揭露对手本质。不一会儿就有一群准备去揭发对手的阿尔巴尼亚人从窗边经过了。虽然我背朝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正在路上，因为丈夫脸上那父亲般关爱的神情告诉我他正瞥着那个走在最前面的阿尔巴尼亚

人。“他们的裤子不会真的掉下来。”我说。没有哪一个西方人在第一次看到阿尔巴尼亚人时不会觉得对方的裤子快掉下来了。这种服装，裁剪时剪刀在腰部横切，裤腰松松垮垮垂至胯骨，且没有明显的裤带固定；让人感觉更糟的是，这些白色或浅棕色的手工织布还在男性身体关键部位用密密麻麻的黑色羊毛刺绣做装饰。尤其当有一截衬衫鼓鼓囊囊地堆在背心跟裤子中间时，情况就更为严峻了。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头上戴的白色无边帽很像神像头顶的第二层光轮，散发出平民气质，也许里面藏着不可思议的东西。这种材料的坚硬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在手工刺绣的强化作用下，它变得跟紧身衣一样坚挺。与此同时，这一身装扮也和阿拉巴尼亚人的本性有关。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身上有一些能让他们抓住机会改良服饰的东西：他们似乎并没有吃下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苹果，只有纯粹的严谨，只有基督教赋予人类柔软灵魂的那份严谨。他们浑身散发出可爱、随性的魅力，展露出令人炫目的笑容。

让我丈夫目瞪口呆的那群阿尔巴尼亚人刚走，又来了一群跟他们截然相反的、来自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山区的村妇。她们尽管外表美丽，却神情肃穆，不流露一丝笑容，这与她们的民族历史息息相关。这些村庄在土耳其统治的五百年间并未被完全征服，村民们杀死了很多来此定居的地主和征税官员，严格地坚守着基督教传统。他们穿着整个巴尔干半岛最高贵华丽的服饰：粗亚麻刺绣长袍，以黑色羊毛绣制各种基督教符号，抽象（完全不具代表性）而充满热情。宽幅长袖像毯子一样厚实，黑线一针针绣成小方块状，通常带着一抹幽蓝，有种内心之光在黑暗之心燃烧的效果。表情严厉的妇女们穿着这样的服装给人以壮美绚烂的风暴将临之感以及一种有如交响乐的感受，而不包含任何灵巧或魅力的意味，这些人的长相就显示出她们不可能做很多不那么体面的事情。

早餐后，我们外出散步，格尔达跟康斯坦丁不久也跟了上来。我们看到，斯科普里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我们跨过瓦尔达尔大桥，昨晚的一场雨将桥面淋湿成淡褐色。越过左侧的一排柳树我们望向驻军要塞矗立的崖底，要塞建在由著名的塞尔维亚皇帝史蒂芬·杜尚修建的城堡原址上；远处还有瓦尔达尔河发源的雪山。右侧的堤岸旁新建住宅、办公大楼、公共建筑等鳞次栉比，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小茅屋星星点点地散布其间；斯科普里老城区位于这些建筑后面，保留着浓厚的乡村气质，梯田果园从要塞靠陆地一侧一路朝下延伸至腹地中央。在西方人眼中，这座城市一方面因烦躁的工作令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却也风景如画。我们沿路上山跨过土耳其地界，了解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萨拉热窝是一座属于穆斯林而非土耳其的城市：一曲由斯拉夫民族弹奏出的东方主题狂想曲。而在斯科普里我们看到了由东方人演绎的东方主题。形式感不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实质的不连续性。城里的店铺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这一点。这些店雅致却不整洁，店主人反对任何先荣后衰的事业。他们只会花费心思安排个别货物的摆放，却把最吸引人的货品摆在那些长时间卖不出去的东西旁边。在其中一个店里，设计精美的17世纪纸牌摆在糖果盒旁，这些曾经颜色艳丽、表面刻有凹槽饰纹的盒子如今已变得污渍斑斑、皱皱巴巴，盒面上戳印的时间为1921年。对绚丽色彩的热爱是另一个因素。人们绝不遵循自然规律进行修改以适应设计需要，只为呈现出自己最原始的状态。窗台上堆着一束束丝线，比起羞羞答答的西方纱线来更显光泽，西方纱线多少年来一直不敢做此大胆尝试，纱线颜色只有白色、蛋黄色、普鲁士蓝以及猩红色。然而，这些店铺于平凡中蕴藏着欢喜。一个烤甜玉米卷给我带来了一次最美妙的购物体验。这家店只卖烤甜玉米卷：金黄的玉米堆在一起，散发着香气，玉米粒遇高温发出低沉的噼啪声。这个声音老板肯定已经听了不下百万次，但他仍然乐在其中。

这种心理耐性的缺乏或许有着生理基础。我对这次旅行有着一丝小小的失望之感，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像我上次来时那样地生气勃勃。蒙面的穆斯林女人款款走过，几个跟那群蒙面女人有着一样表情的络腮胡男子坐在咖啡馆里，他们的表情显示出对纯粹的哗众取宠的约束，西方人完全无法理解，因为缺少了分析综合，西方人很难理解存在的含义。而这个地方此前则更像歌剧里的一幕场景。尖声的年轻面包师作为男高音起音，眼睛硕大、体态丰满的面包师俯身放下面包盘，上面搭着漂亮的红蓝条纹亚麻布，戴着面纱讨价还价的精明妇女们则成为某段舞曲中的芭蕾舞者，她们在一起愉快地表现着对自己性别似隐藏似承认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上几次来到这里是在早上的七八点钟，而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了，我注意到土耳其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跟随着一天当中的二十四小时的节奏。到了下午，这个地方活力减退；傍晚更是萧条不已；夜幕降临，新城区里的斯拉夫人在餐馆品酒用餐，吃着辣肠，闲谈政治，欣赏音乐，而跨过瓦尔达尔大桥从新城区来到对面黑暗的街道，除了偶尔从几家拉下了百叶窗的咖啡馆里传出阵阵歌声，其余之处，寂静无声。

我想，土耳其人大概是一个很容易疲劳的民族。崇尚武力、对宗教狂热的土耳其人在兴奋若狂时不会倦怠，禁酒也不过是为了没了酒精照样能够陶醉兴奋罢了——这实在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似乎天刚亮就开始没精打采，而对人生而言，则是一个人刚过青年时期便身心俱疲。跟朋友在咖啡馆或公园里小聚的土耳其年轻人谈笑风生、精力充沛，可一旦年满三十五岁，他就变得麻木迟钝，外界还误以为是智慧的外露，实际上大部分人很难拥有那种罕见的特质。他的姿势从容，其实是思维的无限延迟；他的手，虽然他才刚过中年，看上去却干枯苍老。土耳其政权的分崩离析可能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无能，还源自生理的缺陷，这种缺陷会在土耳其从政者到达某个年龄段且出任重要政府职位时产生影响。

要是朝霞继续滞留，我们还能享受更多愉悦。我记得有个吸毒者曾经试图跟我解释毒品的魅力，他说："知道吗，给自己打上一针，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都会过得美妙无比。虽然没有大事发生，但是不知何故，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让人觉得快乐有趣。比如某人坐在扶手椅上，又来一人将盘碟放在桌上，坐着的那人望着对方的动作，好像在观看最为精致优雅的表演一般，而电话里一句简单的'你好，在听吗？'听上去则像极了警句隽语。"据说，毒品对那些经常吸食的东方人而言具有同等功效。这个毗邻东方的城市尤其善于运用这种能让平凡变得美妙的力量。我们转进旁边一座清真寺的花园，除了年代久远的精美设计跟白色粗糙的建筑材质形成的鲜明对照所带来的巴尔干文化逆流外，这栋建筑稀松平常。这座始建于16世纪的著名清真寺一度毁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土耳其人对宗教狂热，却又极端懒惰到不愿保卫自己的圣地。一位南斯拉夫官员，来自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重建了这座清真寺，曾在巴尔干战争中奋力抵御土耳其人的这位斯拉夫爱国者现在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建筑的虔诚启发了他的美学热情，他所从事的美学研究饱含着比起东方色彩来更为浓厚的巴黎韵味，因为他曾在巴黎进行东方研究并获得学位。在这座普通的清真寺里，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也都再普通不过了。几个年轻人在喷泉池前清洗；两个富裕的中年男子坐在白色穹顶柱廊里交谈着，谈话内容跟在俱乐部里靠窗而坐的两个伦敦人的谈话内容相差无几；拐角处，几个贫穷老人坐在一位圣人坟墓旁的草地上，一边抚弄胡子一边聊天，谈论着重大却又仿佛说起来很轻松的话题，像极了一段发生在从英格兰郊区驶出的晨间列车上的对话。没有任何程式化的理由能解释这些人为何在此创造出一幅引人入胜的景象，可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或许是由于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怒气。看着这个种族就好比看着一面镜子，他们的皮肤如婴儿般光滑无痕，在他们身上找不出易怒这种毛病的半点踪迹，而这种毛病在西方世界非常盛行以致被误认为代表着生命的迹象。我们自己也受这种宁静气氛感染，不禁在那里坐了良久。

眼前是这样一幅景象：花园建在一个平台之上，这个平台比斯科普里所有的建筑穹顶、清真寺宣礼塔以及各家各户的赤褐色屋顶都高，让环绕城市的山丘和远处的蓝山一览无遗，山丘上立着一些无名穆斯林的墓碑，飘过的白云在蓝山山顶投下紫罗兰色的影子。西方人的审慎细致让我们来到花园墙边，从最好的角度欣赏眼前景致，在那里我们全然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因为陡峭的山坡底下是一条街道，放浪、有趣的人们在那里开心地生活。一大堆干草靠墙堆放，三匹骨瘦如柴、长满虱子的小马正在吃草。一块方形长春花蓝的标记毫无理由地贴在一所房屋的白色大门上，屋主是一位不知倦怠、行事古怪的女士：她每隔几分钟就用盆子朝门外泼水，尽显其彪悍气质。另一栋房屋前坐着一位漂亮的妇女跟两个可爱的女孩，明眸皓齿间满是快乐，她们一边在小火盆里煮东西，一边相互递土罐子，从里面倒水喝。一人带着大红色头巾，一人套着深红的夹克，还有一人穿着浅

红色的裤子。过了不一会儿，她们注意到我们在看她们，于是挥着手朝我们高声喊叫，她们的手纤细修长。像是为了炫耀一般，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还跑进屋里，随后举着一个让我们羡慕的活泼好动的小娃娃笑着跑了出来，那个娃娃没穿衣服，浑身散发着棕色的光泽。

这就是斯拉夫人的感官体验，欧洲人的感官体验，虽然土耳其人是他们的亚洲同类，但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大不相同。面对外界最初的刺激，这种感官体验不愿意将自己仅仅局限在温柔里，它坚持与物质结合，尽管物质在激起快乐的同时也会引发悲剧。抱着小孩的那位妇女此时正思绪万千，重重思绪中不全是快乐，也饱含着生育之痛、置被爱者于危险境地的爱情匮乏之伤以及疏远与死亡的威胁。如果能继续跟朋友坐在火盆旁一边笑谈琐事、一边喝着水罐里甘洌的清水，她会更加安全，不被伤害，而这也是真正的土耳其人想做的事情。整座城市呈现出两种个性的鲜明对照，一种是基督徒们寻找快乐时的轻率鲁莽、放纵无节制以及厚颜无耻，另一种则是土耳其式的节俭克制，只允许快乐存在。在斯科普里的第一个清晨，普通男人们对待玫瑰花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我们的这一经验源于我们打算参观的那家隐匿于众多穆斯林房屋间的著名商队旅舍，许多外交官和商人在从杜布罗夫尼克到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都会在此停留，这家旅舍像是奥西曼提斯式的华美纪念碑，整体宏大，需求决定了每个细节，雄伟的拱廊环绕大理石铺成的庭院一周，深紫红色的墙砖十分厚实。旅舍旁边是浴室，穹顶上长满了草，像长发一样垂下，罂粟花随处可见。草坪中央的小亭四周环绕着一丛丛的紫丁香和玫瑰树，那本该是一位用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善良女孩的家，可实际上那是一个警察局。透过敞开的窗户我们没有看到纺车旁格雷琴的身影，倒是有五个宪兵坐在桌旁，一个来自山区，脸色紫红，其余四人穿着合体的制服，制服衣摆垂到他们结实修长的腰间，五人的表情都十分刚毅，低矮的房间衬得他们的身形高大无比。一缕阳光让盘子里的辣椒折射出红色光晕，在玻璃杯上投射出一块粉色的酒渍状印记，并洒在小锡杯里那朵鲜红玫瑰绽放的花瓣上。正当我们看向窗户之际，他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对他们而言略显低矮的房门外，这样他们向我们行礼致敬时才能够挺直身体，看起来像几只亲切友好的翼龙。他们解释道，商队旅舍出于某些原因已经被关闭。当他们请我们穿过花园离开旅舍时，他们不带任何感情，只是客套地表现出官方礼节，可是一听到康斯坦丁在道别时对玫瑰花的赞美之辞，他们立刻表现得热络。

这些宪兵发出快乐的声音，开始在花丛中摘扯玫瑰花塞到我们手上，我丈夫跟康斯坦丁收到的玫瑰花比我和格尔达收到的还多。“这些花难道不比山顶的积雪纯洁吗？”那位脸色紫红的宪兵一边问道，一边温柔地摘下一束白色蔷薇。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用全世界军士长特有的音调朝着小屋

叫喊。一个宪兵仆役拿着之前我们在桌上看到的那个插有玫瑰花的杯子跑了出来，她是一位体格健壮却面带倦容的女士。“这朵花，”他边说边把花往康斯坦丁手里塞，一副出于礼貌故作谦逊的模样，说这东西微不足道，可大家都知道其实价值非同一般，“我们认为这朵花是今年春天花园里开得最好的一朵。”

后来我们又在一个坐在自家店门口的屠夫手里见过同样的玫瑰花，或者说像不像都不重要。尽管有些许东方式的丰满，但他的确是一位时髦又英俊的年轻人，将毡帽斜戴在头上。他的身形比起西方人的肥胖来真的好太多：我们长胖是由于身体结构有缺陷，自身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而东方人结实的原因似乎是他们喜爱自己的食物，食物也很喜欢他们，食物跟人快乐地和谐共生。从这个年轻人圆圆的脸庞和指甲微凹的双手之中能看出泛着油光的大米跟诸如奶油糖果之类的土耳其甜食间那种宁静无悔的结合。毫无疑问，他正想着即将到来的晚餐。他有权休息，因为他身后器皿里剩下的货品如同纽约第五大道花店里的鲜花一样摆放得很具品位。他的店十分精致洁净，而当一位又老又脏的阿尔巴尼亚人走进店铺用拇指和食指捏肉时，这位年轻的店主居然没有任何表情，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西方人一直认为一个本身整洁之人也必须爱好洁净，而这个观念在东方的每个角落都消失无踪。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转移这位年轻屠夫对玫瑰花香气与颜色的注意力，他的手指慢慢地捻着花朵，有时还把花凑到张开的鼻孔前慢慢闻着。他的乐在其中是合情合理也非常聪明的。如果时代之轮转动，令把玩玫瑰变得愚蠢或危险，这朵玫瑰终将从他的手上掉入尘土之中。而那位脸色紫红朝着房子大喊着要求完美的宪兵，以及那帮神情坚毅却在花丛中来回奔跑的手下，他们已将全副精力专注于玫瑰花。他们可以付出艰辛、抛弃尊严去种植这些花朵。要是有哪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没有相同的喜好，他们也会与之争论。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缺乏精神上的休息与判断力。

斯科普里III

斯科普里街头巷尾都展现出斯拉夫人与土耳其人、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的不同，甚至格尔达在参观途中也暴露出和我们的不小的差异。午饭前我们参观了一座修建于17世纪的教堂，那幅景象满是悲伤色彩，是种族差异造成的有趣结果。教堂基座深陷，因为它建造于穆斯林宗教狂热时期，那个时候所有教堂的基座都位于地面以下。这种规定是土耳其人的怨恨开出的花朵，因为土耳其人热爱光线，清真寺就是光线丰沛的场所，可他们没有实现原有目的，因为基督徒们恰恰更喜欢昏暗的环境，那样的环境适宜于创造各种法术。的确，现在的信众们也还跟以前一样，教堂里有两位女士和一位老人正在慢慢地依次欣赏黑暗中的圣像，他们跟康斯坦丁解释说自己对这座神秘教堂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晃动身体，轻声交谈，将我们领去看教堂里最珍贵的物品，那是一个由三兄弟雕刻的精美圣幛，上面表现了一些圣经里的场景，我们在托波拉的小教堂里见过的屏风也出自这几位老匠人之手。这道圣幛属于拜占庭风格，这种风格认为工匠对于装饰有着无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装饰应尽可能地丰富而强烈，但究其本质，这道圣幛又体现出纯粹的农民气质。亚伯拉罕准备用他的儿子献祭，跟族长制社会里所有的孩子一样，那个男孩呆呆地站着以示顺从，当天使上前阻止时，亚伯拉罕像一位被打断工作的农夫一样对着天空长吁短叹；天使的翅膀明显模仿了一只被杀死用于献祭的鸟的模样，雕刻者在接下来着手仿制翅膀上的羽毛时已经对这一形象了然于心。不论从资产阶级还是知识分子的角度，格尔达对这幅雕刻作品都十分恼火。“这不是严谨的艺术。”她说，说罢径直走向教堂后面。当我们打算离开时，我们看到她拿着一根蜡烛站在一尊14世纪的圣母玛利亚圣像前，这尊残破的圣像在昏暗中仍然散发着光芒，圣母的惆怅被表现得惟妙惟肖。我跟丈夫发出一阵赞叹，格尔达却极度尖刻地回应说：“现在，我想，这尊圣像得去大英博物馆了。”

我把她的态度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对个中原委早已了然于心：不管是因为我们个人还是因为我们是曾经征服过日耳曼的列强的子民，她都不喜欢我们夫妇俩，她将我们视为资产阶级的叛徒。但是用完午餐后，我们却发现她的烦恼源自其人生哲学，而我们之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街头巷尾闲逛的那天早晨，斯科普里已经向我们阐明了斯拉夫人跟土耳其人之间不同的享乐方式，而今它又展示出格尔达与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以及我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触及一个更加实质的问题：快乐是否拥有价值。

当天下午，我们站在堤岸上观看星期日的复活节游行，人们沿着对岸的河堤一路走来，他们不久就会过桥，从我们旁边经过，最终到达大教堂。大

主教和牧师们引领着市民和农夫走在队列的最前面，阳光透过乌云照射下来，令他们胸前的十字架和法衣闪闪发光，也为很多妇女头上的番红花色头巾增色不少。一个吉卜赛女孩很喜欢这种形式的表演，队伍刚从她旁边经过，她就跳上堤岸快速跑到一个离桥更近的地方好让自己再看一次，她那玫瑰色的裤子被风吹得鼓鼓的，在堤岸下的河水中投射出模糊的影像。无论队列内外，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有一群来自某山村的老人，长相和打扮令人生畏：他们长着狼一样的眼睛，迈着狼一般的步伐，羊毛短袜上都绣着粉嫩的玫瑰花蕾。还有几个打扮高贵华丽的妇女，她们没有用面纱覆盖自己精致冷峻的脸庞，一看就知道她们信仰基督教，虽然穿着土耳其样式的裤子，步履间却透着对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一无所知，她们只记得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街角处蹲着一群阿罗蒙人（又称瓦拉几亚人），脚板踏地，脚跟贴臀，下巴搁在膝盖上，个个稳如磐石，一边闲聊一边拨弄玛瑙念珠。而最让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一队身穿黑色制服、拿着来复枪、挎着子弹带的男子，他们在一位高贵不凡的老人带领下正等待着加入游行队伍，老人举着一面旧时土耳其非正规兵团常用的旗帜，那是一面黑色骷髅旗，上面印有一个白色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起初，这些人相对于复活节游行队伍而言让人觉得十分怪异，直到人们想起这是民族主义教会带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这些人没有将基督教和反战主义联系起来的结果。我对这支队伍中的很多年轻人心生疑惑，他们不太可能与土耳其人对抗。我猜测，他们是帮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搞镇压的马其顿塞尔维亚人。可是没人确切地知道，甚至刚和我们碰头的康斯坦丁的朋友对此也一无所知，他是斯科普里大学的民族学教授。“我也弄不明白，”他说，“这些非正规兵团不是早被遣散了吗？”

我没再追问，因为游行队伍此时已行进至桥中心，十字杖持棒者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十分高大，而大主教戴着高高的主教法冠更显伟岸。当他们转上堤岸朝我们走来时，先前蹲着的阿罗蒙人站起身来，每个人都像猫一样闲适地舒展着身体。格尔达凑到我的耳朵边说：“这些人说的话一个字也别信。现在当然还有非正规兵团，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现在被称作切特尼克。他们随心所欲地对人进行屠杀殴打。所有这些南斯拉夫人都在欺骗你。我对那位教授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非正规兵团了呢？’，他回答道，‘他们是外国人，最好让他们这样以为’。”

我无话可说。我当然知道游击队，此时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份关于这些阿帕奇法西斯分子在伏伊伏丁那地区胡作非为的小册子。我绝没想过，当非正规兵团的合理需要不复存在以后，像这样的机构制度就不会以不友好或者更堕落的形式存在。我知道在南北战争时期英勇卓绝的美国游击队战后就很难被遣散，他们中的狂热分子成为浪迹天涯的冒险家，成为杰西·詹姆斯(注)手下日渐声名狼藉的追随者，成为圣路易斯市的黑帮以及禁酒时期的走私者跟劫机犯。我没想过巴尔干半岛的游击队又会如何，对我而言，

作为一个同情法国的地道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权蔑视南斯拉夫游击队，当英国有法西斯分子，法国有“国王商人”（Camelots du Roi），而一个祖国被纳粹统治的德国人更无权过分挑剔。出于礼貌，我闪烁其词，并没有如实作答，可当我望向格尔达的眼睛，我发现她的眼睛里空无一切，她完全无视游行的队列、喧嚣的人群以及斯科普里这座城市，视线里取而代之的是乌云与黑暗，试图投下耻辱与暴力，无论我说什么都能让她满足。

游行队伍来到我们身旁，大主教停下来，与那位兵团老人握手，骷髅海盗旗取代了宗教旗帜的位置。看到他们一同前往大教堂，我们开始沿着河堤闲逛，那位教授向我们聊起周围那些度假者。他指给我们看一些来自希腊边境村落的农民，他们虽然不会读写，可当听到傻瓜同伴那些不嫌麻烦地学到的外贸市场商品价格信息后，他们会精明地计算来年应该种哪些庄稼。他还把一个极为出色的人指给我们看，那人长得很像俄罗斯芭蕾舞剧中的哥萨克人，穿着一件棕色羊毛织成的宽边外套，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教授告诉我说，这人是一个有钱的阿罗蒙人，一个真正的游牧民，带着畜群来回转战夏冬牧场，以此积累了大笔财富，按照游牧民族的经典时尚要求，他的财富体现在他的女人们佩戴的项链和手镯上。看到一个当地吉卜赛家庭，教授快速超过我们穿过马路冲上前去。只有这些人在养育了孩子之后身材仍然如瞪羚般苗条，他们的八个孩子活力满满；只有他们才能身着铬黄色、朱红色、翠绿色、宝蓝色以及橘红色服饰映衬出咖啡色的美，那挑剔的鼻孔、神秘的嘴唇以及奶油果脯般动人的眼睛精致而浪漫，光洁的服饰令阳光也黯然失色。我从没见过如此遵守仪式、放纵狂欢却又清白无瑕的群体。“他们是火药吉卜赛人，”教授说，“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为土耳其军队寻找硝石，他们以干净美丽闻名。”“可他们看上去像印度人！”我大声喊道，“他们也许来自莫卧儿王朝。”“他们之间有些关联，”教授答道，“当甘地的私人秘书来此访问时，他能听懂泰米尔的吉卜赛语。我们认为他们是印度某个被征服部落的后裔，这个部落因为中世纪某种没有历史记录的灾祸逃离了亚洲，这些火药吉普斯人肯定代表着当时的统治阶层。来吧，让我带你去吉卜赛人聚居区看看，你一定有兴趣。”“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人都生活在南斯拉夫。”康斯坦丁说，此时的他跟高个子教授快步同行，容光焕发。

沿着陡峭的山路一路向上，穿过第一次遇见萨拉热窝肚皮舞舞者阿斯特拉的餐馆，我们来到了穆斯林聚居区。聚居区外坐着三位歌手：一个身材高挑丰满的金发女郎跟两个皮肤黝黑的小姑娘，艳羡于三人的美貌的人们认为此等美貌定能让它的主人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而实际上，她们的美貌似乎更具一种将她们引入商业领域的价值。她们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光芒，头不时地从一边转向另外一边，双手插在棉质睡衣胸前，睡衣布料由于反复搓洗已经褪色，磨损严重。斯拉夫人的生活中，所有涉及卖淫的部

分总是包含着一种奇怪的驱邪赎罪式的洁净。我们经过早上参观的那座地基下沉的教堂和清真寺花园来到一片又小又破败的房屋前。我们突然停下脚步，因为一群人说笑着从一条小巷跑出来在我们面前停下，转过身来围成一个圆圈。他们臀部紧收，身体左右摇摆，高兴得大叫，而与此同时，一个醉醺醺的宪兵跌跌撞撞地从巷子里走出来，身体僵硬。他脸色发青，手摇晃着遮挡眼前的阳光，脚上的长筒靴不知所踪，脸上毫无生气，一个人在那儿嘟嘟囔囔。有人在人群后面不知喊了什么，大家哄堂大笑。他发现之前抬起的一只脚现在放不下去了，另一只脚摇晃着，看上去他快摔倒了。可就在这时，一位妇女从小屋里走了出来，苍老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她走到他身旁，伸出一只搭着玫瑰色围巾的手臂扶在他那细窄的腰间。人群逐渐散去，好像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令其趣味索然。这位妇女将他领到屋后的院子里，我们又朝前走了几步再回过头来观望时，透过墙壁豁开的大裂口看到她正用自己纤长的双手按压宪兵那僵硬的身体直到对方双膝点地为止，随后又按着他的太阳穴让他的头向前倾斜以便呕吐，所有行为都看起来无比虔诚。

“到了，”在那之后，教授说，“这里就是吉卜赛人聚居区。”我们站在一段斜坡上俯视一片风格迥异的平房，这片区域坐落在一块长约数里、与环绕斯科普里的绿地相连的沙地上。白色的墙壁上画着样式简单的树木做装饰，有的是深蓝色，有的则为芥末黄。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有一两条小巷将公路和聚居区连接起来，我们还看到一群人正舒服得体地坐在人行道上，个个衣着华丽，衣服由类似窗帘布的布料缝制而成，他们抬头若有所思地好奇打量着匆忙经过的路人，那些路人动作敏捷，步履稳健，不会被脚边的任何东西绊倒。他们的外表跟印度人极其相似，行为却透出怪异的闲适和不受约束之感，而这种约束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特质。眼前一幕仿佛错觉一般，好似画屏上的画变得立体生动。“看呀，他们是不是很有异域风情，让人赞叹不已呢？”教授带着骄傲的口吻说，“这里有两千户房屋，这也意味着有一万名吉卜赛人居住于此。”“是的，”格尔达说，她的嗓音嘶哑，言语间愤慨不已，“显而易见，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吉卜赛人，可问题是，为什么要允许他们？”“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教授重复着格尔达的话，“我没听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来此定居？”格尔达固执地问道。“可是女士，他们一直在这里啊，”教授回答说，“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居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六百年前，大部分吉卜赛人实际上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来到斯科普里居住的。”格尔达气得浑身发抖，说道：“他们应当被驱逐。”下面有六个孩子正由祖母照看着在屋外玩泥饼，那位祖母的侧面如同一位年长的印度王公妻子般精美。格尔达指着那几个孩子说：“看看他们！他们应当被驱逐！”

听到此番慷慨激昂的话语，这位戴着头纱、本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老妇人用她那鹰隼般的眼睛看向我们。“也许现在去逛逛吉卜赛大街是个不错的主

意。”教授匆忙地说。“可是，”他补充道，“我得离开各位了，因为我还得赶赴下一个约会。”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斯科普里斯拉夫人，主要是官员跟知识分子，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连接火车站与瓦尔达尔河之间的大街上踱来踱去，属于旧时代的斯拉夫工匠跟农夫则沿着堤岸来来往往。而穆斯林和吉卜赛人在城市尽头有属于自己的大街，大街位于坡顶，那里有一座法国人的战争公墓，墓园里插满了做工粗糙的木质小十字架，让这座墓园比其他墓地更显哀婉动人。墓地周围以鸢尾花做装饰，旁边有一条通往瓦尔达尔河的陡峭步道，两旁种满果树绿草，步道如银蛇般在金色的杨树和柳树间蜿蜒穿行。山巅白雪皑皑，山间峡谷视野开阔，清泉流淌，耕地牧场好似红绿宝石。因为穆斯林老人更喜欢坐在清真寺的花园里抚弄胡子，所以走在这条步道上的穆斯林男人大部分都很年轻，一些穿着黑衣的穆斯林妇女经常三三两两地坐在果树下的草地上，还有很多吉卜赛人，男女老少，在经过冷漠的穆斯林身边时，滑溜如鱼儿般地快速闪过。虽然这些吉卜赛女人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她们并没有佩戴面纱，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她们的族人为自己赢得了地位，因此故意将自己从普通大众的社会义务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群中晃过一抹亮色，她们根本不用担心招惹麻烦，因为吉卜赛人的美从未被打上深奥的印记。

下午时分，春日的阳光依然透过密布的乌云洒下金色光芒，我们漫步在这条步道上，一阵鼓声传来，那是为科洛舞伴奏的鼓声，科洛舞是一种塞尔维亚集体舞蹈。顺着河朝下游看，我们看到在山坡旁的土丘上，一群穿着便服的年轻人将士兵们围在圆圈中央跳着科洛舞，衣服的橄榄绿和黑色跟远处的杨柳和波光闪闪的水流相互映衬。另外某处也传来阵阵鼓声，我们发现声音来自步道尽头，地面在那里中断，在悬崖边形成一处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平地，一些吉卜赛人也在那里跳着科洛舞。因为吉卜赛人信仰伊斯兰教，复活节不是他们的节日，女孩们此时可以穿着平常的衣服。这是一种幸运，因为她们最好的衣服通常以手工织锦制成，呈现出可怕的淡黄色光泽，让女孩们精致可爱的肤色毁于一旦。窗帘布布料做成的衣服在长时间的与阳光雨露的接触下露出本色，呈现出一抹淡雅温柔的梅红色调，衬出她们的蜜色肌肤跟淡淡红唇。鼓声的音律复杂难懂，这些男孩女孩们就这样和着节奏、如随波荡漾的海草般摇摆着身体，只是没有那么自由随性，而是精妙地与宇宙之实在相呼应。他们相互牵着的手臂在空中挥舞，抬得比传统的科洛舞者略高。他们仿佛大大的蝴蝶，比鸟儿更轻灵。

格尔达问：“你喜欢这种舞蹈吗？”我轻声说：“当然，当然。”衣着娇艳如花的俊男美女们在旷野中舞蹈，背后就是白雪皑皑的层层山峰，春日繁茂的树林，波光粼粼的流水，试问这世上又有谁不喜欢这样的景象呢？格尔达说：“我就不喜欢。瞧瞧，我得点支烟了。我要抽一口给自己消消毒。看到这些人让我感觉自己不像身处欧洲。”我无言以对，或许我应该很自然地说，“希望上帝保佑，如你所愿”。她接着说道：“为什么你会喜欢他们

这些人呢？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们？你没看见他们又脏又蠢吗？”我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些吉卜赛人，惊讶于他们的身材如诗歌般精准，没有一丝赘肉。正看着，音乐韵律变化，可没人显得措手不及；片刻停顿后，这些新的曲调节拍便融进他们的身体里，人曲合二为一。我说：“他们具备某些我们缺乏的东西。”我原本还想说，“他们头脑完整，身体灵活”。可格尔达粗鲁地打断我说：“你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并不了解这帮人。你认为他们很神秘，懂得深奥的知识。我知道你的想法。”

她不知道。总的来说，我特别不喜欢吉卜赛人的样貌。我被告知这些生活在斯科普里的吉卜赛人长得最好看，为人诚实，合法经营，跟巴尔干其他地区的吉卜赛人截然不同，那些人会把基督徒的孩子偷走弄残，使之成为令人揪心的可怜的小乞丐。可我仍然无法对任何吉卜赛人心生热情，主要因为他们已成为这种可恶品行的代言人。他们没有自己的音乐，可他们能熟练地弹奏任何所在国的音乐，并成为公认的音乐团体。他们将音乐纯粹地转化为令耳朵欢愉之物，快乐地同夜晚的微醺相伴。他们没有进行任何人为设计。上次来斯科普里时，我曾经参加过吉卜赛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庆典，一场在城外巨大的足球场里举行的持续一整天的野餐活动。在最初的五分钟里，我想我从未见过比这更为精彩壮观的场面。随后我又花了半小时时间来思考我是否应该戴上太阳镜来忍受眼前看到的一切。他们爱穿的粗布衣上那令人作呕的污渍以正常视力来看仿佛给眼前的整个景象都抹上了一块油渍；而如果透过太阳镜的深色镜片来看，虽然那片污渍仿佛消失不见，但他们衣服样式的千篇一律、马虎的缝制手艺以及刺绣装饰的缺乏也因此暴露出来。回到家后，我终于明白斯堪的纳维亚人让巨魔女成为空心人的意图了。生命不能太轻飘，人应该具有丰富的阅历来增加生命的分量和内涵。可是，面对这些长相俊美、表现出色的吉卜赛人，我对美的反应跟所有正常人的反应一样，也必然是这样，因为我像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一样重视快乐。而比起快乐更在意其他东西的格尔达则坚称：“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你不了解这些人。你认为他们很了不起。但是来自北方的你应该可以看出他们就是一群又脏又不文明的野蛮人罢了，他们就不应该在欧洲出现。”

我转身离开那群科洛舞舞者，再无心欣赏，部分因为我想那群吉卜赛人或许已经注意到格尔达对他们不加掩饰的厌恶，所以我朝康斯坦丁和我丈夫走去，他们两人正穿过一片凸凹不平之地返回通往斯科普里的公路。可是格尔达快速追上我说：“我真的不了解你，你总说这个国家是多么美丽，可你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秩序，没有文明，只有一群乱七八糟的下贱的原始民族。为什么你要那样说呢？”我不耐烦地回答：“可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的民族南斯拉夫才如此有趣啊。这些民族都有各自的显著个性，他们如何能被有序地组织在一起是件很奇妙的事。”“怎样在如此众多的民族中实现有序的状态呢？”她问，“他们全都应当被驱逐。”我加快脚步，不一会儿我

们俩就赶上了康斯坦丁和我丈夫。格尔达立即生气地责骂起康斯坦丁来，既出于对吉卜赛人的排斥，也因为庇护这些人的国家那可耻的顺从。我们走上公路，前面刚好也有一位要去斯科普里的老人。他相当穷。确实，在我的一生中我就没见过比他更穷的人。他的外套跟裤子上打着很多补丁，让人很难看出布料原本是黑色还是棕色，补丁上面又打着补丁；破烂的凉鞋用破布条捆扎，即便如此，还是露出了他光光的脚丫。贫穷带给他巨大伤害。他拄着一根棍子，一路伤心地喃喃自语。格尔达走上前去挡在这位老人面前，老人不得不停了下来，然后她朝着我们喊："看呀！"她指着老人破烂的衣衫鞋袜大笑起来，接着说道："如果像莱因哈特这样的大作家要塑造一个穷人角色的话，他肯定想不出比这个老头更糟糕的形象！"我对丈夫说："我受不了了。"他回答说："不，你必须高兴起来，有一天她会对另外的某个人也这样做，而那个人会揍她，狠狠地揍她。"出于对格尔达的忠诚，康斯坦丁背弃了个人品质中的可爱甜美之处，跟她一起笑了起来。可格尔达拒绝了康斯坦丁的牺牲，朝他比画手势以示愤怒。"你的南斯拉夫应该对这些讨厌的人做点什么！"她说。随后两人一边朝前走一边为了吉卜赛人和那位可怜的老人大声争吵起来。我回过头去，看到那位老人正木然地盯着我们。

现在道路两旁是一排排营房，营房建在花园里，四周都是果树、紫丁香跟紫白鸢尾花丛。士兵们正坐在摆放于花丛中的桌子旁，有的打牌，有的和着古斯勒琴发出的音调轻声吟唱，因为此时已近傍晚，经过一天的节日庆典，每个人都已经很累了。其中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一个年轻士兵坐在两个农民中间，这两个农民是他的父母。他恭敬地看着他们，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父母，他们也尊敬地看着他，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战士。还有些士兵在露台上练习滑稽表演。我们继续向前走，裸露的山坡旁竟出现了一条路，仔细查看上面的草皮，发现那是一条早于拜占庭时期的引水渠遗迹，建于罗马帝国仍然处于罗马人统治下的时期。星星开始在山顶闪烁，幽暗已经笼罩整个山谷，我们开始往回走，号角声响起，那些坐在桌边的士兵们纷纷站起来伸伸懒腰，打着哈欠，收拾好牌，放好古斯勒琴，继续没有音乐的清唱。走近吉卜赛人聚居区时，我们听到很多声音从对面的田野传来，看见一堆篝火在聚居区外围燃烧，隔着火苗能看到舞者的黑色身影。在距离斯科普里更近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旁边有一条坡度陡峭的堤岸，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被格尔达当成种族示威对象的老人，清冷暮色中，他本就十分羞愧地坐在草地上在溪水中洗脚，我们的到来更是让他羞愧不已。

---

1. 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 1847—1882），美国强盗。

马特卡

我们开车来到一个距离斯科普里十英里路程的叫作马特卡的修道院，它也被称作慈母院，因为这里虽然是献给圣安德鲁的修道院，却也照看那些不能生育的妇女。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因为去年修道院的墙壁是蓝色加上闻名苏格兰的甜粉色，而今却变成了白色。“我想我们应该改变一下。”神父说。如果如此激进的改变被运用在，比方说，斯蒂普尔阿什顿的教区教堂里，很难想象英国《泰晤士报》上会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我们仔细地参观了这座修道院，它囊括了同类建筑的所有典型特征：围墙外有大门、果园跟牧场，围墙里是教堂、神父小屋以及一栋有地下马厩并以楼梯连接楼上客房的建筑。事实上这栋建筑有些像一个宗教中心，像一个不必担心穆斯林进攻的基督教军事堡垒，还像一个乡村俱乐部，农民们在那里进行一年一度的雇工豆宴狂欢，感念雇主德行。这家修道院保留了最后一项功能：许多斯科普里人来到马特卡后都会在果园里享用午餐。我们告诉那位英俊睿智的塞尔维亚年轻神父，在前往一英里外的另一个修道院参观前我们也想跟那些人一样在果园里用餐。

乡间小径沿着一段已被工程企业破坏的河堤通向山谷。在水边一块用木头搭成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二十几个头戴白帽的阿尔巴尼亚人正躺在那儿睡觉。我们经过了一片明显是为工匠准备的板房区，板房区的尽头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花园收拾得整整齐齐，长相俊美的一家人正在那儿享用午餐。“愿您好胃口！”康斯坦丁用塞尔维亚语说道。“愿您好胃口！”这家人齐声说，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道路愈加崎岖，岩壁凸悬，河水奔流，峡谷幽涧穿过一片密林一直延伸至光秃的峰顶。小修道院就坐落在悬崖下方一块开阔的平台上，点点紫花从崖顶垂下，饱经风霜的树干从崖旁斜伸出去，悬于深渊之上。这座修道院小而破败，只有壁画保存完好。一束阳光透过墙上的豁口射进来，照在正悲痛地将基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圣母玛利亚身上。有意识痛苦，失去意识亦痛苦，画家通过典型的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的基督人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在很多西方绘画作品中，基督看上去都好像全然处于弥留状态，而就他将复活的先见而言，面对死亡的他似乎太懦弱而小题大做了。马其顿所有的壁画都将死亡表现为对身体的作用，而身体注定会对基督的精神产生影响，死亡像洗衣女工拧干湿裙一般将他的呼吸从肺部挤压出来，像牙医拔除一颗扎根牙床很深的牙齿一样将他的气力从肌肉神经中抽离。一段有关年轻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自己与肉身之关系的《圣经》经文证实了普鲁斯特曾经提到的与肉体的分离，经文说我们的肉体在青年时期跟我们完全一致，志趣相投，可是在随后的人生中肉体成为只是偶然与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无情伴侣，在我们病重年老时对待我们很可能比最心狠手辣的强盗还要残忍。

“漂亮吗，这些壁画？”康斯坦丁问我的丈夫，并接着解释说，“所有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的壁画情感表达都异常深沉。它是欣喜若狂的，却又远比纯粹的狂喜深邃，比激昂的西方艺术深奥，这种激昂的特质在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注)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是什么呢？”格尔达问道，她整个早上一言不发，“你不会是想告诉我，画这种拙劣壁画的人，比我们神奇的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更伟大吧！”“不，不是这样，”可怜的康斯坦丁说，“我只是说感觉不同而已。”“那干吗要两相比较呢？”格尔达问，“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这里的一切都比德国佬的精美。”我和丈夫将他俩留在修道院里解决分歧，我们沿着一条通往峡谷谷顶的小路走了一会儿，由于最近下过雨，道路湿滑，不久我们便折返回来。“哦，上帝啊，我实在是受不了她了！”我丈夫说。“你说有一天有人会揍她一顿，”我说道，“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当我们回到修道院时，康斯坦丁跟格尔达正准备离开，他俩走在我们前面，很明显，康斯坦丁还在努力安抚妻子。“这实在让人讨厌，”我说，“他对她特别好，而她却特别难相处。”“他毫无道理地对她好，”我丈夫说，“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喜欢德国人，而德国人却讨厌他们呢？你知道的，这些犹太人在希特勒上台前愉快地生活在德国境内。我真心相信，即便你给康斯坦丁一个甩掉格尔达的机会，他也不会那么做，不仅因为他拥有忠诚的灵魂以及格尔达是自己孩子的母亲，还因为他真的喜欢有她相伴。”“我相信康斯坦丁只是被她的声望打动，”我说，“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将大部分西方文明带给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他们尊重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当对方对自己表达蔑视之情时，他们就会不安地猜测个中缘由。”“你说得太可怕了，”我丈夫说，“这意味着欧洲是没有希望的，除非出现很多最狭隘、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因为显然，斯拉夫人跟犹太人不会抵御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相信自己比真相所能证明的还要了不起，因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信奉最为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

走在前面的康斯坦丁和格尔达在河边一处乱糟糟的工地上停下脚步。待我们走上前去，康斯坦丁说：“我想看看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因为在马其顿，我们正在做着最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是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做的话，全世界都会为之鼓掌。”这种自负有着深厚的根基。战前的斯科普里遍地沼泽、疟疾肆虐，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城镇都不讲究卫生。现在，一年到头有许多在塞尔维亚或匈牙利长大的人在此居住，到了七八月份度假时节，来这里居住的人更多，这些人很注重保持健康和精力。这些都是通常由天才设计的令人满意的工程带来的结果。“所以，让我们下去看看吧。”康斯坦丁说，说完带着我们开始寻找下去的路。还没找到路，一个头发灰白、眼睛炯炯有神的男人就从那栋我们看到有一家人在外面的花园吃饭的房子里朝我们急匆

匆地走过来。是的，我们或许应该看看这个工程，我们确实必须去看看，因为那个男人正是工程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正在马其顿建设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水电站，这个水电站将成为所有土耳其人的洗手盆，一个很大的、巨大的、庞大的水电站——因为再想不出其他形容词来解释它的大，这个男人在阳光下不停地搓着手。“一个伟大的骄傲，”当他领着我们朝山坡下走去时，他朝身后的我们喊道，“一个南斯拉夫的伟大骄傲！”我们刚才还在谈论民族主义，此时男人的这番平民之言正好印证了刚刚的谈话。

我们沿着一截阶梯走下来。为了修建大坝，河水早被排干，我们站在干涸的河床上。大坝顶部悬空，看上去我们像站在一个洞穴里。头顶上方是发着微光的裸露岩石，这些岩石自史前以来还是第一次裸露在外，涡流如一双强健的巨臂将岩石表面刻蚀成螺纹状；正在岩石栈道上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灯光让他们白色帽子和衣服蒙上了一层浅浅的蛾翅光泽。铃声和铆钉焊接溅起的火花亮光从栈道传来。在康斯坦丁打断他并询问这里是否只雇用阿尔巴尼亚人时，那个灰发大眼的男人还在我们耳边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但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这是我们这些人思维上的瑕疵——的确很难受到阿尔巴尼亚人的青睐——我们对处处决定自己生活的机械设备知之甚少。出于异常严肃的酒醉般的狂热，灰发男人气愤地瞪着我们，这种狂热不被头痛威胁，不受疾病的净化和驱赶。“你为什么称他们为阿尔巴尼亚人？”他喊道，“现在都是南斯拉夫人！”暮色中，他双眼冒火。

我很难过。众所周知，那些因为《和平条约》而成为南斯拉夫人的阿尔巴尼亚人，极不情愿接受这种改变，南斯拉夫政府不得不对他们采取极端严苛的政策。之所以使用“不得不”这个词，是因为我并不相信在世界历史上有任何政府曾经采用过如马其顿和解这样不诉诸暴力的计划。可我怀疑，时间过去这么久，像这位经理这样的盲从分子是否还会继续严厉地对待阿尔巴尼亚人。尽管如此，他接着说：“我确实希望雇用这部分南斯拉夫人，因为这些家伙是如此出色优秀。那边那位工头，你无法相信他人有多好，有多忠心，对工作和手下有多仔细。我觉得他就跟我的兄弟一样。”来马其顿前我见过这种事情：对于其他所有斯拉夫人以及那些来自北方的铁石心肠的爱国主义者而言，阿尔巴尼亚人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旧日恩怨已被忘记。人比想象的还要聪明，完全不同于自我认定的形象。在我们离去前，灰发男子环顾着这个声响回荡的洞穴说道：“为了修建大坝，要让河床变干，而这其实十分困难，因为这里的岩石间会迸发出很多山泉。很多很漂亮的山泉。”他虔诚地重复道，比起水电专家，他更像一位对水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敬情感的塞尔维亚人。

爬上竖井顶端后，我们再次跟灰发男子道别，对灰发男子和康斯坦丁而言，离别催人泪下。“你为南斯拉夫做了很多事情！”康斯坦丁边喊边朝他挥动双手。“为南斯拉夫做的事情又怎么会嫌多呢！”对方回答。回去的路

上，康斯坦丁还在兴奋地蹦蹦跳跳，高喊着：“克服了如此艰难险阻，难道我们不够伟大吗？想象一下工程完工后的意义吧！通往斯科普里的峡谷两旁将灯火通明，遍布工厂，我们将越来越富有，跟曼彻斯特和美国一样。”“是吗？”格尔达说，“别人还以为都是你的功劳呢。”“难道我没有一点点功劳吗？”康斯坦丁吼道，“难道我没有参加过世界大战，没有身负重伤？难道我没有用鲜血去换取马其顿？当我的祖国不再如土耳其人统治下那般凌乱荒芜时，难道我不该欣喜若狂吗？”格尔达耸耸肩，带着冷酷的理智转身走开。康斯坦丁走上前挡在她的前面，他追问道：“你嘲笑你的丈夫，就因为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血的代价吗？”我丈夫以一副他也愿意付出血的代价的口吻说道：“我想我们该吃午餐了。”

回到马特卡修道院时，一张桌子已在围场的苹果树下摆好，苹果树正值花期的末尾，神父坐在那儿等着我们。一群微醺的年轻人围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动作里没有急切也没有贪婪，只有温柔与和缓。苹果花以同样的速度凋落到桌上。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搭着一条毯子躺在草地上睡觉。神父摆上一些美味的粗制面包跟一盘复活节彩蛋，还为我们斟满马其顿出产的红酒，这种酒很可口，就是几乎喝不出葡萄味儿，跟梨汁或柑橘汁类似。神父热情地让我们尝尝那些蛋，我想它们可能是午餐的全部内容，就吃了两个。可随后又有一些羊奶酪端上来，在这些奶酪新鲜味淡时，它们的外观跟味道一样平淡无奇。在我开口询问时，神父说：“哦，还有很多菜呢。我们这里有很多不错的食物，感谢上帝，尽管因为开建水坝，现在抓鱼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可魔鬼为我们设置的圈套实在是太棒了。正是这种鱼让我那可怜的老前辈陷入如此困境，你知道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把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弄明白。”之前从未听说过此事的康斯坦丁问道。“是这样的，我们这儿的鱼远近驰名，这所修道院也以这种鱼而闻名于世，”神父说，“所以当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的前任，耶夫蒂奇首相先生来斯科普里拜访大主教时，大主教很想给他最好的招待，所以给了当时这里的老神父一百二十个第纳尔，请神父尽可能多送点鱼来。可神父年纪太大没法亲自捕鱼，所以他就请来一位农民帮助。这位农民感到非常荣幸，说，‘这事关系到从贝尔格莱德来的首相跟大主教，我得尽我所能地干好’。于是，他拿了一捆炸药，尽管知道不合法，可想到首相和大主教希望一尝美味时，他也没觉得会有任何法律问题。结果他弄到了一车鱼，随后他将鱼给老神父送去，老神父说：‘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呀？’这位老神父非常诚实，他觉得大主教已经付了钱，就得把鱼送过去，可送鱼进城时，海关官员看见了这么一大车东西，问道：‘这些是什么东西？’他们回答：‘送给大主教的鱼！’后来，警察就去拜见大主教，说，‘即使是贵为大主教的您也不能炸鱼呀’。大主教说，‘可我没有啊’。当对方跟他说明事情原委后，他对老神父十分恼怒。警察不相信大主教的话，大主

教也不听老神父的解释，即使到了天堂，我也不认为这事儿能让每个人都弄明白。”

一碗味道浓郁的鸡汤端了上来，我们正开心地吃着，邻桌的年轻人此时却唱起了一首悲伤的民歌，唱得很慢很慢。他们好像正挽着暗恋的情感，倚靠着这份暗恋之情，伴着它的悲戚走向歌曲的尾声。中途有个年轻人意识到音乐已经完全掌控了他们，而他们却无法控制音乐，所以他唱了几个音符，表现出如一位军士长般的决断力。躺在草地上的那位年轻人被惊醒了，他掀掉了搭在脸上的毯子。一片花瓣掉在他的脸上，他立即表现出谨慎的防备状态，直到弄清楚那只是一片花瓣。他努力抬手将脸上的花瓣拂去后又眯着眼睛准备睡去，可一条在围场周围叫个不停的牧羊犬跑过来将鼻子凑近他闻来闻去，但又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跑开了。他感到突然发生了太多事情，于是起身扔掉毯子，现出一身条纹背心短裤的杂技演员行头。他生气地瞪着那条狗，看着他的朋友，然后摇了摇头，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他必须继续独自掌控这个正在失控的宇宙。他翻转身体，开始进行运动技艺表演，将身体重量放在腹部，慢慢从地上抬起胸部跟膝盖，身体向后弯曲，将双手双脚搭成拱桥形状。

下面一道菜是可口的冻羊肉，那只牧羊犬又跑过来啃骨头。“这只狗不错，非常不错，”神父说，“对付狼，他可棒了。去年冬天我的仆人跑到教堂里来告诉我说，她看见这家伙在墙外跟两条狼打斗，一条被它严重咬伤的狼号叫着跑进山里，另一条则被一路追赶掉头逃到山谷下面。我跟在这只狗后面，因为它是一只很好的狗，我发现它追着狼整整跑了三公里，直到将狼赶进一个村庄，那里的农民一枪打死了狼。在这只牧羊犬很小的时候，一位在这一带人称佩尔莎的嬷嬷把它给了我，它继承了她的某些个性。她是一位非正规兵团士兵，像个男人一样，她先后有三任丈夫，可她把他们全杀了，就因为他们的政治见解不正确。一个想追随土耳其人；一个虽然是塞尔维亚人却想跟着保加利亚人，因为村子里有很多保加利亚人，这样他觉得更安全；还有一个希望跟希腊人合作。在巴尔干战争中，她是一名护士，在护理伤员的同时也英勇作战，多次负伤。然后，当她年迈到无法再婚也无法再战斗时，她成了一名修女，隐居在山里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修道院里。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修女。”我记得帕萨尼亚斯和他那睿智的观点，即一所孤独寺庙里的拜神者们总是在强奸与追逐中失去他们的女教士，所以他们需要选择一位经历过足够多男人的老妇。“我曾经上山去看她，有一天她给了我一只她的狗刚刚生下的小狗。可如今她已不在人世，那座修道院也荒废了。去年夏天我还去看了看，门廊已经塌陷，围场里住着十二头狼。要是佩尔莎嬷嬷还活着，它们绝不可能在那里。”

接下来上的菜是一道奇怪却美味的鳟鱼鸡大杂烩。我们鼓鼓的肚子感谢上帝这是最后一道菜了。神父终于不再为我们夹菜后，他双手托腮，手肘撑

在桌子上，享受着午后的怡人氛围。身后那群微醺的青年男子正投入地唱着另一首曲子，唱得很慢，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调整曲调，只是保持着那种悲伤的氛围。那位杂技演员现在站直了身体，永远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想，”神父说道，看着山谷四周灰色的山峰，“在那块岩石上竖起一根巨大的旗杆，让一面这世上最大的南斯拉夫国旗在上面飘扬。”随后，他挑衅地瞥了我们一眼，补充道：“我猜你们这些英国朋友一定蔑视我这个愿望。我对一位去年夏天到此的法国医生也说过同样一番话，而他说，‘如果你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你会想在那里安放一尊巨大的圣母玛利亚塑像，可就因为你是东正教神父，你才想举起一面巨大的国旗’。我想他是在指责我。可我对他说，‘说这话的你一点也不了解，只有当国旗在此飘扬，这个国家才能信仰圣母玛利亚’。”杂技演员浑身颤抖，跌倒在草地上，瞬间就睡着了，而他的朋友们又开始唱起《约翰·布朗的躯体》（*John Brown's Body*）。“这是一首非正规兵团士兵唱的老歌。”神父解释道。

---

1.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1470—1528），德国画家，晚期哥特艺术的大师。

斯科普里的黑山

离开马特卡的途中，我们在一个废弃的清真寺稍做停留。在斯科普里向东的路上，它是一座地标性建筑，规模不大，但极其精致，紧邻一座体量差不多的陵墓。它残破的穹顶上草生木长，优雅地铺满了郁郁葱葱的野草和黄色野花。清真寺里，一大群乌鸦一动不动地站在窗玻璃早已不见的铁质窗格上，阴森森的，和室外的光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拍拍手，它们飞了出去。数量更多的乌鸦在飞入光亮之前，停在穹顶的拱梁上徘徊了一会儿，呱呱地表达着不满。我们听到音乐声，走出去一看，发现在清真寺和道路中间的草坪上，正举行着一场音乐会。那是一支正赶去一个村子参加复活节庆典的吉卜赛乐队，停在这里稍事休息。他们在马车上演奏着一些节庆曲目。我们走上前，马车上的一个男人向前倾身，把一枚硬币放在一位演奏号角的吉卜赛人额头上，人群顿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吉卜赛人小心翼翼地继续演奏，尽量不晃动身体，好让硬币停在自己额头上。看到这一幕，我兴奋不已，因为我曾读到过关于这种场景的介绍，这是拜占庭人在宴会席间最喜欢的一种消遣方式，即把硬币放置在妓女的头上或身上，让她们或唱或跳，看这些妓女能保持表演多久而不让硬币掉落，面前的这个吉卜赛人在演奏时一边傻笑一边夸张地眨眼睛，正是在模仿妓女的神态。事实上，摒除历史层面的意义，这是种恶劣的风俗，同时也解释了拜占庭人对女性的审美观：他们喜欢女性身形像猪一样肥硕。我更认可另一个在近东地区基督徒中盛行的与之相似的习俗，他们把硬币扔向特定的圣像，并深信，硬币在圣像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代表着深刻的含义。当然了，这与眼前的一幕没多大关系，不过，和帕斯卡赌注一个道理。

我们穿过宽广的山谷，沿途是新生的玉米地，田埂上开着罂粟，到达名叫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山脉，即斯科普里的黑山。山上有八个村落，当中似乎只有两个属于保加利亚，剩下的很显然都属于塞尔维亚，以人民冷酷强悍的个性和妇女精美的刺绣闻名：昨天早餐时我们看见过路的旅人就穿着那种刺绣，厚重且颜色深暗。这几个村庄都很大。很奇怪的是，巴尔干动荡的政治环境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积极影响，使这些村庄保持了庞大的规模和紧密的联系。农民们因为惧怕土耳其军队和其他因暴政滋生的武装力量，都把房屋修建在一起，早晨带着所有家畜去田里务农，晚上再返回。农业生活造成的最不利的一个后果，根据我们从英国和美国的现状中总结得出的结论，就是女性无人陪伴，继而孤独引发种种反常，但这种问题在巴尔干人中完全不存在。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村庄，一幢幢深灰色屋顶的白房子镶嵌在长满杨木的山谷中。在一片空地上，我们发现农民们聚集于此，观看年轻男女们跳着科

洛舞。参与其中的人们显然乐在其中，观者则不然。这群年轻人身上的服饰有着世上最精美的图纹，堪称抽象艺术的杰作，但完全让人感觉不到美感。他们虽在舞动，气氛却不喜悦。眼前的这一幕中存在着无法忽视的沉重元素，说起来很简单，原因就在于女人们。男人们英俊帅气，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因观看身旁的女人而获得一丝丝享受。我从没见过长相如此平凡的一群女人，部分原因可能是她们的头饰和身上的服饰重到足以压死一头牛。德巴尔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那种优良传统去哪儿了？那里的人会把女性的头饰简化成刺绣围巾或方巾，而不是像这样，让它变成一堆毫无形体可言的、五花八门地堆砌在一起的女性服饰用品展销，点缀着硬币、绳索、假发和鲜花。在来到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之前，我从没见过如此累赘的女性装扮。她们的身体被长袍包裹着，这种长袍由粗糙的马其顿亚麻布制成，据说质地非常粗硬，连虫子也蛀不穿；长裙上面是粗毛呢的无袖外套，围裙和腰带的样式非常古怪。个别人还要再罩上一层羊皮夹克。从这些女人脸上紧绷的表情不难看出，她们此时遭受的煎熬和负荷不亚于我们被迫裹着自己的床罩生活一整天。

但这种头饰和服饰的产生并非偶然：通常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身体有一种神经过敏的观念，想侮辱她们并将她们逐出视线，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不可能快乐。他们跳科洛舞的形式进一步证实了女性在这种社会迫害中的受害者的地位。看到眼前的科洛舞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充满生气。科洛舞的确如此，但这只描述了一半而已，这一半由男性组成，他们跳跃，在空中旋转，完全沉浸在吉卜赛乐队演奏的欢快节奏中；另一半由女性组成，她们步伐拖沓，脚跟从未离开地面，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回应着音乐的节拍。没错，斯拉夫女性的舞步和男性的截然不同，因为在他们这种社会里面，理想女性的形象是僵硬的，像精心装扮的童贞圣像，因此，比起欢快的跳跃，她们更喜欢摆弄姿势。但她们僵硬愚笨的舞步简直和死人、机器没什么两样。在我们到访的第二个村庄，这种现象更屡见不鲜，人们在草坡上跳科洛舞，草坡旁是一条小溪，小溪旁种着垂柳。整个科洛舞舞者队伍看上去像一条背部受伤的蛇，前半部分生机勃勃地旋转、舞动着，后半部分却像瘫痪了一样，拖在地上。

这非常奇怪，能绣出那么精美的刺绣的女性绝不可能缺乏感受喜悦的能力，一定是她们不被允许尽情舞蹈。从她们一张张阴沉冷淡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们被允许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在斯科普里，我曾听说，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地区的丈夫对待妻子的方式非常恶劣，如此一来，当她们变成寡妇，她们也绝不会想着再婚。无论多么贫困，都不应崇尚这种男权暴政。我还回忆起在斯科普里与一位年轻妇人的交谈。她当时在发廊里帮我洗头、编发，二十出头，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做家务，帮长子打点好一切，然后从早晨八点半到晚上七点半在理发店工作，中间短暂的休息时间用来做饭，服侍丈夫用餐。周末，她需要清洗全家人

的衣物，缝制新衣。当我告诉她，我觉得她的生活似乎很辛苦时，她发自肺腑地笑了起来，说这些压根算不上什么，如果她选择留在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她出生的村庄，情况会更糟糕。她愤愤地说，那里的男人把所有的活计都留给女人做，即使那远远超过她们身体能够负担的范围。

在第三个村庄，我们看到了除舞蹈之外的东西。我们此行车上挂着政府的旗帜，是康斯坦丁之前从省政府借来的。事实上，这些当地人不单单是塞尔维亚的狂热支持者，他们更希望能得到执政者的援助。所以当我们下车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我向来不喜欢这种场面，不喜欢被误认为是别人。话说回来，康斯坦丁到底也是一位政府官员，这对当地人来说就足够了。在年轻人表演完科洛舞之后，我们一行被带到三个英俊、年长的兄弟家中，他们是这个村庄的首领。那是栋典型的巴尔干式房屋，最底下一层是圈养家畜的厩棚，屋外的楼梯直达二楼的阳台，从阳台进去就是起居室。三位主人在阳台上架起一张长桌，摆上了两条长凳，上面铺着毯子。村子里其他几位重要人士也来了，主人们一一为我们介绍。所有人入席后，我们喝了些充斥着霉味的红酒，吃了些山羊乳酪，主人们亲手为我们剥了几颗煮鸡蛋。长兄的妻子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她四十岁左右，衣服上原本波斯风格的月桂树图案被改为了基督教风格的。最年幼的孩子倚在她的臂围中，看起来很健康，也很有教养。我猜测，其他的女人正躲在半掩的门后边听边小声嘀咕。

酒足饭饱后，彬彬有礼的男士们庄重而谨慎地告诉康斯坦丁需要带给政府的话。所言内容平实，合乎逻辑。是，没错，他们和另一个村庄的冲突很尖锐，非常尖锐；的确没错，这场冲突造成三死一伤。但派宪兵过来恢复秩序是不可行的，因为这种冲突事出有因，在根源没得到解决前，冲突不会停止。一切并不简单，因为另一个村庄是保加利亚人的，冲突关系到切实的利益问题，即水的所有权。他们现在也都意识到，这个纠纷由来已久，造成了太多隔阂与痛苦，如若没有第三方调停，双方的矛盾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不知道政府能不能立即派人前来处理。这个请求之前已经提过了，但他们很清楚，它唯一的结局就是被淹没在不计其数的处理村庄间纷争的请求中，没准拖上好几年都得不到受理，最少也需要好几个月，而事态却非常紧急，应该远远优先于修葺道路和供电的请求，因为只要水的所有权不确定，冲突一定会接二连三，人员伤亡也肯定无法避免。所以，不知康斯坦丁是否愿意将这个请求转述给相关负责人。

康斯坦丁答应说他会的。事实上，他第二天的确信守了承诺。接下来，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男人们换了话题。“那你们呢？”他们说，“要是你们能把你们贝尔格莱德的家管理好，我们就能把我们的家管理好。你们这么做了吗？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怀疑。”他们说他们知道那个出于经济需求而与意大利签订的协约，但不认为那有多大影响。“那些人在我们自己的

国家反对我们这些本国人，花了那么多钱——多到像马其顿河里的水——对抗自己的兄弟。他们把炸弹交给杀死我们国王的人。他们怎么突然间就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们会竭尽所能地偷走我们的一切。必须要做些什么，让我们的年轻人记住，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保卫自己的国土，向他们反击。”但听到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协约后，他们变得躁动不安。“去和保加利亚人和解，”他们说，“那不可能。他们不是我们的兄弟。”这时，怀中搂着孩子的女人开口，在座所有男士都安静下来：“我曾亲眼看见保加利亚人杀了我的兄弟和他的孩子”。她的陈述比起西方人讲述类似故事更具冲击力，因为塞尔维亚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异常亲密。“他们毫不手软地杀了他们，好像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土耳其人。”一字一句像重锤一样落下。她合上嘴唇，抿成一条线。男人们重新开始交谈，控诉着敌人的无情和这永不终结的矛盾。

听这些淳朴原始的人谈论如此野蛮的话题真的非常可怕。这种野蛮并不是因为他们原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被强权玷污了。马其顿人的暴力的最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是五百年来奥斯曼帝国的错误统治。但这种野蛮不会像现如今这样激化，具备造成两败俱伤的潜质——如果英格兰没有在奥斯曼帝国即将灭亡时提供支持；如果由沙皇俄国提供支持的马其顿塞尔维亚人的保加利亚化运动没有被武断地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推行；如果奥地利帝国没有雄心勃勃向东进军以应对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否定客观事实，致使塞尔维亚人无法成为最理想的各省管理者；如果意大利没有用金钱和卑劣的操纵手段左右马其顿革命组织。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怀揣着敌意的旅人们通常所想的，这些皮肤黝黑的男人们内心充满黑暗，而是他们在合法宣告，要为了我们现在坐着的一张张桌椅而反抗，为我们喝下的那些充满霉味的红酒、吃下的山羊乳酪和煮鸡蛋而反抗，为了女人和孩子们、为了活着、为了呼吸而反抗，反抗那些自视聪明、不怀好意的大城市，它们幻想着抢夺了这些就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开车离开的路上，我丈夫对康斯坦丁说：“那是些伟大的人，他们有姿态，有风格。他们不因为你是从大地方来的而胆怯，他们也不需要胆怯，因为他们知道对城镇和国家来说，什么是必需。他们思绪清晰，并将其转化成极具条理的语言。”“当然了，他们的确是些伟大的人，”康斯坦丁说，“他们就像科索沃战役前的塞尔维亚人，在山上生活了五百年，一直没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土耳其人虽然觊觎已久，却从未能染指他们的地界。对土耳其人而言，自然就是一切，而那里的景色真的非常优美。但他们一旦到了那里，用不了几天就都死了。这些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男人，他们不会被人征服。”

过了一会儿，我说：“当那个女人说话时，他们都安静下来，真是奇怪。他们表现得好像很尊重她，但外面的女人却像是被肆意践踏的奴

仆……”这其实很好理解，这种现象在个体和不同种族中都稀松平常。对女性的蔑视普遍存在，男性假装女性毫无价值，与此同时却不停利用她们的价值。但个别时候，这种价值如此显著，以至于男性在事后无法否认。三兄弟家里的那个女人通过自己的勇气和面对敌人时表现出的让人难以忘怀的精明证实了自己的品质。但总的来说，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依旧未变。村子里的所有女人都表现得好像勇气、机智与她们毫无关系，她们非常庆幸自己能被当作拉货的畜生一样使用。这着实令人不悦，即使是对已经证明自己是例外的女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所有英国男人都受制于某种禁忌，被所有十四岁以上的女性当作下等人对待，在她们面前，他们不能自由走动和说话，他们被强迫干所有粗重的活儿且不会得到感谢，就算是赢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英国男人，也很难享受这种生活。

还有一点必须意识到，这些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男人确实无法被征服。我们得承认，这也就意味着，对女性来说，一方面生活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生活也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两种性别之间只有一个明确的区别，那就是男人缺乏对客观现实的感知能力，对待知识的态度非常实用主义。一个事实在对男人真正发挥作用前，在他们心中无法成立。如果他认为这对达成自己的目标有帮助，他就会认可；反之，他就会否认。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灵魂秉持着一种怀疑态度，因为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性本善或本恶更值得争辩的了。活着比死亡好，这是我们的肉身最坚定的信仰，但我们的思维却从没能向自己证实这一点。然而，女人却不会为此困扰，因为有生就有死，就算我们生来即恶，那也是被安排好的宿命。因此，女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享受存在所带来的切实的物质感受。男人却无法如此，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内心充斥着恐惧，所有的事都要往最坏的情况设想。这种二分法在年长的夫妇当中很容易发现：年长的女人们，甚至连那些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日的，也绝不会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她们要把最后的时光用来享用那被施舍来的面包，她们接纳晴天、暖暖的炉火以及糖果带来的欢愉；年长的男性却总是闷闷不乐。

因此，男人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每一小时，每一天。他们穷其一生都必须抓住自己能抓住的所有来对抗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手。得知自己比其他东西更强，他们才能略微得到些慰藉。什么是其他东西？答案似乎很明显，当然是他们的敌手们。不过这种慰藉微乎其微，要不了多久，证明自己价值的斗争又会打响，他们永远无法满足：若被敌手打败了，则认为这仅仅在某些层面上证明了对方的强者地位；若打败了敌手，则又反而觉得对方轻贱卑劣，就算战胜了也让人不悦。然而，对所有女性来说，这再寻常不过了。显而易见的是，男性生理上的优势是他们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贬低世界上的另一半人口，说“我比她们强”。这句宣言听起来格外响亮，尤其是当那另一半人口中，有他最依

赖的，甚至赐予了他生命的女人。

如果一个社群真的身处险境——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社群能幸免于此——女性们不会愚蠢到不加反抗就接受上面那句男性的宣言。男性拥有生理方面的优势，不用担负传宗接代的义务，他们自然地成了社群的捍卫者，如果他们能从坚信女性的弱势地位这种信仰中得到力量，那就让他们拥有吧。问题是，通常他们面临的情形并没有严重到需要他们这么做。如果与平原上那些土耳其人手中的女人所经历的悲惨境遇相比，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女人们因为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身上的负担相对得以减轻。强烈又持续终生的痛苦似乎仍是个过于沉重的代价。也正是因为她们的男人在得到塞尔维亚援助前无法彻底摆脱土耳其人对他们土地的侵犯，这种不公正的交易似乎很容易持续到世界终结，而塞尔维亚人则不在他们的性别交易的范畴内。在马其顿生活的土耳其女性的状况则更糟，除了不断承受社群的迫害，她们不会从自己的这种从属地位中得到其他任何回馈。

即便男性是在通过对女性的压迫适度获取力量，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因为这自相矛盾，两性双方都为此感到困惑。如果男性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社群，创造了人人渴望的和平环境，女性们则更会倾尽全力。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企图证明自己和男性的平等地位，这种企图的乐趣持续不了一两分钟，除非她非常好胜，而是因为这么做能给予她们快感。当下，一对年轻男女，他们像一对小马驹一样，匆匆走过青春期，步入成年人的社会。女性回头张望，却发现男性早已不在自己身边，而是落在身后一段距离，感觉非常疲惫。他的祖先从压迫女性中得到的那部分力量又从他身上被剥夺了。女人很惊讶，因为传统教导她说，男人就应该强壮。这种不和谐没有良方，即使当下她可以委身于男性，被其奴役，以补偿对方力量的流失。这种冲突永远没有终结，最糟糕的是，永远不会有一个社群，里面男人只做男人，女人也只做女人，因为人性绝不会一次性地揭示自己的全貌。即便做最乐观的预期，设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某一天，世界终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人性终于得以揭示自己，它也一定是雄性的。因此，或许我们穷尽想象，等到时间终结之时，我们应该尊崇远古的习俗，欢庆男孩的降生，为女孩的降生流泪。女性的惨剧也有不同程度。当下，我们当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谴责那些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允许而自食其力的女性，人们认为这种环境剥夺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权利，这些女性被认定是工资的奴隶，对爱人缺乏热情，对家务马虎应付。但我从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的女人们脸上那种表情：沉静而绝望，因为清楚自己不能自由表达而强忍着加倍的愤恨。

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山脚下的修道院

据说，许多精神狂乱的人饮用了修道院果园里的泉水后恢复了健康，我毫不怀疑。因为这里的确安逸美好。我想，无论在马其顿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精神狂乱都是由于承受了过度的不悦。我们在杨树树荫下的小道遇见了身材臃肿的老修道院院长。“你们能回来见我们，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她说道，眼神充满诚意，“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件举世无双的神圣珍宝，它比所有圣像和圣泉都要珍贵。”她说的是她牵着的那个使她魂牵梦萦的孩子。她将我们领到会客厅，请一位修女端来白兰地、糖和水，向我们解释她是如何获得这件独特珍宝的。孩子的母亲是比托利的一位法语教师，在孩子患了猩红热和白喉后，将她送到这里疗养。这个故事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惑——眼前的这个女孩瘦弱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像是经历了印度饥荒。

“你必须吟诵经文，亲爱的，”修道院院长说，“请给这些来自外国的和这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先生吟诵。”在我们观看这人世间最可爱的表演之前，她实在不能允许我们离开。女孩单脚站着，再换到另一只脚，用手把弄身上那件小外套的下摆，但被制止了，她吟诵了一段塞尔维亚赞歌，又唱了一首关于花朵和自然的法语歌。她的声音是法国孩童典型的高音，与勒内·克莱尔在《自由属于我们》中给牵牛花唱歌时的声音一样。表演完毕，她把小尖鼻子埋进修道院院长的怀里。

一位年轻修女把白兰地、糖和水端来，她两手叉腰，下巴向前伸着，宠溺地看着孩子。我丈夫边喝酒，边打量墙上的照片，问道：“那位头饰华丽的大主教是谁？”一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她看了看照片，答道：“那位是大主教，当时就是他接纳我进教会的，他被保加利亚人给活活烧死了。”她的眼神黯淡了下来，谈论了许久这位已逝的大主教。这次她说了同样的内容，但眼神没有黯淡，而是立刻看向小女孩，说：“我们在这里已经二十六年了，从没有孩子来过，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真是个开心果。”耳边似乎传来公鸡啼叫的声音，但那是来自天堂。

巴尔多乌茨

一个潮湿的夜晚，我看见一位头戴土耳其毡帽的绅士从斯科普里新城区的一间米妮之家走出来，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当下落在他身上的雨比落在我们身上更多。他撑开雨伞，在一摊摊水洼间艰难地前行。“那是巴尔多乌茨的帕夏，”朋友告诉我，“现在已经不存在‘帕夏’这种称呼了，但如果还有，他一定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总这么叫他。但你一定得去趟巴尔多乌茨，非常近，那里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你应该去看看以前帕夏们的宫殿是什么模样。”所以，一天下午，我们向政府官员借了一辆车，驶向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山脚下的那座山谷，葱郁的森林中有一个村庄，许多人身着白色的衣服，戴着夸张的华丽头饰，跟随着庆典的音乐结伴前行，阳光透过树荫，在他们身上投下斑斑点点。我们最终到达一片草地，面前是一面雄伟的围墙，两边都有瞭望台，瞭望台贵族气十足的入口处挂着一扇残破的门。门锁住了，我们的司机敲了敲门，没有应答。他经过草坪，走进农场，对着阳台高声吆喝，但四下寂静无声。所有我们之前见过的人都已经远离了这个村庄。

司机变得怒不可遏。他是个英俊又充满激情的小伙子，可能从小到大都没被人拒绝过。他狠狠地拍打着门，直到里面的人前来打开它。门缓缓地被一个拿着钐刀的老人打开，他的手放在耳后。在他身后，一英亩高高的草丛摇头晃脑，草丛后面就是土耳其乡间住宅，透出一种冷静的审慎气质，却不乏可爱，好像它们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土耳其人和乔治亚时期的英国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建造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可以在其中尽情享受自然的住所。拿着钐刀的老人告诉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可以参观这里的任何地方，他只是在这里捆捆干草，除除杂草罢了，因为年轻人要去跳科洛舞。“是的，”他笑了两声说，“他们必须去，虽然他们很清楚天要下雨，但拦也拦不住。”

这一英亩草丛是围墙背后的三个小牧场之一。我们走向左边的门，每走一步都狠狠跺跺脚，害怕草丛中藏着蛇。从浓密的草丛望过去，我们看见繁复的彩色砖块堆砌成的房屋，非常符合土耳其人的审美。那些砖块足够用来搭建容纳六十匹马的马厩、容纳一整支军队的房屋。我们走到住宅处，突然间，一只黑色的鹳尖声叫着从我们头顶掠过。我们进不去，因为打开门一看，大厅里的楼梯被封锁了。一大群乌鸦从没有玻璃的窗子飞出去，天花板上掉下来好几块砖石，那上面藏匿着许多生物，我们不得不稍稍镇定一下神经。我们只能模糊地远远张望，房屋布置得恰到好处，轻巧却不单薄，稳固却不赘余，即使屋外再炙热，屋内也如蓄水池般，保留了所有的清凉之感。紧接着，我们朝右侧的围墙走去，穿过入口，看见一幢房

屋，比刚才那幢略小一些，过去这里曾是后宫。我们依旧惊扰了许多乌鸦，但这一幢房屋还算完好，可以安全进入。我们走上楼梯，进入别致的引厅，这是土耳其人在建筑方面的独到发明，上面的人可以一边享受楼上的清新空气，一边清楚地看见底层楼梯上进进出出的人。后宫背后隐藏着的精神在于，手中所有的牌都应该一口气摊在桌面上。房屋装饰成土耳其摄政时期的风格，非常诡异。很难想象，为什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土耳其还拥有这世上最凶猛的军队时，他们挂在屋子里的画却让人想起摄政时期，而不是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其实并不奇怪，很多18世纪的男人和土耳其人一样糟糕），它们仿佛是出自雷格斯·威斯勒先生之手的仿制品。墙上还有些描绘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画作，装裱风格非常浮夸。这些画作被滑稽的壁柱隔开，作画的人好像在说："人们竟然认为这样画画非常可笑，简直太可笑了。"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其他几间屋子，分别是浴室和厕所，当中某几间的风格非常独特，在当时那个年代，无论在英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找不出相似风格的装饰。

我们一路漫步，走进一个体面人的世界，周围都是精美的装饰。司机也跟随我们上楼，他之前没和我们同行，因为他跑去抓了一只鸽子，那个小生物现在正在他两手之间拍打翅膀。动物的世界和我们这些城里人的世界隔着层纱，但和司机之间则没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他都能像发现人类一样迅速发现周围的动物，比如白鼬、蜥蜴或是雏燕。对动物来说，他一定如天神一般，无比迅捷地伸手爱抚自己喜欢的，杀死自己讨厌的。他看了看四周，说："啊！肮脏的猪！！年长的女人告诉我，他当时在这里安置了二十五个女人。"他不想继续说下去了，但无奈于实在太愤怒，他的双手围成圈，鸽子在当中害怕地挥舞着翅膀，惊恐地叫起来。他是来自尼什的塞尔维亚人，六十多年前，他们才把土耳其人从尼什赶走。"还有很多我们信仰基督教的女人们被带到这里！他们不让我们的女人生孩子，逼着我们的女人堕胎！把我们的女人杀死、分尸！"乌鸦漫不经心地嘶叫两声，飞到室外。"走吧，走吧，都出去吧！"他高声喊着，哒哒地快步走下楼梯。

老人正扶着钐刀休息。我们前来参观这座宫殿，他感到非常骄傲，这曾经属于阿乌兹帕夏，他边说边观察我们的表情，等着我们脸上恍然大悟的表情。"阿乌兹帕夏。"他又重复了一遍。但在场的人里没人知道有关这位帕夏的任何事情，因为这里的档案资料比波斯尼亚的要少。无论是与政府长达一个世代的纷争，还是某个或善或恶的人物引得六七个乡下人或哭或笑的某个举动，这一切的一切都毫无头绪，除了仅存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宗教史料。老人告诉我们，阿乌兹帕夏是个非常富有、非常伟大的人，他如此伟大——老人轻松地挥挥手——甚至派自己的军队对抗沙皇格勒[注]的苏丹。但结果并不严重，当然了。直到苏丹败倒在来自全世界的军队脚下，他也没有败倒。阿乌兹帕夏是被驱赶出去的，这里还有另一位帕夏，好像

还有一个，他们都很伟大。他们之后，土地自由了，帕夏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刚才参观的那种宫殿也一并消失了。

他嘟囔着什么，我感觉他似乎很遗憾宫殿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我说道："你能不能问问他，如果帕夏还存在，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更好？"老迈加上整日的刈草使他的声音很拖沓，他把钐刀扔在我们脚边，手握在一起，摇了摇头，因为这个单纯至极的问题大笑起来。"当年，"他说，"我们压根不知道收获时节应该是喜悦的，一半的收获直接送给了帕夏，之后，收税的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他们说，'这也是为帕夏收的，是另一项税'。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最后还能剩下多少东西。"我想起在萨尔茨堡火车上的那些德国人，"如果我们能知道究竟需要付多少就好了……"。很显然，事实正是如此，帕夏们丝毫不讲正义，不仅抢夺他人的爱人带回后宫或是集中营，而且榨干了人们辛苦获得、理应拥有的东西，如果这世界或者天堂还有公正存在，这种事情就绝不该发生。

司机再次嚷起来："还有那些马厩！那些华丽的马厩！人们必须从五英里以外的采石场把一块块石头运过来，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丰收压根不是个喜悦的时刻。"老人重复道。"我真的没想到"，我丈夫说，"我能亲耳听到一个人讲述对帕夏的厌恶，根据他们的人民的真切记忆。我要给他五十第纳尔。"老人看见钱币，目瞪口呆，他弯下腰，亲了亲我丈夫的手背。"在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如果我丈夫给当地人钱，他们也会亲吻他的手背吗？"我问司机。"不会，"他回答，"但他们住在山上，这些人则是生活在平地上。他们面对土耳其人时没有丝毫抵御能力。"

---

1. 沙皇格勒（Tsarigrad），君士坦丁堡的别名，亦即现今的伊斯坦布尔。

奈热西

我们乘坐的马车由两匹分别叫作“巴尔干”和“暴徒”的马拉着。伴随着马车特有的颠簸，我们出了斯科普里，经过市集，番茄和辣椒粉深浅交错，透出不同的红。马车一路爬上位于斯科普里后方的山丘，因为泉水广布，这里被称为“水之地”。马车称不上是马车，路也很难算得上路，车夫是个自豪起来毫不理智的男人，每当我们被迫下车，以防止马车滚落沟壑时，他的自豪感便再一次受伤。当下，巴尔干人身上背负着许多情感，因为土耳其人被驱逐后，许多合法雇用的劳动力都流失了。沿着崖边路障漫步，偶尔摘摘野花，偶尔回头望望，透过苹果花和黄绿色杨树能看见隐藏其后的雪山，还能看见一些穆斯林女孩，她们看见康斯坦丁和我丈夫时，立刻用面纱罩起脸庞，神情带着一丝惊恐。康斯坦丁和我丈夫则正相反，一路上都在谈论伯纳德·贝伦森。我们和陌生人也有过几次愉快的交谈，只要有康斯坦丁在场。玉米地旁的山楂树下，一位穆斯林长者坐在石头上，呼吸非常急促，康斯坦丁停下来向他询问：“朋友，你不舒服吗？”“不，”老穆斯林回答，“不过我真是老了，没办法像过去一样走那么久的路。”康斯坦丁说：“这里非常适合休息。”“所以我才选择坐在这里，”穆斯林回答，“尽管已经喘不过气了，但我还是一直走，直到遇见这块石头。我已经老了，要不了多久，灵魂就会离开身体，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多地看看大自然。”

我们到达奈热西，它与我记忆中一样，还是那座朴实的乡村修道院，平凡得就像这世界上最不起眼的拜占庭教堂，矗立在小牧场中间，看上去像是间农舍，好像上帝不经意地吐了口气，吹出了那几个气泡一样的拱顶。孩子们在牧场一角的喷泉边汲水，身着最华丽的科洛舞服饰；李树安静地站在角落，树上繁花盛放；小狗追着跳蚤，完全沉浸于这幼年蠢事的它一处一处地仔细寻觅，想找到最合它心意的那只。眼前一片宁静祥和，身材矮小的神父从屋子里走出来，他是我在南斯拉夫见过的最有同情心的人。

他矮小的身体上没有一丝罪恶的痕迹。他的眼睛，从拧在一起的眉毛、皱纹间透出光芒，明亮都不足以形容，那是不染尘世的光亮。他是个被流放者，流放的原因微不足道。他是个俄罗斯僧侣，但并不在那些从布尔什维克手里逃出来的人之列，他过去所在的大修道院在拉多加湖中的一个小岛上。拉多加湖位于芬兰与俄国的交界处，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他离开了那个从童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可爱地方，因为他不同意使用现代日历。他搬到一个孤独的村庄，那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远比信奉基督教的人多，气候对于他这种北方血统的人来说也过于恶劣。在修道院里，关于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使用老式教堂日历的争论也曾不绝于耳，这种日历比通用的国际日历晚两星期，南斯拉夫一部分地区的东正教教堂仍使用这种日历，也有换用

国际通用的现代日历的。此类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骨子里仍带着路德教传统的芬兰政府失去了耐心，下令僧侣们统一采用新日历，否则就离开修道院。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位身材矮小的神父放弃了所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对于他这种程度的神秘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从理性角度看待。到特定的某一天，你抬头看着天堂，心中想着圣母的模样，她在领报的那一刻，会弯下腰来，接受你的思想，将它们带入天堂。如果你正好错过了她领报的那一天呢？他感觉这仿佛是持续终身的惩罚，如此令人痛苦，令人心碎，就好像每天都被强迫去火车站接人，而那个人半个月前就已经到了。我喜欢这种止于字面的神秘主义，它彰显出一种渴望，渴望拥抱受人爱戴的灵性对象，直到它转化成客观物质形式的馈赠带来的喜悦，这也证明了人的本性应是温暖而善良的，更倾向于宜人的事物。我把这个矮小的男人，视作一个信奉神人同形的异教老隐士，人们告诉他，停止设想上帝具有人类的躯体、四肢、眼和耳，必须将他当作一种精神来景仰，他当即泪流满面，喃喃重复道："他们夺走了我的上帝，不知道将其藏到了何方。"比起爱一个切实的人，爱一个抽象概念更容易，因为爱抽象的个体不需要日复一日地付出，不用为他暖鞋、做饭，因此这种信仰令作为一个人类的他值得赞赏，尽管不是作为一个神学家的他。

我们与他交谈，问候他近来可好，他回答说不错，但他依旧悲伤，与我上次见他时一样，因为鱼的匮乏。在拉多加湖时，他几乎每天都吃鱼，鲜美的鱼直接从湖里钓上来，这个村子里却没有。他过去习惯喝茶，这个村子里的人都习惯喝咖啡，茶很劣质。我们问他，他是不是从不孤独，他回答说："总体来说，是的，因为有上帝为伴。"随后，那只满身跳蚤的狗的主人也加入我们，她是位年长的女性，从贝尔格莱德搬来这里，因为她的整个家庭，五个子女全部选择到这里来过乡下生活。她已经非常年长，这么做多半是因为所有子女在战前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做这种决定等同于自我惩罚，放逐自己过不见终日的旅居生活，卫生医疗环境极差，很有可能客死他乡。我和丈夫非常好奇，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个特殊的理由，选择死在某个不是自己故乡的地方，但眼前的两人坐在阳光下，笑得如此快乐，答案似乎也变得没有原本那么重要。

走进教堂，我们看见满墙的壁画。壁画出土的进度非常缓慢，因为在18世纪末，上面还覆盖着另一层农民壁画，比起以前的，农民们更喜欢这些新的壁画，它们确实很吸引人。那些壁画画着一群矮胖的粉色小人敦实地耍着各种把戏，就像你在旋转木马和法国集市的广告板上看到的张贴画一样，又有些马克·夏加尔[注]的风采。要不是它们覆盖了一些精美的中世纪壁画，毁掉它们简直太可惜了。当丈夫看到底层的壁画时，我能看出，他有些失望，最后他说道："这根本不像我之前看过的拜占庭壁画，它们并

没有那种明显的风格化，甚至有些具体化，没错，非常具体化。”

这话当然没错，但我不知将拜占庭壁画归类为风格化正确与否，因为我第一次来南斯拉夫时，曾走访过诺维帕扎的桑巴扎克，那里恰好是南斯拉夫最有中世纪风格的地区，我曾看见农民们被自尊扭曲的身体，从一个姿势换到另一个姿势，缓慢地移动，看起来和拉文纳与罗马圣坛上的造像没什么两样。但塞尔维亚的拜占庭壁画毋庸置疑更接近自然主义风格，也更具象。在奈热西看着这些壁画让我回想起布尔盖的作品《枝繁叶茂之李尔王》（*la végétation touffue de King Lea*），它们充满了创意。故事借画家之手转换形式，以壁画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山谷里的小修道院墙上，壁画无比直白地刻画了基督死亡的躯体，亚利马太的约瑟正爬上梯子，把基督从十字架上抬下来，紧紧抓住梯级的双脚充满生命力，基督的双脚则毫无生气。另一幅描绘了一个老妇人在拉扎路斯复活的圣迹前抬起头，露出表情震惊的美丽的面庞：壁画向慷慨的心灵致敬，它宣称，奇迹并不单单需要神圣的举动，还需要愿意承认这类举动发挥了作用的人。还有一幅描绘了一个圣徒冲向圣餐的场面，速度快得难以想象。

还有一幅，非凡到超乎想象，因为它不单单看起来像是布莱克的画作，更描绘了布莱克作的一首诗，一个盛怒的女人正给还是婴儿的基督洗澡。同一个女人，同一个婴儿，布莱克写道：

如果降生的是个男孩

将他交给一位年长的妇人

在岩石上将他钉牢，

金杯里盛装他的哭闹。

她将铁荆棘围在他额头，

她钉穿他的手脚，

她剖开他的心房，

让它变得冰凉，变得滚烫。

她的手指细数每一根神经，

像守财奴计算着他的金子；

她活在他的苦恼之上，

她重返青春，而他变老。

这一切都在奈热西的壁画中。手指细数婴儿基督的每一根神经，像个守财奴，一枚一枚地细数金币，这体现在她臂膀紧绷、结实的肌肉上，极具控制力的手指上，可以透过浴盆中的水看到，它们就像水生动物的灵活触手。她正用金杯盛装他的哭闹，换句话说，她手中拥着的，她本有能力随意掌控，她低头望着的眼神却充满敬意。她将铁刺紧紧箍在他的头顶，刺穿他的手脚，在他身边切了他的心，因为她在心中给他命名，基督，对他来说，这些折磨即将降临。这首小诗与壁画不可能属于同一人的创作。而且这首诗创作于一百五十年前，作者是一位深居简出的伦敦人，壁画则创作于八百年前，作者是一位不知名的斯拉夫人。两件作品本该在一起，互相照亮彼此，却流散于两处，只能在偶然经过的一两个旅人的思绪中，在短暂的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在一起。这拂逆了宇宙广不可知的特性，小小僧侣妄想在祷告中与这个世界的一切未知保持联系。他那善良的双眼流露出虔诚，他祷告着，心甘情愿地接受前方愈发棘手的考验。

路上

我们曾与格尔达度过了几个糟糕的夜晚。她在白天也不好相处。好几段旅程都因此而黯淡，这看似毫无缘由，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跳出汽车去看一朵野花或科洛舞后——我们时常这么做——有几次返回车中，我无心地坐在了右边的座位，而她深信，那个位子是属于她的，因为她是政府官员的妻子。但吃完晚餐，她情绪非常差，观光的旅程也不得不终止，好让她巧妙地玩了一把小心性。在康斯坦丁来之前，她会极力地打消我们在日间旅途中对路过的乡间留下的所有好印象。她会对我们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村子有多可怕。当他们谈及塞尔维亚拓荒者时，好像他们有多重要似的。你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要进入公务系统，想晋升到一个好职位，就必须志愿在马其顿工作三年。实在太令人憎恶了。我认识一个女医生，她到这儿来，他们派她去最小的山村里，教授当地人健康和儿童保健知识，实在太可怕了，那些农民简直和动物一样，如此肮脏、愚蠢。让出身良好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去那种地方工作，你敢说是对的？”“但凡想得到未被完全开发的疆土，这类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我丈夫说，“在成功之前，损失和麻烦是必不可少的。在印度，我们当时所经历的事情完全一样。”“你们在印度经历过这种事情？”格尔达重复道。“没错，在印度，有许多英国人倾尽毕生精力在当地人中做着类似的事情，无论是传教人员还是政府人士。”接着，康斯坦丁返回桌上，她用塞尔维亚语对他说：“我们

这几位朋友告诉我们说，英国人在印度本土人中做了各种慈善的事情，他们简直太虚伪了。”

她让康斯坦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失了价值。每当他说起往事，或真实或有趣，他总习惯事先为这件事情定性，说它不怎么可靠，但很有趣。这个习惯无伤大雅，这是他叫醒听众的方式，是他说“快醒醒！快醒醒！”的方式。在座的人毫不介意。有一次晚餐席间，他放下酒杯，高声宣布：“我虽不这么想，但我知道，我很清楚，大部分男人都不是老死的，而是被自己妻子毒死的。”我丈夫知道，我知道，康斯坦丁也知道，这种话纯属玩笑，但也很明白，这种话是一个精彩故事的序章。但我丈夫还是问了句：“果真如此？”然后我说：“你真这么想？”康斯坦丁开始给我们讲述。他当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手下担任过一段时间政府官员，为了保住性命，决定逃走。首先，他不得不隐姓埋名，找了个吉卜赛姑娘，和她一起待了两个月时间，在集市之间穿梭，给人看手相，直到他到达罗马尼亚边境。所有他读过手相的女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询问，他手中有没有毒药能提供给她们，她们要用来杀死自己的丈夫。众所周知，自然总能提供给自己解药，如果男性认为自己比女性优越是自然法则的话，当这种优越感被当作玩笑一样任意处置时，女人给男人喂些毒草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个故事源于这几年在匈牙利被审讯的一些人，他们向农民的妻子们贩卖毒药。无论康斯坦丁通过这种关联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没能听到，因为格尔达尖声嚷嚷：“老天啊，我真是太荣幸了，竟然和你们这群聪明人为伍，聪明到相信大部分女人都想毒死自己丈夫。”“但这是真的。”可怜的康斯坦丁说。“是吗？”格尔达回话道，“我只是个单纯的女人，不会写书，但这种事在我看来实在是愚蠢至极。”紧接着是一阵塞尔维亚语的争吵，以康斯坦丁的沉默与通红的脸颊画上句号。

无论在何种场合，格尔达都以这种方式为谈话系上止血带，她会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用塞尔维亚语评价一两句，我通常都听得懂，它们大多是关于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风格。“他们肯定很有钱，看她手上那两枚戒指，肯定很值钱。他一定是个典型的英国商人。老天爷啊，这些英国人该有多富有啊！”“看她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她一定不是一个好作家。不过话说回来，英国也没什么文化可言。”我并没有把她这些评语翻译给我丈夫听，但有些时候，她似乎忍受不了他听不懂，开始对我非常粗鲁，或是用德语说些粗鄙的话；有些时候，她对我们的怒火会把她的脸烧成深红色。

我们去剧院见过康斯坦丁的老朋友约万诺夫娜，她在一出塞尔维亚传统戏剧中出演女主角。之后，格尔达因对我们、对英国的憎恶而陷入忧愁。我被这种憎恶狠狠地冲击着，像是得了风寒或流感，所以没吃晚餐，提前上床休息了。我丈夫走过来坐在床边，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忏悔。“亲爱

的，”他说，“当下，我就像个商人，自愿申请破产，却发现自己还是因债务坐牢。今晚，我对格尔达实在忍无可忍，我下定决心要摆脱她。老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享受一个假期。你姑姑和我舅舅都行将就木，我们一整年都过得那么糟糕，我们对自己许诺，我们要在一起度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到处看看新鲜事物，安静地生活。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憎恨我们的女人拴在自己脖子上？再说了，我们怎么能保证，她不会冒犯我们未来旅途中遇到的某些人？所以晚餐时，我突然下定了决心，我无法继续容忍了。毕竟，我们可以自己去奥赫里德，没有康斯坦丁，我们也能看我们想看的一切。没了他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陪伴，旅途或许会少了些趣味，但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在餐桌上说，‘明天我们人太多，车里坐不下’。我很不喜欢自己当时说话的语气，但我咬了咬牙，打算表现得和她一样恶劣，继续说道，‘三个人加上我们的行李正好装满一整辆车。康斯坦丁，因为参观约万·比高斯奇修道院时，你必须在场，所以你妻子得乘坐长途车去奥赫里德’。我本以为他们会稍稍沉默一会儿，然后康斯坦丁会开口说，‘很抱歉，这种安排我无法接受。我妻子和我明天早晨必须去贝尔格莱德’。但当时他们稍稍沉默后，就接受了这种安排。所以，我的举动和她一样过分，但从中我却什么都没得到。”对于在这种场合下的令人沮丧的道德状况，我并没他那么在意，我只是简单说了句：“我想，我们这辈子都不得不被和格尔达绑在一起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尴尬的早餐。乘坐八点的长途汽车离开时，格尔达善意地告诉我们，她并不介意。我们坐在街边的桌子旁，喝着咖啡和羊奶，直到办事处的车过来。一个住在镇上的法国记者稍稍停留了一会儿，询问我是否知道米勒创作的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的壁画，他从路过的男孩手中买了一束丁香花，放在我桌上。康斯坦丁当时离开去买邮票了，我丈夫去买牙膏，两个人都遇见了卖花的男孩，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站在一旁的土耳其老人看着我桌面上堆叠起来越来越多的丁香花，脸上的表情透露了他的想法：“这些人真的很喜欢丁香花，他们会买丁香花，既然他们已经买了这么多，看来如果有更多，他们还会买。”所以我们看见他走到边道，在一面矮墙下抬头张望，上面的丁香花从某户人家院子里伸出来。在这小小的屏障面前，他花了一番功夫。他羸弱的双腿费力地攀上墙，破旧的土耳其头巾和消瘦的前臂在丁香枝杈之间忙碌着。他抱着满怀的丁香花回来，以他的身体条件来看，着实成绩斐然，似乎让人很难不花钱购买。

一个女人停下来愉快地和康斯坦丁打招呼，她面容姣好，虽饱受岁月摧残，却没有苦涩的意味，张开嘴，露出满嘴金牙。我想起来，她正是去年我和康斯坦丁待在这里时的家庭女仆之一。她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并以一种近乎令人惊奇的高调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喜悦。我记得康斯坦丁曾告诉我有关她的事，还有另一个金发的斯洛文尼亚姑娘，是另一个女仆。他当时

说："今天，我的百叶窗怎么也拉不上去，所以我叫人来检查检查，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只是有些石灰落在它和墙之间，所有的东西完好无损。所以我对女仆说，'只要坚不可摧，就绝不会是什么坏东西'。然后她表情顽皮地看着我说，'如今这个罪恶的年代，没什么东西是坚不可摧的'。然后她们大笑了一阵子，看着我的睡衣，说它实在艳丽无比，问我是否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总穿这样的睡衣，还说要是我能找个伴侣她们会有多开心！我回答说，'当人有了伴侣以后，值得兴高采烈的可不是睡衣！'。她们听完后高兴地跑出去，又跑进来笑了一阵子，再次跑开。她们非常喜欢我，那段对话似乎向她们展示了些奇妙的东西，那是个高水位的精准话题，她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触及。除了这类事情，她们不会和别人谈别的，因为她们没有其他话题能与陌生人分享，陌生人对本地的事情一无所知。但通常，她们谈及这些话题的对象都是些开玩笑不加节制、举止粗鲁、难以捉摸、突然凶相毕露的人。但我从不说粗鲁的话语，我以非常文雅的态度对待她们，也非常友善。所以无论几个月、几年过去，她们彼此闲谈时仍会说：'记得那个贝尔格莱德来的绅士和英国女士吗？他们对我们说话的方式那么诙谐，那么正式。'这正是我对她们说过的。"事实证明，康斯坦丁是正确的。

名叫德拉古廷的司机年轻英俊，向自己的妻子道别，她身材消瘦，皮肤黝黑，看上去像颗俄国子弹。我们一路急驶过宽广的山谷，经过废弃的清真寺，穿过罂粟花、白杨以及即将过季的果树的花，到达了泰托沃。这座小镇被苹果树环绕。这里的苹果声名远扬，还有歌谣歌颂它们。有人说，当中某些上等的苹果呈透明状，削皮后，你可以看见当中的果核。我们走到街上，在一个灰尘满布的集市里找了一间咖啡馆，喝了杯黑咖啡，一个秃顶的男人用托盘端上一盘蛋糕，说："你们想在这里见到都布什·托特？还是波佐尼？还是努斯托特？"我们回答说都不是，他说："我会告诉你们这背后的缘由。过去，我在斯科普里拥有一间非常大的烘焙店，手下有很多人为我工作。我借了二十万第纳尔给我一个朋友，他消失了。我不得不变卖所有家当，从头开始，从这个我妻子讨厌的地方开始，她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来自多瑙河北部。过去五年里，我不得不像个罪犯一样做苦力，顶着光溜溜的额头应对生活，这不是因为我愚蠢，执意要借钱给他，而是在我事业起步之初，他也曾同样帮助过我。"他为我们准备了些蛋糕带上路，还有一块乳猪肉。"无论你们走到何处，"他说，"都找不到比这更好吃的蛋糕，这种乳猪也很少，总共只有八磅重，像黄油一样软嫩。"他只是客观地描述着食物，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美食方面是贪婪的。不过想想，他住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一片废墟，带着自己有教养的妻子，有这种爱好聊以自慰，倒也是件愉快的事。

在泰托沃的郊外，我们经过河边的一座清真寺，它透出奇怪而荒淫的气息，因为墙面上覆盖着穆斯林摄政时期的彩绘，风格与巴尔多乌茨那座帕

夏宫中的绘画相似。极尽冶艳的室内装潢画上布满钻石拼凑而成的菱形与星形。在雄伟的东方风格墙壁之中，它显得憔悴极了，到处是方形开口，带着木质格子，风格强烈，充满神秘感。突然下起雨来，清真寺在雨中，与周围其他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派一个男孩去取钥匙，他过了很久才回来。在河的对岸是一个土耳其浴池的废墟。我们周身都是些比例无可挑剔的土耳其式住宅，上层房屋彼此略微交错着；往前走一点可以看到土耳其商人的住宅，粉刷成浅紫蓝色，伫立在一个小小的庭院中，庭院如此之美，可以称作花园，但它又小巧可爱，可以称作庭院，让人进退两难。听不见狗叫，这一刻钟缄默着，时间慢慢腐烂。

钥匙拿来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绝妙的情景：清真寺内的每一寸墙壁都被画上了夸张的、艳俗的图案，带着一种自发的、自娱自乐的幽默氛围。有一串连续排列的风景画，画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宫殿和松德海峡中间整齐排列的船只；在另一个画面中，围墙中的花园里，喷泉好不热闹，树木像串通好了一般，彼此把枝杈交错在一起；天花板上画着呈圈状排列的花束和建筑物图案，风格源自波斯，但它距离其真正的根源，就和距离今日的伦敦一样远。这些图案下方的拱顶上画着玫瑰，它在土耳其文化中恰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我们像是走进了一间由无数托盘拼成的花房子——梅赛尔百货礼品部里能买到的图案最诙谐的托盘。福南梅森甜品店也会羡慕这些繁复的花色。在这幢建筑物里，一位上流社会之人注定要在这里敬仰他们好战的先知。我太无知。

出了泰托沃，我们沿路行驶，两旁宽广的沼泽地里点缀着黄色鸢尾花，群山之中，绿色的梯田一直向高处延伸，消失在山顶积雪覆盖的蓝色荒芜之地。我们当时乘坐着一辆长途汽车，路上车突然出了故障，带着些许自我谴责，我们站在一旁，看着人们修理它。格尔达身边站着一位土耳其女人，三十七八岁，穿着寡妇的丧服，身材虽臃肿，却有着土耳其中年女性特有的美。她看起来不像一个臃肿的胖女人，而像是一群美人聚集在一个中心点，厚重繁复的丧服大到可以为一整个城镇吊丧，为她增色不少，厚厚的粉底下面，她的笑容像土耳其软糖一样，带着浓浓的甜意。她告诉我们，她死去的丈夫曾在贝尔格莱德当演员，她此行是打算去拜访他住在德巴尔的父母。汽车重新启动，我们一路前行，到达戈斯蒂瓦尔，另一个受土耳其奢华风格影响的小镇。集市广场周围是一圈小商铺和千篇一律的咖啡店，还有一幢摄政时期风格的穆斯林宅邸，似乎是幢新修的避暑别墅，主人好像是个世界闻名的双性人。路过的男人们怀中抱着哀叫的小羊羔。我们离开镇子，爬上山坡，在山口，我们得以了解到这里的非正规兵团是如何将战斗持续下来，因为我们头一次看见了马其顿山毛榉和椴木，它们枝叶繁茂，浓密矮小。它们天然的绿色屏障之下可以藏一支部队，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绝不会有人察觉。我们停在高处，俯瞰戈斯蒂瓦尔，它现在看起来像个盛满褐黄色屋顶的池塘，顺着河流向下流淌，尖塔与白杨巧妙

点缀其中。通往泰托沃的宽阔山谷坐落在白雪点缀的山峰与终年白雪皑皑的山顶之间。德拉古廷从车里出来，高声喊起来，好像在向战友致敬，手臂高高地向天上伸着。一只雄鹰在我们头顶盘旋，爪子擒着一只小鸡。我们到达山口，那是一片湿地，气候仍似寒冬，草木都光秃秃的。牛群与马群正在觅食，看上去很“低劣”，这是个美国人造出来的词，专门用来形容巴尔干的动物。湿地中，鹳单腿站着，全都整齐地朝向一个方向。

在一间旅馆的屋顶上，一只鹳镇定自若地停在上面，好像完全不知道脚下踩着的是一间旅馆，而是将这里当作了自己本该栖息的地方。我们在旅馆吃了一顿美味的鱼。一辆长途汽车停下，格尔达走进来。看见自己的意见被采纳，我丈夫呆若木鸡，不停地给她夹鱼，递面包与酒，询问她旅途是否舒适。“很舒适，”她说，“一些人问我，为什么当我丈夫和他朋友们一起开车时，我选择乘坐长途汽车，我就得向他们解释，这些英国客人必须坐在最舒适的座位上。”我丈夫不再帮她递任何东西，回归原样，默默忍受着。

格尔达沉默地吃了会儿东西，然后郑重其事地转向康斯坦丁。“那个土耳其寡妇，”她说，“问我是否见过约万诺夫娜，我回答说我见过。她问我是否认为她很有魅力，我说是，她非常迷人。她有那么多追随者，必然很迷人。接下来，那个女人问我说，知不知道有一个名叫康斯坦丁的著名诗人，我说我知道，她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约万诺夫娜的情人，两人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过了一会儿，康斯坦丁神情哀伤地说：“唉，这女人简直太恶毒了，竟然对自己在汽车上萍水相逢的人说这种话！”

正在这时，售票员伸头进来说，他在路上忘了时间，必须赶紧出发。格尔达站起身来，跟了过去，康斯坦丁也跟上。“那个土耳其寡妇一定是认出康斯坦丁了！”我惊呼道，“她丈夫是个演员，而康斯坦丁是戏剧评论人，而且因为那些讽刺漫画，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那个土耳其寡妇当然认出他了，”我丈夫说，“可格尔达在长途汽车上究竟对那个寡妇说了些什么，能让她编出如此精彩的故事？”

道路经过一个岩石峡谷，一路向下，地面上满是岩石崩裂落下的碎石。路渐渐变宽，拓展成山谷，我记得，这里是我见过风景最宜人的地方之一，两边山坡陡峭，山坡间的距离仅够视线通过，不停地向下延伸，似乎地球自娱自乐，沉浸于把玩自己身上生长的万物之中。浓茂的山毛榉覆盖到山顶的雪地边，草地铺展到溪边。峭壁上的白杨与白蜡树好像一位打哈欠的女人那高高扬起的眉毛。山腹上坐落的村落也是我见过最美的，举世无双。它的名字叫作“悲怀的女人”，在这种乡下，悲剧时至今日仍常常发生，这个名字背后一定藏着一个骇人的悲惨故事。村子里一应白色建筑，确切地说是青白色，建得很高，像塔一样，但灰褐色的屋顶仍赋予了它们住宅的特征，矗立在白雪和山毛榉下方的平地上。房屋周围种着白杨和白

蜡树，草坪延伸至河边。还有一座尖塔。一条小径在草坪上延伸开来。村子像人一样，是个个体，让人失望于它竟不能张口说话，失望于自己不能和它互动，只能离开，把它留在原地。

又走了几英里，我们来到之前特地前往拜访过的修道院。路途并不辛苦。修道院位置很高，视野是全欧洲最好的，放眼望去，一路上，从雪地到新生的玉米田，一切尽收眼底，大地被雕刻成了一组快乐的音符。而且，这里的修道院院长是我见过人性最完整的人。当我们从长廊走进庭院时，他听见了我们发动机的声音，正要从楼上下来，发动机估计是在急转弯时使用过猛，伤到了。我们知道他即将过来，因为一个仆人站在庭院里望向楼梯顶端，比了一个只有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人物才会使用的手势，像在宣布国王入场，这位老人也的确从他模棱两可的外表中透露出一丝皇家气质，他的脸上重叠着威严和狡黠的光芒。他和康斯坦丁很熟，因为知道他是政府官员，所以老人以同志的礼仪热情欢迎了他。而他自己之所以会被委派到这个重要的修道院任职，是因为战前在马其顿，他曾是个支持塞尔维亚的狂热宣传者，之后即被委以任务劝说调停阿尔巴尼亚人与保加利亚人之间的矛盾并帮助当局处理其他势力。他隐约记得我之前曾来拜访过，而且因为我们的旅行有政府官员陪同，他觉得，我与我丈夫似乎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一个伴童察觉出了这一点，极尽所能地取悦我们。但再想到这世界如此广袤，许多大事将其连在一起，又分割开来，他的想法就变得像热切准备捕猎的老虎一样，因为他知道他在这样的事情上颇有才干。

我们被带到会客厅，里面整洁雅致，就像这座修道院一样。这真是一次朝圣之行，这座修道院广受周边城镇人的爱戴，又在土耳其技艺精湛的手工艺人的打磨之下愈发繁荣，尤其在18世纪，大量的教堂和修道院被修建和修葺。仆人端来咖啡和酒，修道院院长虽然满怀盛情，但不带一丝慷慨地给我们倒了合适的分量，让我对他的尊敬又长了几分。我看见他的视线在我们身上打量了一会儿，然后准确无误地断定我们夫妇俩只是两个很享受在下午时间喝上一杯的西方人而已，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他后悔在这个仪式般的饮酒场合浪费了自己的好酒。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国际政治，他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的信心，认为战后，英国将是唯一一个保持繁荣的国家，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取悦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收集了一定的证据，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在他看来那些证据证明了英国的独特性。当说到墨索里尼负责掌管马其顿的财政和组织工作时，他把意大利归类为堕落的国度和放纵的恶狼。从他对“同志”一词的理解中，他得出了些对希特勒的看法。他看出，比起自己上前战斗，希特勒更喜欢派别人到前线去，纳粹只不过是一群反叛者，忘了任何反抗的目标都应该是建立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不是做统治者的料。”他说。突然，他的眼中闪过一道闪电般的光，他接着说：“我敢肯定，希特勒不相信上帝。”他

又补充道：“唉，像那种人，如果不相信上帝，那到底相信什么呢？不过可以肯定，无论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在那当下一秒，我想，他收起了罗盘，从一个对宗教充满热忱的人变为一个怀疑论者，之后又回归信仰，只不过这次回归更加谨慎。

我从眼前这个充满动物般活力的男人带来的欢乐气氛中察觉出这一切，还有他那闪烁着的魅力，即便清楚知道，这种魅力是他刻意经营的。他的不坦诚尽管如此明显，却没能让人厌恶。它被他心里最显著的位置中某种强烈却流于表面的力量控制着；他的言行被一种不屈不挠的本质的真诚——却不是艺术家身上常见的那种下意识的精神气质——所注视，而毫无疑问，它们是公正的。他的思维过程具有一种坚韧的特质，他人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但也会讶异于他对常识的缺乏，这便使得美减弱了些许。“法国，”他说，“是彻头彻尾的颓废的国家。绝对是，因为它是个无神论者，还是共和派。”“但你的确是误解了，”我高声说，“我很了解法国，那个国家充满生命，各式各样鲜活的生命。”“如果你感兴趣，”我丈夫说，“法国文学像现如今这样深受宗教精神的影响，时间并不长，而且法国不是共和派，而是民主派。”“可民主是个邪恶的东西，”修道院院长以先知预言般的崇高口吻说道，“民主向来是共产主义的源头。”为了尽快略过这个观点不一致的话题，他开始谈论格拉德斯通，以及他为南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人的纷争所做的一切。谈及这个话题，我向来都不自在，因为我不确定，若是事先已经了解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信徒们，格拉德斯通能否依旧维持他的热情。他们希望相比于他们犯下的罪恶，他们遭受的罪恶要更少一些，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反应，但这恐怕有悖于他的伦理思想中的苦行原则。我一时忘了自己尴尬的情绪，开始好奇，修道院长是否知道，格拉德斯通曾是民主党领导人。答案显而易见，他不知道。穷其一生，他都在持续不断的权力争斗中挣扎，无暇追求那些不能立即拿来使用的知识，更何况，在他所处的那种伴随着极寒与折磨的环境中，追求知识更是难上加难。但他出自直觉的诗歌天分非常了得，它时刻提醒着他，要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与现世的互动有多么地迷惑人。这种天分估计也是他不安定又含糊暧昧的缘由，使他的个性周而复始地拆解、熔化。

修道院院长带我们参观了教堂。教堂非常富有，有精心雕刻的圣幛和一些古代珍宝。关上门的同时他对康斯坦丁说：“当然了，英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直觉，但他们支持宗教，因为宗教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他沉重地摇了摇胡子，深信沟通才是使世界顺利运转的一剂良药。我们穿过庭院时，他驻足在那里，生气地唤来仆人，指着鹅卵石路上一摊油渍中的碎罐子。我的视线被他手上的污渍吸引，实在无法继续默默好奇地猜测，我问康斯坦丁：“为什么修道院院长本人那么邋遢，但修道院却如此整洁，而且很显然，他也热衷于井然有序？”他回答道：“他是为了大众能接受才这么做的，因为老一辈农民认为教父应该邋遢一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是

个圣洁之人。”他继续说：“对他来说都一样，如果他们想，他也可以收拾干净。”“她想知道什么？”修道院院长问。“她想知道，在您成为修道士之前，是什么人。”康斯坦丁瞎编了个问题，修道院院长目光闪烁地回忆着。“我就是一切。”他说。

他将我们带到一个走廊，那里有着一处很有名的景观。森林被覆盖在白雪之下，显出青铜色与红色，再往下是绿色，像新刷的油漆一般鲜亮。接下来是呈阶梯状的山腹，白色的村庄零星点缀在果树和杨树中。“我真希望能在那层积雪表面走上一遭。”我的丈夫高声说。“这个英国男人说，他希望能到那层雪上去，”康斯坦丁解释道，“我想，他应该是在瑞士干过类似的事情。”“告诉他，我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修道院院长说，“这附近没有一座山峰我没爬过。”他看着它们，以登山者的架势享受地吸了一口气，胸前的十字架在教士服上跟着动了一下，上面的珠宝射出耀眼的光芒。“真是个精美的十字架。”康斯坦丁说。接着是一段对话，开始时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说某种十字架只能由被长老赐予了特殊荣誉的修道士佩戴，修道院院长去年通过鼓励临近农民翻修一座废弃的修道院而赢得了那份荣誉。但这个十字架并不是全新的物件，而是他在多年前购得的，期待着在教会一路晋升。他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带着一丝勉强，好像他清楚他的野心太大了，但这也就意味着，下一步他必须使一些去年在土耳其人掌控下转信伊斯兰教且被强迫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的塞尔维亚村庄回归教会。他指着对面山腹里的一个村庄说：“看见那座尖塔了吗？它毫无意义，五年前，我跟他们说明了原因，然后他们把清真寺变成了教堂。”他有着坦慕尼派的专业技巧。

离开前，康斯坦丁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虔诚的农村妇人会将自制的衣物送给修道院，这些衣物是她们辛苦缝制，打算卖给其他地区来的游人的，游人们认为这些本地设计非常新颖。我问他：“我能买一些吗？”“肯定可以，”康斯坦丁回答，“但我估计他会狠狠宰你一笔。”修道院院长得知我想购买，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橱柜，里面塞满了各式人们送来的物品，他东挑西拣，把各式物品铺在地上。这一举动出卖了他典型的二元特征。这些东西都有着绝佳的品位，散发着在审美方面的深刻智慧。挑了一会儿，我感到很满意。他将我们带到他最好的一间商店，但当他将衣物递给我们时，他又透露出些许轻蔑的神情。很显然，他的智慧令他对美不屑一顾，可能是因为美捉摸不定的特性在充满雄心壮志的实战方面毫无用途吧。当我们挑中一双织有美丽花朵图案的羊毛长袜时，他魅力十足地看着我们，又带着一丝嘲讽；我们还看中了一件深红色与紫色交织的围裙以及一件德巴尔头饰，白色亚麻布饰面上绣着各色十字架，十字架周围以圆圈做装饰。

我们把东西翻了个底朝天，正准备继续挑选时，德拉古廷从门外伸头进来

说：“我来看看你们都在干什么，是时候出发去奥赫里德了，这样我们才能在天黑前到达。”从修道院院长向他打招呼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很熟悉，但关系一般。因为德拉古廷是一个坚定的南斯拉夫支持者，并参与过这个地区抵御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游击战，估计他过去常来这里。从他们之间的不合可以看出一种领袖原则的堕落，领袖们总是喜欢坐视追随者们忙前忙后，接受他们的赞誉，直到他们当中意志更薄弱的那些变成彻头彻尾的谄媚者；他派他们做些可耻的事，直到他们天性中邪恶的部分完全寄生在他们的身体里；他强硬地对待那些不顺从的高尚的人；又有些时候，他会对那些卑劣的顺从者发怒，因为他们的某种背叛违背了自己事业的希望。这当中很明显存在偏爱被取消，服务被撤回，又或者两者皆有。“你很会挑。”德拉古廷看着地上的衣物说道。因为他是个年轻强壮的塞尔维亚人，他毫不避讳地把德巴尔手巾包在头上，将围裙系在腰上，看上去像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我们女人打扮得不漂亮吗？”他自豪地问。

修道院院长聚精会神地观察他，让他满意的是，这个年轻的南斯拉夫小伙子正直且体面，让他不满的则是他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身上对权威的抵触，当中有一半他承认是公正的。他忍不住想和这位勇敢而诚实的年轻人重归于好，于是走到橱柜旁，摸索了一两分钟，拿出一条染成红色的亚麻腰带。“给你的，”他对德拉古廷说，但他那种平时呈透明状的表里不一的个性通过言语出卖了他的心，“我必须让这个年轻人重新喜欢我，与他为敌不安全。”“哈哈，我走运了！”德拉古廷叫起来，摘下头上的手巾和身上的围裙，像斗牛士一样将腰带围在自己纤细的腰上。但他并没有真正释怀，我对此有一种吹毛求疵的冲动。修道院院长把我们也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二元论者。我们一直不满他像父辈一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如果他的勇气与狡诈失败一回，我和德拉古廷会非常高兴，而且我们已经身处被他玩弄于股掌间的危险中。我们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什么都不在意，只在意那个想法，而他的心却不赞同他的野心。如果他的做法是扭曲的，本性也同样扭曲，遗传学家与化学家肯定能验证。拒绝这个人就是拒绝生命，但对这个人全盘皆收则是将生命推向永远悲惨昏暗的境地。

在我们离开之前，修道院院长再次感谢我带给他的礼物——一张劳合·乔治的签名照，从这位政治家身上，他感受到一种全情投入以及同情的善意。在我们离开的路上，德拉古廷一直在谈论他。“难道你们还没有受够他吗？”他问，“他可不是个好神父，在我们教区，好神父坏神父都有，我很清楚他属于哪一类。有一次，我到修道院去，对他说，‘神父，我饿了，你能不能给我些东西吃？’，他回答我，‘什么都没有’。我知道去哪儿找，自己找到了一只美味的小鸡，一口气吃光了。修道院院长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吃光，他非常生气地说，‘德拉古廷，你是个邪恶的人’。我回答他，‘不，我不是邪恶的人，我是个饥饿的人’。”在英国，神父与司机之间绝不可能有类似的交流，但在信仰东正教的南斯拉夫，修道院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教堂不单是基督徒祈祷的地方，也供人们在那里与朋友野餐，一个人饥肠辘辘、无处落脚时，教会也是收容所。任何人都可以到修道院去白吃白住三天时间。这么看来，教堂不仅理论上是个社会活动机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敢打赌，”德拉古廷说，此时道路两侧的高墙被绿色椴木的树荫覆盖，白色的村庄看起来像是展翅栖息在上面的鸟，“修道院院长绝对没有拿出他最好的酒，那些好货，他都留给自己的灵魂享用了。”“我们也不想喝他最好的酒。”康斯坦丁说。德拉古廷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不是重点，作为神父就应该如此，应该想着把最好的酒端给客人，无论你们想不想喝。”我们到达一个路途更颠簸的山谷，河流水势湍急，夹带着一丝硫黄的气味，气味逐渐汇集成水汽，到了前方某处，温泉从山崖落下，水汽浓厚得似乎令人窒息。“这都是些很好的浴池，”德拉古廷说，“你只要花上十个第纳尔就能在瀑布后面的旅馆里住上一天。”“十个第纳尔！怎么会这么便宜？”康斯坦丁问。“哦，很简单，”德拉古廷回答说，“这里的旅馆主人买一只羊需要二十个第纳尔，给客人吃了，再把皮拿去卖十个第纳尔。看！就是这样不断地循环赚钱！”

山谷逐渐开阔，好似《圣经》中描写的平原，远山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颜色，却又五光十色。我们逐渐靠近阿尔巴尼亚前线，眼前的土地浸满了血与泪，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因为政治原因经历过如此伤痛。在这里，土耳其人助长动乱，唯恐附属于自己的联盟起来反抗。战后，阿尔巴尼亚人与保加利亚人为了南斯拉夫的合并而争斗，后来也被武力镇压。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因为南斯拉夫人若想对抗意大利，就必须掌握这个地区。说这些争斗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的愚蠢。这片土地美得让人震惊，这是一种我们熟悉的讽刺。希腊的风景也不及马其顿这一角。如今，战争的风暴洗刷了宽广的阿尔巴尼亚群山，在绿色的平原上，暴力轻轻地、轻轻地从昏暗的天空落下，不似阳光，更像云，没有界限却切实存在，没有实体却真真切切，像我们眼中的上帝一般。这块马其顿的土地注定充满了各种神秘的事。这里展示了人类的失望的首要元素，即我们的生命与他们的框架间的无法调和。这片土地是一个精心搭建的舞台，命运屡屡不让我们登台表演，或是强迫我们上演一出出愚蠢的情景剧。我们的惊愕在这片被惨剧雕琢的群山森林间，在那个叫“悲怀的女人”的村庄中，在如上帝般行走于田野上的日光里愈发确定。在这里，恨意就像玉米地里高高挺立的杨树。

车向右转，康斯坦丁喊起来：“你要把我们带去哪儿？德拉古廷，这不是去奥赫里德的路。”“不是，”德拉古廷回答，“这是去德巴尔的路，他们必须看看德巴尔，人们常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烧毁了，德巴尔能把它重建’，德巴尔如今属于南斯拉夫了。”“你可能是对的，”康斯坦丁说，“而且

我之前在德巴尔喝过一次酒，记忆犹新，我们没准能找上一瓶。”“我想，当时的你一定又年轻又快乐，”德拉古廷说，“那儿的酒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试试。”德巴尔就躺在山腹里，面对着平原和阿尔巴尼亚的群山，由两个镇组成，白色的房子聚集在一起构成城镇上层，城镇下层的尖塔和白杨美得让人心脏不由自主地收缩，想到无法完美地搜集这些完美之物，着实让人苦恼。小镇的优雅令泰托沃与戈斯蒂瓦尔相形见绌，我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是所有艺术家祈求着想一睹真容的奇迹之地。不过，没准他们的祈求没有应验，他们反倒会觉得释怀。在中世纪早期，这里以手艺人闻名于世，有珠宝匠与银器匠、木雕艺人、织工与刺绣艺人。土耳其人的入侵使他们沦陷，却又使得这些传统得到了保留，它们停留在了原来的状态。因此，五个世纪以来，他们保护着这里，使它免受那种已经影响了西方同行的粗野作风侵袭，并将这种作风归咎于逐渐商业化的生活和令人困惑的各式思潮。我搞不清楚顶级的金属制品传统是否仍在德巴尔盛行，但我知道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仍有手艺人以拜占庭风格打造金器与银器。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各座圣坛上都能找到制作于德巴尔的十字架，上面用金线雕刻着微小却不显得琐碎的基督，形象栩栩如生，卷曲的丝线很可玩味。一部分制作这些十字架的工匠早在14世纪就死了，还有一部分仍然在世。

整座城镇都呼吸着荣耀的过往。三个女人中，至少有一个戴着德巴尔头饰，头饰白色饰面上点缀着深红或猩红的圆圈，上面刻着紫色的或是深浅不同的红色交织的十字架，没有一件不是抽象艺术的杰作。没有任何记载显示，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用自己的眼与手在第一次尝试时就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境地，这是从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失败中诞生的果实。这种才能不仅能在城镇中窥见，它还存在于大范围的都市风格中。它存在于阿尔巴尼亚边境，那里山顶融雪形成的冰冷河水穿城而过，一代又一代受暴政压迫的人变成了擅长潜伏攻击的狼群，但这里的人行为举止有着大城市的人应有却实际没有的风范，步履整齐而合宜，头抬得不高不低，不盯着陌生人看，看的时候也冷冷地低垂着视线。他们在配得上自己的住宅间穿梭，住宅精美的程度可以骄傲地与乔治王朝时期的府邸相媲美，但相连的屋顶和破碎的窗户偶尔发出鬼魂般的声音，野草在庭院里长得很高。这个可爱宜人的镇子被废墟的阴影笼罩着，让人无法忽视。历史无论如何改变，德巴尔都无法重返当年的繁华。它的美像是杯子里的糖水被打翻了，荡然无存，支离破碎。草原上的光线不再移动，某个粗心的穆斯林的墓碑斜插在地面上，好像保留着最后一句没说完的话。在这个国度，死亡肆意吞噬着一切值得存活的生命，对生命痴迷的修道院院长决心用狡诈保护它，这似乎也能被看作一种珍视。

---

1. 马克·夏加尔（Mac Chagall, 1887—1985），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设计师。

奥赫里德I

奥赫里德距离伦敦路途非常遥远。第一天下午两点钟在伦敦乘坐火车，次日一整天穿过意大利或者奥地利，第三天上午才会到达贝尔格莱德。即使是乘坐雅典特快列车，当天下午五点钟之前也不能到达斯科普里。到了斯科普里必须住上一晚，次日清晨再出发，下午晚些时候才能到达奥赫里德。事实上，一百万英国人中也没有一个去过奥赫里德。因此，我们到达奥赫里德湖边酒店时发生的事情就很不公正。我们发现格尔达正和一名女经理交谈。这名女经理会数种语言，却说得很奇怪，仿佛她长大在几种文明夹杂的某条小巷里，因为她只说出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毫无真正价值。当她听到我们是英国人的时候，她表现出一些兴趣。就在前些日子，这家酒店来了一位英国人。我们知道某某教授吗？是的，我们知道英国学术界的那种摆设。他喜欢奥赫里德鲑鱼，全世界都喜欢奥赫里德鲑鱼，我们会喜欢奥赫里德鲑鱼，但是首先我们会像某某教授也喜欢的那样，先来一份小龙虾调味饭吗？是的，我们觉得我们想要一份。那么，我们是否真的结婚了，还是我们想要两个房间，中间有联络门，就像某某教授和他的年轻秘书那样？“我的天哪，”我的丈夫深情地说道，“如果我有个儿子，一年里我会把这个故事讲好几遍给他听。”

我记得奥赫里德的这家酒店是如此奇怪，仿佛“酒店”这个词语是孩子们看手势猜字谜得来的，而今年它看起来更为奇怪。我们是唯一的客人，餐厅没有开放，电灯也没有接通，因此康斯坦丁、格尔达、我和我丈夫在一间由四张床组成的卧室里，吃了一顿按照任何标准都算是丰盛的晚餐，就像布鲁塞尔的鲽鱼片一样美味。房间由插在瓶子里肆意挥霍的蜡烛照亮，洗手盆中冷却着红酒。当次日上午德拉古廷来到酒店时，眼前的这番景象让他迷惑不解。他站在那里，手扶门框，一阵大笑。“土耳其人过得很好嘛！”他说道。

早晨我很晚才醒来，发现我丈夫站在我身旁，房间里满是新鲜面包的味道。奥赫里德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尽管这座城镇非常贫困，但是小孩子们一整天都托着用精白面粉做成的美味面包卷跑来跑去。我们走出酒店，坐在湖边散步区的一棵树下享受着那美味的面包卷和咖啡。但是天气阴冷。我丈夫谦恭地越过湖湾凝望着这座古老城镇，它像一只匍匐在山脚湖畔的乌龟。山上满是已被毁弃的堡垒，那些堡垒是由拜占庭人、斯拉夫人、诺曼人和土耳其人在罗马人的建筑遗址上修建的。我告诉过他这是欧洲最有趣的城镇之一，就像阿西西一样，是一座称不上是完全由手工建造的城市。城里褪色的房屋在低矮的天空下挤作一团，看起来像是因为地面下沉得如此之低而变得泥泞浑浊。这些小山在我的记忆中如同简朴的雕

塑，如今，当土地容纳粗野的能力被耗尽，它们已然成为爬满灌木的荒石。湖对岸的阿尔巴尼亚根本看不到，而湖水像市民公园里的池塘般死寂。

我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艾迪夫人很可能正确地归咎于'恶意动物磁性'的那种事情，但是当我们到了尼科莱主教布道的教堂时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会看到人类的智慧。主教激发他们，他们就会流露出个人的情感。我敢说，那些认识他们的人会嘲笑我，并告诉我这些居民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吝啬而愚蠢，但是事实上，当他们聚集在教堂里时，他们会展示出一种去接受生活的原样并以之为荣的力量，我从未见过可堪与此相比的力量。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动身去找他。"因为我知道，尼科莱是奇卡跟奥赫里德两个修道院的主教，而我们确实是基于尼科莱主教正在对他的第二个教区进行为期一周访问的消息安排行程的。

但是我们没有动身。由于和格尔达在一起，康斯坦丁已经失去了他的天性，甚至失去了他处理实际问题最简单、最本能的方式。她打断他丰富的故事，删减掉他的每一次表达，而他顺从了；现在他羞怯地为她奉上他希望她会觉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他扮演着一个德国人，想象着一个犹太人因为被收养而成为斯拉夫人以及诗人的模样。他在天性上是一个喊叫者和掠夺者，会将和平摧毁成千百个碎片，然后因他自己所叫嚣的而发笑，并归还他所掠夺的东西。然而，我首先了解的是，他能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有必要，他可以很早起床，他也很守时，也从不丢失任何东西。可现在的他像一个犹太喜剧演员，跑来跑去，喊叫着问题却不等回答，丢掉了很多东西，来得太迟，或太早。他还养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的习惯，以小丑的角色讲述自己无穷无尽的故事：一个蠢货因为迁怒于公司主管的不诚信而撕毁有价值的股票，因为一些不机智的言论而丧失一次宝贵的约会可能。这取悦了格尔达，也令他自己开心。

这是他们的欢乐，我们通常并不反对。这可能是莫里哀的某种发明。但这使得我们上午对尼科莱主教的找寻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漫游，使人联想起梦魇般的经历或者被害妄想症般的幻觉，有时甚至是一出神迹剧，剧中的我们扮演着并不令人欣赏的抽象角色。奥赫里德这座古老的城镇山上布满了教堂，犹如装满丁香花的香盒，且在新镇平坦的湖岸边还有几座教堂。整个上午主教都在从一座教堂赶往另一座教堂举行仪式，我们跟随着他，却从未准时到达。每一次我们被告知主教在访问哪座教堂，随后都因为康斯坦丁的插科打诨而耽搁，他要么坚持询问某位受到惊吓而一无所知的人来核对信息，要么突然心血来潮要买牙膏或者一本算命书。我们到达教堂时，只看到容光焕发的人群快速离去，并不像是他们急切地要去往某地，而像是某种兴奋感使血液涌过他们的血管。我们无事可做，只能返回中央广场的咖啡馆继续喝咖啡，直到这一幕场景重新上演。随着上午时光的流

逝，这在我们本已疲惫的心中越发成为一种极大的不快以及我们自身微不足道的证明。大约在午饭时间，当得知主教已经离开这座城镇赶往二十英里外的一处修道院并且直到第二天才会回来时，我和我丈夫才感到莫大的宽慰。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徘徊在这座老城的狭窄街巷中，观看着它17、18世纪的漂亮房屋。这些房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外形，而我们也在悄悄地欣赏着这里人们的特性。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人类生活的特征都会在舞台上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一个陌生人不得不首先看到的是漂亮的年轻女孩；在英格兰，英俊的中年男子是最可见的社会组成部分；而在奥赫里德，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那些身材纤细的老妇人，她们有匀称的头型，猫一般笔直却不僵硬的后背，灵活的四肢以及一种尖锐地拒绝承认生活中所有不高贵事物的气定神闲。几乎想象不出还有比她们更具贵族气质的人物，尽管除了最粗糙的劳动形式之外，并没有迹象显示她们戒除了任何事物。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年老的公爵夫人不会缝纫、煮饭或者清扫，而是因为奥赫里德有着一段很长的过去。奥赫里德在被划入拜占庭之前属于失落的伊利里亚帝国范围，它曾是一座希腊城邦，并且在它的初始时期形成了先于迈锡尼文明的部分聚居地。也就是说，数千年以来都有上流人士居住于此，他们更偏好和谐的生活，并且能够为这种偏好牺牲自己猛然的冲动。这种脆弱的文明线索在这里或那里融入历史之中，再没有比这些高贵的老妇人更优美的展现方式，这些老妇人身上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最小的一块骨骼带有野蛮特性。

然而奥赫里德最令人兴奋的方面则是它更接近现代的历史，那些在距离我们仅仅一千一百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随着斯拉夫部族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接受了洗礼，但是首先使他们整体皈依基督教的是西里尔和美多德这对希腊兄弟，此二人大约在公元870年把《福音书》部分翻译成斯拉夫方言，而他们的使命由他们的追随者克莱门特、格拉兹德和诺姆带到了奥赫里德。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件看起来如何？听起来如何？闻起来又如何？这可以在奥赫里德山顶上的圣克里门特教堂以及其他几座建于那个年代的教堂里找寻答案。依照塞尔维亚-拜占庭风格，这些教堂都低矮地贴近地面，外屋是储藏需要搁置在黑暗中的杂物而不应有人居住的地方。无疑，在很早的时期有些皈依者进到教堂的漆黑之处，希望找到很像自己作为异教徒时崇拜的却又更加血腥的新神明。巴尔干地区的某些教堂仍对这样的崇拜保有纪念，迄今为止走进那些教堂都会令人不适，因为显然那已经成为邪恶的符咒了。但是阴暗处也是神奇魔法的一种合理秘诀，而就这一点来说作为黑暗宗教的基督教比起我们西方观念中作为光明宗教的基督教来说具有优势。

我站在圣克里门特教堂里，想起一个西装斗篷制造商在长岛上向我展示他

的工厂时曾经对我说过：“是的，它是一座漂亮的工厂，它当然是一座漂亮的工厂，我引以为傲。但是我希望我没有修建它。当我有批急活儿时，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姑娘们在这些宽大通风的房间里还按照在城中心我们之前那个狭小黑暗的地方时的方式工作。以前在那里她们经常狂热地工作，手指经常会飞舞起来。在这里你没有办法让她们兴奋起来。”尽管圣克里门特教堂的穹顶为透明圆形罩顶，门廊却极为粗陋，由几级宽矮的台阶相连，门廊的顶部宽而平，全然不是基督教风格，倒很适合用在牛棚上，由几根粗厚荒蛮的石柱支撑着。门廊内部宽阔的前厅被用作杂物室，堆满了备用的椅子、节日用的华美蜡烛以及其他教堂的破碎模型。几乎每一座东正教教堂看起来都像是有人一直在清扫，只是他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远处是另一间光线更为阴暗的前厅，那是早期没有接受教堂洗礼的人或是忏悔者坐的地方；更远处，教堂光线最为阴暗的地方是一个漆黑的深洞，男人们可以紧挨着站在那里吟诵圣歌，在他们盯着圣幛上的那扇门时，可以消沉至迷离恍惚，也可以高亢至心醉神迷。那扇门偶尔也会打开，身穿长袍的神父站在他们面前，借着蜡烛的火光手持圣物。那火光之于黑暗就像值得崇拜的上帝的本性之于人性。

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过程，而且迄今为止这些人对其都有所偏爱。山下更远处是圣慧教堂，又称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尼曼雅人修复，据说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同一时期。它是一座辉煌的建筑，我会想到它的规模堪比斯蒂普尔阿什顿的教区教堂，简陋而坚固的砌砖堆积出华丽的墙壁，穹顶和拱门使其气势臻于雄伟。这座教堂装饰有几幅华丽的尼曼雅时期的壁画。其中一幅展现了一个愤怒的天使俯身于大地之上，对着受到玷污的非善之类怒气冲冲，另一幅描绘的是玛利亚之死，悲伤的人们站在一位女子平躺着的身体后泪如雨下，这位女子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只是惊异于这痛苦的经历，她知道这是必要的。这座建筑现在属于基督教是一种胜利，因为土耳其人曾将其用作清真寺达五百年之久。但是这座教堂光线充足。它是依照拜占庭风格而不是塞尔维亚-拜占庭样式修建的，没有圣幛，只有一个矮屏风将信众与神父分隔开来。棉布、纸张和木板被匆匆编制成屏风当作圣幛使用，不起丝毫作用。高耸的拱顶之下，一盏灯光犹如众位神父中突出的一位，投射出阴影来。这座教堂并不为人所爱。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修女狂热地保持着它的清洁，并会为了保卫它而献出她的生命。但是这座教堂却得不到任何一般的奉献。奥赫里德其他所有的教堂都有信徒，信徒们可以在教堂内愉快地礼拜，而且他们谈起这些教堂时会带有某种动物般的激情，可以将其想象为一只野兽对于它习惯的巢穴抱持的感受。然而尽管圣索菲亚大教堂起初是主教教堂，但是这份荣誉后来却被剥夺并给予了规模较小、光线昏暗的圣克里门特教堂。没有人捐钱或者出力来修缮它如同筛子一般的屋顶。

我们离开了这座受人排斥的漂亮教堂，沿着一条直通湖边崖顶的小路来到

一座矗立在岬角上的教堂，岬角被浅黄色的花朵覆盖。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圣约万教堂，我第一次在这里了解到东方基督教的特性，它是黑暗而非光明，蓬乱不整，仿佛迷失者仅存于西方。一年前我和康斯坦丁在这里，他听说这座教堂正在欢庆一年一度的节日，而且尼科莱主教正在举行宗教仪式。因此我们从酒店乘坐了一艘划艇，渡过乳白色的水面。朝阳在乌黑的阿尔巴尼亚山峦上方照射着绿油油的梯田，阳光触碰到一座座雪峰，直到它们闪烁出片片浅黄色，在最近的岸边为奥赫里德的房屋披上了霞色彩衣，直到整座城镇亮丽如浅色花束。当我们靠近岬角时，我们听到一阵声响，不像是人们在谈论着什么，只是在发出些声音，就像蜜蜂的嗡嗡声；我看到了这座教堂的周围的环境，通往教堂的每条小道上都满是人群。他们就在岬角边上，那里的岩石会垂直急速坠落，似乎他们中的某些人随时会掉入水中。还有许多乘船而来的人们围绕着岬角划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未远离。他们欣喜若狂地歌唱着。

我们将船停好，上岸。在弯曲的无花果树下，一段台阶穿过黄色的花丛绵延向上，我们拾级而上。在悬崖边，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德比日的人群中。他们交谈着、欢笑着、争论着，喂着婴孩，男孩们托着面包卷、蛋糕和油炸果饼穿梭其中，男人们则叫卖着甜饮。他们恣意地在草地上或坐或站或躺，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衣着整洁，但他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些人涌向教堂，在门廊里挣扎着挤挤撞撞，其他人则在一片动物的恶臭气味中推向或者被推向由低矮的门墙围起来的黑暗洞穴中，尽管外面阳光灿烂。他们一起晃动着，一起流着汗水，比肩继踵，共同呼吸。这些人由于崇拜圣幛后面无尽闪耀的光明而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在我首次战胜困难适应了这种从前不曾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幕场景。

这些信众感悟到了一个西方人不知晓的道理：适用于操作日常生活实务的思想状态并不适合用来找寻生命的终极意义。他们允许自己欣然沉醉，比起依靠理性，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知识；传播这种超自然知识的教堂自然也不会沦为假装这知识就是最终答案、一切事物都是已知的那种可憎的异端。这里的宗教仪式摆脱了出于对宗教兴旺的迷信考虑而竖立的肤浅道德说教，这种迷信考虑使得西方宗教常常变为一套装模作样的章程。假如巴尔干地区的东方教堂有意犯下这个错误的话，那么历史会阻止它。几个世纪以来它发现很难找到这种财富的足够庞大的体现，以至于可以带着权威的语气说："像我们一样，洁身自好，戒除罪恶，因为天国就是如此。"幸运的基督徒实在太少，除了一些法纳尔人，他们至少出卖的是他们较好的那部分灵魂；而那些不幸的基督徒太过贫穷，以至于无法保持清白，但是他们又必然是洁身自好的，因为他们的女人不得不被关在受父权控制的房屋内以抵御敌人的奸淫，但是他们无法完全戒绝谋杀，因为只有通过流血，他们才能够保卫自己免受异教徒侵扰。因此教堂不得不专注于弥撒，反复强调基督教的首要教义。它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善良值得崇

拜，而人身上邪恶的部分憎恶着善良；曾经有一位贫穷的母亲生下了一个贫穷的儿子，这位母亲因为非常善良而被邪恶的男人们杀害了，这位儿子的失败却是一种胜利，因为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远比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好很多，他的谋杀者们被征服的方式超乎胜利者的想象；这件事情并不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发生过一次，它在所有人的心中都每天重复着。

所以教堂里的人群等待着、欢庆着，当神父们低沉的歌声响起，圣幛背后的蜡烛唤起他们泯灭的善良，神父们通过展示善良从未死亡来安慰他们。弥撒这种杰作比任何其他艺术作品被彻底排练的次数都要多，它华丽的演绎达到了高潮，又在它的功效中结束。善良被完全地激发出来以至于再也不能对其有所约束，它必须迸发出来，弥漫在宇宙之中。在善良的陪伴下，神父和信众涌向教堂外的开阔地上。他们眨着已经适应了阴影和烛光的眼睛。在他们看来，阳光一定是空气放纵的大火，由从圣幛冲射出的光辉形成。尼科莱主教身材高大，覆着面纱的主教法冠使他显得更为高大。他盲目地站在阳光下，紧紧握着他的牧杖，犹如视线模糊的战士抓紧武器。人群涌上前来亲吻他的戒指。假如在光天化日之下保持清醒，他们可能会想起他是素洁的，而他们是肮脏的，他是有学问的，而他们是目不识丁的。但陶醉在黑暗之中，他们已全然忘记。他们喧嚷着表达他们对这位魔法师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在幕后为他们酝酿出神圣的奥秘并使这被保留下来的原则如光辉般真实可见。在湖中划船的人们听到悬崖上的人的喊声，就靠在他们的船桨上放声歌唱。平静灿烂的湖水颤动起来，一座座雪峰也闪烁出光芒。仿佛欢乐已经弥漫在整个地球上。

奥赫里德II

我们在圣约万教堂边坐了一会儿。已不再有黄色的花朵，取而代之的是许许多多的小紫罗兰。此时的湖泊变为荒凉的绿色，渐渐冰冷下来。我们爬上山坡来到一处堡垒，这堡垒仅仅是一堵如今已颓然破败的围绕着山峰的墙壁而已，四周是橄榄树果园以及土耳其风格的乡村屋舍。我们让康斯坦丁和格尔达走在前面，穿过果园，闯入其中最可爱的一间屋子。这间房屋灰泥暗淡，木料碎落，仿佛一个幽灵，与它周围簇拥的繁花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一场暴风雨在我们的上空像绽放的鲜花般开始酝酿，我们急匆匆地向着酒店的方向冲下山去。还未走远，康斯坦丁和格尔达就从一个花园里叫住了我们。他们和几个人坐在一株金合欢树下的桌子旁，说道："进来吧，今天住在这里的这个人过生日，他们想请我们喝杯酒。"

前来欢迎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男子，有一种很多伦敦人都有的气质，像是那种总爱在办公室开玩笑的小公司上班族。他的妻子也很可爱，就是太瘦太苍白。很多南斯拉夫妇女都患有贫血症。我们坐在桌边，他们很快给我们倒了很多酒，还拿来很多食物。有夹满了菠菜的果馅饼、精致的乳酪，还有用精细如椰肉的面粉制成的用橙子和剁碎果仁调味的美味甜点。这位丈夫解释说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因为他是一名面点师，而且不应受到称赞，因为他祖上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是面点师了。"就像我们很多人那样，"他说，"因为我们是保加利亚人。"他说他有三个兄弟在国外工作。"他们在哪里？"康斯坦丁问道。然后是片刻停顿。我们待在这座城镇已经超过半天，自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名政府官员。"一个在澳大利亚，另外两个在保加利亚。"这位面点师说道。显然这些人并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保加利亚人的后代，他们以他们的忠诚保持着与祖国的联系。

就在此时天空飘起了雨，这顿筵席不得不搬到房屋里去。一位肥胖的司机将此变为一项娱乐，在转移菜品时用了很多当地显贵人物的姿势。在房间里我们见到了主人的母亲，她是奥赫里德那些美丽的老妇人之一。我们发现她的文雅并不仅仅存于外表：她有着良好的礼貌，熟知很多事物，而且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自己。奇怪的是，我们落座的这个房间像是土耳其人的居所，木质长凳上的坐垫铺盖至房间里的每一边，墙壁上悬挂着一些毯子，此外就没有其他的家具了。这令人惊奇，因为这家人肯定不是东方的类型，那些全都穿着西方服饰的年轻人会被认作英国人或者法国人。那位面点师的妻子开始向我们展示她为装饰这间房间所做的刺绣，但这让人感到苦恼无比：她继承了马其顿妇女的心灵手巧，但是只用于那些最可怕的设计，在布莱顿的某家刺绣品商店里都找得到这样的设计。很古怪的是，当这些妇女丢弃了拜占庭的设计传统，尽管她们也会发明些有趣的设计款

式，但她们似乎对美感的差异毫无辨别力，在单调的背景上欣然复制那些有着丑恶色彩的果实和花朵的最粗糙的自然表现形式。然而不能说她们没有品位，因为她们常常给自己制作最漂亮的西式长裙。就在此时，德拉古廷开着一辆汽车出现了，他在城中心的咖啡馆里已经知道了我们在哪里，并想到我们在雨中回来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是面点师还不愿让我们离开，因此我丈夫就坐着车回到酒店去拿一盒糖果，那是我们特地带来的，以备今天这样的场合所需。

我丈夫离开后，这位老母亲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在澳大利亚的儿子以及他刚刚迎娶的一位性感犹太女孩。那位肥胖的司机伸直了手臂拿着这张照片，左摇右摆着身子，发出活泼的声响。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年轻夫妇在婚宴上被朋友们围在中间。“这个可爱的女孩，”老母亲说道，“他在几年后会把她带回到这里。”想到她的这句话可能预示着一场悲剧，我的思绪就畏缩不前了。这个女孩和她的朋友们看起来都讨人喜欢，但是显而易见他们都被那些工业制成品支配；他们会在汽车、收音机、冰箱和电影上花费巨大，而且假如不能操控机器，他们可能无法存活。女孩能够多大程度地理解这个独特的基督教家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所保持的那份独特的犹太本质，这是件奇怪的事情。假如她与传统还维持着那份联系，那么她就有可能能够认识到这个岁月久远的家庭的本质。

老母亲又取出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展现的是这个儿子与其他员工站在他们工作的餐馆里。他们让康斯坦丁翻译餐馆墙壁上的题词。当他脱口说出的时候他们显然十分困惑，并对澳大利亚人高尚的禁欲主义性格做了一番推测，而在我看来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发现康斯坦丁把“清洁是我们的座右铭”变为了“纯洁是我们的信仰”。然后，这位母亲说他的儿子想让她去澳大利亚，但是她不愿意去。她说她听说过在那些大城镇里的人没有邻居，而且那些住在一个楼层上的人实际上可能不认识住在其他楼层的人。这实在糟糕，你甚至不能说这像动物，这真是一种新的缺德事。但她对此还是做了回应：她给在澳大利亚和索非亚的儿子们写信说如果他们寄钱过来她就愿意来看他们，他们寄来了钱，她却把钱存入了银行。不然他们会把这些钱花掉，当某一天年轻人得到的荒谬工资难以为继时，他们会为此感到高兴。只要能继续下去，莱蒂齐亚·波拿巴[注]过去常常说道。

此时我开始为我丈夫还没有回来而感到担忧，因为到酒店只有五分钟的车程，而且德拉古廷也应该很擅长在这些铺着鹅卵石的小路上开着车冲来冲去。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焦虑，其中一位男子跑出去看是否看得到汽车。这位老妇人走到窗边说：“看啊，有几个吉卜赛人正爬上那座堡垒。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今天下午上那里去。他们昨天就在那上面。他们每年的那个日子都会去，因为有个吉卜赛人曾在那天被埋葬在堡垒里。奇怪的是这些可怜的蠢东西们不知道他是谁。我问了他们一次又一

次，而他们只是说，‘噢，他是我们其中一员，是名伟大的首领，但是我们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我想她是强迫自己提供这个信息，因为我看到这是为了转移我和格尔达对于房间另一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康斯坦丁和那位丈夫以及他的朋友们站在一个相框对面，那相框里面有几张照片，挂在墙壁的高处，有点奇怪。那些年轻男子用手遮挡着嘴巴在他耳边窃窃私语，而康斯坦丁摆出一副放任自流的表情。很快，那位妻子带着一瓶新鲜葡萄酒走进房间，我将这件事引发的社交活动当作借口走近那副相框。里面的几张照片标示着里尔、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但都是一位20世纪初的男子的形象：高顶圆帽，紧紧收腰的短上衣，厚厚的领带，滑稽的裤子，俨然是对意气风发的博尼·德·卡斯特兰“哦，我就是下流”的粗野模样的模仿。只有那张标记着里尔的照片是个例外，照片里是一个女人，有着鹰钩鼻、可怕的胸围曲线以及像砖块的发髻。康斯坦丁对我说：“这个男子是这位老妇人的兄弟，他到比利时和法国去当面点师；这个女人是他的情妇。对这家人来说，他们的叔叔有一个法国情妇，既是莫大的耻辱，又是巨大的荣耀。而这位老妇人有时会说她要把这女人的照片从相框中拿出来烧掉。但是他死了，他的情妇也死了，这个相框被寄给了他们，所以她不想把它销毁了，事实上，他们都觉得其中有些事情既奇怪，又有趣。”

过了一会儿我走到窗边向外看去，却一无所获。我说：“我想知道我丈夫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年轻的妻子听完我的话惊呼道：“这就稀奇了！你们不是经常听说英国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很冷淡吗？但是看看吧，她很担忧，她确实很担心他。”“嗯，”这位老母亲说道，“他是个很好的人，我确信他是个好丈夫，不要告诉我说世界上有哪个地方的女人是不喜欢好丈夫的。”然后，出去寻找我丈夫的那位朋友跑了进来，拍着手掌欢喜地喊道：“他很安全，谢天谢地，他安然无恙，但是发生了一场事故！”众人对这番宣布都极感兴趣，叫喊着听他讲述汽车是如何翻到沟里而不得不用牛拖出来的。当我丈夫带着糖果进来时，人们就像是在对着一个起死回生的人打招呼，还开了另外一瓶葡萄酒。人们的惊叹沉寂下来，那位肥胖的司机透过他的酒杯看着我们，满怀感情地感叹道：“是的，他们俩都喜欢着彼此，看呀，不再年轻的他们坐得多么靠近对方。”

---

1. 莱蒂齐亚·波拿巴（Letizia Bonaparte，1750—1836），拿破仑之母。

奥赫里德III

第二天上午我们很晚才醒来。我们在这春天所给予的最美好的一天中，在湖边的白蜡树下享用了早餐。湛蓝的湖水在微风的吹拂下微微荡漾，休耕的红色土地和绿油油的草地都很清晰地倒映在湖面上，形成不断变化的抽象画面，看上去甚是美好。远处湖岸边的山脉闪烁着朦胧的银白色，近处的则清晰可见。湖湾对面古老的奥赫里德城镇里的每幢房屋都有自己的特色，带着些微的自然特性，矗立于山脉曲线之处，最顶层被托架支撑向外凸出，这在建筑领域就跟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长度一样重要。时间流逝，就快到我们去看尼科莱主教主持仪式的时间了。我们做了最大努力打听到仪式举行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我们甚至采取了预防措施，在离开那位面点师愉快的聚会后，我们还去了教堂。教堂很小，却充满了富丽堂皇的奇思妙想。奇怪的是，它坐落在由那座堡垒延伸下来的一条小路边上的一座漂亮的乡村风格的公园内，公园里长满了紫色丁香花和鸢尾花。德拉古廷在相邻的一间间房屋里找寻教堂的看守人，并从他那里确切地得知庆祝弥撒将于次日九点半开始。但是到了九点二十五分，康斯坦丁和格尔达还没有准备好，当我们敲开他的门，他说没有关系，仪式到十点钟才会开始。我们平静了一下心情便又下楼坐在汽车里。

九点四十五分德拉古廷离开方向盘跑进酒店，像努力将鹅轰赶出屋子的人的姿势一样，挥舞着手臂大声喊道，“出来！出来”，五分钟后他把康斯坦丁和格尔达推搡了出来。而在十点钟，我们在以前常来的那个地方，匆匆离开振奋的人群，跟那些兴高采烈的礼拜者们相向而行。但是这些人并不急促，他们站着聊起天来。我突然哭起来，对我丈夫说道：“你见不到尼科莱主教了，可笑的是，你没有理由不去见他，你应该去见见他，因为他是这些人爱戴的人物。”“你们会见到他的。”德拉古廷说。他跳出车外与一位路过的神父交谈了几句，就又跳进来调转车头，再次向着老城的那些巷子驶去，将我们带到镇上一处满目荒凉的朽坏的地方。走下车，我们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岩石下方是一座荒废了的花园，再往下是几栋仅剩条板和灰泥的房屋，而在我们上方，一幢失去了整体外观、仅用一张阴森森的锈铁皮取代的房屋旁是一条小巷的入口，小巷通往上面的一块荒地。这条小巷向上几步台阶处有一个门廊，德拉古廷说道：“从那里进去，你们就会找到主教了，教堂正在举办筵席。”我走了进去，看到在一座小而破旧的教堂前的蓬乱不整的花园里，人们都注视着花园前方的长廊。那里，尼科莱主教坐在餐桌的主位上，另外就座的还有几位神父和一名修女，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以及几名穿着普通服饰的男人和女人，所有人的脸都面向他。我很惊奇教堂的筵席会是一场有吃有喝的真实筵席。

尼科莱主教站起来欢迎我们，我知道他见到我们一点也不高兴。我意识到他对康斯坦丁没有好感，对我则不确定，他想我可能会在他允许我出席的任何场合因为某种西方的背叛而翻脸骂人。我并不十分在意他对我的看法，因为我对他实在是太感兴趣了，而且我们之间任何的人际关系对我的兴趣也不会有所帮助，因为通过观察他我就能从他身上得到我想要的全部。他这会儿拍打着我，就像前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当时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为卓越的，倒不是因为他拥有智慧或是善良——我仍然不知道他的智慧或者善良程度有多深——而是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魔法师。他掌控了施展魔法的方法，他美丽的相貌如狮子一般，他雷鸣般低沉的声音洪亮且带有喉音，暗示着他能够与神明、人类及野兽对话。他充分了解怎样才能安慰那些寻找魔法的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渴望得知失败并非失败、爱情也有作用。他有着一种温暖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充分利用魔法去给出证明的知识。他也有着一种冰冷的知识，即魔法效用的有限性，以及在物质战场上魔法不能取得人们所渴望见到的那种胜利。他与魔法是如此相得益彰，以至于假如魔法不存在，他也会将其发明出来。他将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视作魔法的表现形式。当他向我们这几个不受欢迎的人打招呼时，当他转身给花园里以及从墙外看过来的农夫、孩童和乞丐下达命令时，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盲目而受阻的表情，仿佛他在问自己："这是什么样的咒语结局？我们现在举行的是什么仪式？这是白魔法还是黑魔法？"

他吩咐我们在餐桌就座，我环顾四周，看到几个我第一次访问奥赫里德时遇到的人。有奥赫里德湖另一边的圣诺姆修道院院长：一位表情极其挑剔却没有一丝坏脾气的老者，身为马其顿人，他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仍然是一位神父，他在青年及成年时期总是面临着突然死亡的威胁却仍然保持不受暴力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位歌唱水准非凡的红发神父，像一头有金嗓子的公牛，笑起来也犹如一头金牛，并且因为在奥赫里德主持洗礼以及婚礼而广受欢迎。其他人都是些新面孔：一名身材硕大的宪兵队军官，他是黑山人，跟所有黑山人一样拥有完美的阳刚之气，毫无疑问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一名掌管奥赫里德工程部门的官员，皮肤黝黑，精神活跃，像填补了这种职位的神秘人物一样，用农民般的力量以及农民般的沉默寡言面对着现代社会，这样陌生人就摸不到其中的门道。

我们都开始用餐了。花园里的人们从小商贩那里买来了面包卷，从教堂台阶下的手推车买来了冰激凌蛋卷。桌上有冷羊肉、煮鸡蛋、羊奶酪、冷炸鱼、未发酵的面包以及青蒜，还有一种味道更浓烈、个头更大一些的春葱。主教用一种憎恨西方对巴尔干之憎恨的口吻对我丈夫说道："这里的一些东西你们英国人是不吃的，但是我们是一个东方民族，我们所有东方人都必须吃。"他给了我一枚煮硬了的鸡蛋，自己也拿起一枚，并让我用我的鸡蛋与他的鸡蛋互相敲击。"敲碎了另一枚鸡蛋的那一个应该是主人。"他说道。他以此来逗乐众人，为的是给自己不用思考的片刻闲暇，

因为他十分疲倦。自复活节以来，他携带着这些耗时长久的宗教仪式的魔法从一座教堂赶往另一座教堂，并把他自己奉献为人们信任的对象。他不得不继续去另一座教堂，不久，他就让众人知道他很快就要让他们散去。

他们对此感到悲伤，贪婪地抓起面前的面包卷和冰激凌甜筒，或者将其扔到地上又冲回餐桌前。尼科莱主教站起来喊道：“基督复活！”他们答道：“他真的复活了！”他连说三次，他们也连答三回，然后就伸出双手，主教从自己面前的一个大碗中拿出鸡蛋分发给他们。这是纯粹的魔法。他们大声叫喊着，仿佛他们所请求的是护身符而不是鸡蛋；主教则带着一种纯粹客观的慷慨神情分发着鸡蛋。当碗中没有多余的鸡蛋时，人们哀号着，仿佛世界上不会再有孩童出生，而当在桌子上的其他地方发现了更多鸡蛋时，他们狂喜，仿佛不会再有死亡降临。有一群小男孩站在主教旁边，带着和长辈们同样的激情哀号着、欢呼着，但是不得不等到最后，因为他们是孩子。就在这时，格尔达开始从她旁边的一个碗中拿出鸡蛋来分发给他们。

这是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都会感到恐惧的时刻，在那一刻，对某种礼仪的违背使得一件事情变得令人如此厌恶，以致亲眼见过的人都无法忍受并继续活下去。后来我们学着不去相信这种时刻，认为遗留在儿时脑海里如此之多的规定不过是一些废话，然而我们错了。“令人震惊”这个词有一种含义，有些不同于犯罪的事情会令人震惊。对于格尔达的行为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因为和她一起来到这场筵席而感到羞愧，我们没有立刻察觉到，之后才有所反应。此刻，我们仅仅是陷入了那目瞪口呆的恐惧当中，这恐惧表现在桌旁每个人的脸上。那些孩子局促不安地从格尔达手中接过分发的鸡蛋，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并且不再关注她，就像动物抛弃生病的同类一般。尼科莱主教对着她垂下眼睛，仿佛是在透过他的眼睑看着她，就像是普洛斯彼罗[注]，默然不理会自己所造生物犯下的过错。当格尔达再次将手伸进碗里拿起一枚鸡蛋分发给孩子们时，我丈夫对她说：“你不能那样做。”她犹豫片刻，然后以一种不真实的慈母般笑容缩了缩嘴角，说道：“但是有些孩子还在哭啊。”她又将手伸进碗里，我们都不确定她会做什么，也不确定尼科莱主教会做什么，而就在此时，一件事情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拯救了我们。

一个乞丐通过巷子里的门廊走到了花园里。他年事已高，衣衫褴褛，很是肮脏，并且看得出他是位盲人，因为他靠一根木棒探着路，而他的眼睛闪着微光，像一条死鱼。他停住脚步并要求把他带到主教那里，于是一大群人匆匆忙忙地把他带到桌子旁边。一到那里，他就向主教打了声招呼，脑袋向后一扬，脏手搭在我丈夫的肩膀上以保持稳定，然后挺直腰板开始唱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位红头发神父对我说，“他不是奥赫里德人。而他唱的这首圣歌非常古老。”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它来自信仰的古

典时代，在堕落的受虐狂悄然而至之前，在赎罪的观念将礼拜变为交易之前。它崇拜着；它并不试图通过崇拜获得救赎；它崇拜它所摧毁的事物，并对破坏感到痛苦，它又十分欣喜，因为死亡遭受了欺骗，而被毁灭者存活了下来。阳光再一次看起来像是一些无拘无束的光辉。

那位乞丐停止了歌唱，自己比画出一副不是沾沾自喜而是放弃的姿态。主教把他唤至桌边，给予他祝福，又在他的手里塞满了面包、羊肉、青蒜和鸡蛋。他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坐在草地上开始吃东西，非常高兴地从骨头上咬下肉来，我们则在桌边轻松交谈。“过去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乞丐，”他们告诉我们说，“人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失明了，那么一定是因为上帝希望他不是去看而是去思考，并且他有责任离开他的家乡去往灵魂呼唤的地方，依靠人们的施舍生活。但是，现在怀疑无处不在，而且没有人会考虑这样的事情。”场面已经完全被扭转了。最后，尼科莱主教发表演讲，提议来年由文职人员担任教堂理事会主席。他的演讲穿插着温和的小笑话，他还带着孩子们为他欢呼喝彩。然后他又礼貌地提及我和我的丈夫，对有人从英格兰远道而来表示愉快。而我发现那位面色苍白的圣诺姆修道院老院长就站在我身边，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幽灵，从瘦小的手中伸出一枚鸡蛋。“他说，”主教翻译说，他的英语很优美，适合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布道的人，“他把这枚鸡蛋给你，由你带给你们的教区牧师，象征着英国国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团结在复活基督下，不是被埋葬的基督，而是永生的基督。你们有教区牧师吗？”他非常疑惑地问道。我诚实地，但也可能是闪烁其词地答道：“我会把它带给我的堂兄。他在一座教堂里担任牧师，那座教堂是在英国国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还是一家的时候修建的。”我用手帕将这枚鸡蛋包裹好。尼科莱主教心不在焉地看着我的手指，他的双手紧扣桌沿，以备站起来时能够支撑起他的体重。

然后，这已经被扭转的场合又恢复原样。康斯坦丁站起身来开始发表演讲。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是主教又一次像是普洛斯彼罗，一位感到厌烦且愤怒的普洛斯彼罗，这一次他终于对他的生物们失掉了耐心。他昂起他硕大的脑袋，释放出一种我不曾见过的表情，就像是上帝命令太阳遮住月亮然后做它的工作一样。但是康斯坦丁没有受此影响，因为他正忙于一项本身并不宏伟的事业。格尔达骇人的行为否定了魔法的功效，并宣称了由一个人给予的鸡蛋与其他任何人给的鸡蛋是一样的。而自幸福的狂喜比痛苦的痉挛更为难得，以及那位失明的乞丐宣布魔法信守了承诺以来，格尔达的行为就被宣告为毫无特殊之处，而实际上她的行为更为特殊。因此格尔达已经被遗忘了，而且也被原谅了。但是出于对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奇怪土地的忠诚以及对世俗的隔离，康斯坦丁又做出了她所做的坏事，于是这些已经得到了纠正的行为继续坚韧地存在着，并且，他是在一种取悦她并低于她的层面上完成了这种行为。她分发鸡蛋时带着某种高贵气质，仿佛她是家庭中称职的母亲；而他现在是个犹太喜剧演员。他穿着因为旅

行而褶皱的衣服站在这些人面前，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下挥舞着短小的手臂，语速飞快，声音洪亮，他的下嘴唇上还带着些唾沫星子。他们还没能适应身材矮胖、跳来跳去、夸夸其谈的犹太人，他们只知道身材高大、沉默寡言、行动如鹰一般的犹太人。主教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他从椅子上跃然起身，赫然站在小小的康斯坦丁身边，吩咐孩子们为康斯坦丁欢呼三次。但是当孩子们欢呼完毕，康斯坦丁还在演讲。主教猛地倒满他的酒杯，以至于酒杯周围的桌布都染成了紫色。他把他巨大的手臂摊在桌子上，在康斯坦丁兴奋得满面红光之前，对着众人一饮而尽。即使在此时，康斯坦丁仍然在继续着他的演讲，如此地固执于他的双重意图，每时每刻都揭示着一种更为可怕的美，他一方面支持格尔达攻击这个世界，一方面也支持她蔑视自己。主教将他的酒杯摔在桌子上，以一种暴风雨深处的平静的威严向众人告别，把椅子推给他身后的孩子们，大步走出花园，人群拖着脚步走在他身后。我们被留下来站在桌边，其他客人则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

1. 普洛斯彼罗（Prospero），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主人公。

奥赫里德IV

格尔达和康斯坦丁看起来相当开心。“我并没有做太多演讲，”康斯坦丁说道，“但这是尼科莱主教爱来的地方，他在这里肯定被允许做所有光鲜的事情。我在想，既然你丈夫已经见到了主教，如果到我们去年与诗人一起参观过的那座小修道院去会是一件很棒的事。那里风景如画，用来打发如此美妙的上午再好不过。”我感觉这想法很棒，我们当然不得不去某个地方，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而且我也想起在奥赫里德背后群山环抱中的那座修道院的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们曾与城里的一位年轻诗人到过那里，希望寻找一个让康斯坦丁可以朗诵诗篇而没有朋友旁观的地点，当时没有发现哪里适合做这事。一位修女养的小狗在回廊里不停叫唤，因为它的女主人到城里购物去了；那位已七十岁高龄身体却健硕的老神父与十个六七岁模样的孩子待在一起，他说这些孩子们因为一些诉讼案件遭受了苦痛。他继续喃喃自语：“诗篇，啧！啧！在心里编一首诗歌没有什么，但要把它写下来，你们不会跟我说那不会浪费时间。”当诗歌朗读结束时，那位老者如释重负，把我们带到低处的村庄里介绍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和几位年龄相仿的同伴坐在一处喷泉边上。

马其顿会让人对之前所相信的许多事物产生怀疑，没有什么比它拥有的老年人口数量更让人心绪不宁的事情。他们一定上了年纪，尽管很可能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老，但是仍然很老，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五世同堂住在同一屋檐下。然而马其顿人有着令人震惊的牙齿。可能就像所罗门所说的那些奇怪的女人一样，牙科医生都是骗子，可能清教主义说服我们去看牙科医生是因为钻牙很疼，而现如今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龋齿。

但是当我们到达那座修道院时，那位老神父和他的家人都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新神父，二十八九岁，来自德巴尔，敏感而有些许感伤，显然并不强壮，还戴着厚厚的镜片。他带我们走进教堂并把壁画展示给我们，是关于现代农民的糟糕内容。有一幅《末日审判》，画上呈现出那些被拯救的人物带着坚硬的小光环，那光环就像是煮硬了的鸡蛋，是鸡蛋的神化表现形式。我们看了看坐落在青红色的平原之上的奥赫里德，它与丝绸般的湖泊相对，然后要不是这位神父温和地渴望我们留下来，我们已经离去了。我们没有食欲，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以及有很多葡萄酒、羊肉、鱼、鸡蛋和青蒜的教堂筵席，而现在还没到中午，但是他神采奕奕地匆忙离去，给我们带回来一些葡萄酒、羊奶酪和鸡蛋，并把我们带到他的房间里用餐。房间非常破旧。他的床垫不是垫在床架上，而是放在木板搭起的支架上，毛巾是几缕破旧的棉布，地板上没有地毯，也没有书籍。他坐着对我们微笑，问了一些关于马其顿之外的生活的问题，看起来他对此

知之甚少。他说话时带有的并不是十足的好奇心，更像是有所触动，那效果仿佛是有一位性格温和的盲人用指尖触碰着一个人的容颜。

忽然他的脸色变了，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爬上木楼梯。他放下酒杯，把手交叉放在额头上。门被推开了，一位修女冲了进来，年龄大约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她说，“感谢上帝你们还在这里”，说完便坐在神父的床上询问我们是谁，气喘吁吁地给自己扇着扇子。“好啦，好啦，”康斯坦丁一介绍完我们，她便说道，“你们都是很有趣的人，但是我也曾经拥有有趣的生活，你们不可以说我没有，你们等着听听看。”神父发出一种表达痛苦和疲惫的低哑声音。“我是个塞尔维亚人，”她深吸一口气后开始说道，“我来自舒马迪亚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非常自然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因为我非常美丽，而且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想娶我。我很早就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他是四个富裕兄弟中的老大，而且他们都很爱我，我所有的家人还有我丈夫的兄弟们，我是他们心爱的人，我有一个女人想要的每一件东西。所以我很自豪，我很美丽，我非常美丽。”我对我丈夫说道：“但是这个女人绝对没有漂亮过。”我丈夫像是在严肃地控告一样，用哽咽的语调说：“她好像一匹送奶工的马。”

“而且，”这位修女说道，“我非常迷人。看，我的美丽有一个瑕疵”——她斜掀起高高的修女帽给我们看那瑕疵——“我的额头很高。人们常对我说，‘你有着教授般的眉骨’。我常常因为我有这个瑕疵整夜哭泣，后来我就用很细小的卷发把它遮住，编那卷发要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唱歌，我跳舞，冷酷地对待那些爱我的人，然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有一次我梦到——我做了一个最美妙的梦。”她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那位神父做了个姿势，让我想起柯勒律治写下的诗行，描写的是那些听着冗长的故事却想去做其他事情的人的感觉：

赴宴的客人捶打着胸膛，

听到巴松管嘹亮的乐章。

她继续说着。我们就像吸血鬼口中的鲜血。

她告诉我们，在她的梦里，圣母玛利亚出现在她的面前，怀里抱着一个最漂亮的婴孩，并把婴孩交到她的怀中。她抱着婴孩，感受着婴孩的体重和温暖，体验着一种最美好的喜悦；当她醒来时，她不相信这真的发生过。她对这个梦感到忧愁，并把这个梦讲给了每个人听，但没有人能告诉她这梦有什么寓意，尽管有一次她的母亲对她说：“我相信这个梦意味着你会拥有这个孩子，但它不会属于你，它会被赋予另外一个名字。”好些年过

去了，她去参加一次基督教信仰会，听到一个年轻的神学学生演讲，而在他讲演时她不得不抓紧她的座位以免不自觉地瘫倒在地，因为她认出这个人就是她梦中那个婴孩长大成人了。她立刻就找到了他，由于他是个孤儿，她就把他收为养子。很快她给他找了位富有的女孩结婚，然后麻烦就出现了。他不愿迎娶那位大笔财产的女继承人，倒跟一位贫穷的女孩坠入爱河。那女孩不但贫穷，还有肺结核。

“我非常生气，”修女说道，“然后修道院的一位神父对我讲，‘你的儿子会跟他心爱的女孩结婚，但只会维持三天’。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反对他的婚姻，但我让他承诺不和她一起睡觉，因为害怕他患上肺结核。”他们结婚三天之后，当他们一起站在窗边时那女孩就死在了丈夫的怀中。这位修女对此事的态度就像一个渔夫收起鱼线时发现有一条大鱼似的。过了一段时间，她正在阿尔巴尼亚与一位朋友在一起时，得知这个丧妻的孩子宣布要成为修道士，她立即和这位朋友赶往贝尔格莱德试图阻止他。

故事进行到此刻，这位修女跺着脚表示她是多么努力地想要阻止他。那位可怜的年轻神父则看着窗外，额头抵着酒杯。但这毫无作用，她又继续讲道，她的养子说他已经向妻子承诺，假如她死了他就会去做一名修道士。所以她就说她会去做一名修女，而她也确实成为修女。而她那位阿尔巴尼亚朋友因为对此事印象太过深刻也成为一名修女。“不是，”她说道，“那并不是很大的牺牲，因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好看。但是我，年轻漂亮、拥有一切的我，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靠人们施舍的东西维持生计，只能依靠当我富有时我那只狗所拥有的维持生计。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听过这样的故事吗？”

人们罕有听闻，因为那是虚无主义的。它没有揭示出故事讲述者和蔼可亲的性格特点，它似乎仅仅包含了对于痴迷的领悟能力；它也没有揭示出其他任何人的性格意义，其他人只是没有个性的木偶，当然她又会说人们好奇地幻想着那名神学学生在树枝下与养母的谈话。“你们英国的朋友听过这样的故事吗？”这位修女边看着我们的表情，边拍打着我们的后背欢快地问道。“现在你们一定要来看看我的房间。”她在床榻上方悬挂着一幅年轻时的巨照，那照片表明她确实从未漂亮过，我丈夫是正确的。她一直有着那种长脸的活力，却不属于最良种的马。她一定是匆忙地度过一生，踩踏着，喊叫着，收养跟她不同类的人，选择她感受不到使命感的职业并阻止生活成为一种连贯的模式。

我们回到神父的房间待了一会儿，但也无济于事。她坐着说话，瘦削的手在膝盖上抽搐着想要活动，而那活动与那些会产生任何实际结果的动作无关，与人们玩弄乐器或者写作的动作也无关。神父默默地看着她，不愿打破这沉默，即使允许他那样做。他会与这个女人在这座距离城镇至少五英里远的小修道院内一起生活，直到教会上级让他搬走。

当我们坐进汽车里，康斯坦丁转向我们绽开了笑容。“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斯拉夫神秘主义，”他说道，“我很高兴你们在看到我们生活的这方面内容后才离开南斯拉夫。”“是的，”格尔达说道，“她像是托尔斯泰笔下的某个人物。”

斯特鲁加的午后

回到酒店时，我们大为痛苦地发现，因为之前对酒店员工施有小惠，人家特地为我们备下了鲜美可口的意式鱼肉烩饭——在短短的四个小时之间，这已是第四顿饭。我们坐在湖畔的水曲柳下，和着一脸牵强的感恩笑容把饭咽下，然后腹胀难消，恨不得用咖啡把一肚子的美食化了去。一位身材苗条的老太太迈着碎步从旁边走过。她的头发染成亮眼的棕色，蓬松地向前盘起，像一顶帽子盖在头上；细瘦的脖子被撑起的高领紧紧围住。她晃动着手提包走得小心翼翼，似乎是为了迎合某种礼仪标准，而这种礼仪标准显然是陈旧过时甚至有点可笑的。当然没人会去取笑她，她的忧伤、她的风度已让人黯然。我说："或许她就是契诃夫笔下那俄国将军的遗孀吧。"看呀，这就是俄国将军的遗孀，在街边的咖啡馆里奏着钢琴。

就俄国作家的话题，我们展开了一点小争论。我和我丈夫表示最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我丈夫说，《群魔》这本书就他看来，囊括了世间道德生活中一切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以及历史生活中我们极有可能面对的偶然事件，而在屠格涅夫的书中，总有丝丝隐隐的东西让他联想起希腊文学，让他很少觉得这就是他所了解的世界。我说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想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绘审判者的梦那样的文字，是因为所有的作家都知道，所有的书都应该写得像屠格涅夫的《前夜》。但是康斯坦丁不赞成，他说："不，你们错了，托尔斯泰才是他们中最伟大的。"这个说法我难以接受，因为托尔斯泰明确地谴责19世纪的欧洲，说它如果不和自己的传统脱离就不足以唤起他的敬畏之心。在其他方面，应当承认，托尔斯泰所说的那些他认为值得说的话，说得比圣奥古斯丁和早期教会的异教人士好得多，而这些人的思辨远远超过了托尔斯泰的才学范围。"但他是个伟人，个性鲜明的伟人，"康斯坦丁反驳道，"我曾经读到，一个日本人去托尔斯泰的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见了他之后赶紧直接返回日本，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对托尔斯泰的印象消散，尽管他本来一直渴望看看欧洲。""但是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后来他又怎样了呢？"我问道，满心好奇。康斯坦丁说："这个很重要吗？这属于……"他的手虔诚地比画出一个大大的空心圈，开启了一个空洞无物的幻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伟人无所言指，追随者洗耳恭听，战战兢兢，却一无所获，虚无的存在不能转化为现实。

德拉古廷沿着湖畔，一边向湖里扔着石子一边朝我们慢慢走来。他大声说："如果我们打算在圣南姆修道院过夜，没必要等到五点钟啊。我们现在就出发，下午待在斯特鲁加怎么样？很有名的斯特鲁加。"他还唱起了斯特鲁加的一首特别的歌曲，歌词说这里的小镇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这倒

差不多是事实，我们从斯科普里来这里的路上就注意到了。我丈夫马上说："好啊，我们走吧。"其他人没响应，于是我们独自出发。

这是个令人心醉的小地方，白净得像一颗剥过的杏仁。德林河从奥赫里德湖流淌而出，穿过这个小镇。河流比清水还亮澈，就像水晶比玻璃更明净一样。镇上的房子呈现出一种蓝白色调，蓝是那种长春花盛开时的蓝。放眼皆是白杨、柳树和金合欢。这只是一个乡野小镇，并不像奥赫里德那样身负醒目的文化标签，但它如此美丽，简直秀色可餐。驻足桥上，人们仿佛忘却了时间的流逝。清澈的流水淌过桥墩，可见度刚刚好，足以让双眼沉浸在愉悦之中。

我们在镇上逛了一会儿，来到教堂，教堂墓地里站了许多人，还有不少吉卜赛人坐在矮墙上。他们说主教尼科莱正在里面主持仪式，唱诗班欢快的赞歌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据说当主教率领教众走出来时，吉卜赛人会起身进入教堂，安安静静地祷告，然后回家。本地基督徒还在里面的时候，他们不会梦想着进入教堂。这更增添了我对吉卜赛人的反感，这是如此普契尼式的事情。但我们还得逗留一阵子。尽管他们穿的都是西式服装，他们却敢于选择最大胆的色彩搭配，鲜橙色配藏蓝色，绯红色配翠绿色，暗褐色配橙黄色，足以让最精美的乡村服饰黯然失色，虽然他们穿的衣服没有哪件在奥克斯福德街买不到。

"我们去看鳗鱼吧，"德拉古廷大声建议，"走，看鳗鱼去。"于是，后来我们去了渔场。在那里，渔夫们用围栏从清亮无比的河水中捕捞鳗鱼。自己像黑水晶一样的渔夫从晶莹透明的水里拽出两条鱼，然后把它们首尾相连地束在一起。在我们的注视中，鱼儿们还能够在长草丛中扭动，却不再有恢复自由身的机会。德拉古廷看到这样的妙招，快乐得叫起来。身边有动物时他总是很开心，就像内心保留着童真的人总是乐意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以前他看见人对动物施加控制时会尽情欢呼，其实他并没有恶意，就像小男生看见己方的摔跤手赢了对方也可能会欢呼一样。"你瞧，"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水草地那边的几栋木屋，木屋建在杨树下的草丛中，周围是纵横交织的小运河，"那里是生物所，里面还有个博物馆呢，你可以在那里看见这片地区的所有鸟兽，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们留下他和鳗鱼继续做伴。他说他喜欢活物。其实他来的话，本可以发现他和博物馆老看守在这点上志趣相投。老看守带着我们参观了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它看上去就像被改成了科研所的船屋。这里的填充动物标本，鹰和狼，熊和野猫，野猪和蛇，在幽绿的暮色中呆滞地看着我们。他对动物的态度与德拉古廷如出一辙，在他看来，他与兽类的区别并不比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区别更大。我丈夫说："这可是一头巨型野猪啊。"他解释道，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无人区里，是不允许在森林里打猎的，于是野猪们在那里栖身，靠吃橡

子和栗子越长越肥。他咕哝着："在那里，它们生活得可好了。"就像伦敦人在说他们的市长和市议员："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可不像俺们穷人这样过活。"

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大多数掌管对象都生于此长于此，未受伤害，死后经过细致的填充，用樟脑丸进行防腐处理后，被保存在磨光透亮的玻璃容器里。他只对其中一只动物心存哀悼。这是一只双头牛犊，外形非常可爱，仿佛是亚当兄弟做的一件支架设计品。它的躯干带着牛犊都有的谦卑的牺牲气质，而令人惊愕的是它那两颗长得像枝形烛台的头，一颗美得让人动容，另一颗却丑得惊世骇俗，像是哈哈镜中的扭曲形象。"生得真好，"老人哀叹着，"生得真好。""它出生时活着吗？"我丈夫问道。"活着吗！"他叫起来，"它活了两天，不是因为天性的话，它到现在还活着。""天性？"我丈夫重复了一遍问道。"对，它的天性。它一生下来它的农民主人就把它带到我们最好的医生这里来了，那时候活得好好的。我跟你讲，它原来生得很好。但是它漂亮的那个头张嘴喝下我们给它的牛奶，吞进喉咙，丑的那个头就硬是使劲咳，把奶吐出来。过了两天，一滴奶都没有进到那个可怜的胃里，所以它就死了。"两颗头，一颗向左一颗向右，一颗精雕细琢一颗粗制滥造，一颗求生一颗求死，这样的经历人类并不陌生。我们把脸贴在玻璃框上，透过暮色往里看，我们的映像叠加在牛犊身上，此刻我们觉得即使它走近玻璃隔板来看我们，也不会让我们吃惊。

圣南姆

圣南姆坐落在湖的另一头，距离奥赫里德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天气晴好时可以越过水域看到它，在小小的直布罗陀黑岩上闪着微微白光。一条马路沿着湖畔向它延伸，穿过布满散发香气的灌木丛和金雀花的山坡，然后进入渔村，海岸边高高的杆子上晾晒着古铜色的渔网。我们经过时，年轻人正坐在黄昏的余晖中。他们身穿具有波斯风格的乡村服饰，感觉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德拉古廷说这个村庄不仅以其激烈的政治生活闻名，男人们对女人们的温柔体贴也广为传颂。“一些人曾经去过美国，”他解释道，“他们回来后就这样了。”山区里的氛围又变得激烈，人们的虔诚程度与德巴尔周围的平原地区不相上下。一带裸露的山脉漆黑如夜，高耸的山脊上白雪点缀如星。这是向左的山脉。而右边跨过天青色的湖水，深蓝色的阿尔巴尼亚山脉掩映在雪白如纱的云雾之间，更显巍然，具有正义的严峻姿态。之后，这条路在圣南姆彰显宽恕，趋于平坦；旅行者在这里会体会到，相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来说，他们进入的是更加简单、纯朴的地方。

通向修道院的马路穿过地势陡峭的牧场，伸展成一条林荫大道，靠土这边是高大的白杨，靠湖那边是粗壮的垂柳，都长在平整绵软的草皮上。大道两边都临水。右边咫尺之遥就是湖，在树丛间闪耀着粼粼波光。我们走到大道尽头，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便源自左边的那个湖。湖泊小巧宜人，垂柳依依的小岛倒映在湖面上，更是一道秀美的风景。第一次来圣南姆的人会简单地想：“啊，这里到处都是水。”实际情况更加不寻常。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旱地只是一种修辞说法。在这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地方的树、花、草从来就不缺水，空气中也没有扬尘。”这里的景色让人觉得浑身舒坦，仿佛地球在此达到了生理平衡，这样的润泽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见。这可不是幻觉。左边的黑岩之外就是普雷斯帕湖，面积一百二十平方英里，比奥赫里德湖海拔高出五百英尺，没有明显的排泄口。湖水就从地基渗透出去到达平原，其网状水系形成了完美的天然灌溉系统，顺水而出的鲜活也渗入人的眼睛、鼻孔以及每一寸皮肤里。

修道院蜷伏在黑色的巨崖上，凭崖可远眺大湖。里面矗立着一座设计粗鄙的铁青色水泥塔楼，让修道院的造型显得有些怪异。它的建立是为了纪念修道院成立一千周年。主教尼科莱许可了这样的建筑，因此他受到强烈的指责。他辩称是修士和教众喜欢这样的建筑，何况修道院怎么建也无须得到博物馆的批准。一座码头延伸到湖里，而小路背向而去，爬上了陡峭的石板堤道，穿过拱门进入围场。修道院周围几乎总有围场。这围场比一般的都要大，覆盖了五六英亩的草坡。周围是极美的农场建筑，大概有几百

年的历史。圆木柱子撑起宽瓦房顶，凉廊以拱门间隔，唤起人们对古希腊建筑遥远的记忆。猪，马，一只神气十足、色彩斑斓的大火鸡，以及两只孔雀，都在享用它们的鲜草，四处还种了些枝繁叶茂的大树。围场有它的历史。土耳其人统治时期集市就开在这里，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基督教商人和农民就在这里聚集，让拜占庭陈旧的文化脉络得到一点延续；有时候，叛乱也在这里策划。

我们从拱门下走过，来到修道院建筑群中的小广场上。广场具有混合特色，自14世纪起经历过多次修缮，被漆得五颜六色，白的、灰的、红的，仿佛修士手里的油漆是毫无缘由随机派发的。有一块地上没有建筑物，宽广的湖面正对平台，空气经过湖面变成凉风。广场中心就是10世纪的圣南姆教堂。教堂低矮，光线不足，石壁上除了用灰泥涂白的地方以外都是褐色的；上面一高一矮的两座炮塔都是用红白两色的砖砌成，因年代久远而显得色泽暗淡，顶上覆盖着红褐色的瓦片，形状像个火车头。教堂建在泥土基座上，下面就是广场的鹅卵石；墙壁是用石头堆砌的。教堂的一侧种了棵丁香树，紫色的花开得正艳；另一侧是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旁边立了些杆子，晾晒着修道院的渔网。

我们到达时，周围除了一位神秘的修士以外没有其他人，这位年长的修士仿佛一团长长的白尖火焰，对我们视若无睹，可能他不确定我们到底是活人还是鬼魂。于是我们径直进入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塞尔维亚-拜占庭式建筑，用来帮助人们追寻上帝。教堂很小，也许可以作为几只野兽的巢穴；有几扇狭窄的窗户，多是炮塔的通气口。若不是圣像前还有几支燃烧着的蜡烛，昏暗的教堂外殿和更昏暗的内殿简直无异于地牢的围墙。镶着金丝线的圣幛微微地闪着铜色光泽。里面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浓烈但是干净；分隔教堂的两根矮柱立在原生岩石上。一道矮门从这边的黑暗空间通向一个更黑暗的狭小空间，那是圣南姆的墓室。一盏镶着红蓝玻璃的锡灯照在一口大理石石棺上，上面覆盖着一块白金色条纹的遮布，布质稀疏，沾染了不少油腻，许多信徒曾把他们的头伏在上面。上面还放置了两本厚厚的《圣经》，银质的装订十分朴实，还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质十字架，以及一个粉色蜡封的捐赠箱。四尊圣像立在墙边，覆盖着机制蕾丝，其中一尊还戴着棉质的玫瑰花饰。这里有几捆衣服，是人们捐赠给修道院的，放置一段时间后会被卖掉。在这堆珍贵的垃圾中有张脸露出来，神情绝望，它属于一个杂役打扮的男人。

墓碑上方的壁画是圣南姆的肖像，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熟识他的人之手。他继承了圣克里门特的衣钵，是第一位被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派到这里的基督教传教士。他来时不得不带着佩剑，而不是和平，因为彼时这里的人不知道和平为何物。他看起来就是一位斗士。几千年间，几乎没有人敢于触碰肖像上这凌厉的双眼，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肖像离地不高，信仰不

虔诚的土耳其人习惯于射掉壁画上基督教圣人的双眼，而信仰虔诚的农民又习惯于把眼睛部分刮下来浸在灰泥里制成洗剂来治疗眼病恢复视力。他的严厉面容，以及教堂的黑色力量，都被马其顿农民视作庇护之力，护佑自己免受恐惧。这也折射出这片土地上曾经的恐怖历史，这不是勇气的失败，而是心智的失落。过去来到这个国家的旅行者对疯人的数量大为惊讶，通常直接就追溯到一些战争行为，比如焚烧村落等，有时候也会归咎于农民生活的严酷。这座修道院就是一所医院，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神奇的治疗。病人被带到这里后有吃有住，在墓室里祷告四十天。毫无疑问，这位杂役就是其中一个忧郁症患者。

我们离开修道院下山来到一座桥上，桥下的河连着两个湖，我想让我丈夫看看它的奇妙。这河被称为德林河，比其他河流都要清透，其能见度恰及眼眸舒畅之点。事实上这和我们在斯特鲁加看到的是同一条河。它的源头是一些不知名的泉眼，泉水流入一片柳树环绕、与其他湖泊并无二致的小湖，水路清晰；流过桥下时它独特的狂喜才神采奕奕地闪现出来。它像人一样跳进奥赫里德湖，也像人一样，和周围的水域毫无交融。水流二十里，它仍然在湖水里保持自我，清晰可辨，完全不似其他河流。太阳慢慢落山，藏到那片黑岩之后，空气变得和水一样，透明、洁净，也像水一样缓缓流动起来。我们把手肘搁到护墙上放眼眺望湖水，发现膝盖触碰到了什么雕刻。那是一块石板，刻着公羊母羊交配的图景，显然是某种生殖崇拜的遗迹。当基督教的斯拉夫先驱修建他们的教堂时，总会融合进代表当地的异教信仰的残余痕迹。这处遗迹正因它的平凡的内质而显得特别：公羊看起来就像个纳税人，母羊带着惯常的谦卑气质。在无趣人的手里，生殖崇拜比宗教的任何现代形式都更加无趣。咩咩的羊叫声从泛着苍白光线的土地上传来，还有它们清脆的铃铛声，最后，是人的嗓音，在神圣的阴影中若隐若现，一遍一遍重复着某人的名字，像是在发出邀请。黄昏里的果园带了些鬼魅气息，因为果树的树干上刷了石灰水。老态龙钟的修道院院长在果园里走动，身上系了红腰带，显得很怪异，像是穿戴鲜亮的幽灵。这会儿他的喊声得到了回应，一个穿着羊皮外套的农民向他跑去。老院长指了指头顶上的树枝，农民露出惊讶和忧虑的神情。接着一个帅气的小伙子骑着一匹马驹在园里飞驰，马的身上装了马鞍，套了缰绳。人们呼喊小伙子停下来。他从果树间骑马过去。人们指着树顶告诉他让他们忧虑的原因，他朝上看了看，含混不清地说了个什么答案，显然证明了人们之前的忧虑不过是个滑稽的错误，人群中迸发出一阵大笑。地上苍白的光线变成了金黄色。

我们回到修道院时看见院子里有个之前遇到过的修士，正和两个精神病患坐在一起，对他们唱《蝴蝶夫人》的曲调。这位修士是来自诺维萨德的塞尔维亚人，人们叫他医生，因为他在立誓入教之前学了两三年的医科。据传，他之所以会入教是因为圣南姆医治了他本人的精神失常。他是个魅力

十足的人，他的脸时而充满野性，仿佛可以单凭嗅觉识路，时而温良笼罩，仿佛祛除了好斗及其他的低劣本能。他有一口漂亮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充满空灵感。和他在一起让人感到如沐春风，然而要和他接触并不容易，因为奥匈帝国并没有像它常常虚假宣称的那样，通过教授民众德语，来向民众打开一扇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诺维萨德曾经属于匈牙利，那里的孩子们学习的是匈牙利语而非德语。他对工作尽心尽责：大多数仪式上都是他在咏唱，他一个人接待了来参观修道院的所有客人，还履行了部分照顾精神病人的职责。但他仍然拥有孩童般光滑的皮肤，以及怠惰的人身上那种慵懒的魅力。

那两个精神病人都证明了他为他们治病时散发的能量，因为一旦他把注意力转移开，他们就又陷入曾经的痛苦不能自拔了。他们坚持从教堂开始自己的生活，这里是他们所有希望的聚集点。这与拜占庭式的做法形成对照，后者让人盯着亮光使其失明，前者则是让人在黑暗中睁大双眼，寻回内心的悟性。两个病人的病情都很严重，任何人见到他们都会注意到他们的状况。一个是年轻女孩，身穿带羊皮领的廉价布衣，大概是来自某个小镇的店员。她穿了双卧室拖鞋，脚后跟从袜子上的破洞里露出来。另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帅气男子，留着长发和像牧师一样的胡须。他和他的同伴一样，身着西式衣服，但完全不修边幅：袜子是明黄色的，脚蹬一双样子稀奇古怪的扣带鞋，像童鞋款式。这两人迥然相异。对于女孩，人们很可能简单地说，如果不是有人对她太残酷，她不会疯掉。简单得如同说如果不是有人揍了那张脸，脸上不会有瘀青。但是这个男子身上有一种原生苦楚，为他所独有。如果除了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以外，他没有认识其他人，这种苦楚将一直困扰他。他的困境和双头牛犊一样，他的一部分灵魂总是排斥自己所需的营养。

对于他们混乱的着装，西方的思维会感到惊讶。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生活中的一段痛苦的历程时，我意识到，让自己身边的一切，包括衣服，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这也不能代表他们的看护人对他们不闻不问。一些修士完全沉浸在宗教狂热中，对物质的东西视若无睹；另一些人在土耳其文化盛行的马其顿长大，在许多基督徒的家里，破烂的衣服比完整的更常见。和这些人在一起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可怕，事实上他们的情形远未糟糕到令人恐惧的地步。一个待在修道院的年轻人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更像一名游客而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个子很小，动作灵活，穿着一条怪异的中欧款式灯笼裤，坐在那里一边吹口哨一边用小刀修剪指甲，看起来完全是个心智正常的人。他似乎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确，一个对东正教修道院毫无兴趣的人待在东正教修道院里，时间快不了。他对我们的谈话很少回应，看起来他确实兴致寥寥。

快到晚餐时间时，医生把两个精神病人送到他们的餐厅，然后叫我们四人

跟他走进客房。他对年轻人道了晚安，年轻人友善地点头回应，是极不适度的友善，过量得像啤酒冒过了杯沿。医生也报以微笑，笑得有点拘谨。我们余下的人便跟着医生上了楼梯，进了会客厅。大多数修道院的会客厅是开放的，但这里的是关闭的。客人们在这里得到礼仪性的甜品招待，享用糖果或者水果甜酱，以及几杯凉水；过夜的客人用餐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吃的是白兰地李子酱，吃完后被领进我们住的小房间，房间空空荡荡，有几张窄床和几个锡盆。窗户朝向湖面，在乌云密布的地平线下湖面变成银色。在右边的深暗视野里，一道像尼亚加拉瀑布的白色水雾倾泻而下，几缕无处觅源的微光沿着湖岸线低低地潜行，把岸边的树映出厚重的祖母绿色。左边的阿尔巴尼亚群山呈暗紫色，山下村落中点亮的万家灯火映在湖水的边沿。医生告诉我们："那些近在脚下的灯光就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村子。我们这里属于边疆地区。其实第一次和平协议签订后，这里也属于阿尔巴尼亚，但是因为是许多居住在南斯拉夫的信徒的朝圣之地，所以边界被重新划分了。如果意大利通过阿尔巴尼亚打南斯拉夫的话，我们就又要遭殃了。"

晚餐时医生用他优美平和的嗓音做了长长的祷告，然后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餐。食材都取自修道院肥沃的农场土地上，由一个精神病患者精心烹制成饭菜。这个病人只是不确定是否在圣南姆得到了完全的治愈，所以他乞求让他待在离圣坛比较近的地方，这样他有需要时能够得到帮助。这是那天我们吃的第五顿饭。但医生吃得很香，作为一名东正教的修士，他的一天过得漫长而艰辛。教友们在凌晨三四点起床，八点吃早饭，经过持久的晨祷后在十二点半吃午饭，然后直到晚上八点钟甚至更晚才吃晚饭，其中有些人在下午会再经历一次长时间的宗教仪式。医生昏昏欲睡地坐着喝咖啡时，康斯坦丁问他："在院子里和精神病病人坐在一起的，穿着灯笼裤的那个小个子是谁啊？"医生答道："我们也不认识，他时不时地会过来。"康斯坦丁又问："那他说他为什么来吗？""他说他喜欢修道院。"医生说，并不十分确信。"他说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拿的是南斯拉夫护照。"医生回答。"但我觉得他说话有点儿像撒克逊人，但不是德国萨克森州人，倒像是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来的。"康斯坦丁说。

大家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更多酒。"我有点儿难过，"医生又说道，"我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却可能不得不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会更愉快。我喜欢带着客人参观修道院，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我也喜欢和精神病病人们一块儿工作，他们许多人其实已经康复了。这些都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当修士唯一让我有点儿失落的是我做不成医生了，我在这里帮助治疗病人，用的都不是医生的方法。但是尼科莱主教说他可能把我调派去奇卡。"奇卡是尼科莱主教在另一个教区的座堂，是座玫瑰红色的修道院，所有的塞尔维亚国王都在那里加冕，在贝尔格莱德以南不到一百英里处。"为什么呢？"康斯坦丁问。医生

回答道：“他说奇卡是个教会管理中心，那里需要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比如说我。而圣南姆是传统的延续，传统主义者能够把它管理好。他还制定了一条规则，规定只有马其顿修士才能待在马其顿修道院，我没有理由成为例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说：“从多方面考虑，这是一条明智的规则，对圣南姆本身来说也是的，否则容易来一些人，既不了解这个地方也不懂这里的农民。”

他说了很多，可起初的时候，这条规则多半被认为是为了讨好马其顿爱国者。医生是个个性独特的人，搬来这个强调精神实质的世界之后，很少对肉体层面加以关注，除了关注一点简单的愉悦感觉，比如清洁。但是大多数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长大的人都会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关于物质财富和书面文化的重要性这些方面。那天傍晚在果园里修道院院长、农民和年轻小伙子在交谈，他们有年龄和职业上的区别，这也导致了他们在个人权力上的显著差异。但是这并不是由出身决定的根本性不平等，因为修道院院长很可能就来自农民家庭。在这里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一个牧师治疗精神病病人时，让他们知道了等级体系的概念，哪怕并非有意为之。病人们会明白自己处于这个体系中弱势的位置，而他们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件可怕的事会让人意识到，不管等级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是如何无法避免，它在人们心里都是残酷的负担。还有件糟糕的事就是，在一部分人不得不衣衫褴褛的国度里，当人们陷入精神痛苦时，寻求慰藉的地方却是在把价值和光鲜衣着相联系的牧师那里。类似的治疗危机也表现为西方社会在欣赏非文字主导的文化时能力缺失，这导致一部分在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居民，从位于柏林、维也纳、巴黎等地的大学毕业回来，对农民的服装、舞蹈、礼仪之美完全视而不见，觉得它们都带着野蛮气息。这种视而不见是最严重的治疗危机。几年前有位英国医生出版了一本书，写的是他在非洲本地人的精神病医院当主管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工作一直劳而无功，直到他了解了他们的文化，懂得了他们的神话故事和基本理念。如果这在原始族群中是真的，那么对由复杂文化的幽灵来统治的民族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有人或许认为这些考虑都不适用于圣堂，这里提供的是神秘疗法，所以应该设想它像膏药一样简单。病人被搁在大理石墓碑上听天由命，冷冰冰的，似乎和治疗背道而驰。但其实治疗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它靠的是把接受能力尽可能高的病人带来，接受圣南姆本人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接受因口口相传而长存不朽的人物及建筑风格的影响。在这里，西方的影响也可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圣南姆非常适合马其顿，适合成为神志清醒的形象。面相冷峻的圣南姆当年在群山峻岭间和未经开化的野人搏斗，没被击败，通过了马其顿的考验。他明白，再恶劣的事情都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但只要他能够英勇地战斗，摸清敌情，借助一切可借之力，尤其是神力，便什么都能经受。流传的故事如果落到西方情感主义者口中就可

惜了，他们会把圣南姆描述成亲吻大地、为其添彩的善人；或者在西方欣快症患者口中，会被错误地描述为所有的事只要正确对待，就一点儿也不可怕。

圣南姆其人，或是在他名下形成的传统形象，如此清晰明确，以至于每次我在修道院睡着后，他都会来影响我的梦境，让它们变得阴郁，但并不是把生活表现得痛苦不堪，达到无力改变的程度。每到这时我便蓦然惊醒。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睡过头了，醒来时听到大钟当当作响，宣告进入漫长晨祷的最后阶段。我用冷水洗漱完毕，远眺了一会儿湖那边光辉的世界，然后换衣整理，穿过院子。院子里有只孔雀，沐浴着阳光，正用嘴整理尾巴上的羽毛。然后我进入，或者更确切地说，向下进入幽暗的教堂里。在烛光中我看到了我丈夫、格尔达、康斯坦丁和德拉古廷，两个年老的修女，一个驼背的年轻修女，两个之前在院子里看到的精神病病人，以及另一个由她母亲陪伴的年轻农家女孩。

医生开始颂唱祷文，旁边站着辅祭，是个年轻小伙子，衣着破旧，袜子层层叠叠地堆在脚踝上。当他颂唱完毕时，圣幛那边的皇家大门打开了，出来一位身着深红色与金色长袍的牧师。他站在教众与圣幛之间，地上有一个白石圆圈，上面刻了个黑色的星形图案。其中一位年老修女把穿着布衣的女孩领出来，女孩俯身拜倒在他跟前。他张开胡须密布的嘴，声如洪钟地念诵祷文，拎着小香炉在女孩的前后左右晃动。女孩蜷曲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可怜的象形文字，含义十分明确。假如性在人的头脑里被重新定义，男人们就会善待给予他们欢愉的人，那么她就不会疯掉了。然而，我们周围教堂里暗黑的穹顶，雄伟的立柱，华丽肃穆的圣幛，都在宣告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不和谐的生活根深蒂固。在她跪着的地方来了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屈膝焚香，然后激情澎湃地扑倒在牧师脚下。他这么一扑倒顿时礼仪尽失。他从左腿跪到右腿，右腿跪到左腿，不停地抬头低头。这就是生活不和谐的根源，也是把女孩逼疯的观念根源。我又想起了那只双头牛犊，一个头喝牛奶一个头吐牛奶，结局必死无疑。最后来的是一位农家女孩，她走到牧师那里时转过身来，背对着牧师，在精心包裹的白色方巾里露出漂亮的脸蛋。她有智力障碍，甚至在牧师面前跪拜时都止不住笑。她母亲并不算年老，但早已被极度的痛苦折磨得形容枯槁，像是一片被烟熏了的火腿。女孩起身时她母亲站在她旁边，帮她转身面向圣坛。母亲在她耳边轻声说着什么，把她的手推向前额，她笨拙地画了个“十”字。母亲要教她这么个复杂的动作，想是经历了几年辛苦的劳动。

牧师从皇家大门退出，医生开始颂唱弥撒经文的另一段。智障女孩感到厌倦了，从站在一旁闭着眼睛做祷告的母亲身边溜开。她摸了会儿我身上毛茸茸的安哥拉兔绒衫，很快也失了兴趣，于是盯着前面看，看到了她母亲的后脑勺，圆圆的，包在黑色头巾里。她伸出手去，带着娇嫩胎儿般的爱

意，用指头拨弄她母亲的头发；母亲耐心地转过脸来，把女儿拉回身边。接着牧师又从圣幛中走出，端来满满一碗圣餐面包，是用长条面包切成的小片。修女们热切而愉快地拿了一份；布衣女孩拿了一份，仿佛这可能就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胡子男人急急地上前，然后走到旁边，开始整理圣幛上缠结的垂穗，那是用来装饰供着圣像的龛架的；智障女孩乐呵呵地回来，一嘴的面包屑，她母亲帮她拭去。做完感恩祷告后，魔法戛然而止。修女和牧师迅速散去各忙各事，精神病病人们晃晃悠悠地走出教堂，对他们来说，仿佛所有的钟表都停止了转动。

我们去会客厅吃早饭，有咖啡、牛奶，以及用他们自己种的小麦烤出来的黑甜面包。我一边吃一边对康斯坦丁说："你去问问医生吧，他们是不是治疗各种疯症都是用一样的方法。"他答道："我不去，这样问他会不高兴的，而且没必要，他的答案我就可以告诉你。他会说上帝的仁慈会降临到每一个追寻他的人身上。"说完他又接着喝他的咖啡。我又坚持说："还是麻烦你去问问他吧。"他仍旧不肯，于是我用自己磕磕巴巴的塞尔维亚语亲自上阵。医生听后给了个灿烂又带点狡黠的微笑，就像猎犬明白了狐狸的路数，然后答道："有些疯症病例可以被圣南姆治愈，另外一些，显然上帝另有保留。神经症我们是可以治的。我见过许多神经症患者从这里健康地走出去。而精神病患者，有一些在这里治好了，可以说治愈率比别处要高。比如说早发性痴呆，精神病医院不敢说可以治愈，但在这里，我看到治愈了好几例。但如果是器官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当然我也不该那么说，说不定明天情形就改变了。而且严格说来，我也应该指出，或许其他修道院能够治愈这样的病例。我真正能说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治愈其他的。"他说他认为布衣女孩很可能被完全治愈，但胡子男人就很难说了，至于戴白方巾的女孩，他完全不指望他们能够为她做任何事。

这种对于普遍类型和个体病例的管理方式，受过现代西式相关培训的精神病医生看了必定颇有异议，除了对精神病患者的乐观预测表示赞同。但是医生的言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经历以及修道院的传统，因为他自己所受的医学教育早就止步于这些领先的研究之前了。实际上，修道院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心理治疗体系，几乎可以与现代医学所倡导的方法媲美，也切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不难理解。病人们来修道院待的时间是四十天，正好相当于一个舒适假期的长度，修道院提供的饮食很健康，比家里吃的种类也更丰富——在极端贫困的家庭，食物甚至仅限于面包和红辣椒。他们的住宿也做了更多的私密性考虑。对其中许多人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从过度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对为数不少的女性而言，她们可以逃离男性专横暴虐的控制。他们成为许多牧师的唯一关注对象，牧师是他们认识的最重要的人，这种关注正是滋补他们残破自尊心的一剂良药。我们刚才看到的教堂仪式的感召力来得铺天盖地。人们习惯了弥撒，常常伫立于教堂

内，知道圣幛之后牧师们正在颂扬着圣洁的神力。有时候门帘掀开，他们看见牧师们笼罩着光辉，仿佛就是壁画上的圣人或旧时代的王者，或者是锦衣华服、长发披肩的圣像本身。有时候牧师们走出来，分发圣餐面包，这是最神圣的东西。那时，人们觉得牧师们别无他念，唯一的使命便是拯救这些晦暗的大脑。

吃完早餐后，我们去看小湖的泉眼，在去的路上我们又进入教堂，再次体会它的力量和威严。我们没有停留，因为看见在圣南姆的墓前，有位牧师正在对着一位农家女孩念诵某种驱邪祷文。女孩的母亲站在旁边，两手交叠在围裙前面，露出绝望的表情。女孩坐在地上，头上围了块用于礼拜仪式的绣花布。她雪白的脸上深嵌了一双又大又黑的眸子，盯着前方，神情里并无悲伤。她的手腕、脚踝纤细得有些病态，脸上则带了一种快活的任性表情。她让我们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巴黎男青年，民众的偶像，染上了可卡因瘾，和让·科克托注那个圈子颇熟。我们走出修道院时听到头顶上拱门的位置传来喧嚷的鸟叫声，抬头一看，木椽上挤着麻雀一家，正受到一只凶恶鸽子的威胁。但这场风波马上就平息了，一个瘦瘦的老修士拿了根长杆跑出厨房，口中念着温和的劝诫语，以一番猛烈的动作帮助了善良的一方。外面的山野绿地，蒙主之恩饱受润泽，花草树木欣欣向荣，焕发着盎然生机。

我们沿着小路绕湖而行，小湖中央静如明镜，对岸的一排杨树正好把自己灰白色的树干和金绿色的树叶映入水中。湖的边缘波澜不止，在这里，普雷斯帕湖的湖水从密闭的岩石层中迸出，形成两百个单独的泉眼，这些就是德林河的源头。每一眼泉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急促，有的舒缓，有的如脉搏跳动，但都同样明如水晶。“它们在圣南姆共同存在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丈夫感慨道，“这小教堂是我见过的最阴郁沉重的地方，这片水却是我见过的最鲜亮明快的地方。”在一个露天小礼拜堂的杂草间有个石盆，盆底的泉水汩汩冒泡，清透如空气。我们来时惊扰了一只巨蛙，蛙身铜黄和翠绿两色相间，它猛地从草丛中跳进了石盆里。在高处，一片野生紫罗兰将山坡染成了玫红色，山羊在那里大快朵颐。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躺着一个白皙纤巧的小孩，似已入寐，仿佛一团丝线，光彩熠熠又松散慵懒。我伸出手，触碰的是最有诗意的野花，紫色风信子。我们看了看德拉古廷，他对水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我们之前也经常看到，这会儿他正虔诚地沿着湖畔小路踱着步子，注视着湖水，时常驻足。

一上午的时间已慢慢流逝，我们寻了一条回去的路，穿过遇见修道院院长以及农民们的果园，又来到德林河上那座桥。我们站在栏杆边，膝盖靠着那幅公羊母羊浮雕，看着灰塔下转动的水车轮。灰塔据说也有千年的历史了，和修道院一样古老，岁月沧桑的灰塔看起来古朴而又宏伟。河水清透得几乎失真。我们远望着德拉古廷，他沿着杨树柳树成行的林荫大道徜徉

而来，途中停下脚步和放牧人闲聊，牧人的羊群在树下绵软的草垫上悠然自得。现在他已经过来了，把一捧不知道从哪里拾得的白色圆形石头倒进我的手里，然后和我们一道倚靠在桥栏上。我拨弄着这些石头，想起了教堂的圣餐面包，也想起了上次去圣南姆观礼时看到的那诗意的一刻。那天下午的祷告仪式上，一个修女走进教堂中央。那里的地板上有一个白色圆圈，镶了颗黑色星星。她在上面搁了张摇摇欲坠的小桌，桌上盖了张钩了花的桌垫，我们在海边度假屋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接着，身穿深红配金色衣袍的牧师端了盘圣餐面包走出来，把它放到桌子上。牧师绕着桌子走动，用一个长十字架指向面包。十字架的直木顶端固定着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那里是对应着基督头部的位置。他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停了一下，吟诵咒语。这个仪式强烈地唤起人的情感，让人们想起基督之死、善良的光辉、谋杀的罪恶，想起他带着良善光辉复活，因而解除了罪恶。品嚼面包的人觉得自己也咽下了与某种与基督相通的物质，也吸收了良善的精华。

在圣南姆，魔力可以被创造，大家接受了这样的信念。也就是说，这是世界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它的象征意义来自其物质构造，其物质构造被人为劳动所强化，而这种人为劳动又是它鼓励居民去付出的。这类地方的存在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许多大城市也属于此类。它们周围的地形地貌，托起它们的群山，或是让它们易受攻击的平原，它们的河流，它们的海洋，甚至它们的贫瘠和荒芜，都昭示着某种哲学。这种哲学虽不成文，却是民众的生死要义，就如同在某些时候，我们会为了某个我们并无记忆的梦悲喜一整天。这些地方能够给土地上的民众打上同样的烙印，不管历史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怎样的民众——即便因为征服占领而将一个民族赶尽，倾倒进去种族、哲学截然不同的另一民族。这就是佐证。只要是在君士坦丁堡，血液中必感觉到对雍容华贵孜孜以求的义务，在此压力下人变得疲惫不堪，甘于堕落；只要是在罗马，唯一的信仰便是对宇宙的疆域大开饕餮之口；帝国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在莫斯科都只会隐匿于紧闭的大门之后，无意向阴影之外迈出一步。

在圣南姆，千年以来被认可的，是帮助人们恢复心智的有效劝服，让人相信生活再苦也苦不过心智的容纳限度，而且从本质上来说，生活是快乐的。这一论点被托寄于一系列的象征物上。这里有清水环绕，它们和山岩一样是天然物质。这里另有湖泊，虽然微小，湖水却别无二致，与自乌云中降落、从山坡上淌下的雨水一样，且吸纳着更加清亮的其他水源——自远山而来的泉水。这些水源汇成一道小河，流过这边的小湖和那边的大湖，既汇集又保持独立之态，本质始终不变。除了湖、泉、河，这里还有一片绿地，草木青葱不受干旱，牧群丰足不愁吃喝。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之外却是岩石一圈，寸草不生，瘠薄之至。岩石上有建筑一方，平矮、暗沉、结实。居于中心的建筑在其中显得最平矮、最暗沉、最结实。这幢建

筑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半充满光明，人们用赞歌和仪式启迪思考和感情，它们对于人的重要性就如同水对于花草树木一样；另一半却是黑暗笼罩，人们需要精神涤荡。

这就是人的生活图景。山与湖的区别就是自然和人的区别，湖和穿过湖的河的区别就是人和动物叠合的这部分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区别，绿地和荒岩便意味着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修道院的存在作为例子告诉人们，即便命途多舛，人也绝非完全无能为力。人还可以调集声音、颜色等各种手段形成咒语和召唤，去劝服宇宙给出手里紧握的解药，来祛毒疗伤。但圣南姆没有误导人们说天启会来得轻而易举。哪怕是在这里，真理也不是唾手可得的。面包必须被摆上小桌，置于教堂中心，在饰以白石黑星的圆形图案的地板之上，被教堂四角吟诵的赞美诗赋予神力，被火焰之光指示，才能真正成为良善的等同物。艺术和思想的特点便得来不易。圣南姆不曾误导人们天启已经得到完整呈现，众人皆知。如果要说这个地方有所宣称，那也只是说这一两英里的土地与现实情形配合得当，这种配合和谐宜人。

---

1. 让·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导演、幻觉派艺术家。

奥赫里德V

我们在回去吃午饭的路上走进了圣南姆的礼拜堂，看见教堂司事正把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孩向坟墓牵去。小孩的头大得出奇，因为患了脑积水身子看起来格外小。司事隔着小孩的肩膀向他母亲喊道："来，跪下开始祈祷。"可她仍然一面来来回回地走动，一面拧动自己的双手。她长着一张清秀的脸，尽管你如果看见她在地里劳动，也许会觉得她粗鲁——或许在某方面她的确如此。她转向我丈夫，喊道："可我说啥呀？你有文化，你肯定知道我该说啥！""别对着那位先生讲，"司事说，"对上帝说吧。""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她抱怨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事儿说给上帝听，要说的太多了，不知道从哪儿讲起，这事儿发生得很怪。"我又开始琢磨，选出思维状态如此的人，交给土耳其人统治长达五个世纪之久，命运真可谓用心险恶。他们的思考天赋简直处于赤贫状态，语言里都没有"有趣"这个词。

就在这时，修士医生和康斯坦丁走进来，通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去吃午饭，然后赶回奥赫里德，因为主教尼科莱希望我们下午到他那里去。我们觉得特别尴尬，这个邀请不过是一种礼节性致谢，因为我丈夫为奥赫里德一位牧师的教堂捐了些钱。但拒绝这个邀请不太可能。格尔达和康斯坦丁自然不明白我们有什么不接受邀请的理由，而德拉古廷说他拒绝过，但又明白表示，拒绝是没有用的。在这个地方，这样的邀请无异于皇室命令。于是三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车爬上了旧城的高地。在炎热的午后，空气像水晶一样凝重，这个地方看起来光彩熠熠而又拘谨刻板。我们的到访受到了东方式的接待，它的初衷没能实现，但让我们感到了意料之外的一种愉悦。

这和访问英国主教宫殿截然不同。在一条地势陡峭的小巷里，没有刷过漆的大门背后是破败不堪的房子和花园。农场看起来也是这样。这里的人们劳动繁重，收入微薄，民风却很善良。在花园茂密的草丛里，有个带着校帽的男孩正和一条杂色的小狗玩耍，还有一个乞丐，脸朝下呼呼大睡。门廊是以前的马厩牛棚，没做大的改动。我们穿过门廊，沿着松散欲坠的梯子走进主教的办公室。那里坐着四个男人在说话，两人农民装扮，另两人身着西式衣服。我们被告知，主教在几英里以外参加正午仪式还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安坐下来，一边等待，一边享受着令人惬意的凉爽，昏昏欲睡。房间的布置很精致，木质的天花板和模塑的壁龛精雕细琢，以石膏叶子围绕，比例恰到好处。我们靠在窗边远望湖水，它这会儿白得耀眼，似乎在中央升腾起来，活像一团亮光高高地堆在盘子上。山坡上强烈的阳光铺了一地，地面在早晨或傍晚时分呈深红色，这会儿则像是岩石间的一股

淡粉色的气息。我们向下看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即使是从这样鸟瞰的角度，建筑群的典雅华贵也能够一览无遗，帝王将它作为贡品呈献给天神再恰当不过。目光移近，我们看到了水曲柳，带着乌黑油亮的嫩芽，荫庇着仍在酣睡的乞丐。

在等待中三刻钟过去了。他们给我们端来清咖啡，可下午的时光实在让人昏昏欲睡，我们倒在椅子上。几只蜜蜂在桌上插着紫丁香花的花瓶边上转圈，一位年长的牧师正和康斯坦丁谈着政治话题，四个男人在讨论斯特鲁加附近村庄上的土地争端。我盯着那精妙的天花板，猜测着它是哪个时期的杰作。大概是17世纪早期的吧，但是没人确切地知道土耳其征服以后这里发生了什么，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这片与世隔绝的地区还世代延续使用着在欧洲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习语。我停止了思考，在一个小时后清醒过来。用人又端来了新一轮的清咖啡，这次还在每只碟子上放了块用牙签穿着的土耳其软糖，因为看我们等主教等得实在太久。一只黄褐相间的猫溜达进来，老牧师让它一边待着去，但显然语气不够强硬，猫跳上了他的大腿，把自己蜷成一圈。然后用人走进来告诉我们，有电话来说主教的车在很远的地方抛锚了，再等下去已无意义。

我们沿着小巷走上奥赫里德的主干道，天气凉爽了许多，呼吸变得格外顺畅。访问极为愉快，虽然一无所获——根本算不上访问。康斯坦丁和格尔达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晃悠，觉得一切都那么可爱。碰巧遇到了几个烘焙店的小男孩，他们每天要出来在路边售卖几次，手里端着盛面包卷的托盘。我丈夫买了两只我们尤其爱吃的那种小面包条，口感细腻得像油酥点心，上面撒了些罂粟子。我们走进湖边一家大的咖啡馆，点了咖啡和牛奶来配面包。必须承认，我们纯粹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其实完全没有果腹之需，但这点小欲望，想来也是相当温和的。只有小昆虫能把这称为纵欲吧。然而当康斯坦丁和格尔达走进咖啡馆坐到我身边，她对他说："这些人总是在吃吃喝喝。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这么贪吃。"她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我的面包条，开始吃起来。

本来这倒没什么，就在那时候端着盘子的男孩们也进了咖啡馆，我丈夫又给我买了一只。接下来发生的对话则愚笨之至，极不投机。一个服务生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但我经常去美国。他又问我去过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没有，他的兄弟在那里当点心师傅。我说我曾经去过，那里有很多长得好看的人。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转身离开时，格尔达问："既然你了解美国，你知不知道那里的女人是怎样做头发的？""怎样做头发？"我重复着她的话，"怎么了，就像其他女人一样啊，只不过她们花的时间更多。""不，不，"康斯坦丁说，"这是件让人好奇的事儿，你不知道的话应该听一下。是说她们怎样在发型师做了头发之后保持发型。""可她们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啊，"我说，"她们的头发都自然带卷，许多人戴发网，比

欧洲女人戴得多。”“不是的，她们不是自然卷，”格尔达又说，“是每天晚上用手纸把头发卷成小卷。我那次乘汽船在多瑙河上游览时，同行的一个美国女人就是这样做的，她告诉我所有的美国女人都这样做。”“你瞧，这不奇怪吗，”康斯坦丁说，“你去过美国而她没去过，但她却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关于美国人的事。”“无论她去哪儿，”格尔达用塞尔维亚语对他说，“她都什么也不懂。我跟你说，她是个傻子。”“我想这得是在地狱里才会有的谈话吧。”我丈夫说。“真是无可救药，这谈话太蠢了。”我答道。“完全同意，”我丈夫说，“但我觉得这只是一场漫长谈话的一部分。公元前3世纪，一个罗马女人和一个迦太基女人在旅行途中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对话。赶紧吃掉你的面包卷然后走吧。哦天哪，她已经把第二个也吃了。”

就在那时，镇上的一位律师过来找我们。我曾在一年前和康斯坦丁一起到过他家。他听说我们在这间咖啡馆，就赶过来说他妻子很想见见我们。我十分乐意前往。他妻子是位特别有英雄气概的女子。在过去土耳其统治的时代，她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时就来到这里，在一所塞尔维亚学校教书。她知道这里是保加利亚地区，对塞尔维亚人特别不友好，但她相信学校之所以会成为保加利亚式的，不过是因为有俄罗斯人的宣传。她简直是希腊丰产女神得墨忒尔，尽管岁月侵袭，她的头发仍然褐黄浓密，声音醇厚得像凝乳。她有着精通园艺的绿手指，从她的花园里种出来的花插满了花瓶，娇艳欲滴，芬芳袭人。她送给我们的水果甜酱品种非常丰富，有榅桲、樱桃和李子，而且均出自她自己的果园，水果的个头长得比我们在别处见到的都要大。

她想见我们，一半是出于自己平和的殷勤好客本性，另一半则是出于政治根源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和我们遇到的其他好人一样，她也意识到康斯坦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本质上却是个有激情的爱国者，她曾经想争取他的同情。他们用塞尔维亚语就当地政治讨论了很久，康斯坦丁以为我听不懂，但其实我还能跟得上。她和她丈夫因为镇上的人仍然支持保加利亚的态度感到悲伤。他们甚至怀疑，如果全民投票的话，奥赫里德会选择并入南斯拉夫还是保加利亚。他们并不是沙文主义者，只是因为这个感到黯然。别忘了，当塞尔维亚人受到奥匈帝国攻击的时候，保加利亚人加入了攻击者的队伍，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认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斯拉夫血统。战争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更感厌恶。离奥赫里德不远处的山坡上有根白柱，老远就能看见，却没人去参观它。它是为了纪念1915年撤退时永留于此的四百个塞尔维亚人。他们当时弹尽粮绝，疾困交加，被本地保加利亚人射杀。奥赫里德的塞尔维亚人，包括眼前这位女子，在战时被拘禁在保加利亚，也受到了无情的对待。她痛心是因为她觉得经过二十年的残酷待遇之后，支持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没有和塞尔维亚人团结起来，尽管这些残酷在她看来并不算什么。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来自外部的暴政威胁

远比来自内部的管制忧虑要严重得多。“我真是不懂他们，”她哀叹着，“如果意大利统治了我们，不管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不管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保加利亚，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就都完了。”

她仿佛是要用土地的丰饶来安慰自己，毕竟即使是对于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土地也会给予支持。她走出房间，用围裙兜了一窝刚孵出大约一周的小鸡回来。她把小鸡们倒在写字台上，让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在墨水池和吸墨纸之间蹦来跳去。她微笑着，尽管眉间的忧愁还凝结不散。然后我们听见有人敲门。旅行者有时会忽然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受到了镇上的灵魂人物的接待。在教堂庆祝宗教节日的年长女教师差人过来说，她知道律师和他妻子要去参加她的斯拉瓦，如果他们能带上这几个外国人一道去就更好了。我很乐意同去，只是不喜欢这种对镇上的富于智慧的仪式的刻意彰显，但能够观看斯拉瓦的机会实在让我向往。斯拉瓦的字面意思是“圣人”，这是塞尔维亚人独特的社会习俗。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丰盛慷慨的生日宴会，一整天这家人都敞开大门，为所有的朋友、熟人甚至路人奉上食物、饮料，以及他们的亲切友善。斯拉瓦的日期却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不容变动的。据说这个日子来源于家族祖先摒弃异教，接受洗礼的纪念日，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合理。宴会上有一道用煮熟的小麦做成的菜，有点儿像我们的牛奶麦粥，它的菜名意思是“宰杀献祭”，即告诉新加入的基督徒，他们不必在新上帝的神坛上祭杀牲口，只消以这道菜作为替代吃下即可。结果我们去得太晚，错过了仪式，但我们分到了些斯拉瓦蛋糕，蛋糕也有转变信仰的含义。这些用小麦面粉烘焙的蛋糕个头很大，加了蜂蜜所以很甜，口感尤其浓醇。历史学家追根溯源，发现它也和生殖崇拜有些关联。它必须用刻有耶稣基督名字的蛋糕模制作，而且要由品尝第一块蛋糕的牧师来祈福。

康斯坦丁回到宾馆，给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办公室打电话。格尔达、我丈夫和我，同律师夫妇一道，加入了一个由十二个人组成的圈子，坐在女教师明亮的空房间里。女教师笑逐颜开，显然觉得款待本身充满乐趣，并不在意款待的对象是谁。她给我们讲了一些她在上一次战争中从事间谍活动的故事。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海，被吓得不轻。她乘坐的船必须出航，结果遭到了鱼雷袭击。当然这仍然是好玩刺激的，她只希望年轻人也能够像她一样经历美好的时光。每五分钟就有两个十岁出头的漂亮小女孩，她的养女，端着盛满小蛋糕、水果蜜饯和一杯杯葡萄酒的盘子来回走动。这会儿一位农妇走进来，她是其中一个小女孩的奶奶，人们把上座让给她以示尊敬。她呷了口酒，和律师谈起了他最近经手的案子，情况似乎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穆斯林联手实施了一桩不大的公路劫案，结果因分赃不均发生争执，另一个基督徒为了获得一份赃物参与进来，和穆斯林一起谋杀了第一个基督徒。第二个基督徒对案情供认不讳，两人各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显然这桩案子在周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我看来，这是对南斯拉夫在马其顿的管理工作的极好证明。在土耳其治下公路上劫案频发，以至于除非有钱请得起武装护送，否则一个人根本不敢上路。当然人们对案件的判决也意见不一。老年农妇说在她的村子里，人们对这案子的讨论无休无止，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看，所以想听听有文化的人的意见。在一个塞尔维亚传统小镇长大的另一个女教师说："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应该被判绞刑。"但出生、成长于马其顿的律师却不赞同。他甚至对供词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我猜想是有人怀疑警察刑讯逼供，这样的做法由土耳其人带入这个国家的这片地区，已深深扎根，甚至最有良知的管理者也无力禁止。但律师接着又说，他认为对于指控的抢劫环节量刑过重，毕竟被劫的是个富人，他的财富也无非是从别人手里巧取豪夺而来。年老的女教师表示反对："噢，这种事是拿到最终审判日去裁决的，现在没必要去理论，当然一个人的确不应该拥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律师说这很好，这正是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规则，但他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变得更好。"噢，你们俩总是在争取变得更好，我明白，我也因此喜欢你们俩，但这位大妈，"女教师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胸膛，"这位大妈跟不上啰。"于是律师和他妻子笑了起来，和她吻别，我们也就和他们一起离开了。

天色渐暗，我们沿湖步行回宾馆，我对格尔达说："非常感谢你为我们翻译他们的话。"她答道："我翻译这些话没什么，但你们听懂了吗？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多可怕的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分子。"我丈夫说："什么意思啊？他们说的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律师和他妻子听起来更像是传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可能连这都不是，只是简单的人道主义者。"格尔达脸上带着沉重的恨意，重复道："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分子。"

路上

格尔达和我们一起驱车从奥赫里德前往比托利，只是几个小时的行程，因此也不至于非要说有她同行不适感就延长了。康斯坦丁坐在德拉古廷的旁边，乐得听了好些家长里短。"你都猜不到昨天傍晚我看见谁在湖边走。是科斯蒂奇一家，就是经营大绸缎庄的那家人，他们在斯科普里有家店，在比托利和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也都有店。他们是住在这里的吧，他老婆的妹妹嫁的是这里的官员。他们人不错，钱也挣得不少，身上的第纳尔就像人家身上长的虱子一样多。什么都好，就有一件麻烦事，他们家没孩子。这可愁坏他们了，觉得钱那么多没人继承可不好，当然他们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经常进出教堂做祈祷，也花了很多钱看医生。唔，如果老科斯蒂奇让我吃顿好的，再给我一百第纳尔，说不定他老婆就会生个大胖小子了呢。我知道钱不是这么花的，但他那么有钱哪会在乎这点。不过，我真的觉得他老婆挺可怜的。有一次他让他老婆一个人去维也纳看医生，一个聪明的女人就应该做点其他事，而不是看医生，不过我认识她好

朋友家的女佣，她说她没这么干。哎，就是这里，我们得停一下，有东西看。”

他让我们走上一道斜坡，光秃秃的红土地看起来有点荒凉，然后指给我们看一个小小的洞穴，那里有蒸汽冒出来，就像水刚烧开时壶嘴冒出来的一样。“那是座火山，就那儿，”他说，“尽管小，但是是活火山。可怜的野兽要是走近它，噗！就死了。”我没信他的话，接着向下看了看，发现我脚边有一只刺猬干瘪的尸体，香消玉殒赎了刺猬所能犯的罪。今天是德拉古廷的幸运日，想什么有什么。我们行至通道顶端时，车忽然向前纵了一下然后停下来，他跳下车跑到车后去查看轮胎，然后回来悻悻然地说：“我以为我碾死条蛇，结果啥都没有。”没过一会儿，车子又那么纵了一下，吓人一跳，这次是真有蛇遭了殃。然后它的头和心脏受到扳手的重击，一命呜呼。“看看它背上的黑色格纹，”德拉古廷瞅着它的尸体幸灾乐祸，“它是条非常危险的蛇，被它咬了的话半个小时就得死。这种蛇在这里多得很。”我问康斯坦丁：“这里很多人被蛇咬死吗？”他想尽力维护马其顿的形象。“远远不及波斯尼亚多。在波斯尼亚许多人被蛇咬死，”他一腔赤诚地说完这话后，想起波斯尼亚也属于南斯拉夫，于是加了一句，“其实也不算太多。”

再往前走，道路下延到了一片辽阔的红色平原，平原上种着谷物和葡萄；然后道路把我们带入里森区的一个无趣的小镇。这里的空气具有和南部平原上那些小镇相似的特征，它们好像被沉重的热气压平了一样。历史上，这里发生过两件引人注目的事。1903年，基督徒在这里英勇地崛起，与土耳其人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也是在这里，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催动了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思想萌芽，并向他的战友和同僚们进行传播。我们在中央广场坐下来喝咖啡时，一个男人走过来用美式英语和我们交谈。他大概四十五岁，在芝加哥待了十年，最近因为家事回到这里。我们问他还有没有对1903年起义的印象，他说有。他那时刚从睡梦中醒来，跑到大街上，看到土耳其兵营上空一片血红色。之后就是一段可怕的日子，他和其他许多男孩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的父亲。这时，乔治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政治家的噩梦。

乔治据说在美国待了五年时间，直至1928年。他曾在底特律上班，每周挣五十美元，后来不得不回来服兵役，服完了就再也回不去美国了。“但我想回去，”他说，“美国是好地方，没有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人穷。”我们想告诉他，现在即使回去，情形可能也与当年有所不同。“不，”他说，“你们不了解底特律，没有人穷，没有人找不到工作。”从芝加哥来的男人开始挥舞着胳膊对着他嚷嚷。毋庸置疑，我们误打误撞地卷入了这个乏味的小镇上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他转向我们，大叫：“我一直告诉这个家伙现在经济衰退！”“没事，”乔治接着说，“美国不交税，没有人听说过税是啥

玩意儿。也没有军队。”芝加哥男听了只能抱着头痛苦地呻吟。我丈夫和我离开了他们的争论，去瞪眼凝视军官俱乐部——国父阿塔图尔克曾经的策谋中心。这是座白色的方形建筑，带着一种奇异的宿命色彩，曾经在一楼的大阳台没有了，支撑它的悬臂突出来，像个绞刑架头。曾经通向它的玻璃门现在只能向虚无敞开。它旁边那座风雨飘摇的房子，在驻守森严的日子里应是座漂亮的公馆，现在纠缠在紫丁香交错的枝蔓中。

在咖啡店里我们看见格尔达正在享用她的面包和凯马克，凯马克是和黄油类似的奶制品，口感比它的名字要好得多，是将牛奶加热后冷却，奶皮收缩后制成的。她的举动其实无妨，但她觉得这有悖于她平时宣称的禁欲主义，于是解释道：“我平时是遵守规矩不吃这个的，但我今天看见德拉古廷杀那条蛇的时候实在是感到恶心，必须吃点东西。你们不觉得那看起来太野蛮了吗？”她吃完后我们绕了点路，离开比托利去看了一眼普雷斯帕湖。我知道的人当中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除了五行谐趣诗人爱德华·利尔。早在19世纪50年代时，他闲云野鹤地行至湖岸，寻找他那些美妙绝伦、赋予人奇特感知的水色。到达那里之前，我们路过了一连串村庄，村里的生活在冬季的寒风中很可怕，在夏季的酷热中更加可怕，过这样生活的人却总是充满活力。见到两头水牛的时候，我们停下了脚步，冲着它们乐了一会儿。它们带着煞有介事的表情，躺在和它们的体型完全不相称的窄小溪流里，任由一群动作机敏的男孩女孩把水浇到它们身上，小孩们的肤色呈玫瑰色和金色，有的小孩长着蓝紫色的眼睛。沼泽地里，鹳鸟和鹈鹕站在高高的白色野草间。在沼泽地之外，我们找到了普雷斯帕湖。一片风信子般的蓝色铺陈在群山之间，群山竟失了色彩，只带着点光泽，光却也遇到了坚实的障碍，不能深入。它的秀美不亚于奥赫里德湖，却不及后者那般幻妙圣洁。真实的奇迹发生在圣南姆的水上。

远处的湖岸边，树林和水之间形成一道陡直的分界线；而在近处，树林在深蓝色的水域边形成了一小片模糊的绿色。“在那座岛上，”康斯坦丁说，“有保加利亚沙皇塞缪尔以前的宫殿。”在公元10世纪时，他统领一个强大的巴尔干帝国，直到被称为“保加利亚杀手”的拜占庭皇帝巴西尔击败。以现代的观点看来，巴西尔干的事比屠杀更恶劣。他俘虏了一万五千个保加利亚人，把他们的眼睛全部弄瞎，只在每一百个人当中保留一个人的一只眼睛，好让他们带领其余的人回去见他们的帝王。塞缪尔见到自己的兵士全成了盲人，受不了打击而死去。他尽管是个保加利亚人，但毕竟也是个真正的帝王。“我们可以上岛吗？”我问道。“那可上不了，”康斯坦丁说，“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岛上交界，那里有许多士兵悉心守护自己国家的荣誉，没事儿做就放两枪。而且，岛上到处都是巨蟒。”于是我们只能在湖水之上一块小的岬角上游荡。这里的灌木丛中鲜花盛放，地上铺满了软绵绵的厚草皮。我们尽情地呼吸着原生态的空气，注视着圣洁的光芒。“荣耀归于我主！”德拉古廷喊着，上下跳动，“简直和

沥青路一样好，这草皮。”“听啊，”康斯坦丁说，“灵魂深处他就是一个司机，他以司机的形象说话，以司机的目光看世界。就像有个法国人写的剧本，应该是一条狗写给其他狗的，就是以这样的角度开始的，‘幕布在骨头上升起’。”“荣耀归于我主！”德拉古廷又喊道，“这些花草闻起来真香！躺下来打个滚吧！这太让人享受了！”我们都躺在草地上打起滚来。一个牧羊人走过，看了看我们，点点头笑了笑。“瞧，多好啊，”他说，“不过你们应该七八月份来这里，那时候的味道闻起来更香。”

比托利I

我们在湖边溜达了很久，直接赶去比托利已经太晚，只得先在里森吃午饭。在这座看似贫瘠的小镇上，我们午餐吃得还不错，有鲜美的鸡汤、辣椒炖羊肉以及口感一流的酸奶酪，比在英国任何一个主教座堂所在的镇上吃的都要好。因为我和我丈夫感到心满意足，格尔达便蒙上了一脸愠色。她开始用塞尔维亚语向康斯坦丁抱怨："这些人，连问我要不要去佩奇的风度都没有。他们只希望你和他们同去，你才对他们有用。我就应该自己回贝尔格莱德，这才是他们希望的。"她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有邀她同去佩奇。我们实在觉得没有义务把过去两周的折磨继续延续下去，在这两周她对我们表达的情感简直无异于憎恶。我丈夫和我闲逛着走出饭店，在街上一家文具店停下来，买了把紫红色的镀锡削笔刀，这东西削起笔来比我以前用过的削笔刀都更好用。我丈夫说："我们得告诉可怜的康斯坦丁，他不用陪我们了，我们自己去佩奇没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我们回到车上时，康斯坦丁也正要告诉我们这个。"我把我在那边认识的一个官员介绍给你们，"他说道，"我得和我妻子一起回家了。我出来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我们登上光秃秃的山，走在山间隘口时正好一道彩虹跨越其上。我们停在山顶，最后一次凝视普雷斯帕湖沿岸那一线风铃草般的深蓝紫色。德拉古廷指着一朵紫色的云，这朵云仿佛正拉扯着灰绿色天空上裹缠的面纱，而旁边这样的云还不少，他说："要打雷了！"一分钟后，就在那朵云那里，一道亮剑闪过。他很享受这场暴雨，一边开车一边哼唱瓦格纳的曲子。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驶过漫山遍野的野水仙而无法采摘。他中途停了一下，满怀敬意地指着一个村子说，那里的男人们全去了美国汽车厂上班，回来个个买房置地。"道奇啊，别克啊，雪佛兰啊，他们都造过，哦，还有林肯。"他说道，嗓音里洋溢着诗人华兹华斯描述的那种"自然的虔诚"。然后我们沿着山谷的谷底继续行进，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在关于上次战争的书上读到过。比托利旧称莫纳斯提尔，这条山谷和这片群山曾被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占领，在他们和他们的盟友——东部的保加利亚人——一道对抗希腊人时。军队里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战争和伤病，而对于幸存下来的人们来说，莫纳斯提尔和马其顿这两个名词代表的也仅仅是折磨而已。

然而比托利却是世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山谷口，延伸至广阔的平原，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杨树丛中，直到盛夏之前都能看到平原之上的雪山顶。在我们的惊叹中，这座城市再次证明我们西方人都还没开始理解市政规划的意义。三万五千人居住在这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像一座花

园，没有哪里因拥堵或肮脏而显得不宜居。倒是有些小破屋，但它们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表明有些不幸的人丢失了财富或才智。它的商业区颇有趣味：在种着金合欢树的林荫道上，两行商店像盒子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小河两岸。我所知晓的小镇没有哪座像它一样，开敞的门里总是展露出布置精妙、灵感层出的花园。经过严肃的文明测试，我发现这里的猫既肥硕又慵懒。女人们，哪怕是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店员，都穿得简洁而优雅，就连时装设计师阿利克斯和梅吉·罗夫也会对这样的着装心存敬意。这里的民众善良而本分。这是马其顿的土耳其首都，带着古韵的城市传统在这里彰显无遗。

我对比托利产生的温柔情感还有一个特别原因。一整个社区的人们起来维护我，这在我到访过的地方还是头一次。当时我和康斯坦丁在新的商业街上边走边谈，全神贯注于谈话中，一个可怜的穆斯林老妇踉踉跄跄走出门口向我行乞，和她的同胞一样，着一身黑袍和黑面纱。我给了她两个第纳尔。我们回到宾馆喝咖啡，出门时一个可怜的穆斯林老妇踉踉跄跄上前行乞，我给了她一个第纳尔。然后我们过河进入老城区，正和一个卖刺绣品的犹太商人讨价还价，一个可怜的穆斯林老妇踉踉跄跄上前行乞，我给了她两个第纳尔。我回到新城正要走进宾馆时一个可怜的穆斯林老妇踉踉跄跄上前行乞，我正要给她两个第纳尔，却有许多人冲上来阻止我伸手。我并不知道有人对我做的事有那么丁点儿兴趣，更不知道有人在我身后一路随行，但他们都告诉我每次行乞的都是同一个老妇，为了第四次“偶遇”我，她还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花了半个第纳尔打车抄近路过桥。在人们眼里，她的最后举动让她的生计添了卑劣的成分，无异于给他们共同的城镇抹黑。

可惜，我对于人们的善意仅有的回报却只是假装赞同他们，因为我喜欢这个斗志昂扬的老妇，胜于喜欢其他的乞丐，就如同我喜欢河边咖啡馆那个服务生，胜于喜欢其他的侍者，尽管在比托利，有公共意识的民众可能不怎么待见他。那是一家小咖啡馆，光顾它的只有几个戴帽子的年轻人，他们的帽子压得低过了耳朵。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玩磨坊牌，总让人觉得有点蒙骗的味道。咖啡馆不合时宜地挂了幅皇家艺术院的复制画，画上路易十五的侍臣们跳着小步舞，来测试他们的白缎及膝紧身裤质量如何。康斯坦丁放了枚十个第纳尔的硬币为我们的咖啡买单，本应有八个第纳尔的找零。只见服务生的手在钱币上瞬间一闪，就听见了他无辜的声音：“奇了怪了，刚才这里好像有十个第纳尔，你们又拿回去了吗？”我相信我刚才要是盯着他的手是看不出端倪的，但是我的目光那会儿正越过他，停留在皇家艺术院的那幅画上，所以眼角的余光瞟到那枚硬币从他的掌心溜进了他的袖口。他让我们把钱再拿出来时，态度是那么随和友善。

比托利其实很有些《一千零一夜》故事里描绘的、让人忍俊不禁的无赖寄

生性，或许过去它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座城市。有证据显示，城内那些穷奢极侈的大理石墓碑下藏有土耳其人留下来的财富，在那些装点着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喷泉池的穆斯林墓园里。于是许多希腊富人没事儿就坐在他们阴凉的花园喷泉边，当然也有些是犹太富人。可惜这座城市经历了太多战火导致的物质损毁。城里到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多缘于那次爆炸事故，事故之后多年，损毁不减反增。对南斯拉夫没有好感的人们言辞激烈地抱怨政府，认为把斯科普里定为行政中心的做法毁掉了比托利。可是政府很难选择这座城市作为行政中心，它距离边界几英里，只有一条铁路支线通过。毕竟斯科普里位于铁路主干线上，且距离边界有近一百英里。另外，比托利作为一处旅游胜地可能前景更好。金合欢开花时整座城市白纱覆面，馥郁芬芳，甚是迷人。城外山顶上的咖啡馆也坐落于金合欢丛中，盛夏的傍晚时分闲坐那里，欣赏暮色中的十四座清真寺宣礼塔，以及平原上拉长的杨树影子，确实是件让人惬意的美事。

带着我充实的记忆，一到宾馆安放好行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拉着我丈夫出门，带他看看这城镇的风土人情。但走到楼道上看见康斯坦丁时，我有点不确定我们的行程是否会顺利了。他说：“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去，我们跟你们一道。我妻子嘛，我带她去看德国战争纪念馆，她会喜欢的。”比托利的德国战争纪念馆是现存的最畸形又最厚颜无耻的地方之一。德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一路烧杀抢掠，然后驻扎在这片山上，仗着他们的枪炮肆意践踏马其顿，直到协约国中的强势力量将他们扫出。在他们架起枪炮毁灭城市的地方，他们竟坦然地把己方战死的士兵的尸体埋在山顶，还在周围修一圈墙，围得像个堡垒。这无异于用最直白的语言表明，自己对以往行径毫无悔意，若时机允许，将立马卷土重来。我参观过的战争公墓中唯有这座让人生厌，而且是双重厌恶，它侮辱的对象不仅是它脚下这方国土，还包括那些不幸的士兵。他们被胡乱地塞在里面，没有任何姓名或是归属团营的记录。陪着格尔达去参观她们民族的不幸象征实在让人不快，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她此刻正从房间里走出来，边走边说：“我们总算找到时间去看看那些为国捐躯的可怜战士了。我太高兴了，本以为你们不会满足我这点快乐呢，毕竟是你们决定往哪儿走，又不是我。”

下楼时我丈夫已经坐在车里了，旁边是德拉古廷。我没有机会就我们将去的目的地对他发出预警。寻常情况下他参观德国战争纪念馆时满怀同情。他的童年早期是在德国和英国度过的，有可能墓碑下面掩埋的，正是他在汉堡上幼儿园时的同窗小男孩。但这却不是一座寻常的战争纪念馆。于是他的反应和我一致。下车时他仰望着陡直的山坡惊呼道：“这是什么啊？”我赶紧跑到他身边说：“德国战争纪念馆。”“胡说！明明就是座堡垒。”我催着他走在康士坦丁和格尔达的前面，向他解释我们不得不履行的这项不幸的参观义务。结果我们在他们之前到达了山顶。我丈夫目瞪口呆地盯着面前的建筑。它仅仅是一圈高高的围墙，人从矮塔下的窄门进

入。“这完全是统治比托利城的堡垒！”我丈夫叹道，“真是片奇怪的墓地，看起来大得很，实际上又容不下多少士兵。”“三千人呢，”我说，“挤在这么一小圈。上面种着从瑞典运来的石楠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怜的人！”我丈夫说。我们推了推，门打不开。“没关系，”我说，“里面也没什么。进门处搁了口黑色的大理石棺材，上面雕着德国各州的名称和纹章。天花板上是一幅用马赛克拼成的图，图上是展翅的雄鹰。”“但这也完全不是德国风格的，”我丈夫又说，“想想德国生活中人们强烈的家庭情感，还有在德国墓地里，人们对逝者的爱意。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它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侮辱，好像威胁着要重演历史。哦，他们来了，不说了。”

我们在纪念馆外绕行，眺望朝向普雷斯帕湖的雪山，它俯视着比托利的从容优美。走完一圈回来，我们看到康斯坦丁和格尔达站在入口处。“太美了，”格尔达说，“它是最有价值的纪念馆。”然后她转向我们说：“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说？你们不喜欢它。我在下面就看见你们站在这里，带着你们英国人的冷漠在看它。我想，你们是觉得德国人居然有战争公墓这件事太滑稽了，我们就应该像野兽一样横尸荒野。”“不，不，”我丈夫解释说，“我们只是没有像喜欢贝尔格莱德外那座公墓一样喜欢它，那真是座漂亮的德国战争公墓。”“我们认为那座比我们在法国看到的都要漂亮。”我补充说。“我没和你说。”格尔达边说边转向我丈夫。“为什么你不那么喜欢这座呢？”她大声说，“为什么？”“哦，天！”我丈夫说，他被逼得绝望了，“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它完全不尊重里面埋的个人，而且明目张胆地对着受侵民族追忆历史。”

格尔达一甩胳膊，仰天大呼：“他现在开始侮辱我的民族了！他侮辱我们整个民族！英国人这么说话，就应该印在报纸上，让人看看他们是哪种人。但我们德国人不干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太善良了，我们还想着和英国做朋友！但看看吧，我在这里，远离家乡，他却侮辱我的血统，德国血统！”她脸涨得通红，而且开始哭起来，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地往山坡下走。她脚下的山坡像红绿相间的棋盘格，朝着树丰草茂的群山倾斜过去。蜿蜒的河流旁边有条笔直的路，牛群和推车在阳光和泥土的氤氲中悠然而行。阴凉的花园之间，红顶白墙的房屋让小镇显得端庄淑雅。我们看见德拉古廷站在车旁，仰头望见了她，然后把他的双臂交叉在胸前，脑袋歪向一侧。康斯坦丁低声说道：“德国人都像这样，真是个糟糕的民族。”我丈夫说：“也不是，许多德国人一点儿也不像这样。”然后这个向来彬彬有礼的人立马尴尬地打住了话头，显然他本来要说的话无异于“你妻子的确糟糕透顶，不过那是因为她本身的缘故，和她是德国人并没有关系”，但他说出口的却是：“非常抱歉，惹你妻子不高兴了。”康斯坦丁苦恼地答道：“噢，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们英国人是直来直去的。”然后他也开始往山下走，一边走一边踢前面的小石头，看起来就像个不开心的孩子。

“哎，你怎么就说出来了？”我们跟在他后面时我抱怨道，抱怨可不是妻子应该做的事，“天知道，我一直对着你使眼色，把脸都快挤抽了。”我丈夫说：“我忍不住。我知道她会不断地挑衅咱俩，直到从我口中听到真相，所以我就让她如愿以偿了。但恶心的是在战争公墓前大吵大闹！在那么多逝者面前！这比在主教仪式上还糟。”“这都是一回事，”我说，“对德国人来说宗教和死亡都无关紧要，除了德国民族性以外，其他东西都可有可无。”我们到达山脚时德拉古廷面色凝重地坐在驾驶座位上，而格尔达绕着车子不停转圈。我丈夫走到她面前说：“对不起，刚才得罪了你。”她却没有领情，吼道：“你觉得这句话就能弥补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我怎么可能容忍你说德国人明目张胆？”她对德拉古廷说：“开门，我坐你旁边。”然后又停下来告诉我们：“你们受不了我坐在这车上和你们同行，从今以后你们就会舒坦了，因为我要回贝尔格莱德去。我不能再跟侮辱我和我们民族的人待在一起。”

德拉古廷没问我们怎么办，我们惊得呆若木鸡，也忘了告诉他怎么办。他载着我们穿过城镇到达大约一英里外的希拉克里亚废墟。这是一座位于维亚·埃格纳提亚大道上的罗马古城废墟，维亚·埃格纳提亚大道是条罗马古道，起于亚得里亚海，穿过阿尔巴尼亚到达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发掘出来的这点古迹能够吸引的只有犬类和考古学家们。我和我丈夫走过去在东正教墓园坐了一会儿。这片墓园一直延伸至旁边的山坡。我对这片墓园有着深深的依恋，因为正是在这里我意识到马其顿是一座桥梁，把历史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一个农妇坐在树下一块墓碑上，腿上搁着盘子，里面盛着麦片牛奶，斑驳的光影投在她的白头巾上。另一个农妇经过，她的衣服穿得和树下的农妇完全不同，应该是来自另一个村庄的。我认为她们完全不认识。两人打了招呼，端着盘子的农妇把盘子伸向新来的农妇，并把勺子递给她。后者吃了几口。这个片段让我痴迷，一千五百多年前，圣莫妮卡去米兰，陪伴她天资聪慧却放荡不羁的儿子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墓地里吃东西时受到教堂司事的指责，因为她像在非洲习惯的那样，把东西分给一起干活儿的人吃。坚守信条的圣安布罗斯禁止这一行为，因为在他看来这无异于野餐。看着这两名妇女在上帝的荣光下温柔地咀嚼食物，我觉得重回历史简直像进入另一个房间一样容易。

我第一次参观这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那时我们的导游远望着平原那边的城市说：“看，那边过来个殡葬队伍，但是死的只是个老人。”“你怎么知道？”我很好奇。“灵车后面没跟几个人，而且走得很慢，”导游解释说，“如果死的是年轻人，全城的人都会觉得可惜，会来参加葬礼。你看，这是安娜斯塔西娅·彼得洛维奇的墓。她才二十岁，从十字架上的照片就可以看出她有多漂亮。出殡时比托利的每个人都来了。她被送进教堂时，从城里过来的路上还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但是如果是老年人去世，那是顺其自然，除了其他几个老年人以外就没有人在意了。”说话间灵车

和送葬队伍已经走近，的确，来哀悼的人都是老年人。我们跟着他们进入教堂，在黑暗中手持点燃的细烛，聆听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表达对逝者发自肺腑的哀恸。“永别了，我的兄弟！呜呼哀哉！过来拥抱他吧，在他与我们同在的最后一刻。此后他将入土为安，覆以砾石，居于荫蔽，与其他逝者一起被掩埋。我们所有人，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将与他别离。在此祈祷，愿主赐予他安息。”

我们看见康斯坦丁沿着林间小道行走，脚下斑驳的光影像铺了一地的豹纹。“有件事，”我对我丈夫说，“你在德国公墓没管好你的嘴，这很糟糕，糟糕透了，但是，至少我们摆脱了格尔达。”“那你可错了。”我丈夫说。“不会吧，”我说，“你没听见她说她明天去贝尔格莱德，不和侮辱她的人待一块儿了吗？”“我听见了，”我丈夫说，“但她会食言。你想，明天我们去凯马克莎兰，在那座山上塞尔维亚人赶走了保加利亚人，赢得了东部战役的决定性一战。这趟行程很有趣，她肯定会留下来跟着走的，而且态度也会非常随和。但是在斯科普里，如果我们得半夜起床，悄悄离开的话，这事必须了结。”康斯坦丁走近我们，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现在你们会知道，我妻子其实是个好相处的人，”他说，“她说为了不使你们不愉快，她愿意和大家一道去法国战争公墓。”于是，我们好不尴尬地驱车前往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感动的地方之一。公墓位于平原上，周围的田野以柳树和杨树标界；里面立着很多纤细的木质十字架，涂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漆，每个十字架上都标有名字或是号码，旁边都种着棵蔷薇。如同公墓本身，它的花费应该不高，但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这样独立整齐的安置方式必是一种慰藉。长眠于此的已经有七千人，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牧羊人仍然不断地在山上发现散落的遗骨，然后在赶集时带下山。就是这样，在死去二十三年之后，杰拉德·米歇尔回到了平原上。人们发现他时他被捆在亚麻口袋里，拎起来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很使人心酸。他被放在外屋等候牧师和掘墓工，然后重见天日。这时他引起的嗅觉冲击比普通视觉冲击更让人觉出生命的气息。雪山顶在晚霞中呈现红色，每个十字架都投射出斜斜的长影。我们望着广阔的墓地，格尔达说：“想想这些人，都是为了众多斯拉夫人而死。”

凯马克莎兰

“今天我们去看我的民族拯救文明的地方，”康斯坦丁一边说，一边在我们享用阳光早餐的桌子旁停住脚步，手里握了三支玫瑰花，“这是塞尔维亚人为你们其他民族赢得战争的地方。我去给我妻子买了点花儿，她今早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她心情非常好，说今天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凯马克莎兰。”他走后，我说：“我们尽量做好一点。”我丈夫答道：“不知道怎样才能免除今天的厄运。”我又说：“饭店的人说只有炖乳猪和炖羔羊给我们当户外野餐，格尔达曾经告诉过我们，这两样她都不爱吃。我们把囤着应急的那瓶牛舌头献出来吧。”“嗯，这主意听起来很友好，”我丈夫说，“我们到野餐地再拿出来，刚见面时她或许有点儿尴尬。”这点他完全错了，人家走下来时泰然自若，可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嫌隙需要冰释的。

汽车载我们驰骋平原，路过泥土色的村庄，穿过切割成极小块的田野，田野极具纯粹乡土风，以架在杆子顶端的动物头骨为标。我们看见十五个人在那块看上去不过五英亩的土地上耕耘。一些游牧民族从我们身旁经过，赶着他们的牛群、马群、羊群从冬天的牧场去往夏天的牧场。在一个绿色的村庄里坐着一队吉卜赛女人，艳丽的围裙扬到头上，安静地晃动着身体。据说，她们的男人中有几个因为触犯法律被送到市政厅去了。在希腊边界那头，我们看到白色的方形房子聚集的村落，房子反射着亮光，像糖块一样。那是为被土耳其人从士麦那赶出来的难民修建的庇护所。我们最后来到一座小房子，房子坐落在不起眼的小山上，与其他村屋无异。马其顿战役时期，这是国王彼得和王子亚历山大的指挥部。里面有两间房和一个开满鸢尾花的小园子。我们心神不宁地转了转，想象不出这里曾经发生了些什么。太奇怪了。国王彼得和王子亚历山大坐在这里，看着前面小山围合的圆形竞技场和后面的层峦叠嶂，思忖着谁来夺下这座名为凯马克莎兰的山峰。山名意为“黄油桶”，它是整个平原的要隘。他们认为必须拿下它，拿不下也要拿下。凭着在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的表现，他们跻身于世界上的伟人之列。在这座小房子里发生的其他事件也让他们显得卓越非凡，究竟是什么事件却不得而知。萨洛尼卡阴谋证明，历史并不具备权威性，因为关键信息会被隐匿，复杂的动机不能用猜谜的方式来揭晓。

就在此处，1917年亚历山大下令逮捕了一大批人，其中包括“蜜蜂”（原名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坦科斯奇和斯格诺维奇——后两人是“黑手党”中的次要成员，为普林西普进行萨拉热窝刺杀提供了武器，还有梅美德巴什奇——这个穆斯林男孩没有将他的炸弹扔向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之后逃向火车站，乘车去了黑山。他们被控密谋刺杀亚历山大。“蜜蜂”和黑手党成员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梅美德巴什奇被判二十年监禁。整个巴尔

干半岛上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有罪。现在民众私人持有判决报告也被视为违反法律。所有的报纸和演说都对其讳莫如深，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充满智慧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对这桩历史迷案最广为流传的解读是拜占庭式的版本。据说亚历山大心灰意冷，觉得自己不得不向中欧强权请求获得独立的和平。于是他希望自己可以这么说："是啊，阴谋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人是一群暴民，可他们跟我毫无瓜葛，其实他们后来还想刺杀我。"如果他说这话时，策谋者都已经死亡或是入狱，他就省去了被中欧强国要求交出策谋者的尴尬，否则必是"顺得哥情失嫂意"，得罪本国民众。我的一位德国朋友的话印证了这一说法。他的话其实是转述自一个居住在柏林的塞尔维亚人。这个塞尔维亚人以前是军官，之后流亡多年。他说："是的，我想回塞尔维亚，但'蜜蜂'是我的首领，'蜜蜂'警告我说必须立即逃离，因为他们会剿灭我们整支队伍。只有'蜜蜂'本人会留下，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死对于国家更有利。"这位德国朋友对这些话所指的事件并不知情，却对斯拉夫人不同寻常的勇于自杀的精神印象深刻。他们把这起合谋归罪于"蜜蜂"，这完全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贯性格，比如他执着地坚信抛头颅洒热血会化解历史危机。

然而这样的解读并不令人满意。我曾遇见过一个伊斯兰教的黑塞哥维那人，他现已步入中年。那时候他是梅美德巴什奇的密友，他讲述的故事让我不得不相信亚历山大的行为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他在萨洛尼卡战役中有个指挥部，在审判后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梅美德巴什奇的密信，让他去一座希腊岛屿上的塞尔维亚监狱探视他。他设法去了，看见这男孩处于痛苦和迷惘的可怜状态中。他在法国被捕。在回希腊之前，法国人像对待重罪罪犯一样对待他，反复折磨他，逼他做一些他一无所知的供述。显然，法国人在塞尔维亚王室试图获取和平独立的这项计划中，扮演的已不再是同仇敌忾的同盟者角色。塞尔维亚当局也不再是了，因为当局明知对梅美德巴什奇的指控罪名是莫须有的，却要求法国人从他身上获取供述。但这个谜却没有就此终结。塞尔维亚当局已经对他进行了审判，而且以企图谋杀亚历山大的罪名让他获刑，却仍要求他招供点什么。黑塞哥维那人非常清楚，梅美德巴什奇不仅在企图谋杀这个罪名上完全无辜，而且对于他们想要他供述什么也毫不知情。他还算可靠，但也只是个平庸无奇的年轻人，策谋者不太会把那些惊心动魄的计划透露给他。当黑塞哥维那人返回前线时，他去见了亚历山大，告诉他自己觉得对待梅美德巴什奇的方式恶劣且愚蠢。他这么做无所畏惧，因为他有着为国效力的光荣记录。一个君王被怀疑将自己的臣民置于死地，以虚假的指控让他们入狱，同时又被相信会尊重对国家理想忠贞不渝的年轻军官，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亚历山大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并问了他一连串让他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我十分肯定他在琢磨着什么，"他说，"却不知到底是什么。他对此很不悦。他显得绝望而且愤怒。"后来没多久，显然也是因为这次谈话，

梅美德巴什奇被释放，他至今还居住在萨拉热窝，成了一个闭口不谈政治的木匠。

没有一种假说能够将这些事实编织成合理的图景。有时候在我看来，这些事实和某个故事相关，这个故事的各种谣传版本还能在萨拉热窝得以耳闻，只是现在听来更加模糊。显然，针对弗朗茨·斐迪南实施的罪行有两项：一项是以积极的方式，由普林西普和他的同伙们实施；一项是以消极的方式，由不作为的皇家卫队实施。据说预谋中还有第三项，在圣维特斯节那天，萨拉热窝有些人已准备承揽此罪。没人说得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唆使，据猜测，是危险、邪恶又不甘寂寞的奥地利势力。这也许正确，但也有些轻率的外国人在事件中受人利用。他们被失败激怒，之后热血冲头，贸然行事。如果刺杀行动成果显著，他也许会在军队的支持下争取权力，而且可能成功。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但这不失为一个推荐版本，用以解释亚历山大为何在萨拉热窝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很久，仍然对萨拉热窝的罪行追着不放。值得一提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亚历山大从来就不曾看过审判记录，所以并不知道梅美德巴什奇只是普通一员，与罪行的牵涉甚微。于是，这个谜用历史考证的方式几乎无法破解，因为亚历山大的所为很可能是基于完全错误的线索。在身处高位的人中，亚历山大也算是最隐秘的人之一。看着紫色的鸢尾花，我想起了大学图书馆里鳞次栉比的书架，在高高的穹顶下的横格，以及历史学家们眼镜镜片反射出来的光，想到这里我笑了。

走过这里，我们的路线就向上进入山区。在砾石密布的山间翻滚流淌着一条黑德林河，许多英国和法国的士兵回忆起它都心生厌恶。我们沿着点缀着流星花的河岸进入山毛榉林，然后是杉树林。树下铺了一地黄色的三色堇、紫罗兰，还有大株的勿忘我。我们欣然赏花的乐趣却被格尔达对“为什么凯马克莎兰如此出名”这个问题的执着探寻毁坏殆尽。康斯坦丁解释说，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曾经占领山头，用重炮和机枪加强防守，但塞尔维亚人还是爬上山坡，夺下了防御工事。格尔达立马反驳：“但如果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用机枪防守，又怎么会让你们塞尔维亚人爬上去呢？”康斯坦丁说：“哦，这正是重点，他们怎样都阻止不了我们。”她问：“但你们怎样上去的？”他答：“我们爬上去的，我们走上去的。”“胡扯，”她说，“山上的人用机枪扫射时，一个人是爬不上山的。”康斯坦丁用德语回答道——因为德语听起来非常适合我就保留了原话——“So dachten die Deutschen und so dachten die Bulgaren, aber so dachten nicht der König Alexander und die Serben!”注

格尔达顿了一下，又问：“这里大多数人是德国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他回答：“大多数人是保加利亚人。”“啊，现在我明白了，”她得意扬扬地解释，“这就说得通了。这是背叛啊，保加利亚人背叛了德国人，投向你们

塞尔维亚人。”“我可不这么认为，”康斯坦丁恹恹地说，“保加利亚人在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很久，都憎恨我们。”“不可能！你们都是斯拉夫人。你们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有德国血统的人。就是背叛，保加利亚人背叛德国人，和你们站在一起。有人在山上扫射时显然没人爬得上山。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压根没开枪。但是那样的话，塞尔维亚人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们不是经过阿尔巴尼亚，被赶到海那边去了吗？他们又怎么成功返回这里的？”“他们经过希腊回来的。”康斯坦丁回答。“哦，经过希腊，是吧！”格尔达喊起来，“那你们还敢抱怨德国人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但是比利时是中立国家，而希腊是我们的盟国！”康斯坦丁的声音高亢起来。“对你和英国人来说，这区别可真大。”格尔达不无揶揄。

现在我们渐渐融入高山的宁和之中。我们把车子留在位于积雪之下的光秃秃的高地上。那里有一片牧人的小屋，关着百叶窗，什么也看不见。游牧民族会在夏天来到这里，制作奶酪。这会儿见不着他们，春天来得太晚。我们踩在草皮上，经历了风霜雪雨的草皮已变成土褐色，但仍点缀着亮蓝色的雪光花和柔紫色的番红花映出的光芒。我们向上遥望长长的雪脊，雪脊绵延五里，有朝圣者在去往顶峰教堂的途中留下的沟壑印迹。登顶当然需要适宜的登山靴，但我们仍然沿着足迹走到我们能到达的最远处。明净的空气让我们都觉得爽快。格尔达似乎也感到愉悦，对待康斯坦丁的态度温和了很多。我们走下斜坡，蓦然发现，茫茫白雪中，一块巨石周围开满了三色堇。我们坐在石头上，看着昔日的战场向着平原方向倾斜，与杉树林间的深谷相接。山间的喜悦是真实的，因为它有血有肉，生命在此有其终极之态，然而它又是虚假的。坐在巨石上，看见、听见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舒畅，但下面的战场又令人蒿目时艰，证明我所身处的时代在一些基本的观念上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延续的存在变得困难。

是的，证据就在此。有些关于战场的想法，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比如首当其冲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浴血奋战，那他就证明了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又怎么会不是呢？有些目标是值得为之奋战的，比如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命运就不折不扣地证明了这点。不抵抗运动会让侵略者的统治自动失效，这是个谎言，否则德国的犹太人今天都还安然存在。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保障，终将被其他军事强大的邻近民族奴役。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勇气和纪律等行伍特质，便不得不在未来的岁月中面对一些本无必要的战争，且不能坚持自己的文明进程。如果有一天，和平之光终于笼罩全世界，那必是由于本可以在护卫队、海军陆战队、英军战技竞赛大展雄姿的许多人，以同样的过硬力量和精准作风捍卫着生命的权利。

我相信这是事实，尽管许多职业军人有显而易见的缺陷，真让他们苦恼的，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职业军人。不知道与同等

专业级别的律师或医生相比，高级军官的整体思维是不是更加局限，有更多谬误。在任何情况下，一名军人都不太可能对某一平民活动抱有愚蠢想法，类似于许多平民对战场抱有的那种。对无数人，包括身处英美的数百万民众来说，凯马克莎兰坡地只不过是个许多人不那么体面地死去的场所，就像他们也可能死于铁路事故一样，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明智地让自己卷入了战争。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因为对侵略毫无体验，打心眼里相信所有的战争都是由军火商策动的，没有人会因为成为俘虏而饱受虐待。他们就是不愿相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入侵塞尔维亚的目的就是屠杀平民、掠夺财富。在广袤的地域上，土耳其人无疑就是对巴尔干人做了这样的事。即便基于此，美国人所受的教育也让他们不能接受这些行为的可能性，他们觉得这肯定是威格士或斯柯达公司散布出来的无稽之谈。在美国还流行着一股犬儒主义的浪潮，人们对什么都毫不在意，一概以“哦，是的”和“那又怎样”作为回应，最后这种态度莫名其妙地发展为对整个宇宙的单一认知，基督教科学派从来无法超越它。对于暴行不假思索的怀疑态度催生出一种玫瑰色的信仰，人们认为入侵军队的每个成员都像剧院的引导员一样彬彬有礼。他们觉得，塞尔维亚人相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扫荡一个又一个村庄，摧毁房屋、砸烂家具、搬空粮仓、抛洒油酒、践踏神像，肯定是不明真相。被入侵的国家里每一个三十岁以上的农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事实，可无数美国人，不管是三十岁以上还是三十岁以下的，都会告诉你这不是。所以，这片战场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只能让人类蒙羞。

在一定程度上，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塞尔维亚人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他们就不用卷入战争了。就如同一个人在年轻时听说某位朋友将接受一次危险的癌症手术时的感觉。如果她不吃肉，如果她不吃盐，她当然就不会罹患癌症。由此推断一个人是可以不必患癌症的。然而癌症客观存在，可以有一千种方式在体内生根发芽。同样，一个国家让另一个国家生灵涂炭的方式也多得无穷无尽。但是我们别再想这些了，让我们假装手术都非必需，让每一片战场都显得异常愚蠢。至于这片战场，我们真的不需要想起，它离我们如此之远。凯马克莎兰是什么？马其顿的一座山。和平协议之后，马其顿又在哪里呢？这部分土地现在被称为南塞尔维亚。那它又在哪里？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保加利亚？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个答案就太长了，事实上长得就像这本书一样，只因它的长度，很多人都不会想去阅读。我们现代生活的不幸就在于此。我们没法知道那些与我们的生存休戚相关而且也是我们理应知道的事情。这片战场的核心要义在人们的脑海里已消失殆尽。由于人们的恐惧或是无知，它不能作为事实而存在，它被其他林林总总的事实排挤出局。

德拉古廷一路跟随我们，一边走一边为格尔达和我做了点小诗。他说：“我觉得自己站在这片圣地上有点傻。我太年轻了，没经历过那场战

争。”“是的，这的确是一片圣地，”康斯坦丁说，“如果我们能带一千个克罗地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让他们看看自由是怎么得来的。”“对，对，”德拉古廷大笑起来，“让他们看看自由是怎么得来的，然后绞死他们。”他倒不是真的想戕害克罗地亚人。在他的头脑中，对克罗地亚人实施暴力其实是极其过火的行为，这只是他生动的讲述方式，用以说明导致南斯拉夫分裂的政治差异。“但是你们也不能就在这里坐一整天吧，”他又说，“不管它是不是圣地，我载着你们也看够了。它还是不能当饭吃的。”

我们往山坡下走了大约十英里，在一间旅舍吃了饭。它坐落在松林间，如果没有马路对面的空地上那几座士兵的坟墓，看起来还挺有瑞士风味的。管理旅舍的两名年轻士兵走出来，帮我们安上搁板桌。我把饭菜放下。格尔达只是袖手旁观。我想这是因为她在冷空气里沐于阳光之中，温暖得刚刚好，喜不自胜。尽管如此，她仍旧带着她那股晦涩的阴郁。我们递给她牛舌时，她一脸严肃地问：“这是什么？”我小心地解释：“我们以为你会喜欢这个，因为你说过你不能吃乳猪和炖羔羊。”她答道：“并不是我不能吃乳猪和炖羔羊，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老要吃这些。”她把牛舌挪向自己，欣然为自己切了一块。因为帮她握稳盘子的是我丈夫，她的一张脸简直要被种族仇恨扭曲了，带着愤怒的沉默。

德拉古廷坐在车子的踏板上吃他的午饭。在他左右是两个年轻的士兵，脸上那种负责尽职的表情在南斯拉夫被征入伍的士兵脸上经常可以看到。德拉古廷的午餐遵循了他一贯的饮食习惯，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符合神秘的交感原则：他喜欢吃瘦肉、硬黑面包和红辣椒，认为一切软糯滑口的东西，比如黄油、凯马克奶油和沙丁鱼，都会让人变得虚弱。“嘿，你们来听听，”他叫着我们，“他俩说他们知道护卫凯马克莎兰是件光荣的事。白天挺好，但是夜里很恐怖，老是听到死去的士兵在呼喊他们的妈妈。”“他们说什么？”康斯坦丁问。“Yao matke! Yao matke!”其中一个年轻士兵告诉我们，意思就是“啊，妈妈”。“当然也有其他的，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呼喊。”另一个士兵补充道。两人都耸了耸肩，然后一脸正色地继续吃保温盒里的小牛肉。

我曾经一直很好奇，那些对战争持有原始态度并且认为战争必要且高尚的人，是否从来没有完全意识到战争中那些令人痛彻心扉的死亡。现在我明白了，生活其实更让人难受。有些反战主义以战争令人不快为论据，好像人们从未注意到这一点似的，这类反战主义显得愚昧。现代思潮中许多这样的外行话让我觉得遗憾，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不过是素材不合的证明，而这些素材是思想必须处理的。在回家途中，我觉得自己对德拉古廷的观点不能苟同。它始终指向生命原始的不和谐性，而这正是我不愿提及的。车子驶过颜色难辨但光彩照耀的小山，他停下车来，我们看到了头顶天空里一组像字母组合似的愤怒形状，那是一只鹰在和一只鹳搏斗。然后

我们走出去，喝了些岩石缝间迸出的泉水。这股山泉汇入黑德林河。德拉古廷指着一条翡翠色的蜥蜴，它足有一英尺长，从我们足间的草丛里穿过。“这东西有毒。”德拉古廷说。“没毒。”康斯坦丁反驳。但我知道他不过是借此表达爱国心而已。回到自己的座位后，我从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遁入了温柔梦乡。

一觉醒来，我发现汽车在一处喷泉旁边趴窝了。德拉古廷在修理引擎，周围三位身着精美绣花礼袍的华贵女士正用鉴赏的目光看着他，每个人都带着女王般的优雅，手持一把蓝釉锡壶。美丽的女人们走向浪漫之地的水域，手上的双耳壶和搪瓷罐来回晃动，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我依稀听见德拉古廷告诉她们，车之所以抛锚，是因为我们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骑驴的神父，女王们笑逐颜开。我又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我们已接近比托利的郊区。我的目光越过一片绿地，落在葡萄园中一座小房子上，门廊枝藤缠绕，顶窗之下有单薄的铁花阳台。“停车！”我说，“停车！”

我叫停车是有理由的。阳台上站了一个男人，穿着闪亮的灰袍，傲视群雄的手势似在号令天下。他豪迈的站姿表明，他已将真理从岩石的基底挖出。他右臂的力量似在表明他已从天堂取得圣火，所以他可以把这些真理牢牢地焊进我们的生活，使其不会随着我们的肉体一道烟消云散。拉长的影子映在平原上，落日的强光将群山衬托得更加萧索。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类和牲口，听闻他的声音后会知道自己的解脱近在咫尺。马路边的草丛里蹲坐着两个形容枯槁的女人，戴着面纱，全身上下都裹在尘土色的褴褛衣衫中，大概是离了婚的穆斯林女人。她们比城中那些游荡于田间、向农民伸手的乞丐还可怜。也许他一发话，她们也会立刻腾然而起，扔掉面纱，永远不用再乞讨。

但是他没有开口。他只是一个穿着破衣裳的稻草人，被涂了灰泥，以使他足够坚固，能够过冬。他被储藏在阳台上，等到葡萄成熟季节再拿出来。他的威严只是一把稻草呼出的气，就像贝尔格莱德的中央广场上那个罗马尼亚吉卜赛人低声承诺的救赎，也不过是酒精作用于她体内器官后，她呼出的一口气而已。灵魂可以得到升华，可以受到诱导，去发现痛苦的尽头，因而相信一切都被预先安排好了，只为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事实上，这一系列看似偶然其实相互关联的事物本无意味，也不能解释什么，它们只是它们自己。对眼睛而言，稻草人的论证如此强大，它导致了对于所有其他升华的怀疑。弗鲁什卡·格拉山上饭店广播里播放的莫扎特交响乐，曾经被我认为是美的证据，但它和稻草人的手势、吉卜赛人的承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处于范围内的另一端而已。它只能证明肉体的范围比稻草更为宽泛，除此以外，并无其他。相比酒效，它催生出更微妙的醺醉感觉。

1. 意为：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是这样想的，但亚历山大国王和塞尔维亚人不这么认为。

比托利II

稻草人是比托利的真正公民。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呈现出奇怪的图景，看上去这些图景只是一种象征，尽管象征意义也未曾明示。傍晚时分，我们出门，在河畔的金合欢树下漫步，在商店里闲逛。商店就是黑暗中的一个个亮着的小洞穴。在大清真寺，敦实的炮塔和高耸的宣礼塔，以及漂亮的灰泥装饰透出精美和力量交织的意味，就像一只洁净的手握着利剑。我们通过锻铁大门看进去，看到一排坟墓，以及几个可爱的老人。他们从金合欢树下走到门廊，头上的土耳其毡帽带着皇冠般的神秘光彩。黄昏的微光捕捉到了他们的白色衣带，那是穆斯林牧师的身份标志。我们在第二个极具感染力的德国战争纪念物前驻足。这是旧塔里的一组钟琴，每天两次响起德国军歌，“我曾有个好战友，再也没人比他好”，重现出金发男孩在这片土地上饱受饥渴和伤痛折磨的场景。哪怕我们中的硬汉也会觉得这很残酷。我们悠闲地走在一个身材魁梧、强健如雄鹰的犹太人和他妻子后面。他的妻子头戴一顶紧贴头顶的帽子，上面缀了一圈金色亮片，身穿一件17世纪风行西班牙的紫色长裙。他们步履轻缓，低声说着西班牙语，然后进入一间高雅的房子。房子里一切布置均端庄得体。我们停止了参观，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起得太早，而且明天还要早起。在回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件寓意深刻的神秘事件，无法解释。我们被一阵满怀激情的说话声吸引，透过门道向里看。这是一间仓库，地板上放着几袋稻谷，椽梁上垂下来几圈绳子，墙上燃着一盏油灯。一个男人斜靠在一根断柱上，这根造型传统的柱子和这个地方极不相称。他对着另外三个人讲话，仿佛是在向他们传播福音。他们看着他，带着阴郁和探寻的焦虑，因为他讲的每个字都让自己离听众更远了一些。一个男人开始局促不安地晃动身体，无法判断他是准备臣服于讲话者并拜倒在他脚下，还是准备对抗讲话者并袭击他。正看着，我们的注意力被某个畅游梦乡的人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分散了。环顾四周，我们发现这个身穿农民衣服、头戴登山圆皮帽的男人就站在我们旁边，靠在铰链门框上睡得正香。他身形庞大，大概有七英尺高。

这一天还给了我们其他的神秘感，尽管是更为平实的那种。驱车从里森进入市镇时，我看到一座残破不堪的清真寺。里面有几座呈穆斯林摄政时期风格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雕刻精美，让我觉得既惊讶又着迷。为了拍照片，我们清晨就到了。大概半个小时之间，我们都在杂草丛生的坑洼地上摸索。这里有些墓碑，如果它们只是立柱，应该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了；如果立得坚实，也应该被下面的灌木顶得四分五裂。周围的罂粟和矢车菊，在未入殓的尸骨上吸收营养，肆意疯长，繁花烂漫。这些纪念碑很值得拍一两卷胶卷。它们看上去像是糕点师的作品，带有波斯艺术影响的痕

迹。可爱的小卷轴和挂饰，陶罐里的娇弱小花，士兵墓碑上蚀刻的袖珍剑，这么多有效的成果堆砌在无效的物件上。这里有个双重矛盾。这么一个穷兵黩武的民族会滋养出这么奇特的艺术形式，而这么奇特的艺术形式遭遇的又是完全的漠视。当一位老妇制作雅致的抽丝花边手绢，或是精美的绣花婴儿袍子时，她自己，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赠予对象，并不会为它们将被装进碎布袋子的前景感到痛苦。当手工艺品的制作者不是女性，而是一位青年男子时，人们更不会有这样的感怀。在穆斯林所有物中，完全符合穆斯林品位的物件没有哪个受到了任何保护。

但这还不是我们在这座清真寺里发现的唯一矛盾。两个蒙面的妇女从寺里走出来，看我们在干什么。她们是管理员，黑色装束，满身尘土，和一般管理员的区别则是，显然不能指望她们管理任何地方。她们带我们进入寺里参观，寺内寺外并无差异。我想在英国或是美国，除非是精神病医院，没有哪块场地会像这座墓园一样杂乱无章。这座清真寺本身也被周边种地的农民用作商店。他们在几块木质墓碑之间堆起疏篱、栏舍、锄头。墓碑应属于某些达官贵人，因为刷的是绿漆，先知的颜色。碑顶装饰着一些小球，上面缀着朽蚀的方巾，曾是由虔诚的双手悬挂上去的。灰泥大块大块地从墙上脱落下来，但有两幅壁画安然无恙。一幅是风景画，画的是掩映在蓝色树丛间的赭色宫殿；另一幅展示了一种奇想，微蓝的窗帘被几个玫瑰色的绳结向后牵引，绳结可能是出自麦迪逊大街上的装饰艺人之手。正看着，脚下的木板突然崩裂，下面一阵令人恶心的骚动。从房间另一边的地板的洞里蹿出一只老鼠，嘴里叼了个白东西，不知是什么。

一个住满穆斯林居民的城市，竟然没有五六个虔诚的工匠联合起来，把这个显然被许多荣耀家庭视为信仰中心的地方整修一下，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似在暗示一个丧失精神内核的民族的衰落。我们走出去，透过一扇开启的门看到管理员的家。那是从清真寺的门廊里隔出来的一点空间。想象不出还会有另一间房，比这间房更能清晰地代表一种稳固的文明，它代表的社会认为，生活在洁净和秩序之中令人感到舒适惬意是理所当然的事。房间的板壁纤尘不染；靠墙的长凳是用旧的包装箱做的，上面覆盖的垫子颜色高雅；墙上有几块挂毯，尽管显出缝补和褪色的痕迹，至少透露出精致的东方美学传统。一张嵌入式的小桌上搁着一套锃亮的待客用的咖啡用具，还有一台微型织布机，正织着一条设计细致、图案美妙的亚麻毛巾。“我的上帝，”我丈夫感叹道，“这个国家的任何事都没个准啊。”

这天是赶集日。我们回到比托利时，从山上或是平原来的农民面朝商铺，坐在沿河堤的矮墙上，脚边堆放着他们的农货。起先是男人们坐成一线，摆着一捆捆的洋葱、大蒜，一筐筐的早熟草莓，还有捆绑在一起的母鸡。然后是女人们，带着她们的小货物坐在那里，一盆盆的鸡蛋，小把的菠菜

和一串串深红色的辣椒。阳光从金合欢的枝丫间倾泻而下，在她们白色的头巾上映出耀眼的光斑。有些女人带来的货物实在太细碎了，让人忍不住怀疑她们来到集市上与其说是为了做生意，不如说是为了聊点闲话，这里的流言蜚语和萨拉热窝的一样活跃。我丈夫给她们拍了些照片，然后对付了一只把头搁到他肩上的驴子，她们哈哈大笑，和我们开着玩笑。她们说话很快，接其他人的话题也很快。

我们正在那里逗山羊和羊羔玩儿，一个男人走上前来，穿着一身别扭的西装，用美式英语问我们跑到比托利这样无趣的城市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本来是马其顿人，早年移居到多伦多，在那边当鞋匠，回来只是为了度假。他说这是个上帝看了都要皱眉的地方。我们和他谈起美国，但是熟悉他的说话风格后，我们发现他除了廉价汽车、路边旅馆和无线广播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分地说，这个普通人从相对原始的国家移居美国，既丧失了欧洲文明，也并未被美国文明接纳。他的子孙后代或许会慢慢适应新的传统，但是做出这样转变的男人，说他头脑里是一片文化真空毫不夸张。他离弃了经济地狱，欧洲用经济地狱来惩罚民众，因为他们坚持履行对它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职能，并为之耕作；他升入了心目中的经济天堂，美国用经济天堂来奖励民众，因为他们大量生产不必要的商品，让它负债累累。于是，他的基本需求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满足。他相信自己如愿以偿了，却将自己民族对于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理解抛诸脑后。当然，即便他的移居地是完全远离他的传统的一个欧洲大城市，结果也一样，但他更倾向于去美国。

转变导致的白痴举止在这位西装男身上显露无遗，比如，他对着我们眨了眨眼，把大拇指往肩上一扬，说：“嘿，巴黎展览去？”为了摆脱他，我们离开了牲口市场，挤进一小堆人里。被人群围在中间的是两个坐在桌上的男人，大家都看着一匹白色的驮马被拉来拉去。康斯坦丁说：“那些农民交不起税，他们的东西就被拿到这里来卖掉。”“那样的话，我们买下这匹白马，送还给主人吧。”我丈夫说。康斯坦丁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如果他手里有一大笔财产的话，他更要欣喜若狂了。“真的吗？”他问，“你是真的准备这样做吗？”“是的，我觉得这样做挺合适。”我丈夫说。

康斯坦丁雀跃着穿过人群，大声对官员们呼喊“停下！停下！”，好像他和诗人勃朗宁笔下的德里克和乔治一道，带着好消息从根特策马而来。他给这个场合带来的东西是我们完全给不了的。官员们对他的呼喊做出了回应，满心喜悦地接受了他的好消息。他们弄明白这事得花我丈夫三百第纳尔，大概相当于六美元，然后确定了我丈夫会支付这笔费用，接着，他们向周围的人群宣布了这一消息。人群像在舞台演出一样，面面相觑，比画着表示惊讶的手势。结果，相关的主角却没在场。马主人的朋友们确定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比托利满城奔走，想找个放债人借一些免担保贷款。这

件礼物的细节问题没能得到很快的解决。官员们得拟一份赠予契约，这样我丈夫才能把马归还给它的主人。正当他要签约时，人群那边一阵混乱。我旁边的人们喊道：“他来了！他来了！”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戴了顶圆形的皮帽，身穿黄褐色的土布衣服。但我想他们是搞错了吧，这个人可没有一点喜色，而且他怒不可遏地露着牙齿，举着木棒好像要打那群人的样子，就是刚才言之凿凿自称是马主人朋友的那群人。

“那不是他吧。”我说。但是旁边一个身穿撒克逊蓝毛衫的微胖的年轻人答道：“确实是他，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们是美国人吗？”“不是，”我说，“我们是英国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你们做了件好事，”他做了个总结性发言，“但是我希望你们是美国人，因为我特别喜欢美国。”“我也是，”我说，“你会很快回美国吗？”“不会。”他答道。“我在美国时犯了个大错误。我这里的族人都走私，老爹儿子都干这事。战前我们在黑山和土耳其边界处的里耶卡走私；战争开始后我们就在比托利这里了，因为这里离希腊边境非常近。所以我在美国时以为那里的走私罪和我们这里的一样，错是错，但是不严重。我从加拿大边境用卡车把酒运进美国，那时没觉得有什么。然后有一天子弹打来，我被用担架抬走。但我最不高兴的是，之后我就被驱逐出境了。这可真是不幸，”他接着说，好像在唱民歌似的，“被你热爱的国家驱逐出境。”他满脸绯红，热泪盈眶。我不由自主地同情起他来：“没什么，没什么，我许多朋友也被驱逐了。”当然这并不是真的。

年轻人咽下了他的悲伤后又说：“马主人来了。现在他弄明白了你们做的事，想感谢你们。”“那刚开始他以为我们干了什么？”年轻人解释道：“你们之前看到他时，他正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让你们买下他的马是做了错事，因为每个人看你和你丈夫的衣着都觉得你们是要放高利贷给他。他以为你丈夫是债主，我们这儿有那种人，没有固定住处，在各个市场转，富得流油，把农民都榨干了。他没什么恶意，这样的错误大家可能都会犯。”我丈夫惆怅地说：“我们被当成了流动放债人。亲爱的，你还不着边际地说你有许多朋友被美国驱逐。我想，可能是时候我们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是这会儿马主人正站在我们面前，紧紧地握着我丈夫的手，感激的话语噼里啪啦地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他长着一口又白又长的牙齿，跟狼牙似的。“他在说什么？”我丈夫问，“显然不是塞尔维亚语。也许他是希腊人。”“不是的，他说的不是希腊语，”我说，“他的话很难听懂。听着。”“啊，真的太感谢你们了，”他说着，“这会给我带来好运的，一定会，它也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现在不能让我招待你们喝点儿威士忌吗？不能吗？一杯都不行吗？”那个来自多伦多的鞋匠出现在我的手肘边。“你们真的帮这个男人买回了他的马？”他问，“搞什么名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离开人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管我们要钱，尽管事实证明了我们有慷慨解囊的能力，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们朝着城里往回走，碰巧走到一条支路上，许多妇女，而且只有妇女，在路沿上坐着。“她们是在卖衣服。”我开心地说。的确，卖的是给进城打工的农妇穿的新衣，那些农妇既没有手工纺布，也没有闲暇自己做衣服，又羞于穿西方服饰。当中还有一些旧衣服，上面配有很精美的刺绣，可以拆下来继续用。所有的这些衣服都是标准的斯拉夫款式，白色或是米色的手纺亚麻面料，褶边和衣袖上都有繁复的绣花，领部一圈稍简。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严肃的艺术品，只知道中欧的商业农民艺术的人一定觉得这难以置信。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十字绣上衣，粗制滥造又品位低俗，贵族和文人雅士认为它们俗不可耐，底层百姓觉得它们滑稽可笑。它们受到排斥是因为农民艺术主题博大精深，技法也错综复杂，所要求的深思熟虑要么扎根于农民生活，要么见于潜心钻研的学术圈，而这个圈层的人不太可能去做衣服。妇女们被现代城市生活中这样那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弄得眼花缭乱，或是在现代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辛勤劳作，艰难谋生。她们缺乏体验，无法形成对这些刺绣所蕴含的生活哲学的判断；她们也没有工夫去练习针法，去发现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锦簇花团所体现的造型与色彩原则。类似的退化过程也可以在纽约叮砰巷(注)找到例子，在那里，民歌和抒情诗的主题被一些肤浅的人囫囵吞枣，随即在令人反感的状态下造出画虎类犬的东西。

这些看起来既热忱又可悲的老年妇女也可以满面笑容，以前泛滥的眼泪已将她们的脸浸泡得灵活善变。她们正在售卖的是未遭破坏的商品。所有的绣品都有其内涵。我随手拿起的第一件在褶边处有一道艳丽的小饰线，由光芒四射的许多太阳组成，半英寸宽，其间有树，星星在树顶跳舞。太阳的中心和光束都是黑色的，周围绿色和橙色相间；树呈绿色和蓝色；星星有绿色、蓝色和棕色。这些设计位于一条黑色的缝线上，下边是断断续续的两行各色缝线，然后是一道用锁扣眼的针法缝制的绲边，黑的、深蓝的、浅蓝的、深红的、绿的、紫的，在黑色的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的感觉像是用色彩的创造搅动了一片黑暗。但是小太阳、树和星星却不刻意于创造，似乎妙趣已然横生。这件绣品的意义可不是我们杜撰的，卖绣品的妇女和她的朋友们向我们展示这件绣品时带着会心的笑容，展示另一件——我的第二选择——时却面无表情。在这件绣品上，某位气质独特的妇女摈弃了自己的主意，完全沉浸于对大自然的宏伟延续以及冷酷特质的思考中。她在亚麻织物上绣上了许多黑暗的挺拔的树，点缀着稀疏的花，庇护着可有可无的鸟。其设计风格鲜明，并不以摆陈事实来吸引目光。它的树，体现的正是表达情绪的功能。

我还发现另一件纯抽象的设计品。在坚实的背景下，黑色的条状、块状与紫色的提亮色设计和笔触并未描绘任何自然物，却莫名地唤起某种兴奋感。托尔斯泰到底懂不懂农人，这似乎存在疑问。在他那部愚蠢的作品

《艺术论》中，他坚称农人只欣赏那些灌输道德的图片，比如描绘施舍食物给乞儿的妇女，说只有衣食无忧的人才会去关心那些不带教化目的的艺术。如果他能把他的头伸出窗外看看他自己的村庄，他就会明白——这类绣品带着不同的艺术价值，这样的艺术品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直至东欧都存在——农民群体在现代社会比任何其他阶层都更为庞大，他们一直欣赏并呈献只为悦人的艺术形式。也许托尔斯泰是个坏家伙，他希望艺术只教导他如何行善，而不做他用。农妇们或许可以容许自己享受一些自由纯粹的艺术，因为她们的道德生活已牢牢植根。她们曾被土耳其人如尘土一般践踏，食不果腹，甚至变得凶残暴戾，却不曾忘记宏伟壮丽的概念。这是可贵的道德观念，它暗示着，人类的职责在于制造超越动物性需要的东西，并将它用得绝妙出色。我在这里买了件大概二三十年前的结婚礼服，它是八件衣服的叠加组合，包括一层精美的衬衣，一条褶边和衣袖处的绣花堆砌得让衣服都快穿不上身的亚麻裙，一件带有银线饰边的紫色天鹅绒背心，一片覆盖在子宫位置的亮片装饰物，大概相当于男性遮阴物，以及一层饰以紫色和金色刺绣的网纱。礼服带着拜占庭和塞尔维亚帝国的记忆，它庄严地用亮片装点帝王王后佩戴宝石的位置，它由羊毛、亚麻以及一些可以从流动小贩那里买来的饰物制成，炫目程度略似于拜占庭浮华织锦大放异彩、引人注目的模样。这些地方的民歌在歌唱金银时，并不是带着怀念把它当作财富或可开采的矿产，而是觉得它们可以当作闪亮的饰物。

他们应该记得曾经的荣耀，尽管被迫经历了多年的不光彩生活，但这种记忆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如这片土地对成就的记忆一样。传统并非物质实体，可以独立于人力以外而存活。必须由人力掌握其构造，并对其焰火散发出的温暖给予回应。亚洲的基督教教会几近灭绝，并非由于伊斯兰教强权施威，而是由于教众既算不上对教义兴趣十足的哲学家，也没有在漫长的数以世纪的年月中孤独地爱它，爱到忠贞不渝。但是马其顿人喜欢像拜占庭传教士教他们的那样去爱人；喜欢帝王给他们的教谕——衣着紫色和精致的亚麻服饰会鼓励人类将自己和野兽完全区别开来；也喜欢，甚至是无度地喜欢拜占庭艺术给他们的教导——教他们检视自己所过的生活，对降临的命运加以探询。他们手中还握有针线，于是开始并也最终成功地将自己的强烈喜好浓缩于这些内涵丰富而又抽象的小设计中。

老妇们对我们表现出的热情感到非常高兴。她们当然不清楚自己的绣品对于保留古代文化的意义。一位英国妇女在演奏珀塞尔[注]的奏鸣曲时，也不太会觉得自己是在维护英国的音乐传统。然而妇人们知道，当她们缝纫时，她们是在从事一项特别的工作。曾有一位英国女人，收集了二十年这类绣品，对缝制绣品的人也非常熟悉。她告诉我这是一项秘传的手艺，手艺精湛的匠人不会外泄她们的秘密。许多在设计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其名号和象征意义，陌生人却无从知晓。妇女们有时会拒绝谈论衣服上自己的绣品。出嫁时她们会为自己的新郎制作帽子，这些也是绝对私藏的。实际

上，这也是另一证据，证明历史中的不可能性。不可能有一份清单囊括时代的所有内容，一些最珍贵的东西总被藏于不可触及的地方，在挪移到其他地方时会丧失精髓。因为在新的地方，或许它们会被仔细检视，但它们的所有者对它们的本质无所知晓，它们的秘密终被掩埋。

我挑了几件裙子和外套，把它们搭在我丈夫乐于助人的手臂上，然后继续搜寻其他的。在我们返回酒店的路上，我丈夫都舍不得让我拿走任何一件了。到达桥边时我们停了下来，最后一次看着妇人们坐在白色金合欢树树荫下的美妙轮廓。她们戴着面纱的头上映着斑驳的阳光。我说："我们一定要再回来，一次一次地回来直到老死。""是的，我们确实应该，"我丈夫说，"但先看看眼前吧。"几个农妇停下脚步，翻看他手臂上的衣服，露出赞许之色。"你看，她们肯定觉得我们品味不错。"我丈夫洋洋自得。但是她们开始报出一个总价，先用塞尔维亚语，见我们毫无反应，又用了希腊语和瓦拉几亚语。康斯坦丁刚才还沉浸在先前的买马的愉快中，这会儿更乐开了花。"她们以为你们把衣服搭在手臂上是为了兜售它们呢，"他快活地喊着，"看见没，她们完全不能接受丈夫为妻子拿东西的样子。她们知道的身穿西服却又和农民的东西搅和在一起的人只有生意人，所以她们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英国人，而且很高雅。她们完全没搞清楚。""啊，亲爱的，"我丈夫说，"还没到中午十二点呢，我们已经被误认为是放高利贷的和卖二手衣服的了。当然，我认为你胡诌你的朋友都被美国驱逐的话最有害。他们到底认为我们是什么人啊？在度假的黑帮教父艾尔·卡彭先生和夫人？还好，比托利会将什么事都变得美好。"

路上

有时候，一个国家会把它的秘密向旅行者保留数天，只让他看见它的表面，它的草、它的树、它的房屋外立面，然后突然扔给他一把钥匙，告诉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天下午和傍晚，关于它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马其顿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开敞心扉的状态。我们的受教开始时，康斯坦丁正送格尔达去乘一点钟的火车到斯科普里，她会在那里再待一晚，然后去贝尔格莱德。我们在咖啡馆里度过了最后的半个小时，咖啡馆位于城外一英里左右的小山上，周围长着密密丛丛的金合欢。这天是节假日，在层层叠叠的白色花朵投下的阴凉地上，坐着许多年轻学生，他们刚走出体育馆（英国人和美国人叫作中学的地方），其中一些学生漫不经心地弹着古斯勒琴。然后一个学生见我丈夫的火柴盒掉了，过来帮忙拾起。"你们是德国人吗？"他问道。"不是的，但我会讲德语。"我丈夫回答。"你们是在这里做生意呢，还是游玩？"这个男孩接着问。"游玩的。我妻子一年前来过这里，非常喜欢，于是坚持要带我来。"

男孩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马其顿当然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但是游

客却少得可怜，因为政府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吸引游客。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达尔马提亚，政府把钱都投到那里，什么都没给我们。看看那里的超大宾馆，再看看我们这里的。”“我们觉得这里的也够好了，”我丈夫说，“但作为旅游中心，马其顿怎么都不能够和达尔马提亚竞争，因为到这里太远了。我们英国人一天多一点就能到达亚得里亚海，而到奥赫里德大概得花三天时间。”“他们应该修条路，这样你们就可以从亚得里亚海直接到这里了。”男孩固执地说。“可是从罗马时代到现在从来没有人这么做。”我丈夫说。“为什么现在不能做？”他继续追问。“他们是有些优势的，”我丈夫有些厌倦这个话题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马其顿的路线必须穿过罗马地界，而现在又涉及叫阿尔巴尼亚的另一个国家。还有，他们雇用奴工，所以他们做事更加容易。”

男孩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们只属于保加利亚——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都是保加利亚人——这事就能做，而且可以做得好。”他出神地望着雪山顶，然后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们不属于保加利亚，反倒和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你都想不到这有多让人遗憾。南斯拉夫是个穷国家，保加利亚却非常富。”我丈夫说：“我并不认为保加利亚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南斯拉夫的确不富，但我肯定保加利亚也不比它好。我可是个做银行的，这些我应该清楚。”“但是在保加利亚的人都过得很好，”男孩生着闷气，然后一股新火又在他心里烧起来，“还有，为什么我们想去保加利亚他们却不让！我们在那边都有亲人啊，他们都不让我们去探望我们的亲人。我有个叔叔，在索非亚开了个糖果厂，我想去看看他，他们却不肯给我通行证。”“那么我认为如果不是你想惹麻烦，南斯拉夫政府这么做是很愚蠢的，”我丈夫说，“我知道，在南斯拉夫你会发现很多和你想法一样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有一天他们会帮助你改变现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男孩一脸讥讽，“他们绝不会让我们拥有自由！即便是有一些好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此我都深表怀疑——他们又怎能在贝尔格莱德实现愿望呢？那是座恶心的城市，那里全是茨冈人。如果南斯拉夫是个高尚的国家，它的首都怎么会充满腐朽堕落呢？”

“一个新的国家，”我丈夫说，“也许会有一个腐朽堕落的首都，而自己并不腐朽堕落。美国已经是个伟大高尚的国家了，但它的政客们做尽了贪赃枉法的事，华盛顿也有很多人类似于你说的茨冈人那样的人。那只意味着政治机制不会从天而降，当精英群体被富有冒险性的工作吸引，乐于开发资源时，它才能出现。所以，自然是谄媚的寄生的二流货色先掌控政府。情况会逐渐好转。事实上，只要你和你的朋友们联合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所有在乎高尚和自由的其他人，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已经开始了，”男孩自豪地说，“这些是我的特别的朋友，他们正坐在河岸边，围着弹古斯勒琴的人。我们和奥赫里德、普里莱普、维勒斯的组织保持着通信。当然了，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

“你打算上大学吗？”我丈夫问。“是的，”他说，“我准备明年去德国学工程。德国人是好人，在上次战争中他们是和保加利亚站在一起的。说不定哪天希特勒会再次联合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开战，帮我们夺回自由。那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权利了。你知道吗，这里不允许我们加入共产党。”我丈夫说：“如果你指望希特勒为了帮助你和你的朋友争取加入共产党的权利而打南斯拉夫，恐怕你会非常失望。你说，你们很多人想成为共产党员吗？”“不，”男孩回答，“那个和我们没有关系，这里的事有些不同。我们对事物的根源更感兴趣。我们讨论很多重要的话题，并不受限于父母们的偏见。比如我自己，我坚信耶稣基督不是神，而是哲学家，很伟大的哲学家。实际上我认为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几次停下来，点了点头，面色庄重，拧结的眉毛下一双眼睛望着远处的雪峰。“还有，”他补充道，“我们组织的人不允许我们的姐妹使用任何化妆品。”

我们离开时，他说：“真希望你们见见我母亲，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我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我母亲，我认为家庭感情是老套滑稽的东西。但她为保加利亚所做的爱国行动证明了她的价值。她还是个年轻女孩时，处境非常危险，她去了斯特鲁加。”她属于在奥赫里德给我们展示鸡的那位黄头发妇女的对立派，但我相信她也同样英勇，因为眼前的这个男孩尽管这会儿愣头愣脑的，仍然具备优秀的品质。“你们怎么去斯科普里呢？”男孩问，“经由维勒斯吗？啊，真希望和你们一起去，维勒斯住着一个保加利亚爱国律师。我们在塞尔维亚的报纸上读到过他，报纸无耻地攻击他。以后我们会去看他，尽管之后警察肯定会迫害我们。好了，再见，感谢你们和我谈话。我总是喜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说话，这样可以让我得到提升。”

我们驶出比托利，途经的平原上鲜花盛放，有三叶草、毛茛、高株雏菊，还有一种绣线菊，比我们那儿的纤细些。我们路过一个褐色的池塘，里面挤着数头水牛，它们躺在那里，像是炖汤里的一块块肉。我们还遇见了死神，在他执行一项愚蠢的任务时。马其顿的狗绝大部分属于俊美而且英勇的品种，被喂养得很凶猛，这是有原因的。在恶徒横行的时代，它们白天要保护主人的庄稼和牲口，晚上还要为房屋站岗放哨，以防坏人入室。它们平时很少见到汽车，看到了并不认识，只当作某种罕见又强悍的动物，所以觉得必须像对付其他动物一样，阻止它侵害主人的财产。去普里莱普的路上，我们看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白狗，身上的毛像松狮犬一样卷曲密实。它对我们的车就抱了这样的错误认识，非要勇猛无比地撵着我们狂吠不止。忽然遇到路上一个大坑，车子一个急转弯，冲进了它守护的田地里。它觉得必须履行自己的守护职责，于是扑向车子的引擎盖，就像扑向其他敌手的头一样。只见一个白色的身躯凌空划过，掉落在挺拔的玉米秆间，大概二十码开外。在空中飞过时它只是笨重的一团，掉下去了就好像

从来没有活过一样，令人惋惜。“许多认为自己必须攻打保加利亚人的塞尔维亚人也是这样死的吧，”我丈夫说，“就像许多认为自己必须攻打塞尔维亚人的保加利亚人一样。”

普里莱普就在我们前方的平原上，后面群山绵延，外露的岩石让山看起来像是城堡。我们进城之前把车开到路边给一队头发蓬乱、怒目圆睁的游牧民让道。他们驱赶着负载沉重的驮马，去凯马克莎兰的农舍进行夏季的干酪制造。普里莱普是个宜人的村镇，对抗着外面的炎热和尘土。我们途经集市时，听见有人在叫康斯坦丁的名字，然后看见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西服的人朝我们跑来。“上车吧，我的朋友，”康斯坦丁说，“我把这几个英国人送到马可王子修道院，回来时再把你送回这里。”这个人好像是管理镇上教育的塞尔维亚官员，是我见过的人中牢骚最多的一个。他一坐到康斯坦丁旁边，各种抱怨便喷射而出，可不是一点涓涓细流，而是滔滔不绝的江水，在沉重的压力下迸发，简直要在公园里修座大的喷泉池才能装得下。“他没完了，”我丈夫说，“他马上得哭了吧。到底怎么了？”“他在讲行政管理上的难事。”康斯坦丁草草地回答，有些遮掩。我们下车时可怜的男人仍在诉说。我们沿着陡直的斜坡向马可王子修道院走去。我丈夫说：“真希望能了解他的忧虑，他长着一张善良、固执而又真诚的脸。”“他肯定还喋喋不休呢，”我说，“说话那速度，连康斯坦丁也半天插不进一句嘴。这算是项纪录吗？”“上帝啊，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丈夫问。“听着，听着，太奇特了。”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男人已经站在教堂前的平台边上，面对着烈日下的平原、群山、天空这幅巨大的全景，感觉比它们哪个都热。他朝某个假想的憎恨对象挥舞着拳头。“是的，”我说，“完全正确。他似乎在说‘巴克斯顿勋爵！巴克斯顿勋爵！’，现在我明白了。巴克斯顿是支持保加利亚的，这个可怜的男人是塞尔维亚官员，在抱怨这里的保加利亚人不理解他的付出，抱怨他们受了外国人的煽动，不服从管理。”

我丈夫擦了擦他的眼镜，又看了看紧身黑衣男。“这太荒唐了，”他说，“他正是巴克斯顿喜欢的那类人，善良、高尚，一本正经的。”我故意刺激了一下康斯坦丁：“保加利亚人对你的朋友做了什么？巴克斯顿勋爵又怎么卷进来了？”他尖声答道：“巴克斯顿勋爵来过这里，带着个和他一样蠢的秘书。他们来这里只看保加利亚让他们看的，完全不理会南斯拉夫所做的。你知道，南斯拉夫做得很好，非常好。他完全不能想象像格拉德斯通先生那样的英国人，为什么会在运动中站在意大利人——还有那个恶魔墨索里尼——资助的那一方。他们说我们顽固地对抗他们，我们一度这样，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对我们不好，让我们身处险境，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没有他们在，年轻人在教室里吐痰他也不能施以惩罚，还威胁着要去见巴克斯顿勋爵，怎么样。”“自由派领袖巴克斯顿勋爵要是知道自己被看作法西斯同谋，而且成了随地吐痰的保护伞，会惊呆的吧，”我丈夫说，“显然这个人说的都是真的！生活中总有些混沌无解、令人失望

的东西。”这时，紧身黑衣男仿佛记起了我们的存在，猛然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他指着一个拱门，激情澎湃地对康斯坦丁说着什么，目光在我们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康斯坦丁说：“我朋友希望你们注意到，保加利亚人怎样在战时把保加利亚的颜色涂上了拱门，尽管这是马可王子修道院，属于塞尔维亚纪念物。还有，他希望我指给你们看，他们怎样在塞尔维亚壁画和雕刻上乱涂乱画。”“老天，”我丈夫说，“这就像我们还在纠缠玫瑰战争的事一样。但我想，如果我们自那时候起被奴役，现在重新开始生活，我们也会无法释怀。不过，这仍然是个烦人的话题。”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基于历史原因产生的所有争端都真实存在。双方不管是老教授还是街上闲人，起初都有一个荒谬的想法，即当土耳其人被赶出巴尔干半岛时，曾经认可的边界应当重新划分，尽管已过了五个世纪。但是他们又不遵守边界划分。双方的极端分子所要求的边界，是他们的族人在疆域拓展的鼎盛时期才触及的，后来不能有力防守，自然也就退离了。保加利亚人理想中的保加利亚，通过1878年俄国起草的《圣斯特法诺条约》几乎得到了实现。而事实上，这样的保加利亚只在沙皇西美昂一世和沙皇塞缪尔时期存在。西美昂一世在公元10世纪去世，而塞缪尔死于一百年之后。塞尔维亚人把他们的沙皇杜尚不仅视作精神引领者，也视作版图展拓者，这同样令人烦恼。因为他的帝国在三十五年之后，在他本人的死亡和科索沃战败之间，就已分崩离析了。决定巴尔干边界划分的唯一因素应是各民族的自治权，以及他们应该遵从的对这种权利的改进，这样才能保持半岛的独立完整，免遭强大的敌对势力干涉。但历史满足了斯拉夫人的学究派倾向，所以他们仍执着于历史。

我那时又被其他的事分神，忘记了紧身黑衣男，因为院长和两名修士走出修道院来迎接我们了。院长是优秀的塞尔维亚先驱类型，来到马其顿从事教会、医学和教育工作。他热情洋溢地和我们打招呼，我想可能并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因为我俩并不是修士。他们是俄罗斯人，表现出深度的遁世状态，这是南斯拉夫的白人流亡者的特点，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在奈热西看到的一个来自芬兰的小修士倒是例外。他们远离世俗，只是因其实在过于浅薄，甚至连事物表层都无法触及。他们的神情似在告诉人们，他们留在这里，是因为错过了世间所有的火车。院长把我们领进供客人休闲的陈列室，端出水果甜酱。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样东西，竟解开了困扰我多时的一个谜。这个谜是关于马可王子这个人物的。他是许多民歌传颂的塞尔维亚英雄。历史上确有其人，14世纪塞尔维亚国王的儿子，他也是普里莱普王子。但他是个传奇，也是外向性格的代表，因而很受性格在外向内向间摇摆的人的青睐，他们明白哪一端更令人愉悦。他魁伟彪悍，手持一根狼牙棒，由六十磅铁、三十磅银和九磅金铸成。他的坐骑花斑马，迅疾如风且通晓人言；马鞍一侧系着狼牙棒，另一侧的皮囊里装着重量相当的红酒。马可嗜酒善饮，量如江海，千杯不醉。他骁勇善战，且有

一颗剑胆琴心。他杀掉阿尔巴尼亚反叛分子穆萨·阿巴纳萨时，挥泪哀叹：“啊！愿主宽恕！我杀掉了远强于我的勇士！”他带着砍下的头颅骑马回到君士坦丁堡，把头颅掷于苏丹脚下。苏丹吓了一跳，连连后退。马可喊道：“穆萨死了，你们看到他的头还往后逃，如果他活着，你们遇到他了会怎样呢？”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是为苏丹杀的穆萨·阿巴纳萨。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反映。马可被土耳其人击败，尽管他还保留着普里莱普王子的头衔，但普里莱普其实已是苏丹的属地，因此他有义务参与对基督徒的战争。对于战争，他没有全力以赴，而是内心凄然，颇多顾虑。据说，他在1399年罗马尼亚的罗温战役前说：“祈求上帝将胜利赐予基督徒，哪怕我将付出鲜血作为代价。”他的祈求得到了回应。也有一种同样令人信服的说法：一日清晨，他骑着花斑马沿路前行，马忽然失蹄落泪，他正琢磨着这是什么征兆，一位仙女——曾是他家领养的姐姐——向他宣告，他高龄三百，大限已至。于是他杀掉了陪伴了他一百六十年、早已难舍难分的花斑马，给予厚葬。然后他将狼牙棒掷过群山，直至大海，并且高声说，狼牙棒从海底升起之时便是自己重返世界之日，说完躺在青青草地上，让自己经历了文献记载中最愉悦的死亡。

关于他的死亡的两个版本间的差异，也同样存在于关于他的生活的各个版本间。这种差异的产生，不是由于一个版本是由忠实于事实的人所写，而另一个版本的作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善用想象，意在编造故事，倒像是他们所写的是性格迥异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首民谣写他利用了他父亲的祸事，拒绝为父亲提供伪证，没有支持父亲关于沙皇史蒂芬·杜尚将帝国留给他的宣称。在另一首民谣里，他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囚禁他的人是撒拉逊亲王。她向亲王的女儿承诺娶她，条件是她盗取她父亲的钥匙然后放他出去。于是他重获自由。但在去往基督教辖区的路上，他意识到自己没法信守承诺，她的样貌实在是太黑太怪异了，所以他杀掉了她。“真是糟糕”，他带着些许诚挚，但对自己遗忘的能力还是颇有信心。这些诗里展现出两种个性，一种包含着敏感的良知，另一种则没有。

在陈列室里我看到一幅嵌在墙上的雕像，雕的是一个快活的胖子，一丝不挂地骑在一匹大马上。我问：“这是哪里来的？”院长答道：“这是原来的教堂的一部分，正好建于马可王子时代之前，18世纪旧的教堂被拆掉，人们在原址上新建了眼前这座，他们就把它放在了现在这里，它和以前那座教堂差不多是同时存在的。但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把它放在这座里，因为这个小人是基督教之前的时代里人们信奉的神。”的确如此。这是色雷斯骑士，是整个古代色雷斯和马其顿都信奉的神，一些人认为这是色雷斯国王瑞索斯的形象，荷马笔下的英雄。他的寿命很长，有色雷斯族源的罗马军团仍然信奉他，军团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他的圣坛，包括罗马。布达佩斯博

物馆也有几尊他的塑像。马可王子之谜得到了解答。有两种类似的解答过程，得出一个综合结果。在普里莱普存在对色雷斯骑士的崇拜，受基督教所迫，这只能暗中进行，但它一直存在于民众心中，饱受生活折磨的民众喜欢去想象自在的神祇，想象他们的幸福永恒、无忧无痛。甚至在马可王子被贬为封臣时，民众也不曾遗忘他。身受土耳其人奴役的人们向往这位善于反省的基督教王子较为怀柔的统治。于是两者在人们的意识中融为一体，快乐的神仙，悲伤的凡人，民谣中的想象在矛盾的纠缠中呼应着这样两种形象。

下山时紧身黑衣男跑在我们前面，要带我们看有塞尔维亚国王肖像的崖壁，那壁画已被保加利亚人损毁。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下方，德拉古廷站在车旁，神情黯然。“他心情不好，”康斯坦丁说，“我们会发现，他是在和动物的某种搏斗中吃了败仗。”我们走近他时，他闷闷不乐地告诉我们，他看到石堆中有条巨蛇，但让它溜走了。一路上他都恹恹的，直到我们到达一座叫巴布纳的山。山上长满了矮山毛榉，曾经是叛军的藏身之地。第一批波格米尔教徒，摩尼教的异教徒，长期以此地为庇护所，连这里的地名都是他们起的，因此那时候他们也被称作“巴布尼”。整个土耳其占领时期，黑盗客和非正规军也躲在这里。“反政府军给这个地方命的名，”康斯坦丁说，“它也把它的名字给了其中一位最了不起的反政府军首领。我们所有致力于解放马其顿的塞尔维亚非正规军士兵都使用化名，以便有时候他们的亲属在土耳其境内活动。他们中最具天赋的那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栖身于此，于是自称为‘巴布恩斯基’。”德拉古廷听到这个名字后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吼叫，以示敬意。

在我们四周，马其顿展现出我心目中的绝美景致，尽管许多旅行者把它描述为死气沉沉。它的确草木稀疏，仅有山谷里装点了几棵树，也不太有河流经过，但它仿佛是精雕细琢的作品。人们在此间穿行，会形成对恢宏气势的纯净领悟。有时候途经一片片罂粟地，看着肥厚的绿色茎叶、或纯白或清紫的花朵，感受到的是它们冷静、壮丽、积极的美。有时候途经像马赛克一样的水域，其间以精致的泥线分割，一方方最生动鲜活的绿色喷薄而出，仿佛响起高音阶的升F调。德拉古廷冲着它们晃动着拳头。“是水稻，”康斯坦丁说，“政府禁止种植水稻，说会引起可怕的疟疾。但我们不能不种。人们太穷了，稻谷带来的收益比其他都好。”那天傍晚时分，我的鼻子享受到了人生第二大欢愉。排名第一的是那次夜里路过法国南部的酒庄，农夫们把压平的牛皮酒袋放在城外的地里沤肥，微醺的乙醚在温暖的夜晚升腾起来，浓郁又柔和，比任何美酒都更加醉人。在这里，在马其顿，我开始明白蜂蜜并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无所不能；蜜蜂从来就不清楚它到底想干什么；香水调配师很笨拙，他们不会打碎一触即溃的束缚，去获得自己一直觊觎的东西。其实，他们只需要走近一座到处是小花园的土耳其风格小镇。金合欢树享受了多时的日照以后，空气中弥漫的简直不仅

是嗅觉感知的芬芳，更是浸染味觉的风味，馥郁的花香浓浓地凝在空气里。

我们正去往维勒斯，许多人在去雅典的路上会驻足欣赏这座小镇：荒废的土耳其式建筑仍显出昔日的精致，带着高雅的漆色，伫立于奔腾的瓦达尔河两岸的峡谷绝壁之上。我们一路喧闹着，挤过狭小的街道，到达小镇高地。这里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便，在他们看来，我们做的事倒是充满勇气。他们对着我们微笑，仿佛我们是神气活现的冒险骑士。我们来到坡地上的大教堂里，它所处的地势如此之高，山下的小镇已经笼罩在暮色中时它还享受着朗朗日光。环绕着它的是草坪、石阶和广袤的平地，从泉眼流来的溪水滋养着这片土地。它和斯科普里的大教堂一样有些奇怪，外形处理上手艺娴熟而理解不足。事实上，它也是那四兄弟修建的。这里的意大利哥特式半圆后殿显露出他们潜意识里对技艺的掌控。这种风格来自他们在意大利当石匠时所见的建筑。他们并不清楚这些形式和其遥远的起源之间的关联，也错失了形式下的核心本质。它的壮美显得盲目。教堂内部充满了违和感，这些不协调的元素并非建筑学意义上的，而是宗教和文化上的。这里的布道坛也像清真寺的宣教台，神父必须爬上陡直的阶梯，在伸手可触梁的高处向下面的教众宣讲。这里的旁听席特别宽敞，完全是伊斯兰风格，里面还有为女士而设的独立分堂，以及为社交活动而备的大桌子长凳子。这个地方的比例也错得离谱。建筑师们相信修建教堂时，相对于地基大幅度增加其主体高度并不会让它显得腿长失衡，反倒有磅礴的气势。但是错也错得华丽，他们对石头的处理，尤其是对大理石的处理，让人理解了土耳其人在斯拉夫对象面前感到的恐惧，恐惧促使土耳其人永不停歇地用饥荒和屠杀来打压他们。

金色的午后，两位神父向我们走来，他们衣着整洁、相貌英俊，站在草坪上招呼我们。其中一位说：“很高兴你们来参观我们的教堂，一般没人来看。当然它是非常漂亮的，看起来也很堂皇，不输比托利的教堂。维勒斯没有比托利那么富，但镇上的所有基督教教友拿出了他们的全部，包括周围几里地上住的所有基督教教友。”另一位说：“土耳其人认为他们迫使我们的神父在城外建教堂是侮辱了我们，其实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有了维勒斯最美的选址，所有的清真寺都在我们脚下了。”“请坐，”他说，“我给你们端点水果甜酱来。这个泉眼流出的是最美的水，冰澈、生动，像活物一样。”我们饮水时他们在我们身旁坐下来，接着说：“这里还有一座珍贵的坟墓。你们见到了吗？就是这里，鹅卵石堆旁边的白色大理石石碑。人们在非周末时段来这里才看得到墓地，他们经常没有参观我们的教堂就回去了。但他们来向这块神圣的石头表达敬意，我们仍然很高兴。”“是谁的墓？”“巴布恩斯基，反政府军首领。”

“巴布恩斯基！”康斯坦丁吸了口气。我们跟着他走下鹅卵石时德拉古廷就

在那里，站在泉眼旁边，和他的水神神交。康斯坦丁问他："你知道巴布恩斯基就葬在这里吗？"德拉古廷答道："我没参加他的葬礼吗？"我们都立在墓碑前，上面写着"巴布恩斯基（1878—1920）长眠于此"。"在他去世前不久我见过他，"康斯坦丁说，"他看起来显老多了。""是的，"年长的那位神父说，"他年轻时我和他比较熟，你说得对。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多少日子里他没饭吃，只靠灌木丛里的浆果充饥。他遍体鳞伤，经常活在恐惧中。我们的塞尔维亚兄弟为我们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马其顿获得自由。"

我们的车在维勒斯出了故障，德拉古廷不得不花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修理机器内部。康斯坦丁倒在后座上睡着了，我丈夫和我在薄暮笼罩的镇上闲逛。小镇刚从白天的曝晒中复苏，还没开始工作，只伸展了一下肢体，却意识到不久它又将睡去。我们在一些小店前晃悠，所谓的小店是一些用细小木框搭建的小洞穴，有一点点存货，加起来大概是一百个罐子，或是二十卷布匹，或是几盆酸奶和米粥。我们转过角落进入正街，这里的商店更大一些，商品也更西化一些。我注意到其中几家并不是商店，而是律所。这里有药剂师、律师、布商。"如果我们发现查理·罗素，或者威廉·乔伊特伯爵[注]，在赫佩尔和仰光的海滩酒店里的缅甸红宝石公司间走动，倒也是蛮有趣的事。"我说。我们站了一会儿，看着其中一位律师送他的客户出门，起先是出于好奇，然后便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位律师举止文雅，带着一种贵族气质。他总是过于忧郁，他的忧虑是为他人而生的，而对他自己，他表现出的是温和而高尚的淡然。客人离开后他独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眼望着暗处，仿佛知道黑暗终将吞噬一切，却只显出一点淡淡的忧伤。

他关玻璃门时我看见了他标牌上的名字，我抓着我丈夫的衣袖："快看！快看！"我喊道："这就是那个比托利的男孩跟我们说过的在维勒斯的保加利亚爱国律师！我们去和他谈谈，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他肯定会说法语或德语。这会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这里是保加利亚动乱的中心。"我们走进律所时，律师带着从容不迫的警觉看着我们，然后打发走房间里的用人，让她去给我们端清咖啡。她一离开，我丈夫就解释了我们的来意。"那男孩说你为保加利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丈夫继续说道，"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希望来看看你。"律师微笑着。"他是个好孩子，我想，"他说，"勇敢，也很有心。""是的。"我们回答。"你们的话让我想流泪，"他缓缓地用老式的法语说，这腔调正是他温和而精细的个性的最合适的媒介，"是的，我想哭。你们瞧，我并不是保加利亚爱国者，我甚至都不是保加利亚人。我确信这一点。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看见我父亲，这里和普里莱普之间某个村里的塞族小学校长，被保加利亚人谋杀，因为他不属于他们的血统。"

他忧虑地做了个表示反对的手势。“但我尽力只把这记忆为一桩痛苦而不是错误的事。因为我必须承认，如果他是位保加利亚校长，也很可能被塞尔维亚人谋杀。我尽力认为我父亲是去世而不是被杀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时候停止去想我们到底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这类小事了。我相信我们更应该以新的严肃态度意识到我们同是人类，每个人都像需要呼吸的空气和吃的食物一样需要自由和正义。事实上，我是现任南斯拉夫政府的反对者。我完全不算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的朋友。带你们来我这儿的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官方报道为了败坏我的名声，编造故事说我是损毁塞尔维亚利益的保加利亚人，没有比这更阴暗的谎言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似乎想到了将马可王子和瑞索斯联合起来的某个过程。“不过也别太烦心了，”他真诚地说，“这个谎言现在带来了你们的到访，对我来说是桩乐事，这么看来它也有不错的一面。你们要不要喝点咖啡，感受一下土耳其式愉悦？”

---

1. “叮砰巷”（Tin Pan Alley），本为地名，位于纽约第28街。19世纪末起，该地集中了多家音乐出版公司，遂被戏称为“叮砰巷”。这里不仅是流行音乐出版中心，更是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风格的代表。
2. 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l, 1659—1695），英国作曲家，其歌剧《狄朵与埃涅阿斯》被誉为最伟大的英语歌剧。
3. 威廉·艾伦·乔伊特（William Allen Jowitt, 1885—1957），英国工党政治家、律师。

斯科普里

格尔达来和我们说再见，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真的就是她对我们说的全部内容。她伸出手，说了“再见”两字。简短的表达完全忽略了在过去的两周我们把她当客人招待的事实。我觉得她可能会说点什么，因为头天晚上吃饭时她兴致挺高，对我耍起横来技艺尤其精湛，把刻薄当成万能的大棒。康斯坦丁送她上前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时我们坐在宾馆外喝着冰啤酒，感觉筋疲力尽，但心满意足，就像发烧的病人烧退了一样。我丈夫在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那里买了些绣球花，把它们摆在桌上，对着它们沉思良久，然后说：

“格尔达没有过程的概念，这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她想获得结果而不去经历指向结果的过程。她想享受妻子的地位，却不愿费事地去经营一段真正的婚姻。她没有去欣赏她丈夫的优良品质，没有以忠诚和审慎的态度去对待他的负面素质，也没有敬奉他的神，因为那不是她的。她想享受母亲的身份，却没有照顾她的孩子们，没有教他们礼仪，也没有为他们营造一个平和的氛围。她想做我们的朋友，和我们拉近关系，让我们邀她一道周游全国，但她舍不得费一点心来喜欢我们，甚至连她对我们的不喜欢都懒得掩藏。你是个名作家，但只要人们对你表示一点尊敬她都会愤愤不平，她觉得她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尊敬，尽管她从没写过什么东西。我们有钱她也难受，她觉得钱也应该属于她。她不会去想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在伦敦金融城、我家族在缅甸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对她来说，最好只要动动手指，钱就轻轻松松地奔着她而来，就像在箱子上贴个标签那么容易。她完全不知道什么可以给人带来爱、友情、荣誉、财富。她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不劳而获，宇宙里什么都是随机的。最好不公的事再多发生一点，所有的好处都从别人那儿被拿走，让别人一无所有，然后转给她，一切都归她。基于‘宇宙纯粹是任意的’这个前提，因果关系完全不起作用，她的想法也就不荒谬了。

“这就是征服者的逻辑。土耳其在所有的侵略期间都持这样的观点。和格尔达不一样的人在格尔达看来都是‘异端狗’，对待他们应该毫不留情。如果她可以通过杀掉我们得到我们的钱财，而且不会受到惩罚，我想她会这么做的，并不是因为残酷，而是因为茫然。因为她拒绝现实过程，她只会设想，我们死亡的结果对她而言是大大的便利，她不会考虑我们死亡的过程，这对她而言是大大的不便。她已将自己置身于仁慈之外了，因为痛苦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在她和心灵敏感的人发生冲突时，这让她占尽上风。她的天性给她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许多比她好的女人所不具备的。康斯坦丁作为丈夫，对她一腔挚诚，就因为她对他来说是个坏妻子。

他所有的人性会说：‘如果她轻视我，也许是因为我有不足？’而他所有的情感会说：‘既然她充满渴求，我能给予她什么呢？’不用说，她的孩子们对她也很尽心，孩子们总有冲动，做他们父母不做的事。如果父母屈从于孩子们，孩子们就不爱搭理父母；如果父母不爱搭理孩子们，那孩子们就会屈从于父母。

“在更广的社会关系里她也如鱼得水。首先，和她不一样的人没有谁能相信她有多坏。我们起先也不相信，如果我们把旅途中她对待我们的态度，以人们通常用来讲故事的那种集中的方式讲述给别人听，我们只会看见人家一脸怀疑。人家会暗自想，‘他们肯定得罪了她’，或者‘他们不会得体地招待她’。她不请自来，然后不停地让我们难堪，这种事情很难被人们的意识接受。如果意识许可了这样的行为，人性便显得毫无希望了。即便我们能证明故事的真实性，人们也会寻些借口为她开脱，辩称她是来到陌生土地的外国人，一个女孩子经历了战争会变得有些神经质，或是《凡尔赛条约》让她有了复杂的自卑情结。

“这些也许是事实，但是对它们的认可很危险，这也是事实。因为这会削弱对格尔达的抵制。只有把她当作存在的终极、唯一的威胁，才可能免受其害。看看我们是怎样被她打败的。到过的国家里你最喜欢马其顿，圣南姆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你想带我去看看，所以我们走了那趟行程。可是我们却带着我们的敌人。她用恶劣的行为折磨我们不说，还用这样的行为去对待其他我们喜欢的人。这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变得灰暗，激怒了我们，也削弱了我们。当康斯坦丁对我们说‘我妻子想和我们一道来马其顿’时，我们不应该只说‘我们觉得那样不太方便，最好她不要来’，我们应该说‘我们非常不喜欢你妻子，我们不喜欢她对你和南斯拉夫的负面言辞，所以我们不和她同行，如果她上了火车，我们就带上行李下车’。可是我们没能这么说。我们不信她会一直坏下去。我们同情她，一个爱国的德国人却不得不住在巴尔干地区。我们从小就被刻意训练，不能公然表达对他人的憎恶。于是，她得到了她想要的。这种情形仍将持续。别以为她去贝尔格莱德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她去佩奇，她去的原因仅仅是她觉得去她的孩子们那里更开心而已。

“格尔达，事实上是势不可挡的。所以特别重要的是计算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格尔达，他们会不会因为什么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当然，她也不是典型的德国人。想想看古斯塔夫、乔治、布里吉特，还有某某一家！他们哪怕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做不出她做的事。但也许你能想到一些像她一样的英国人。”“我们学校有个体操老师，和她一样漠视他人，充满攻击性。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同学家里喝茶，她家人看起来好像也这样，”我说，“我遇到过一些像这样的美国人，在家里那边，某女士、某女士和某太太在我看来也类似，只是略多一点掩饰技巧。”“我认识一个犹太人属于

这种类型，”我丈夫说，“其实这种类型到处都有，只是在一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为集中一些。在我看来，符合两个条件的人会出现这情况。第一个条件是他们无视过程的重要性。他们忘了所有非天然的东西都带有人工过程，而人工过程是痛苦而艰难的。他们看着一条面包，意识不到在麦子长成、磨坊研磨、烤炉烘烤之前，必须经历持久的忍耐和对智慧、技艺的考验。这条件可能由几个原因促成：一个是成功的帝国主义，征服者有被征服对象来从麦穗开始为他们做好面包；另一个是现代机械文明，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生活在人造的城市里，面对包装在玻璃纸里送到他们面前的面包，看不到它的来源，就像看不到朋友家小孩的孕育和出生一样。另一个条件是人们了解到，如果过程导致的结果没有了，这十分可怕。这是他们的全部所知。他们害怕人造的一切都会消失，然后自己被扔回天然世界，想到没有完好地包在玻璃纸里的面包的日子，他们浑身颤抖，觉得不得不靠吃草度日了。

“现在就土耳其人来说，当他们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公害时，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起先他们的战争不是由宗教狂热或奴役他国人民的贪欲激起的，他们有足够正当的理由——为了政治经济安全。只是当穆罕默德二世、塞利姆和苏莱曼一世屡屡在战场上得利后，他们才变得残酷、暴虐。俄国崛起以及中欧和威尼斯的反抗胜利让他们担心失去胜利的果实。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在和平时期实现繁荣的艺术，他们算不上经济生产力强盛。说来也奇怪，德国尽管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也算不上。格尔达属于在城市长大的中产阶级。她的家人都是专业人士，她因此很自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是她不用烘烤面包。她喜欢在店里买蛋糕。她对自己的社会价值评价，取决于她能够放下钱购买由过程产生的结果，而不必亲自参与过程。她非常担心她不能够继续这样做，她的担心来自战争，更来自经济萧条。她从没意识到她和她的同类应该做的是重新规划国家生活，直到出现某种保障，让一定量的人造商品可以属于所有人。她也没意识到她最好学会烤面包而不是买面包。因为她将自己的社会价值基于她可以不必这样做，于是要她这样做在她看来无异于判她死刑。于是，她想夺走属于他人的结果，她敲骨吸髓，想拿走所有其他人的面包。

“这些条件适用于全世界太多人了，所以我不能把格尔达视为一种孤立案例。她是个国际现象。但同样，我想有些地区可能集中出现大量格尔达，使其成为一种全国现象。她大概在中欧广泛存在，于是中欧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侵略势力。她毕竟是整个19世纪奥匈帝国的决定性因素。寄生城市维也纳，就靠着奥地利、匈牙利贵族从农民阶层榨取的财富来养活自己，见到一点经济不安全的信号就吓得六神无主，不断哀号，索要他人的面包。想想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求先于捷克人享受求职优待，要求进入政府行政部门时不用像捷克人那样通过困难的考试。像俾斯麦那么骄傲的德国人肯定不齿于这种行为，他是个贵族，练达老成，接受生命的一切，勇敢

无畏，懂得自己的角色，也懂得农民的。但格尔达会认为，动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不得不承认，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整个世界可能就是格尔达的了。她会从那些教养太好、同情心太盛的人手里夺走它，而那些人只会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防卫。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她不会有能力保住它。她对过程的蔑视使她不能够执行任何过程。你记得在贝尔格莱德车站我们见到她时，她是怎样对你手里的书——《治疗仪式》——发表评论的。她说的完全是废话，她都没读过那本书，她想象着仅凭她知道有这么本书就可以评头论足。在奥赫里德你见到的，她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不知它和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区别，尽管她自己还曾经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她显然从没想过要花功夫去了解她加入的教堂所传播的教义，她加入仅仅是因为教堂够大，在她之前加入的人够多。征服一个国家可以用这样的原则：开飞机扔炸弹是已经总结出的复杂过程的最简单应用。但你不能依据这样的原则去管理国家。你还记得查理·艾略特爵士在他的《土耳其在欧洲》（*Turkey in Europe*）里所写的奥斯曼帝国的异常空虚吗？这就是土耳其的军事天才们在全盛时期所获得的实质，其残余势力保存了这种实质，其内涵里没有任何程度的复杂或困难过程。在战争中他们有其优势，艾略特说这种优势是‘对于纪律和命令的特殊本能，不幸的是，它与治国之术毫无关联，但确实能让每个人对他的军事或官方上级绝对服从’。面对余生，他们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怎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延续性，只能让自己接受失败。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家里过得舒适：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抵御冬天的严寒。他们喜欢乡村，喜欢农业生活，但他们只在肥沃得几乎不需要劳作的土地上劳作。他们的商业、金融、管理不得不由外国人来运作；他们的许多将军和上将是意大利人、波兰人，或其他的欧洲反叛者；他们最能干的高官中许多是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他们没有发展过什么经济项目，从他人手里无偿没收财产除外。土耳其人也不认为在土地上劳作、经营商业、节约使用本国资源的国家是在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获得所希望的结果。艾略特怎么说来着？‘土耳其认为自己是魔术师，根据不同的情形能变出各种有用的、好玩的或者危险的戏法。但是对所有的基督教世界而言，它带着一种蛮横无理的藐视——藐视之剑会砍向所有能砍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格尔达们造成的状态会让人堕入这样的态度。问题是，被格尔达的状态所征服的这部分世界，忍受其无能、低效能有多久。提醒一下，这低效可不仅仅是我的预测，事实上它已经出现了。想想战争以来奥地利和德国银行业的灾难史吧，它只能解释为和格尔达同类的银行家们，完全不能意识到银行业是一个过程，以及他们始终都应关注因果规律。是的，奥斯曼帝国尽管无能、低效，仍然在进攻欧洲后存续了五百多年。但它有一些格尔达帝国不具备的优势。它有伊斯兰教作为后盾，这是个有七百年历史的宗教，黩武思想不仅在其眼中合理，而且

可作为它的身份标识。现在格尔达却不能用基督教来统一各民族，因为基督教的内质是反对侵略、崇尚仁慈的。也许她可以另立门户，发明一种非基督教的新宗教，但不能将其融入现在的民众的血液。年轻人也许会在家里缝纫机上竖起神像，过两天就喊着神的名字匆忙上阵，但战事恶化，年轻人死去，神像不会给予哀悼者任何慰藉。

“土耳其人还有一个优势，他们面对的是斯拉夫人。这个民族在近三个世纪才断断续续了解了秩序、和平、团结，他们的宗教与伊斯兰教不同，与其说是联合了它的追随者，不如说分裂了他们。首先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然后是几大强权的宗派分歧。格尔达也不会有这个优势。现今欧洲每个人都直接地或是间接地了解到和平和秩序带来的福祉，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团结至少是一项有用的手段。如果说新教因为让宗教等同于某种有限类型的道德力量而显出弊端的话，它把基督教教义输入黑人白人的大脑可算是做了大好事。它告诉我们如果背弃这些教义生活会失去什么。请记住，让格尔达的帝国存在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土耳其在欧洲的存在对英国来说是有益的。英国希望地中海的那一端有个弱势力量，能够对怀有不当野心的强国形成阻碍。它阻挡了奥地利帝国通向黑海的路途，也打破了沙俄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以及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但格尔达的帝国可抵挡不了这些，它只会成为人们恐惧的对象，别无其他。

“因此，我相信格尔达的帝国不会长久。但它一旦存续就很可怕，即便消失了，留下的东西也很可怕。我们只能指望不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通过暴政的存在和欧洲传统的断裂来进行一系列领导权争夺战，直到国家重现，文明重现。这个过程是缓慢而且痛苦的。难怪你来到马其顿会感到如此着迷，你是在魔法水晶中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哦，我并不想夸张。也许格尔达进攻非格尔达群体的悲剧不会完全上演，也许形势下潜在的罪恶只有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会成为现实。但是土耳其人就在这里，格尔达就在这里，欧洲就是她灵魂里的马其顿。如果欧洲人没有马其顿农民的美德，我们已小命不保了，我们就是玫瑰枝上的蚜虫，必须被除掉扔到垃圾堆。我们是谁，或者做了什么，并无意义。我们所有的先辈是谁，或者做了什么，也无意义。除非我们天生等同于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山区和比托利的农妇，她们的手指从不曾忘记古代文化所创制的图案，那象征着对生与死的理解。”

我丈夫说这些话时，我们喝了啤酒，沿着堤坝散了步，看着运货的马车夫把他的马牵到低处河流的中游；我们吃了辣椒炖菜和酸奶酪当午餐；后来在我们卧室，当我坐在窗边缝补衣服时他也在继续，这些衣服刚刚由一个穿橘黄和深蓝色衣服的吉卜赛洗衣工送回来。我们在养精蓄锐。明天是圣乔治日，晚上我们要开车出门。同行的是我们的一些塞尔维亚朋友，其中有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妻子，一个诺维萨德来的塞尔维亚人，以及穆

罕默德和米丽察。我们去观看节日前夜村子里举行的仪式。所有的仪式都是为了祈求生育，用神力治疗和对抗马其顿境内的不孕不育诅咒。这些病症部分源于疟疾，部分源于妇女的过度劳作以及对怀孕妇女疏于照料。康斯坦丁没有去，他得和城里一位政府官员一道吃饭。我们之前对那个夜晚的情形全无概念，它就像一幅深蓝色的幕布悬于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幕布揭开时会有美妙的图景呈现出来。对我丈夫的话，我隐约感觉有点不快。我抗议道："真受不了，听起来好像事情还没理顺我就死掉了。"我丈夫答道："事情没理顺前你当然死掉了！你得有充分的意识，否则你肯定会不开心，甚至痛苦。""当然了，我们死之前能不能心满意足地看到公平正义的世界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我低声咕哝着，伸手在针线篮里摸索深米色的织补丝线，然后我一下子笑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两人都怀揣着一点傻乎乎的光明希望，"过五年一切都好了……噢，那过十年吧……"

敲门的声音传来，康斯坦丁走进房间。他看上去很疲劳，但神情放松。"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他说着，看了看过道，"是格雷琴那种类型的。如果格雷琴·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在井边遇见，而出现了个有经验的服务员，《浮士德》又会有怎样的区别呢？""哦，这可能就是这部剧所缺少的东西了，"我说，我有点喜欢在有关歌德的话题上折磨康斯坦丁一下，"老天知道，尼采说它是个单薄空洞的小故事可是说对了。""这里有封你丈夫的电报，"康斯坦丁一边说一边坐下来，"这服务员很有点儿像巴黎的小妇人。这位妇人在战前对我们这些在巴黎的塞尔维亚学生生活帮助非常大。她被称为'白色小母牛'，我们发现她极富同情心。我记得她在一件令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事情上让我恍然大悟。我们一直奇怪，我们去小妇人那里时她们为什么总能立即知道我们不是德国人，不是瑞士人，不是意大利人，不是俄罗斯人，而就是塞尔维亚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向'白色小母牛'问了这个问题。她是个诚实的好女孩，马上就回答了我。她说：'那是因为你们的裤子不是用扣子而是用带子系牢的，像睡袍那样，女孩子们都知道只有巴尔干人才这么穿。'于是我跑回去告诉了我的同伴们，然后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啊！我们跑出去买了欧洲样式的新裤子，把家里带来的全扔掉了，我们的塞尔维亚好母亲送我们来巴黎时，什么都给我们带了一打。""哎呀，亲爱的，"我丈夫说，"是从柏林来的电报，让我今晚等个电话。我不能跟你、米丽察和穆罕默德一块儿去了，真是遗憾。但我会去和他们一起喝茶，去送你。无论因为什么事，我都不愿错过见到米丽察和穆罕默德的机会。"

他无疑是失望的，我们这些朋友一看就既使人激动又让人放心。我曾经给丹尼斯·索拉特，一个最睿智的人，看米丽察写给我的信。"她从斯科普里写来的，我明白了，"他说，"真的，我们比自己想象的安全多了。如果有二十个像这位女性一样的人分布在这里和中国之间，文明就不会消

亡。”米丽察出生在诺维萨德，那里那时候还属于匈牙利。也就是说，她是1690年大主教阿森纽斯带入奥地利境内的三万七千个家庭中其中一个的后裔，他们离开是因为不再支持土耳其的暴政了。她父亲是19世纪一个冲劲十足的人物，起先在维也纳学医，在学生军团中脱颖而出，之后在俄国军队中任军官，最后成了一位著名的文字工作者，用塞尔维亚语翻译了《浮士德》。米丽察从外貌上看像她的母亲。她母亲是希腊人，大概是血统悠久纯正的一类，她也长得骨形娇小、相貌精致，就像我认识的一些拜占庭家庭的纯正后裔那样。她继承了她父亲的智力，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塞尔维亚语、德语、匈牙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又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广博地研读了这些语言承载的文学作品，我很少遇到比她更熟悉英文诗歌的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她拿了哲学博士学位，写了很多关于柏拉图的文字，现在在研究神秘主义哲学对于黑山共和国主教国王彼得二世的影响。国王本身是个神秘主义诗人。米丽察还写诗，在她的诗里，她的细腻敏感在雄心勃勃的才智引导下，探索着整个宇宙。她的谈吐闪耀着萤火虫的熠熠光辉，但她的飞翔却不似萤火虫那般漫无目的。她从一个逻辑明确的要点转移至下一个时敏捷迅速。除了这些，她还做着其他女性穷其一生在做的事。她继承了操持家务这个中世纪传统。这个传统在诺维萨德的塞尔维亚群体中一直被严格遵守。她对待她的寡母力尽孝道，对穆罕默德也爱恋有加。

穆罕默德是个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他的家族原是斯拉夫的地主，在16世纪没有背弃波格米尔异教，而是成了穆斯林。他的父亲是位伊玛目（注），是穆斯林礼拜的领拜人，受人崇拜，所以他小时候就非常虔诚。那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赢得“哈菲兹”的名号，这个名号被授予那些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但是他只背了一半就被卷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民运动的浪潮中。他是莫斯塔尔的革命领军人物，相当于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的角色。曾经有个夏天，他为马其顿的非正规军工作，后来在巴尔干战争中加入了塞尔维亚军队，之后在维也纳学习法律，成为反对政府的奥地利籍斯拉夫学生的领袖。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逃到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军队一道作战。身处他的位置，他很清楚政府那时有多么反感战争，因为他发现自己一场接一场地打仗，这些战争本应获得决定性胜利，如果他和他的战友们得到充足军需供应的话。经过阿尔巴尼亚时他选择撤退，在科孚岛被清退出军队。他还是个男孩时，就有了五年几乎不间断的在正规军或非正规军的服役经历。余下的战争年代，他在索邦神学院进行关于东方研究的学位学习，现在是一位懂得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梵语的学者。过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生活后，他回到了黑塞哥维那，毫无私心地帮助实施土地计划，把属于穆斯林大地主的大宗产业化整为零，分到农民手里。他在战后南斯拉夫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周旋，尽管有人煽动他的激情和占有欲，他向国家所强调的，仍然是基本美德、诚信行政以及各种族阶层共享公平的重要性。实际上，本应让他变成一头狼的经历却让他安稳不变地

保持温和，始终如一地心怀仁慈。在过去几年间，他遭遇了自己政治抱负的翻船，在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独裁统治下像他这样的民主主义者都被赶出了政治圈。但他仍然没有愤世嫉俗，笑容总是在他浑身上下散发的波斯尼亚式帅气中绽放。

米丽察和穆罕默德对于我的特别价值不在于他们干什么，而在于他们在哪里。我之前两次经过斯科普里却没有停下来。第一次经过之后，我问雅典的人们："我坐火车时看到一个叫斯科普里的地方，有最漂亮的城堡，值得去走走吗？"他们都是反斯拉夫的，说："斯科普里值得去？什么想法！那儿就是个沉闷的小镇，什么都没有，连个聪明人都没有！"于是第二次，当我回贝尔格莱德途经小镇时从窗外看去，觉得镇上只有空虚。我的眼睛看着它的片片房顶，想到的是房顶下乏味的房间，里面住着乏味的人，在吃饭、喝酒、睡觉，只有最单调的连接组织把这些功能绑在一起，形成一天。但是这里一直有瓦尔达尔河堤的可爱平地，摆放着从诺维萨德带来的旧家具，讲述着奥匈帝国的鼎盛时期，讲述着有莫扎特和舒伯特的维也纳。这里一直有米丽察和穆罕默德，总是在忙碌，却又总是那么沉稳。米丽察在各个房间来回跑，从书房到厨房，从厨房到卧室，查找雪莱是怎么说查特顿的，确认腌制的最后一批桃子里有没有再冒气泡，试戴从高街的波兰帽子店里买来的女帽。穆罕默德坐着，和一群面色沉重的穆斯林老牧师在议事，老牧师头顶毡帽上缠绕的白帽带，经过多年洗涤都变成了蓝色。最后等他们慢慢进行完礼仪性道别，他飞快下楼，到花园里和他的猎犬玩了会儿，又飞快回来，给大学生们提出了保持克制的建议。因为他们致电告诉他，反对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的静坐示威行动正在进行。然而这两人仍坚稳如柱，这柱子撑起一座看不见的房子，如果我们不想被自然之风刮走，就得在此栖身。现在，当我走过一座我一无所知的小镇，如果这座小镇只有千篇一律、毫无内涵的街道，看起来如同一片弃土，我会出于好奇而满怀希望地去看它，因为这里可能住着一个穆罕默德、一个米丽察。

---

1. 伊玛目（Imam），可理解为伊斯兰的学者、权威，是穆斯林对祈祷领拜人的尊称。

圣乔治日前夕I

当我到达穆罕默德和米丽察的公寓，准备和他们一道去乡间观看圣乔治日前夕各种各样的仪式时，米丽察正在接待来访的两位女士。穆罕默德、康斯坦丁和我丈夫在谈论政治。我听到女人们在说她们的一个朋友没和丈夫一道，而是只身去贝尔格莱德多待了段时间，于是引起了整个斯科普里的诸多猜疑。“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米丽察说，“叶琳娜没有因为其他男人而离开她丈夫。她丈夫不给她任何自由，她总是感到有点不满，想有点独处的时间，享受一下生活的诗意。”“可能是这样，”其中一位女士说，“但是如果她只是想有点独处的时间，享受一下生活的诗意，她离开前一周不辞辛苦专程去波波维奇太太的新家，借《夫人》的复印本就有点意思了，这本杂志里有些迷人的睡衣。”她们没待多久就走了。我们喝茶，然后喝水果白兰地。米丽察站着，以她惯常参与学术对话的态度，和我丈夫讨论新托马斯主义。她站在茶桌旁边，养的那只老狼犬就在几英尺外。她手里端着一杯水果白兰地，时不时举一下杯，放下时溅出的酒滴在空中划过，狼犬跃身上前，在半空中吞下美酒。“我们得出发了。”穆罕默德说。“那里的哲学空气可不是我能轻松呼吸的，”米丽察说，“那里的宗教也完全不适合我。但是除了在希腊，我也没发现适合我的宗教。那时候上帝还没被当成造物主，还保持着神圣，没有被宇宙的责任缠身。”“嗖！”酒又洒出一点。“汪汪！”狗又跳起来。“我们得出发了。”穆罕默德又说。“马上就好。”米丽察说着，自己喝下了最后一滴水果白兰地。她看了看她丈夫和我丈夫，满意地点点头。“可怜的叶琳娜啊，”她说，“她丈夫是个大胖子，一直那么胖；她贝尔格莱德的情人也相当老了。”

终于，在这个寒冷的灰色傍晚，我们三人动身前去观看圣乔治日景象。它和之前设想的不同。圣乔治和英国的主保圣人一样，是个神秘的善人，因为完全不为人知的原因被委以掌管生育的重任。早在公元5世纪时，罗马教皇基拉西乌斯巧妙地评价他是“英名为世人所崇敬，行为为上帝所知晓”的圣人之一。吉本把他描述为卑鄙的军队承包商，这是胡说八道，他把这个乔治和叫“劳迪西亚的乔治”的一个无赖主教弄混了。另有个故事，说他是个罗马军官，在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时殉道，但学界认为这个故事也不太可信。但他们相信他确实曾经存在，大概在公元3世纪，殉道于君士坦丁堡以东四十里的某个地方。显然他是个德行高尚又英勇无畏的人，与一只野兽有些离奇的冒险经历。在人们眼里，他就是基督徒中的珀尔修斯。不管他的冒险经历是怎样的，都以代表生命的强大干预形式出现。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说他从战争的铁蹄下逆转死亡，拯救城市，让木板萌出新芽，让被砍下的殉道者头颅里流出牛奶而不是鲜血。他自己也曾三次亲历死亡，一次被砍成碎片，一次被深埋于土，一次被烧成灰烬，但三次都起

死回生。在马其顿，据说他能够让不孕的妇女和贫瘠的土地都变得多产，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这么说。他的存在早于先知穆罕默德三百年，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对他的永恒的记忆。

我们一离开住所，就看到了些关于他的雕塑。我们过了桥，沿着河岸驶去。米丽察说："阳台上很多花的那栋房子里住着的女孩，几年前曾是南斯拉夫小姐。结果这给她带来了厄运，因为在这里，要想嫁得好必须行为端正，不能参加选美大赛。她其实是个好女孩，至今未婚，生活非常贫困。"这时候我看见一队穿黑袍、戴面纱的女子在河边行道上走过，像是一串黑色的项链断裂，珠子朝着一个方向滚动。"是啊，"穆罕默德说，"在圣乔治节前夜，他们总是来到堤坝上有杨树的这一段，然后站立着朝河里看。"这正是她们在做的事：像一根根纤细的柱子立着，目光越过矮石墙，看着奔流的瓦尔达尔河。这是我见过的最弱化的仪式、最苍白的典礼，它的存在与否只有一线之隔。当然了，如果一个人不能露脸，又受衣物束缚不能自由活动，而且遭受否定常常是其指导性行动准则，这就是其最大限度能做的了。这一习俗显然和他们对自然的崇拜相关。自然崇拜，尤其是对水的偏爱，是当地各民族的基础宗教信仰。但它缺乏崇拜的治疗性特质。崇拜者得不到通过进行激烈动作或非凡行动来表达敬仰后获得的释放感，它也不能提供与神力相接触的感觉。她们仅被允许对崇拜这一念头有所接近，然后对其有个模糊的理解，就像她们透过面纱隐隐约约地理解外部世界一样。"为什么她们会到堤坝这段来呢？"我问穆罕默德。他也不知道。然而我想，他对当地穆斯林男人的迷信行为应该很熟悉。

很快我们就到了山脚下的旱地，行进在蜿蜒颠簸的泥路上，好像是离开了从刘易斯通向纽黑文的山谷道路，来田野丘陵试试运气。衣着鲜亮的漂亮小孩们，看着我们在凹凸不平的小径上从路的这边晃到那边；热情的老人们穿着白色的褶裙，在荒凉的草原上大声地为我们提建议。有个人斜靠在矮树上吹着管乐。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大农场上。它在黄昏中泛着微微白光，周围是个新的果园，里面的果树树干还很细小。穆罕默德说："这就是我们要待的地方，尽管主人还不知道。"这么不请自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紧张地在花园里溜达，把鼻子凑到丁香丛里的大花朵前嗅闻。它们在暮色中呈现一片黑色。一个声音从房子里传来，说着优美的英语，这英语即使在说英语的英国人听来，也美得非比寻常。一位发色金黄、肩膀宽阔、腰线紧凑的英俊男士走出来欢迎我。他看起来像某类俄罗斯官员，但他的脸显得心不在焉，似乎知晓他的躯体所能完美适应的各种行动变数。门廊下站着他的太太，一位二十多岁的可爱女子，还有他的岳母，一位满头银发的同样可爱的女性。她们正和米丽察、穆罕默德说着话，真诚地欣赏他们朋友身上的个人魅力，这魅力能使斯拉夫生活变得如此惬意。

我们立即表明了我们的来意。主人听说我们想参观这附近的圣乔治节仪式后，站起来说我们得马上动身，如果我们等天完全黑了再启程的话就不能在午夜之前赶个来回了。我们又坐上车，他给我们当向导。我们在泥路上又开始颠簸，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有几间茅舍，在黑暗中透着亮光。我们的主人说：“那里，的屋。”“是的，这里是贝克它什的村庄，”穆罕默德说，“我认得出来，我以前来过这里。”之前我对我们晚上将看到的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好奇心，因为我发现提前去想象南斯拉夫将呈现什么给我，总是徒劳。但我知道“的屋”在土耳其语里表示避难所，而“贝克它什”是一种苦修修士的教义，也就是说，这些修士的存在提供了一些神秘主义元素。这套教义是由一个名叫哈里·贝克它什的布哈拉人在约六百年前创立的。最初土耳其士兵特别信奉，后来传播至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据说它传播的是狂热的泛神论，宣称受选之人在生死上可以自由地追随神启。我下了车，踏入一片如同明亮阳光一样炫目的黄昏。白色的房子闪着亮光，穿透本应厚重的夜色。最后一点光像抛光的钢铁发出的光泽，应是路上的水洼反射出来的。几个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朝我们走过来，牙齿和眼白的颜色从薄暮中透出。他们和我们打招呼是以穆斯林村民那种随意和漫不经心的方式，这倒更像城市居民蜻蜓点水的接触，而不像他们的斯拉夫邻居那样。斯拉夫人总是热情洋溢，喜欢百折不挠地刨根问底。他们领着我们走向一栋看上去和别处无异的小房子。我脚步不稳地走去时心跳加速，它让我感觉不安，也让走马观花的旅行显得徒劳。我不能单单看它一眼就推断出它是穆斯林避难所，就像不能看一眼斯科普里就推断出米丽察和穆罕默德一样。

进屋是带着木质拱顶的方形房间。在抹着灰泥的墙壁上及腰高处有烛架，点着几支蜡烛，光线有点晦暗。我们充满惊奇的巨大身影都对着房间中央立的那块高达七英尺的黑石。它的顶上还横着一小块扁平的石头，活像戴了顶学位帽。石头上绕了圈绳子，绳上系了些薄薄的布条；石头旁边放了个箱子。不久，我们轮廓清晰、显得无动于衷的巨大身影就被几个更纤弱的影子扫过，四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出现在我们中间。轮流四次，有硬币落进箱子；轮流四次，一个黑色的身躯压在黑色的石头上；轮流四次，黑色的双袖舒展开来，手臂尽量地围合着冰冷的石身。“今晚，如果女人在拥抱石头的时候许愿，”其中一个男人向我们解释，“她的指头能够相碰的话，愿望就可以实现。”“她们真的相信吗？”我问道。穆罕默德和我们的主人表示确认。但是，显然这不是女人们所相信的。指头不能相碰时她们处之泰然，实际上我一生中也没见过几个女人，胳膊长得足够围合这块石头。男人们的错误更加证实了穆斯林妇女生活中可怜的隐秘性。她们的秘密总是安然无恙，因为男人的好奇心根本无意涉猎。

观察一下就知道，女人们的信仰表现在她们拥抱石头时用劲的大小里。她们定是使足了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激情，把手臂伸到最长，去吸取石头中

她们所能吸取的。她们掀起了自己的面纱，用自己的嘴唇满怀爱意、毫无保留地亲吻石头，向石头表达着最大限度的忠诚和敬意。这像是谐和和弦与不谐和和弦的混合，让人为之一震：极度贪婪的举动后面紧随的是极度仁慈、极度自制的举动。然后，每位女人都退下来，紧张不安地向后走，用指尖从脸到胸划了一下，结束了她们的轻声祷告。她们怯怯地汇成一团，于是我们粗笨的影子又显在墙上。我们实际上都没见到她们离开。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些戴着面纱的女人来石头这里找寻施展动物本能所需要的力量，而它的受益者是一些并不尊重她们的人；她们如此压抑，将自己的行动稀释得几乎不留痕迹，悄然地离开房间；她们仿佛只是一些毫无区别的雌性物质，母亲产出物的某些样本而已。然而，这四个人实际上把她们的天性展露在了这个房间，以及房间的每一处阴影。每个人的天性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每双袖子里伸出的每双手都和其灵魂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有一双韶华流逝，希望也随之飘零；有一双青春年少，却绝望地抓着石头，唯恐希望破灭；有一双也绝望地抓着石头，但所负的痛苦只有五分钟之长，甚至更短，如果她看到逗笑的东西；有一双动作一丝不苟而且不慌不忙。我猜，较之于参加贝克它什的神秘交流，这双手可能更愿意去河流下游参加斯科普里的正统穆斯林的虚幻性仪式。

我们出去时，又有另外三个戴面纱的女人从我们身旁走过，进入这间神圣的房间。整夜都会有人来完成使命，他们来自方圆数里信奉贝克它什教义的村庄和城镇。天空中璀璨的星光下漂浮着厚厚的云层，我们又在跌宕起伏的黑夜里继续前行。“现在我们去圣乔治的墓地，”米丽察说，“想要小孩的女人好多。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都吻了石头。穆斯林们曾礼貌地暗示，因为这是女人的仪式，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这真的神圣。米丽察又说：“我想要的是政治上激烈的东西。”如果石头名副其实，真的会显灵，我就不会下一分钱的注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的命上了。

在一座小山坡上，我们看见有昏暗的光亮在闪烁，于是朝着它驶去。我们踏上活像举行德比赛马日的地方，看见的场景也和吉卜赛人安顿下来后德比赛马日前夕的埃普瑟姆镇相似。草地上到处坐着平民，他们吃吃喝喝说着话，好像意识里从来不曾把夜晚和睡觉相联系。如果这时闭眼，嘈杂的声音听起来令人震惊，意识的初级形态在表达它的诧异，觉得自己不应该还处在无意识状态。一支吉卜赛乐队拨弹乐器，哼着鼻音；卖柠檬汁的小贩大声吆喝着他们青黄色的商品；俯瞰平民的房子里，走廊灯火通明，映出许多背向的头和肩膀的影子。我们沿着小路走上山坡，来到一座小教堂，随着人群挤了进去。这是一座新修的小教堂，并不有趣。起初吸引我的不过是许多颜色亮丽的羊毛长袜，上面织着精致抽象的图案，悬挂在神像以及布道坛前的绳子上。挤在人潮中继续向前挪动，我看见了地板中央的十字架，周围堆着人们的东西。“十字架下面就是圣乔治的墓地，”米丽察小声说，“你看，噢，你看！简直难以置信！这是希腊的冥想仪式，希

腊人就是这样通宵躺在阿波罗圣坛上，这样，他们可以在梦中进入神性意识，预知未来。”

十字架周围躺了一堆正在进行冥想仪式的女人。她们闭着眼，胸脯随着睡眠的呼吸节奏慢慢起伏。她们彼此挨着躺在地上，横着的，侧着的，一个的肩膀挨着另一个的膝盖，一个的脚放在另一个的脸上，彼此纠缠，静止，像冬天石头下窝着的一团蛇。看起来她们是真的睡着了，呼吸缓慢，躯体僵直，眼皮把装满烦恼而又执着坚毅的眼睛封得严严实实。看着她们，我也昏昏欲睡。我看着脚下一个女人的脸，打了个呵欠。她睡得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她把自己投入睡眠的最深处，就像一颗石头被扔到井底。她把头枕在胳膊上，在她拧结的眉毛旁边搭着她的羊皮外套的衣袖，上面绣着拱门和树，这质朴的产物带着精巧的波斯设计。我们身处于文明的碎片、文化的枯萎外壳中。这项仪式真是高度浓缩！希腊人渴望通晓未来，熟知众神的伟大思想。这些女人对未来的需求仅限于十月怀胎，她们寻求帮助的对象是遥不可及的存在，除了口口相传的恩赐以外并无其他特别之处。然而，哪怕是残留的仪式都仍是壮观的。这些女人身上充溢的生命力是错误的类型，不能够催生新的生命，所以她们将其倾倒而出，将自己彻底清空，然后躺在圣地上重新充灌另一种新的生命力，它强大得可以自我繁殖。这是忠于信仰的行为，它值得赞誉，因为这些人鲜有理由坚持信仰，对存在是有价值的延续这一点也全无把握。

离开小教堂时我们看见一个老农妇，身边围着一圈朋友。她把双手伸向两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分别吻了她们的双颊。“看，”我们的主人说，“就是她，在梦里见到了这座山坡下埋着的棺材，里面躺着的是圣乔治。”我们想透过黑夜看清她的脸，无奈夜色太厚重，她身上带着的是先知的神启还是愚人的痕迹不得而知。我们下山时经过小教堂的后殿，路遇一个人带着电筒，它的光线让我们看到有一扇窗户上绷着一股一股的羊毛，拉满整扇窗户，连在固定在墙上的木片或金属片上。“那也是她们做的，想要孩子的妇女们，”我们的主人又说，“是她们自己纺的羊毛。”空地上一大群人围着几个坐在壕沟里的男女，他们正在争论什么，操着稀奇古怪的学究腔，尽管不得不放大嗓门以压倒吉卜赛乐队和小贩的声音。他们用深思熟虑后的长篇大论来表达观点，然后对方开始批评，暴躁中不忘对自己的用词感到喜悦。他们的言辞有些近似于去过牛津的人说的话。突然，一方的一个女人脱下羊皮外套扔在地上，然后扑到上面开始哭泣，场面顿时失去了紧张感，人们围着她呜咽的身体表示同情。

车还没来，我和我的主人在黑暗中继续沿着马路走。我说：“你的一口英语说得真漂亮。”他答道：“哦，我在伊顿待过。米丽察没跟你说过这件荒唐事吗？我是绕道去的那里。”可米丽察没跟我说过这个，只说他的父亲曾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在巴尔干战争以及1914年世界大战中表现都很出

色。他说话时，我想起我曾经听说过这位将军，是杀死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和德拉加的弑君者之一。他说他自己十岁时就离开塞尔维亚，被送到圣彼得堡的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在那儿待到十六岁。革命爆发后，他作为部队的分遣队成员，逃出乌拉尔山。在西伯利亚时，两名原来的管事军官死了，他就成了分遣队的队长。他带着队员安全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经由美国航行回欧洲，在尼斯和他的家人团聚。家里人以为他早就死了，还一直悼念着他。然后他被派往伦敦，不久被召入陆军部。在等候室，他和自己玩起井字游戏作为消遣，看自己到底会被派往法国还是希腊的萨洛尼卡。但面见他的军官说："我们觉得你去伊顿待一年比较好。"这就像是从北美回来的雷夫·埃里克森(注)要被送去上学。他有些愤愤不平，后来却慢慢地爱上了伊顿。战争结束时，他在伊顿度过了一年，然后去剑桥当了名农科学生，以便能够耕作马其顿的大片土地。这片土地是奖励给他父亲的，以肯定其多年的服役。现在他正努力打破土耳其人对这片土地的贫瘠诅咒。另外，他还扮演着自己的政治角色，固执地反复重申斯拉夫的倾向于民主的原则。他谈话时神态温和而宛转，因为他已经阅读过史书上翻过去的那一页里的惊心动魄，将阅读的下一页对他来说不会出乎意料，甚至对未曾翻过去但被撕下来的书页，他也不会感到惊慌失措。

回来时，有大盘的培根鸡蛋、巨大的瑞士卷、羊奶酪、手工面包和烈酒摆在我们面前。餐毕，其他人说着话，我看着客厅四周的画。其中有按照老式的塞尔维亚房子的装饰习俗陈列的小印刷画，六乘四英寸大小，分组悬挂，上面是卡拉乔治维奇和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肖像，国民偶像的汇集。主人走过来问我在看什么，还取下墙上的东西，好让我在充足的灯光下看得更清楚。"这张卡拉乔治我不喜欢，"他说，"让他看起来像希特勒。他不可能像希特勒。他体型高大健硕，受过严格的体能训练。我们的民族喜欢弄得像狂热分子、苦行僧一样的领导人图片，可我不喜欢。我希望事情不要像这样，我希望人都能够保持理性。"

墙上大多数其他照片都是关于主人的父亲的，那位伟大的将军。他个子不大，骨骼细小，带着每个年轻的塞尔维亚士兵脸上可见的纯真、从令如流的表情。在他后来的照片里这种表情就变成了神秘莫测的凝神深思。有张照片是他和被杀的亚历山大国王坐在松树林里。这张照片里他看起来轻松快乐，嘴唇微张，而不是紧闭着，暗示着在为实现令人苦恼的意志而积攒力量。"我父亲是最优秀的男人，"主人说完，停下来叹了口气，"但这张照片才是我最喜欢的，这是我父亲和他的母亲。我奶奶是个农妇。"我们的至亲至爱一旦去世，便显得虚弱不堪，不足为外人言道。

拜占庭艺术完全没有固定程式。这位妇女端坐着，头围白布，全副武装，行使呼风唤雨的权力，也承受圣母般的深重苦痛。她掌管土地，将她的孩子们都带进了它广阔的监牢里。她的脸表明，她深知以土地为监牢时，面

包吃起来有多苦。她的鼻子很挺，瘦骨嶙峋的鼻梁像许多壁画上画的一样，双颊内陷。这样的妇女必须养育孩子们很长时间，因为国王和世间的贤者从不会在孩子断奶时就接管他们，给予他们田间野地的自由饮食。这样的妇女一生都吃着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吃剩下的。她们是多余的。如果她已经知道生活多艰难，为什么又要让她的孩子们继续受苦呢？她不能向我们言说，但在这一点上她坚定不移。因她这无法辩护的坚持，她的儿子以她为荣。他毕恭毕敬地站在她身旁。但是他的纤瘦、他的力量、他明快的仪态，甚至他眼里诚挚的热情，全然不同于她的坚韧，倒暗示着对她的命令的反抗。他会从生活中逃离出来，从她送他去的监牢里逃出来，不是直接走入死亡，而是走入和本能相反的一种新生活。所以他会干扰自然成长模式，让自己投身于非自然的训练，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打倒国王，颠覆帝国。妇女们在马其顿的深夜里到处向神祈求的生育力，并不是她们想象中的简单礼物。她们祈求的是怀胎十月的谨言慎行，以及瓜熟蒂落的机会，她们获得的是人类历史上血染的永恒。主人把照片挂回墙上，说："不知道我睡在楼上的俩小孩长到我们这个年纪时会挂什么样的图片在这里。"然后他走回去坐在灯旁，手托着头，开始讲起西方的墨索里尼和北方的希特勒。显然他也清楚，也许墙上不会挂任何其他照片。我们面前的这些照片也许有一天会被刺刀砍落在地；当四周的墙上冒起青烟时，它们也就死在被热浪炙烤的玻璃框下。和这个夜里所有其他妇女不同，米丽察想要"政治上很激烈的东西"，想用智慧的思想来保护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她是帮助圣母的艾莉儿。

---

1. 雷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on，970—1020），古代冰岛探险家，据传也是北美的第一个欧洲游客。

圣乔治日前夕II

我们准备去看在奥维智地区一块石头那儿举行的一项仪式。这个地方叫“羊场”，在几英里外的高原上。于是我们五点半就起床了，在灰蒙蒙的凌晨动身出发。山坡上刮起冷风，在麦苗地里荡起一层层波浪。农民们骑着驮马走在小路上，身上披着斗篷，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一路从圣乔治的墓地颠簸回来。我们走上一条平坦的路，它沿着瓦尔达尔河下至峡谷，通向维勒斯。上面是陡峭的草坪坡地，东一处西一处地散落着一片片深蓝色花朵和一丛丛野玫瑰。快到镇上时，我们看见每座山的山脊上都有人扎营，一边吃喝一边迎接清晨的到来。男人们站着，拿着瓶子喝酒，看着山巅的一片白茫茫。

“多美妙的仪式啊，”米丽察说，“这让人们对万事万物充满景仰之情，就像对大家说‘你应有一双诗人般的好奇的眼睛，不应把美视作理所当然的！’”“是啊，”穆罕默德说，“我坐着车来到这里，因为我是个懒家伙。但我的灵魂和他们一起升华了，我也明白了清晨意味着什么。你知道，我本该死了，我二十三年前就该死在监狱里了。1914年6月28日，我和我的表兄在维也纳散步。我表兄和我一样，也是个黑塞哥维那的民族主义者。我们走到环城大道，看见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听说了塞尔维亚人怎么怎么，以及王储被杀。我们以为被杀的是我们的塞尔维亚王储，于是非常悲伤，在小餐馆坐下来喝酒。一个报童走过，我买了份报纸。报上说是弗朗茨·斐迪南被一个塞尔维亚人杀死。于是我立即站起来说：‘快，我们得马上逃回塞尔维亚，一切都快完了。我们赶紧去乘火车。’但他不愿和我一起走，因为他知道战争会有多可怕。他不想承认战争已如箭在弦上。我和他争论，直到拿出表一看，发现自己就快错过火车了。我赶紧逃离，恰好赶上了火车。当晚我表兄就被捕了，如果我不走也是一样的。他死在了监狱里。我想如果我被抓了，奥地利人也不会让我活下去的。想到这个，我就感受到了上面那些人的感受。啊！白天，就像这样的白天，多么美好！”

我们走近维勒斯时，看到一家子吉卜赛人，他们疲累地往家走。他们年轻的女儿穿着非常宽松的亮粉色绸缎灯笼裤。一架老古董马车上坐着些黑白衣着的人，像埃及人一样面无表情。他们来自一个远处的村庄，大概在比托利地区。另有一架样式更为现代的马车，赶车的是个体态丰腴、优美的年轻女子，身着西式服装，一看见米丽察就拉着缰绳叫我们停下。她是个塞尔维亚人，几年前在贝尔格莱德时，米丽察用拉丁语教过她基础科学课。她后来嫁了个马其顿的政客，现在经营杂货店，在维勒斯上边一座山间小镇上。

“怎不告诉我你们要来呢？”她嗔怪道，“我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斯拉瓦，在斯科普里那头。但是，天知道，我肯定更想待在家里招待你们。我今天放假，我完全有理由休假。我整天从早忙到晚，直到圣乔治日。”“你怎么这么忙？”米丽察问。“哦，去修道院求子的女人们买粉饼、胭脂、口红，打扮自己好出门啊，”杂货店老板说，“她们整天都来买东西。你们这是去哪儿？”“我们去羊场的石头那里。”米丽察说。“噢，你们会喜欢那里的，如果你们没迟到的话，”杂货店老板说，“但你们不赶紧的话可能就会迟到了。那是项有趣的仪式，在我看来，里边有点意思。我是两年前去的，因为马可和我结婚快五年了还没有孩子。我在那儿做的是最简单的事——爬上石头把罐子扔到地上砸碎。我把我的罐子扔了三次，还是砸不碎，所以我现在还是没孩子。不耽误你们啦，不快点走的话其他人都要走光了。”沿路上行，远处的维勒斯像块马赛克拼图，瓦尔达尔河的峡谷将其分割开来。我们离开马路，开始爬两峰之间的一条山路。山顶上黑压压的都是在做晨祷的人。这条路带我们进入羊场，这里又是一片焕然一新的景象。海一样辽阔的牧地和耕地在灰蓝色的山间像温和的波浪在起伏。灰色的天空下，这地方看起来平淡无奇。在马其顿的夏天，它必是铄石流金的一条热槽。但现在是春天，柔和的清晨，微风习习，日光和煦，风景中的各种形状、颜色都呈现出其本质。高原上的泥土不像洼地上的那般猩红，红得很优美。长在这种泥土上的麦苗格外青葱，没有抽穗时呈透明的珍珠般的质感，沾染在上面的石灰岩粉末让它看起来与彗星的尾巴隐约相似。在周围连绵的群山间，有一座山峰独自伫立，悬崖峭壁透出威严，它被称作“神的见证”。太阳再升高一点就会有亮光投进山谷，仿佛希腊之光一般。凝结的辉煌有如天地间的一位圣人，在地平线上傲然而立，其他地面上的存在物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我们走的那条道渐渐变成了车辙、凹槽的随意组合，横跨羊场十里远。远近有几处村庄，白得萧索，我们没有进入，只跨越了细长的铁轨。铁轨旁有两栋大得出奇的建筑，一栋是宪兵队的，另一栋里有火车站和邮局。羊场是土地安置实验的不幸对象，是战后新南斯拉夫在前期所犯的错误之一。它把一些本无意愿的家庭从北方迁移到这设施匮乏、极不宜居的新址来，进行了失败的管理。无论是在管理定居民众的艺术性还是科学性方面，它都毫无经验。铁路线的另一侧走来一群群农民。女人们老远就很抢眼，她们身着五彩缤纷的围裙，光彩照人。大家走得很慢，尽管看起来心情都很愉快，但显然面带倦色。还有一些马车经过我们，人们躺在里面呼呼大睡。在缓慢颠簸前行时，我看见其中一个熟睡的女人，身穿的羊皮外套上有在圣乔治墓地上昏睡的那个妇女衣袖上同样的波斯图案。

显然我们正在靠近某个焦点，它不是村庄。道路蜿蜒直至山顶，尽管地势并不是很高，也能够俯瞰方圆几里的乡村了。我们看见一些人，总共二十个左右，正从旁边山顶上某个地方四散开来，那个地方靠眼睛却看不太

清。他们有的步行，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驮马。一队肤色黝黑、身材精瘦的年轻骑马人和我们擦肩而过，在山上的草原驰骋。这里的山是我在马其顿见到的最美的山。这些人身上流露出放荡不羁的自信和传奇般的色彩，像是来自某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的精英。“他们都走了！”米丽察呼喊着。她丈夫对其中一个骑马人叫喊着问道：“这条路是去石头那里的吗？我们去牧牛石，晚了没有？”那年轻人扬手拽住缰绳，朝我们踱过来，用戴着紫色手套的手礼貌地对我们致意，他的话音如同牧笛一般，比一般的欧洲人亲切：“是的，继续走，一两分钟就看到了。不会搞错的，羊场上就那么一块石头，还有些人在那儿。”

我们的车下了车道，在草地上前行直到开不动。我们下车的地方离岩石很近，我们都能看见它的颜色了。这是块平顶的岩石，形状不规则，高出地面大概六英尺，呈红褐色，散发着微微的光泽，因为表面全是血迹，夜里宰杀牲口用祭祀时留下的。十几个男人在石头脚下或坐或躺，大多数都戴着圆毡帽。一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孩放在不远处的小毯子上。我们下车后走的草地已被踏坏，一片泥泞，满眼垃圾。走近岩石时，我们不得不在血淋淋的鸡头间择路落脚。这场景极其恶心。喷溅的血已看不出颜色，只是一团污秽，整个就是在展示腐烂。红褐色的岩石上，每一条裂隙里都曾插过蜡烛，蜡烛现在悬在油腻松垮的黄色尾穗上，也沾染了血污。绕在石头上的羊毛捻子有些曾被染成红色或粉色，现在上面也都是油腻和血污。许多罐子从石头上被扔下来。在踩得东倒西歪的草丛里，碎片和鸡头混在一起。这里尽管没见到粪便，效果和肮脏的土厕也差不多。

这景象让人想立马转身跑回车上把车开走，离它远远的。但是这个地方有着摄人心魄的威严。它是死亡的形体，是我们身上恶的种子，是锻铁炉，锻造的剑可以将我们杀死。我们在生活中一直与它的伪装形式相伴随。此刻当它终于像这样赤裸裸地呈现于我们眼前时，不停下来待一会儿想一会儿，就太愚蠢了。我注意到，刚才放小孩在地毯上的那个男人，现在正绕着石头行走，怀里抱着只正苦苦挣扎的黑色羔羊。他是个年轻的吉卜赛人，是被称为“火药吉卜赛人”的那一类，因为他们曾经帮土耳其军队收集硝石。他们以美貌、整洁和华服闻名。这个青年有印度王子的五官和风度，古铜色的皮肤呈亚光的亮度，仿佛抹了细粉，仍然散发出温和的光泽。他身上雅致的亚麻衬衫是雪白的，外面套着紧身夹克，精美的马裤塞入及膝高的软皮靴中，头戴一顶细毛圆帽，简直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卡马拉尔扎曼王子。他围着石头走了三圈，然后停下来，弯了弯腰，吻了一下油腻的血迹斑斑的岩石。然后他举起羔羊，站在石头上的人从他手里接过了它。我看到好像那个人对羔羊实施了麻醉，羊不再挣扎，只是安静地躺在他的脚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这会儿吉卜赛人把小孩从地毯上抱到了石头这边。那是个一岁半左右的小

女孩，穿着干净的白衣服。白色的童帽上用深棕色的线绣着拜占庭传统花样，系帽的蝴蝶结缎带是忧郁的天蓝色。她父亲把她递给了站在岩石上的另一个人，然后自己爬上去，在一片污秽中寻出最干净的一块地方，温柔地把她放下来。捉羊的人把羊带到石头边，用刀划过它的喉咙。一股鲜血喷涌而出，红亮亮地覆盖在先前留下的棕色血迹上。吉卜赛人拿了什么在他手指上，他带着这东西在孩子的前额画了个圈。然后他走下岩石，又转了三圈，带来另一只黑羊。旁边一个留着胡子的穆斯林解释道："他的妻子是来这里用羊祭祀后才怀的孩子。所有从这块石头得来的孩子必须被抱回来，印上石头的标记。"吉卜赛人再次亲吻石头，递上羔羊，爬上祭台，再次供奉了祭品，但这次他不仅给孩子画了圈，还装了些羊血在小玻璃瓶里，然后把孩子抱回地毯。拿刀的男人把死了的羔羊放在草地上，和碎瓷片、鸡头堆在一起，它们的喉咙还冒着微弱的热气。在晨曦中，岩石上散发出来的恶臭越来越浓烈，令人作呕。

拿刀的男人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这地方的妙处。许多女人来向石头供奉公鸡和羔羊，因而得子。一个从普里莱普远道而来的妇女，婚后十五年不孕，现在也有了孩子。怀疑祭祀岩石的有效性显得很傻，如果它不灵验，人们早就不这么做了。这一仪式源远流长，得有几百年，当然，按他们说的话，是几千年。如果人是理性动物，会看到他们的实证比推断更具说服力。他们说这些动物都是优等牲口，眼眸明亮，四肢颀长，骨骼健硕。他们也是聪明人，关于石头的言论尽管信息不足，却逻辑井然。当他们谈起生殖以外的不那么神秘的话题，比如在上场战争中的经历，他们表现出极强的判断力和观察力。其中一个会讲一点英语，另一个法语说得非常流利，有两三个人应该是从事技术性职业的。然而，他们在石头上做的事让人反感。

我头天晚上见到的一切并不违背人性。我没觉得他们所做的能够给因为生理原因而不孕的妇女带去孩子，但我见到仪式上这些举动或许会唤起爱的力量，这和这些事情也不无关联。当的屋的妇女们展开双臂，拥抱黑石，并低头亲吻石头时，她们的举动和男人女人们在复活节弯腰亲吻圣台上替代基督的布一样，它们具有同样的本质，只是不那么绝对罢了。这样的动作是在模仿充满爱意的灵魂。它说："我将竭力奉献于你。我将倾其所有且不求回报，我平和地做着这一切。因为我明白，腾空的自己必将重新得到填充。"人类应该不厌其烦地自我提醒，这样的奇迹是能够实现的，尽管它的存在不能用逻辑进行证明。

躺在圣乔治墓地上的女人们，和的屋的女人们一样，以合适的方式维护灵魂的健康。我们修剪我们心智的枝叶，让它们能够适合于寻常的生命花园。我们从意识里排除了已获得的各种知识，因为它们会让我们分心，不能专注解决为了生存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们甚至会让我们怀疑生存是否明

智。有时，我们有必要知晓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永恒，在当下，同时又必须解除禁令。于是我们必须让所有的知识侵入我们的大脑，让与生俱来的记忆如同出洞的蛇一样蔓延，让对死亡的预知散布它的阴影。那些因不孕而变得敏感的女人，躺在生命为可见奇迹的人的墓地上，探寻她们生命中不可见的奇迹，这没什么丢脸的。她们的仪式性睡眠和普通睡眠一样，有益于身心健康。

羊场仪式的虚假宣称并非源于妄想和谬见，而是有意欺骗。发明和多年传承仪式的人被残忍的倒行逆施所驱动，当污秽淹没了他们的婴儿思维时，他们便想重新拥抱污秽的黎明。他们想把手伸向那些比他们弱小的事物，用痛苦把它们变成可笑的把戏；他们想击碎完整的东西，想在自己黏糊的分泌物中倒腾。于是他们宰鸡羊，砸罐子，弄得油脂、血污一团糟。但是头脑清醒的人会意识到，成年人想走回婴儿期不可能成功，他们只会走向愚笨和狂躁。于是想沉溺于此的人，便煞有介事地假装有一条秘密通道会指向你想得到的好东西，假装世界上有神秘过程在起作用，和因果关系无关。这个过程就好像白痴投币机，投进一枚苦难，便立马跳出一份福气；就像和死神协调，给他供一份祭品，就可以得到一份自己渴望的生命。这样，热衷于暴力的人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在热爱和平与生命的人面前，他们也骗得了权威。可以看出，宰羊的屠夫对自己的重要性非常满意，围在石头边的一些穆斯林也洋洋得意地急着告诉我们，他们在夜里也履行过这份职责。想到他们对这份殊荣的享受令人恶心，尽管他们的行为已流传上千年，也为习俗所圣化，他们的身上总有那么些稀奇古怪、任性行事、反复无常的样子，令人生厌。就假装而言，他们做的所有这些事其实并没有必要。他们无可超越地取得了令安德烈·纪德先生馋涎欲滴的东西：无偿行为。这和善良相去甚远，而且肯定稳固，因为它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回应，本身必然稳固。

我非常熟悉这块石头。我一生都生活在其阴影下。我们所有的西方思想都基于这可憎的虚假，认为痛苦是收获的固有代价。可见耶稣受难的意义是如何地不为人知，尽管它清晰地见于文字。一个至善的人降临于世，他毫无残忍之心，本可以教会人类如何永远地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我们却被牺牲的念头冲昏了头脑，认为必须洒下无辜的鲜血以获取公正的收益。我们不知道该拿这救世主怎么办，只得毁了他。茫茫宇宙，一半在心智之内，一半在之外，却都值得敬畏。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也就被杀死了。如果不是我们企图实施的罪行实施未遂的话，我们的耻辱将是绝对的。上帝是杀不死的。它总是更多地存在，它不会从我们不幸的地球逃离，它永远在召唤我们去拿取我们所需。

从这一课中我们几无收益。石头上展现出来的创意就像上面的血腥恶臭一样。它所附带的恶灵用神学上的诡计将自己保全下来。这诡计已然得逞，

石头带着一种熟悉的令人反感的东西使我恶心，就像老酒鬼的醉酒比一个有节制的人偶尔过量更让人生厌。这样的仪式，各个宗教团体，罗马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卫理公会、救世军，给它们戴上不同的伪饰，从我的婴孩时期起就摆在我的面前。从古时候起，基督教就被迫以相反的形象示人。石头、刀子、污秽、鲜血，是许多人的至上欲望，他们不惜奋斗以求。曾经有个可爱的敌人，基督称他为“塔尔苏斯的扫罗”，他不能容忍教义说人是卑鄙的，说残酷就是这种卑鄙的本质。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基督徒进行迫害，直到他的诚实不能再容忍他否认自己对上帝的崇拜，然后上帝以光亮为形对其显身。他心里的信仰已扎根，但是他仍然苦恼。他的头脑在拒绝接受失败这方面非常具有犹太人特征，他不断地用福音对其进行修缮，直到它找到一条出路，把残酷作为救赎之路。他发展了一套赎罪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却极具说服力。因为这理论是用一副天才的腔调讲出来，激动的人们听得十分信服，知晓了基督的无辜，也假设托他之名的一切皆属无辜。听者也和说话者一样，被嗜血的爱好玷污，与其他人无异。这荒谬的理论假设上帝嗔怒于人类的原罪，决定应施以惩罚，不是以改造为目的，而仅仅是让他承受痛苦。上帝允许基督替代人类受罚，并基于一些条件，愿意以免除人类原罪的方式对待人类。从任何方面看，这理论都有悖理性：一个公正的上帝，怎么可能因为另一至善之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了痛苦，就原谅邪恶的人类呢？

理论上的这条鸿沟无法弥合，但崇尚残酷的人自此却一直努力地在跨越。这类型的人有许多不那么重要，也有一个显著的，奥古斯丁。他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圣人。他有天赋以及一腔热血，但他的心却像石头一样被污染。他堕入一种无望的热恋，对象是像李尔王一样不会爱的人。他的母亲和他关系就像母兽和幼兽那样，纯粹天然，但他对污秽的嗜好却让他玷污了这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极端的美好时不时地也存在，但腐坏如影随形。对于她的死，他暗自欢喜，文学中有最刻薄的记载。因为她死在意大利，远离她的非洲故乡，于是她不能如她所愿，和自己亲爱的丈夫葬在一起。他希望自己成为超人，不沾染任何他的天赋认为不妥的东西。然而，他又不希望自己是正面的好人。他憎恨美德的所有温和面，他鄙视让万物顺其自然的观点，因为他实在太爱一刀刺破羊喉的感觉。他试图把残酷融合为神圣的一部分，为此他努力为圣保罗的可恶教义寻找逻辑基础。他引入的理论是，魔鬼因为人类的原罪获得了凌驾于人的正当权力，也因为将无罪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丧失权力。这有力地证明了宇宙是荒谬的，正如岩石的膜拜者们所愿。这呈现给我们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尊敬的魔鬼，至少在他杀死基督之前，上帝是允许他行使合法权利的。这让人类的邪恶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他的原罪显然也没那么坏，无非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土著王子的所为。可能就是这个让奥古斯丁接受了理论，尽管他心知肚明自己是邪恶的。

显然也是这个，把奥古斯丁的理论推荐给了马丁·路德。他甚至不像那块岩石，他本身就是那块岩石，带着被弄脏的草、鸡头、油污，以及发臭的血。他是伟人中最丑陋的一个，是一头被谬赞的能言会道的猪。他唯一的美德便是野猪的美德：胆子够大。其他的优点在他身上看不出来。他满脑子错误念头，一心努力想把生活搞得像猪圈一样肮脏。他号叫着反对人类的理性天赋。在一次布道时他号召他的信徒把屎砸到理性的脸上，说理性是魔鬼的婊子，因疥疮和麻风烂了一身，应该被关进茅厕。他憎恨理性是有缘由的，因为它暴露了奥古斯丁的赎罪论的愚蠢。他钟爱这理论，因为它血腥暴力；他钟爱它，因为它用谋杀的快感替代了谋杀上帝的悔恨。他坦言，上帝将基督的死视作人类的牺牲这想法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它甘之如饴，它是优秀的、光芒四射的，是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新教开始冲着羊血哀号，尽管没有比罗马天主教叫得更响。

所以，魔鬼每天都在赢得胜利，无数虔诚的信徒把基督降临展示的残酷奉为神圣的光荣。如果上帝对人类不满，想惩罚他，然后又让他免于受罚，因为从基督受难中已获得愉悦，那么承受苦难的人则是救赎我们的工具，促成了上帝的愉悦感，他们至少和天使一样高尚。那个面带微笑的重要男人，站在岩石上用肮脏的手握着血淋淋的刀，他被当成精神世界里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残酷已被植入我们母亲的子宫里。我们可以对这一切感到欣然，但同时我们心里向善、懂爱的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个龌龊的谎言。于是，没有被西方思想误导而成为除了机器制造的物件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比如，不关心教会从根本上已被设计成有阶层的社交组织）的所有人已经意识到，基督教是一种恼人的折磨。它让我们心里的善和恶都得到了可以想象的最大满足，也对它们施加了终极威胁。我们不断被告知，要与十字架的施刑者和受刑者，与无辜和罪恶，与善良的爱和残酷的恨，并肩而行。我们的胸腔里永远回响着这样的呼喊："谋杀基督我们有罪""谋杀基督我们获救""羔羊无罪但必被杀""死去的羊让我们获得救赎"。我们就生活在混乱中。这种状态不太会得到改善，因为护卫岩石的人十分狡猾，不会授人以柄。尽管赎罪论学说对公众或私人的信仰影响极深，它从未被任何的教会总理事会定义为教义。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用他们的笔去沾染这兽性的墨水。莎士比亚沉溺于此。他对岩石的恐怖了然于心，却屈服于它的权威。他相信仪式是符合现实的，尽管他觉得其本质堕落。他知道良善的可敬之处，在它的简单性和更细致的方面，如同在君王威严堕落的年代，或者术士年代里一样。但是渗入他作品里的，也有他根深蒂固的对婴儿期污秽的念念不忘，对在身体的特殊支流中寻找丑恶鳟鱼的渴望，以及对残酷的欲求。也许其中并无乐趣，但他仍然会病态地想去圆满地成就这个恶心的、具有破坏力而又公正的时刻，如同殉道者向往他们的注定的厄运。他完全理解了爱的本质，他明白"若是遇变则变，或是遇强则屈，爱便不是爱"。他觉得有义务以损毁

性功能这一结合世间最多爱人的方式来阉割爱，不管是夫妻之爱还是亲子之爱。他对岩石的敬意迫使他写下《李尔王》，把羊群里的羔羊一只一只带出，用刀划破它们的喉咙。在剧中，各类的爱都显得一文不值，父母对孩子的，孩子对父母的，合法夫妻间的，非法恋人间的，所有的都痿弱无力或是行同狗彘。但是在莎士比亚作品的末尾，一个成年人吼出：若无爱，世间便无康健；若无爱，生活只是癫狂和死亡。西方文化产出的顶级艺术作品，只不过代表了对这块石头的魂牵梦萦和挣扎反抗，这也不应归功于人类。我们已在自己族群无思无语的源头处行进了这么远，很应该走得更远一些。我们身体里定有一些卑劣的东西，让我们代代相承，在这块不洁之地逗留徘徊。

然而，有些东西却不和我们同处于岩石，而是和阳光同在；恶臭只能微损它，它依然纯洁地照耀于山巅。那是莫扎特的特殊价值。并不是说他是至善的。当他想吃羊羔时，羊羔也得死。但在他的音乐里，没有哪行乐句会容忍屠宰仪式中表现出的在精致性上的荒芜，或在对抗不孕中表现出的对专业目标的偏离。他从来不会相信恶心的东西会有某种魔力。他相信恶总会带来伤害，否则它就不是恶。“嘘！嘘！”莱波雷洛在唤，招呼着花园里戴着面具的陌生人，邀请他们参加舞会。但是邪恶才是主人，没有舞会，只有强奸和杀戮。唐璜死后，剧中的正面人物们不论是严肃还是轻松，都聚集在夜莺的歌声里。因为离开残酷，他们可以释放并遵从本性中的良善。同样的精致，以及拒绝被残酷的伪善宣称所欺骗的同样特质，解释了简·奥斯汀作品的价值。这价值，比依据其表面内容做出的解释重大得多。

温和的风格并不是其中的诀窍，威廉·布莱克[注]便是粗犷的。他以另一种方式拒绝了岩石。他在自己的大脑里搜寻信仰的欺骗性，就像惊恐的女人在检测乳腺癌。他让自己完全沉浸于未卜先知的狂热中，知道自己的意识能够返回到知晓良善的纯净之源。在羊场这里可以看见一种东西，它被理解为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分裂：一边是岩石的帮凶，另一边是岩石的敌人。我们的人性中也有这样的分裂，让我们崩溃且无能为力。我们心中的一面倾心于岩石，告诉我们不应该拒绝它，它是庄严的、神秘的，只有浅薄的人才会否认牺牲的价值。一个完美的神秘已被揭示，是关于意识的基本倾向，但它的本质是污秽的。我们都和那个满面尘土、形容枯槁的农民一样。他的围巾松散地跨在脖子上，身体正耷拉在岩石上。他将在明日凌晨参加一场夜间仪式，举起抽搐的羊羔递给戴圆帽的刽子手，然后，那个人会爬上肮脏的石顶。

---

1.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虔诚的基督徒。

下册

 

老塞尔维亚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科索沃平原I

从斯科普里到科索沃地区（黑鸟场）的路，将我们领向灰色的群山。颇有沧桑感的山谷旁边，映着蓝如英国风铃草般的阴影，路过果树时便嗅到从南部乡村飘来的带成熟气息的空气。不一会儿，德拉古廷让我们下车，因为这里有口很出名的井。井边坐了两个上了年纪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他们身穿破烂的衣衫和鞋子，看上去却像清晨一般静谧而愉悦。“你好，”康斯坦丁说，“你们在这里干吗啊？”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这里远离村庄，他们也不像是有独立生计的人。“我什么也没干。”其中年长的那个说。“啊？什么都没干？”“是的，没干。”他说着，笑容把皱纹拉得很宽。他曾经在某处接受过道德教导，很明白对于在闲散中有意识地寻找快乐，诚实劳动有其意义。“丢脸哪，”康斯坦丁嘲笑道，“你朋友呢？”“他是来帮我的！”阿尔巴尼亚人说。盛着井水的杯子上，升腾起来自大山深处的雄伟气概，我们嘲笑起了自己的勤劳。

但回到车上，康斯坦丁就情绪大跌，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他又困又躁，一副想吵架的样子。他的话字字带刺：“我们会在格拉查尼察停一下，就是我说的在科索沃平原边上的那座教堂，但估计你们也看不懂，因为它是我们塞尔维亚人特有的东西，你们老外永远无法理解。这对你们来说太难了，我们过得艰难你们却顺利，我们深沉你们却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外国人写的关于我们的书都是高傲自大、胡说八道。在我们部门我读了国外出版的写我们的书，因为我得审查它们。他们的傲慢常常让我吃惊，西欧和美国在我们民族和文化面前惺惺作态，但其实他们和一个低劣的傲慢的农民差不多，他学了一点雕虫小技，用以抬高自己，显得比其他农民优越。就像是借给他人高利贷的人，不顾别人的痛苦托起对方的下巴说：‘啧，臭死了！’其实他自己还是像最低劣的农民一样无知。你读过约翰·冈瑟的《欧洲内幕》吗？真是本恶心、愚蠢的书！我能够禁止这本弱智书的销售真是太开心了！”

“但那也不是本坏书。”我反对。“它是本彻头彻尾的烂书，”康斯坦丁说，“作者什么都不懂，不知道的也不能瞎猜啊。”“是的，我知道有些部分写得不那么好，”我说，“但是有两处是相当不错的，比如对多尔富斯之死及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描写。而且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审查它。”康斯坦丁叫道：“为什么不应该？”“原因在于，”我说，“你非常清楚，除非你用极其严苛的标准，严苛到可以防止任何正经书的出版，否则你就不能够审查《欧洲内幕》。”“你错了，”他尖叫道，“有的东西你们的英国脑子懂不了，我们的塞尔维亚血液却非常确定，把这些傻子写的书踩在脚下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要让西方白痴把他们的口水滴到我们神圣的东西上？”显

然，他违背自己的信仰对《欧洲内幕》进行了审查，就像伏尔泰时不时地也会扮个鬼脸，把他的自由主义良知挂到门上，只为了从本性那里请个假。但康斯坦丁是在假装一个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愚蠢的普鲁士官员，一个尖刻的意大利职员，他和他们其实没什么共同点，因此这模仿他坚持不了多久，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下巴耷拉在胸口，肚子软塌塌地堆在前面。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老几岁，身体也有点肿胀。似乎在他摈弃格尔达的虚无主义时，不再认可任何一个整合过程，对自己的血液循环也不例外。

一路上，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们去摘绣线菊和野玫瑰时，他没和我们一起下车。通常我们采花时他会一道跟来，在我们弯腰采花时，聊到自己性生活或学术方面的种种精彩。“那晚我关上卧室的门”，当我们的手指伸向那些无辜的花茎时会听到，“瑞士牧师的妻子从衣柜里跳了出来，什么都没穿”，或是“你们真的理解质数理论吗？它对历史影响深远。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我可是个数学家呢，我……”但这会儿他却坐在车里，既没睡也没睁眼，只是闷闷不乐。我们发现了绝对比候鸟都精准的，显示一年成熟季节到来的证据，对这发现我们也只能自得其乐了。昏暗中我们看到一个穆斯林村庄，村里的杨树和清真寺宣礼塔给山坡投下了斑驳的光影。在村外的田野上有个老农民。他抬头望着阳光，从眉间抹下一把汗；他的样子，好像是在观察着什么临床症状。然后，他执行了自己把冬衣换成夏衫的决定。这个过程无比简单：他脱下了腰腿间缀有刺绣暗纹、髋部有神秘压线装饰的白色哔叽长裤，然后重新拾起锄头。他觉得自己的衬衫和衬裤完全就是夏天所需的衣物。他是对的，衬衫勾勒出整齐的腰线，衣摆也束得很好看。就西方人看来，大庭广众下做这样的调整很有趣。

车停到小山脚下，山顶上有座白色的新教堂。这时，康斯坦丁又恢复了生机。“这是我们塞族人为科索沃建的教堂，”他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平原，土耳其人曾经在这里打败我们，奴役我们；五百年后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奴隶。”他激情洋溢，脸红气喘，和高兴起来一个样。通向教堂的道路杂草丛生。我们走到高处，眼前出现一片大平原。德拉古廷紧握拳头，向着大地呼喊，下面躺着死掉的土耳其人。他觉得基督教教徒死后都入了天堂或是变成魂灵，而不是躺在地底下，更不是散落为根根了无生气的骨头，只有土耳其人才会湮灭得如此彻底。在沉静的科索沃，我们也沉静了。它不同于其他平原，不像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沃野，也不像英国东部的低地沼泽，它们平如地板，而它缺乏地质变迁的狡黠面孔，在这里，土地呈现的仍然是不规则的特性。它的原型是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土地被随意地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人睡在由平凡无奇的群山围成的摇篮里。怎么看它都不在地平面上，那里突出个肩膀，这里伸出只手托起睡觉的人的头。它明显地呈消极的卧态，并未以积极的精神去参与构建青山、森林和风景如画的山谷。它只有睡眠者的那种积极，维持最简单的剩余活

动，没有这些，睡眠就成了死亡，平原就成了沙漠。绿草顶出草皮，休耕地在等待中改变了自身的土质，青绿的庄稼超越了青绿，但只有这些简单活动，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天空笼罩于平原上方，平原不仅比平常看起来更宽，而且更高，这是天空的特点。云朵下的陆地绵延起伏，处在苍穹之下，可见，但无色，唯有空间。在这里，光生动起来。光线是黄铜色的，因为已接近夏天；它又很温和，因为经历了初春。它缓慢地游走，走得很高、很慢，探寻远处看不见的层峦叠嶂上的皑皑白雪，以及低洼地带新建住地的白色街区。奶油色、深棕色的绵羊群经过低地，蠢呼呼地走得步履艰难。房子和畜群表明这是一个充满人类活动的世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科索沃生活、工作、流汗。平原吸纳了他们，用自己的漠然废止了他们的活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我们所有不和谐的初始，以及我们后来悲剧的源头：人和自然的分裂。童年时我们跌倒在地，会为地面如此坚硬，弄疼了我们而感到失望。随着年龄增大，我们暗暗地、可能很奢侈地期望发生不可能发生的事，即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间的对应。在所有女人和许多男人的心里，认为在他们的生命里至少有一次，命运应将他们置于一片洒满月光的林间空地，给他们以爱，去匹配这样的美。我们迟早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地面并不关心我们会不会在它身上磕破鼻子，月光照耀的空地往往除了月光空无一物。我们用爱自我慰藉。爱是理智判断之果，和谐机遇之花。我们甚至忘记曾经傻傻追求的为何物。我们突然遭遇不协调的时刻。我们看见悲剧性历史事件的遗址，它们本应被摧毁却依然葱郁明媚，或者，我们抬着遗体走向墓地，途经花团锦簇的园子。这种不协调让我们忆起了曾经的失望，顿感无限孤寂。大地不是我们母亲的怀抱，并未对我们表现出特别的恩宠，我们不能指望它来袒护我们。它以草为骨血造就了我们，让我们在它身上踩踏，但这已是它愿为我们所做的全部。大地不是我们，是命运和上帝的象征，所以我们踽踽独行，诚惶诚恐。

科索沃比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历史遗址都更能唤起孤独感。它平和地向广袤无垠的远处延伸，徐风轻拂，仿佛柔布拂过镜面，未收割的谷穗随之转头。它生着一副无辜的面孔，却罪大恶极。这里尸横遍野，死的不仅是肉体，文明也被一同扔进坟墓。这里的传奇带着艺术作品的失实和固执，来纪念其中一次科索沃战役，而它的现实甚至比它的传奇更加悲惨。这次战役发生在1389年，由拉扎尔大公指挥，结果塞族人被土耳其人统治；之后又打了三场主要战役，塞族人在土耳其人面前崛起，用死亡证明对他们统治意志的彻底歼灭。十四年之后，拉扎尔大公之子在这里，为了争夺“塞尔维亚君主”这一名存实亡的头衔，而与另一个塞尔维亚贵族乔治·布兰科维奇交战。他们依附于土耳其苏丹，势均力敌，各领一半雇佣兵。没有谁获得了绝对胜利。他们经过不那么体面的妥协实现了共存，只有科索沃收获了许多坟墓。四十五年以后，败局更加确定。尽管又有一场科索沃战

役，塞尔维亚人却已无力再战。另一个乔治·布兰科维奇，前一个的侄子，是当时摇摇欲坠的塞尔维亚的君主。他和鼎鼎有名的约翰·匈雅提（一个效力于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及波兰国王弗拉第斯拉夫一道组成远征军，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恢复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没能独立，塞尔维亚却重获自由。交战各方签下严肃的条约，以多瑙河为界，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待在自己那边，土耳其人也是；整个塞尔维亚归乔治·布兰科维奇，同时归还他被土耳其人俘获并弄瞎双眼的两个儿子。但是，因为土耳其人那时正在小亚细亚遭受攻击，教皇觉得这是把他们驱逐出欧洲的机会，于是派红衣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率军敦促基督教队伍重拾兵戈。他们提出异议，说刚签了和平条约。红衣主教则申明，基督教教徒搁置或是违背与异教徒间的誓约完全合法。

天主教教会的独特风格在这申明中让人觉得舌尖余味浓厚。乔治·布兰科维奇拒绝像波兰人、匈牙利人那样背信弃义。原因很容易解释，他比其他签约方从条约中获益更多。事实就是这样，尽管这样的统治对土耳其的基督教教徒更有益。在他们被奴役期间，东正教从没有鼓励他们抛弃自己的荣誉。于是，乔治·布兰科维奇在天主教军队攻击保加利亚瓦尔纳的土耳其人时，选择了袖手旁观。军队到达时，苏丹祷告：“噢，基督，如果你是上帝，如你的信徒所说那样，那么请惩罚这些背信弃义的人吧。”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匈牙利国王和红衣主教，连同他们的多数兵士，都倒在了战场上。但是战争断断续续又打了四年，最后在科索沃这里终止，了结于一场打了三天的战役，为平原又添了五万亡灵。这时候，因为基督教内部的分裂，以及和异教敌人的联手，塞尔维亚早已士气低落。据说他们在平原周围的山坡上守候，只等战役结束，好在死人身上劫掠财物。

所以，在第一场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体会到了失败的含义。不是那种努力过程中必经的失败，在历史轨迹中，类似的教导他们经常接受，而是全面的失败，灭绝了他们的集体意志以及所有的个人意志。第二场科索沃战役告诉他们，人的生活层次可以低得毫无存在感，以至于连失败都不能获取。第三场让他们明白，这层次还不算最低，对于臣服的民族来说，有一种地狱边缘状态，既非胜利又非失败，而是流产，他们一旦有生的迹象，遭遇的即是流产。还会有第四场，证明更多可怕的教训。第三场后不久，在1453年，拜占庭陷落，奥斯曼帝国能够专注于掌控巴尔干半岛的任务。塞尔维亚人迫于罗马天主教势力不敢对抗。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和保加利亚人对东正教的忠诚，以及对异端波格米尔派的支持，对他们心生怨恨。夜幕笼罩长达四个世纪，地狱边缘变成了地狱，而且充分展示出地狱的特征：混乱。

成为土耳其士兵的斯拉夫人，尤其是波斯尼亚塞族人，更是受到了教训。他们从他们的基督教母亲身边被带走，受训后宣誓背离基督，服从于充满

压迫而又草率的奥斯曼法律。当土耳其人自己警觉到法律的问题，试图进行改革时，那些土耳其士兵还站出来反对改革。但是他们仍然记得自己是斯拉夫人，尽管周围的压力试图迫使他们遗忘。他们感到，在对抗土耳其人，甚至反对土耳其法律时，他们是在对抗那些把土耳其法律强加给他们、以替代他们的基督教体系的人。所以，在1831年第四场科索沃战役中，当反叛的土耳其士兵击败苏丹的皇家军队，在战场上留下无数土耳其死尸时，他们觉得自己洗刷了在第一场科索沃战役中留在基督教斯拉夫人身上的耻辱，尽管他们自己其实已经是穆斯林。可是他们的基督教斯拉夫同伴却不支持他们，因为只看到他们与土耳其压迫者属于同一教派，也把他们视为敌人。于是，土耳其士兵的反叛以失败告终，而且新添一笔糊涂账，最终击败他们的土耳其元帅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斯拉夫穆斯林，而是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叛教者。这里表现出常被史学家弄得晦涩费解的关联。一个民族会在厄运的逼迫下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存在，这不是生活，只是毫无意义的荒唐，像癌细胞一样恶性滋生的荒唐。

科索沃诉说的一直是自己的失败。这些失败被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化解，这是真的。19世纪初，他们在卡拉乔治和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的领导下，从土耳其人手中重获独立，然后在各大强国的压迫中奋力前进，直到在巴尔干战争中，让老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独立出来。关于这次胜利，科索沃只字未提。1912年塞族人赢得独立的战争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在东南方几英里远处的库马诺沃。甚至在这之后，它又品尝了失败：在这里撤退的塞族军队遭遇了飞向阿尔巴尼亚边界的德军战机，受到轰炸；尽管他们跨界追敌，三年后归来，仍然没有什么壮举发生。这就是失败的形象，满眼失败，就像失败有时候充斥一个人的一生或是一个时代一样。

我们看到的白色教堂，是塞尔维亚爱国妇女协会修建的，以纪念收复的失地。教堂内部，用石灰水粉刷过的墙上挂着许多致谢牌匾，比一般的题词显得更加热情洋溢。教堂外部，在正午阳光投射下的短影下，有协会主席的墓地。墓碑上说，她穷尽一生竭力工作，点燃同胞的雄心，去解放被奴役的兄弟，临终时用最后一口气表达了自己想葬于科索沃的愿望。我们站在十字架旁边时，从下面山坡上的白房子里，有两个男孩走出来。见到我们后，他们就跟着我们走。野蛮、不好意思的好像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他们在繁茂的杂草里绕着我们走来走去，走了大概十码后终于停步。他们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吮着，眼睛像暗黑的小隧道，一直通向他们的动物天性。

康斯坦丁冲着他们喊："小东西！小东西！"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距离几英尺远时，他们告诉他，白房子是孤儿院，也是那家爱国协会建立的。现在就剩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不到上学年龄。两个小男孩，幼童年纪，被独自留在孤儿院一上午，而且光着脚，这看来不符合西方观念；但

他们看起来很不像是长在孤儿院的：身体健康，表情安宁。很有可能这里有种睿智的斯拉夫无序状态，就像克罗地亚的休养院一样，容许人性按照其不可预测的设计来发展。康斯坦丁的魅力吸引小孩来到他身边。他问小孩："为什么把孤儿院修在这里？"他们的回答是官方说法的稚嫩幼童版，像小山村里用作爱国庆典的彩旗和花环一样动人。他们说到了辉煌的古代塞尔维亚帝国，土耳其人在科索沃进行的无耻破坏，长达五个世纪的痛苦奴役，塞尔维亚人民用勇气争取的解放，以及和古代塞尔维亚一样辉煌的南斯拉夫的建立。"你们知道吗，"康斯坦丁问，"我们民族唱的歌，关于可怕的圣维特斯日？"他们立刻开始了，显出斯拉夫小孩超强的文字记忆力：

穆斯奇·史蒂芬喝着他的冷酒，

在他的宫殿，纯银装饰的宫殿，

在他堂皇气派的府邸，

他的仆人瓦伊斯蒂纳在倒酒，

他深深饮了口冷酒，

对他的仆人说：

"瓦伊斯蒂纳，我可爱的孩子，

我想小憩一会儿，

喝点酒吧，吃点饭吧，

走去我堂皇的宫殿门前，

看看明净的夜空，

告诉我，

银月是否在西沉，

晨星是否在东升，

我们是否该启程，

去向美丽平坦的黑鸟草原。"

小男孩们吟唱时看起来高贵而虔敬。其中包含的民族主义，是我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们一致认为的恶习和世界不幸之根源。我不能想象原因。每个人都有令人赞叹的价值，因为他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独特的经历赋予他对现实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汇总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现实图景。人类想要掌握命运，需要拥有这幅图景，因此必须鼓励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培养这种意识。同样，每个国家作为有相同经历的人的集合，也有自己独特的现实视角，有助于我们的解脱，所以也应该同样鼓励国家意识。让各个种族坚守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吧，尽管可能对游客造成不便。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去混淆民族性，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想成为自己的愿望；不能用帝国主义去混淆它，帝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想阻止其他民族成为他们自己的愿望。实际上，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其实是当帝国主义摧毁一个民族的特质时，这个民族进行重建的努力。譬如，芬兰的民族主义就是受沙皇俄国挫伤后的输血，伴随着对邻国的防御而不是进攻的感觉。在这里，我当然可以站在旁边毫无保留地看风景，看两个小男孩一面说着严肃的话语一面模仿英雄皱起眉头，看康斯坦丁用塞尔维亚眼泪充溢自己的犹太双眼，看我丈夫带着僧侣般的敬畏躬身面对孩子——英国人看到受纪律约束的童年时会有如此反应，看幸福坟园里的花圃和十字架时，看当地教堂的穹顶时，看如农场般宜人的孤儿院时，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伤痛会产生，如同我们在路边采摘的野玫瑰和绣线菊，安然无恙。

景色秀美，但相对于我们眼前绵延四十英里（约64公里）、因悲剧变得沉重的平原来说，它却遗憾地缺乏质感，变得无足重轻重。假如一个巨人用右手擎起科索沃，而用左手拾起我们、教堂、农舍还有坟墓，他必定向右倾斜，因为负重太多。对他来说，左手上除了一点尘埃别无他物。说自然无视人类，算是对自然的恭维。它对人类的质和量都表示不满意，给予的总是苦大于乐，以让人类变得更强大。最简单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食物：好牡蛎对味觉的满足，总是不如坏牡蛎倒胃口来得那么剧烈；好牡蛎吃了不能让人长命百岁，坏牡蛎却可以让人一命呜呼。科索沃的痛苦不能由它带来的乐趣进行平衡。修建教堂的妇女们离家辗转，在持续的折磨中变得了无生气。即使她们修建的是一个新的国家，激发起稳定的快乐，这个国家也会因为意志对物质对象的抵制，或是指向同一结果的不同意志间的相互冲突，而变得黯然无光。通常来说，指向同一结果的不同意志，也不比指向不同结果的毒害更轻。但是科索沃的痛苦极其纯正，苦上加苦，整整五个世纪中每代人都有新鲜的痛苦滋味。罪恶的暗夜铺天盖地而来，而且看不到尽头。

平原上空，柔软的白云堆成城堡，后面是茫茫的蓝色天幕。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也必将辞别这个世界。我不能迁入幸运的星球，在那里，天赐之福会迅速拭干罕见的泪滴。这是我的杯子，我必须饮杯中之物。我焦虑地想知道杯子里盛装的是什么。“世界是悲惨的”，可是，到底有多惨？我想知

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结果，我们是否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大难，在宁静中尝试另一条生命之路，既非悲剧又非喜剧。当然不是喜剧，喜剧只是悲剧降临前的生活，像电影里的小丑一样荒唐可笑。他咧嘴笑着，跳着，没看见身后就是正举着棒子要打在他头上的警察。另一条生命之路必将超越喜剧和悲剧，拒绝以夸大的性质标记自己，而会从各方面脱离这样的性质。

我发现，自己的意识已经从本质是悲剧的主题上游离了，也不想思考悲剧给人带来的伤害，倒是沉溺于某种乐观主义。在西方，是乐观主义而不是坚忍刚毅在支撑我们。我告诉自己，生活肯定不都是那么悲惨的，也许科索沃的失败并不是万劫不复的灾难。也许站在土耳其人前面的是一群野蛮人，顶多给人以狼群的印象，其死亡只是向世界展示活狼群和死狼群间无趣的差别。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不幸被《剑桥中世纪史》的编辑们选中、撰写关于塞尔维亚帝国这一章的作者。这观点似乎也获得了一些支持，支持的人和我们一样，离开教堂后行驶在平原边缘。老塞尔维亚的民众比马其顿民众更加艰难，乍一看，19世纪的旅行者也会赞同基督教土耳其人的错误观点。村里街道边，他们的房子破败不堪，空空如也。他们的衣服总是很脏，没有一针一线的刺绣装饰。他们盯着陌生人看时，目光空洞，只有一点无精打采的恐惧。这恐惧不合时宜，是从以往的岁月留下来的残余，智慧也未能将它洗净。

事实上我知道，除了性格积淀，还有许多原因导致女人们这样。她们已经不是科索沃战争时期斯拉夫人的典型代表了。大多数贵族死在战场上，其余的精英在之后的三百年间移民去了奥地利。留下的这些人，只承受着土耳其统治的弊端，一点没享受到让马其顿从废墟中站起的优势。这里没有像比托利那样富裕的首府城市，也没有像斯科普里、维勒斯、泰托沃、戈斯蒂瓦尔那样的贸易中心，而且没有如画的风景以吸引土耳其富豪来修建别墅。它就是一片纯粹的农地。土耳其人掠夺了地上的粮食，运回君士坦丁堡，以税收的方式拿走了农民最后的一点东西，不做任何补偿。这片平原也许会盛开文明之花，然后面目全非。也有可能，房子和农民展现给世人的是虚假的一面，这些妇女并不像她们看上去那样。但是此时，我白痴般地看着她们，好像格尔达一样，向她们灌输的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毫无用处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也许发生在科索沃的，没什么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也许悲剧的后果是鲜血，但永远不会伤及命脉。

格拉查尼察I

可惜我在这里无法停留很久。科索沃平原上，战场遗址往南几英里的地方有座房子，显示着和塞尔维亚人一起倒下的，是怎样的文明。它是民族主义的雄辩言辞中不希望面对的东西的证明，在它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狡辩的空间。它是尼曼雅帝国的一部分，是对帝国的本质无可辩驳的证实。我们沿着笔直的道路行驶，经过暮气沉沉的村落、牛羊、家禽，牲畜们全都没精打采，农民也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人很少，整片土地像天空一样空荡荡的。我们转向上山的道路，芬芳的野花郁郁葱葱，几乎遮掩了旁边地里的庄稼。恐怕我得说，这里本不是片沃土。它经历过几百年贪婪且无知的耕种，现在又再被开垦，得到的无异于赤贫。目所及处，没有丰裕的感觉，除了芳香扑鼻的漂亮金银花在树篱间蔓延。然后，我们路过一片长着灰绿色嫩玉米的土地，看到矮树间有一些小块田地。矮树中央有一个玫瑰红的大圆顶，撑起它的，是下面四个小点的圆顶，也是同样温暖而透明的颜色。就像所有的宗教建筑一样，它的显眼形状，也指示出众生面相之上的现实，以及超越无序众生的秩序。

哪怕从这个距离，我们都能看出格拉查尼察是和沙特尔大教堂类似的宗教建筑。尽管它看上去更简单、矮小一些，背后的思想和情感却一样复杂，庄严的主题也并无二致。但是，就好像沙特尔大教堂那样，宗教建筑应该独立地存在于那片土地，脱离其修建初始及之后的所有法国元素——独立于巴黎，独立于索邦神学院，独立于法兰西学院，事实上，甚至独立于塑造教堂的一点现代文化元素，以及方圆几英里的作为承载该文化的物质根基的安康生活的任何痕迹，没有肥硕的母鸡，没有一磅黄油，没有一瓶好酒，没有一张舒服的褥垫。不同文化时代的杂糅在拥有金字塔、吴哥窟、印加古迹的非洲、亚洲或美洲很常见，但在欧洲，我们还真不怎么习惯。我们的历史悲剧可能污损了些许段落，但它们很少会将整卷书的某些页面撕毁、只留下着色的扉画来嘲讽我们。但是在格拉查尼察这里，灾难留给我们的，只有格拉查尼察。

我们到达教堂的时候，周围的废墟被人们试图修复的努力变得更像一座废墟。格拉查尼察被一圈光秃秃的栅栏围绕，掩映在几棵树下。可惜，它和征服者们所修的清真寺周围的花园不一样，那些花园里有喷泉、水景和大理石座椅。它这会儿堆满了砖石，远点的一边，是还搭着脚手架的半成品建筑。教堂阴影下的凳子上，二三十个年轻士兵在坐着吃饭。一名军官站在旁边，和一个高个子白胡子神父以及一个穿着本地衣服的男人在说话。他们转过身，看见了我们。本地打扮的男子拍着手向我们跑过来，喊道：“康斯坦丁！康斯坦丁！”“瞧，他认识我，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康斯

坦丁说，在这种情形下他总会这么说，只是这次说得热情不足。之前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他还记得和朋友分享乐趣时的兴奋感；而现在只像是想起在一次消费后得到报偿后的平淡感。“他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师，”他解释说，“这些人我都认识。他明显是在负责这座新楼。不知道是什么楼。”

建筑师也是这么解释的，他高兴地把头贴在康斯坦丁的衣领旁边。他在盖一座新的招待所，这很紧迫，因为修道院实在太穷，需要新的设施来筹钱。每年圣维特斯日和科索沃战争周年纪念时，都会有数万朝圣者前来。这里容纳他们完全没问题。这些朝圣者一面感受着度假的惬意，一面因为沉思于民族悲剧而痛苦。他们通常睡在夏日炙热的土地上。有点钱的农民们，会把钱花费在离这里最近的市镇——普里什蒂纳——的小旅馆里，筹钱的计划便是把这些钱赚过来。建筑师接着说下去，为了让我们听懂，他说的是法语：“在这里非常愉快。为了这个奇迹这块珍宝，我也要做些贡献呢，教堂本身令人赞叹。你们看！

“在这里工作感觉很棒，因为在贝尔格莱德，人们已经忘掉自己是谁，忘掉我们其实是吃红椒的民族了。看，那位老修士。知道吗？我刚来这里时，希望说服修道院长、修士们和他们的主教，让我拆掉门廊。我知道，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政府也会允许的。于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不让格拉查尼察恢复米卢廷国王修建之时的美，那实在遗憾。但他们不肯听我的话，也许他们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权利。门廊的确有些历史趣味。它修建时，正是土耳其人理论上禁止修建和修缮所有基督教教堂的时期。它的修建理由十分罗曼蒂克。索科洛维奇家族里有个小孩被土耳其人抓去当兵，最后成了内阁总理。他凭借职权庇护着所有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应允了他兄弟的请求。他兄弟跟随神父，后来被任命为佩奇大主教。但我是建筑师，不是历史学家，修士们不根据我的希望做事时，我就非常生气。我转身背对他们，走出我们刚才待的那个房间。我走到这里，坐在教堂墙根下的石凳上，气冲冲地用脚踢面前的石子。正在那时，这个白胡子神父走出来警告我，说他们认为我最好明白，如果我晚上来拆了门廊，他们会把我逐出教会。这位勇敢的老人好像还活在非正规军时代，满脑子的私运步枪、炸弹、夜袭。这就是他认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心生怒气的人。当然，这样的方式并非完全不适合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太暴烈了，非常暴烈。你走进去就会发现。如果你看看头顶，就会发现，我们不是野蛮人，但是非常暴烈。”

我们穿过尘埃，走向教堂时，他又阻止了我们。“是的，我们当然不是野蛮人，”他接着说，“看，你们看教堂。这座建筑身上没有偶然。它的修建一点也不简单，很是复杂精细。这里处处是玄机，其中的精妙我很难对建筑外行解释。支撑穹顶的塔柱被建筑师移离原来合适位置的轴线，以便达

到轻巧空灵的效果。只有技艺娴熟的人才能这么做。建筑师这么做之前，掌握的理论和经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啊，他什么都懂。想想吧，这里的地下有水，很多水，就在距离地基三英尺之内。但他很冷静，对自己的知识充满自信。我可不敢在离水这么近的地方修建这种规模、这么重要的建筑。建筑师敢，而且他的大胆被证明是正确的。建筑建好了六百年，仍然和初建时一样，并没有下沉一点。这样的事情，野蛮人可是完全做不来的，有文化的民族也很难做得成。”由此证实，巴尔干人意识到我们可能怀疑科索沃被破坏的文化灾难，他们觉得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幸。“但你们得走进去。格拉查尼察的内部会告诉你们所有修建它的建筑师。”

的确。它向我们传达的竟让我们并不陌生。巨大的穹顶向下延伸到三个正厅，用庞大粗壮的柱子分割，柱顶上五彩缤纷，各色的壁画布满每一寸墙壁。这里有种强势感，是动物的野性，是欲望的膨胀，可以将高尚的或是低俗的欢愉一饮而尽，是眼里的绯红、舌尖的美酒，神性与兽性共存。实际上，这里有一种类似于都铎王朝末期的氛围；这样的教堂也许正是汉普顿宫的建筑师们会修建的，如果不是因为那时哥特风席卷欧洲的话。这是惊人的巧合：科索沃战争之前约七十年，修建格拉查尼察的塞尔维亚国王像极了我们的亨利八世。

当时在位的是国王米卢廷。公元12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尼曼雅家族驻守在黑山边界的一个小城堡里，靠近亚得里亚海岸线。家族里出了一个被称为圣萨瓦的天才；他的兄弟——前任国王史蒂芬，也是个极具天赋的人。两人联手建立起稳固的基督教塞尔维亚国。他们的后人将其扩张，北至多瑙河，东至瓦尔达河，南至拜占庭境内。王朝延续一百五十年后，米卢廷登位。他本人及他的皇室职能，与亨利八世都极其相似。

米卢廷为他的国家创造了奇迹，但对许多臣民却不够厚待。他对女人热情似火，但抛弃她们或是把她们用作政治工具时，则冷如冰霜。他虔敬热情，却毫无顾忌地把宗教用作国际关系的筹码。他的磅礴大气仍然从坟墓那头散发着魅力，但是，他的内心无疑已被忧郁吞噬。这里的壁画中也有他的画像，呈站态，须髯如戟，身着塞尔维亚皇家盛装，显然是对拜占庭风格的模仿：豪华面料制作的束腰长袍十分硬挺，上面镶嵌着各式珠宝，无视里面包裹的血肉之躯的舒适感，只是束缚它，让它显得富丽堂皇。这套礼服让人自然回忆起都铎王朝末期的画像，光彩夺目的长袍包裹起亨利八世的脑满肠肥和伊丽莎白神志不清的衰弱，呈现出他们的君王贵态。礼服是在讲述基于地位观念构建的世界。国王被视为神的使者，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因为大家认为，只要他被加冕为王，他就会行使天使的职责——社会上都这么认为。站在他旁边、和他同样奢华的，是他的王后西蒙尼斯，拜占庭帝王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之女。她是米卢廷的第四个妻子。他努力爬升，和她齐平，在漫长的日子中赢取权力，以报复先前的

失望。

关于这失望，我们在关于当时施加痛苦一方的文字记载中读到过。根据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帕奇梅雷斯的叙述，拜占庭皇帝迈克·帕列奥列格曾希望与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乌罗什结盟，提出把自己的二女儿安娜嫁给史蒂芬国王的次子，也就是这位米卢廷。迈克的妻子不仅是皇后，也是天生的贵妇；她不赞成这个计划。新娘和她的随从启程之前，皇后派出一些官员和一名主教，去探查塞尔维亚王宫是否适合她的女儿。他们的探险结局令人遗憾。他们被眼前这片土地上的贫困惊呆了。因为某些原因，中世纪时，任何人出访他国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拜占庭人更容易对别国形成尤其鲜明的负面印象。很长一段时期，这也有真实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总是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甚至高出很多，以至于在11世纪，他们的一位贵族小姐嫁给威尼斯的塞尔维奥总督为妻，她奢侈的生活习惯（包括用金质餐具进餐和佩戴手套等），让她被指责应该下地狱。后来，优越性不那么明显时，拜占庭人也变得不再那么强势，反而有些偏狭，总是絮絮叨叨地开始抱怨，就像生活宽裕些的英国人抱怨法国的咖啡、美国的火车、德国的床上用品一样。这种抱怨，远远超出这些东西在正常人那里所能引起的合理恼怒程度。拜占庭使者无疑属于这一类，他们回去报告，说塞尔维亚人就靠着猎物和盗窃来的东西勉强过活。其实那时候塞尔维亚人已经在大规模地进行木材、牲畜、小麦、油品贸易了，还发掘了几座富矿，而且罗马人建立的工匠行会，仍然在积极地进行运作。

这些拜占庭人的偏狭，在面对他们所不熟悉的西方教会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乌罗什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安茹的伊莲，她是罗马天主教虔诚的谨行派。据说，她广施仁爱，才智卓越，人们对她赞誉不绝。她在恢复被蒙古人践踏的土地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但是她以极端的方式践行天主教禁欲主义，这也是后来清教主义的根源。在她的影响下，她残疾的大儿子德拉古廷，养成了在四周布满荆棘和尖利燧石的墓地里睡觉的习惯。她的丈夫尽管还属于东正教徒，但也被她的想法主宰。当拜占庭的官员们和主教到达他的王宫时，国王态度冷淡。听说来者是安娜公主的部分随从，接下来会来更多人，国王尖酸地说真是抱歉，他和他的家人都不习惯这样的奢华排场。然后，在我们都熟悉的氛围中，国王带着来访者去见他大儿子德拉古廷的妻子，一位匈牙利公主。她衣着朴素，正在纺羊毛。史蒂芬国王说："这才是我们这里喜欢的妻子类型。"这种对生活的态度深深地触动了先行随从们。这里的公主们十年如一日地向公众展示简朴的生活方式，几乎快要倒地而亡。她们身着衬衫，尤显消瘦；卧室没有生火取暖；她们很早就上床睡觉——她们的睡眠时间一定过于"充足"了。

拜占庭人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无暇顾及自己显而易见的惶恐不安是否会给主人留下坏印象，立刻转身骑马返回，在奥赫里德拦下公主。他们不知道

该怎么做，是应该把公主直接带回君士坦丁堡呢，还是等候命令呢，或是让她继续前行然后被召回？他们只好在那里徘徊，直到来了个塞尔维亚大使，史书记载，大使名叫乔治。他看上去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是被派来阻止他们的送亲行程的。正如同拜占庭使者们不喜欢塞尔维亚皇室一样，后者也很不喜欢前者。乔治上来就说自己在来路上遭到了抢劫，不出所料地，拜占庭使者们说强盗连自己国家的大人物都不放过，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外国人留情呢。乔治还循循善诱，引导使者们犀利地提问，质疑迈克·帕列奥列格和史蒂芬·乌罗什之间缔结的婚姻协议条款会不会被忠实执行。乔治用明显的躲闪之词来答复。晚上，拜占庭使者们的马被盗走，而且发现指望不上当地卫兵的帮助，尽管当地人愿意提供替代马匹，很低劣的马匹。于是，安娜公主和随从仓皇回国。

这件事并没让当时作为王子的米卢廷感到高兴，尽管他可能更心疼的是那些马匹。对于家人们的想法，他的反感形于颜色。他厌恶简朴，他的一生都在表达这种态度。罗马天主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用以赢得那个被称为教皇的人的支持而已。教皇行使的权力，实在大得让人心生妒忌。他努力奋斗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他的成功被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辉煌的拜占庭帝国所认可。但他的家庭生活，在实现欣欣向荣之前，却很需要一番等待。他虔诚的长兄德拉古廷背叛了他父亲史蒂芬，在其妻兄，即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四世的帮助下，打赢了黑塞哥维那战役，为自己夺得王位。因为德拉古廷深受罗马天主教母亲的影响，所以他母亲无疑对他的反叛持同情态度。也许他们都觉得史蒂芬·乌罗什笃信东正教这一理由让战争显得正义，尽管拉迪斯拉斯是来自亚洲某无赖部落的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在这场圣战中，是不太合适的同盟。德拉古廷战胜后，将父亲关进监狱，然后领导国家背离东正教，转投罗马天主教。老百姓了解到这些情节后，自然觉得反感。后来，德拉古廷和拉迪斯拉斯攻打拜占庭失利，必须划割大片塞尔维亚土地作为赔偿，他不得不退位将王位给了米卢廷。退位后的德拉古廷在波斯尼亚住下，这是他的匈牙利妻子带来的嫁妆之一。他皈信了罗马天主教，让教皇派给他一队方济会修士，去劝投他辖域内的波格米尔派信徒和东正教教徒。于是，开始了这一时期野蛮凶残的宗教迫害。身心俱伤的波斯尼亚人宁可选择伊斯兰教，也不选罗马天主教，这倒让土耳其人在欧洲东南部确立下自己的关键地位。德拉古廷真是个可悲的家伙。

米卢廷加冕后，觉得没什么必要释放他父亲。老国王像李尔王一样，一年后在阿尔巴尼亚监狱里郁郁而终。之后，塞尔维亚就走上了稳定繁荣的康庄大道，这正是米卢廷被视为幸运的统治者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塞尔维亚就像一座花园，主人是长着“绿手指”的好园丁。发掘的富矿为他们奉献财富，美酒、粮食、油品和牲畜汇成一条丰腴之河，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对外，米卢廷一直执行针对邻国弱点的扩张政策，向南占领无序的拜占庭

帝国，他的第一次婚姻帮了他的忙。他的岳父是尼奥帕特拉斯的约翰公爵，当时最有权的专制君主之一，其在希腊各岛上凭借自己的势力对抗君士坦丁堡。后来拜占庭派鞑靼人出战米卢廷，米卢廷借口说要巩固自己在西方的地位，遣走约翰公爵的女儿（这一做法很像亨利八世），又娶了伊丽莎白——德拉古廷的妻子及匈牙利亚洲王拉迪斯拉斯的妹妹。但是这桩惹眼的新婚姻有几点必让人厌嫌。塞尔维亚帝国内外的罗马天主教教徒觉得这是桩丑闻，不仅因为米卢廷离了婚，还因为新娘是修女。东正教教徒觉得是桩丑闻，因为新娘是他兄长的妻妹，属于禁婚范畴。米卢廷这边的人也不喜欢她，因为她是匈牙利人；德拉古廷和新娘哥哥的联盟对塞尔维亚来说，意味着失败和领土损失。人们无法相信这场婚姻带给米卢廷的利会多于弊，况且他的动机也不是出于激情。人们会把它和亨利与安妮·博林注那场既非理智又非激情的婚姻进行类比，它们大体上是类似的。没过多久，米卢廷也遣走了伊丽莎白，娶了安娜·特尔特尔——乔治·特尔特尔的女儿。乔治·特尔特尔是暴虐但能干的保加利亚沙皇，斯拉夫血统和亚洲血统各占一半。蛮族侵袭后，东西方都觉得可以在东南欧找到结合点。

但安娜也没能待得长久。在米卢廷的统治下，塞尔维亚雄厚的财力，加之他虚伪狡猾但行之有效的政治才能，让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心存戒备地认可他的权力。那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在小亚细亚越来越壮大，成了更危险的存在。于是，从父亲迈克·帕列奥列格手里继承了皇位的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与米卢廷签订了和平协议，并提议由他孀居的姐姐尤多西娅盖印见证。这提议没法实现，除非米卢廷能即兴创作一篇法律幻想曲，堪比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书。米卢廷不能再迎娶任何人，因为东正教的教会法规明确禁止第四次婚姻。但这样的障碍米卢廷也能跨越。他现在宣称他的第一次离婚为非法。为了支持他的说法，他指出，东正教神职人员从来不允许在礼拜仪式中提及他的第二任皇后的名字。事实上，真实原因是她和他的联姻属于禁婚范畴。说自己第一次离婚无效的托词，意味着不仅第二任，而且第三任妻子与他的婚姻也无效，她们的孩子都属于私生子。这点他并不在意。因为尽管他有两个儿子受到影响，但他想要的并不是一个王位继承者那么简单。米卢廷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通过父位获得塞尔维亚王权，通过母位登上拜占庭王座。而且这也是对迈克·帕列奥列格身边那群蔑视他的宦官的终极报复——他们曾被派来查看他够不够格娶安娜公主。他收获的时刻终于来临。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起初的那位，已经去世。尽管东正教对待鳏夫寡妇的再婚，并不比对离异人士的结合更为宽容。他总算成功地清除了自己的第二以及第三次婚姻。眼前这桩，他深思熟虑要算作自己第二次婚姻的这桩，他只需做一点轻微的赎罪，便唾手可得。

但是拜占庭皇帝的姐姐尤多西娅拒绝了这个机会。她以两套托词反复推托，要么说自己深爱逝去的丈夫，不再愿意经历世俗的婚姻；要么说如果

自己再婚，希望新郎是个比米卢廷更值得尊敬的人——米卢廷在婚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实在惊世骇俗。不过，米卢廷当政期间，并没有什么行为恶劣得足以匹敌亨利八世对安妮·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处以的斩首极刑。从某些方面来说，米卢廷比亨利八世开化得多，尽管前者比后者早一百五十年，且所处的国家晚三百年才实现基督教化。若是亨利八世也有一位精力充沛的母亲，曾经发动攻势阻止他的每一次离婚，且孜孜不倦地在本国及邻近的疆域进行罗马天主教教义宣讲，亨利八世大概会将孝道抛诸脑后。米卢廷的这位母亲，史称“安茹的伊莲”，公开谴责米卢廷除了第一桩之外的所有婚姻。她不仅支持在塞尔维亚的西界上的波斯尼亚的罗马天主教儿子，而且试图让东边的保加利亚沙皇改变信仰；在米卢廷驾崩之后，她才离世。我们知道托马斯·莫尔注爵士身上所发生的事，塞尔维亚的大主教雅各布相比莫尔爵士走运得多，他无畏地反对米卢廷迂回曲折的婚姻策略，但既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失去大主教的职位。米卢廷的野蛮已暴露得淋漓尽致。安德罗尼库斯皇帝满怀悲伤和耻辱地做出决定，为塞尔维亚的忠诚支付了比原计划更高昂的代价。因为他姐姐尤多西娅拒绝作为牺牲品，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西蒙尼斯贡献出来，她时年仅有六岁。

历史对这些女孩子的付出只是一笔带过。她们一离开育婴室便被送到遥远的他乡，经历被强暴、流产的痛苦。围在她们周围的，是一群操着不同语言、遵循不同习俗的陌生人。这类做法并未被废弃多久，尚不能被鄙弃为远古的野蛮行径。比如，比利时公主嫁给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王储，人们觉得她很可怜。婚期之时，她远未成年。但是婚礼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被推迟。当然，也没有必要为了制造恐怖效果，而夸张早期性行为的恶名——非要说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嫁给善良的年轻新郎的情况，比四十多岁想嫁未嫁的女人要糟糕——这也是在骗人。如果童婚真像现代社会描述的那样可怕，白人族群早就已经灭绝。伊拉斯谟布道时说，尽管十来岁的女孩结婚并立即生子很常见，他本人认为这个年纪还是太小。我们英国的亨利七世出生时，他母亲年仅十三岁，后来，她长成了精力旺盛的女性，对学术颇有兴趣。

但这些小公主的出口贸易，无疑让人十分反感。童妻要想过得幸福，必须有一位朋友般温柔的丈夫，生产时围在四周的必须是熟悉的面孔。但这些皇室的孩子被送往陌生的土地，数年甚至永远都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接手她们的男人，在证明自己头脑和行为都充满血性之前，是不会把上述珍贵的礼物恩赐给她们的。这些婚姻往往标志着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各个势力间的和平协议。小女孩们被送到敌人的床榻，见到的丈夫残酷得如同童话故事里的蓝胡子。13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每个小孩在晚上想起鞑靼人都会不寒而栗，在地上穿行的矮个子黄种人简直如同来自地狱的鬼火。但是，当迈克·帕列奥列格需要借鞑靼人之力对抗保加利亚人时，给他们的首领查

莱伊王子送去了超凡的礼物。送礼大使是“基督全统”修道院的院长兼神父。他的行李中有个轻便圣坛，以华丽的布帘做屏障，嵌上圣像，以及工艺一流的十字架，配以昂贵的圣餐杯盘供庆典之用。同行的还有皇帝的一个私生女，名叫尤弗罗西尼，被许给鞑靼首领当新娘。她还远不足十岁。当送亲队伍到达鞑靼人的南俄罗斯营地时，查莱伊王子已死，于是他的儿子诺盖取而代之和她成婚。新郎好奇地看着她的套装中拜占庭童帽上的珍珠，猜想那可能是避雷的护身符。关于尤弗罗西尼后来的生活，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儿子中的一个在保加利亚政治动乱中被绞死。迈克·帕列奥列格还有一个庶出的女儿玛丽亚，为了执行同样的使命，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嫁给巴格达的鞑靼可汗，即成吉思汗之孙。值得一记的是，这些亚洲入侵者带给尤弗罗西尼和玛丽亚的惊恐不相上下。尽管中世纪出现更多的社会暴乱，战场上却更加严守骑士精神。囚犯不得被处死或用以勒索赎金，除非是皇族或贵族成员，而普通被俘士兵被缴械后即可释放，在真正的战争以外没有杀戮。遵守这些规则的社会，和我们一样，会被鞑靼人吓得胆寒。他们屠杀百万生命，铁蹄肆虐处无视一切人权。很难相信尤弗罗西尼和玛丽亚不是活得战战兢兢，不论是孩童时期还是成年以后。

所以，出生在拜占庭上流社会的小女孩西蒙尼斯，她的遭遇不算那么坏，但也够糟了。那时期的史学家记录下她的献身情形。安德罗尼库斯皇帝离开君士坦丁堡，带她到米卢廷那里。那时，四旬斋刚开始。那年的冬天漫长而残酷，冻死了许多生灵。大地覆盖在冰雪下，河流也还没解冻。皇家车队朝着萨洛尼卡缓慢行驶，偶尔停下来处理一下地方事务。一天晚上，他们停在了大主教的修道院，清晨一同参加了弥撒。之后，大主教尽力向皇帝指责这桩受到诟病的婚事，并希望能和西蒙尼斯谈谈。但安德罗尼库斯只是草草敷衍几句，弱者也只能如此。他告诉大主教他们必须继续前行，让大主教为他和他女儿祈福。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又踏上向北的旅程。后来，皇帝用书信告诉大主教，他决定复活节时不按照习俗从大主教手里领受圣餐，这项任务将委任给其他神父。但同时皇帝又给大主教送去了财物，这是一项季节惯例。

皇帝离开修道院时，心情一定非常沉重。因为他明白，大主教是对的。而且皇帝特别疼爱这个小女孩。之前他痛失过另外几个女儿，她们还在婴儿时就夭折了。她的名字记录着他的关爱，起名字时他举行了一些仪式，因为害怕像失去她的姐姐们一样失去她。她出生时，他在十二门徒的圣像前点起十二根一模一样的蜡烛，蜡烛燃烧时为孩子念诵祷告，最后让她接受的庇护来自燃烧时间最长的蜡烛对应的圣人。庇护她的是圣西蒙，结果却出人意料。女儿在六岁时就被交到年长于她四十岁的新郎之手，由于圆房太早导致一生不孕。然而，安德罗尼库斯也无可指责。大洋彼岸的小亚细亚汇集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增势不断。他们比蒙古人更可怕，变本加厉地施暴，在定居过程中制造屠杀已成常态。一个基督教君王若要与其他

基督教君王结盟，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攻势，别无他选，只能容忍他们的恶。

在萨洛尼卡一个盛大的节日里，小公主和米卢廷在奥赫里德大主教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在所有的人群、彩旗、号手、游行、宦官……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毫无喜庆气氛的阴沉仪式。作为对献出女儿的某种补偿，有两个人被移交给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个是拜占庭的叛逃者，刚指挥着米卢廷的军队在边疆成功地攻下了城池，算是米卢廷的沃尔西注；另一个是保加利亚沙皇特尔特尔之女，米卢廷此前的妻子。安德罗尼库斯带走她是存案备查的意思，将这桩政治交易带出公众视野，期待它被遗忘。其实和新晋新娘一样，她证明，这种期待被实现的可能性相当有限。结果不过是让这个女人陷入最残酷的冷嘲热讽，而女性也被描述为弱势性别而已。据说米卢廷抛弃她时都不带一丝内疚，因为她的父亲刚被赶下王位，后继者是她兄弟。然而，对女人来说，往往亲情淡如水，没人会觉得她的家人会来保护她。

此后，西蒙尼斯会在一段时间内面对和她的前辈们一样的命运。她会比米卢廷活得久，就像凯瑟琳·帕尔注比亨利八世活得久。两个女人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刻，在命运的深渊中下坠时，突然躺在了丈夫宠爱的平地上，顿生安全感。但是，时间慢慢地确定西蒙尼斯不能够为米卢廷孕育拜占庭皇位继承人，也慢慢地证明她的父亲安德罗尼库斯皇帝是个无能的统治者，其联盟价值日渐消失。于是，米卢廷与查理·德·瓦鲁瓦，即拉丁帝国的名义君主、美男子菲利普（菲利普四世）的弟弟，商议结盟，以废黜安德罗尼库斯。作为必要的前奏，米卢廷得采取步骤改变信仰，让整个国家皈信罗马天主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与教皇进行了长时间的书信往来。他也向查理·德·瓦鲁瓦的某个亲戚，或者任何一个亲戚，提出婚约。但他的计划没能成功，原因是查理对此没有兴趣。如果成功的话，西蒙尼斯就会被遣送回她父亲那里。可是她父亲自身难保，可能被流放。而她因为外交和生育的双重失败，免不了遭人鄙视。落到她头上的，还有其他耻辱：娶她的那个可恶老男人投向了罗马天主教。自从1204年十字军劫掠君士坦丁堡后，她和每个拜占庭人一样，视罗马天主教为罪恶的敌人。西蒙尼斯一直憎恶塞尔维亚，她试图逃走也不足为奇。她母亲去世时她回乡扶柩，到了君士坦丁堡就不愿再离开。她的逃离定是激起了米卢廷年轻时遭受迈克·帕列奥列格所派大使拂袖而去的耻辱记忆，米卢廷不惜威胁使用武力，逼迫她回去，且不顾她多年的反复请求，拒绝允许她成为修女。在日常生活中，米卢廷似乎也算善待自己的妻子，甚至表现出些许关爱。最终塞尔维亚的历史给她留了一笔丑恶的记录，就像我们英国史书中的玛丽·都铎注一样。她做出的可悲牺牲没有开出神圣的花朵，倒是凋零成乖戾和仇恨。格拉查尼察这里有幅壁画，画的是天使为她加冕，她却如同被强迫接受爱

抚的小猫一样紧张，脸上那种缺乏理解、缺乏平和的神色，只在泼妇和囚犯脸上看得到。留在她身后的，是无穷无尽的、带着仇恨和恶意的传说。塞尔维亚的每个农民都会说西蒙尼斯是个坏女人，尽管他们对她所知甚少。就像“血腥玛丽”的名称在英国大众的思维里一样。

西蒙尼斯的恶名有可能源于她在她丈夫和其子史蒂芬之间扮演的离间角色。印有老塞尔维亚圣人王者的通用日历，从最初的古代到一百年前为止，都清楚无误地归罪于她。可上面讲的故事并不可信。故事说她处心积虑地把史蒂芬赶下王储位置，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可她并没有亲生儿子，而且米卢廷是在确认她不孕以后才立储的。但故事的梗概似乎正确。这个史蒂芬的母亲，可能是米卢廷第二任妻子，来自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她是个修女，有亚洲血统。史蒂芬很小的时候就目睹自己的母亲被保加利亚皇帝乔治·特尔特尔的妹妹取代，但他自己仍然留在皇室，英勇地为国建功。他成为诺盖的人质，多年身处险境。诺盖是鞑靼王子，娶的是拜占庭年幼的尤弗罗西尼。史蒂芬回国时，被安排迎娶斯米列茨的女儿为妻。斯米列茨是保加利亚贵族，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当了几年君主。那段时间，保加利亚的王座经常易主，像抢座位游戏中的最后一把椅子，被人争来夺去。同时，史蒂芬也得到了他父亲分封的部分国土，作为自己的公国。

之后，米卢廷和史蒂芬之间爆发了内战。有可能是儿子叛离父亲。朝中部分人认为米卢廷在处理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时，没有显示出强硬的爱国态度，这部分人转而支持史蒂芬。但在关于修建修道院的正式记载中，史蒂芬指责西蒙尼斯对他父亲说了些关于自己的谗言。更重要的起因是，米卢廷进攻了史蒂芬的公国。如果第一项罪责落到西蒙尼斯头上，后来的、更严重的罪责也会落到她头上。在对拜占庭顾问颁布的谕旨中，米卢廷下令将他儿子放逐至君士坦丁堡，临行前弄瞎其双眼。这本不是塞尔维亚的刑罚，塞尔维亚法律惩戒罪犯，要么是单纯的放逐，要么是没收财产。但拜占庭人会用这样那样的肉刑惩罚罪犯，致盲的刑罚常被用于身居高位、感官齐全并且会对国家形成威胁的人。所以，史蒂芬和他的儿子杜尚以及女儿杜什莎，被守卫从他父亲的宫殿里带走，送至君士坦丁堡。离开塞尔维亚疆域之前，就在经过前文提到的在岩石上屠羊祭祀的羊场时，守卫停下来，用烧红的铁器剜了史蒂芬的双眼。我不清楚守卫选那个地方的原因，但他们按照传统，就是那么做的。据传，那晚，圣尼科莱斯托梦给他说：“勿怕，汝目已置于吾手。”实际上，就像常见的情节一样，行刑人或是发了善心，或是手法不精，或是收了贿赂，他的视力并没毁掉。但史蒂芬什么也没说。

在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库斯皇帝友好地接待了史蒂芬。这种友好难以解释，只是以皇帝的脾性，在嗜血的年纪，有如此亲切的举动，这必定只是

树荫下的片刻歇息而已。史蒂芬在“基督全统”修道院安逸地住下。他假装失明。在那五年，他面对阳光如同面对黑夜一般。都铎家族也很善于表演这些由恐惧而生的计策：玛丽·都铎在她父亲活着时屏气敛息以求苟活，伊丽莎白在被玛丽·都铎囚禁时也是如此。最后，史蒂芬壮着胆子告诉安德罗尼库斯，他没有失明；后者叮嘱他继续绑上绷带，别告诉其他人。

据传，那之后没过多久，安德罗尼库斯就遣了个使命团去米卢廷那里，商讨联合防卫奥斯曼土耳其的措施。他把“基督全统”修道院的院长也派了去，让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对米卢廷说说其儿子史蒂芬的好话。另有两个了不起的塞尔维亚教士，学者丹尼尔和政治家尼科迪默斯，也年复一年地向米卢廷进言，直到他愿意接受自己的儿子。在这里，西蒙尼斯的本性可窥一斑：她的父亲安德罗尼库斯善待她的敌人史蒂芬；尽管她十分虔诚，她所在教堂的神职者却不站在她这边。米卢廷终于回应了这些求情，让安德罗尼库斯把他儿子送了回来。于是史蒂芬和他的小杜尚踏上了归途，可惜他女儿在软禁期间已经去世；最后，他们被带进他父亲的皇宫。人们领他来到他父亲的脚下，他双膝跪下，抱住他父亲华贵挺括的长袍，哭喊着说他父亲对他的指责都是对的，自己一直非常懊悔。他父亲躬身下来，用长着浓密胡须的坦诚面孔对着他，扶他起身，吻了他以示原谅。但史蒂芬没有解下眼睛上的绷带。米卢廷另赐了史蒂芬一座公国，替代以前他失掉的那个，让他搬去那里，并把其子杜尚留在宫中作为王子抚养。史蒂芬蒙着双眼接受了封赐。一两年后，有贵族来告诉他，米卢廷已死。史蒂芬仍然掩藏着他没有失明的秘密，直到确认他父亲不仅死亡，而且已经下葬。亨利八世的一个子嗣在他父亲决定刺瞎他的眼睛，但第一次没有得手时，也是这么做的。

整个故事隐含在格拉查尼察，在其光艳夺目的色彩中，在其生机勃勃的形象里。西方读者也许会反对：“这是关于野蛮的故事。它告诉我们，逝去的都不值得悲伤，这说法在科索沃完全正确。”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从来无效的标准——其有效期只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以内，而在现在看来，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政期可谓是寻常年代里，道德沙漠中的一方绿洲。如果一定程度的习惯性暴力行为可以被认可，那么米卢廷执政期可以算作一个伟大的时代，引领着下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正如同亨利八世的晨曦之后，人们迎来了英国的盛午——伊丽莎白时代。米卢廷是个真正的君王。他使他的国土朝太阳倾斜，也许运行的轨迹正穿越天堂。这样的选择来之不易，因为灵魂总会否认对原则的向往。也许表面不像，这其实更像一种牺牲，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依照原则生活的欲望：好人靠美德而生，坏人靠恶性而活，但共同点是都希望自己的快乐有个固定的准则。然而，统治者却不能有。他必须质问自己，关于每个行为的机会主义问题，不论国土是向太阳还是向阴影倾斜，然后坚守自己的答案。责任让他既当不成坏人，也做不了好人；但会让民众对他心怀感激，好像他是位慈爱的父亲。

就这样，君主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荣耀和迷茫。他的行为方式打破固有的束缚，覆盖所有能想到的行为范围，不是因为散漫无序，而是因为探询精神。君主也为自己行为的效果感到困惑，尽管它们与传统道德相悖，却有益于臣民的身心。他想象着，自己必定是发现了一套新的道德准则，觉得应该用些之前未经许可甚至未曾预见的实验性行为，并加以摸索。他的臣民和他一起经历了胜利与困惑，知道他是对的，哪怕所有熟知的权威言论都可能做出相反证明。于是，他们也让所有的事件有机会发生。既然土地朝向太阳，种在土壤里的所有种子自然长势惊人。

这样的成长期不同于衰落期，区别在于其根本论调。走向衰亡的民族，每字每句都在宣称万物皆已知；年轻的民族却落入另一个错误陷阱，宣称什么都还尚待发掘。有一项关于女性躯体感受欢愉和痛苦的能力测试，如果不是同时研究她们的心智，以及表现出对她们意志的尊重——她们的意志体现在时间的艺术中，这测试可能就被斥为纯粹的色情了。如果不去揣摩信仰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也许过分的忠诚和背叛总被归为简单的动物性反应。这些行为方式，有时孕育在可能因叛国罪被斩于斧下的头颅中，有时书写于签发死刑执行令之手。这个年代是道德的，不是因为它遵循了道德准则，而是因为它在探寻道德准则。

米卢廷无疑是谋杀犯、色鬼，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青面獠牙；但也和亨利一样，他四处征战订约，为国谋利。他的国家商业繁荣，法律堡垒越来越强。最后一项成就危险而复杂。围在他身边的贵族们，身穿华丽的皮草衣袍，用珠宝装饰自己。这些昂贵的衣料来自希腊、意大利、佛兰德斯。他们遵循着源于拜占庭的高尚礼仪，但一旦出了朝堂，他们仍然很容易重拾匪盗旧业。米卢廷驯化他们，利用他们的凶悍为国服务，通过细化法律来对抗他们的散漫无纪。在这方面，塞尔维亚可从来没受过拜占庭的启发。它吸收了各国的法律成果：北方各国、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甚至借鉴了蒙古入侵者这样那样的律例。这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受北方影响的一个标志是建立起陪审团审判制度，这是在米卢廷执政期出现和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安排陪审团的地区代表时，特别关注了马其顿的问题。

在宗教上，米卢廷也摒弃了所有动物性的简单思维，不管他的右臂还是下体有怎样的偏好。也许天国王朝还须更豁达一点才能接受他，但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他却可以被称为行家里手。他秉持着在两性关系领域里常见的二元论，一直考虑着，背离东正教向罗马教皇投诚是否适当，尽管他的灵魂是忠于东正教的。在他经年累月的慈善举动中，时代见证了他的忠诚，这一点非常值得赞誉；他供养起一群那时候被称为麻风病患者的人，尽管里面可能真包括一些麻风病患者，大多数病人却只是患了一些皮肤病，以及由新教教徒理论导致的可怕溃疡——在巴尔干半岛上，这至今还很普

遍，造成了无数的伤害。为了治愈感染的皮肤，人们应该敷上刺激性很强的药膏或乳液。他的这些善举，也可能被视为美国人所称的“火灾保险”，即为了应对严重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只是对他虔诚的母亲建立的惯常做法进行延续。然而，他参与的教堂生活推翻了这样的解读。米卢廷显然不畏惧神力。当出现策略障碍，影响到他的土地斜向太阳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对抗。在统治时，他搁置了东正教和罗马教皇间的纷争，在他的王国里允许建立起六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教区。参考亨利八世的怪异行为，这更可能说明米卢廷有了信仰。他们两人都渴望能不受拘束地做力所能及的事，也许都曾暗自祈祷：“神啊，我信奉您，请为我的信仰赐力。”

米卢廷是个信徒的事实，可以从他修建的教堂证明。这些教堂带着狂热、激昂，几乎可以说是本无必要的宗教特质。格拉查尼察首先表达的，就是教会和国家的联合。当这里还是一片荒芜时，它的建筑师就通过自己的灵感，看见圣像屏后的神光，在神秘的黑暗中闪亮；看见米卢廷、西蒙尼斯以及他们的侍臣走近圣像屏，从暗藏的神光中吸取力量，获得和自己等级相应的权威。他们身穿耀眼的紫色衣袍，束着缀满珍珠宝石的黄金腰带，色彩之绚烂仿佛田野的鲜花。建筑师可以为教堂增加凡俗的荣耀。他表现其至高无上的神性时用了相互矛盾的形式，坚如磐石却轻如鸟羽。一个社会，尤其是规模不大的社会，若无投身其中的激情，很难修建这么一座教堂，且在之后令其门庭若市。激情催生教堂，反过来教堂也在鼓动激情。根据教堂的记载，米卢廷的许多侍臣对隐藏的神光非常痴迷，简直不能忍受圣像屏的隔离。塞尔维亚贵族和许多偷羊贼一样，都想争做圣徒。年轻人逃离朝堂，成为隐士和修士，立下比罗马天主教会所要求的更加严厉且不可撤回的誓言。人数之众，以至于统治阶层开始出现危险的断层。于是一道法令颁布下来：除非大主教同意，教会不得接纳任何新信徒，不论男女。

站在教堂里，年轻人的热情便易于理解了。我们身边是粗壮的柱子，体积庞大，触感冰凉，仿佛是我们将脚深入泥土，在河流的源头踩到了原生岩石。我们头顶之上，有来自广阔天空的光，透过穹顶的狭窄窗户倾泻而下，停留在壁画上，展现出一个感官敏锐、思考深邃的年代。这几乎超出了我们西方人的理解。与其说它是拜占庭古典艺术的完美代表，不如说它代表着两个伟大的时期：4世纪至6世纪，9世纪至12世纪。它在精神上并不古典：它并非在纪念一种极其复杂的完备的发现——文明通过对其环境所有可能的信息的支配而完成的发现。古典主义之前，必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时代整理着所有能想到的理论和幻景，来摸索发现之路，以期将有效和无效的东西进行区别。这些壁画就属于这个实验性阶段，该阶段的基础是实质性古典主义的残留。格拉查尼察修建的时候，拜占庭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没有那么稳固和确定了，对土耳其的忧虑瓦解了它太多的力量。于是，帝国的精神在几个地区落地生根，比如萨洛

尼卡、特拉比宗、米斯特拉和塞尔维亚。这些地方的居民种族各异，地理位置遥远，在继承拜占庭传统时，自然而然地进行了适应性改变。因此塞尔维亚——拜占庭艺术是古典和浪漫主义，以及历史、强度、经验各异的两种种族精神的融合。它不是统一且完全令人满意的艺术，但它仍然表现出许多后世无法超越的美。

这些壁画，和拜占庭的母本作品一样，都呈现出高超的工艺成就和内容追求。圣母玛利亚在祈祷，举起的手指向远处。她的长相和近亚洲地区的人非常类似，本质上又和想象中的圣母惊人地一致。让她感到困惑的命运，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奇妙。画上的两个女人在会面，一阵大风吹起她们红色和蓝色的斗篷。这是《圣母往见节》，大风是神的旨意，吹来丰收和富足。一个天使站在年轻的圣母玛利亚面前，递给她一纸严厉的军令。她向后退缩，不是出于拒绝，而是她比他更清楚履行命令对命运的影响。这个版本的《圣母领报》匠心独具，我们的祖辈们会形容它别有风味。从这里其他的壁画中，也能品出这样的味道。这里的一景一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些形象表面相似，却内在独特。这些都构成了不可预测的视角。浪漫元素将艺术中的独创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产生一种陌生的美感。它们没有启发联想，倒是引发了争论。也正是看着这样的壁画，我丈夫说："瞧，很不寻常啊。还记得在奈热西看见的那幅壁画吗，一个女人在给婴儿时的基督洗澡，看起来像布莱克给《精神旅行者》（*The Mental Traveller*）画的那幅？喏，这幅壁画像是布莱克给乌里神或是洛斯神画的图。"

的确如此。布莱克将裸体视为肌肉的不和谐组合，想象一下，他去除身上这些不协调的因子，然后开始画所有预言书里的插图，事实上是将插图互相贯通，他笔下超自然的神也在为了琐事抱怨争吵。这幅壁画代表了自然的形式，因而美得惊人，仿佛在说："只要你不是瞎子，就能看得到。"在一片壮观的建筑背景前——这样的背景常见于早期的意大利作品——一位年轻的神赤身裸体，站在又高又窄的神坛上。一名老人谦卑而充满敬仰地俯卧在他身前，一位主教站得稍远一点，带着没那么谦卑的崇敬之情。年轻人的裸体被描绘得极其庄严，好像人体就是对神像的临摹。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都能从中看到上帝的影子。老人的衣袍单薄地包裹着四肢，四肢又单薄地包裹着不安的灵魂。主教的斗篷是对抽象艺术进行早期探索的典型例子，是拜占庭画家喜欢用的元素，一同使用的还有教袍上的十字架。它们将显赫的人表现得更加显赫。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背景间的关系恰到好处，以至于我们离开教堂时，已记不得画是大是小，覆盖的是教堂的半个墙壁，还是只有小小一方。但它还是缺乏真正伟大艺术的那种效果。它呈现出一些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任何一个观者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论他对主题有多么熟悉。事实上，这是亚历山大港的圣彼得的生活一景。圣彼得是戴克里先宗教迫害中的殉道者。基督赤

身出现在他面前，是在预示他的衣服、他的教堂，都会被异端阿里乌斯派夺走。从后来的史实已知其内容属实。这三个人物的奇怪表现，对神性、人性表达的观点，以及它们在教会权威中的融合，仍然都需要用语言来放大。这是个实验性的新生时代，它还没有意识到每种艺术形式的局限性，还不知道对于某些题材，文学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绘画无法触碰。

塞尔维亚——拜占庭艺术和布莱克作品的相似性，在我看来充满神秘，没法用想得到的理论去解释。它和浪漫主义无关，在格拉查尼察的古典壁画中，它相当显眼。它描绘了神秘主义者，东正教和威廉·布莱克都清楚神秘主义是什么。东正教直接从基督及其门徒那里获得知识，然后在希腊圣山阿索斯山的修道院里进行发展。布莱克是众多的神秘主义者之一。这幅壁画画的是以利亚坐在某个岩洞中，埃尔·格列柯画作中常有的那种岩洞——围成子宫状的岩石。上面的标志象征遮天蔽日的森林，洞口有两棵风格类似的小树，象征着贫瘠。老人右手握成拳头，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陷入沉思；左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他身上裹着张羊皮，脚上什么也没穿。“这是只有我们民族才知道的学问，”康斯坦丁说，“这是未经苦难的神秘主义。”

他指的是现代西方世界和拜占庭世界的区别，说到底，就是贫富区别。西方人想象，沙漠中的修道者因为物质匮乏而生活不便。他对精神世界不甚了解，很难专注于此，所以不得不把远离物质享受作为一种可以经常获得的积极胜利。这实际上就是许多西方神秘主义者的状态。圣杰罗姆在他的书信中，说自己的动物性成见总是会闯进精神世界的荒芜地带；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说，看蜥蜴抓苍蝇或是蜘蛛结网捕虫，已足以让自己从冥想中分神。这幅以利亚的壁画和另一幅圣约翰的壁画——那幅画里，圣约翰空灵的眼睛盛装着人类负载不了的智慧——都描绘了隐入沙漠的神秘主义者，他沉浸在精神世界中，日常谈话在他的耳朵里，犹如音乐厅外面弹奏的手摇风琴声音在音乐家的耳朵里。神秘主义者不思饮食，不念肉欲，因为这些事会妨碍他通过自己的胸怀以及宇宙，去追求区分善恶的乐趣。一只渡鸦飞进以利亚的岩洞，嘴里衔来食物；圣徒对此并无谢意。假设一个裸女出现在他面前，也不会是诱惑，只会是打扰，就像在图书馆里，一个学生找了好长时间，终于在闭馆前的几分钟找到了资料，这时去和他说话，就会让他觉得很烦。对这些人而言，人生太过短暂，无法去享受丰富的感知，甚至来不及将其转化为智慧。

他们的财富超越了我们的计算能力。我们的杯子也不算空，但终不及这些人那么满盈。他们处于亚欧接壤处，知道主宰性的文明总是胜负皆有，于是新的斯拉夫族群便投入年轻的情感和精力，去发掘传承的阅历财富。在格拉查尼察的一面墙上，展示着《熟睡的圣母》（the Falling Asleep of the Virgin Mary），描绘的是圣母升天之前的状态，这是拜占庭人经常进

行创作的题材。而现在对这个题材进行冥思苦想的人们，却是成果寥寥。

壁画的前景是圣母玛利亚躺在灵柩里。松散但永恒不变的线条，勾勒出死亡的奇迹，这死亡超越了单纯的意识消亡。当它侵袭到没有意识存在的地方时，一树、一花、一谷穗，也随之消亡。灵柩之上闪耀着一颗光之星，里面站着基督，将他母亲的灵魂拥入怀中，像拥抱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们头上的光环透出一股宁静，象征着超越皇权的神力。他们身边围着使徒和信徒，从另一个世界，或从遥远的地方，匆匆赶来参加圣母的葬礼，带着各自的光环，形如气泡，也透着宁静。人群边上，几位主教如磐石般站立，身披带十字架纹饰的斗篷，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动摇不了他们的坚毅。还有一些人，穿着宽松的长袍，身体已为悲恸所融化。还有一些人，也穿着宽松的长袍，身体因受力而扭曲，在灵柩下显得十分矮小。一个面露震惊的男人，双臂附着在灵柩上。他是个犹太人，谋害基督的帮凶之一；他想掀翻灵柩，结果被黏附在灵柩上，直到天使用剑斩断他的双手。背景里全是天使，是东正教乐于想象的模样。这些优雅的信使永远都闪耀着神圣之美，把律条传达给肉体凡胎的人类。事实上，他们象征的是理想中完美的眼界和不屈的意志，不会受限于人类的缺陷，比如所知贫乏、能力低下等。他们不带一点劳苦的污迹，他们力大无穷。天堂之门被他们开启，入口处圣光照耀，是前来迎接的圣人们所散发的圣光。

广袤的想象空间被这幅小小的壁画占据，两股激荡的浪潮开始冲刷这空间。一股是孩子们面对死亡的母亲时，所感到的诚挚而幼稚的悲伤。悲伤爆发，之后减弱、退却。另一股是慢慢升腾的圣子的喜悦之情，他能够运用神力取消这样那样的死亡，在静止和结局看似不能避免的地方，催生出荣耀和感动。壁画的四面填满了建筑，建筑被施加了大胆的变形，来符合整体格局，以呈现坚固而逼真的效果。我们为之惊叹，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这样，惊叹着最非凡的经历发生在日常的场景中，惊叹着这样的场景应该用在哑剧和悲剧中。建筑之后是苍穹，唤起另一种经常发生的惊叹。这是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里有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儿子、灵柩和建筑、悲伤和欢喜，真让人难以置信。更有可能的是，宇宙把空洞的虚无进行了如此独特的包装。在自我中的存在，采取最不奇迹的方式，这便是奇迹。

但这幅壁画，尽管灵感来自这些观点，并传达这些观点，却只是单纯的画，不曾承担适于其他艺术的任务。这些观点进行了自我表达，因为它们是画家从拜占庭文明继承的知识、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画家未经提醒，参与的只是最表面的活动。但他全心全意忠于他的艺术。他限制自己，只处理形式和色彩的某些问题，但基于他对技艺的掌控，这限制却给了他许多自由。就大多数人的天赋和时间而言，这样的自由可能就是所需的全部。他知道怎样在直线旁画圈或在圆圈旁画线，或在闭合的图形里排列图形。

他的设计从某个角度看不失本质，总是拒绝成为物质对象的平庸复制。他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近东地区色彩鲜明的画风，当强烈的阳光褪去其刚健的内质，或者拜占庭宫殿的错综复杂让其迷失时，色彩的力量就被削弱，只在火把或蜡烛的光照下部分复苏。我们西方人通过埃尔·格列柯[注]知道了形式和色彩的传统风格。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得此财富的传统珍宝库，我们总是想把这错误地当成他自创的财富。在格拉查尼察，壁画的绘制和教堂的建筑都说明了紧跟着拜占庭晚期文化出现的两种艺术，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财富简直无穷无尽。这里的艺术家们获得了在他们这个行业所能获得的最大财富。他们创造力丰富，服务于感知力敏锐的观众。这些人的王国，是世间的王国理想中的样子：谷物丰收，酒肉充足；他们应有尽有，早就遗忘了饥饿的滋味，也脱离了贪得无厌的追求。他们的眼前是思想的王国，由其他人建立，像所有的思想王国一样并不完善，但有其独特之美。塞尔维亚人深受滋养，力量强大，于是继续前进，寻求新的艺术和思想愉悦，让文化更加丰富，以匹配其物质上的丰富。

教堂外一无所有。失败带走了一切。曾是花园的地方尘土飞扬，士兵们在石子路上碾出车辙。他们不是要重建消逝的宫殿，而是要搭起旅馆，好从农民的口袋里分来一份，否则钱都会被破烂的小客栈挣走。德拉古廷坐在我们的汽车踏板上抽烟。他旁边站了个男孩，眼神呆滞。男孩穿着件没扣扣子的褪色的亚麻衬衫、一条打了补丁的马裤和一双破凉鞋，嘴唇上长了个疮，涂着天蓝色的药膏。“走吧！走吧！”德拉古廷说着，用脚踩灭了烟头，“瞧，他真傻。他知道你们要去特浦加矿场，大多数来格拉查尼察的英国人都会去特浦加矿场，或者已经去过。所以他想让你们帮忙带封信给经理，伟大的麦克先生。但我说，他们要这样的穷小子干吗？那里什么都很高级，非常高级。他们什么人请不到？工资给得高，为人也公道，人家都是公爵呢。”男孩说：“我在这里没事做。我想到矿井去上班。先生，女士，我在这里真的没事做，我想去矿井。”

教堂的墙外是残破、空荡的山。在米卢廷时代，那里村庄密布。群山消失在远处，那地方真大，旅人得深入其中，才可能重新感受舒适的生活。那里有充足、精细的饭菜，有牧师的教诲。然而，当格拉查尼察始建时，平原上、山上的人们用金、银、锡制的餐具，吃着野味和鲜美肥嫩的肉。贵族男女人丁兴旺，善待农民。他们会讲塞尔维亚语，也会讲希腊语。但是因为基督教教徒在科索沃战役中战败，这些生活都消失了，只剩下士兵们虔诚的眷念，这是西方人不知道的。英国士兵比英国平民更加愤世嫉俗；而当塞尔维亚人穿上军装时，会安静地沉浸于难以阐述的信念中，这可能是教宗称帝的君王时代留下的记忆。德拉古廷身上也有些贵族气派，大概是传承自贵族；因为农民血统也占了一半，所以当财物丧尽时，力量尚存。曾经的景象已经烟消云散，残留的东西稀薄得可怜，就像阴云后的太阳投下的影子。男孩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说：“这里没什么事给我

做。”

---

1. 安妮·博林（Anne Boleyn，1501—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后被斩首。
2.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代表作《乌托邦》。曾担任英国大法官，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
3. 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473—1530），英国政治家、红衣主教，亨利八世的大法官和国务大臣。
4. 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1512—1548），亨利八世六个妻子中的最后一位。
5. 玛丽·都铎（Mary Tudor，1496—1533），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国王后。
6.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擅长宗教画。

普里什蒂纳

“这就是普里什蒂纳。”康斯坦丁说。普里什蒂纳曾是塞尔维亚君主国的首都之一，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巡回朝廷，来处理新成立的国家的大量事务，这也是早期的匈牙利、德国的惯例。现在，它设在斯科普里、泰托沃和这里，以及靠近多瑙河的某个北方城镇。我们惊愕地看着这个暮气沉沉、布满尘土的村庄。“我们得在这里吃午饭，”康斯坦丁接着说，“到特浦加的时间会很晚。”他带着病人的忧郁和一点无伤大雅的恶意又补充道：“你的花可以扔了，它们都枯死了。”我们在大广场上一家酒店外的桌子边坐下来。桌子旁边有匹马，像欧几里得图表一样棱角分明，似乎应该给它拴上缰绳，套上一辆微绿的马车。摇摇晃晃的木质商店，像小农场上的鸡舍一样，东倒西歪地互相支撑。在歪斜的门和狭小的窗那里，陈列着商品中最小最朴实的样品，这就是这里出售的东西了。

一名服务生走过来为我们点菜。巴尔干半岛上有土耳其人，有土耳其人的地方就有咖啡屋。小镇周围的居民都和服务生很熟。在西方国家，服务生就代表着复杂人情世故的中心。酒店老板走到我们旁边，显然他对自己的位置志得意满。坐在我们周围的人们，穿着比任何农民装束都要怪异的西式服装，因为这里的人和这里的裁缝，在成年之前都没见过西装。点餐没花多少时间，菜单很短。“鸡肉和米饭。”服务生说。然后酒店老板高声重复：“鸡肉和米饭！”他弯下腰来换了桌布。我的面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大片酒渍，形状很有装饰效果，阳光在上面作用了一段时间，显出优雅的淡紫色。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曾有最好的状态，或是最佳的同伴；在有名的饭店里，领班用栀子花来迎接我。

“回到英国时，”康斯坦丁酸酸地说，“你们会看不起这些，觉得我们都像猪一样。你们会忘记，我们没有你们富裕的国家给你们的那些好处。”“胡说，”我答道，“我很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表达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规矩，不知道桌布必须保持干净。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认为桌布不应该是脏的，人们太清楚了。我曾经在尼什的宾馆度过最难熬的一晚，一合眼便咳个不停，把自己呛醒，因为床单肯定是在强力消毒剂里煮过。我就像睡在嗅盐瓶子里。那些人只要开始做这事，可比英国人干净得多。”

“我注意到一件事，”我丈夫说，“不管普里什蒂纳干不干净——这里特别穷，比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市镇都穷，当然我们也见过比它更穷的村庄——这里的人们倒是不怎么颓废。酒店老板对自己的位置、职业得意得很。他可从没想过要为这里的环境表示歉意。而在其他我觉得简朴、漂亮的地

方，酒店老板是会这么做的。至于来来往往的人，看上去也挺高兴，尽管他们脸上布满皱纹，身体看上去疲惫无力。”“那是因为他们以前过得更糟，”康斯坦丁说，“这片地区是土耳其的基督教教区中最不幸的。这里除了最简单的农业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贸易、工业，连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都没有。谷物和牲畜以外，他们什么都不生产。”“事实上，”我丈夫说，“他们生产的是最必需的东西，所以他们穷得彻底。你不说我们也明白。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子的，全世界都这样。这也许是个错误，我们会因此遭到惩罚。”

“这也许是拜占庭受到惩罚的原因，”我说，“两个阶层，‘权势阶层’和‘贫苦阶层’，从公元9世纪就开始了激烈斗争。小地主和自由农一直被外来的入侵及内战所困扰，于是让出自己的自由，去交换大贵族的保护。贵族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占便宜，收走小地主的财产，也把自由农变成农奴。起初，王族还打压这些大贵族，甚至要消灭他们。封建主义，也就是大地主对国家的剥削，不能存在于所谓的神权国家。因为神权意味着个人、阶层都享受神授的公平公正。但拉丁人入侵时，也带来了他们自己国家所建立的封建体系。这没法赶出国门，因为拜占庭的贵族也像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宁可噎死也不舍弃吃撑的机会。他们对任何扩张财富和权力的机会趋之若骛，不管有多危险。所以，拜占庭社会显得自相矛盾。它所宣称的神权不再是个圣洁的神话，而成了一个贪婪者的谎言。”

“是的，”我接着说，很乐意谈论这个我比我丈夫了解更多的话题，“这在国家内部播下了毁灭的种子。穷人太穷，其中彪悍善战的人就成了雇佣兵，只效忠于付钱的贵族。我想，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权力中心转向塞尔维亚。尽管农民无论在哪里，都被捆绑在土地上，并且被禁止出售土地，但他们仍然有明确的法律权利，贵族也不能侵犯。如果农民展示出在经营土地及平常行事方面的能力，就很容易进入小贵族阶层。事实上，这点易于在一个扩张性国家里实现，因为这样的国家希望它的民众不要激起社会动乱，而要全力抵抗外侵。如果不是土耳其人的话，拜占庭文明不会消亡，而会在塞尔维亚焕发生机。就像我们的欧洲文明，有很大一部分退至美国，在大学、美术馆、音乐厅，以及我们无法提供的大规模研究室里，发展势头良好。”

“这是什么？”我丈夫问道。这不是个修辞性问句，他是真不知道。“是您的鸡肉和米饭。”服务生回答。“对啊，是您的鸡肉和米饭。”酒店老板尖声重复。整份套餐也不能说是难吃，米饭煮得还算可以，配着些不错的面包、黄油、羊奶酪、白葡萄酒和樱桃，这些东西我们不一定做得出来。但是这只家禽本身，是个惊世骇俗的怪物。它很瘦，瘦得出奇，像埃尔·格列柯画笔下的某个禁食圣徒。在这里，贫瘠的土地让农民最多只能用几周的时间给他们饲养的牲畜增肥，人们经常吃幼嫩的肉。羔羊和乳猪在这个阶段，

与生俱来的肉多少也该堆积了一点。但在禽类细小复杂的骨骼上，显然食之无肉，只能尝点味道了。这就是酒店老板所知道的家禽。看到我们愁眉苦脸地对着那堆残骸，他发出一声苦笑。肥嫩可口的鸡肉在他看来，就像没有设置障碍区的高尔夫球场一样，总有哪里不对劲。

“完全没关系，亲爱的，”我丈夫说，“我觉得很好啊。”但是，也许鸡肉的某个部分在让他说：“你认为塞尔维亚本来能够继承拜占庭的杰作，这也许没错，但我还是有点怀疑。我好像记得有拜占庭作家记录过他们出访塞尔维亚的印象，很反感对方的野蛮。其中有个作家，我想想，叫格雷戈拉斯。”“确实有，”我回答，“但他就是一个蠢货。”这常常是拜占庭作家的特点。他们没有准确的文献，因为没有统一的语言。有三种已知的希腊语存在于拜占庭。第一种是穷人们讲的，退化的、简单的希腊语；第二种是富人们讲的，比较发达、灵活的希腊语。这两种语言间区别明显，因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悬殊。还有一种古典希腊语，所有受教育群体都必须学习。从事文字工作的专业人士，出于面子考虑，觉得要么使用第三种语言形式，要么把富人希腊语尽量向第三种靠齐。那就是说，他作为作家，有意识地变得势利又浅薄，这可不值得借鉴。格雷戈拉斯把愚蠢当成了任务，叫人看了倒胃口，这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故。

他写的东西啰唆冗长，不是因为语言丰富，而是因为贫乏。“太阳跨过了一半子午线，”他在某个地方这么写道，“它正把自己隐藏起来，按照每天的惯例下沉，朝着地平线。”在无数这样的语句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厌恶的事实：他像极了某些生活宽裕，但令人厌烦的英国人。他给他朋友写了封信，说的是他在13世纪末，跟着外交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这封信后来被历史学家广为引用，尤其是反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在这点上他们可谓一模一样。关于这次考察，他写道：“包含了人与野兽的七个十年。”考察糟糕地始于一个夜晚。也不是因为什么体面原因，他们踉踉跄跄地走在森林里的河边小路上。一股武装分子遇上了他们。他们本以为对方是土匪，结果却是塞尔维亚帝国派驻的边境警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英国”的一幕：他们一行人中没有哪个能多说两句塞尔维亚语。尽管一个世纪以来，和塞尔维亚保持良好的商贸及外交关系，对于拜占庭至关重要。到达斯科普里的塞尔维亚王宫后，格雷戈拉斯和他的朋友们也无心留意这个国家的任何东西，他们的心思都在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的岳母身上。这位女士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帕列奥列格之妻，最近刚丧夫。格雷戈拉斯自己穿了件华贵的紫色大袍，充分享受了从她的悲痛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对于能够观看她对她丈夫的尊称，也深感受宠若惊。她一边喊着“噢，您是诸王之后，美德盖世，万民敬仰”，一边抓扯着自己的双颊，直到指甲被血染红。

这个外交色彩不足的代表团，围着她转了十天，安慰她的丧夫之痛，对她

不得不忍受这个野蛮国家深表同情。他们嘀咕着说，塞尔维亚国王在安排他母后回君士坦丁堡时，完全没显示出应有的尊重，但又能指望什么呢？他们不无刻薄地说，猴子的行为就像猴子，蚂蚁的行为就像蚂蚁，都别指望它们会像鹰，像狮。格雷戈拉斯在他的经典语句里说："他真是位智者，了然于心，畅达于言。不管是米利都的泰勒斯，还是阿里斯托的儿子柏拉图，或两者兼备，他都从心底感激自己生来是希腊人，而非蛮族。"真是这样，他嗤笑着。他和他的同伴们回忆起在君士坦丁堡的做事方式，觉得在塞尔维亚这里，自己就像是掉进了甲虫窝里一样，只不过这些甲虫戴着项链、手镯而已。

这话触动了每一个熟悉跨国情形的人的心弦："亲爱的，看到那么多珍贵的珠宝和美丽的衣服穿在这些可怕的粗人身上，真是令人痛惜。"不幸的是，许多可爱的小男孩、小女孩常常幼年夭折，那些嘲讽圣诞树上的礼物、破坏圣诞派对气氛的讨厌鬼却总是顺利长大。如果是欧洲人，肯定会鄙视美国，尽管鄙视时不如一百年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有人假装着，说自己憎恨新生的扩张性社会，是因为那里的人粗鄙且爱炫耀。但事实上，人们忍受社会礼仪，不过是因为这些礼仪能转化成不透明的物质，掩藏其内在含义。热情友好，这些东西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慷慨和财富，代表的仍然是好运。这让他们忆起了基本的现实，他们因为羸弱而不愿面对的现实。格雷戈拉斯就属于这个群体。英国公爵的遗孀在她的花草园子里说一番美国的坏话，并不会有损那片大陆的美好形象。同样，格雷戈拉斯的书信也无法证实他的观点——不利于格拉查尼察的观点。

"但是请告诉我，"我丈夫说，"哪个史蒂芬国王有拜占庭岳母？我认为是米卢廷的儿子，被他弄瞎的那个，后来继位，娶了保加利亚公主。"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证明生活总是陷入程式化，设计总是在自我重复。史蒂芬取得王位没那么容易。为继承王位，他不得不一直伪装成盲人，直到他父亲去世。所以许多人相信，他守不住这个位置。他的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兄弟康斯坦丁，也和他一样，因为米卢廷娶西蒙尼斯时不承认先前的婚姻，成了私生子。他的堂兄弗拉第斯拉夫，是跛脚国王德拉古廷的儿子。德拉古廷曾经退位，成为波斯尼亚天主教国王。这两人都想攫取王位。弗拉第斯拉夫被他驱逐到匈牙利，而康斯坦丁则被他钉在十字架上分尸。这在14世纪不算罕见的刑罚。史蒂芬尽管天性还算仁厚，也终究是那个时代的人。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掌控了王国，可以放心大胆地生活了。

然后史蒂芬摇身一变，成了他父亲的忠实翻版，尽管他父亲曾是他的敌人，被认为是站在他的对立面。起初，在可能的时候，他对罗马教皇恭敬有加，就如同米卢廷在位早期那样。他甚至接待了教廷使节，商讨把塞尔维亚帝国移交给罗马天主教管辖的细则。他无须模仿他父亲离婚，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已经逝世；他试图跟随他父亲实行婚姻机会主义。他想娶布

兰奇，塔兰托菲利普的女儿，其父在安茹王朝，行使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地区的名义宗主权。史蒂芬希望借此与天主教的拉丁势力结盟，这些势力正威胁着东正教的拜占庭。他的背信弃义较之于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初是大主教尼科迪默斯说服米卢廷将史蒂芬召回，以结束流放，还运用教会影响力对康斯坦丁和弗拉第斯拉夫施加压力，确保他的王位。史蒂芬现在的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塞尔维亚人仍然像在前一个君主统治下一样，笃信东正教。而且教皇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后，丧失了大部分影响力。五年后，史蒂芬放弃了这个策略，又开始模仿米卢廷的另一个错误——娶了个拜占庭公主。新娘玛丽亚·帕列奥列格倒是没西蒙尼斯那么险恶，但这桩婚姻和早先那个原型有两处类似的地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人士不赞成这桩婚姻，他们希望拜占庭人在军力方面和他们联合，而不是在家庭关系方面；这桩婚姻在国王和继位者之间，埋下了麻烦的种子。

在羸弱和患病的时候，生命比较容易重复前路，陷入固定模式；而在生命力强大和健康时却总是难以预测。这意味着，畏首畏尾的人拒绝让生活顺其自然，而喜欢坚持重复自己已经熟悉的事，宁可选择已知的恶，也不愿尝试未知。史蒂芬坚持的一些重复，给塞尔维亚带来了力量和光荣，因为他模仿了其父的长处。他像他父亲一样兴建教堂，位于佩奇的大修道院德查尼，就是他建的。我们去完科索沃和特浦加矿场后，打算去参观那里。他像他父亲一样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新的保加利亚沙皇迈克发现，尽管有与玛丽亚·帕列奥列格的联姻，拜占庭帝国仍然十分愿意和保加利亚联合对抗塞尔维亚。史蒂芬在库斯滕迪尔（那时候称为“维尔伯日德”）赢得决定性战役，漂亮地击退了入侵者。但是，使他成为模仿者的弱点，也让他在模仿长处方面徒然无功。

米卢廷曾经对他儿子发怒，试图弄瞎他的眼睛，流放他，赦免他，和解后又架空他，让他无力，因为米卢廷是两者中的强者。即使史蒂芬有力量去背叛父亲，米卢廷的政治智慧也已培养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民族心态，人们不会支持儿子去背叛父亲。米卢廷的才能确保了他稳坐王位，直到自然死亡把他带走。但是当史蒂芬对他自己的儿子发怒时，却招致了不同的命运。因为他儿子比他和米卢廷都强大，对这个具有威胁性的非凡继承人，国王却没有在民众心中唤起足够的忠心。他没有采取政治家该有的行动，巩固针对保加利亚的胜利，而是把它保留为一个满腔怨恨、全副武装的自治国家。这确实让贵族们感到惊恐和恼怒。史蒂芬的儿子带头反对他，击败他，并把他关进科索沃北部的一座城堡，然后让身为大学者和政治家的大主教丹尼尔为自己加冕。这事必须尽快完成，趁着新国王的双手还干净，因为丹尼尔刚正不阿，决不会为卑劣者加冕。两个月后，不是在新国王的命令就是在他的默许下，史蒂芬在狱中被绞死了。

这个令人惊叹的天才家族，被确有价值的拜占庭、法国、保加利亚、亚细

亚血统强化，以恐怖的方式宣布他们到达了获得神圣肯定的这一刻。在尼曼雅人裤裆间流转的种子，赶着他们从亚得里亚沼泽地起步，一路经历荣耀、折磨、艺术、罪恶和文明，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统治工具。史蒂芬的儿子也叫史蒂芬。为了加以区别，父亲叫史蒂芬·德钱斯基，以他所建的大修道院命名；儿子叫史蒂芬·杜尚。关于“杜尚”这个词，争议尚存。它可能是表达爱意的词语“杜莎”（dusha，意即“灵魂”）的昵称。也有人说它来源于动词“杜什提”（dushiti，意即“绞死”），影射他父亲的命运。明显第一个是正确的来源。他多半童年时已经被这么称呼，因为他的姊妹叫杜什莎（Dushitza）；而且斯拉夫人并未觉得给他们的民族英雄一个这么温柔的名字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人们不太可能到处称呼国王“绞人者”，国王既然绞死了一个，多绞死几个也无妨。就像伊丽莎白女王的侍臣到处谈及她时，不称“荣光女王”，却用某些名称来影射砍掉罗利、埃塞克斯和玛丽项上人头的斧子。这种可能性不大。历史中的类比总是会自己浮现出来，比如，米卢廷是塞尔维亚的亨利八世，史蒂芬·杜尚就是塞尔维亚的伊丽莎白。

史蒂芬·德钱斯基出现在他和他祖父之间，就像爱德华和玛丽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之间一样。脆弱的生物不能孤立于家族的电闪雷鸣之外，他们会因此凋零，而非受此激励。史蒂芬·杜尚能够抓住每一次雷电，也许是因为他和伊丽莎白一样，被敌人和死亡威胁包围。在几年间，他建立了14世纪最强大的君主国，若非如此，他也只能沦为封臣。他的东边是保加利亚，他父亲在位时与它只形成了半和平状态；他的西边是天主教波斯尼亚，一直和教皇谋划攻打东正教塞尔维亚；他的北边是匈牙利，匈牙利受到亚洲人入侵时总是恨不得对邻国发动自杀性的进攻；他的南边是拜占庭帝国，有心与他交战，只是因为土耳其的进攻而无暇他顾。面对这么多敌人，他不能只当个国王，他必须成为帝王，无法征服的帝王。伊丽莎白也是这样，如果不成为至高无上的英国的荣光女王，就只能把自己的人头摆上断头台，让国家成为法国或西班牙的洗手盆。

史蒂芬·杜尚首先对付的是保加利亚。他以武力威胁，然后娶了沙皇的一个名叫海伦的姊妹。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这位女性如同商品一样，被移交到她丈夫手里。这样的“商品”完全有可能畏首畏尾，没有文化，只学得一脸连狱卒都能被打动的笑容。但是海伦成了一位发号施令的人物。她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为其出谋划策，在她丈夫身前身后，都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给国外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史蒂芬·杜尚指挥攻打拜占庭，占领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且包围了萨洛尼卡。结局并不圆满，匈牙利国王让杜尚后背受敌，不得不赶往北方拒敌。但他已取得的胜利足以让拜占庭人接受条约，今后也对杜尚心存敬畏。他在北方击退了匈牙利国王，还夺取了对方的一大块领土。后来他将安茹王朝逐出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此举提高了他在与拜占庭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军事问题，但杜尚也运用了外交手腕。他越过波斯尼亚的天主教邻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握手言和。后者对他颇为同情，因为与他交战的匈牙利，也是自己在达尔马提亚的敌人。不必说，杜尚知道威尼斯一贯自私、短视、反斯拉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杜尚不得不采取拖延战术。他玩弄的这种诡计，也是我们眼中伊丽莎白女王的伎俩。有时候在杜尚脸上，我们能看到伊丽莎白那种隐秘的笑容；她的那种笑容经常惹怒别国外交官。杜尚曾经致信威尼斯，乞求庇护，因为国家正受到敌人的颠覆。有些史学家仅仅粗略地查看日期之后，便认为这是他政权不稳的证据。但写信时，他已即位九年，刚击败安茹王朝，很有理由感到满足。“跟女人打交道真是麻烦，”伊丽莎白的一个西班牙大使抱怨，“她身体里一定有千万个魔鬼，虽然她不停地说自己想当修女，在祷告中度日。”

这种故事史蒂芬·杜尚也会讲。他与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和英诺森六世长期保持通信，应该是出于纯粹的讥讽。因为教皇在法国阿维尼翁待了大概十三年，只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且和匈牙利有繁复的利益纠葛，不能给塞尔维亚承诺什么。杜尚假装急于转变信仰。等到教皇发送详细指示，告诉杜尚应该怎样做时，他则装傻充愣，仿佛全然不知所有的信件是为何而写。事实上，杜尚是东正教教会的忠实信徒，尽管二者的关系不太寻常。其弑父的罪行在当时候和那之后，都没有得到教会原谅。尼曼雅国王们令人惊讶地被称为“天生圣人”，因为他们是圣西缅的后裔。米卢廷和史蒂芬·德钱斯基也被尊为圣人，却从来没人提及把史蒂芬·杜尚封为圣人。但他也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每逢大事必先咨询大主教丹尼尔。随着时间流逝，出于法律和政治原因，杜尚对教会越来越感兴趣。

国王的雄心指向南方，意在赢取拜占庭众多皇冠中的一顶。拜占庭帝国那会儿正被内战折磨得心烦意乱，杜尚知道自己可以夺取帝国，并统治它。只凭这一点，他就不会皈信罗马天主教——拜占庭不可能被一个非东正教教徒统治。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只有主教才能为帝王加冕。普世主教极端偏袒在位的皇室家族，显然不可能同意给一个塞尔维亚征服者加冕。于是，史蒂芬·杜尚在斯科普里，召开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神职人员大会，促使他们将佩奇的塞尔维亚大主教升至主教之职。没过一个月，新任命的主教即加冕杜尚为塞尔维亚人、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其妻为皇后，其子为国王。这等于是建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教会实施分裂的基础，但人们处之泰然。可见，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仰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最终，普世主教将这些人全部逐出教会，包括帝王、新主教、整个塞尔维亚教会以及整个塞尔维亚国家，但这是七年之后的事，而且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与此同时，有纯粹的拜占庭教会留下的信徒被纳入他扩张的领土里时，史蒂芬·杜尚也予以善待。他不仅承认，而且提高了奥赫里德的主教教区特权。杜尚是个容忍度极高的统治者。这是他的政策，让非塞尔维亚人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保留所有习惯的管理形

式。

但是，当杜尚夺取希腊色萨利时，这政策却无法奏效。他发现那里的拜占庭牧师敦促教众进行反抗，杜尚只得用塞尔维亚人替代了这些牧师。这无疑干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但至少可以说他是尽量保持克制的。当墨索里尼禁止斯洛文尼亚人在他们的教堂、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家里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不能在借口里鼓吹，如果斯洛文尼亚不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就会成为摧毁意大利和平的混乱邻国。因为如果斯洛文尼亚站在战线的另一边，会被纳入平和、文明的南斯拉夫。但是在史蒂芬·杜尚时期，拜占庭帝国成了无主之地。野草蔓延，淹没了所有的庄稼。这状态，我们是通过无可置疑的证据知晓的，记录者毫无羞愧，他本人其实应对此负责，但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那就是拜占庭的篡位者——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回忆录。

这个令人厌恶的人被视为文明的代价之一，文明为达到鼎盛，必须为其腐朽付出代价。在拜占庭，如同在许多其他社会一样，政权总是保留给世袭对象，或者幸运儿。幸运儿一旦显出其运气，也会进入世袭行列，因为富人们总是相信财富就是天赐宠爱的标志。这是个封闭自足的团体，能够将执政的能力发展至近乎完美，也能够交换通过独掌大权而获得的信息，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他们为国家，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直到他们成为自己眼中的魔法师，已不知失败为何物。最后，他们开始认为国家的繁荣是他们的阶级衍生物，只要这个阶级过着健康的生活，并被允许践行其传统活动，繁荣就会源源不断地产出。梦幻太美好，他们都不忍从中醒来，哪怕它和自己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们英国人熟悉这种困惑。我们的很多生产商，拒绝转变他们在19世纪建立财富的方式，哪怕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他们正在失去20世纪的市场。我们的外交官，好像觉得不列颠主权仅仅靠公使馆和大使馆里的生活习惯来确保，长期按照这样的思维来行事。

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么一段时间，连最听话和最顺从的孩子们都能看穿统治者编的故事，原因往往是当受到了饥荒和危险的威胁时，统治者不去面对现实，而是与世隔绝到疯狂的地步。拜占庭帝国曾经经历过这个关口，坎塔库泽努斯就是标志。当然，它的厄运已经注定。来自土耳其的摧毁在劫难逃，但是无情的西方早已将其破坏殆尽：贪婪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要求它签订极其离谱的灾难性贸易协定，以换取帮助，抵御四处劫掠的拉丁人；痛恨东正教胜于伊斯兰教的罗马教皇阴谋不断；本应抵抗土耳其的外国雇佣兵通敌叛主。他们本应是欧洲更文明的一部分，事实上却对拜占庭犯下了无法估量的罪行。他们还算步伐缓慢，步子迈得更快的是亚洲。没过多久，土耳其就从小亚细亚开始吞噬拜占庭领土，这事关重大，因为帝国的大部分水手和兵士就来自这些地区。拜占庭除了与塞尔维

亚以及保加利亚联盟以外别无他法，毕竟这两国和它宗教一致，文化相关。这事本来可以通过几路王权订立制度的方法进行安排，避免公开承认投降的尴尬。拜占庭内，共存的帝王人数并无限制，曾经一度达到五人之多。其中一人行使王权，其他的并无实权，履行协商职能或充当继任者。在塞尔维亚已有这项习俗，几任尼曼雅国王都指定他们的儿子为国王助手，享有国家的一部分特权。联合两三个帝王统治下的东正教巴尔干民族比较容易，尤其是当时，斯拉夫人已占拜占庭人口的大多数。但是，这却不符合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的意志。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里，还无耻地存在着几笔巨额财富，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是其中之一的继承者。而且他身处高位，是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军事统帅。约翰的分裂影响力首现于皇帝废立皇孙小安德罗尼库斯时。这位皇孙派了些弓箭手躲在他情妇的门外，暗杀了他心存妒忌的一个访客，此举将他爷爷对他素日不端行为的不满引向极致。结果被杀的人是他兄弟，他病弱的父亲听闻悲剧，震怒而亡。老皇帝的意图已明。但在那个狂暴的年代，一些贵族认为皇帝另立一孙为储不合理，拒绝接受废立皇孙的命令。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支持这荒谬的举动，随即导致国家陷入七年内战。他留下一部极其详尽的自传，告诉后世他这样做的原因和方式。那是本令人恶心的书，它就像是蛋白和糖的混合物，一些糕饼师傅用来替代纯奶油的东西。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解让书页白得极不自然，这种苍白就来源于其中扬扬自得的感觉，因为缺乏原则和对现实的承认而显得虚伪。在某些时期，保守阶层比革命阵营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必须承认，坎塔库泽努斯是个能力极强的人。拜占庭的管理历来高效，其军队组织性之强，堪称欧洲进入现代史以前之最，因此它的合格的军事统帅必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他为自己的协商能力甚感骄傲，原因无须多言，拜占庭的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协商这门艺术只能适用于风调雨顺的年份，相关各方可以安心地对富余部分讨价还价。在荒歉的日子里，国家就得制定相应条款，用以满足自己的储备，不能妥协于此的条款就应该被废弃。拜占庭不能永远处于巅峰期的事实，坎塔库泽努斯不能从本质上看到。他极其草率地煽动皇帝和皇孙间的不满，希望以自己的技巧去安排他们之间的妥协。他的希望得到了过于充分的实现。在七年内战期间，他就这样鲁莽行事。在这个饱经蹂躏的国家，他能够将三份设计最为巧妙的条约，摆在双手沾满鲜血的异议者面前，让他们签字。坎塔库泽努斯是拜占庭这个国家的外科医生，手术总是成功，但病人总是死亡。

终于，坎塔库泽努斯的同胞们开始注意他的一些东西了。无论他处于何种权力位置，人们总会表示出极大不满。当小安德罗尼库斯去世，让坎塔库泽努斯辅佐自己十二岁的儿子约翰时，针对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坎塔库泽努斯对人们的忘恩负义大为不解。他知道，自己曾经有某种能力，可以

效力于国家，让自己的阶级免于受责。因而，他没有意识到，交际方面的技术性成就并不等同于治国之才。带着骄傲的尊严和在道德上的充分权威——他自传里呈现的这些在读者眼里如同一栋大而乏味的建筑——他自封帝王，宣称拥有儿皇帝约翰和约翰母亲（萨沃伊的安妮）手里的执行权，这又引发了内战。随之而来的，是十三年痛苦的兵荒马乱。坎塔库泽努斯却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机敏带来的一系列胜利，完全无视这些行为在摧毁拜占庭帝国中的累积效应。

在此期间，坎塔库泽努斯不断向邻国求助。和邻国谈判时，将自己的机智、圆滑及谨慎发挥到了极致。这大大地加速了东南部欧洲文明的崩塌，因为他的邻居们要求拜占庭维持秩序，以维护他们对抗土耳其的共同防线。他们也不确定是坎塔库泽努斯，还是皇后安妮，能更好地确保这事。邻国摇摆不定，让局势更添混乱。后来，坎塔库泽努斯把他的艺术天赋进行了灾难性的展示：他成功地和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领奥尔汗结盟。他的“卓越”无人能及。只是，这给欧洲引入了驱赶不尽的土耳其人。他将自己的女儿嫁与奥尔汗，进行联姻，模糊了基督教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土耳其之间的鲜明对照图，而在他自己民族和西方人的眼里，这种对照本应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留。

最后，坎塔库泽努斯天才地与已长大成人的皇帝约翰实现了和解，结束了他精妙而愚蠢的成就，条件是承认两个皇帝三个皇后：他自己、约翰、约翰之母萨沃伊的安妮、他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力劝约翰娶了他女儿，并保留了让自己成为十年内唯一统治者的权力。他能让协议通过，必是政治交际史上的绝世佳作，当然，他让国家精疲力竭，这极大地成就了他的佳作。内战严重损毁了国家，哪怕是不久前还艳惊世界的皇廷，也辉煌不再。在皇帝约翰和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的婚宴上，皇族和贵族一样，用镀金皮革和彩色玻璃来打扮自己，盛酒的器皿不过是锡铅制品而已。

但是，针对坎塔库泽努斯的防卫迅速反弹升级。两大斗士间的停战协议刚给了国家喘息的空间，约翰就撕毁了协议。他引入热那亚人助战，并获得大多数臣民的支持。坎塔库泽努斯做出回应，让自己的儿子马修坐上约翰的王位。他觉得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从懂得做事的家族里再来一人。这时，拜占庭人终于丧失了耐心。他们团结一致反抗坎塔库泽努斯，把他赶进了修道院。他以能想到的最体面的方式接受了这境况，立誓入会。因为世间人无法充分欣赏他的才能，他以毫不减弱的自信把它们延伸至另一个世界。在余下的岁月里，他撰写了反对犹太人和伊斯兰教的大量论著，在精神世界又激起一场内战。他独具特色，先巧妙地把土耳其人请来欧洲——他们在那里无正事可做，然后巧妙地攻击他们的想法——他们完全有理由坚持的想法。

这位保守的政客，光亮圆滑，滑得像流过断崖边缘的水。他来到普里什蒂

纳时，是羽翼渐丰且并未广受好评的篡位者，本应觉得前途未卜。他确实有些踌躇，是就职的议员刚跨进议会大厅时的那种踌躇。恐怕他所知道的怯态也不过如此了。他走进市镇，就是之前康斯坦丁、我丈夫和我吃饭的市镇，然后他感觉到了自豪。市镇多是木建结构，有的史学家认为，这说明它很原始。但是斯拉夫人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总是尽可能地用木材建房；而使用石材的地中海习惯，是由森林匮乏而南方采石场众多的原因决定的。从木房之间，塞尔维亚贵族和贵妇骑马出来迎接他。他们自己身披皮草绲边、金线绣花的红色斗篷，非常亮丽；他们的马披戴着来自威尼斯的银质马饰，也十分俊美。斯拉夫的民族性没有给他们和访客之间造成太大隔阂。他们中很多人讲希腊语，对史蒂芬·杜尚来说这就是第二母语，因为他从八岁到十五岁都住在君士坦丁堡。皇廷的礼仪也完全是拜占庭式，这让坎塔库泽努斯深感愉悦。

根据塞尔维亚习俗，当国外贵客会晤国王时，双方都应下马，客人亲吻主人的面颊和胸膛。但史蒂芬·杜尚下令，当坎塔库泽努斯来时，他应受到和在自己帝国内一样的接待。于是，所有贵族老远看到他就下马，等他行至他们面前时，他们屈身亲吻他架在马鞍上的膝盖。然后他被引领至皇宫，受到帝后的亲切接待。宴会时，他被带进大厅。在餐桌旁为他安排的椅子比史蒂芬·杜尚的还高。尽管他来自拜占庭，也不得不惊叹于这场宴会。贵族贵妇们身着绿色或黄色的束腰礼服，缀满钻石、宝石及古希腊切割珠宝，扎着金银腰带。男人们配着华丽的匕首，手戴珠宝戒指和手镯，脖子上挂着宝石十字架。女人们头戴工艺繁复的金银头饰，从上面垂下精致的坠链，连在巨大华美的耳环上。他们听着长笛奏出的音乐，开怀畅饮蜂蜜酒和红酒，享受野味、鹿肉，以及多瑙河冰雪下的鱼肉，还有各种蔬菜、水果、羊奶和蜂蜜。桌子四周还有一支乐队，乐手们来自各个国家，在轻声奏着管弦乐。许多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亚洲人来到塞尔维亚寻找财富。史蒂芬·杜尚的私人卫队里就有一队德国士兵，以模仿拜占庭皇帝著名的瓦兰吉卫队——那是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组成的。但是，皇廷细致周到的礼仪，比其财富和国际化素质更让坎塔库泽努斯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一个人待在帐篷都不觉得孤单。史蒂芬·杜尚几乎每天都会派来一个代表团，由最尊贵年长的贵族和最漂亮可人的男童组成，乞求他去往皇宫，以便皇廷得到他宜人的陪伴。每当坎塔库泽努斯接受邀请前往时，史蒂芬·杜尚都会在华丽的门口迎接他，有时候甚至在他下马的地方迎接。

满足礼仪习俗的时间充分流逝，访问除了纯社交并无其他意义。史蒂芬·杜尚问坎塔库泽努斯，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表达了意愿：若有，必应承。坎塔库泽努斯运用上帝降临对摩西的问答口吻回答，说他是来结交史蒂芬·杜尚这个朋友的，智者以忠诚的朋友为贵。但他接着又承认，他想寻求主人的帮助来恢复拜占庭帝国的秩序。他补充说，如果史蒂芬·杜尚不想帮他，他希望能够立即被告知，这样他可以寻求其他方式的帮助。从他对

自己对话的记叙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只聪明的、善于表演的跳蚤。他表达自己的诉求时，用双重假设让史蒂芬·杜尚陷入网中：一场属于绅士的谈话，如果转换自己定下的谈话基调，就会证明自己不够绅士；话语中强烈暗示，如果求助受拒，拒绝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史蒂芬·杜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威望，对于最后一项暗示，他不能视而不见。他说如果坎塔库泽努斯能证明自己确实有所求，他有足够的军队，可以给予坎塔库泽努斯他需要的所有帮助。坎塔库泽努斯表达了对语句的疑惑：怎样证明自己确实有所求呢？史蒂芬·杜尚回答，如果坎塔库泽努斯把色雷斯所有的市镇，即萨洛尼卡以东的希腊海滨区域，交给塞尔维亚皇帝，他就能相信坎塔库泽努斯对帮助的渴望。事实上，这也不算过分的要求。那时候，拜占庭帝国的居民，大多数是斯拉夫人而非希腊人，从种族原因来看，没有理由不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人合并，领土总是会落入强势政府的盾牌之下，这是趋势所致。侵略者常常以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强盗行为辩护。在欧洲东南部这里，14世纪中叶，这样的理由恰好又是有效的。位于海滨又缺乏有效管理的市镇，对于天主教西方强盗来说，意味着一扇没锁的大门。

坎塔库泽努斯回答史蒂芬·杜尚的方式，很像最糟糕的老派英国外交官说话的腔调，当他们对早已厌烦债务问题的美国人说话时就是如此。他用冷静而滴水不漏的语言，绅士地总结了一下主题。“你言之有理，”他说，“就你想获得的回报而言。没有哪位智者在面对麻烦和付出的时候，不期待回报。所以，如果你的本能没有告诉你，你应该对我欣然地施以援手的话，你让我购买你的帮助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购买它，为它进行了支付，那么我对于你就毫无义务了，因为已为商品付过账的人对卖家没有义务。当然，如果你帮助我是出于慷慨的友谊，出于对于主权可敬的雄心，那么你是为了高尚的目的，而不是出于低等动物的贪欲，厉兵秣马也自然显得光荣。而且，”他补充道，“如果你当我是朋友，我享受皇权时，你也拥有我的所有，哲人们都说了嘛，朋友共享其所有。”他完美地运用了自己的技能，也完美地展示了对于现实的无知。“如果你提供帮助的条件，是要我交出你要的那些市镇，你把这个说得很直白，”他最后冷冰冰地说，“那么我只能另作安排了。我发誓我永不放弃任何一座市镇，我会护卫它们，如同护卫我自己的孩子们。”事实上，它们可不是他的孩子，也得不到他宣称的那种护卫。

史蒂芬·杜尚那时大发雷霆，场面一定很骇人。到他皇廷出访过的外国人，形容他是“同时代最高大的男人”。他在壁画肖像中体格强健、双眼乌亮、颧骨突出。他对坎塔库泽努斯的愤怒有其原因，虚弱的篡权者是对整个巴尔干和平的威胁。皇后海伦平息了杜尚的怒气，他同意召开由二十四个最重要的贵族组成的议会，和他们进行商讨。在这里，海伦扮演了一个重要

角色，也说明了男人看待女人的矛盾心理。他们既爱她们又恨她们，既纵容她们又虐待她们。女人们时而像奴隶，时而比他们更自由。在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女人们只是男人们的财产。她们的口供不被法庭接受，这样的规则总是暗示着，任何女人都不能受到社会明确的保护，她们不能冒险提供不出自男人的证据。然而，海伦皇后能够站在议会，发表长篇言辞，敦促人们反对，或至少是调整她丈夫的政策，说明她已习惯于积极无畏地使用自己的头脑。

她的演说极具说服力。她坚称，塞尔维亚人没有将对坎塔库泽努斯的利益的义务放在其自身的利益之上来考虑，她提醒他们要仔细判断，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她隐晦地暗示（现在知道，她指的是由萨沃伊的安妮皇后提出的，愿意以一大片拜占庭领土换取坎塔库泽努斯，且不论其是死是活），然后否定伤害客人的可能性。她说那种行为是人神共愤的罪行。她觉得他们应该帮助坎塔库泽努斯，因为他的过去证明了他是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如果他重掌皇权，可能变成危险的敌人。她提出，他们给予帮助，索要的回报不应是新城，而应是让他认可塞尔维亚的前人已经从拜占庭获取的老城。皇后的城府比坎塔库泽努斯想象的要深。皇后明白坎塔库泽努斯会接受这些条件，因为损失这些老城无伤他的颜面。

皇后说服了议会和她的丈夫。史蒂芬·杜尚发表言辞，感谢皇后关心自己的子民，然后去坎塔库泽努斯那里，微笑着说："你赢了，你成功地说服了我们去为你披荆斩棘。"坎塔库泽努斯听了海伦的提议，很乐意地接受了，然后愉快地坐下来，完成了更多笔触精致的纸上作业。可他的命运坍塌得太快，条约从起草到签订，其基础已发生了改变。一个军事冒险者，横跨在塞尔维亚和拜占庭之间，见风使舵地效忠于两边，这会儿又夺取了一个拜占庭的城池，赶着来送进史蒂芬·杜尚的怀抱。这是个不妙的兆头。这家伙是个万无一失的晴雨表，杜尚现在认为坎塔库泽努斯毫无价值，也可能这就是他的真正价值，和他结盟对塞尔维亚没什么作用。但史蒂芬·杜尚仍继续履行条约，只是坚持把这座城加入他的财产清单，把这个军事冒险者收入麾下，尽管坎塔库泽努斯竭力想把这些放到自己的无能统治下。然后，二十四个议会成员又被召集，史蒂芬·杜尚通过模仿得不完全但仍值得赞赏的议会流程，告诉他们，既然决定给予坎塔库泽努斯军事援助，现在他们就必须提供出来。其中二十人会率军出征，全力服从新任将军的命令。他们一定让史蒂芬·杜尚在暗自思考，没人能够拥有可靠的盟友，除了自己的右手；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也经常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思考。

八年之后，坎塔库泽努斯和史蒂芬·杜尚再次相遇，地点是远离普里什蒂纳的萨洛尼卡城外。到此时，在自己得意的破坏性追求中，坎塔库泽努斯越走越远。而史蒂芬·杜尚把他的势力向四面八方扩展，为自己获取了巴尔干半岛的掌控地位。他把斯科普里建成一座大城市。在一个复活节星期天，

他被加冕为“塞尔维亚人、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成长经历一直对他的宫廷礼仪影响深远，他现在完全模仿拜占庭的宫廷生活。他头戴三重冠，以双鹰为徽标。他的官员头衔也沿用了拜占庭制度，比如首席贵族、国务秘书、军队大统帅和大祭司等。他的模仿还不限于名号。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忧无虑。坎塔库泽努斯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对杜尚把控不牢的领土进行最后一次索回。军队开始向杜尚的领土行进，新皇帝明白击退这次进攻可不是儿戏。在波斯尼亚战线上，他的天主教敌人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但杜尚保持着自己的高贵，帝王的高贵。他面对坎塔库泽努斯时，脚下的这块土地，以及更广阔范围内的土地，都是他的，或即将成为他的。他有真正的力量，吸引着土地向他靠拢，这是其他人所缺乏的。

他首先得否认坎塔库泽努斯对他背信弃义的指责。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他唤起了敌人们心中的愤慨，因为他们不得不对付无穷无尽的奸诈和欺骗。任何动物，如果像狐狸那样被追捕，也会像狐狸那样去奔跑。无疑，他破坏了和坎塔库泽努斯订立的条约。可是两人地位起了变化，确实让条约变得难以遵守。要执行一个活人和一个幻影签订的文件，这当然困难。关于这场争论，更多的是是非非难以判断。在坎塔库泽努斯的自传中，当他写到这一段时，说他做了个决定，当然，在他的自传中这样的决定也不少见。他决定通过谎言来实现对自己的公平。他也告诉了我们关于史蒂芬·杜尚的事，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因为它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它让缺乏想象力的坎塔库泽努斯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坎塔库泽努斯记录下来，想败坏这个屡屡成功的对手的名声。他写道，在他们的公开会议中，在所有的拜占庭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在聆听时，史蒂芬·杜尚突然承认自己非常害怕坎塔库泽努斯和他的军队。是的，他说，他怕极了他们：睡梦中想到他们，会在冷汗中惊醒；睡前想到他们，会一整夜睡不着觉。杜尚的这个论调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后来的谈话中，他又提了一下。坎塔库泽努斯问他为什么自降身份，对威尼斯进行国事访问、对共和国致敬，对于强大广阔得多的王国的国君，这不合适。他回答说，他很清楚自己的举止有损尊严，但恐惧迫使他如此。他又补充，考虑到是什么恐惧，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什么更低劣的事。坎塔库泽努斯天真地暗自思忖，显然自己和全世界人都高估了史蒂芬·杜尚的性格，于是毫不迟疑地要求他归还征服的所有拜占庭领地。

史蒂芬·杜尚对这个提议大为惊讶。他不过是讨论一下恐惧的本质，以及偶尔的病态幻想而已——所有出身于女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他可丝毫没有在行动上示弱的打算。这好像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从恺撒的《高卢战记》中向我们踏行而来。这是历年来，关于斯拉夫人性格身份的最稀奇证据。他放纵了自己的欲望，知晓全局的欲望，这欲望也统治着今天的斯拉夫人。他发现自己身处极端境地，知道物极必反，也努力理

解着命运的种种方向。如果他战败且无望扭转局势，他会大谈胜利，直到听者被他吹的牛弄得一头雾水。所以，他现在自然会探索恐怖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尽管危险仍对他构成威胁，他似乎已找到了控制的良方。

杜尚权力的核心是他的强大力量，这让他能够支撑自己复杂的斯拉夫大脑。显然，他像炸弹一样，易发脾气，这和他的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非凡的活力配合得天衣无缝。他的习惯性作为，在《圣徒行传》中写圣彼得·托马斯的章节中可见一斑。后者蠢得出奇，毫无计谋，担任教廷使节一职极不合适。他被派到塞尔维亚皇廷，劝导对方转变信仰，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拒绝在受皇帝接见时按常规礼数致敬。史蒂芬·杜尚不出意外地勃然大怒，禁止朝廷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参加使节在第二天主持的弥撒，违者以挖眼处刑。圣彼得·托马斯将其理解为他将面临被杀的危险。挖眼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从拜占庭人那里学来的刑罚，并不意味着死亡。他仍然主持了弥撒，许多德国卫兵以及天主教侍臣参加了仪式，这是他们少见的失礼行为。塞尔维亚帝国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如果不是主持仪式的神父侮辱了他们的帝王，他们本来可以参加任何弥撒。当史蒂芬·杜尚派人召唤他们时，他们表示，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失去眼睛甚至生命。皇帝听了拊掌大笑，赦免了他们，以肯定其精神；之后，在圣彼得·托马斯逗留的日子里，也对其以礼相待。

故事里闪耀着史蒂芬·杜尚的特点，他讨厌在仇恨和冲动上浪费时间。这样的描述用在一个弑父者身上，显得有些奇怪。但即便是最基本的滔天罪行，也有一些层面在提醒我们，不能把它放在我们的年代去评价。史蒂芬·杜尚谋害他父亲的时候，没有杀死、监禁甚至流放他的继母。六年后，他把继母嫁给了专制君主约翰·奥利弗，并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羊场”和维勒斯城。文献中他称她为“亲爱的母亲”，表明那时候，她在他的皇廷里还是颇受敬重的人。我们徒劳地问自己这怎么可能，相关的人物共处一室时怎么可能共同呼吸，毕竟他们的恐惧和耻辱密切相关。这情形和都铎王朝比起来，也不算惊人。简·格雷或许还会感叹尼曼雅人的宽容。至于和现代做法相比较，三十年前可能我们还略显优越，而现在倒是每况愈下。毋庸置疑，如果史蒂芬·杜尚没能实现他的千年目标，不是因为他胃口不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只要知道方法，必会使尽浑身解数。

他喜欢顺其自然。他的政权里没有集权主义或仇外民族主义。他的民众不愿在城市经商或者从事矿井工作，他们更喜欢耕种自己肥沃的农田。当然，这也非常合理。他们的君主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引入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经商，引入萨克森人当矿工。外来的人得到的待遇都不错。我们非常清楚，他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上的考虑。因为他留下一部法典，里面包含近两百条款。这项成就极具荣耀，汇集了尼曼雅王朝先王们的法律，对北方的法学以及查士丁尼制定的拜占庭法系，都做了很

好的平衡和融合。它和谐巧妙地处理社会结构需求，甚至和西方律典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那时候，在西方，土地被划分给几个封建大地主，他们管辖着无数农奴。但在塞尔维亚这里，农奴非常少，少得在社会中形成的是最小的阶级，自由小地主倒是个大阶级。他们有个国家议会，可以召集商讨诸如继承王位或是爆发内战之类的重要事件。这个议会的成员包括君主、行政官、大小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还有个小规模的议会，用以商讨紧急事件，比如塞尔维亚要不要对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施以援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由整个地区的民众进行管理，所有司法也是；只有一些特殊的案件会交由皇家审理，比如重大叛国罪、谋杀罪、拦路抢劫罪。这表示，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处理他们能够完全理解的事情，而超出一般常识的事务则由君主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解决。这里的阶级并不封闭，神职人员和贵族都不断地从农民中产生。

尽管史蒂芬·杜尚一直受到军事问题的困扰，他仍然稳固地拥有许多东西。这个国家有许多生活得怡然自得的民众，国库充盈，谷物、牲畜、油料和酒品也都很富足。它遵循着两种传统——成熟厚重的拜占庭传统和生机蓬勃的斯拉夫传统，它的内核在向着文明发展。这里物质丰裕，也有着繁荣的精神文明。有些举动让我们又回忆起都铎王朝。在那里，离家数月的绅士会吩咐家人，在自己不在家时要好好待客；史蒂芬·杜尚下令，对踏上国土的外国使节都要用充足的酒肉款待，花销由皇室承担。他南进拜占庭时，也使他们恢复了几乎被忘记的文明生活的必要元素。他不缺钱，所以也不像内战时那样掠夺新的臣民。他降低了税负，还帮他们修补边塞的缺口，把塞尔维亚士兵借给他们充当警察。他坚持信仰自由的原则，深受拜占庭民众的拥护。值得一提的是，当狂热的拉丁骑士攻击撒拉逊商人的寺院时，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教众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护卫寺院。信仰自由的原则并未完全执行，史蒂芬·杜尚任命塞尔维亚行政官去管理新的领土；当本地牧师难以协调时，他也派去塞尔维亚神职者。但他让本土的社会政治体系保持着原样，对被征服领土也没有经济歧视。

从塞尔维亚帝国渗出的蜜、流出的酒，似乎浸染了整个地图。它们充溢着拜占庭，漫延到整个国家，直至大海，直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每个人都认为，可能有一天，史蒂芬·杜尚会来到君士坦丁堡，不仅是拜占庭人的皇帝，而且当上拜占庭这个国家的皇帝，端坐于宫殿中央，如同康斯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他为什么没能成功完成这项事业，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没有舰队很难攻下君士坦丁堡，史蒂芬·杜尚既不能发展海上力量，又不能说服短视的威尼斯共和国和他结盟——他曾协助其对抗土耳其人。但是，也有很多原因本可以让他无法建立起帝国，而事实上他还是建立起来了。他的邻居们在边界上设置的重重障碍，似乎使其领土扩张变得不现实。与

此相似，我们在初期也无法预测伊丽莎白女王政权的结局。宣称史蒂芬·杜尚到不了君士坦丁堡的人，主要是19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他们支持保加利亚，反对塞尔维亚。而他自己的时代，以及生活在对往昔荣光的追忆中的人们，相信他能够完成征途，甚至更远。他可能会发现，那是个贫穷的地方，连连内战已让财富化为灰烬，瘟疫的侵袭让民众筋疲力尽，宝贵的港口落入粗野的意大利人手里，他们控制其商业，且对被劫对象肆意侮辱。但了解杜尚的人相信他可以让其恢复往日光彩。这需要创造一个奇迹，但更神奇的壮举他本来也能实现。他本可以从土耳其人手里拯救欧洲。退一步说，他至少能够牵制对方，让欧洲有更多时间武装自己。本来，匈牙利不必经历一百五十年的土耳其暴政，维也纳不必遭受围困，万恶中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奥匈帝国，本来不必建立。我们的黑夜本可以不那么黑暗，我们的荣耀本可以更加夺目。

但史蒂芬·杜尚死了。在生命的第四十九年里，他死在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村庄小得今天已无迹可寻。他在痛苦中死去，似乎中了毒。由于他的死，一些不合意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我们坐在普里什蒂纳一家餐馆，手肘下的桌布仍带着污渍，盘子里的鸡瘦得像麻雀。一男一女朝我们走过来，女的背上扛着一个犁头。就在这里，曾经的女人们戴着金银美冠，皇后妙语连珠，赢得议会的满堂敬重。就在这里，女性的价值得到慷慨的承认，画家充满激情地将其绘入壁画，引起观众的共鸣。现在，同样在这里，这个女人远远地走在她丈夫旁边，肩负重物，而她丈夫只是空手而行。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凉鞋和羊毛袜子沾染了白色的灰尘。尽管她身形健壮得堪比驮马，嘴唇上也因为疲惫，显出青色的阴影。她丈夫上前，和斜靠在门上的酒店老板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她不能坐下来，因为绑在背上的铁犁头很长，从头顶一直伸到她膝盖处。她和她丈夫都没有觉得他们的样子有什么令人尴尬的。他们的面容洁净、严肃，我想他们不会做任何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当他把犁头绑到她身上时，他们是在自动遵循着他们的世界里无可指责的传统，没有什么一方刻薄、另一方怨愤的含义。这看上去也不像是丈夫嫌弃没有性魅力的中年妻子。她不过二十出头，颇有姿色。两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些乏味，但稳固而和谐。

如果情形如此，如果她和她丈夫习以为常，社会也安之若素，陌生人应该也没理由大惊小怪。但在普里什蒂纳，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大男子主义不受限制的地方，女性被驱使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却没有权利实践自己的意愿。这种状况令人作呕，说它恶心，并不是因为工作对于女性的影响——她们总能从工作中学到东西——而是因为它让男人变成了废物。这位科索沃男子健壮挺拔，但看起来像个阉人一样虚弱无能。这没什么奇怪的，他的生活里缺乏努力奋斗。他指望女人做所有的事，繁衍子孙，劳动

养家，给自己留的任务少得可怜。尽管女人没有完全让自己荒废，却也显露出令人不悦的邋遢模样，让黑色衣服、橙色围巾带来的整洁感荡然无存。她已慢慢地忽略了自己的子宫。她忘记了应该精细地使用自己，不是出于骄傲或怯懦，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种族的工具。生活本应以人为出发点，向前推进，以征服下一阶段的时间，现在却拖在他们后面，像投射在泥地上的阴影。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懂得我们所懂得的全部，甚至更多。但是史蒂芬·杜尚死后，思想也随之而死，被杀死在科索沃的田野上。

夫妇俩动身走入阳光里，色彩鲜亮，血肉丰满，却因愚昧而空虚。我上楼去洗手间。走廊上敞开的门里面，展示出僧院般整洁朴素的卧室，有铁制的床头柜、单薄的脸盆架、搪瓷水罐和面盆，以及擦洗得发白的空板子——吉卜赛人用作什么秘密用途的。在一个房间里的床上，蜷着个阿尔巴尼亚人，眼睛瞪着天花板在拨弄手指头。洗手间是传统土耳其式，即一间石面地板的小屋，靠近其中一面墙的地板上有个圆洞，离得不远处是水龙头。整个地板湿漉漉的，用完洗手间的人走出来时，鞋上必沾染尿渍。这个隔间很不可爱。地板上那黑乎乎的洞，以及厕所逼仄的空间里显得诡异的某种东西，让人觉得，似乎粪便——男人所排泄的——也树立起一种新的权力元素，充满敌意且具有魔力，能将其暗黑的浊流与恶臭的潮湿气息覆盖整个世界……我感觉那地方正用它的秽物将我玷污，而我永远无法再洗涤干净，因为那污秽的实质比温和的肥皂和水更加顽固。

我走下楼，我丈夫正站在酒店外看着一块橙色的布。我说："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有充足的供水，我们从医院的章程中可以知道，他们有悉心维护的浴室和洗手间。"他回答："恐怕是那样。看看这个，我去店里，本来想看看能不能给你买张本地的方巾，结果他们都用这个。"这是一块带着机缝褶边的方形布，织法潦草；褶边上每隔八英寸绞入四五根橙色的丝线，大概三英寸长，寒碜地想制造装饰效果。"他们说城里可以买到好的绣品，有个女性卖家很有名，"我丈夫说，"但这是大多数女人戴的。它是我们各处见到的东西中最简朴的。他们说这里的人们太穷了，没有多余的羊毛可以给自己做东西，所以丢掉了装饰的习惯。"

---

1. 简·格雷（Lady Jane Grey, 1537？—1554），英国首位被废黜的女王。1553年，她被推上英国女王的宝座，同年被废黜，次年2月并被秘密处死于伦敦塔内。死时年仅16岁。

科索沃平原II

我们坐进车里时，康斯坦丁朝着绣线菊的芬芳残片做了个鬼脸。那是从枯萎的花上掉下来的几片玫瑰色的花瓣，花在午饭前已经被我扔掉了。“真搞不懂，”他说，“你假装热爱这些漂亮的东西，然而你摘花的时候明知道它们会枯萎，会死，会被扔掉。”“为什么不摘呢？”我回答，“长在这里的花有千百朵，没有人会去怀念它们。而我们，至少有两三个小时都很欣赏它们啊。”他耸了耸肩：“噢，好吧，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然后他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头向后一甩，闭上眼睛，嘴角露出一点沉思的笑容。“你和我妻子真不一样，”他说，“她比较神秘。她会围着路边的野花跳舞，而不是把它拽下来。你不会理解，你们英国人可没这么温柔。”我心里默默地想，格尔达围着路边的野花跳舞，不知道要给周围的生物造成多少不温柔的伤害呢。我还想起，她对花一样的吉卜赛男孩女孩们心怀憎恨。“她跟土耳其人一样‘温柔’，”我自言自语道，“热爱自然但也曾发起战争。”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道路从普里什蒂纳所在的低洼处向上延伸。回头看，新近粉刷过的政府大楼像人的下巴似的从广场上凸起；在它周围，老城杂乱无章地摆在那里。向前看，是暗绿色的平原。紧密晦暗的草地质感让它看起来有些失真，好像是为了什么特殊目的而准备的，就如同我们的跑道、高尔夫球场，或者锡尔伯里的土丘——它因我们的史前祖先某种不为人所知的用途而存在。

我试图抵制那些单调枯燥的夸张，说很多不可挽回的损失已经被造成。我假装这里的破坏无伤大雅。如果斯拉夫文化曾经存在于现实，塞尔维亚帝国就不至于在从史蒂芬·杜尚去世到科索沃战争之间的三十四年内土崩瓦解。这是反塞尔维亚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指出，在极短的时间里，杜尚的帝国分崩离析，于是土耳其人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民族，而是封建贵族和追随者们的松散联合。他们重复这些观点时，我明白这是一派胡言。如果伊丽莎白死时不是七十岁而是四十八岁，英国也可能因为派系内斗而堕入荒废期。有很多原因致使塞尔维亚尤其容易陷入无序状态。

首先，一个不幸的遗传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文明的不稳定性负责。和一些伟人一样，史蒂芬·杜尚遗忘了他那个对父亲的天赋承袭很少的儿子。他儿子和他一样非凡、细致，但缺乏应有的体量和魄力。史蒂芬·乌罗什继位时年仅十九岁，但他的缺陷已暴露出来。他能干的母亲海伦皇后不想让他掌权，似乎确有其事。她曾经一度自己亲理朝政，甚至率军上阵；哪怕是退隐至修道院，成为伊丽莎白修女时，她都还继续管理一部分领土。史蒂芬·杜尚死后八年，拜占庭皇帝约翰急于和塞尔维亚结盟，以对抗土耳其人。于是他派出大主教做些必要的前期安排，以便撤销他曾下达

的、将塞尔维亚教会革除教籍的命令。任务本来是指向在女修道院的皇后，结果大主教在途中去世，命令也就作废了。皇帝没有再另派他人继续执行。思路不连贯和朝令夕改在那个时代很普遍。

塞尔维亚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史蒂芬·杜尚死后不久发生的一次灾祸。它对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害，也动摇了其后继者的权威，不论其能力有多强。它被描述为夺走许多人命的饥荒，也可以被视为是某种瘟疫的侵袭。之后，它还吞噬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这场流行病让大片良田荒芜，损毁了手工业中心，也废弃了对外贸易。这场浩劫必定影响了之前积极扩张长达七八十年的帝国，就像1929年的经济衰退影响了美国一样。在那个年代，经济理论还未成形，完全超越一般人的理解范畴。人们对物质的不满常常表达为神学或政治上的争端，尽管这和正在经历的困难并无多大关系。

那时的拜占庭人将痛苦发泄为宗教狂热分子间的争议。但塞尔维亚人不像知识分子，更像是艺术家。他们喜欢就所见的进行争论，于是争论起他们的统治者。如果他们讨论的是，耶稣在三个门徒前变容的神光会不会为肉眼所见这类问题，则要好得多，因为那只会满足对于无形力量的虚荣。对于激起有形力量，塞尔维亚则应非常小心。它仍然在创造自己的贵族，即它的管理阶层，创造时需要有获得认可的权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知道君主在将军事或民事掌控权赋予一个贵族时，会授予他武器和战马；贵族去世时，新旧东西必须归还君主，由君主决定把它们还给死者的子嗣，还是授予其他家族。这就要求有一个具备教会权威的君主，他的意志就是神法。如果他的凡人天性让他在做决定时摇摆不定，一群封建贵族便会对他施压，质疑他的统领地位，并企图据为己有。斯拉夫社会总有这个特殊的悲剧：在危机时刻，涌现出的具有掌控力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在史蒂芬·乌罗什继位后的头几年里，相当多的人在觊觎其权力。其中有：他的母亲；他父亲的兄弟西美昂及其女婿；他的两个兄弟乌格里耶沙和武卡欣，即之前他的斟酒人和行政官，后来背叛了他，并窃取了大片土地；还有几个小族长，其中包括一些强势人物，他们后来在保加利亚制造过分裂。过了一阵子，在科索沃战争之前，这些对手都已经销声匿迹。史蒂芬·乌罗什被流放，然后被谋杀。如今，他的君子声名让忠诚于他的人在他墓前赞叹不已。在弗鲁什卡·格拉山上的亚扎克修道院，那个俄罗斯修士跟我们说起的就是他——“不，这里没什么有趣的，只有一位塞尔维亚皇帝的遗体”。武卡欣和乌格里耶沙在带领军队对抗土耳其人的时候被杀，武卡欣死在一个叛变的仆人手里。且不说那些因为自然死亡或战争失利而被遗忘的人，其余的人在两个能力卓越的王子面前也黯然失色。

一个是特弗尔特科，波斯尼亚王，尼曼雅家族的旁系子孙，夺取了达尔马提亚和塞尔维亚的大片领土；另一个是拉扎尔王子，我在弗尔德尼克碰触

了他棕色的战败之手，这是同一个拉扎尔，他是塞尔维亚北部和东部土地的领主。特弗尔特科表现出自己的军事天赋，而拉扎尔至少可以被称为军事效率极高。他们为了团结斯拉夫人对抗土耳其人而签订协议。协议反映出他们优秀的政治家才能。这二人的素质说明，塞尔维亚帝国在史蒂芬·杜尚死后的衰落只是波峰过去之后的波谷，跟随其后的，也许又是另一波大浪。历史学家们力图证明，巴尔干基督教文明在遭受破坏之前，已经被自己的厄运诅咒。历史学家们势利而胆怯，不想说命运这位老绅士的坏话。科索沃战争对于文明的损毁，可能相当于都铎时代后英国积攒的总和。

我们身处的世界不过是一艘在渗漏的船，倾覆随时可能发生，这想法令人痛苦。康斯坦丁说："瞧，我们现在得步行，我要给你们展示我们所有的悲剧。"我听了真不想下车。但下了车，站在路上时，我也没察觉出什么。面前不过是绿色的高地，和威尔特郡山谷边上那些差不多。银白色的高空让景色里的所有异国风情都消失无踪。地平线上的皑皑白雪，在天色的映衬下，像是闪亮的云朵。还有蜿蜒的道路和零星的建筑。在这里我看不到曾经发生的事件。在格拉查尼察时，我在现存的服装里看到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如同游客在汉普顿宫看到都铎王朝，或者在波茨坦看到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样。但是，1389年圣维特斯节前夕驻守在这里的军队，甚至都没来我的脑海里游荡一下；他们只是停留在书上的文字里。得到这样的"赦免"，我其实感到惬意。我还记得曾有一件让人不快的事降临到我头上，时隔一年之后，我仍感到恐惧，惊醒时只觉得空虚，彻底的空虚。我离开汽车，朝着生长在一百码以外的粉紫色花簇走去，任凭康斯坦丁叫我也没转身。但德拉古廷在我后面跟来，慢声说话，以便让我听懂："像个小孩，像个小孩。"他把一只手掌在离地两三英尺的位置展平，另一只指向康斯坦丁。"他就像个小孩啊！不过他有个坏妻子。上山去吧，挺有意思的。别理他。"

"不、不，不是因为这。"我说，又觉得没法解释。于是跟着他走过草地，和我丈夫以及康斯坦丁走在一起。我们沿着道路走上一座小山，山顶上有座粉刷过的六角形建筑，覆盖着灰蓝色的金属圆顶。周围的草坪上到处可见穆斯林坟墓，上面的白色柱子东倒西歪。还有一些野玫瑰丛和一棵果树，悬着一个棕色的花环，花已枯死。地形起伏的景色本来看着很空旷，等我们刚走到建筑那里时，忽然出现几个人，聚集在我们面前。其中有一个带着面纱的妇女，黑色的棉质衣服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夏日尘土，颜色诡异，像幽灵一般。她走路悄无声息，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脚边还站了俩小孩，让人想起鱼子酱一成不变的黑滑，以及其中蕴含的繁殖力。有一个精瘦的男子，面容透出些野性，牧羊人打扮。他的双颊凹陷，好像平时是戴假牙的，现在去掉了；仿佛不是有什么东西撑起的话，他的肚子也会凹下去。有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基督教女信徒，她最好也戴上面纱，因为她的脸上固定不变的，是由饥饿而产生的空洞眼神。她完全被饿坏了。她身上穿

着条短裙，就是从布上裁下的一块，用一条布边当腰带，裙摆挺在膝盖处，像粗制滥造的芭蕾舞裙。还有几个男孩，都戴着土耳其毡帽，都是罗圈儿腿。面纱妇女带着她的孩子们，悄声地走进了六角形建筑的破旧回廊里。康斯坦丁简单地解释："这是他们的圣地。"她的样子，的确像是在从事某种既满足冲动又履行责任的任务，比如购物或打电话。她们的程度更深，是穆斯林妇女在宗教典礼中的那种投入。牧羊人打扮的男子盯着德拉古廷看，这是对英俊青年的仰慕。孩子们把几束花递向我们，动作洒脱得像有贵族风度。康斯坦丁说："这是科索沃的著名罂粟，别处没有。它们被认为是从被屠杀的塞族人的鲜血里发芽的。后来整个平原都成了红彤彤的一片。但是你看见的这个还小，它们还只是花蕾。"它们像一种非常美丽的野生牡丹，有金色的雌蕊和粉色的雄蕊。我丈夫从女孩手里买了些，德拉古廷从男孩们手里买了些；他在科索沃的举止，犹如在春天里，在教堂中一样，有着某种军人般的神秘的振奋，像是在向英勇的神圣灵魂致敬。

康斯坦丁开始讲述军队是怎样集结上战场的。拉扎尔王子的军营就驻扎在这里，而土耳其人也在此守候。"噢，不是的！"德拉古廷打断他。他慢慢地叫起来，并不带怒气，好像是被爱国热情驱动。"他们怎么可能守候在西北！不是这里，是那里，他们那些走狗！那里，乌克·布兰科维奇本来应该带着部队来的，结果他转身离开了战场。""乌克·布兰科维奇，"康斯坦丁说，"是我们故事里的犹大。他是拉扎尔王子特别亲近的姻兄。他肯定是把自己出卖给了土耳其人，在关键时刻，带着部队离开了战场，从而使拉扎尔两面受敌。但现在历史学家认为并没有什么背叛，说可能是其中一个塞尔维亚王公没能及时收到前去支援拉扎尔的信息，所以让他吃了败仗。但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背叛让我们失去了科索沃，而是我们内部的分裂。""是的，"德拉古廷说，"我们的歌里是这样唱的，我们被布兰科维奇出卖了。但我们知道其实不是，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不齐心。"我问："你说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说是学校这样教的吗？""不，"他说，"我们上学前就知道了。这是我们民族的记忆。"我又一次见证了斯拉夫思维中奇妙的诚实。掩饰历史的相互矛盾，以便让它们可以勉强通过理性审查。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虚构出一个故事，用自己阶层内的背叛来解释战败，让自己心里好受些，正如同德国人"一战"后所为；但当他们头脑中的批判性思维指出故事不过是故事时，他们也不会去压抑这种思维。这种不一致已被承认，所以并不危险，他们就让故事和对故事的批判在脑海里共存。

康斯坦丁和德拉古廷在低地那边挥动胳膊，我还是什么都没看见。我转向一旁，看着我们身后的白色建筑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能进去吗？""当然，当然，"康斯坦丁说，"这里很有意思，是戛兹·梅斯坦的墓地。他是个土耳其领袖，战争中阵亡，就葬在他倒地的地方。""是啊，"德拉古廷喊

着，“我们的很多人都倒在科索沃，荣耀归于上帝，也归于他们。”我们进入木质回廊。面纱女人和她的孩子们轻声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屋子，明亮而干净，但看起来像是凡人早已不曾使用，活儿都是由毛绒玩具干的。屋子里除了两具穆斯林棺材之外空空如也。棺材是人字盖板，头比脚高。上面覆盖着旧损的绿色台面呢料，悬挂着廉价的装饰物，其中一些是粗糙的绣品，另一些是印制品。墙上有几幅装裱起来的土耳其书法作品、苏丹的印章复制品，以及一些明信片。一个男子向我们走来，带着和悦的微笑，但又显得有点犹豫不决。他头戴褪色的土耳其毡帽，身穿整洁而磨旧的西服。从整个样貌看来，这是一位胸怀天下而不是为己考虑的人。我在英国也看到过类似的人，他们穿着夏装，戴着草帽，走在11月的冰雨里，仍然欢欣快乐。他用一段程式化的文字对我们讲述戛兹·梅斯坦的英名和英勇，大脑记忆里凝固的语言听起来颇显生硬。“那你呢？你是谁？”康斯坦丁问。“我是戛兹·梅斯坦仆人的后人，”男子答道，“第十六代后人。他倒下时，我的祖先就在旁边，为他的主人合上眼睛，保卫并守护着他，直到把他移进墓地。之后，我们都在守护他。”一个弱视的男孩跑进房间，站在男子身边。男子将手放在他的肩上。“我的弟弟，”他温柔地说，把脸靠在男孩的细发中。他们看起来柔弱得不可思议。如果有人从寺院的薄顶上拿着鹅卵石轻击一下，他俩必定会带着微弱的笑容倒地。男孩光溜溜的踝骨在棕色的鞋子和磨损的裤边间露出来，凸起很高，周围的皮肤绷成了亮红色。“这些人靠什么生活啊？”我问。“肯定是靠接受馈赠。这里也是一处圣地，”康斯坦丁说，“可能会从瓦库夫拨发津贴，穆斯林宗教捐助的基金。无论如何，他们不能从事其他的事情，这是家族的命运和荣耀。”“他们过得一点都不像凡人，”我说，“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像是玻璃瓶里的船和真船之间的区别。”我看到的，是一个超越合法边界的帝国。帝国不能将自己的生命延伸至被征服地区，因为生命不能远离其本源；结果，它导致了这些地区本土生命的枯萎。于是它将所有的臣民禁锢在陈腐的保守主义里，用低级的排场，一遍一遍反复纪念曾经的辉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的过去。他们体格健壮，意志强劲，在往昔的灿烂岁月里，他们也像土耳其人一样，或者像处于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人一样，威武而和善。但他们变成了酸甜的魂灵，人间的美酒发酵成了醋。

在外面，我们发现德拉古廷躺在地上，女孩男孩围在他身边，一只田鼠蜷在他手里。“你不想进去吗？”康斯坦丁问。“不，”他说，“土耳其人曾经活着，现在死了，这是好消息。但这个人死了这么久，消息都有点馊了。”说着，他张开手掌，田鼠顿生逃意。“现在我带你去苏丹穆拉德的墓地，”他说着，站起身来，“感谢上帝，我们先在基督纪念碑停脚。”那里离主干道几里远。围着栅栏的花园里立着个简单平常的十字架，鸢尾花、羽扇豆和玫瑰长势惊人。可以看出，科索沃曾经真是富庶，滋养出许多兴旺的村庄。看守纪念地的两个士兵来到门口迎接我们。两人都不过二十出

头，矮小、敦实，浑身散发着健康的气息，古铜色的皮肤下透着红润，黑色的眼睛闪着深邃的光彩，黑色的头发也光彩熠熠。

我赞叹着花园。他们其中一人蹲下身，从花床里为我采了些鲜花。他没在主路上采，以免破坏了整体效果。康斯坦丁对着另一个人问："你是从北方来的塞尔维亚人，对吧？"他微笑着："是的，我是从北方来的，和你来自同一个城镇，沙巴茨。""啊！"康斯坦丁惊叫，像婴儿看到了奶瓶，"你认识我？""沙巴茨有谁不认识在那里长大的伟大诗人啊？"士兵回答。我喜欢沙巴茨人，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知道康斯坦丁的好坏两面，既讥讽他也敬重他。"告诉我，"德拉古廷插话，"那个不是克罗地亚人吗？""是的，"他说，"他来自卡洛瓦兹。""在这里，和一个克罗地亚人整天在一起，不难受吗？""一点也不，"他说，"他人好得简直让人吃惊。他是我真挚的朋友，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人。我都觉得难以置信。""真的吗！"德拉古廷说。"告诉你啊，"康斯坦丁说，"好的克罗地亚人也有很多。我们塞尔维亚人应该和他们交朋友。""是这样。"德拉古廷回答。

我们在纪念碑脚下沉默了一会儿。碑上写了些让人吃惊的文字："致为了诚实的基督精神、自由以及人民权利而倒下的英雄，1389—1912，普里什蒂纳全体人民立"。它纪念的是远在记忆范围以外的人，这点让人头痛。奴隶生于奴隶，他们试图反抗，结果阵亡。我们再次朝向花园时，看到另一个士兵站在我们身旁，手握花束，像宫廷防火屏上的那种花束，那样的造型和色调。所有的斯拉夫人，除了画商之外，都对配花有天赋。我致了谢。德拉古廷说："嘿，克罗地亚人！你是个勇敢的家伙。你觉得我们塞尔维亚人怎么样？""好得很，好得很！"他笑着回答，"这里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我以前还以为你们是我的敌人呢。""哦！"德拉古廷说着，拧着小伙子的耳垂，"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们赶尽杀绝。"小伙子笑着甩开。他们一直在说话，直到我们离开。德拉古廷重重地拍了拍小伙子的背，说："你们两人，如果去斯科普里的话，在'班的修车厂'可以找到我，我请你们吃红椒炖肉。你们是南斯拉夫需要的人。"在小岩架这里，他们遇见，并心生默契；在十字架下这方空间，科索沃的暗色草坪不再蔓延，生于不同旗帜下的人们必须摧垮谎言的隔墙，才能互相微笑致意。

科索沃战争对于我来说完全无法捕捉，是由于它波及的范围太过庞大。科索沃的野地完全吞噬了在他们的刺绣帐篷里等待命运的人们。它曾经被他们的鲜血浸透，现在成了一片沼泽，落上去的东西就会永远地消逝得无影无踪。康斯坦丁说："这会儿我带你们去苏丹穆拉德的墓地。他是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在战争前夜，被一个叫米洛什·奥比利奇的塞尔维亚人杀死。刺客是因为被我们的人怀疑犯下叛国罪，想洗清自己的名声。"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斯，是"胜利者"奥尔汗和一个希腊女孩的儿子。女孩从她新郎的怀抱中被掠走、强暴，土耳其人称她为"尼鲁菲尔"，意为水莲

花。根据记载，穆拉德有一个创造某种道德性格的不道德企图，因为他似乎将令人惊骇的残酷，作为合金成分引入性格当中，来强化他精神和肉体上骄奢淫逸的软质金属。“他的墓，”康斯坦丁说，“就建在他倒下的地方。”

一条小径从马路上延伸出来，穿过晦暗无光的牧草地——这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小径通向的地方，看起来像废弃的农舍。我们来到农场门口。就像在戛兹·梅斯坦的墓地一样，来了一群带着纯粹乡土气息的人。他们很快绕过农场的角落，来到门口迎接我们。男人们穿着西式衣服，像站在莱斯特广场或是皮嘉尔广场的招揽员——那些人对自己的恶名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他们的相似点，在于都心急火燎地想卖出自己的东西。因为什么都没有，只得可怜地宣称，自己拥有特殊的知识，具有提供不寻常的服务的能力。他们的光脚踏在破布捆绑的皮制凉鞋里，在我们前后左右吧嗒吧嗒不停地走。我们正沿着石径走过一片四方草地。面前立着一座房子，破窗里填着报纸，墙壁斑驳，像长了湿疹的皮肤。

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到陵墓所在的园子，里面简陋且灰尘密布。喷泉从墙上流泻下来，除此以外，并无赏心悦目之处。墓园的门尤其丑陋，用粗糙的木头制成，漆成巧克力色，镶了几块奇形怪状的廉价玻璃。英国小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和厅堂有时会出现这种门。周围的草坪无人料理，只有零星的几只可怜的绵羊吃着草。草坪边缘有一些花，有两三座大气的穆斯林坟墓。坟墓上下都有石板和立柱，年久失修，有些破损。草地上坐着几个戴着面纱的妇女，在她们周围坐着漂亮的孩子们，孩子们的眼睛红肿。他们在野餐，带着穆斯林妇女无限辛酸的交际性质，在沉默中展示对于欢愉勇敢而坎坷的追求，偶尔得到施舍的一点碎屑便又锲而不舍。一棵小树苗的周围，立着小木棍连成的篱笆，保护小树不被绵羊破坏。篱笆上挂着一排彩色的布片，依稀可辨，是洗得非常干净的衣服。其中至少有一位妇女住在远离水源的村舍，所以值得她花时间把衣服拿到喷泉这里来洗。在这光秃秃的低地，一两英里地都看不到村舍。

我们靠近陵墓的丑陋大门，一个老人开了门。他应该是阿訇，牧师。我们只是根据他毡帽上扭结的白布在猜测，他的举止却没有一点神圣权威的痕迹。他困倦无神地跟我们打了招呼，没有自豪的神态。我们跟着他，我们的招揽员跟着我们，走到穆拉德的所在。他最后的住所里，墙上刷着单调的颜色，装饰着抽象的设计图案，巧克力色、灰色、深绿色，大概是上个世纪（19世纪）后期，西方的管道工和油漆匠所喜欢的创造。窗帘是很大众化的深绿色印花天鹅绒，欧洲大陆的铁路卧车上常用的那种。倾斜的人字板棺材和戛兹·梅斯坦的一样，但是覆盖着天鹅绒，摆放着拜祭者的供品——大概价值半便士，下面躺着穆拉德。棺材一头的木杆上挂着他的头巾，尘埃密布的布束。阿訇睁着模糊的眼睛看着康斯坦丁，在和他说着什

么，说完话，他像鱼一样的嘴巴忘了合上。“这个老人说只有苏丹的内脏在这里，”康斯坦丁说，“他的其他部分被带到土耳其布罗萨，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哪怕是最理性的人也会想，阿訇可能有点遗憾吧，这座神庙里供奉的是苏丹的内脏，而不是他的心脏或头颅。可是在他灰暗而浑浊的眼里和张大而空洞的嘴里，安放的是最彻底的漠不关心。

两个招揽员轻轻地走过我们身边，俯卧着身体叽里咕噜地在做穆斯林祷告，心里希望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然后给小费。参观了萨拉热窝，或者比托利，甚至斯科普里之后，人们不可能不知道土耳其人真正意义上的了不起。正因为具有了不起的特质，人类才能解放上肢而直立。土耳其人很清楚，流水、树荫、城里白色的宣礼塔、锦缎和礼貌，它们的意义远远超越其用途，甚至对于最有军人气质的男子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具有真正的贵族气派。他们撬动了让人肚子紧贴大地的必需钳制。因此，看到这些土耳其人与温饱的距离，比他们的祖先与最奇妙的奢侈品之间的距离还远，不禁让人心生悲凉。对这些土耳其人来说，破衣烂衫和一块布满尘土的场地已是难得的精神提升物。这些伪装的信仰之所以让人反感，并不是由于它出卖了堂皇的宗教——这种行为不过代表了人类不可扭转的倾向而已；而是因为它的出发动机是对微乎其微的一点第纳尔的希冀，少得都买不到任何值得一买的商品。我转过脸去，眼角的余光瞟到招揽员们鬼鬼祟祟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暴露出他们已经活力尽丧，无力作为，唯有对这个特别目标的些许期盼。他们一旦觉察到我们对他们毫无兴趣，也就停止了自己的虔诚俯伏。他们疲惫地站起身来，跟在我们后面，拖拉着走进小牧场。

“把外国人带进来看这些土耳其的旧东西真是蠢，”德拉古廷对康斯坦丁说，“现在土耳其的一切都又烂又臭，像个粪堆。看这些家伙，与其说像人，倒不如说像些腐烂的骨髓，他们的母亲，肯定在他们出生之前很多年就死掉了。”德拉古廷缺乏同情心的动物性更加可怕，因为它自然得都不带一丁点儿蓄谋。我们快步走出小牧场，一些招揽员追上我们，嗒嗒地赶到我们前面，回头看着我们，目光里有让人难以承重的期望。人们很容易冷酷地对待他们。走出门口，康斯坦丁带我们，沿着没有涂抹灰泥的墙边行走。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停下脚步，据说这是杀穆拉德的刺客被处死的地方。他说：“他的名字叫米洛什·奥比利奇，其实不是的，是叫‘科比利奇’，是传种母马的意思。在那些年间，我们的人民，哪怕是贵族，也没有姓氏，只有教名和别号。18世纪的时候，全世界都变得文雅起来。我们觉得有一个叫母马的英雄似乎不妥，于是去掉他名字里的字母K，可怜的米洛什就这么得了个没有意义也不属于他自己的名字。更让他介怀的，可能是眼下许多人说我们不应该纪念他，因为他是用诡计让土耳其苏丹现身的。米洛什说自己是个叛徒，想要加入对方阵营。他觉得，爱国者们也觉得，他得在怀疑他是叛徒的人眼前为自己正名。他能够对土耳其人用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交给了对方。”

“怪了，”我说，“土耳其的苏丹被谋杀，他们竟然没有大乱阵脚。”“什么都乱不了他们的阵脚，”康斯坦丁说，“他们简直超凡。他们有自己的骄傲，他们都具有穆罕默德赋予的素质，是随时遵从各项纪律的士兵。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上帝征募的，在世界末日，上帝会成为他们的将军，来指挥他们。”我说：“查理·艾略特爵士写过：‘苏丹可能是罗马皇帝，每一个土耳其人都是罗马公民，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对理应归于他的东西也很有意识。’”我正说着，发现我丈夫没有走在我旁边。像所有的妻子一样，我环顾四周，看他在干什么。他在后面，离我们几步远，正拿一些第纳尔给招揽员们。接受者表达着温和而精斟细酌的谢意，尽管做的是乞求的事，态度却毫不卑贱。这证明，艾略特对他们的描述以前可能正确，然而现在的情形显示，它已经失真。之后，他们不再跟着我们，仍然在我们身后温和地看着我们。他们像火苗一样柔软无骨，苍白的面庞和布满尘土的衣服在阳光下显出污浊。他们分散地站着，在科索沃暗绿色的大草原上彼此疏离，肉身过于贫瘠，以致感受不到鲜活的欲望来拉近彼此。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帝国拓展至远离根基的地方，会犯下“奥南之罪”（the sin of Onan），把自己的种子向地上抛撒。

道路穿过小树林。我们还没行驶多远，德拉古廷就停下车来，拉开车门说：“我们在这儿吃饭。”康斯坦丁问：“什么意思？”“哦，你们没从斯科普里带些面包、红酒和鸡蛋吗？”德拉古廷说，“这是吃掉它们的绝佳地点。时间也正好。现在已经很晚了，英国人是习惯在固定时间吃饭的。所以，出来吃吧。”“不，不，”康斯坦丁拿出手表摇了摇头，“我们必须赶往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天黑前可能到不了。”“你在说什么啊，”德拉古廷回答，“现在大概是下午三点钟，5月份啊。到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要不了两个小时。闭嘴下车，你们必须出来。”他这么说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因为知道，康斯坦丁在过去的几天里，遭受了某种令其崩溃的变化，觉得现在他的判断已不足为信。康斯坦丁用并无恨意的好奇目光看着他，好像在说：“我就那么糟糕了？”然后乖乖地下了车。德拉古廷拿出铺垫和食物摆在草地上，说：“现在，你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说完，在我们面前的路上踱来踱去，啃着个苹果。他对我喊着：“你不怎么喜欢待在这里。”“是的，”我说，“这里太伤感了。刚才我还想着弗鲁什卡·格拉的弗尔德尼克修道院，在那儿我看到了拉扎尔王子的尸体，还触摸了他的手。”“啊，可怜的圣人，”德拉古廷说，“他们砍掉了他的头，因为我们的米洛什·奥比利奇杀死了他们的苏丹，当然，杀不杀他们都会这么做的。他们是狼，让弱者流血是他们的天性。唉，没办法，我们心不齐。”

他又啃了一大口苹果，一边用力嚼，一边走下公路。我对康斯坦丁说：“真是少见啊，他没去责怪贵族间的争吵。”康斯坦丁若有所思：“没有，但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心不齐’，这话他今天说了两次。所有的史书上都说斯拉夫人在科索沃战败是因为贵族

亲王间的纷争。他能有什么其他意思呢？”“的确，我们民族总说战败是因为不齐心。在科索沃之前，的确有很多斯拉夫贵族亲王，他们总是争吵，但我认为这说法和事实毫不相关，”康斯坦丁说，“我认为，这说法的意思是，每一个斯拉夫人对待土耳其的态度都很分裂，其实是提及我们关于灰鹰的著名诗篇。”“我从没听说过呢。”我回答。康斯坦丁站起来叫德拉古廷，德拉古廷继续咀嚼着，走了回来。“知道吗，她居然从没听说过我们的灰鹰诗篇！”“太可惜了！”德拉古廷也叫起来，吐出些苹果籽，他们开始一同吟诵：

Poetio soko titsa siva,

Od svetinye, od Yerusalima,

I on nosi titsu lastavitsu ...

“我来帮你翻译，”康斯坦丁说，“用你们的语言来说，它不如本来那么美。但你也能听出，它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诗，它对我们非常特别……”

灰色的鸟在飞翔，那是灰鹰，

来自耶路撒冷，圣地，

他的喙叼着燕子。

那不是灰鹰，不是灰鸟，

是圣以利亚。

他带的，不是燕子，

是书，来自圣母。

在科索沃的大公面前，

他把书放下，在大公的膝上。

书上的话罕见无双：

“拉扎尔大公，血统高贵的王啊，

你想要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你要的是世俗的王国，

请鞍马执缰，佩剑出战，

结束土耳其侵略，

赶走每一个土耳其士兵！

如果你要的是神圣的王国，

请在科索沃修建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铺上丝绸和红衣，

让你的士兵接受圣餐，以及军令，

你的士兵都会战败，

你，王子，随之而败。”

大公读毕，陷入深思：

“主啊，这话从何而来，何以如此！

我应该选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选择世俗的王国，

世俗的王国存在不过一时，

但神圣的王国将永世长存。”

大公选择了神圣的王国，

放弃了世俗的王国。

他在科索沃建起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铺上丝绸和红衣。

他传召塞尔维亚大主教，

以及主教十二位。

他让士兵接受圣餐，以及军令。

王子下令时，

土耳其人侵入科索沃。

“接下来，”康斯坦丁说，“有很长的篇幅，文字非常混乱，讲述大公如何英勇作战。战争尾声时，他们看起来好像即将胜利，但乌克·布兰科维奇背叛了他们，于是他们惨败。诗云：

土耳其人击垮了拉扎尔，

拉扎尔大公被灭，

他的军队随之而灭，

兵士七万七千人。

万物神圣，万物可敬，

上帝的荣光得以实现。”

我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拉扎尔是‘和平誓言联盟’的成员之一。”走过面前山脊上一长片黑麦地，一阵风吹过，仿佛战栗袭过皮肤和血液。我一边剥蛋壳，一边离开其他人。我知道，诗里提到了一些我生活中真实而令

人不快的东西。“拉扎尔错了，”我暗自思忖，“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之后五百年间，在这片平原上，或者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方圆数百里，没有人被允许保留他的灵魂。他应该为了他们，选择被罚入地狱。不，我在说什么？我正把国家置于个人之上。我相信某些终极人权优先于其他权利。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不相信这诗的主旨。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为了自己的救赎，而拒绝将几百万人从痛苦的奴隶生活中解救出来。战争的问题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尽管战争可能有点令人厌恶，但人们为了使民族抵御入侵，不得不做的许多事比战争更甚。为了保护我们免于病菌困扰，许多人不得不从事和污物打交道的、让人极为反感的工作；为了让人们充分利用经济资源，海员和矿工也不得不忍受各种不适和危险。但是，这首诗的确表明，和平主义态度无关于战争的恐怖，因为它丝毫没有提及这个。它直入问题的核心，表明观点：和平主义者真正想要的是被打败。拉扎尔王子和他的军队将接受圣餐，将被土耳其人打败，然后他们会得到救赎。诗里没有一个词是关于避免杀戮的，相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是他全力以战，杀尽能杀的每一个土耳其人。重点不是说他无辜，而是说他应被打败。”

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这首诗搅动了我的心绪。当我站在弗鲁什卡·格拉的弗尔德尼克修道院里的墓旁，触摸拉扎尔王子干枯的手时，我就清醒地意识到，他是我熟悉的类型。他是那种热爱荣誉、自由与和谐的群体中的一员，与我们时代的赫伯特·费希尔、西塞尔勋爵和吉伯特·默里教授同列。我一直追随着这些人，我知道他们是正确的。我的理性承认，依照他们的规则，也只有依照他们的规则，纯洁的幸福才会在地球上扎根，并且欣欣向荣。可是，当时代催生了这些优秀的人，以及如我一般的追随者时，为什么这样的幸福却没有实现呢？我们准备走向繁荣时，为什么仍然存在贫穷？存在对孩子未来的漠视？存在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存在种族之间的残酷？我知道答案。我已经知道了很久，只是这首诗让我的意识承认了我的知晓。

这答案也在一些集会上有所显现。这些集会由心系他人的自由和福祉的次要群体讲话或参与，常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危险感觉。对立方的集会，由那些希望奴役他人以满足己利，或是因为从中得利而希望保留不公的社会制度的人组成的集会，只是让人单纯地厌恶其贪婪和愚蠢，但并没有散发出这种危险的感觉。危险的感觉在各个方面被唤起，比如，讲话人和听众中女性的着装。贫穷或工作过度不能解释这种穿着类型，它们并不是特别廉价；要找到它们倒是颇费功夫，因为它们完全不是寻常着装。它们除了使穿衣人疏离公众观点以外，别无他用。不幸的是，当他们试图改变群体信仰时，不应该竭尽全力地做这些事来争取群体的尊重。也可能，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把事做成。这种怀疑常常由讲话者的音质和听众的反应引起。讲话人的口音真挚亲切，一直在颂扬美德。但他们的话听起来不像是说未来权力一旦掌握在他们手中，会被用于善行。他们的听众，似乎也没有将自

己视作命定的统治者。他们漫不经心地鼓掌，嘲笑他们背后的敌人，其间夹杂着孩子们激动的笑声。他们想当正确的人，不是做正确的事。他们觉得没有义务成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如果这意味着任何程度的污染，他们宁可另辟渠道，形成一池纯洁的静水。事实上，他们愿意领受圣餐，被土耳其打败，然后升入天堂。

这样一来，他们证明了自己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些对手不会想让自己偏离生活的主道，他们简单地相信，侵略和暴政就是确保人类未来的最佳方式，所以承担了将这方式付诸实施的职责。自由之友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在哪方面高于对手。实际上，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原则而希求失败，而非成功。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最卓越的人，成为恺撒，像成为善良的自己一样。在出现一个善良的恺撒之前，每个女孩仍然一出生就面临险境。自省其心，我知道我也不清白。我时常琢磨，如果有需要，我能不能为了自己的原则而忍受煎熬，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不应这样问，我应该更急切地问问自己，可曾尽我所能践行自己的原则，怎样才能获得力量，让自己的原则获得绝对的胜利。但是，这些问题仍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没能激起我的勇气，在我思考自己的殉道精神时，它们在焦躁地等待。

“如果是这样，”我对自己说，“如果生于这个世界、热爱善良胜于丑恶的人们，都带着与生俱来对失败的冲动，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科索沃，被鲜血浸染、让人厌恶的平原。在这里，愿意走出去的人们与不愿意的人们对战，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出卖给敌人。仁爱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惨遭迫害，比它偶尔获得成功的时间要漫长得多。”我开始悲泣，我一生都与之同行的左翼人士，是他们对外国政治的态度，造成了这种背叛。他们一直正确，却从来不把自己的正确施加于人。“如果这种倾向天然存在，属于基督和犹大的关系，”我想着，“我们倒不如死掉，越早越好，美丽承诺后的失败更加痛苦。”我背对着平原，不去看湿漉漉的草地，不去回忆普里什蒂纳那个压在犁头下的愚蠢女人，衰弱无力地守护着领袖陵墓的那个目光涣散的牧师，面色惨白在苏丹的棺木前假意跪拜的招揽员，也不去想象基督教斯拉夫人失去的荣耀——奥斯曼土耳其也有其荣耀，与之不同，但相当，也同样消失。即便不用肉眼或心灵去看这一切，我仍然感到万念俱灰。我开始跑，想快点和同伴们待在一起。

我刚刚离开的小团体里新增了第四个人，一个阿尔巴尼亚老人，戴着白色的无檐便帽。这种帽子对于他们民族，就像土耳其毡帽对于穆斯林一样。大家邀请他分享我们的食物。他坐在地上，背对着我。我走得更近些时，他转身和我打招呼，带着阿尔巴尼亚人独有的社交微笑。我看见他的臂弯里躺着只小黑羊，就像我在羊场见到的，在岩石上祭祀用的那种。“科索沃”的本义是平坦。

黑羊和灰鹰曾在这里合作。在这桩罪恶里，就像在几乎所有的历史罪恶里，和最私密的罪恶里一样，他们曾是同谋。关于这个，我在南斯拉夫读到过。隐晦的东西写得很清楚，给出一些学者尚不能阐释的象征。我在羊圈看到了肮脏且虚伪的祭祀，以及基于想象力的令人惊叹的神力。在那里，我明白了，那些极其恶心的作为，都源于人们相信让动物流血会带来人的提升，相信向死亡献礼会获得生命的回报。在那里，我意识到这种信仰是我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与原始思想很亲近，能够为各种错综复杂的东西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原始思想是现代思想建立的基础。这信仰不仅自身丑陋：它玷污了爱的全部。它还不遗余力地使基督意义变得无效。它巧妙地潜入教会，大展手脚，释放出散漫的哭喊和迷醉的狂喜，并催生出荒谬得无从下笔的赎罪论学说。这学说假装着，仿佛是基督降临，编造出一套愚蠢难看的神奇仪式，用他的痛苦来交换毫不相关的良善。于是，真相从我们眼前被蒙蔽。他的死是在控诉我们的罪。它证明我们族群是如此残酷，以至于在我们身边出现良善时我们不知该怎么办，只得将其扼杀。我同米丽察、穆罕默德一道离开岩石时感觉到，如果我就这场祭祀多进行一些思索，可能会悟到更多的东西，关于自己不堪的天性的东西。

我看着羔羊，它那柔弱无力，像黑色小锤头一样的口鼻，从老人疲惫的手臂围成的颤巍巍的庇护所里伸出来。我不能够再让自己的意识退离。我们中没有人，不管是我们族群还是其他人，能够抵制诱惑，拒绝接受祭祀为有效象征。在诸多思虑中，我们相信自己的心。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并无其他。站在岩石上的男人，割破羊喉，取悦上帝，以得到幸福。我们的智学告诉我们，这男人干的是恶心且无意义的事。我们的回应不是把这个主意作为噩梦排斥开，而是说“既然牧师牺牲羊羔不对，那我来当羊羔，当作牧师的祭品”。于是，我们建立起“对于无辜的事物来说，厄运便是荣耀”这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谈及仁爱、主张和平，之后，屠刀抹过我们的脖子便被认为是适当的。所以，类似的事件反复出现。当我们为了正当理由勇猛作战且胜利在望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违反了神圣的协议，从而转向，寻求失败，于是背叛了那些相信我们为他们赢取仁爱、和平的人们。

斯拉夫人就这样，在科索沃平原上被土耳其击败。他们知道，基督教义比伊斯兰教义更有利于人，因为它指责人的原罪和残酷，穆罕默德的军事大脑甚至都未曾识别这些东西。他们也知道，一旦被征服，他们在行为和艺术上的成就也会随之被践踏进泥土里。由于岩石上的神力作用是在他们的大脑里，他们不会走向胜利。他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正直高尚的，因而自己赴死也很正确。在这样的信仰中，他们背叛了跟随他们的正直高尚的人，长达五百年。我也同样有罪，我和我的同类，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们。我们觉得自己比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神圣多了，因为我们用神父的角色替换了羔羊的角色，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在履行人类主要的道德义务，即保护爱的成果。我们在保护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他们拥有些许自

由，因而也有些塑造灵魂的力量，可践踏他们的其他民族充满仇恨，没有自由的能力，却有将灵魂像野草一样连根拔起的欲望。可能我们背叛生命与爱的时间，比五百年更长，在比科索沃更加广阔的土地上，广阔至整个欧洲。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再次感到了低能的焦虑，关于我在这场危机中的作为。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事。真正重要的是，我没有忠诚地对待生命，我太忧心于虚幻的个人救赎，愚蠢到想象自己可能通过在发臭的岩石边晃荡而获得救赎——那里不过站了个男人，用肮脏的双手让鲜血无缘无故地流洒。

“这真是个可爱的阿尔巴尼亚老人！”康斯坦丁道。的确是的。他尤其可爱，因为他在微笑。阿尔巴尼亚人的微笑爽朗提神，给人的感觉像吃了一口西瓜一样。他们浅色的眼睛目光灼灼，雪白的牙齿熠熠生辉。这个老人的皮肤也是白而透明的，好像一层很薄的云。“我想他是个很好的人，”康斯坦丁说，“肯定也很可怜。他猜想我们是去特浦加矿场，所以希望我们去帮他孙子找份工作。他说他孙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他做点什么。”康斯坦丁发善心时总是最开心的。施善的机会让他两眼放光，是我们多天以来看到他眼神最亮的时候。但下面的脸颊像挨了揍似的，轮廓模糊，仿佛一张哭泣的女人脸。也许他是哭了。灰鹰也降临于他。他把他的喉咙裸露在格尔达的刀下，把他的挚爱之心奉献于仇恨之前，以让自己被打败，保持清白。

“那是自然，”德拉古廷说，用的是结结巴巴的德语，以便让老人听不懂，“这人是个恶棍之类的。他是个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喜欢族斗，当强盗，被基督抛弃，他们是大恶棍。但这人又穷又老，不管他做什么坏事，也做不了很久了，所以我们尽力帮帮他吧。”他抖了一下，把张开的手掌放在胸上，在做深呼吸，好像是因为想到了老年，要感受自己的健康和力量，来进行自我恢复。如果不是他刚才背诵了那首关于灰鹰的微妙复杂的诗，如果那首诗不是仅仅由于他的民族能够欣赏而存留，他可能就成了原始简单的形象。这是斯拉夫的神秘。斯拉夫人看起来完全是行动派，却很重视内在生活，重视行动的源泉。而其他民族，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意识。斯拉夫的恺撒大帝，有可能因为纯粹的形而上的动机而陷入危机，而在其他地方，除了神父和哲学家们，很少有人会去进行这类思考。也许史蒂芬·杜尚不仅是被清白与罪恶的想法影响，就像所有的政治家都会被影响那样；他是被它们控制，以至于几乎排斥更简单和更物质的考虑。也许他像许多人那样，死于自己的鼎盛时期，因为他希望死亡。烦扰我们所有人的血腥祭祀形象，让他从命定的胜利中看到耻辱。他站在面向巴尔干山脉的门廊下，看着君士坦丁堡的黄金、象牙和大理石，在它的十字架上，圆屋顶上，以及港口的船舶上。他知道他是这一切的上帝，因为它们会不复存在，如果他不把它们作为清晰的想法保留在脑海里的话。他害怕拥有那样的创造力。他从门廊的光照下往后退，退进了无罪的阴影

世界里；君士坦丁堡就像呼到窗玻璃上的一口气，慢慢隐去。

“南斯拉夫总是在对我讲述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我自言自语，“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和德拉加之死，迈克王子之死，拉扎尔王子之死，史蒂芬·杜尚之死。然而这个国家充满了生命。我觉得我们西方人应该到这里来学习怎样生活。也许我们在西方对生活无知，正是由于我们避免思考死亡。一个人专注于陆地而无视海洋，是没法学习地理的。”然后我叫了起来。我忽略了那只黑羊，它伸着脖子把它颤搐的鼻头贴到我裸露的前臂上。男人们都嘲笑起我来，阿尔巴尼亚人小心翼翼地在笑声里保持着礼貌的内核。我回应了他们的笑声，但我被吓到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我自己，能够摆脱对牺牲的迷醉。它造成了现在的科索沃，如果不加制止，它会让一切的人类进步化为乌有。

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I

这座城市位于平原边上，是进入温暖但又破碎的塞尔维亚国家的门户。这里让英国的萨默塞特人想起萨默塞特，让苏格兰人想起苏格兰低地。这是座小城，标准的城市模样。山上有兵营，还有几座宣礼塔，房屋主要集中在河流弯道周围。街上显眼处，有一些精美的土耳其旧式建筑，带着比例和谐的上层平台和雕工繁复的格架。在街上，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宾馆。“进去吧，进去吧，”德拉古廷不耐烦地说，“别看那些讨厌的人留下的老鼠洞了。看看这间宾馆吧，它在特浦加的矿场开办时就建起来了，美极了，美极了！”当然，我们进入的大咖啡厅非常整洁，精美堂皇，完全不留巴尔干的痕迹。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像是从其他地方拿来，经过意念执着的文化人加以调整，以满足眼前需求。但坐在这里的人们却具有十足的巴尔干特色。四个男人戴着帽子在玩牌。一个年轻的牧师手里端着玻璃茶杯，在他们身边转悠，看着他们的牌。牧师的长相俊美非凡。长长的头发和胡子呈黑蓝色，波浪一般；眼睛很大，龙胆蓝色。看到其中一人的手里时，他把头向后一仰，喊了声什么带着嘲笑意味的话，然后坐下身来，带着安静的笑容呷茶。“听口音我猜他是俄国人。”康斯坦丁说。他的确有婉转轻灵的气质，像烟圈呼成的一般。在南斯拉夫遇到的一些俄国牧师和修士身上，我也曾注意到这样的气质。“是的，他是俄国人，”服务生说，“在特浦加矿场工作的有来自各国的人，其中有很多俄国人，他是其中一个的儿子。”

“我订好我们的房间了，”我丈夫说，“我得去给矿上的人打电话，看他们什么时候方便让我们上去看一看。”“当然，当然，”康斯坦丁说，“我让服务生告诉你们电话在哪里，把号码给你们。”我丈夫回来告诉我们：“好了。听起来他们人很好，很有苏格兰感觉。他们说很高兴和我们见面，我们可以马上就去。”但康斯坦丁却摆了张苦脸：“希望你没告诉你的朋友们会带着我去，没因此吓到他们，我是不会去的。”“可为什么啊？”我丈夫惊呼起来，“他们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不是装装礼貌样子而已。你肯定也对参观矿场感兴趣的。”康斯坦丁摇摇头，继续面带微笑。“我不跟着你们去，他们也不会真的很失望，”他说，“肯定的，我太了解英国人了。我想，如果你们全是英国人，在一起会更开心。你们可以说关于我们国家的真实想法。”他说话带着格尔达的腔调。“至于参观矿场，我是个作家，不需要真正去参观矿场，来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他补充道，我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他飞向我的目光，“我不是记者，我，我是个诗人。”

康斯坦丁让自己蒙受了不小的遗憾。如果他和我们同去，会有新的面孔让他觉得印象深刻，受到吸引。他的意识事实上也不是自动运转的。就像新

西兰喷泉一样，唯有什么固体物落下去后，泉口才会喷水。他的意识和我的意识一样，也会受到远离其经验的景象刺激，因而涌现灵感。但争论也无用。他把自己所有的窗户一扇接一扇地关闭起来。我们坐了一会儿，静静地喝咖啡。服务生端着一盘甜点走进来，是多柏思蛋糕和萨赫蛋糕，这在巴尔干意味着精美、骄傲和西式风格。服务生把蛋糕放在玩牌人旁边。年轻牧师拿了一块，又开始围着玩牌的人转圈，朝上咬着蛋糕而不是朝下，用舌头把蛋糕顶在上腭，像动物园里的熊面对一勺蜂蜜的吃相。咖啡厅的窗户很高，上半部分几乎触到了对面土耳其式房屋伸出来的一楼。有两只手抓着格架的上部，一张面孔在隐匿处注视着我们。

德拉古廷走过咖啡厅。康斯坦丁叫着他："准备好一两分钟后带他们去矿场了吗？"他答道："是的。我把我的头在冷水盆里浸了一下，现在清醒得像刚离开斯科普里一样。就算没有，我也愿意去矿场，上面那地方美极了，美极了！如果不是要当司机，我都愿意住在那里，我可是认真的。"

德拉古廷关上汽车门之前又喊了起来："美极了，美极了！"然后挥了挥胳膊，向我们承诺，去的地方像天堂一样。"我很想知道德拉古廷认为'美极了，美极了'的是什么，"我丈夫说，"我担心'美极了'的实体是很糟糕的东西。"我一边望着窗外，一边说："这里的店铺特别多，他们卖的东西很棒，真的是很不错的水果。""这里的每个人走路都又快又轻，"我丈夫说，"这小地方有它的自豪，像比托利一样。"道路引着我们出了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进入一处山谷，拥抱陡峭山峰的基底。地上铺满矮小的山毛榉。我们沿着小河蜿蜒而行，岸边垂柳扶风。很快，我们就目睹了一系列盛况，与乡村的田园牧歌特色大相径庭。它们属于一种更微妙的民歌类型，比笔下的抒情诗更豪壮一点。河岸边的铁路多了起来，然后出现一座小山，不是土丘，是山，边缘方正，呈死亡一般的颜色。"那是矿场里出来的废弃物，"我丈夫说，"没做什么处理，上面什么都不生长。"接着是一组灰白色的波纹状建筑，代表着工程上的奇思妙想。它们架在高耸的支柱上，从三楼伸出的长廊直达地面，仿佛是想要喝水的钢铁脖颈。许多小水箱被细腿撑起，像鹳鸟一样，站在屋顶之间。"这是个宽阔的地方。"我丈夫高兴地说。河流重新趋于平静，在淹水草甸间流淌；道路放弃了牧场，爬上小山的南坡。"美极了，美极了！"德拉古廷喊道，朝着山坡挥手。他完全正确。小山的上半部没有受到狂野的自然力和历史的影响。在山毛榉和灌木丛之上，满坡的茅草和花朵相映成趣，延伸到山巅，和城堡的残垣断壁融成一片。这足够美丽，却仍不及下面的景象。山坡的下半部全是类似于英国戈尔德斯格林式样的别墅，有小花园间隔其中，真的是"美极了，美极了"。我来巴尔干半岛之前，都不曾想到过这样的景象，而现在我知道了。

"我以前从没意识到，"我丈夫说，"花园也是和政治有关的东西。"在过去

的几周里，我们见到的郊区住宅的设计，无不是基于对现状的充分理解。住在里面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提心吊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除非房子处于市中心，人们都会让房子的整面墙壁对着马路，且用高墙围起来，以防止土耳其士兵、强盗、收税员的入侵。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带有窗户的墙壁自由地朝向四方，种植的鸢尾、玫瑰、青豆、菜豆毫不设防地暴露于众人眼前。这里没有谁的祖母遭遇强奸或凌辱，没有谁的祖父种的全部庄稼被强盗抢走，或是自己被索税未果的官员带走，受罚为帕夏做一季的苦工，然后再也不见踪影。一些窗户反射着西下的阳光，明亮亮的，好像是永不识愁滋味的快乐小号手吹出的旋律。“这些房子是族长们的，”德拉古廷说，“但是老百姓也有漂亮的家。看下面的山谷！不过我们接着往前走吧，麦克先生的房子在最高处，是最漂亮的一座！”于是我们上行至顶端，高于英国的戈尔德斯格林、奇斯尔赫斯特，甚至高于天堂。这里其实就是奇斯尔赫斯特，放眼望去，没有别处的漫天尘土。它们没有被废弃，而是一直在使用。人们对它们早就习以为常。

这里有一片砾石，传统样式的月季花床分布在前门四周，粉刷、粗砌的墙上爬满了多萝西·帕金斯玫瑰。一名巡视者站在门廊里。一条亚伯丁小猎犬摇摇摆摆地出来迎接我们。我们对它大加赞赏，因为几周以来，我们都没有听到乡间的狗叫得这么舒适宜人，还带着一点明显的佯装嗔怒。但这条小狗一生中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对克鲁弗兹(注)裁判的裁决全无把握。其他狗会接受训练，只从主人手里吃食以免被敌人毒害，但它没有。别墅里能看到英式印花布，铺着厚垫的扶手椅和沙发，抛光的地板，以及英式房屋里常见的家具，一个苏格兰家庭。麦克先生在里面。他属于粗犷而又细致的苏格兰人类型。他五官尖锐、脖子细长、身体精瘦，看起来好像除头和心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在童年时代被东风吹拧了。他的妻子是另一个苏格兰的样本——丰腴的苏格兰。这个地方知道怎样让点心口感醇厚，对糖霜和奶油馅料带来的肤浅、甜腻口感嗤之以鼻，让小脆饼和苏格兰小面包具有素净的奢华感。这位苏格兰女人体格健壮，出生于艾尔郡，说话带着西部低地那边深沉而温和的口音。她行动稳沉而自信，就像那些在铸币厂工作的人一样。她有天生的智慧和观察力，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和固定不变的高标准，在她的身后，也必有一尊财富后盾。家里还有一个已婚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在不觉中搅动了我的心，因为她和我学生时代的一位挚友极其相似，棱角分明而优雅，颧骨精致，肤色白皙，声音甜美，她们无须一点血缘的纽带就如出一辙。这样的人们总是立即让我着迷。我厚着脸皮黏在她们周围，就像饿狗守在食柜边一样。那天，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待了很久，他们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时我们也欣然接受，且饭后没有立刻返回宾馆。实际上，只要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我总是尽可能地多待一会儿，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我朋友所不知道的各类事情，他们本身就是相异于我和我朋友的各类人。

“这座矿场，以及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所有其他矿场，都不是第一次开采。首先是希腊人开采过，再是罗马人。中世纪的时候，塞尔维亚人引入萨克森人进行开采。然后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开采被停止，一片死寂，长达五个世纪，直到我们再重新开采。有趣的是，你能凭着矿场的开采方式判断它属于哪个时期，而不用去翻查它的年代。希腊人最具想象力，他们似乎很能猜想矿藏埋在哪里，总是以最巧妙的方法挖到矿，但是他们的建筑只是凑合。罗马人好像想法没那么巧妙，但是对建筑很在行。他们总能造出很好的建筑。萨克森人只是按部就班，没有什么增添，跟着做得还好。我们也沿袭以前的做法。我在走过罗马哨兵曾经坐过的石凳时，总是要拍拍它，表示一下好奇。就在那个石凳旁，有些构造是我们谁也无法理解的。那里有一条长隧道，狭窄得连小孩都爬不过去，从一个全尺寸的坑道通到另一个，没有看见其他的道路。我们想破了脑袋，谁也提不出个关于它的解释。有时候就是这样，老矿井下有些构造，最优秀的工程师也没法理解。”这奥秘的出现让人感到困惑，人类的活动一贯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诸如采矿这样具体的事件上得以显现。

有人提议说第二天带我们上矿场，我立马赞同，这让麦克先生忍不住扬起浓密的眉毛，清楚地表达了一下他的条件：“我说的是上矿场，不是下矿井，要小心。”我丈夫和我相视一笑，因为我本来就对钻到地面以下心存恐惧，所以二十年以来，我从来没坐过伦敦和纽约的地铁。但我说：“那里，真这么危险吗？”这并不是危险的问题，是男人的感觉，觉得应该考虑到这些。我说：“他们相信如果女人下矿井，会有事故发生。你能为我解释一下这个吗？我们在南美时，矿上的人也相信这个，全世界矿上的人都信这个。除了这里以外，有些矿工的家人在地下工作了几代人，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过。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迷信，并和其他国家的矿工交流融合。但这里的人们有五百年没在矿场工作过了。事实上，我认为这些人没在矿上工作过，因为在塞尔维亚帝国，是萨克森人，而且只有萨克森人当矿工。教这些年轻人采矿的外国矿工不会传给他们这些想法，因为他们的塞尔维亚语不能满足对话需求。他们其实大多是用我做你看的方法进行教授的。那么，这里的矿工现在怎么会和全世界的矿工有一模一样的迷信，而且执着地相信，好像信了几代人一样？真希望有人能为我解释一下。”他女儿说：“和他们争论这个迷信没用的。每次只要爸爸坚持让女人下矿井，就有事故紧接着发生。”“严重的事故？”麦克先生耸了耸肩。我们停了一下，怀疑整个宇宙都很白痴。或者，男人很白痴，白痴到自取灭亡的程度。他们会让潜意识的自己拆毁支柱，让自己被黑暗吞噬，而不让自己对于女性同类的诽谤被证明是不实的。

女人们也谈话，也健谈，谈的总是已知的事情。她们谈论城里的人。是的，这里还有一些没回土耳其的土耳其家庭。他们实在太富有了，不忍放弃在这里的利益。其中有一家，麦克先生非常熟悉。他们仍然在城外保留

着一栋漂亮的房子。儿子们有些是棒小伙儿，但都会觉得别扭，心里感到矛盾。因为他们想融入南斯拉夫生活，家庭自豪感和传统又让他们笃信伊斯兰教，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总是感到孤立。最近，其中一人答应遵从父母之命，迎娶比托利一个商人的女儿，以巩固生意伙伴关系。“但这里的男孩子们习惯于与在下面磨坊、我们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女孩子相处，”麦克夫人说，“她们很聪明。事实上，我觉得白俄罗斯人有点聪明过头了。”来自比托利的女孩不能符合这些标准，年轻的丈夫就养成习惯，时不时地喝醉酒，和他妻子到一些公共场合时，扯下她的面纱叫喊：“看看我的这丧气货啊！”之后，他总是又清醒过来，变回体面的土耳其人，为自己的失态懊恼不已。所以在两个世界里他都很遭罪。

“为我们工作的大多数穆斯林都是阿尔巴尼亚人，”麦克先生说，“大家都喜欢阿尔巴尼亚人。”大家都说，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人和所有其他斯拉夫民族之间培育起来的敌意，正被阿尔巴尼亚人的魅力稀释。他们开始谈论他们的老园丁，一个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他们非常喜欢他，他现在患了严重的内科疾病。“我怀疑他妻子没能好好地照顾他，”麦克夫人说，“让人不解的是，这些穆斯林妇女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热爱家庭生活。她们说她们一点都不喜欢做饭。如果她们独自生活的话，她们只靠清咖啡过活，从早到晚就喝它。我觉得，她们不知道怎样让她们的男人过得舒服。矿场开工之前，这里的人们过得很糟糕。很多人根本没有烹饪的概念。他们在炭灰中烘烤一种没有发酵的面包，吃的就是那个。葫芦瓜上市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和生面团混在一起，烤成你见过的最恶心的糊状物，就跟狗食似的。肉是一年到头也见不着的，他们就靠这些填肚子。”

史书上说，科索沃战争之后三百年，这个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想靠迁徙来改变自己的痛苦生活。他们从未屈服。其中几个世纪，他们一直在反抗。直到17世纪后期，他们在帮助奥地利人攻打奥斯曼帝国时，见到了西方人和西方人的优势。战败后，他们心灰意冷。然后是史书上反复出现的那段时期。大主教阿森纽斯三世接受了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的提议，热情迎接所有迁入他领域的塞尔维亚人。1690年，他亲自领头，带着三万七千个塞尔维亚家庭，跨过斯拉夫人的荒地进入匈牙利。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这当然不是全部的真相。关于没有加入这场长途跋涉的人，史书并无记载，但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队伍里。当考兰科特途经俄罗斯靠近拿破仑那边时，发现撤离的城镇并没有完全撤空。每座城里都有“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不幸的人，一些社会最底层的老头和老太”。这里也是如此。有些人没有加入迁移队伍，因为他们个人的极度厄运，让他们自己不幸的集体都不能接纳他们，其中包括老者、病人、罪犯、独身女人、莫名义务的受害者，还有受到敌人掌控的人。他们被遗留下来，后代也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忘得太过彻底，甚至包括怎么做饭。历史会还原其本色，由这位女人的气息呼之而出。

我们道了晚安，站在多萝西·帕金斯玫瑰下的门廊里，等待德拉古廷。下面的山谷里有只狗在嚎叫，叫了又叫。不知分寸的狗颇令人厌烦。“招呼一下那狗，”麦克先生说，“老是让我睡不着觉。我们明天得过问一下，这是第三晚给我们开演唱会了。”“是德国人的狗。”他女儿说。“你们有很多德国人在这里工作吗？”我丈夫问。“就一个，负责索道的。”麦克先生回答。“是的，如果你有索道的话，就必须有德国人，”我丈夫说，“全世界像样的索道都是德国公司造的，我真不喜欢这样。”“我也不喜欢，”麦克先生说，“我们安慰自己说，没有英国人的钢索，他们也造不出像样的索道。”他关于物质对象的快乐见解，让我想起童年时学过的两行诗，直到现在看起来都很有讽刺意味：

世界充斥着许多东西，

我相信我们都应像国王一样幸福。

夜风穿透了女人们的薄衫，我低声表达歉意：“那个司机来得真是慢。”然后，我们听到德拉古廷的声音从夜色里传过来。他正在厨房门口向管家和厨师道别，嗓音低沉而缓慢，话风华丽。他阔步走来，显出原始但是庄重的派头。这是史蒂芬·杜尚的臣民与生俱来的威严，确信任何时候他都会有马匹和盔甲，让他成为一名贵族。他用一种全新的驾驶风格把我们载下山坡，铮亮的灯光在一片漆黑中辟出一方雪白的花园，仿佛只要把卡特带着的种子撒过去，这些地方都会成为英国花园。沿着黑暗的公路，穿过沉睡的城镇，我们到达宾馆。很奇怪，这么晚了，这里还亮着满场的灯光。咖啡厅里仍旧坐了一半的人。这儿和其他斯拉夫人熬夜的地方有同样的氛围，仿佛时间在此凝结、下沉，成为人造的光线，悬挂在那儿，在它重新投入生命的奇妙轨迹之前静默地沉思。“你熬得很晚啊。”我丈夫对店主说。他回答：“是矿上来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从来不想睡觉。”看上去的确如此。这些人有俄罗斯特质，说不上是优点，或是优美，反正让他们不合于人们的想象。这特质会让带有特里或巴里摩尔血统的任何男女演员照亮整个舞台，不论他或她会不会表演。“我可不是在抱怨，”店主说，“这意味着钱。开矿前我们没钱，现在钱来了，一天比一天多。感谢上帝！”

我们所在的这个城镇淹没在上涨的潮水里，但潮水没有涨到人们估计的那样高。我们是第二天早上准备外出购物时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德拉古廷他们来带我们去矿上。这里成了一座岛，有的地方甚至被隔断了与外面的交通，我们所知道的讯息他们却收不到。我们正说着这事，一个摄影店主在他店外的橱窗边上叫住我们，我们曾在他店里买过胶卷。“看！这些是我特别感到自豪的！”他指着几张照片，拍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穿着长裤和蕾丝绣花外套，为观众奉上一杯咖啡。她眼波流转，代表着伊斯兰

女眷们的喜悦。这些写真，事实上也不能说没有吸引力。虽然她体态丰满得如同一头大象，但她长得漂亮，这种相似性能被解释公象对于母象的感觉。“非常美，”我丈夫说，“她是谁？”“我们戍守将军的太太。”摄影师说。英国奥尔德肖特高街上的某个橱窗里，似乎也应该摆满将军太太的肖像；她柳娇花媚的，是法国明星密斯丹格苔的本土化版本。

我们没再接着讨论她。我丈夫看到了另一幅照片，就在这些肖像下面，表意淋漓尽致，和它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四个目光惊骇的送葬人把一口无盖的棺材放在街上，里面躺着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双目紧闭，凹陷的颧骨凝固着死亡的气息。棺材周围站了些小孩，圆睁的眼里充满悲恸。还有一位妇女，手放在前额，表情空洞失神。“我的天，那是谁？”我丈夫问。“是我们已故的市长，”摄影师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是被暗杀的吗？或是出了事故？”我丈夫问。“谁？市长？”摄影师说，“不，不，显然大家都很爱戴他。他死于胃上的毛病。”“那这是什么场景？”“就是他的葬礼。”“你看！”我说，拉了拉我丈夫的衣袖，我注意到第三个迹象，表明一种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这是一张黑发男子的照片，他的脸上是斯拉夫人想要看起来浪漫时显出的表情，所有的俄罗斯芭蕾舞者在晃动身体寻找平衡点时也是这样的面容，活像一只悲泣的勺子。照片展示出他赤裸的躯体直到腰部，男人的乳腺算是惊人的浪费，他双乳之间悬着最简单经典的首饰，是中间嵌了颗小珠子的心形挂坠。“这年轻人是谁？”我丈夫问。“他是这里戍守部队的一个中尉，”摄影师回答，完全不觉得难堪，“他是个搞笑的家伙，总是来拍照。他穿得很花哨，有时候还穿女人的衣服。”“这样的年轻人在这里多吗？”我丈夫问。“就他一个。”摄影师答。

在我们的宾馆那里，一辆车等着接我们到矿场去。康斯坦丁坐着，把面包卷浸入咖啡里。“早上好！”我们招呼着，他客气地应答了我们，礼貌痛苦地抑制住他想要做出的谴责。其他人都在晕船时，不晕船的人便有罪，显然我们也犯下了同样的罪。“你准备好了吗？”我们问。他的前额苦恼地拧成一团。显然我们说话太大声了。“准备什么？”他问。“上矿场去啊，”我说，“会很有意思的。你肯定会喜欢那个经理，他是非常不错的人。”康斯坦丁默默一笑，拒人于千里之外。显然我们之前太迟钝了。“不，我想我不会喜欢那个经理，”他说，“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过这类人。我觉得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噢，走吧！”我们恳求道，但他抬了抬眉毛，把嘴向下拉了一下，低头看着桌布，缓缓地摇着头。“算了，”他说，“那地方，人们攀附在高贵的山周围，为了钱，纯粹是为了钱。我在那里格格不入。你们去吧。”他善意地说：“你们去，我不会怪你们的。我们又不会有同样的抵触感。上去高高兴兴地待会儿。我会让德拉古廷开车，送我去群山没受侵犯的地方。在那里，我会感到宁静，记起我是个诗人；我会很开心，比你们能理解的更开心”。我们低声咕哝着离开了他，倒不是因为被他惹怒了，本来也没生他的气。我们俩都很喜欢他，这个时候，他是最哀怨

的，脸色略带紫色，眼白呈暗褐色。但在他态度执拗时，跟他做口舌之争实在是让人筋疲力尽的体力活儿，好像是和柔术演员对话一样——他们把嘴放在扭曲的膝盖下，在阴影中讲话。

来载我们去矿场的司机是麦克先生的私人司机。有些人，在他们手下人的眼里，就是英雄。“这司机会不会期望我们将他的溢美之词复述给他老板？”我丈夫想知道，但又自己回答，“不会，司机是挺高尚的人，而且他认为他和麦克先生的关系已经很理想了。”我们出了城，感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是在南方。夏日里，这里的土地像人的皮肤一样发烫。一座桥把褐色的土地和褐色的土地连接起来，褐色的河流里有褐色的年轻人在游泳。细小的溪流流过山谷，芦苇丛中有晒得更黑的小孩在蹬腿、尖叫。山腰上排列着索道的电缆塔，偶尔有一架缆车，从矿场上滑到磨坊。那之后，我们又看见山上一排颜色鲜亮的新房子。司机停下来。“我们的工人住在那里。”他说。我们应答说房子非常漂亮。它们的确漂亮，有着和一些现代法国工业园林城市一样热情奔放的特点，比如靠近科德贝克的塞纳河边的那些，那里制造水上飞机。“你们待会儿看到的一些房子是公司建的，十分华丽，”司机接着说，“这些是工人们自己修的，也够漂亮了。他们还享受麦克先生带回我们国家的好东西。他们还有化粪池。”他满脸激动地转向我们，“这不是最棒的事情吗？化粪池？所有喷涌出来的脏东西”——他的手臂在空中比画出污秽物淹没了宇宙的形象，精神打不败它，唯有麦克先生这一法宝才能将其征服——“变成了水，干净的水！”他挥动着手，向这种救赎致敬。“我主人死去很多世纪以后，”他大声说，“人们仍然在纪念他，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化粪池。”对下水道系统的基本理解，竟让它呈现出天使般的面孔，这让我吃惊。但是对普里什蒂纳那间晦暗公寓的记忆，尤其是地板上那些经年累月黏糊糊的一层污物，让这事显得不是那么出人意料了。

我大概不会知道以前的矿场是什么样子的。它现在看上去像座火车站，立在森林覆盖的山坡断崖之下，位于溪谷的尽头。有一架货运缆车，装满了大块的矿石，呈绝望的古银色，正慢慢驶离。在一间看上去像等候室的房间——可能是间什么办公室——我们看见两个年轻的英国人，穿着工装裤，拿着手电筒，在他们去洗澡的途中停下脚步，告诉我们他们刚和麦克先生一道下了矿井，麦克先生已经先上来，沐浴更衣后便来接待我们。他们是可敬的年轻人，有和自己职业相符的洁净面貌，像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但不是艺术家和科学家所用的那种有长长笔尖的铅笔。他们的是不易折断的那种，不需要经常用铅笔刀削；当然，也不是那种不需要手艺的钝铅笔。他们恰到好处。他们要走时，我看了看墙上悬挂的矿场地图，说：“我不明白这个地方的名字——斯坦齐格（Stan Trg.）。我知道‘齐格’是‘市场’的意思，‘斯坦’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看起来就不像个塞尔维亚词语。”“它不是，”其中一个英国人说，“它只是个错误。矿场开业时有人抄

错了名字。这地方没人懂塞尔维亚语，也改正不了。应该是‘斯塔里’（Stari）。”他们留下我们在那里惊叹采矿业的统治核心。他们冷静客观，能够进入自己一无所知的国度，在语言毫无共通之处的地方，为了秘密财富进行深度挖掘。

白天时，麦克先生经历风吹雨淋后的虚弱感，比头天晚上更严重了。在他温和而不失严厉的神情中，他的力量更带了些使徒意味。我们和他一起走出办公室。路过的牛车上，车夫转过头来看我们，可能是觉得陌生人也分享了本地的荣耀。这里的男人中的每个人都足以让女人心醉神迷，因为他们戴着莱卡帽。这是为男人设计的最具魅力的头饰。它是一种黑色的圆形帽子，带了一道红边，一束细致的黑色流苏垂在左肩，带给男人一种殷勤和轻松的无赖气质。但它本身却解释了为什么拜伦勋爵青睐近东地区。“但是莱卡离这里很远啊。”我说。它属于喀斯特地形，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后面的石灰岩上，从科索沃出发，只能经由黑山共和国或是波斯尼亚山地里的小路到达。“我们这里尽是这样的小伙子，”麦克先生说，“政府把他们一批批地送来这里，为我们工作，从村子里到这边的山上。他们在那些地方都过不上体面的生活，因为没有土地，只有岩石上的几袋泥土。你看，这里有各类人，是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混合地。我们有来自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我们来时就在这儿的本地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他们不同的、塞尔维亚其他地方来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些来自黑山共和国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他们又很不一样；本地阿尔巴尼亚人，一些是天主教教徒，一些是东正教教徒；在办公室和磨坊的白俄罗斯人；还有像我们这样的苏格兰、英国和美国人。是的，现在他们都处得不错，起先可不太好，有时候甚至非常紧张。我们曾经有个克罗地亚工头，负责雇用工人。他那里的一些惹人厌的塞尔维亚人，赌咒发誓说他偏袒克罗地亚人。他是个好人，我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愿解雇他。一天，这个可怜的家伙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个喝多了酒的塞尔维亚工人走进来，用枪打死了他。这是件可怕的事。还好我们抓住了凶手，尽管凶手跑上了山。他被押送下来后，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审判，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情形。本地人终于明白，旧的日子已经结束，不用以命抵命，但会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对这不是很习惯，但开始用不同的思路理解事情了。”“那个克罗地亚工头偏袒克罗地亚人了吗？”我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我在他停顿时又穷追不舍地问了一遍。这点毛病我从小就没能克服，尽管大家经常试图纠正我。“我们现在有个克罗地亚人，处在差不多相同的位置上，行事是最公正的。”这就是他的回答。两个男人开始讨论矿业技术。我落在后面，盯着尘土。“我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现在有个克罗地亚人……”我仿佛看见这人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死人的相关文件，突然变得面色苍白，开始揉捏鼻子。他意识到了秩序上的障碍，这是在占着不厚道的便宜，在意识形态而不是冶金学上。这违反了矿业妥善管理原则。

沿着一条蜿蜒的路，我们来到陡峭的山上，途中穿过一座花园城市，里面的房子白墙粉瓦，周围分布着果园。这里完全像是西方，又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看来，它们试图弱化黑暗在神圣土地的胜利感，但这里的神圣土地，在几个世纪以来，头一次被认为不那么黑暗。在我们看来，产业工人好像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够享受作为一个自由农民，或是工匠，相对惬意的存在。他们不得不过这种标准的舒适生活，生活质量远不及其他工作容易，或者压根儿就不工作的阶层。这想法在这里是胡说八道。五个世纪以来，没有现实可能的谋生方式，让这些人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马其顿并不是这样，塞尔维亚也不是这样，但在这片区域，事实的确如此。五百年来，这片区域没有其他哪个阶层享受到了这么高标准的舒适，现在仍然没有。公职人员和部队军官的处境更加局促。女人们坐在小房子的门廊里，仿佛身处神佑的天堂，尤其是对比以前的悲惨境地，更觉得满足感陡增。她们的孩子在花草间玩耍嬉戏，转头看着我们，眼睛或是黑色，或是深邃的斯拉夫淡蓝色，眼里似乎缺了点什么，又似乎没有它其实更好。我们意识到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孩子，很多都接受过基于往昔饥饿和苦难的忆苦思甜教育了。“每间房子都装上了自来水，”麦克先生低声说，“他们简直像爱惜新胸针一样爱惜它。”我们走过这寻常而真实的伊甸园，来到单身工人吃午饭的食堂。厨师们站在那里，面带饱含殊荣的微笑，像在实施某种仁慈且新奇的神秘法术。旁边一口大锅，里面褐色的和熏黑色的豆子汤正冒着泡，羊排炖在炭红色的红椒浓汤里。我知道至少有一家英国公立学校，伙食还不及这里好。毋庸置疑，工业文明在这里魅力四射。这家现代工业单位在这里受待见的程度，像背光的薄纸一样清晰易见，双重原因让它成为这类单位的杰出样本。它的背后，是土耳其统治不力留下的真空。

这一切，感人得如同1929年之前的美好的往昔：外国移民到达美国时，眼里洋溢着满足，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自己身处富庶之地，不管天气如何，这里粮食充足，有保暖而便宜的衣物、舒适的鞋袜、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还有不易获得但仍能够争取的收音机、冰箱和汽车，这些在波兰加利西亚或葡萄牙，是触不可及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新的工业化世界里，有不同于由太阳轨迹决定的季节，它更加残酷且更长久。城市版的暴风雪和旱灾更可怕，因为受它们的折磨时，人们处于绝对穷困的状态。农业社会的人们不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还拥有，或者有权利获得一片土地。他们所有的人由血缘的，或是世代培育的友谊纽带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家比较缓慢，但我见证了它令人惋惜的最后阶段。19世纪时，英国制造商俨然以一副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饱受蹂躏的农民面前。农民们在当时土地体系里生不如死——巴尔干半岛简直会为这种体系感到震惊。在兰开夏郡、约克郡以及英国中部地区的城市里，农民们得到了他们未曾享受过的食物和温暖，然后，他们在痛苦的失业大军里销声匿迹。所以我的直觉想要提醒这些带着欢快的胃口，高高兴兴迈进食堂大

门的矿工："不要被欺骗了。你认为是恩主的人其实是你的敌人。他们会奴役你，从你的后代身上夺走甚至在土耳其统治下你都未曾失去的东西：工作的权利。"

他们也许会回答："什么？给我们食物填肚子，给我们衣服遮身子，让我们能够死在自己床上的人是敌人？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从来不懂什么是饥饿、寒冷和恐惧。"也许他们是对的。工业化通过大大提高生活水平，而为人类的最高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要否认这一事实，便只能算是虚伪的自由主义畸形的一面。但同样愚蠢的，是否认它对人们做出的伤害：它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并不充足；它用廉价的城市毒害了天空和大地；它摧毁了雇员的意志，只让他们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顺从。因为事实证明，英国和美国的工业，无法如起初承诺的那样支撑它们的工人。我据此假设南斯拉夫也会如此，这是错误的。英国曾经的繁荣在缓慢地衰落。这缘于市场的萎缩，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说，东方国家日益增长的产能满足了它们自己的需求；缘于上流社会的教育存在缺陷，把自以为稳固的所有工业企业放到继承者们的手里，而他们却无力适应变化的情况。美国的盛景迅速消退，缘于实业家们没有预见到消费存在的限度，以及银行业的鲁莽草率。当然，在英国和美国，最终的原因其实都更加深刻：富裕阶层坚持将产业利润的过重比例以及控制权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意味着，为了眼前的利益需求，产业被过度开发，完全不考虑其持久性。最深层的因素也存在于南斯拉夫。矿工们为股东们工作，股东们的利益被优先考虑。矿场在战后重启，那时候欧洲的抱负变得相对平和，因为英裔美国金融家们更倾向于稳定，所以，没有受害于席卷美国华尔街和中西部的赌徒狂热。管理层很可能是小心翼翼、头脑清醒的。职员们当然也没有心存奢望，想靠着欺凌穷人让自己飞黄腾达，然后住进带有二十五间卧室的苏格兰豪宅。它也许会是能够长久存在的工业单位，只要还能从地下取出金属，以谨慎而耐心的方式。

人们会好奇，这些工人团结吗？像以前一样构成矿场最高指挥部的英美人，是否意识到，让这家企业成为生活手段，而不是死亡原因的必要性？这取决于采矿工程师是什么样的。而这一切我不得而知。我知道，我旁边这个人非常清楚他掌控的一切事情。

麦克先生指着一片山坡，那里展示着塞尔维亚风景的独特魅力。林地中有草原高地，正好可以让仙女在那里翩翩起舞。他说："那也是我们的地。买下它我挺遗憾的，尽管这里的地我们尽可能地多拥有并不是坏事。下面山谷的那一边，有块地我们没能及时拿下，一些流氓就在那里辟出了红灯区，几乎成了男人们所有麻烦的根源。但上面这块地我买了却觉得遗憾，因为拥有土地的阿尔巴尼亚人本来没打算搬离。他真是个正派的老人。他找到我说：'现在你拥有我的地比较好，它对我不再有用了。我的女人们不

能够在这个地方露着脸四处走动，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你没来时那样生活了。所以，付我些钱买下它吧，我们下山去市镇上生活。’顺便说一下，我想这一家人是一直在那里生活的。我们给了他两千镑买地，交易的每一步进行得都很愉快。他诚实、有礼，完全相信我们会公平地对待他，所以宁可让自己断臂也不会欺诈我们。我时常为结束他和他的家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悲伤，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催生了善良的人们。时不时地，他过来向我问些建议，他很信任我。我不知道他的两千镑余下的还多不多。在这个国家，不太容易找到像土地一样回报良好的投资品，在小市镇里想要过得和山上的生活一样好也不容易。欺骗自己没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一次改变都会变得更好。”那是现代人必须拥有的古老智慧。

麦克先生接着说："不管怎样，我对阿尔巴尼亚人很有好感。我们都喜欢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为我们认真工作。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他们是尽职的工会成员。之前我们关于薪资有争议，阿尔巴尼亚人比任何人都立场坚定，为此我也敬佩他们。之后政府派了个代表团来调查罢工的起因。代表团暗示，为我雇请这么多阿尔巴尼亚人深感同情。我自己倒不觉得。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雇请他们，是因为觉得他们正直、勤劳，我们还会继续雇请他们。情况越来越好了。塞尔维亚的管理人员慢慢地也开始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不再在他们和自己民族之间划分界限。这个国家很好地超越了以往。”我们在路上一个陡直的拐弯处停了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朝下看着工人们的食堂。我丈夫问我："你看见刚走进房子的那两个男人了吗？没有？啊，我觉得其中一个人是德拉古廷。”“不可能，”我很有信心，“他带着康斯坦丁到山上某个地方去了。”一想到康斯坦丁，我们两人都有点负疚感。我们离开了他，和这个专注、安稳的男人在一起，感觉非常愉快，这好像是缺乏仁爱的表现。

但这个男人是个天才，是独特的例外存在。麦克先生不仅不是规则的证明，反倒使什么是规则变得可疑。人们不能根据麦克先生的前任坎宁安先生，来对他做任何判断。我们在上面的马路上见到了坎宁安先生，一个身高体宽、头发斑白的苏格兰人，正和一个修士一起站在花园里。两人都专心地在研究蜂箱。养蜜蜂好像是他的爱好，他花了很多时间教这片地区的人们制造和使用现代蜂箱，以替代原始的那种——以前那种每次取出巢脾时都会被弄坏。清贫的修道院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他们买不起糖。修士离开后，我们在坎宁安先生的花丛间散步。花草竟然没有被南方的气候烘干，这很神奇，好像在它们生长时，土地都让高地的空气变得清凉。这清凉的空气也滋养了主人的口音。我对他说："这些耧斗菜长得多好啊！看着跟活物似的，随时都可能飞走。”他回答："啊，它们被称为精灵花。”他的苏格兰口音发“r”时像3月的风吹过王子大街，轰隆作响。接着，坎宁安先生又说："我让萨沙送一瓶苦艾酒去食堂那边，给咱们调鸡尾酒，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偏爱这东西的话。”他冲着屋里喊："萨沙！萨沙！”然后解

释："萨沙是我们在这里的杂工。小伙子很棒。天知道，如果不是他在这里照顾我们所有人的话，我们会怎样。"萨沙进到花园来之后，谈话就遵循了机械化的模式——西方人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和更落后的民族的族人说话时，常采用这样的模式。苏格兰人开启谈话，用的是护士对小孩说话那种不容置辩的口吻，塞尔维亚人也像认同了护士权威的小孩一样答话，但是再进一步讲话时，就轮到塞尔维亚人像护士一样讲话，苏格兰人像小孩一样回答了。这种方式也见于英国军官在印度和他的印度勤务兵讲话，南方人和他的有色人种管家讲话，加拿大度假者和他的印第安向导讲话时的情形，假如他们都是聪明人的话。只有蠢人才看不出，在这种关系中每一方都掌握着另一方毫无知晓的信息，于是每一方在另一方的领地里都是迷茫无助的，唯有依靠另一方的慷慨。这样的认知在苏格兰人的声音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他历经沧桑的城府，让他对所处职业的问题，比如矿石的性质以及它的地下蕴藏地，非常敏感；也让他能够明智地对待蜜蜂、花朵以及人，自然不会因为虚荣而让自己偏离智慧的轨道。他不会牺牲自己对萨沙的合理认知，来彰显自己在萨沙面前的优越感。这样的人有利于文明的发展。

但是普通的采矿工程师阶层可能不会有和他们领导一般的素养。他们根深蒂固地倾向于只关心了无生气的坚硬采石场，而忽略对活生生的人的状态的关注和理解——要知道，人的状态才是矿场的母体。这种忽略，导致一个塞尔维亚矿场被命名为莫名其妙的"斯坦齐格"。山坡的道路旁边有一片坪地，立着一座小教堂的废墟，教堂曾是中世纪时塞尔维亚的国王们修建的。萨克森矿工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在此朝拜。那些萨克森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算萨克森人，他们只是矿工。他们成立了国中之国，塞尔维亚的法律不能约束他们。他们遵守自己的规范，这规范也不是从萨克森州借鉴来的，只是，而且纯粹是，矿场的规范。人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规范是对散漫状态的许可，其实不是的，效力于扩张国家的人们曲解了它。这规范是为矿工职业所制定的法律条款，用了一个好听的英语词，指代所有与技术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信息。这个词其实来源于古法语中表示"职业"的词，一不小心误拼成了来自希腊语的、表示"神秘学"的词。它让这门技术成为必须忠诚献身的事业。曾经有人被发现破坏矿场，于是被用绳子吊死在井筒中。为了萨克森人的天主教信仰，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占据了本地人在这里修建的教堂。它本来是用来做东正教仪式的拜占庭教堂，后来被他们带来的德国画家绘上了壁画。几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教堂的拱顶已经崩塌，壁画也经历风吹日晒，褪成白色。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它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精神成长地。它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已抛却了国家的独特灵魂。

我们在道路顶端的食堂里遇到的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无疑是采矿工程师。至于其他，他们也许是儿子和爱人、丈夫和父亲、圣人和罪人、哲学

家和自然人。但他们每个人，如果被神的拇指和食指拣出来，用响雷般的声音问他是谁，可能会回答：“我是个采矿工程师。”他们太醉心于自己的职业，自然排除了危险的过量自我强化。采矿工程师必须保持健康，不能急躁，且能承受身体劳损。所以他们打网球，读一点儿书，拍照，学习语言；他们舒展着眉头面对生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将军肚。他们像一面耀眼的瓷砖墙壁，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

其中有个塞尔维亚人，是个医生，成天兴高采烈的，发色微微泛红。他的脸上初现皱纹，倒不是因为他显老，而是因为他仍然喜欢像孩子一样大笑。当我们说起曾经去过比托利时，他说他就是那里的人。我们就那座城市聊了一会儿，聊那里的清真寺，那里可爱的女孩子，那里的金合欢，以及藏于表面之下的广博文明。他相信，那座城市尽管远不如曾经作为马其顿首都时富裕，但仍然非常富有。“许多妇女早上在河边拖着脚步逛小店，穿着棉布袍子，”他说，“她们的脖子上，手腕上，戴着很多金子，比五百个锦衣华服的威尼斯女人一辈子见到的还多。我跟你说，这个城市遍地黄金，到处都是金子。”他又带着巴尔干人的热情，讲起了危机四伏的童年。“我父亲是个老师，”他说，“在比托利的第一所塞尔维亚学校里当校长。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学校，但是我们没有。我父亲是来自舒马迪亚的塞尔维亚人，于是他便出来教他的同胞。我母亲总是非常紧张，说不定哪天他就会被杀死，死在土耳其人手里，又或者是死在保加利亚人、希腊人手里，她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你父亲当了校长就会被杀？”一些工程师问，“还有，为什么比托利是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些人不知道土耳其在欧洲的传统，这些传统塑造了他们生活的土地。

他们对更近时代发生的事情也并不知晓，这些事情都已印成文字，留作记录，甚至远在他方的英国人都能读到。我对医生说：“战争时，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一面回答，一面在笑开的嘴巴前拍着手：“你肯定猜不到！我跟着撤退的塞尔维亚军队，一起翻过阿尔巴尼亚山脉，下到海边。瞧，我本来应该和我母亲、兄弟姐妹一起坐难民火车到萨洛尼卡的，但我被派去给我的一个老叔公送信，他住在城市另一边。回来的路上，我开始担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男孩，于是我去看他是怎么打算的。等我发现找不到他时已经太晚，赶不上火车了。我就加入了在街上走的一些军人里面，和他们一起到了奥赫里德，走进了阿尔巴尼亚的山地。你知道吗，这其实并不可怕。是的，所有你听到的都是真的。那里冰天雪地，能吃的东西很少，阿尔巴尼亚人躲在岩石后面朝我们放冷枪。但我觉得自己完全长大了，所有的塞尔维亚男孩都希望长成大人，然后参战。士兵们很宠我，我们进山时，他们从一个死了的士兵身上脱下外套，给我穿上。当然，衣服穿在我身上显得太大了，一直垂到脚上，所以他们叫我‘长衣将军’。他们对我真是好，每次有点吃的，他们总是先拿给我一份。所以到达科孚岛时，他们知道我的家人在萨洛尼卡，让我去找我的家人，我真的不是很愿

意。想想吧，别人叫你去睡觉，其实你一直在睡梦中！”

我们听了觉得非常吃惊，就像是某一天和你一道做客的人，宣布说他曾经去过莫斯科，然后和拿破仑一起回来的；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听这个故事的大多数英国人从来没听说过经由阿尔巴尼亚的撤退，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听过纪念那段痛苦时光的民歌：Tamo Daleko, Daleko od mora. Tamo ye selo,Tamo ye Serbiya（意为：“那边，遥远的地方，远离大海，是我的家乡，我的塞尔维亚！”）。这意味着他们也不知道南斯拉夫，或者说，他们不能把已掌握的、所有关于它的珍贵信息合成一幅有效的图片。由此推断，他们似乎成了国家的危险，因为他们所不知晓的国家利益不能主导他们。这可能是杨百翰的观点。他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总是把前来犹他州寻找矿产财富的探矿者和矿工视为国家敌人。他们不是他的子民，所以也不会为子民的利益服务，这是他的理论。但是在斯坦齐格矿场的食堂里，此类的迹象似乎在这片地区至今还没有出现。

这些人不太可能背叛他们的伙伴。有力量在约束着他们。他们反复讲述自己的出身，似乎他们都在青年时期去过一个奇怪的地方，甚至也可以说是童年时期，多舛的命运里有酷暑寒霜之类的虐人天气，以及出生畸形的事件——样本本应该存放于外科医学博物馆这类场所的瓶子里。然而他们却不受困扰。曾经，现在，他们一直靠着规范进行维系。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什么呢？一个人必须保持身体清洁；不能撒谎，甚至不能容忍谎言；受人酬劳后应力尽勤勉；不能予人苦难，必须让人尽力修塑灵魂。这是新教教义在英美思维里树立的道德传统，很容易被人嗤之以鼻。人们的确有积极的需求来摒弃它，它的支撑作用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生活富裕的人们来说，这更像是堕落的规范。任何位于资产阶级上层，以及更高阶层的英国人，保持身体清洁一点儿也不难；他可以说服自己，宣称自己说的都是真话，可以强迫经济状况不如他的人对他讲真话；他大概选取的都是不太需要费力的工作；让他人保持安宁的责任可以被解读为允许他心安理得地漠视他人。但同样的规范由采矿工程师来实行，就成了纪律，甚至成了神秘主义的教导。要保持身体清洁，可这个地方的天性就是让人一头臭汗，浑身邋遢的；要讲真话，还要苛求他人讲真话，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谨慎呼之欲出，想要掩饰一切；工作要力尽勤勉，不受批评，就必须使得身心俱疲；要尊重外族人的权利，可外族人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显得很可怕。这规范没有让任何人成为国家敌人。当然，有些采矿工程师执行规范不严格，甚至压根儿就不执行。但是这里的人都是麦克先生挑选的，他也是监督纪律的人，他们自然不属于对抗规范的那一类。尽管西方人反复用腐化来感染巴尔干半岛，但这次的接触可能是清白无辜的。

下午时分，我们开车离开矿场，沿着山谷来到镇上。那里杂乱地分布着一

些灰白的建筑，是粉碎矿石的地方。我们周围的传送带进行着没有目的地的无休止旅程，安全阀那里的一股股烟雾在标示流程的高潮。就我对机械无知的眼光看来，高潮还不曾开始。

“你无论怎样对我解释这些事都没有用，”我告诉麦克先生，“我觉得这些都是魔法，不可思议的魔法。”“你在这儿这么说很有意思，”他答道，“这正是我对于这些机器的印象。这里其他人也都这么觉得。”我们就站在许多储槽之间，里面装着沸腾的矿石熔浆。但每一个储槽里，冒泡的节奏快慢不一，迸出的灰色阴影也各不相同。“这些设备是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他接着说，“它们是最新的型号。它们才是魔术师。在每一个储槽，矿石都会留下一种成分，或者是银，或者是镁，或者是硫，或者是其他的，所以当它出这间屋子时，好东西都被抽出来了。我们只需要把各种矿物质从储槽里收集起来。但我搞不懂这些机器的工作原理，这里我认识的其他人也搞不懂。倒不是说它们坏了我们就不能修理，我们是能够修的，就像尽管你搞不懂一本矿业书里的内容，你仍然能够纠正里面的语法错误一样。但是机器的原理太高深，我理解不了。把它们从美国带来的小伙子们搞得懂，他们在这里待了一阵子。机器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专长就在这些生产线上。我们是多用途的人，处理的是运营矿场的生意。”“你是说关于矿业还有太多懂不了的东西？”我问。“太多太多了，”他说，“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职业的奥妙我们都会遭遇，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特点。

但这个男人不烦不躁。我们站在一座桥上，下面的铁路线从碎石场一直延伸到公路上。我们的左边是索道，跨越几座山直达上面的矿场；我们的右边是陡直的山峰，覆盖着森林，顶上立着堡垒。高地上的下午是金色的，但麦克先生却看着前面四四方方的垃圾山，它在阳光下呈现出比死亡更加死亡的颜色，是那种无望得到自然腐化和消融的死亡。“这个让我很担心，”他低声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方，什么都长不成。唉，它是个刺眼的东西。我们开始采矿前那里可是个美丽的地方。”我们下方的工场上，十几个人在挖坑。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戴着他们的白毡帽，穿着收腰的亚麻衬衫和亚麻裤子。我用相机在瞄他们，其中一个朝上看时看见了我。他立马就变了样，很快地，整个人群也都变了样。殷勤劲儿穿透他们全身，让他们的头摆成了挑逗的角度，手也放在了臀部上，眼睛和牙齿隔着距离熠熠生辉。也许他们没注意到我已经不再年轻，或者，也许他们的浪漫情怀阻碍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可以带着吸引过一位美丽的英国女人来崇拜他们的幻想，美美地度过一天。

麦克先生对着他们沉思，好像对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跟你们说，他们都很好，这些阿尔巴尼亚人，”他说，“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族群仇杀了，那是对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的诅咒。但他们说他们已经放下了。想来他们也会。给男人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座他喜欢的居所和花园，当他因为一个人

杀了他的二表兄而要去向这个人的叔叔复仇时便会犹豫，尤其是如果他知道他会蹲监狱之后。族群仇杀，你知道的，会让一切变得不可能。南斯拉夫人在战后接管了这个国家，人们出门走在路上都很不安全。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人们根本就不出行，除非富得可以请个武装护送队，或是有事情不得不出门。山里面有些村庄里，每个家庭都在干土匪的营生。也怪不得他们，他们也是被逼的。也许他们曾经在某个时候冲撞了当局，被赶到了无法耕种的土地上；或者出现了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把他们全部引入歧途。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路上扫荡、抢劫、杀人，这必须阻止。警察们能够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村庄，杀光男人、女人和小孩。温和点的方式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他们放过一个小孩，他一长大，就不得不向警察，或是该为警察进攻负责的人复仇。那是件残酷的事，不光是对村民们来说，对警察来讲也是，这些警察通常是很正派的人；对整个民族来说，这都是痛苦的事。这降低了他们的水准。如果你让警察那么难受，他们就会让每个人难受。但别急，这只是一个阶段……”

接下来，我们谈论着国家在复兴阶段经历的磨难，那包含着生和死的剧痛折磨。

回到宾馆时，我们还为刚才心满意足的聆听而两眼放光，看到康斯坦丁，就不约而同地示意彼此闭嘴。他衣着光鲜，神色黯淡地独自坐在咖啡厅里，在一群白俄罗斯人中间；一张报纸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摊开。“我们能和你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吗？”我怯怯地问。“当然，当然。”他回答。我们一落座，就感到了扑面而来的伤害，以及微笑的沉默。我丈夫清了清嗓子，问：“在山上过得愉快吗？”“我没去，我不愿意去。”他简短地回答。然后又陷入沉默。最后他问：“你们呢？我想，一定是和你们矿场的朋友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带着负疚感，我们承认了。“我很高兴，”他说，“我非常地高兴。也许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在矿场上并不总是这么开心的。”“什么意思？”我丈夫问，“是在批评英国公司对矿场的所有权吗？”康斯坦丁严肃地点点头：“是的，特许权是作为奖励，给我们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他的儿子把特许权出售。但他可能不是很聪明，全世界都知道，和英国人做生意必须很聪明，可能还不只是聪明。”他扬了扬眉头，耸了一下肩。“所以，他可能就犯下了错误，错误也许会被纠正过来。”“但交易不可能存在欺诈，”我丈夫说，“我认识公司的主席，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名声，公司和员工的名声，那不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另外，这也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在看到回报之前，公司投了100万镑在矿上。如果矿场是盗取的，他们随时会被踢出局，就不会在矿场上这么大笔地投钱了。”

康斯坦丁又耸了耸肩。“你是个城市人，”他说，“伦敦人。当然你看你的同胞们都是好的。可我们是更简单的民族。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基于我

们所看到的，也许某一天我们会采取行动。”沉默。我们郁郁地喝完咖啡，正准备起身离去时，一个年轻男子停在我们桌旁。他的穿着更像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晚上好，康斯坦丁先生，”他用法语说，眼角的余光瞟了我们一眼，“康斯坦丁先生，一位诗人，一位政府公务员。”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的一样，不能原谅康斯坦丁离开反对派阵营，他们对他的评论显失公平。“就为了一把银子，他离开了我们，就为了衣服上的一根绶带。”“晚上好，”康斯坦丁说，然后向我们解释，“这个年轻作家白天在矿上图书馆上班。我和他很熟，到处都是我的朋友。”年轻人接着说：“为什么你摆张讨厌的破报纸在面前？你知道那上面全是恶心的谎言。矿场的这些人，也是肮脏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下尽力想当好人。都是胡说，不知所云，荒唐，关于矿场的所有权。你心知肚明，你知道，这些报纸都是德国人在出资，就是因为纳粹想把他们的爪子伸进我们的国家。可是你和贝尔格莱德那伙该死的恶棍，你们让流氓发行这些满篇谎言的报纸，让他们威胁我们这个不幸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正直机构。”“我们没有，”康斯坦丁吼道，“我们一发现它们出版就压制过。这些卑鄙的东西反复出现，我们总是派人去追踪捣毁它们，我们把它们踩成垃圾，它们本来就是垃圾！”他痛苦地扫视我们，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矛盾，现在他太分裂了，已经没办法从这个困局脱身，也不能自嘲或假装什么，尽管他思维敏捷的才能让他比大多数人都精于此道；他明显的不一致下面其实有着微妙的一致性。我们做不了什么，只得起身道了晚安。

---

1. 英国克鲁弗兹狗展，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狗展，不仅是犬类用品大市场、各种犬种的竞技场，还是人与犬相互依存和照料的最佳展台。

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II

我们在城里又待了一天，但我们一直都没法让康斯坦丁结识麦克先生——这个他一定会喜欢，甚至喜爱的人，因为康斯坦丁具备对伟大的鉴赏能力，还因为他们两人怀着对南斯拉夫共同的爱。那天下午，麦克先生和我丈夫沉溺在关于粉碎厂专门术语的最后痴迷中，我和麦克太太一起坐在她家花园的石阶上，眺望群山和山谷。小河流过，在可爱的绿草地之间倒映着垂柳。我像一个独守着蜜罐的小孩，因为眼前的这位女性，像许多苏格兰女性一样，具备小说家的所有核心天赋。她被放逐了太久，乡情浓厚。她的一半谈话是在重写我们眼前的风景，用英国艾尔郡覆盖老塞尔维亚，着色鲜活生动。她一笔一笔地构建起图画，诚实而坚定，像德加年轻时画的肖像。她说起她的母亲，四十年前居住在苏格兰的一位寡妇。她每次出门时都穿着丧服，要精心尽一番礼数。我似乎又看到、闻到了厚重的黑色泡泡纱，触到了浆过的白色衣领那硬直的边缘，带着敬畏和疑惑，凝视着那带有安眠药效的凝重面色。那是那个时代寡妇的特征，表明忧悒不欢和降格的满足感一直在伴随着她们。她讲述的语调冷静，情感却像刚从眼里、心里萌生出来，鲜活地向外喷涌。她告诉我，自己年轻时的性格怎样被改变，变得随和，但少了青年时期应有的欢快。改变的起因是她和麦克先生漫长的订婚。麦克先生那时在国外寻找财富，非常不确定是否能让他俩的订婚走向结婚。麦克太太的全部春天都笼罩了一层伤心的阴云：“年复一年地为这事心心念念，感觉不那么好。”她经常觉得，人们会认为她迟钝，是个失败者，她很想一诉衷肠。但是，把自己希望发生的，说得像已经在发生的事，这是在对神进行误导。她的故事具有早期苏格兰诗歌的深度和气势，以威廉·邓巴(注)和道格拉斯的《埃涅阿斯纪》为代表。

这位女性有着敏锐过人的观察力和执着的标准。她和麦克先生结婚几有三十年，婚姻并不像显微镜那样神奇，但麦克先生通过了她所有的严查细究以及测试。现在，他成了她的生活。她一直提到自己的父亲。“你看见山脚下对着这幢房子的方形白色大建筑了吗？那是公司给这片地区的学校。他们为此非常高兴，房子从奠基开始，有特别多的事情要做。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那里有个牧师。我们本以为他是去做祷告，为那个地方祈福的。但他们突然抬出一只羊羔，他割断了那可怜的小东西的喉咙，血溅满了奠基石。我想那个和基督教教义无关。那是他们自己的地方，我父亲总这么说。那是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他们挺有意思的，你瞧，他们把学校修得太大了。那是他们的缺点之一，他们把什么都修得太大。他们在米特罗维察修了座市政厅。你可以想象，那规模看上去简直像英国的格拉斯哥。但父亲说为这个和他们发脾气没用。你只能在自己这边考虑应对，当他们那边陷入麻烦的时候，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怎样让

自己陷入麻烦的。”

她在织一件高领毛衣，织了一两圈便放到一边，说：“父亲到退休的时候，我们在国外也住得够久了。我们在南美待过二十多年，两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然后我们回到英国，在苏格兰买了栋房子。这里的人让父亲出来看看这个矿场。他们拿到了特许权，你看，却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合适的处理。于是父亲来了，说要想得到矿石，必须走迂回路线，用任何看起来直截了当的方法都是得不到的。然后父亲的注意力就完全集中在这个地方的问题上了。劳工们都来自不同种族，每个种族都想割断其他种族的喉咙。所以我不得不卖掉刚买的家具以及房子，来到这里。这里的工作对他来说很重要。但现在，我们都该回家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她若有所思地用织针挠了一下头发。

“可你知道，这会儿很难退休。因为这里没有中年人来接管负责工作。好的年轻人很多，可是没有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全死在战争中。于是老人们只得等年轻人再成长一点。我父亲召集了个不错的团队，他的精神导向很正确。你看这里情形复杂，他们得认真对待矿上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也得细心。在这类国家应该保持这样的清晰理解。父亲总是对从这儿去矿场的每个人说，‘现在，你们必须礼待南斯拉夫人，这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在这儿只是客人’。但是一些人却听不明白，尤其是那些在自己国家什么也不是的人。他们老想在这里当斯拉夫人的主人。只要他们这么做了，我们迟早都能听说。当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对军官无礼的时候斯拉夫人才会报告，你知道，军队对他们来说很神圣。我相信这里的军队比我们国内的教会更加神圣，因为我们觉得取笑神父也没这么糟糕。不管怎样，问题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都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我带着一个从贝尔格莱德来的医生的妻子参观桥牌俱乐部，她以为我已经转过身去，就做了个鬼脸；我们看着她丈夫，发现这位医生也在做同样的鬼脸。因为这个鬼脸，这对夫妇发现自己还没弄清楚身在何处，就被驱离塞尔维亚，登上了返回伦敦的火车。”

她把手放上额头，然后向下移动，直到把下巴托在手上，对着手掌叹了口气，眼睛朝下看着——这是苏格兰人的典型手势。“但这里有些方面很讨厌！他们对待女人的方式！还有，注意，他们身后的法律！”她颤抖了一下，讲起一个有教养的波斯尼亚女人的故事。她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的毕业生，来矿场做化学师工作。她嫁给一个塞尔维亚采矿工程师，几年之后成了寡妇，却发现自己经常被亡夫的农民家人造访。他们夺走了她的所有家具，丈夫存的每一分钱，这个国家的继承法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而且他们提出更骇人的要求，让她跟他们一起回去，嫁给他兄弟。她讲起来，感觉是饱受了妇女隶属地位的恐怖。这些是切切实实被实施的，不仅仅停留于天马行空的幻想：掠夺，残害，对子宫和生命的侮辱，对泥土和死亡的诅咒。显然，就像所有背井离乡多时的人一样，她有

时候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很古怪，而自己是蔓延的溃疡，引发瘟疫的炎症，若不赶紧回到无菌区便将感染，甚至死亡。但她十分自律。她了解让自己蒙上阴影的阴影本身。她颤抖之后恢复了平静。她转动了自己雌狮子一样的头，转向红红绿绿的山坡，垂柳掩映的山涧，说她热爱这一切。

四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下山去网球场，因为这天是一个圣人节，公共假日，整个矿场上的人都会在那里，因为一个著名的职业选手专程从贝尔格莱德来此庆祝假日。首先我们得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国内庆祝仪式。女人们，也包括我，会觉得它们很有趣，这些女人一生都不得不从事某项专门的任务。麦克夫人卷起了她的针织活儿，把针线篮放得整整齐齐的。她的动作很慢，带着富足的姿态——奶油不会一下子倒出来。我们必须劝说亚伯丁小猎犬留在屋子里，以免它跟着我们。这家伙整个下午都阴郁地坐在我脚边，摆了个合适的姿势，好让自己抓挠左耳下方。它成了人们对网球疯狂激情的受害者，那激情不亚于黑格尔派哲学家听到喝酒的美妙声音产生的激情。“好了，我们要走了！”麦克夫人叹息了一声。我们沿着一条路穿过果园，拐过个弯，到达网球场。这地方位置绝妙，周围是尖尖的山峰，顶上一片废墟，奶油色的野花在灌木丛中开得一片绚烂。

比赛已经开始，赛况如同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之间常见的走势，很快成了一场舞蹈表演似的格局。塞尔维亚的专业选手先把球打向球场的左角，英国的业余选手把球接回来；然后塞尔维亚的专业选手把球打向球场的右角，英国的业余选手又把球接回来，然后球掉在球网下，停在那里。尽管专业选手无须费劲便可稳定这样的格局，他仍然有问题需要解决：怎样将付出的努力效果最大化。目前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他不需要加紧步伐，总是缓慢地移向球到达的地方。观众对保持静止的容忍度能够证明他们的自律性。没有持续练习这个实践过程的人不能够静下来只是观看，他们必须嚼嚼口香糖，剥剥橘子皮，把重心在两脚之间和臀部两边来回移动。但球场周围的观众非常安静，集中着注意力。他们的眼睛和下巴带着恰当的笑意从左往右或是从右往左移动，只是必要地跟着球，别无其他，他们的双唇保持着嘴的安静，指头保持着手的安静，身体微微收拢。

这里大多数的男人是矿场和粉碎厂里体力劳动者以外的工作人员，女人有两类：他们的妻子和在这里上班的女人们，比如秘书、科技员以及家政管理员，光用眼睛也看不出她们之间的区别。她们头上有一样的华丽卷发，就像在南斯拉夫各个地方都能看出钱的光彩，女人们也如同在维也纳一样裹着头巾，衣服穿得谨慎而艳丽。许多人都很漂亮。其中有一个白俄罗斯人让人难忘，那是一名办公室职员，脸庞轮廓清晰，面色冷静而温柔，身形笼罩着优美，举止流动着比一般动作更为恣意的高雅。有一个来自黑山的女孩，英雄般地俊美，仿佛与生俱来就适于生活在白雪覆顶的黑山下，

雄鹰翱翔的蓝天下。有一位英国妇女，带着花园的气息。但是即便是这些高度个性化的女人，也像她们旁边坐的男人一样，被共同目标带来的压力打磨圆滑了，与其说她们单调，不如说是统一。矿场将他们塑了形。他们为了维系自己和族群的利益而工作，像农民一样，只不过现代工业是他们的媒介而已。他们经受教育的才华上，蒙着一层农民般神圣的严峻，环境无法使其消退。当然，南斯拉夫或许可以领受西方的礼物，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毒害；或许可以学得走向繁荣的良方，让自己充分开发经济资源，而不危害人力资源。

傍晚斜照的阳光用明亮的光线和暗色的阴影勾画了我们上方棒棒糖状的尖峰，以及峰顶上如鱼骨般细致的废墟。牛群在炽热的灌木丛中闲逛，像神兽在土地上接受赏赐而变身。远远可见，紫色的、白色的花在茂盛的草地里盛开。我旁边站着麦克先生。他和我丈夫刚到，全身发热，一脸满足——他们刚结束在粉碎厂的奇迹之旅。“我见你仔细地在看我们的城堡，”他说，“我想你知道那是史蒂芬·杜尚绞死他父亲史蒂芬·德钱斯基的地方。”我惊呼：“可我以为发生在茨维查恩，而不是特浦加。”他回答：“但那里不是特浦加，特浦加是山谷源头，矿场所处的地方，我们下到这里，就是茨维查恩了。”我说：“我希望我能上去看看。”但我旁边的女人反对：“现在那里没什么可看的，只有些残垣断壁。而且你不能穿这样的鞋子上去，上面有蛇。”

茨维查恩的城堡里有蛇是最为合适的。从那锥形物里传下来的事件还不紧凑，还拖着致命的冗长在游走。多年来史蒂芬·德钱斯基和他的父亲米卢廷互相憎恨。儿子像一头被猎获的野兽，伪装得像石头一样沉静，以免被击打致死。本来史蒂芬·德钱斯基可以随着性子活些年头，却在米卢廷死之后，因为得罪儿子，重复了自己早先的祸患。德钱斯基的儿子定然是种族里最危险的角色。他又一次模仿石头般的沉静，并不是为了逃脱毁灭的命运。在这铜色的山巅，他静静地躺着，成为横扫天下的利剑下注定的厄运象征。挥剑的行刑者，正是发肤受之于他、听他教诲的人。所谓命运，是人类半心半意却执着不变地追寻死亡的代名词。各民族一次又一次地拥有机会活着，并展示，如果人生源源不断地得到幸福的滋润，将会发生什么。人们更喜欢炸开运河，抗击旱灾。他们听了灰鹰的罪恶建议；他们像黑羊一样让人割喉。神秘的科索沃在这座山的后面，在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后面。

真相在这个社会的后面。去设想矿场的人们为南方斯拉夫人提供创造未来福祉的良方，是幼稚的。这并不是说充分认可并赞赏他们，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就幼稚了。我猜想，没有人有个当公爵的爹或是百万财富的继承者。他们出生的家庭应该有舒适和高雅的传承，但必须代代工作，否则便没有机会享受这些。所以，较之于在他们之上的人，他们更明白一个

人应该凡事有度，应该严谨细致，应该尊重他人的本性，就如同靠每天的表现领取报酬的运动员，比业余运动员更明白，决不能用酒精或是不健康的食物损伤自己的体力。但是，决定英国命运的人却没学到这一课，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庞大的居所。

奢侈的房子并无意义，除非是欧洲历史上各方力量联合起来剔除的小皇廷，或是有慈善热情要为所有来者提供食宿的热心人之家。然而，占据这些居所的人们，心中的骄傲却是数量意义上的。他们欣喜于房间的数量和面积，花园、玻璃房、马厩的规模，仆人、马夫和园丁的队伍。让他们高兴的并不是家的和谐比例，这实际上暗藏着对他们的真正摧毁。因为他们失掉了自己的品位，在19世纪的时候。除了那些被某种阻碍——比如天赋异禀、身体弱势、同性恋——隔绝于他们自己阶层之外的人，余下的很少能恢复自己的品位。证据写在墙上的家族肖像画里。在他们的霍尔拜因、凡·戴克、庚斯博罗、雷诺兹、劳伦斯旁边，悬挂着迪科塞尔、米莱、赫尔科默、萨金特、拉斯洛和伯利的画像。他们的眼睛失去了锐气，因为整个机体的幸福不再取决于视力或其他感官。这些人会吃得很好，哪怕他们又盲又聋又哑，因为曾经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联合起来将食物投入他们的嘴里。

他们失掉品位，也就失掉了灵魂。他们不能够将标准基于质量上，就只能在数量上保持骄傲。但是财产的数量，以他们学会享受的规模而言，只是过去成就的集结，而与如今的成就毫无关联。所以这些人背离了生活。他们中最好的逃进了对某种技艺知识的专注追求，比如马术、射击和垂钓，这些没有给他们带来从事技艺追求后一般会有的良好感觉，因为他们带着非理性的自得情感，相对于那些因为才智上的偏见，或经济上的匮乏，而不愿将所有其他利益用以交换技艺实践的人，他们会有优越感。如果进行冷静的审视，就不能设想一个保守社会，将狩猎视为与宗教活动同等神圣，能够让它的成员免于成为生活的傻子。保持足够精神活力投身于公共生活的人，正坐在议会的席位上，带着我们历史上某一阶段的威严。他们与现今时代的接触方式，就是阅读专家准备的备忘录，但他们又不太信任专家，因为社会起源不同。他们刻板地忠于某些原则。他们保护往昔努力带来的积累，否定现今的要求。他们不会为保卫麦克先生和他的职员们费一丁点儿力。他们不会理解他们在特浦加工作的美好和精妙，因为它不是狩猎和射击，它是现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视作红利的来源而略感激动，但他们会通过国际政治，来对矿场的维护进行灾难性的指导，因为他们仍然处于19世纪，不能够相信英国的权威在全世界已不那么绝对，英国的资产也不再不可侵犯。这样的统治阶级对英国来说意味着死亡，尽管分散在各处的英国人一生都在努力为国家服务。所以，英国对南斯拉夫不能形成救赎的榜样。

我问麦克先生：“英国外交部和公使馆对你们感兴趣吗？”他回答：“一点儿都不。尽管我经常想他们可能会，毕竟我们是巴尔干半岛上重要的英国影响力。但他们甚至都没告诉过我，如果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我想，可能我应该更执着地去问。但你知道这些外交官的，他们会厌烦你，你也会厌烦他们。”这座大房子（国家）里最大的耻辱，在于它的孩子们总忧虑着他们在外国公使馆的家。社会的极端在放逐中相遇。普通的英国外交官，当值的地方不在伟大著名的首都，比如巴黎、柏林、罗马，或者维也纳。他们的作为，恰似年轻的女人放弃了在男子服饰柜台上班的工作，嫁给在一家熏肉公司的大陆分部上班的年轻男子。外交官们对服装有一种狂乱的兴趣，对异域的环境有一种愤恨的冷漠。这可不是贵族的态度。这座大房子不再培育贵族，只产出特权阶级。

外交官们的特权很广泛，为其他阶层怀有的雄心提供了一个坏榜样。他们的财富让社会其他阶层深受刺激，因为财富来源于继承。他们从在娘胎起就走运，走运得可以从摇篮到坟墓，一路逃脱亚当受到的诅咒，这是我们在童年时，想为自己选择的命运，所以也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的命运，想到这些时我们都很幼稚。我们看着大房子，有着世俗财富的稳实根基。我们将它视为自己的希望能够得到满足的证据。于是，节俭——所有美德中最单纯的一个，常表现于小孩留着一颗糖明天吃——被放大、贬低为无理期待的庞大怪物，成了一种欲望，即储蓄用于投资，来换取永久的巨额红利。

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我们的希望毫无根基。支撑大房子的财富通常是由前人积累的，他们幸运地得到土地或矿产的所有权，或贸易的垄断权，在那时候，社会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不受剥削，也没有发现使用贬低性条款的手段——这些条款具有广阔、永久的需求市场。幸运的第一种形式在当前稳定的世界里已经享受不到了，而第二种在我们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工业体系里也越来越少见。人们也不会相信一般的存款如此稀缺，借贷者必须付出无期限的高额利息来获得。但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就建立在伪装上，每个工业企业的脖子上都拴着贪欲的磨石，它的最大承受力被计算得刚刚好，确保它不被压垮。哪怕是在特浦加这里，付给股东的红利也是矿场社会价值的不利因素。在矿场产出矿石之前，的确得先投一百万英镑，但这些前期投资得到的回报是极其超额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去了远方的投资人手里，这人对矿工或者南斯拉夫一点也不关心。但他也是个可怜的家伙，在这混乱的世界里和其他人一样无助，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可能立马血本无归。国际金融不像宣传中假装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简单形式一样狡猾欺诈，它的缺陷大概在于牵引的绳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再能被算作战争的主要起因。但它像一个学识渊博，却又聋又怀有偏见的法官，坐在对决定个人命运和司法原则有巨大影响的审判席上。它时而明智善闻，时而糊涂闭塞。

特浦加的人们也不是完全天真无邪的。经由他们同意，比他们低劣的英国才能在他们这里存在的。很可能麦克先生曾是老派的苏格兰自由主义者，对格拉德斯通先生满怀敬仰，他在精神上肯定是激进的。他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自己的感觉——认为社会精神不忠于创造性精神，后者在良好有序的采矿业和管理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如果是一场正确的革命，他的妻子已经见证过了，带着坚定的支持，如同一个主妇看见她懒惰的邻居终于处理了自己的春季扫除。但我想，坐在网球场周围的大多数其他人极端保守。他们会迅速保卫那些企图摧毁他们的力量。他们至少会为谋杀革命人士的统治者开脱，即使不能彻底为他们免罪，而这些革命人士是试图救助他们的。无论在哪里，和他们一样的人们，行为明确而卓著的人们，总会倾向于维护大房子。他们不能为自己的感觉提供才智上的合理解释。他们简单地遵循自己的本能，而本能，据说是健康的。但这不过是我们人类对自己讲的一句自吹自擂的谎言，我们头顶的山峰便不能赞成，山峰是史蒂芬·德钱斯基执拗的求死本能所指向的目标。

我丈夫说：“是时候我们该走了。”我们开始告别。我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我觉得真的很伤感。离开时，我转头和一群我不曾见过的男女说再见，尽管我知道这是皇室成员离开街市时才有的适宜举动，而我，只想直接地看看他们的愉快模样。在对他们的深爱中，我意识到，西方社会想要帮助其他地区，其实是多么无力。它造就出的个体如此出类拔萃，坚定、诚实、讲究，如果不是他们内部的力量迫使他们追踪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单独看来都是细致优雅的。一个天堂般的社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丑恶、悲观的模式。在这里，通过麦克先生这样的天才，那股力量还远不至于被挫败，西式美德仍然以其纯净的面孔示人。但这只是单纯的当地驱魔术。西方，在落日之外，绵延千里，正处于令人惊讶的腐朽中；它企望死亡，对自己的病态扬扬自得。

在我看来，只有在马其顿，人类才在治疗自己的腐朽，尽力激起对生命的眷念，以对抗对死亡的热爱，以保护人类事务的王国免遭政府的侵害——政府只应染指坟墓。我记得尼科莱主教看起来是怎样和求死欲望搏斗的，好像失去控制一样，尽管他柱形的身材在华贵的衣袍下岿然不动。我记得圣南姆的修士们是怎样擎起诱人的生命象征，面对那些对生命丧失兴趣的人。我满怀希望地记得，那天傍晚我们去佩奇，准备第二天参观史蒂芬在德查尼建的大修道院。那是培训修士的神学院。在那里，在马其顿的成就是否是个人天才的成果，或者东正教教会是否拥有能够留传给子孙的智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变得简单易解。若是如此，哪怕平庸的人也可以成就功绩，对生命的热爱将遍及四处。我们现在正立于门口，德拉古廷在汽车旁边等候我们，手放在额头上，看上去好像是把我们的金鞍骏马牵到了拉扎尔大公的帐下。麦克先生说：“你们会喜欢德查尼，它是山里一处漂亮的地方，像苏格兰高地。”他妻子说：“希望不要是穿着难看胶鞋的小

修士带着你们逛。”终于，我们驶下山坡，像英国的戈尔德斯格林、奇斯尔赫斯特一样的山坡，它其实是真正的天堂。斯拉夫生活神秘和愈来愈强的复杂性又一次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

1. 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约1460—1520），苏格兰诗人，代表作有《蓟与玫瑰》《七宗罪之舞》《悼念制造者》，被时人誉为“北方的乔叟”。

佩奇I

我们回到宾馆时，康斯坦丁手里捏着他的表，正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们曾经注意到他这种焦躁烦乱状是格尔达经常指责他的原因之一，现在倒经常表现为他在日常每件事情上嫌弃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来得要么太早、要么太迟。如果他看着别人喝咖啡，就会觉得他们比较合适的做法应该是早一个小时，或晚一个小时喝，反正那会儿就是不对。现在我们回宾馆的时间，比计划出发去佩奇的时间早二十分钟，在他看来我们却是晚了很久，晚得几乎要将行程推迟到明天早上了。我们下车时他跑过来，一边挥舞着手表一边大声指责我们，但是德拉古廷跳出来，用超然、强硬的态度回应他，态度像蛇一样冰冷。康斯坦丁的病态使得别人对他的厌恶感与日俱增，德拉古廷很乐意把康斯坦丁从我们身边赶走。尽管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们也感到了一股傲慢的寒意。康斯坦丁突然变得含糊其词，好像匆匆地套上衬垫外套来保护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人之间发生过点什么我不清楚的事。康斯坦丁只是说：“哦，我们不能太晚出发，不久前这路上发生过南斯拉夫最危险的事。”“但现在已经不这样了。”德拉古廷开始往车上搬我们的行李。

他们又开始争吵起来。这时我们已经离开镇上一段距离，正经过小山坡。坡上长满矮栎，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出微红色。道路穿过曲折的山谷。我们看见一辆小车在路边缓缓停下。一个男人站在凸起的土丘上，头侧向西方。我们减慢速度，看见他正在胸前划着十字。我们停下车来。“等他结束时，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在这里祷告，”德拉古廷说，“也许这是个圣地，某个土耳其首领在这里被杀掉。”那男人走下土丘时，他大声问他：“朋友，你为什么在这里祷告？”男人走近我们的车子，答道：“因为我很高兴还活着。你们不是英国人吗？听听我的英语多好！我在英国的朋友们嘲笑我，说我说苏格兰语说得好。整个战争期间，我在亚伯丁上学，之后回到这里。因为受的教育好，所以我做工厂服装生意。这也是我现在在这里祷告的原因。我经常往返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和佩奇之间，总是害怕土匪，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他们曾经下到山谷来，把树干横在路中央。我想着我亲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祈求上帝的保护。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在感谢神赐予我的保护。因为你们来自英国，我很喜欢和你们说说话。你们是要去佩奇吗？待得久吗？啊，那样的话，我改天去看你们，现在我得赶紧走了，我得和我一个朋友吃饭，他在城外有片农场。”“你瞧，”康斯坦丁说，“他说这条路很危险。”“他说这条路以前很危险，”德拉古廷纠正他，“他用行动表明他相信这里已经不危险了。我和其他人一样信上帝，但如果这条路上仍然有土匪，我不会停下车来站在旁边祷告。我会一边开车一边祷告，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这样做。”

曾经在这条路上活动的土匪是政治叛乱者。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自称代表在战后南斯拉夫政府重新分配土地时被驱逐的民众。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拦路抢劫和革命理想相互关联，这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却是土耳其征服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14世纪情形的具体化，中世纪的任何人，一旦踏入生来的位置，便发现除了盗抢别无其他出路，因为他既不能迁至他地，也不能转做他业。如果一个农民坚持主张自己族群的权利，触怒了当局，便会变得一无所有，于是只能生活在森林的掩蔽中，打劫富有的旅者，这情况就如同在尼曼雅人和土耳其人统治下一样。直至今天，巴尔干民族也没有惊讶于叛军一面宣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惯常性地杀人越货，尽管他们迟早也会被这种将中世纪理论应用于现代情况所导致的实际结果惹恼。这种做法的弊病，是现今这里不经常有富裕的旅行者经过了。在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和佩奇之间的路上，罗宾汉们在春秋时节还可以挣得几顿美餐，到了夏冬就颗粒无收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劫掠路人这一不足取的方式，或定期向当地农民伸手——那意味着他们成了害虫，附着在自己宣称支持的阶级上。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I. M. R. O.（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毁灭；这些阿尔巴尼亚人也越不过这个障碍，尤其是在特浦加矿场为当地带来财富以后。农民们急切地享受生活，享受自己的这份新财产，有意无意地全站到了警察那方。尽管如此，要彻底剿除这些匪徒仍然艰难。这条道路右边群山绵延，裂开一条树林密布的深谷；左边平原广阔，翠绿、悦目、肥沃，和我们的佩维希河谷一样。劫掠这事充满诱惑，就像美好的封面。

“看，这里是车纳格拉，这里是蒙特内哥罗。”康斯坦丁说。的确如此。这个国家，它的一切事实，它的本质，而不只是其中一部分，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面山墙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向南延伸，另一排向北，在平原的模糊边界处与其相会，但它们的相会很短暂。沟壑上方立起更高的山墙，黝黑的悬崖面，高度直达半空。那是车纳格拉、蒙特内哥罗，通常翻译为黑山，但起名时完全没有名字所带的意义。那时候它指的是斯特拉希米尔·伊沃黑山，据说，一个曾是塞尔维亚首领的罪犯，在科索沃建立基督教公国后半个世纪时逃到那里。土耳其人没跟着他去那里，几个世纪都没去，只是坐在平原上，仰望着这巨大的堡垒。这是鬼斧神工的地质壮举，将只见于地下洞穴和深渊的岩石举起来，悬于这片云迷雾罩的地区。

沟壑口的地方散落着几座宜人的小丘，站在上面，感觉能更近地辨别出城市的清真寺和方块建筑。周围的建筑闪着蓝白色的微光。我们驱车走入黄昏。在谷端的悬崖投射的阴影笼罩下，黄昏变得冰冷，薄暮中的佩奇仍散发着摇摇欲坠的颓废魅力。它和瑞士小镇很有点类似，也有一条小河在主道旁奔流而过，裹挟着来自冰川冰冷的呼吸。暮光隐去，群山仿佛在眼前推进。只是这个地方没有如瑞士那样的坚固小木屋。若非亲自来到佩奇，没有人能够想象，供人居住的楼房可以怎样的脆弱。我们经过的多数住

房，以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能够被一个身强力壮的人，用一把鹤嘴锄，在半小时以内拆除，能够被直接夷为平地的也不在少数。许多房屋都是用薄板和马口铁皮搭建的，使用的灰泥似乎也感染了某种建筑疥癣。

我们走上主道，道路很宽，两边低矮破落的店铺和旅馆更衬出它的广阔。道路一旁有细流淌过，是土耳其人挖的一条排水沟。一小时流程的沟渠，一众当地人。人们大多数个子很高，拖着脚走来走去，热情洋溢的面孔和缤纷张扬的衣服上，也包含着同样热情洋溢和缤纷张扬的两层色彩，映射其上的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光芒：暮光，以及来自电灯的炽白光幕。这是一篇复调乐章：悠闲散步的人群，路旁细流轻快的涟漪，房舍间依稀可见跃动起舞的河流，在杨柳间的宽石板路上驰过的汽车。然而，我却想起了曾经在科罗拉多州参观的鬼城，一道未着人迹的尘土路从空窗房架延伸到废弃已久的矿场。

酒店侍者把我们迎至宽阔古怪的内堂。它围绕餐厅而建，房间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一排超柯林斯式的立柱沿着走廊上分布，全漆成晦暗的褐红色。这是另一处巴尔干半岛本土建筑的样本，似乎建得不拘格局，修建者胸中并无他所修建筑的成品样。餐厅里的几个人穿着西式衣服，大概是公务员，围桌而坐，旁边候着几个服务员。房间太大，灯光散漫无序，他们看起来平淡无奇。我们上楼，穿过过道，那是佩奇脆弱风格的见证。地板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叫，并不是无病呻吟，真的是在承受伤痛。

经理拉开一间卧室的房门，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年轻的军官身上。他的头发呈黑檀色，橄榄绿的外套下摆服帖地围束在时髦的腰间。他正站在铁台旁边，用亮粉色的香皂在搪瓷盆里洗手。香皂的气味尖锐刺鼻，摧毁性的花香让我们围成半圆目瞪口呆地保持静立，望着神奇的泡沫。感觉像是开了门，看见一个人正从高礼帽中掏出一只白兔。先恢复镇定的是经理。“房间好像已经被占了。”他对我们解释。我们满心不情愿地退出来，眼睛还盯着那块非同寻常的香皂。“但很快会有房客离开。”他说。这时我们出来走到了楼梯平台。“你们坐会儿吧，不会等很久。”“你们没有其他房间吗？”我丈夫板着脸问，讲的是德语。“有啊，”经理回答，“但这间和旁边那间挺特别的，我经常说起。我希望你们能感受一下。”“我呢，”康斯坦丁问，“我也得等着吗？”“是的，”经理说，“另有个军官在你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走。他们说他们会在五点半离开。但是，他们两人都很年轻，年轻人总是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你会找到些舒服的椅子的。”

这他可错了。这是些藤椅，面上有大大的洞孔。但坐上去倒不难受，因为它们被摆放在桌旁，一个看起来很讨人喜欢的女服务员正在那里熨烫一堆床单。她是匈牙利人，并不十分年轻漂亮，但她有张喜气洋洋、略显顽皮的脸，红褐色的面颊和明亮的棕色眼睛被她拧成了有趣的鬼脸。床单很粗

糙，熨烫它们很是费劲，每次用力时她都带着愉快的表情，混合着苦行似的感官享受和自嘲。在温暖的傍晚，这么坐着让人倍感惬意。床单散发着烤茶点的味道。我几次都几乎合眼而眠，但总是被旁边的橱柜门板惊醒，它们迸开并无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做工粗糙，合不严实，展示出里面许多褐色纸张包裹的不明物件。我记起曾经读过的一本俄国小说，里面对一间卧室的描述用了这样一句结尾：床的下面有一支巨大的灌肠器。

终于，军官们说笑着走出过道，我们接手了他们的房间。我们那间房里仍然飘荡着粉色肥皂的香味，仿佛是难以想象的丰腴而油腻的夏季幽灵。我们换了衣服。刚准备好，康斯坦丁就来敲门，进来时一脸欢快和幸福。“那个匈牙利的小服务员，”他宣布，“也许她没有看上去那么好，而是更好。我跟她说我想洗个很热的热水澡，因为我有点儿发烧，想出出汗。她对我说：‘你可以洗个很热的热水澡，我可以把洗澡水弄热，但洗完之后谁给你按摩呢？也是我吗？’啊，我们的所有女服务员都这样，她们很调皮，但也很好，你们看见她是怎么工作的。”他背过身去对着豪华镜框围着的镜子，在狂乱的镜像中抚平领带，一时间自嘲般的殷勤劲儿猛然复活，我们刚开始和他一起旅行时很为这种精神着迷。我们三人一齐笑开了。但我注意到他的脖子后面一片绯红，问：“发烧怎么样了？康斯坦丁，你真的生病了吗？”他急转过身回答：“是我手的问题。”我们惊恐地看着他的手，指节和手腕之间整个都是猩红、肿胀的。“这是怎么了？”“就在早上我们吃完早饭后，”康斯坦丁说，“我被一只长着大翅膀的毒虫子蜇了一下，要么是黄蜂，要么是马蜂。只是你们没注意。”

我们俩守在他旁边，低声说着忏悔和同情的话。我们突然又成了初见时那样的朋友。他于我们，像孩子，像伟人；我们于他，像父母，像学生。我们之间，我们的话语之间，已无任何隔阂。但很快他的脸又变得空洞起来，像是在聆听远方的声音，然后浮起冷硬的神色。他说：“是的，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但你们别操心，我会下楼去。尽管我一口饭都吃不下，吃饭时我会坐在你们旁边，然后我带你们在城里逛逛。”“别做这些事了，”我丈夫说，“你躺床上去，待会儿把饭给你送上来。”“不，”康斯坦丁说，“现在我很清楚你们的习惯了。饭后要在城里逛逛，否则你们会觉得很不舒服。我知道你们英国人的。”我丈夫突然简短地冒了句话，我在场时很少听到他这么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然后他扶着康斯坦丁的手臂，带他离开了房间。他回来时说：“原谅我，亲爱的。我想这样的场合只能用自然的男人的方式处理。别担心，他很高兴被送回床上。”

我们在大酒店的餐厅吃饭，在等候多时之后享受到了美味的鲑鱼。餐厅很大，服务员拿到点单后立即一路小跑去厨房，毫无疑问厨房也很大。厨师们偶尔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儿，重修一下墙壁，重铺一下地板。我们消磨时间，认真地阅读贝尔格莱德报纸上的新闻，报纸是由一些皮肤黝黑的小

男孩拿来的。他们衣衫破烂，外表很容易识别。或者，我们和一个年轻人说话。他上前来用德语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因为我们在这里是陌生人。他告诉我们，他是克罗地亚律师，来本地法庭当书记员。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年轻、简洁、彬彬有礼，很有骑士精神。我们的鲑鱼端上来时，他告辞离开。我们刚吃完，又来了另一位访客。一个皮肤黝黑、体形魁梧的男子，穿戴比餐厅其他人都显精干。他在邻桌观察了我们一阵子，现在走上前来。他对我丈夫说："晚上好。遇见德国人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挺有意思的。""我不是德国人，"我丈夫纠正他，"我是英国人。"

黑皮肤的男子看着他的回应，好像这个回应被拣出来，运走、卸下、埋葬，或是给予了不相信的对待。他说："可是你的德语说得和德国人一样好。""那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汉堡待了些年头，"我丈夫回答，"而且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和德国人做生意。"男子的话还纠缠于对我们的怀疑，我丈夫有些不耐烦："你呢？你是德国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噢，我不是德国人！"男子叫嚷着，一脸诧异。我丈夫说："可是你说话像个德国人。"黑肤男子回答："那是因为我是丹麦人。"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很烦我丈夫那张聪明的长脸，于是草草道别而去。"我说我是英国人他不相信，"我丈夫发表他的意见，"但我不相信他说他是丹麦人时，他倒生起气来。他觉得我不光明正大。那意味着他是德国人。""他不会是丹麦人？""不可能，"我丈夫说，"他说话甚至连德国北方口音都不带。那人肯定从小说的就是柏林腔。"

正在这时，德拉古廷过来和我们道晚安。他之前坐在房间另一头。他告诉我们，看完特浦加后，觉得佩奇很乏味，倒是戈鲁的建筑和这里的产业是他见过的最棒的。他走后我突然想到，"戈鲁"不是一个地名，是个表示"在山上"的词。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去过矿场。"这太可怕了！"我说。"你还记得我们正要在矿场食堂吃饭之前，我认为我看见德拉古廷在餐厅这件事吗？啊，我是看见他了！他肯定是叫了个朋友带他上去了！""这事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丈夫不解。"那说明，"我回答，"他走了，离开了康斯坦丁，很可能没问他的意见。所以，并不是康斯坦丁一个人驱车旅行。他自觉比我们，比矿场所有人高出一等，因为他是诗人，行为得有诗意。结果他孤零零地坐在宾馆，觉得受到了抛弃和鄙薄。""天哪，我相信你说对了！"我丈夫惊叫起来。我们俩面面相觑，觉得的确可怕。"我想，德拉古廷不是故意不顺从康斯坦丁，"他说，"我猜他只是忘了他。他很清楚康斯坦丁并不健全，某种意义上他是被毁了，而且他害怕受感染。现在我理解了反犹太主义的另一个原因，许多原始的民族，肯定是接受了关于犹太思想有毒质素的暗示。他们只知道宗教的强化观点。他们在犹太人身上看到的是怀疑思想的折磨，分裂观点产生的效应。德拉古廷看到一个男人悲惨得如同患了病，受了穷，蒙了羞，根源也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在他身上为所欲为，尽管使之屈服的观点只是来自一个女人。难怪

他惊骇丧胆。好了，走吧，我们得去睡了。”

于是我们爬上吱嘎作响的楼梯，来到我们的房间。遇到个子娇小的匈牙利女服务员时，她正在储藏柜的蜡烛堆里翻寻什么，她仍然忙碌着。我们那天睡得不错，尽管我中途醒来一次，打开灯，看着五只老鼠沿着墙角线列队行进。早晨，许多甲虫认真观看我擦干用原始方式洗过的身体。但到处很清洁，无菌标准的清洁，原因当然是那位女服务员。她膝盖跪在地上，右手嗖嗖地用肥皂水擦洗着脆弱的地板。她左右晃着头，齿缝间半哼半吹着一段旋律。我们跟她道了早安，告诉她，一个漂亮女孩这么工作真是太努力啦。她笑呵呵地仰起头来，她前面的木板折断了巨大的一块，像片吐司一样。“是的，”康斯坦丁刚走出他的房间，“她是个好女孩，非常感性。昨晚她到我房间，语气很友好：‘啊，见到你真高兴，你身上带着让人觉得亲切的东西。你比大多数到这宾馆来的人都要文雅。我瞧着你病得很重，就给你带了点橙汁。’”

我们下楼，在大酒店外面吃了早餐，喝着咖啡，消磨漫长的时间，陶醉于风景。风景中最迷人的一道在于许多漂亮的小女孩。她们长着充分沐浴了阳光的黑发，精致的古铜色皮肤。她们奔跑的身体穿着最美的服饰，包括合身的外套和宽松的裤子，裤子在脚踝处束口，像是闪亮的窗帘面料剪裁的，质感优雅，不像东方的风格。这效果太显女权主义。小女孩就应是小女孩，是诗意情感的可能对象。但她的意志受到尊重，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跑和跳。我们将目光从她们身上移走，只是对酒店门口等候的几辆廉价车感到好奇，我们吃早餐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彼此显然都不认识，手里都握着柠檬，面色极其忧郁。“他们担心会晕车，”康斯坦丁解释，“所以吸柠檬汁来预防。他们会经由黑山去科拉辛，或者采蒂涅，或者波德戈里察，或者尼克什奇。他们只能乘坐巴士或小车去，整个黑山都没有铁路，地形太崎岖。”目光随着道路上行，便看见阻挡道路的岩石壁，地形崎岖显而易见。只有辛普朗隧道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通过那条隧道要花整整一天时间。“可怜的旅客们，”康斯坦丁接着说，“他们担心晕车，甚至死亡，这种担心并不多余。黑山人是英雄的民族，土耳其人走了之后他们也没什么展示英雄气概的地方，所以开起车来十分勇猛。黑山司机对待他的车就如同哥萨克骑兵或是牛仔对待他的马，老喜欢拿它逞能，显示自己的技巧和勇气。他还很为车祸中受的伤感到骄傲，好像是战争留下的伤疤一样。这观点好是好，但不适合乘客。没人能总结出一套程式，哲学的、美学的、宗教的……没有什么能让它适合乘客。然而必须有乘客，因为有司机。这个严重不和谐。”

正说着，一个穿着制服的瘦男人走到我们桌子这边。男人虽面带倦怠，但眉宇间透着刚毅，自我介绍说是佩奇的警长。他讲的是美式英语，因为在美国的中西部待了近二十年，充满了一种带有社会破坏性的情感，对我们

所有的情感伪装嗤之以鼻。这种情感没有名称，是思乡的反义，即对自己国家心生厌恶。“这里的一切对于我，就像对于你们一样陌生，”他抱怨，“他们叫我从美国回来当警长。因为我支持南斯拉夫，所以就听了他们的话，但是这是个错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里的人不会规矩守法，除非你逼迫他们；要想逼迫他们，就得凭外貌认识每个人。你信吗？每天傍晚我都得出来观察人群，就为了看他们都在干什么，然后记住谁是谁。你能想象在美国人们也这样做吗？”佩奇有将近一万四千个居民。从佩奇向南到普里兹伦的平原上，也就五十五英里左右的距离，在土耳其统治的时代，一年固定有六百桩行刺案件。我在这位绅士的命运上觉出些悲怆，他试图用个人的关注，去诱导那么多已被传统塑型的人做一个守规矩的巴比特式好市民。我丈夫说：“但你辖区的民众看起来都很不错。”我补充说：“小女孩们真的很可爱。”警长很吃惊：“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当然。”“噢，你们错了！”他大声说。“可是我们真的看到了最精致优雅的小女孩。”我正说着，康斯坦丁打断了我。“警长是黑山人，”他解释道，“如果你让他说的话，他想告诉你，只有街尽头的墙后面，上到黑山境内，才有真正不错的民众和真正可爱的小女孩。”“哦，我想，如果不是由这样的信仰造就的人，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职位。”我丈夫说。在警长完全依照康斯坦丁的预见，发表了他的言论后，我问：“主教座堂和德查尼修道院的修士们不是对民众影响很大吗？”他迷茫地看着我：“影响？怎么影响？”“啊，长久地影响，”我结巴起来，“修士们，你知道的。”他仍然疑惑地看着我。正在这时，一个警察走进来，行礼之后附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跳起来离开了我们，好像是一个母亲刚听说自己的两个孩子打架，伤到了他们自己。

“天气比以前热了。”我说。我们出了城，行驶在通往黑山的道路上。我们要去佩奇的主教座堂，那里和德查尼修道院差不多一样有名。

旅程让人惬意。房屋渐渐稀疏起来。草地铺青叠翠，向郁郁葱葱的丘陵延伸。河水清冽，在峡谷中奔流。“我可一点都不觉得热。”康斯坦丁说。“可是阳光很强烈啊。”我回答。“我觉得很弱。”康斯坦丁继续说。“不是吧，”我嚷起来，“我昨晚洗了晾在窗户上的长袜今早八点已经干透了。”他还没开始冷笑，我已经明白自己又犯傻了。“什么你都能找到证据。”他的脸沉重而肿胀，一半由于发烧，一半由于损人的欲望。格尔达让他相信，作为一名犹太人他是卑微的，他想让她所鄙视的其他人也显得卑微，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坠落，被消灭在这位金发碧眼女士的盲目意志里。我们三人一路沉默，直到抵达主教座堂。这座围墙中的建筑坐落于山麓之间的峡谷平地上，地势较低，河流之上峭壁林立。

穿过拱廊，我们进入一座乡间房屋样的建筑。它带着适宜的外部构造，堆着整齐的木垛，厨房菜园整洁有序，果园的树都刚浇灌过，以防枯萎。一

位年岁很高的修士像树干一样，褐色又干瘦。他对着我们微笑，但没有应答康斯坦丁的话，只领着我们经过林荫路来到一座绿树掩映的圆形喷泉边。我们以为他耳朵失聪，其实他是个俄罗斯人，在放逐至此的十七年间没有学过任何塞尔维亚语。他去叫修道院长的间隙里，德拉古廷出现在我们身边，履行着他的特别仪式，务必使我们从喷泉里饮水。“这水能治百病，”他说，“而且有基督的赐福。”他从车上带来了些平底玻璃杯，好让我们喝得更舒服。水的味道的确比一般的甘甜。

喝完水，我心满意足地环顾四周。这是一处富饶的小产业。房子不仅新建不久，维护得也很完善。客房后微微倾斜的平台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现代式样的蜂箱。将喷泉溢流导向溪流的石砌分流道全无杂草。我记起有本评价很高的书里记叙过关于主教座堂的描述，《斯拉夫各省漫游记》，作者是缪尔·麦肯齐小姐和厄比小姐，里面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描述充满真知灼见。尽管写于七十六年前，对现今的旅行者来讲，它仍然为一些在别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提供了解释。这两位女士在穆斯林阿尔巴尼亚士兵的护卫下到达这里，准备待一晚上，结果发现惊恐的修士们一反平时斯拉夫人或东正教教会热情好客的态度，竭力想打发他们离开。这些女士正像小说以外的许多维多利亚女性一样，有胆有识。她们让护卫离开房间，和修士们私下交谈，明白了这些可怜的人们被路过的一队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劫去了所有的粮食，唯恐新的入侵者因为食橱空空而迁怒于他们。为应对这个处境，女士们让她们的护卫不仅离开房间，而且离开修道院。她们上床之前仍不得不稍做耽搁，各个房间的跳蚤得先处理一下，通透的窗户得装上玻璃（士兵们离开后修士们才敢把玻璃拿出来）。中世纪缺乏舒适和安全，这对生活影响巨大。那情形和眼前的氛围完全背离，眼前的景象用苏格兰词语douce（意即安宁）能恰如其分地形容。是的，我们就身处一片为许多人所渴求的安宁之中。

院长仍然没有出现。我们看着喷泉上的雕刻来消磨时间。它们带着特别原始的气息，但其中一块上，呈现的是男人扛着比较现代的步枪。康斯坦丁变得紧张不安，于是我们带着他去看教堂。教堂位于我们右边，周围有胡桃、桑树和松树，其后是一片绿坡。“我对这座教堂有点偏见，”我们走向它的时候，我丈夫说，“曾有一位法国作家写到过它，‘她有着金发女郎柔嫩肌肤的颜色’。”我感到有些困惑：“亲爱的，你知道的比我想知道的还多。”“我强烈地感觉，”他解释，“他不应该再接着写另一句，‘她建在一块长方的岩石上，形状不规则’。读后形成的图像很难让人喜欢。”法国作家脑子里的东西真是显而易见。教堂的颜色的确是白皙女人的肤色，经历些许风霜，但并不严重，仅见于喉咙或手腕上方的部位；形状上看，它就是以弗所的戴安娜，多乳的女神。它是包含并排三座小教堂的建筑群，每座都带着穹顶和圆形的后殿，曲线如母亲般的柔和。走廊里很适宜地走出一群妇人，年岁已经摧毁了所有的青春韶华，她们已经过了适于交合生育的

时期，但在自己的性别里，她们仍然荣耀，因为所余的生命尽献于实质的目标，即生命的延续与和谐。她们的身材纤细而挺拔，像奥赫里德的老妇们，但缺乏那种贵族的，甚至是奢侈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承载着拜占庭辉煌过往的市镇里自然而生。她们可能更像罗马人，生于稳固共和时期的罗马。她们所有人都年长得足以忆起佩奇的不堪岁月，那时的土耳其人拼命煽动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仇视他们的基督教斯拉夫同胞，以至于每个塞尔维亚人的葬礼上都有人用石头和污物扔向尸体。但她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平静的尊严。我又想起缪尔·麦肯齐小姐和厄比小姐，她们对一位名叫凯特琳娜·斯米奇的佩奇女性印象极深。她丧夫，无子女，为女孩们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学校，在面对穆斯林顽固的敌意时，也不曾折损自己的勇气。她成为修女，仅仅是因为这样的身份更有利于她从事的民族主义工作。英国女人们对她的描述会让人想起一个伟大政治家宁和、睿智的个性。她的誓言并非不虔诚，在那些日子里，基督教义和斯拉夫民族主义几乎是统一无异的，哪怕以最关注精神层面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现在我眼前走出教堂的这群妇人，对待凯特琳娜·斯米奇的小学生们自然应该很友好，这群妇人有的甚至和凯特琳娜有着血缘关系。凯特琳娜看到她们会心生自豪。她应该觉得她们安静的炽热和机敏的尊严是自然而然的，那也是她的特质，她觉得斯拉夫的女性都是这样的。但她也会发现一些新时代的痕迹，并为此高兴，比如这群妇人的黑色波蕾若外套下的白色袖子。它们是用本地纺出的条纹丝绸制成，在凯特琳娜的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基督教妇女能够买得起，甚至做得起，因为蚕吃的桑叶超出了基督徒的经济承受能力。

我们进入走廊，走廊在三座教堂外形成了一个长厅。另两位老年妇女坐在沿围墙一周的石凳上，说着体己话，其中一位手里拿着从胡桃树上劈下来的树枝。她们的安逸、骄傲，以及见到有访客来时用胡桃枝比画的友好手势，都让人想起这些教堂的历史。

第一座是叫阿森纽斯的主教根据圣萨瓦的命令于13世纪初期修建的。圣萨瓦觉得，塞尔维亚大主教的座堂奇卡容易受到西方匈牙利人和东方鞑靼人的入侵，太危险，于是授意他在南方找一处更安全的庇护所。在这里，日益繁荣的塞尔维亚文明有了它的精神生活中心。当史蒂芬·杜尚不得不让他的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时，这里就成了主教座堂。为了满足它的地位重要性增长的需求，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又建了两座教堂。土耳其人占领时，塞尔维亚教会的独立性遭到了破坏。曾经一度，基督教斯拉夫人再次屈从于君士坦丁堡。但在16世纪发生了索科洛维奇兄弟的戏剧性情节。我们在格拉查尼察时已听说了。他们给教堂增加了大门廊。兄弟中其中一个被称为穆罕默德，小时候被土耳其人带走，成为土耳其士兵，后来升至内阁总理。他在这个位置上恢复了塞尔维亚国家教会，并让他的兄弟，修士马卡里乌斯，成为佩奇大主教，享有许多特权。了解像穆罕默德这样一个变节者是怎样被他人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时间和重复慢慢抹掉

罪行，直至它被理解为基督教自我保存的合理策略而被接受？还是人们仍然保留着对它原始的反感？马卡里乌斯应该在这条门廊上走过成千上万遍，他要么不悲不喜，已是暮光年岁，信仰在妥协的痂壳下早已灰白；要么相信他的兄弟会被地狱的烈火焚烧，那穆罕默德必然受到痛苦的困扰，即使穆罕默德没有坠入地狱之路，他也不能给教众派发面包红酒。但关于这两兄弟的内心世界并无记录。人类的编年史里记载的总是更简单、更讨人喜欢的经历。

无论如何，马卡里乌斯的工作干得很有效率。继他之后的多位主教也很能干，直到1690年大迁徙至多瑙河。那时，主教座堂迁至现在的卡洛瓦兹。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前去参观过，建筑已在紫丁香花丛中。但那并不是说教堂已经被遗弃，这里一直都在开展教会活动，哪怕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土耳其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基督崇拜的这种延续，其结果反倒是对基督教传承中最有价值部分的破坏，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威尼斯没有那么繁荣，没有在圣马可教堂已经完美之后几百年再对其重改、装饰，圣马可教堂会比现在漂亮得多。佩奇这三座教堂里，最精美的塞尔维亚——拜占庭壁画在近代被遮盖，取而代之的是些信神的琐物，都是农民们付钱买的，表达自己的感恩，为漫长的劳役岁月里得到的舒适感恩。现在像在奈热西一样，旧物从墙上被移走，所以看得到新旧并排陈列。我们再次学习了所谓的矛盾，最伟大的悲剧艺术就是这么产生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快乐的奥地利，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关注人类命运的黑暗转折；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市侩而堕落的奥地利，每天都上演着它自己甚至大舞台的厄运情节，却飘荡着华尔兹和轻歌剧的声浪。壁画按三百到四百年的历史分隔，连接的边缘有些残破。从壁画上看，尼曼雅王朝自由而幸运的臣民尚能对苦痛的奥秘冥思苦想，而饱受蹂躏的基督信徒只想考虑恩惠和漂亮。这种对比，鲜明地呈现于一幅迷人的壁画上。这幅画显然是受到我称为“土耳其摄政”时期画风的影响，描绘的是一些淡然、雅致的天使在桌子旁聚会，布置桌子的人显然有着时髦的快乐体验。画和妖艳的穆斯林布帘一起置于窗前，现在被毁得七零八碎，剥落下来。这是对人类和其母亲之间关系最醒目、最无情的揭示。

所有的这些早期壁画，绵亘两百年，画风各不同，但在其残忍性上却相似。天使们狂暴地席卷而来，圣神看起来像被猎获的小鸟。圣主显容日，众人无不骇然，似乎昭示着人们被物质世界完全欺骗，另有超越其上的人对他们进行掌控。其中一座教堂的穹顶上绘有万物统治者基督，他身着琥珀色的衣袍，头顶金色的光环，映衬在银色的背景下，囿于旋风般的天使间。如同一些伟大的音乐带给听觉的，这教堂带给视觉的，是对苦痛的痴迷，来自伟大的天赋、伟大的力量以及伟大的责任。有时候冷酷的核心掩饰在最优雅的慈悲里。一幅壁画描绘的是圣母用乳房喂养婴儿时的耶稣，三位妇女仰慕着他，两位天使在旁边静候。它让人想起杜乔[注]或季翁塔·

皮萨诺，但更文雅，带着意大利油画中非常少见的仙灵气息。画家好像是在对粗野和虚弱全然无知的世界里作画，或者至少是在禁止共同意识的世界里。可是，即便在这样的壁画里，仍然缺乏仁慈。婴儿耶稣不像个婴儿，倒更像个缩小的成人、微观的圣人和统治者。他成熟，不苟言笑，贪婪地吮吸他母亲的乳头，好像要吸尽最后一滴乳汁，却无一丝感恩的回报，尽管她的身体柔软地拥着他，保护着他，像熟透的水果果肉包着果核。尼曼雅王朝和都铎王朝极为相似。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知道，尽管伊丽莎白被称为“荣光女王”，英国荣耀无限，但在这个地球上，上帝对人类并不仁慈。

但所有壁画中，最无情的一幅是圣母和耶稣在天使茶会上的对视。它很吓人，其中的恐怖，让后来的艺术家们（比如鲁奥）的现实主义成了唱着童谣的小孩在育儿所和食人魔一起玩耍。魁伟的圣母如孩子眼中的母亲一样庞大，她把耶稣抱在怀里，要把他带去他不想去的地方。她庞大得简直不公平。圣母的手指抓牢耶稣，具有石匠的力量，十个指头就是十座高塔、十座灯台，附在巨大的掌心上。圣母的五官也是巨大的，就像所有成人的五官对于孩子的触觉而言。她显得异乎寻常地严厉，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危险的孩子们就会这样认识他们的母亲。她巨大的面庞上宣告的关爱和仁慈就像一支庞大的军队在确立自己的目标。在她的怀抱里，圣婴像个被束缚的小运动员，强健的大腿裸露在运动短裤之外，脸上充满怒光，表达着反叛——对这囚禁着他的仁慈，向往着逃至一个遥远而美妙的秘密目的地。耶稣无畏的头脑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谁是我的兄弟或是我的同胞？”“女人，我该拿你怎么办？”而且思考过他从这个世界听到的、关于他的某些令人苦恼的争论。

争论似乎仍然在继续。康斯坦丁背对着壁画，从口袋里掏出两封信，在车里他曾向我们提到过，信是早上收到的，分别来自格尔达和自己的母亲。他把两封都打开了，轮流盯着它们看。他好像有些发热，尽管教堂的影子在我们身边辟出一片清凉。“你挺担心她们的，”我说，“要么你就离开我们直接回贝尔格莱德的家去？”他抱怨似的回答：“可是如果我回去，就只得带着一个来写我们野蛮人的法国女记者到处逛，她下周就到。我不喜欢这些政治圈的法国女人，她们都一样，都像吉纳维芙·塔布伊和安德烈·维莉斯。她们满世界地走，对现实人做的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他抬头看着巨型圣母，上唇从牙齿上掀了一下以示轻蔑，然后眼睛离开圣母，忧虑地看向虚无。“女人该做什么我倒有其他想法。”他虚弱地说，好像已经十分疲劳。我们转而去看其他的壁画和主教们的大理石墓碑，他焦躁不安地跟着我们，一起走出教堂。

在外面我看见一位修士，我看出他应该是院长，因为他戴的猩红色宽边饰带显出了他的职位。他正站在一棵虬枝盘曲的坚果树下，和几位老妇说着

话。我们走进教堂时遇到过她们。这会儿我远远地看去，注意到了先前因为目光定格在她们颇具魅力的脸和雪白亮眼的衣袖上，而忽视了的其他东西：她们穿的不是裙子，而是深色的花布裤子，脚踝处是黑色的编织收口。这样的装束在女人们身上显得不协调。她们很可能曾是大学里的领导。她们和院长说话时带着迷人的崇敬神色，部分源自对他神职身份的尊重，部分源自对他独特适职性的认可。她们看他时，对他的英俊外貌有着宁和、纯洁的欣赏。他个头很高，肤色清透、白皙，深色的胡子呈波纹状，像英国博物馆中的亚述人。他身上的一切都在表达安静的力量和健康的状态。他必是给出了理由让她们舒心：她们关心的亲人、种族，一切安好。稍远的地方也站了个修士，外貌截然不同。这名修士个子特别矮，弯腰曲背，背几乎驼了。他长长的头发和胡须闪着合唱团女孩身上那种金色光泽。院长抬头看见我从教堂里走出来，后面紧跟着我丈夫和康斯坦丁。他走向我们，欢迎的微笑和尴尬的手势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矮个子的金发修士也加入了我们中间。他看见我们很高兴。他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塞族人，知道康斯坦丁的名字，不论如何，东正教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他有所继承，然而他有点拘束。和我们寒暄过后，他向我们介绍矮个子的金发修士，说："这是德查尼修道院的兄弟，过来帮我完成今早的特别仪式。恐怕他得马上告辞，否则就赶不上回程的汽车了。"

但小个子向前凑了一下，带着舞剧中的小孩那种紧张充沛的活力，冲着我们摇摇手指，用一种奇怪的德语大声说："我知道你们在怎么想我！"这样的开场白出自一个外形如此特别的人之口，实在让人非常尴尬。但他立即接着说，笑声惊人："你们在想，'他皮肤真白啊！他怎么会这么白，一个南斯拉夫人？白得像个德国人！'"我们当然没想这个，许多斯拉夫人，尤其是波斯尼亚人，比德国人还白，白得像斯堪的纳维亚人。让我吃惊的倒是他的头发，特别刺眼的颜色。"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其中的奥妙，"他吃吃地笑，"我是个克罗地亚人，是的，来自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但是我母亲，我至爱至善的母亲，她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纯正德国人，是她给了我一头金色的头发！"他的小拳头把垂在后背的卷头发向前捋了捋，头发遮住了眼睛，和胡子搅在一起。"我小时候走在街上，人们总是停下来说，'这白得像天使一样的孩子是谁啊？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德国小孩'。我母亲会说，'是个德裔小孩，但不是德国小孩'。"

这人在阵发性的笑声里有些眩晕。院长又说："你不快点的话，会赶不上汽车了。""是的，是的，"小男人叫着，"我不能错过车，我得接待来德查尼的所有贵宾。我跟他们说我的母语，优美的德语。今天下午我得接待一位意大利将军，还有他的妻子，是位公主。明天早上我得接待一位教授，他是法国最好的大学的校长。他们由我带着参观，其他修士不懂德语，只有我讲德语。""坐车。"院长又说。"哦，太遗憾了，我必须走了！好吧，再见，再见，再见！"他迈着小碎步从我们身边跑开，扭过肩膀以及像波

浪一样展开的胳膊，回头再冲我们笑了一笑，像过时的仙后在舞台上谢幕。

院长摘下高顶的帽子，吹了吹，又戴回去，显然感觉好多了。这是个奇怪的动作，但我们对他的感受心知肚明，颇有点同情。他因这段匪夷所思的插曲而感到折磨，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他本来就是位乡间的绅士。那也是他成为这里的院长的原因。他的职责是恢复主教座堂的秩序和感召力，让佩奇的基督徒明白，他们的上帝希望他们在顺境中，当他们无须殉道的时候，他们该怎样生活。在这方面他的功绩令人钦佩，修道院对农业保持着虔诚面貌。这样的面貌见于许多法国的和一些英国的农场和商品菜园。我认为壁画对他并没有太多意义，但他饶有兴味地说起伯纳德·贝伦森(注)和加布里埃尔·米勒为了观看壁画专程到访。他完全理解人们对于技艺的情感，他也知道，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工作驾轻就熟。他热情地回忆起和贝伦森先生一起时的愉快会面，说他长相英俊，举止优雅。“他就像个王子！”他说，“白色的头发，纤细的手，修长的身材。他的衣服都那么干净整齐。他像是从大皇宫里走出来的。我希望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他的照片。”

他带我们上楼，去了他的会客室，那里温馨而整洁。我们一边喝着香醇的咖啡，吃着一勺勺晶莹剔透的柑橘果酱，一边听他讲述他的工作以及这个地方。是的，感觉美妙，尽管冬天从黑山来的寒风凛冽地刮过山谷，遍地积雪。这片土地很富饶，尽管这座修道院不如德查尼那么富有。他觉得在这里劳作的人们确实非常友好，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我们再次注意到，现在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怀有好感，尽管在土耳其占领时期，后者经常折磨前者。他接着说，他的教众非常善良、虔诚，步行数里路来参加仪式。然而，院长刚刚让我们确信他对这片地区十分满意后，他那如奶油一般温和的英俊面庞却蒙上了一层困惑和恼怒的阴云，神色黯淡。他深色的眉头在饱满的前额下皱在一起。他的眼睛，明亮如泥炭色的溪流，好像看着不远处的什么让人不那么舒服的东西，也许是佩奇的主干道。它在他的眼里全无陌生的魅力，对于可能通过这里的交通工具来说，它都显得过于宽阔。沿路排列的电线杆毫无价值，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有用的信息。

本来那天下午我们应该去德查尼的，但是午饭时康斯坦丁再度发烧。于是他给院长打了电话，安排我们第二天早上再去。我们把康斯坦丁送回床上，自己也想睡一会儿，我们也都快累死了。但我发现自己很难入睡。因为只要我的大脑没有专注于新的见闻，便会被旧的回忆侵袭，关于过去两月我见到的、听到的重大事件的回忆：克罗地亚灵魂在斯拉夫自我和西方影响中的挣扎；流亡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乌斯科克人被非法化；弗朗茨·斐迪南、索菲·霍泰克、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的殉难；奥布伦诺维奇和卡

拉乔治维奇的家族冲突；马其顿基督教教会的神奇实践；圣乔治前夕的仪式；格拉查尼察的辉煌和科索沃的自杀；特浦加崇高的努力以及格尔达的虚无主义。人类精神范围的所有努力被要求搁置一旁，宇宙万力被要求指向一个目标——让自己塞满属于其他的任何物质。最后我终于睡着，做了个忧心的梦，梦中我确定无疑地相信，蜇到康斯坦丁的手的，无疑是他的妻子。她不想让他再写诗了，因为他是像海涅一样的犹太人。

在我们鞋子之间上蹿下跳的老鼠惊醒了我和丈夫。于是我们不睡了，去山上散步，眺望河对岸的主教座堂。它掩映在欣欣向荣的树木之间，脚下的草地上灰紫色和蓝色的花缠绕而生。我们遇见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上身赤裸，拿着一件亮蓝色的衬衫和湿漉漉的浴衣。他仔细地看着我们，然后转身，我问他可不可以和我们一道散步，向我们介绍其中一个隐士的洞穴。这片地区的隐士洞穴不计其数，多得城市都以其命名——“佩奇”就是洞穴的古词。这位小伙子说英语时带着教学腔，据他说是儿时在美国学的。他去那里拜访一位叔叔。“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光着上身就朝你们走过来了，”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充分相信，你们是清除了头脑里所有有害偏见的人。你们思想开明，能接受健康的理念，比如日光浴。”“你怎么知道？”我丈夫问。“昨晚你们在宾馆外吃饭时我看着你们呢，”小伙子说，“所以我可以肯定。”“可是，我们吃饭时做了什么让你相信我们是支持日光浴的？”我丈夫追问。“你对你太太非常有礼貌，”年轻人说，“这证明你已经克服了自己压制异性的动物本能，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她通过生育，与男性通过自己的特征性行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样多。你们交谈起来心无旁骛，这证明你已经将她提升到和你一样的智力水平。昨天，我回家让我妻子过来看看你们，将你们作为榜样，因为她是这种类型的人，有时候却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这么前卫。她早期的环境总是拖累着她。她很漂亮，也很善良，她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特别气质。除了你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你们的样貌看起来也像有教养的人。你们一定读过许多书。你们喜欢读哪类书呢？为什么喜欢那一类？”

面对问这些问题的人，我丈夫觉得自己像牧羊人在面对羔羊。他没有问自己是否更愿意独自思考，或是和与自己相似的同伴共度时光。他完全忘却了自己，只感觉这是个对社会有价值的群体，珍惜着里面每一个成员。我们一起在山坡上散步，我丈夫一直和这小伙子讨论着书。山上覆盖着葱绿的冷杉，遮天蔽日，让春天姗姗来迟。我们穿过繁花竞放的草地，穿过一片断垣残壁，蛇在铁杉和藜芦间蜿蜒而行。我们来到一座水库，水冰凉透骨，这就是小伙子刚才日光浴的地方。然后，我们沿着青草坡上行至洞穴处。洞里，中世纪隐士绘的圣像还散发着微微的光泽。我们听到有叫声的回响，它可能会让人以为是痛苦的灵魂在哀号，如果不是绕过后角可见远处牛儿们像敲钟索一般的尾巴。不远处的草地上，一棵金合欢树洒下的阴影里，坐着一位阿尔巴尼亚老人。他明亮的双眼和笑容像冒着泡的泉水那

样清新。我们觉得他肯定选的是一处最佳的休息位置，于是就在他旁边坐下来。

小伙子和我丈夫说笑着，其中一个笑话着实有趣，小伙子笑得在地上滚了几圈，然后想起什么似的，爬起来，不乏优越感地说："阿尔巴尼亚人是个天生具有智慧的民族，但他们的社会却一点也不先进。"随后又谈起书来。他的兴趣尤见于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他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事实上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识兴趣，比大多数自称该名号的南斯拉夫人强得多。他们多数只不过是国家与城市间长久对抗的拥护者，更倾向于与威廉·莫里斯(注)而不是马克思产生共鸣。但这个小伙子读过《资本论》，带着强硬的批判性思维。我丈夫向他复述了一些H. W. B.约瑟夫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书里最有意思的段落。他不顾自己的信仰，笑得前仰后合，躺在地上，正如刚才听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笑话一样。"写那本书的人是谁？"他问，"他的思维一定很精彩，当然实质上是草率的。你们认识他吗？""他有全世界最细致的一套思维，"我丈夫说，"他是我在牛津的哲学导师。""噢，"小伙子叫道，"如果我有你们这些优越条件，能做多少事啊！"他坐起来，手托着下巴，闷闷不乐地俯视山谷，然后一丝光亮闪过他的双眼。他转向我丈夫："我在城里听他们说，你们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来，和特浦加矿场的人是很好的朋友。你们能不能帮我写封信给麦克先生，让他给我份工作？我在这里没什么事可做。我帮着我父亲打理他的旅馆，但这些工作也不够我们两人忙的。我在这里做事有点儿浪费，我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我都哭了，因为佩奇没有我做的事。"

下去吃晚饭前，我们去康斯坦丁的房间看他的烧退得怎么样了。在楼梯平台我们又见到那位女服务员，在熨烫成堆的床单，就像头一天晚上那样。但这次她静静地在流眼泪。我问康斯坦丁："你的小仰慕者正哭得伤心呢，你对她不好了吗？"他回答："不是的。她告诉了我她伤心的原因，可比我重要多了。女服务员给我端橘汁进来，坐在我床边，说：'我应该很开心，这里付给我的薪水很不错。他们很清楚宾馆正慢慢地散架，如果没有我在这里洗地板、擦床垫的话，老鼠、虫子早就爬得满屋都是了。但有时候我就是受不了这生活。'我对她说：'你受不了什么呢，小东西？'她回答：'死亡，它让我很生气。三天前这里有个男人去世，他很有钱，在城里官做得很大。首相来这里的时候他也是接待成员。他戴着一顶高帽子，就像布达佩斯的先生们戴的那种。我挺熟悉他，他是个骄傲、有权力的人，脑子里装的事可多了。三天前他死了。昨天他们抬着他的灵柩走过街道，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具快要腐臭的尸体，会变成垃圾，脏东西！'然后她就开始哭，于是我说：'你爱他吗，小东西？'她回答：'不，一点也不，让我生气的是，死亡有这样的威力。头一天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第二天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应该是这样。啊，我太生气了，我想和死亡对战，杀了它。'她就坐在那里，一直哭，我觉得她说的是实话。她并不爱这个男人，

只是被死亡的念头激怒。因为她哭起来像个受辱的女人，而不像个受伤的女人。然后她说：‘我得去熨床单了。’捶了一下我的枕头，离开了我。”我们出门走到楼梯平台时，她暂时搁下了手里的任务。一支忽明忽暗的蜡烛立在弄皱的熨毯上，在洗皱的床单和熨平的床单之间。我们经过时，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投下了巨大的影子。

我们坐在餐馆里时，一位旅者来到我们桌边，衣着打扮像我们在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附近的路上看到的祷告者。他看起来彬彬有礼。我们邀请他和我们一道进餐。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因为他想愉快地谈谈他的住地，他的记忆把亚伯丁进行了一番修饰，糅合了狂欢节的威尼斯和新耶路撒冷。他的混乱记忆像是一种古老的“炼金术”：人性在反应过程中软化了那座城市憔悴的俊美，将温柔注入祖国的血脉中，与它冷酷的活力相融合。旅人充满柔情地说起他在英国遇到的许多人，尤其是其中一位女性。通过他充满柔情的讲述，我们对这位女性肃然起敬。这位女性曾发起一个计划，将塞尔维亚的难民男孩安排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家庭和学校里，还经常前去探望他们，看他们过得怎么样。后来，她将他们作为个体来进行关注的态度让他们深感意外。“她就像一位长者，像一位祖母，”他说，“许多人都喜欢小孩，喜欢年轻人，就像喜欢狗或马一样。之后发生的事倒是更重要。知道吗，去年她来到这里，说自己已经很老了，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她想知道她的男孩儿们怎么样了。于是她走遍全国把我们找出来。我们一切顺利，她非常高兴。在我家时，她和我的妻子一起喝茶，也见了我的孩子们。她坐下来，点了点头，说：‘这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再好也不过如此。我回家会经常想起这一切的。’她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些男孩子，是因为我们本身，而不是因为我们是男孩子。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好。”我们也的确觉得这是来自天堂的善行，让人们充满希望：人世不必总是人世的样子。

“我一直为曾在英国待过感到幸运，”他继续说，“我学习了利落有序地做事，在规定时间完成，这里并不这样，它让我在生意上获得了成功。并不是非常成功，我不是一只鹰；但我拥有了我想要的所有东西，比我童年时期对自己的期待好得多，而且我给了我妻子一个舒适的家，她过得很好。我的孩子们也身体强健，教养良好。我很高兴自己回到了南斯拉夫，这是个最美的国家。”他问我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那些修道院，为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塞尔维亚修道院——贝尔格莱德南面的山谷里那些——而感到遗憾，但很高兴我们去过圣南姆和弗鲁什卡·格拉。“你怎么这么熟悉这些修道院呢？”我丈夫问，“你出差途中又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参观。”“其实我一点时间都没有，”他回答，“但我是贝尔格莱德一家社团的成员。每当有节假日的时候，比如复活节或者圣神降临周，我们这些成员就租下几辆大游览车，带着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开到某个修道院，待上两三天。这是一种很棒的度假方式，让我们更贴近教会，哪怕我们不喜欢主教们的所为，

或者忘记了去贝尔格莱德参加仪式。它让我们想起国家的历史。这些地方美得惊人，还有许多和善的修士，和他们见面非常愉快。”我忍不住想起英国坎特伯雷，或是格洛斯特，被公众假期的人潮入侵的景象。人们在附近野餐、唱歌、跳舞、喝酒，时不时地闯入大教堂，热忱地参加仪式，想出来时又冲了出来，并和主持牧师以及其他神职人员自由无羁地交谈。想象力创造不出这幅图景。英国国教教会用如此高的代价呈现出这些仪式，去想象剥夺它们的购买市场，这不适当。“我很高兴，”我们的朋友接着说，“你们要去看德查尼。它是最漂亮的修道院之一。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年复活节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为它的华美惊叹不已。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这片土地在尼曼雅时代是什么样的。”“德查尼对这座城市影响很大吗？”我问。“似乎不大，”旅者回答，“这是座可怜的城市，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不好，佩奇的塞尔维亚人总是以性格和智慧著称的，而是因为这里从来都没发生过什么。他们说，每个月有相当于两三千英镑的第纳尔作为战争补贴和酬劳付给城市，人们主要就以那个为生。一年按人头也就是两镑多一点的补贴。你知道，在土耳其时代，它是前线市镇，那意味着很多钱，雇佣军队也好，为军队提供物资也好，走私也好。人们很有兴趣去维护他们的信仰，反抗迫害，但现在他们需要新的事物。”

旅人早早地就告辞了，因为明天黎明时他要开始向南行进。他走之前，先为我们做了番仪式，像炼金术士做的那种。总的来说，他是个值得钦佩的人。几乎是立即地，他的位置就被一个不那么值得钦佩的人代替了，那个像德国人一样说德语的丹麦人。“晚上好，”他说，“我想，你们明天会去采蒂涅？”“不。”我丈夫说。“但你们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是做什么呢？”丹麦人固执地问。“我们是游客。”我丈夫说。“可是这里没什么可让游客待一天以上的！”丹麦人以恼怒的音调呼喊。“我们还没看到德查尼。”我丈夫说。“但你们应该上午看德查尼，下午看主教座堂！”丹麦人凶巴巴地大声说。“你在佩奇做什么？”我丈夫问。丹麦人显然觉得这是一个无礼的问题。“我做农业机械。”他冷冷地回答，好像是告诉我们这不关我们的事。“我想你会在这里待几周。”我丈夫说。“你为什么说几周呢？”丹麦人说。“哦，那你觉得我应该说几天？几月？还是几年？”我丈夫回答。丹麦人一脸不快地回到他自己的桌子边，开始研究一份德国报纸。

---

1. 杜乔·迪·博宁塞纳（Duccio di Buoninsegna, 1260—1318），意大利画家，锡耶纳画派创始人。

2. 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 1865—1959），美国艺术史学家，代表作有《佛罗伦萨画家作品集》。

3.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19世纪英国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

佩奇II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酒店外吃早餐时跟康斯坦丁说起昨天遇到的那个可疑的人。“显然他是个德国特工，”他说，“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了。我可以肯定，在圣南姆那个穿灯笼裤的小个子也是德国特工。但我想不出这里能发生什么，这里不是重要的地方。在马其顿，德国人经常跟保加利亚人找麻烦，那儿倒值得德国人费神。但这里只有阿尔巴尼亚人，不值得任何人去费心挑动他们。”天气渐热，多日无雨。一阵风从峡谷尽头的岩壁吹下来，冷不防的寒意直入肌肤，也将高街来的一层暖尘吹进我们的牙齿，吹进我们的眼睛。轻微的不适激起了康斯坦丁一直以来的心神不宁，他带着狰狞的笑容转向我们。“是的，德国人是个可怕的民族，”他冷笑，“他们雇了些秘密特工来为他们在国外的利益服务。我想英国人从来不这么干，在俄罗斯，在印度，都不这么干。”“我们当然也用秘密特工，像其他各个国家一样，”我丈夫说，“有时候用得合理正当，有时候不那么合理正当，这也像其他各个国家一样。让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男人是秘密特工的事实本身，而是他从事自己的行业太缺乏谨慎了。我们只需要向你描述他的行为你就可以判定他是秘密特工。”“是啊，”康斯坦丁尖声说，攥紧了拳头，“英国人冷静、尊贵，从来不会干傻事；德国人是小丑，总是出自己的洋相。但这里面也有玄妙啊，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就受到佑护，德国人就受到诅咒。”他说话的语气像个冒充内行的人，其实内心也是一团乱麻。他用了斯拉夫人精神领域的词汇，为失败和羞辱惶惶不安，以此让自己对他的德国妻子的效忠显得合理。他妻子格尔达对英国人并无好感。康斯坦丁对英国人的推崇，在格尔达看来，证明了他的斯拉夫自卑。康斯坦丁说话时的腔调暴露出自己的虚伪，尽管他还在佯装。

但我们一上路去德查尼，康斯坦丁又做回了他自己，因为路上的风景优美。我已经说过，佩奇的位置处在北来的山墙和南来的山墙未能相连的错开点。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至佩奇的路，位于北来的群山之下；从佩奇至德查尼的路，位于南来的群山之下，穿过灌溉和荫蔽良好的乡间，因而一片葱绿，好像是从湿润的基底里冒出来的盎然生机。山坡上的森林覆盖密实，高耸的大树托起优美的树叶冠盖。道路左边有延伸的平原，就是我们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的来路上看到的那片平原，水美地肥，如同英国的佩维希河谷。沃腴的田野里，劳动者在紧凑的队组里劳作，他们看起来像穿着白色褶裙的芭蕾舞团。村庄里，妇女们围着喷泉，说着闲话，姿态高贵雍容，如同壁画里的皇后。但我们路过的那些房子，却讲述着骇人听闻的故事。狭窄的窗户装得很高，因此子弹可以从里面射出来，却不能从外面射进去。墙上弹痕密布。我记得曾经读到过，在这条路上有两栋房子，并排而立，是1909年一桩愚蠢悲剧的发生地。一栋房子里住着的男

人杀害了另一栋房子里住着的一家四个男人。凶手不得不逃跑。这很自然。不自然的是，如同西方文明中某些陋习一样压制人性的，凶手家里其他十三个男人，虽然和这桩罪行毫无瓜葛，也不得不逃跑。否则，在土耳其统治下不受制止而盛行的氏族仇杀，会把他们卷入一场屠杀里，在其中，每个人都会有谋杀之罪，自己也会成为谋杀的受害者。1919年，在南斯拉夫的统治下，罪犯被逮捕。他无辜的亲戚们得到了旁边房子里居住人的同意，得以回家，其实他的邻居们也一样渴望着从氏族仇杀中被解放出来。

秩序很重要，当我们走过一片小树林时，我又想起了这一点。土耳其人热爱任何不需要精心维护的美，所以他们选了这里作为墓园。七十多年前，缪尔·麦肯齐小姐和厄比小姐从主教座堂来这里参观。肯定也是在这片小树林里，饱受蹂躏的德查尼修士们在等待，希望可以恳求女士们，不要将她们的土耳其卫兵带进修道院。修士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珍宝、他们神坛的圣洁，早已疲惫不堪。缪尔·麦肯齐小姐和厄比小姐不得不拿出她们极大的魄力，哪怕只是潦草地涂画字条显示她们掌握的神奇书写艺术。于是，她们叫退了卫兵（这些人在修道院里必然会“大肆作为”一番）。现在，小树林里一片空荡，只有一个像女孩般漂亮的阿尔巴尼亚牧童，坐在那里吹笛子。他的羊群在树干和墓地的石碑之间啃着草，他身上也像它们一样光影斑驳。

我们在德查尼。越过宽广整齐的农田，我们看到苏格兰高地那样的河谷。它的背景是山，近处的山峰之后显出远处的雪顶，数里之外，超越了阿尔巴尼亚的疆界。近点的山在低坡处呈祖母绿，之上便是亮绿色，山上种的是山毛榉和酸橙，种着松树的地方像用暗黑的羽毛覆盖着一样。河谷入口处便是修道院的白色长方形地带。这座修道院比我们曾见过的都大，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也能看出它的独特。它是一块珍宝。我们沿着支路走近它时，看到它是无法破坏的。但在这一刻，它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被破坏的状态。现在这里布满了脚手架，修建者们把强有力的有感染性的无序状态以有害的补偿方式散布到了他们所修建的对象上。但当我们跨过厚板坡道——这是眼下修道院的唯一入口——在庭院中的壕沟和碎石堆之间择路而行时，发现我们来看的，显然是一颗建筑史上的珍珠。它有珍珠的统一性，也有它的生动质地，甚至有它的色彩，因为建筑用的是大块的白色、灰色和玫瑰色大理石，它们在眼里融合成为柔和的灰白光泽。

然而，碰巧我对珍珠不太能欣赏；我也不喜欢德查尼。它代表基督教建筑阶段的灵感时刻。那时亚美尼亚的影响与拜占庭以及伦巴第流派融合，许多法国教堂体现了这种融合的优点。宗教兼容性是尼曼雅时期的特征。史蒂芬·德钱斯基雇请了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建筑师——也是一位方济会修士——来修建这个国度主要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引人注目的基础。和西

方教会的这一接触，使德查尼吸收了新的元素，让习惯于拜占庭标准的眼睛，比如这时候我的眼睛，蓦然一惊，觉得它是温和的，不纯粹的。在罗马天主教信仰中，它常常代表着不同的人类行为间的隔阂已经消除，给膜拜者带来宗教欲望的合适满足，这种满足通常只能在性的层面，或是依靠实施权力，或是享受尊重，才能得到。于是教会总是通过艺术、仪式或者教理来谈及性乐、浮华以及尊重。在我看来，德查尼把这三点都谈及了。格拉查尼察是为那些来教堂时彻底摆脱性欲的人们修建的，他们已经从与社会间关系的角度对自己的诉求进行了判定，并将性欲断绝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被分配了自己的位置，并在限度内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明白，要想赢得周围人的尊重，他们必须做一个好的士兵、好的学者或好的工匠。但是，德查尼却可能是为那些受到压抑、耽于淫欲的人修建的。他们对能力所持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标准，对美德的标准也是负面的，因为社会中的荣誉地位，都可以仅仅通过不断拥有物质财富来获取。教堂精美，却缺乏朴素之气，显得浮夸。

此刻，无论如何也很难给它应有的尊重，尽管脚手架也难掩其美。我们穿过的壕沟和碎石堆，呈现出的样子比应有的更加杂乱，好像是人们出于对这个地方的自豪，不屑于去整理似的。有几个年轻的修士瞪眼望着我们。他们是神学院的学生，像粗人一样蓬头垢面。他们身上的衣服肮脏而疏于打理。其中一个学生身上的法衣胸口处没有扣子，衣缝中透出里面仍然没有扣子的衬衫，从衬衫里冒出一簇黯淡无光的胸毛。修士因为沉浸于宗教生活而脱离了对肉体的关注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些年轻人懒散的面孔，因为倦怠而显得有些浮肿，表明他们的邋遢和精神专注无关。他们如此只是由于脱离了农民家庭的束缚，又没有受到其他纪律的规约。我们继续参观教堂的外观。他们只是安静地尾随其后。忽然，从后面角落冒出来那个金发的小个子修士，就是头一天我们在主教座堂遇见的那位。

“你们还记得昨天见过我吗？”他叫着，拍着双手，做了个动作，尽管有点缩手缩脚，也不十分灵活，仍然表现出对芭蕾舞的感觉。“我就是那个你们以为是德国人的修士。因为我长得白，我告诉你们我既是德国人又不是德国人！喃，我就在这里。我跟你们说，我接待所有的访客，因为只有我懂德语，其他人不懂。”他继续对自己的民族魅力和个人魅力扬扬自得，我们却性急地想继续我们的参观。这时，一个看起来仪表堂堂的年长修士，走出来厌烦地制止了他。年长修士好像是被派来招呼我们马上去吃午饭的，因为修道院院长午后要赶紧出门，不能耽搁。金发修士立即说：“那正是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可他们谁也不能很好地听懂德语。”我们走进修道院，建筑将庭院三面围合。我们被带到餐厅，院长和四五个修士坐在桌边。院长中年样貌，头发乌黑，同样乌黑的胡须蜷曲而密实。他用流利而不十分标准的法语招呼我们，用一杯拉基亚果酒遥祝我们的英国国王身体健康。我们咽下酒后，我丈夫简短、得体地发了言，提议为我们女

王的健康干一杯。吃饭之前，我们得为大多数皇室成员干杯。幸运的是，他还不知道玛格丽特·罗斯公主的存在。

气氛倒也不沉闷。院长是个有学识的人，除了讲得一般的法语之外，他还能说俄语、希腊语、土耳其语。他讲话带着活力。所有的修士，除了其中一张东方面孔，黄色的脸上不着任何表情痕迹，其余的人都专注于他的话，时而插一句活跃气氛的评论。最新的语言在女生的寄宿学校饭桌上也会使用，但它们也不会因此就不合时宜。这修道院也很容易被命名为圣希尔达或者圣威妮弗蕾德。最能侃的修士体态略胖，肤色偏黑，举止热情，像极了许多艺术家女主人。尽管氛围轻松而且相当单纯，我们这顿饭吃得却不算十分惬意。饭菜下的桌布比我在任何一家巴尔干旅店里看到的都更脏，饭菜的数量和质量也很不体面。那天星期五，是斋戒日，因为这个原因，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麦汤，一份炖煮的牛油豆，一份土豆泥配洋葱酱，一份非常油腻的菠菜炖沙丁鱼和一摊混合着炸土豆的米饭。每道菜给我们的量都相当于整餐的量，每道菜都烧得毫无厨艺。这份菜单完全无视人类脆弱的消化系统。这让我想起在《上帝之城》里提到的，圣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朋友能够用不寻常的方式制造歌唱效果。

这里的人们，对食物以外的其他事物也缺乏洞察。院长礼貌地提及了缪尔·麦肯齐小姐和厄比小姐以及她们对到访德查尼的描述。作为礼貌的回应，我们说起了过去几年间来到这座修道院的外国人。康斯坦丁从贝尔格莱德送过来不少，其中几个我也认识。我们发现没有哪个给院长留下丁点儿印象。他记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人的任何事，不论他们的国籍、阶层或职业如何，都没有引起院长的兴趣。他不记得英国的一位部长，法国的一位非常杰出、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外交官，美国的一位学者和意大利的一位哲学家，这些人都是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起初我们猜想，这些人可能是在他任职之前来参观修道院的，但确认日期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也许人们会反对，没有理由非要一个著名宗教机构的领导，关注随意到访的外国游客。但他忽略的人群中有一个荷兰艺术家，也是东方教会一个神秘而虔诚的成员。

在午餐继续进行时，我们明白了真相。其实西方的一切对他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不幸的历史事件，任何地方的任何事对他来说，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的谈话用语表明，他的脸转向了东方，对于一个在巴尔干战争前听命于人的东正教神父来说，这很自然。因为他的家园成了土耳其领地，承诺改变这一切的是沙俄，他无意去观察新的土耳其。他因此陷入孤立的偏狭状态。只有灵魂天赋造成的转变，才能让人接受这样的状态。但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原因如此。他说起斯托亚迪诺维奇，设计用宗派协约来安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牧师，这协约让罗马天主教会不公平地占了东正教教会的便宜。他使用的语言仿佛出于政客之口，并无仁慈或隐忍的调和。

他说起在修道院农场干活，以及在附近居住的黑山人时，带着不加掩饰的敌意，全无在这个被种族仇恨所蹂躏的国家里，牧师们通常所具有的审慎。他的话里或他的自然状态里没有任何改变自然人或他的国家的建设性意图，说话效果无异于喋喋不休地催人昏睡，折磨耳朵，损伤心脏。

“有意思，”康斯坦丁说，“黄色面孔的那个人，安安静静的，也不笑。他是一个土耳其男人和一个塞尔维亚女人的儿子。他母亲似乎很爱他父亲，他父亲死时他母亲悲痛欲绝，守寡后就和儿子愉快地继续生活下去。但他母亲去世之前生了很长时间的病，经常意识模糊，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发现母亲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不是基督徒这件事倍感痛心，于是他答应母亲去做一名修士。这样，母亲才安心地离世。”不难理解这位修士为什么不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人非要迫使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困于这间小房子，聆听这些琐碎话，方能安心离世。

但教堂毕竟是教堂。院长一离开，我们就走回了教堂。教堂内部比外部漂亮得多，因为塞尔维亚天才没有委托外国人来将它打造成绝世神作，而是据其本身进行修建的。尽管教堂是由史蒂芬·德钱斯基建造，壁画及陈设却是由他儿子史蒂芬·杜尚负责，这些进一步证明了杜尚主政时期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相似性。在各个时代都存在国家扩张和创造性艺术兴盛的契合。灵和肉在共同的美感中得到渲染。这里有几幅皇室肖像，也闪耀着类似于都铎时代的奕奕神采。其中一幅显然是史蒂芬·杜尚本人。他身形魁梧，精神矍铄，让人易于相信，正如他的编年史作者描述的那样，他有时会声如洪钟，笑得地动山摇。人们也易于想象，他在他的人民心目中，就等于伊丽莎白在英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杜尚如同一眼丰腴之泉，用富饶浇灌着他的土地。那时令人咋舌的丰腴程度，可以通过一幅描绘殉道场景的壁画里的鲜明对比来证明。一个行刑者等着将圣芭芭拉斩首，他的脚呈舞蹈姿势，长长的手指在试他的刀锋。他的头上戴着黄色的高帽，高达几英尺；他的斗篷是玫瑰色的；长袍是绿色的。他的受刑者在他面前弓着腰，玫瑰色配金色的斗篷包裹在蓝色的衣袍外。她也站成了舞蹈姿势。他们正表演着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著名的舞蹈与反舞蹈。这幅壁画聚集了奢华的生活经历。他的画家见过各种织物浸在各种染料里。他再现出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能以最体面的方式对待最凶恶的公务人员，自然对自己的荣誉确信不疑。他的同类人超越了社会必需的层面，因此有充分的闲适，可以审度他们不可思议的内心。

可我却不能如自己所愿地观看这些壁画，因为周围有个金发小修士又跑又跳。他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说得久了，越说我们越觉得他的言语不合时宜，让我们越来越心生怒气。我们一进来时，对塞尔维亚的历史和历史纪念物充满真挚激情的康斯坦丁，就带我们去看了圣幛前大理石墓地上的棺材。里面躺着史蒂芬·德钱斯基，面具覆脸，丝绸裹身。他还带我们看了教

堂的其他遗迹。但现在，烦人的小修士想再带我去把它们重新看一遍。我用目光搜寻康斯坦丁和我丈夫，却不见踪迹。我想去找他们，但小修士跑在我前面。于是我决定站在原地等着他们回来。我不得不再一次寻找那支巨型蜡烛，是死于科索沃的拉扎尔大公的遗孀赠给修道院的，并指示修道院，只有在雪耻报仇之日才能点燃这支蜡烛。在1913年，国王彼得·卡拉乔治维奇适时地点燃了蜡烛。我的眼睛扫视着这里的奇迹，比如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画上是殉道的圣乔治，一位俊美的男子，带着尘世所有的卓越气度。他既无动作也无语言，他是谋杀的受害者。两名主教和一个像复仇女神一样的天使弯下身体，用一股神力，像磁铁吸力一样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不含爱意的神力，将他起死回生。“你没在听我说话！”小修士叫起来，“你为什么不听我说话？”“我听着呢。”我说。

但他知道我没有。他刚才在告诉我关于他兄弟的故事，显然要求我做出同情的表示。如果我在听的话，肯定会做出这样的回应。“恐怕我听不懂德语。”我只得这么说。“你的德语够用了，”他回答，“只是因为你没专心听。我会从头再说一遍。”我看见我丈夫走回了教堂，赶紧朝他走去，同时用手拍着耳朵，一面走，一面瞥了几眼周围富丽堂皇的壁画，感觉受到了嘲弄。这里一大群雄狮在和狮身人作战。保留下来的天使报喜图里，一根栋梁在圣母和天使之间投下一片十字架形的阴影。也许未来几年我都不会再看见它们了，至少不会在这样的场景下看见它们。我走到我丈夫跟前时，忘了为什么要走向他。我的目光跟随着他，落到我们头顶的枝形吊灯上。在初建的所有拜占庭教堂中，它是最为辉煌的其中一盏。圣索菲亚大教堂有一盏，阿索斯山的每一座教堂里有一盏。链条从中央的鼓状凸圆处垂下来，支撑着金属连接的平面圆环，密密匝匝地装点着蜡烛和圣像。链环的连接非常松散，因为在重大的夜间仪式的某个环节里，吊灯会缓缓地晃动，为整个教堂投下光影的变幻图案，这被视为象征天使和圣人在神殿的舞蹈。“多么优雅、严肃的作品，多么优雅、严肃的品位！”我丈夫惊叹道。金发修士挤了过来，又是数落又是抱怨。我喊起来：“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他？”我丈夫用德语严肃地跟他说：“你这些抱怨是为了什么呢？”小修士安静下来，低头看着自己的拖鞋，大声说：“哦，天，我得去穿上我的胶鞋！”我们看着他跑开，我丈夫说：“康斯坦丁在那里，我得让他停下来。”但康斯坦丁走向我们时，手指举过肩膀向后指。我们又一次忘记了自己的恼怒。这一次，我们的兴趣落到一队人身上，一个老修士正带着他们走进教堂。

这队人里有两男三女，其中一个人用藤编摇篮带着小婴儿，还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是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男人们戴着白色的无檐便帽。无檐便帽对于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就像毡帽对于其他穆斯林。他们穿着标志性的白色哔叽裤子，裤裆和脚踝处有黑色的编织装饰，独特地连到胯部。小男孩们头戴小的无檐便帽，身穿瘦小的有饰带镶缀的裤子。女人们戴着面纱，

穿着宽松的白色裙子，裙摆垂得很低，下面是宽褶边，像旧式的灯罩。多彩的广场围合在漆墙中间，在高高的窗户泄出来的黄色光柱之间，看起来像飞蛾一般，蒙着一层灰粉。牧师和男人们说话，他们摘下了头上的白色便帽，盯着孩子们让他们也照做。牧师又和女人们说话，女人们慢慢地、笨拙地摘下面纱，也许是因为她们不愿打破一生虔诚的习俗，但也许是因为伊斯兰习俗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强调动作沉稳优雅是女性的典范标准。但实施这项禁忌动作的人，脸上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这种表情尤显可怕和轻率，因为其中一个女人露出癌症病人典型的铅色皮肤，瞪着心事重重的眼睛。“今天是周五，”康斯坦丁轻声说，“穆斯林的礼拜日。他们把他们的病人交给我们的基督圣人治愈。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呀。”这些穆斯林们来到史蒂芬·德钱斯基墓前，肃静地站成一队，传达自己的意图。

牧师离开他们，走向我们，一边微笑一边小声说：“穆斯林自己在做这个仪式。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和我们没有关系。”首先，穆斯林把摇篮放在地板上，把小孩取出来。小孩的哭声表达着积聚的悲伤和九十多岁的人最后的脆弱。孩子的母亲把孩子的脸贴在棺盖上，然后自己跪在坟墓旁边，其中一个男人也在棺尾跪下。她颤抖着，将哀号的孩子放在墓碑下，男人把孩子从她身边抱走，绕棺尾一周，然后交还给她。孩子就这样被传递了三次。孩子与棺材里的男人进行了牵强的联系，这个男人被自己的父亲灼烧双眼，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又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人们相信这种联系会赋予小孩健康的身体。接着，小孩被放回摇篮。小男孩中的其中一个吻了一下墓碑，然后爬行了三次。之后，脸色铅灰、瞪着双眼的女人缓慢地开始做仪式，动作僵硬而机械，好像她自己的病症从里面对她实施了催眠。第三次时，她靠自己的意志已经无法从墓碑下爬过了，只能由两个男人把她拽出来。就算这个仪式有效果，她也来得太晚了。现在，她已无权说要不要摒弃病症了，是她的病症来决定要不要摒弃她。两个男人扶着她勉强站起来，他们又形成了因过于敬畏而瑟缩的一队人。他们放轻脚步，穿过教堂走向门廊。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抬头故做镇定地看着壁画，就像来到热带岛屿的游客，看到当地人把肢体暴露在外时的反应（显然在游客自己的国家里，暴露身体是被视为不体面的），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描绘人物、动物像。我们跟着他们走到拱廊，看着他们在阳光下穿过壕沟和石堆，又戴上各自的面纱或便帽。

在圣南姆时，同行者告诉我，穆斯林把疯人带给他们治疗，但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当然这不是对伊斯兰教义的实际违抗。我们只记得穆罕默德命令他的信徒砍掉异教徒的头颅。我们忘记了在《古兰经》里，穆圣曾向基督深表敬意，认为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基督，还有他自己，都是上帝的至爱。这些穆斯林来这里有几个动机。首先，最可怜的动机是他们已经向自己的神祈祷过了，发现神对此不太上心。这个地方既代表着伟大的过去，也凝聚着现今的威望。德查尼成为修道院之前，是尼曼雅的皇

宫。尽管科索沃战争之后，大部分已经被土耳其人毁掉，坚不可摧的厨房仍然顽强地幸存下来。关于宏伟的记忆，必定仍然徘徊在这一个世纪比其他地方的十年还短暂的国度里。一个世纪前，这里的修士还生活在贫苦和恐惧中，现在已是国家的统治群体的一分子。随着土耳其苏丹和他的帕夏们被驱逐，他们给无知的人一种凤凰浴火重生的感觉，从死神手里凯旋。但不管人们的动机怎样，旅程本身让人觉得痛苦，因为人们从中几无受益。在史蒂芬·德钱斯基的坟墓爬行不是邪恶的仪式，但是愚蠢的。它完全是幼稚症的表现，纯属退化。人们用手脚爬行，假装自己又成了小孩。在权威的象征下爬行，扮演逃离责任的幻象，让自己回归依赖状态。这就是人们参观教堂得到的全部。在教堂的墙上，有强烈而微妙的证据来证明基督教义能给予受难的人类、动物以支持。在穹顶上，在圣坛后，都存在基督普世君王、万物统治者。人类辉煌的构想显示他忧虑苍生，心力交瘁，被必然的职责全然击败，又全然胜利，因为在挫败下，他继续存在着，并施行自己的意志。在墙壁上，圣母合着纤细而慈爱的手在祈祷。她身上衣袍的褶皱都包含着宗教意义，因为它们长长的垂坠呈现出持久和延续的形象。她也被全然击败，她也全然胜利，因为她在挫败下仍然拒绝放弃慈爱。领会了这些构想的人，会永远懂得舒适的尺度。我认为这些壁面，和亚伯丁一样，解释了我们那些售卖成衣的朋友身上那种特别的可爱和宁静。但在修道院的生活中，似乎缺乏一股力量，让自己的传统里没有这些构想的人来领会这些构想。进入圣南姆的人，哪怕是来自最偏远山区的穆斯林，都能领会一些它的创建者，以及在它影响之下生活的人们，关于生活信仰的启示。但是在德查尼这里，尽管有几个修士看起来拥有智慧，并能传递智慧，然而他们都带着无助和受挫的神情。

“我正要带你丈夫去看一些外墙上的雕刻，”康斯坦丁说，“你要去吗？”但我仍然留在了壁画之间。下午的阳光正照着它们，它们越发显得精彩绝伦，作为单纯的油画，而不是作为对残酷民族的情感揭露。突然，金发小修士又回到我旁边。我以为他说他要去穿上他的胶鞋，是个逃离我丈夫的借口。但他事实上换了双蓝色布鞋，奇怪地啪嗒作响。我似乎又听见了麦克夫人的话：“希望不要是穿着难看胶鞋的小修士带着你们逛。”显然，来德查尼的访客通常都会经历这样的白痴场景。“你必须给我你的护照。”他说。“为什么啊？”我问。“这是规定，”他说，“来修道院的每个人都必须把护照给我。”“可是我们没打算待在这里，”我抗议，“我们很快就要回佩奇，傍晚之前。”“那没关系，”小修士说，“来这里的每个人，哪怕是待几分钟，都必须把护照给我。”这当然荒谬至极。“给我，给我。”他不停地吵闹。我很清楚，如果我把护照给了他，恐怕就再也看不到了。他很可能拿走，撕掉，回来说他没有拿过。“抱歉，”我说，“我没带在身上。我们的护照都留在佩奇的宾馆了。”他的脸生气得扭曲了。“我知道你带了的！”他不依不饶，“你拿手帕时，我看见在你的包里的！赶快给我！”我狼狈地逃出教堂，到处都没见到我丈夫和康斯坦丁，只得绕着教堂找他们，在壕沟和

石堆之间跳来跳去。转过第一个角落，我看到他们在和修士中年长而更加庄严的一位说话。跟在我后面又跳又吵的小修士戛然而止，急急地跑开，转头喊着：“我在找那个匈牙利伯爵，正带他参观修道院呢，不知道他怎么了。”

我愤怒地说：“真是不应该让这么个讨厌的小害虫在这可爱的地方到处跑，他妨碍了人们参观这个地方。”尽管我说的是英语，这位修士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显得有些苦恼和尴尬。他提议我们下去小溪那边。小溪从农田流过来，离修道院不远。他说我们可以喝一点有名的养生泉里的水，近期泉水都漫上了堤岸。我们跟着他穿过果园，走下一条陡直的路，途中遇到三个穆斯林妇女往上走，牵着一匹驮马。她们气喘吁吁地问：“我们可以进教堂吗？”黑色的面纱随着身体的动作而摇摆、颤抖。修士回答：“可以。但是马必须留在外面。”小溪奔流着，在白杨、橡树、柳树和洋槐投下的树荫间穿行、闪耀，就像穿过佩奇的那条不同寻常的河，它被称为“净水”。从桥上看去，远远地得到一幅歌剧般优美的全景。近处水草地和树林清晰美丽的构图就是一曲美妙的牧笛音乐。风景里不那么清新精致的一笔，便是年轻的神学学生们身上污秽的黑色外套。他们站在那里，瞪眼盯着我们。

我们啜饮泉水时，饶有兴趣地看着几个年轻的阿尔巴尼亚人跪在河岸的垂柳之间，捧水洗脸洗头。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有一个显著差别。塞尔维亚男孩一旦脱离了母亲的怀抱，看起来就是确定无疑而且凶猛好斗的男性；而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的性别要到十多岁才能从外部加以确定。眼前这些男孩大概十三至十七岁，叫他们“罗莎琳德”似乎也可以。他们长着纤长的睫毛、鲜亮的嘴唇，皮肤娇嫩如花，举止行云流水。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洗脸洗头？天气又不是很热。”修士回答：“这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净化仪式。他们喜欢每周五上教堂去，上去之前总是先来这里清洗，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我们从来没让他们这么做，他们是自愿的。我想，他们是自觉有罪，他们不像土耳其人总是那么粗野。14世纪修建修道院时，他们是基督徒。我想，他们明白他们应该像以前一样，重新回到我们中来。”我自思自忖：“问题是，你们也和14世纪时不同了。这里也没有太多应该有的东西，让他们回归。收复的国家仿佛一只等待填装的空圣杯，但在我看来，这里完全找不到能往杯中倒的酒。”

正在这时，一只胳膊肘拐到我身上，金发小修士挤进康斯坦丁和我之间。他朝这片风景轻蔑地挥舞着手，叫道：“我也为我的宗教做出了牺牲，为了这个，我放弃了城市生活的快乐。”他还用德语说了一遍。康斯坦丁对着他怒吼一声，另一个修士也冲他挥了挥胳膊，让他离开。他不服气地扭着头，像古体小说里描写的女学生之类的角色。然后，他一蹿一跳地跑到穿过果园的那条陡路上，走着走着停一下，因为总有一只胶鞋老在掉。阿

尔巴尼亚男孩们仰起可爱的椭圆形脸蛋朝向桥这边。邋遢的神学学生们站得更近，盯得更牢。康斯坦丁还在叫：“一个克罗地亚人，施瓦布克罗地亚人，对着我们最神圣的塞尔维亚地方说这些！”他说完，修士疲惫地耸了耸肩。

“我们走吧，”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我们经过四方形的建筑，看见教堂闪耀着比珍珠更明亮的光彩，像艳阳下的一朵百合，尽管还有脚手架和一些杂物在那里。“你还想再进去吗？”康斯坦丁问。“一点也不想，”我说，“我只想在外面的树林里走一会儿。”我们和修士道了别，捐了些钱给教堂，向外走到路上，看见德拉古廷抄着两臂站在车子旁边，金发小修士在他旁边跳来跳去。“是，”他大声说，“为参观这里而自豪的名人，那不是最后一个！今天我们收到了好消息，下个圣神降临周，我们会在德查尼喜迎希特勒元首和戈林将军！”“沿路开出去一点，”康斯坦丁说，“女士不想再在这里待了，她宁可到树林里走一走。”“自然，”德拉古廷说，“这不是我对圣地的想法。如果这小家伙有头跳舞的熊，我会觉得我们进了吉卜赛营地。”

我们发现一条小路，穿过静谧、馥郁的松林，指向孩子们的假日营，那里现在还没到夏季开放日。我们在一处座位上坐下来。康斯坦丁很快打起了瞌睡。我在树林里走了一会儿，回来时握了一把薄荷。我丈夫现在也睡着了。我就坐在两个男人之间，直到他们醒过来。康斯坦丁睁开眼睛，问：“你腿上放的那些是什么？我喜欢那些深绿色的叶子，哀伤的、适合中年人的淡紫色花朵。薄荷，你说它们和薄荷有什么关系？闻起来像薄荷吗？”“不是，”我说，“这就是薄荷。”“你在说什么！”他惊呼起来，“我就像个小孩子，一直都以为婴儿是从医生的口袋里出来的，忽然被直率的男老师告诉了真相。我一直认为薄荷仅仅是从店里来的，或说是从店里最远的那个罐子里来的，现在你直接告诉我，它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在我自己的土地里，在我这辈子随处可见的树林里。”我挤碎一片伸到他鼻子下面。“嘿，它真是薄荷。”他狂喜地喊道，因为他喜欢辛辣的气味和口感。但突然，他的表情从喜悦的笑容变成了龇牙咧嘴的厌嫌。他推开我的手呻吟起来。他好像是突然在抗拒自己强烈的感情，在憎恨这般鲜活的经历。“我病得很严重，”他叹息了一声，“我很痛苦。无论这是什么，都和我没有关系了。”他说着，变得更加虚弱。

我丈夫和我用手臂扶着康斯坦丁，因为担心他从凳子上掉下来。他闭着眼睛待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好多了。是我手上被蜇的那一下让我发烧的，就是这样。”“不，”我说，“不光是那个。你很累了。”我停了一下，一时无语。我不知道该怎样说，他其实将死于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在这个世界里，某颗新星将一股奇怪的力量注入某些观点里。但我丈夫说：“亲爱的康斯坦丁，你知道你快累死了。要么你直接回

贝尔格莱德，让我们自己找路从黑山去科托尔吧？你觉得我们是英国人，很笨，但是从这里到杜布罗夫尼克，连狗都不会迷路。”“你们和我在一起觉得多么无趣啊，”康斯坦丁说，“我早就发现了。”“亲爱的康斯坦丁，不是那样的。”我说。“你是我们最棒的陪伴。”我丈夫说。“真的吗？”康斯坦丁热切地问道。我们拍了拍他的手，但他移开了视线，好像对我们的确认有点失望。“我要和你们一道，”他说，“黑山是个非常有趣的国家，我自己比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给你们听。现在，让我们坐在这里，享受这里的宁静。呼吸，深呼吸！这是最甜美的空气，你们在英国没有的。”

我们回到佩奇时，康斯坦丁立马躺到床上去了，我们在宾馆外坐着喝了会儿洋李白兰地，盯着街上看了会儿。“我们和康斯坦丁的关系真是伤脑筋，但又很有趣，”我说，“好像我们已经不是真人了，成了诗人梦里的角色。”“我忍不住地觉得，”我丈夫说，“我们应该用更安宁的方式来度假，而不是扮演《浮士德》第二部分里的角色。”在我们面前，来自山里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动。他们骨架结实，面色威严。他们在年老时总显得不幸。衣着整齐的政府职员举止轻快，好像他们注定可以躲避命运之途，不用经历从青年到老年的这种变化。小伙子们成群结队，走得很散漫，像一束一束的羊毛，在我们自己国家的贫困地区里，他们也是这样的。了无生气的小男孩们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售卖报纸和风景明信片。快乐的小女孩们在人群中奔跑。她们的装束非常迷人，穿着花朵图案的紧身外套和宽松的裤子。

突然，我们从自己心满意足的困意中被惊醒。两个小伙子在沿着道路流过的溪流边说着什么，然后彼此分开，一个人的手打在另一个人的胸口上，不算猛烈，但是带着侮辱的意图。他的击打还没回收完毕，应答随之而来。他被一股带着谋杀念头的力量袭击，身体以一只脚跟为枢轴扭转，倾斜着倒下，手臂旋风似的挥动起来。他掉进溪流中。他爬出水面时，整条街陷入一片寂静。并不是受惊后的寂静，只是马戏团的观众看着杂技演员到炫技的高潮时那种寂静。也许很多观众在想，旧时代又回来了，男人又可以成为男人，有了自己的激动时刻。但是寂静被打破。刀剑脆声作响。剑没有出鞘，放在一把椅子的椅腿边。警长从咖啡馆的桌边站起身来，坚韧的脸露出极度愤怒的神情。他疾步跨过街道，走到两个小伙子面前，一拳击在溪流边站着的小伙子耳朵上，把另一个从水里拉起来，毫不留情地戴上手铐。然后他对着两人，像保姆训孩子一样训他们。街上的人流又开始涌动，报童又开始吆喝：“《真理报》！《政治报》！”无疑，很多人的心里越发沉重地意识到，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旧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沿着主干道继续走，路过一些明亮的洞穴。它们位于低矮楼房的晦暗、简易的结构里。政府职员和他们的妻子在这里可以购买固龄玉牙膏和李施德林漱口水，法国科蒂的粉饼和蓝瑟瑞克的唇膏。终于，我们到达了

在去主教座堂的路上曾说起过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景色本身并无非凡之处，一座没有明显建筑特色，而且已经废弃不用的清真寺，一座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方形土耳其塔，一方草地，几棵绿树，以及一片砾石铺面的开放广场。它们被安放在不同的角度，赋予自身一种激动人心的神秘价值。我们站了一会儿，享受它们给想象力带来的挑战。日暮西山。明亮的天空显出微蓝色和白色。繁星初现，然后一刻比一刻更加醒目。群山的颜色和质地都像油灯上的黑色污迹。山脚的树林像一汪清澄的绿水。清真寺旁边有个水洼，白得很纯净。我们听到一阵令人心悸的模糊的声音，暗想着，这清真寺并没有像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被废弃不用了，因为我们听到的无疑是仪式中的吟诵。但当我们走近清真寺时，声音却变得更加模糊。墙缝里有蝙蝠径直地飞出来。我们循着声音，绕着广场走，走到一个小村舍边。屋子带着花园，有人正在开派对，把很老的唱片放在很老的留声机上，播放着音乐娱乐客人。肯定是个很小的派对，因为这间村舍是最小的。我想客人不超过两三人。但也有着斯拉夫派对那种庄严、刻意的狂欢声响。

我们正看着，听着，身后一阵响动，有人在拉我的外套。一个穿着花外套和裤子的小女孩站在我的身后，在笑声中喘着气：“您说法语吗，夫人？”她沐浴于阳光中的棕色头发闪耀着金色的光泽，在暗色中仿佛一圈光环。她轻轻地尖叫着，逃回躲在土耳其塔角落的那群影子中，路上笑得几乎走不动。然后影子各自散开，和她一同笑着，消失在暮光里。我们叫她，她也不来了。不过没关系，她的可爱就像翠鸟展翅一样，自然而然。宁静中这么突然的一下展翅、收翅，让小城更显安静。我们随意地走上一条街道。街边白色的房子露出单调而隐秘的一面，房子和道路之间一条宽阔的溪流护卫着房子。我们一直没有听见人声，直到遇见一个土耳其人。他包着红白相间的旧式头巾，扛着两只细颈酒罐。经过我们时，他的眼镜朝我们晃了一下，但他接着叽叽咕咕地跟自己争论着什么。我对我丈夫说：“肯普小姐在她的《治疗仪式》里，说她在这里遇到一个研究神秘学的年轻人，在他家里存了两百部有关法术的古代手稿和书籍。”“一个人如果住在佩奇，就会做些奇怪的事情，”我丈夫说，“它高贵的衰落，让我觉得像苍蝇在天鹅绒上走动一样。”

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明显的声音。从一间房子延伸出一座桥横跨在溪流上，桥上站了个年轻的女孩，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短裙。她一只手拿着提灯，另一只胳膊放在四个小孩的肩上。他们都热切地望着大街。“他们来了！”一个小男孩看见我们叫道。“不，他们不是！”其他人一致嘲笑他，“你不认识他们吗？”这么一来，孩子们的兴趣就被打散了，纷纷跑回房子里。但女孩仍然望着大街，只是匆匆看了我们一眼。我们在她面前停下脚步，被她无与伦比的美丽惊得风度全无。她的表情微微一变，表示对我们冒失行为的不满，不卑不亢恰到好处。她高贵的举止不输于外表。我

想她可能也出自凯特琳娜·斯米奇的族系，或者至少是她的追随者。我希望她等待的访客们会为她带来一些满足她华贵胃口的食粮，一些通过英勇行为让生命得到升华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带着这样可预见的使命而来，我觉得他们又不可能归属于培育凯特琳娜·斯米奇天才的杰出组织：我不能想象他们是当地教会派来的。主教座堂的院长将他虔诚而非神秘的职责履行得近乎完美。当女孩年老时，修道院也许会成为她的庇护之所和养息之地。但是没有力量在她年轻时告诉她，如同凯特琳娜·斯米奇需要引导时教会所做的那样，怎样将天国王朝湮灭在暴风雨中。我紧张地侧脸看去，以免错过可能在此时此地出现的信仰的唯一使者，因为他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也可以想象他在暮光笼罩的街上欢跃嬉戏，对着自己的影子搔首弄姿，金色的卷发随风晃动。

星光满溢，像吸足了世间的色彩。深渠里的溪水像黑蛇一样闪着亮光。房子呈白垩似的颜色，像幽灵，像骷髅。我可能错了。我回到高街时能够再看一下佩奇的全貌，整座城正安定吃着晚餐，今天是星期五，斋戒日。我们回到宾馆。在餐厅坐下时，我对丈夫说："吃你喜欢的，我想做个测试。"我问服务生我能吃什么，他说了一道又一道菜，包含着肉，或者蛋，或者黄油，或者用黄油烧的鱼，或者奶酪，或者牛奶，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东正教教会禁止在斋戒日食用的。"这些不行啊，"我说，"尽管我是外国人，我也想斋戒。你们没有符合传统的菜么？你们没有豆子？或者油炸的、水煮的鱼？""没有。"他回答。"因为是晚餐？"我说，"也许你们中午有这样的菜？""没有，"他说，"因为没有人要吃这些。"我说："那好吧，我得另换一家餐馆。"我丈夫这会儿也对我在做的测试产生了兴趣。我们在高街来来回回，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店里坐满了正在吃晚餐的食客，没有人斋戒。这在处于德查尼影响范围之内的城镇来说，是奇怪的现象。几百年来，人们不仅是生活在信仰的狂热状态中，而且是以此为生。人们热爱一点小禁戒，不会摒弃斋戒带来的隐约的愉悦，除非他实际上希望脱离信仰，这才会显得合理。如果西方世界不能为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幸福公式，就不能假装新事物的失败无关紧要。因为这里的旧东西正是国家需要的全部。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这些旧东西一如既往地和过去一样有价值。在另一些地方，它们已经无效。人们认为它们不再是流通的货币。而这里，没有新币铸造，因此面临破产。我们回到餐厅时，风从峡谷吹来，冰冷刺骨，像攻城槌一样狂暴。耳边传来木头绽裂、铁皮压碎的声响。一间小店轰然坍塌。

黑山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黑山

路上

我起得很早。因为要了解佩奇的宗教状况，我不得不以沙丁鱼、干面包、红酒和清咖啡为餐，这样的饮食不适合我。我偷偷溜出房间，走过因为维修不善仿佛在呻吟、抱怨着的过道，下到大街上，叫了辆的士去主教座堂，因为我想再看一眼巨大的圣母玛利亚和她小小的、反叛的、体格健壮的圣子基督。阿尔巴尼亚司机带了个朋友坐在副驾驶座，他说他朋友也想享受一下和我交谈的机会。于是我把字典摊在膝盖上，尽我所能听懂他们的话。的士司机是个严肃的帅小伙，在巴尔干半岛经常能遇到他这种类型的人。他的朋友却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仲夏夜之梦》里的罗宾·古德非罗那种。他红色的直发长可及肩，嗓音像鸟啼，还有双坚实的、善于传递信息的手。他们俩都是罗马天主教教徒，但我发现他们对教皇庇护十世的所言所为一无所知，他们的大多数西方教友也会觉得和他们不那么意气相投。司机单身，“罗宾·古德非罗”七年前娶了个十四岁的女孩，有六个孩子。他们对政府心怀愤恨，表达了想尽可能多杀几个官员的愿望甚至意向，但他们的主要不满好像不过是针对高昂的糖价。因为国家垄断，糖价的确偏高，但没有高到能为极端暴行正名的程度。他们对一切甜食都特别有兴趣，听说过英国和瑞士巧克力的优质，于是我不得不带着红酒鉴赏家的学究气质和他们聊彼得斯糖果、瑞士三角巧克力、雀巢产品，以及吉百利、朗特里和芳润公司。果酱和香料他们也想知道，但我有限的语言却不能帮我克服障碍。他们问我多少岁了，丈夫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来。当我说我丈夫还在睡觉时，他们彼此示意，口吻不像是开玩笑，倒像是男人世界里的现实主义者，说他多半头天晚上喝醉了吧。主教座堂的花园在清晨阳光的斜射下呈现一片金绿色，教堂是蜜色的，里面充溢着修道院院长蜜一样的嗓音。东正教教会有众多荣耀，其中之一便是能言会道的牧师数量。他们恪尽职守，传达神的意志。我进来时仪式进入尾声。参加仪式的有两个中年男子，像是拥有着非凡热情的信徒，还有几个年轻的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以及多位老妇，她们腰背挺直，长裤装束，我之前在这里见到过她们。仪式结束后，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看看这些壁画。它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晨光以绝妙的角度照射在穹顶的天窗上，折射为最温和的光辉，洒进教堂，沐浴其中的油画呈现出所有的柔美、雅致，以及春天般的鲜活，这一切让它们像极了早期的意大利艺术作品。在可畏的母亲和孩子画幅前，我没驻足多久，倒是在另一些场景前多看了一会儿。那是发生在有点像古代托斯卡纳的乡村里的基督传奇，现在我知道，画的应是更广的疆域。看完之后，我出门走进阳光里，温暖的阳光将胡桃树和松树里的芳香烘托出来。我从喷泉里喝了最后一口养生泉

水，然后去跟牧师道别。他正坐在树下的桌子边，啜饮清晨咖啡。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我。因为他的阿尔巴尼亚佣人和一个老工人在他面前摆放了一盆植物，植物多肉的茎叶被蹂躏得有些残损，他正盯着植物看，手肘搁在桌上，手里捧着咖啡杯。我想，他们可能正在讨论这坏事是什么动物干的。他们的思虑里带着善行的本质。在细心的呵护中生命得以幸存。

回来的路上，的士司机和他的朋友问我去过哪些国家，最喜欢哪个。我说我去过美国，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除了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和葡萄牙。我最喜欢的是南斯拉夫、美国、法国和芬兰。听到法国时他们叫起来。他们受不了法国人。他们说，在大战中和法国人打仗时，他们觉得很高兴。他们喜欢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讨厌塞尔维亚人。两人都表示，如果再来一场战争让他们有机会枪杀许多塞尔维亚人的话，他们十分愿意享受这场战争。他们举起左臂，沿着手臂看向前方，右手大拇指托着左肘，嘴里念念有词："砰！砰！一个塞尔维亚人死了！"我问："为什么你们这么讨厌塞尔维亚人呢？"他们说："战后他们对我们很不好，抢走了我们的土地。"我知道这里面是有些缘由的。佩奇地区曾被交到当过彼得大帝骑兵统帅的一个老人手里。他就像我们的贝尔瓦猎场和阔恩猎场的支持者一样，对社会智力造成了如马社所造成的那样毋庸置疑而且强大有力的退化效果。"那现在他们对你们怎么样？"我问。他们耸耸肩，抱怨道："我们的生活这么穷，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兄弟们过得可比我们好多了。"就像在比托利遇到的那个保加利亚男孩相信保加利亚比南斯拉夫更加富裕一样，他们也有同样可悲的信仰。其实，每个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的人都会惊叹于两者的差异，优势全然在南斯拉夫这一边，从生活水平来说。

他们把我送回宾馆时，我慷慨地给了司机小费。他的道谢中有很特别的一句，特别得让我叫他重复了好几遍。我所闻不虚，他真的在说："很高兴收到您的钱，因为明天我要到巴黎去结婚。"这听起来跟吹牛闲话似的。尽管这会儿我已经被靠着逐词查字典来继续对话的方式折磨得筋疲力尽，我仍然让他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解释给了我新鲜的证据，证明了法国吸收奇怪事物把它变为己有的能力。"你知道，"他说，"我不光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我还是车主。""他是财主！"罗宾·古德非罗嬉笑着，戳了下他的肋骨，"他有一打的士。"事实上他拥有八辆。它们运载访客去德查尼。不管怎样，有钱的女人是不在佩奇靠脚行走的，除非是到市场去。当他购买第八辆车时，他写信给他的阿姨。他的阿姨嫁给了在巴黎的一个小旅店的意大利店主。他让阿姨帮忙给他找个妻子。在巴黎不大但是富饶的阿尔巴尼亚居住区里，她给他物色了几个候选人，寄了照片给他。他选了一个，将在五日内成婚。带着传教士的精神，我问："你阿姨在巴黎幸福吗？""幸福，"他说，"她和她丈夫挣了很多钱。他们说在那里非常自由。""在那里的阿尔巴尼亚人呢？他们幸福吗？""幸福，"他说，"他们都

过得很好。”“可你不觉得，这正说明法国人是不错的民族吗？”我说。但是这个论点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将这种状态视为正常，即不同的种族在遥远统治者的决策下生活。对他们而言，一个国家应该由其居民直接管理这样的念头是一种不正常的简洁模式，和雌雄同体差不多。

我上楼进了卧室，看到我丈夫正在锁他的手提箱。我的床铺中间有一小堆我忘记收拾的东西，它们被故意摆得很精巧。我指出：“它们都是我不介意丢掉的东西。”“打包，”我丈夫说，“不属于批评的范畴。”小个子的匈牙利女服务员把头探进门里来，我们给了她五十第纳尔的小费。她觉得我们很慷慨，深深地亲吻了我的手。“真是不错的小东西，”康斯坦丁下楼吃饭时说，“早上她帮我打包行李，对我说：‘告诉你哦，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是这么迷人，这么有教养，你甚至可以为我念一些诗歌选节，所以每天晚上我下班了都来你这里。可是每次你都发烧，脸色绯红，像只龙虾，于是我明白了，命中注定我们是不应在一起的。’”

我们在大餐厅外吃了早餐。一会儿，康斯坦丁让我们与警长道别，警长正在路中央为牵着两匹驮马的人提建议。一个卖农机的丹麦商人和我们说起话来。他问候我们的好心让我们有点难堪。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刚收到信息说我们完全无害，也不重要；就算我们有一点重要性，不论如何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所以也没关系。“你们要走了，嗯？”他说，“翻过大山去科拉辛，然后去采蒂涅？沿海岸去斯普利特，然后去布达佩斯，最后回家，很好，很好。”“你真是太好了，对我们的行程这么感兴趣，都把它弄明白了。”我丈夫说。“噢，你知道，这里的人们会讲的。”所谓的丹麦人说。“我觉得他们更可能会读。”我丈夫沉着脸。一片寂静，我开了口，虚弱地将沉默打破：“瞧，你看到那边走着的那个年轻人了吗？拎着黑色公文包的那个。回应一下，他在和我们打招呼。他是法院的职员。我们到达的第一晚，他好心地提议，要带我们在市里观光。”所谓的丹麦人一下子笑起来。“那个糊涂的年轻人！他傻到告诉我他挣多少。想想看，他是大学毕业生，每周挣十二马克，你们的一镑！在这里，他们都是贫困群体。”“是啊，很遗憾他们这么穷。”我丈夫说。“他们都是这么善良的人。”我说。“你是在浪费你的同情心。”所谓的丹麦人说，一下子迸发出残忍的激动情绪，“这些是斯拉夫人。他们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东西，他们就和羊、牛、猪一样。”

宾馆试图敲我们一笔，无奈他们的“功夫”还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康斯坦丁和德拉古廷义愤填膺，直到七点过十分，我们才解决了争端。然后我们启程去峡谷，去车纳格拉。“现在我们要像鹰一样攀升！”德拉古廷喊道。“那里，”我们在通向主教座堂的路上经过一片草地，在河岸的柳树下，他说，“是我们去了佩奇后，我每晚睡觉的地方。酒店里那些

该死的贼想收我的钱。我一个司机，房费和你们一样，尽管我知道你们也会付这钱，可我不愿意。我来到这里，就躺在这里，又没什么损失，反正我睡得跟个国王似的。”

我们将主教座堂鼓起的拱顶留在身后，进了路戈夫峡谷。峡谷在任何时候都很壮观，现在更是自然和人冷艳之美的盛会。1915年，从峡谷口的岩石堆上，撤退的塞尔维亚军队把他们的枪扔了下去，以免落入奥地利人和保加利亚人之手。他们步入了饥寒交迫的日子，这一幕正好应景。它险峭的绝壁和风雨侵蚀的山峰，显出我们的星球在花草掩盖下的铁质构造。在道路上，男人女人们踏着庄严的节奏飘摇前行，显出肉躯包裹之下，人类柔软的身体里坚硬的内核。他们是去要佩奇的市场，大多数靠步行，准备天黑之前回家。他们来自峡谷之上距离五英里、十英里甚至十五英里的村庄。事实上，他们日间要走的路程有十至三十英里，行程的后半段是陡直而上的山路。我们觉得这行程简直如赫拉克勒斯的任务般艰巨，便让康斯坦丁去向其中的两个徒步行人了解情况。一个是阿尔巴尼亚人，包着白色的头巾，头巾末端绕过他的喉咙，掩盖他肿胀的甲状腺，似乎这样的症状在山里很常见。他的妻子骨瘦如柴，穿了件黑色的裙子，裙摆奇怪地裂成荷叶边，垂在膝盖上方，有点儿克里特岛的风味。是的，他们来自山坡上距离此处一英里的村庄，步行去佩奇，黄昏时回家。他们的小驮马是没法骑的，去的时候它驮着他们要卖的东西——羊毛，回来时它会驮着他们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木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而且我也怀疑这马能不能承受两人支架一样的身体。他们理解到我们的惊讶时，皮革一样的脸缓慢地绽出笑容。路上的这些人说话、动作都非常刻意、拘谨、着重，像是壁画人物复活。有一个坐在推车里的女人，在蓝色的斗篷下搂着她年幼的小孩，像极了德查尼的一幅圣母像。她因爱而生的忍耐，给她带来压力，扭曲了她的身体。这再一次地意味着，拜占庭艺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程式化，它可能或多或少是高度程式化的生活的自然表现。

峡谷扩展成谷地，山毛榉之上是雪山，它们变宽变陡便是另一个瑞士。未来，这里可能变成那样，或者将要变成那样。草长得又短又密，正是贪吃的奶牛所喜欢的。这里会出产奶酪、罐装奶和牛奶巧克力，如果人们能够买一些好品种的牛，而且知道怎样饲养的话。史蒂芬·杜尚执政时期，每年夏天，长得膘肥体壮的牧群都会被赶到这里。但在土耳其统治下，基督徒已遗忘了这种奢侈的畜牧业，只有一些游牧人还惦记着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边界争议地区的这片牧草地。即便是他们，行动也受到了南斯拉夫疆域定义的局限，因为其中一些的冬季牧场处于划分给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界域之内，于是他们便不能在其间穿行了。其实，这里还可以适度地发展一点登山运动，因为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和极佳的攀岩环境，但是导游和小木屋的传统还需建立。这里鲜花遍野，不输瑞士。道路攀上山隘的地方，山坡像一枚发饰。地势太高，树不能生长，番红花倒开成了一片紫色的云，金

凤花更添了一抹辉煌。在险峭的山隘，我们观前赏后。人们在瑞士常常这么看，前后恍如两个世界。我们身后的山地延展成温暖的一片，本身并不十分寒冷，像是山地之上的低山和平原从广沃的胸怀呼出一口回暖、富饶之气。我们前方的山峰及山谷融合成冰天冻地的一片，如同一尊比生命之躯更加冷峻的雕塑。黑山并不像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贫瘠，那不过是从海上看它的人们产生的错觉。它的内陆部分，如果说并不是适耕之地，也是树木密布、牧草肥美的。但它们被岩石围在杯中，与到处弥漫的暖流隔绝开来。杯中围住的部分极纯：人们说，夏天纯热，秋天纯熟，冬天纯冷。现在，暮春时节，纯鲜。这是季节带来的至纯精华，让世界重新焕发青春。

“这里的山隘曾是土耳其边境。”康斯坦丁说。“现在不再是了，不再是了，谢天谢地。”德拉古廷说。其下，繁花似锦、绿叶如云的山谷尽头，我们来到一座看起来不那么繁荣的村庄，在一家小旅店前停下来。“现在我去问问到普拉夫湖的路，”康斯坦丁说，“你们一定要看看普拉夫湖。听说过它吗？”我知道这个名字。巴尔干战争时期，这里发生了一场不幸的惨案。1912年，黑山从土耳其手里夺过普拉夫村，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当地穆斯林牧师的大力协助。他加入东正教，被任命为黑山军队的少校。无人监督后，他的第一项举措是把他的前教众带进军事法庭，然后射杀了所有拒绝接受东正教洗礼的人们，受害者据说多达五百人。为这个事件进一步添加了悲剧色彩的是其中一名青少年的作为。小威利被告知要做个好男孩，别让他的小婴儿发出哭声。也就因为他想做个好男孩，所以用枕头捂住了小婴儿的脸。高耸的山下，石头在谷底闪动着微光，其间有一圈小泥屋，这是我本来想象的事件发生地。但是两三英里的坎坷山路却把我们带到一处让人惬意的完美之地。一汪清水置于翠绿色的沼泽地上，以微白的芦苇饰边，以绿草红土的群山为框，后面衬以雪山峭壁。湖里倒映着灵光闪动的山崖陡壁，还有水域特有的瑶池仙葩润色。我们坐在石堤上，受着一棵荆棘的荫蔽。这棵荆棘被风吹成了中国淑女的端庄姿态。在我们的下方，一个男人正在湖边切割草皮，把它们装进灰色的小马驹拉着的宝蓝色推车里。他动作娴熟，好像一生中都不曾知道疲惫为何物。他的白色衬衫、短裙、长裤和黑色短上衣在翠绿的沼泽地映衬下白得如雪，黑得似炭。这里是极妙的地方，如果美是一种妙处的话。“普拉夫湖，”康斯坦丁说，“意思就是蓝色的湖。普拉夫是个奇怪的词语，表示蓝色的或者金发的。都是无忧无虑的美丽。”

我们回到小旅店，在令人讨厌的环境中早早地吃了午饭。一只少了只爪子的狗在我们脚边一瘸一拐地走。他们说它捕起兔子来仍然很拿手。它仰头看着我们，目光阴冷，冲着我们咆哮，像那种生活在痛苦里、靠诡计为生的人的声调。我们正吃着饭，一辆黎明时分从采蒂涅开出的公共汽车到达了，卸下一车了无生气的人群，手里各自拿着揉挤过的、吮吸过的半个黄

色柠檬。不用猜测，他们觉得防晕车的这招并不怎么灵验。其中一个人证明，在她这里，这小窍门完全无效。“这里有阿道司·赫胥黎想要的一切。”我丈夫说。诚然。马路对面的旅店花园里，有座像避暑别墅一样的小建筑，位于一条溪流上方的高处。我们很有理由相信那是一处卫生设施，过于简单的类型。但肮脏不是黑山的特点。要说这个国家有什么显眼的缺点，倒是它令人心寒的空洞。他们典型样式的房子高耸在一方小地基上，上面陡斜的屋顶看着像是铺着石板，其实是松木，房屋立面特别缺乏表现力。房子通常是孤立的，因为土耳其占领之前，并没有抱团抵御武装入侵的必要。就算这些房子聚集在一起成为村庄，它们也不会化成温暖的一片和蔼可亲。安德里耶维察是个有一千五百名居民的村庄。我们经过橄榄林和梅李园，开车行了十英里的路来到这里。村庄位于河流上方的岩架上，周围有石楠和松树。漂亮的主街道两旁种着大树，排列着坚实的石砌房屋。房屋装点着精美的阳台，阳台是跨过文化分水岭的建筑标志，表明它已经倒向了达尔马提亚、威尼斯和西方世界，因为东方人是不怎么在意阳台的。尽管有这些优势，它给陌生人的印象仍然是冷淡、沉闷。这个地方的精神，仿佛缺乏情感和学智上的着色。这种效果被黑山人纯正得可怕的美貌所强化。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美好的容颜超越了传奇的描绘，因为传奇总带有取悦之心，而这种完美昭示的是美好的事物已然过量。他们是非怪物群体中的极致佳人。他们的五官和身材极其匀称，头发、眼眸、皮肤和牙齿光彩熠熠，风度优雅无瑕，一切美的精华让双眼应接不暇。

安德里耶维察村庄之外，俯瞰河流的绿草高原上有一处像是公园的地方，里面有座新修的拜占庭风格的白色教堂和一座战争纪念建筑，包含一根黑色大理石柱，上面用白色字体书写着长得惊人的一串名字。我们上前去看它到底是纪念什么，刚才在纪念碑旁边的深草里睡觉的一个白人小伙子站起身来。他带着迪斯雷利描写的公爵具有的那种沉静的帅气。他告诉我们，这纪念碑是为纪念瓦索耶维奇部落成员，他们消失在战争中。科索沃战争之后，塞尔维亚人在这里避难，分裂成一些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很像我们苏格兰部落的那种秩序。其中，瓦索耶维奇是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石碑的四面刻满了名字，应该有七八百个。当我看到碑上刻写的战争时间“1912—1921”，我惊呼了一声。事实是，在之后的九年，这个国家仍处于战备状态。他们首先在巴尔干战争中加入了塞尔维亚人一方，打败土耳其之后，他们继续和阿尔巴尼亚人进行局部战争直至大战爆发，然后奥地利人又攻打他们。他们总无宁日，因为他们又在和塞尔维亚人交战，反对并入南斯拉夫。我们站在那里时，走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衣着简陋，但像那个小伙子一样，颇有贵族气派。他们成了我们参观这座墓园的导游。部落的两位将军葬在公园里。马路那边的石楠灌木丛里，躺着两名被奥地利人绞死在这里的部落族人。不远处还埋着年代更早的另两名族人，他们曾经鲁莽地要求国王尼科莱斯制定自由宪法。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带着松木的香味，空气因为海拔高而有些稀薄。周围的沼泽、群山和水域都享受着它们自然的纯真。这些俊秀不凡的人们，如同珍稀动物一样。他们平和地带我们参观墓地，里面埋葬着他们被屠杀的亲人们。我记得，这个国家比我能想到的其他国家都更为确定地把它的幸存归因于单一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在性质上是令人反感的。科索沃战后三百年间，黑山人以不屈不挠的勇气对抗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他们。当土耳其人1683年被驱逐出维也纳，之后又被赶出匈牙利时，土耳其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更虚弱、离家乡更近的敌人。军队翻越群山，由转投伊斯兰教信仰的黑山人引导着，占领了采蒂涅。在那之后，最后的基督教斯拉夫要塞似乎必然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太多人改变了信仰。在17世纪，三分之二的阿尔巴尼亚人转变了信仰；而且他们作为先例，似乎也腐蚀了他们的邻国。1702年，一位主教参加完新教堂的献祭仪式后，在回家路上被土耳其人绑架，绑匪索要赎金。黑山的统治者丹尼尔·奈戈什觉得他的人民要么奋起，要么将被毁灭。一首全国传唱的歌谣里说，他召集了部落会议，让他们在平安夜行动，让黑山的每个伊斯兰教徒做出选择，要么接受东正教洗礼，要么死亡。只有叫马丁诺维奇的五兄弟遵守了他的指令。童谣里唱的是他们自己执行了计划，但显然他们肯定动用了整个部族的力量。“约定的圣夜近在眼前，马丁诺维奇兄弟们点起了圣烛，虔诚地向新生的神祈祷，在基督的荣光里啜饮每一杯美酒。他们抓起了神圣的权杖，他们在夜色里出发。”

我是站在马丁诺维奇兄弟们这一边的。我见到了土耳其征服对于斯拉夫人意味着什么，马丁诺维奇兄弟的罪行显然也有其正当的理由。一个男人若不愿拯救其子孙，便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命运如此可恶，逼迫着兄弟们——他们应是带着那种无瑕和冷酷之美的，如同今天的黑山人——走进黑夜，谋杀变节教徒——他们应该也很美。“请给我些白兰地，”我对丈夫说，“我觉得不太舒服。”但是当他从长颈瓶中倒出酒时，我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更喜欢的是劲头十足的酒，可以立即模糊我的意识，闻起来却清淡如水，比如伏特加。白兰地的醇香让人想起了大地的盛典，开花结果，这和谐而有逻辑的过程，让人用类推的思维，使自己怀着过多的希望，来关心自己生活。这是细致的微妙，而在这里，微妙却劫数难逃。我们驱车出了石楠丛生的野地，进入更加苍绿的乡间。农场修剪得惊人地整齐，里面的植物简直根根直立。我们路过的教堂，内外都丝毫不带一丁点神秘主义氛围。它们也可以作为市政厅，在某些情况下充当炮楼也未尝不可。那是很自然的。在黑山，直至近代，政教不仅结合，而且等同。16世纪约翰·车诺家族的最后一个国王是“不法之徒约翰”，车纳格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宣布退位，去威尼斯生活。他离开之前召开了民众集会，把权力交给采蒂涅主教，黑山教会的最高主教。康斯坦丁大帝，在离开罗马建立君士坦丁堡时，也把他的权力移交给罗马教皇，于是使得教皇拥有了世俗权力。1851年，达尼洛二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不能自拔，修改

宪法让自己可以娶这个女孩，并且把自己的皇权传给他们的子嗣。在之前，黑山由一系列的采邑主教统治，权力从叔叔手里传到侄子手里。所以教会就是政府，它的建筑也因此调整，兼有国家的主要功能，即抵御土耳其人。这里并不对神膜拜，痴迷地认为是神力坚不可摧的地方。首要而真实的需求是一座圣坛，马丁诺维奇兄弟们可以在那里喝下一杯饯行酒，然后开始他们虔诚的使命，真正虔诚的使命，挥动起他们神圣的权杖。基督教义仍然是一种启示，其价值已被证明。但是，就像黑山人的房子和美貌一样，它过于简单，过于质朴，充溢着一种完美的东西，和虚空一样美妙。

“黑山人没有做出巨大的牺牲，来保全自己的独立吗？”我问康斯坦丁。他回答：“牺牲大得让你难以相信。除了其英雄气概，他们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确实是英雄。如果他们吃饭睡觉，那么他们醒来就是英雄。如果他们结婚，必会繁衍小英雄，这些小英雄若是不确定自己会在英雄氛围中成长，简直不屑于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他们就是现在活着的荷马史诗中的那种人：英勇、俊美，而且自负。黑山战士必须自负。他走上战场时必须相信，他是这么优秀的人，上帝不会让他面前卑微的人把他杀掉。而他面前的人是土耳其人，通常情况下真正非凡的战士。黑山人对自己所讲的，关于自己的童话故事，便没了结局。这一点你从两个经典故事中可以发现。那是关于这些人的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一个真是不假，是巴尔干战争中被注意到的。你知道士兵操练的时候总会报数，‘一二一二’。在黑山军队里却不这样，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二，所以第一个人报‘一’，第二个人便说‘我在他旁边’，以极快的语速。另一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又或许只在精神上是真的。据说，一个旅行者问一个黑山人：‘你们的人有多少？’黑山人回答：‘包括俄罗斯，一亿八千万。’旅行者知道他们不足二十万人，说：‘是，但除了俄罗斯人呢？’黑山人回答：‘我们永远不会抛弃俄罗斯人。’这可不是个笑话，他们的自负是必要的，否则在战争中就将被征服。

“他们的自负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其他特征，除了一点小小的狡猾，相当简单的那种，荷马英雄的那种小狡猾。想拥有完美和绝对的自负，你必须免于一切活动，因为你不敢在任何事情上失败。所以黑山人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真正的兴趣，让他们融入南斯拉夫的现代社会特别困难。早年间，他们以打仗为生，其中总包含大量的劫掠。他们还依靠国外的免费补助，因为国家处于亚得里亚海岸上的重要战略位置。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这些补助数量巨大，尤其是来自俄国的。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得自己赚钱谋生，而他们根本不想做任何事情，哪怕是种地的活儿。这活儿以前主要是他们的女人在干，因为他们总是在打仗，或者在战争间隙修养，没有工作让他们有兴趣。这里没有小孩会说：‘我想当建筑师，或者医生，或者木匠。’可能有些人想当司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个冒险而浪漫的职

业。于是，他们缠着政府，要求提供公务员的职位，要求津贴。这想法也极度简单。对公务员的需求没有这么多，即便有，这些人也不能够完成公务；就算是上帝，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也想不出个理由为什么他们都要有津贴。对像南斯拉夫这样的贫穷国家来说，这是难事，靠着耐心和爱国主义也不容易解决，不像许多事情在波斯尼亚、老塞尔维亚和马其顿那样容易。因为黑山人除了狂热和盲目的英雄主义以外，脑袋空空，那就是说，他们经常像疯子一样。我跟你说，这个国家把自己牺牲给自己了，什么都没留下。”

灵魂在两难境地中无路可走。对羊场上的仪式感到难受的人，既不是牧师也不是黑羊，既不会转变成伊斯兰教徒，也不会在科索沃平原上被击败。他们被迫对抗牧师。既然我们必须和我们对抗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也共同面对高地的萧瑟凄凉——那高地，仅仅有那块沾染血污的岩石，过于简单地装点在那里。“以刀剑为生的人将死于刀剑”，这只是经战争留传于世人的诅咒的其中一半，另一半说，“拒绝死于刀剑的人将以刀剑为生”。黑山有些像监狱，尽管它像天堂一样通透，而不像其他监狱那样憋闷。它的石质构造和牢房颇为类似；它强烈地散发着英雄主义的臭味，就像狱所散发出消毒剂的味道；狭隘的居民被封锁在只有屠杀和胜利念头的空间里，如同罪犯被困在自己的负罪感和惩罚里。如果一个人闭上双眼，想起任何基本层面以外的愉悦，想起任何帮助意识进一步完成探索宇宙任务的享受，这个人不得不睁开双眼说：“不在这里，除了根源，什么都不在这里。”

看起来似乎如此。道路在山腰盘旋而上，直至更陡的山峰，蜿蜒指向另一个山隘。地势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到达时，正午的天空已在遥远的山峰显出苍白的颜色，而我们头顶却是一片湛蓝。乡间总是多变，它在这里又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在凉爽的北坡，它成了英国的白金汉郡。山毛榉高耸入云，树木遮天蔽日，草叶青葱秀丽。我们一直向上行驶，直到不得不停下来冷却引擎。每个人都觉得了无遗憾。路边的堤岸上长着许多龙胆草。在我们的下面，树林像轻微起伏的草坪上燃起的绿焰篝火；远方群山穷尽处，有一片野风信子的蓝紫色。我们在这里坐了很久，刚才在低处弯道超过的一位妇女现在赶上了我们，停下了她跋涉的脚步，走到汽车旁，把手臂放在打开的车窗边框上，打量着我们所有人。她的脸曾经完美无缺的，现在精致不复当年，倒是更好些。“你好，”她对康斯坦丁说，“你是谁？”“我叫康斯坦丁，”他回答，“来自沙巴茨，是个诗人。”“你们是谁呢？”她问我丈夫和我。“他们是英国人。”康斯坦丁说。“也是很不错的人。”她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康斯坦丁问。“因为他们是伟大的战士，并且他们热爱自然。”她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康斯坦丁问。她从车窗上抬起手臂，从另一只手里拿起白色的细羊毛线球和毛线针，又开始干起活儿来，仿佛从他的问题中觉出这个对话并不那么重要，

她不如继续进行自己的实质职责。“噢，每个人都知道。”她心不在焉地回答。“那你呢？”康斯坦丁问，“你是谁？是这里的本地人吗？”“不是的，”她说，“我现在住在这里。但我出生在杜米托尔。”杜米托尔是座大雪山，山脚下有一片黑色的湖，在黑山的北面。“谁带你来这里的？”康斯坦丁问。

她笑了一下，把羊毛线球举上嘴边，把细线衔在嘴唇之间，站在那里晃动着身体，眉毛苦恼地向上拧紧。“说来话长。我现在六十岁了，”她说，“战前我在那边嫁了人，杜米托尔附近。我曾经有个我非常喜欢的丈夫，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1914年，我丈夫被奥地利人杀害。不是在战场上，他们把他从我们家里拖出去，枪杀了他。我儿子出去当兵，也被杀死。女儿和我被带去集中营，她死在那里。集中营里非常可怕，死了许多人。战争快结束时我被放出来，孤单一人。于是我嫁给一个大我二十岁的男人。我不像爱第一个丈夫那么爱他，但他对我很好。我和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但两人都夭折了，很自然，因为我丈夫太老了，我也太老了，而且我从集中营里出来身体也垮掉了。现在我丈夫八十岁，神志不清，对我也不好了。他跟每个人都生气。他坐在自己家里，没事就大发脾气，我怎么做都不对。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你穷吗？”康斯坦丁问。“穷倒不穷，”她说，“我丈夫前妻的儿子是老塞尔维亚的法官，他每个月给我们三百第纳尔，让我们雇个人来做农活儿，所以我们没什么其他要求。哦，这是好的，但其他的就太糟糕了。”“噢，老姐姐，老姐姐，”康斯坦丁说，“真是不容易啊。”“的确不容易。”她说。“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吗？”康斯坦丁问，“我们感觉你很亲切。我们可以搭载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吗？”“你们为我做不了什么，当然你是一片好心，”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只是四处走走，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如果我必须活下去，为什么我的生活会这样？如果我走得高一点，这里又高又壮观，我觉得自己好像更容易想明白。”她把毛线团放到额头来回蹭动，眼睛里透出思考的痛苦。“再见，”她礼貌地说，仍然心烦意乱，说着便离开了，“再见。”

这位妇女无足轻重。在高地上走动是否能让她得出哪怕是对她自己有价值的结论，这尚待存疑。然而，她回答了我的疑问。她对待命运的方式并不像野兽，也不像草木。她不只是忍受它，她还审视它。就像刀剑在黑暗中向她横扫而来的时候，她伸出手抓住刀锋，并不在乎是不是会割伤手指，她想弄清楚它的材质，在哪里锻造的，以及谁是凶手。她希望理解格尔达否认的奥秘，即过程的奥秘。我知道艺术和科学都是这一欲望的工具，这也是它们存在的唯一合理理由。尽管在我生活的西方世界里，我看见过艺术沦为装饰，科学也堕落成小玩意儿的集合。我知道它们起源于人类的原始需求。猎捕野牛的洞穴人在岩壁上作画，让自己更好地理解野牛，在捕猎时有更好的运气，他是所有艺术家的祖先。游牧人观察阴影的长度，来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把他的牧群赶到夏季牧场，他是所有科学家的祖先。但

是我却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事情，用肚子，用脑子都不能够。现在我理解了，当我看见理解的欲望驱动着这位妇女时。命运也可能在她身上造就全然不同的结果，因为她族人的过往和现在对她造成了局限，她的命运可能会让受害者震惊而无力审视。可是，她的欲望不在于宁静，不在于金钱，而仅仅只在于知晓，到底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捕猎人和游牧人用的工具，并没有钝得打造不出适应更精细用途的工具。这工具并不因为复杂而灰心，它可以对付在意识里游走得更加巨大的野牛，也可以丈量历史投下的更加广泛的阴影。而且，人类曾经不会，今后也不会忘记使用它的欲望。

我记起曾经丹尼斯·索拉特说的关于米丽察的话：“如果在这里和中国之间分布着像她那样的人，只需二十个，文明就不会消亡。”如果在之后的千秋万代，每代中至少有一个人永不停歇地探寻命运的本质，甚至在命运抛弃他、打击他的时候仍不停歇，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揭开宇宙之谜。我们会认识到哪些工作是我们受召应做的，而为什么我们又不能做。如果矿场不能凭其财富产生收益，教堂浪费其珍贵的圣坛，我们会知道原因。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将刀尖划过黑羊的喉咙，或把它置于那块恶心的岩石上，为什么我们让灰鹰栖息在我们的胸怀，尽管它把它的尖喙埋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应该给我们的癫狂套上枷锁。那么，战胜我们自己的怨恨之后，我们才能面对自然强加给我们的命运，以及战争。那意味着什么？自然之后是什么名字？仅有的一个名字是什么样的名字？然后会有一场值得奖励的摔跤比赛，被击败是永恒的光荣，然后除了庄严，别无他物。赛事会绵延千万年，见证战士的威力。那之后，再然后呢？假如意识能够拉开星辰后的黑幕，可能会被超越星光的辉煌照得眼花缭乱。那也许是另一个战场，为未曾知晓的冲突而设。这位妇女指向的是这一片辉煌。之后，我们再次超越她，驶过马路，在龙胆草密布的草地里辟出一条小路。她已看不见我们了。“再见！”德拉古廷对着她喊，“再见，母亲！”

科拉辛

如果没有路边遍地的坟墓，这里会是一片更美好的湖区，一处更可爱的科尼斯顿水域。大概下午四点，我们来到镇上。这里具有典型的黑山地区风貌，石头很多，整齐刻板。它位于平原上，周围群山环绕，形状美观，清秀的树林给它笼上了一层羽纱。接待我们的小旅馆干净得可怕，女店主让人心生敬畏。有些寡妇带着一种威严，似乎让人们觉得她们丈夫的死郑重其事，这位女店主便属于其中一个。她硕大的埃尔金大理石雕般的头上，顶着乌黑亮泽的发辫，用黑色的蕾丝头纱遮盖起来；她的长黑色衣袍覆盖着厚重端庄的躯体，你甚至不能想象这样的躯体像通常那样分出四肢的样子。我们在餐厅喝咖啡时，她弯下腰来，把两盏明灯似的眼睛对着康斯坦丁，然后用极其庄严的口吻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诧异："她是在背诵迎宾颂歌吗？""完全不是，"康斯坦丁说，"她在告诉我房子太乱了，因为正在装浴室和马桶，要十天才能装好，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用锡盆盥洗，在花园尽头的撒土厕所里方便。"

"显然，"大概一分钟后，我打断他的话，"她用了亚历山大诗歌体在说话。""不是，是无韵体，"康斯坦丁说，"她每句话用的是十韵脚不是十二个。所有的黑山人在完全正式的场合都这么说，表明听这些话的不是他们的家人。听着，她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总理斯托亚迪诺维奇先生，总是待在这里。这是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选区。你会发现她是用无韵体在讲述这一切。"的确如此。我被误导，以为是用的亚历山大诗歌体，因为她说话带着歌唱般的甜蜜而模糊的鼻音，让人想起法兰西喜剧院的诗歌日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无疑是一种类似于诗歌的语言，直到近代，人们都被鼓励在所有日常生活以外的重要场合使用这样的语言。美国著名的驻外通讯记者史蒂芬·邦斯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第一次到巴尔干地区时，听到塞尔维亚的财政部部长用无韵体长诗的形式介绍预算，简直听得入迷。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能够让生活尽可能变得体面的自由民族，会很自然地选择用诗歌体而不是散文体说话，就像人们会选择穿丝绸而不是亚麻。当然，这里也有个逻辑瑕疵，在很多场合下，亚麻和散文体，比丝绸和诗歌体用起来更加方便。

眼下，警长来找我们了，邀请我们和他一道去看一个湖，距离这里大概十五英里。我心怀敬意地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在荒蛮西部的治安官。科拉辛可不是个温和地区。它起初的名字叫科尔·伊辛，这个名字转弯抹角地意指阿尔巴尼亚语的圣尼科莱斯。它在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时期是塞尔维亚定居区，后来却遭到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的入侵，然后加修防御工事成为土耳其前哨。在18世纪时，如同黑山许多的其他地方一样，阿尔巴尼亚人和

塞尔维亚人融合，开始说他们的语言，并信奉东正教。而拒绝这么做的其他阿尔巴尼亚人，常常和土耳其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一道，攻击成为基督徒的阿尔巴尼亚人。高潮时期是1858年。附近几个部落的成员攻击小镇，毁灭了所有保持阿尔巴尼亚身份的居民和穆斯林。从那以后，一种阴沉的和平笼罩着这片地区，然后发展成对抗精神、独立精神，倾向于绝对的消极主义。这让他们在战后黑山与南斯拉夫合并时充满愤恨。

这种不满已然平息，不像充满骚动不安的保加利亚人的马其顿地区那样，因为这里没有针对政府车辆的破坏活动，但说这里已经成为安静的新娘也不太可能。事实上，从警长的面容看来，果真如此的话，他也不必在那里存在了。他有一张坚毅而泰然自若的脸，在上面玩飞镖也无妨。警长举止十分得当，带着诚挚的谦恭把我们领至一辆本地汽车上。这辆车会带我们去湖边，因为我们的车太重了，会压坏道路。和所有的黑山汽车一样，这辆车也暴露出粗劣的五金技艺。这个田园诗般的国度，在每个黎明，有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瑙西卡带着她的女婢们下海洗浴的清新感觉。它未曾受到铁路网的污染，没有发展出现代的，其实甚至是中世纪的市镇。它只有牧场、林地、群山和原始的村落，在大地上仿佛刚出炉的新鲜面包一样香甜。道路上扭曲的残破汽车毫无意义地存在着，玷污了它；这些车说不定是从斯劳垃圾场里捞出来的。小伙子们开着这些车，神情好像是在演绎英雄梦幻一般。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像尊雕塑，有一对不自然扩张的鼻孔。他站在扭曲的黑色残骸旁边。

在黄昏的金色余晖里，我们沿着一条清冽喧嚷的河流边驱车而行，经过一片精耕细作的平原进入一个像科尼斯顿·克拉格的山谷。在罂粟花下做梦时会忆起这片景象，思想无限驰骋，不在乎可能性，只在乎纯美的境界。我们进入一片山毛榉树林，从银色的树干和被阳光染色的绿叶投下的阴影中飞驰而出，直到遭遇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它奇怪地保留着夏日的痕迹。我丈夫和我先走出来，司机为我们充当向导。德拉古廷在我们后面游荡，寻找小动物，时不时地走上前来给我们看一只油绿色的甲虫，或其他类似动物。远远落在后面的是康斯坦丁和警长。这位警长像佩奇的那位一样，神情像是饱受困扰的女教师，负责管理不守纪律的差生，正想逮住机会发泄自己的痛苦。走了大约一英里，司机告诉我们，得走下马路，抄近道上山。我们转身看见德拉古廷正跪在交错纠缠的树根旁边，对某种生命下咒。我们打断他，对他指了指要走的新路。爬山的感觉十分宜人，我们在山毛榉果实之间踩着柔软的路面，头顶是郁郁苍苍的树冠绿盖，最近也少有机会做点真正的运动。我一度回头，到处都看不到德拉古廷，于是我停下脚步，听到下面传来呼喊的声音。我忽然觉得，我们也许走错了路，其他人正试图提醒我们。于是我问司机：“真是这条路吗？”他回答：“是的。”不容置疑。所以我们大声呼喊，把我们的方位告诉给其他人，然后继续前进。道路忽左忽右地拐弯，以避免陡峭的石崖，一时间我竟老想着

在上面行走的感觉。我又停下来回头看，直到这会儿，视线内仍然不见人影。我大声叫喊，没有回应。

尽管我们顶上的树冠还有阳光照射，下面的树林却已完全隐匿在阴影之中。太阳慢慢西落。我看了看表，问我丈夫："知道吗？我们已经爬了半个小时了。这不对劲啊。"但他是在瑞士学习的登山，受到的教导是必须信任向导。"那小伙子住在这里，"他说，"他肯定认识路。"我又问："你确定是这条路吗？"他的应答有点奇怪，向后看了看，好像有什么危险尾随我们爬上山坡，然后不耐烦地挥手示意我们继续沿路上行。我们又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爬上一片极陡的坡地。我弯着膝盖垂着头，步履相当沉重。当我挺直了身体时，眼睛落在司机身上。他站在前方，背对着我们，把手举得齐头高，紧紧地靠在树干上。这个毫无意义的姿势以某种方式表达了一个确定的意思。我明白，他迷路了。我叫起来："我们再走下去吧！"但他黑着脸转向我，脸上是阴郁的恐怖表情。他立即跑开，跑进了树干间的灌木丛中。

他一秒钟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因为整个树林都在阴影里。我转身朝着下面暮色笼罩的山谷叫喊，没有回答。我丈夫站得稍远一点，我走向他，挽住他的手臂，说："这倒霉孩子到底去了哪里？"他回答："那边的山谷里有一座伐木工的小屋。他多半是去看那边有没有人认识路。没关系的。"正在这时，司机回来了，走得太快以至于老是有点脚步不稳。他身后跟着两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身上胡乱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对他喊着什么，是警告和愤慨的语调。这样的场景没法让我有乐观的解读。我的意识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被带进了贼窝，会被抓起来勒索赎金。不过看起来可能性不大，因为警长也是队伍中的一员。离开这些人后，司机继续带领我们。这时他跌了一跤，爬起来，把山毛榉果实从衣服上拂去，站在我们面前气喘吁吁的，眉毛上滴着汗水。"这边！这边！"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是什么危险在威胁我们，以至于他要我们逃离这片地方。我想着，是不是山崩或者森林火灾，但山上毫无动静，空气闻起来也只有夜的味道。

"这里，"司机说，"这里！"穿白衣服的两个男人和男孩就在后面。他带着我们走到悬崖顶上。这里发育不良的树木朝着深渊生长，用树叶给它盖了一层面纱。"哪里？"他指着崖壁上的一条小路，那不过是一道溜滑崖壁的边缘，在地质裂缝旁凿出的两三英寸的阶梯。我说："光线太暗，我们走不下去。"司机为我的迟疑深感苦恼。"你必须走！你必须走！"他很不满。"他肯定是觉得我们身处某种险境，"我对我丈夫说，"但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说。我回头看着穿白衣服的人们，想问问他们的建议，发现两个男人在恐惧和绝望的姿势下身体变得僵硬。两个白衣服的人都长着挺直的鼻梁，唯独那个男孩长了个蒜头鼻，这鼻子好像平时都被压

着，这会儿朝前伸出来，配合他瞪着眼的注视。“瞧！”我对我丈夫喊，他也转头看着他们。但他的塞尔维亚语甚至还不及我，也就是说，一窍不通。所以，还得我和司机继续沟通：“我们不打算走那条路。带我们回去找警长。”但司机仍然咬着牙回答：“你们必须走那里！走，走！”

他的决心削弱了我的声音，但我转头看着穿白衣服的人们，发现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拒绝走下悬崖必对他们有巨大影响，巨大得如同我们生和死的区别。我重复道：“把我们带回警长那里去！”他的脸变得绝望。他向我迈进一步，仿佛要把他的手搁到我身上。我意识到我应该表现得比他所惧怕的未知对象更为危险。我必须得有点戏剧化的表演。暴怒的情绪我不太有，愤怒只会让我沉默不语。我想起了夏洛蒂·勃朗特在《维莱特》中对瑞秋的描述，决定依照这个方式模仿一番。我对着司机挥动双臂，尖声惊叫：“找警长！下山！找警长！”他吃惊地看着我，畏缩了，惊慌失措地穿过树林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还回头看我，比画着手势表示调和，喊着：“是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左边有树枝断裂的声音，我们把头转向那边，看见伐木工那边的蒜头鼻男孩沿着和我们的路径平行的路道下山，大概离我们三十码，脸一直朝向我们，好像我们是什么惊天奇迹，一秒钟都不能错失似的。司机停了下来，因为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也有一会儿没发出什么威胁性声响了。他交叉双臂在胸前，一脸愠怒。我们听到从下面的山谷里发出一阵恐慌的叫喊，还有警察的哨声。我们站在一线石崖顶上，不知道该从哪条路下去。我想不起更多的塞尔维亚语词汇，于是以女武神的节奏尖叫起来，司机又开始往前冲。

我们会合时，他们所有人脸都白了，康斯坦丁、警长，以及德拉古廷。“你们干什么去了？”康斯坦丁叫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回来？我们一直叫啊，叫啊，还吹口哨，快要担心死了！”“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警长对着司机吼。“他带着我们，”我说，“到了山顶上，然后要我们从崖壁上的小路下来。”警长甩开他的两手。“那条小路！”他吼道。司机把头往后一仰，看起来十分高尚。他说了些话，然后康斯坦丁喊道：“但他说他没打算带你们去任何地方，是你们坚持要爬山；他也没有叫你们下山崖，都是你们的主意。”我感叹：“这谎撒的！”但我丈夫说：“等一下，有一点我们没弄明白。我们可能对小伙子有点不公正。你想，在山上时他看起来很不安，我妻子问他是不是迷路了。然后他明确地表现出忧虑，我们判断他是在惧怕什么。当他要我们走悬崖路时，好像是我们必须这么做，像是……”“好了，”康斯坦丁叫起来，“这些黑山人果然不出所料！”他向其他人重复了我丈夫的话。他们表示出不耐烦和轻蔑，警长抱着自己的头在抱怨，德拉古廷在他的双脚间啐了一口。

“这些黑山人，”康斯坦丁发出嘘声，“我跟你们讲过他们的，你们没听。我说他们都是英雄，都是自负的蠢人，像荷马笔下的英雄。这个小英雄受不

了向你们，或者我们，承认他迷了路，完全给你们带错了路。所以你们必须从悬崖壁走下来。也许你们会死掉，以证明不管怎么说，他是对的，这里有条路。”他捏起拳头在司机面前晃动，吼着：“你怎么敢把他们带到那么危险的路上去？”他把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耿耿于怀地回答：“那条路不危险。”“危险，”一个尖声在后面说，伐木工的男孩在暮色中静静地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告诉了他那有多危险。我都走不了那条路，哪怕是光着脚板。先生和女士穿着鞋，马上就会滑倒。说实话，没有人走那条路。那里几年前就不安全了。去年冬天一场大风暴，树枝和石块不停地从悬崖上往下掉。我爹、我叔，不是非去不可的话，绝不到下面去干活儿。”我顿感不寒而栗：“没那么糟糕吧。毕竟，要是我们死了，他也活不了。”“你觉得黑山人会在乎这个？”康斯坦丁气急败坏地说。

一阵沉默。三个男人虎视眈眈地看着司机。他的头昂得更高了，一颗白牙咬进了下唇。伐木工的男孩带着一种地域恶意，幸灾乐祸地享受降临到其他村的村民身上的厄运，凑得更近，以便看好戏。“现在，我们可以去看湖了吗？”我丈夫提议。康斯坦丁和警长看着他，好像他在阐释一场审判或者教堂仪式。“毕竟，那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丈夫坚持。他们妥协了，因为他们不确定司机到底是不是这么白痴，白痴得让周围人都没有办法理性行事，还是他异乎寻常地在表现最后的绅士风度。我们抓住了湖景的绝美一瞬，在暮色融掉它的所有色彩之前。山毛榉在光洁如镜的湖泊前垂下来，其后，松林在城堡一样的山峰上嵌入一片黑色。问题是我们谁也看不到它，尽管我们都坐在朝向它的凳子上。我对刚才的事心有余悸，我和我丈夫逃过了俯冲下山、摔得七零八碎的劫数，而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不愿承认他迷了路。康斯坦丁和警长气得发抖，德拉古廷像个要面对又一项惩罚的小孩似的惶恐不安，司机靠在树干上，仰着下巴叠着双臂。

康斯坦丁爆发了：“你看他们多么固执！他们是英雄，他们必须总是前进，他们不能后退。哪怕做的事不过是傍晚散步，他们都不惜搭上你们的命！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变成理性人，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如果我们不敲打、敲打、再敲打他们？”“话说回来，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也不能成功地挡住土耳其人。”我丈夫说。“是，曾经好的事情难道要永远做下去吗？”康斯坦丁生气地问，“我在我的时代也做了许多过于勇敢的事。战争时期，在北波斯尼亚，我用刺刀从许多士兵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山谷。在保加利亚和平时期之后，我用武力拦截火车，救了我的军队。难道我就必须一直用刺刀杀人，每天拦截火车，因为我曾经这样做是对的？”然后警长和他开始热烈而低声地交流抱怨。司机清了清嗓子，带着理性和尊严开始发言，用的是准确的自由诗韵律。他俩一起对着他吹胡子瞪眼。“他还在说蠢话，他说你们想去山崖边看风景。”“然而，”我丈夫说，“我觉得涉及这件事的人当中，我最没有好感的是伐木工的男孩。你看，他正在左

边那棵老树下看着我们。”“你为什么会抵触那个小家伙呢？”康斯坦丁问。“我强烈地感觉，”我丈夫说，“如果我们翻下山崖，他会是不顾路远，第一个找到我们尸体的人。”

回到小旅馆时，我非常疲惫，离我早起去佩奇的主教座堂的时间已经有十三个小时了。我觉得我吃不下任何饭。结果我却大吃了一顿，因为庄严的女房东给我们端来香浓的豆子汤、自家腌的生火腿、一盘香草烤羊肉、一摞土耳其风味小蛋糕，捣碎的水果和干果压在两层糕饼之间，真是做得非常好。还有来自黑山南坡的美酒。德拉古廷坐在餐厅和我们对角的桌子边，我们和他一起举杯祝福这位寡妇身体健康。她正站在餐厅中央。作为应答，她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活泼，亮出了她的女低音，黑色的长袍也腼腆地荡漾起来。我们好像取悦了一只白嘴鸦。

一切十分美好，让人沉醉。这时门开了，或者说，被十足的派头突然推开了，司机走进来，脸色苍白。我们都感到一阵静默，看着他走到我们桌边停下脚步。“怎么了？怎么了？”康斯坦丁问。小伙子开始说话，全用的是无韵体。康斯坦丁从椅子上弹起来，拳头砸在桌子上，朝着小伙子叫嚷。德拉古廷也站起来，发出嘲讽和愤怒的喊声。“有人信吗？”他走后，康斯坦丁解释，“他不是来道歉的。他还想证明他带你们上悬崖没有做错。可摔下来是要粉身碎骨的啊。”他颤抖着，从杯子里大大地喝了一口，透过杯底看到面部抽了一下。然后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凶险的回忆、谨慎，以及怨恨。他记起来，我们是英国人，是自由主义者，还有，我们喜欢他。他的灵魂造就了他的倾向，要求他只能忠于德国人，忠于纳粹，忠于鄙视他的人。他咆哮：“看看，你们总是这么独立，制造了多大的麻烦！你们俩总要做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如果你们待在警长和我旁边，我们哪有这些麻烦！”我们无话可说。这指控太缺乏公正，是他们让司机当向导，带着我们在前面走的。康斯坦丁见我们没打算应答他，便看向德拉古廷，用塞尔维亚语重复了一遍。德拉古廷什么都没说。

寡妇觉察到了气氛的变化，开始在房间里转悠着干点琐事，把帘子拉平，把空盐瓶拿走。我丈夫把火柴拿到雪茄边，对着火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问过你，康斯坦丁，我倒是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你年轻时有没有经历一个阶段，觉得好像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就没有作家存在？”嘲讽和自我牺牲的表情从康斯坦丁的脸上消失。他说：“有两年是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我觉得，自己除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的那部分以外，似乎都不存在了。每当我见到新事物的时候，我会问自己：‘现在你是谁？是斯塔夫罗金还是沙托夫？你是卡拉马佐夫还是阿廖沙？’”他开始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所有人的启示，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是我曾经看到的样子。“评论家们认为屠格涅夫比他更加伟大，他们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坑里爬出来，就不

能够阅读屠格涅夫……”

然而，让我战栗的寒意，尽管有他重燃的火焰，也驱之不去。司机甘愿在山上抛弃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的生命，为了不被认为是蠢得找不到路。康斯坦丁甘愿抛弃他的自尊，还有所有他在乎的东西，艺术、哲学、国家命运，为了一个琐碎的目的——为了赢得某些人的好感。这些人指出柏林是个比贝尔格莱德富有的城市，给他造成一种对方社会的优越感。所以，不能说司机“犯错是因为可弥补的无知”，因为康斯坦丁，欧洲最具天赋和最有学识的人之一，罪过超过司机。也不能说康斯坦丁“如果不是过度紧张于我们的人类禀赋，也不会计划自己的自我毁灭”，因为司机在简单的状态下也犯同样的罪过。那天下午遇到的在山里行走的妇女，似乎也不是我所以为的安慰性预兆。在崇山峻岭间，她是如此渺小；在对抗我们愚顽的黑色普遍群体时，她的理解欲望只是虚弱无力的武器。所以我颤抖了，从我朋友的才华和我丈夫对待朋友的善意中，再也觉不出一丝喜悦。当寡妇从壁炉边的座位上起身时，我有点高兴。她为了让我们知道，去科拉辛的时间已经太晚，给了我们些什么信息，但我觉得康斯坦丁没有带着他通常的愉快把这些信息翻译给我们。我几乎可以确定，她说她愿意尽力为我们服务，说我们最好在花园的灯仍然亮着时使用撒土厕所。但康斯坦丁宣布：“寡妇说她愿为你们尽其所能，希望你们出事之前能使用卫生间。”

波德戈里察

我们早早地离开了小旅店，带着寡妇端出来的所有余下的小蛋糕，在湖区里山毛榉和溪流构成的美景里穿行了数英里。然后我们走过一个山隘，进入传统的黑山地区。这里反对耕作，所以，若不依靠橡木和三色铜，农民就没法过活了。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哪怕是那些了解瑞士、苏格兰以及落基山脉的荒凉萧索的人，也会这么觉得。在那些地方，人们常看到不少树歪斜地从山坡的岩石缝隙间挣扎而出。而这里的感觉，仿佛是一座火山，在即将爆发，让整个乡村灰飞烟灭的一瞬间，被抑制住了。山坡向外膨胀，石板、树木和地面形成了一个狂乱的角度，而地面本身，也处在一个狂乱的角度上。在错综复杂的断裂地形上，居民们肯定会改变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活动。在这里，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仅仅几百码的距离，除非路已经铺好，否则走完这段距离需要跳跃、跨步、攀爬，绝不可能闲庭信步。

下一个山隘带我们到达一片更加荒凉、更不宜居的地方。把它描述为贫瘠并不准确，因为可以看到一些特别肥沃的土壤，但它也因来自地球内部的攻击，变得满目疮痍。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房屋，它被破坏殆尽，只有一些底楼的墙壁还勉强立着。所谓的房间，不过是划出一个地点，里面的野花杂草长得比外面荒地里的还要苍翠繁茂。这里方圆几十里的山坡上，似乎遍布着这样的房子，只不过墙壁不是泥瓦匠所筑，而是丁香般蓝紫色的岩石。因为这里靠近亚得里亚海，木材十分珍贵，不过既然如此，如果当初他们盖房子的这片地方，离生长的作物，或发育不良的树，有个几码的距离就更好了。但这片地方小而偏远，到处花团锦簇，鸢尾花和金雀花丛中长出泛白的藜芦。这是饥肠辘辘的场景，却让人忘掉饥饿。

我们朝着低地和遥远的海洋方向下行，眼前是峡谷，河流辟出来的。河流是单调的亮绿色，清澈，如蛇一般蜿蜒，在沙子和鹅卵石上淌过。南斯拉夫人特别喜欢这颜色。当地的民歌里提到过，各种类型的人们，从米丽察到贝尔格莱德的鞋店营业员，都曾和我说：“你要去黑山？那一定要多看看莫拉卡河的水。它流过波德戈里察，非常美丽。”峡谷之上的低山形成了自然的梯级，平整得让基底沃土上的人工梯田倒显得错漏百出。远方展开，形成平原。去那里之前，我们在跨河的桥上停了一两分钟。这座桥把大山和莫拉卡连接起来。康斯坦丁说：“土耳其人和黑山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了这座桥打仗，桥上一次又一次地血流成河。因为这里处在肥沃平原的重要位置上。这些平原是泽塔的最好部分，曾经是土耳其的领土，1876年黑山人夺过来以后，就一直属于黑山了。”“是块好地啊，”德拉古廷说着，揉着自己的肚子，“现在，除了土耳其人，其他人也有饭吃了。”“我的天，

我们出来在农村，你为什么要说吃！”康斯坦丁喊道，“马上把我们载回波德戈里察。”

我们在山谷里沿着河流飞快地行驶，一路跑回城里，倒也没有错过它奇异鲜亮的色彩组合。很快，我们在大饭店的餐厅里吃上了鳟鱼。我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波德戈里察的景色上，因为这里显然没有任何景色。土耳其占领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作为现代城镇，它又少了魅力。它很坚固，曾经是黑山的第二城镇，现在是地区行政中心，但它的建造缺乏韵味。其他地方的石头总是会为建筑增添一些风味，这里的石头却不能对抗黑山人天赋的匮乏，它表达的内容唯有直率和抵抗。但这里仍不乏值得一览的景观，甚至就在这间餐厅里也是如此。

我们一落座，就有一个胖胖的中老年男子，头发拙劣地染成不可思议的钢琴黑，穿过餐厅，冲上来抱住康斯坦丁。“你离开贝尔格莱德这么远，在干啥呢？”他叫道。“你呢？我不知道，你还可以在莫斯科餐馆以外呼吸呢。”康斯坦丁叫道。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男子坐在邻桌，先前没在吃鳟鱼，而是在读信，仰头看着这都市间的隆重会晤，好像认出了双方，默默地冷笑了一下。年轻男子猛地折起信纸，放到口袋里，开始吃鱼。胖男人解释说，他来波德戈里察是为了组织当地剧组排练，以便演出他的一部剧。“他们干得十分漂亮。”他的手挥出个威严的动作。我们看到演员都在我们周围，吃着鳟鱼。男子们坐在一张桌边：有几个少年，眼睛像西班牙猎犬的一样；有一个高贵的父亲，晃动着食指发号施令，假发越冒越高；有一个滑稽的男人，像个忧心的母亲，面容焦虑，腹部的肋骨有些凸显。女主角一个人吃着，尽管青春不再，却是冷艳俊美，魅力依然。这不是说她像玛琳·黛德丽小姐一样，宣布自己中了毒，自身分泌的性毒素像重口味啤酒一样影响到了脸；而是说她对爱有充分的准备，对爱的要求了然于心，但对爱人来说，她却比最冷淡的老处女更加难以驾驭。因为在她看来，男人的爱完全没法与观众的认可相匹敌。因此，没有爱人对她感到确定，哪怕是在肉体上已经拥有了她。她会离开罗密欧去扮演朱丽叶。每个男人都会向自己承诺，定能成功地打破她的偏执，让她觉得自己比掌声更加珍贵。

她最迷人的样子就是坐在那里。斯拉夫的金发和职业的彩妆让她格外光彩照人，好像是宣称她比其他女人更加易于亲近，实际上却是证明她与人群更加疏离。睫毛上一抹黑晕的设计，不是说爱人只在一吻之远，而是说男人都在长廊之后。她的面色也不在于烘托娇嫩，而是将舞台脚灯的光晕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她和她代表的消极性，在另一张桌边坐着的两位年长一些的女演员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她们展示的是存在的另一个阶段。两人都不年轻了，其中一个曾经必是美艳绝伦的。她们的神色既非愤懑，也非绝望，只是老狐狸千百次地从猎人手里逃脱，及时找到自己洞穴

后的愤世嫉俗。她们在艺术世界里或真或幻的价值，为她们提供了免于遭受生活中各种殇痛的庇护，给予她们力量，去对任何试图使之受辱或者失望的人们说不，让她们所受的伤害只能来自不相识的人们，坐在位列上的观众。我正观察着她们，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亲爱的！你能从这些人身上指望些什么呢！”她描黑的眉毛向上扬起，点红的嘴唇向下撇出，纤细的手腕翻转，露出袖口上的一枚别针，在本应该是纽扣的位置。这一瞥让我看到了一种无序，知道这种无序可能存在于所有这三个女人的房间里，以及在各个国家，像她们这样的女人们的房间里。这与其说是源于邋遢，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源于对整齐常规的反叛，源于对在舞台以外的其他地方花费任何一点紧张力量的拒绝。我放下刀叉，拍了拍手，因为我想起了点愉快的事，可以跟康斯坦丁讲点关于德国人的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康斯坦丁和他的朋友才分别。他们绵延悠长的谈话场景，让邻桌的年轻人掏出刚刚放进口袋的信纸，把它撕成了碎片。信是打印的，年轻人的行为无疑是对信中值得注意的文学抱负予以了断然拒绝。无疑，那真正是个悲剧，因为在这座斯拉夫小镇里，蕴藏的能力大得惊人。在另一个黑山城市尼克什奇，有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讽刺期刊出版。康斯坦丁终于坐下来加入我们，面带微笑，气喘吁吁：“你瞧，我到处都有朋友！”我说：“听着，康斯坦丁，我刚才想起一点事，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啊哈，这种消息我爱听。”他叫起来，笑容满面，开始吃鱼。“我有时候当着你的面说歌德不好，”我说，“现在我收回。有一件事他做得十分完美，而且影响永存。我见到你朋友的同伴们在等你朋友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人们在任何国家看到女演员，不管是在英国铁路枢纽站候车的巡演剧团成员，或是在罗马竞技场彩排的法兰西喜剧院领固定报酬的演员，或是在纽约阿尔冈昆升起的新星，都会想到一件东西，只有一件东西！”

“那是？”康斯坦丁问。“《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我说。“是的。”康斯坦丁说。“是啊，的确，”我高兴地说，“你难道不记得那些精彩的描写了，关于可爱的玛丽安娜卧室里的杂乱？到处摆放的舞台化妆品和服饰，在书里有极其生动的形象，这和它们被使用时可全然不同，简直是一条银光闪闪的鱼被厨师扔在厨房里的样子。他还列出了她房间里的其他零碎：剧本、针插、发夹、散页乐谱和人造花，共有的一种元素，粉尘里的汞，把所有的一切联合起来。他描写出，习惯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威廉起初感到多么惊愕，因为他必须挪开情人的紧身胸衣才能打开大键琴，如果他想要坐下来，也不得不为她的衣袍另寻一处地方。但后来倒觉得这样混乱的家务别有一番魅力。”“是的，是的。”康斯坦丁说。

“怎么了，你不喜欢威廉·迈斯特吗？”我问，因为觉得他说话有点冷淡。“哦，喜欢，非常喜欢。”他说。但他的目光穿过我的右肩看向远处，

然后目光收回到我身上，兴趣寥寥地审视了我一下，再次投向远处。“他不相信我，”我懊恼地想，“我已经使他确信我不喜欢歌德了。”于是我又说：“我敢肯定，如果你跟着这个女主角回家的话，你会发现她的屋子就像玛丽安娜的，而她自己就像玛丽安娜和菲琳娜，甚至可能是严肃的奥里莉亚。”“是，是，”康斯坦丁说，“我认为你说得对。”但他的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遥远。“没用啊，”我暗自思忖，“他坚信我不会真正公平地看待德国的任何东西。他才是对我不公平的人，我其实也能够发现那个地方的美，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我也看见了作为玛丽安娜、菲琳娜和奥里莉亚存在背景的德国，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别墅，有奶白色灰泥覆盖的壁柱和山形墙，丁香和栗树，喷泉，还有即便本身不那么精致，放在那里却一点也不差的雕像。我正要告诉康斯坦丁我有多喜欢这样的景色时，我丈夫问：“康斯坦丁，为什么你这么认真地看那些人？”

我转过头，发现当我关注着古老的德国时，康斯坦丁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注视着现实的德国。我后面的圆桌上坐着八个人，四个穿着开襟衬衫和皮短裤的男人和四个穿着棉质紧腰宽裙的女人，所有人的皮肤都很白，体型都很胖。“他们看起来都没有恶意。”我说。“你的用词不太准确，”康斯坦丁说，“最老最高的那个男人是奥特多夫，南斯拉夫的德国特工头领。”“哦，他这会儿当然是无恶意的，”我说，“他显然是在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康斯坦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爆发出来：“我不确定。我觉得他和这些生肉块在一起不只是闲逛。我相信阿尔巴尼亚一定有什么事。为什么在圣南姆有个穿灯笼裤的小个子，连修士们看着都可疑的人待在那里，那里正是阿尔巴尼亚边界？为什么佩奇有那个自称丹麦人的蠢蛋在那里，而那里正好也是阿尔巴尼亚边界？为什么在波德戈里察这里出现这个奥特多夫，同样是在阿尔巴尼亚边界？明显是阿尔巴尼亚要有麻烦了，意大利人正要对阿尔巴尼亚做什么坏事，阿尔巴尼亚的朋友德国人，对他们没那么一心一意，正等在外面观察事情的进展。我觉得你们英国人关于阿尔巴尼亚什么都不懂。它几乎要成意大利的了，他们在派驻官员，控制整个国家，说不定哪天就把他们的军队派来了，这就像把手枪瞄着南斯拉夫。”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说：“他们总是在前进。”他说起这些话来像个塞尔维亚人，或者犹太人，再或者法国传统的继承人。

太阳的光束夹杂着飞舞的尘埃，投射在清洁无瑕的木地板上，僵硬粗糙的桌布上，演员们夸张的表情和手势上。他们对自己的天资太缺乏信心，以至于用化妆品将所有明亮的变得更明亮，黑暗的变得更黑暗，向自己的同类奉上美好的生命贡品，以搏他们的一笑。阳光也落在面无表情、像木头一样僵直的特工们身上。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很满足，对别人的好恶毫不在乎。鱼的味道浓烈地弥漫在餐厅，因为大家都在吃鳟鱼。康斯坦丁支支吾吾地说：“我那位在排剧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作家。他很有钱，可以为了当作家而倾其所有。但他的剧十分、十分的糟糕，因为他并没有写剧。他

是个胃口很好的精明人，喜欢吃喝，喜欢和女人厮混，他很有生活经验，而且他很聪明，能够理解自己做的事。但他拿起笔时，主宰的便不是他自己了，而是他张大嘴巴打呵欠时吞下的某个小女人。小女人现在生活在他身体里某个地方，在他的肾脏里说话，选择让他提笔的时间，让他用她的方式写东西。他的剧小得可怜，平淡乏味，笔触微弱，也就和修女写的养老金申请差不多。”

斯库塔里湖

那天下午，有一个小时我们都坐在砾石山坡上。这里散落着一簇簇漂亮的蓝花和薄荷，下面是波德戈里察周围的平原。平原被切割分区，柔软得像雅致的家里烘焙的蛋糕切块。上面整齐地种植着玉米、烟草、苹果树、无花果树，还有枝繁叶茂的桑树。一股烟尘迅速地沿着笔直的道路划过这片整洁的平原，那是德拉古廷，我丈夫把他的帽子落在波德戈里察的旅店里了，德拉古廷去帮他取。现在天气暖和起来，清澈湛蓝的天空就在头顶。平原上笼罩一层白雾，像铺了一块台布。我们上方的岩石凸起的上空，立着一团白色的烟云，像个玩具。我闲逛着采摘野花，仍听得到两个男人的对话。我听到我丈夫说："英语中没有法语单词banaliser的同义词。""这暴露出钝性，"康斯坦丁说，"庸俗化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有两种类型的庸俗化，由下而上的和由上而下的。第一种在我成功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因为我有时候非常成功，比南斯拉夫的其他人都更加成功。我写的剧本大受欢迎，每天晚上人们都挤破头地想进剧院。我写的小说在贝尔格莱德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那些日子里，各家报纸都派出记者来采访我，我总是注意到，他们会选择那些最能代表我的特性，最能让我的剧本和书成功的言论。我经常想问：'如果你们总是从我说的话里聪明地删去我的那些小言论，那什么才是你们认为编辑派你们来采访我的原因呢？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正是因为我有你们没有的思维和写作方式，我才成为受欢迎的作家，而你们只是记者？'"当然，我是没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愚蠢会永恒存在：聪明人太忙了，无暇纠正蠢人。

"然后，我发现我写作的速度跟不上妻儿的需求，于是成了政府官员，了解到另一种庸俗化。我为我们的部长们写演讲稿，我写的讲稿不仅文笔优秀，而且气势恢宏，简直举世无人能及。讲稿内容也精彩，卓越非凡，和演说的场合也配合得天衣无缝。但让我特别吃惊的是，部长们会修改讲稿，每一份他们都会改，就像记者们改掉我对他们说的话一样。他们让讲稿庸俗化。讲稿离开我的笔时是睿智、具有说服力和令人难忘的。部长们发表演说时，却并不显得比一座清静小镇里的杂货商更明智。他们的话会让听众转身即忘，自然也不能让任何人改变任何观点。然而这类庸俗化和记者的那类不一样，尽管它们看起来很相似。那类意味着贫穷和晦涩，这类代表着富裕和荣耀。这是当部长绝对必要的。有时候会来个部长，不修改我的讲稿，就照那样发表演说。听众听得欢呼连连，说他们都可以为他献身。但这样的部长总是下台，被贬黜。我不能理解贫富之道应该是一样的。但在这里，我觉得很舒服，这里只有岩石和阳光。"

德拉古廷离开了很长时间。他回来时一脸愉快，好像一个医生怀疑他的病

人贫血，结果发现病人的红细胞非常充足。“那座城里仍然很有生活感。”他说，满怀热情地给我们演示一个非法的波德戈里察人怎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人眨着眼睛，翻起夹克衫给他看满口袋没向国家交税的香烟。“来一根，”德拉古廷说，“口感不错。噢，它们没有加工过，那个，没有用任何方式。啊哈！如果你们想看斯库塔里湖的美景，我们现在就得出发了。”我们爬上一片岩石区，历经日晒雨淋，简直达到了手术清洁度。在一个大的水泥蓄水池旁边，我们停下来给发动机水箱加水，看见几个姑娘围着悬铃木的粗壮树干坐着。她们的黑羊白羊都躲在树荫里。在黑山的这一边，女人们没有了她们的拜占庭气质，成了杜穆里埃贵妇。她们有着同样的钱币上那种侧脸轮廓，头微向上倾，带着非常严肃的尊严；有着同样的潜在的朴素天真，和蔼可亲，举止端庄。这些姑娘们只需要头带和网球拍，以及几个穿着水手装的小伙子，便和早期《笨拙》（*Punch*）里的人非常相似了。

“难道这不是世界一大奇迹吗？”德拉古廷说。我们在路上又转了几个弯，这时终于看到了斯库塔里湖的景色。的确，它处在这片地形中，正像龙在野兽中一样。在我们之下大概一千英尺，一道河流穿过深沟峡湾流入湖泊，水流缓慢，两种物质间几无混合，仿佛龙头里的水滴渗入糖浆桶里。因为这湖里的不是水，是泥。一潭碧绿，像英国共有地上的饮马池，但里面的内容物却不像液质，几乎成了固态的。映在上面的倒影不是一阵微风就可以模糊和打碎的表面图像，却是印入感光胶状物上的照片。拍的照片严格遵从了几何图案格式。峡湾描绘出一条弧线，在它的绿色边界之间，河流以同样的弧线慢慢地拽出一条蛇形的路径。构筑在湖泊周围的岩石世界被凿成了大大小小的三角形。高耸的山峰挺出锐利的尖角，低矮的小坡和岛屿蹲伏在钝角下。在每个三角形下，除了高峰之外，是一个它自己形象的倒三角影像，更加结实，更加顽固，更像是现实而不是普通的倒影，因为它们呈现在这黏性的介质上。峡湾口的群岛看起来像超载的舰队，停留在马尾藻海。从湖上反射的光在山峰与其倒影之间形成一层混沌的白色薄雾，好像不能自由地升到上层空气里。在这片景色里，事物也像时间似的，按他们所说，静止不动。流动性没有了。这里有灰岩，上面的矮树和灌木在砾石之间，长得如此之慢，好像是用钉子钉在山坡上的一样。这里有微带绿色的胶冻，河流、倒影，甚至光芒本身组成的，也固定不动。经过热带的酷暑，本来空气变成浓缩状态也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向下俯瞰时，迎面而来的却是最新鲜的空气，以及从大海、从山峰吹来的清风。这里的自然最不自然。风景的范围极其广袤。从高处俯视，目之所及处都是，这种宏大让人心生忧虑。这就好像人们知道，噩梦困扰的不仅是午夜之后的一个小时，而是整个日夜。历史新纪元可能蕴含着恐怖，唯有恐怖。然而它极美，美得让震惊的双眼怎么也看不够。

“有个小孩从砾石后面看着我们。”我丈夫说。“什么也别说，她可能会过

来，”康斯坦丁说，“但我们得十分小心。这里，哪怕是小孩子，都既害羞又骄傲。”过了十分钟，小女孩从遮挡物后面出来。她的一个朋友和她在一起。“你好，小朋友们，”康斯坦丁招呼着，“麻烦你们告诉我，有两座山峰的那座岛是不是弗拉尼娜？”她们不想表现得失礼，尽管不十分情愿，还是朝我们走过来。两人约莫十岁，穿着自家做的亚麻连衣裙，五颜六色的羊毛筒袜，脚上穿着凉鞋，趾头向上翘起。她们拿着长长的柳条绳。在她们下方，黑色的、尘土色的绵羊在山坡上摆成扇形，正大快朵颐。其中一个女孩皮肤白皙，另一个肤色偏暗，细密的汗毛长在眉毛以及被太阳晒成蜜色的太阳穴周围。两人都很漂亮，美得全面细致，没有疏漏，例如眉峰和上唇唇线都尽善尽美。两人都出众而端庄。她们的五官和四肢都没有散漫的痕迹。她们具有正经人会选择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骄傲，流露的性情既不会不温柔，也不至于太娇弱。

可以看出，她们见到康斯坦丁时被逗乐了。她们觉得这个长着动物口鼻和密实黑卷发的矮胖男人是个大笑话。但她们丝毫不露嘲讽之色，也没有任何失礼之处，只是带着心驰神往的严肃笑容。她们就像小公主一样，受到训练：永远不能失去优雅。一个男孩走上山坡站在她们旁边，俨然是个小王子。又来了一个公主，以及一个王子。五个人站成可爱的一线，康斯坦丁坐在一块石头上，开始展示黑卷发下藏着的有效、可靠的魔力。他摊开双手，撅着嘴巴，骨碌碌地转着眼睛，声音抑扬顿挫，故意在紧要关头留白，让听众发出尖声惊叫。也许，在几百年前，他的某支血脉也曾在亚洲城镇的集市上施展魔法。很快，孩子们开始不停地问问题，问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们时而被激动的笑声呛住，时而让他倒回去重新修改他说的话，因为有违于某些童话习俗。

我不知道他给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他通常翻译给我们的是些无关紧要的对话。这次他太开心了，只跟我们说了两次话。一次他站在石头上转了一下，说：“他们给每只羊都取了名字，很有想象力的名字。”后来一次，是另一个公主爬上小路，加入他脚下的一圈人时，有个小女孩托着下巴，好像站在许多面带轻视的评委面前。他和她打了招呼，告诉我们：“这真有趣。她的名字叫戈丹，就像你们给小孩子取名叫骄傲一样。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让她的父母给孩子取这么个名字。”他说话时孩子们一直看着，好像听懂了似的，微微点头，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彩，却又覆盖着一层拘谨。很显然，他们对他们同伴的特别之处表示赞赏，且不管那是什么；他们也能讲述名字后的故事，但不会把这些事情讲给陌生人听。于是他们将身上的严肃之态暂且搁置一旁，喧嚷着让康斯坦丁继续讲他的故事。

但是，最先来山坡的那个白皙小公主没有全神贯注于康斯坦丁身上，尽管起初她是最热切的听众。她时不时地看着我丈夫和我，越来越不安。这不是应该给予客人的礼遇。她试图弥补，私下给了我们一个甜美的微笑；但

她的道德告诉她，这样的弥补并不足够，所以她不能静下心来聆听。于是她跑下山坡，到一片花地里，帮我们采摘礼仪花束，尺寸和种类都有讲究。这是个颇隆重的牺牲，有点太过了。她听到她离开的圈子里迸发出笑声，跑回来加入听众们，听一两分钟。但她的眼睛又落到我们身上，她站起身来继续她的任务。她采摘好了她觉得合适的花束，步履轻松地把它交给我，屈膝行礼，吻了吻我的手。有那么一刻，我都不忍让她离去。我用手臂围住她的肩膀，这么近距离地拥有这个族系遥远而优秀的精致小人儿，幸运得如同有一只蝴蝶飞落在指尖上。她有礼貌地忍受着我的触碰，看着我的眼睛微笑，也同样给予我丈夫应有的问候，但我一放开她，她便迅速闪进了围着康斯坦丁的那个圈子。

我去车子那里取来从科拉辛带来的蛋糕，看见德拉古廷坐在车上，正努力地教一只从路边捡来的乌龟吃巧克力。“为什么老是吃草，吃草，吃草？”他问乌龟。我把蛋糕递给康斯坦丁，就放在他的鼻子下以免打断他，立刻，它们也成了他的故事。他的眼睛没有从他描述的遥远的高塔穹顶上落下来，他的声音也没有在涤荡着英雄、巨人和帝王之女的历史风浪中沉没，回到这个山坡。他比了个魔法师的手势，把白皙公主叫到身边，递给她蛋糕，吩咐她给每个小孩一块。“全体跪下！”他命令。他们双膝跪下。“现在咬第一口！”他们都听从了命令。“现在第二口！第三口！”

我猜，他告诉他们这些是魔法蛋糕，前三口可以帮他们免除厄运，或赐予他们福祉，他们本来半信半疑的，后来统统信了他。他们吃的时候咯咯地笑，但每次下嘴前都郑重其事地看着蛋糕。他们的舌头识别不出魔力，但遭遇美味香醇的点心却是能够识别出的，于是伸出来，把蛋糕屑都舔进嘴里。最终还是美味俘获了他们。他们缓慢细心地吃完了最后一口。康斯坦丁静静地看着他们，手肘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在他们的可爱身影背后，尽管表面覆盖着绿色胶状物，岩石的灰色金字塔向着正午的天空耸立。斯库塔里湖的深远景色就是大地自绘的意符，表达着它的矛盾。

---

1. 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1989），英国浪漫派女作家，其小说以神秘、恐怖为主要特点，同时带宿命论色彩。

采蒂涅I

山下，倒映着森林的河流旁边有一座小城在沉睡。其名为里耶卡，是“河流”的意思，而它的全称，里耶卡·车尼耶维察，则是“车尼维奇斯之河”之义。车尼维奇斯这个部落居住在被视为黑山要塞的山坡上。德拉古廷去找汽油了，我们坐在堤岸的树下，欣赏周围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色。这里有一座古老的、呈迷人的弧形的非对称桥。我们这边的河岸旁停着几艘划艇，形状如弓；河流对岸，一树鲜花与自己的倒影相映成趣。我们身后排着一行朴素的石砌房屋，一群相貌俊美端庄的人坐在敞开的房门前。在离我们最近的这幢房子里，三名中年女人和一名老年女人尤其美貌。那会儿以及后来，我们都注意到，较之于性魅力绽放时期，黑山女性在童年时期或老年时期甚至更好看，因为年轻时的黑山女性经常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空虚。女性的脸好像一座壁龛，设计给一尊不能安放的雕像。也许这是因为成熟女性的天性中，有一部分必须由性爱或其升华物来填充，否则就会让人感觉到空虚。而黑山男性仅仅凭着保持其大男子主义的狂暴来彰显自己的自由，这阻碍了他们去爱女人，或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缺爱。黑山女性们的境况并不比许多工业化西方世界的女人们更糟，西方世界的男人们被榨干了血汗，这看不见的敌人比土耳其人更加危险；而黑山女性的悲剧，因为具有适宜爱情的显著外在条件而更引人注目。

“谢天谢地，”德拉古廷说，“我找到汽油了。再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到达采蒂涅，直接上山只有十六公里的距离。”可我们告诉康斯坦丁时，他却表现得毫无喜色。不一会儿他遇到三个老年男人，对方起先把他当成了普通游客，并抱怨说：“这是个荒废的城镇，什么都在腐烂。我们穷得像狗一样，贝尔格莱德啥都没为我们做。”康斯坦丁反驳他们之后倒显得开心一点了：“我很清楚这座城镇的荒废，贝尔格莱德什么都做不了，也不应该做。你们这些老坏蛋，如果你们战前很富裕，那只是因为这是座前线城镇，而你们都是走私犯。是的，你们所有人都犯过法，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让自己和你们这些人说话，要不是我来自沙巴茨的话。沙巴茨就在萨瓦河上，曾经在塞尔维亚的边界。在那里我们一出生就开始走私，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聪明，会把烟草包进鞋子里。”现在四个人成了知己，康斯坦丁转过一张阴郁的脸对着我们。“我们还不能去采蒂涅，”他说，“我必须带你们过桥，因为你们得从另一边看看斯库塔里湖，你们也要看看奥波德修道院的废墟。15世纪的时候，斯拉夫的第一台印刷机就装在那里，后来被土耳其人毁了，什么都毁光了，在16世纪的时候。那里曾经印刷过许多宗教书籍。这个地方，你们肯定应该看看。”坐在车子里，他咕哝着：“在上面，采蒂涅那里，萨瓦·米利车维奇，一个政府官员，正等着我。上面就是大好世界了，像贝尔格莱德。”

过了桥，我们并没有去看奥波德修道院。我们徜徉在未曾想象、未经描述的一片愉悦中。桥的前方，河面变得宽阔，水上长着一片黄色睡莲。两岸边缘像镶了一面带状的明镜，垂柳立岸，树的正下方，倒影映入水中。那惊人的绿，那千尾猫尾般下垂的柳枝，仿佛静态的礼花，让我们惊奇不已。穿着制服的英俊小伙划着舟从军港驶出，弧形的小船像破冰船一样，从睡莲的金色凝乳中辟出一条水路。河口之外的斯库塔里湖，比在另一侧峡湾里的更显浓稠，更让人眼花缭乱。群山之下覆盖着葱郁的森林，翠绿色的几片水草地在沼泽边界上结合。边界难以辨识，它外观上只比沼泽地本身少一层阴影的浓度。沼泽地上印着林地厚重而残缺的形象，像一幅不成功的彩色照片。在这波光粼粼的黏质湖泊周围，我们沿着蜿蜒的道路经过金银花盛放的采石场。阶梯状的地形上，一层一层地开着寻常而干净的花朵，上面是一片温柏果园。我们也看见一家农舍，合闭的百叶窗是热情的蓝色，农舍附近的土地归置得平整如台，却荒凉无人，好像耕地的是幽灵一样。从那片寂静中，我们仰头看着山坡。从这里看去，它是一面陡直的灰墙，有雪堆的护栏，从西方来的风正将它吹走。在那里，康斯坦丁曾给长得像王子和公主的小牧童们讲故事，分蛋糕。孩子们在矮树间牧羊，他们的一天很长。“是时候上采蒂涅了。”德拉古廷说。“是啊，是啊。”康斯坦丁有点儿悲伤。在回里耶卡的路上他恢复了精神，因为他打开汽车收音机，调到了米兰的电台，正在播放一段尤其令人心悸的歌剧。他发现在合适的时间调高音量的话，效果堪比汽车喇叭。女高音唱出的对爱情的召唤，在即将和男高音会合时中断，一下子把赶着牛马回家的农民们惊得跳出了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意大利音乐想要的效果。”康斯坦丁的评价有点偏激。

我们爬上陡峭的山顶，再从顶峰下行，终于看到了采蒂涅。它位于一个岩石坑洼地，就像被置于一个巨大的头盖骨里的城市。这里四四方方的石砌房屋分布在宽阔的街道旁，典型的清教主义黑山风格，除了偶尔有一棵大树，并无任何其他装饰。所有的地平线都镶上了一道岩石的碎波，在这个时间点，岩石呈现出寒冷的颜色。体育组织索科尔、雄鹰体育协会以及爱国体操协会的分部正在这里举行集会。我们走进这座像耶稣受难地各各他一样的城市，听到几支乐队的声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开过身着各式各样农民衣服和制服的俊男靓女。一度我们都没法靠近酒店前门，因为站在门前的人们突然灵光闪现，围成个大圈，跳起了科洛舞。后面大树的枝叶间透出月光。月光从酒店旁大房子的窗玻璃上反射回来，这样的氛围让人觉得这里并不是凡人的居所。“那里，”康斯坦丁说，“是年轻女孩子们的寄宿学校，俄罗斯沙皇皇后出资建的。”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小可爱们，被送来灌输专制主义的原则，学习阅读斯特普尼亚克、克鲁泡特金和高尔基的作品。我正在观看巴尔干习惯的最新展示，它让生活充分可见，把散碎的事件聚合成一个易于理解的象征。漂白的城镇，建立于一片荒芜之上，正是俄罗斯帝国所做的诸多无益之事留下的景象。月光仍然

照映其上，人们仍然起舞其中。

黑山晚祷结束。马丁诺维奇兄弟肃清了在民众中弥散的伊斯兰教影响，彼得大帝对民众心怀赞赏。他看重南斯拉夫人的素质，曾派过一队年轻的贵族到科托尔学习航海技术。他对黑山独施恩惠，宣布黑山王子兼主教达尼洛作为他的盟友，“征服土耳其，以荣耀斯拉夫的信仰和名誉”，并送来钱财和礼物，比如祈祷书、法衣和圣像等，以培育东正教信仰。大帝的继任者也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直到官僚们开始用死板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一个为了保持原始生活状态而战斗的民族，至此传统被阻断。1760年，一个俄罗斯使者被派来调查当时的王子兼主教萨瓦是怎样处置资助资金的。大使发现王子委派他的侄子瓦西里主教，一个能干的政客，不加限制地把钱发放给不同的部族，以巩固部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忠心的部族得到奖励，而惹麻烦的部族什么也得不到，这让大使感到愤慨。这位俄罗斯官僚觉得应该以俄罗斯的名义将钱平等地分发给各个部族。于是他态度冷淡地回国，完全不考虑黑山人在对抗土耳其人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建议女皇不再给予资助或赠送礼物。瓦西里主教赶去圣彼得堡乞求撤回这项决定，结果客死他乡。他突发急病，身无分文，无力负担日常必需品和医疗费。因他是位主教，俄罗斯人在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给予他厚葬的礼遇。

俄罗斯政府就这样破坏了维持秩序的机制，这个国家一下子陷入骚乱。失去了瓦西里，王子萨瓦也无法控制局面。一个有天赋的新领袖出现，拯救了那个时代。他是被称为“小史蒂芬”的一个修士，宣称自己是沙皇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尽管实际上那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人，数年前就已经被奥尔洛夫稳妥地谋杀。很难假设“小史蒂芬”的说法真的会被人们相信，如果按照“相信”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一个修士不可能凭空就出现在这所修道院，实际上，据说很多人认出他是来自达尔马提亚一个声名显赫家族的成员。像许多冒名顶替者一样，他可能是以这么个故事来表明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尽管他的追随者们否认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他们也明确表示，即便故事被证明不实，他们也不会背弃他。

小史蒂芬很快就表现出了自己异乎寻常的能力：他恢复了部族间的秩序，让他们团结一致，站到了对抗土耳其人的前线。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受到鼓动，派出一个由三十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由王子多尔戈鲁基带领，前往黑山。代表团肩负着充满火药味儿的双重使命：揭穿小史蒂芬的伪身份，招募黑山志愿者和俄军一起对战土耳其。他们的访问相当无趣。当他们到达黑山和王子兼主教会面时，对被修士们劝着一起喝下的拉基亚果酒的数量，以及饭菜的简陋程度都深感惊骇。然后部族首领前来表示敬意。人都到齐了，小史蒂芬和他的热情追随者队伍加入进来。可以想象，小史蒂芬肯定已经意识到，一旦他出现，多尔戈鲁基王子便会揭发他。揭发完毕后，黑山人拒绝采纳俄罗斯人的建议射杀小史蒂芬，但同意把他囚禁起

来，关在多尔戈鲁基王子住处上面的房间里。

使团很快有了麻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土耳其军队准备发动新一轮进攻；佩奇大主教和他的其中一名主教来到采蒂涅，请求援助以对抗发生在他们教区的暴行；密探带回消息，说土耳其人对囚禁小史蒂芬暗自窃喜。于是黑山人召集会议，指出他们现在有了一位王子兼主教、一位到访的大主教和主教，以及一位俄罗斯王子和三十位俄罗斯官员，却没有领袖，这是何其遗憾。他们进一步指出，多尔戈鲁基王子允许把小史蒂芬囚禁在他楼上的房间，证明他明白，修士的地位高于他自己。

看起来难以置信，这些言论一次又一次地被史学家记录，成为黑山人简单和无知的标志。实际上，这是凡尔赛和罗曼诺夫王朝都尊重的习俗。因为这个原因，法国国王和沙皇下榻地之上的房间总是空置。于是多尔戈鲁基王子和他的三十个官员匆忙逃下洛夫琴山，跑到科托尔，乘船离开，留下小史蒂芬和王子兼主教在接下来的八年间共享统治黑山的权力，直到1774年。小史蒂芬本来可以统治更长时间的，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治者，前所未有地引导着各部族尊重生命和财产。但他不幸被斯库塔里帕夏派到修道院的理发师谋杀了。这桩罪行似乎应该算在土耳其人的头上，可是斯库塔里帕夏的位置是世袭的，掌握在一个变节的塞尔维亚家族手里。这甚至都不能算在伊斯兰教头上，因为威尼斯宗教法庭的记录坦率地披露该法庭派遣过某个伯爵到黑山，下令他杀死小史蒂芬，并且给他提供了一瓶毒药。

这位伟大的冒名顶替者颁布的命令在他身后仍然有效。在1782年王子兼主教萨瓦去世时，国家被治理得井然有序，由他聪明的侄子——王子兼主教彼得一世接管。这个男人是几乎可以媲美小史蒂芬的奇才。他作为军人，骁勇善战；作为政治家，能够灵活地教化和联合各个部族；还有着高阶的法治思维，编纂了法典，创立了国家的司法体系。另外，他还有长寿的优势，这让他能够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期间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在七十三岁高龄时，赢得了对抗土耳其人历史上一次最显赫的胜利。富于创造力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特别欣赏他，给予他慷慨的资助，换取对他军队的调遣权。这两人定然是最令人不安的联盟。曾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俄罗斯海军军官布朗列维斯基先生留下过一份令人惊恐的证言。“在攻打克洛布克时，我们的一支小分队被迫撤退。其中一个军官，体形壮实，不怎么年轻了”——人们会觉得他像《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配角——“筋疲力尽倒在地上。一个黑山军官看见，立即跑到他身边，拔出军刀说：‘你非常勇敢，与其选择落到敌人手里，你肯定宁可让我砍掉你的头。所以，祷告，画十字吧。’”

这名黑山军官的情感，在傍晚我们和康斯坦丁的朋友萨瓦·米利车维奇会面之后，我才能理解。当时我们正站着观看跳科洛舞的人摇摆、停顿、踩出

节奏、再停顿。月光像细碎的白色粉末撒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舞者脚下蒙上灰尘的地面。这时，萨瓦出来认出了我们。他也是黑山的英俊模子里铸出来的，他的性格和外貌一样高贵。我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在某种情形下，他或许也会让我做个祷告，画个十字，以便可以砍下我的头。他或许也会受到这种风发意气的鼓舞，觉得难以抗拒。晚饭时，他用法语和意大利语交谈，透露出自己是最和善的那类大学教师精神上的兄弟，如果去牛津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必是如鱼得水。但他崇尚英雄主义和古典主义。他提出要踏入我们现代的小世界，因为他知道我们在那里过得安逸自在，但他的内心却很难遵从他自己的提议。

这种态度随处可见，触碰整个生活，遇到民族习俗的微小禁锢，强有力地弹回，并无偏转。在他把我们的信件递给我们时，这种态度就立即显现出来。我发现我的那一扎里，有一封是我婆婆写来的。我叹息了一声，因为她的书写质量很高，唯有易读性偏低。萨瓦显然吃了一惊，即便当我解释了叹气的原因：我不过是缺乏耐心，去阅读这封内容必定睿智和幽默的信。听了我的解释，他并没有感到释然。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是，我在我婆婆面前用隆重的跪拜礼仪开始我的婚姻生活，这将教会我，将我婆婆视为德墨忒尔女神的化身，然后全盘接受她给我的一切，以书写或其他任何方式。后来，他得知我因为在南斯拉夫讲学获得了圣萨瓦令的奖励，对我丈夫说："你呢？你得到什么了吗？在黑山这里，要是妻子被授予了什么，而我们男人没有的话，我们可不会感到满意。"尽管他自嘲了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觉得妻子得到了丈夫没有的荣誉这事儿有点荒谬，哪怕是丈夫本身得到的荣誉大得多。男人应该拥有一切，因为他是英雄，因为他凭借勇气几近神圣，还因为，如果他的命运不那么糟糕得出人意料，他和大地上的果实之间必有一种注定的引力。如果允许女人为自己收获一个果实，这个理论就无效了。因为尽管女人可能英勇，那也只是业余的，她们永远不能成为专注的全职专业人士。但作为补偿，慷慨的男性会给予女性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萨瓦说起黑山女性来，好像她们个个都是圣人，为了她们所有人或其中的每一个，他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理所当然的，这个男人毫无胆怯；同样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大多数西方男人胆怯十足。当然，这不是要点，女人想要的不是个人保护，而是高标准的公民秩序，两件事并不是完全和谐。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丈夫问黑山农民的服装带着大量的金、银和丝线编织的装饰，是不是很贵的时候。萨瓦回答他，说那代表着对贫困人群所征收的苛捐杂税，单单一套服装就要花三十镑，全套服装包括很多饰品，甚至还配有一把步枪。"持枪需要执照吗？"我丈夫问。"是的，"萨瓦说，"持枪当然需要执照，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但穿着民族服装时就不需要。""但那样的话，持枪执照就毫无意义了。"我丈夫说。"可我们是战斗民族，"萨瓦说，"我们的民族服饰怎么能不包括枪呢？"

我丈夫的信件里有一封电报，让他比我们原计划提早三天到布达佩斯。我们正讨论这个变化，康斯坦丁突然说：“坐在那里的，是从阿尔巴尼亚来的德国部长吗？”“是的，”萨瓦说，“他今天下午到的。”“为什么来的？”康斯坦丁问。“我不清楚，”萨瓦说，“也许他是度完假回国。”“阿尔巴尼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康斯坦丁问。“没听说，”萨瓦说，“反正报纸上什么都没有。”“但阿尔巴尼亚肯定有事情发生！”康斯坦丁叫道，他推开面前的盘子，用双手扶着额头。他告诉萨瓦我们在圣南姆、佩奇和波德戈里察看到的特工。萨瓦叹道：“我不能相信意大利人会这样，我在罗马学习时挺喜欢意大利人。他们会做这样的事，和德国人联合，这罪行太反自然了。”

一阵不安的沉默。康斯坦丁说：“你在这里没有看到从阿尔巴尼亚来的其他人吗？”萨瓦环顾四周，摇了摇头。“那你得问问德国部长发生了什么事情。”康斯坦丁说。“那怎么行！”萨瓦愤怒地叫起来。“你干这事很容易，”康斯坦丁说，“你是这里的官员，你可以轻易地见到他，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然后，相当自然地，你转身时就可以说：‘顺便说一下，有传言说，’——噢，你随便说点啥——‘阿尔巴尼亚在进行革命。’”“不行，我干不了这事。”萨瓦说。“为什么呢？”康斯坦丁问。“他可能会拒绝告诉我。”萨瓦说。“那有什么关系？”康斯坦丁说着，脸变红了，“我们又不会损失什么。”“我呢，”萨瓦说着，脸变白了，“如果我问一个人问题，他不回答，让我难堪，也不会损失什么吗？”“不会，你不会损失什么，口袋里又不会少一个第纳尔。”康斯坦丁回答。两个人互相瞪眼看着。康斯坦丁耸耸肩，表示退让：“好嘛，我们要到明天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我们国家的威胁。”我们开始讨论明天的计划。我们决定上午在采蒂涅转一转，然后到下面的海滨小镇布德瓦吃饭、洗浴，下午去科托尔坐船，晚上晚些时候在杜布罗夫尼克靠岸。

那晚我对我丈夫说：“这两个男人看着好奇怪啊，都觉得如果每个人做事都像对方一样的话，世界肯定得停止转动。”“是的，”我丈夫说，“萨瓦·米利车维奇觉得，如果男人手无寸铁地在外走动，让自己在陌生人面前处于劣势，就没法自我防卫。康斯坦丁认为，如果人们不用尽手段搞清楚敌人在干什么，他们就不能够保护自己。一个认为尊严是其全部，另一个认为理解是其全部。”过了五分钟，他的声音又在黑暗中响起来，更加睡意蒙眬：“萨瓦的态度让我想起我们要离开那些孩子们时，在山坡上发生的事情。你可能没看到，你忙着想说服德拉古廷，乌龟被带上车后肠道会立刻有反应。顺便说一句，你懂得的东西真够特别。发生的事情是，康斯坦丁把余下的蛋糕给了那个白皙的小公主，让她分给其他小孩。可是小孩有六个，蛋糕只有四块，必须切开才能分，那就表示他们承认他们想吃那些蛋糕，如果分得不均他们会介意。垂涎于糕点，得不到就想哭——这些情感不够高尚。所以小公主拿了蛋糕放到一旁，直到我们离开。”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不读希腊文字真是可惜。”“年纪太大读不了，”我说，“为

什么忽然想起这茬事儿了？”“那小公主的行为，”他说着，不胜睡意地顿了一下，但接着说完，“那小公主把蛋糕放到一旁的行为很可爱，不光是说它现在的含义，曾经的本质也是。自世界伊始，相似的行为肯定不计其数地重复，然而她手臂的推放却似乎全然新鲜。哦，《伊利亚特》里就有这个。它说，男人拉开弓或者举起盾，好像这些事并不影响世界的晨露安然如初。人性中原始的东西的确非常有魅力。”

采蒂涅II

早上，采蒂涅看起来比头一晚更加奇怪。一般城镇周围有土壤的地方都应该肥沃丰饶，在充足降雨的滋润下，高树、绿草，以及挺拔的庄稼长势良好。但这里几无土壤，田地少得可怜，乡村余下的部分是多孔的岩石，蓄水效果无异于筛子。地面不仅在阳光下很干燥，在雨天也是如此。与之相称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居民不能接受这种地形特点，虽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中外出过的人不多，但他们能意识到黑山的高海拔和荒凉有些不寻常。城里仍然立着老的主教宫，它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以“台球室”的名义被民众知晓的主教宫。其原因是在19世纪30年代，王子兼主教彼得二世让人沿着驮运路从科托尔拉来一张台球桌，在当时堪称奇迹。在旁边与宫殿相连的一间房子里，一些意大利的战俘在奥地利地理学家的指导下画了一张巨大的地势图。萨瓦·米利车维奇指给我们看那些疯狂的等高线，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可能它出现在英国沼泽地中会更自然。黑山人一直表达对黑山的惊讶，这暗示着，他们仍然保留着塞尔维亚帝国时期，家在平原山谷中的传统记忆。

“台球室”的旁边是采蒂涅修道院。它是15世纪的建筑，17世纪晚期的修复工程让它有了坚固的外观——黑山教会建筑的特点。它上面的岩石上立着一座圆塔的废墟，我认出来，这是一位英国人——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来到这里拜访王子兼主教彼得二世时觉得悲痛的地方。彼得一世，伟大的法律创建者，执政四十五年后，于1830年去世。继承其位的，是所有占据欧洲王座的君王中最有趣的人之一。这人曾受教于采蒂涅这座修道院，又受教于山下亚得里亚海岸上的萨维纳修道院——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一世在这里敲响离别的钟声，然后踏上去法国马赛的旅途，之后遇刺——再后来他受教于一个名叫米卢廷诺维奇的塞尔维亚诗人。历史学家总会喋喋不休地说东正教的修道院就是无知、迷信和淫荡的老窝，而塞尔维亚就是一群赶猪人的国家。彼得二世会说德语、法语、拉丁语和俄语，学习了每种语言的文学；他是位可敬的执政者和法学家；他也是哲学学生，聆听过深奥的神秘主义讲授；他是一位高产诗人，创作过《发现微观世界》，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玄学派诗歌作品之一。那个时候，英国在位的国王是威廉四世。彼得二世只离开过他的国家一次，那次他在圣彼得堡被任命为主教，与俄罗斯结盟。但他经常接待国外来访者。他如画般的外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俊美非凡，比一般的黑山人长相更加精致；他的头发黑长，胡须黑亮，面色白皙，嗓音尤其甜美，身高两米左右。他戴着一顶在那个时代十分流行的红色毡帽；穿着猩红色的皮草饰边的皮质上衣，白色外套，全蓝色的马裤；系一条猩红色的腰带，上面挂满武器；脚穿白色长袜和土耳其拖鞋。一条飘荡的黑色领带让他看起来有些古怪，这

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他深受其影响；手上还戴了双羔皮手套。

所有外国访客中，彼得二世最喜欢招待的是法国历史学家拉马尔廷，并对其作品由衷地赞赏。但是，他也不得不忍受不那么杰出的客人。如果是英国人，通常历经艰辛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到达之后，却缺乏智慧和见识发现有趣的东西。在《布莱克伍德杂志》1845年的一月刊上，除了关于大仲马新近成就《三个火枪手》的评论文章，还有一个英国官员和他的妻子记录的他们对王子兼主教的拜访——彼得二世那时正在斯库塔里湖里耶卡之外的岛上指挥军队。他们的旅程可能真是惊心动魄。黑山人是彻头彻尾的职业军人，特别专业化，以至于不能从事任何其他职业，给这对夫妇留下的印象竟成了“业余士兵”。而且他们怀疑，彼得二世只是在等待从他的属地捞够钱财，然后跑到更文明的国家去。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倒不至于此，但他肯定够让主人恼怒的。他十分欣赏彼得二世最拿手的小技巧——击中由一名随从抛到空中的柠檬（他认为这是“主教唯一的成就”），觉得彼得二世的这项天赋比其执政能力高得多。但采蒂涅旁边的圆塔让爵士大为震惊，因为上面全是土耳其人的脑袋，插在木桩上，周围乱七八糟地堆着骷髅头。

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写道：“一个年轻人的面孔引人注目。他的上唇收紧，露出一排白牙，表达出惊恐的表情。在死亡那一刻他好像忍受了很多，惊骇或者痛苦。”这景象让他十分悲伤，这的确是个可怕的证据，证明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想对彼得二世进行劝诫，后者厌倦地告诉他没办法。如果黑山人停止对土耳其人以牙还牙，土耳其人会觉得他们力量虚弱，因而进攻他们。他其实也可以指出，黑山人坚定地觉得必须砍掉战场上受伤同胞的头，以免土耳其人活捉他们，施以酷刑，残害他们。他们对土耳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然也是无可非议。

加德纳爵士深感惊骇，启程去了黑塞哥维那。在莫斯塔尔的维齐尔的宫殿里拜访时，爵士更为震惊地发现，宫殿旁边的圆塔上插着许多黑山人的头。他也想进行劝诫，但维齐尔说自己也没办法，黑山人对待可怜的土耳其人令人发指的残酷，土耳其人其实十分无辜。加德纳爵士提议由自己出面宣布停战，和彼得二世进行会谈，但提议被维齐尔当场否决，说东正教教会的所有教徒都是骗子，但维齐尔承诺，如果黑山人停止砍土耳其人的头，那么土耳其人也会停止砍黑山人的头。加德纳爵士相信了，给彼得二世写信，告诉他维齐尔是个好人，急切地想就目前的虐行达成人道主义协议。彼得二世不可能对这封信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不可能指望一个家族两次享有他叔叔彼得一世获得的成功。当拿破仑的元帅马尔蒙在同样的话题上对他进行指责时，他回答：“这事情会惊到你，我才觉得吃惊，你们法国人把你们国王、王后的头都砍了。”于是他颇有满足感地回复，说

莫斯塔尔的维齐尔实际上不是个好人，不可能被人道主义考虑所感动，因为他的残忍臭名昭著，甚至经常钉死活人。所以，除了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别无其他补救方式。

彼得二世四十七岁逝世，就黑山人的自然死亡而言，他的寿命短得荒谬。他身体虚弱，也许是因为文学爱好的原因。他的导师，塞尔维亚诗人米卢廷诺维奇，曾在德国居住，深受浪漫主义学派的影响。从他们那里，诗人相信了暴风雨对创作灵感的升华作用，养成习惯，带领他如痴如醉的小学生在脆弱的幼年时期，冒着滂沱大雨翻山越岭，以帮助年幼的彼得二世实现升华。不论如何，可怜的彼得被他的命运折磨得筋疲力尽。很多事情实属不易：作为一个俊美的巨人，有着弥尔顿式的诗词天赋和圣人般的善良天性，又必须在高贵的野蛮人国度里成为首领，残酷地为每一片文明而争斗，道德谜题不断地噬咬他的宗教和民族信仰根基。如果文明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为什么西方文明世界对他国民众的悲剧无动于衷，却对他们的压迫者如此友好呢？

因为彼得二世，统治王朝丧失了道德激情的全部力量，这也不足为奇。自把马丁诺维奇兄弟派去执行可怕使命的那位伟大的王子兼主教达尼洛一世起，王位变成世袭，从叔叔传给侄子，或传给同一家族内收养为侄子的其他成员，各方都须在神前发誓遁入空门。彼得的侄子达尼洛王子，废除了这项条件，因为他已经安排好迎娶一位相貌出众，且教养良好的达尔马提亚塞族姑娘，可他也公正地认为自己是合适的统治者。所以他修订了宪法，把所有的神职权力给了采蒂涅大主教，而自己作为世袭的合法王子，享有所有的世俗权力。随即，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勇气和远见，给自己招来了漫长的噩梦。他支持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王子——卡拉乔治性格温和的儿子，在米洛什和迈克·奥布伦诺维奇被驱逐出境之后登上王位。他继续支持卡拉乔治维奇王子的中立政策，拒绝牵涉进大国势力间的阴谋争斗。这并不容易。他和卡拉乔治维奇都不能抵制外国势力想把他们牵入违背他们自身利益的战争的企图时，难免受其羞辱，而他们的臣民对这些羞辱深恶痛绝。

达尼洛不愿帮助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土耳其，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土耳其人会对黑山发动比之前更猛烈的攻击。因为他的臣民倾向于俄国，他的处境就像面对暴动船员的船长一样。同样，他也不愿成为奥地利人的工具，后者出于报复，一直密谋反对他。1858年，他的政策似乎并未顺利施行：土耳其人全然不顾及黑山在克里米亚战争保持中立对他们的好处，仍然对他的国家发动进攻。但达尼洛早在国家西线上有所准备，在格拉霍沃战役中一举粉碎了进攻军队。第二年，他失去了合作伙伴，但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被废黜，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登位不久便由他儿子迈克继位，这是现在公认的一位天才。如果

这两位卓越杰出的人没有遭遇行刺的话，很难预料他们会为南斯拉夫做出怎样的贡献。

1861年夏天，达尼洛王子的王妃，达尔马提亚的达琳卡，遵医嘱要进行海水浴，准备在科托尔待一阵子。她的丈夫坚持同行，尽管他的大臣们警告他，在奥地利的国土上，他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在晴朗的傍晚，科托尔的民众们会聚集在有乐队演奏的海滨小公园里，王妃经常参与这些小娱乐，然后划船返回别墅。一天夜晚，达尼洛正牵着王妃的手上船，这时枪声响起，他应声倒地而亡。一个黑山人用手枪击中了他背部。“谋杀他的人，”萨瓦正带着我们穿过宽阔、敞亮的采蒂涅老街走向市中心，“是个男人，妻子受到达尼洛王子的引诱。”

“当然不是。”我丈夫很肯定地说。“为什么呢？”萨瓦很惊讶，“你听说过不同的故事？”“没有，”我丈夫说，“但是我没见过哪个国家会像这样，把所有的要点都完全遗漏掉。达尼洛王子不可能把这个女人带到科拉辛周围的树林，因为在他当政时，那里一直是军事活动地。他当然也不可能在采蒂涅和她秘密约会，因为我估计，采蒂涅有四五千居民，关注点都在王子身上。山谷里的每层岩架和瓷器柜架一样暴露无遗。黑山唯一适合男女秘密幽会而不会被发现的地方，估计也就在山顶上，但是那里冬季冰天雪地，夏季蛇虫肆虐。农民也许会克服这样的困难，但王子不会。”

“不管怎么说，”萨瓦冷淡地说，“大家都知道是这么回事。男人的妻子被她的部族驱逐，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丈夫问：“在黑山，不忠的妻子都是这样受罚吗？”“是的，”萨瓦油然而生一股庄严感，“我们现在也把她们赶出家门。”经过我们的观察，萨瓦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人际关系很好，他的亲戚、秘书、仆人都喜欢他。“更早的时候，她会被处以石刑。”“那我觉得很好奇，”我丈夫说，“在这个国家每一寸土地都有主，每一个人都供神，可是对女人放纵的惩罚真是非常严厉，像把《圣经》中的夏甲驱逐到沙漠里一样。我觉得这样的严厉并无必要，因为你们的女人是最没有放纵冲动的类型。她们会觉得淫荡比守节带来的压力和困难要多得多。”我丈夫说这话并无心机，可他却把我们的主人置于一个矛盾的两难境地。因为萨瓦既想同意他的说法，黑山妇女天生就纯洁得忠贞不贰，又想坚持说黑山人履行着神圣的职责，保护他们的家庭免受任何可能的玷污。

萨瓦的英俊面孔上蒙上一层阴云。他把话题转移开来：“了解这个男人准备他的复仇有多仔细，是很有意思的。他离开黑山后，去了希腊的岛屿上，以捕鱼为生，然后回到科托尔。所有的希腊水手说起他来，好像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那里没有人意识到他曾经是个黑山人。所以时机来临时，他很容易就接近达尼洛王子了。”“这很奇怪，”我丈夫说，他有时候很像一只小狗，非常偏执地确定玫瑰花坛下埋着什么东西，“如果一个黑山

人相信他的统治者勾引了他的妻子，会在任何地方开枪打死他，而不是一定要在采蒂涅，因为他可以不受任何处罚。”对此，萨瓦没做任何回答。后来我们发现自己触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处疑点。那段时间，因为达尼洛向部族推行新法典，非常严厉地处罚匪盗行为和氏族仇杀，一群反对新法的黑山人被流放，在扎拉——奥地利达尔马提亚的首府——避难。行刺者无疑就来自这群人。他们靠着奥地利政府发给他们的救济金过活。达尼洛拒绝向奥地利屈服。人们也应该记得，七年之后，塞尔维亚的迈克王子同样得罪了奥地利，也因为所谓的——其实是最不可能的——卡拉乔治维奇阴谋而倒地。为了避免黑山人令人困扰的推测，他们喜欢把故事讲得像歌剧情节一样让人难以置信，比如受了屈辱的丈夫在希腊岛上游荡数年，以准备一场他本可以在家门口执行的复仇行动。

从这桩悲剧中可以看到，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将各大势力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定义为堕落也不为过。把刀插入好人的背后已经很坏，更坏的是，曾经被赋予中世纪美德多于中世纪罪恶的农民斗士，在其影响下变成了导致自己民族效力于西方金主的怂恿者。这个堕落的过程留下的纪念，有仍立于采蒂涅的空空如也的大别墅，它低劣浮夸的设计与庄严、朴素、脆弱的松木瓦房——典型的黑山建筑——形成了对比，警示作用很明显，因为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一个原始社会企图改变自己，以符合一个高级得近乎颓废的社会的标准。这是尼科莱斯的宫殿。尼科莱斯是黑山被并入前最后一任统治者，先是这里的王子，然后自升为国王。他是达尼洛的侄子，其兄弟米尔科的儿子。作为将军他赫赫有名，却也有吝啬鬼的坏名声。他能继承王位，是因为达尼洛膝下只有一女。在他身上留存了许多家族禀赋，却没有丝毫道德激情。他是最难以相处、令人尴尬的那类怪人，是个有意识的丑角。他喜欢做些荒诞的事，让人们嘲笑他，然后把脸掩在手后嘲笑他们，觉得欺骗他们如此容易；他身上没什么好情感，只剩下揶揄和窃笑。

尼科莱斯是个颇有文化的人。他在巴黎接受教育，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一些英语；他的文学天赋也很高。作为军人他表现不凡。达尼洛的去世造成国内惊慌失措，土耳其乘虚而入，攫取了大片肥沃良田。他把土耳其人驱赶出境，在位二十年间还打下了不少土耳其的领土，到巴尔干战争结束时，他的王国面积翻了一番。他还是个机敏过人的政治家，不仅能在最困难的过渡时期引导他的民众，而且和迪斯雷利、格拉德斯通这些欧洲政治家在一起时，也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但他损伤欧洲的那些低劣笑话，让他的形象成了个自吹自擂、狡诈奸猾、肆无忌惮的农民。他假装出一副笨拙简单的样子，大及他手下臣民的一般举止，与他风度翩翩的伯祖彼得二世比起来，更是有天壤之别。在外交事务上，他也假装以农民的思维来处理，就像在市场上挑起牲口贩子之间互斗一样。好像是他的良心，让他想要通过自己不合礼仪的外在行为，来牺牲自己应得的公共尊

重，以放弃他和大国势力间的秘密关系。

这些关系令人反感。尼科莱斯活着，活得很好，靠着土耳其、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的拨款。他斜着眼宣布：“Ich bin ein alter Fechter（我是一个老战士）。”Fetcher意为“战士”，也是德语里的一个旧俚语，表示“借用人”。但他的臣民，被贫穷折磨得痛不欲生，却从来没有获益。他对他们敲骨吸髓。饥荒时期，俄国人给他挨饿的民众送来粮食谷物，他却不分给民众，反而卖给那些买得起的人。1913年他夺下了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镇，之前他的两千士兵在七个月的围城战中丧生。他借着这场战争，在维也纳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中挣够了钱之后，又把城镇交了出来。他把自己摆上拍卖台，让各大势力出价，得出结论，奥地利的物质刺激最令人满意，于是委身于它，同时让自己的民众一贫如洗，苦不堪言。他曾在国外受教，他的家人总是很看重出国旅行的价值，他却只让几个特权家族拥有护照。他竭尽全力让他的臣民像愚蠢的斗鸡，让他的军队尽忠于一国，以便有机会向另一国索要更多的拨款。他让他们的道德退化得极其彻底，以至于他们在巴尔干战争中征服佩奇、普里兹伦和达亚科维察之后，完全无力统治它们。黑山连能够识字的人都不多。其实有足够的外国拨款流入这个国家，让每个男人女人都能接受良好的入学教育。尤其讽刺的是，尼科莱斯外表高尚而浪漫，看上去像子民的慈父一般。在许多亚得里亚南部城镇的文具店里，还能买到明信片，上面的国王尼科莱斯挽着庄严的王后，像主神朱庇特和朱诺一样，走过鲜花装点的大街，旁边身着白色长礼服的黑山男人们，和身着黑色短上衣和白色礼袍的女人们，鞠躬行礼，像听话的孩子们。

他的统治在背叛行为的顶峰上不断创新高度。1914年，他已在位五十三年。“一战”爆发时，他立刻给贝尔格莱德发电报，向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国王承诺，他和他的臣民会一直支持塞尔维亚直到死亡。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联合进军波斯尼亚，战事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很快将荡平萨拉热窝。正当城市即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他们之手时，尼科莱斯毫无征兆地撤走了他的军队，塞尔维亚人也被迫后退。第二年，塞尔维亚军队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国家，翻山越岭向海边行进。这时，一道皇室命令颁布给黑山军队和警察，命令他们禁止民众将任何食物送给或卖给饥饿的士兵。1916年，尼科莱斯的儿子彼得王子，将洛夫琴山交给奥地利人；尼科莱斯把他的军队，大概五万人，调到铁定会被奥地利人夺取的地方，而他自己离开了他的国家。他和奥地利人的关系已然恶化，但他还是把他的军队出卖给他们，因为他担心，如果黑山军人像塞尔维亚人一样逃到科孚岛，他们会起兵废黜他。之后，他逃到了法国。法国官方允许他留在那里，主要是因为这样便于密切注视他，而不是出于其他原因。黑山在奥地利人的铁蹄下，每一道岩石缝里都塞满了死亡、饥荒和痛苦。有人建议对这个国家实行和比利时一样的补给，尼科莱斯拒绝了。“让他们等着，”他说，“等我回国的时候，

我会带回大量的补给，这样我必定最受欢迎。”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山坡上遇到的那位妇女，正身处集中营中，眼睁睁地看着她女儿死去。

我们本来安排的是在宫殿外和康斯坦丁会合，但他不在那里。这个纪念物代表着斯拉夫历史上尤其丑陋的节点，在这里等待让人不快，而且，很可能他迟到是因为他想找出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消息，而这消息也许压根就不存在。“过马路来，”萨瓦说，“看看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的出生地。”这是一座宽敞的建筑，不像大多数黑山房子那样逼仄粗糙。可能它的灵感来自对早期塞尔维亚农舍的回忆，那些房子朝着茂盛的绿草，而不是无边的岩石，因为房子是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在成为塞尔维亚国王前建的。1883年他在这里召集黑山军队。话说，尼科莱斯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是以智慧和骄傲著称的某部族的成员。她的兄弟，武科提奇，在黑山很受爱戴，因为他热心为公，临财不苟。多亏他的王后，尼科莱斯有几个漂亮的女儿，他把她们安插到整个欧洲，以配合自己的外交策略。一个成了意大利王后，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这位女神习惯于自己国家的古典华美礼服，可这会儿戴着茶盘大小的帽子，穿着像把人分成两半的高腰衬带裙子，显得很别扭。人们认为她与生俱来地野蛮和粗俗。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奥地利贵族。有两个嫁给了俄罗斯大公。还有一个，佐尔卡，给了彼得·卡拉乔治维奇，最好的原因便是以此削弱奥布伦诺维奇家族的声望，进而在塞尔维亚制造麻烦。

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建了这座房子给佐尔卡公主，与她父亲的宫殿隔路相望。现在，这里成了驻守军官的俱乐部。上楼梯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小伙子们，带着斯拉夫职业军人的庄严神色，紧靠着墙壁，以便我们能够爬上楼梯，看看佐尔卡公主的房间。公主那时也不比他们现在年长多少，在这里生下孩子们，然后去世。房间狭长、低矮，有三扇窗户朝着外面的树叶；一行树就排在这道没落皇族的死胡同边，排得很长，夏天绿叶荫蔽，房间里的人会觉得自己仿佛身处乡间。可以想象，一个女人，若有个好丈夫，譬如冷静的头发斑白的彼得，可能会享受躺在这里的感觉，忍受着生育的剧痛，想着疼痛带来的成果，这疼痛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她，要计算因为早逝而获益多少，想想就有点儿骇人。

佐尔卡公主在这间房里生下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活了下来。最年长的乔治在黑暗中枯坐多年。叶琳娜嫁给了大公康斯坦丁，亲眼看着丈夫被布尔什维克谋杀，最终与她的家庭闹翻，被放逐在外。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在马赛被谋杀。然而，或许她可以承受住这些悲剧。墙上挂着她的照片，展示出铸造她的模子，带着英勇特征。她可能更难以忍受她父亲干的那些龌龊事，比如1907年的炸弹丑闻。那时候她丈夫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已经登上塞尔维亚王位，统治国家很成功，因此成了尼科莱斯的妒忌对象。这很符合奥地利人的计划。许多年前，奥地利人就打算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如果能说服欧洲，贝尔格莱德是罪恶和腐败的中心，完全不适合拥有新鲜领土的话，他们早就放手开干了。奥地利也想离间黑山普通民众对于塞尔维亚怀有的兄弟情谊，让塞尔维亚孤立无援。所以，尼科莱斯便宣布自己是炸弹阴谋的受害者。

炸弹当然是存在的。它们装在普通的旅行皮箱里，被送到两处不同的边防检查站——哪怕是最天真的密谋者也会预见它们会被边检官员查到。炸弹的行踪被一个斯拉夫人报告上去，这人叫“纳斯蒂奇”（与“nasty（令人讨厌的）”形近），人如其名，的确令人讨厌。这家伙提供出加工过的可怕证据，证明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已经堕落，依靠着各大强国过活，已不再是英雄。他的祖父为土耳其人监视自己的塞尔维亚同胞；他的父亲为波斯尼亚的奥匈政府监视自己的塞尔维亚同胞和克罗地亚人；他自己监视自己的塞尔维亚同胞、克罗地亚人和黑山人，先效力于波斯尼亚政府，后服务于奥地利外交部。他做的最高尚的事，得算是顺手牵羊拿走维也纳歌剧院的观剧眼镜了。他参与了臭名昭著的萨格勒布最高叛国罪审判，为弗里德永教授，一个反斯拉夫的奥地利历史学家提供证据。教授是个诚实的人，后来发现自己不得不宣布废除这些伪证。纳斯蒂奇还负责许多其他案件，尤其在萨拉热窝，这些案件意味着监禁，甚至处死品德高尚的斯拉夫人。正是这个纳斯蒂奇，发现了炸弹寄送给一个反叛的黑山团体，他们打算用它们来炸国王尼科莱斯和他的宫殿，执行人为国王的外孙，塞尔维亚的乔治王子，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的长子。这当然是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乔治王子已经被他的家庭认定为行为反常的人，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挚爱的妹妹叶琳娜正和她的外祖父在一起。不论如何，阴谋还是得逞了。它更添了贝尔格莱德和卡拉乔治维奇的恶名，也让奥地利的金主出手更加大方，而且让尼科莱斯有理由处死许多黑山人，监禁更多的人。其中两个，就躺在我们在安德里耶维察城外的路边看到的坟墓里。

我们离开这座朴素而充满悲剧的房子，在宫殿外发白的街道上来回地走，一股19世纪欧洲的臭味强烈地冲击我们的鼻孔。是奥地利腐败的尸体感染了黑山，黑山好像把仇报到了另一个皇室成员的头上。“有点奇怪，在我们宫殿的外面——其实这宫殿既不大也不堂皇——就是俄国的废墟。你不知道吗？国王尼科莱斯的长女米丽察嫁给彼得大公为妻，她上了年纪之后对宗教方面的秘密行为非常感兴趣，其中包括假装有远见和能创造奇迹的修士或牧师。她的口味众人皆知，于是就有人把拉斯普京[注]带到她面前。正是她和她的妹妹——大公夫人安娜斯塔西娅，把他带去了沙皇皇后那里。这点尤其奇怪，因为我们的妇女通常都是非常明智的。不过，我们进去宫殿里面吧，这里现在是座博物馆，虽然没什么重要的展品，至少也是消磨时间的方式，反正我们也得等康斯坦丁先生。”

这里自然是个消遣的地方，不过就像在这个钟头看到的其他地方一样，也是死一般的阴气沉沉。我们一进宫殿，就想起了第三帝国的瓦解，这倒不是因为臭气，或者白痴的幽灵回音，而是因为香味。国王亚历山大设计的省份制，把采蒂涅划归在萨拉热窝的中心控制之下，这里的穆斯林政党影响力很大。于是，黑山国家博物馆的展出内容主要是五个世纪以来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事记录，现在却由一个戴着毡帽、遵从信仰的土耳其人掌管。他不是波斯尼亚穆斯林，而是真正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许多黑山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对黑山历史的公然侮辱。从另一个理由来说，这种安排也引起了异议。一个土耳其绅士不应该被置于公众面前，作为战利品展示。沿袭当地的老传统倒是会仁慈得多，在修道院上面的山上竖起圆塔，挂几个穆斯林人头在木桩上。

表面上这位馆长一切都好好的。他体形微胖，面带酒窝，用单纯平和的礼貌精神带我们参观博物馆，说着如玫瑰果酱一样甜美的东方法语。但他所有的动作都展现出对于体系的完美的适应。那体系不在那里，他既不能服务于它，它也不能回报于他。宫殿的餐厅现在存放的是尼科莱斯收藏的东西式武器。他的藏品很广泛，因为从杜布罗夫尼克到君士坦丁堡的贸易路线途经黑山，黑山人经常选择以令人生畏的新式武器为工具，向旅行者收取他们提供服务的费用。戴毡帽的馆长走过这些武器，一会儿抚摸一下穆斯林弯刀的回火，一会儿展示一下早期步枪原始但精巧的上膛装置，对掌握的技巧感到骄傲和愉快，每一门技巧都微妙地指向个性化战争的某个阶段，那时候的男人还不得不依靠他的马匹、铁匠和勇气。那个阶段已经结束，它指向的是虚无，绝对的虚无。

很容易驳斥这样的观点，说既然飞行员也不得不依靠他的飞机、技工和他的勇气，那个年代和今天仍然有联系的桥梁。但飞行员的生活没有哪部分是悠闲从容的，他们不懂得土耳其人在狂热和放松、邋遢和优雅之间的平衡。一个上了年纪的空军中将，和一个等待时辰升天进入穆罕默德天堂的帕夏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西方人脸上存在的东西会更多，也更少。土耳其人精神宇宙已然毁灭的证据层出不穷。在馆长抚摸剑锋时，他的手肘边是一张死亡面具，从一颗帕夏的头上摘下来的。他的头来到黑山，身体却没有。很奇怪，它看起来不是亚细亚风格；如果有人告诉我它代表拿破仑三世，我也会相信。事实上，这个帕夏不是土耳其人，而是波兰人，跑来为土耳其作战，不过是因为土耳其是俄国的敌人，而俄国是波兰的压迫者。过去，土耳其人兴高采烈，被这样的欣喜刺激了灵感，创造出全世界的最佳秘密活动——利用基督教内部相互的仇恨让自己占便宜。这种仇恨在他们看来总是很荒谬，因为他们之间穿着一条愚蠢的金线，那是对和平的向往，对和谐的偏好。但是，如果现在这种秘密动作仍然存在的话，人们会发现，基督教的仇恨属于更加低劣的不同类型，不那么容易被愤世嫉俗的情感所利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愤世嫉俗的。它的当权机构对它完

全无视适度的行为大感恼怒。它对于钱财经济的关注，在那些鄙视商业的人眼里，实在有损尊严。

馆长在带我们上楼时，自己也成了忧伤的一幕。楼上曾是皇室家族的私人房间，历史的古物自身充满魅力，对历史学家来说却是有误导性的。一个曾在宫殿里做过活儿的仆人告诉我，国王住在这里时的面貌和现在截然不同。国王离开时，大多数家居用品也运走了，我们看到的家具是送给国外皇族的礼物，他从没用过。如眼前所见，它代表着一些美好的时光。一张巨大的北极熊地毯摆放在客厅地板上，地板装饰成朴实的蓝色；椅子的刺绣花纹中反复出现字母N，代表着尼科莱斯，以及拿破仑；墙上挂着家族以及同时代皇族的肖像，它们无疑是真实的。照片大都褪成了最苍白的棕色，鸡汤的颜色。作画的艺术家力图显出照片般的精确，绘出模特衣物上的纹理，尤其当面料闪亮耀眼时。就在这平凡无奇的物质上，馆长努力地用尽他的土耳其感知，他的感知简单得在我们看来有悖常情。

“看看这毛绒！”馆长在画前面说，全然不掩饰自己垂涎欲滴的样子。“这缎子！这皮草！漂亮的女人！”在褪色的照片前，他喃喃地念着名号，“王子殿下，王后陛下”。他将每一个照片中的人都称作苏丹或苏丹王后，照中人在金色的穹顶下斜靠着丝绸垫子。作为西方人，总是对隐藏的含义念念不忘。我们想着：“这些物质和名号到底在这个土耳其人心中唤起了怎样的梦想，让他如此欣喜若狂？”可是我们错了，他欣喜若狂只是因为毛绒深长，因为绸缎亮泽，因为皮草柔软而温暖，因为珠宝熠熠生辉，因为漂亮的女人漂亮——还是女人，因为当王子或王后比当奴隶好。这正是他和蔼亲切的证据。他特别努力地在这间屋子里感受兴高采烈，这里曾试图展现壮观和优雅，尽管这意图并没有十分成功地实现。他表现了自己的种族真我。土耳其人会在任何一个号称接近自然美景的小咖啡馆里聚会，可能是一片小树林或者一挂小瀑布，哪怕是最不堪的样子，几棵营养不良的树或者一股细水，他们也会刻意地对宣称的宜人景色表现出欣喜状态。令人嫌恶的是看着人们摒弃这种天赋，却努力像癫狂、虚弱的西方人一样，调查、分析，尝试实验，它们都指向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比如精神奋发。继续实施其天赋需要英雄气概。这些画像，它的唯一对象，在其幽灵感觉方面颇为相似，不管它们是褪色的照片，还是颜色过于鲜亮的图画。

博物馆里还有其他游客，这会儿就剩了萨瓦、我丈夫和我，单独待在曾是某位公主闺房的小房间里。里面的装饰是一架华丽的立式钢琴和一幅织锦画，画上的威尔第穿着白色的鞋罩。房间看出去是宫殿花园，现在成了一座公园，眼下却正用作某人晒床单的地方。我不禁想起曾经在萨拉热窝的街上看到的无数戴毡帽的男人和蒙面纱的女人，他们孤寂地离开，因为新土耳其的代表们冷冷地看着他们，告诉他们，旧的土耳其，他们曾经的母亲，已经死亡，已经被埋葬。我问萨瓦：“旧的土耳其烟消云散，这位馆

长是不是很不开心？”“的确不开心，”萨瓦回答，“最近一队土耳其记者来参观时尤其明显。这个可怜的人对他们的到来抱着最大的期待，你知道吗，因为这里的穆斯林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多么彻底地被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们喜欢认为是南斯拉夫政府让他们不能和他们的教友交流。所以，之前数天，这个可怜的人就只谈这件事，为迎接他们的到来制定了无数的计划。可是当他们到达这里时，却全无兴趣和不守秩序的他见面——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等了他们多时。见到他们时，他显然很吃了一惊，因为我们的穆斯林不曾料想到，土耳其的土耳其人穿戴如同基督徒。然后，当他对他们发表自己的简短言辞时，他们没有立即回答，却首先说：‘我们觉得你戴着毡帽不太好。阿塔图尔克不希望我们戴土耳其毡帽，他是我们现在追随的人。’他们说完了这个话题后，馆长带他们去看展品，把帕夏人头的石膏模型指给他们看，觉得那是会让他们难过的东西，因为那个可怜人曾是苏丹和穆罕默德的忠实仆人，黑山人砍下他的头，把它带来这里，印了石膏模型以便可以对着它欣喜若狂。但土耳其记者对这些充耳不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想这些了吧。他曾经是我们的一个战士，他的头被砍掉。但是是我们自己把这种砍头文明带进欧洲的，阿塔图尔克教导我们，不要为此而自豪。’在这里的参观不成功。可怜的馆长认为，那晚在这里的酒店招待土耳其记者，也不是一次成功的宴会。因为黑山这里有一种可口的生火腿，他们那天吃了很多。馆长简直看不下去。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不仅在所有规定的时间里铺好地毯进行礼拜，而且遵守所有禁令，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看到土耳其人吃猪肉——这种先知认为的所有的不洁物里最不洁的东西——是什么感觉。他不饮酒，这些记者却喝了很多拉基亚果酒。但他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站起来说自己感觉不舒服，必须回家了。他们也非常有礼貌，说很遗憾，希望他早些康复。当然，他们的希望也的确必要，因为此后多日，馆长看起来就像个病人。”

我把脸靠在窗玻璃上。下面的花园里，一个妇女跪在床单旁边，用手指摸着，看床单干了没有。她指望它们现在干，肯定是黎明时就晾出来了。两个乱蹦乱闹的小孩后面跟着个苦着脸的姑娘，多半是个德国或者意大利的女家教。做苦力或者被流放，都比遭受这个土耳其人的遭遇强。一个人猛然发现，从父母和学校得来的信仰，曾是和其他同胞打交道的基础，现在信仰却被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摒弃了。就像行乞者遭遇了没面包的厄运。这种匮乏会带走一个人的胃口，因为能否活到明天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谜题。我告诉自己：“如果民族信仰破灭，这些总是会发生。当然土耳其的信仰已经破灭。凶残和纵欲，尽管和更优等的伴侣——勇气和美丽——相伴而行，显然是不足够的。死神必须被允许带走死者。一种文明若不能站立，必然倒下。”

过了一阵子，我相信我什么都没想，只看着女人收好她的床单，姑娘呼唤着她的学生。当他们不睬她时，她重重地加快了脚步。我的心思转了回

来。事实上，我肯定想了很多事情，全是令人不快的。我暗想：“我的文明肯定不会死亡，它无须死亡。我的民族信仰依然存在，不像奥斯曼的信仰已然破灭。我知道英国人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不健康，相对于完美的健康而言。他们没有全身心地，如同他们应该的那样，去感知或工作。他们缺乏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的意愿，对于别人的灵魂，总是紧闭心门。但他们热爱生命，维护公正，憎恨暴力，尊重真理。他们在处理印度和缅甸问题时并不总是这样；但那不是他们的错，是帝国的错，它让人拥有了控制力以外的东西。但是在他们自己内部，在处理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时，他们学到了基督教教训的某些部分，比如我们有打压良善的倾向，所以我们必须规避自己的野蛮。这样的明智之举让我们的文明不至于枯萎腐朽。”

萨瓦对我说：“我想让你注意一下那边的马车房。多年来那里一直堆满了货箱，里面装的是衣物珠宝等值钱的物件，是尼科莱斯和他的家人的私人财产，他们匆忙逃往斯库塔里时，把东西留下了。尽管我们的人很穷，而且习惯于把劫掠当作军事技术的现实部分，却没有人动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拿走他们失德国王的东西有损体面。”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但他的语气，他的形象，建立的仍是单调不变的黑山英雄主义白色柱列，在沉闷乏味的胜利神庙下。我感到一阵厌恶情绪，如果不想和土耳其人处于同一困境，我最好能够停止这种感受。如果我希望我的文明遭受攻击时仍然能够幸存——从这趟旅程中我应该知道它将遭受攻击，尽管我启程时一无所知——我必须愿意为它而战。这种必要性没有降低，因为战斗意味着牺牲大多数难以捉摸的变化，这些变化本是知识分子乐于强加给本能生活的。我必须愿意为它而战，尽管我的目标让自己排斥。既然文明的本质是对暴力的厌恶，当我护卫它时，习惯会让我担心，是否正在背叛它。

“肯定的，肯定的，”萨瓦说，“康斯坦丁这会儿肯定已经到这里了。”我们下楼时车已经在那儿了。德拉古廷站在车轮边，康斯坦丁坐在座位上。两人的姿势不祥地统一，都交叠着双臂，下巴垂在胸前。“我的上帝，”萨瓦说，声音很低，“这个贝尔格莱德的疯子现在又在干什么？”我丈夫走上前，问康斯坦丁：“你弄清楚阿尔巴尼亚发生什么了吗？”“没有，”康斯坦丁说，“我把电话打到贝尔格莱德，和我们部门通了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通谈话肯定耗时很久。”萨瓦说。康斯坦丁像玩偶盒里的玩偶一样弹离座位。“没有！不到二十分钟，不，连十五分钟都没有！我在想，你是不是把我们的电话泄露给了外国人！从那之后我就有了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做。”他重复着，凶狠的目光落在德拉古廷的肩上。“听着，”德拉古廷说，“光听就行了。采蒂涅没有汽油，一点都没有，因为昨天的索科尔大会。本来我有足够的汽油拉我们上洛夫琴山，然后下到科托尔和布德瓦。在那里，我就可以想加多少油就加多少油了。但现在别想了。哦，不！现在我们必须走进每一个苍蝇乱飞的旅店，每一个自称汽修厂的鸡

窝，向他们乞讨他们有机会时在汽油桶里掺的什么马尿，直到我们能够开到海边，然后回去。上午已经过了。”“他搞不懂，”康斯坦丁傲慢地说，“我旅行经验多得很，我认识南斯拉夫、瑞士和法国的所有路。我开车也开得多，我总是会备足来回必需的汽油，因为我懂。”

我知道，他说这话时，自己听着都傻到极点；也知道，他开着车在采蒂涅到处跑是想弄明白点什么，不管是什么，反正不是德拉古廷的意愿所在。“但本来汽油是够去科托尔或布德瓦的。”萨瓦说。他也烦躁不安，很有欲望冲撞和侮辱一个塞尔维亚官员——这些人代表着强压在黑山头上的南斯拉夫当局。“你这么说，”康斯坦丁驳道，“你怎么知道呢？我告诉你，我旅行经验多得很，我都没这么确定。”他们重复了几遍这类言语的微小改版，似乎没有理由停止这场对话。于是我说：“现在我们直接去洛夫琴山吗？”转换话题的办法没有成功。因为萨瓦沿着路看出去，愤怒的声音尖得像打碎的玻璃：“看看发生了什么，你在采蒂涅来回跑，因为你认为亚得里亚海没有汽油。”

围绕城镇的环形岩壁上堆起了一层耸立的雾墙。“现在，”萨瓦说，直杠杠地，“他们在洛夫琴山上看不到什么景色了，那是全世界最美的风景，在塞尔维亚可没有任何类似的地方。现在他们再也看不到王子兼主教彼得这位诗人的坟墓了。现在他们再也看不到涅古什了，那是我们皇家王朝的摇篮。”“可能是的，”我丈夫说，“但也不是因为我们动身太晚，整个上午都有雾。”萨瓦怀疑地看着他。但我丈夫是知识分子，很善于说服别人。“我十分确定，”我丈夫接着说，“我七点钟在窗前刮胡子时注意到了。”德拉古廷通过其他人的翻译得知我丈夫的话时，看他的眼睛里一点怀疑都没有。后来德拉古廷告诉我，我丈夫当银行家和我当作家都是件憾事，我们要是卖东西的话必是前途无量。“现在，”我丈夫说，“就让德拉古廷载我们到任何雾薄点的地方吧，能看到什么就看什么。”

---

1. 拉斯普京（Rasputin，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宠臣，后引起公愤，被贵族合谋刺死。

布德瓦

我们站在山坡上一处圆形的小广场里。这里有我们自己、康斯坦丁和萨瓦、一座方尖碑和一排弯曲的栏杆。这处广场，是某种难以描述的神奇力量从浓雾当中辟出来的，距离观者五英尺以内的任何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之外的其他东西却茫然不可见。路上停着的车子成了一团阴影，除非德拉古廷不耐烦地按喇叭，否则我们几乎找不到他。之前某时，萨瓦曾伤感地告诉我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方尖碑那里的景色特别美，真是十分美丽。"他和康斯坦丁之间，就某个话题接着对话。话题来得太容易，找不到任何结束的出口。

"我告诉你们啊，"康斯坦丁说，"我们应该直接下到海边去。我很清楚雾天应该怎么办。我在日内瓦生活了很长时间，也经常观察降临在罗纳河谷的雾，我知道当雾像这样的时候是散不去的。带他们上洛夫琴山没什么意义。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但瑞士和黑山有什么关系呢，"萨瓦问，"瑞士这个国家往北离这里很远，位于大洲中央。条件完全不同。这里的雾倒像意大利的阿布鲁齐，我很清楚，这样的雾很有可能在任何时间里散去，他们就可以看见全南斯拉夫真正最美的景色了。""但上山没用的，他们看不见什么，完全看不见，"康斯坦丁说，"这是我清楚的，在瑞士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降到罗纳河谷的雾就像所有的雾一样，凭着它，你能够准确判断其他所有的雾。我跟你们说，我研究它们，研究了很多年。""但他们应该抓住每一个从洛夫琴山看风景的机会，因为没有比这更漂亮的地方了，"萨瓦说，"我必须指出，这里的条件天然地和意大利更接近，而不是和瑞士。这样的雾就是会散去。"他们说话间，康斯坦丁好像越来越矮，而萨瓦越来越高。

我丈夫和我走开了，几步之外，我们独自站在自己的空间里。"也许我们就是埃塞尔·史密斯的《救援队》注里的人物。"他说。"或者，我们是在我童年时坐的老地铁里旅行，"我说，"这样，我们最终就会参观到怀特利的动物园。"我们上方响起轻柔的马蹄声，德拉古廷的喇叭鸣叫声，一阵疾跑和训诫声，突然视野里闯入一名农民和载着木头的驮马，伴随而来的是香云氤氲。"你瞧，"我丈夫说，"他拿着那么大的一束水仙！"于是我们跟着他往下走了一小段路，走到确信萨瓦和康斯坦丁听不到我的破塞尔维亚语的地方。然后，我们跟他打招呼，让他卖给我们些。他回答："我很乐意卖些给你们，但我不能全给你们，因为我必须带些回去给我的小男孩儿。"他是一个眉间写满杀戮的巨人，很容易让人猜想他的小孩只爱玩手榴弹。

我们站着，沉浸在极大的满足里，鼻子埋在一捧清爽的鲜花中。这时，我们听到上方传来一阵躁动的呼喊。“喂！喂！”康斯坦丁叫着，停了一下又嚷道，“啊，那两人总是要节外生枝搞点事！”我们发出让他们安心的回应，有些不情愿地走向他们。一旦我们的朋友确定了我们的安全，瑞士和阿布鲁齐之间的比较就要继续进行了。但他们看到水仙时，停了下来。“你们从哪里得来的？”康斯坦丁笑道，急于让自己陷入困惑，“这可不符合我对英国银行家的想象——大雾天里让他在荒芜的山坡上逛，然后满手捧着花回来。”“是银行家的妻子。”萨瓦说。赞美有些词不达意，好意倒是显然。“光顾着说话，没闻到水仙的香味吧，”德拉古廷揶揄道，“我可是吸饱了，就像教堂里的香气一样美妙。现在回头看！别又开始说话，把美景错过了！”

我们下方的迷雾里出现一个银色的形状，可能是几码之外一只看不见的手里握着的镰刀，或是一弯巨大的倾斜得不自然的新月。我们正瞪眼看着，它变得更大了，可以认出是海湾的一线波浪。我们惊奇地呼喊起来，刚才我们都以为看见的东西高高地悬在地平线之上。浪潮消退，消失，但在另一个地方又出现一片像圆雕饰似的蓝海，一座蹲伏的岛屿像印在上面一样，它们这般完成了自己的定义，然后消失。在别处，我们看见阶梯状的岬角，像鼻子骄傲地伸出来一样，落在太阳金碧辉煌的尾迹中。围墙立起，我们又囿于自己的小空间里。“嘿，停在这里有什么用？”德拉古廷喊道，“跳进去！跳进去！下面的布德瓦是个好天气！现在走吧，否则我们午饭前就没有时间游泳啦！”我们沿着道路驶下去，进入剧院灯光般的耀眼阳光里。道路旁边有一个宪兵部，是1914年奥地利人没有建完的。在它无框的窗户上，闪动着钻石般的波光。我们的下方可见布德瓦，圆形半岛上的一座城墙围合的城镇，在蓝色海洋的映衬下，如同一只小白龟。金扫帚让阳光更加炫目，在每一个锄头未曾弥合的裂隙间泻下它的金鞭。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文明的地域，好像已多日不曾见似的，眼前的丰腴简直让波德戈里察周围的农田都相形见绌。这里的葡萄和橄榄葳蕤蓊郁，如同酒味香浓，油质稠厚。这里张狂的梯田里长满了傲然而立的小麦。达尔马提亚的土地其实并不是特别肥沃，哪怕是在南部这里。但我们看它的眼睛适应过马其顿和黑山，能够在满铺土壤的田地景象里发现某种程度的肥沃，土壤大概有几英寸的厚度。大海也让我们惊讶，它是自由和财富的象征。远处一艘轮船若隐若现，它的一柱直烟倒更清晰；近点的地方，一架游艇像只懒洋洋的信天翁，在看起来有些清透的小岛旁游荡；几只更小的船在更远处微波泛起的水域里，扬着白帆。这里许多人能够休闲旅行，不必把自己的鼻子贴在磨石边，唯恐自己被饿死。有些人买得起昂贵的物件，价格远胜于许多顿饭，能让许多的同族人伺候自己，能租赁各式各样并不那么必要的服务，让人们为他们造船，替他们挥桨。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我们几乎忘掉了这些东西。

土耳其人破坏了巴尔干半岛。破坏程度太深，它尚未被修复，也许已经不能被修复。布德瓦是其中一座较小的达尔马提亚城镇，因为位置太靠南，太容易受到海军进攻，对威尼斯没什么价值。然而我们发现它非常富裕，难以置信地未受攻击，十分稳定。这里有片市场，考古学家们相信从希腊殖民时期起就一直存在。城镇近陆方向的墙上缀着品红色的墙花，围墙下面两行桌子，安放在挺拔虬曲的悬铃木树荫下。农民们在它们前方的矮石凳上坐着，穿着黑色的乡间衣服。我兴高采烈地在这些人之中穿行。他们十分贫穷，他们的商品摆在任何一个西方市场上看起来都很可怜。但他们没有因为真正物质上的匮乏而显得瘦弱，没有哪个人是只摆了一小堆豆子在面前的。

眼前的丰盛景象，尽管完全是相对而言的，仍然让我们都感到振奋。我们在圣马可狮子下疾走，它立于城门上方，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没花多少时间欣赏如同中国匣子般整齐完美的城镇景观。景观里包含着几码之外的一座9世纪的教堂，教堂冷酷的外形很能表达早期的极端虔诚，还有悬着一挂红玫瑰的花园围墙，以及一坡石阶——它从一棵粗壮的悬铃木下的树荫里起步，一直延伸到洒满阳光的威尼斯堡垒高地。我们都分散开，去购买自己不怎么需要的物件，去感受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商品供应带来的单纯快乐。当我们再在商店门外会合时，我丈夫说："瞧，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个阿尔巴尼亚手工银扣。"我说："瞧，我给我们都买了泳衣。"康斯坦丁说："瞧，我给我的小儿子买了这两把土耳其匕首，老板说，我们吃午饭时会帮我做些钝化处理。"德拉古廷说："瞧，我给我妻子买了一双丝袜。"萨瓦穿过城门走向我们，说："在那边的酒店里，我点了胭脂鱼和薄煎饼当午餐。我们会在梯台上的玫瑰丛中用餐，但你们得赶紧，必须得赶紧！不快点的话，就没有时间洗浴、吃饭、坐船到科托尔了！"然而我们感觉世界一片空荡。

在马其顿的山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那里有拜占庭留下来的巨大无形宝藏，斯拉夫人被囚禁时，它们被拿出来赚进收益，现在累积得足以支持精神的探索；而在更穷的国家里，这些是不被考虑的。我们好像失掉了一笔巨大的资本，要面对的未来里，充满了吝啬的节衣缩食。

我们在走向海水浴场的途中，不时地停下脚步，回头看布德瓦的精致轮廓，看满足地躺在海湾之上的岛屿，以及在它们之后，立在半空的黑山堡垒。海滩上大概散布着三十个人，有成年人也有小孩，都沉浸在温和的幸福中，没有发出很嘈杂的声响。他们或在海里戏水，或在沙滩静躺，露出的躯体不够漂亮，但是干净、健壮。一个女孩递给我们毛巾和更衣室的票，顽皮地说："这么多男人和一个女人。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同伴们都坏笑起来，好像和我在一起真有什么浪漫目的似的。我们走出更衣室，滚烫的沙子灼烧着我们的脚底。人们躺在铺展的毛巾上，看我们蹦

跳着下海，露出懒散而并无恶意的微笑。我们走进海水中，没有觉得不适应，因为水几乎已经不是水了，海水和阳光融合在一起。一股魔力渐渐作用在我们身上，唤醒了皮肤，再是血液，然后是肌肉。我们依着习惯在水中游动：萨瓦和我丈夫用受训运动员沉稳标准的动作划过大海，康斯坦丁像一条强壮的猛犬将自己带过，而德拉古廷，相对于他平时去洗浴的河流，海水的浮力让他十分陶醉，他不停地在水面上翻来滚去。

“活着就是好的。”我对我丈夫说，我们站在更衣室外拧着泳衣里的水。“是的。”他说。康斯坦丁走出他的更衣室，像个花花公子一样向下攥着领带，说：“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个正直的人了。我知道我干净了，但我觉得我也正直了。”路过的一个小孩被他的脚绊了一下，他伸手拉住小孩的脖子后面，稳住了小孩。小孩用一种奇怪的歌咏调对他致谢。“小家伙是个捷克人。”康斯坦丁说，亲切的目光还跟随着小孩。“这里的大多数游客都是捷克人，”萨瓦说，“我们觉得他们是安静、诚实的民族。只有穷点的人会来这里，商人和职员们，因为这里没有现代的大酒店，但他们的举止再得体不过了。”“是的，捷克人很好，”康斯坦丁说，“我们南斯拉夫人嘲笑他们，但他们非常好，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两人赞同地点点头，环顾四周棕色的健康的人们。他们这会儿全都从海水里起来了，在正午的日头下一动不动地躺着放松。德拉古廷冲出他的更衣室，拍着自己的胸膛。“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他说，“给我来个土耳其人，来个克罗地亚人，来个德国人！”

我们回城的路上，萨瓦说：“现在你们见到了亚得里亚海夏天的样子。我希望你们哪年再回来，像你们的爱德华国王（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事是什么立场，是喜欢这么称呼他呢还是叫他温莎公爵）坐游艇来这里一样尽情地享受。他在这里的停留期间是由我来负责安排的，因为我管辖地区延伸到了杜布罗夫尼克，我得告诉你，这职责让我再愉快不过了。我觉得他是最富同情心的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统治者，或者哪个公共人物，会像他一样热切地体谅他人。”萨瓦告诉我，温莎公爵如何不厌其烦地弄清楚，自己在花园餐厅的存在会不会让警察禁止民众在此跳舞，又是如何让自己的游艇驶离锚地，因为等待他的人群让栈桥附近别墅的居住者们感到了不便。这是萨瓦对于这一天，对于洗浴的致敬形式。他没有谈及他的肉体感觉，因为那是和保持缄默这一黑山英雄特质相悖的。但他讲述了一些令人愉快的轶事，表明他发现生活是宜人的，而且他觉得，我们会认为和我们皇室相关的轶事格外宜人。

我们在露台上的桌子边坐下来。木柱子周围长满了玫瑰，餐巾之间散落着粉色的天竺葵，散发着泥土的味道。我们喝的开胃酒，是这个国家产的一种葡萄酒，口感像淡味波特酒，但它掠过舌头时，口感比波特酒更稀薄一些。萨瓦的回忆出现了一个忧郁的转折，完全真挚的，同时又很有艺术效

果，一句伤感的措辞为旋律赋予了适当的结尾。“但是他不能当国王，”他坚定地说，“他是最令人敬重的王子，但是他当国王是不合适的。在杜布罗夫尼克的一晚，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时他坐在桌边，恰好一封电报送到他面前，不是给他，而是给他的秘书。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了一眼电报，把它扔到桌上给他的秘书。你能理解吗？他没有把电报给侍者，而是扔给了他的秘书——这样。”手势比完，他悲伤地摇摇头，喝完了杯里的酒。“不，他不能够当国王。”

在衣服的遮盖下，我的皮肤里仍保留着海盐水带来的愉悦，血液里仍存留着清新的感觉。他们端来一大盘鲜美的鱼肉和另一种酒。风把玫瑰的香味吹了过来，也吹着六条白帆船，从远海朝着城市的方向疾行。坐在我旁边的康斯坦丁站起身。“这是什么？”他叫道，“看那些车！”离城门不远处有一片开阔地，在棕榈树的树荫下。那里可以停车，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时，周围没有其他车。现在那里停了六七辆价值不菲的车，出乎了我们对布德瓦的料想。“瞧，每辆车都带着小旗帜！它们全是外事车辆，当然不是从贝尔格莱德公使馆来的。他们只会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我太希望知道阿尔巴尼亚的事了。”我们停下吃东西的嘴，把目光定在棕榈树荫下闪着暗光的珐琅和镀铬零件上，还有微微颤动的小旗子。“那一定是重要的事吗？”我不情愿地问。“当然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康斯坦丁叫道。“外交官们不会全跑出阿尔巴尼亚，只为了来布德瓦的海滨游泳！他们来南斯拉夫，以便能够用电话电报和他们的政府联系，而不被阿尔巴尼亚人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担心是坏事，很坏的事，对阿尔巴尼亚很坏。这里面就不会有好事，因为意大利插了一脚进来。”

萨瓦说：“又像在土耳其统治时期了。”“我们怎样才能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呢？”康斯坦丁咕哝着，悻悻地又说，“如果我是这里的官员，早就弄明白了。它一开始我就能知道。”萨瓦冷冷地回答：“我又不是警察。”似乎一场辛辣刻薄的对话就要进行，还好康斯坦丁叫了起来：“啊！现在我明白了！你们看见那边那个年轻人了吗，马路对面那个？我很熟悉他。我跟你们说，我有许多朋友，到处都是。他来自阿尔巴尼亚，小个子那个。史蒂法诺波利！喂，史蒂法诺波利！他是个希腊人，我是在雅典和他一起的。他什么语言都懂，所以在地拉那的一个公使馆供职。喂，史蒂法诺波利！啊，他听到我了！”“整个达尔马提亚肯定都听到了。”萨瓦说。

史蒂法诺波利先生挥手示意他很高兴见到康斯坦丁，但没有微笑。他走向我们，在露台下停住脚步，正式地鞠了一躬。他不会来和我们一道进餐。既然身在布德瓦，他肯定会去拜访他一个嫁给市长的表亲。他是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锯齿状的头发上，角度适当地顶着毡帽，身穿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似乎很奇怪，他会露出这么一张脸。报纸图片和新闻影片让我们觉得，命运多舛地区的居民，在危机面前才会露出这么一张脸。那是一脸

的厌倦，这样的表情也可能出现在经常挨打的酒鬼妻子的脸上，当她听到踉踉跄跄的脚步声靠近她的门边时。康斯坦丁不再讲法语，而是用生硬的语言——现代希腊语，喊出他的疑问。年轻人简短地用几句嘟哝话回答，目光变得阴沉，鼻子也皱了起来。他突着下唇，掏出一把口袋梳子，梳理他锯齿形的头发。康斯坦丁喊道："我跟你们说了这对阿尔巴尼亚很糟糕。非常糟糕。是屠杀。官员们都被意大利的钱收买了。当意大利夺取这个国家时，他们带走了最可能给意大利制造麻烦的四百个年轻人，假装那是共产主义起义。那些年轻人最后全都被杀了。这太险恶了，险恶至此，并且不到最后绝不会停止。"

---

1. 埃塞尔·史密斯（Ethel Mary Smyth, 1858—1944），英国作曲家，代表作有歌剧《救援队》（*The Wreckers* ）。

尾声

尾声

这是我们东方之旅的尾声。我们在科托尔和康斯坦丁道了别，登上闪亮的白色大船，入眠之前再看了一眼杜布罗夫尼克。在繁星满天的6月之夜，映衬在夜晚的白色灯光中，这里完全不似一座真实的城市，倒像是硬币上印出的城市图画。早晨，我们从达尔马提亚海岸旁边驶过，这里赤裸如采石场一般。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苏夏克——我们出发的港口。第二天，我们朝着萨格勒布往回走，翻越群山。上次见到这片群山时，它们似乎一年四季都只是冬天，总是银装素裹；现在，山体却呈现出狮子的颜色，石焦土干，似乎它们又只有正午时刻，只有夏季。此刻，如同彼时，人们身在国外需要勇气。山谷呈现出原始的荒芜，以至于激起了遗忘的圣经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翻动，让人不禁喃喃念出“何烈山”和“巴卡”。热得发狂的空气好像是一层玻璃，隔着它，我们看见绯红色的花和苍白的岩石在摇摆，除此之外，任何地方再无任何实际活动。克罗地亚高地上的牧场和松林里，戴着彩色头巾的女孩们在放牛，戴着圆帽的伐木工人挥动着他们的斧子。这景象不仅是对眼睛的慰藉，也是对胸肺和肌肉的。

离萨格勒布还有三四个小时路程。我们下了火车，在普利特维采湖群逗留了一天。这里有最滑稽和轻松的自然奇观。它的创造精神完全不同于诸如尼亚加拉、大峡谷、马特峰等寻常景观。悲剧或恐惧未曾染指于它；它显现出的，只有欢乐和可爱。十六个湖泊，大的大，小的小，散落于草地和山林之间，间插着闪亮、悦耳的瀑布，有时像螺旋形的楼梯，有时像圆形的剧场，有时候就是瀑布，但总是美得让人目酣神醉，不带一点矫揉之气。这方平面上很少能见到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美。莫扎特把他天才中的精华献给了苏珊娜，然而她是个轻浮女子。艺术中的美并没有太多类似之处。在这里，晨间和午后，我们都在林地的绿荫之间行走。光线环绕周围，那是从水域升起的光，透过绿荫仍然亮澈。我们谈起了康斯坦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发现。孩提时代他来过这里。那时候，这里仍处奥地利境内，人迹罕至，因为位于野蛮的斯拉夫人领地里。康斯坦丁常在自己的作品里赞美它。他的语句重回我们的记忆，其文采让我们感到难过。因为我们都很爱他，现在却彻底失去了他。

我们的悲伤里掺杂着一些尴尬和不安。如果我们之间曾出现激烈的个人纠纷，而且三人的举止都低劣无比，可能我们会彻底地决裂。然而，这类事情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客观差异。我们是英国人，康斯坦丁是斯拉夫犹太人，有个德国的妻子。但是我们成长的世界告诉我们，人们应该超越这些差异，在认可个性是文明人标志的基础上坚持交流。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阻止嫌隙的出现，是幼稚且缺乏教养的表现。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无稽之谈。真相比这糟糕。过往的经历曾命令我们放下种族和国家的差异，因为一个人的善意和另一个人的流氓行径之间的冲突带来的结果会让差异变得无足重轻；因为所有的欧洲人，就其理想的道德社会已经达成一致。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改变。现在，不同的种族和国家珍惜其特有的社会理想，同时各自的理想在对方的鼻孔里散发着臭味，这种冒犯除了最可怕的私人行为以外无力可抗。我丈夫和我认为格尔达的黑是白，她认为我们的白是黑。康斯坦丁的视野和我们是一样的，但他的心向着格尔达。他不能像聪明人强迫愚蠢人那样强迫格尔达，因为他觉得自己来自一个没有国家主权、饱受迫害的民族，故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的差异对象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性别或经济方面的，这让差异更难以弥合。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正在阳台上喝咖啡，吃面包和果酱，光线变成了钢铁色，下面的大湖一片漆黑。打前站的气旋风，束紧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树梢，让它们变成了旋转的绿色尖峰。眼前的景象突然被呼啸的雨幕掩藏了。“我们这的雷暴天非常美，”服务生如痴如醉地说，“它们通常持续三天。”听说我们叫了辆车，要载我们去火车站，他感到惊讶。在欧洲偏远些的地方，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古老文学里的描写。这位服务生就属于那个浪漫的年代，尽管事实上他挺年轻的。他觉得既然我们是受过教育、懂些门道的人，就很适宜模仿《少年维特的烦恼》里的恋人，听着雷声，靠在彼此的臂弯里，感动得浑身颤抖，低声念着为暴风雨写颂歌的德国诗人的名字，克洛普施托克[注]，是这个名字，很不幸。在他看来三天的雷暴，对于带着行李的人们，比如我们，本应该如同拜罗伊特艺术节。

一列快车在夜幕降临之前把我们送到了萨格勒布。在车站附近的一座现代大酒店的餐厅里，我们再次感到，而且是更加强烈地感到一种憎恶：到处充斥着物质商品，同时又缺失了某种更加重要的内在气质。在见到布德瓦商店里的相对繁荣之前，我们也有这种感觉。菜单上列着数不尽的菜名，周围的人们却单调乏味，消极懒散。我们从他们的着装上看不出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对于旁观者，他们的快活也看不出缘由。当我们不知感恩地躺在舒服的床上时，我觉得这里的精神生活不像其他的斯拉夫土地上那样，以一种肉眼可见的形式存在。关于这一点，清晨时我们被证明是错误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像萨格勒布一样清晰可见的，是这里也如同普利特维采湖群一样，萦绕着浪漫情怀，只不过，形式不像雷暴下的狂喜那么纯真而已。

起初，我们以为城里正在休假，罗马天主教城市就经常这样。大多数的商店都关着，许多人坐在公园的石凳上。但很快我们就被一种不协调的氛围搞糊涂了。这天显然不是什么节假日，而是祭奠日，因为从许多窗户里挂出了狭窄细长的黑色旗帜——整个巴尔干半岛上的丧事标识。然而人们正在期待的，是快乐。他们看起来带着狡黠，好像知道有人想把快乐从他们

身上夺走，但确信自己最后肯定能够享受到快乐。我们走到市场上时，忘掉了这一切。因为不管城里在进行着什么，乡里来的农民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卖掉自己的货物。摊位摆了出来，围绕着叶拉契奇将军的雕像撑起了许多伞。再一次，我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农民拥有的存货量如此之大。我们用一两便士买了一口袋光鲜美味的乌皮樱桃，用几先令买了一幅绣饰精美的桌布，而且我们时时记得，这些人需要钱来购买一定量的制成品，比如靴子、农具和厨房用品等。显然，我们这些充足的购买量在他们看来，仍然无异于一种自我嘲笑。没有任何意大利或德国式的强求，这些人带着冷静的周到态度，为我们展示他们卖的东西。一阵含混不清的声音传来，人们回头张望。从教堂广场延伸至市场一角的阶梯上，一群人冲了下来。正把一些餐垫展开给我们看的女人抿紧嘴唇，收叠好她的货物，然后转身收下那把遮蔽着货摊的伞。弹簧很硬，她用手指勾住它时厌倦地说：“那是三个克罗地亚人的葬礼。他们在塞尼音乐节时被塞尔维亚人杀死。这里会发生骚乱的，你们最好离开。”

六个月之后，在伦敦，从一个亲眼见证了枪击事件的英国女孩口中，我知道了塞尼真正发生的事。女孩驾车从萨格勒布到杜布罗夫尼克，途中和马车相撞，于是不得不在塞尼待了两天，等待修车厂进行修理。在她逗留的第二天，城市被克罗地亚国会和达尔马提亚合唱团控制。在欧洲大陆上，表面上致力于简单明确的休闲活动的俱乐部，往往有其隐藏的政治目的。比如在波兰，乒乓球协会常常是犹太自由主义者的聚集地。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如果人们是笃信不疑的分离主义者，或死去的拉迪奇以及活着的马特切克的追随者，表面上他们就会组织唱合唱曲。这里有许多合唱团员。拂晓时分，他们蜂拥而至，人数之多，惊扰了城镇的宁静。头一天晚上，一些其他地方的宪兵也被调来这里。整个一天中，气温很高，歌声此起彼伏。临近傍晚时分，人们喝了很多酒，政治情感连同合唱者们的歌声，一起被释放出来。到黄昏时，从早上起就被戏弄、被折磨的宪兵们，试图在狭窄的街道上强行发布命令。街上挤满了吼着煽动性歌曲的人群，马车和装载远处合唱团成员回家的汽车很难挤得过去。在某个十字路口，一个宪兵在行人间跑来跑去，徒劳无功地想给装满合唱者的大游览车清出一条路来。街上的和游览车上的人，都大声地奚落和侮辱他。突然，爆炸声响起。宪兵觉得肯定是游览车上的人在向他开火。这也是英国女孩最初的印象，她就站在离宪兵几码远的地方。事实上，是被遮在大游览车后面的一辆小汽车爆了胎。此时的宪兵，又热、又累、又怒、又怕，根本顾不上调查。他朝着游览车开枪回击，打死了五个年轻人。

克罗地亚的领导人并不幼稚。他们本来也不会相信南斯拉夫政府会愿意看到一个宪兵在全无遮隐的环境中杀死五个无足重轻的克罗地亚人——那定然会激起影响深远的仇恨。但这一考虑并没有促使领导人们去缓和追随者的情绪。为殉难者送葬的人群就在这会儿冲下阶梯，占领了整个市场，把

农民围住。他们的神色越来越阴郁，举动越来越轻率。他们拆掉农民们的货摊，把货品聚集成堆。“你们应该走的，”刚才卖亚麻制品给我们的女人说，“宪兵们在这里，可能会开枪。”正对阶梯的市场那边，有大约二十个宪兵在行进，手握子弹上了膛的步枪。看见宪兵，人群停止了歌唱。这时市场上聚集了至少有一千人。然后，在一个角落里，几个年轻人相继喊出反对塞尔维亚、支持克罗地亚的口号，他们周围的人群里响起激烈的呼叫声。宪兵们听到后开始朝他们冲去，动作并不野蛮，只像是驱散示威者的样子。他们前面的人群立即变得鸦雀无声，而后面的人群里，爆发出更响亮的口号和更激烈的呼叫声。宪兵们停下来，犹豫着，到处转动，又冲向新的风暴中心。他们一转向，第二群爱国者们变得安静、驯服，胆怯地后退，而第一群，又开始呼叫政治口号，加剧流血事件，在宪兵队的后面发起威胁性的冲撞。可怜的士兵们又转过来。整个市场警笛口哨响成一片。

这次示威肯定像美国橄榄球比赛一样精心演练过。实际上，它与其哀悼的缘由背道而驰，成了涉事人的一场游戏。早晨，城市颇有征兆的欢欣，不加掩饰地从他们的脸上闪耀出来。也许教堂里还有人记得悼念那几个年轻人，在这里，悲伤却了无痕迹。所有人都迷失在对游戏的陶醉中，无视同情的需求，甚至自保的需求，这是世上最危险的。他们在全力对付自己的天然朋友——他们的斯拉夫同胞；而他们的天然敌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及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正虎视眈眈地围着他们，只等着他们的第一个崩溃信号出现，以便安全地袭击他们，剥光他们，杀死他们。

大量的宪兵后援队伍赶来。人群散去，农民们叹着气，重新摆起货摊，展示他们的东西。我们完成了和亚麻摊贩之间的交易，但她不愿意讨论刚才发生的事。“是政治，全是政治，”她说，“聪明人都不谈政治。”但是我们旁边货摊的主人，卖皮制品的，却热切地告诉我们，两个“我们克罗地亚人”被塞尔维亚宪兵冷血地杀害了。他说话用的是一种慢吞吞的抱怨语调，表达着不满，却又眉飞色舞，眼神看起来仍然很愉快。他对这事肯定不那么上心，都不知道被埋葬的人并不止两个。“我们去大学吧，”我说，“找到瓦勒塔，他会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一些店主在升百叶窗，一些却在往下放，都带着一脸神秘的快乐。每栋房子的二楼都飘着长长的黑色旗帜。结果我们发现，大学周围的空地上正发生着静态的暴动。宪兵们站在紧锁着的大门前的阶梯上，许多年轻人在楼前走上走下，时不时地爆发出嘲讽的呼叫声和高喊的口号声。

“能麻烦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我丈夫问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着芥末色的西服，站在街角。他属于在巴尔干半岛，在斯堪的纳维亚，或在任何农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大点的城市中常见的个人类型，尽管穷得几乎到了需要乞讨的地步，从事的是最卑微的职业，却靠拥有西服或者城市人的地位，来维持自己快乐的绅士身份。“敝人十分乐意

为高雅的陌生人效劳，”他答道，说的是过时的华丽德语，“是这样的，学生们因为塞尼屠杀，急着要举行示威，当局不同意，所以就关了大学。”“什么是塞尼屠杀呢？”我丈夫问。“你不知道啊，”小个子男人说，露出同样的欣喜和抱怨的表情，“塞尼音乐节时，那边的塞尔维亚宪兵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我们一些克罗地亚人，用的是达姆弹。”这小个子男人没有力气，没有技能，没有土地，在纳粹政权下，他可能连一个冬天都熬不过。他只能寄望于在南斯拉夫这种松散、非专业化的经济下生存，并遵从它的政治习惯，呆板、像面部抽搐一样非理性的习惯。结果，他倒沾沾自喜地表现出叛逆。就在这时，我的眼睛被两个结构松散、颜色中性的大球体吸引，一个是黑灰色，另一个是褐黑色。这是两个农妇的屁股——她们被市政府雇来给广场边角的花圃除草。她们挺傻的，从个人意义上来说，和伦敦养老院里的护士差不多，都想象不出，刺杀国王亚历山大事件为什么会困扰和国王没有亲友关系的其他人。她们受雇拔草，她们想挣这钱，于是就继续拔草，哪怕在不到十五码以外的地方，学生们正呼喊着，把宪兵都招来了。我看着这俩专注的屁股，随着她们的典范工作上下挪动，还有自动反叛者那张自鸣得意的脸。感谢上帝，将愚蠢赋予女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人的愚蠢必是对抗男人疯癫的唯一自保工具。

我们回到酒店时，看见十几个宪兵悄悄地溜进警察局，不再理会起哄的人群。他们看起来受到了惊吓，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胆小鬼。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克罗地亚人杀死一个塞尔维亚宪兵，受到的惩罚不会高于三年监禁，而且通常从轻发落，十八个月就出来了。他们也非常清楚，除了完全被忽视的塞尔维亚群体以外，这个城市不存在什么灵魂去感知对他们善意的或同情的举动。离开萨格勒布之前，我们对几个人说起示威行动，在商店里，在我们的酒店里，在火车站里，除了一个人之外——这个人不是克罗地亚人而是斯洛文尼亚人——其他人全都表达出对南斯拉夫，对其所有机构的憎恨。每一次，憎恨的原因都被率直地表达为厌恶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这种低劣的东方文明。克罗地亚的位置感觉是和西方在一起的，这暗示着，是和奥匈帝国的残余在一起的。在我们旅程的下一段，我们会发现，这种感觉是多么的互利互惠。

正午过后，我们乘火车去布达佩斯。整个炎热的下午，我们都在田间野地穿行，花开的地方，紫的紫，白的白，还有玫瑰色。稻谷成熟的地方呈现出积聚的黄铜色。在冬天，中欧平原上的泥土，让它们在城市游客的眼中，成了消极之物的精华凝结。在夏天，它们肥沃丰饶，全不带一点蔬菜的纯真，倒是充满了放纵和满足，这让它们和任何山脊一样，拥有了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黑暗降临，与之同存的是布达佩斯的灯光，炫目的灯光。在巴尔干半岛上没有哪座城市有这样的灯光，也没有哪座酒店如同眼前这座多瑙皇宫，有铮亮昂贵的木质地板、厚实的地毯和壁毯；编织精美、清洗勤密的亚麻品，在饭桌上、侍者的胸前、卫生间里、床上，被慷

慨而奢侈地使用。巴尔干半岛城市中，也没有哪里有我们在此处的第二天早上行走时所见的沿街商店。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崭新鲜活，没有陈腐褪色的东西，且花型多样，完全超越了必需的要求。“有这么多种鞋？”我在窗前惊叹，玻璃板的宽度让它本身也成了一道奇迹。“为什么你们要在萨格勒布停一脚呢？”在布达佩斯的朋友问，“那里什么都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和布达佩斯如繁星般璀璨的街灯比较起来，萨格勒布的灯光简直不能称为灯光。但我们没法解释“的确如此”的意义。这里没有穿过思维的拱顶长廊来追寻理念的习惯——那是萨格勒布的习俗。无论在哪家咖啡厅，都没有人邀请我们讨论沃恩对志留纪研究的伟大成果，或讨论精神的本质。这里，对话的广度和深度正和1924年我来此参观时一模一样，关注的是因为《特里亚农条约》割让给匈牙利而丧失的领土。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卖着一种地图，写着一行字，“Nem, nem soha”，这是马扎尔语，意思是“不，再也不要”，国家周围用黑色标出环形的土地，这些土地曾经属于这个国家，现在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这种地图还在卖，似乎是匈牙利头脑里认定的完整地图。多瑙皇宫里的美发师不停地对我进行民族统一主义宣传，从我的头发抹上泡沫开始，直到吹风停止前的最后一刻。他倒不像个狂热分子，因为他看起来性情温和；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在这个关注焦点以外，成功存留的新元素唯有骄傲，因为这里的人们感到，他们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亲密。我们的朋友们对于一两周前布达佩斯给予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的隆重接待津津乐道，甚至提议带我们去看游行的新闻影片。

这几乎就是民族愚蠢，超越了克罗地亚人的荒唐。这些人对自己的国内问题毫不在意，尽管他们未经改革的土地制度让农民对国家缺乏忠诚感，他们的经济政策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与有限的市场不兼容的工业化中。他们想要收回的土地，从历史沿革上来说并不是匈牙利的，那里的人总是对匈牙利人的统治心怀反感，所以回归会让匈牙利面临严重的管理难题。保持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希望在于延续和平条约里的分配。假如欧洲局势处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可能解体的状态，那么匈牙利可能就湮灭了。它没有任何军事、战略或者政治优势可以作为谈判底牌。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上下两块磨石之间，匈牙利会被研磨成粉。尽管失去的领土很可能会归还给它，作为贿赂，促进它的屈服，但它把这些土地拿到手也并无用处。之前，匈牙利的利益得到满足，不过是因为奥地利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二元帝国，以平衡这边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和那边俄国的势力，所以用虚假的繁荣来灌溉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没有理由过分关怀匈牙利；它们会盗取它的粮食、牛羊，分割它，用商人和殖民主义者淹没它，攻击它的语言，企图摧毁它的身份。

“我们想不出，”我们的朋友们说，这时我们坐在房间里喝着杏仁白兰地，哥白林挂毯和奥布松地毯让房间显得雍容华贵，“为什么你们英国人不更坚定地支持我们的修正主义计划。毕竟，我们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如此相似，我们的生活都受到同样的‘绅士’理念的统治。”我们建议说，和匈牙利的巴尔干邻居处好关系，共同为坏日子做准备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的朋友们不这么认为。怎么可能和那些邻居处好关系呢，他们问。他们把自己隔离在自己的困扰中，像碗里的金鱼，直到收回被夺走的领土那一天。至于坏日子，他们不愿去思考。一个年轻人停止了弹钢琴，兴趣寥寥地说：“如果爆发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可就糟糕了，大家不知道该站在哪方作战。”我们大为震惊，问他是什么意思。“哦，”他轻描淡写地解释，好像在谈只会发生在剧本或小说里的事，“战争会发生在纳粹主义和其他专制主义之间，没有哪方比哪方好。”在这个国家，人们很容易遗忘，还有一些观念是人们会认为值得去护卫的。他们的心里书写的是不微妙、不复杂的文字，“不，再也不要”。但我们震惊的原因并不是那种健忘。这个年轻人是个犹太人，在为支持还是反对纳粹主义而战这种问题上，我们以为他的回答应该是毫不迟疑，就像纳粹分子自己，在这个话题上也不会感到丝毫迟疑。“是的，”一个久居布达佩斯的英国人说，“这里的犹太人都像那样。反犹太主义浪潮在他们周围涌起。没有一个犹太人受邀参加任何为意大利国王举行的晚会。然而，他们对德国人不怎么怨恨，尽管德国人是始作俑者；也不怎么怨恨意大利人，尽管意大利人为虎作伥。”

但犹太人对斯拉夫人满腔怨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感到困惑和恼怒，因为我们在南斯拉夫待了如此长的时间。“可你们发现在那里有什么事可做啊？”他们问，“你们觉得那里很漂亮？是的，我想是很漂亮，但那里的人那么野蛮，生活也很原始，就像和动物们在一起。”这些人——我得说，并不见得比我高雅多少——描述着他们如何不能欣赏达尔马提亚的风景和建筑，因为当地居民举止粗俗。我想起了在斯普利特的教授，在赫瓦尔岛那个沾染着波特酒污渍的男人，在科楚拉的红衣主教和他的家人，觉得这些人异常地不幸，或是细致到偏执。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传奇，说整个特罗吉尔，而不光是一小块石狮浮雕，都被南斯拉夫破坏者毁灭殆尽。我听说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从科托尔上行至采蒂涅的轮船旅行的。旅程很不圆满，因为一个医生——故事是以解释的方式讲述的——习惯了在非洲生活，撞到了一个黑山司机，尽管只是轻微地。听到这件事，我闭上了双眼，好像什么剧烈的爆炸将在房间里发生。但是把话题转向克罗地亚，却一点都没有在萨格勒布所期待的效果。“克罗地亚人真是蠢！”布达佩斯的朋友们说，他们的嗓音变成了尖锐的笑声，那笑声伴随着从托儿所的保姆那里听来笑话的记忆。在老的奥匈帝国里，克罗地亚人似乎是哥谭镇的智者，就好像愚蠢的萨福克本地人，或是利兹人眼中的帕德西人一样。我想，那是他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世界中扮演的唯一角色。

克罗地亚人指望进入德语世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除了一种甜蜜、高雅的感觉以外。这感觉来自憎恨他们所有的斯拉夫兄弟。匈牙利人指望进入德语世界，结果同样什么都没得到，除了一种甜蜜、高雅的感觉以外，这感觉来自鄙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人，并且夺走这些鄙视对象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这破坏性的教育甚至也被强加给了犹太人，他们曾是伟大的创造性民族，现在是现代欧洲创意的最伟大解释者。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被倾倒出来，洒在地上。他们身上甚至都没有留下一点必要的恐惧，可以涌动于胸中，在敌人的剑下保护自己。使他们空虚的，不是战后的疲惫，或者任何全球衰退导致的困惑。早在战前很久，犹太人的“手枪记者”便已声名狼藉。他们驻在泽蒙，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境上，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发回完全不可靠和危害极大的信息，说贝尔格莱德是策划阴谋的老巢，意图颠覆哈布斯堡王朝。这些国际破坏者常常得到辩护，宣称他们是被可敬的种族动机驱使而为：俄国反对犹太人的政策激起他们对所有斯拉夫人的报复欲望。不幸的是，为了一句道歉，犹太人颇有热情地做了有害的事；在塞尔维亚和俄国敌对的年间，他们也展现了同样的热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是犹太人，而像是已被德国化的犹太人。

这似乎是立在欧洲中央的一座消极主义的喷泉，杀死了喷洒范围内的所有生物。这致命的行为不能想象成是条顿人对斯拉夫人的反应。它可没有这些种族局限。生命，不论在何种标签下，都是它的敌人。这一点，在维也纳时，一名金发女孩向我证明过。那天傍晚，她因为一件我觉得有些尴尬的差事来到我的酒店。在一件不快的事情之后，我发现她在我们的客厅里。我们之前和一个朋友在他位于巴登附近的房子里吃了午饭，开车送我们的司机在我们参观访问时总为我们做些事。他三十出头，体格健壮，黄色头发，蓝色瞳孔，像盲人的眼睛，和格尔达的一样。我们回家的路上突然起了雷暴，为了躲避那一刻的狂风暴雨，我们停在路旁的小旅馆边。三个人就在擦洗干净的小酒吧里喝啤酒，这会儿话题就出来了，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关于维也纳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动荡。司机的声音变成了咕哝抱怨，在奥地利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抱怨，当人们意识到面包不能从树上长出来时。他说：“这对我们维也纳人来说太糟糕，太糟糕了。我们都失望透顶，本来还指望情况会好转的。二月革命时我不是还给马约尔·法伊开车吗，因为我认为那会结束空谈，马约尔·法伊和他的党派会做点实事，但现在呢，还不是和以前一样。”我苦叹了一声。

1934年的二月革命留给公众的记忆是对卡尔·马克思大院以及其他公寓式住宅区的恶毒破坏，比这更糟糕的是虚无主义。一群全无经济、政治理念的人，相信他们能够神奇地激发社会的繁荣，仅仅通过消灭他们认为拥有这些理念的另一群人，他们的认为也不见得很有根据。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计划。舒施尼格[注]，他们任命的总理，代表着绝对的虚无，无原则，无理论，甚至无想法，除了拒绝他人的想法这一想法。之前几个星期，我都

和穷人们在一起。他们太穷了，以至于我们司机的衣食都成了他们工作五十年依然无望触及的顶尖奢侈品。但他们的付出却远高于司机。穷人们的历史也显示，当统治者的王权开始动摇时，穷人们心中凶猛的弹簧便蓄势待发。但是他们不会走出门，为了绝对虚无的原因去残害许多他们的兄弟。“结束空谈……做点实事……”斯科普斯卡·瑟尔纳·高拉山区的农民，奥赫里德的保加利亚糕饼师傅，佩奇的旅馆老板儿子，在黑山山间行走的老妇，他们中没有谁参与空洞无物的争论，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司机看着我们，不解我们为什么突然沉默了。他目光里的盲目内质让人惊讶，好像视网膜后面有一道愚昧的网，只让光线能够通过，筛除了人们通常通过观察而学习的其他东西。

在客厅里，我见到了那位金发女孩，她带着一封信。信是我的一个教大学生英语的威尼斯朋友写的，信上说这女孩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选了我的作品作为她的论文主题。我自然感到惊骇，解释说，我的作品完全不适合她的题材：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散落在英美期刊中；我从来没有用我的写作向他人持续展现自己的个性，而是表达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不同主题的发现，以期自我启迪。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我写了一本关于伦敦的小说来发现自己为什么喜欢伦敦；写了圣奥古斯丁的一生，来探索为什么读他的每句话都觉得耳边响起宣判的声音——对自己的命运，和自己年龄的命运进行的宣判；写了富人，来发现为什么他们在我眼中和野猪、蟒蛇一样危险。对它们的思考可能有助于促成一份关于伦敦、关于圣奥古斯丁或关于富人的研究，但无益于融合成一张关于作者的图像，因为作品彼此间间隙太宽。

让我觉得烦恼的是，金发女孩把这些解释都当成了我谦虚的说辞，其实不是的。她的专注势不可挡。鉴于每个德国大学生在论文上另辟蹊径，不蹈他人覆辙的决心，她的专注不能视为对我重要性的证明。我想起一个这样的学生，怎样凭着关于“土豆泥”——一名德鲁里巷舞者——的论文被授予博士学位，这是狄更斯的场景中偶尔提及的，他通过伦敦教区记事录进行了身份追踪；之后这名学生的后继者，用题为《土豆泥的姐妹》的文章又超越了他。眼前这位金发女孩就有那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我的不安没有阻止她向我问一长串问题。但我的回答很快就让她变得比我更加不安。她想先入为主地把我归入某个公认的学派，问哪些作家影响了我。我的答复让她感觉困惑。我说我年轻时曾尽力像马克·吐温那样写作，在我看来，他仍然比世界上的王子们还幸运，因为他和他的文字之间一直保持着快乐的关系。“但是，马克·吐温不是美国人吗？”她怀疑地问，“不是幽默作家吗？”我立即明白了，任何作家都会明白，文学对她来说是个封闭的领域，她永远读不懂一本书。尽管我皱着眉头，她仍然继续她的话题。在讨论我的任何偏好时，我们之间都没有共同语言，哪怕是被她接受为合理的偏好。

这会儿她说："我现在关于英国作家了解得足够多了。"她有些闷闷不乐地看着自己的笔记，好像预见到了在推动我丧失了标签的思想进入合适的既定框架时将面临的麻烦。"请告诉我，"她说道，"那些影响了你的欧洲作家。""首先是大仲马，"我说，"他的《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教会了上托儿所的人，什么是浪漫主义，还有，冒险是如何证明生活其实是灵活有弹性的——尽管它看似纹理紧密。在十岁出头时是易卜生，他纠正了英国文学中的主要缺陷——未能认识到思想的动态。理智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创造的，然而我们的作家在写思想时，却好像思想是可以挑选的东西，尽管这种选择可能被推到殉道的极致，仿佛思想能够孑然独立，仿佛它们只是以被选择的样子来发挥作用。可是，思想是真实力量之间关系的象征，它让人们吃早饭迟到，把早饭带走，隔着早饭桌打架，这种意识是英国人不喜欢的。他们很懒，懒到骨头里，愿意相信仅仅活着就是生活。"

"是的，"我继续说，兴致盎然，两眼放光，尽管我的听众并没有多大兴趣，"易卜生改变了我，让我相信是思想让世界转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易卜生对于思想观点的呼唤，就如人对于水的渴求，恰恰是因为缺这东西。他是道德家，极简单的那种类型。他听到了哲学海洋里传来的声音，但只是和小孩可能听到的贝壳低语差不多。《布兰德》注不是一部关于宗教的戏剧，它是禁欲主义冲动的原始呈现。《玩偶之家》不是一部关于女性解放的戏剧，事实上它没有触及解放运动的基本要素。它提出一种天真而稳固的看法——在正义的天平上，也许刻薄的诚实不如可爱的欺骗有分量。我带着易卜生刺激出来的对思想的胃口，又反观自己国家的文学，它们据说能够满足这胃口。那个时代是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

"啊，休伯纳，休伯纳，"金发女孩叫起来，发音和"嗖"一样的韵脚。"萧伯纳，"我不耐烦地纠正她的发音。"是的，休伯纳，休伯纳，"她继续说，"我们还没有谈他。我猜你很崇拜他。""没那么崇拜。"我说。"怎么可能，"她问，"我们觉得他是你们最伟大的作家，与莎士比亚和奥斯卡·王尔德比肩。""也许和奥斯卡·王尔德比肩吧，但和莎士比亚没有，"我严肃地说，"现在我重读他的东西，完全找不到任何思想的痕迹。威尔斯至少知道，如果人们受教于其他有思想的人，自己也会有些思想。当遇到非理性的傻瓜时，他几乎是和伏尔泰一样超群的争论者。但萧伯纳代表的只有社会主义，只包含一种信仰：如果人人都吃饱了，穿得干干净净，世界就更美好了，没有任何人性分析或者国家理论基础，彻头彻尾地是对伪善进行斥责的陈词滥调，和《伪君子》相比，不能望其项背。当然我们国家有比萧伯纳更好的作品，我后来发现了，但它们不太容易找到，因为我们的文学缺乏连贯性。一个人孤立地起步，受到某种乖戾激情的刺激，要写一些关于某个主题的东西，却很少受到刺激，要去读一下他人关于这个主题的

写作。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文学能够服务于思想，因为每个作家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参与争论时，准确地知道前人已经进行到何种阶段了。”

“但是，关于法国文学，你这说的是什么啊？”金发女孩打断我的话。我再说了一遍，她惊愕地喊起来：“法国文学！所有的法国文学当然是琐碎和做作的！”“琐碎和做作？”我重复，“阿贝拉尔、龙萨、乔基姆·杜·贝莱、蒙田、拉伯雷、拉辛、帕斯卡、拉·封丹、伏尔泰、拉罗什福科、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维克托·雨果、本杰明·康斯坦特、普鲁斯特、狄德罗——难道你没有读过《拉摩的侄儿》吗？”“我不读法语，”她说，“我们几乎没有人学法语。但是所有这些人加起来还比不了歌德。”我感到悲哀，因为在我看来，我刚提到的作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歌德一样具有探讨性，歌德的哲学，事实上也归结到观念上。“自然不伟大吗？”我说，“你不能读蒙田太遗憾了；他也对自然进行了很多思考，尽管他认为自然不在于伟大，而在于必然。”她看着我，好像她觉得那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我也看着她，想知道什么语言能够向她传达包含在完全接受命运这一行为中的美德。我意识到我的语言比蒙田的更有传达效果。蒙田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命中，最卑微和凡俗的便是他对神化的离奇幻想；他说考虑丢弃我们的人性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我们踩在高跷上，仍然必须用腿走路；他说要想坐上至高无上的王座，除了学会坐于基底，别无他法。而她身上没有哪部分会去欣赏他这些话的含义。我发现自己微笑起来，我想起他又加上了一句话，听似不合理，实则带着贴切的睿智。他说，对老人而言，生活无须被想得如此现实。

尽管我盯着她的脸时心事重重，我的眼睛终于把这张脸的信息印入我的脑海。我意识到，她的眉毛和颧骨出型的模子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得很熟；她的白皙不像北欧女人那样黯淡，倒像是深色皮肤种族里的金色特例那种模样，好像是含的金色色素比较多。一丝怀疑让我看了看自己一直用手指拨弄的名片，然后我喊起来：“你不是奥地利人！你有个斯拉夫名字！”她回答：“我几乎是一直住在维也纳的。”我没有注意到她的语气，反驳说：“从血统上来说你仍然是斯拉夫人。”她如坐针毡，感觉很窘，像是受到了公正指控的贼，说：“是的，我的父母都是克罗地亚人。”她的态度让我感到尴尬，我说：“哦，我猜想你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得和德语、英语一样好，因为那是你学习的另一种语言。”她有些激昂地回答：“不，事实上我一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都不会说。我为什么会？我是维也纳人，我的一生几乎都住在这里，我长大后再没去过克罗地亚，除了在萨格勒布待过几天以外。”“你没有觉得那里的人非常聪明吗？”我问。“我没和他们说过话，”她一脸鄙夷，“我觉得那是个可怕的小城镇，偏狭得很。”“你一点都不为自己的斯拉夫血统感到自豪吗？”我惊呼。“为什么我要？当斯拉夫人有什么可自豪的？”她毫无表情地回答。

这就是中欧给周围地区带来的影响。它截断了女孩本会为自己的种族感到的自豪。如果她对保护欧洲文明不被土耳其人灭绝的卓越功绩感到的骄傲，远胜于对她自己的种族感到的骄傲，这是一种遗憾。它截断了她本应从法国文化中受到的启蒙。法国文化比所有其他起源更早的文化都更有优势。它直接从罗马文化衍生而来，发展最具有连续性。取而代之，提供给女孩的，是更近代的、更稀疏的东西，把它定义为腓特烈大帝和歌德也未有不妥。在音乐上，它可能提供足够的东西以弥补所有其他的缺失，但它阻隔了巴赫和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之间的融合，因为它更加偏爱瓦格纳这个错误的天才。这种影响让这个女孩浅薄得像一座偷工减料的房子，根基的深度在19世纪的范围以内。本来，如果她忠于自己的斯拉夫血统，坚持欧洲文化的主流，她可以继承东西罗马帝国留下的巨大财富。不仅是康斯坦丁，这个女孩和她的家人，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其他人，都做出了这个令人诧异的选择。人是贪婪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真实。有些人喜欢贫穷胜于富裕，有些人甚至喜欢死亡胜于生命。这一点我在返回英国之后将会学到。

这次归来对我来说意味着进入沉隐状态。穿越南斯拉夫的旅程，比以往生活中的其他事对我的影响都更深。部分的原因是，南斯拉夫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自然构造和色彩，与我想象力的内在构造与色彩，实现了近乎巧合的一致。马其顿是我在清醒时、睡梦中，都见过的国家。从童年时起，当我厌倦了所待的地方，便希望自己去一个小城，像亚伊采或者莫斯塔尔、比托利或者奥赫里德那样的。但是这趟旅程感动我，还因为它像捡拾起的一股羊毛线，我本以为这会带着我走出迷宫，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身陷其中的迷宫。有可能当我跟着羊毛线走到末端时，发现自己面对着紧锁的大门，发现这个迷宫就是我在世界上的唯一空间。但至少我现在知道了线的迂回曲折，哪条回廊通向哪个拱顶房间。去南斯拉夫之前，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把这些奥妙解释清楚。这次经历让我对自己说：“如果在罗马被劫掠之前的几年，一个罗马妇女意识到了它为什么将被劫掠，刺激蛮族和罗马人的是怎样的动机，而且把她所知道的和感受到的都写下来，这记录将对历史学家很有价值。我的位置可能不那么重要，但同样有趣。”无疑，把它记录下来是我的职责。

所以，我决定把一个典型的英国女人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她已经相信，第二次英德战争在所难免，她能够将事件的黑暗水域追根溯源。我将专心致志地把事实上几年的沉隐用在几个基本面之间。我不得不写一部漫长复杂的历史，且费足笔墨叙述我自己以及和我同行的旅伴们，因为我的目的在于，让过去与书中所创造的现实并肩而行。几年间，我在大量的素材中辗转纠缠，它将某些思想灌输于我。

我对帝国产生了新的怀疑。从童年起，我就有意无意地争论它们的价值，

因为我生来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公民，而我还成长为它的尖锐批判者。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愚蠢到去谴责有人构思了帝国主义理论，或去否认它经常在实践上被证明的宏伟。在那些世界上还明显存在着民族间不平等的日子里，有的民族还仍然对农业无知，对游牧生活简朴外表后面的复杂过程无知，所以在饥饿中悍然对外进行掠夺；有的民族还率直地享受着杀戮的乐趣，那些更先进的民族肯定觉得有必要保护自己的财物和生命，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征服的习惯。在那些日子里，也有可能蛮族拥有某种金属或植物，更文明的民族发明了它的有利用途，可前者单纯因为不高兴，便拒绝让后者接近这一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就可能引用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的东西归属于所有的人，于是，打破这种拒绝的企图便得到了许可。民族会因为落后而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想法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驳倒了；但原始状态带来的威胁长久地存在于技术成就中。更文明的民族想要获得原始民族掌握而未加利用的资源，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这早在很多个世纪前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因为相关各方的不平等总会引诱强者滥用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对于帝国主义的道德制裁，如果提出时不能脱离后续阶段的虚伪，那么，它们就会获得所有虚伪借口带来的益处，为后效者树立榜样。大英帝国的理论说自己的存在将秩序带进了世界上无序的地方，这大多是谎言。但它激励着热爱行动的人开始行动，这些人的热爱里并无谎言。他们代表着隶属民族对抗瘟疫、洪水、旱灾和饥荒；他们在那里设立法庭——那些地方的司法，即便没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产生冲突时完全失效，本身也是一个蒙昧粗略的体系。这些服务可能被视为骑士精神的体现，履行者是“真正的、完美的、高尚的”骑士——尽管他们服务的对象可能对他们感到极端恼怒。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为自己的帝国以及建造者感到自豪的普通百姓，也沿袭了骑士的观点。

四十年前的一晚，在伦敦，我母亲走进我的房间，一脸喜色，描述着她参加完市中心的茶会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景象：一群人站在宾馆门前，固执地对着拉上窗帘的几扇窗户欢呼。欢呼的时间很长，声音很大，窗帘终于拉开了。几个满脸胡须、表情疑惑的男人，从光亮中退出，融入这个不寻常的夜晚。他们是布尔人的将军，在南非战争失败后来签订和平条约。这场景可能被视为自鸣得意的典范，但其精神在几年之后赋予了南非一部宪法，大概被征服者从来没有从胜利者手里收到过这般慷慨的礼物。二十多年后《威斯敏斯特法令》颁布，给予了英国属地在帝国框架下最大程度的自治权。这比大多数历史书页上记载的故事都更加不可思议。英国人在道德上和学智上都不见得比其他民族更加有优势，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唯一被帝国思想推向卓越的民族。

在英国帝国主义中，壮丽与愚蠢和流氓行为同时存在。被征服的民族是无助的民族。如果他们和征服者之间外形不同，文化不同，类似于现代的公

正、人性理念本可以给予他们的保护，便和他们相隔甚远了。卡莱尔，一个自称爱上帝、实则崇拜帖木儿的人，把这种情形的经济结果，简明扼要地写进一本名叫《黑奴问题》（*The Nigger Question*）的小册子，说“没有根据上帝赋予的能力进行工作的”黑人不能拥有“任何权利得到南瓜，或者得到生长南瓜的土地，不管这样的土地有多少富余”，这是“自然的法则”，但他有“无可争议的永恒权利，由上述土地的真正所有人，迫使他为自己的生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即为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的白人园主工作。这态度实际上比看起来更加危险，因为如果一个人有权力违背他人的意志使其为自己工作，他当然有权力决定工作的条件。除非他是个少见的正直人，否则，他会用这些条件来为自己造福，使仆人服从。最贪婪的资本主义，在这时候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劳动变得残忍，文明和文化的整体水平也随之下降。这必是帝国的趋势，只要它建立的基础是对其他民族所建国家的占领。而且，时间也不能如同希望的那样对其进行治疗。卡莱尔写了1865年在牙买加发生的叛乱。又因为另外一起叛乱，在1937年，一个委员会被派去对西印度的劳动条件进行调查。

还有一类困难，也是导致罗马衰落的重要原因，即它让适于统治帝国蛮荒边疆的人去承担管理职责，而这些人还未适应成为在帝国核心施展影响力的人物，因为帝国核心需要的是另一种管理者。士兵们和行政官们，在和那些他们认为是小孩的人们打交道时，都表现出无限的耐心和理解，不管那些人是他们工作中的下属，还是不同种族的其他成员。可他们却没有时间和意愿，去学习不同的方法，以便合适地和那些在种族上、法律上与他们对等的人打交道。所以，在他们看来，社会建立良好根基的首要任务是夸大社会中的不均等，为了实现目标，夸大的也包括那些和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或民族文化毫不相关的不均等。他们牺牲了其他的所有考虑。因此，后期的罗马帝王摧毁了老罗马人建立的结构。那样的结构给市民极大的自由，以换取他们对国家核心规则的遵从。直到帝王们自己感觉和罗马已经格格不入，在位期间只有几天待在城里，或者也许根本就没待过。孟买管辖区里的一个城市“浦那”因此而得名（意为“美德之城”），玩笑一半、诚意十足地传递政治上的反动张力，它和任何一个英国地区的名字都没有关联。

在对南斯拉夫进行思考时，帝国的这些劣势明显可见。没有什么地方比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受到掠夺后留下的犯罪遗迹更加触目惊心。土耳其人在这里对本土民众的巧取豪夺长达五百五十年，直到他们穷困潦倒，无力承担更重的剥削，否则便不能留下自身，以备将来持续受劫。除了穆斯林和犹太人以外，所有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贫困，都是针对土耳其人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奥地利人——的可怕控诉。达尔马提亚被威尼斯洗劫一空。匈牙利对克罗地亚各方面的控制，阻碍了克罗地亚实现物质繁荣，使它的经济比它的西方邻居落后了半个时代。在巴尔干半岛上，帝国

从来不曾意味着托管制度。受托人曾经存在过，但都终了于监禁中。帝国无力培育既能征服领土又能管理领土的领导者，南方斯拉夫民族极大地受害于此。这不适用于归属奥地利和威尼斯的部分，这些国家对外征服、攫取，靠的从来不是讨价还价的外交策略这类简易方法；但这是土耳其交响乐的基调。在查理·艾略特爵士所著的《土耳其在欧洲》这本深刻的书当中，他对土耳其人的描述是，“如果引用《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最能代表他们生活方式的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持续的城市’”。他将土耳其房子里的一个房间描述为“一般都整洁得一尘不染，但是四壁空空，毫无装饰”，其程度如此，一个欧洲人肯定会相信“一队旅行者占据了旧谷仓，说：‘我们打扫一下将就吧；费更多事没什么用处。我们多半过一周就又要走了。’”如果这些人是征服者，正在扩展和巩固他们征服的领域，那这种无视享乐、拒绝放松的态度就再合适不过了。但对广阔疆域的管理者来说，这就意味着懒惰的无序、贫穷、疾病和无知。这意味着，收税官每年榨取土地时，就像军队一样总要奋力前进，当作离开土地前的最后一次勒索。零零散散地，有个别的斯拉夫人被有益于巴尔干半岛的唯一外国思想拯救，那是东方人对愉悦的喜爱。零零散散地，土耳其人让自己身处杨树林、喷泉，以及富有且知觉敏锐的基督教邻居周围，以愉悦自己的感官。达尔马提亚例外地受益于一个怀才不遇的法国人——马尔蒙。他也向周围扩散自己的思想，如同浮油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但他被他的统帅拿破仑否决。拿破仑证实了规则的存在，他没能守住在战争中赢得的东西。

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思考，也暴露出帝国灾难性的另一面。当我在写关于圣奥古斯丁生活的文章时，思维里出现一些关于帝国主义体系在帮助对象国家超越原始阶段时的效度问题的怀疑。我觉得，如果拜尔巴斯不曾建起围墙，非洲应该会幸福得多。我的南斯拉夫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怀疑。达尔马提亚的海岸是棺材的一面，里面躺着死亡的伊利里亚。它是一个伟大的王国，死于罗马帝国之手，以教化使命的名义。伊利里亚人醉生梦死。

罗马人一本正经地说，不知道苏埃托尼乌斯(注)要拿他们清白的名声怎样；他们是海盗，维护不了大路上的安全。如果一伙强盗劫杀了一家人，事后宣布这家人是恶人，除掉他们是履行公职，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伙强盗，尤其是有任何不利证据出现时。证据有很多。伊利里亚在东方势力中独占鳌头，罗马不论在细微之处，还是在显赫程度方面，都无法与之匹敌。亚历山大大帝让所有的罗马人都黯然失色，他有四分之三的伊利里亚血统。伊利里亚被征服以后，也出现许多人，在处理罗马事务时，让具有意大利血统的同时代人相形见绌。所以，罗马的故事版本不足为信。

梳理历史，对伊利里亚的征服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公开战争进行了二百五十年，接着是五十年的叛乱和平定，最后实现的和平只延续了一百年。但是，这和平只是有才华的伊利里亚人在维护，他们不得不接管老朽的帝国机器，所以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自由的伊利里亚可能

本无这样的障碍。甚至，帝国导致的灾难让他们的天赋也变得徒劳无益。让帝国陷入停滞的蛮族入侵，也将许多欧洲文明湮灭无痕，以大火燎原之势向西横扫整个大陆。如果各个国家的政治管理与其种族和经济情况相匹配，能够让入侵遭遇严防死守的对抗，也许形势会有所不同。但这些国家都被罗马摧毁了。原来的国土上建立起松散的种族联盟，它们早就在臣服于外国控制势力的过程中意志消沉了；而这些外国势力，本身因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厄运，已成强弩之末。蒙古人荡平它们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但其可能性能够通过我们对于非洲的了解加以判断，非洲的书载历史要多得多。罗马摧毁了迦太基文明，因为罗马还没有建立商业的理念，不能理解对手也可能是顾客，还因为它希望把北非当作自己的粮仓。它对受害者的描述和对伊利里亚人一样负面，可信度也同样不高。在这里，被征服的民族也接手了胜利者的事业。伊利里亚一脉的罗马皇帝被称为“世界修建者”，声名赫赫。但是非洲神父们用天才的智慧，将可能消失于世的基督教会保留下来，因而护卫了西方文化的延续。通过圣奥古斯丁这位最伟大的非洲基督徒，我们了解到当蛮族入侵时，这些天才的人们和他们的肥沃土地是怎样的情况。北非被禁止掌控自己的经济生活，只存在为罗马帝国的一个部分。主人破产时，它自己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感染。因为皇室税负高得让人难以忍受，所以财产变得无用；无力承担税负的人将财产交给教会，数量让教会感到十分尴尬。许多工匠和劳动者穷得发疯，加入了游荡的宗派团伙，他们将宗教狂热和自杀躁动结合在一起。崩溃的消息传到南部，来自大陆黑暗心脏的部落成员渗透上来，侵蚀着文明的边缘。当时的情势对入侵者极有帮助：瘦高的皇帝和他跋扈的姐姐之间产生争执，分裂了帝国，之后，几支军事势力相互混战，加剧了割据。北非总督名叫博尼法斯，关于这个不快乐的人我们知道得很多。他陷入迷茫，不知道该效忠于谁。于是他不得不起兵造反。两支罗马军队被派去平叛，这时汪达尔人对受困的省份发动了进攻。受益于对方弊政分心等因素，他们比较轻易地建立起废墟之国。他们在几个地方坚持着，除去其中短暂的伊斯兰文化期，几乎延续了随后的一千五百年。于是，在其存在看起来最为合理的地方，帝国的理论受到了怀疑。在现代非洲，“白种人的责任”这一短语完全不是讥讽：不计其数的欧洲人舍弃生命来救助非洲人，让他们免于受到昏睡症和奴隶贸易等不利因素的困扰。但是，如果原生的非洲文化没有遭到罗马帝国的摧残，这些传教士的服务是否还会被需要便值得怀疑了。

可能罗马摧毁的人类成就，比它孕育的要多得多。拜占庭为巴尔干半岛创造了很多，但也是在西罗马帝国陷于困难的日子里。那时候，西罗马帝国对外进攻的梦想几被遗忘，自我防卫的需求持续存在。在与所有现代帝国接触的过程中，巴尔干半岛失去的显然要比得到的多。他们属于悲剧的范

畴，帝国不会理解悲剧因素。英国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除了格拉德斯通先生之外。他如果知道了基督教反叛的真相，定会深感震惊。所以他假装他们不是这样的，就凭着这样的虚假信念服务于真理。还有一些高尚的女性，比如厄比小姐，她和她的朋友缪尔·麦肯齐小姐一起，冒着危险穿过马其顿，讲述土耳其弊政的真相；之后又在萨拉热窝为基督徒开办学校，也将刚毅不屈的品质，作为课程教授给学生。但英国人通常以愚蠢的眼光看待半岛。他们被灌输了帝国主义思想，认为帝国是好的，所以总是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没有建立帝国主义就不够好。19世纪的英国旅行者，易于对奥斯曼帝国里的基督教臣民形成负面的看法，原因是他们肮脏、不识字、贪婪、谄媚、冷淡、无礼。旅行者指责他们，就像是指责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这些新生工业地狱的居民一样。这些居民总是臭烘烘的，喝杜松子酒喝到烂醉，且粗鲁无礼。当19世纪英国旅行者的这些不幸同胞，成为中上层慈善人士的传教对象时，他感到高兴。因为对这些基督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监护的是土耳其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习惯很细致，人也十分文雅、慷慨、高贵、友善，特别有礼貌。他的高兴在土耳其帝国土崩瓦解时随之破裂。善人是不应该破产的。但在20世纪，他的孙辈却将热情转向俄国和奥地利帝国，为这个或那个不是巴尔干半岛的监护人而深感遗憾。哪怕是在战后，这些大国势力被证明像烂苹果一样稀软，而塞尔维亚人在拯救欧洲文明中表现出强大的一面，英国人仍然哀叹着巴尔干民族没有处在高雅、迷人的奥地利人的监护之下。

一种奇怪的梦呓认为：南方斯拉夫民族应该由俄国来进行文明教化。可是老的俄国甚至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也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更多地是一个广博的精神价值和微小的物质能效的象征。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在广袤而疏远的领土上，在过去的失败中伤痕累累。他们据此相信，自己正在出演一部大戏，这部戏能够揭示自己非凡命运的含义。这些人还没能从金帐汗国的蒙古部落强加给他们的无序状态中恢复回来。游牧民族占据他们的国家将近两百年，互相冲突的信仰阻隔了他们和拜占庭帝国的关联，此时它已是个肥沃多产但是垂死挣扎的国家。在这漫漫长夜里，国家陷入一片迷茫。尽管国土上出现了一些伟岸的天才，烟与火的结晶，证明着血统传承的价值，然而他们中却没有人具有当保姆的素质。最不可思议的念头是将饱受土耳其人蹂躏的受害者移交给俄罗斯人照管。他们至高的需求是宁静、秩序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俄罗斯人自己在亚细亚的势力影响下，陷入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同时并存的长久狂热状态。所以，唯一的想法只有将他们移交给奥地利帝国，别无其他。

从史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宣传者的角度，要写出关于奥地利帝国的纯粹真相很困难。维也纳的紫丁香和栗树，巴洛克宫廷里的镀金楼梯和水晶吊灯，神圣的音乐家，林林总总，扰乱着人们对世界的判断。同样，对日本——这个很大程度上以樱花、宝塔和浮世绘为特征的王国

——的辩护也不具说服力。在格林津的花园里喝一点维也纳新酒，感觉十分惬意，但是，当格拉德斯通先生说他不知道奥地利有什么好时，也不是在信口雌黄。它在能够统合为一个整体的最大程度上展现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余下的人则热衷于争论，意识不到有任何理由让他们用和谐替代不和谐，以消除地方差异。如果不是有土耳其入侵的威胁，很可能奥地利人将一成不变。他们之愚笨、粗心，从他们容忍哈布斯堡王朝成为他们的统治者长达几百年当中便可见一斑。

这个皇族起始于1273年一个不幸的日子，这一天选举团将哈布斯堡的鲁道夫选为罗马皇帝——因为他的平庸，终止于1918年查理二世退位。整个王朝没有出现天才，只有两个有能力的统治者——查理五世和玛丽亚·特蕾莎，以及无数的蠢人，还有几个白痴和疯子。他们在执掌德国时，把它输给了瑞士，使其深陷痛苦之中，从此再没能从“三十年战争”中完全恢复过来。他们给西班牙带去一片废墟，而且情况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荷兰，他们也让自己声名狼藉。如果说在奥地利，他们成功地赶走了土耳其人，那是因为他们在几代人总结失败教训以保持王座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定的技巧，能够驱使外国将军，比如萨沃伊的欧根和约翰·索别斯基，带领外国军队对抗入侵者。他们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骇人听闻：斐迪南皇帝发动的，将其统领下的大部分新教属地转变为罗马天主教属地的战争，堪称史上最为丑恶的行为之一。维也纳的美丽，证明了统治者和其子民之间存在的鸿沟。因为奥地利并不是天然富裕的，它的地形多山，交通极不便利，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奥地利的这些巴洛克宫殿只能建立在对农民和工匠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公正地替哈布斯堡王朝说一句，他们从来没做任何伪善的掩饰，假装自己对民众的利益有任何过分的关心。“他可能对奥地利来说是个爱国者。”有人推荐一位政治家作为大臣人选，推荐理由是他的爱国主义。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冷笑着问：“但他对我来说，也是个爱国者吗？”

哈布斯堡家族，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与帝国里的外来种族关系极差。在土耳其人被赶出去之后，奥地利吞并了匈牙利，既没学会怎样与其和睦相处，也没学会怎样进行压制。它丧失了对意大利的掌控，纯粹因为行为野蛮，管理无能。它仍然对从早期就激荡在德意志民族胸中的双重激情完全不加反思。“斯拉夫人，”11世纪时，萨克森人的王子们和主教们在宣言中说，“是个可恶的民族。但他们的土地盛产肉类、蜂蜜、谷物和牧群，种什么庄稼都能丰收，其他地方不能与它相比。知道的人都这么说。所以，你们既能获得最好的居住地，也能拯救你们的灵魂。”八百年之后，俾斯麦重新审视《柏林条约》时，看到其中一条简直怒火中烧，用铅笔在上面划了又划。因为它保护库卓——瓦拉几亚人的权利。这其实是个无害的民族，但俾斯麦误以为他们属于斯拉夫人。然后他重新起草条约，直到最后把巴尔干送进了奥地利人饥饿的喉咙里。

这是德国人性格中最执着、最鲜活的一面。它使德裔奥地利人承认匈牙利人在二元君主制的帝国里享有平等权利，因为匈牙利人也憎恨斯拉夫人，不会忘记用自己的独立权力，在边界范围以内折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你们看管好你们的蛮族，”匈牙利政治家安德拉希向奥地利总理伯伊斯特保证，“我们也会看管好我们的。”奥地利内部政治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对德裔奥地利人某种不可分割权利的幼稚主张：他们应当享尽偏宠，以斯拉夫人的权利为代价。奥地利颁布法令，要求在捷克地区工作的德国公职人员必须学习捷克语，让他们和捷克公职人员保持平等，因为后者必须懂德语。所有的德裔奥地利人奋起抗议，他们的代表让议会事务陷入停顿，直至法令被撤销。这是19世纪维也纳政治生活中的唯一积极特征。那个年代，哪里都不高尚。因为那时候，市民的无知在人类的思想上投上了厚重的阴影，他们除非是博学之人，否则其极端的无知几乎无可避免。但维也纳甚至比欧洲其他地方更不高尚。显而易见的教权主义，十之八九地导致了幼稚的政治蒙昧主义；官僚机构的阶级贪婪，大大地超越了国家的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自由主义代表的不过是工业家、银行家、律师和地主间的对抗；反犹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致力于保护市侩，他们是一群庸才，不屑于从事体力劳动，却又缺乏让自己进入更幸运阶层的头脑，于是叫嚣着要通过党派行动把自己提升到特权地位。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缺乏胆量的纳粹主义——大胆本是纳粹主义的唯一优点。哈布斯堡王朝延续继承而来的外部秩序传统，靠的是自动作用。这也让他们能够控制这场运动，没有出现比著名的维也纳市长卡尔·鲁伊格博士更加具有争议的领导。该市长尽管头脑里除了仇恨和贪婪空空如也，但行为也在那时的资产阶级自我设定的限度以内。那场运动，以及所有其他的维也纳运动，其动力都来自对斯拉夫人的厌恶。

我在书里读到的就是这么多。但在南斯拉夫，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仇恨。那是给斯拉夫民族带来伤痕，让克罗地亚分神的震颤，以及撕裂波斯尼亚的道德完美主义。那也是德国灵魂上的一个脓疮。格尔达在比托利看着七千座法国人的坟墓，用尖刻的语言伤害待她无限温柔的丈夫：“想想所有那些为了斯拉夫人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比托利的德国战争纪念馆就像一个因为充满谋杀而肿胀的子宫。我第一次知道了这场世仇中双方的品性。我看到斯拉夫农妇制作的庄严、华丽的刺绣品，才知道，滑雪者们喜欢从圣安东带回来的，奥地利腰带上那些亮眼的小花和心形装饰物，代表着怎样的技艺和品位退化。我看见塞尔维亚人踏上阴郁的路途——比在维内尔瓦尔德的小餐馆里露天吃饭的感觉还阴郁。他们去弗鲁什卡·格拉朝圣，在拉扎尔大公身上见证失败本身。他躺在金色的裹尸布里，没有头——战败者往往如此，象征着一种人格的挫败；手倒是保存下来了——这也是适宜的，因为手才是人类的标志，将人和其他所有动物区别开来，是有输有赢的冲突将人和自然界区别开来。我看见了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显然什么都不能教给他们。塞尔维

亚人两次将可能成为他们老师的人赶了出去。当塞尔维亚人第三次被征服时，战胜他们的与其说是武器，倒不如说更多的是疾病和饥荒。他们经过雪山逃向海边，蛰居在一个小地方。然后是第四次交战，他们终于胜利。这不是学生和教师之间应有的关系。我在南斯拉夫见到许多人，比如在圣南姆的墓地那里的智障小孩的母亲，对我们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上帝说，要说的太多了，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发生的事情太奇怪了。"又比如在黑山的山路上行走的老妇，向天空发问："如果我不得不活着，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像这样？"还有其他人，比如米丽察，是诗人、学者，以及世上的一个女人，而还可辨出的是，她是这些女人们的姐妹，证明着她们并不是仅仅在展示因为缺乏使用而保存下来的原始优点；证明着她们的精妙并不是肤浅的花朵，一接触现代文明便会烟消云散；证明着她们的内在能够赢取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我知道，奥地利很少有人表现出足够程度的感知力，让他们有资格教授这样的人。其实他们人少人多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本应该发现，像这样的人不需要被其他种族指导，完全能够自我教诲。

当我在和这本书的素材苦苦纠缠时，我常对自己说，现在，好事终于要发生了。因为老土耳其已经远去，后继者对帝国也无甚兴趣，俄罗斯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哈布斯堡衰落了，而且《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也解放了一些小民族。自由给这些人们带来了狂喜，这是真的，我曾亲眼见证过。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像年轻人一样，睡了长长的一觉之后，清晨站在敞开的窗户前伸展自己的身体。在这些国家的公共场所吃饭，或者公园里漫步，都会让鼻孔里充溢着幸福的味道。历史上没有比民族解放更美好的事情了。这些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的压迫，也未曾忘记自己的灵魂，在对民族命运的思索中走过转型期，创造出鼓舞人心的永恒艺术品。简直不能想象，如果他们被许以时日，学习自治技巧，能创造多少成就。因为他们虽已是自由民族，且这一切对于文明贡献卓著，但他们的自由缘于足够的幸运，他们还没有像斯拉夫人、芬兰人和波罗的人一样学到某种智慧，这智慧"售于无人光顾的冷清集市，长于农夫徒劳的荒芜田间"。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宣称仁慈地关怀着人类的未来，却一点也没有从这前景中得到升华。尤其是左翼人士，对新生的国家和它们的行为吹毛求疵。这不符合他们一贯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常常远超实际——即个人必须自由地决定其命运。它部分来自某个理论，荒谬如此，甚至它的对立理论都没有任何真实基础。这理论是：民族主义总是反民主的，且具侵略性；而国际主义总是自由的、和平的。然而，民族主义仅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决心，决心培养自己灵魂，遵循从祖先传承而来的习俗，根据自己的本能发扬传统。它就等同于个人不愿再当奴隶的决心。实现这两种决心，实质上就是余下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解放个人或民

族，根据其不同的天性会导致各种各样不同的结果。匈牙利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总是比较强盛。匈牙利在发展工业方面雄心勃勃，在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和压制境内外国人方面意志坚定；而爱尔兰，尽管想要征服阿尔斯特，仍然希望保持农业国家的状态，让工业处于完全可控的比例之内。被和平条约解放的各个国家都极可能倾向于自由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长久以来一直积极地反抗俄国、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事实上，鉴于它们所继承的困难条件，他们的行为继续向自由主义靠拢。然而，左翼对新生国家抱有极度的怀疑，访问它们之后，就立即与其对立派进行联盟，哪怕后者是极其反动的。因此我常常感到惊讶，当我和思想自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们谈起南斯拉夫时，总是发现他们对天主教克罗地亚人表达着最温暖的同情，哪怕是那些比马特切克的追随者反动得多的类型。

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被知识分子们使用词语“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复杂化了，好像两个词表示的是一个意思。毫不夸张地说，当英美作家在写法国民族主义时，四次中有三次想的都是法国帝国主义，这是法国生活中不同的两条线。拿破仑是法国帝国主义者，但他和法国民族主义是完全脱离的，这很自然，因为他不是法国人。查理·贝玑[注]是法国民族主义之花，但对法国帝国主义充满敌意。但并不是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都会上升到这种混淆的高度。欧洲状况恶化时，不计其数的人，大多是美国人，叹道：“啊，是这些小国家的错。”他们说这话时，对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也毫无概念。他们不会真觉得是这些小国家在耀武扬威。事实上，当他们感觉受迫时，就翻出那说法，辩称是小国家阻碍了欧洲贸易的自由流动，因为这些小国家设立关税壁垒隔绝自己。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没有给这种辩词提供任何理据。如果巴尔干国家没能建立多瑙河流域的联盟，那是因为意大利想让这些国家保持虚弱，以便哪天把它们握在手里，所以召开一个接着一个的会议，确保禁止它们形成任何同盟。

针对这些新生小国家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出的无知拉低了参与者的整体水平。他们一定心存偏见。这点令人震惊，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欧洲有时候出现的一切顺利的把握，或者明天会更好的承诺都是这些国家给予的。我不禁为此感到振奋，从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的双重角度。土耳其的收税员不必再在斯科普里的山野田间去向农民乞求，为了帕夏的利益——土耳其农民对帕夏也没什么好感。这只是一个例子，用至少更悦人的东西替代使人不悦的东西，我想，这是理性的人都乐于见到的。但我想起来，拜占庭的壁画艺术，以及隐藏在几乎最琐碎的斯拉夫人谈话中的猜测，都证实了我的推测：人类并不理性，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来说，也没有喜欢悦人的东西更胜于不悦的东西。我们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这部分人喜好快乐，希望幸福的时日能更悠长；希望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这屋宇又将为后来者遮风挡雨。

我们另有一半的人几近精神失常。他们偏好违逆的东西胜过合意如愿的东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希望暴死横逆，致使生活回到原点，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除了被烟火熏黑的地基。我们的光明天性，在内部和动荡不安的阴暗进行斗争，哪方都不能够常胜不败。我们自我分裂，不允许任何一方被摧毁。这种斗争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一直可见。很少有人可以从不抛弃任何快乐，不管有时候他把快乐攥得有多紧。在历史上，我们经常对自己的厄运兴致盎然。有时候我们追求和平，竭力为种族命运寻找便利的边界和合适的实现。但有时候我们无休止地进行战争，将支撑民族生命的根基践踏成泥。我们选择忽略历史上的这种自杀式倾向，因为我们在描绘自己时，一直都是糟糕的画家。我们粉饰自己的意志，让它在上帝面前看起来不那么色彩斑驳。我们假装“三十年战争”让那些策划它的人感到失望。因为它给中欧带来了饥荒，程度极其严重，无数村庄死寂一片，绝望的灾民伏击路人，以食其肉。也许战争工程师们不喜欢村庄，一想到饮食健康的社群，顿觉反胃。我们似乎被上一场战争取得的胜利噎住了，所以现在有了对失败的胃口。新生的国家充满活力。南斯拉夫挥动着握紧的拳头，发誓这意味着活下去。于是英国、美国和法国转过头去，因为生活让他们反感。他们想要一个褪白的世界，一个没有血液、在失败面前妥协的世界。

所以，英、美、法对地下活动不加干涉，这些活动与我所记录的连绵不断的国家行为并列而行。时不时地，从正文中出现一些黑色的小图形，在白色的纸张上摆出姿势，就在正文的旁边，它们获得了有魔力的符号——死亡咒语，然后重新跑回正文中，继续着主流、正统的历史进程。

在那之前，对合法过程的不规则背弃，和历史的大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黑色的小图形跑出正文，在空白处留下魔力印记然后消失。正文的大篇幅文字仍如以往一样继续，只是之后的部分与预期的相比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魔力灵验的话。19世纪的进程当然受到了微小程度的影响，除了专业的眼光，一般人很难觉察。影响因素来自对黑山王子达尼洛的暗杀，更显眼的因素是对塞尔维亚迈克王子的暗杀。当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被谋杀时，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登上王位，欧洲的地图被重新涂刷上更加鲜亮、刺眼的颜色。但是达尼洛之死没有让我的曾祖母落泪。我怀疑，我的祖父也未曾想起过塞尔维亚的迈克王子离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也没有因为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而吃得不同，穿得不同，或产生不同的思想。萨拉热窝的暗杀却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它在正文上的魔力操作效果立竿见影。我，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女人，为此落泪的次数不计其数，反反复复地说：“啊，那是因为战争。”然后学着吃饭充饥，穿衣暖身，思考不为消遣，而旨在找寻迷宫里的线索。非个人化的事件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如同个人生活当中的典型阶段所带给我们的一样深刻。在欧洲，交战各军带来的阴霾被清除后，版图再次被涂刷，色彩更加辉煌，也协调起来。

也许未来之眼将时间隧道里远处的欧洲看作一个苍白的西方世界，像一幅褪色的壁画，由天才绘制而成：烦恼的、因痛苦而扭曲的德国人；处处受阻、心事重重的俄国人；还有一串闪亮的小国家，人们前所未有地生活得欢欣快乐。然而，总有些难解的因素不满足于这样的分配。

萨拉热窝暗杀代表了历史上的三种主导因素。普林西普是受了民族主义的驱使；致使普林西普走上这条路的奥地利官员是帝国主义者；另一场暗杀的各方——因为普林西普领先一步，所以那场暗杀并未实施——是“埃皮斯神牛”的孩子们，他们热爱杀戮本身。但现代有一种重要因素，既不存在于暗杀中，又不存在于和平之后的满足里，尽管它也不存在于之前的满足中。城市无产阶层中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的群体，派卢切尼作为代表，谋杀了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很大程度上因为犯罪地点的关系，他们在谋杀弗朗茨·斐迪南的事件上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的利益没有在随后而来的战争中得到顾及，后来，他们被莫名其妙地遗忘了。新的时代热衷于改革，在为其支付代价时也慷慨激昂，却没能对社会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部分的原因是左翼势力无所作为。他们适于进行革命，这是他们的本行。但他们忙于讨论遥远的俄罗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本地的拯救方案。他们把机会让给了右翼革命势力。

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墨索里尼上台。意大利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阶层成员的国家。尽管法国有庞大的城市人口，却根深蒂固地不具备无思想倾向。英国有强大的传统。美国有财产。意大利有许多农民，历经大概一个时代的工业化却没有受到教化；意大利丧失了旗下小国的传统，却没有建立起遍布国家范围的新传统；而且这个国家很穷。墨索里尼是它注定的领导，虽然他的才智不足以让他从这个阶层脱颖而出，却足以让这个人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从学徒进入左翼队伍。如果他的领导权是在和平时期获得的，他可能会寻求一些暴力举动来激起战争。但他的时机到来时，全世界已看腻了金戈铁马，他的计划明显时机不对，于是他不得不另想些将暴力运用于和平时期的方法。他检索到了《戴克里先法典》，不知道是从哪个聪明同志一知半解的言论中听来的，还是在书店外的便宜货箱子里瞥到一眼。但墨索里尼不知道，或是没注意，戴克里先最终绝望地死在斯普利特的宫殿里，因为他没能有效地审查罗马国土上退化的后继者。墨索里尼把法典施用于自己的国家。这是一场滑稽的冒险。因为戴克里先有理由通过颁布帝国的制度来寻求稳定，帝国的存续已经超过千年。但是企图固定一个国家的形式就显得蠢笨了，这个国家统一还不到百年，且深度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而这体系最早也不过始于工业革命。

实际上，墨索里尼复活法典这事，与其说是依靠人们的才干，不如说是寄望法典自我改良的能力。他力挺它，是因为现在不得不以暴力来推广，而

暴力是墨索里尼所宣称的生活最高要旨。在和平中，使用暴力的机会非常有限，而且不那么有利可图。墨索里尼必须诉诸战争。他教他的追随者们享受攻击的滋味，他必须向他们应许欧洲冲突中的大范围杀戮，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在社会服务开销上大肆挥霍，把追随者的物质标准提升到国家无力供给的程度。为了抚慰他们新的贪欲，他又不得不向他们承诺海上权力，比如英国的，以及一个延伸至亚洲和非洲的帝国。迈向这些终极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摧毁南斯拉夫。如果墨索里尼想掌控亚得里亚海的话，南斯拉夫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是一个必需；穿过南斯拉夫的内陆腹地，公路可通向亚洲。但墨索里尼无心进行公平战斗。他没有传统，他只学到了最原始的社群所学到的东西，即如果双方都没有背叛通敌行为，那冲突对双方都更好。他努力地想事先赢得战争，方式是煽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境内的南斯拉夫人进行革命。但他犯了个错误。他本身属于就业不足、生活无聊的市民阶级，这个阶级总是对街头斗殴喜闻乐见。他没能理解农民阶级，他们很快就厌倦了游击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到处穿行，觉得这些人严重干扰劳作，影响收成。所以，墨索尼里把目光投向北方的奥地利。

维也纳仍然站在那里。就是说，它还和曾经一样。一个伟大的城市培育了它的传统，这是摧毁不了的。因为它历经所有生于此地或者受其荫蔽的人的努力耕耘，因为它决定了本地风俗的形式，从此永远地限制着从其他地方进入此地的人，让他们遵循它的生活方式。君士坦丁堡也是这样，拜占庭人按照自己宏伟的梦中形象建立起这座城市，也将这些梦想灌输给外来的天才——赶走拜占庭人的土耳其人。维也纳的情况就是如此。

维也纳这座城市似乎起先是因为引发战争，而接受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命运。自此以后，它就不得不受穷了，因为它的贫穷是天生的。只有对它的农民以及斯拉夫民众的无情剥削，才让它支撑起贵族的奢侈和资产阶级稳固的舒适。但在它的衰落中，也许它能见到一个和自己的18世纪同样伟大的时代，如果它能甘心抛却虚荣，让自己成为一座小城，只自豪于它的大学和歌剧院，它的巴洛克宫殿和艺术馆，它的丁香和栗树，以及彬彬济济的犹太天才。然而，它却不能审视在19世纪愈发根深蒂固的传统。在维也纳的残垣断壁间，这传统发展得枝繁叶茂，甚至蓊蓊郁郁地延伸到了其他土地上。

因为这传统找到了一个良好的通道，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不要忘记，希特勒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他带给战后德国的，在战前的奥地利无不有其存在。他的恶魔幻想除了其强度之外，并无新颖之处。他与卢切尼和墨索里尼同属一个阶层，也是无望无助的城市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他无思想、无财产，就迄今为止的人类传统来说，他也无传统。他不知道，为什么艰难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思想过程会受到尊重。他不知道，一千四百年前就有帝王曾经表明，一个统治者“不仅要能驰骋沙

场，也要懂得法治天下”。所有的社会必须遵从这样的观念，否则将会枯萎、消亡。他完全不懂，事实上人类喜欢愉悦胜于不悦是健康的。他曾是个手艺人，对自己的手艺没什么自豪感，这很自然，特别是作为我们社会体系里某种寄生虫——海关官员——的孩子来说。但他幼年时听到的东西一直在耳边回响。他父亲出生的村庄离舍内勒注的住宅也就几英里，19世纪末舍内勒领导的泛德意志运动席卷了维也纳，《我的奋斗》一书中悉数是舍内勒的计划。里面有同样的民族骄傲、同样的反犹太主义、同样的对斯拉夫人的憎恨、同样的对教会的敌意。然而，舍内勒的运动失败，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在知识阶级里寻找自己的追随者。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总有吹毛求疵的倾向，这让他们没法欣赏这个平台的简单和强大，构成平台的每块板都是从仇恨或者自负里切割出来的。两个领导，不是农民或者工人，都是官僚。他们意识到，信仰的唯一希望在于向城市工人中的卡利班（Caliban）群体中扩散，这些人身处工会之外。他们创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章程和纳粹党几无区别，在1911年的奥地利议会中占三个席位。希特勒仅仅是奥地利货物的出口人，卖货的精力极其充沛，因为对血的活力激情是他独特的个人癖好。他在谋杀中获得的愉悦如此强烈，和他相比，“埃皮斯神牛”算是温和的人，后者只是有时生气了跺跺脚而已。

但是，希特勒实现了他在德国的命运。维也纳没有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只有一些老演员，刻意上演同样以放肆和糊涂为主题的喜剧。金融家和实业家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热情高涨，不仅拉垮自己的房子砸在自己的头上，还打破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1931年安斯塔特信贷银行破产，导致1929年世界经济衰退持续发酵后的德国危机。城里的政治势力没有关注这些动向，他们一如既往地为琐事而纠结，相互倾轧。左翼阵营中出现一些乐于奉献的，甚至是圣洁的工会会员，还有许多某一类国际社会主义的信徒，这类主义让它的信徒们不太适宜处理本地问题。其实所有这些都没用。人们没有意识到，通过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当局，花钱的方式如同社会主义已然建立，尽管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资本主义，这也唤起了令人生畏的反应。右翼扮演着社会对他们期待的角色，仍然能够看着茶杯，对外国访客说：“请问，某某先生在英国社会中是属于第一阶层呢还是第二阶层？”奥地利独立的唯一希望在于和多瑙河流域国家之间的同志关系，它们可能会和它共建一道坚实的阻隔，来抵御那些肆无忌惮的年轻国家，随时准备面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升力量，后背还得抵住更加肆无忌惮的俄罗斯和土耳其。但奥地利仍然对它东边的民族嗤之以鼻，仍然自诩为“欧洲前沿”。它向西方寻找救助。当它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陷入经济萧条的深渊时，还抱着错误的幻想，认为和德国结成了关税同盟，麻烦就会结束。这一想法不错，被后来的历史轨迹证明是非常合理的，但当时各国势力认为与德国结成关税同盟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于是禁止了。但无论如何，关税同盟也不是治疗奥地利经济弊病的良方，德国和它一样疾病缠身。因为极其相似的原因而濒临破产的两个国家，偿债能力没有哪个

比哪个更高。一些右翼政客对此有所意识，但他们的意识缺乏敏锐度。他们决定保持独立，却挑动起与帝国主义或者国际纳粹主义相结合的倾向，或鼓动他们的追随者，燃起同样的对帝国主义或者国际主义法西斯的自杀式热情。为了这些疯狂冲动，他们牺牲了一切：荣誉、尊严、人性——在自己不具备这些特质时，还把自己的同胞拿来做了牺牲。因为这些独特的奉献，1934年2月，硝烟升起。

战后维也纳最经典的特色之一便是由维也纳政府所建的工人住宅。住宅规划极左，国家政府政策极右。这些巨大的建筑，对已经被维也纳花园里的丁香和栗树诱惑的访客来说，充满了现代和理性主义的魅力。但凡有质疑者发出一丁点儿对住房计划的其他声音，必被斥为铁石心肠的家伙，不愿给可怜的孩子们一个体面的安身之所。真实情况是，这些住房对于一座废墟之城来说，是惊人的浪费。因为它们是不必要的。尽管哈布斯堡的维也纳被面目可憎的贫民窟丑化了，人口的减缩却让穷人不必再在这里居住。他们只需要搬进那些由它们以前的主人腾空出来的住所。这里修得很好的、为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流而建的别墅区现在立在缺乏照料的花园中，住或不住这里的人，节衣缩食地为它们付税。这些别墅可以轻易地被重新分割，花园也可以分成小单元，成为新的住房。结果，它们被废弃在那里，慢慢腐朽。这座穷困、萎缩之城的市议会花了一千四百万镑来修建六万间公寓，以孤立的街区形式容纳了最多一千七百个家庭。一个仍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运转的国家，不应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这么大一笔钱从工业当中转移出来——失业率和这些高楼的数量呈正相关增长。而且，特别值得怀疑的是，如果附近有充足的土地，让民众可以住进带有花园的宽敞住宅，是否应该鼓励家庭住进公寓里。这些公寓的面积极小，尽管无法衡量它们对外国人来说有多少魅力，但事实上，它们不及许多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类似工人住宅。相对于大多数战前的英国同类住宅来说，它们要优越得多；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使用的住宅计划标准就远高于它们了。

据说，驱使维也纳市政当局建造这些街区的动机并不简单。要想成为租户，市民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事实上会确保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如果他从事某种职业，那他必须是工会会员。如此一来，这些公寓就把稳固的社会主义选民阵营放进各个地区，以防他们可能转为右翼代表。如果事实如此，卡尔·马克思大院和歌德大院的建筑的讽刺意义就不亚于巴别塔了。1934年2月，文明存在的缓慢、合法进程，再次遭到了背弃；对行动的诉求如此迅速、直接，它的逻辑很难体现出智慧。黑色图形再次跑出了历史正文，在空白处印上了魔力符号。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

注 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奥地利民族主义者，农业保护主义者。他憎恨希特勒的无神论、帝国主义和经济计划。所以他秘密地向墨索里尼求救，实质上成为意大利政策的工具。施塔亨贝格王子，一个富裕的贵族，

也是如此。他曾是希特勒早期的同谋，后来背叛了他，现在领导着一支半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力量，称为“保安团”或“家乡保卫者”，支持多尔富斯。1934年1月，似乎多尔富斯和施塔亨贝格迫于艰难的内部条件，打算和社会民主党缔结一个运作协议。事实上，在法国当政的左翼政府也的确得到了明确的承诺：他们会缔结这个协议。但在1月中旬，墨索里尼带信给多尔富斯，说对社会民主党不能怀柔，只能摧毁。不幸的是，这次表态恰巧发生在法国政府垮台的2月7日，在灾难性的协和广场战争之后。这向全世界暴露了法西斯在法国的影响势力。多尔富斯立刻吸取了教训。3月11日，他的副总理马约尔·法伊和施塔亨贝格王子一起走进维也纳，带领警察和保安团追捕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寻找追捕对象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因为许多党员就是街区公寓里的居民。警察和保安团包围街区，进行轰炸，清除了里面的居民。内战中，受害者的信息可以被隐瞒。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有多少不幸的租户被杀死、监禁，或者被释放出来后无家可归、一贫如洗。但这样的受害者必是成千上万。就是在这场屠杀里，我那盲目的蓝眼司机进行了协助，载着马约尔·法伊到处跑，从一场屠杀跑去另一场屠杀。因为他认为，是时候某人该做些什么事了。

这场谋杀，标志着造就我们近代历史的谋杀天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它也谈不上新奇，它带着发动者令人熟悉的印迹。就像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堕落一样，它也毫无意义。它不能服务于任何可能的目标。如果墨索里尼进军奥地利，抵抗他的会是其他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大院和歌德大院的忧郁租户。这场罪行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奥地利人冷血、无人性的其他罪行。梅耶林悲剧发生后，玛丽·维特塞拉的叔伯们连夜被召唤到狩猎小屋，面对装在洗衣篮里的他们侄女的赤裸尸体。他们为她穿上衣服，一路上让她的尸体立在他们之间，颠簸十英里到达墓地，秘密地将她葬下。为了让玛丽的尸体一直坐在座位上，必须用伞作为夹板撑住她的脊柱和脖子。皇廷官员没有人为这事感到心碎，也没有人同情这些悲伤的年轻人的处境。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谋杀后，以及二十五年之后他妻子去世时，葬礼安排都非常冷漠，表明野蛮时期并未过去。二十年后，二月屠杀证明了“仆随其主”这句话的真实性。要想对我的司机的行为进行判断，只需要想象一个伦敦出租车司机，在几天的时间里兴高采烈地载着一个恶棍到处走，该恶棍的职业就是用炸弹和机枪袭击伦敦的所有市政公寓，不管里面住的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还可以进一步想象，驱使这个伦敦司机的动机，并不是对什么明确错误的愤慨，或对什么事业的激情，而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时代变得更好，希望自己不被穷困逼疯，希望自己吃穿不愁，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充分的社会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罪行缺乏新颖性。暗杀黑山达尼洛王子和塞尔维亚迈克王子的是个人，他们持某些观点，要杀死民族主义者。暗杀伊丽莎白皇后的人却不是个人，他是未分化的人类群体的代表。他杀的是个体，这个

个体是阶级的代表，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部分人类丧失其区别，回归到人类大众群体中来。暗杀亚历山大和德拉加·奥布伦诺维奇的人，很可能是出于民族主义思想，反对那些本应成为民族主义者，却被外国帝国主义腐蚀了的个人主义者；不太可能是为了享受谋杀的乐趣。弗朗茨·斐迪南的谋杀案，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个人谋杀帝国主义个人的案件。但二月屠场却代表着群体谋杀群体。墨索里尼要摧毁他的同类人，动机不在于用精神、传统、兴趣来驱使个人维持稳定状况，而是出于某种最初级的反应，就好像胚胎在子宫里的踢动。这是现今时代中，第一次个体被挤出历史。在影响数以百万计人命运的决定性行动中，墨索里尼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这意味着，自此以后的事件定会沿袭一条暴力的非理智途径，因为胚胎不能控制成人创造的复杂世界。这也意味着，存在的状态将堕落，从已实现的舒适和尊严，堕落至迄今为止程度仍然未知的痛苦和羞辱，因为成人不会幸福地被胚胎统治。

维也纳屠杀的第一个结果是众人皆知的1934年6月30日纳粹“血腥清洗”。至今，谋杀只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他的主要做法是虐待和监禁的结合，只是偶尔诉诸暗杀，处理一些特别危险的人物。但维也纳当局向他建议说，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大，也许可以杀人，甚至杀很多人，而不受惩罚。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一夜之间不经审判、不加警告地杀掉了大概一千两百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曾经喜欢他、信任他。这样，他同时既满足了自己的杀人胃口，又上演了一出我们幼年时都玩过的幻想游戏。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曾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像小帖木儿一样，祈祷整个不好的、困难的世界在晚上被扫除，这样，到了早上他们可能会有新的爸爸、妈妈和保姆，新的幼儿园。带着这种孩子式的残忍，希特勒在他的受害者中又添加了慕尼黑餐馆里的经理和两名领班。这家餐馆，他和他的同党以前经常光顾。这也是群体对群体的谋杀，但主体和客体如此相像，这种谋杀就不再是真正的谋杀了，就像手淫相对于性交一样。许多被杀的人很清楚自己和纳粹之间不变的相似性，所以以为自己是反纳粹势力的受害者，临死前大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希特勒对于过程的享受，比如上述这种过程，引导着他在下个月还没过完时，就冒险尝试更成熟的放纵形式了。7月25日，他策划了在维也纳的纳粹起义，主要目的是暗杀多尔富斯。对这个受害者，没人需要洒泪。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即便他事实上没有积极合谋，也默许了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场谋杀十分恶心，完全不带个人同情的痕迹。多尔富斯在残暴的刺杀中倒地，在自己的血泊中挣扎了几个小时，徒劳地呼喊牧师和医生。同谋者们惊恐万状，还没有时间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便四处奔跑逃窜。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注定无果的。它们不能致使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原因是，如同理智的观察者必能预见的，起义的风声把墨索里尼的主力部队带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勃伦纳山口。6月30日的“血腥清洗”是否达到目的不得而知，因为内战可以悄无声息，许多受害人就彻底湮灭在纳粹党内，外人永远不知。但

谋杀多尔富斯震惊了世人，这例子表明，独裁者决定的历史事件具有无意义的特征。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喘息期里，发生的事件不多。8月全世界相对安静。整个9月，地中海沿岸延续着疲乏与倦怠。但到了10月，事态又严重起来。10月9日，在马赛，发生了让我很长时间都感到揪心和困惑的罪行——南斯拉夫的国王亚历山大遇刺。我发现，用自己在南斯拉夫旅途中收集的资料，似乎可以对这桩罪行进行解释。他被杀的原因是这样的：土耳其人长期压制巴尔干民族，像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只是简单地以征服的方式来建立政府，弊政统治下的半岛成为周邻各个帝国觊觎的对象，它们像狼一样蹲伏四周，期待着有那么一刻，土耳其人趔趄逃走，留下他们未加防守的战利品。而在那一刻，久远的梦想在巴尔干民族心中激荡，他们愤而崛起，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狼群希望破坏这一刻，把战利品归为己有，为曾经在甜蜜中经历的失望进行报复，这般甜蜜更胜于盗窃的感觉，它来自屠杀。所以他们不得不杀死亚历山大国王。他是巴尔干的精神化身，他和所有的巴尔干民族一样可怕，因为他两次起死回生，击碎了科索沃坟墓。当奥地利人践踏他头上的土地时，他踢走他们，卓然而立。对谋杀者来说，最可恶的事，莫过于被杀的人不死。他顽固地立入光明，满脸尘土，眼里闪耀着新添的智慧光芒——他从我们生活的黑暗基底学习得来，在他死亡期间。

他不得不死。我收集的材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我数年来，坐在书桌边研究时，我的材料以及围绕欧洲发生的愈来愈黑暗的事件显示，也许，亚历山大在那一个日子的那一场死亡，仅仅因为，如果两个尚处胚胎阶段的玩家在桥牌游戏中成为搭档，他们都会希望打出自己手里的王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必定结成负面联盟，以对抗世界其余地方的正面力量；但在无关紧要的谋杀上，他们一度相互竞争。墨索里尼在2月杀掉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党员；希特勒在6月杀掉自己的同志，带着成功的喜悦，又在7月拿下了多尔富斯；墨索里尼不甘落后，在10月灭掉了自己的人。对亚历山大的谋杀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但拖着它迈过现实门槛的，可能仅仅是犯罪中的竞争精神。正是这种无意义性让罪行更加骇人。无思想——没有记忆或意志——的生命代表杀死了从死亡中崛起的生命代表，这生命曾经崛起的方式，是让五百年的沉淀不染遗忘的尘埃，用决心，让被剑刺穿的心脏依然保持跳动。

历史，看起来就像疯子的精神错乱一样，本没有意义，但是被填上了可怕的意义。这里存在着一种新的手段，来面对我们时代的这个特点，来强化它。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代表的这类城市人口被从农村拉来，为了机器和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销而工作，这些机械工作把飞机带给了我们。它成为独裁者的完美工具。通过在大城市空投炸弹，群体谋杀群体的欲望得到了满

足；以同样的方式，它破坏了古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些国家的过往，讲述着漫长、连续的故事，如此一来，它攻击了思想、传统，以及安居乐业的根基。这样的战争定然意味着全盘的摧毁，因为群体和群体几乎势均力敌，因为全世界的力量，也不足以重建那些凭着对命运的笃信不疑，历经数个世纪建立的东西，除非花费同样长的时间，由同样理想化的灵魂塑造。但这些经历不会有助于阻止战争。眼下是我们人类的周期循环中语无伦次的阶段，失败与灭绝，和胜利一样得到热切的追求。这一点，可以从我所研究的事实中推断出来，也能从我每天写给报纸的东西中得到证实。它们记录了普遍的、愚蠢的战争状态的推进，以及周围更坏的情况。因为它们记录了冲突的演练。德国和意大利公然无阻地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施行演练，而受到威胁的其他国家，尽管具有仍然不可小觑的传统力量，却只是缄默地呆立一旁。

在乡下，有时候睡觉的人醒来，发现周围一片陌生的静默。寂静仿佛延伸在他的上方几英里、周围几英里。破晓时分，平常的那些响动也消失了。他走到窗前，发现世界被覆盖在大雪之下。草地、树林和远处的田野一片白茫茫，道路上一片白色的冰封。鸟兽杳无踪影，也没有劳动者出来工作。耳朵里响起的只有血之歌，纯洁、轻快，愈显其纯粹。空气也在寒冷中得到净化，鼻孔顿感轻松。这里听到的声音，是野天鹅的鸣叫；这里看到的身影，是灰松鼠在路上的跳跃。相比身处更为纷杂的世界时，如今它们的存在更为醒目。那一天，那一周，其后的一周，降雪都带着质朴的、充满活力的喜悦；但是如果月复一月，仍然大雪覆盖，坚冰不融，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这样的冰雪存在于高处很好，人们可以经常去探险；但是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低地就很糟糕了。泉水在源头结冰，牛群没办法饮水，羊群找不到藏着的牧草，种子撒不进坚硬的土地，果树萌不出新芽。如果冰雪不化，江河不流，美景就成了钢铁绷带，所有的动物都活不成，人也会死于其中。当白色持续得太久时，我们告诉自己，所有的季节都有自己的周期，春天总会如期而至，今年如此，去年如此。但是，明年可能不会如此。冬天来造访时，经常逗留的时间长过安全限度，耗尽了树叶、花朵、水果，还有牛肉。冰雪先覆盖了门槛，然后是窗户，再是烟囱，以及高地上的农田，最后围出一片寂静，在春天的阳光里都融化不去。有时候，位置不太高的农田和果园也被寒冷烧灼，像被大火烧灼一般，照管的人们跑下平原，饥肠辘辘。又一次冰河世纪。

在英国也有如此的寂静，如此的白色冬天，漫长得几乎受到死神的威胁。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叫嚣着杀戮，可以想象，英国是它俩共同的目标。防御工事上必是忙乱一片，必有各种叫喊——警告，宣布，呼吁武力，争论战略。但也有一种沉寂，静止不动。它好像是一层无效的幕布，笼罩着整片土地，好像民族意志的春天被紧锁在霜冻里。当然，有些人因为对独裁者的恐惧和愤怒，大声呼喊起来，但他们被拉离了那些不同于主

流英国人的群体，有些人更好，有些人更坏。但是主流群体自己却处于惰性状态，起初，是因为他们有理由心怀希望。英国获得对时代的掌控权之前，不得不忍受远离繁华多彩的维多利亚自我后深刻的转变。鉴于它的智慧，这个国家曾经的做法显得有些过于轻信他人。那意味着，一经通知，没有一丁点儿的思考，就要对最遥远的他国民众承担责任，而别人的物质、精神环境对它来说全然陌生。它需要知道，行动并不是一切，沉思对于发现方法和提炼意志来说，都是必要的。它需要保持静默一段时间，让自己沉溺于神秘的玄思中。在逻辑发出的声音更大，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玄思是给不出指示的。它躺在静默中很好，就像躺在大雪下一样，没有来来往往的惊扰，空气被怀疑主义所净化，只有最简单和最基础的活动在继续进行，揭示出繁忙日子里被遗忘的固有本质。英国最大的不幸，是在鲍德温勋爵监管期间的无所作为。那段时期，从外观上看来，和重生前必要的基础期如此相似。本来，一个属于过去的政党，可以坦陈自己无力应对当下的情形，然后恬淡寡欲，不做任何无谓的挣扎，只等待着被新生力量替代。

但是安静持续得太长。新生力量没有出现。过时的政党没有打算放弃权力。相反，它用可怕的固执扼住国家的咽喉，因为它从属于不同于生命的其他领域。活人在疲乏之后，紧握总会放松；只有幽灵的手会无期限地始终紧掐。但这些不是诚实的幽灵。若是的话，他们会重现伊丽莎白的权力盛况；哪怕国家舞台上已经积起厚厚的灰尘，他们也会有维多利亚冷静的傲慢，纵然从消瘦的胸腔里发出的声音已然空洞。然而，他们对英国所有骄傲的传统完全陌生，好像骨子里就是外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礼仪抛于一旁，对着英国的政治家大呼小叫，就像廉价外国餐馆里的侍者呵斥厨房杂工一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民族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主张的实质就是呼吁摧毁大英帝国，以及它更低劣形式的重生。这话语将变得有血有肉。流血和撕裂，以撕毁条约、重组被禁军队的方式来证明。前景的恐怖程度史无前例，因为无思想、无传统、无财产的城市无产者，为空战的前景欣喜若狂。在德国和意大利，全部民众都舔着嘴唇，等待他们的领导兑现许下的空战承诺。但英国的管理者们却静如止水。他们的脸像空袋子一样。他们没有就防御下达任何命令。尽管英国大陆上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知道，很快英国就将遭受空袭，但我们没有建造飞机。

当大雪没过门槛，没过窗户，仍然没有融化时，农夫家人的心情应该和我们是一样的。温柔到来的暴力更加可怕，仿佛耳朵在寂静之中只听到惊慌的血液在流动。但是我们的悲痛更胜于自然灾害中灾民的心情。因为把我们交给死亡的不是自然，而是和我们出自同样血统的同胞，我们曾经顺从、信任的人们。我们知道，当我们成年时，他们会欺侮我们，让我们不能充分享有成人特权；我们知道，他们会强迫我们交出大部分周薪，作为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回报；但我们还抱着信任，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会像我

们忠心的父母一样，至死不渝地保护自己的孩子。但是死亡到来了，他们没有保护我们。甚而至于，他们缴夺了我们的武器，把我们的双臂捆缚起来，为我们的敌人打开门，说：“是啊，我们为你们准备好了，捆好了他们任由你们宰杀，你们可以随意处置。”

那时，我们很多人认为统治者们故意背叛我们，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国家建立极权体制，渴望和纳粹德国以及法西斯意大利合作，以奴役欧洲。的确，唯有这样，才能解释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不干涉”政策。它事实上秘密地阻止了所有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多么合法。本来，这些行动是可能有助于独立、友好的西班牙存活的。它也秘密地鼓励所有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多么非法。这种鼓励会让我们的天然敌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我们的天然盟友法国人的两侧累积势力。某种程度上来说，背叛的指控是成立的。粗俗的流氓爱钱，伦敦金融城里这样的流氓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是坚定的纳粹和法西斯支持者。对于彻底投降德国，金融部门当然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条件是英国的财富仍掌握在和以前同样的人手里。外交部也有一些影响，他们反对英国的抵抗。英国首相在其整个任期内，对着某个多瑙河国家不停地进行热心宣传，支持纳粹将这个国家解体的计划。在某个重要的中欧使馆里，一个公使特意拦下访客，力陈德国人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明显优越性，说他们在和平条约中遭受了不公待遇，为了表示赎罪，有必要对纳粹有求必应。但这些是普遍状态之中的例外，就像拿起武器反抗独裁者的愿望一样。英国的统治者们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自己在那桩罪行中的无辜。如果他们想建立法西斯主义，在慕尼黑之后羞辱和迷茫的日子里，他们肯定就图谋政变了。但是，在那行动面前，实际上也是在其他所有行动面前，他们克制了。

现在清楚了，不是睡眠让世界如此安静，是死亡。极端的寒冷可以像火一样灼烧，无限制的和平正像战争一样践踏生命。眼下，战争本身即将到来，但它只是破坏已经被破坏的东西。我们的房子会倒塌在我们破碎的身体上，我们的炉底石早已冰冷，但我们的身体毫无意志，仿佛尸体一般。空荡的天幕下躺着空荡的英国。它还假装着不是如此，假装慕尼黑不是险恶的，而是积极的，假装着内维尔·张伯伦签订条约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国家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所以希望赢得重整军备的时间。即便上述属实，也不能免除张伯伦的罪过，因为他是该为军备不足负责的政府成员之一，何况这根本就是个谎言。他和他的同僚们没有利用这段喘息期来保卫他们的民众。各个地方，独自热爱生活的个人疯狂地工作，在陆军，在海军，在空军，在工厂里；但英国的大部分群体仍然呆滞。我们的统治者们站在我们旁边，而我们捆手捆脚，无助地躺在他们脚下。他们醉醺醺地微笑，却没有喝酒的合理理由。同时，控制他们思想的、怪异的背叛念头继续向我们的敌人发出邀请：“赶紧来，现在就了结他们，他们不能反抗了。”

我，会读，会写，出过门，和我的所有同类一样，被震惊了。我环顾四周，看着这片萧索的历史景观，想象中最悲观的厄运把我带至的地方，也不至于如此荒凉。但它并不陌生。“我曾经来过这里。”我说。这是真的，因为我曾经站在科索沃平原上。我走过那片战场，在那里，面对着想要摧毁他们的子孙、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文化的敌人，基督教统治者放弃了。不需要别人来击败，不是出于怯懦，不是出于背叛，而是顺从了灵魂偏好宁静的胃口，并觉得满足这样的需求非常神圣。1389年的科索沃和1939年的英国，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时间、地点，不在于经历的事件。我们以为后者的浩劫是自己独有的噩梦，其实，两者甚至在细节上都极其相似。两者都莫名其妙地屈服于新技术的威胁。纳粹以他们积极装备的空军来威胁我们；土耳其人以他们彪悍、灵巧的骑兵来战胜巴尔干民族。英国人造得好枪炮、好飞机，也有好炮手和好飞行员，却对空袭不做防御；巴尔干民族有马，也有不错的骑术传统，长久以来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策略了如指掌，却不聚集有效的抵抗力量。两者都有同样令人眩晕的陡坡下滑情形——从无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堕入落魄和屈辱。伟大的塞尔维亚皇帝史蒂芬·杜尚曾是他那个时代里欧洲最强大的帝王，去世的时间也就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三十四年；慕尼黑会议距离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也只有三十七年。

此外，失败对于英国，意味着和塞尔维亚同样的悲惨。此后五个世纪，我们的民众将遗忘温文尔雅的含义；粗野的人将把犁头绑在他女人的背上，在旁边毫无羞耻地行走；我们将不再注意自己的秽物；装饰，说外语，曾经的天才发现，都会成为幻影，偶尔惊扰我们的记忆。土地上会摆陈着战胜民族撤走时留下的污秽弃物。在为德国飞行员立起的纪念碑旁，某个中士的第十六代后人，一个叫汉斯的老朽，脖子后面堆着皱皮而不是拱着肥肉，将掀起纳粹十字旗，露出下面的棺材，用似懂非懂的固定言辞对死者进行赞美，指着斑驳的墙上那些褪色的照片，叫瘦的那个“戈林”、胖的那个“戈培尔”。在被杀的德国军官坟墓旁，梳着金发直辫的妇女们，因穷困而无精打采。她们会在长草里野餐，回忆最后的“力量来自欢乐”运动；她们的男人们会举起柴棍似的胳膊向希特勒致敬——如果有游客路过的话，其他时候就省下力气了。城里面，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以及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孩子们，当然他们自己也出自同样的父母，趴在肮脏的小吃店地板上寻找食客们扔下的烟屁股——喂养食客们的这个社会，忽视良善已经许久。这就是失败，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被入侵者破坏时；这就是征服，一个民族远离自己的基地，根基受到打击，这就是会发生的事。

我们似乎很无助。因为政府正谋划着我们的失败，既无理智也无同情，它沉溺在痛苦、郁闷的升华中，像拉扎尔大公一样。

灰色的鸟在飞翔，那是灰鹰，

来自耶路撒冷，圣地，

他的喙里，叼着燕子。

那不是灰鹰，不是灰鸟，

是圣以利亚。

他带的，不是燕子，

是书，来自圣母。

在科索沃的大公面前，

他把书放下，在大公的膝上。

书上的话罕见无双：

“拉扎尔大公，血统高贵的王啊，

你想要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你要的是世俗的王国，

请鞍马执缰，佩剑出战，

结束土耳其侵略，

赶走每一个土耳其士兵！

如果你要的是神圣的王国，

请在科索沃修建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铺上丝绸和红衣，

让你的士兵接受圣餐，以及军令，

你的士兵都会战败，

你，王子，随之而败。”

大公读毕，陷入深思：

“主啊，这话从何而来，何以如此！

我应该选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选择世俗的王国，

世俗的王国存在不过一时，

但神圣的王国将永世长存。”

因此，大公选择了神圣的王国，让他所有国民毁灭。

土耳其人击垮了拉扎尔，

拉扎尔大公被毁灭，

他的军队随之而灭，

兵士七万七千人。

万物神圣，万物可敬，

上帝的荣光得以实现。

正如同在科索沃一样，英国也是如此。完全不加讽刺地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内阁和白厅里的一切都神圣、可敬。这些人也并不是出于胆怯。当他们迫于波兰受攻而向德宣战时，他们全无畏缩，尽管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们究竟有多么脆弱。他们不是为了贿赂，或者出于对法西斯的忠心而背叛国家。的确，在张伯伦政府下，为滞后的战争行为负责的人当中，至少有一人存在腐败的嫌疑和与德国之间可疑的联系。但背叛通敌行

为是机警、敏锐的，期待回报，而我们的统治者昏昏沉沉，满眼幻觉。说到提供情报的人，信息确认之前就已经心满意足，因为信息具有神秘的特性。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张伯伦先生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他的声音通过电台广播带着一种奇怪的复调。其中一种，是一个自负的男人在发现自己被欺骗后表达的愤怒；另一种，主要的、更深刻的主题，是庄严地接受注定的厄运以及救赎。“我们要战斗”，犀利空洞的声调表达着对希特勒的愤恨；“我们要战斗，”隐秘的思想在发声，“无疑我们会被击败，上帝的荣光得以保存。”灰鹰再次从耶路撒冷飞来，将和英国人在一起，就像曾经和基督教斯拉夫人在一起一样；国家的喉咙将被割断，就像异教手中的黑羊一样。我们又回到岩石那里，可恶的幻想控制了我们，假装着流血会取悦上帝，残酷的行为会给无助的受害者带来恩惠和幸福。我们像科索沃的斯拉夫人一样，也到了那个阶段，在幻想的强迫下，自杀变得必然。我们培育了足够的理性，知道残酷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想成为牧师，去用刀刺穿黑羊的喉咙；我们仍然相信血祭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部分善报，别无选择，只能成为黑羊。

我们已经在财富和权力中沉溺了几百年，哪怕是在最恶劣的战争中，我们依然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让失败者吃了许多苦头。罪恶感生于每个人的心中，衣食无忧时，它会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时候发挥作用。很久以来，受虐的倾向让我们感到厌倦。这一点可以在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奇怪宣传中看到。普通英国人年复一年地进行宣传，他们从来没读过其中的一条，甚至也不认识任何读过的人。他们没去过欧洲大陆，也不接受任何政党的教导。这些人彻底忽略了和平条约对于解放小国家的贡献，荒谬地夸大了他们的经济条款带来的难处——实际上这些条款大多数是完全无效的。最明显的，他们对那些旨在防止德国再次侵略英国、法国的条款毫无感激之情。他们忘记了，有时候必须为生命而战。“一战”之后十年出生的许多小孩，从来没听他们的父母或者老师说过任何事情以表明1914年时他们的国家曾经，或者本来能够，受到除了愚蠢和轻信的沙文主义以外的其他动因驱使而拿起武器。自我保护的想法，如同在早些时候关于性的事实一样，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让年轻人知道。这样，英国不是违逆的左翼国家——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摧毁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保守的、中庸的国家，把自己置于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地位。对它养育的这一代年轻人而言，保卫国家的想法令人讨厌，并不是因为真涉及危险（尽管他们现在的确常常被告之以恐惧，就像其他时候，男孩子们总被告之以勇气一样），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在任何时候有这个必要。每天，德国和意大利都在以明确而强烈的方式计划征服、消灭英国，如果这个幻觉的魔力球能将英国人保护在里面就太好了。若说他们被感官放纵所迷醉，或是对荣誉变得漠然，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清醒、守法、节制，从来没有对阶级和阶级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可敬行为有过这么强烈的期待。错不在于堕落，而在于对崇高的渴求，对牺牲的信仰，以及把自己

作为祭品奉献给上帝的意愿。

这些我能从我自己的书页中读到，如果我把报纸展开放在旁边。报上的内容让我觉得是在对历史进行荒诞的解读，因为我们假装公共行为必是由简单、肤浅的动机激起，这样的现代倾向积习成癖。我们都承认，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说“那是约翰·琼斯，是雨伞生产商，正在去他在阿克顿的工厂”时，并不是真的在描述他，我们只是摆陈了关于他的事实，有利于社会和他打交道。对他的充分描述会像一幅丛林地图，里面走动着许多野兽，善恶共存。莎士比亚的特别伟大之处，就在于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在《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之后，便不能再假装人类是追求愉悦、躲避痛苦的动物。就国家而言，这种假装仍然存在。大家都假设，如果一个国家参战，必有合理的动机，必是想获取胜利；而不承认一个国家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发自内心地说有一种斗争让其夜不能寐，或像奥赛罗和李尔王一样，挥动斧头毁灭宇宙。

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时，法国正处在一场历史地位至高无上的悲剧中（其地位如同《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在艺术上的地位），这证明国家也和个人一样，觉得有必要探寻一种看似美丽的命运，哪怕其中包含的是自我毁灭。这命运的理念，写在生命里而不是诗篇里的主题，是科索沃的主题，岩石的主题。如果英国有一个理由知道德国打算对其发动进攻，那么法国有十个理由告诉自己，极端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可它却比英国更加懒散。事实上，它远不只是不抵抗，它猛地跳起来，跑去给敌人打开所有的大门，喊着欢迎他们，因为抵抗既不可能也不明智。每个阶级都有屈服的理由，理由总是很荒谬。有钱人宣称他们希望和纳粹合作以保住自己的财富，尽管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明白地告诉世人，纳粹征服者没有兴趣保护法国纳粹，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德国人。罗马天主教反动派渴望希特勒来摧毁他们憎恨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们忘记了参加“脱离罗马教”运动的孩子不太可能温柔地对待他们自己的信仰。人民阵线的城市工人们耸耸肩，认为在纳粹手下，他们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尽管他们的同类人在德国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统治阶层尽管表面看起来积极得像蚂蚁一样，实际上和现实毫无关联，甚至从党派理念的角度也关联不上。查理·贝玑曾经说：“利益，问题，根源存在于每条秩序、每个体系之中；神秘主义不会被政治吞噬，它给予政治其生命。”那场惨败，在碌碌无为的巴黎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成就。所有这些人在共同准备祭坛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他们将把自己作为牺牲品供奉在祭坛上。因为人们毫无异议地，把本来应该花在坦克、飞机上的钱挪走，投到了马其诺防线上。这条防线起不到防御效果，它没有完成，而且抵挡不住边路进攻。唯恐这还不足，一大批叛徒，在德国人一跨过前线时，便跳起来迎接他们，把要塞、桥头堡、铁路、运河悉数上交。他们，还有逃亡者们，在堵塞公路、阻挡忠诚的法国军队抵御入侵者时，都没有一点羞耻感。一个国家觉得自己是

在舍身殉道时，不会有羞耻的理由。圣女贞德曾领导的神圣法国军队里的两名军人——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担心世界会错失这次庄严、欢跃的投降的意义。他们十分在意全盛时的光荣，宣布消息时的声音既矛盾又适当，类似于羔羊的咩咩叫声。他们说，法国已经腐朽，需要通过战败来实现重生。这话的意思很难猜想，只能说他们是被科索沃的神话，被那块岩石所控制。这样的言论中没有什么基督教色彩。很早之前教会就宣布，它的圣坛只需要用面包和红酒进行“理性的无血的祭祀”。这是巫术的散布，异教的传道。

现在，我们孤独地站在英国。我们曾经是不可一世的世界之主，现在，像南斯拉夫人一样贫穷、受困。一个特别夏天的万丈光芒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却相信它立即会被永恒的黑夜所遮蔽。但是，经历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不堪，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不战而亡的欲望，是这个，而不是危险，让人恐惧。最可怕的死神和最美丽的女孩都囿于同样的局限，给出的只能是拥有的。但是自愿扮演残酷行为中的角色，自愿接受宇宙的理论——上帝能够播撒福祉来换取无谓的流血，却会开启无限的堕落过程。因为它是想象的，不会有任何现实局限。从那个地狱中，我们突然被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解放出来。也许德国人通过战争的肮脏，让我们毫无怀疑地熟知了将要参与的这个仪式的污秽。也许我们的灵魂里有一种平衡，真实地悬于生死之间，如果朝死亡方向摆动得太远，会进行自我修正。这种均势也见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它站在艺术之巅，阐明了祭祀神话。首先，莎士比亚证明残酷的情况是无法解答的，因为善良，哪怕是开出了爱之娇花，也不过是掠夺和背叛的掩饰；最后，他喊出爱是世间唯一的珍宝，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便必须继续深挖，直到找到为止。所以，在我们英国文学的巅峰之作里，我们深入黑暗，畏惧光亮；在我们历史上的濒临绝境时刻，我们也遵循着这样的路线。我们倾尽所有地献祭，甚而献上了我们的肉体存在，一夜之间又全盘收回。触发我们自杀动力的重要因素，内维尔·张伯伦，这个看似牢固地存在于我们政府中，如同糖存在于糖尿病人的肾脏中的人，突然离去。我们抛弃了我们的约翰·坎塔库泽努斯。现在领导我们的是温斯顿·丘吉尔，没人会想象他会有赴死欲望。除非他的死亡能够释放出更多对自由生命的弥补，除非死亡是让他的国家存活的必要代价，那么他愿意去死。从此以后，一切变得简单了。

当然简单了。很长时间以来勇气被束之高阁，重拾勇气很好，能够感受它被置于手中的舒适。但是事情还没有变得简单。到处都是痛苦啊！在那段时间，可怜的法国崩溃，逃跑，我们看着命运的脸，坚硬如铁，似乎我们将和法国人、低地国家的人、捷克人、波兰人遭受同样的对待。当我们的恐惧做出这样的暗示时，我们感到寒意侵骨。如果我们没有这般虚弱、疯癫，莫名其妙而又愚蠢地向刽子手屈服，捷克人和波兰人本不必忍受这一切的。这污点我们穷尽一生也无法洗净。经常地，当我想起入侵，或者当

炸弹坠落在近旁，我祈祷着：“让我像塞尔维亚人一样吧。”但我后来明白了，我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祈祷。斯拉夫人亲如兄弟，我们因为愚蠢无能而对斯拉夫人犯下的罪无可赦免。于是，当我们走向窗前，看着伦敦燃烧时，甚至都没有无辜感的慰藉。眼看着自己出生的城市陷入火海，人们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景象触及了痛苦的最深根源，让人无法聆听任何理由。看着自己的亲人逝去，也同样痛彻心骨。我们可以说燃烧的街道已经破旧，能用更好的来替代；却不能徒劳地向一个为母亲掉泪的儿子指出，她已经年老体衰。

有时候，我觉得正在写的这本书可怕得让人难以忍受，它所记录的痛苦、暴力和流血被不同的民族长期忍受着；也许最可怕的是，为了实施我的意图，展现过去和它导致的现在之间的关系，我不得不结束它。这时周围恶行肆虐，一如我在书中的描述。现在整个欧洲都像斯拉夫人一样受苦，面对的敌人比土耳其人更难征服。人们会觉得到处都没有希望存在的理由，唯有的可能性，是人类在攻击同类的时候野心过大，以至于灭绝了整个族群。这是可能发生的，甚至不会给人流泪的时间。一个没有坚实大地的世界，只有血和泥混合成烂软一摊，犹大永不停歇地在上面反复践踏，引诱彼此在背叛的圈里循环不止，刽子手说着“赶快赶快”，还没来得及清洗斧头，自己的耳朵里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谁会喜欢这样的世界胜于万物消亡的雪底和平世界呢？

然而我相信那样的选择是不必的。倘若人类继续如此，像书中所提的各个历史时期那样作为，我们全部死亡倒是更好。但是，人类改变的希望犹存，作用于他们身上的两个因素或许可以为他们消毒。其中之一是艺术。这些日子我们有机会检验艺术过程，然后做出判断：它是诚实劳动的工具呢，还是仅为稚气的人准备的玩具。现在有一种惧怕让我们分心，有一种破坏是对任何论点提出反驳。我们播放留声机唱片，从里面散发出小的光之白星，说着：“啊，快来吧，别耽误了。”这是苏珊娜在花园里等待幸福之夜降临时唱的歌，在《费加罗的婚礼》结尾时。整个头顶的天空，整片脚下的大地，爆发出巨大的光之红星，那是烈性炸弹在爆炸。大红星当然会吞噬小白星。但并非如此。相反，大红星立刻坠落了。翻腾着的内心还想对它进行感知，但心结随即解开，注意力也将它排除开去——除非它伴随着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比如关于受害者背靠墙壁的喜剧报道，公海阔大水域的凡尔赛式升腾。但注意力却没有放开歌声里正确、永恒、重要的小白星。“是的，”我们全身心地说，心灵、思维、肌肉都集中在聆听上，“这才是要紧的。”“什么要紧？”惊讶的声音在回响，“你能说可能把你轰成碎片的炸弹，相对于可能是个女仆唱的歌来说，没那么要紧？女仆并不存在，当等待男仆的拥抱时；男仆，其实也不存在。”“是的。”我们回答。那些战前喜爱图画、音乐和美好文字的人，发现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的兴趣更加浓厚。我记得自己曾经坐在弗鲁什卡·格拉的餐馆里时，听着莫

扎特交响乐通过电波流淌而出，想着是否音乐给出了什么美妙的承诺，抑或是作曲家在旋律里模仿着人声的音调，诉说着温柔的、守护的爱。现在看来，似乎我只能感到怀疑。因为那时我不知道，因威胁而产生的终极不安全感，并非只针对个人的存在，而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生命。现在我觉得很自然了，达尔马提亚人身处和我们同样的险境，他们建造教堂和宫殿，对每一块石头精雕细琢，让它带有虔诚和愉悦的性质。教堂和宫殿建在临海那一面的山脚下，山顶上沉重地压着土耳其堡垒，近陆那一面遗留着波斯尼亚被毁后的废墟，满目荒凉。我觉得马其顿农民为他们的服装点缀绣饰，跳舞歌唱，也十分自然。因为艺术给我们以希望：历史可能转向，人又变得尊贵起来。什么是艺术？它不是装饰。它是经历的重生。艺术家说："我会让事件再次发生，改变由于和其他事件相接触而损毁的外形，让它真正的意义得以彰显。"他的观众说："我们通过看他的图画或房子，听他的音乐，或读他的书，让事件再次发生。"事件不能被复制，它必须被记忆，被再次经历，从意识的某些部分再次通过，这些部分积极地参与生活，受伤时会流血，也能释放出温和的快乐元素；同时，它也被意识中远离生活的那部分加以检视。在这个过程的末尾，经历被追根溯源，它们开出苦乐之花的魔力也被查明，在我们的愚思拙见所能及的范围内。被理解的东西将会被掌控。如果艺术可以对所有的经历进行研究，那么人类便可以理解生活的全部，因而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这股力量能够摧毁岩石本身的神秘，此后千年，力量无疑会延续。难怪当我们深陷险恶时，伸出手想抓住这股力量。

但这拯救不会立即到来，因为艺术是最不确定的工具。在写这本书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深受打击，因为命运拒绝让人类看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它在路上洒满红鲱鱼转移人类注意力，以获取自己卑鄙的快乐。在这些书页之间，一位首相倒地而亡，他喊着说一定是一位国王下令杀了自己；国王很快也倒地而亡，也喊着说一定就是那个首相下令杀了自己。然而他俩都是被一个组织下令杀害的，构成组织的有两队人，彼此猜不到动机，性格也大相径庭。这可以被算作复杂历史事件的一种类型。如果对事实的误解和性情的差异让人们彼此分隔，与工具相关的困惑就会让他们和现实疏离，因为工具是引导他们走向现实的。意识是自身的敌人，用固有的、缠绕的无数章鱼爪与自己搏斗。岩石的神话和基督教传奇纠缠在一起，宗教立刻让人类匍匐而行，然后起身朝向光明。艺术不能讲述平常的感觉，它有时讲述的东西乍一听是废话，而事实上却是超感的。但是许多愚不可及的废话却显得如此紧凑，以致仿佛是浓缩的智慧一般。那个站在比托利城边小房子阳台上的人，用双臂宣告他将拯救平原大山。他就是个稻草人，平时躲风避雨地存放着，时节到来时，再被拿出来放在挂果的葡萄藤中间。人类所有的艺术活动中也许有一半是虚假的。为数不多的向导可以帮助人类走出黑暗，他们来时身边围着叛徒，这些人身着伪装，难以辨别。人类命运多灾多难，无须夸张。所以，无论历史的哪一页，哪怕是这本书

里最血腥的记录，都不容小觑。

如果一个人背弃目标，像野兽一样生活，没有求知的欲望，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指责。但他的基因驱使下的本能是无法违逆的。在黑山的山里行走的老妇对艺术提出了真正的需求：“让我明白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所有的现状都让她失望：首先，在她出生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离她生活圈子数英里之外的地方，是一个大的集团，东罗马帝国和分散在科索沃的斯拉夫国家；然后是奥匈帝国和黑山；最后是坐在她灶台旁边的老头。然而，料想不到的，是她的追寻精神不曾疲惫。换句话说，它敲响了我们产生希望的其他缘由。历史，就像人类的生殖器官一样，并不能进行纯种繁殖。光荣并不总是生出光荣，罪恶和天才也会出人意料地跳出来。在这本书中，最可怕的角色是那部分无产者扮演的。从工业革命开始，疯狂的经济大潮将大批人从农村输送到城市，从事一些对他们教化甚微的工作，工作条件让他们很难融合进现存的城市文化里。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这个阶级陷入极度的贫困和退化中——其退化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代表；在法国，它的消极懒散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盗匪行为，导致了1940年的悲剧；在英国，它受到了超越城乡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控制，因此免于源自无知、良善和罪恶的耻辱。似乎已成定势，它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改变自己的环境，方式是反抗经济上的不公——这是导致现状的原因。在反抗中，它会赢得自己的辉煌。它和它的先辈们贡献了大量的个人作为，总体上构成了陆军和海军，渔业、商船队和矿场的英雄业绩。但是事物的秩序从来不曾暗示，创造英雄主义新形式的机会是为他们保留的，也不是说，他们想到的同时就能完美地成就这种英雄主义。

我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那样的成就。法国陷落时，以及陷落之后，我丈夫和我每天傍晚都在摄政公园的玫瑰园里散步一个小时。那个完美的夏天里，无瑕的天空奇怪地装点着防空气球阻塞幕。人们坐在玫瑰花丛中的椅子上，阅读报纸或是直视前方，脸色发白。一些人在花圃间走动，特别诚挚地低头看着鲜亮的花朵，嗅着香气，说：“它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味道。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当我们倒在黑暗中时。”玫瑰园的旁边有个湖，湖中有个小岛，岩石间种着高高低低的植物。连接小岛和陆地的中式桥上缓缓地走过一队人，看着岩石间欢乐、脆弱的生命。他们一脸庄严，好像是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一样。英国人，如黑山山坡上那位老妇所说，热爱自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相信，他们现在正面临一场比以往更为恐怖的、对象指向普通老百姓的攻击。他们是对的。任何人都不用假装自己无畏，去轻视这场攻击。人又不是牛和驴，当然会感到极其恐慌。但他们没有张开苍白的嘴唇，说一些让自己感到安全但是会蒙上耻辱的话。

他们预见到的事降临在了头上。天空中没有伸出善意的手来嘉奖他们的勇气，保护他们的安全。反而，掉下来的是炸弹。许多人死伤，许多人无家

可归，所有人都从恐惧中感受到了耻辱的痛苦。然后他们开始大笑。在玫瑰丛中，安全仍在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微笑。现在，他们双膝颤抖，眼睛因为恐惧而空洞。他们从日落开始说笑，此时警笛长鸣，他们仍然一直说笑到黎明破晓，日光把熟悉、亲近的东西被毁的样子呈现给他们。他们不仅仅是坚忍。他们工作，像军人一样战斗，没有一点从杀戮中获得喜悦的陶醉感，因为他们只能保护自己，没有任何办法攻击进攻者。在冷静的状态中，男人女人都出来了，在废墟中挖救伤者。炸弹仍在坠落，枪炮仍在开火。本能告诉我们应该逃跑。就这样一夜接着一夜，一周接着一周，一月接着一月。英雄们曾经在特洛伊平原上、伊丽莎白海面上、佛兰德斯田野上以及阿尔巴尼亚海边的群山里，但这些人的英勇不输于他们。

人们不曾预见到，空战以及未分化群体对抗未分化群体的武器，会最终击败它的使用者，因为它的受害者变成了最光荣的个体。历史上这一诡秘而高尚的成就一下子让城镇居民得到了重生。他们坐上了一个不道德的位置，像王子一样，能够为战争投票。打仗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职业军人，前线战士的清白取决于他们。这给出了承诺：生命能够自我超越，我们不一定会重复有限的模式。这项承诺在第二年得到了履行，在欧洲的另一边，那里人们的命运在这本书里有所描述。1940年的最后几月，见证着欧洲大陆陷入无可比拟的堕落状态。现在，我不能如此自信地告诉那位维也纳的金发女孩，她对法语的无知让她损失了关于一种伟大文化、文明的知识，因为对于我给出的一长串名字，她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贝当"。在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曾经享受着自由和尊严的人们像不能说话的驮畜，表露出任何对以前状态的回忆便会招来德国士兵的一顿嘴巴。波兰的持续苦难就是警告，提醒人们对邪恶说"不"是怎样的罪。整个欧洲唯一的希望的迹象是自1940年10月起希腊对意大利进攻的抵御。当然，希腊人无须畏惧意大利军队。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巴尔干军队特别喜欢一个谜语：有羽不是鸟，能跑不是兔，持枪不是兵，这究竟是啥？答案是"bersagliero"（意大利狙击兵）。但是希腊人十分清楚，他们不能享受必然到来的胜利，因为德国人不能忍受他们同盟失败，事实上，德国人非常希望介入这个地区，省得战后就其落入谁之手发生误会。尽管明白这一点，希腊人仍然继续战斗，这部分可归因于他们从古希腊传袭而来的血统，但这也是巴尔干故事的一部分。现代希腊人的血统里带着强烈的斯拉夫血缘色彩，与意大利交战的、身着传统裙装的希腊精锐步兵团，士兵大多是阿尔巴尼亚人。

1941年初，希特勒显然将很快对时局进行干涉。英国在于北非与意大利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希特勒觉得舞台已经为他备好。罗马尼亚早就受到了诱惑。卡罗尔国王在战争初期表现出与民主力量结盟的意愿，后来渐渐地屈服于轴心国的压力，但被要求出卖国家超越了他的忍耐限度，在1940年9月，他宣布退位，离开了国境。他把王位留给小儿子迈克。在这个十八

岁的小伙子身上，可悲的王朝发生的错误，由于欠缺考虑的教育，被继续放大。从此之后，他对国家的管理受到了纳粹军队、国内卫戍部队和某些罗马尼亚叛徒的控制。油田和矿井根据德国拟定的条款交由德国使用，粮食被装上了运往德国的火车，直到土地发出饥荒的悲吟，军队也受到德国的监管。国内民众胆敢抗议对国民的蹂躏，罗马尼亚皇廷便处以残暴的惩罚。1941年2月，英国首相在布加勒斯特请求发放护照，基于罗马尼亚已经成为德国的属国。有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的自然健康发展趋势，只是被一些瑕疵破坏，但整体而言是朝着法治方向进步的。他们应该注意这一转变带来的退化。尽管其民众不乏天赋，罗马尼亚仍然总是以无序和腐败著称；和现在比起来，过去成了黄金时期。德国纳粹的到来，意味着给予罗马尼亚纳粹——铁卫团特权和后台。铁卫团就是一帮凶手和骗子，长久以来，从事诚实营生的正经人无不谈其色变。情况变得更糟，是因为铁卫团中一些人的流氓程度不及其他人，当他们发现来的德国人不像是兄弟，倒像是外来强盗，便爆发了秘密反抗。国家现在面临的是最糟糕的黑帮战争。

同时，保加利亚也遭受了类似的堕落。不管皇室为保全国家做了些什么，也已经是力尽所能了。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作为游客进入这个国家。首相在议会宣布，保加利亚只有将自己套牢在轴心国力量上，才能赢取自己的命运。它所有的机场、港口全落到了德国人手里。在这里，德国势力的延伸，也意味着当地文明标准的退化。入侵的纳粹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罪犯勾结——意大利的金钱已经腐化了这个组织。这些人杀人、勒索、强迫女子卖淫、贩毒，无恶不作。曾经鲍里斯国王和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国王的联合行动把他们赶回了自己的老鼠洞，现在他们又出来，在保加利亚的街头骚扰寻常百姓。到了3月，五十万德国人聚集在保加利亚，曾经独立、荣耀的国家生活荡然无存。

现在南斯拉夫的境况令人绝望。它完全被轴心国和轴心国的受害者们团团围住。匈牙利还在抱怨和喃喃自语，“不，再也不要”，变成了和法国一样可怜的附庸。同盟国的帮助够不着它。希腊不会允许英国皇家空军使用其机场作为基地，来攻击在保加利亚的聚集力量——希腊只和意大利作战，不和德国敌对，对此，一些亲德势力可能应该负责。南斯拉夫不能拒绝希特勒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似乎已成定局。任何放下武器，或者没能拿起武器的国家，都没有比它更好的投降借口。当希特勒要求南斯拉夫政府派部长们去维也纳签订协议，让他们的国家归附轴心国势力时，似乎抵抗已经全无可能。

就应对这一危机来说，南斯拉夫并不处在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位置上。1939年，它片面地解决了一个主要问题，将内部统治延伸到克罗地亚的一个新省，涵盖大部分的达尔马提亚、黑塞哥维那和斯拉沃尼亚。新的克罗

地亚比较成功。它从拉迪奇创建、现在由马特切克领导的农民党中选出了政府，用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的土地改革取悦了农民，但同时疏离了萨格勒布和其他大的城镇。导致签订克罗地亚协议的危机，也导致了对斯托亚迪诺维奇博士的免职。此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和热情与日俱增，表现出自己也想成为元首的迹象。但他的道路困难重重。他采取同类的常规技术，运送国内一伙一伙的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够参加他的会议，呼喊“领袖！领袖！领袖！”让本地观众看得有滋有味。但他们改变了节奏，最后，大厅响起齐声高呼：“魔鬼！魔鬼！魔鬼！”他归属于历史小角色的可怜序列，说着“恶，愿汝为吾之善”，但从恶魔那里得到的只有摇头拒绝，因为梅菲斯特规定，某一尺寸以下的浮士德都拒不接受。不幸的是，他的首相继任者茨韦特科维奇，只是同类的另一样本，贝尔格莱德派系中的另一代表；他代表的是金融冒险者和职位谋求者。但他相对温和。他更愿意说“善，愿汝为吾之恶”，祈祷自己能从诱惑中得到解救。马特切克巩固了他的力量，程度甚微。此人坐上首相副职，为其职责献计不多，而且肤浅。比他更不如的是他的外交部部长，一位名叫辛撒马科维奇的职业外交官。他从来没有获得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认可，但长期在柏林代表他的国家。在那里，他开始认为巴尔干人落后得可笑，而德国人是世界的恰当的统治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的叔叔辛撒马科维奇将军和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国王、德拉加皇后在同一晚被射杀。这可能让辛撒马科维奇更偏向于选择较为安全的道路。

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这些部长的行为多多少少还在维持着一个有尊严的政府，和摄政亲王保罗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受到全国上下的诸多质疑。那些无权进行评论的人们，所有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省级城镇里的那些人，相信摄政亲王是支持轴心国的，只是在等待时机把他的民众交给希特勒。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相信他的行为是受到了英国同情的刺激。贝尔格莱德的某些英国外交代表强烈地支持这种观点，似乎政府的某些行动也能对其加以证实。当斯托亚迪诺维奇博士鼓吹纳粹的宣传太过于招摇时，他被拘禁在塞尔维亚一个小村子里。但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走的是相似的绥靖主义道路，结果也相似。这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农奴般的境遇。它按德国的要求将农产品送往德国，甚至在1940年农业歉收时也是如此，那时国内市场已供不应求。1941年1月，面包价格相对于1939年的标准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作为回报，德国将工业制品送往南斯拉夫，送来的东西恰好是南斯拉夫过剩的，也不管它需不需要，还将汇率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调整。有迹象显示，德国的显著影响还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陆军部长尼迪奇将军，回头看着罗马尼亚，得出结论，如果南斯拉夫不想重蹈其覆辙，最好是对希腊施以援手，在希特勒派军进驻半岛之前，把意大利人赶出阿尔巴尼亚。他立刻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亲轴心国的将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势在朝着尼迪奇将军忧惧的方向发展，政府拒绝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们不愿意与英国人或者希腊人进行对话，哪怕是以

秘密的方式。

所以，无须质疑，南斯拉夫政府必定会接受希特勒的邀请去维也纳，跳过立在它面前的所有套环。就在之前不久，南斯拉夫曾经摆出独立的姿态，驱逐斯托亚迪诺维奇博士，把他交到在希腊的英国官方手里。但这是狡黠的一招，既让博士避免落入反纳粹南斯拉夫人手里受到伤害，又安抚了民众。3月里，茨韦特科维奇和辛撒马科维奇第二十五次听从命令，坐火车前往维也纳。里宾特洛甫在美景宫接待了他们。这座绝美的巴洛克宫殿是为萨沃伊的欧根亲王而建，曾是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霍泰克的宅邸。从这里，越过草地和梯级花园里的喷泉，可以看到城市里的尖顶和穹顶；它为艺术增添了许多美感，却给生命增添了许多恶行。在这些高高的房间里，充溢着从镀金的古镜和年代久远的抛光地板上反射来的微亮的寒光。摆在南斯拉夫部长们面前的是那份熟悉的《三国同盟条约》。通过这条约，每个被轴心国吞噬的国家得以绑住自己，不对吞噬者抬一根指头。他们还被要求，不能允许境内有任何反对轴心国的活动，还要让自己的国家经济与帝国新经济秩序保持协调。这意味着南斯拉夫和所有其他的被征服国家一样，意识被奴役，实体被掏空。强加给南斯拉夫的，还有此刻特有的耻辱。条约要求它允许运载德国军用物资的火车经由其铁路通向希腊，并且它无权对此类运输进行检查。这表示，军队也可能被运载。这样，南斯拉夫被迫为虎作伥，暗害巴尔干兄弟——它在血缘和传统上的亲人。

想到部长们回国后可能会建立某种防御，德国人插入了一些条款，确保了南斯拉夫的现存疆域，承诺其具有通向爱琴海的出口。可这就是个怪相，好像媚笑着的嘴里伸出条舌头。因为德国已经许给保加利亚人数量可观的南斯拉夫土地，其中一些事实上阻碍了通向爱琴海的道路。发明这些条款的恶魔，面带微笑地看着茨韦特科维奇和辛撒马科维奇签订这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看着他们的还有意大利的齐亚诺伯爵和日本的大使。齐亚诺伯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煞了风景。他的双手沾染了亚历山大国王和许多南斯拉夫农民、警察的鲜血。那时候，他的人正因为战场上的拙劣表现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他很不适宜为了其他民族的屈辱而弹冠相庆，毕竟这个民族从来不输英勇，只是因他人背叛和敌人强劲而失败。伯爵因为别人带来的羞辱和破坏而幸灾乐祸，殊不知羞辱和破坏也为他的意大利同胞准备着。日本大使的出席违反了更基本的准则。尽管德国人很久以来一直为种族问题殚精竭虑，却没有意识到，白种人不应该观看黑种人或黄种人蒙羞，黑种人或黄种人也不应该观看白种人蒙羞。仪式之后，希特勒接见了茨韦特科维奇和辛撒马科维奇，对主持这样的局面心生欢喜。仪式没有对人类尊严做出让步。那晚部长们回到贝尔格莱德，肯定感到了一丝安慰，当然也只有一丝安慰。自此以后，他们的民众可能活在奴役之中，但他们会活着。南斯拉夫人可以寿终而寝。

但是南斯拉夫人不想要这样买来的生命。敏锐让他们洞穿了事情的面目，质朴让他们对提供这生命的手嗤之以鼻。从最早秘传南斯拉夫被要求屈服于德国的管束开始，持续多日，整个国家都在宣扬宁可选择抵抗和死亡。所有的阶层都在提出抗议。尽管军队里安插了很多亲轴心国的将军，军官们仍然坚决地要求被允许与希腊人并肩作战。曾经和军方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现在和军人一起同仇敌忾。四位阁僚辞职，茨韦特科维奇发现很难找人替代他们。许多政府职员也辞去职务，上至克罗地亚和瓦尔达省的长官，下至离了职就只能饿肚子的卑微小职员们。天主教教会的牧师和修士们告诫他们的教众，决不能让政府签约把自己的土地划入陌生的领地，那些统治者善恶不分，不会允许斯拉夫灵魂用自己的方式执行上帝的旨意。加夫里洛大主教进谏保罗亲王，让他不要滥用摄政权力，毁了这个交由他看护的国家。抗议最为激烈的是农民。城镇和村庄随处可见他们聚集起来呼喊口号，反对政府将耻辱强加给他们。

当人们知道首相和外交部部长去维也纳签了条约，人们的激情燃烧成了持续的怒火。警察不再使用武器对付或逮捕示威者。军队的不满情绪非常浓厚，以致部队所有人，包括军官，都被关在军营里。全国都要求不批准条约，必须拿起武器反抗德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要求的不只是不谙现代战争之道的人。执着于呼吁行动的许多人已年至中老，在上一场战争中知道了伤痛、饥饿和无家可归是什么感觉。而且，他们都紧跟新闻，非常清楚空袭给伦敦、鹿特丹和柏林带来的后果。有的人还记得飞机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那次在科索沃逃亡的塞尔维亚难民遭到了轰炸。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很清楚，如果与德国交战，战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有几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少年男女，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和内维尔·张伯伦一样，都是绥靖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想着如果他们起来反抗希特勒，俄罗斯会伸出强壮的臂膀来保护他们。但是，除此以外的南斯拉夫人没有心存幻想，他们明白自己兵微将寡、装备简陋且重重受围的军队没有任何机会战胜德国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他们明白，对这个兼有斯拉夫人身份和抵抗行动双重罪责的民族，希特勒会采取怎样的报复；也清楚，很快自己也会落入狱卒之手，和看管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同类的狱卒。

令人意外的是，保罗亲王从本质上就不是塞尔维亚人。对他而言，民众的渴求肯定十分离奇，而且麻烦。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局势。他在贝尔格莱德郊区的火车站迎接了归来的首相和外交部部长，发了感谢电报给希特勒，表达了对“伟大的德国人民日益繁荣的美好祝愿”，之后坐火车前往斯洛文尼亚。保罗亲王在布莱德附近有一处别墅。有的人认为他打算越过边界逃进奥地利。但这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贝尔格莱德。他只是想休息一下，假装无事发生。他穿过这个国家，在这里他从来不曾扎下根，当然，他在别处也没扎下根；在这里，带着灵巧但缺乏创意的艺术气质，他成了一种吉卜赛人。贝尔格莱德从过去几年的沉睡中醒

来，再次拥有了其历史天赋，艰难的，有力的，现实的，恶魔的，隐秘的，夜行的。之后的3月26日晚上，空军总司令杜尚·西莫维奇将军的妻子迷茫地看着她丈夫，因为本应就寝的将军仍然十分清醒。将军说他可能喝了太多咖啡。凌晨两点半，他仍然清醒，听到前门的敲门声也毫不吃惊。“这都是怎么了？”妻子问道。“只是，”将军说，“爆发了革命。我领导的。”她用大多数妻子的通常口吻回答：“胡说，告诉我你是革命领导也没有用。”

她的怀疑很自然。西莫维奇将军是年五十八，从来没有乱发脾气的时候。他不曾谋划过弑君，也不属于黑手党。外表上，他就像许多南斯拉夫军官一样。他身材瘦高，但粗壮的脖子能屈能伸；他有一双略带眼袋、富于幽默感的眼睛和饱经风霜的皮肤。他被认为是位杰出的军人，在战术上也是公认的权威。但他五次从重要职位上被免职，原因看着可信，在他的处理下，又显得颇有趣。第一桩众人皆知的争端是关于两个军校学生的，尽管这两人是某位政治大人物的亲戚，将军仍然在考试中给他们打了个不及格；后面的就涉及更严肃的问题。在这些争议中，他显得很有优势，因为他拥有缜密的智慧，表达方式极简单，带着表面上的质朴，就是老兵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抱怨。他阻止某个人物、某个情形时使用的语言，让最具生花妙笔的作家也只能自叹弗如。支撑他这种幸运的，不仅是巨大的才智天赋，还有来自荣耀家庭和民族传统的坚定性格。他的祖上是黑塞哥维那人，在反对帕夏的叛乱中逃到塞尔维亚，成了一个真正的舒马迪亚人，在卡拉乔治和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的领导下，为国家独立而战斗，并生下儿子在后来的战争中接替他继续战斗。西莫维奇将军在世上最喜欢的，是他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一处乡村小房子，但他并不嫌恶权力。

在这个人的指示下，隐秘的身影和低声的口令整夜都在城市的阴影中游荡，引起了一些变化。但这个夜晚却和贝尔格莱德所知道的其他夜晚不同。因为只有一点流血事件，而且事发偶然。空军起义，四分之三的皇家卫队加入进来，还有其他一些军事单位和许多警察。他们占领了重要的政府大楼。事前已经收到警告的守卫，未进行任何抵抗便投降了。不幸的是，向主管无线电的警察发送的信息没能送达。信使前去时遭到了攻击，因为对方以为他们是伪装起来的德国人。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生命损失。茨韦特科维奇和辛撒马科维奇从睡梦中被叫醒——他们的睡眠很可能也不深——然后被礼貌地逮捕。消息传到保罗亲王的卧铺车厢，让他返回。亲王极不情愿地打断了在萨格勒布的旅程，拜访完克罗地亚长官之后，便乘火车返回了贝尔格莱德。同时，西莫维奇将军去了德迪涅，劝告年轻的国王必须马上掌握控制权，而不要等待9月份到来的十八岁生日。在那里，将军踏上了革命区域最危险的地带。但他下令给包围在宫殿周围的皇家卫队，让他们不要向宫殿里因为胆怯或外国影响而未参与政变的皇家卫队开火。国王也下令不要向外面的部队开火，于是起义者顺利进入宫

殿。

宫殿里的男孩刚度过了孤独而又十分激动的一天。在头天傍晚，宫廷官员对过往日子进行了些许暗示，然后肯定地告诉男孩，他的民众背叛了他，他必须把自己锁在宫殿里，否则会遭遇行刺。男孩基本上已经相信了这个故事。他曾在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从学校被接走，参加被谋杀的父亲的葬礼。他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所以，在他看来这个故事不是没可能的。他从藏手枪的橱柜里将两把手枪拿出来，整日带在身上，以免遭遇厄运的时候过于被动。从他父亲那里，他继承了强硬和沉默的外在勇气；他应归功于家族和塞尔维亚血统的，还不只是这个特点。他像野兽一样，对陷阱很是机敏。根据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民主传统，他受教时有六个来自塞尔维亚代表家族的男孩陪伴。他和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学习、玩耍；他们习惯了通过私人电话与住在德迪涅的他进行联系。不久之前，国王设法让电话公司另装了一条私线，没让随从知道。他把号码告诉了其中一个朋友，一个名叫科斯蒂奇的男孩。3月26日的整个上午，国王坐在他的房间里，不敢打电话，等待着攫获任何一点外来的信息。中午时，科斯蒂奇给他打电话。国王问他，民众是不是真的想要杀死自己。他的朋友告诉他，这纯属谎言，民众憎恨的是保罗亲王和政府，很快革命力量将来到宫殿，放他出来，统领他们反抗德国。听了这密信，知道自己将被要求带领国家走进灾难，前途无非是死亡、监禁或者流放，年轻的国王感觉很释然。但消息说宫外的人是他的朋友，那就意味着身边的人是他的敌人，于是他继续带着自己的手枪。他被叫醒，和西莫维奇将军会面时，手枪就在他的枕头底下。

早上八点，振奋的男孩在光芒四射的阳光下乘车经过贝尔格莱德。举城欢腾，好像他是得胜凯旋，而不是将领导他们走向战败。他从城中宫殿发布公告，宣布自己开始执掌皇权，陆军和海军已经听候调遣，并呼吁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坚定地团结在王座周围。聚集在街上的民众看见他在阳台现身，欢呼雀跃，并穿过城市来到大主教宫殿。加夫里洛大主教出来致谢，感谢王朝走出这么一位国王，于危难之际保护塞尔维亚人的荣誉。他的话可能是不经意间脱口而出，但说出了事实：这的确是由塞尔维亚人，而不是南斯拉夫人演出的剧目。政变的策划人和执行人都来自舒马迪亚，和卡拉乔治维奇以及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属同一血统。一天之中，内阁形成，包含了所有三个民族的代表，能够听取各方的意见。更让民众喜悦的，是傍晚时分，墙上贴出了新任部长的名单。因为人们对于国家团结的感觉，就像诗人对自己永远不能完成的诗篇的感觉。“不管这之后发生什么，”一个老人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终于都在一起了。”只有一个惹眼的人物没有顺应这场合的宏大风格，那就是马特切克博士。对与轴心国签约的事，他没有强烈的反感，尽管他在维也纳发现希特勒残酷地虐待克罗地亚人，但抗议辞职的部长中没有他。西莫维奇将军

的政府里包括了一些反对克罗地亚自治的塞尔维亚人，可是马特切克博士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与他们合作，尽管实质上克罗地亚自治的问题在两年前就已经解决，不太可能再重启。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态度，再次担任副首相，这是数天之后的事。历史让克罗地亚人成为律师，让塞尔维亚人成为士兵和诗人。这是种不幸的分歧。

在这天，反对保罗亲王的民意变得强硬。国家公文被研读，官员被质询，各种怀疑指向他们的源头。结果，完全不知道保罗亲王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的农民和地方知识分子猜对了他的态度；而对亲王有密切了解的专家们却错了。他支持轴心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对纳粹的要求不予抵抗，并不只是因为觉得摄政者没有和在位君王一样的权力，要求国家执行昂贵的政策——任何审慎的人处在他这个位置都会有这种感觉，也不是因为他对张伯伦领导的英国不够尊重，对它的盟国缺乏信任——这当然也是自然的。原因其实是他对希特勒个性的诚挚崇拜，以及让南斯拉夫和获胜方站在同一队伍的愿望。他如此强烈地持有这一观点，因而，事实上，他为亲轴心国的行为承担了责任。观察者们认为执行这些行为的人远比他自己更具纳粹特质。尽管茨韦特科维奇自己是愤世嫉俗的职业政客，对这场危机倒不怎么愤世嫉俗。他在受邀前往维也纳时，向保罗亲王呈交了一份中肯的备忘录，指出，不论南斯拉夫怎样做，都面临着实质性的厄运。如果它违抗德国的要求，国家就会遭到德国官兵的蹂躏，农田、矿井、森林会被劫掠，国家生命即到尽头；如果屈服于德国的要求，前述的同样命运也会准确无误地发生。从荷兰和罗马尼亚、比利时和保加利亚来看，二者的饥饿和受压迫程度几无区别。当然，如果抵抗，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便会是，南斯拉夫人在空袭以及与入侵军队的战斗中，会死伤无数。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考虑。一段时间之后，希特勒的统治会过去，它不会延续到永远。那么，如果南斯拉夫骄傲、勇敢地抵抗过他，战胜他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承认南斯拉夫为同志。无论欧洲新秩序怎样建立，它都会被赋予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如果南斯拉夫像个懦夫一样，没有人会尊重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法尊重自己，那他们就永远低人一等了。所以，茨韦特科维奇希望保罗亲王允许政府拒绝德国的要求。这是典型的塞尔维亚观点，基于过去的土耳其征服，以及在此征服之下幸存的经历得来的。但是，保罗亲王没有产生共鸣。他劝说茨韦特科维奇不要依着这样的判断做事，仍然让他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耻辱之旅。现在隐藏的内幕大白于天下，一天之内，贝尔格莱德弥漫起忧虑的情绪，因为保罗亲王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消极，他可能会更加积极地行事；他会号召国内的腐朽力量，为了德国的利益发动内战。许多人，尤其是军方的人，认为为安全起见，最好将他射杀。

傍晚七点时，西莫维奇将军前往火车站迎接从萨格勒布归来的保罗亲王。他已下令另一列火车待命，准备驶向希腊边境。当保罗亲王到达时，将军载他前去战争指挥部，那里是城东行政管理区里最大的建筑之一，经常因

为格调低俗、平庸而受到参观者的诟病。当他们走进指挥部大厅时，将军说：“我们得乘电梯到一楼。”但正要踏进电梯时，一个军官上前来告诉保罗亲王：“不，你必须走楼梯。”这话听起来像丧钟在耳边响起，这些多余而又投入的人们在这时看起来十分可怕，他们投入的对象似乎已经忘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教律。保罗亲王带着不自然的微笑低声说：“你们的领导告诉我要坐电梯，你又说要走楼梯。我应该听谁的呢？”“你最好走楼梯。”军官说。然后西莫维奇将军告诉亲王，也许他们最好走楼梯。他作为塞尔维亚人，了解他的民众，如同农民了解天气一样。那等待他的，并不是令他恐惧的暴力。楼梯又宽又高，每一级站着两名军官，各站一边。当保罗亲王从中间通过时，军人们高呼：“国王万岁！”这两列人，神圣而凶猛，像愤怒的天使，在憎恨密谋着他们的死亡和救赎的统治者。他们改变了建筑司空见惯的特性。本来这建筑和世界上其他小首都里成千上万的建筑并无差异，现在它像是填充那些塞尔维亚——拜占庭壁画间距离的标志性建筑，把我们虚弱肉眼里错误的圆润形状变成了棱角分明的现实相似物。保罗亲王在这场景中的存在极不适宜。尽管他热爱绘画，却从来没有欣赏过这些壁画。为了让鉴赏家和艺术商人更容易理解复杂的主题，拜占庭艺术被精心分级，进行分级的专家大多从未见过多数存留下来的范本。塞尔维亚流派的，和其他难以接近的作品一样，评级很低；结果这种考虑影响到了他真挚的审美情感。他被带到楼梯尽头的小房间里，毫无异议地签下了摆在他面前的退位协议。西莫维奇将军说：“现在，我听候您的指令。”他只请求允许自己离开这个国家。第二天，候命的火车带着将军和他的家人去了希腊。他在雅典做了短暂停留，然后去了肯尼亚。

那个略带外国人个性的人物一离开，身后的场景便对他关上了大门。整个场景又变成了纯粹的塞尔维亚式，完全成了尼曼雅时代的壁画。在德迪涅，大主教在新内阁的见证下，主持了年轻国王的宣誓就职仪式，之后他们在大教堂举行了感恩弥撒。彼得·卡拉乔治维奇二世带着君王的威严站立着，像早先身着宝石束腰外套、头戴巨大王冠的帝王一样。士兵们坚定地站在他周围，非常满足，因为他们的陛下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国家的眼前、民众生活的眼前。东正教的牧师和修士们，就像旧时代里身着缀有黑十字架的白袍的那些人一样，断言拯救和诅咒都是真实的，会带来极度的福祉和极度的灾难，场景因此变得完满。女人们看着他们，像德查尼和格拉查尼察墙上的圣母一样悲伤，惊愕于悲剧的痛苦滋味，但是没有把它吐出来，因为那是圣餐，在那一刻福泽随之分发。有一刻，场景凝滞如同壁画。德国要求新政府认可在美景宫签订的条约，收到了对方的拒绝以及保证，说自己愿意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参战方。这一答复之后紧跟着震惊下的短暂停顿。然后德国广播站里响起熟悉的声音。这些声音高声抱怨，说在南斯拉夫城镇的大街小巷，无辜的德国人遭到袭击和殴打，德国商店被洗劫，在斯洛文尼亚和多瑙河村子边上的德国人居住区被摧毁，农田被焚烧。这些公告发布的语气，俨然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指控一个跟她

素未谋面的男人强奸了自己，她高声喊叫着，满嘴谎言，一副贪婪模样。卢布尔雅那的总领事做出的，大概是纳粹统治以来德国人最有英雄气概的举动。他尽管知道自己今后肯定会成为受害者，遭到不可避免的报复，仍然发布声明，说德国少数民族在斯洛文尼亚遭到虐待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并感谢南斯拉夫政府和民众在本可以采取敌对态度时，对这些“无赖”表现出的善良和忠实。但是诚实的问题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广播攻势不过是个警告，暗示着欧洲另一个无辜的民族即将遭到毁灭。

为什么南斯拉夫人选择了毁灭？必须重申，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选择是在对情形充分知晓的情况下做出的。命运并不是出其不意地对他们施以窃取。他们的领袖，西莫维奇将军，知道他只能领导军队走向失败，而且不会拖延太久。数年前他担任参谋长时，曾制订过一份全国防御计划，完全适用于此次危机。计划提出，为了抵御来自各区的进攻，应将后备军力集中到中心区域，并修建放射状的道路作为通信线路。但他的继任者暂缓了这一计划，根据个人倾向在全国划出军队警戒带，却在保加利亚边界上留下了可怕的空白。他的设想过于乐观，以为眼下不太会发生进攻。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一倾向就意味着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可以从各个方向冲进国家，同时在许多地方挺入疆域，切断和包围几个防御部队。军队各级都对这个情势了如指掌。民众大量涌进教堂，参领圣餐，说明平民的领悟力也不在军人之下。反抗压迫，为之流血，而不是投降以求存活的决定，和英国市民的决心一样，只能用无畏精神来解释。这些人都像艺术家一样，懂得死亡的含义。在凯马克莎兰的山坡上和德拉古廷说话的年轻士兵知道鬼魂在他们周围呜咽：“啊，妈妈！啊，妈妈！”他们不能忘掉战场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痛苦。我的朋友米丽察有最精细的思维、最精细的肌体，两者在墓地扩散的寒意前都退缩了。他们没有被岩石的神化统治；他们没有将失败作为钱币，从白痴的神灵那里购买救赎；他们没有把自己作为黑羊，供奉给并不虔诚的牧师。对死亡的欲念所有的人类都会有，尤其是享受了充足的生命时，因为我们只知道钟摆的晃动，并不知道成长的运动。但在科索沃和土耳其征服之后，南斯拉夫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比其他国家和民族更想要生活。

然而在这一刻，南斯拉夫人经常重复拉扎尔大公和灰鹰的诗，它赞美自我供奉的牺牲精神胜于其他艺术作品。“万物神圣，万物可敬，”他们引用诗句，从先知的高塔上俯瞰着即将来临的命运，“上帝的荣光得以实现。”这事实上并不恰当。在1941年的南斯拉夫，没有人会同意镇压自己的民众来换取对个人的拯救，没有人不愿选择战胜纳粹，如果可能的话。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抵抗，而不是他们的失败成了严峻考验中的圣洁元素。然而诗篇在耳边响起，好像是预言在他们的行动中得到了实现，全能的神跨越时间赐予福祉，对时间曲线中什么是福祉心如明镜。的确，爱它的人现在读它，无不带着强烈的贴切感。它是适用的，它适用的秘密，就在所有深

奥的艺术作品的复杂本质里。驱使艺术家进行这个层面创作的动力，就是他对于解决一些重大冲突的需求。当至关重要的事件引发众说纷纭时，艺术家能够寻找出真相所在。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成为一个重写本，上面叠加着几种对他的主题互不兼容的观点；有可能书写力度最强的，或者他的最深处天性寻找的最真实见解，并不决定他给出的表述形式。拉扎尔大公和灰鹰的诗，讲述了一个赞美死亡意念的故事，但其隐藏的含义却与生命脉息相通。

世俗的王国存在不过一时，

但神圣的王国将永世长存。

良善可敬，而且不朽。它被践踏入泥，便又重新迸发，人们在尘土里摸索，以寻找它回归的第一抹绿芽。若非有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国家和个人之间相互的善意，血脉将无以延续。仇恨在爱之前到来，给怀恨者以怪异而美妙的喜悦，但它的效果是短暂的。自然天命到来之前，头从身体上被砍下来；谎言诞生，以期在其结出恶果之前挫败其他流氓的计划。社会迟早会厌倦拼凑这些罪恶的碎片。就算仇恨的统治延续数百年，它也不占据真实时间中的任何位置，它是现实中的空隙。即使是最严重的物质盗窃，世界范围内对矿井、谷仓的劫掠，也不能给予它任何实质。然而，南斯拉夫人尽管因历史原因受到罪恶的限制，仍然明辨善恶。人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认清公正和仁慈的义务，也就是说，它禁止其公民沉溺于粗俗的仇恨中，给他们机会为爱而生，这样的国家较之忙于杀戮、劫掠的国家来说，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于世。人们也知道，如果一个基于爱的国家，没有经过最大限度的抵抗，就屈服于一个基于恨的国家，那么在现实的世界中，它也滑进了后者的序列。所以，他们宁可选择让南斯拉夫被摧毁，也不投降于德国而苟活，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热爱生活，而不是热爱死亡。

4月6日黎明，德国的飞机对贝尔格莱德发起攻击，空袭持续了四天。德国没有宣战，贝尔格莱德被宣布为开放城市。八百架飞机在城市上方低空飞行，系统性地摧毁了宫殿、大学、医院、教堂、中小学校，以及大多数民房。二万四千具尸体被带进坟墓，更多的就埋葬在废墟底下。4月7日，德国外交部宣布他们的军队已挺进边界二十英里。之后，一切正如能够预见的那样发生。入侵的部队包围了整个国家。四面八方都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冲进来，他们对斯拉夫人的经年仇恨，现在完美地配上了机械化的表达方式。意大利人无耻地出现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这是凭他们自己根本就不敢来的地方。在布达佩斯，距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签订永久友好协议四个月之后，泰莱基伯爵羞愧自杀，因为他的内阁准备允许德国使用匈

牙利铁路和匈牙利机场运输部队；现在这些牵线人也把自己的部队送过边界，开向多瑙河地区。德国已经跨过了保加利亚培育已久的东部边界，带上的不仅有保加利亚军队，还有“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罪恶势力。入侵者切断防御军队，将他们各个击破。4月18日，德国政府宣布南斯拉夫军队投降，但消息不实。发布消息只是为了让德国人有借口杀死，而不是监禁所有投降的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军队从不投降，哪怕已被摧毁；它最后的残余力量都仍然在战斗，隐藏在山野林间。

从此以后，南斯拉夫地图好像是被污黑、恶臭的油滴滚满了一样。达尔马提亚的控制权给了意大利人。因为他们想要轻易地掌控亚得里亚海的港口，统治还不至于太反人道，除了针对某些个人的以外。但在克罗地亚，他们的作为无异于德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作为。他们使当地的秩序标准恶化，让罪恶阶层当权，统治正派的普通男女。首相——在纳粹控制下的专制统治者——这一职位给了安特·帕韦利奇。此人是克罗地亚恐怖主义的组织者，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操作刺客训练营，对不计其数的死于炸弹爆炸和列车失事的人负有责任；他还亲自陪着谋杀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的人去法国，给他们提供武器和指导。因为此案，法国法庭在他未到庭的状态下，对其宣判死刑。这么一名职业革命人中卑鄙肮脏的典范，现在统治着萨格勒布的文雅知识分子、谢斯汀的敬神者和疗养院里的医生们。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和其他城镇已被荒废在空气中。在那里，东正教的所有教众，所有犹太人和所有吉卜赛人，手臂上都戴着共同的耻辱标记，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的境况堪忧，但在塞尔维亚情况更糟。希特勒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是南斯拉夫反抗的源头。大量的男人以及十岁以上的男孩被送往罗马尼亚和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在这里，和针对波兰人一样的种族灭绝政策也开始实施。在马其顿，过去二十五年定居这里的所有塞尔维亚人被迫离弃他们的家园，身无分文地回到满目疮痍的北方地区，在那里游荡。大的地区交由“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占据，它的领头伊万·米哈伊洛夫是最残忍无情的人。在其统治下，劫掠、屠杀比比皆是，大量农民逃往山里。许多牧师和修士被杀害。斯科普里这类城市中的混合种族，违反了德国人的种族净化主义，于是许多土耳其穆斯林被处决。这片土地本已多灾多难，现在更是突破了自己的历史。

一部分南斯拉夫军队通过山隘撤退至希腊，协同英国进行后卫作战。其中一些士兵横渡地中海进入埃及；一些水手和渔民渡海而逃；一些平民到达了土耳其；还有一些人，不可思议地出现在里斯本。空袭开始时，政府把彼得国王送出了贝尔格莱德，待在奥斯特罗格修道院里，那是黑山崖壁上一处荒凉的鸽子屋。他们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离尼克什奇只有几英里，那里有飞机场。当战败已近在咫尺时，皇室成员被告知前往飞机场，在那里等待飞机来接他们，带他们去希腊的约阿尼纳，那城市仍在英国的控制下。他们在尼克什奇坐候了一阵。这是一座宜人的小石城，肥沃的高

原上长着桑树，周围是光秃秃的群山。但飞机没有来，并且他们发现没法联系其他的南斯拉夫机场。德国人已经把这些机场全部控制了。别无他法，他们只能乘坐已经停在机场的其中一架飞机。这里的飞机全是意大利马尔凯蒂斯飞机。如果他们乘坐这飞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任何发现他们靠近的英国飞机或者防空部队的攻击。他们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发送信息给约阿尼纳，因为信息会被德军截获。他们驾驶一架飞机在前面开路，但无法知道它能否安全通过。航程是安全的，只是凭着一点幸运而已。飞机到达约阿尼纳时，一队战士包围了飞机，飞行员努力表达这不是敌机的信息，随机发送了一些信号。事实上，英国当局事前给他们发送过一则他们并未收到的信息，让他们发送一组信号以示明身份，而这组信号和飞行员随机发送的信号组合几乎一样。

国王从约阿尼纳飞往耶路撒冷，灰鹰从此地带着圣母的信息飞向科索沃。他在这里和西莫维奇将军，以及几位部长会合；部长们也从尼克什奇飞来。另外两人在航程中被击落。还有一些人，包括马特切克，被困在家里或者监狱里。后来，国王和他的部长们飞离亚洲，穿越非洲到达里斯本，然后去往伦敦。在那里，他们等待着和平，还有国家的重建。他们来到西方不是作为不幸的请愿者，而是作为施恩者，因为他们对德国的抵抗，给了英国宝贵的暂缓时机。现在人们知道了，德国在保加利亚的军力本来打算对付的不是南斯拉夫，而是土耳其，作为进攻俄罗斯的第一步。这一步原本打算在3月进行，与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发动的政变，以及德国攻入叙利亚相呼应。如此一来，他们在5月便可会集已征服了近东地区的势力，进攻俄罗斯。但南斯拉夫出乎意料的抵抗，使驻扎在保加利亚的德国军力转移到了西边，并延长了德军穿过希腊的行进时间，直到伊拉克的政变被镇压，英国进攻叙利亚的准备已然就绪。于是，希特勒进攻俄罗斯的计划被推迟了一个月，而且不得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德国征服近东地区获得的优势没能派上用场。南斯拉夫人在他们矛盾的命运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后获得秩序和高贵的人，是拜占庭帝国遗产的最后继承人——继承了它的律法和恢宏气势。在这场战争中，如同在之前的战争中一样，南斯拉夫虽败犹荣，让作为他们盟友的强大帝国，免于遭受变得和他们一样虚弱的耻辱。就在此刻，他们的国王流亡他乡，他们的炉膛也为狗彘所污毁。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他们的国家宛如一块岩石。在整个欧洲，悲痛的人们从他们的历史中找到慰藉，尽管他们的历史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灾难。南斯拉夫对抗希特勒的消息不胫而走，像阳光洒进被吞噬和羞辱的国家，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在马赛，一些人从花园里摘下鲜花，一些人从花店里订来花环，他们带着花走向卡纳比埃尔大道。警察猜出他们想干什么，不让他们沿着街走。但这里有电车经过，人们便上了车。电车司机将车开得很慢，人们沿途将手中的花撒在了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遇刺的地方。

---

1. 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代表作有史诗《救世主》、诗歌《早年的坟墓》《春天的庆典》等。

2. 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曾担任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理。

3. 《布兰德》（*Brand*），易卜生于1866年写作的一部诗剧。

4.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5. 查理·贝玑（Charles Pé guy, 1873—1914），法国诗人、散文家，著名民族主义者。

6. 舍内勒（Georg Ritter von Schö nerer, 1842—1921），奥地利地主阶层，奥匈帝国政客。

7. 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 1892—1934），基督教社会党领袖，1932—1934年担任奥地利总理，实行法西斯统治。

参考文献及索引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参考文献

我没打算将本书参考过的文献全部罗列出来，其原因有二。

一是出于篇幅考虑。任何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研究，所触发的问题均可谓林林总总，研究者必得广撒其网。无论谁希望对南方斯拉夫人的思想有一个认识，都有必要对拜占庭帝国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因此，我就其中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查阅了吉本、伯里、诺曼·贝恩斯、G.P.贝克、C.查普曼、史蒂芬·伦西曼、迪埃尔、施朗伯格尔、艾奥加等人的著述，然后就其他的问题又查阅了迪恩·斯坦利、尼尔、艾德尼、霍尔、哈纳克、R.简宁、德赫比格尼、巴蒂佛尔、萨拉维尔、阿森内夫、别尔佳耶夫、达扎德，等等。但其中许多所处理的材料，都只是间接涉及巴尔干半岛。任何读者，如果不细加寻踪索影，都可能被他们引用的材料弄得晕头转向，气不打一处来，还弄不明白之间到底何种关系。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发现L.G.布朗的《基督教在亚洲之没落》非常有价值，却仅仅因为他对基督教在亚洲如何被遗忘的讲解，给了我启发，使我注意到基督教在巴尔干半岛得以保存下来的历史过程。同样，我发现，所有我读过的关于奥地利或奥斯曼帝国的著作都很有用，可是如果一一列举出来，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同时也很犹豫，不想给本书增加书页负担，将那些众所周知且不重要的文献放进来。书中几处段落提及密特拉教。我所查阅的，自然是其权威作者卡蒙特，以及《剑桥古代史》。不过，很少有人希望绕这样一个弯子的，既然在任何图书馆目录里，都能找到大量直接的相关文献资料。因此，我亦选择弃而不顾。

另一个截短参考文献列表的原因，乃是在于讨论巴尔干半岛问题的文献本身特定的性质。其中大量都是那些大国之买办文人所撰。更有甚者，则是两派不同花色的鸟群酸溜溜的论战，一派不喜欢压迫和残酷，另一派喜欢这东西——双方都在无知的高空扇动着翅膀，志得意满。在此书中，我刻意对19世纪时在英国争辩得火热的“东部问题”仅仅一笔带过。我原想对南方斯拉夫人的生活进行一番描绘；英国好辩者对于欧洲土耳其的描绘，往往都是主观臆想。可以预想，将来的某一天，某位历史学专家将研究人类所经历的这一奇怪现象：竟弄不明白关于它自身的信息。当各个历史阶段都沦为这样的凭空想象，作为个体的作者，只能说均已死亡。

因此，有大量的著作我曾有参阅，最后却被我从参考文献中删去，因为出于良心，我只要提到这些作品，不可能不对之做出一些负面，甚至贬低性的论语。这其中，就包括一位举世公认的巴尔干研究权威的著作。我自信，该书的出版方仍给我留有余地，让我有机会说，该作每一页都有严重

的不准确——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太多了点。除了是为抬高巴尔干一个民族，而贬低另一民族，因此造成书中大量不实之外，该作者还因为故意罔顾事实，而犯了极多的错误。一个作者，在同一部著作之中，对18世纪某位统治者，一会儿是极尽溢美之词，一会儿又极尽讨伐之事，让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所写。还有几位作者，出于类似原因，我亦将他们拒之于外。

其他我所排斥的作者，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那么不准确，却重复了另一些人出于其政治目的而杜撰的不实言辞。比如，有一种说法被人反复引述，说萨拉热窝阴谋叛乱，是由俄国总参谋部，通过“蜜蜂”——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与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陆军武官阿塔马诺夫之手策划和实施的。俄国合谋这一说法，见于《南斯拉夫之过去与现在》（*Die Jugoslavie einst und jetzt*，Johannes Günther Verlag, Leipzig und Wien, 1936）；另外，匈牙利受人尊重的作者M.W.福多尔，在《希特勒之南》（*South of Hitler*, Allen & Unwin, 1938）中说：“在俄国总参谋部的知悉下（多姆布里埃维奇通过俄国陆军武官阿塔马诺夫与之联络），1914年6月28日，大公被谋杀。”我曾问福多尔先生此言证据何在，但他只是回答说“这些事实人所共知”。可是，既没任何证人，也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说辞。而且据我了解，那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搜遍了各种相关档案，也未曾找到能够验证此传言的蛛丝马迹。如西滕沃森教授在其《萨拉热窝》中指出，鉴于时间因素，验证已基本上不再可能。我想留给读者去判断，当俄国总参谋部或“蜜蜂”试图筹划一场欧洲战争，他们是否会如史蒂芬·格雷厄姆先生在《圣维特斯节》中所描述那样——描述之精确，实在令人佩服——信赖一个当地阴谋团体。不过，诸如这一关于俄国的胡乱传闻，却散布于大量的书籍之中，尤其出自原籍为奥地利或德国的作者。非常显眼的一个例证是，奥托·斯特拉瑟的《我自己时代的历史》，里面有关巴尔干历史的不实引据简直触目惊心。尤其有一段文字，指责在此次萨拉热窝阴谋叛乱中，已故的斯韦托扎尔·普里维切维奇参与了谋反，其依据更是荒谬之极。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或是弗兰克福特法官先生，可谓同样是在犯罪。

以下作品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有参考，我想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与之最直接相关的资料：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y E. Gibbon. London, 1896.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893）/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1889）/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1912）by J.B. Bury.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 XII.

Les Invasions Barbares by Ferdinand Lot. Payot, 1937.（极为重要，要想了解现代欧洲历史，绝对必需。）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by A. A. Vasilev.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28.（作者系俄国人，稍有亲保加利亚倾向，该作描述了斯拉夫人之坚韧不屈，对于了解久远世纪的历史事件，颇有意义。）

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 jusqu'à la fin de l'empire, Tr. sur les Originals grecs de Monsieur Cousin. （4 vols.）1672—4.（非常了不起的一部杰作，值得英国学者仿效。书中翻译了史学家Agathias、Anna Comnena、Cantacuzenus、Ducas、Leo、Menander、St Nicephorus、Nicephorus Bryennius、Nicetas、Pachymeres、Procopius、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研究成果）

Byzantine Civilisation by Steven Runciman. Arnold, 1933; Longmans, 1933. （值得敬佩的一部研究成果。）

The Byzantine Achievement by Robert Byron. Routledge, 1929; Knopf, 1929.（作者死于敌人之手，他所有的朋友和读者都应为之痛惜。他写就此作时，尚不到二十五岁，实在令人钦佩。书中对过去关于拜占庭败落之胡言乱语，作了有理有据的矫正。）

La Civilisation serbe au moyen âge by Konstantin Jirechek, tr. 1920.（篇幅短小，却价值非凡。）

Geschichte der Serbei by Konstantin Jirechek. Gotha, 191-18.

Christianity in the Balkans by M. Spinka.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33.（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一部著作，所涉内容至今为人们所忽视。）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V.（很糟糕。虽然由Bury教授策划，但整卷水准实在令人失望。不过，本书将众多事实——或曰接近事实的资料——收录一处，可以用作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基础。）

The Servian People by Prince and Princess Lazarovitch Hrbelianovitch. T. Werner Laurie,1914.（本书表面拙朴，实则精妙之极。）

History of Serbia by H. W. Temperley. G. Bell, 1917. （非常有用。）

Serbia by L. F. Waring.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1917

Serbia of the Serbians by Cheddo Miyatovitch. Pitman, 1915

Historv of Servia and the Servian Revolution by Leopold von Ranke, Tr. Mrs A. Kerr.

The Lives of the Serbian Saints by Voyeslav Yanitch and C. Patrick Hankey. Macmillan, New York, 1921

Kossovo; a translation of the heroic songs of the Serbs by Helen Rootham. Blackwell, 1920

The Ballads of Marko Kralyevitch by D. H. Lo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Yugoslav Popular Ballads by Dragutin Subotit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L'Histoire de Dalmatie by L. de Voinovitch（1918）. Hachette, 1934.（优秀之作。）

Dalmatia, the Quarnero and lstria, with Cettinje and the Isle of Grado by Sir T. G. Jackson.Oxford, 1887.（任何准备拜访达尔马提亚的人，如想了解其历史或建筑，此为必读经典。）

Mémoires du duc de Raguse（le maréchal Marmont）.

Geschichte von Venedig: I. Band bis zum Tode Enrico Dandalos, Gotha, 1905; II. Band, Die Blüte bis 1516, Gotha, 1920; III. Band, der Niedergang, Stuttgart, 1934, by H. Kretschmayr.

Travels in Dalmatia and Montenegro; History of Dalmatia by Sir Gardner Wilkinson, 1848

Architecture of Diocletian’s Palace at Spalato by Robert Adam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Foot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1875, with Historical Review of Bosnia, etc., 1876 by Sir Arthur Evans. Longman

Travels in the Slavonic Provinces of Turkey in Europe by Miss Muir Mackenzie and Miss Irby.Bell & Daldy, 1867.（值得敬佩之作，研究巴尔干必读。）

Turkey in Europe by Sir Charles Eliot under the pseudonym 'Odysseus.'（至关重要之作。Charles Eliot是他的时代里最有思想的作者之一，其散文优美典雅。不过，也必须记住，晚年他改信佛教，使他在土耳其入侵问题上，不可能欣赏基督教对其所属文明的贡献。）

Sarajevo by R. W. Seton-Watson. Hutchinson, 1927.[值得钦佩之作。尤其适合那些未加思索地接受了B. Sidney Fay教授Origins of the World War（Macmillan, 1928，1931年修订）一书的读者。Fay教授之偏颇可见于他为Apis und Este英文版所写前言，此书为Bruno Brehm极尽恶毒中伤南斯拉夫的三部曲之第一部。]

L'Attentat de Sarajevo by Albert Mousset. Payot, 1930.（审判报告。）

St. Vitus' Day by Stephen Graham. Benn, 1930; Appleton, 1931.（对南斯拉夫密谋者的描述，看似虚构，实则忠实于事实。）

La Serbie d'hier et de demain by N. Stoyanovitch, 1917.

La Crise bosniaque（19089）, 2 vols., by M. Nintchitch. Alfred Costes, 1937.

The Annexation of Bosnia by Bernadotte Schmitt. Cambridge, 1937.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lkans（187578）by M. D. Stoyanovit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A Royal Tragedy by Cheddo Miyatovitch

The Southern Slav Question and the Hapsburg Monarchy by R. W. Seton-Watson, 1911.

The Hapsburg Monarchy by H. Wickham Steed. Constable, 1913.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Franz Josef by Karl Tschuppik. G. Bell, 1930.（美国版出版信息：Francis Joseph I; the Downfall of an Empire by Karl Tschuppik. Harcourt, 1930。）

Letzte jahrzehnte einer Grossmacht by R. Sieghart, 1932.

Aus Meiner Dienstzeit by Field-Marshal Conrad von Hötzendorf

Franz Ferdinand, Erzherzog by T. von Sosnosky, 1920.

Das Ende der Dynastie Obrenovitch by P. F. Bresnitz, 1899.（由一位名叫Georgevitch所作，该人曾为塞尔维亚总理大臣。一部令人惊叹的无耻之作。）

The Servian Tragedy, with impressions of Macedonia by Herbert Vivian, 1904.

Macedonia, Its Races and Their Future by H. N. Brailsford, 1906.

The Serbs, Guardians of the Gates by R. G. Laffan. Oxford, 1918.

The Birth of Yugoslavia by Henry Baerlein. Parsons, 1922.

Alexander of Yugoslavia by Stephen Graham. Cassell, 193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The Native's Return by Louis Adamic. Gollancz, 1934; Harper, 1934.（一位移居美国的斯洛文尼亚人的研究成果，从当时的共产主义人士的视角所写。很生动，也很有趣，尤其是有关斯洛文尼亚的那些篇章。但作为一个整体，该国家之图景又过于简略。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尽管强烈地亲克罗地亚，这本书却激怒了克罗地亚人，因为他们认为它带着侨居者的姿态，没有表现出任何斯拉夫态度。）

Balkan Holiday by David Footman. Heinemann, 1935; Ryerson Press, 1935.（很有趣的一本旅游手册，目的也在逗乐，却极具知识含量和良好的判断力。）

L'ltinéraire de Yougoslavie by A. T'Serstevens. Grasset, 1938.

Profane Pilgrimage by L. Fielding Edwards. Duckworth, 1938.

A Wayfarer in Yugoslavia by L. Fielding Edwards. Methuen, 1939; McBride, 1939.

Undeclared War by Elizabeth Wiskemann. Constable, 1939.（对战前时刻南斯拉夫局势极为全面的呈现。）

Living Space by Stoyan Pribitchevitch. Heinemann, 1940[美国版出版信息：World without End by P. B. Stoyan (Stoyan Pribitchevitch). Reynal, 1939]（近些年最有用的著作之一。关于巴尔干人民的一部纵览之作，其中尤其提到南斯拉夫人。作者是一位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是被亚历山大国王流放的Svetozar Pribitchevitch的儿子。）

The Soul of Yugoslavia by H. D. Harrison. Hodder & Stoughton, 1941.（之所以列出这部著作，是因为该作信息非常丰富，作者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记者，在贝尔格莱德居住多年。只可惜我似乎来不及再参阅该书。）

书中大部分材料，均来自我与南斯拉夫人的个人对话，有的是出自这次旅游，有的来自后来一次为时更长的访问。这其中，一些对话我已原样重现出来，一些没有——或者是因为其信息本身较之信息的透露方式更加有趣，或者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比如，我有心重现那位军官的证词——坦科斯奇当时曾跟他说过一句似乎不可能那么明智的话："我们跟谁也没讲过来自萨拉热窝那些年轻人的事情，给任何人也没讲过"——但他憎恶那行为，极不愿意自己无意卷入的事被透露出去。因此，我只是将他所提供的信息融入我的观点之中，而不指明出处。但我曾希望对所有这些曾给予我帮助的朋友，致以谢意，然而就目前来看却不可能。所有我书中提到的人物，如今要么已去世，要么生活处境之凄惨，完全超乎我们西欧人之想象。除了格尔达和黄发僧侣德查尼，没任何人可能逃脱。要是我提及任何一位朋友的名字，都可能会在他们本已无尽的苦难上重重地踏上最后一脚。

我要感谢在本书筹备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南斯拉夫公使阁下苏博蒂奇博士，及其夫人安娜·苏博蒂奇博士；斯洛文尼亚研究院的德拉古廷·苏博蒂奇博士；薇拉·嘉瓦勒克小姐；凯瑟琳·布朗夫人——重恩不敢言谢；伊丽莎白·韦斯柯曼小姐；让·博伊塞维恩先生；大卫·福特曼先生；彼得·布朗先生；卢多伊夫人；以及格丽塔·伍德。对于玛格丽特·霍奇斯，我的感激难以言表，谢谢她长时间以来在身受疾病困扰的情形下，仍为我录入了大部分的手稿，几番阅读校样，使该书得以呈递至出版社。

至于我丈夫亨利·安德鲁斯，可以说，该书任何的精彩内容都应归功于他。在我写作该书的几年间，他将一切琐细之事一应承担下来，而不曾有任何怨言。他也在地图和照片方面给了我特别的帮助。而我最要感谢他的，是他耐心地注视着我致力于盘点一个他乡异国——而这份努力，直至最近，都看起来像一种无谓的辛劳。这份信赖，我最是感激。

索引

A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克西斯 Alexis

见亚历克西斯·卡拉乔治维奇 Karageorgevitch, Alexis

阿利克斯 Alix

协约国 Allies

阿尔玛塔德玛 Alma Tadema

奥特多夫 Altdorff

阿廖沙 Alyosha

美国 America

亚眠大教堂 Amiens Cathedral

穆拉德·阿穆拉斯苏丹 Amurath, Sultan Murad

安娜斯塔西娅大公夫人 Anastasia, Grand Duchess

安科纳 Ancona

安德拉希 Andrassy

保罗·德·安德烈斯 Andreis, Paolo de

安德里耶维察 Andriyevitsa

安德罗尼库斯国王二世 Andronicus II ,Emperor

安吉拉（斯洛文尼亚人） Angela, a Slovene

安吉丽娜女公爵 Angelina, Duchess

吴哥窟 Angkor Vat

圣公会教堂 Anglican Church

礼仪 decorum

英国圣公会 Anglicanism

英德第二次战争 Anglo-German war, second

安卡拉 Ankara

安妮女王 Anne, Queen

萨沃伊的安妮 Anne of Savoy

迈克·帕列奥列格皇帝的女儿安娜 Anna,daughter of Emperor Michael Palæologus

阿农吉亚塔 Annunziata

邓南遮 Annunzio, d'

《自由属于我们》À Nous la Liberié

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蜜蜂” “Apis”

《一千零一夜》 Arabian Nights

阿拉伯人 Arabs

阿兰德洛瓦茨 Arandzhlovats

穆萨·阿巴纳萨 Arbanassa, Moossa

圣女贞德 Arc, Jeanne d'

阿里乌斯派教徒 Arians

阿里斯托的柏拉图儿子 Aristo, Plato son of

停战 Armistice

牧首阿西尼厄斯三世 Arsenius III , Patriarch

阿西尼厄斯·卡拉乔治维奇 Arsenius Karageorgevitch

奥地利 Austria

塞尔维亚 Serbia

彼得治下的塞尔维亚 Serbia under Peter

谢斯汀 Shestine

东方扩张政策 Drangnoch Osten policy of

国内政治生命 internal political life of

意大利占领 Italian possessions of

米兰秘密会议 Milan's secret convention with

站在塞尔维亚一方 on Serbia's side

1914年哗变 outcry in 1914 of

暴政 tyranny of

奥匈帝国 Austria-Hungary

奥地利帝国 Austrian Empire

塞尔维亚人 Serbs

作为俄国邻居 as neighbour to Russia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被划归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iven to

“草率”Schlamperei

政府 state of the

奥地利人 Austrians

塞尔维亚人 Serbians

建筑 architecture

军队 Army

在贝尔格莱德 at Belgrade

巴洛克 baroque

波斯尼亚被虐 Bosnia misgoverned by

治下的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under

外交部 Foreign Office

政府 Government

在波斯尼亚 in Bosnia

海军 Navy

议会 Parliament of

统治 rule

领土被塞尔维亚军队入侵 territory invaded by Serbian Army

奥德联军入侵塞尔维亚 Austro-German invasion of Serbia

奥匈帝国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军队 Army

进攻塞尔维亚人 attack on Serbians

克罗地亚人在旧帝国 Croats in the old

作为士兵的斯拉夫人 Slavs as soldiers in the

见“阿格拉姆审判” “Agram Trial”

大学毕业 university graduation in the

阿瓦拉山 Avala

无名战士纪念碑 monument to the Unknown Soldier at

前卫队 Avanguardisti

国会 Congress of

条约 Treaty of

莎拉·贝恩哈特 Bernhardt, Sarah

伯特兰将军 Bertrand, General

奥地利总理伯伊斯特 Beust, Austrian Chancellor

比亚里茨 Biarritz

约万·比高斯奇修道院 Bigorski, Yovan,monastery of

比林斯基 Bilinski

“台球室” “Billiards”

见采蒂涅的主教宫 Tsetinye, Episcopal Palace at

俾斯麦 Bismarck

比托利 Bitolj

黑德林河 Black Drin

“黑手会” “Black Hand”

“黑羊与灰鹰”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黑海 Black Sea

《布莱克伍德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威廉·布莱克 Blake, William

塔兰托的菲利普之女儿布兰奇 Blanche daughter of Philip of Taranto

“白色小母牛”Blanche la Vache

布莱德 Bled

神圣的奥萨那 Blessed Osanna

C

查理六世 Charles VI

德国皇帝查理 Charles of Germany, Emperor

那不勒斯 Charles of Naples, King

沙特尔大教堂 Chartres Cathedral of

查特顿 Chatterton

路易斯·奇皮齐 Chippitch, Louis

宫殿 Palace

索菲·霍泰克 Chotek, Sophie.

见索菲大公妃 Sophie, Archduchess

基督教科学派 Christian Scientists

基督教 Christianity

马其顿人 Macedonian

基督徒 Christians

穆斯林强暴 Moslem rape of

“基督全统”修道院 Christ Ruler of All,Monastery of

丘布里洛维奇 Chubrilovitch

温斯顿·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齐亚诺 Ciano

美国南北战争 Civil War

克莱门特 Clement

克莱门特六世 Clement VI , Pope

克莱里索 Clérisseau

本杰明·康斯坦特 Constant, Benjamin

米卢廷的兄弟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brother of Milutin

惩罚 punishment of

康斯坦丁大公 Constantine, Grand Duke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of Greece,King

康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诗人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the poet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圣索非亚大教堂 Hagia Sophia of

近卫兵 Janizaries of

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出来的路 route from Dubrovnik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Constantius Chlorus

科孚岛 Corfu

科西嘉 Corsica

巡游 Corso

在贝尔格莱德 in Belgrade

《恋爱学堂》 Cosí fan tutte

《基度山伯爵》 Count of Monte Cristo

对立改革派 Counter-Reformation

安斯塔特信贷银行 Credit Anstalt

克里米亚战争 Crimean War

克罗地亚 Croatia

E

东南欧 South-East

南部与北部 Southern and Northern

土耳其 Turkey in

土耳其人 Turks and

西欧 Western

中欧之关键亚伊采 Yaitse, key to Central

《叶甫盖尼·奥涅金》 Evgenye Onegin

伊维安 Evian

F

费伯先生 Faber, Messrs.

雅可波·法加尼奥 Faganeo, Jacopo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意大利人 Italian

法西斯主义者 Fascist-s

阿帕切族人 Apache

英国人 British

保加利亚党 Party of Bulgaria

浮士德 Faust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Ferdinand and Isabella

斐迪南·查尔斯 Ferdinand Charles

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 Ferdinand of Bulgaria,King

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 Ferdinand of Habsburg

G

奥地利人 Austrians

性格 character

皇室领地 crown lands

在萨格勒布的影响 influence in Zagreb

意大利人与之联盟 Italians in league with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大臣 minister from Albania

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苏台德区 Sudeten

游客 tourists

贝尔格莱德的战争公墓 war cemetery at Belgrade

德国 Germany

进攻贝尔格莱德 attack on Belgrade by

早期 early

食物 food in

希特勒的 Hitler's

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

犹太人 Jews of

借贷给保加利亚 loan to Bulgaria by

机械化部队 mechanized forces of

纳粹 Nazi

罗马尼亚妥协 Roumanian concessions to

斯巴达克同盟成员 spartacists in

“雄鹰体育协会” “Hawks, The”.

见“索科尔体育协会” “Sokols”

海顿 Haydn

佩兴斯·坎普《治疗仪式》 Healing Ritual The, by Patience Kemp

健康合作社诊所 Health Cooperative Society Clinic

圣慧教堂 Heavenly Wisdom, Church of

保安团 Heimuxhr

海涅 Heine

海伦皇后 Helen, Empress

尼古拉亲王的女儿海伦公主 Helen, Prince Nicholas's daughter

沙皇的姐姐 Tsar's sister

安茹的伊莲 Helene of Anjou

海勒南塔尔 Helenenthal

赫弗里希 Helfferich

纳维尔·亨德森爵士 Henderson, Sir Nevile

亨利一世 Henry the First

亨利七世 Henry VII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赫佩尔的 Heppell's

希拉克里亚 Heracleia

希拉克略 Heraclius, Emperor

新海尔采格 Hertseg Novi

I

见圣女贞德 Arc,Jeanne d'

拜占庭皇帝约翰 John, Byzantine Empero

约翰皇帝 John, Emperor

《约翰·布朗的躯体》 “John Brown's Body”

尼奥帕特拉斯的约翰公爵 John of Neopatras,Duke

约瑟夫皇帝 Joseph, Emperor H.W.B.

约瑟夫 Joseph, H. W. B.

玛丽·巴什克尔特塞夫《日记》 Journal of Marie Bashkirtseff

威廉·乔伊特爵士 Jowitt, Sir William

犹太教 Judaism

卡米尔·M. 朱利安 Julian, M. Camille

朱利乌斯侄子 Julius the Nephew

见朱利乌斯·尼波斯 Julius Nepos

朱利乌斯·尼波斯 Julius Nepos

朱诺 Juno

朱诺，阿布兰特什公爵 Junot. the Duke of Abrantès

查士丁尼 Justinian

K

弗朗茨·卡夫卡 Kafka, Franz

卡衣丹 Kaïdan

凯马克莎兰 Kaimakshalan

卡莱梅格丹城堡 Kalemegdan

卡塔琳娜 Kalarina

阿拉贡的凯瑟琳 Katherine of Aragon

约翰·济慈 Keats, John

彼得·凯格勒维奇 Keglevitch, Peter

戈特弗里德·凯勒 Keller, Gottfried

坎普《治疗仪式》 Kemp's Healing Ritual

克伦斯基 Kerensky

纳塔利娅·凯斯科女士 Keshko, Natalia,Mlle

见纳塔利娅·奥布伦诺维奇 Obrenovitch, Natalia

鞑靼可汗 Khan of Tartary

哈尔科夫 Kharkov

班库恩赫德瓦里 Khuen-Héderváry, Ban

《李尔王》 King Lear

“国王避难所” “King's Shelter, The”

基斯利亚克 Kiselyak

圣斯特克莱门特 Klement, Sveti

克利希 Klish

克洛普施托克 KJopstock

科比利奇 Kobilitch.

见米洛什·奥比利奇 Obilitch, Milosh

科拉辛 Kolashin

警察局长 Chief of Police at

L

摩尼教徒 Manichaean

摩尼教 Manichxism, and Slavism

马塞林努斯 Marcellinus

意大利马尔凯蒂斯 Marchettis, Italian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玛格丽塔 Margareta

玛丽亚山 Marian, Mount

《威廉·迈斯特》中的玛丽安娜 Mariana in Wilhelm Meister

玛丽娅·特蕾莎 Maria Theresa

法国王后玛丽·路易斯 Marie Louise,Empress of France

马里昂巴德 Marienbad

罗马尼亚玛丽公主 Marie of Roumania,Princess

亚历山大妻子 Alexander's wife

罗马尼亚玛丽皇后 Marie of Roumania,Queen

莫里茨将军 Marits, General

南斯拉夫玛丽亚王后 Mariya of Yugoslavia,Queen

马克·安东尼·德·多米尼斯 Mark Antony de Dominis

马可王子（后成为国王） Marko, Prince（later,King）

修道院的院长 Abbot at monastery of

王子修道院 monastery of Prince

马尔蒙元帅 Marmont, Marshal

《费加罗的婚礼》 Marriage of Figaro, The

征服者 the Conqueror

伊斯兰教 Mohammedanism

伊斯兰教徒 Mohammedans

黑山人 Montenegrin

蒙古人 Mongol-s

帝国 Empire

蒙田 Montaigne

黑山人 Montenegrin-s

军队 Army

美丽 beauty of the

运往的炸弹 bombs sent to

边境 borders

性格 character of

政权 state

黑山共和国 Montenegro

军队 Army of

教会与政权 church and state in

政府 government of

历史 history of

国王 King of

风景 landscape of

大山 mountains of

N

那不勒斯 Naples

拿破仑 Napoleon

打败奥地利 defeated Austria

俄国人 Russians and

战争 wars of

路易斯·拿破仑 Napoleon, Louis

国防协会 Narodna Obrana

纳斯蒂奇 Nastitch

诺姆 Naum

纳粹分子 Nazi-s

空军 Air Force

“浴血” “Blood Bath”

合作 collaboration with

占领 domination

法国人 French

德国人 German

政党 Party

纳粹主义 Nazism

德国人 German

纳粹主义 Nazismus

尼迪奇将军 Neditch, General

尼曼雅皇室 Nemanya-s

P

保罗教派 Paulicianism

帕萨尼亚斯 Pausanias

安特·帕韦利奇 Pavelitch, Ante

汉弗莱·佩恩在雅典卫城的古代大理石雕塑 Payne, Humfry, Archaic Marble Sculpture in the Acropolis, by

和平 Peace of

和平誓言联盟 Peace Pledge Union

农民国际 Peasant International

农民党 Peasants' Party

培尔·金特 Peer Gynt

查理·裴盖 Péguy, Charles

佩列萨奇 Pelyesatch

珀拉斯特 Perast

文艺复兴时期教堂 Renaissance church in

白人神父 Peres Blancs

佩尔莎嬷嬷 Persa, Aunt

珀尔修斯 Perseus

波斯 Persia

战争 war

贝当 Pétain

佩奇 Petch

丹麦人 Dane at

教皇英诺森六世 Pope Innocent VI

教皇利十世 Pope Leo X

《意大利人》 Popolo d'Italia

波波维奇 Popovitch

夫人 Mrs.

奥斯曼帝国政府 Porte, Sublime

葡萄牙 Portugal

《群魔》 Possessed, The

波蒂奥雷克将军 Potiorek, General

迪莉斯·鲍威尔 Powell, Dilys

温思罗普·麦克沃思·普雷德 Praed,Winthrop Mackworth

近卫兵 Praetorian Guard

国事诏书 Pragmatic Sanction

布拉格 Prague

普雷斯帕 Presba

普雷斯帕湖 Prespa, Lake

普雷斯堡和平 Pressburg, peace of

普里维切维奇家族 Pribitchevitch, family of

斯韦托扎尔 Svetozar

普里莱普 Prilep

对色雷斯统治者的崇拜 cult of Thracian Ruler in

普里莱普王子 Prilep, Prince of

见马可王子 Marko, Prince

丹麦王子 Prince of Denmark

保罗亲王博物馆 Prince Paul, Museum of

普林西普 Princip

普里斯卡 Prisca

普里什蒂纳 Prishtina

普里兹伦 Prizren

普罗查斯卡先生 Prochaska, Mr.

新教 Protestantism

马塞尔·普鲁斯特 Proust, Marcel

清教徒 Puritan

普沙拉 Pushara

普希金 Pushkin

普特纳 Putna

金字塔 Pyramids

Q

黑羊与灰鹰文献及索引贵格会教徒 Quakers

“德拉加王后科洛舞” “Queen Draga's Kolo”

R

拉布 Rab

圣克里斯多福钟塔 Campanile of St.Christopher of

反塞尔维亚情绪 and anti-Serb feeling

卡尔洛夫奇以前的清真寺 formerly mosque at Karlovtsi

现代 modern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斐迪南皇帝 and Emperor Ferdinand

罗马天主教徒 Roman Catholic-s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毁灭 destruction by the

东 Eastern

西 Western

北非作为其一个单元 North Africa a cell in the

罗曼诺夫人 Romanoff-s

建筑与装饰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皇室 court of the

奢侈 luxury

王位 throne of the

罗马人 Romans

匈奴人 and Huns

军团 Legionaries

罗马 Rome

毁灭 destruction by

龙萨 Ronsard

亚历山大港圣彼得 St. Peter of Alexandria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帝国军事学院 Imperial military academy of

布坎南爵士 Sir Buchanan at

圣彼得·托马斯 St. Peter Thomas

圣普罗科皮尤斯 St. Procopius

圣萨瓦 St. Sava

敕令 Order of

圣萨维那 St. Savina

圣西缅 St. Simeon

圣西蒙 St. Simon

圣索菲亚 St. Sophia

圣维特斯 St. Vitus

《圣维特节》（史蒂芬·格拉汉姆） St. Vitus' Day（Stephen Graham）

圣维特斯节 St. Vitus's Day

萨拉曼卡派成员 Salamancans

索尔兹伯里平原 Salisbury Plain

萨罗纳叶 Salonae

主教 Bishop of

萨洛尼卡 Salonika

密谋 conspiracy

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湖 Lake

帕夏 Pasha of

帕夏领地 Pashalik of

色巴思 Sebaste

科德贝克附近的塞纳河 Seine near Caudebec

塞利姆 Selim

塞尔维奥总督 Selvio, Doge

塞尼 Senj

歌咏节 Song Festival at

射击 shooting at

塞法尔迪犹太人 Sephardim

塞尔维亚军队 Serbian Army

在科孚岛 at Corfu

1915年 of 1915

守卫 defence

宣言 manifesto

撤退 retreating

派往俄国的幸存者 survivors sent to Russia

塞尔维亚帝国 Serbian Empire

艺术 art of the

堕落 decadence of the

边境警察 frontier police of the

暴君 Despot

政府 Government

“塞尔维亚王冠”旅馆 hotel “Serbian Crown”

“塞尔维亚国王旅馆” “Hotel of the Serbian King”, in

入侵 invasion of

作为统帅的卡拉乔尔杰 Karageorge as Commandant of

国王 Kings

35年前 35 years ago

1815年解放 liberated in 1815

迈克的成就 Michael's achievements in

皇长子米洛什 Milosh, first prince of

军事局势 military situation of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老塞尔维亚 Old

族仇 blood feuds of

由圣萨瓦组织 organized by St.Sava

南方 South

给予最后通牒 ultimatum given

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统治之下 under Peter Karageorgevitch unhappiness of

1912年的胜利 victory in 1912

中世纪妇女 women in medieval

塞尔维亚人 Serbs

基督徒 Christian

风俗 custom

舞蹈 dancing

在科索沃战败 defeated at Kossovo

不满 discontentment of

刺绣 embroideries

巴尔干民间医药学 folk-medicine of the Balkan

食物 food

德国仇恨 German hatred of

问候 greeting

在波斯尼亚 in Bosnia

独立 independence

九世纪 in the 9th century

生活 life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of

正教会 Orthodoxy

使问题复杂化的各民族 peoples complicating the problem of

达尔马提亚定居者 settlers of Dalmatia

斯洛文尼亚礼拜仪式，以及 Slovene liturgy and the

奥匈帝国士兵 soldiers in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统治者 ruler

南方 South

斯狄德 Stead, W. T.

斯蒂德·韦翰 Steed, Wickham

斯蒂芬妮 Stephanie

史蒂法诺波利 Stephanopoli. Monsieur

国王史蒂芬二世 Stephen II , King

史蒂芬（拉扎尔大公的儿子） Stephen（son of Tsar Lazar）

史蒂芬亲王（米卢廷国王的儿子） Stephen,Prince（son of King Milutin）

史蒂芬·杜尚 Stephen Dushan

见史蒂芬·杜尚 Dushan, Stephen

匈牙利国王史蒂芬 Stephen of Hungary, King

匈牙利第一加冕国王史蒂芬 Stephen the First-crowned, King

小史蒂芬 Stephen the Little

抄写员史蒂芬 Stephen the Scribe

斯特普尼亚克 Stepniak

斯托亚迪诺维奇 Stoyadinovich

敌对情绪 feeling against

亲纳粹宣传 pro-Nazi propaganda of

斯特拉希米尔·伊沃黑山 Strashmir Ivo the Black

“力量来自欢乐”运动 Strength Through Joy movement

斯特林堡 Strindberg

斯特林堡《离婚》 Strindberg's Divorce

T

茨冈人 Tziganes

U

乌格里耶沙 Uglyesha

乌里兹·阿里 Uliz Ali

教皇至上主义派 Ultramontane Party

《尤利西斯》 Ulysses

美国 United States

大学宿舍 University Students' Hostel

乌里 Urizen

史蒂芬·乌罗什国王 Urosh, King Stephen

乌斯科克游击队 Uskoks

乌日策 Uzhitse

V

瓦伊斯蒂纳 Vaistina

瓦克基奇家族 Vakchitch family

瓦库夫 Vakuf

瓦莱里娅 Valeria

瓦勒塔 Valetta

查理·德·瓦鲁瓦 Valois, Charles de

汪达尔人 Vandals

瓦兰吉卫士 Varangian guard

W